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七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

主编：A·阿杜·博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七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1880-1935年

A. 阿杜·博亨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II
Africa under Colonial Domination 1880-1935

EDITOR A.ADU BOAHEN

Unesco ISBN 92-3-501713-0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责任编辑：张元一
责任校对：燕桂珍

非洲通史　第七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1880-1935年

A.阿杜·博亨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向阳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47.75印张　字数1200（千字）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
ISBN 7-5001-0086 8/K·3
定价：（精）28.15元

非洲通史　第七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1880-1935 年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

第 一 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编辑　J.基-泽博）

第 二 卷　非洲古代文明
（编辑　G.莫赫塔尔）

第 三 卷　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
（编辑　M.法西、I.赫尔贝克）

第 四 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编辑　D.T.尼昂）

第 五 卷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
（编辑　B.A.奥戈特）

第 六 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编辑　J.F.A.阿贾伊）

第 七 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 年
（编辑　A.A.博亨）

第 八 卷　1935 年以后的非洲
（编辑　A.A.马兹鲁伊、C.旺济）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 七 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全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卷翻译工作由中国社全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承担，屠尔康同志主持这一工作，并由陈绂、吴慎娴、吴良健、郭健、葛佶等同志参加审订。我公司担任本卷译稿编审工作的是张元一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年5月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M.B.艾克潘，〔11.2，28.2〕

艾伦·哈奇森图书馆，〔29.5〕

K.阿萨雷·奥波库，〔20.7〕

英国广播公司赫尔顿图片图书馆，〔2.2(e)，4.3，4.4，6.4，13.1(c)，13.1(d)，16.1，17.1，17.2〕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25.2〕

内罗毕东非出版社，〔7.2，26.1，26.2〕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5〕

伦敦外交和联邦事务部，〔19.4〕

佛兰克·卡斯公司，〔19.1〕

班加西加里扬尼斯大学中央图书馆，〔5.1，5.2〕

阿尔兰盖-维奥莱特，〔2.2(f)，5.4，6.1，6.5(a)，6.5(b)，10.2，10.3，11.1，23.1，23.2，24.1，28.2〕

霍普森，苏珊，〔6.2〕

《伦敦图解新闻》图片图书馆，〔13.3〕

伦敦帝国军事博物馆，〔2.2(d)，12.1，12.2，12.3，12.4，12.5，13.4〕

伦敦国际非洲研究所，〔27.1〕

基斯通新闻社，〔16.3，25.3〕

拉皮·维奥莱特，〔10.1〕

朗曼出版公司，〔2.2(c)，6.3，9.2，16.2，24.2，25.1〕

玛丽·埃文斯图片图书馆，〔2.1，4.1，13.1(a)〕

伦敦卫理公会传教会，〔20.4〕

巴黎人类博物馆提供的封面图像

伦敦人类博物馆，〔1.1〕

伦敦国家军队博物馆，〔2.2(a)，9.1〕

佩珀图片社，〔21.3，26.2〕

罗歇-维奥莱特，〔13.1(b)，13.2，24.3〕

伦敦皇家联邦关系协会，〔2.2(b)，4.2，4.5，7.1，7.3，9.3，19.2，19.3，20.2，29.1，29.2，29.3〕

G.斯皮尔曼，1968（见参考文献目录），〔5.4〕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8.1〕

喀士穆苏丹社会事务部，〔23.3〕

T.齐邦古阁下，〔20.6〕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20.3〕
弗吉尔，皮埃尔，〔29.4(a)-(d)〕
沃纳·福尔曼档案馆，〔21.1，21.2〕
赞比亚国家旅游局，〔20.1〕
哈拉雷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8.3〕

---

* 方括号〔 〕内阿拉伯数字为章次及图片编号。

序　言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长期以来，种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仍然不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什么科学的研究。

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来源，然而对非洲人的口头传说，即对各族人民关于他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线索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是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像非洲各族人民实际走过的道路，倒像是作者想当然认为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为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总是参考欧洲的过去行事。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如不摈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此外，非洲大陆几乎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历史实体。相反，却强调这个，强调那个，力图使人相信，远古以来"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人们常把撒哈拉说成是不可通过的地方，阻碍着各族体、各民族的任何融合，也阻碍着沙漠两侧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之间物资、信仰、风俗和思想的任何交流。古埃及和努比亚的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的文明之间，被划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历史，同地中海沿岸历史的联系，确实比它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历史联系要密切得多。但是人们现在普遍承认，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其语言和文化多么不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被历史悠久的纽带联结到一起的一群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分支。

严重危害客观研究昔日非洲的另一种现象是，随着奴隶贸易和殖民化，出现了各种种族成见，它们引起了轻视和无知，并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都被歪曲了。自从被认为是上等人的殖民主义者使用"白"和"黑"两个概念作为人种的标签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不得不既对经济上的奴役又对心理上的奴役进行斗

争。非洲人可由肤色加以辨认，他们成了一种商品，被打上戳记从事繁重劳动，最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就是想象中的所谓劣等尼格罗种族的象征。这种伪造的鉴别模式，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降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历史和文化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必然受到歪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生活和作为国际社会存在理由的相互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使用现有的非洲资料（尽管还是相当谨慎），以比较严格、客观和虚心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在行使其历史能动权的时候，非洲人自己也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恢复自己社会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科文组织出版中的八卷集《非洲通史》，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来自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是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热切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那些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族人民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演变过程的历史资料。

这一繁重任务，由于资料浩繁和文件分散而更趋复杂、更趋困难了。为了解决这个任务，教科文组织不得不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第一阶段是从 1965 年到 1969 年，致力于搜集文件资料和制定工作计划。工作任务是在现场进行的，包括开展活动搜集口头传说，建立一些地区性口头传说文献中心，搜集未经出版的阿拉伯文和阿雅密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一些非洲语言）的手稿，编辑档案目录和《非洲历史资料指南》，这部《指南》是根据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材料辑成的，后来分 11 卷出版。此外，还组织了多次会议，使来自非洲和其他各州的专家们能在一起讨论编史方法问题，经过认真审查现有资料以后，确定了编写大纲。

第二阶段是从 1969 年到 1971 年，致力于使《非洲通史》具有雏形，并把各个部分连接起来。1969 年在巴黎和 1971 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两次国际性专家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关编写和出版《非洲通史》的问题：分 8 卷出版，主要版本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斯瓦希里、豪萨、富拉尼、约鲁巴或林加拉等非洲语文版，还将出版德、俄、葡、西、中文版，以及面向非洲和国际广大公众的缩写本。①

第三阶段是实际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阶段内，首先任命了由 39 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 2/3 是非洲人，1/3 是非洲以外的人，它承担《非洲通史》编审方面的全部责任。

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并且以多方面的研究和多种资料来源为其基础。其中首先是考古学，因为它掌握了非洲文化和文明史的许多关键。由于考古的研究，现在人们承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和历史上首批技术革命的发祥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证明，埃及是世界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所在地。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材料来源是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的极有价值的工

① 第 1 卷、第 2 卷已出葡文和西文本，第 1 卷已出阿拉伯文本。

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我们十分感激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员，以及各卷各章的编辑和作者，感谢他们真实而全面地说明了昔日的非洲，感谢他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来研究实质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列举以下几个：贩卖奴隶，这是一个“流血不止的创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大规模背井离乡，它耗尽了非洲大陆的元气，与此同时，却大大发展了欧洲的经济和商业；殖民化给人口、经济、心理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后，非殖民化和建国的进程，这激发了当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激情，他们至今往往还很活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很注意真实性和严谨性，这是《非洲通史》一书的巨大优点。《非洲通史》对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的显著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xxii

《非洲通史》指出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方法不当，因之要求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两者由于互相作用而密切关联。像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一样，《非洲通史》为进一步大量研究各种专题铺平了道路。

因此，国际科学委员会与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决定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一些专题，以便对非洲过去的某些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在《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和文件集——非洲通史》丛书中②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非洲通史》的有益补充。计划编写的有关国别史或分地区史的著作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团结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历史学家不加区别地当作是非洲文化特点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不是采取这种态度。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同一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的普遍概念。虽然在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差别，但是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西半球某些国家的感觉、思维、想象和行为的方式，都有从非洲继承的标志。从美国南部到巴西北部，跨越加勒比地区以及在太平洋沿岸，非洲文化遗产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这种文化遗产甚至加强了居民某些最重要成分的文化特性。 xxiii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和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之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

② 该丛书已出版下列8卷：《古埃及居民和辨读麦洛埃手稿》；《15至19世纪的非洲奴隶贸易》；《跨越印度洋的历史关系》；《南部非洲史学史》；《非洲的非殖民化：南部非洲和非洲之角》；《非洲的种族名称和地名》；《1935年至目前黑非洲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关系》和《现代非洲历史的方法论》。

到，并且流传下去。

我当过教师，并且从独立的早期起，担任过西非和中非几个国家第一个史地课程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为了教育青年，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情况，由洞悉非洲的问题和希望、并能从整体来理解非洲大陆的学者编写一部史书，是多么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教科文组织的目标在于保证，用多种文字出版《非洲通史》，广为发行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和编排广播电视节目。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包括小学生和大中学生，从而可以更真实地了解非洲大陆的过去以及说明过去情况的各种因素，还可以更公正地理解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因此这部《非洲通史》必将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正义、进步和和平的事业。至少，这是我最诚挚的希望。

我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各位委员、报告员、各卷编辑、作者和所有参加这部巨著写作的人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完成的著作和所作出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具有不同背景，但在为普遍真理服务过程中都怀有同样的善意和热情的人能够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国际体制内，完成一部有巨大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著作。我同样感谢各组织和各国政府，承蒙他们热心帮助，教科文组织得以出版不同文种的《非洲通史》，从而保证这部著作具有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影响，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

编写计划说明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前任主席

B.A.奥戈特

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大会责成总干事主持编写《非洲通史》。1970年，执行局成立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执行这一巨大任务。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971年通过的章程，本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不是非洲人），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在本委员会任期内以个人身分进行工作。 xxv

本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本书的主要特点。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各点：

（a） 虽然《非洲通史》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最高科学水平，但是它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而是一部摆脱教条主义的综合性著作。它将在许多方面，说明一些问题，叙述当前对各种问题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它毫不迟疑地提出存在的不同观点。这样，它就为未来的工作奠定基础。

（b） 在这部著作中，非洲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目的是说明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而到目前为止所出版的著作都是过于经常地把它分成若干部分。非洲同其他大陆的历史联系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互相交流和多边影响角度分析这些联系，以便恰如其分地说明非洲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c） 《非洲通史》特别是一部思想、文明、社会和制度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范围很广，包括口头传说和艺术形式。

（d） 《非洲通史》实质上是从内部来观察的。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文明的忠实反映。虽然这部著作要在国际范围内编写、并充分吸取现有科学知识，但承认非洲的遗产也非常重要，还应该说明有利于非洲大陆团结的各种重要因素。致力于从内部观察事物的做法是本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因而除了科学质量而外，还应使这部著作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反映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通史》 xxvi 就能在一个专心从事经济和技术斗争的时代提供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准则概念。

本委员会决定，涉及三百多万年非洲历史的这部著作分八卷出版，每卷约有八百页正文，内附插图、照片、地图、图表。

每卷由一名主编负责，必要时配备一名或两名副主编。各卷编辑均由本委员会从委员中或从外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产生。各卷主编和副主编根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计划进行工作。在科学性问题上，他们在各卷内容、文字定稿、插图，总之，就《非洲

通史》的全部科学技术方面问题对本委员会负责，或在两届会议之间对本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审定最后文稿。在办公室认为文稿可以交付出版的时候，将文稿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而本委员会，或在两届会议之间由办公室对本书负完全责任。

每卷约三十章。每章由一名主要作者执笔，必要时由一或两名合作者协助。作者由本委员会根据其简历遴选。对非洲作者，给予优先考虑，但他们必须具备应有的资历。还尽可能特别保证，在作者中，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以及与非洲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其他地区有同等代表。

在每卷编者审毕各章文稿以后，文稿送交委员会全体委员征询意见。此外，编者将每卷待审文稿送交审读委员会，审读委员会是按照委员的专业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内部设立的。审读委员会对各章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办公室最后审核文稿。

这种程序看来时间长，涉及面广，但已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保证《非洲通史》的科学客观性。事实上，确有几次，办公室不同意原稿内容，或是坚持作重大修改，甚至另请作者重写某章。有时要去请教精通某一阶段历史或某一问题的专家，以便对某卷内容进行最后定稿。

本书将先出版英、法、阿拉伯文的精装本，然后再出版这三种文字的平装本。英、法文的节本将译成非洲各种文字。本委员会已选定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作为第一批非洲文字来翻译本书。

xxvii

还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出版《非洲通史》的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

因此十分明显，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对于非洲史学家和广大学术团体，以及对于正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教科文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编写这样一部非洲大陆历史肯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以往三百万年，要利用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而且要动用不同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学者参加。这是一部全大陆的国际性多学科巨著。

总之，我要强调这部著作对非洲和对世界的重大意义。正当非洲各族人民为团结和进一步合作进行奋斗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了解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源泉。

纪 年 注 释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方法来书写年代。史前年代，可用两种不同方法书写。 xxix

一种方法是参照现在的纪元，即距今的年代，以＋1950年为基准年；所有的年代是相对于＋1950年的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参照基督纪元的开始。日期前简单加上＋号或－号以表示相对于基督纪元的年代。在提到世纪时，以“我们纪元前”和“我们纪元”字样代替公元前和公元这两个用语。

举例如下：

(i) 距今2300年＝－350年

(ii) 公元前2900年＝－2900年

公元1800年＝＋1800年

(iii) 公元前5世纪＝我们纪元前5世纪

公元3世纪＝我们纪元3世纪

目　录

插图目录

图片目录

表格目录

1 面对殖民挑战的非洲

A.阿杜·博亨

非洲历史上发生的变化从来没有像1880年至1935年之间发生的如此众多，如此迅猛。的确，这些变化中最带根本性和最富有戏剧性的（虽然是悲剧性的）变化是发生在1890年至1910年这段短得多的时间里。在这段时间内帝国主义列强在实际上征服和占领了整个非洲大陆，并建立起殖民制度。1910年以后时期基本上就是殖民制度的巩固和开拓的时期。这出戏的进度实在惊人，因为迟至1880年，非洲还只有极其有限的地方处于欧洲人直接统治之下。当时整个西非，只有塞内加尔的岛屿和沿海地带，弗里敦城及其郊区（在今塞拉利昂），黄金海岸（今日加纳）的南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和达荷美（今日贝宁）的波多诺伏两地的沿海地带，以及拉各斯岛（在今尼日利亚境内）已由欧洲人直接统治。在北非，只有阿尔及利亚在1880年以前已成为法国殖民地。整个东非没有一寸土地由任何欧洲国家控制，而整个中非只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沿海一些地段由葡萄牙人统治。只是在南部非洲，外来统治不但已经牢固树立，而且已向内地延伸了相当距离（参看插图1.1）。总之，迟至1880年，非洲大陆约有80%是由自己的国王、女王、氏族和家族的首领以大小不等、类型各异的帝国、王国、村社共同体和政治实体的方式进行统治。

然而，其后30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非凡的，实际上是一场异常激烈的变化。到了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是仅有的例外，整个非洲大陆全都沦为欧洲列强统治下大小不等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通常在自然条件上远比原先存在的政治实体大得多，但往往同它们甚少关系或竟毫无关系。然而当时失去的不仅仅是非洲人的主权和独立，它也是对已有的各族文化的打击。正如费尔哈特·阿巴斯1930年谈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开拓殖民地时所指出的：对法国人来说，殖民化“不过是一项军事和经济的冒险事业，事后用适当的行政统治加以保卫”。但是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它是“一场确确实实的极大变革，推翻了整个古代的各种信仰和思想，以及古老的生活方式。它使整个民族面临突然的变化。举国上下，毫无准备地发现自己被迫要不就去适应要不就灭亡。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精神和肉体上失去平衡，其空虚无聊的境地同彻底崩溃相去无多”。①这里描绘的殖民主义的性质不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是如此，欧洲人在整个非洲的殖民政策也是如此。差别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只是在方式上而不是在本质上。所以，换言之，在1880年至1935年这个时期，非洲的确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挑战，即殖

① F.阿巴斯（Abbās），1931年，第9页；后文第二十四章中J.伯夸（Berque）加以引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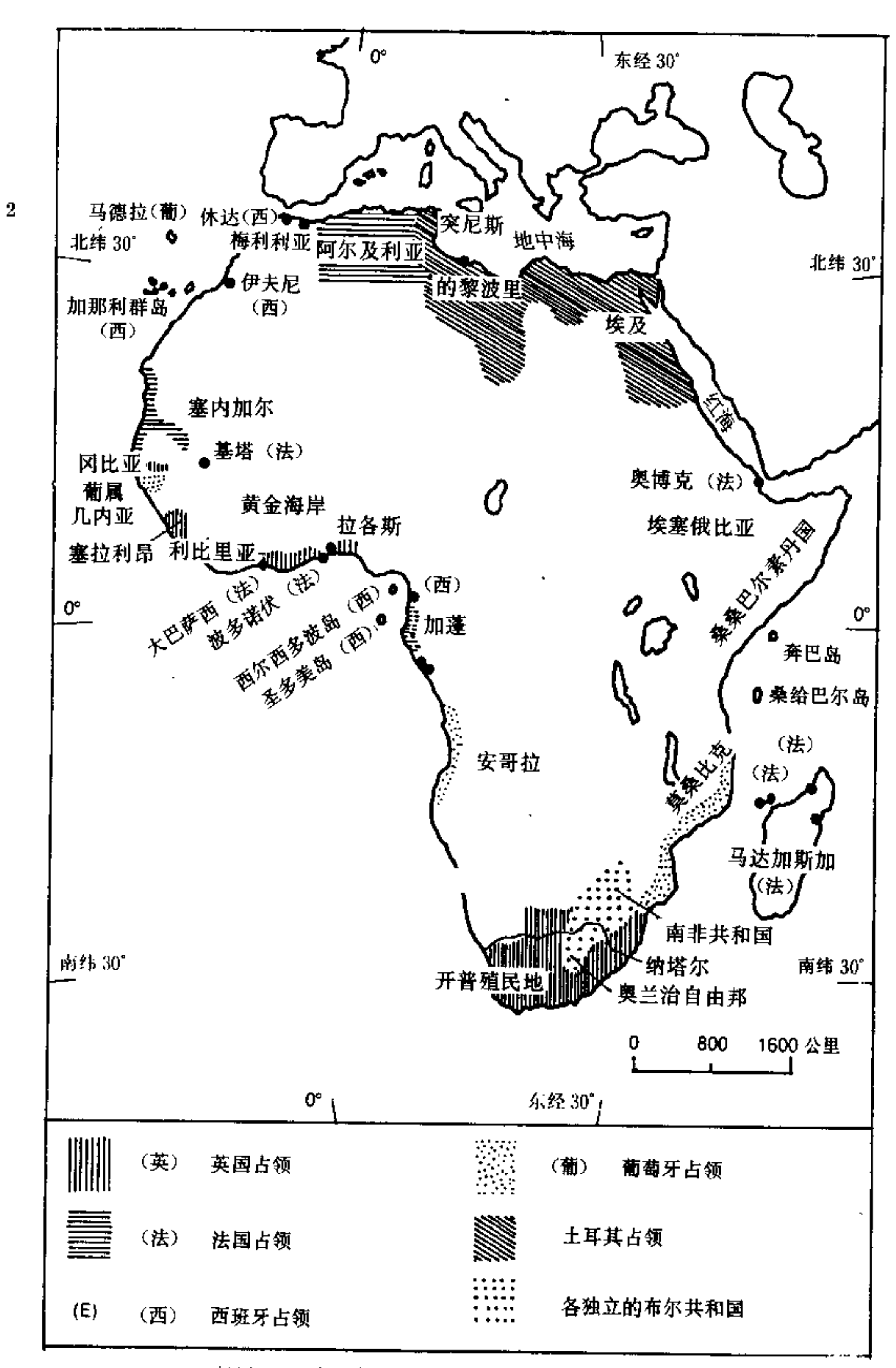


插图 1.1 分割前夕的非洲，到 1880 年为止的征服范围

民主义的挑战。

非洲人的准备状态

对于殖民主义的确立，包括它使非洲人同欧洲人之间在此以前三百年业已存在的关系在性质上发生如此带有根本性的变化，非洲人自身抱着什么态度呢？这是历史学家们(不论是非洲人还是欧洲人)至今未加认真考虑的问题，然而它需要加以解答。答案十分明确：绝大多数的非洲当局和领导人强烈反对这种变化并表明决心要维持原状，特别是要保持自己的主权和独立。关于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都是决不打算让步的。这个答案可由同时代非洲各国领导人自己说的话来证明。1891 年，当英国建议对黄金海岸的阿散蒂国王普伦佩一世予以保护时，他答复说：

> 所提目前情况下的阿散蒂可前来享受女王兼印度女皇陛下保护一节，余意乃需非常严肃考虑之事。对此余愿奉告，吾人已得出结论，认为余之阿散蒂王国决不为此类政策承担义务。阿散蒂必须保持旧貌，同时保持同一切白人友好。余作此书并非浮言自夸，实系剖明真情……阿散蒂之事业方兴未艾，所有的阿散蒂人并无理由对前途感到惶恐不安，或有一刻认为吾人之事业由于前此敌对行动之结果已经受到挫折。②

1895 年，沃博戈（即“莫罗·纳巴”或莫西国王，在现代的上沃尔特）对法国军官德特纳夫上尉说：

> 我知道白人想杀死我以便占领我的国家，而你却声称他们要帮助我把我的国家组织起来。不过我觉得自己的国家照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我不需要他们。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有自己的商人；而且，你该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没有下令砍掉你的脑袋。你现在走吧，最要紧的是决不要回来。③

4

表达类似情绪的还有 1883 年在今塞内加尔的卡约尔国达梅尔（国王）拉特·迪奥尔·迪奥普（引文见后文第 6 章）；1890 年在今坦桑尼亚大陆部分的尧人国王马琴巴（引文见本书第 3 章）；以及现今纳米比亚地方的一个国王亨德里克·维特布依（引文见本书第 3 章）。但这里要举出的最后一个而且是最感动人的证据乃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曼涅里克于 1891 年 4 月致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王的扣人心弦的呼吁书。同样的函件还送致了法、德、意、俄各国元首。在呼吁书中，曼涅里克首先定下当时埃塞俄比亚的疆界，并且（表达了个人的扩张野心）宣称他意图恢复“埃塞俄比亚的从前疆界，远达喀土穆和尼扎湖，包括加拉人的全部领土”，还说：

> **如果远方列强打算分割非洲，我绝不想袖手旁观。在过去 14 个世纪中埃塞俄比亚一直是异教徒海洋中的基督徒的孤岛。**
>
> 既然万能之主至今保佑着埃塞俄比亚，我深信他在今后也将保全它，使它扩大。

② J. 菲因（Fynn）引文，见 M. 克劳德（Crowder）主编，1971 年，第 43-44 页。

③ M. 克劳德，1968 年，第 97 页引文。

1 面对殖民挑战的非洲

A.阿杜·博亨

非洲历史上发生的变化从来没有像1880年至1935年之间发生的如此众多，如此迅猛。的确，这些变化中最带根本性和最富有戏剧性的（虽然是悲剧性的）变化是发生在1890年至1910年这段短得多的时间里。在这段时间内帝国主义列强在实际上征服和占领了整个非洲大陆，并建立起殖民制度。1910年以后时期基本上就是殖民制度的巩固和开拓的时期。这出戏的进度实在惊人，因为迟至1880年，非洲还只有极其有限的地方处于欧洲人直接统治之下。当时整个西非，只有塞内加尔的岛屿和沿海地带，弗里敦城及其郊区（在今塞拉利昂），黄金海岸（今日加纳）的南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和达荷美（今日贝宁）的波多诺伏两地的沿海地带，以及拉各斯岛（在今尼日利亚境内）已由欧洲人直接统治。在北非，只有阿尔及利亚在1880年以前已成为法国殖民地。整个东非没有一寸土地由任何欧洲国家控制，而整个中非只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沿海一些地段由葡萄牙人统治。只是在南部非洲，外来统治不但已经牢固树立，而且已向内地延伸了相当距离（参看插图1.1）。总之，迟至1880年，非洲大陆约有80%是由自己的国王、女王、氏族和家族的首领以大小不等、类型各异的帝国、王国、村社共同体和政治实体的方式进行统治。 1

然而，其后30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非凡的，实际上是一场异常激烈的变化。到了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是仅有的例外，整个非洲大陆全都沦为欧洲列强统治下大小不等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通常在自然条件上远比原先存在的政治实体大得多，但往往同它们甚少关系或竟毫无关系。然而当时失去的不仅仅是非洲人的主权和独立，它也是对已有的各族文化的打击。正如费尔哈特·阿巴斯1930年谈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开拓殖民地时所指出的：对法国人来说，殖民化"不过是一项军事和经济的冒险事业，事后用适当的行政统治加以保卫"。但是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它是"一场确确实实的极大变革，推翻了整个古代的各种信仰和思想，以及古老的生活方式。它使整个民族面临突然的变化。举国上下，毫无准备地发现自己被迫要不就去适应要不就灭亡。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精神和肉体上失去平衡，其空虚无聊的境地同彻底崩溃相去无多"。① 这里描绘的殖民主义的性质不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是如此，欧洲人在整个非洲的殖民政策也是如此。差别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只是在方式上而不是在本质上。所以，换言之，在1880年至1935年这个时期，非洲的确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挑战，即殖 3

① F.阿巴斯（Abbās），1931年，第9页；后文第二十四章中J.伯夸（Berque）加以引用。

进的新变化实际上是欢迎的，因为截到此时这些变化对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不曾构成威胁例如，在西非，多亏传教士的活动，福拉湾学院早在1827年就在塞拉利昂建立，而黄金 6 海岸和尼日利亚到19世纪70年代也已建起一些小学和一所中学。诚然，出生于加勒比的泛非主义者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发起的在西非建立一所大学的呼吁这时已经烟消云散。但早在1887年一些有钱的非洲人就开始把自己的子女送往欧洲深造，接受专业训练，其中有一些甚至已回到黄金海岸成为有完全资格的律师和医生。

尤其是，在废除骇人听闻和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之后，非洲人已能逐步转入以出口经济作物为基础的经济（尼日利亚的棕榈油，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花生），那都在1880年以前，而可可则由泰特·夸西于1879年才从费尔南多波岛重新引入黄金海岸。而这一切是发生在，除沿海一些小块的孤立地区以外，欧洲人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起直接统治的情况之下。诚然，人数相对较少的一批西非人从欧洲式教育得到了好处，到1880年已经光景极好。他们控制着欧洲人行政当局所提供的为数不多的文官职位；在沿海一带，他们中有些人经营着自己的进出口生意，并垄断着进口货物在国内的销售。欧洲人影响仍然处于最低限度的是东非。虽然如此，经过利文斯敦和斯坦利的划时代的非洲之旅以及各传教团体随后进行的宣传，教堂和学校，以及随之而来的公路和铁路，其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至于非洲人方面，他们看不出有何需要对他们同欧洲已经延续数百年之久的关系作任何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确信，如果欧洲人要把变革强加于他们并向内陆强行推进，他们将能同过去二三百年曾经做的那样挡住他们。因此，上面引语中激荡着即使不是蔑视也是充满自信的语调。

但是非洲人没有认识到的是，到了1880年，由于工业革命在欧洲的传播以及随后，由于有以轮船、铁路、电报以及最为重要的以最初的机关枪（马克沁枪）为标志的技术进步，他们所要面对的欧洲人此时有着新的政治野心、新的经济要求和比较先进的技术。这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自由贸易和非正式政治控制的旧时代已经——借用巴兹尔·戴维森的话——让位于"新的帝国主义和相互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时代"⑦，因此，欧洲人现在要的不仅是从事贸易而且是要直接的政治控制。其次，非洲的领导人不懂得，现实的情况是，他们迄今所使用、所储存的枪枝，那些前膛装药的毛瑟枪（法国人在1911年镇压科特迪瓦的鲍勒人的最后反抗以后，从他们那里俘获了21,365支毛瑟 7 枪）⑧，已经完全过时，完全不是欧洲人所用的新式后膛装填的来复枪（以六倍的装药，有十倍的射速）和新式超速射马克沁机枪的对手（参看图片1.1）。英国诗人希莱尔·贝洛克贴切地概括了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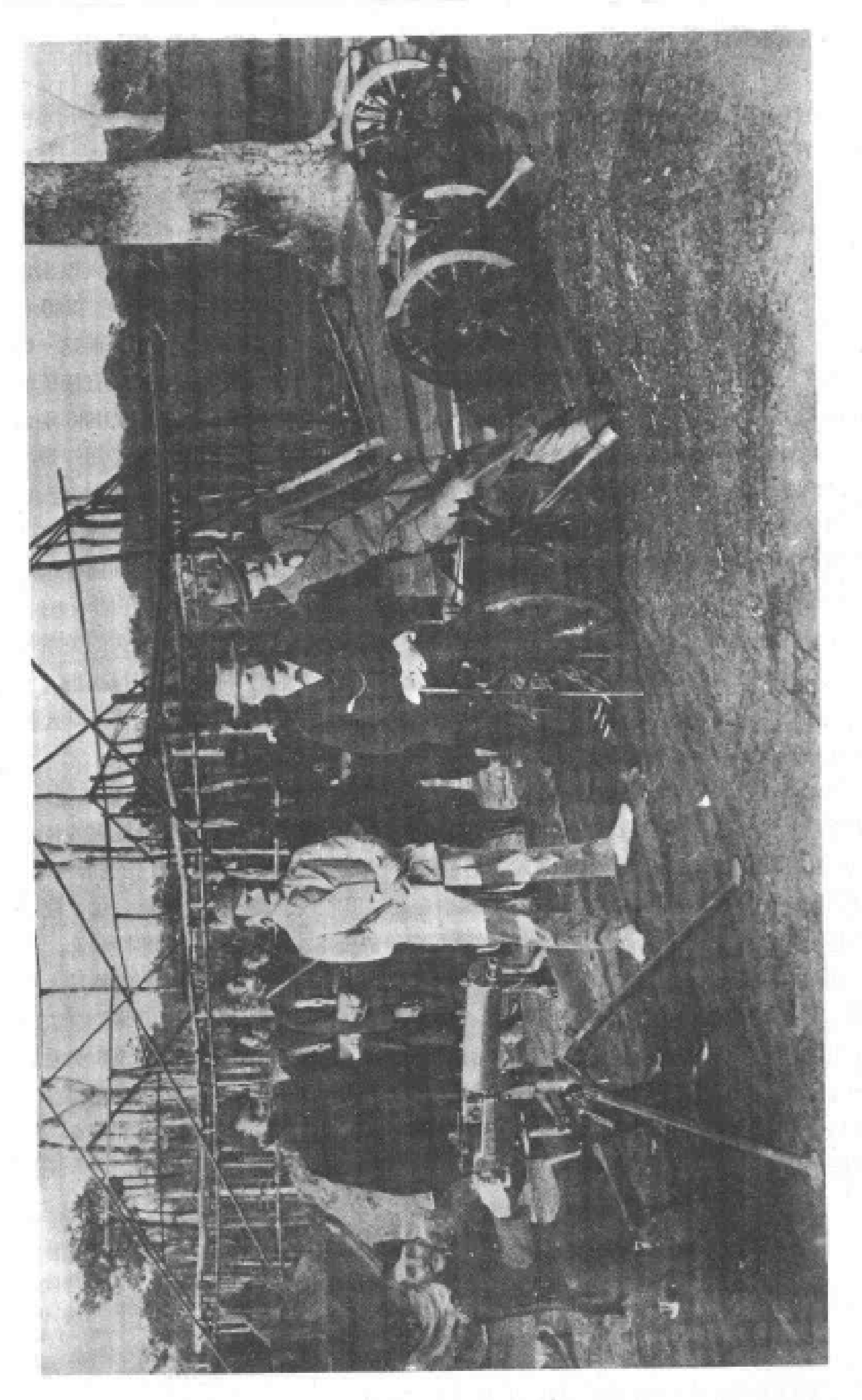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有马克沁枪而他们没有⑨

⑦ B. 戴维森（Davidson），1978a，第19页。

⑧ T. C. 韦斯克尔（Weiskel），1980年，第203页。

⑨ 引文见M. 佩勒姆（Perham），1961年，第32页



图片1.1 1896年的阿散蒂战争（黄金海岸），带着一挺马克沁机关枪的英国侵略者

非洲的君主们恰是在这点上失算了，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造成悲剧。我们在后文中将看到，上面引述的那些首领，除了一个例外，都打了败仗失去了主权。拉特·迪奥尔·迪奥普甚至死于非命，普伦佩、贝哈津和祖鲁族的塞茨瓦约遭到流放，恩德贝勒族的洛本古拉则在逃亡中丧生。只有曼涅里克（后面将有一章专门论述他）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从而保住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第七卷的结构

因此，非洲人同欧洲人的关系显然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880 年至 1935 年之间非洲面临着严重的殖民主义挑战。那么这种非同寻常的挑战，殖民主义的挑战，其根源是什么？或者换个不同说法，三百年之久的非洲与欧洲关系，在这个时期是怎样地又是为什么发生如此巨大的带根本性的变化呢？殖民制度在非洲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为了巩固这个制度又采取了哪些政治、经济、心理和思想上的措施？非洲面对这种挑战准备得怎样？它如何去对付而又取得了什么成就？哪些新变化被接受了？哪些又被拒绝了？旧的东西被保留下来的是什么？被摧毁的又是什么？都做了哪些适应与调节？有多少体制结构遭到破坏，或者说有多少是崩溃瓦解了？这一切对于非洲，对于它的各族人民和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以及对他们的制度习惯都有什么影响？最后，殖民主义对非洲及其历史有何重大影响？这些就是本卷试图回答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和阐述在殖民主义的挑战面前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反应行动，本卷除头两章绪论部分之外，可分三大部分。每个部分冠有一章（第 3、第 13 和第 22 章）从整个非洲大陆的角度概括地研讨本部分的主题，随后数章则按地区分别论述。绪论部分，包括本章及第 2 章，论述非洲同欧洲人关系发生这种根本性变化的前夕非洲人的态度和准备状况以及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征服和占领非洲的原因。应该指出（因为这点常被忽视），实际征服阶段之前，欧洲列强同非洲各国君主进行过多年的谈判和缔结条约的活动。这一谈判阶段表明欧洲列强最初是承认他们的非洲对手和自己是对等的；并且，欧洲列强也承认非洲国家和政治实体的主权和独立。 9

第一部分论述的主题直至 60 年代仍被非洲史学史上的殖民学派所严重歪曲或完全忽视，这就是面对非洲被征服和占领，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反应行动。按照这一学派的成员（诸如H.H.约翰斯顿、艾伦·伯恩斯爵士，以及晚近的马杰里·佩勒姆、刘易斯·H.甘恩和彼得·杜伊格南[10]）的说法，非洲人实际是欢迎建立殖民统治的，因为殖民统治不但使他们免于无政府状态和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某些具体好处。马杰里·佩勒姆就曾如此说：

> 这些部落大部分很快就接受欧洲人统治，认为它是不可抗拒的秩序，这种秩序带来许多好处（首先是和平）和令人振奋的新鲜事物——铁路和公路、灯、自行车、

[10] H. H. 约翰斯顿(Johnston)，1899 年，1913 年；A. C. 伯恩斯(Burns)，1957 年；M. 佩勒姆，1960 a；L.H.甘恩（Gann）和P.杜伊格南（Duignan），1967 年。

> 铧犁、新的食品和作物，以及在大小城市中可以获得和享受到的一切。对各国统治阶级来说（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封立的），它带来了新的地位所赋予的力量和安全，带来了新形式的财富与权力。兼并以后好多年，虽有不少迷惑，但极少发生反叛，看不出对于被统治有过多大屈辱之感。[11]

这一类思想也反映在使用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字眼上，如“绥靖”，英国式和平和法国式和平被用来形容1890年至1914年之间相当于征服和占领非洲的情景。

一些对这个题目给以某种关心的历史学家也仅仅只是对之偶然一提或是一笔带过。英国历史学家罗兰·奥利弗和J.D.费奇在其所著《非洲简史》（初版于1962年，系现代行家关于非洲历史概述的一本最早著作）中，在有足足14页述及已被公认为欧洲人瓜分非洲殖民地的一章中，只用一段文字谈到他们称之为非洲人进行的“拚命抵抗”。本书则用整整七章之多的篇幅来论述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反应行动，目的正是为了纠正殖民学派的上述错误解释，调整一下，突出非洲人的观点。

10 在本书这些章中将可看出，那种认为非洲人是欢欣鼓舞地款待侵略军战士并很快就接受殖民统治的观点，并无有效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上，非洲人的反应正与此相反。十分明显，当时在非洲人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或是乐于放弃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或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们。最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他们绝大多数人，不论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是什么样的结构，不顾面临的形势如何不利，都决定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本卷将充分证明此点。一方面是对他们不利的势力的份量，另一方面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抵抗的力量，本卷封面所载的浮雕抓住了这两个方面。这个浮雕塑在阿波美地方达荷美诸王宫院的一堵墙壁上，描绘一个只用弓箭武装起来的非洲人昂首正对一个用枪武装起来的欧洲人。

例如约翰·D. 哈格里夫斯就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假设已知：

> 欧洲侵略者方面可能持有的态度，非洲统治者可以有的几种选择。从缔结条约和同欧洲人合作所能得到的短期好处不仅仅是可以得到火器和消费品，而且有机会在对外或对内的纷争中获得强有力的同盟者。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非洲国家拒绝这种机会而选择用战斗来抵抗欧洲人呢？[12]

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然而只是对一些从欧洲中心论观点观察整个问题的人方才如此。对非洲人来说，生死攸关的不是短期或长期的好处问题，而是关于他的国土和主权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恰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事实上所有的非洲政治实体，不论是否实行中央集权制，都或早或晚选择维护和保卫自己的主权或是设法恢复自己的主权。对他们来说，这方面不能有任何让步，而且的确，这些国家有许多领袖宁可选择战死沙场、自愿外逃或面对流放，而不愿不经斗争就放弃自己的主权。

---

[11] M.佩勒姆，1960 a，第28页。

[12] J. D.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语，见L. H. 甘恩和P. 杜伊格南合编，1969年，第205-206页。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的非洲统治者确是选择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他们彼此不同之处只在于为达到这个普遍目的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大部分非洲统治者都选择了对抗的战略，他们或利用外交手段，或使用军事手段，或两者兼用。我们在后文中将可看到，萨摩利·杜尔和布尼奥罗人的卡巴雷加是两种手段兼用，而普伦佩一世和布干达的姆万加则倚靠外交手腕。其他的人，如波多诺伏（今贝宁首都）的托发选择了联盟或合作的战略，但这**并不是**与敌人勾结的战略。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这种战略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它一直遭到严重误解，从而导致把某些非洲统治者列为“合作分子”，把他们的行为算作勾结行为。我们反对使用勾结合作这种字眼，不仅因为它不确切，而且因为它是贬义的，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上文已经提到，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头十年之间，就非洲各国统治者而言，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是主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清楚没有人打算让步。被误称为合作分子的那些非洲国家统治者是那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保卫自己主权或甚至夺回也许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自己业已丧失给某一非洲强国的主权的最好方法**不是**同欧洲侵略者勾结一起而是同他们**联盟**。一个合作分子当然是个背叛民族事业的人，他同敌人勾结，追求敌人的目的和意图，而不是追求自己民族的利益。然而，如上文所述，所有非洲人都勇敢地面对放弃主权还是保持或收复主权这个问题。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同欧洲人连在一起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目的，所以把他们叫做合作分子是完全错误的。 11

无论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合作分子一词有着十分贬抑的涵义，有意思的是使用这个词的某些历史学家是知道这一点的。例如，R.鲁宾逊说：“应当着重指出，使用〔合作分子〕这个词并无贬意”⑬。问题就在于，即使这个词可以这样用，为什么非得用它不可，特别是在非洲情形下它是如此地不准确？为什么不用确是比较贴切的“联盟”一词？波多诺伏地方的贡族王国国王托发总是被举为合作分子的典型例子。但他果真是如此吗？正如哈格里夫斯清楚指出的，⑭托发在法国人到来之时正面对着三个不同的敌人——东北方的约鲁巴人，北方达荷美的丰族诸王，和沿海的英国人——他必然是把法国人的到来看作是天赐的良机，不但可以保护自己的主权，甚至可以挫败诸敌，捞到好处。所以他自然不是选择同法国人**勾结**而是同法国人**联盟**。无疑地，历史学家们，只有那些不晓得托发当时面临的问题的人或是不承认非洲人有任何能动性、不承认非洲人对自己的利益有任何了解的人，或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看待整个问题的人，才会把托发说成是一个合作分子。此外，以下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词的谬误：在某些时候准备与欧洲人联盟的所谓合作分子，常在后来成为欧洲人的反对者或反抗者。莫西国王沃博戈、卡约尔国的达梅尔拉特·迪奥尔·迪奥普，甚至伟大的萨摩利·杜尔本人都是这类统治者的典型例子。因此这种分类是十分荒唐无稽的。

最后，只有那些对于欧洲人分割和征服前夜的非洲政治和民族-文化情况确是无知或是持有极其简单化观点的历史学家才会使用这个词。他们以为所有非洲国家，都像许多 12

⑬ R.鲁宾逊(Robinson)语，见R.欧文(Owen)和B.萨克利夫(Sutcliffe)合编，1972年，第120页。

⑭ J.D.哈格里夫斯，见L.H.甘恩和P.杜伊格南合编，1969年，第214-216页。

欧洲国家那样，居住着同一民族-文化群体或民族，所以这个族体的任何部分同一个入侵者联盟就可以称做合作分子。但是并无一个非洲国家或殖民地或帝国是由这种单一的族体构成。每个国家或帝国都居住着许许多多的民族-文化群体或民族，他们彼此有别，就如，比方说，意大利人与德国人或法国人的不同。而且，在欧洲入侵者到来以前，这些不同族体之间的关系常是敌对的，有的甚至还遭到另一个的征服。把这种遭到征服的或互相敌对的群体中，选择同入侵的欧洲人团体联合，以对抗自己过去的外敌或统治者的人，叫做“合作分子”那是没抓住要点。的确，本卷有几章将证明，非洲人对殖民主义所作的反应和回答的性质不仅决定于非洲人所面对的民族-文化和政治的情况，而且也决定于在对抗之际，具体社会中起作用的各种社会-经济力量的性质以及这个社会中政治组织的性质。

许多欧洲历史学家一直谴责反抗者是空想、是近视，而称赞所谓的合作分子是有远见和进步，例如奥利弗和费奇于1962年写道：

> 如果这些人〔非洲各国统治者〕有远见，消息灵通，尤其是如果他们能有传教士或商人之流作为顾问，他们可能深深懂得抵抗将一无所得而谈判可大有所获。如果他们不如别人有远见，不如别人走运，或不如别人那样得到好顾问，则将看到自己的传统敌人同入侵者站在一起，而他们自己则将采取抵抗态度，其下场完全可能是军事上战败，首领地位被罢黜，国土丢给占领国的本地同盟者，甚至于社会或国家在政治上可能沦于破碎……犹如早年的奴隶贸易，有赢家也有输家，在每个殖民领地的疆界之内两者都可见到。⑮

罗纳德·E.鲁宾逊和约翰·加拉格尔也曾把敌对或抵抗行动说成是一些“反对现实的、空想的、倒退的斗争，是各国社会由于受到新的变革时代的冲击得不到安慰而发出的急躁的抗议。”⑯但是这些观点大成问题，抵抗者与所谓合作分子的划分法不但是机械论的而且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奴隶贸易中确是有输家有赢家，但这一次却没有赢家。抵抗者和所谓合作分子到头来都输了，而有趣的是，今天仍受人们怀念的恰是所谓的空想的领袖和拚命顽抗的人，他们成了当今民族主义领袖们鼓舞力量的源泉。⑰我完全同意罗伯特·I.罗特伯格和阿里·A.马兹鲁伊的论断：“不可否认，西方准则与权力的引进，和伴随而来的控制与束缚，在非洲到处受到有关各族人民的怀疑。”⑱

然而，不论非洲人采取了什么战略，他们（利比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仅有的例外）由于后文将加以阐述的原因，全都未能保住自己的主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本卷第一部分的截止期），非洲已经沦于殖民统治。面对这种殖民宰割，利比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如何地设法生存下来，原因又是如何，将在第11章加以论述。

⑮ R.奥利弗（Oliver）和J.D.费奇（Fage），1962年，第203页。

⑯ R. E. 鲁宾逊和J. 加拉格尔（Gallagher），见F. H. 辛斯利（Hinsley）主编，1962年，第639-640页。

⑰ 关于这一论点的进一步发挥参看A. A. 博亨（Boahen）著，《关于非洲对殖民主义的应付办法和反应行动的新的分类和分期》（未刊稿），本章有些部分系依据该文。

⑱ R. I. 罗特伯格（Rotberg）和A. A. 马兹鲁伊（Mazrui）合编，1970年，第xviii页。

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插曲之后，这些殖民国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又如何对待自己的新殖民地呢？本卷第二部分就将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为管理自己的殖民地而设计出来的各种政治机制，和在其背后的各种意识形态，在现有的研究非洲殖民主义的许多著作中已有充分论述，[19] 所以这里只用一章谈这个问题，而把远为更多的注意力用到殖民制度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以及殖民制度对非洲的影响方面，以求纠正不平衡的状况。在这些章中我们将可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35年这个时期（晚近某些历史学家曾称之为殖民主义如日中天的时期）的确出现修建公路、铁路的基础设施，推行某些社会改革如设立小学和中学；然而殖民统治者心中有个主要目的，即开发非洲的资源（动物的，植物的和矿物的），纯粹为了殖民列强和它们的商业机构——宗主国的矿业和金融公司——的利益。该部分有一章应特别注意，即讨论殖民统治的人口方面问题那一章。这个题目在现有关于非洲殖民主义的概述中通常是看不到的。

面对这种巩固殖民主义和剥削非洲大陆的情况，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反应行动是什么 14 呢？这是本卷第三部分所要解答的问题。本书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并遵照本书所依据的哲学，即从非洲人的立场观察历史，突出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反应行动。这个时期非洲人态度的特点肯定地不是漠不关心或消极被动或欣然接受。如果说，这个时期曾被说成殖民主义的典范时代的话，那么它也是非洲的抵抗或抗议战略的典范时代。在概述部分和随后的分地区考察中我们都能看到，非洲人确曾使用各种的手段和措施——确实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抵抗殖民主义。

应该强调指出，这时候的目标（除北非国家领导人的目标以外）不是推翻殖民制度而是谋求改善它，在其中得到适应。主要目标在于使殖民制度不那么暴虐，不那么灭绝人性，使它对非洲人和欧洲人都有利。非洲各国领导人谋求纠正诸如强迫劳动、重税、强制种植某种作物、土地转让、通行证法、农产品贱价而进口货高价、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之类具体的措施和弊政，并改进不够充分的设施如医院、自来水和学校之类。

应该强调指出，对殖民制度的这类不满，社会各阶层都有体会，不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文盲，也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于是他们中间产生了共同的意识，成了与他们的压迫者（殖民统治者和白人）相对立的非洲人和黑人。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非洲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强化起来了。紧接着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殖民制度建立完成，非洲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就开始蓬勃兴起。

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个时期，表达这种情绪和领导这个运动是传统当局的责任，并且是在殖民地以前的政治结构的框架内发展的，而如今则由新起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或新兴中产阶级承担起来。颇为自相矛盾的是，那些新的领袖是殖民制度自身的产物，是通过它所推广的学校以及行政、矿业、金融和商业等机构产生出来并加以维持的。由于非洲的民族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活动的领导权集中在那些主要生活在新兴城市中心的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手中，所以曾经导致不正确地把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非洲民族主义

[19] 参看S. H. 罗伯茨（Roberts），1929年；黑利勋爵（Lord Hailey），1938年和1957年；S. C. 伊斯顿（Easton），1964年；L. H. 甘恩和P. 杜伊格南合编，1969年和1970年；P. 吉福德（Gifford）和W.R. 路易斯（Louis）合编，1967年和1971年；J. 絮雷-卡纳尔（Suret Canale），1971年。

认定为完全是属于那个阶级的，并以为其特征主要是城市现象。

成立了许许多多的团体和社团，以表现这种民族主义的愿望。在这一部分的各章中
15 说得很清楚，这个时期中，为了表达这种愿望而制定的战略和战术也是形形色色的。如B.O.奥洛隆提梅欣和E.S.阿蒂埃诺-奥迪安博所指出的(后文第22章及26章)，这些团体包括青年组织、部族组织、同学会组织、政党、地区性或跨地区的以及非洲大陆内部和非洲大陆以外的政治运动、工会、文学会社、文官俱乐部、促进性协会、和各种宗教的派别或运动。他们有的在第一次大战以前时期就已组织起来，但无疑的是，如各章所述，它们在本卷这一部分所讨论的时期内数目激增。

这个时期所采取的手段或策略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那样比较流行反叛或所谓骚乱，而是向宗主国及当地政府递送申请书和派出代表团，举行罢工和进行抵制，而最重要的是创办新闻事业和召开国际性大会。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整个非洲，特别是西非，新闻事业顺利地兴旺发展，而各种泛非大会也成为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些大会是想给非洲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添上国际性色彩；它们还希望引起宗主国列强对殖民地事态的重视。正因如此，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甚至在里斯本举行了由美国黑人W.E.B.杜波依斯博士组织的泛非大会。这个问题在第29章加以详细论述，该章论述全卷讨论时期中非洲黑人与散居美洲各地黑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然而，尽管社团组织有形形色色，它们所制订的策略也千差万别，除了埃及是唯一的例外，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早期，它们对殖民制度造成的真正影响还微乎其微。而在1935年，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法西斯意大利帝国军队袭击并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仅存的两个希望堡垒之一，是非洲未来复兴和恢复青春的主要象征，于是非洲大陆仿佛注定了要永远处于殖民主义枷锁之下。但情况并非如此。非洲人民的压而不服的精神、埃塞俄比亚遭到占领这一事件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情绪的增强，加上出现各种新的群众性政党和一个新的激进的领导力量——他们所献身的不是要求改良而是要求彻底根除殖民主义——如同本书第8卷所将揭示，这一切因素联合起来导致从非洲大陆消灭殖民统治的结局，其速度之飞速正如当年建立殖民统治一样，差不多同样地是在20年时间之内。可是，在1880年至1935年之间，殖民主义好像牢牢地在非洲刻下了烙印。那么，它在非洲都留下了什么标志呢？这就是本卷最后一章所要答复的问题。

16

第7卷写作的资料来源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在绪论部分应该谈到。它们是研究非洲殖民主义历史的资料来源和这段历史的分期问题。就资料来源而言，本卷作者和研究学者比起从事其他各卷的人各有若干有利之处与不利之处。先说不利之处。本卷及第8卷所涉及的各个时期，与其他各卷的时期不一样，有一部分档案资料，学者们目前还见不到。诚然，有几个宗主国的某些档案资料，如法国的截至1930年的档案资料，已向学者开放，但都是在某些章差不多已经完成之后。而且，由于有这么许多不同的欧洲列强参预分割和进入非洲，研究

学者所面对的语言问题就成为一个难题。

可以弥补的是，有了更多的杂志和期刊，公布的议会文件、辩论记录、调查团报告书、私人公司和社团的文件以及公布的各种年度报告书，比以前各个时期数量更多了，这些都是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是，在殖民主义这场活剧中本身担任演员的人有的还活着，可以访问并且也确是作过访问。其他一些人，有非洲人也有欧洲人，也开始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和自传，或以小说、剧本和学术论文形式追忆往事。在以上各点，本卷的作者们比其他各卷的大部分作者享有某些有利之处。

最后，对殖民主义这个题目曾经进行和仍在进行的研究，以及曾经发表和即将发表的著作好像远比关于非洲历史上任何其他题目都要多。的确，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部L.H.甘恩和彼得·杜伊格南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非洲殖民主义史。在东欧各国，这个题目恐怕也比任何其他题目引起了更多的注意。以上情况自然使得综合的工作就资料来说相对地容易一些，但是作者们需加吸收的资料数量巨大，就这点来说，工作就更加费力了。

非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分期问题

非洲殖民主义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为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但A.B.戴维森和迈克尔·克劳德在60年代提出了这个问题，这里应该加以简要论述。

有些历史学家曾提出1870年作为欧洲人瓜分非洲和施行殖民统治的开始年代，然而 17 这个年代似乎太早了。正如G.N.乌佐伊圭在第2章所指出，引发瓜分的乃是由于法国人在塞内冈比亚地区的活动，以H.M.斯坦利为代表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活动，和以皮埃尔·萨沃格南·德-布拉柴为代表的法国人在刚果地区的活动，以及葡萄牙人在中非的活动；而所有这些活动确实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方才开始。所以，看来1880年应是比1870年更为合适的年代。[20]因此，从1880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殖民制度的瓦解，研究殖民统治与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反应行动可分为三个阶段：1880～1919年(细分为1880～1900年的征服时期和1900～1919年的占领时期)，我们将称之为使用对抗或使用联盟或暂时屈服的战略以保卫非洲的主权和独立的时期；1919～1935年，我们将称为使用抗议和抵抗战略的适应时期；和1935年以后时期，那是使用积极行动战略的独立运动时期。[21]

我们的论点是，自1880年至1919年前后这个时期（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是所谓绥靖阶段）在欧洲人看来是这样一个时期：在纸面上完成分割，在地面上部署军队实现分割，以及有效地占领所征服的地方，其表征是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和推广公路、铁路和电报这类基础设施以开发各殖民地的资源。

在非洲人看来，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时期非洲的国王、女王、家系和氏族

[20] 参看M.克劳德，1968年，第17-19页。

[21] 关于各种分期法，参看A.B.戴维森(Davidson)，见T.O.兰杰(Ranger)主编，1968c，第177-188页，又M.克劳德，1968年，第17-19页。

头人们全都为一种压倒一切的考虑所左右，即究竟是采取对抗还是采取联盟或采取投降的战略来保持或者恢复自己的主权、传统和文化。到1919年，除了利比亚和撒哈拉的某些地方、以及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是明显的例外，实际上在整个非洲，对抗行动已经以有利于欧洲人的方式解决了，而一切非洲人，不分所谓的抵抗者和所谓的合作分子都丧失了他们的主权。

第二阶段是1919年至1935年，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恰当地用抵抗，或用我们惯常称之为抗议这个词来称呼非洲人的反应行动。我们之所以选择1919年不仅因为它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罗斯帝国的十月革命和杜波依斯召开第一次泛非代表大会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事件之后（这些事件都对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革命性的影响），而且因为，到那18 个时候，对欧洲人占领非洲本身的反对行动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已经停止。

我们选择1935年而不是1945年作为本卷的终止日期，由于那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队入侵和占领埃塞俄比亚的年份。那次危机震动了非洲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以及全世界的黑人，引起他们的义愤。它也更加生动地唤醒他们认识殖民主义的不人道、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性质，其作用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尔后加纳的第一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所说，他在听到那次侵略行为消息时的反应是："当时简直就像整个伦敦都向我本人宣战了一样"[22]，并且如他所承认，那次危机加深了他对殖民主义的仇恨。的确，要不是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来非常可能，争取把非洲从殖民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在30年代后期就会开始。

从1935年至独立革命时代这个最后时期完全应属于本书的下一卷即最后一卷的范畴，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陈绂 施兰卿译）

---

[22] K. 恩克鲁玛（Nkrumah），1957年，第27页。

2 欧洲瓜分和征服非洲：概况

G.N.乌佐伊圭

导言：一个战争和革命性变化的世代

1880 年之后整整一个世代是近代时期充满了重大的历史上有名运动的年代。在这个时期，非洲这个面积超过 2800 万平方公里的大陆，遭到了欧洲各工业国有效的分割、征服和占领，历史学家至今还没有认真探讨这个战争连绵不断的世代对于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双方的有害影响。但它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激烈变化的世代则普遍得到强调。 **19**

然而这个时期的重大意义超出它所经历的战争和变革。历史上有过许多帝国兴衰起落，自有历史以来就有征服和篡夺；在往昔的岁月中，曾经试验过各种模式的殖民统治和兼并。非洲是欧洲所要征服的最后一个大陆。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占领和制服如此辽阔的大陆，从欧洲人观点看，竟然完成得如此之协调、迅速和比较地不费力气。过去从未有过这种情形。

这种现象是什么引起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这个时期非洲会在政治上遭到分割并被有步骤地占领如它所经历的那样？非洲人又何以不能遏止自己的敌人？这些问题使得历史学家殚精竭虑，他们对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分割行为与新帝国主义进行探究，却未能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解释；相反，关于分割行为的史学著作成了我们时代争论最多、最容易叫人激动的问题之一。它给历史学家带来令人生畏的任务——弄明白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所造成的极为扑朔迷离的情景。

分割非洲与新帝国主义：回顾

因此，需要把非洲历史中这一场关键性运动的各种理论的混乱状态加以清理。为了方便，这些理论可分为如下诸类：经济的、心理的、外交的和非洲尺度的。 **20**

经济论

这种理论的流行情况，就像时髦款式那样，随时间的推移而起变化。在共产主义成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以前，没有人认真地对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基础提出疑问。

因此，约瑟夫·熊彼得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的攻击[①]，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极为流行，绝非偶然。他所发起的对这种理论的猛烈攻击曾经卓有成效地如此长期坚持，今天已到了效益递减的地步。于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学说，以经过修正的形式，如今越来越赢得承认了。

经济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它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1900年，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把世界政治，也即全球规模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问题，提到他们在美因茨举行的年度党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来。正是在这个场合，罗莎·卢森堡首先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也是在这个场合，乔治·勒德布尔提到，“世界政治的核心”是“一切资本主义趋向掠夺政策达到高峰，它把欧美的资本主义带到世界各地”。[②]然而这个理论典型的和最清楚的陈述是由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提出的。他说，工业国的生产过剩、剩余资本和消费不足，导致它们“把自己经济资源越来越大的部分放到自己目前政治版图以外的地区，并且刺激了政治扩张的政策以便把新的地方纳入版图”。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源”。他承认非经济力量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确有作用，但确信：

虽然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或一名干劲十足的商人可能建议甚至倡议采取帝国主义扩张步骤，他们也可能帮助培养迫切要求作某些新的推进的爱国主义舆论……然而最后的决定还在于金融力量”。[③]

列宁大量借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霍布森的主要论点，强调指出新帝国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由“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④]正如竞争资本主义由于商品输出而繁荣起来，垄断资本主义由于通过银行和工业卡特尔聚积的超额利润所获得的资本输出而繁荣起来。照列宁所说，这一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遵循卢森堡而反对霍布森，他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自行走向毁灭，因为在最终分割世界以后，资产阶级这时成了靠自己投资的收入生活的食利者和寄生虫，他们将受到新发展的国家的威胁，后者要求重新分割世界。资产阶级的贪婪一如既往，他们将拒绝照办。这个问题于是将由战争来解决，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战败。因此，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横死的下场。

这种鼓舞人心的宣传为许多马克思学者所接受是不足为奇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激进派也接受霍布森的观点和列宁的观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他们同激进的西方学者联合起来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无耻的经济剥削的结果。[⑤]

虽然霍布森和列宁没有专门提及非洲，可是显然，他们的分析对非洲遭到分割具有重要的含义。结果，一大批根本不相同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多或少地就马克思主义的

---

① J. 熊彼得（Schumpeter），1955年。

② 引文见L. 巴索（Basso），见 N. 乔姆斯基（Chomsky）等人，1972年，第114页。

③ J. A. 霍布森（Hobson），1902年，第59页，第80-81页。

④ V. I. 列宁，1916年，第92页（着重点是原有的）。〔译文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上海版，第798页。〕——译者注

⑤ W. 罗德尼（Rodney），1972年；又钦韦祖（Chinweizu），1975年，特别是第3章。

经济帝国主义学说涉及非洲的方面加以诋毁。⑥对这种表面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作的典型反应是：霍布森和列宁的批评从根本上说还是对的，只是人们运用失当。鲍勃·萨克利夫写道："目标往往是一种蜃景，而且武器也不得当"，因为被认为是普遍现象的帝国主义是把帝国的价值看作一个整体，因此"一个民族的得失没有什么意义"。⑦一个比较能压服对方的论点是，即使经典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被彻底否定也未必能驳倒帝国主义就其根本的推动力而言主要是经济性质的这个论断。贬低关于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观点，然后欢欣鼓舞地把对手一棍子打死，就因为他们有与霍布森和列宁同伙的嫌疑，这太没有学者风度了。根据对这个时期非洲历史所作比较严肃的探讨，现在很清楚，那些固执地轻视分割行为的经济因素的人，结果是自找苦吃。⑧

心理论

我从心理学角度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起探讨——通常被列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福音派基督教徒精神**和**社会返祖论**——是因为主张这些学说的人有着共同的信念认为"白色人种"至高无上。 **22**

社会达尔文主义

1895年11月查尔斯·达尔文《**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⑨一书问世，就某些人看来似乎为欧洲人种优越论的信念提供了科学根据，这种论据自17世纪以来在欧洲著作中不断以各种面目出现。后期的达尔文主义者于是自鸣得意，因为可以把他们所谓的"杰出的种族"对各"从属的种族"或"落后的种族"的征服解释为是生存斗争中强者统治弱者所经历的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过程。因此他们鼓吹说那可能是公正的。于是分割非洲被他们看作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明目张胆的种族沙文主义，被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为"白化病"，它的有趣之处在于肯定了帝国主义的责任。⑩可是实际情况仍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应用到对非洲的征服，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文过饰非，而不是道出事物的本源。

福音派基督教徒精神

在福音派基督教徒的心目中，"物种起源"是该死的异端邪说，然而他们却毫无疚色地接受其种族主义的引申。不过福音派基督徒精神鼓吹的种族主义内容搀和着大量的人

⑥ 有代表性的批评有D.K.菲尔德豪斯（Fieldhouse），1961年；M.布劳格（Blaug），1961年；B.萨克利夫（Sutcliffe），见R.欧文（Owen）和B.萨克利夫合编，1972年，第316-320页。

⑦ B.萨克利夫，见R.欧文和B.萨克利夫合编，1972年，第318页；参看同书第312-323页。

⑧ 例如，参看A.G.霍普金斯（Hopkins），1968年，1973年；C.W.纽伯里（Newbury）和A.S.卡尼亚-福斯特纳（Kanya Forstner），1969年；J.斯滕格斯（Stengers），1962年。

⑨ C.达尔文（Darwin），1859年。

⑩ 此类观点的详细情况，参看R.莫尼埃（Maunier），E.O.洛里默（Lorimer）翻译和编辑，1949年；G.希梅尔法布（Himmelfarb），1960年。

道主义和慈善热忱——在征服非洲过程中这些情绪流行于欧洲决策人中间。因此人们曾经认为，分割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种“更广义的传教”和人道主义的动力，旨在使非洲各民族得到再生。[11]人们也曾断言，正是这些传教士为把殖民主义强加于东非、中非以及马达加斯加铺平道路。[12]传教士们确是没有阻止对非洲的征服，在某些地区甚至确曾积极从事于这种征服，然而不能因为传教因素可以有限度地适用就认为它是解释帝国主义的普遍理论。

社会返祖论

第一个从社会学角度解释新帝国主义的是约瑟夫·熊彼得。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某些无法估计的心理因素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压力的结果。他的论点是以人道主义的语言而不是以欧洲种族主义的语言来表达的，所依据的是他认为人类有为支配其同类而支配他们的天然欲望。左右这种天生的侵略冲动的是人类普遍追求强权的渴望。因此，帝国主义是一种集体的民族利己主义：“表现为一个国家有着无目的可言的进行无限度强力扩张的倾向。”[13]他说，新帝国主义还有返祖性质，[14]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回复到人类早年原始的政治与社会本能，这些本能在近代以前时期或许被认为是正当的，但在现代世界肯定地不被认为是正当的。他于是论证，资本主义按其天性是何等的“反帝国主义”和仁慈。它在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家主持下，完全反对古代各种君主政体和武士阶级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动机（他们的野心行为并无明确目的）。与此相反，资本主义有其明确目的，所以它完全反对这种作为古代政权特征的返祖行为。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用经济因素解释新帝国主义，尽管是以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为根据，是不能成立的。这个论点尽管很有吸引力，它的缺点在于仿佛雾里看花并与历史不符。心理学说作为对瓜分行为的一种解释虽有某种真理因素在于其中，它们却不能解释何以分割行为发生在它发生的时候。然而，它们确是提示了何以分割成为可能并被看作是可取的。

外交论

这一类理论是纯政治的或许是最流行的对分割的解释。然而有意思的是，它们为心理论提供了明确而具体的支持。在这些外交学说中我们看到欧洲各国的民族利己主义，或是彼此间矛盾冲突，或是共同行动以保证自我保存，或是针对原始的非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作出断然的反应。因此，我们拟按如下各方面论述这些理论：**国家声誉；力量均势和全球战略。**

---

[11] 关于有助于推动帝国主义扩张的传教活动的调查，参看 J. S. 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61 年，第 34-48 页；G. 贝内特（Bennett）主编，1953 年；C. P. 格罗夫斯（Groves），见 L. H. 甘恩（Gann）和 P. 杜伊格南（Duignan）合编，1969 年。

[12] R. 奥利弗（Oliver），1965 年；R. I. 罗特伯格（Rotberg），1965 年；P. M. 马蒂布瓦（Mutibwa），1974 年。

[13] J. 熊彼得，1955 年，第 6 页。

[14] 同上，第 65 页。

国家声誉说

这个理论的最杰出倡导者是卡尔顿·海斯。他在很有见地的一段话中说：

> 法国谋求以海外的收获来补偿在欧洲的损失。英国要扩大英帝国，使之光辉灿烂，借以弥补她在欧洲的孤立。俄国在巴尔干国家受阻，要重新转向亚洲。而德国 24 和意大利则要向世界显示，它们已经在欧洲内部靠武力取得威望，它们也有权在欧洲以外用帝国的业绩来提高威望。较小的列强，无多大威望利害问题，则设法不干什么新的帝国主义而过好日子，虽然葡萄牙和荷兰在它们已有的帝国内表现出力图恢复自尊，而后者更是抖擞精神管理其帝国。⑮

因此海斯得出结论说，“新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现象”，其倡导者追求的是国家声誉。总之，欧洲的领导人在巩固了自己的国家并重新组合内部的外交力量以后，受一种朦胧的或返祖的力量驱使，这种力量自身表现为一种“心理反应，一种要求保持或恢复国家声誉的强烈愿望”。因此他得出结论：分割非洲不是一种经济现象。⑯

力量均势说

F.H.辛斯利⑰则强调欧洲需要内部的和平与稳定是进行分割的主要原因。据他认为，向一个超欧洲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转变的决定性年代是1878年。从那年柏林会议上*起，俄国和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和奥斯曼帝国的抗衡使欧洲各国濒于战火燎原之势。欧洲各国政治家为避开这一场强权政治的危机向后退却。从那时起到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强权政治在欧洲被消除掉了，却在非洲和亚洲全面展开。当非洲的利益冲突威胁着破坏欧洲和平时，欧洲列强别无选择只有瓜分非洲以便保持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使欧洲本身得到稳定的外交均势。

全球战略说

第三派的主张是，导致大瓜分的欧洲在非洲的利益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罗纳德·鲁宾逊和约翰·加拉格尔强调，就英国来看，非洲对印度有着战略重要性，把分割非洲的原因归咎于非洲的返祖性“原始民族主义的”运动的影响，认为这种运动威胁了欧洲国家的全球战略利益。这些“幻想的、倒退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是哗众取宠的不合时代的事物——迫使迄至当时满足于在非洲行使非正式至高无上权力和施加道义上劝告的欧洲政治家们十分勉强地分割并征服了这个大 25 陆。所以，非洲之被占领不是由于它在物质上能给欧洲人提供什么东西——因为它在经

⑮ C. J. H. 海斯（Hayes），1941年，第220页。

⑯ 同上。

⑰ F. H. 辛斯利（Hinsley），1959 a，1959 b，见E. A. 贝尼安斯（Benians），J. 巴特勒（Butler）和C. E. 卡林顿（Carrington）合编，1959年。

* 指在柏林召开的修改圣·斯特芬诺和约的国际会议。——译者注

济上毫无价值——而是由于它威胁着欧洲人在别处的利益。[18]

心理论及其同类外交论的主要目的在于驳斥那种认为分割非洲的动机是由于经济刺激的观念。但是关于声誉考虑的论点，当伴随的经济因素被一笔抹杀或被不适当地贬低的时候，就显得太没有说服力了。例如，海斯曾对在分割的关键时刻欧洲各国之间发生的关税战作了详细的文献引证工作。[19] 他甚至承认说，“实际上引起向‘黑暗大陆’以及日晒如焚的太平洋岛屿作经济推进的，与其说是欧洲各工厂货物的生产过剩不如说是原料供应不足”；[20] 因此，“为了防止世界过多地受到……法国、德国、意大利或任何其他保护主义国家的垄断，大不列颠强烈地行动起来把最大最好的份额并入她自己的自由贸易的帝国。”换言之，新重商主义一旦地位确立，对于帝国主义的争夺就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21] 然而，就在他的著作的下一页上，海斯又十分自信地争论着反对经济因素是新帝国主义支柱的论点，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样。H.布伦施威格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对法国帝国主义作非经济的解释，另一方面却指出它面临的是完全属于经济范围的帝国问题，于是只好赋予经济一定的作用。他把盎格鲁-撒克逊的帝国主义看作是出于经济的和博爱的，而法国的帝国主义则被看作是出于追求声誉的动机。[22] 关于全球战略的论点，有识之士所作的反应一直主要是否定的。可是，对于非非洲人的历史学家或对于一般读者，它却大有吸引力。而我们知道这个论点是从兰格[23] 的较为折衷的假设和辛斯利的颇经熟虑的分析发展而来。它过于圆溜溜，太多的偶然性，从而难以为人所接受。它在西非、中非、南部非洲和东非经过检验，结果不够格。[24] 至于埃及和北非，则业已证明，引起英国人的到来有强大的理由，与英国的印度帝国战略没有关系。[25] 可喜的是，无论如何，鲁宾逊已开始不再强调被夸大的埃及指挥棒对瓜分非洲其他地方的影响。[26]

26

非洲尺度论

至此为止，我们所述关于分割的各种学说都是从欧洲历史角度来对待非洲。显然这是一大缺点。即使是鲁宾逊和加拉格尔的“原始民族主义的”返祖论观点也没有充分展开，其原因恰是由于他们关心的焦点是欧洲和亚洲。

因此，需要从非洲历史角度观察分割问题已是至关紧要之事。与通常的看法相反，

[18] 参看J. 加拉格尔（Gallagher）和R. 鲁宾逊（Robinson），1953年；R. E. 鲁宾逊和J. 加拉格尔，见F. H. 辛斯利主编，1962年；R. E. 鲁宾逊和J. 加拉格尔，1961年。

[19] C. J. H. 海斯，1941年，第205-208页。

[20] 同上，第218页。

[21] 同上，第219页。

[22] H. 布伦施威格（Brunschwig），1966年，第4-13页。

[23] W. L. 兰格（Langer），1935年。

[24] 参看 J. 斯滕格斯，1962年；C. W. 纽伯里和 A. S. 卡尼亚-福斯特纳，1969年；G. N. 乌佐伊圭（Uziogwe），1974和1977年；W. R. 路易斯（Louis）主编，1976年。

[25] G. N. 乌佐伊圭，1974年。

[26] R. 鲁宾逊，见 R. 欧文和 B. 萨克利夫合编，1972年。

这种方法并非别具慧眼发现什么“新的”非洲历史编纂学。J.S.凯尔蒂的名著《非洲的被分割》[27]（出版于1893年）真正深刻地指出，19世纪80年代的瓜分是大约开始于300年前的对非洲进行蚕食的必然结果。它还对认为分割是出于经济动机的观点表示首肯，虽然这不是它的主要论点。在20世纪30年代，多产的法国殖民史学家乔治·阿尔迪也表明分割有其非洲当地因素，他在很大程度上把非洲看成一个历史的整体。他像凯尔蒂一样论断说，分割的直接原因虽是工业化欧洲各国的经济竞争，然而它同时是欧洲与非洲长期接触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认为，非洲人对于越来越大的欧洲人势力所作的反抗促进了实际的征服，正如各工业国越来越激烈的商业竞争导致了分割。[28]

关于分割的这些观点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但是随着1956年K.翁乌卡·迪凯的杰作《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29]的出版，从非洲尺度看待分割问题再一次提了出来。迪凯的著作虽有其时间跨度和地理范围的局限性，可是它鼓励了一整代的历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种族和文化长时期接触的情况来探讨分割问题。不幸，罗兰·奥利弗和J.D.费奇在其流传甚广的《非洲简史》[30]一书中虽然论证了这种长期延续的关系，可是他们强调的还是用欧洲尺度而不是用非洲尺度来看待分割问题。因此，A.G.霍普金斯的重要作品[31]令人耳目一新，它在地理范围上虽有局限性，然而却是尝试着从非洲角度重新解释西非的帝国主义。他的结论值得引述：

> 在一个极端，可以想象有一些地区，那里从奴隶贸易的过渡进行得很成功；保持了收入水平，内部紧张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对分割的解释需要强调外部压力，如商业需求和英法竞争之类。在另一极端则可以设想其情况是：本地的统治者采取反动的态度，尽力通过掠夺手段来维持收入，内部冲突十分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对帝国主义的分析需要更着重于非洲境内的各种分裂力量，虽然不能忽视外部因素。[32]

27

本文作者同意这一学派成员的大多数观点。[33]他也像他们那样，既从非洲角度也从欧洲角度解释分割，因此认为非洲尺度说，是前面已经谈过的各种欧洲中心论的补充。他认为，分割和征服是19世纪以前很久就已开始的欧洲人蚕食非洲的必然结果。他承认：使蚕食成为不可避免主要是经济推动力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从奴隶贸易向合法贸易的过渡，以及随之发生的这个时期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下降；正是非洲方面这种经济变化和随之而起的非洲人对越来越大的欧洲人势力所作的反抗，促成了实际的军事占领。看来的确是，非洲尺度说提供了更全面的、更是以历史为中心的关于分割的理论，胜过所有的纯属欧洲中心论的学说。

---

[27] J.S.凯尔蒂（Keltie），1893年。
[28] G.阿尔迪（Hardy），1930年，第124-137页。
[29] K.O.迪凯（Dike），1956年。
[30] R.奥利弗（Oliver）和J.D.费奇（Fage），1970年。
[31] A.G.霍普金斯（Hopkins），1973年。
[32] 同上，第165-166页。
[33] 非洲尺度说在A.G.霍普金斯，1973年和G.N.乌佐伊圭，1973年，两书有比较充分的发挥。

大瓜分的早期阶段

到了19世纪第三个25年末，法国、英国、葡萄牙和德国等欧洲强国已经在非洲各地获得商业利益并发挥相当的影响，然而它们在那里的直接政治控制极其有限。德国和英国，尤其是英国，当时有能力为所欲为地施加影响，然而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愿任意地作出选择去付出代价，在自己能够从非正式的控制得到同样利益的时候，竟去招惹正式兼并的种种意外事故。“不想兼并并不证明不愿意控制”[34]，这话说得很深刻。28 这既说明了索尔兹伯里和俾斯麦的态度，也确切地说明了分割中大部分主要角色的态度。

但是，由于1876~1880年之间发生的三件大事，这种态度开始改变。第一件大事是布拉班特公爵（1865年加冕为比利时的立宪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宣告的对非洲的新兴趣。这在他1876年召开的所谓布鲁塞尔地理会议上明显流露，其结果是建立起国际非洲协会，并于1879年雇用亨利·莫顿·斯坦利以该协会的名义考察刚果河地区。这些行动终于产生了刚果自由邦，在柏林西非会议的商讨结束以前利奥波德想方设法取得欧洲各大国对它的承认。[35]

第二个重要事件是自1876年起葡萄牙的一系列活动。由于起先未被正式邀请后来才得以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它很为恼火，一阵风似地派出一些探险队，结果是到1880年葡萄牙王室已经吞并了莫桑比克境内非裔葡萄牙人统治者的实际是独立的庄园。所以就葡萄牙人和利奥波德国王而言，到1876年瓜分已经开始。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促使分割进行的因素无疑是构成1879-1880年法国殖民政策特征的扩张主义情绪。这表现在它同英国一起参与对埃及的双重管辖(1879年)，派遣萨沃格南·德·布拉柴进入刚果河流域，并批准他同巴特克族酋长马科科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法国在突尼斯和马达加斯加两地恢复其殖民主义的进取精神。[36]

这些国家1876年至1880年之间采取的上述行动，清楚表明它们正致力于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和建立正式统治。这种情况最后迫使英国和德国都放弃长期偏爱的非正式统治和建立势力范围的做法，转而赞成正式统治的政策，导致它们从1883年末起在南部非洲、东非和西非的一系列兼并行动。[37] 例如，德国人的行动造成了对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和德属东非的吞并。这一切又进一步加快了瓜分的步伐。

到19世纪80年代初，大瓜分已全面展开。由于害怕被完全挤出非洲，葡萄牙提议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清理一下中非地区的领土争执问题。所以，从上述情况看，很明显，29 引发大瓜分的并非鲁宾逊和加拉格尔所说的那样[38] 由于英国人在1882年占领埃及，而是

[34] J. 加拉格尔和R. 鲁宾逊，1953年，第3页。

[35] PRO FO 403/192，“E. 赫茨勒特（Hertslet）爵士关于1883年以来在中非和东非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和领土变化的备忘录（有P. 安德森爵士（Anderson）的附署意见）”1893年2月，机密。

[36] P. M. 马蒂布瓦，1974年，第6章，第7章。

[37] 参看G. 塞西尔（Cecil），1932年，第225-226页；F. D. 卢加德（Lugard），1929年，第13页。

[38] R. 鲁宾逊和J. 加拉格尔，1961年。

1876 年至 1880 年这个期间非洲各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柏林西非会议，1884-1885 年

举行国际性会议以解决由于欧洲人在刚果河地区的活动而引起的领土争执的想法，最先是由葡萄牙提出的，随后由俾斯麦接过来，他道出了其他各国的意见，得到支持，促其实现。会议于 1884 年 11 月 15 日至 1885 年 11 月 26 日在柏林举行。将要举行这样会议的消息加剧了大瓜分行动。这次会议对于奴隶贸易或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问题都没有认真讨论，而原来这两者被认为是召开会议的精神之所在。可是它还是就废除奴隶贸易和为非洲人谋福利问题通过了一些空洞的决议。

从表面看，会议的原定目的不是企图全面分割非洲。然而，它的结局却是瓜分领土，通过有关尼日尔河、贝努埃河和它们支流的自由航行问题的决议，并订出“将来在非洲沿海地区占领领土应遵守的规则”。[39] 根据与会各国签署的文件“柏林协定”的第 34 款，所有欧洲国家今后占领非洲沿海某地或宣布那里为“保护国”，必须将其行动通知柏林协定的各签字国以便其权利要求得到认可。这就是所谓**势力范围**的原则，与之相联系的是荒唐的内地概念，它弄得被解释为占有海岸也就意味着拥有其内地，距离范围几乎无限。协定第 35 款规定，凡此类沿海领地的占有者还必须以事实表明它在当地拥有足够的“权威”可以“保护现有权利，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按照协议的条件，保护贸易自由和过境自由”。这就是所谓的**有效占领**的原则，它后来使得对非洲的征服成为如此杀气腾腾的营生。

在承认刚果自由邦，允许领土谈判，并为“合法地”占用非洲领土订立规章制度的过程中，欧洲列强是僭自窃取了权力，自行批准对另一个大陆进行分割和征服的原则。一个大陆上的一群国家如此厚颜无耻地谈论分割和占领另一个大陆的领土却觉得颇有道理，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这就是这次会议对非洲历史的主要意义之所在。那种与广大舆论唱反调，认为这次会议并没有分割非洲[40] 的论点，只是在极端的法律意义上 31 说是正确的。事实上，窃占领土的事在会议上确是发生了，而未来的窃占问题在会议的决议中包含得一清二楚，实际上，到 1885 年已划出最终分割非洲的大致轮廓。

缔约时期，1885-1902 年

早在“柏林协定”以前，欧洲列强就曾以种种方法在非洲取得势力范围——通过殖民、探险、建立贸易站和传教区、占领战略地区、以及同非洲统治者缔结条约。[41] 柏林会议以后，靠缔结条约取得势力成了实现纸上分割非洲大陆的最重要方法。这些条约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订立的，另一种是欧洲人相互间订立的双边协

[39] PRO FO 403/192，E. 赫茨勒特爵士的备忘录，1892 年 2 月，第 1 页。

[40] S. E. 克罗（Crowe），1942 年，第 152-175 页。

[41] G. N. 乌佐伊古，1976 a，第 189-193 页。

30



图片2.1　1884-1885年柏林西非会议的一次会议

定。非洲人与欧洲人订立的条约基本有两种。第一种是奴隶贸易和商务的条约；这些条约曾引起摩擦，摩擦又导致欧洲人对非洲事务的政治干涉。第二种是政治条约，按照这些条约非洲统治者或是声称交出主权以换取保护，或是承担义务不同其他欧洲国家缔结条约。

这种政治条约在这个时期十分流行。它们或是由欧洲国家政府的代表缔结的，或是由一些私人机构的代表缔结而后来转让给它们各自的政府。如果一个宗主国政府接受这些条约，那么这些领土通常就被兼并或宣布为保护国。反之，如果它对其真实性有怀疑，或感到受世界政治变化的约束需要谨慎从事，这些条约就被用来在欧洲国家双边谈判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非洲人缔结这些条约则有各种动机，但特别是为了自己人民的利益。有时候，他们愿意同欧洲人有条约关系是因为希望这种关系的声势会使他们在同邻人打交道的时候获得某种政治优势。往往一个非洲弱国会想同一个欧洲强国缔结条约，希望利用它来否认对声称有权统治它的另一个非洲国家的臣服归顺。一位非洲统治者想要一个条约往往是希望用它来使难以驾驭的属国就范。同一个欧洲国家订立条约往往还

32 被某些非洲国家看作是保持其独立的手段，这种独立正受其他欧洲国家的威胁。[42]不管怎么说，非洲人同欧洲人缔结的政治条约在非洲最后遭受分割的阶段有着重要的作用。

英帝国东非公司（IBEAC）和布干达订立的条约是一个例证，当一位非洲君主在同自己臣民发生纠纷时，他寻求一家欧洲公司代表的帮助。布干达的卡巴卡姆万加二世曾致函这家公司要求"前来扶我即位实为幸事"，并曾许诺将酬以"大量象牙，尔等可在乌干达从事一切贸易，并在朕之辖境内行所欲为"。[43]对于这个请求他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派遣两名使臣，塞缪尔·姆文巴和维克托·森凯齐去桑给巴尔求助于英、法、德各国领事。他命令其使臣询问，"如果彼等愿助吾人，吾等需作何酬报？因为我不想以土地给予彼等（或尔等）。我要各国的欧洲人都来乌干达按其意愿进行建设和贸易。"[44]很清楚，在缔结条约时，姆万加并没打算放弃自己的主权。后来他吃过苦头才发现欧洲人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F.D.卢加德在1890年12月和1892年3月同姆万加缔结的条约对姆万加提供"保护"，它们是强加于他而不是同他磋商的。诚然，英帝国东非公司确是帮助他恢复了王位。但是巴干达新教徒在门戈战役（1892年1月24日）战胜了巴干达天主教徒（卢加德的马克沁机关枪起决定作用）使卡巴卡处于极为虚弱的地位。当该公司在布干达停止营业时（1893年3月31日），它就把这些条约转让给英国政府。H.E.科尔维尔上校同姆万加缔结的最后条约（1894年8月27日）确认了前此订立的各项条约，但是它比先前的条约走得更远。科尔维尔为他的国家要求并取得了"对外交、岁入和赋税的控制权"由姆万加转让"给予英王陛下政府，它的代表同时也是一切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庭"。[45]

---

[42] S. 图瓦尔（Touval），1966年，第286页。

[43] PRO FO 84/2061，姆万加（Mwanga）致杰克逊（Jackson）函，1889年，6月15日（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

[44] PRO FO 84/2064，姆万加致尤安·史密斯（Euam-Smith）函，1890年4月25日。

[45] PRO FO 2/72，科尔维尔（Colvile）致哈丁吉（Hardinge）函，1894年8月28日，（附件）包括该条约全文。

同年英国宣布布干达为保护国。

很说明问题的是，卢加德后来居然在他的日记中就签订条约提供公司保护一事写了如下的话：

> 只要懂得此中奥秘就不会有人签订它。要说有人曾告诉过一个不开化的酋长，他是把一切权利割让给公司而换来的是空无所有，那显然是假话。但如果他曾被告知，公司将保护他抵御他的敌人，并作为同盟者分担他的战争，那么他听到的也是谎言，因为公司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想法，而且即使他们想要这样做也没有力量。[46]

33 实质上卢加德是在说他本人缔结的条约都是以欺骗手段取得的！我们没有篇幅来一一分析非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许许多多条约。但是不妨顺便提一下努佩（在如今尼日利亚境内）的埃米尔向L.A.A.米宗中尉请求结成联盟以反对皇家尼日尔公司一事（他与这家公司有了争执）[47]，这可算是一件非洲君主想寻得一个欧洲国家的帮助以反对威胁着他的独立的另一个欧洲国家的典型事例。

欧洲人进行分割的双边条约

通过条约取得势力范围通常是一个欧洲强国占领一个非洲国家的第一个阶段。其他欧洲强国对此如果都没提出异议，当事国就逐渐地将条约权利变成主权权利。所以势力范围之产生最初是一个国家独自宣布的；只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加以承认或不作异议的时候才成为现实。各国的势力范围常常引起争夺，但是这些领土纠葛和边界争端最终由于在同一地区活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和认可。这些领地界线的划分尽量接近于自然疆界，或是如果不存在自然疆界的话就按经纬度划定。有的时候，他们也考虑本地的政治疆界。

1885年4月29日（和5月7日）的英德条约划定了两国在非洲某些地方的“行动范围”的界限，它被认为或许是近代时期势力范围理论首次的认真运用。[48]通过一系列类似的条约、协定、和公约，到19世纪末纸上分割非洲实际上已经完毕。在这里我们只能简短地谈谈其中最为重要的。

举其一例，1866年11月1日的英德定界条约是特别重要的。它把桑给巴尔及其大部分属国纳入英国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它保证了德国在东非的政治势力，从而使突破英国在该地区的垄断地位得到正式承认。[49]于是这个条约实际上分割了奥马尼帝国。根据其后1887年的阐明性协定，英国承担“劝阻英国人在德国势力范围后方的兼并行为，其条件
34 是德国政府将同等地劝阻德国人在英国势力后方的兼并行为。”双方还进一步协议，如果一方占领海岸，“他方未经同意不得占领其后方未划入势力范围的地区。”[50]由于两国向

[46] M.佩勒姆（Perham）和M.布尔（Bull）合编，1963年，第1卷，第318页。

[47] 详见R.A.阿代莱耶（Adeleye），1971年，第136—139页

[48] S.图瓦尔，1966年，第286页。

[49] PRO FO 403/192，E.赫茨勒特爵士备忘录，1893年2月。

[50] PRO FO 403/142，索尔兹伯里（Salisbury）致马利特（Malet）函，1890年6月14日。

西去的“势力范围”在上述内地安排中说得很含糊，于是有了著名的1890年黑尔戈兰条约，它全面地议定了对东非的分割。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它把乌干达留给英国；但是它也摧毁了英国关于打通一条好望角至开罗之路的宏大幻想，把黑尔戈兰交给德国，并且结束了桑给巴尔的独立。

1890年和1893年的英德条约、和1891年的英意条约，总的来说是承认上尼罗河属于英国势力范围。在南部，法葡条约（1886年）、德葡条约（1886年）和英葡条约（1891年）则既承认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势力又划定英国在中非的势力范围。英国-刚果自由邦条约（1894年）也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它解决刚果自由邦疆界的方式是让它成为法国领地与尼罗河流域之间的缓冲国，并为英国提供一条从乌干达经坦噶尼喀湖的好望角至开罗的走廊（由于德国的抗议在6月份撤销）。在西非，最重要的安排是萨伊-巴鲁瓦协定（1890年）和尼日尔河协定（1898年）[51]，通过这些协定，英法议定了对这个地区的分割。最后，1899年3月21日的英法协定解决了埃及问题，而结束英布战争的弗里尼欣和约（1902年），总算是暂时地确认英国在南非的霸权地位。

分割并征服非洲所依据的同非洲统治者订立的各种政治条约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双边协定有多大合法性呢？考察一下这些政治条约使人可以得出结论：它们有的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有的在道义上完全破产，而其他则是合法取得。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之所以成为站得住脚的政治行为只是从欧洲的成文法角度来看，也即把实力看作一切法律的基础。即使是非洲人公开寻求同欧洲人作出条约安排的情况，他们的决定也总是根据他们对欧洲人实力的感受。还有的情况是，在非洲人怀疑欧洲人谋求缔结条约的动机、不肯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他们仍被通过难以忍受的压力导致建立这种关系。还有许多例子，非洲人和欧洲人对于彼此间作出的安排有不同的解释。这种情况下，就非洲统治者而言，这些政治条约并没有丧失什么主权的意思，他们往往把条约看成是互相合作的安排（被迫的或不是被迫的），也许证明是对有关各方彼此都有利。关于这些条约的合法性问题，欧洲人的看法不一。虽然有的人认为它们是合法的，其他的人，如卢加德则确信它们差不多都是以欺骗伎俩取得的；有的是露骨的伪造文件，有的是十足的骗局，而大部分则是非法生效的。[52]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荒唐的条约仍然依据欧洲的外交公约得到了承认——例如，卡尔·彼得斯的各项欺骗性东非条约，和卢加德自己斥之为“纯属骗局”的各项英帝国东非公司的条约。[53]只有极其少数的情形是，经仔细复查，发现这种条约有不足之处——如卢加德同尼基订立的诸条约——于是在会议桌上被宣布无效。

欧洲国家的各项双边条约全都是在一些欧洲国家首都对非洲领土作出处置，而那些命运受人摆布的人既不在场也未曾同意。达些条约居然被认为有效，这种见解同样也是

---

[51] 关于尼日尔河协定的最详细叙述，见G.N.乌佐伊圭，1974年，第5章、第6章；参看B.I.奥比切雷（Obichere），1971年，第8章。

[52] 见F.D.卢加德，1893年，第2篇，第580页；M.佩勒姆和M.布尔合编，1963年，第1卷，第318页；J.M.格雷（Gray），1948年，

[53] M.佩勒姆和M.布尔合编，1963年，第1卷，第318页。

根据欧洲成文法来解释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十分明白，两个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并不影响那个范围内非洲君主的各项权利。但是由于势力范围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一个友好国家或许决定尊重这个事实，而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则或许决定置之不理。关于内地原则也是如此，它由于使人联想起“命定扩张论”原则和据之提出的疯狂要求而恶名远扬。总之这两种原则在国际法上都没有合法地位。[54] 索尔兹伯里在1896年说，“近代的内地原则，由于有不可避免的矛盾，表明把国际法应用到依靠推定的占领或控制而提出的领土要求时是何等蒙昧无知和反复无常。[55] 换言之，“只有通过对要求地区的真正占领，才能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56] 而由于有效占领的概念——对于这种概念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是不熟悉的——以及非洲人对于同欧洲人发生这些条约关系所具有的真正意义的理解是彼此根本矛盾的，冲突的局势必然要加剧。于是欧洲列强对内地进行系统的军事占领就要锣鼓开场了。

军事征服，1885-1902年

不论原因是什么，法国人奉行这种军事征服政策最为积极。他们从尼日尔河上游向下游前进，迅速击败卡约尔国的达梅尔，拉特·迪奥尔·迪奥普，他于1886年战斗至死。36 他们在图巴-库塔一役（1887年）打败马马杜·拉米内，从而结束了他在塞内冈比亚所建立的索宁克（人）帝国。他们成功地粉碎了伟大的萨摩利·杜尔所进行的持久而光辉的抵抗，终于俘虏了他（1898年），将他流放到加蓬（1900年）。而路易·阿尔希纳尔少校，通过一系列的胜利——在孔迪恩（1889年），塞古（1890年）和尤里（1891年）——消灭了塞古·图库洛尔帝国，尽管其君主阿赫马杜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直至1898年死于索科托。在西非另外一些地方，法国人征服了科特迪瓦和未来的法属几内亚，1893年在这两地建立起殖民地。而1890-1894年，完成了对达荷美王国的征服和占领。到19世纪90年代末，法国人已完成对加蓬的征服，巩固他们在北非的地位，完成对马达加斯加的征服（1897年把女王拉娜瓦洛娜三世流放到阿尔及尔），并在东部撒哈拉-萨赫勒的边缘地带结束了森纳尔地方拉比赫的顽强抵抗，他于1900年战死。

英国的军事帝国主义也同样地引人注目，血迹斑斑。我们在后面各章中将可看到，非洲人的反应也是坚决的并且经常是长期的。英国从其在黄金海岸（今日的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沿海殖民地采取军事行动，有效地阻止了法国向尼日尔河下游和阿散蒂内地的扩张。最后一次库马西征伐（1900年）之后，1901年继之兼并阿散蒂，纳纳·普伦佩被放逐到塞舌尔。阿散蒂以北的北部领地也于1901年正式被兼并，它们在1896年至1898年之间已被陆续占领。英国从拉各斯殖民地发起对尼日利亚的征服。到1893年，大部分约鲁巴兰已被宣布为保护国；对伊策基里兰的征服于1894年完成，足智多谋的“豪商”，那里的酋长纳纳·奥洛穆被放逐到阿克拉；而英国领事哈里·约翰斯顿显然没有力量以

[54] M. F. 林德利（Lindley），1926年，第234-235页。
[55] 引文见G.N.乌佐伊古，1976 a，第196-197页。
[56] 引文见F.D.卢加德，1929年，第13页。

公开战斗向奥波博的国王贾贾挑战，便把他骗到一艘英国战舰上开会，在舰上将他囚禁起来，于1887年送往西印度群岛。布拉斯和比尼两地到19世纪末都已及时征服。到1900年，英国在南部尼日利亚的霸权地位多少有了保证。可是对伊格博兰和东部内地其他一些地方的有效占领，则直到本世纪的头20年方才完成。在北方，英国人的征服是从努佩开始完成的，在那里，乔治·戈尔迪的皇家尼日尔公司到1895年已对洛科贾至海上一带施加影响。伊洛林于1897年被占领；1898年建立西非边防军以后，卢加德在1902年征服了索科托素丹国。

在北非，英国原已在埃及处于支配地位，但直到1896年才批准重新征服苏丹。1898年经过野蛮的不必要的流血达到了目的。两万名以上的苏丹人，包括他们的领袖哈里发阿卜杜勒，在战斗中牺牲。对于法国占领苏丹南部的法绍达（1898年），可想而知索尔兹伯里勋爵是不能姑息的，于是法国人被迫撤走。 37

1890年11月正式宣布桑给巴尔为英国的保护国，其后为废除奴隶制所作的努力，引起的反抗，很快就遭到粉碎。对英属东非其余部分的征服以桑给巴尔为基地。英国在这个地区谋求的主要目标是乌干达，在那里门戈战役（1892年）——门戈在布干达，是作战的中心地——终于导致乌干达保护国正式宣告成立（1894年）。这就为征服乌干达其余地方铺平了道路，1899年卡巴雷加国王和姆万加国王被俘并流放到塞舌尔岛，于是完成了对全部乌干达的征服。然而在肯尼亚，英国花了大约10年之久才在南迪人中间建立起有效的统治。

在中部和南部非洲，塞西尔·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未经洛本古拉国王的准许就对马绍纳兰进行占领。1893年，国王被迫逃离自己的首都，于翌年去世。然而直到1896-1897年恩德贝勒-马绍纳人的起义被血腥镇压以前，他的王国并未被最后征服。对今日赞比亚地方的征服，没有那么多的事故，于1902年完成。英国分割非洲的最后一场战争是在南非同布尔人进行的。英布战争（1899-1902年）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在欧洲人彼此间进行的。

其他欧洲列强同样地发现有效占领十分艰巨。举例而言，德国人到19世纪末之所以能在西南非洲有效地建立起统治，主要是因为延续一百多年的敌对关系使纳马人和马赫雷罗人不能通力协作。在多哥兰，德国人同科托科利人和查科西人的小王国结成联盟以便加快粉碎非中央集权的孔孔巴人和卡布雷人的反抗（前者在1897-1898年，后者在1890年）。在喀麦隆，德国指挥官汉斯·多米尼克少校在北部遇到极大困难，但到1902年他已设法征服了富拉人的一些小公国。可是对德属东非的征服工作，却是所有这些有效占领战争中最为酷烈和历时最久的。它自1888年延续到1907年。最著名的征战是派出讨伐队攻打大名鼎鼎的勇猛的阿布希里（1888-1889年）；攻打瓦赫赫人（1888-1889年*）；和攻打马及-马及抵抗运动的领袖（1905-1907年）。

葡萄牙对它领地的军事占领始于19世纪80年代，直到进入20世纪相当时候方才完成。对葡萄牙人来说，这是一桩特别艰巨的事业，然而它终于导致葡萄牙在莫桑比克、

* 原文如此。按：德国殖民主义者攻打瓦赫赫人始于1894年，迄于1898年（瓦赫赫人的领袖姆克瓦瓦战死）。见K.英厄姆（Ingham）著《东非史》，朗曼公司1962年版，第178页。——**译者注**

安哥拉和几内亚（现今的几内亚-比绍）巩固其权力。刚果自由邦完成对其势力范围的军38 事占领以前也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开始是同对它特别怀有敌意的刚果阿拉伯人结盟。由于这种结盟显然无用，利奥波德又下令对他们进行讨伐。大约花了三年时间（1892-1895年）才打败他们。但是对加丹加的征服，开始于1891年，到本世纪初方才完成。

意大利在其有效占领的战争中处境最糟。1883年，它已设法占领了一部分厄立特里亚。它在1886年第一次分割奥马尼帝国时还得到了索马里的东部海岸。后来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曼涅里克二世签订的乌查理条约划定了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意大利对这个条约加以稀奇古怪的解释，通知其他欧洲列强说，埃塞俄比亚已是意大利的保护国。意大利占领它无中生有的保护国的企图虽以在阿杜瓦的不光彩败北告终，可是它仍然想方设法保有它在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占领的地方。在北非，直到1911年意大利才得以占有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的沿海地区。摩洛哥好不容易保住它的独立，直到西班牙和法国在1912年把它结束。所以，到1914年，整个非洲只有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块地方保持了（至少在名义上）独立。

欧洲列强为什么能征服非洲？

欧洲列强之能够如此比较轻易地征服非洲是由于事实上各方面条件都对他们十分有利。首先，由于有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的活动，到1880年欧洲人对非洲及其内地的知识（关于其自然面貌、地形、经济和其他资源，以及那里的国家和社会的强弱所在）大大超过了非洲人对欧洲的知识。

其次，由于医学技术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由于发现使用奎宁预防虐疾，欧洲人不像19世纪中叶以前那样视非洲为畏途了。[57]

第三，由于直到19世纪70年代，甚至在那以后，欧洲与非洲之间贸易的不平衡性质，以及工业革命的步伐越来越大，欧洲所拥有的物质和金融资力比起非洲所拥有的物力和财力占了压倒优势。因此，欧洲列强对海外战事花得起无数的英镑，而非洲国家则供不起任何旷日持久的军事对抗。

第四，1877-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时期的特点，照J.霍兰·罗斯的说法，是“一种政39 治均势状态，使欧洲走向和平和停滞”，[58] 而非洲同期的特点则是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的冲突和倾轧——曼丁哥人反对图库洛尔人，阿散蒂人反对芳蒂人，巴干达人反对巴尼奥罗人，巴托罗人反对巴尼奥罗人，马绍纳人反对恩德贝勒人等等。于是，当欧洲几乎可以把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其海外的帝国主义活动而毫无内顾之忧的时候，非洲的国家和地区则注意力分散。而且，除了国内平静之外，欧洲列强在帝国和殖民地问题上不论如何分歧，在整个分割时期直至1914年，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诉诸战争。因此，尽管在非洲有激烈的竞争，发生多次危机，卷入分割的欧洲列

[57] P. 柯廷（Curtin），S. 菲尔曼（Feierman），L. 汤普森（Thompson）和J. 范西纳（Vansina），1978年，第445页；J. H. 罗斯（Rose），1905年，第508-572页。

[58] J. H. 罗斯，1905年。

强表现出惊人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不但消除了彼此间的战争，还使得非洲统治者和各地非洲社会因而不能有效地利用一个欧洲国家反对另一个欧洲国家。在我们讨论的时期，欧洲各国一次同一个非洲国家较量，绝没有出现一个非洲国家得到一个欧洲国家帮助反对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情况。

与此相反，非洲各国的行为不但缺乏团结、一致和合作，而且有些国家毫不犹豫地同入侵的欧洲人军队联盟来反对邻国，结果本身也遭到征服。巴干达人同英国人联合反对巴尼奥罗人，巴罗兹人同英国人联合反对恩德贝勒人，而班巴拉人则同法国人协作来反对图库洛尔人。[59] 由于这一切，非洲人采取英勇令人难忘的立场反抗欧洲入侵者的行动——见后文各章[60]——即使是地区一级的也往往是孤立的、不协调的抵抗方式。

最后而且无疑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自然是欧洲较之非洲拥有压倒的后勤和军事优势。欧洲使用的是职业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非洲只有极少数国家设有常备军，有职业军队的国家就更少了。大多数非洲国家是为了防守或攻击才专门征集兵员或动员群众。此外，欧洲列强除自己的军队外，总是，如A.伊萨克曼和J.范西纳所说的，有非洲的雇佣军和征集来的人员可以倚靠，使自己享有所需要的数量优势。[61] 事实上，正如A.拉鲁伊所说，大部分军队的兵员是非洲人，只是由欧洲人指挥。最重要的是，按照1890年《布鲁塞尔协约》的条款，帝国主义列强一致同意不向非洲人出售武器。这意味着大部分非洲军队是用完全过时的旧式的而且常是不堪使用的枪械武装起来的，主要是燧发枪或前膛装药毛瑟枪，并且全无重炮或海军力量。欧洲的军队则是用最新式的重炮和连发式步枪之类的枪枝，尤其是有格林式机枪和马克沁机枪。他们还使用海军的重炮。正如拉鲁伊指出的，在后期的战役中甚至使用了机动车和飞机。[62] 有意义的是，萨摩利和曼涅里克这两位能够使欧洲人吃几场败仗的非洲领导人，想方设法获得了若干这类的新式武器。但是到最后，即使是萨摩利也被法国人击败。关于欧洲对非洲所享有的压倒优势，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曾经引过的希莱尔·贝洛克的著名两行诗中作了简洁的概括。 42

鉴于欧洲列强对非洲各政治实体具有的这些经济、政治，以及尤其是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双方较量力量极其悬殊，而前者可以如此比较轻易地击败后者完全不足为奇。的确，对欧洲来说，选择这个时期进行征服是再好不过了，对非洲来说它却是再糟不过。

分割和占领以后的非洲地图

经过大约一个世代的系统的边界划分和军事占领所形成的非洲新的地缘政治地图，同1879年当时的地图（见插图1.1）大不相同。欧洲列强把非洲大陆分成大约四十个政治单位。有些学者认为新的边界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武断的、人为的、轻

---

[59] M.克劳德（Crowder），1968年，第81页，85页；P.奥利弗和G.马修（Mathew）合编，1971年；V.哈洛（Harlow）和E. M.奇尔弗（Chilver）合编，196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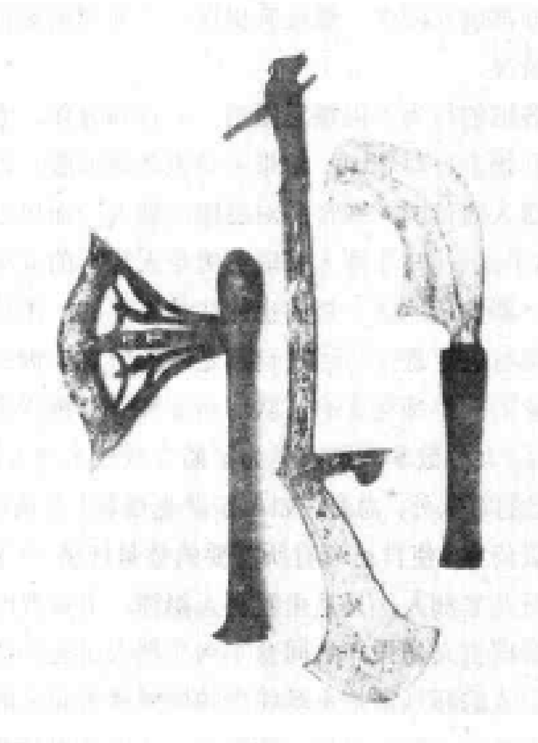
[60] 见下文第3-9章。

[61] 见下文第8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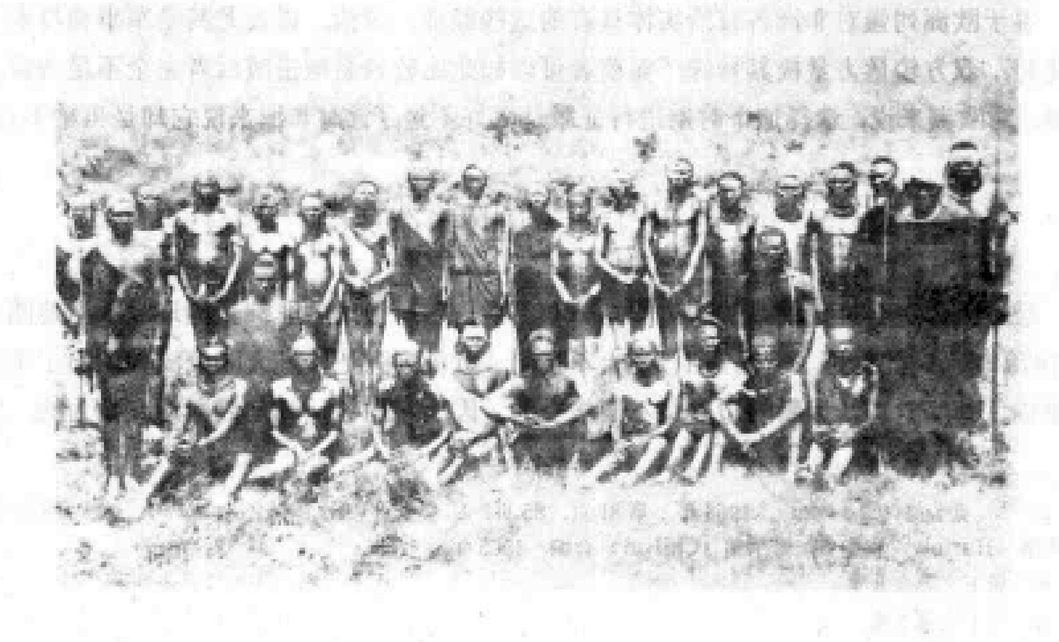
[62] 见下文第5章。

图片2.2(a)-(f) 1880至1935年间，战争中非洲人及其欧洲对手所使用的武器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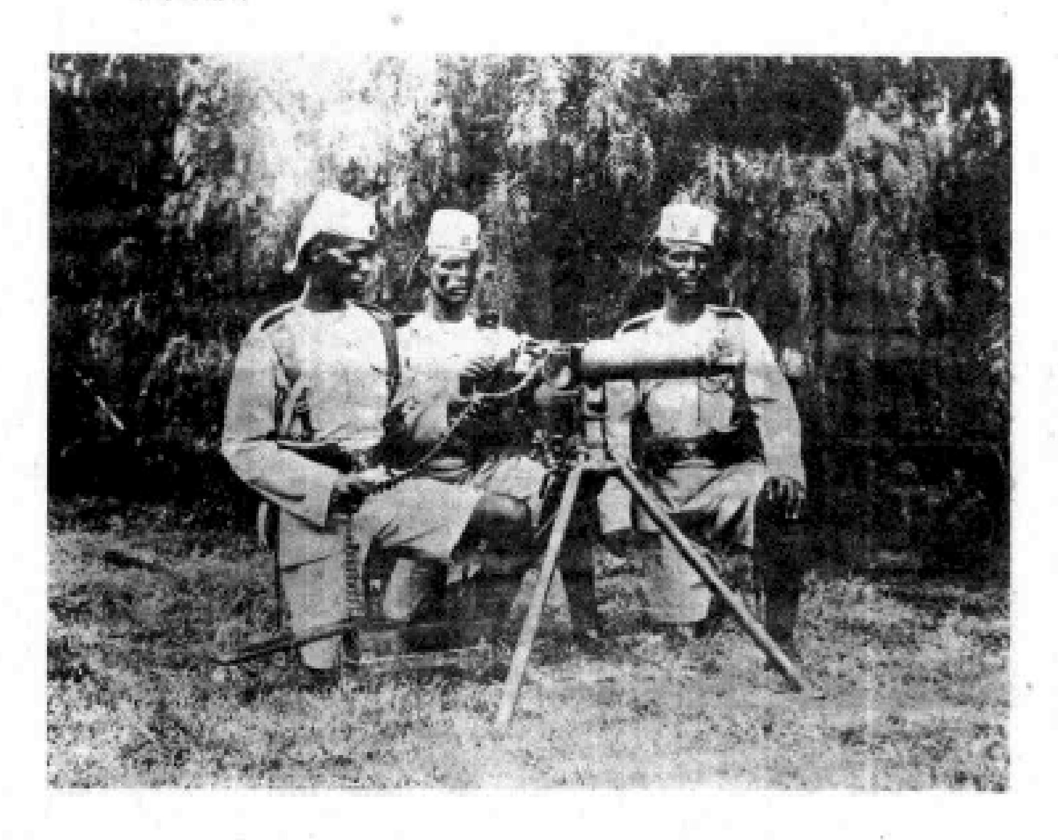
图片2.2(a) 1896年的阿散蒂战斧(黄金海岸)、短剑和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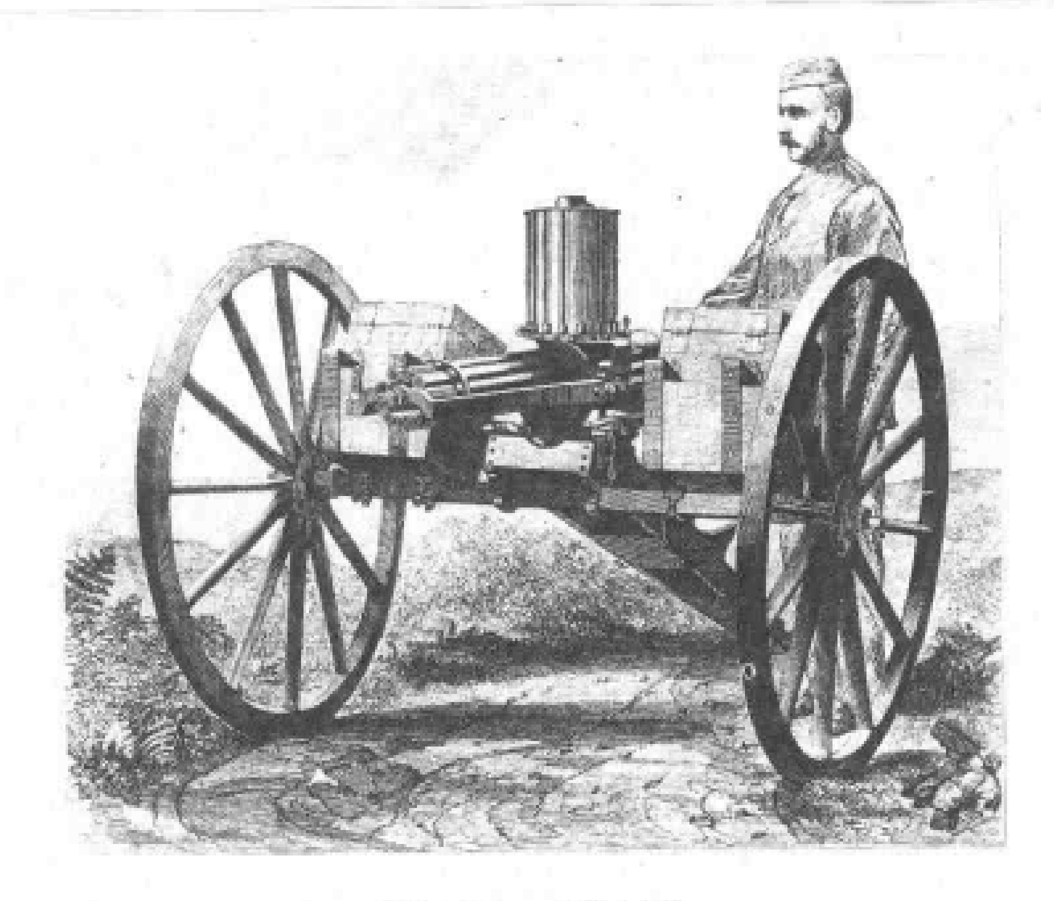
图片2.2(b) 拿着长矛和盾牌的卡鲁尤多海战士(肯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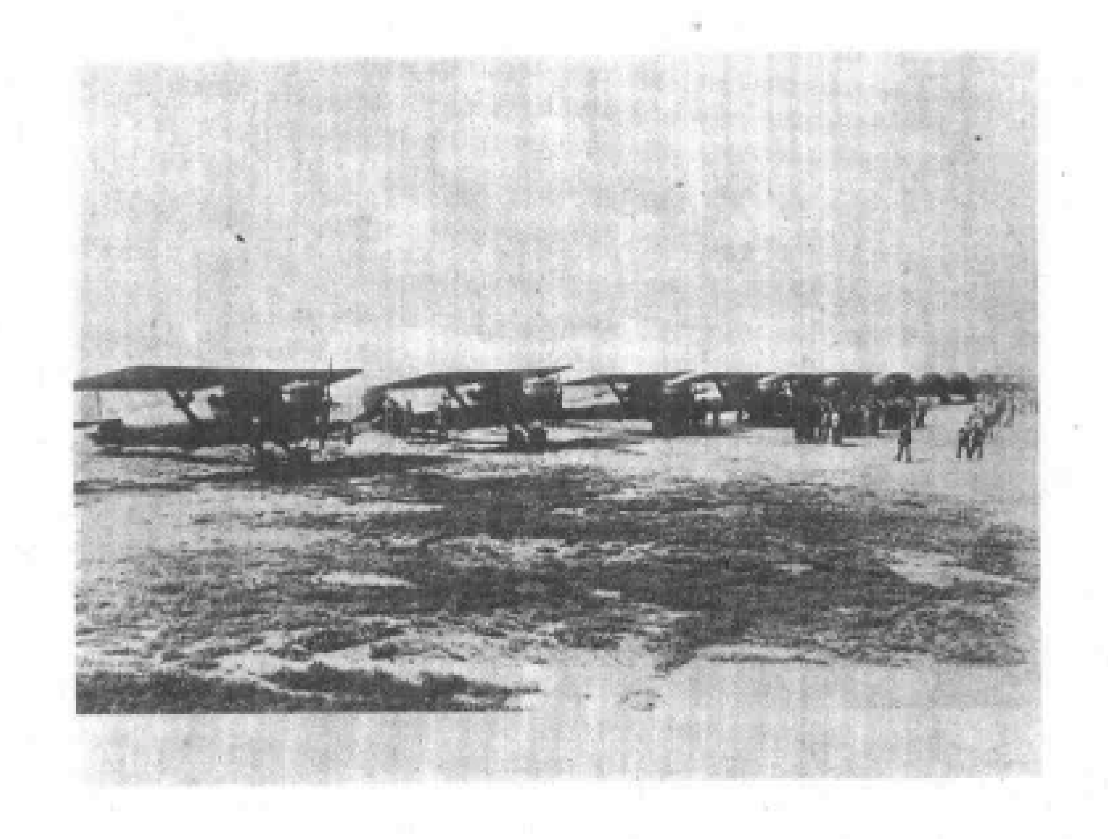
图片 2.2(c) 一位19世纪约鲁巴族（尼日利亚）的奥巴（国王）及其将军们，所用武器是过时的[illegible]



图片 2.2(d) 携带一挺马克沁机关枪的皇家非洲步枪队的士兵



图片2.2(e) 一挺格林机枪



图片2.2(f) 20世纪20年代殖民战争中使用的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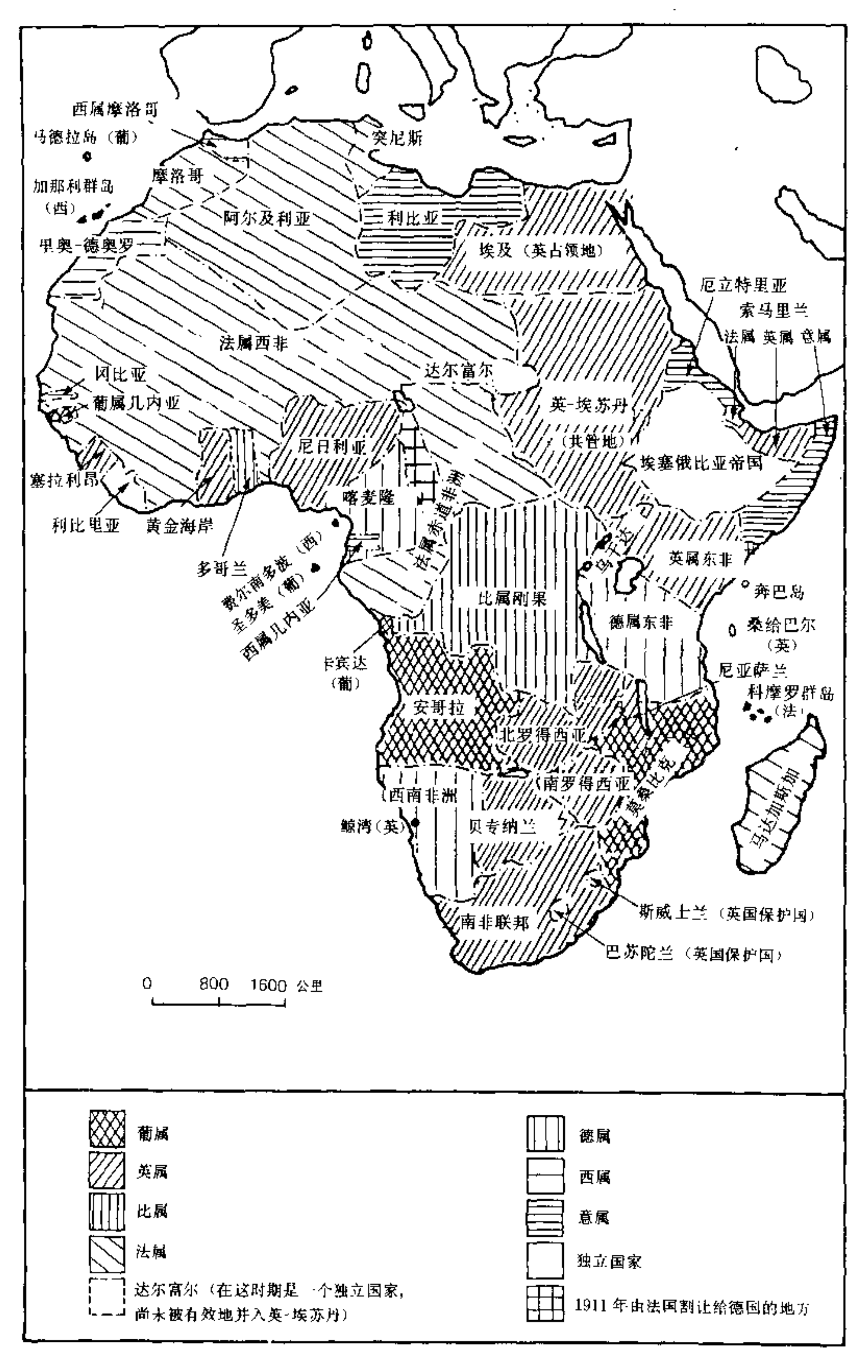


插图 2.1 1914 年的非洲（根据R. 奥利弗和J. D. 费奇，1962 年）

率的和随意的，并且歪曲了欧洲人到来以前的国家政治秩序。其他学者，例如约瑟夫·安宁和萨迪亚·图瓦尔则认为它们比1879年以前的更为合理。[33]

44 两种观点各有一些道理。边界总长度的30%是画成直线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边界常是径直地穿割民族和语言的疆界。然而，其余的边界则确是按照民族分野，因此不能认为是武断的或是考虑欠周如各家批评所说的那样。况且，非洲政治单位的形成是由于例如奥约—达荷美之争，富拉尼人的圣战，南部非洲的"姆菲卡尼"，或如19世纪后半叶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的内部争权倾轧的结果，它们证明在分割以前非洲的国界、边境和飞地的不固定性。通常未被认识到的是分割使这种不固定的疆界固定下来的程度，也即划界官员们在多次边界划定中，在政治上可能时，为了纠正异常情况所费力气的程度。因此，总的来说，1914年的非洲地图（见插图2.1）同1879年的地图比较，虽然看起来也许很混乱，然而划界工作却是颇为高明的，这是由于制图学有了新的进展。分割虽应谴责为非法的和不道德的，而且必须承认有些国界确是人为的和武断的，然而鉴于这种"混乱"是由分割造成的就鼓吹回到不固定的、欧洲人到来以前的国际边界则是不足取的——实际上还是危险的——除非经过非常仔细的复查。

到1902年，对非洲的征服差不多结束了，它是一桩特别血腥的事业。马克沁机枪的毁灭能力和相对先进的欧洲技术对非洲人来说该是一场令人头脑清醒的经验教训。但是欧洲对非洲的征服虽是如此比较轻易地完成了，占领工作和在非洲建立欧洲人行政管理的工作却并非如此——以下各章将表明此点。

（陈绂 施兰卿译）

[33] J. C. 安宁（Anene），1970年

3 非洲人对瓜分和征服的能动性和抵抗

T. O. 兰杰

从1880年至1900年这20年间，热带非洲出现既新奇又残酷的矛盾现象。欧洲征服 45
和占领的过程分明是不可逆转的，但这种征服和占领却又显然是有条件进行抵抗的。之所以不可逆转是由于技术革命，白人第一次在武器方面取得了决定性优势；同时，铁路、电报和轮船的发明，也第一次使他们能够解决非洲内部和非欧之间的部分交通问题。之所以有条件进行抵抗，是因为非洲幅员辽阔；因为那里各族人民具有力量；因为当时欧洲并没有调动大量人力和众多技术。确实，白人征募非洲人辅助部队来弥补他们的人力缺乏。但他们并不是能控制被分裂和被胜过的黑人的既凶残狡猾又善于玩弄手段的能手。欧洲人只不过是照搬老牌帝国的全部策略而已。他们对形势具体细节的了解往往远不如非洲统治者。他们在开拓策略的执行上是混乱和笨拙的。欧洲人遭遇非洲人意想不到的大量抵抗，这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和惊慌失措所激起，有些甚至是自己虚构出来的。

欧洲人"最后总归还是取得了胜利"，在他们取得胜利以后，他们整顿了混乱的局面。许多书籍大量记述称为"绥靖"的事迹，给人的印象是大多数非洲人以感谢的心情接受所谓"殖民地式的和平"，而非洲人进行抵抗的事实则被一笔抹煞。但是欧洲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非洲的反抗在当时无足轻重，或者现在不值得对之进行研究。实际上，在最近二十年里人们对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工作，大多数是严肃的、细致的、有学术价值的，不回避许多抵抗运动中含糊不清的地方。但是大多数研究都以三种理论性假设为基础，或用以说明这三种理论性假设，这些假设我认为基本上仍然是正确的，虽然每一种假设都经过近代研究和分析的修正。第一种论点，非洲抵抗的事实是意义深长的，因为它证实非洲人对于欧洲的"绥靖"并没有平静地予以默认。第二种论点，这种抵抗既不是绝望的挣扎，也没有丧失理性，它经常从理性和革新的思想意识中取得力量。第三种论点，这些抵抗不 46
是无效的，它们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重大的反响。这里，这三个论点连同对它们提出的修正值得我们重加论述。

抵抗运动的梗概

1965年，苏联历史学家A.B.戴维森号召学者驳斥"欧洲传统编史工作者的观点"。根

据这种观点，“非洲人民把殖民主义者的到来看作幸运，看作把他们从自相残杀的战争中、从邻近部落的暴政下、从流行病和周期性的饥荒中解救出来的救星”；根据这种观点，不进行抵抗的民族被描写为“爱好和平”，而进行反抗的民族却被描写为“嗜血成性”。戴维森评论说：“殖民统治的拥护者拒绝承认抵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们把反抗解释为“原始的和无理性的”反应，或者说是受少数“嗜血成性者”的煽动。“他们拒绝接受把反抗看作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这个唯一正确的解释，而这正是占压倒多数的非洲人支持那些反抗的原因。”①

1965年，戴维森着重指出“很多反抗迄今尚未被人所知……我们往往没有那些早被公认为既成事实的反抗的具体资料。从那时起，“发现”抵抗的工作进展迅速。历史学家们开始更严格地将反叛事件进行分类，把“农民反抗”从“社会盗匪”中区分出来，把游击战与军队间的冲突区别开来。在某些事件中，殖民主义者大肆宣扬为“反叛”的情节，实际上是由于白人愚昧无知和惊慌失措强加在人民头上的。② 在更多情况下，相当数量和意义重大的抵抗终于从含糊不清中辨认了出来。现在我们掌握了大部分“重大”起义的详细研究资料，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有了如何最好地解释和说明这些起义的有力的论据。从所有这一切看来，很清楚，戴维森认为抵抗是“正常现象”的看法是正确的。

同样清楚的是，过去那种把非洲社会区分为天生好战和天生和平的陈旧做法并不中肯。我曾写了一些文章提出，就广大的非洲政治实体来说，区别所谓好战、劫掠成性的国家和所谓和平、从事贸易和耕作的国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所有国家多少都曾试图寻求一种不须求助于武力而能巧妙地摆布欧洲人的办法；实际上所有国家也都有一些至关紧要的利益或价值必须加以卫护，甚至在必要时准备武力抵抗。③ 但是我本人曾错误地认为，决心进行抵抗和企图巧妙地摆布欧洲人方面走在最前面的社会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要比它们与“那些既不能抵抗又不能利用殖民统治的小型社会”的共同点要多。④ 另外一些历史学家，诸如舒拉·马克斯，在对南非科伊桑人抵抗的研究中指出，非中央集权的民族正如中央集权的民族一样，有能力进行反对白人入侵的坚决战斗。约翰·桑顿对比了有国家和无国家社会的抵抗潜力，认为后者具有很大优势。

> 人们往往称赞国家在抵抗欧洲人侵略中的作用……实际上……它们的作用是含糊的。确实，有些国家抵抗得很出色……但是许多有国家的社会在与欧洲人的冲突中垮了……另一方面，无国家的社会的抵抗却往往持久而英勇……就是那些无国家的社会——伊博人、鲍勒人、阿格尼人等等——进行了游击战争。⑤

简言之，实际上每一种非洲社会都进行了抵抗，在欧洲人入侵的每一个地区，实际上都存在抵抗。人们现在可以接受这点已是一个不再需要详细阐述的事实。目前我们所要做的是从分类转入解释；从仅仅宣扬抵抗转入评价和阐明它的激烈程度。研究某个具

① A. B. 戴维森（Davidson），见T.O.兰杰（Ranger）编，1968 c，第181-183页。
② S. 马克斯（Marks），1970年。
③ T. O. 兰杰，见L.H.甘恩（Gann）和P.杜伊格南（Duignan）合编，1969年，第293-304页
④ S. 马克斯，1972年，第55 80页。
⑤ J. 桑顿（Thornton），1973年，第119-120页。

体民族领地的历史学家往往着重于表明在他研究的地区有过抵抗，并声称这种抵抗是当地反抗传统的一部分，由于实际上到处都有过一些抵抗活动，因此这种做法不成问题总是办得到的。问题在于，这样零星一件一件叙述的办法，会混淆地区间的抵抗程度有极大不同这个事实。在北罗得西亚（现在的赞比亚）确实发生过武装抵抗，但其规模和持久程度都不能与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相比，转过来说，南罗得西亚的斗争，其经常程度又不能和赞比西河流域发生的反抗葡萄牙人的抵抗相比。显然，我们需要作严格的地区性比较研究。以下数章将提出进一步的对比模式，并阐明其意义和后果。

抵抗斗争的意识形态

殖民地的辩护士强调武装抵抗是丧失理性和不顾死活地蛮干。他们声称武装斗争往往是“迷信”所导致，否则，人民会心甘情愿接受殖民统治，只是“巫医”起了作用。很多欧洲反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家同情非洲的反抗，但是他们也认为在非洲人的“传统”思想模式中缺乏在生活方式受到攻击时促使他们作出有效或实际反应的东西。反抗的思 48 想意识被视作“绝望的魔术”，注定要失败，不可能指明未来前途。在这样观点下，不管抵抗运动多么英勇，终究免不了悲惨的灭亡结局。⑥

最近十年左右，研究抵抗运动的历史学家设法与这种说法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们使用两种方法：严格遵循世俗的革命思想意识和“肃清”宗教观念。

他们提出的主要的世俗思想意识就是“主权”观念。贾科布·阿贾伊曾经这样写道：“欧洲冲击的最根本的方面是丧失主权……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他们的主权，他们被迫接受别种文化，他们至少要失去一点自信和自尊；在怎样改变自己的文化，是仿效还是拒绝别的文化上，他们失去了自己掌握方向的权利，失去选择的自由。”⑦

沃尔特·罗德尼更加强调地提出同样的观点：

> 断定殖民主义的短期性……主要出于非洲失去权力这一事实……在殖民前贸易的几个世纪中，非洲还保持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某些控制，尽管和欧洲人通商时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在殖民统治下，甚至对内部事务的一点点控制权也消失了……在历史上，独立自主地行动的权力是积极而自觉进行活动的保证。遭受殖民统治就意味着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一夜之间非洲政权国家失去了它们的权力、独立和内涵。⑧

阿贾伊和罗德尼看到了丧失主权具有左右一切的重要意义，当然，这并不表示非洲的抵抗者也是这样来理解主权的。罗德尼本人悲叹，“对世界片面的和不恰当的见解”妨碍了非洲领导人充分理解在遭遇欧洲人时什么才是生死攸关的。但是阿贾伊断言，非洲国家的统治者“作为人民主权的保护者”，他们“对任何觊觎主权的强国，都抱有敌意”。⑨

⑥ M. 格拉克曼（Gluckman），1963年，第137-145页。
⑦ J. F. A. 阿贾伊（Ajayi），见T. O. 兰杰编，1968c，第196-197页。
⑧ W. 罗德尼（Rodney），1972年，第245-246页，为原文的重点摘录。
⑨ J. F. A. 阿贾伊，见L. H. 甘恩和P. 杜伊格南合编，1969年，第506页。

历史学家重新找到了一些惊人明确的主权声明。其中有单纯自主权的声明，如尧人国王马琴巴 1890 年对德国司令官赫尔曼·冯·维斯曼的驳斥：

> 我已经听到你讲的话，但是我没有理由一定要服从你——我宁愿先去死……而决不拜倒在你的脚下，因为正和我一样，你也是上帝创造的……这里在我的国土上，我是素丹，你是那里在你国土上的素丹。听着，我没有叫你必须服从我，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自由人……至于我，我不会向你屈服，如果你有足够力量，那么你来杀死我吧。⑩

49

也有一些声明表达了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但同时表示决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如莫桑比克中部巴鲁埃族的首领马康珀·汉加的事例就是如此。他在 1895 年对一位来访的白人说："我知道你们有人怎样在非洲得寸进尺，一步一步推进……在我国家的四周都有你们公司的活动……我的国家也要进行这类改革，很愿意开放我的国家……我也想有良好的公路和铁路……但是我要一如祖辈那样仍旧是马康珀"。⑪

还有一些声明强烈表示较广泛的主权哲学。最惊人的一份来自西南非洲。纳马人领袖亨德里克·维特布依在他的日记中吐露："以肤色和生活方式来说，我们属于同一种族，而非洲总的说是'红头人'(即非洲人)的土地。我们组成不同的王国和地区，但这仅仅反映非洲内部的划分。"维特布依于 1894 年告诉德国行政官员特奥多尔·洛伊特韦恩说："天主在人世间创造了各色各样的王国，因此我知道并相信，我希望保持作为我国土和人民独立首领的地位是无罪和无辜的"。⑫

对如何理解欧洲人来到的最初影响，不管人们会找出什么问题，毫无疑问，一旦建立起欧洲人的统治，必然带来非洲人丧失主权的后果。维特布依的宿敌赫雷罗人起义的领导人马赫雷罗于 1904 年写信给他，呼吁联合行动，信中说："我的愿望是我们弱小国家应当起来反抗德国人……让我们整个非洲向德国人作战，我们宁愿战死在一起，而不愿受敌人的欺凌、囚禁或其他手段对待。"⑬ 坦噶尼喀东部（现在的坦桑尼亚）没有建立中央政权而热烈维护独立的马通比部落 1905 年爆发马及-马及起义，该部落的头人们谈及德国人的统治时说："德国人现已成为绝对的统治者，必须消灭之"。⑭

主权思想显然为抵抗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然而，对这点必须进行重要的修正。因为统治者并非总是一清二楚的"人民主权的保卫者"。在 19 世纪的非洲——在东、西和

50

南部——曾经出现以"欧洲军事技术"为基础的新国家。⑮ 这些国家常常抵抗欧洲强国的直接扩张，但是他们的抵抗却遭受不满的臣民的破坏。桑顿向我们指出，像萨摩利·

---

⑩ 由 B. 戴维森（Davidson）引用，1964 a，第 357 358 页。

⑪ 由A. 伊萨克曼（Isaacman）引用，1976 年，第 128-129 页。

⑫ 研究西南非洲抵抗运动的有H.德雷施勒(Dreschler)，1966 年；H. 布莱(Bley)、1968 年和 1971 年。这里引文是录自J. 艾利夫（Iliffe），见G.基博迪亚（Kibodya）编，1968 年。

⑬ J. 艾利夫，见G. 基博迪亚编，1968 年。

⑭ 姆齐. 恩敦杜尔·曼贾亚（Mzee Ndundule Mangaya）引文，见 G. C. K. 瓜萨（Gwassa）和 J. 艾利夫合编，1968 年，第 5 页。

⑮ P. 博安南（Bohannan）和 P. 柯廷（Curtin），1971 年，第 271 页。

杜尔或谢胡·阿赫马杜领导的那些西非国家，“接连遭受持续不断的叛乱，这主要是由于高压和剥削性的国家结构引起的。总的说来，这些国家的领导阶层剥削成性，暴虐无道，并不具有管理国家和进行战争的合法性”。[16] 艾伦·伊萨克曼描述赞比西河流域“附属国家”的情况，在那里“强加的外来混血种人的统治引起了非洲人的反对，强迫征集劳力也引起同样的反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充满了无数叛乱……反抗这种形式的外来统治以及掠夺奴隶的劫袭活动。很明显，此种形势难以使它本身作出不断的和统一的努力”来反对白人。[17]

这类国家可与立国较久而统治者已取得“合法性”的国家组织形成对比。但即使在立国较久的国家里，如果设想所有古代贵族政府享有普遍的信任和支持，那就太不切实际了。在有长期历史的民族中，统治集团利用19世纪武器和商业提供的机会，建立独断独行的权力，结果是在他们与白人对抗时不能指望人民广泛的支持。这就是北罗得西亚的抵抗无效的部分原因，在那里本巴人的首领面临亨利·S.米贝洛所说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憎恶”，在那里巴罗兹兰的贵族政权顾虑重重，如果他们打算反抗英国势力扩张的话，会发生奴隶起义。[18]

确实，很多历史学家曾强调区分两种抵抗的重要性，一种是统治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剥削权力所发动的抵抗，另一种抵抗规模更大，既针对殖民压迫，同时也对准非洲统治者的独裁主义。爱德华·斯坦哈特强调指出：

> 抗议和抵抗可以是而且正是指向……国内的压迫形式……必须把抗议看成与表达民族感情有所不同……由于我们的视线集中在领导阶层，我们已接受这种解释，即反对殖民主义是“非洲民族主义”，是一种驱逐外来者和恢复“民族”独立的运动。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反抗运动的内部……我们很容易发现，反抗运动领导者组织和阐述的运动的动力，完全是反独裁主义和革命的，而不是反外国和“民族主义”的。[19]

即便是建立已久的政治实体，有公认合法的领导阶层，并能发动大多数人民群众参加反抗运动，近来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批评其为“原始忠诚的狭隘意识”和“地方主义”，其目的还是集中在主权上，并未超出过去的理解。这些历史学家相反十分重视那些把主权概念重加解说的抵抗运动的重大意义。鉴此，伊萨克曼认为，1917年在赞比西河流域掀起的叛乱，与以前那里发生的抵抗不同，“以前的反抗旨在重建一个历史上的政治实体或恢复有关各族人民的独立。”1917年的叛乱“寻求从殖民压迫下解放赞比西所有各族人民”，这特别吸引所有各族的被压迫的农民。“原始忠诚的转变，体现了政治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时第一次认识到葡萄牙人是共同的压迫者”。[20] 51

---

[16] J. 桑顿，1973年，第120-121页。
[17] A. 伊萨克曼，1976年，第103-104页。
[18] H. S. 米贝洛（Meebelo），1971年，第68页。
[19] E. 斯坦哈特（Steinhart）未发表的论文。
[20] A. 伊萨克曼，1976年，第343、345、370页。

宗教观念的作用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重新查考抵抗运动中宗教观念的作用。他们发现的宗教观念与殖民者所说的“狂热的巫医”或者“绝望的魔术”很少有相似之处。开始时，他们发现宗教的教导和信条往往与主权和合法性问题直接有关。统治者通过宗教仪式的认可成为合法化，每当统治者及其人民决心保卫他们的主权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大大依靠宗教的信条和观念。罗德尼在一份论述安哥拉发生的奥文本杜人反抗斗争的论文中提到“在非洲斗争的后期，精神上的抵抗引起人们极大的重视——如著名的马及-马及战争就是明显的一例……至于对‘原始的抵抗’，人们往往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任何地方的非洲民族，不但在物质方面，同时也利用他们自己超自然的宗教武器，自动进行抵抗”。[21]

在另外一篇论文里，罗德尼论述的是莫桑比克南部加扎国家反抗葡萄牙人的斗争。他写到，依靠精神力量进行斗争可能导致损伤性结果，“加扎的恩戈尼人不但政治首都被毁，而且主要圣殿也受到玷污”；1895 年在军事上失败后，王室的宗教仪式祭祀物品失去了；在难以理解的失败后，占卜者掷掉了他们的占卦骨头；“高级女祭司”被免职并处死。“人们普遍在灵魂深处意识到危机的存在”。[22]

正由于合法性面临危机，才常常出现试图重新解释主权含义的大规模运动。这种运动几乎一律都有精神上的领导者，发布更广泛团结的信息。有时这种情况出现在伊斯兰教教义之中——伊斯兰的千年至福说和抵抗思想从东到西遍布苏丹地带。有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亨德里克·维特布依汲取基督教新教教义支持主权理论，而当时有一位非洲独立基督教的先知活跃在纳马人中，他们当时正起义反对德国人。这种情况的发生更经常的是与非洲宗教有关。

52

我深信这种情况也曾在南罗得西亚发生，1896 年的起义是由宗教领导人激励和协调的。伊萨克曼认为 1917 年在赞比西河流域发生的起义，精神上的鼓舞力量来自女巫师姆傅娅的教导，她并不号召恢复她自己的巴鲁埃国家，而是宣讲所有非洲人兄弟情谊和深受压迫的福音，并布道大神姆瓦里关心他们的幸福，关心他们对邪恶的纠正。[23] 在 1905 年的马及-马及起义中，反抗思想从伊斯兰教和非洲千年至福的热情中得到力量。1888-1891 年发生的坦噶尼喀沿海地区的大反抗受斯瓦希里商业界和城市名流的领导，没有出现伊斯兰教的或“传统”的反抗宗教观念，抵抗的思想基础仍是保卫已经确立的主权。[24] 但是在沿海地区暴动失败和有很多斯瓦希里社会名流被德国人吸收为他们服务之后，反抗的基础改变并扩大了。马及-马及起义是受非洲内地礼拜中心新出现的先知的启示和平民主义的热诚的伊斯兰教义的共同激发而崛起的。[25]

---

[21] W. 罗德尼，1971 b。

[22] 同上，1971 a。

[23] T. O. 兰杰，1967 年；A.伊萨克曼，1976 年，第 304-305、307、310、313、316、326 页。

[24] R. D. 杰克逊（Jackson），见R. I.罗特伯格（Rotberg）和A.马兹鲁伊（Mazrui）合编，1970 年。

[25] G. 瓜萨，见T. O. 兰杰和I. 基曼博（Kimanbo）合编，1972 年。

作为有些大规模抵抗运动基础的先知的教导，慢慢地从其反对者歪曲的记载中得以保存下来。吉尔伯特·瓜萨对金吉基蒂勒的马及-马及思想意识的发展和特征的叙述就是这种保存的最佳例子。另外一个令人注意而尚未发表的保存实例，是蒙加默利·马博纳所记录的伟大勇敢的科萨先知马卡纳的教导，他的启示发布于19世纪早期，“只是到1890年科萨全国抵抗运动最终失败时，才失去其力量。”正如马博纳所说，他的教导通常被看作是“与宗教既不相容也无关系的杂烩”。马博纳揭示，这种教导是科伊桑人、科萨人和基督教要素精心拼凑的典范，以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把它们拼合在一起。

马卡纳以卓越的铸字炼句来表达神的概念——阔大而光芒四射的概念。“他的强有力的心灵和宗教天才……塑造成一种教义，用以作为科萨人的思想动力。”马卡纳教导的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基督教新教主权思想的非洲翻版，这种思想后来给予维特布依对“红头 53 人”神圣权利的信心。马卡纳探索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根本区别——风俗习惯的不同，信奉神的不同。创世主是科萨人的伟大祖先达利代富，他使乌西克索成为白人的神。乌西克索位在达利代富之下，因此，白人在精神上要比科萨人卑下——不断为罪恶意念所折磨。但是这种差异在两个精神世界相互接触和冲突之前是无关紧要的；达利代富表明，他保证他自己特殊的孩子——科萨人——和他们特殊而优良的生活方式将压倒白人表而强大的力量。马卡纳呼吁全体科萨人团结一致；相信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利代富必将把白人赶走；科萨人的死者将要复活；“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26]

像马卡纳这种概念上的和象征性的创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远比最初与之结合的那次具体抵抗运动存在得久远。它完全不是出于无奈的胡言乱语，这种先知的启示是一种系统的尝试，力图扩大和重新解释神的概念以及这种概念与道德秩序的关系，它也涉及科萨人内部的责任与关系的广范围的改变，并且提供了“抵抗思想的基石”。彼得·里格比强烈反对把非洲先知主义的思想说成“仅仅是殖民时期遭受外来瓦解力量的结果”，或者说“因非洲宗教的垮台”而突然出现的产物。在他看来，先知主义肯定是反抗的突出表现，“在非洲大多数反抗运动中起到主要的作用，”但先知的出现“不仅仅是外来经历的反应，而且是以非洲宗教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为根据。”[27] 从上述观点可以理解为什么非洲宗教体系能正常地从本身的紧张状态和潜在力量中产生先知领袖，并理解先知领袖为什么有能力鼓动新的号召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使旧的重新复苏，也使新的不断涌现。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再受先知抵抗思想是“绝望的魔术”那种谬论的影响。

尽管所有这些研究都很有价值，对反抗运动中宗教观念的重视还是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把宗教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估价过高了；另一方面又有些学者认为夸大了抵抗运动在宗教中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国的学者纷纷提及领导肯尼亚沿海腹地起义的“女巫”吉里亚马；较近期的历史学家重新解释说，她是一个“女先知”。但是，辛西娅·布兰特利·史密斯在她对吉里亚马精辟而彻透的描述中，说此人根本不是什么宗教领袖，她仅仅是 54

[26] M. A. 马博纳（Mabona），1974年。

[27] P. 里格比（Rigby），1974年。

一个可尊敬的和过分自信的妇女。[28]这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仅仅重新解释殖民者术语如"女巫"和"巫医"还远不足以纠正官方记载的歪曲。这种论点是研究恩德贝勒和绍纳历史的两位研究人员提出的，我本人对1896年南罗得西亚起义的叙述也持有同样看法。英国南非公司说，这些起义是由"巫医"挑起的，我坚持认为为它们是受强有力的先知思想所发动。朱利安·科宾和戴维·比奇断言，降神者的影响很有限，不像我所说的那样大，而姆瓦里的祭司根本没有参加起义。[29]毫不足奇，我不准备作如此大幅度的修正。但肯定正确的是，近时对南罗得西亚非洲宗教的研究，说明它和抵抗斗争的关系不可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白。事实很清楚，不论是姆瓦里的信徒，还是降神论体系，本身都不能完全承担反抗运动或完全承担其他任何事业；二者都以各个神庙之间和神庙内部不断和激烈的竞争为基础。神灵崇拜之所以能够令人惊奇地保持下来，依靠的是祭司和降神者一旦支持错误或失败的事业，就会迅速地被守候在他们左右的对手所取代，同时也依靠某些重要的崇拜中心采取的立场往往截然不同于其他中心。有几个姆瓦里神庙支持起义，而别的神庙则不予支持，那些确实支持起义的神庙，在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当权的家族就被撤换。我设想绍纳的整个宗教领导层全部都投入起义，这显然是错了。起义固然十分重要，但其重要程度不能（也不应）破坏长期形成的神灵崇拜的持久性和实效性。[30]

有关先知运动和反抗关系的争论就如上述。先知的出现反映了公众迫切要求采取彻底而革新的行动的强烈情绪，但是如果只有外来的威胁也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民众意识。正是由于民众对内部紧张关系和种种变革的深切焦虑，或者甚至由于人们普遍希望加速变革的步伐并抓住新的机会，先知才有可能出现。正因为如此，先知领袖的教导常常指向非洲社会内部道德方面——有时是领导一场反对内部独裁主义的抗议运动，有时更多的是抗议有关人类天性的种种行为。目前对19世纪非洲大量先知领袖所做的研究，明显可见他们中许多人与反抗白人无关，或甚至根本与白人没有直接关系。

55 甚至那些主要关心如何重新确定他们的人民与欧洲人关系的先知领袖，在提出抵制或抵抗时，也根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正如马博纳所指出，科萨先知主义既提出"抵抗思想"，也提出"有控制的和解"思想。主张抵抗的先知是马卡纳；主张"有控制和解"的先知是恩齐卡纳。恩齐卡纳和马卡纳都是同一等级的有创造性的宗教天才；他们之间关于神的本性的论争具有很直接的实际影响，把科萨人分裂成了宗派，但这种论争被引入了深奥的神学范畴。实际上，恩齐卡纳主要并不关心与白人关系的问题，他意图接受某些基督教思想的动力，给科萨人社会带来变革，同时又否定白人的许多文化上的自高自大。正如O.P.劳姆所指出，今天对许多科萨人来说，"基督教的兴起并非传教士的功绩，而应归功基督教先驱者恩齐卡纳个人。"[31]

虽然，我们找不到另一件像马卡纳和恩齐卡纳之间争端那样戏剧性和直接的先知冲

---

[28] C. B. 史密斯（Smith），1973年。

[29] J. 科宾（Cobbing），1974年和1977年；D. 比奇（Beach），1971年和1979年。

[30] M. 舍费利尔（Schoffeleers），见舍费利尔编，即将出版。

[31] O. P. 劳姆（Raum），见E. 本兹（Benz）编，1965年，第47-70页。

突，但是，甚至在抵抗十分坚决的地区，(如马及-马及起义地区或罗得西亚的绍纳地区)也完全可能出现相同地位的先知。马及-马及起义失败后，就曾出现由金吉基蒂勒加以利用的一系列象征精神力量的信条和主张，被后继先知人物接过来，他们关心非洲社会的内部纯化，他们领导了称作“清除魔法运动”。

至于绍纳人，埃莱克·马辛盖泽曾写了一篇动人的论文，论述先知给予马佐埃流域绍纳人忠告的后果。最有影响的降神者首先劝告人民仔细倾听传教士讲道；然后劝告他们参加起义，驱逐白人；接着再次劝告他们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使他们能获得白人的“智慧”。马辛盖泽并不认为这是一连串混乱或背叛。他写道：

> 1897 年的军事失败……并未导致像白人天真地预期的那样抛弃传统的世界……绍纳人开始试图去了解白人……以内汉达及其他降神者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一点也不反对基督教精神。从两个宗教体系互相接触开始，传统宗教的任务就是打算缓和变革……它一直提醒人民不管军事较量的结果如何……他们不应失去他们的文化特性。实际上，传统宗教一直是绍纳人对基督教和整个西方文化做出建设性和创造性反应的源泉。它提醒人民他们仍旧有接受或拒绝新秩序某些方面的余地。[52]

56

有人可能说，绍纳人的先知以保持一定的精神自主权来缓和失去政治主权的后果。然而绍纳先知主义发动反抗思想的潜力并没有消失，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降神者都深深地卷入民族主义和游击战的斗争。

从抵抗历史的观点来看，很多先知把焦点移向内心世界，把邪恶之源归诸内心的罪恶而不是外部的压迫。这种转移看来像是“虚假的意识”。从非洲的宗教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运动的意义明显地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解决非洲社会的内向性焦虑。因此，B. A. 奥戈特教授不同意认为肯尼亚先知运动基本属于反殖民性质的那些人的论点。他提到这样一位先知——西梅奥·翁代托时说，他的确是“革命的”，但是他的革命是精神上的，发生在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不在政治领域里。奥戈特写道，先知运动的实质是“改造精神的和社会的结构，建立能面对现代世界挑战的新的社会”。[53] 伟大的先知抵抗思想就这样成为重新确定社会道德基础的较大尝试的一部分。

非洲抵抗运动的后果和意义

直到大致二十年前，人们一直普遍地接受一种看法，即抵抗运动是死胡同，没有出路。从那时以后，开始有人强烈主张抵抗运动以各种方式通向未来。就它们与主权的关系而言，可以认为它们是恢复主权和非洲民族主义胜利的预演；就它们所具有的先知思想而言，可以把它们看作对新社会概念的一种贡献。有些抵抗运动的结局改善了参加起义的民族的地位。其他一些抵抗运动则涌现出新的领导人取代为当局承认的首领。我本人主张，抵抗运动“联结着”群众的民族主义，因为实质上它是群众参与的运动，它始

---

[52] E. 马辛盖泽 (Mashingaidze)，1974 年。

[53] B. A. 奥戈特 (Ogot)，1974 a。

终具有群众运动在过渡阶段所贯穿的气氛和表征，并且具有民族主义运动从过去英雄历史的回忆中吸取的明显的激情。[34]

这些论点得到其他学者的发挥，抵抗运动的现实意义成为民族主义和游击战争理论家的公理。因此，罗德尼在对奥文本杜人反对葡萄牙人的抵抗运动进行考察结束时写道：

57

> 过去几年发生在本格拉高原上的武装抵抗得以复燃，它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它和过去时期有什么联系，这些主要问题，在这里并未得到解答，而且即使有解答也免不了不够充分。只要注意到下面的事实就足够了：**安哥拉的自由战士本身肯定他们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先前的抵抗战争之间的连贯性，同时，在他们影响下，据说广大的人民群众确实恢复了爆发拜隆杜战争那种事件时的精神**。缺乏事实根据的学者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有异议。[35]

学者们，无论有无根据，怀疑抵抗运动和后来的自由斗争之间假设的连贯性。这种异议有来自"右"的，也有来自"左"的。

亨利·布伦施威格从"右"的立场撰文，否定抵抗运动和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按布伦施威格的观点，在非洲，很多世纪以来，一直存在适应外来思想和抵抗外来思想的斗争。"适应者"创立了伟大的素丹帝国，抵抗者则力图否定它们；适应者利用广义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原则，抵抗者提出布伦施威格所说的"泛灵论"和"部族论"。早在殖民统治之前很久，就曾发生过"无数次的叛乱"反对非洲的革新者；大多数反对殖民主义的抵抗运动都植根于相同的"泛灵论"和"部族论"。另一方面，现代非洲的民族主义和泛非洲主义则是集中革新论点和采取"博大"思想的潮流的表现，因此，它们站在与抵抗传统完全相反的传统之上。[36]

另有一些历史学家从"左"的方面来撰写，他们否定抵抗运动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假定的联系，其理由是他们认为允许新国家中占少数有时还很自私的统治者自居革命的合法地位，是纯理论的产物。斯坦哈特对此提出极明确的陈述："不要通过民族主义神话的歪曲透镜来考查反殖民主义的抵抗运动，我们必须创造出较好的'神话'，以更合适地解释非洲的反抗现实……描写革命高潮的'神话'比陷于失败的'民族主义神话'更能引导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 20 世纪的反抗运动和解放运动"。斯坦哈特试图用这种方式宣称非洲新民族国家中激进的反专制的反抗继承了抵抗运动的传统。[37]

58

最近，对抵抗斗争的一本研究巨著——伊萨克曼论赞比西河流域非洲叛乱一书，试图探讨来自布伦施威格和斯坦哈特的反对意见。伊萨克曼论述布伦施威格时，重点不是放在种族叛乱的"地方主义"上，而是放在对主权的重新解释上，关于这点他声称在 1917 年的起义中曾经发生过。他论述斯坦哈特时，不把扩大的抵抗运动与上层的民族主义挂勾，而是和激进的莫桑比克解放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挂勾。在伊萨克曼的论断中，关于早期抵抗运动和当代争取自由运动之间联系的观点是这样的："呼吁的性质

---

[34] T. O. 兰杰，1968 a。

[35] W. 罗德尼，1971 b，第 9 页。

[36] H. 布伦施威格（Brunschwig），1974，第 63-64 页。

[37] E. 斯坦哈特未发表的论文。

（用广义的反殖民主义语汇表达）以及这种呼吁形成的联盟的规模，说明1917年的起义正好处于早期非洲抵抗形式向20世纪中期解放战争过渡的地位……1917年的起义既是赞比亚人长期以来抵抗传统的顶峰，又是当代解放斗争的先驱。”1917年，与现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斗争一样，“问题的焦点是压迫，不是种族”。而且，“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联系已经超出共同的思想信念”，因为抵抗运动的传统“既是自尊的源泉，又是未来行动的楷模”。㊳

抵抗运动的周期化：从经济上阐明

我以描述19世纪最后20年的形势作为本章的开端。然而要按这一年代限制来具体探讨抵抗运动却是非常困难的。在一端我论述了19世纪早期的科萨先知马卡纳。在另一端我又论述了赞比西1917年的起义以及它与当代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关联。只是我的论述迄今限于对白人入侵的武装抵抗或者反对殖民统治（当它开始“咬人”时）的武装起义：由于白人入侵非洲有早有迟，而且有效殖民统治的建立更加参差不齐，因此，这段历史的年代就前后都延长了。根据这种基本上属于政治性的定义，1880到1900年这段历史时期就成了抵抗运动的关键性时期，尽管通过反抗斗争重申主权的多次巨大尝试在以后才出现。

倘若我们的结论把发展重点转向经济抵抗，那么年代限制的划定就更加不明确了。也许最激进的要算萨米尔·阿明重作的解释。阿明提出，西非对欧洲真正决定性的抵抗斗争出现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他不考虑“大瓜分”时期的抵抗运动，认为这些抵抗的本身是已经妥协的统治阶级的半心半意、旨在维护旧制度的行动。在阿明看来，非洲和欧洲遭遇中最为存亡攸关的并非形式上的政治控制，而在于欧洲试图操纵非洲的经济。真正有意义的非洲抵抗运动是反对此种经济操纵。

59

阿明认为，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强化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并促进了进步”。另一方面，欧洲人所控制的大西洋贸易“并未提高生产力，相反，它引起社会的分崩离析……非洲社会显然反对他们处境的这种恶化，而伊斯兰教则成为他们进行抵抗的思想基础……穆斯林阿訇力图组织抵抗运动；他们的目标在制止奴隶贸易，也就是阻止出口劳动力，但并不是要结束国内奴隶制度……伊斯兰教的性质改变了，它从少数民族商人的宗教转化成为群众性的抵抗运动。”

阿明确认属于这种性质的三大抵抗运动：1673-1677年的历次战争；1776年的托罗多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军事贵族统治并结束了奴隶贸易；瓦卢王国1830年发生的代尔先知运动，这个运动因“遭到法国军事干涉”而归于失败。在这里阿明描述直接反对非洲贵族制度的抵抗运动，但这些运动同时也是对法国经济侵略的回答。

阿明继续指出，随着19世纪岁月更替，法国不再需要奴隶，转而需要原料和农产品他们开始在瓦卢试办农业种植园，但是由于“村社的抵抗而失败”。直到法国人占领整个

㊳ A. 伊萨克曼，1976年，第344、345、375页。

地区并使用源源不绝的武力时，他们才能克服村民对无产阶级化的抗拒。但是这种殖民征服在进程上来得很迟，以致对它的抵抗不大有效。到这个时候，伊斯兰教已经不再是鼓励抵抗的思想，它变成被打败的贵族的精神安慰物，贵族利用它来训导农民种植者，并保证叫他们生产法国人需要的任何产品。[39]

阿明强调的是真正重要的抵抗运动发生在"大瓜分"之前，其他运用经济观点的历史学家却认为对正式殖民统治的真正重要抵抗要到20世纪方才出现。当然，在"大瓜分"时期确曾有过大量的经济抵抗，特别是当欧洲人舍弃了与非洲商人和中间人的昔日联盟，用武力建立商业垄断时情况是如此。结果是出现非洲商人方面的剧烈抵抗。抵抗的领导者有尼日尔河三角洲（尼日利亚）伊策基里族的首领纳纳·奥洛穆，此人A. G. 霍普金斯把他描写为生意人的典型；有非洲人和斯瓦希里人的酋长，他们操纵莫桑比克北部的奴隶贸易；有大商人鲁马利札，他在东非抵抗比利时人和德国人。

6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这场商人领导的战争是殖民主义时代早期的决定性事件之一。他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许多地方……（有过）相对的自行发展的过程，以有限但是重要的方式，通过双方商人或国家的商务代理人的中介与欧洲世界紧紧联结……然而在1879年这种结构整个开始崩溃，到1900年它已不复存在。"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非洲人和欧洲人间典型的联系已不再是贸易伙伴间的关系……殖民统治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它对非洲商人的冲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非洲和阿拉伯商人阶级相对重要性的急剧下降已是既成事实。[40]

但是一般说来，近来的历史学家并不同情商人的抵抗运动。霍普金斯警告我们，不要幻想尼日尔河三角洲如纳纳·奥洛穆那样的商人是民族主义的先行者或者是人民苦难的代言人。他指出这些人的"社会正义观点并不包括解放他们自己的奴隶。"南希·哈夫金则着重阐述莫桑比克北部抵抗运动首领的纯粹自私利益；她的结论是："他们的抵抗运动根本谈不上人民性和进步性。"[41]

大商人的抵抗能量像附属国家统治者一样，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因为他们给非洲人造成的痛苦实在太多。当英帝国东非公司要挫败阿拉伯、斯瓦希里和非洲商人的力量时，它得以从马林迪修筑一条通向内地的新的贸易通道。"从沿海种植园的阿拉伯主人那里逃出来的奴隶组成的社会支持他们，并为这条路修了栅栏。"[42]拉各斯腹地的"重要企业家"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抵抗英国人的前进，因为他们的"大量主要由奴隶和农奴组成的劳动力"在骚动。[43]国际贸易条件造成强有力的非洲商人崛起，但也必然使得他们的成功以内部紧张和不满为代价。

实力强大的商人和普通平民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也有例外。举例而言，安哥拉的拜隆杜王国"每个人都从事商业"；19世纪70年代，"翁本杜人的企业家发现并制造了一

[39] S. 阿明（Amin），1972年。

[40] I. 沃勒斯坦（Wallerstein），见L. H. 甘恩和P. 杜伊格南合编，1970年，第402-407页。

[41] A. G. 霍普金斯（Hopkins），1973年，第147页；N. 哈夫金（Hafkin），1971年。

[42] C. B. 史密斯，1973年，第112、113页。

[43] A. G. 霍普金斯，1966 a，第141页。

种新型的块根橡胶"，在以后的十年里"拜隆杜有空前的人数从事私人贸易。" 61
1899-1902年橡胶跌价，此种范围广泛的商业繁荣才随之终止。"1899年后，欧洲商人侵入拜隆杜，使问题更加严重……当橡胶价格急剧下跌时，葡萄牙商人和蜂拥而至的贫穷白人……来到拜隆杜从事商业。"最近对拜隆杜1902年战争研究的看法是，这次欧洲商业侵略激起的怨恨，实为爆发群众起义反对葡萄牙人的主要原因。㊹

但是一般说来，以经济观点研究抵抗运动的历史学家不认为群众由怨恨而反抗的原因是欧洲人在商业上的侵略，而把它归因于非洲人缓慢地逐步理解到，白人决定要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许多非洲人开始时欢迎欧洲人，把欧洲人视作使他们不受极度苛求的酋长或斯瓦希里商人或奴隶主压迫和剥削的保护人。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欧洲人对他们的需索是同样（如果不是更加）难以忍受的。开始时非洲的奴隶主、酋长和商人对欧洲人害怕和憎恨，但是时间一久他们中很多人发现黑人和白人当权者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抵抗运动模式的根本改变。

唐纳德·德农对这点说得很扼要：

> 当我们说到对非洲"大瓜分"时，一般是指欧洲瓜分非洲的领土和主权。这个现象还有它的另一方面——抢夺非洲的资源。其中有钻石和黄金，但是也许最有价值的资源，殖民当局争夺最急切的是非洲的劳动力。正如过去欧洲和阿拉伯商人曾在非洲到处购买奴隶一样，新招工机构抢着召募不熟练劳动者到矿山去劳动……在安哥拉和赞比西以及加丹加（在19世纪与本世纪交替时）来自南方矿山的招工机构与来自葡萄牙人在贝宁湾的强迫劳动种植园的招工机构进行竞争。㊺

正如第一次对领土和主权的大瓜分引起抵抗一般，第二次对劳动力的大瓜分也同样引起抵抗。它受到武装抵抗。给予20世纪早期伟大反抗斗争（它试图为主权重下定义）的许多支持来自憎恶强迫劳动的人们。抢夺劳动力也受到逃跑和罢工、拒绝到矿下劳动以及就地暴动等形式的抵抗。在一些学者（如查尔斯·范·翁塞伦）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研究抵抗运动的新的一面——不再局限于"赞比亚抵抗"或"本巴抵抗"的范畴，而是沿着整个殖民主义时代早期各领土间劳动力的迁徙路线来研究抵抗运动。㊻ 62

结　论

总之，编写抵抗运动历史的工作是一种生动而充满论争的工作。然而，经过修正的观点和新建立的观点仅仅只是扩充而并没有否定我上面论述的三个基本理论性假设。当我们把针对欧洲经济侵略的早期间接抵抗补充到我们划分为"大瓜分"时期的武装反抗和叛乱中去时，抵抗运动的"经常性"和"普遍性"显得更加清楚了。当我们把工人和农民的"自觉意识"的最早表现加到主权思想和对新道德标准的探求中去时，我们对抵

㊹ D. L. 惠勒（Wheeler）和C. D. 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见F.-W. 海默（Heimer），1973年，第54-92页。

㊺ D. 德农（Denoon），1972年，第74页。

㊻ C. 范·翁塞伦（Onselen），1973年，第237-255页。

抗运动思想基础的探索就更加丰富多采了。而对当时的抵抗运动和目前非洲形势之间联系的探索，从经济抵抗思想上可获得新的共鸣。我们最后的结论性语句不是引自历史学家而是引自一位政治科学家科林·利斯，他提倡一种更有生气和以历史为基础的“不发达”理论：

> 在一个关键性的方面，不发达理论与“发展理论”相仿——它集中阐明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下（而不是涉及整个历史过程）不发达国家发生的事情，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各种形式的斗争，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产生于不发达的环境……所以，需要的不是不发达的理论，而是不发达和如何消灭不发达的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从不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的世界历史，就是这些国家受压迫和求解放的理论；某些东西……在发展的很原始阶段，可以感觉到对它的迫切需要。[47]

对抵抗运动的研究不是对过去不足道的光荣作叨叨不绝的阐述，而是能够对压迫和解放的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

（李秀芬译）

---

[47] C. 利斯（Leys），1975年，第20-21页。

4 东北非非洲人的能动性和抵抗

H.A.易卜拉欣根据
已故阿拔斯·I.阿里文稿编写

非洲面临欧洲人的瓜分和占领时，非洲人所表示的能动性和抵抗行动任何地方都没 63 有近代国家埃及、苏丹和索马里那样坚决和持久。这些反抗以1881年的埃及武装起义开始，持续不断地在这一地区的某些部分此起彼伏、没有中断，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非洲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民族掀起这样坚强的战斗，以保卫他们的自由、他们的主权，特别是保卫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本章将试图概述这些能动性和进行的反抗，首先从埃及的斗争开始，然后是苏丹，最后再提及索马里。

埃 及

阿拉比革命

由于哈蒂夫*伊斯梅尔（1863-1879年在位）对财政管理不善以及他从欧洲借入巨额贷款，到1880年，埃及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此时埃及国家岁收的一半要严格拨作支付这些债务的利息，沉重的赋税强加于埃及人民身上，而大多数付不出这样重税的农民遭到残酷鞭打。这种经济上的困苦羞辱，引起对哈蒂夫陶菲克（1879-1892年在位）及其腐败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剧烈反对。陶菲克由于完全屈服于欧洲强国，进一步被人民所唾弃，而欧洲强国利用他的虚弱无能和埃及的负债累累，乘机控制这个国家的财政和政府。任何一届埃及政府如果没有14个欧洲国家事先的一致同意，实际上不可能实行任何行政上或经济上的改革。当埃及人遭受所有这些苦难的时候，侨居埃及的外国人却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甚至不受这块土地上的法律的约束，而有他们自己的法律和法庭。而且，外国人利用这种特权地位，经常通过贿赂和不道德的手段牺牲埃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大发其财。希望消除这种耻辱和敌对性的外国统治是爆发艾哈迈德·阿拉比上校领导的反抗 65 斗争即阿拉比革命的主要原因。①

---

* 哈蒂夫：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译者注

① A.拉菲（al-Rāfʿī），1966年，第82-85页。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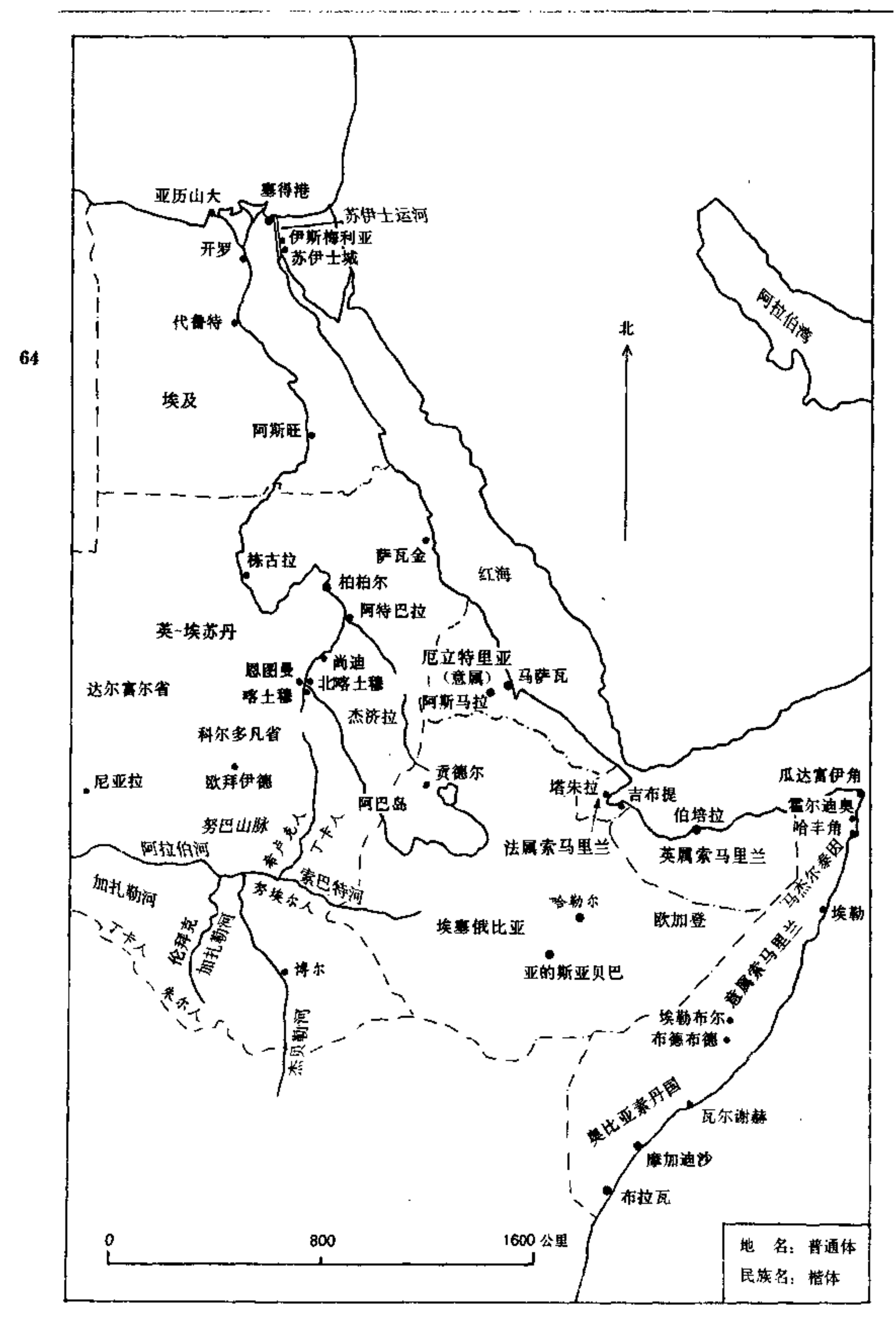


插图 4.1 东北非洲的政治区域和民族分布



图片 4.1 艾哈迈德·阿拉比（阿拉比帕夏）（1839-1911年）

爆发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19世纪的教育逐步普及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促使埃及人民中自由思想的成熟。而这种思想成熟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国家出现和发展宪政运动的主要原因，特别在反对欧洲统治和哈蒂夫专制主义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埃及人中间更是如此。这个运动从穆斯林改革者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的革命思想中吸取很大支持。在穆罕默德·谢里夫帕夏的领导下（他别名宪法之父），这些提倡立宪的民族主义者，迫切要求制定自由宪法和组成代议制政府。② 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希望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的王朝，这个王朝从本世纪开始统治这个国家。

但是，爆发革命的最重要的直接因素是埃及军队的不满和遭受的挫折。当时士兵的饷银很低（每月20皮阿斯特③），埃及军官在军队里不允许被提升到较高的官衔。事实上这种职位被外籍的土耳其-切尔克斯贵族军官所垄断，这些人蔑视和虐待他们的埃及部下。为了结束地位低下的状况，达到国家的民族要求，埃及军队在埃及近代史上第一次干预政治，并于1881年2月初发动一场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和哈蒂夫陶菲克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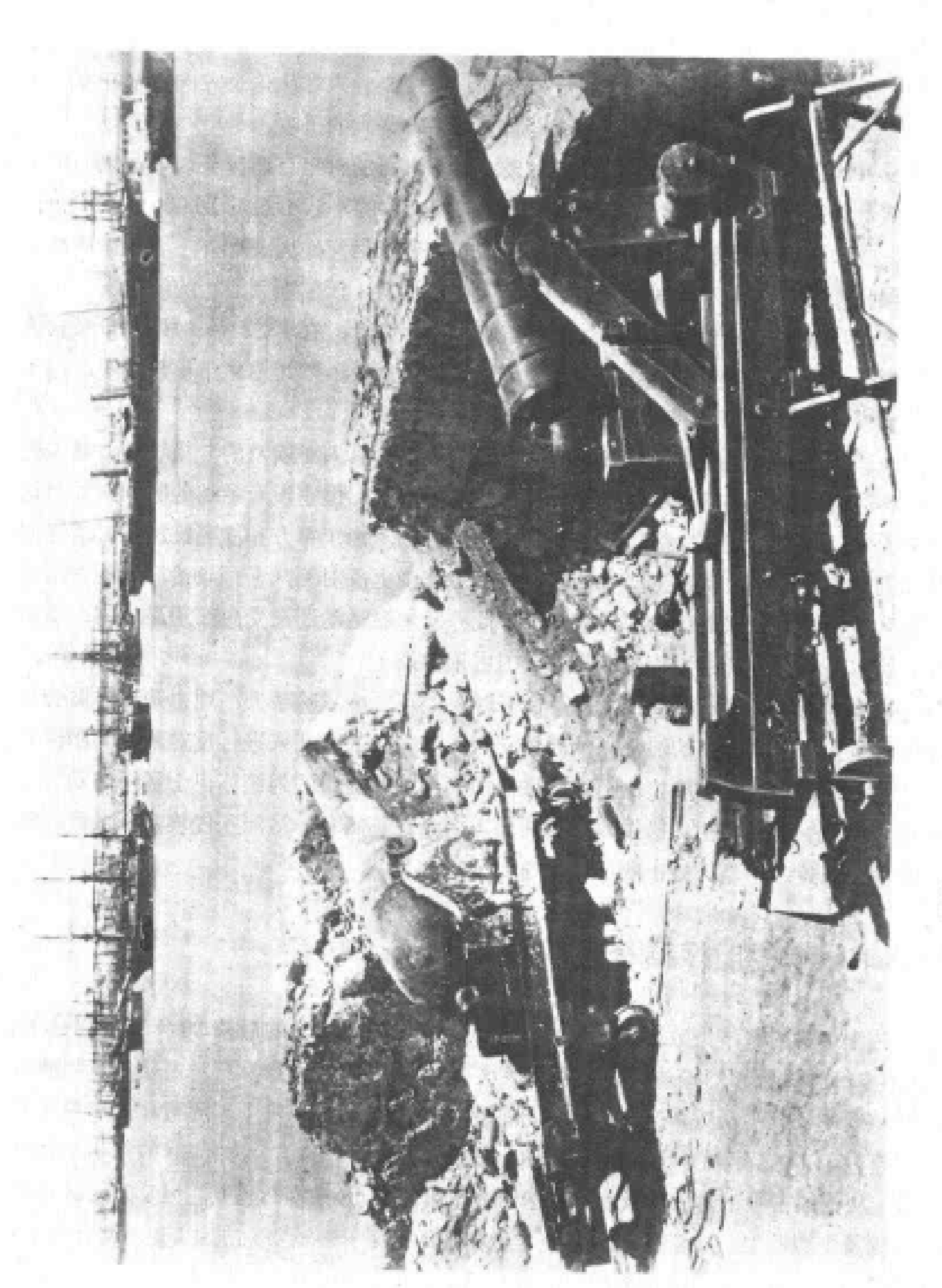
革命的领导者——艾哈迈德·阿拉比上校（1839-1911年）是一位很有吸引力的人，纯粹农民出身。虽然"性格单纯，缺乏敏锐和政治上的老练"，④ 但是阿拉比是一位有勇气的人和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他常常在他的演词中插入古兰经，"具有深受群众欢迎的性格"。这些领导者的优良品质，使他很快成为无可争辩的革命领导人，而他为组成祖国党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个党的成员有农民出身的人和一些土耳其著名人物，他们完全由于对陶菲克独裁统治的不满而联合在一起。

在开始阶段革命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声名狼藉的陆军大臣、军队中歧视政策的策划者、切尔克斯人奥斯曼·里夫基接撤职，由杰出的诗人和革命政治家马哈茂德·萨米·巴鲁迪接替他的职务。接着，一个成熟健全的阿拉比内阁组成了，由他本人担任陆军大臣⑤。陶菲克非常惊恐，他下令建立人民议会，并在1882年2月7日制定一部相对自由的宪法。阿拉比党人知道这种立宪的姿态并不真诚，他们仍然坚决要推翻陶菲克，甚至计划宣布埃及为共和国。这种事态的发展威胁外国人的特权和利益，因而使革命与欧洲列强发生直接的对抗。

与此同时，哈蒂夫在幕后密谋镇压革命。为了给外国提供干涉的借口（某些埃及历史学家保持这种看法），哈蒂夫和英国人炮制了1882年6月12日亚历山大的大屠杀，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外国人遭到杀害，大量财产遭到毁坏⑥。不管这种谴责是否属实，无关宏旨，因为事实上哈蒂夫曾经请求英国人干预，得到他们热忱而迅速的反应。但是埃及内阁一致决定击退外国入侵，拒绝接受英国要求停止加强海岸防御工事和拆除亚历山大周围大炮阵地的最后通牒。这给英国舰队于1882年7月11日炮轰亚历山大造成进一步借口。埃及军队和人民进行英勇的反击入侵者的战斗，但是他们被优势武器击败。在这

② P. J. 瓦蒂基奥蒂斯（Vatikiotis），1969年，第126-130页。
③ 国家档案馆Kew,FO 141/168，杜弗林（Dufferin）报告，第4页。
④ A.L.赛义德（al-Sayyid），1968年，第9页。
⑤ M.希拜卡（Shibayka），1965年，第604页。
⑥ M. 麦希迪（al-Murshidi），1958年，第58页。

68



图片4.2 1882年亚历山大港英国舰队炮轰后的情景

次战役中埃及人战死约2000人。

亚历山大陷落后，埃及部队撤至几英里外的达瓦尔村。这时，阿拉比发布一份宣言书公开对英国人宣布圣战，并把宣言书向埃及人民广泛分发。1882年8月在达瓦尔村周围爆发几次战斗。埃及军队和人民的坚强抵抗，使侵略者很难从这个方向占领开罗。于是英国人决定占领苏伊士运河，再从那里向首都发动强大的进攻。

埃及人民群众乐意为军队提供经济支援，成千上万的青年自愿应征入伍，然而整个形势对埃及的抵抗运动不利。阿拉比所能召集训练有素的军队不超过16,000人，即使这么少的人数，还要分散在达瓦尔村、达米埃塔和苏伊士运河地区。此外，埃及军队缺乏训练、现代武器和弹药以及有效的运输工具。在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的统帅下，一支20,000人的现代化军队很快地渡过运河，占领伊斯梅利亚，在1882年9月13日泰勒凯比尔战役中击溃革命军的主力⑦，占领了这国家。虽然英国欺诈地允诺很快撤军，但实际上英国占领埃及长达72年之久。

69 阿拉比革命旨在摆脱欧洲对埃及的影响和结束土耳其人对埃及的专横统治，其失败原因很容易说明。虽然这次革命受到大批埃及人的支持，但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动员这种支持力量。加之，在统一的民族主义联合阵线内部，由于军方和立宪民族主义者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很快就发生严重的裂痕。后者原则上反对军队干预政治，而前者坚持认为军队控制政府是保卫革命的最好办法。此外，革命运动还遭受内部阴谋之害，哈蒂夫及其切尔克斯支持者背叛革命，帮助英国占领埃及。

阿拉比本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在革命开始时他不愿废黜哈蒂夫，理由是这样做会招致外国的干涉和引起国内的混乱，从而给予陶菲克宝贵的时间来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和煽动。另一致命的错误是阿拉比拒绝听取他的军事顾问提出的封锁苏伊士运河的劝告，他的看法是——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法国不会允许英国利用运河入侵埃及。最终，阿拉比的革命被英国军事优势击败。

埃及人的能动性和对英国征服的反抗，1882-1914年

阿拉比革命的军事失败挫伤了民族精神，在英国占领埃及的最初10年（1882-1892年），形成一种失望和幻想破灭的气氛。在这10年里，埃及本身没有对占领作有效的抵抗，最重要的民族主义呼声来自流亡国外的民族主义者。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于1883年创办了一份泛伊斯兰杂志《不可分解的结合力》，目的在于唤起埃及舆论，从英国占领下解放埃及。虽然这份杂志出版了18期即行停刊，但是它对读这份杂志的埃及少数阶层——学生、伊斯兰学者和知识分子——有深远的影响。《结合力》提供反对英国和保持民族自决精神的原动力⑧。它的反英精神在19世纪90年代由一群政治上主张泛伊斯兰主义的作家接过去，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是名作者谢赫·阿里·优素

⑦ A. 拉菲，1966年，第487-496页。

⑧ A. L. 赛义德，1968年，第87-90页。

福，他于1900年出版一份报纸叫《穆阿亚德》(al-Mu'ayyad)，并于1907年创立了宪政改革者组织，这个组织对英国在埃及的霸权予以有力的抨击。

1893年，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从沉默状态中再现，当时某些埃及人开始批评和抵制英国占领埃及。这些人中最主要的是新接位的雄心勃勃的哈蒂夫-希勒米·阿拔斯（阿拔斯二世，1892-1914年在位），他鼓励民族运动的发展，要求英国人立即撤出埃及。他从经济上资助新闻刊物，使民族主义运动广为人民所知，这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在他统治的最初3年，阿拔斯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列，他的行动成为向英国代理人和总领事克罗默勋爵独裁统治的真正挑战，并成功地迫使亲英首相于1893年1月15日辞职。虽然在这以后，由于英国的压力他不能过分公开地活动，然而，阿拔斯·希勒米吸引了一些志愿献身民族事业的人，他们愿意连续为反抗英国占领而斗争。这些人是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熟悉法国革命的思想，醉心于新的社会和政治理论。⑨古老的埃及社会及其严格的法规和宗教限制，实际上正在渐渐崩溃，这种发展必然引向大的动荡。受过教育的埃及人特别对英国控制文官制度感到震惊，因为这是仍旧向他们开放并能使他们地位上升的唯一领域。到1905年，在较高的文官职位中英国人占42%，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占30%，埃及人只占28%。⑩ 70

当时反对英国统治最激烈的要算穆斯塔法·卡米勒和他的祖国党，他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和雄辩的演说家。卡米勒最初集中力量以求赢得欧洲支持埃及的独立事业。他显然认为其他欧洲国家对于英国占领埃及是如此的忌妒，以致会积极支持驱逐英国人的任何努力。有哈蒂夫慷慨给予大量财力，卡米勒于1895-1898年间周游欧洲各国首都，在那里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讲，接见报界人士，写文章和小册子。⑪这些活动在欧洲激起人们很大兴趣，但是其影响只能到此为止。卡米勒的乐观主义信念，认为欧洲普遍——特别是法国——会支持埃及解放事业的想法，被证明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法国在北非有它自己的殖民地，卡米勒主张自治的论点未能把法国争取过来，这丝毫不足为奇，而且法国也不打算在埃及问题上和英国发生战争，1898年爆发的法绍达事件充分说明这一点。

当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驳斥克罗默宣扬的在文明原则上埃及人没有治理自己国家的能力的谬论，并使埃及人树立信心，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自治，并且理应得到自治的权利。卡米勒从1898年以来就专心致志从事这项任务。在1906年以前，他以发表大量讲话和在报纸上刊登各种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讲话和文章主要发表在他于1900年创办的《旗帜》报上。他着重宣扬埃及的辉煌历史，以驳斥失败主义，并表明埃及人完全具备从事伟大事业的能力。他说："如果我生来不是埃及人，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埃及人"，而且，"灰心丧气，生命就没有意义，只要活着就不应绝望。"⑫——这些就是他所提出的口号。卡米勒的演讲和文章，还旨在消除地方之间的敌 72

⑨ A. L. 赛义德，1968年，第99-136页。

⑩ 米尔纳（Milner）报告，第30页（埃及，1921年第1号，Cmd 1131，米尔纳埃及调查团的报告）。

⑪ P. M. 霍尔特（Holt）编，1968年，第308-319页。

⑫ A. L. 赛义德，1968年，第161页。

71



图片 4.3　埃及哈蒂夫阿拔斯·香勒米(阿拔斯二世)(1892-1914 年在位)

对，把全体人民统一在民族主义阵线内，并发展民族教育以增强爱国感情。他的政治活动产生了效果，这表现在1906年2月他居然能够组织法律系学生进行罢课。

1906年5月的丁沙维事件极大地推进了埃及的卡米勒运动。简单地说，一群英国官员来到丁沙维村作一次射猎鸽子郊游，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因为鸽子是人们赖以为生的手段，随即发生冲突，其中一个英国官员受致命重伤。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反应过度，竟然将村民判以重刑，其中4人甚至处了绞刑，还有很多人判处长期徒刑。虽然在两年前就停止公开执行死刑，但这几个人的绞刑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执行，并强迫所有丁沙维村村民观看处决。⑬ 在卡米勒看来，这种野蛮行为对唤醒人民反对占领，比10年实际占领效果更大。⑭ 这一事件肯定无疑地导致埃及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1882年以来英国人第一次感觉到他们在埃及的地位不稳。由于这个缘故，迫使英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高压政策，并宣布打算在埃及作实行自治的准备。克罗默于1907年退休，为新任命的总领事埃尔登·戈斯特执行新的政策让路。这是卡米勒及其祖国党的巨大胜利，这个党在1907年公开成立。

1908年2月，卡米勒不幸过早去世。此后，穆罕默德·法里德继任祖国党主席。法里德缺乏卡米勒所具有的许多领导品质，但是他继续写文章，向公众集会发表演说，要求英国撤军。他的民族主义活动，在1911年使他遭到6个月的监禁，出狱后他流亡国外。⑮

到1907年，有些杰出的埃及知识分子终于承认英国太强大，无法用革命行动把它逐出埃及。同时，他们也感觉到在丁沙维事件之后，英国的政策确有改变的迹象。因而他们认为，为了取得能够得到的让步，在取得完全独立之前，与在埃及的英国人合作没有害处。持这种见解的一批人在1907年10月组成一个新党叫人民党，有它自己的报纸《日报》。在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教育家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受过教育的埃及人把他看作“当代哲学家”）的领导下，人民党极力主张埃及人革新他们的伊斯兰传统，采用他们认为进步所必需的欧洲思想和制度。⑯ 人民党党纲号召建立埃及的独特个性，它觉得舍此埃及就得不到真正独立。党纲强调农业改革的重要性，要求在准备最终实行宪政时，应增加省议会和全国议会的权力。最重要的是，该党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它是训练有能力的行政人才和获得国家独立的必要手段。但是人民党在埃及民族主义者中间并不很受欢迎，因为它与英国当局合作。再则，它那世俗的自由主义未能在广大埃及人民群众中扎根，因为普通埃及人本能地信奉他们的伊斯兰传统。⑰

7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分裂的和主要是上层人士的运动，它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的追随。因此，它软弱到不能从英国当局那里索得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自治道路上也没取得多大进展。民族主义者必须等到1919年以后，才奋起投入反对英国占领的公开叛乱。

⑬ M. G. 马萨达（al-Masada），1974年，第84-91页。

⑭ M. H. 海卡尔（Haykal），未注明日期，第148页。

⑮ A. 萨卜里（Sabri），1969年，第81-109页。

⑯ P. J. 瓦蒂基奥蒂斯，1969年，第229-230页。

⑰ J. P. 瓦蒂基奥蒂斯，1969年，第234页。

苏 丹

马赫迪革命

苏丹自1821年以来，一直受在埃及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统治。到1880年，苏丹人民和埃及人民一样，也为摆脱异国的贵族统治政权而斗争。圣战和伊斯兰抵抗异族统治的宗旨，在埃及由阿拉比传播；在苏丹，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雅领导下的军事革命运动也明显持有这种主张。他所领导的运动“马赫迪雅”实质上是一场圣战，他就是用这个名义来呼吁所有穆斯林的支持。这一运动的基本目的，正如在他的信件和公开声明中一再提出的，[18]是恢复和回到纯洁的和原始的伊斯兰忠诚，并“清除异教及其邪说”，[19]如果认为必要，以武力向全世界扩展这种精神。马赫迪革命精神上的真正热情表现在马赫迪支持者的忠诚宣誓上。他称支持者为效法先知榜样的“安萨”，[20]在加入“马赫迪雅”之前，必须向马赫迪或他的代表宣誓。在宣誓仪式中，“安萨”们立誓忠于马赫迪，“放弃这个世界，并舍弃现世的一切，满足于与真主同在，渴望与真主以及未来的世界同在，我们决不从圣战中逃跑”。[21]

说马赫迪革命是宗教性质的，并不意味着宗教是产生这次革命的唯一因素。还有在苏丹引起普遍不满的其他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全都是由腐败的土耳其-埃及行政当局的罪行引起的。1820-1821年最初被征服时出现的残酷暴行，造成强烈的复仇愿望，而土耳其人横征暴敛，更导致人民广泛的不满。加之，政府压制奴隶贸易的企图引起某些北部苏丹人的不满，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财富来源，也是畜牧业和农业经济的基础。最后，政府偏袒舍基亚人和哈特米亚教派，看来也引起别的地方团体和宗教团体的忌妒，从而刺激他们支持马赫迪。[22]

马赫迪革命的领导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是一位虔诚的人，他所效法的模范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本人。正如在他的前辈先知是在四十岁那年担任村社的领袖一样，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也是在同一年龄担任“马赫迪雅”领导人的。这个巧合先是秘密地在受信任的追随者中间传达，随后公开地对民众宣布。这就导致他与英-埃当局形成直接的军事对抗。这场斗争延续了4年（1881-1885年）之久。最初，英-埃当局低估了马赫迪，把他看作仅仅是一个托钵僧。当局派遣不中用而组织混乱的远征军去阿巴岛讨伐他，就是这种轻视态度的反映。接着是一场短暂的小规模战斗，战斗中“安萨”们迅速而顺利地取得胜利，使当局陷入极度混乱。马赫迪及其追随者把他们的胜利看作是他们显示的奇迹。[23]

[18] 参看M. I. 阿布·萨利姆（Abū Salim），1969年，他大量收集那类信件和公告。

[19] P. M. 霍尔特，1970年，第19页。

[20] 安萨（Ansār）（辅士），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支持者的最初命名。

[21] P. M. 霍尔特，1970年，第117页。

[22] N. 舒凯尔（Shouqair），1967年，第631-636页。

[23] M. 希拜卡，1978年，第39-44页。



图片 4.4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勒，马赫迪像(1844-1885 年)

马赫迪的政治远见及其军事才能，明显地反映在他经过这场遭遇战后决定从阿巴岛
76 “迁往”努巴山区的卡迪尔山这个举动上。此举除了又是一次与前辈先知生活相同的经历外，这个决定把革命从暴露和无防御的地区（那个地区是政府军队能到达的），迁移到遥远的和战略防御牢固的地区。这个决定的确是“马赫迪雅”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的主要意义是把革命从河流地区转移到苏丹西部，从那时起，西部人担任了革命斗争中的主要行政领导人和军队指挥官，而河流地区人民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降低了。[24]

马赫迪革命的另一个转折点是1883年11月5日的谢坎战役。那时，哈蒂夫陶菲克和他的政府决定摧毁当时已控制科尔多凡省重要城镇的马赫迪。因此埃及政府组织了一个远征队，由残存的阿拉比士兵组成，以英国军官希克斯帕夏任指挥官。“安萨”们在欧拜伊德附近的谢坎森林全歼来犯敌人。[25] 这场胜利大大提高了马赫迪及其革命的威望。当时很多苏丹人参加了革命，从几个穆斯林国家派来代表祝贺马赫迪大败异教徒的胜利。无论如何，谢坎战役胜利的直接结果是土耳其-埃及政府当局在苏丹西部的全面瓦解以及科尔多凡、达尔富尔及加扎勒河等省建立马赫迪的统治。此刻马赫迪准备转入下一个目标，即控制喀土穆，彻底结束土耳其-埃及政府当局在苏丹的统治。[26]

马赫迪的下一步是攻打苏丹东部的军队，由有才干的奥斯曼·迪格纳领导。迪格纳在与政府军队的战斗中多次取得胜利，并形成对红海港口的威胁，这些港口是英国发誓要保卫的地方。于是英国试图进行军事干涉，但是收效甚微。除萨瓦金外，“安萨”们控制了整个苏丹东部，中断了从埃及通过柏柏尔-萨瓦金大道运往喀土穆的任何给养和增援。

与此同时，在谢坎战役后，英国对苏丹问题的政策也有了重大改变。以前，英国一直认为这个问题只与埃及有关，在谢坎战役后，英国政府觉得为了维护帝国利益，必须使埃及立即撤出苏丹。[27] 于是它下令埃及政府放弃苏丹，并派查尔斯·戈登将军监督执行。由于马赫迪向喀土穆推进，戈登发现他本身处于十分危险的地位。经过长时期围攻后，
77 马赫迪的军队攻进喀土穆城，于1885年1月26日杀死了戈登，结束了土耳其-埃及对苏丹的统治。[28]

在创立后的最初4年中（1881-1885年）“马赫迪雅”从一种宗教抗议运动发展成为强大的军事国家，统治苏丹达14年之久。它的行政、财政和司法制度以及它的立法全都严格建立在古兰经和伊斯兰逊尼派教规的双重基础上，虽然马赫迪在妇女地位和土地所有制那类紧迫的问题上也偶尔批准新形式的立法。[29]

马赫迪国家的对外关系严格按圣战的宗旨进行。不论是马赫迪还是他的哈里发阿卜杜勒·伊本·赛义德·穆罕默德都写警告信——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给某些世界上的领袖人物，如埃及的哈蒂夫、奥斯曼皇帝和阿比西尼亚皇帝，要求他们接受马赫迪的使

[24] M. I. 阿布·萨利姆，1970年，第21-22页。
[25] I. 祖勒福（Zulfu），1976年，第203-229页。
[26] M. A. 哈桑（Al-Hasan），1964年，第4页。
[27] M. 希拜卡，1952年，第107-109页。
[28] M. M. 哈姆扎（Hamza），1972年，第159-183页。
[29] P. M. 霍尔特，1970年，第128页。

节，并声称如果他们不答应，就立即面临圣战。[30]

虽然马赫迪未能活到执行这样的政策——他于 1885 年 6 月逝世——圣战成为他的继承人哈里发阿卜杜勒外交政策的基石。尽管面临着极大的行政和经济问题，哈里发阿卜杜勒力所能及地推行两条战线的圣战：对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阿卜杜勒·拉赫曼·努朱米的领导下，马赫迪军队入侵埃及，但是他们于 1889 年在图什基的战役中失败。马赫迪军队在东线的进攻也受阻，“安萨”们分别于 1891 和 1894 年丢失了陶卡尔和卡萨拉两地。哈里发思想意识上对圣战的义务，使他拒绝埃塞俄比亚皇帝想要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成立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非洲同盟的意图，因为，哈里发坚持皇帝应接受和信仰马赫迪主义和伊斯兰教作为这个同盟的先决条件。这种教条主义的后果是长期的军事对抗，从而削弱了这两个国家，使它们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唾手可得猎获物。[31]

到 1896 年 3 月英帝国政府决定入侵苏丹，为了这个目的，组织了一支英-埃联军，以H.H.基奇纳将军为统帅。在这次入侵的最初阶段（1896 年 3-9 月）没有遭到苏丹人民的任何强烈抵抗，敌军就占领了栋古拉省全境。部分由于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部分由于他们突然袭击，使哈里发措手不及。

正像哈里发正确地推测的那样，占领栋古拉仅仅是全面进攻马赫迪国家的序幕。当 78 基奇纳正向南推进时，哈里发调动他的军队坚决抵抗入侵者。以埃米尔马赫茂德·艾哈迈德为统帅的马赫迪军队于 1898 年 4 月 8 日在阿特巴拉战役中，试图击退敌人的进攻，结果没有成功。[32] 3000 名苏丹人战死，伤 4000 人以上，马赫茂德本人被俘，监禁在埃及的罗塞塔，几年以后死于狱中。

阿特巴拉战役失败后，哈里发决定在他的首府恩图曼附近迎击敌人，因为他了解，给养和运输的困难将阻碍任何大军团的活动。苏丹人于 1898 年 9 月 2 日在卡拉里战役中以高度的勇敢精神与敌人作战，[33] 但是，他们再次被优势的装备所击败。将近 11,000 苏丹人战死，约 16,000 人受伤。哈里发看到战斗失败，便撤退到科尔多凡以东，他希望在这一地区召集他的支持者向盘踞在首都的敌人作新的进攻。有整整一年，他继续成为使新政府头痛的难题，但是 1899 年 11 月 24 日他在乌姆·迪瓦克拉特战役最终一败涂地。战斗结束后，发现哈里发死在羊皮祈祷毯上，[34] 所有马赫迪运动的将军和领导人或者被杀，或者被监禁。这标志着马赫迪国家的瓦解，虽然“马赫迪雅”作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信念永远不会消亡。

马赫迪追随者的各次起义

虽然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马赫迪教派是非法的，但是苏丹社会相当大一部分人的

[30] N. 舒凯尔，1967 年，第 921-929 页。
[31] M. S. 卡达勒（Al-Kaddāl），1973 年，第 105-107 页。
[32] M. A. 易卜拉欣（Ibrāhīm），1969 年，第 196-237 页。
[33] 关于被囚禁的马赫迪埃米尔们情况的资料，参见H. A. 易卜拉欣，1974 年，第 33-45 页。
[34] P. M. 霍尔特，1970 年，第 243 页。

79



图片 4.5 马赫迪军队司令之一马赫穆德·艾哈迈德被英-埃军俘虏后的情景

内心深处依旧信仰马赫迪教义。多数人以继续诵读马赫迪的祈祷书和参加马赫迪的宗教仪式来表示他们对英国统治的怨恨。献身于马赫迪信念的少数人则一再试图以武力推翻“异教徒”的统治。1900 到 1914 年这段时间，在苏丹北部几乎没有一年不出现马赫迪教派的起义。这些起义的激情和力量主要源自先知耶稣的穆斯林教义。穆斯林教徒普遍相信，在世界充斥不义时，为了把正义带到人世间来，马赫迪必将再次来到人世，但是他的使命会被反基督的力量暂时阻遏。无论如何，先知耶稣为保证光荣“马赫迪雅”的永久存在，将很快出现。马赫迪的追随者显然把英国人当作伪基督教徒，他们中许多人下定决心承担把英国人逐出这个国家的神圣任务。[35]

马赫迪追随者的起义在 1900 年 2 月、1902~1903 年和 1904 年陆续爆发。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 1908 年，由杰出的马赫迪信徒阿卜杜勒·卡迪尔·穆罕默德·伊玛目组织和领导，人们通常称他为瓦德·哈布巴。瓦德·哈布巴在贾齐拉宣讲马赫迪主义，从他在坎林附近图库尔村的营地公然反对政府。政府军向他的住地进发，遭到抵抗，在这次接触战斗中两名政府官员被杀死。政府当局对这一事件大感震惊，而瓦德·哈布巴却于 5 月再次向驻扎在卡特菲亚村的敌军发动突然袭击。 80

马赫迪主义者在作战中虽然打得十分英勇，但是在几天内起义的主力还是被彻底击败了。瓦德·哈布巴使用马赫迪的方法进行迁移，大概是要到恩图曼寻找庇护所，他显然希望在那里继续秘密宣扬马赫迪主义的事业。遗憾的是他在途中不幸被捕，于 1908 年 5 月 17 日绞死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许多追随者也被处死或者判长期徒刑。[36] 在不公正的审判中，瓦德·哈布巴对英帝国主义者毫无惧色，他对审判他的法庭严正声明：

> 我的愿望是苏丹应由穆斯林根据穆罕默德的法律和马赫迪的教义和格言来统治。我比政府更了解苏丹人民。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政府的所谓友谊和花言巧语无非是伪善和欺骗。我可以发誓，人民宁愿要马赫迪主义而不要现政府。[37]

虽然这许多次旨在救国救民的起义未能互相协调配合，也没能获得大量的追随者，但它们是马赫迪时代的延续，它们证明马赫迪主义作为有生命力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在苏丹依然存在。而且，这些起义显示抵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情绪依然牢固地留在苏丹北部许多人的心中。

努巴山区和苏丹南部的反抗运动

努巴山区和苏丹南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面临的极为严重的挑战之一。但是这些地区爆发的许多次起义和反叛基本上是地方性的。而且它们都是当地人民对殖民主义者向各个部族的社会结构引入变化的直接反应，也是英国人破坏那些部族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并以英国人自己的新结构来代替的结果。

尽管殖民军队十分冷酷残忍，各努巴社会仍积极反抗英国统治。就在基特拉的艾哈 81

[35] H. A. 易卜拉欣，1979 年，第 440 页。
[36] 同上，第 448 页。
[37] 苏丹情报局报告，1908 年 5 月。

迈德·努曼公开宣布起义的同时，1906年塔洛迪人民也揭竿而起，暴乱中不少政府官吏和军人被杀。更严重的一次是米里山区法基·阿里的叛乱，阿里困扰政府军队达两年之久，但他在1916年被捕，关禁在瓦迪哈勒法。[38]

在苏丹南部地区，反抗运动是由住在毗连索巴特河和白尼罗河地区的努埃尔人领导和维持的。在前政府当局统治下，由于当局未能行使有效的控制，所以努埃尔人习惯于自行其是。现在，努埃尔人拒绝承认新政府的权威，并不断对它表示敌意。他们有两位领导人邓库尔和第乌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积极。虽然这两个有影响的人物于1906和1907年先后逝世，但努埃尔的反抗行动并没有停顿。1914年，努埃尔人的另一位领导人杜勒·第乌攻打政府哨所，尽管政府采取了不少不加区别的严刑峻法，努埃尔人的抵抗仍源源不绝地获得新的势头，直到1927年爆发群众性的传播很广的努埃尔起义。

阿赞德人在他们的首领延比奥领导下，决心不许任何外国军队进入境内。他们同时面临着比利时人和英-埃政府入侵的危险。比利时人在赞德兰的南面边界上加紧活动。延比奥看来担心比利时的入侵比担心英国人更厉害。因此，他认为他能采取的最好政策是向英国表示友好，使其保持中立，从而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更为紧迫的比利时入侵的危险。根据这种考虑，他邀请英国人在他的王国内设立商站。他以为虽有这一邀请，英国人也不可能来，如果他们真的前来，他将与之作战。他的真实意图看来是打英国牌来对付比利时。因为他显然相信，在他国土内存在英国利益会使比利时在发动进攻之前必然三思而行。[39]

然而英国却接受了这一邀请，并于1903年1月派遣一个巡逻队离开瓦乌向延比奥的领土挺进。在途中他们遭到阿赞德人的袭击，这支巡逻队逃往伦拜克。1904年1月在喀土穆的政府又派来另一支巡逻队，途中又受到阿赞德人的攻击，最后不得不撤退到通杰。

当比利时准备向延比奥领土进攻时，后者动员了10,000名阿赞德军队向比利时在马亚瓦的据点大胆发起进攻。阿赞德人勇敢地骚扰入侵者，但是他们单以长矛抵挡不住比利时来复枪的火力。这场战斗严重地削弱了阿赞德的军事力量和士气。延比奥在他军队力量削弱的情况下，1905年1月还必须抵御政府派来的远征军。最后他终于惨败，并遭到俘虏，随即于1905年2月死去。但是，他的人民仍继续斗争。1908年延比奥部下的一些战士曾试图再掀起一场叛乱，而另外一些战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人作战。[40]

82

索马里兰

索马里兰对遭到瓜分的反抗，1884-1897年

从19世纪中叶起索马里半岛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列强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竞相争夺的

---

[38] A. S. 库德西（Cudsi），1969年，第112-116页.

[39] 同上，第220页。

[40] 同上，第238-254页。

舞台。19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和法国在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有它们的利益，因而力图在索马里沿海建立自己的势力，因为这一带在战略上和商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最后意大利也卷了进来。三国把势力扩展到内地，各自在索马里兰建立一个保护地。法国人积极活动，首先在1885年建立了一个保护地。英国政府则到两年以后才宣布在吉布提以东的地方建立自己的保护地，包括齐亚德港。通过英帝国东非公司和英国政府的积极帮助，意大利也在1888年11月获得了布拉瓦、马尔卡、摩加迪沙和瓦尔希赫等城市的控制权。意大利政府宣布与这些城市相连接的沿海地带为它的保护地，这块保护地随后扩展到包括奥比亚和北部的米朱提因索马里（见插图4.1）。

埃塞俄比亚也扩展势力到索马里人居住的地区，设法在豪德和欧加登建立临时性行政机构。有一种看法认为：欧洲人入侵索马里，其动机出自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埃塞俄比亚向那里扩展，主要是“对在它国土附近建立欧洲人殖民地的一种防御性措施”。持这种看法的人强调，由于意大利、英国和法国从他们各自的沿海领地向索马里内地推进，埃塞俄比亚皇帝曼涅里克才“力图通过紧急手段扩展自己的边界，使这些殖民者尽可能远离他在高地上的权力中心。”[11] 可是应该注意的事实是：早在欧洲人侵入这个地区之前，曼涅里克统治下的绍阿就已开始扩张，第一个目标是奥罗莫，下一步就侵入索马里。

对索马里的分割实际上在1897年正式完成，不顾索马里人民的合法权益，剥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因此，必然会惊醒他们的犹豫，激起他们仇恨，促使他们起而抵抗外国人的征服。索马里的酋长们和素丹们对这种侵犯特别不安，因为它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他们决不甘心放弃他们的主权，正是他们在被分割期间领导无数次反抗欧洲人和埃塞俄比亚统治者的局部性起义。 83

索马里的酋长们意识到欧洲强国在殖民扩张中相互间处于激烈竞争的状态，他们试图离间殖民者使它们相互倾轧。他们和欧洲这一个或那一个强国缔结条约以求达到这一目的，希望运用外交手段能够阻遏对他们独立日益增大的威胁。举例而言，索马里的酋长们和英国人签订很多条约，但是这些条约很少真正对英国让步。在每一份条约的序言中都阐明：在索马里方面缔结条约是“为了保持独立，维护秩序以及其他良好而充足的理由”。索马里有关各部族并没有公然割让土地给英国人，他们特别保证除英国政府外，“决不割让、出售、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让人占有现在他们居住着的或者在他们控制下的领土的任何部分。”[12] 这些条约最终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欧洲列强和埃塞俄比亚设法用和平手段解决了这个地区的殖民纠纷。

除了这种外交上的努力外，也有些索马里部族试图拿起武器来维护主权。他们迫使英国人不得不4次派遣远征军：于1886年和1890年对付伊萨族；1893年对付哈巴尔·热尔哈吉斯族；1895年对付哈巴尔·阿瓦尔族。[13] 意大利人也由此遭到严重伤亡，1887年

[11] S. 图瓦尔（Touval），1963年，第74页。
[12] I. M. 刘易斯（Lewis），1965年，第46-47页。
[13] A. 汉密尔顿（Hamilton），1911年，第47页。

一批意大利人在哈勒尔被屠杀，1896年14个意大利人被比马尔人所杀。埃塞俄比亚军队和索马里部族之间经常不断地发生冲突，以致前者无法完全占领欧加登，也不可能把他们的权力延伸到离分散在各地的军事据点以外较远的地方。[44]

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记住，尽管索马里人文化的同一性，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建立起单一的政治实体。因此，外国侵略者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是不团结的而且常常相互敌对的部族集合体。[45] 此外，索马里人仍旧用长矛和弓箭作武器，又不可能立刻进口任何数量的武器装备。然而索马里人在被瓜分时期的抵抗中仍然闪烁着民族主义的精神，从而激发了后来的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反对欧洲和埃塞俄比亚占领的圣战。现在让我们叙述历史上这一事件。

84 索马里人为自由而战

赛义德·穆罕默德出生于1864年。他7岁精通古兰经，19岁离家去非洲东部伊斯兰主要中心哈勒尔和摩加迪沙以求深造。据可信的传说，其行踪所到之处曾远达苏丹马赫迪革命战士在科尔多凡的要塞。[46] 1895年赛义德出发去麦加朝圣，在阿拉伯半岛逗留一年，还访问过汉志和巴勒斯坦。他逗留麦加期间，曾在谢赫·穆罕默德·萨利赫门下学习，并加入他的教派——萨利希雅。这次大范围和长期的在穆斯林世界各个地区的国外旅行，使他有可能接触到当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思潮。[47] 在回家途中，他又在柏培拉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向同胞们讲解宣教，劝导他们回到严格忠于穆斯林的道路上来。

赛义德·穆罕默德明了，基督教（欧洲和埃塞俄比亚的宗教）的侵入，已威胁索马里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早在1899年7月，他写信给一个索马里部族，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警告："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异教徒破坏了我们的宗教，把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他们的孩子吗?"他说这样的话，显然是指在索马里境内建立基督教教会学校这件事，他认为这类学校的建立是对古兰经学校的一种威胁。赛义德觉得，不少索马里人采用如"约翰·阿卜杜勒"之类基督教名字，也足以说明人民改宗基督教的严重性已达何种程度。所有这一切都使赛义德更坚定地相信，基督教的殖民活动意在破坏穆斯林的忠诚信仰。

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在索马里兰产生强烈的反响。赛义德和别的宗教领袖一样，深受马赫迪光辉业绩的激励。索马里人对苏丹早期革命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坚持共同信仰的人的同情当然是推动赛义德·穆罕默德起义的因素。[48] 在他的一篇演讲中，赛义德谴责英国军事当局为对马赫迪作战而出口牲畜。他说，"马赫迪是苏丹的圣人，真主给予他胜

[44] S. 图瓦尔，1963年，第74页

[45] I. M. 刘易斯，1965年，第43页。

[46] A. 沙伊赫-阿卜迪（Sheikh Abdi），1978年，第61 62页。

[47] M. O. 阿卜杜勒·哈利姆（Abd al Halim），1975年，第339页，

[48] *I. M. 刘易斯，1965年，第69页*

利”。[49] 可是在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心目中，他的圣战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全过程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以及苏丹的马赫迪革命对他的激励和影响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人们尚不完全清楚。甚至在他访问苏丹期间曾与苏丹东部信仰马赫迪主义的埃米尔奥斯曼·迪格纳进行商议的假设也不能完全证实，虽然一些索马里传说声称，索马里人在圣战中运用 85 的游击战术是仿效苏丹东部马赫迪主义者的。[50]

对过游牧生活的索马里人而言，阻碍他们团结的较严重的因素之一是传统的世系制度以及对宗派的效忠。但是通过他个人的超群才能和卓越领导方法，赛义德有办法统率由不同索马里部族组成的庞杂的追随者，并建立一支估计达 12,000 人的常备军。[51] 在十分成功的反对异族殖民统治的动员工作中，赛义德呼吁索马里人不顾部族义务而树立穆斯林宗教感情。同时他写了大量诗篇(其中有许多篇至今仍为整个索马里所熟知)，他运用这些诗篇“高举以伊斯兰和祖国两面旗帜，成功地引导一大批好争吵的各部族人民集合在一起”。[52]

赛义德在柏培拉开始他的圣战，1895 和 1897 年期间，他在那里活动，努力唤起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他的首次革命战斗是 1899 年 8 月占领英属索马里兰中部的布劳。英国人对此大为惊恐，在 1900-1904 年间先后派遣四支远征队去击退赛义德的进攻。尽管在这几次战争中英国人得到意大利人的帮助，赛义德超群的军事才能和成功地运用骑兵和游击战术，使他的战士获得多次胜利，其中有一次发生在 1903 年 4 月甘布鲁山，这场战争中有 9 个英国军官被杀。

但是，到 1904 年底，赛义德的军事力量已被大大削弱，因此他不得不撤退到意大利的米朱提因保护地，1905 年 3 月 5 日在那里他和意大利人签订伊林条约，由他自己口授条件。到 1908 年，赛义德动员他的军队进行新的一轮战斗，迫使英国人于 1909 年 11 月从内地撤退，集中于沿海地区。当时，赛义德扬言还要进攻沿海城镇。1913 年 8 月他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歼灭英国新建立的骆驼警察部队。这场灾难迫使英国人与埃塞俄比亚哈勒尔地方的总督结盟，组成联合远征队对付赛义德，直到 1920 年 11 月他死于埃塞俄比亚的伊米。

在赛义德·穆罕默德的领导下，索马里人民就这样不断困扰欧洲帝国主义和埃塞俄比亚人达 20 年之久。他们有能力赢得一次又一次军事、政治甚至外交上的胜利。虽然这场索马里的圣战未能使国家最终摆脱外族的统治，但是它鼓动了强烈的民族感情。索马里人民终于把他们自己看作与外国入侵者作战的单一整体。此外，赛义德·穆罕默德领导的斗争还在索马里民族意识中留下爱国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永远不会消失，它将激 86 励以后世世代代的同胞。[53]

---

[49] L. 西尔伯曼 (Silberman)，未注明日期，第 47 页。
[50] M. O. 阿卜杜勒·哈利姆，1975 年，第 369-370 页。
[51] D. 贾丁 (Jardine)，1923 年，第 69 页。
[52] A. 沙伊赫-阿卜迪，1978 年，第 62 页。
[53] I. M. 刘易斯，1965 年，第 91 页。

结 论

1880-1914年期间非洲抵抗欧洲征服与占领的斗争，恐怕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像这个大陆东北部那样轰轰烈烈。成千上万的埃及人、苏丹人和索马里人在他们与殖民军队的大小战斗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仅此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抵抗力量的源泉，除了鼓舞战斗的爱国情绪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感情在起作用，那就是强烈的宗教信念。埃及、苏丹和索马里的人民不单是为保卫家乡而战，同时还为保卫他们的宗教而战。那里的穆斯林和穆斯林世界其他部分虔诚的教友一样，意识到异族对迄今是穆斯林领土的侵犯，将引起社会和宗教的瓦解。要穆斯林人民接受政治上从属于基督教国家的地位，这是违背伊斯兰精神的。因而，阿拉比、马赫迪和赛义德·穆罕默德的革命运动应该从18和19世纪遍布和深刻影响穆斯林世界的无数次改革运动的来龙去脉中去理解。

（李秀芬译）

5 北非和撒哈拉非洲人的能动性和抵抗

A.拉鲁伊

本章所述主题十分复杂，主要不是事实繁多，这些事实人们大体上都很熟悉，而是对这些事实如何理解。我们的任务是研究马格里布和撒哈拉人民抗击殖民者入侵的能动性以及被征服过程中他们的反应。为了给读者对形势的复杂性有个初步概念，让我们先观察一下 1907 年的情况（见插图 5.1）。 87

在西边，摩洛哥正经历一场革命，要推翻素丹阿卜杜勒·阿齐兹（1894-1908 年在位），因为他批准法国占领图瓦特省，并同意 1906 年 4 月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欧洲列强所强加的改革。这次革命的创导人是马赫增的成员，[①] 他们同苏菲兄弟会的当地中心“扎维亚”以及地方酋长们有联系。

在东部，突尼斯正出现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由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毕业生建立起协会，同时出现了用殖民地宗主国语言出版的反对派报纸。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以前所未见的能动性崭露头角。

在南方，撒哈拉西部是法国大规模调兵遣将的用武之地，其目的在包围和扼杀独立的摩洛哥。西班牙很快在摩洛哥境内仿效法国的榜样，而意大利则觊觎的黎波里塔尼亚，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是君士坦丁堡素丹的权益。

这样，在我们所叙述的时代和地区，我们需要把三个方面区别开来：

（1） 组织起来的国家[②] ——：即北非西部的摩洛哥和东部的奥斯曼。正是这二个地区我们必须正视受之无愧的能动性。

（2） 苏菲兄弟会——：鼓舞人心的无疑是宗教性的，但毫无问题真正起作用的则是政治性的。在北非和撒哈拉，它们常常是反对外侮的自卫组织。在国家强盛时，兄弟会是国家机制的一部分；当国家衰微或分裂时，它们成为独立的组织，自行采取主动行动。这样，当君士坦丁堡放弃它的主权时，赛努西兄弟会成为在昔兰尼加抵抗意大利人的核心组织；当摩洛哥国家瘫痪无力时，凯塔尼斯兄弟会在欣基特和沙维亚地方集结力量反抗法国的军队。 89

（3） 在“杰玛一级[③] ——：只在其他两个方面的行动都被军队镇压下去时它才公

---

① 马赫增（Makhzen）：指摩洛哥政府，广义指该国政界和宗教界名流。

② 这个国家的结构，不能以欧洲自由国家的结构来理解，不然会陷入殖民者思想意识的陷阱。

③ 杰玛（djema'a）：代表不同部族阶层的大会。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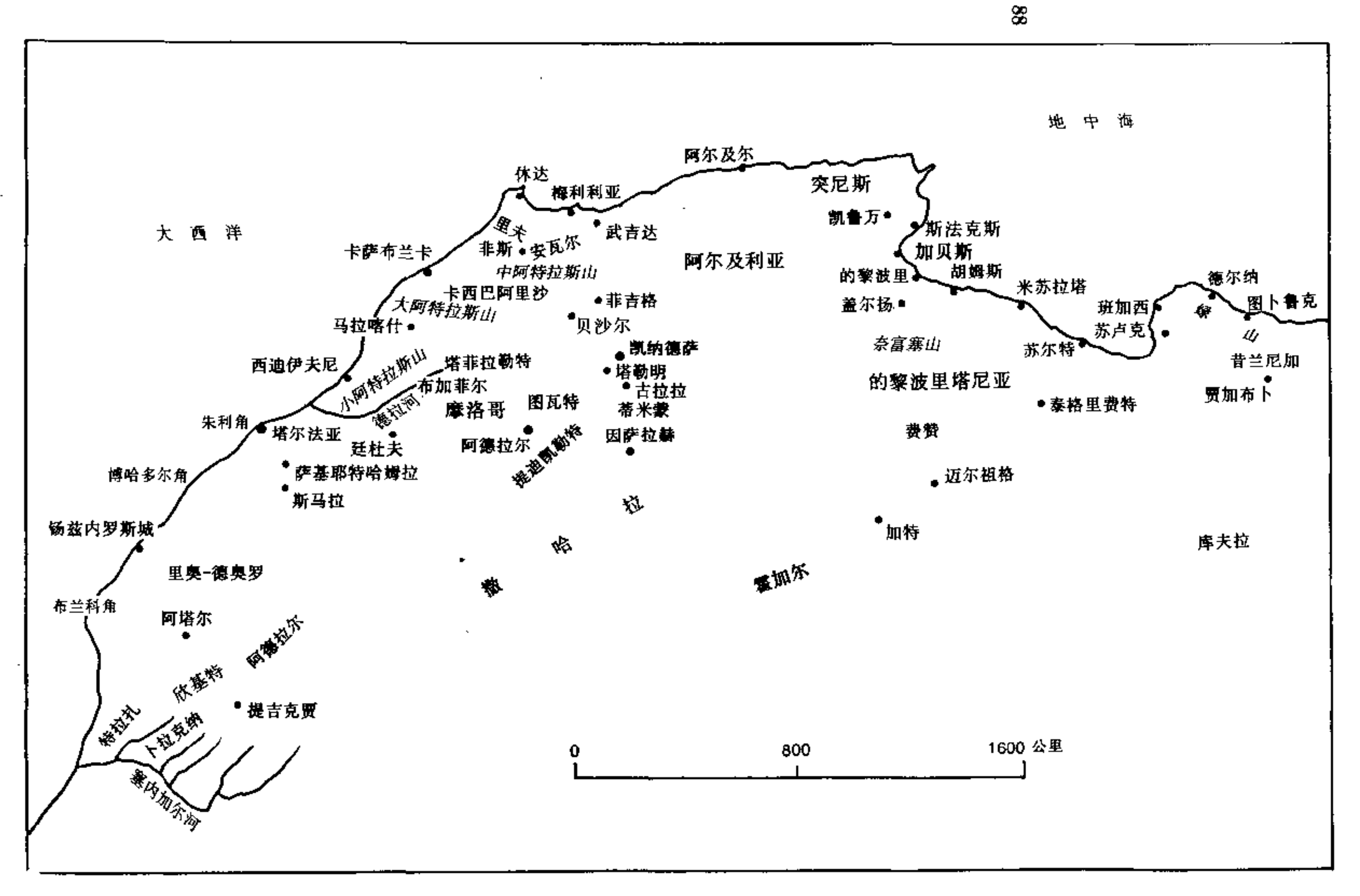


插图 5.1 马格里布和撒哈拉的主要地域

开露面。杰玛开始时不顾殖民者诱饵，拒绝同殖民当局作任何接触。最后当它屈服时，它只保持一种有限行动，即只有殖民当局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让它成为独立力量时，它才对这个政策作出反应。

殖民主义的史学家有意歪曲事实，他们无视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地位，贬低兄弟会为某种超部族性质的组织，并把马格里布社会看作仅只是部族性质的集团。此外，他们按照尤其说是实际事实还不如说是理论的人类学血亲模式解释这些国家和社会。由于这种歪曲态度，他们把抵抗斗争曲解为对征服政策的一些偶发的无组织的反抗，比较起来，征服政策倒反而成为非常合乎理性的行动。

当我们说到国家或兄弟会一级时，我们应该用“能动性”这个字眼；在地方一级则应该使用“反抗”这个词。虽然这两种含义在马格里布历史中同时并存，每一个含义可以单独说明一段特定时期的特征：摩洛哥1912年以前和以后，利比亚1922年以前和以后。

关于马格里布抗击殖民主义野心的能动性，我们的资料来源于政治和外交文件，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材料。今天历史学家的问题是如何收集和加以保存。关于地方性反抗的证据，主要是一些手写的和口头的叙述。显然，这些口头叙述必须记载下来，手写的陈述必须赶在它们消散湮没以前收集好。但是，严重的问题是对资料的评价，也就是要懂得我们对它们可以作怎样的合理期待。

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第一，关于城市里有教养的人所写的陈述，我们须要记住，在军事征服之前总有长时期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当时，城市里的上层精英已失去全部抵抗意志。这个阶层成员中那些写下回忆录的人，(不管今天怎么评价他们)并非当年参加抵抗的成员。第二，关于口头叙述，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目击者必定受到过两种 **90** 影响。一种是欧洲人的影响。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所作的战争记载，几乎立即就能在专门报刊上发表；④把所属酋长的儿子派去法国学校读书，希望把他们转变为法国的忠实同盟者，也是殖民主义者的政策。例如，在征服战争才过10年，儿子可能把父亲所进行战役的细节讲述出来，而父亲却一点也不知道。自此以后，他将以充分信心把所讲的一套编在他自己的叙述中。殖民主义者的描述，虽然与事件同时发生，却是不全面的；它沾上存在于宗主国军队和当地殖民政权军队之间相互敌视的色彩。殖民地政权的军官会毫不犹豫地大肆描述他们在非洲的战役，使它们看起来可与宗主国军队在欧洲发动的战役媲美。⑤

第二种影响是民族主义的。征服战争与城市中的改良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活动同时发生。即使战争远离城市，城市人民也急切地处处注视着它的起伏消长，而且立即利用战争为意识形态的目标服务。常常就是那些战斗性很强的城市人民，请高地的老战士们讲述所经历的回忆。

由于上述两个理由，我们现有陈述固然无法改变殖民主义的记录或民族主义的描述，

④ 法国绥靖政策的编年史，从1898年起，每月刊登在法国非洲委员会所办的《法国非洲》杂志上。

⑤ 纪尧姆(Guillaume)将军关于法国征服中阿特拉斯山的著作写道，“但是经常发生不顾总的战争艺术原则的事”。A.纪尧姆，1946年，第457页。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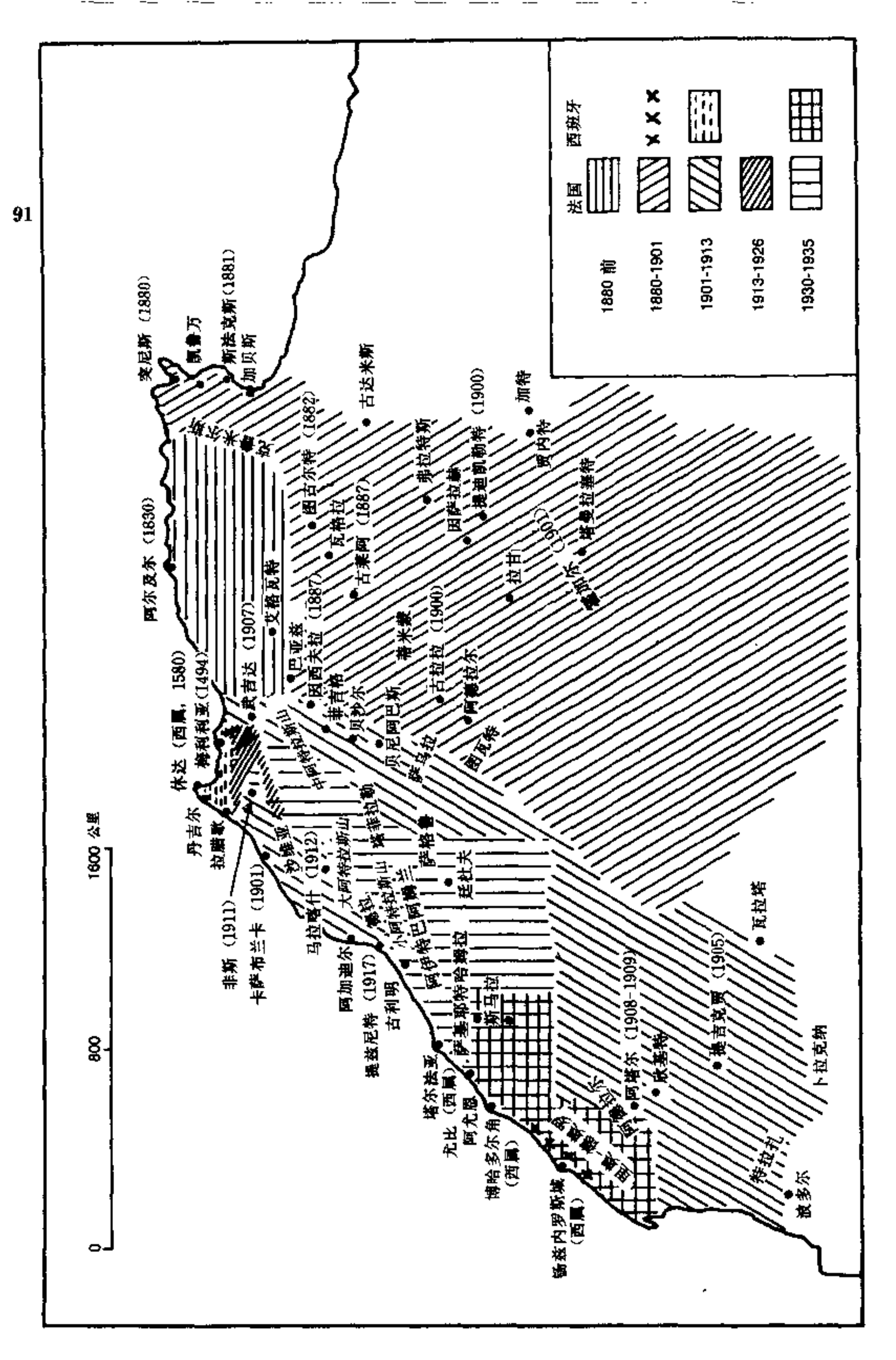


插图 5.2　欧洲人在马格里布进行的战争

但我们能从不同角度加以阐明，这点只要我们超脱狭隘的地方背境就能看得分明。

马格里布各国和欧洲人

19 世纪殖民主义者在北非洲的争夺战与以前战争相比是不同寻常的（见插图 5.2）。

摩洛哥政府抵御占据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西班牙人长达四个世纪。摩洛哥政府禁止当地居民同西班牙人打任何交道；为了打破这个封锁，西班牙发动 1859-1860 年的战争，至使摩洛哥遭到惨重损失。它被迫支付大量赔款，同意西班牙在梅利利亚扩大堡垒地区，并割让大西洋沿岸的一个港口作为加那利群岛渔民的避风港。⑥ 连同获得里奥-德奥罗海湾（1884 年 12 月 26 日正式将占领该海湾一事照会瓜分非洲为势力范围的柏林协定各签约国），西班牙到 19 世纪末，在北非海岸已经取得三个桥头堡。 92

1880 年和 1881 年，以保护在摩洛哥的个人为讨论主题的马德里会议连续召开了两次。马赫增为谋取获得国际公认的界线明确的领土上的独立和主权，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尽管有英国支持，它的努力面临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为私利结成的联盟，还是失败了。法国在短时间内甚至自认为在摩洛哥的利益已经全部丢失殆尽了，会后立即提出图瓦特的问题。的确，当时在巴黎的人们纷纷议论横贯撒哈拉铁路线的计划，这条铁路将为法国贸易进入中部非洲敞开大门。但是这个计划碰到严重的障碍：撒哈拉中部的绿洲在政治上依附摩洛哥，法国试图使素丹同意它的意图，但是素丹在英国支持下拒绝法国的要求，同时大力加强自己在图瓦特的行政和政治力量。

在马格里布东部，突尼斯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和意大利人打仗，正像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打仗一样。统一后的意大利当然对突尼斯的摄政政权有所图谋：意大利向那里移民、投资并宣传它的文化。但是对突尼斯的真正威胁还是来自法国，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已有半个多世纪。

君士坦丁堡的素丹利用他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厄运，乘机把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再度置于直接管辖之下，并恢复在突尼斯的政治影响。⑦ 无疑，在突尼斯摄政政权的上层，有相当的亲奥斯曼情绪。贝伊把这种亲奥斯曼情绪看作对他的特权的威胁，认为他应力求依靠意大利和法国。这个多少经过慎重考虑的行动路线对他来说是致命的错误。当法国政府利用有利的外交形势向这个国家发动进攻时，贝伊感到在国内外都处于孤立地位，他被迫在 1881 年 5 月 12 日签订条约，接受了法国的保护。但是萨赫勒和宗教首都凯鲁万的居民立刻起义，希望奥斯曼迅速干预。此时法国又派出第二批远征军，在西北部、中部和南部山区地带遇到顽强的抵抗。萨法基斯和卡比斯两地受到敌方海军的炮击；1881 年秋天凯鲁万顶住了长期的包围；而邻近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南部领土长期以来一直是不安全地带。

---

⑥ 经过多年争论，在西迪伊夫尼港问题上达成协议，但直到 1934 年才占领这个海港。

⑦ 见 E. 库兰（Kuran），1970 年。

意大利坚持对这个国家的权利要求，但是突尼斯人显然不能再玩意大利这张牌了。93 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对伊斯兰的君权保持忠诚；同君士坦丁堡的联系从未完全中断，这点就是突尼斯早期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一。

这里我们不必论及欧洲各国为了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紧张外交活动。这个准备阶段到 1904 年 4 月法国和英国达成总协议而告终。在这个日子以前，对马格里布有兴趣的欧洲各国满足于保持其既得权利继续有效，并偶或占据一些领土作为保障。

这样，在哈桑一世统治结束时，摩洛哥经受 1893 年战争的失败，被迫允许西班牙巩固它 1860 年在梅利利亚附近一带取得的地方。7 年后，即巴·艾哈迈德大臣摄政结束时，法国断定一下子解决图瓦特问题的有利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法国借口科学探察，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逐渐接近它所觊觎的绿洲，1899 年 12 月法军出现在因萨拉赫之前并命令该城投降。由摩洛哥素丹任命的当地首领在马赫增士兵的拥簇下和在因萨拉赫酋长们的协助下猛烈抵抗。如同 1899 年 12 月 27 日因加尔战役一样，由于双方力量悬殊，经过多番浴血苦战后，整个因萨拉赫绿洲陷落；最后一役是于 1901 年 3 月在塔勒明进行的。英国和德国接到年轻素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告急后，劝他接受既成事实，他只能被迫在 1902 年 4 月 20 日的草约上签字。作出这个重大的让步以后，他要求在摩洛哥南部和东部与法国占领区连接处明确划定界线，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法国乐于使界线模糊不清，好为下一步侵占的前景提供方便。

图瓦特的丢失成为素丹权威破产的一个主要原因，一直到 1911 年，素丹的威信每况愈下。马赫增的成员知道法国正计划包围摩洛哥，其目的是孤立而征服之；他们也知道英国不再反对法国的图谋。马赫增在国内进行行政改革和强化军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于德国，除外交上的支持外，不再能指望它提供任何帮助，的确德国在 1911 年 11 月以前支持摩洛哥独立，但 1911 年 11 月，德国同法国签订一项协议，给予法国在摩洛哥放手行动的权利，以使法国同意德国在赤道非洲的权利作为交换。

1905 年后，法国决定加速行动，占领所谓的比拉德西巴。[8] 那里是土地贫瘠、人口稀94 少的沙漠地区，因为这些原因，素丹把那片土地交给当地酋长去管理，虽然不曾放弃他的主权。素丹按时能得到殖民主义者策划阴谋的情报，当法国的威胁变得十分明确时，他及时派出赋予权力的代表去指挥抵抗。这就是在凯纳德萨地区和欣基特发生的情况。

法国总是拒绝摩洛哥勘定菲吉格以外的界线，它采取的是蚕食领土的政策，逐步向索拉河谷推进，法国军队逐步占领瓦迪吉尔和瓦迪祖斯法纳之间的土地，借口是终止无法律和不安全状态以及扩大边境贸易。法国政府向马赫增建议，应分享海关的收入，1910 年 3 月，它的要求得到满足。

再往南，法国强使特拉扎和卜拉克纳的埃米尔接受它的保护。以后，在 1905 年，一个熟悉穆斯林教义的专家格扎维埃·科波拉尼从阿尔及利亚来到这里，介绍“和平渗透”政策，这个政策采取同酋长和宗教性兄弟会首领直接接触的方式，旨在使他们接受法国

---

⑧ 按照殖民主义的论断，比拉德西巴是一个独立的地区，实际上那里素丹的主权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他只有宗教上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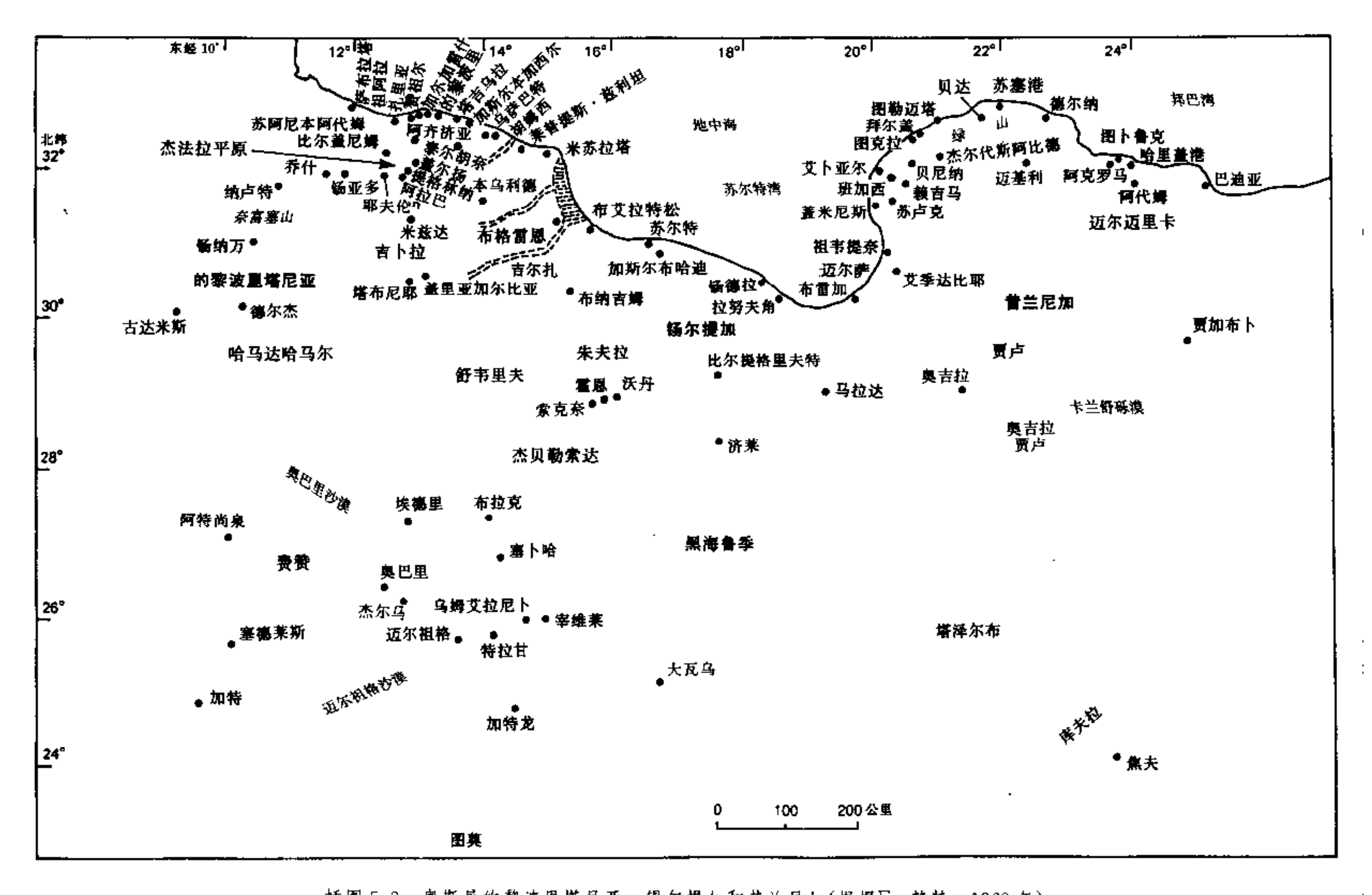


插图 5.3 奥斯曼的黎波里塔尼亚、锡尔提加和昔兰尼加(根据F. 赖特，1969 年)

的影响。这个鼓吹和平渗透者遇到一位旗鼓相当的敌手，就是担任摩洛哥素丹的代表达30多年的谢赫·马艾奈恩。穆莱·阿卜杜勒·阿齐兹接到通知，便派他的叔叔穆莱·伊德里斯前去抵抗军鼓舞士气。同时，科波拉尼在提吉克贾的营地在1905年4月受到攻击，这位“和平渗透”的吹鼓手被杀身亡。法国趁摩洛哥内部发生危机、全国动荡之际，要求摩洛哥召回穆莱·伊德里斯，1907年1月，这个要求达到目的，但是抵抗仍在继续。由古罗上校带领的法国一支强大远征军向北挺进，1908年6月16日在穆伊南遇到严重的挫折，但在1909年1月9日成功地进占阿塔尔。谢赫·马艾奈恩及其追随者撤退到萨基耶特·哈姆拉，从那里他的部队继续骚扰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直到1933年。

在同一时期，西班牙叨法国之光也趁机进军。当法国占领欣基特时，西班牙抓住时机从它在里奥-德奥罗湾的定居点出动，并在1906年组织撤哈拉干涉军向内地深入30公里。在北部，西班牙等到法国在1909年侵入瓦杰达之后，也集合一支拥有45,000多名士兵的远征军，在1909年9月出发征服里夫。作为回答，当地人民在谢赫·阿迈里扬号召圣战的激励下，集合起来进行一场殊死抵抗，直到1926年抵抗的战火方才熄灭。

在北非的另一端，奥斯曼管辖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在1911年遭到意大利的攻击(见插图5.3)。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大大削弱了奥斯曼国家；同时意大利的侵略得到英法两国的默许。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向君士坦丁堡提交最后通牒，指责奥斯曼玩忽职守和国内严重无政府状态，而后不顾土耳其政府和解性的答复，于同年10月悍然在的黎波里、班加西、胡姆斯和图卜鲁克登陆，轻易占领了这些城市。可是，在意大利军冒险出城时，他们遭到猛烈的抵抗。一连串的战争在城市的郊区进行，其中有1911年10月23日在的黎波里城外的哈尼之战。意大利人遭到可耻的失败，对的黎波里的城市居民犯下极大的暴行。[9] 1911年11月28日，意大利人在班加西郊外的朱利亚纳、库韦菲亚和豪瓦里打了三次大仗，他们又遭惨败，被迫退回班加西。在胡姆斯，意军和土耳其-阿拉伯军队为争夺战略据点马尔基卜从1911年10月23日到1912年5月2日展开拼搏激战，意军终于把守军赶走。[10]

96

在德尔纳的小量土耳其军队撤到俯瞰城镇的山地，并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与意大利人交锋。德尔纳的抵抗因安瓦尔帕夏（恩韦尔）和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的土耳其之父）率领的一批土耳其军官的来到而加强。安瓦尔及其一伙在萨努西教团精神领袖艾哈迈德·谢里夫的帮助下，动员内地的阿拉伯人，并成功地招募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97

安瓦尔在1912年10月8日和同年3月3日率领军队在卡尔卡夫和西迪阿卜杜拉和意大利人打了两仗。[11] 在图卜鲁克，阿拉伯军与意大利人进行两次重大遭遇战：1912年3月3日在纳杜拉和同年7月17日在穆道沃尔；在后一场战斗中意大利司令官萨尔萨将军战死。[12] 要在这概括性的史实记叙中述及利比亚抗击意大利人的全部战斗是困难的，但

⑨ P. 马尔蒂斯（Maltese），1968年，第210-224页。

⑩ K. 提利西（al-Tillīsī），1973年，第463-467页。本章有关利比亚的部分根据I. 哈雷尔（El Hareir）和J. 范西纳（Jan Vansina）（编者）的来稿写成。

⑪ 同上，第27页。

⑫ 同上，第344-346页。

是，只要指出当时每一个城市、城镇和河谷及周围全都发生反对意大利人的遭遇战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于这种猛烈的抵抗，意军在战争头6个月除占领5座城镇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收获。

到1911年底，许多意大利人开始对在利比亚旷日持久的战争感到失望。为了迫使土耳其军队撤离利比亚，意大利政府攻打土耳其海峡、多德卡尼斯群岛和达达尼尔海峡。意大利在土耳其心脏地带这一新行动威胁世界和平，并重新引起“东方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极度复杂，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愿意见到它重新提上日程。于是，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对土耳其和意大利施加压力，迫使两国达成和平协议，并成功地诱导（如果不算强迫）土耳其同意于1912年10月18日与意大利签订洛桑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里保全面子）给予利比亚人民独立，作为回报，意大利同意从土耳其水域撤离。⑬



图片5.1 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赛努西，赛努西教团的精神领袖(1902–1933年)

利比亚人对这一未与他们商议的和平协议的反应是不一致的，有人愿意与意大利人谈判，有人则想战斗到底。在精神领袖艾哈迈德·谢里夫领导下的昔兰尼加人属于前一个阵营。

意大利人抓住土耳其军队从利比亚撤离的机会，对德尔纳以南艾哈迈德·谢里夫领导的军队发动攻击，但于1913年5月16日在耀姆朱马一役遭到晕头转向的失败。⑭这一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土耳其军队撤离后，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首次大规模的遭遇战。根据土耳其素丹给利比亚人独立的敕令，艾哈迈德·谢里夫宣布组成称为胡库马·赛努西亚的政府——赛努西政府。⑮

98

意大利人又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发动一次类似的袭击，目标针对西部山区的主力部队，他们在1913年3月23日詹杜巴一役击败利比亚人。这次胜利为意大利军队进入费赞地区打开了通道。他们组成一支远征军，由米亚尼上校指挥，在连续三次战役中成功地挫败了利比亚战士，并在1913年2月占领了塞卜哈。⑯

⑬ 扎维（Al-Zāwī），1973年，第140-156页。

⑭ K. 提利西，1973年，第321-322页。

⑮ 见位于利比亚、班加西的卡尔·尤尼斯大学所收藏的艾哈迈德·谢里夫（Ahmad al-Sharīf）的文献。

⑯ K. 提利西，1973年，第46-47页。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北非的抵抗运动[17]是在有组织的国家领导下进行的。侵略军遇到正规军小分队的抵抗，虽然正规军的人数比当地战士少。当这个国家有鉴双方力量悬殊，被迫接受既成事实时，它默默地把抵抗的责任交给同穆斯林社会政治领被一直有联系的兄弟会的领导人。[18]这样，第一阶段发生的是明确地以穆斯林主权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战争。

到1914年止，除利比亚外，由中央集权的当地政治当局组织的抵抗都已告终。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局面，使得殖民国家无法进一步取得有效的占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只想保持他们既得的领土。但是他们遭到严重挫折；这种情况引起法国在摩洛哥驻扎官利奥泰将军说出这样的话："事情是不进则退啊。"他国人和土耳其人鼓动北非人民摆脱殖民主义枷锁；泛伊斯兰领袖如突尼斯人巴什·汉巴和摩洛哥人阿塔比在柏林都得到热情接待，并参加在中立国的宣传旅行；使者被派到里夫和瓦迪农地区；武器通过米苏拉塔港运给的黎波里塔尼亚抵抗战士。无疑，某些人认为能将殖民者赶回大海。战前刚征服的领土的脆弱性，这一点可从这个时斯总督们神经极端不安和他们言谈之中不断夸跃"自由主义"看得十分清楚。利奥泰对此的态度简直像是摩洛哥素丹的一个外交大臣。

1921年，这种对未来渺茫的时期告一段落。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新总督沃尔皮被民族99 主义浪潮冲昏头脑，(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导致墨索里尼进军罗马)；这位总督舍弃所谓的自由主义政策并废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斯间和以后达成的协议；接着发动一系列的侵略，以达到"再征服"的目的。一支大部队在格拉齐亚尼将军指挥下向的黎波里塔尼亚首府盖尔扬进军，1922年11月7日占领该城。另一支入侵军攻打米苏拉塔，并在1923年2月20日占领该地。[19] 1922年1月建立的联合共和国中央委员会，[20]一方面由于成员之间的纷争和米苏拉塔和瓦尔法拉之间的内战，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和西部山区柏柏尔人之间的冲突，搞得四分五裂，因面无法动员足够的力量挡住意大利人的入侵。结局是中央委员会垮台，其成员纷纷离国逃亡埃及、苏丹和突尼斯。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是，1922年12月21日，联合共和国的精神领他和最高指挥官埃米尔伊德里斯·赛努西自动流亡埃及。他的未作解释和突然的出走（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尚在争论）使人民斗志瓦解，并引起许多战士不是离开这个国家，便是向意大利人投降。然面在离国前，赛努西指派他的兄弟里达为他的代表，任命乌麦尔·穆赫塔尔为绿山国民军总司令，就是在后者的领导下，由于他发展卓有成效的游击战，使抵抗战争一直持续到1931年。他把军力分为三个强大的机动纵队，驻扎在马尔杰之南的山区杰尔代斯。1923年夏天，敌人向他发动一系列的攻击都被打退。另一支在3月份派来袭击他营地的敌军也被击溃。

---

[1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亚人民的抵抗，见本书第12章。

[18] 摩洛哥和奥斯曼的两位素丹的地位只是在1919年前是差不多的。1919年，君士坦丁堡的素丹放弃了对几个阿拉伯领地的主权。再者，1925年奥斯曼哈里发的职位被废除了。

[19] K.提利西，1973年，第63-76页；又见R.格拉齐亚尼(Graziani)，1976年，第98-104页、161-171页、339-367页。

[20] 见本书第12章。



图片 5.2　乌麦尔·穆赫塔尔，1862 年左右生，在 1931 年被处死刑前，他是赛努西人抗击意大利殖民侵略的领袖

的黎波里塔尼亚首先陷落。到1924年6月所有可耕土地都被占领。但是意大利人知道只要还没有控制沙漠地带，他们的地位就是脆弱的，他们开始了长期战役以征服沙漠，和最后占领费赞。尽管意大利使用了空袭和毒气，也未能取得成功，几次进军都被阻止。迟至1928年，利比亚人还在苏尔特以南的法克里夫特挡住意大利的主力部队。但到1929年末和1930年初，费赞终于陷落，利比亚在西部和南部的抵抗失败了。

同时，昔兰尼加的抵抗还在继续，并成功地给意大利人以重大创伤。当法西斯用直接军事攻击镇压昔兰尼加的乌麦尔·穆赫塔尔革命遭到失败时，他们使用非洲殖民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些手段，他们首先在的黎波里和埃及的边界竖起长达300公里的铁丝网，防止来自埃及的任何支援。其次，他们不断增援，占领贾卢、贾加布卜以及库夫拉绿洲，包围并孤立昔兰尼加的战士。最后他们把昔兰尼加的农业人口驱逐到苏尔特沙漠，在那里把他们关入铁丝网围绕的集中营。这种手段意味着不使穆赫塔尔的军队取得任何当地的支援。另外在马克龙、苏卢克、阿盖拉及巴赖卡等地建立大批监狱和集中营。这种集中营的情况十分恶劣，相信有十万以上的人死于饥饿及疾病，更不用提他们被没收的牲口了。单就巴赖卡集中营而言，根据意大利人自己的统计数字，在1930年和1932年之间，8万人中据说有3万人死亡。[21]

尽管有这些恶毒的手段，但起义仍在继续，起义者靠的是打了就跑的战术。意大利人再次提出与穆赫塔尔谈判。双方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一次是1929年7月19日在马尔杰附近举行的，有巴多格里奥总督参加。在这次会议中意大利人竟然向穆赫塔尔行贿，他毅然拒绝贿赂并坚持解放祖国。[22]后来当他发现意大利人企图在他的追随者中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时，他就中断同意大利人的谈判，并恢复游击战术，遍布全国的这种战术包括麻雀战、攻击、埋伏、奇袭和渗透。在他本人被俘前的最后21个月里（如格拉齐亚尼承认的那样）他总共与意军打了277次仗。[23]可是，1913年9月穆赫塔尔被俘，并被押往班加西。他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于1931年9月16日在苏卢克镇数千利比亚人前被处死刑。

穆赫塔尔被俘后，他的部下推选副司令优素福·阿布·拉希尔为司令。他继续斗争了6个月，然后决定暂停战斗撤至埃及。他本人在通过利比亚和埃及边界时被杀。1932年1月24日意大利总督巴多格利奥宣告征服并占领利比亚，至此这场对欧洲帝国主义说来，持续时间最久的抗战终于走到它或多或少无可避免的终点。值得牢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摩洛哥北部的战场也有同样激烈的战争和同样英勇的抵抗。[24]

1931年前，阿特拉斯山区和撒哈拉的广袤区域被认为经济上无利可图，因而一直处于殖民控制之外；这些地方就成为那些不向法国或西班牙军队投降的人们的避难处。但是那里的居民并非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他们与被征服区有接触，他们也到那边的市场和诊疗所去。这是和平渗透和接触政策时期，也是一个前途未卜的时期。对于那个时期，

[21] M. T. 阿什哈卜（al-Ashhāb），1947年，第482页。
[22] I. 哈雷尔，1981年。
[23] R. 格拉齐亚尼，1980年，第296页。
[24] 里夫之战见本书第24章。



图片 5.3 伊茱树尚的阿姆加尔·哈苏·乌·巴萨拉姆(撒哈拉的“阿特·阿泰”)，1933 年阿尔及利亚的布·加菲尔(萨格鲁)抵抗战士的领袖

我们务必谨慎，不可轻下一般性的结论。

1931年法国殖民政策发生变化。它对德国重新武装感到焦虑，法国陆军部长梅西米把1935年作为征服与占领非洲的终止期。他供给在非洲的陆军全部必要的装备，做好和西班牙人协同作战的安排。马德里出现共和国使这种协调十分顺利。每逢春天，派遣一支远征军镇压一个“不驯服点”。

为了充分理解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记住，征服是以素丹的名义进行的。[25] 绥靖军主要是当地人；接触政策使殖民当局懂得在土著社会中多年存在的矛盾，而每个社会既有当地人也有往往来自非常遥远地方的难民。最主要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到底为什么人民会为了风俗习惯要作殊死战斗，而这种风俗习惯却是殖民国家显然准备加以维持和加强的。

尽管最后征服在任何地方都非易事。[26] 中阿特拉斯山在1931年和1932年两次战役中还是被征服了；1932年7月12日到9月16日，在塔齐克祖特展开血战。法军包围了3千个家庭（这些家庭从1922年殖民军进攻前就已后撤）。这次战斗从8月22日持续到9月11日。不管是密集炮击还是封锁都未能打破由瓦基·阿姆胡什及其兄弟们领导的抵抗，入侵军不得不用手榴弹清除荫蔽所，战斗结束后，在摩洛哥人尸体中，法军找到自己的士兵战死达500人。这场战事清楚地表明，殖民当局对各个部族集团实施的接触政策，收效有限。1933年，在萨格鲁山发生的布·加菲尔战役（从2月13日到3月25日）又是一场浴血战斗。1934年抵抗战士最后在小阿特拉斯山投降；在这以后法军才于3月份进入廷杜夫。一周后（1934年4月6日），西班牙军才终于占领西迪伊夫尼。

104 1930年和1931年，当殖民主义列强似乎有理由设想征服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时，意大利领袖大谈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而法国人则举行仪式庆祝占领阿尔及利亚一百周年和建立突尼斯保护国五十周年。殖民主义理论家们把这视作罗马对伊斯兰和西方对东方的复仇。然而那时，已在城市确立的民族主义正准备向乡村地区传播。从有关情况看，最后几场战斗并不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继续抵制自愿投降的征兆。[27]

抵抗的各个阶段

在马格里布，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抵抗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从1880年到1912年左右，另一个阶段从1921年到1935年（中间是一段性质含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现在让我们超越战争编年史和种种主观报告，探讨可能为思考和研究铺平道路的一些问题。

在第一阶段，战争常按照由法国人在征服阿尔及利亚期间发展起来、尔后由西班牙

---

[25] “就这样经过22年不断的努力，才达到柏柏尔人山区的中心，使最后一支叛军归顺摩洛哥君主的权力。”A.纪尧姆，1946年，第456页。

[26] “没有一个部落未经战败就向我方投降的”。同上，第9页。

[27] 这是现代主义伊斯兰的基本观点。阿拉伯文“伊斯兰”一词的意义就是“绝对服从真主”，这意味着除真主外决不向任何人低头。

和意大利继续下去的模式进行。殖民国家入侵它所觊觎的领土之前，先慎重行事，力求得到竞争对手的同意，有的通过双边会议，有的通过国际会议的会外疏通。㉘ 一俟这件事情完成，接着就实行以下征服阶段：

（1） 确定并利用一个事件作为干涉的正当理由：由此编造出所谓当地人袭击和掠夺的故事（如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边界上的克鲁米尔斯事件至今臭名远扬）。于是，并吞提迪凯勒特的借口是它曾为1869年到1874年与法国人作战的布·舒沙提供避难所；占领古拉拉的理由是因为卡杜尔·哈姆扎在1872年到1879年斗争时，从那里得到过帮助和给养；而征服欣基特的借口是因为摩尔人常常渡过塞内加尔河。㉙

（2） 一旦遭到其他强国和被觊觎领土的君主素丹的反对，就强调那里管理混乱和普遍不安全作为借口。

（3） 一有机会出现（例如国内局势紧张或统治者更换之际）便趁机提出要求领土抵押。这样，法国在1900年1月出人不意地占领因萨拉赫。该地居民求援，105 摩洛哥素丹提出抗议；但是法国拒绝对这一事件进行讨论，理由是当地无力维持法律和秩序，等于自行丧失主权。㉚ 在武吉达和卡萨布兰卡（于1907年3月和8月相继被占领）的事件中，由于对方的主权是无可否定的，于是法国人就提出恢复秩序为先决条件，只有实现先决条件才答应撤军（正因为法军在场，秩序无法恢复）。

（4） 通过一系列的压力和许诺，取得委托主权，使占领合法化。这就是保护条约的实施。

（5） 再下一步便是真实的征服，这就是称之为绥靖行动的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典型方式，此后征服的速度完全根据殖民国家制定的先后次序而定。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第一阶段以政治和外交活动为标志，这些活动使这个阶段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史学家来说，这不是什么新的课题。

第二阶段情况就不是这样，那是全部征服和所谓绥靖阶段，由于明显的理由，城镇和平原地带的抵抗总是难以持久。最初被认为是无经济价值的山区，㉛ 被安全地带所封闭，能固守好几年。沙漠地区为大西洋沿岸强大的殖民据点所监视。㉜ 这种政策是自然环境力量强加给殖民国家的，因为它反映生态的和社会政治的现实。㉝ 抓住这一形势的现实

㉘ 1878年柏林会议的幕后活动使法国取得对突尼斯的全权，1906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期间法国又取得对摩洛哥的全权。

㉙ 法国无休止地抱怨在摩洛哥东南部奥拉德扎里尔和达维马尼亚遭受劫掠，这就是占领贝沙尔的借口（为欺骗法国的公众舆论），后改名为科隆。

㉚ 但法国仍坚持素丹应承认既成事实。

㉛ 直到那里（如里夫）发现丰富矿产的迹象。矿产的发现驱使西班牙人加速征服的步伐。

㉜ 因此，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授予拉基巴特人监视沙漠地区的任务，因为他们的游牧生活，使他们得以从阿德拉尔巡行到小阿特拉斯山和哈姆马达这拉。

㉝ 这点殖民主义的领导人是知道的，他们急于继承他们前辈的事业。纪尧姆将军在描绘中阿特拉斯山的绥靖战役以后，又附带叙述在同一地区伟大摩洛哥统治者穆莱·伊斯梅尔（1672-1727年）几仗战争的情形。

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现实意义被殖民主义史学家歪曲的思想意识所掩盖。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提出几个看来是中肯的问题：

（1） 为什么一定要和摩洛哥或君士坦丁堡的素丹签订正式条约使其征服合法化，同时又把征服说成为仅仅是一种“绥靖行动”？

（2） 为什么殖民者每次袭击居民都感到出其不意？

（3） 为什么殖民军如此北非化？这种军队能说是欧洲军官统率的当地人军队吗？

106 （4） 为什么抵抗运动总是出现分裂？这种分裂甚至在最大危机时也不能克服？

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有助于理解当地居民在所谓绥靖阶段所作反应的原因。

非洲人的能动性和抵抗的失败

尽管马格里布人民有坚强决心维护他们的主权和生活方式，尽管抵抗具有持久性质，到1935年整个马格里布还是落入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列强之手。那么，最后要考虑的问题是马格里布人为什么会失败。

正与可能设想的相反，人口、生态和经济条件在大部分时间里对北非抵抗战士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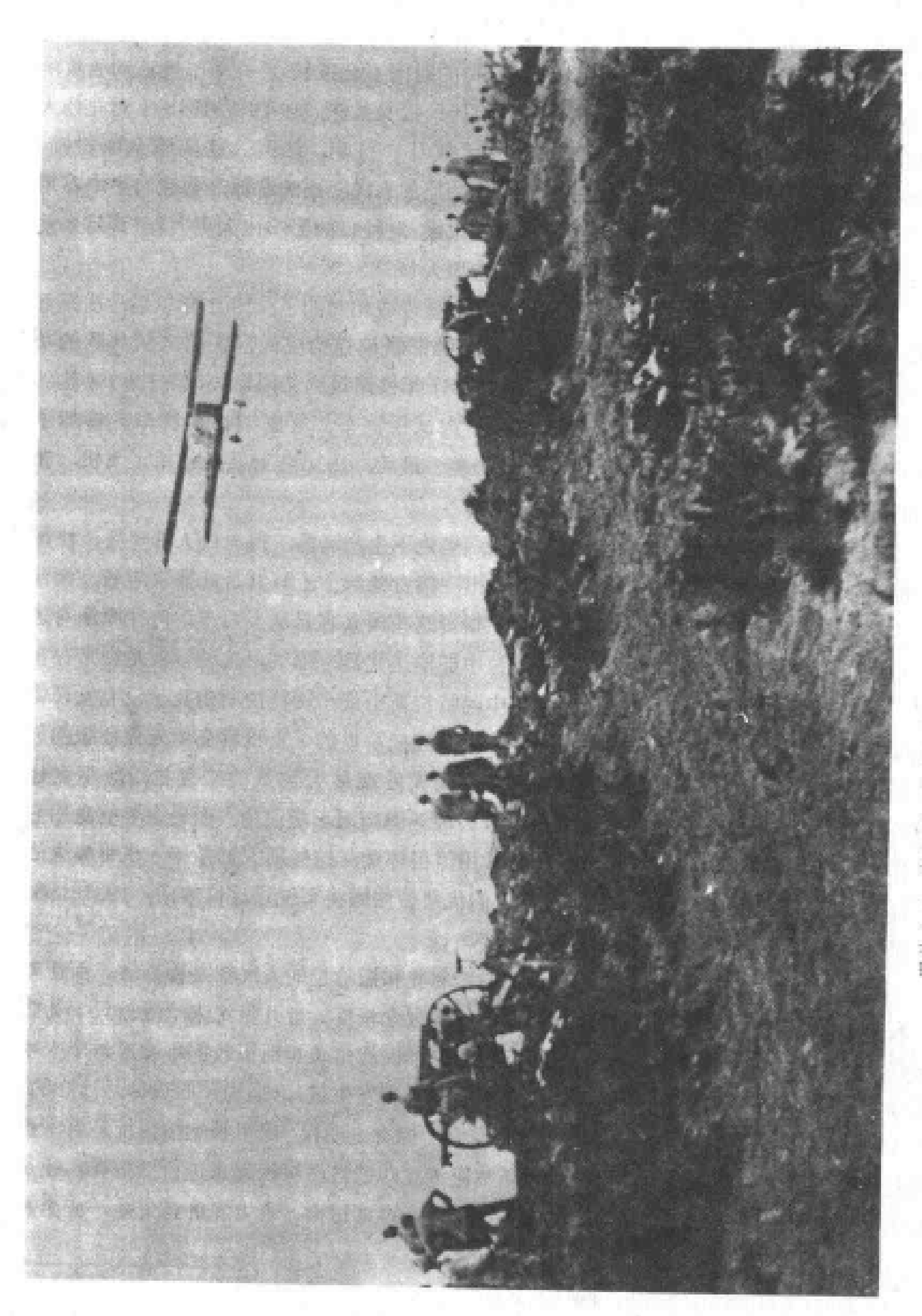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知道，人们对19世纪北非人口估计过高，实际上年龄达到能拿起武器的人数有限，而且因为农业和畜牧业的需要，他们能作战的有效时间也很短；这样就使主动权落在敌人手里。提迪凯勒特的人口不超过2万人，被1000名敌军占领。1902年5月7日，当阿哈加尔的泰拉维克人在提特战败时，他们是300个平民百姓对付130个敌人；而且这是他们能够集合起来的最多数字。结果93人战死，这对他们是不容易恢复元气的沉重打击。想象中人口密集的高地，情况好不了多少；在每次决定性战斗中，进攻的敌人都拥有数量上的优势。里夫的人民遭到法国30万军队的攻击（西班牙的军队还没计算在内），这个数字等于摩洛哥北部整个人口的总数。中阿特拉斯山在抵抗战争高潮中，总人数1万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必须面对8万敌军。在萨格鲁山7000战士受到配备最新武器的34,000敌人的攻击。[34]应该承认不是所有殖民军都是战斗人员，但无可否认，仅以人员数字来说，优势常常在殖民军一边，这种优势使“当地人恐怖和沮丧”。[35]

土著战士的灵活机动性和熟悉地形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但这些只是战术上的优势，随着战争的延长，这种优势趋于越来越不起作用。1905年6月在提吉克贾的抵抗军利用这种优势打死了和平渗透论的鼓吹者格扎维埃·科波拉尼，从而使阿德拉尔的陷落推延到107 1909年。1913年6月8日到10日的卡西巴战役，法军死亡100人，伤140人；1914年11月13日哈里战役更加激烈，法军遗尸510具，伤176人；1921年7月22日到26日的安瓦尔战役，打死西班牙军15,000人，俘虏700人，缴获来复枪2万枝、机枪400挺、野战炮150门；所有这些英雄业绩（战斗中显出令人赞赏的地形知识以及机动果断的决定性作用）在几年内确是阻止了殖民军前进，但无助于收复失地。不论是沙漠居民还是

---

[34] E. F. 戈蒂埃（Gautier），1910年，第12和129页；A. 纪尧姆，1946年，第114和414页；A. 阿亚谢（Ayache），1956年，第332页。

[35] A. 贝尔纳（Bernard）和L. N. E. 拉克鲁瓦（Lacroix），1921年，第332页。



图片5.4 摩洛哥，里夫之战，侦察机投下指示，以调整火炮射程

高地居民都不能长时间离开种植果园和饲养牲口，这种情况使入侵者有可能发动针对他们的货真价实的经济战。1909年阿德拉尔战役期间，法军在收枣季节占领一些绿洲，然后等待抵抗战士受饥饿逼迫前来投降(显然坚持的时间不会很长)。在季节性流动放牧的地区，法国人封锁冬季收场，依靠饥寒，迫使居民接受条件。在1917-1918年对扎扬人的战争中和1925-1926年对里夫人的战争中，战斗一打响，法国人就实施全面封锁。1928-1929年，意大利人(如上文已指出)把昔兰尼加人民驱逐到北部，把他们集中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地里。这种政策造成难忍的饥饿(对牲口的影响比人更大)，其后果就是战斗一结束，殖民军就能找到帮助他们的志愿人员。

抵抗战士最大的法宝——机动灵活性，不久就变成相对的了。1901年以后，法军开始使用疾走的骆驼，效果极好，以至对撒哈拉的征服被描绘成尚巴人骆驼骑兵队的功劳。[36]几乎到处都在征服前建筑铁路：例如，1887年铁路筑到艾因锡夫拉，1905年这到比沙尔，1930年又延伸到济兹。1915年第一次试用汽车，厄皮纳特运货车[37]参加了1931-1935年的战争，在阿特拉斯山路上下奔驰。最后，1920年起甚至使用了飞机，在战役中用于空中摄影以及打击居民斗志。[38]

于是，在我们的面前就提出了武器问题，当地不生产武器，得向敌人那里要。法国常常把向马格里布走私武器作为国际问题提出，指责德国、土耳其是武器供应者，而西班牙甚至英国容忍里夫海岸的武器运输，还指责这些国家容忍从大西洋沿海往摩洛哥运送武器和假道利比亚绿洲往突尼斯和撒哈拉中部输送武器。确实，这种运输是经常存在的；不过事实是法国当局自己承认他们在中阿特拉斯山或小阿特拉斯山几乎没有发现德国制造的武器。由于每个大部族在被迫投降时，都把手里的来复枪移交给未被征服的邻近部族；以致在1934年3月战争结束时，法国人发现最大数量的来复枪，数字竟达25,000枝之多。我们应当记住，这些兵器常因缺乏弹药而不能使用，而最主要的是用它们对付飞机、远距离重炮、装甲部队，其效用值得怀疑，这些新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侵略军用以装备自己的。这种武器上的优势使法国将军说过这样的话：1931-1934年的历次战役是“使用活靶子的真正演习”。[39]

109

最后的不利因素是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北非和撒哈拉的人民都是穆斯林，而伊斯兰教对人民战争立下严格的规则，与西方的一般观念相反。近几世纪来圣战被理解为防御性的：即只有在国家遭到侵略时，服兵役和交纳因战争负担而征收的税款对每个人才是强制性的。在进攻性的战争中（几世纪来北非没有发生过），捐税和服役都是自愿的。在19世纪的形势下，这种情况使入侵者在军事上拥有主动权。保卫领土按传统是君主授权契约的条款之一。在遭到攻击时，穆斯林应该立即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呢？还是必须等待素丹的命令呢？这个问题由法律博士作了详细讨论，占上风的意见是，应由君

[36] 尚巴人是阿尔及利亚泰拉山区中的游牧民族。

[37] 以一个对采矿感兴趣的在马拉喀什的法国商人的姓氏命名。

[38] 实际上是意大利在1911年殖民战争中第一个使用飞机。1921-1926年的战役中，飞机在未来的巴多格里奥元帅指挥下，在击败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的抵抗战士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39] A. 纪尧姆，1946年，第398页。

土负责，以防煽动和过分放权。这种规定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法国或西班牙士兵在某一地区出现时，当地居民派出代表觐见素丹请战，然后等待他的命令。如1864年和1890年在图瓦特，或1885年在塔尔法亚都发生过这种情况。这样就把责任交给君主，使他的处境进退维谷，因为，如果他不管，就损害他的合法权威，如果他批准这项请求，那么列强就要他对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通常他劝告人民保持冷静，委派一位酋长去维持秩序，使有关人士认为问题正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关于这点在场的许多人都深信不疑）。[40]现在我们谈到问题的核心：当素丹失败时，[41]一位宗教的或世俗的领袖感到有责任代替素丹举起圣战的旗帜，但没有他的授权，肯定得不到一致的支持，那时殖民国家可以采 **110** 取各种手段挑拨对立和仇恨。

在事实上不存在领袖的社会结构里，殖民军很容易利用分裂对抗的局面。为了充分理解这个伎俩如何施展，我们必须记住，素丹政府的管理常是间接的，他授权给当地酋长、伊斯兰教士或谢赫(教长)。当素丹本人不能领导抵抗时，各个人都马上想到如何保护自己的特权，或像一位土著事务专家所说的“见风驶舵”。[42]法国在征服图瓦特时不费力气地得到瓦赞谢里夫的帮助（这个酋长只有在法国总督准许下才能向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追随者收集捐款）；在征服欣基特时得到西迪亚和萨德布赫二个谢赫的帮助；在征服塔菲拉勒特时得到纳西里雅“扎维亚”领导人的帮助；最后在征服里夫时得到达尔卡瓦酋长的帮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意大利人把奈富塞山的伊巴迪特一家人争取到他们一边，这家人反对占国内多数的逊尼派。在一个强大酋长建立起邦国的地方，殖民当局等待出现继承权纷争，然后轮流支持争位者。这就是1901年和1904年之间在特拉扎以及1917年和1919年之间在扎扬人中发生的情况。但是，这种“土著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过多夸张。每当一个酋长倾向法国时，他立即丧失他的威信而且不再能起什么作用。到了这种地步，殖民当局最后也不再寻求公开的归顺了。

领导人投降的趋势，有力量的酋长意图妥协和耍两面手段的趋势，主要不是出自部族的不同和相互对抗，而是由于最高政治权力的消失，在最高政治权力方面连续失败，暴露了军事力量的荏弱。

历史遗留下来1900-1935年期间领导抵抗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约30位酋长的姓名，不包括穆罕默德·本·阿卜德·克里姆和阿卜杜勒·马利克在内。[43]其他酋长不管其成败如何可以分为两组明显不同的类型。

一组与素丹保持不间断的联系，为素丹服务，当殖民主义威胁出现时向素丹求助；另一组在当地“杰玛”的影响下行动。前者目光较远，但受素丹军力荏弱的不利影响。

---

[40] 19世纪君士坦丁堡素丹的地位有点不同。

[41] 他有时成功地延迟遭到征服的命运，如1890年的图瓦特；有时甚至还能收回一个地区，如1898年英国交还塔尔法亚。

[42] L. V. 朱斯蒂纳尔（Justinard），1951年，第105页。

[43] 关于阿卜杜勒·卡里姆的事迹不在这里讨论，他的事迹得在别处论述。至于阿卜杜勒·马利克，他是阿尔及利亚埃米尔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孙子，本人曾担任奥斯曼军官。他轮番为土耳其、西班牙和法国的利益服务，看来是一个冒险家。

后者行动顽强，但是他们的影响限于他们防御区的狭窄的界线内。

111 当穆莱·阿卜杜勒·哈菲兹在19世纪末起而反对其兄穆莱·阿卜杜勒·阿齐兹，并企图在被认为属于摩洛哥的整个地区重建该国主权时，他的主要支持者有如下一些人：谢赫·马艾奈恩及其子哈萨纳和阿克达夫（他们在欣基特领导抵抗），其余儿子希拜、穆拉比赫·拉布赫和尼马特（他们在法军进攻前于1912年从马拉喀什撤退，1917年退到提兹尼特，以后于1934年退到凯尔杜斯和维杰詹），以及强大的阿扎加尔酋长穆哈·乌·赛义德和穆哈·乌·哈穆（他们阻挡法军进入阿特拉斯山区直到1922年）。穆莱·阿卜杜勒·哈菲兹的企图陷于失败，主要因为地理上处于孤立地位，他们不像其他早与法国人有接触的南方酋长那样，他们没有投降。但是丧失了素丹的支持，他们不再能有效地作战。希拜于1912年自称为素丹，但没有取得城镇或者强大酋长的支援。其他人闭关自守，抵御任何外来者，每一个人都像阿哈斯的酋长迈达尼恰如其分地描写的那样，希望在看到"法国人的脸"之前死去。[44]

当地酋长与上述那些人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有些人是临时指定的，如1911年在非斯附近的穆罕默德·哈杰贾米和1919-1934年间在塔菲拉勒特的纳弗鲁坦·萨姆拉迪及其门徒纳卡迪。其他一些人则是传统上为大家公认的，如阿里·阿姆哈武什，他的儿子马基和穆尔塔达以及他的门徒伊本·塔伊比和穆汉德·乌·哈杰杰（从1919年到1934年，他在中阿特拉斯山成功地领导斗争）或1933年2、3月份在布·加菲尔进行抵抗的领导人哈苏·乌·巴萨拉姆。后一群人坚决拒绝妥协；他们抵抗失败后还继续斗争，直到被包围于高山或沙漠的隐蔽处，受密集炮火的轰击。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人在完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所表现的如此顽强的精神呢？

我们必须记住，在整个19世纪，一种鼓吹战斗到死的群众运动在兴起；但是这个运动为"乌里玛"（伊斯兰贤哲改革会）和马赫增的成员所蔑视，因为它主张乞求于超现实的神灵和相信未来的千年至福。据说，希拜和他的兄弟穆拉比赫·拉布赫在1912年9月6日布·乌思曼战役前夕，祝祷天使帮助抵抗战士。在1922年6月26日战斗时，还提到塔费萨塞特的凯尔库尔神石，据说在神石脚下殖民军会受到巨大灾变的痛苦而停止前

112 进。[45]这是引导大多数无文化人民的酋长和教士的自然信仰；但城市上层人士必然视之为危害，因为这种态度是原始的和非现实的。改良主义运动先驱之一阿布·舒艾卜·杜卡利对这种抵抗提出很恰当的批评，他谈到希拜的行动时说道："我反对给欧洲人占领穆斯林土地以口实的抵抗战士们，如布·阿马马以及沙维亚和贝尼·马提尔的酋长们和无数东方和西方的人们。"[46]

---

[44] M. 苏西（al-Susi），1961年，第20卷，第202页。

[45] A. 纪尧姆，1946年，第219-220页。关于希拜的事迹，见伊本·易卜拉欣的《远征》手稿K. 320（拉巴特档案馆），第16页。

[46] 伊本·易卜拉欣（Ibn Ibrāhīm），《远征》第13页、30-35页。布·阿马马于1880年和1885年之间，在菲吉格附近与法军作战；布·希马拉起来反对素丹穆莱·阿卜杜勒·阿齐兹（后者被谴责为亲欧分子），并领导从1902到1909年的叛乱；在沙维亚，穆罕默德·布·阿扎维从1907到1909年领导一支抵抗军；在贝尼·马提尔，阿卡·布·比德马尼从1911到1913年为抵抗入侵军而奋斗。

正如殖民政策有两个阶段，抵抗有两种方式一样，也有两组完全不同的抵抗运动领袖。城市上层人士集中注意力于征服和占领问题，那种由相信千年至福必然到来的酋长和伊斯兰教士领导的顽强而分散的抵抗运动就不合他们的口味；我们发觉那种抵抗运动有如下特征：

（1） 他们同历史上的上层精英不发生任何关系，后者懂得殖民军和土著战士真正的力量对比；

（2） 他们期待奇迹出现，祈望以此逃避殖民主义者的征服；

（3） 他们由于流离失所、饥饿和互不信任而不团结和分散。

（4） 他们拒绝接受战败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这些特征使这个阶段从根本上不同于第一阶段时的抵抗运动，也就是与有组织国家发动的政治战争不同，而民族主义者把有组织国家的目的作为自己的目的。因此，难以回答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这种分散、局部的抵抗看作是民族主义的早期形式。

这种抵抗本身，被认为是原始和无效的，历史上的领导人任其自生自灭。但是在它最终失败之后，为了抵抗事业的缘故，它又立即被人们有选择地永远牢记。其理由是民族主义者歌颂成功的战斗，永远纪念宁死不屈的酋长，而忘掉活下来成为欧洲官员爪牙的那些酋长，即使他们在投降前也曾进行过猛烈的抵抗。

这种抵抗至少在某种程度可以作为美好的传说流传民间以激励他人。塔齐克祖特和布·加菲尔的历次战役以及穆哈·乌·哈穆、纳卡迪这样一些人物，使得民族主义者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在压倒优势力量面前投降，是不是真的投降。在征服顺利的时候大谈其和平渗透的殖民主义将军们，于1926年以后又回到比若所宣扬的观点，即敌人必须彻底摧毁，征服北非需要许许多多军队，占有北非也同样需要许许多多军队。[47] 113

这等于说，“征服人心”是永无可能的！

（吴壬林译）

[47] 据G. 斯皮尔曼（Spillmann）报道，1924年底利奥泰曾说：“有些人显然敢于主张，只有血洗一个部落，才能使其真正屈服。”见G. 斯皮尔曼，1968年，第60页。西班牙人的态度常常带有令人不愉快的十字军气味，一种憎恨与害怕的混合物。1921年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沃尔皮谈到血腥的政策。



西非非洲人的能动性和抵抗 1880-1914 年

姆巴耶·盖耶；A.阿杜·博亨

114 在 1880-1914 年期间，除利比里亚一国外（见第 2 章），整个西非都处在殖民统治之下。这种情况基本上意味着非洲人的主权、独立和土地已经全部丧失殆尽。这种现象是分两个阶段来到的。第一阶段从 1880 年到 20 世纪初，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初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个阶段，欧洲人的活动各不相同，随之产生的非洲人能动性和反应也同样各不相同。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反应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洲当地的形势。可变因素包括政治实体的性质（是不是中央集权，是不是被别的非洲国家所控制，以及是在上升阶段呢，还是在停顿或衰落阶段）；[①] 它建立的领导体制的性质；到 19 世纪 70 年代时欧洲政治、宗教和经济势力的渗透程度和由此获得的经验的深度。其他同样重要的可变因素是 1880 年到 1914 年间欧洲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地区建立它们统治时所采取的方法。

在第一阶段，欧洲人或是使用外交手段或是使用军事入侵，或是两者兼而用之。这是一个采用传统手段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西非几乎每一角落都先是签订条约，在大多数情况下下一步跟着的是由规模不同、纪律不同的军队进行军事侵略、征服和占领。1880 年到 1900 年期间是欧洲人征服和占领西非的高潮时期。在这个大陆已知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见到如此之多的军事行动和对非洲国家和社会发动如此之多的入侵和战争（见插图 6.1）。特别令人难忘的是 1880 年和 1898 年间法国在西部苏丹、科特迪瓦和达荷美（今贝宁）发动的战争，和英国在 1895 到 1903 年间在阿散蒂（今加纳）、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带（尼日利亚）和北部尼日利亚发动的战争（见插图 6.2）。

117 在第一阶段期间，实际上全体非洲人都有同一目的，即保卫他们的主权和传统生活方式。只是采用的战略或方法不同。在非洲人面前有三种抉择：一是对抗、一是结盟、另一是默认或屈服。对抗的战略又包含公开战争、围攻、游击战术、焦土政策以及外交手段。从下文可以看出，往往这三种选择都要采取。虽然欧洲有三个主要国家与西非的征服和占领有关，在本章，我们只述及其中两个，即英国和法国。

① A. S. 卡尼亚-福斯特纳（Kanya-Forstner），见M. 克劳德（Crowder）编，1971 年，第 7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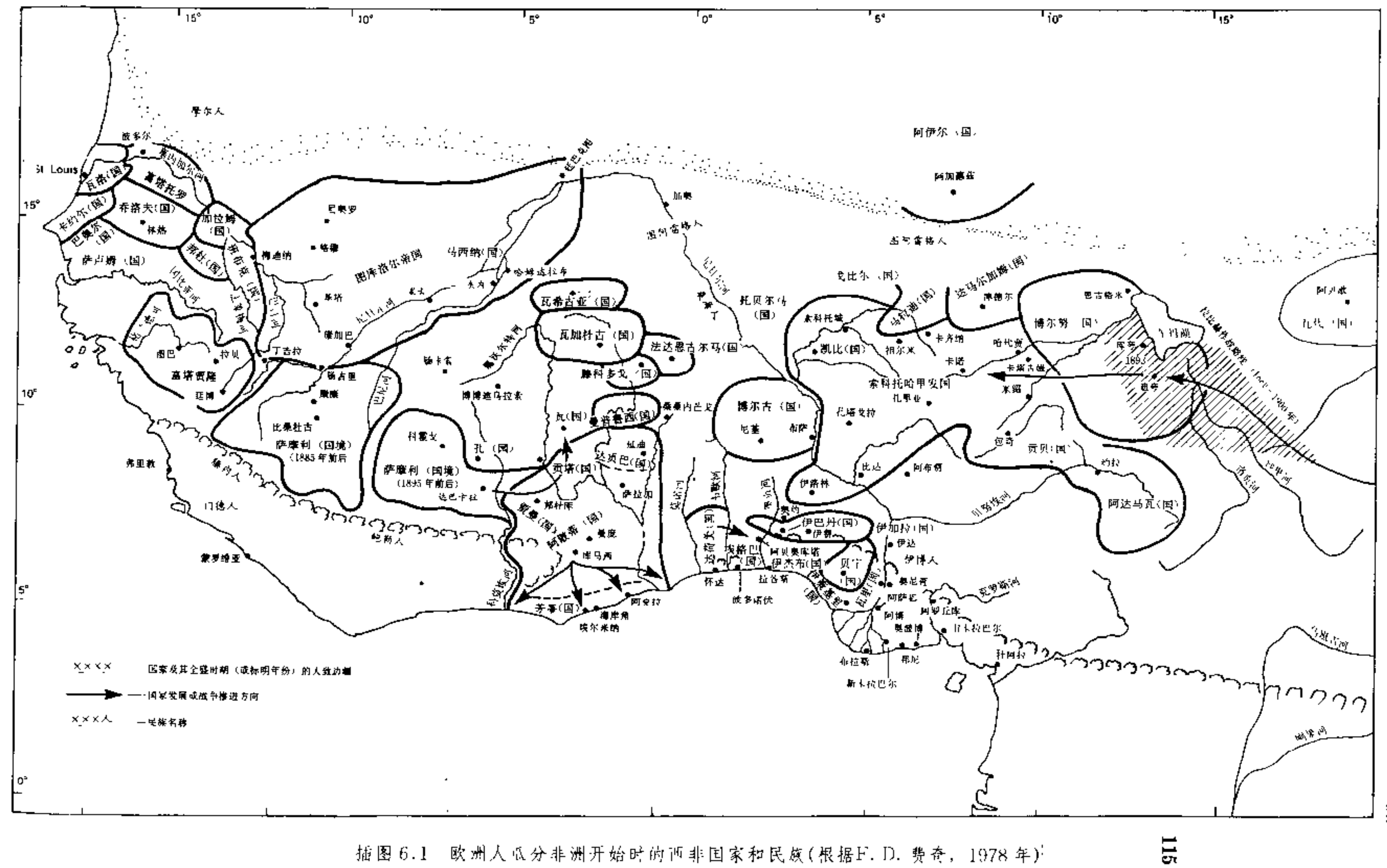


插图 6.1 欧洲人瓜分非洲开始时的西非国家和民族（根据F. D. 费奇，1978 年）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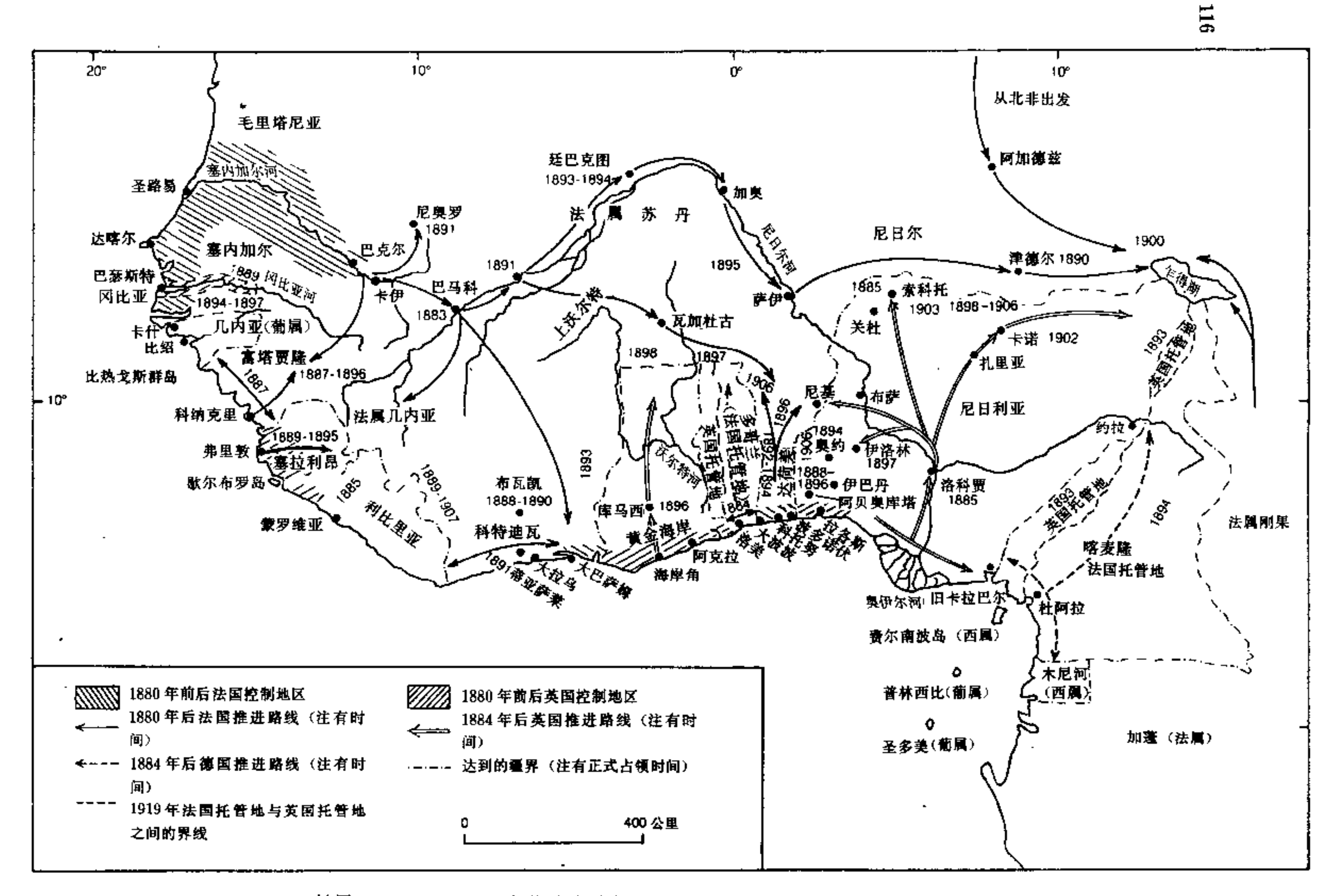


插图6.2 1880-1919年前后欧洲人向西非推进情况（根据F.D.费奇，1978年）

法属西非被征服和对此的反应，1880-1900 年

从现有的材料看，事实是一清二楚的，法国人从 1880 年以来就对整个地区采取不断扩大控制的政策，从塞内加尔开始，先到尼日尔，而后到乍得，逐步把这些地区和他们在几内亚湾沿岸科特迪瓦和达荷美所占据点连接起来。这一政策委托给在塞内加尔地区的法国官员去执行。因此人们可以预料到，在占领西非时，法国几乎完全依赖军事征服的办法，而不像英国人那样采取缔结保护国条约的方法。至于非洲人的反应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办法只有屈服、结盟和对抗。从下文我们知道，大部分统治者选择的是军事对抗，而没有选择屈服和结盟的策略，这里的反抗比西非其他地区更为持久，其原因有二：第一，如上文所指出，法国几乎只使用军事征服的方法，因此也就激起军事反抗。第二，这里的人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比其他西非各地更多，正如迈克尔·克劳德所指出，"对西非穆斯林社会来说，实行白人统治，意味着向异教徒屈服，这对任何一个好样的穆斯林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② 他们往往以更大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来抗击欧洲人，这种精神在非穆斯林中往往是没有的。让我们认真研究塞内冈比亚、图库洛尔帝国和曼丁哥帝国发生的事件和科特迪瓦的鲍勒人地区和达荷美发生的事件，来证实这一带普遍性的结论。

塞内冈比亚

法国从 1854 年起就开始在塞内加尔进行征服，到 1880 年法国并吞了卡约尔和迪安德北部的瓦洛，得到巩固的作战基地。从 1860 年起，上塞内加尔沦为法国的保护地。不管这些成果如何微不足道，但法国人得之决非容易。卡约尔的达梅尔拉特·迪奥尔·迪奥普虽然在 1864 年被法国从卡约尔逐出，但是他选择对抗的策略，继续与法军奋战。1871 年，普鲁士打败法国，塞内加尔总督不得不放弃兼并卡约尔的企图，并再次承认拉特·迪奥尔·迪奥普为达梅尔。此后，他与塞内加尔的法国当局建立起友好关系。 118

1879 年，法国总督布里埃尔·德·伊斯尔在取得达梅尔的同意后，决定建筑一条连接达喀尔到圣路易的道路。但当 1881 年拉特·迪奥尔·迪奥普得知这实际是一条铁路时，他宣告反对这项规划。他理解铁路将使卡约尔丧失独立。1881 年，他得知铁路即将动工，就采取阻止的步骤。他向全体酋长发布命令，任何卡约尔的人民不得向法国工人提供任何物品，违者严惩。③ 以后他又派遣密使觐见特拉扎的埃米尔埃利、富塔托罗的阿卜杜勒·博卡尔·卡奈和卓洛夫的阿尔布里·恩迪耶。拉特·迪奥尔·迪奥普邀请他们参加神圣同盟，协调斗争步骤，以把法国人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赶走。④

1882 年 11 月 17 日他给总督塞尔瓦蒂尤斯一函，禁止他动工筑路，即使在卡约尔领

② M. 克劳德，1968 年，第 72 页；A. S. 卡尼亚-福斯特纳，见 M. 克劳德编，1971 年，第 53-54 页。
③ ANSOM——总督朗诺致部长函——塞内加尔I，466，1881 年 5 月 24 日。
④ ANSOM——总督瓦隆致部长函——塞内加尔I，67 b，1882 年 7 月 23 日。

上的外围也不允许，因为那也是卡约尔整体的一部分。他在函中写道，“可以充分肯定，只要我活着，我将全力以赴反对建筑这条铁路……马匹和长矛的景象对我们说是悦目的。那就是为什么我每次接到你提到铁路的来信，我总是回答一个‘不’字，我决不会有其他的答复。即使我死去，我的马——马莱也会给你们同样的答复。”⑤没有东西比这封信更能驳斥有些人的观点了，他们认为拉特·迪奥尔·迪奥普在铁路问题上的立场只是封建酋长的任性，除任性外，他没有顾及他的人民的福利。情况就是这样，当他注意到总督坚持执行筑路计划时，拉特·迪奥尔·迪奥普禁止他的人民种植块根植物。他深信，倘若法国人得不到块根植物，他们就会回家去。他还命令住在法国据点附近的人迁往卡约尔腹地居住。凡不服从这些命令的村庄则被焚毁，财产被没收。

1882年12月，法国陆军上校旺德兰入侵卡约尔，他率领的主要是从兼并领土召募来的非洲来复枪兵和辅助兵组成的远征纵队。拉特·迪奥尔·迪奥普从1861年起就和法军打仗，他懂得在常规战争中很难打败法国人。他在旺德兰部队到达时撤退，并在卓洛夫驻扎下来。在卡约尔，旺德兰将权力授予拉特·迪奥尔·迪奥普的堂弟桑巴·亚亚·法尔。1883年8月，此人被撤职，由拉特·迪奥尔·迪奥普的侄子桑巴·劳贝·法尔代替其职位。法国总督确信拉特·迪奥尔·迪奥普决不会同他的侄子作战。总督这次估计对了，拉特·迪奥尔·迪奥普设法同他的亲戚妥协，这个亲戚在1885年批准他返回卡约尔。

1886年10月桑巴·劳贝·法尔在蒂瓦万被阿尔及利亚骑兵支队杀死。总督热努耶随即作出决定废止达梅尔的称号，他把卡约尔分为六个省，委托前王室战俘统治，⑥并通过法令将拉特·迪奥尔·迪奥普赶出卡约尔。当拉特·迪奥尔·迪奥普接到这一处分通知时，他狂怒之极。他动员300名坚决支持者（这些人仍忠于他，凡不能与他同死者都让他们解除誓言）起而与法国及其同盟者（他先前的臣民）作战。拉特·迪奥尔·迪奥普下定决心在死前要索取高昂代价，因此他伪装服从放逐出境的命令，出发前往卓洛夫。途中，他突然大胆折回，设法不使人察觉偷偷地潜入敌人与铁道之间的阵地。1886年10月27日上午11时左右，他突然袭击代赫尔泉的法国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使对方遭到重大伤亡。他倒在那里，他的两个儿子和80位坚决支持者也同时战死。⑦拉特·迪奥尔·迪奥普的死自然意味着卡约尔独立的结束，加快法国占领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

图库洛尔帝国

在图库洛尔帝国（见插图6.1），阿赫马杜继承他父亲帝国创建者哈杰·乌马尔统治这块土地。他像其他大部分非洲统治者一样，决心保卫国家生存并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选择结盟和军事对抗两者兼而有之的策略。然而，他不同于这个地区的其他统治者，他更依靠前者，较少依靠后者。确实，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从他就位到1890年，他一直坚持与法国结盟或合作的政策，只是到了最后二年，才依靠

⑤ ASAOF——拉特·迪奥尔·迪奥普致总督函——塞内加尔 I，68 b，1883年1月8日。
⑥ ANSOM——热努耶致部长函——塞内加尔 I，86 a，1886年11月13日。
⑦ 同上。

战争。

不过阿赫马杜选择这种政策，并不使我们诧异，因为他面对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使他没有办法作任何其他选择。政治上，从他一开始掌权起，就被迫进行三条战线的斗争：他得对付觊觎他权力的自家兄弟；他的藩属——班巴拉人、曼丁卡人、富拉尼人及其他人，他们憎恨图库洛尔的新统治者，设法以武力恢复独立；以及反对法国人。使他的困境变得更加恶化的原因不只是他父亲用以创立帝国的军队人数大减，到 1866 年只有 4000 塔利贝（talibés）（组成乌马尔军队骨干的宗教学生）和 11,000 苏法（sofas）（步兵），[8] 而且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控制军队和鼓舞士气的力量。因而人们可以想象，阿赫马杜当时刻不容缓的和最最关心的是对付他的兄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确，1872 年他的几个兄弟试图推翻他），然后镇压在藩属中普遍存在的叛乱（特别是班巴拉人）以保持他的帝国。要这样做，他需要武器弹药以及通过贸易取得财政资源，二者都需要同法国人保持友好关系。此外，大部分塔利贝招自他父亲故乡富塔托罗，由于这个地区在法国人的统治之下，他得争取法国的合作。像他这样面临所有这些内部问题的人，在他就位后立即就同意与法国谈判还值得惊奇吗？谈判由他和法国代表马热中尉举行。双方同意，法国供给大炮并承认他的权威，而阿赫马杜则允许法国商人在他的帝国境内经营商务。[9]

120

尽管这项条约未经法国政府批准，阿赫马杜也没有得到大炮，尽管法国继续支援叛乱者，甚至在 1878 年攻打图库洛尔帝国在瓜索的要塞萨布西尔，阿赫马杜还是继续对法国持友好的态度。这样做对他有利，使他能在 1874 年平息他兄弟们的叛乱，并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平定班巴拉境内塞古和卡尔塔的叛乱。因此当法国准备征服塞内加尔和尼日尔之间地区需要阿赫马杜的合作，于 1880 年重提再次谈判的要求时，他欣然同意。这些谈判最后由加利埃尼上尉完成，导致同法国人签订了芒戈条约。该条约规定，阿赫马杜允许法国人建筑和维持通过他的帝国的商路，并允许法国在尼日尔河上建造和通行汽船。作为回报，法国承认帝国的主权，同意让他自由进入富塔，并许诺不入侵他的领土或在他领土上建设堡垒。最主要的是法国同意有代价的给他 4 门野战炮和 1,000 支来复枪，并每年给予租金：200 枝来复枪，200 桶火药，200 发大炮炮弹和 5 万颗燧石。[10]

这项条约对阿赫马杜来说显然是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如果法国批准并忠诚地履行条约各款，无疑阿赫马杜的帝国本来是可以生存下来的。但是，当然，即使是加利埃尼本人也没有履行条约的意向，而且无论如何他的政府不会批准这项条约。在以博尔尼-德博尔德中校为首的新上塞内加尔军事司令部指挥下，法军在 1881 年开始入侵帝国，到 1883 年 2 月他们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尼日尔河畔的巴马科。甚至到了 1884 年，图库洛尔也并没有在尼日尔河上攻打航行中的炮艇。阿赫马杜唯一的反应是禁止人民向法国人出售任何物品。[11] 1884 年，他带领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溯尼日尔河而上向巴马科进

121

⑧ A. S. 卡尼亚-福斯特纳，见M.克劳德编，1971 年，第 61 页。

⑨ 同上，第 63-64 页。

⑩ 同上，第 65 页。

⑪ Y. 圣-马丁（Saint-Martin），1972 年，第 301 页。

发。然而出乎众人意外，他突然转向卡尔塔，既不攻打也不威胁法国脆弱的交通线，而是包围卡尔塔的首府尼奥罗，其目的是废黜他兄弟蒙塔加。他认为这个国王对中央政权过分独立了。[12]

阿赫马杜不去攻打法国而去攻打他的兄弟的理由很明显，实际上接近巴马科的贝莱杜古地区的班巴拉人当时仍在叛乱中，他仍然不能全部控制自己的领土，他仍然需要法国人的支持，这点肯定是1881-1883年间他对法国入侵所作反应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包围尼奥罗这一军事行动进一步耗尽他的军力，他需要法国人合作也就更加迫切。在法国人方面也极其希望和阿赫马杜结盟。因为1885和1888年之间，法国人忙于镇压索宁克人的首领马马杜·拉米内的叛乱，因此他们急于防止索宁克人与阿赫马杜结盟。以后，虽然阿赫马杜知道法国仍在援助班巴拉的叛乱，不管怎样，他还是同意在1887年5月12日缔结另一个条约，这就是戈里条约。条约规定，阿赫马杜同意他的帝国名义上由法国保护，而法国方面向他保证不入侵他的领土，并撤销对阿赫马杜购买军火的禁令。

然而到1888年，法国人平定了拉米内的叛乱，以后，如下文所述，他们又同萨摩利缔结一个条约，因此不再需要和阿赫马杜结盟了。这一点加上法国军事统帅部的侵略成性，导致他们于1889年2月对阿赫马杜的进攻，他们攻打图库洛尔的孔迪恩要塞，“这个要塞是锡吉里至丁古拉道路上令人烦恼的障碍。”[13] 这次军事行动没有以预期的速度结束。这个要塞用石砌双重围墙筑成，非常坚固，为了防止大火迅速蔓延，战士们把碉堡盖顶的茅草挪去。阿尔希纳尔使用80毫米口径的山炮连续8小时的密集轰击才轰开围墙，图库洛尔士兵坚决顶住像洪水般倾泻的炮火，勇猛地抵抗法军，以不断的旧式步枪射击抵挡敌人的炮击，接着进行逐屋战斗，许多士兵紧握他们的武器而阵亡。[14]

122

阿赫马杜受内部困难缠绕，于是把斗争引向宗教方面。他呼吁帝国所有的穆斯林为捍卫信仰拿起武器。求援信派人送往卓洛夫、毛里塔尼亚和富塔。[15] 这些步骤都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阿尔希纳尔在小心准备和得到充分武器后（包括两门95毫米的野战炮和100发最新的麦宁炮弹），[16] 于1890年4月占领帝国的首都。从那里出发，他进军攻打忠于阿赫马杜的班巴拉人守卫的韦塞布古堡垒。守军全部在战斗中牺牲，而进攻者也遭到严重的伤亡。27个欧洲人中2人被杀，8人受伤，13名非洲兵被杀，876名受伤。从那里出发，阿尔希纳尔在打败图库洛尔人对他的抵抗后进一步攻占科尼亚卡里。由于面对图库洛尔要塞守军的顽强抵抗，阿尔希纳尔宣布停止攻击，并要求阿赫马杜投降，让他作为平民定居于丁古拉村。

直到这个时候，阿赫马杜才放弃使用外交手段主张使用军事行动。1890年6月，他的部队攻打塔拉里的铁路，在卡耶斯和巴富拉贝之间同法军进行多次小规模的战斗。其中一次，法军125人中死伤43人。9月份，乘科尼亚卡里被洪水围困之际，他们企图重

[12] Y. 圣 马丁，1972年，第316页。
[13] 同上，第379页。
[14] 同上，第381页。
[15] 同上，第390页。
[16] A. S. 卡尼亚-福斯特纳，见M.克劳德编，1971年，第69页。

新占领该地，但没有成功。[17]

然而阿赫马杜也准备保卫尼奥罗。他分兵四路，主力集中在尼奥罗周围，由班巴拉将军巴菲和卓洛夫原来的国王阿尔布里·恩迪耶任指挥。[18] 1890 年 12 月 23 日，巴西鲁的部队由于法军使用 80 毫米和 95 毫米口径的大炮轰击而溃败。1891 年 1 月 1 日，阿尔希纳尔进占了尼奥罗。阿尔布里·恩迪耶于 1891 年 1 月 3 日试图夺回尼奥罗，因图库洛尔部队被击溃也告失败。素丹有3000余人战死或被俘。他本人退往马西纳，在科里科里恶战后又离开马西纳。甚至在豪萨领土上流亡期间，他仍对法国人保持“不妥协的独立”态度。[19]

萨摩利和法国人

123

萨摩利·杜尔不同于阿赫马杜，他选择对抗策略，而不是结盟策略，虽然他既用外交手段也使用军事作战，但重点放在后者。1881 年时，萨摩利已经在如今的塞拉利昂的北部和科特迪瓦的萨桑德拉河之间“沿西非大森林地带的苏丹大草原南部”建立起了他具有绝对权威的单一帝国[20]（见插图 6.1）。与图库洛尔帝国不同，曼丁哥帝国在 1882 年萨摩利与法国发生第一次战争时仍处于上升阶段，法国对这一地域进行征服，也使萨摩利能够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装备有相对说来比较优良的欧洲武器。这支军队分为两翼：步兵翼在 1887 年人数达到 3 万至 3.5 万人；骑兵翼在 1887 年人数不超过 3000 人。步兵以 10-20 人为一固定单位，叫做“脚”或“堆”，由一位头领指挥，10 个“脚”组成一个“臂”，由一个“博洛肯蒂吉”(Bolokuntigi)指挥。[21] 骑兵 50 人为队，称为“塞雷”。“臂”是主攻力量，而“塞雷”在“臂”的周围奔驰。因为所有上述单位都是固定性的，它的成员首先在相互间产生友谊，并具有先对地方领袖，而后对萨摩利的忠诚。这样，这支军队“由于具有显著的和谐一致”，很快表现出“一种类似国家的性质”。[22] 但是萨摩利军队与众不同的特点还在于它的武器和训练。它与西非大部分军队不同，这支部队实际上是职业性的，而且它是由萨摩利亲自装备起来的。在 1876 年以前，他以旧式枪枝武装他们，这类枪枝当地铁匠随时都能修理。1876 年以后，他开始订购现代化的欧洲武器，主要从塞拉利昂购买，他认真地研究这些枪枝，选购其中最适合这个地区使用的品种。这样从 1885 年起，他不再使用后膛快枪，因为这种枪枝弹药筒大，在潮湿环境下很快就锈坏，而改用弹药筒较轻的格拉斯步枪和克罗帕茨切克斯步枪，后者是能连续发射的格拉斯步枪。他继续依靠这些类型的枪枝一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训练出一批能有效地仿制这类武器的铁匠。从 1888 年开始，他仿制速射枪，到 1893 年时他已拥有 6000 枝这种枪枝，一直使用到 1898 年他被打败。可是，他从没有得到过大炮，这

---

[17] A. S. 卡尼亚-福斯特纳，见M. 克劳德编，1971 年，第 70 页。

[18] 同上，第 73 页。

[19] Y. 圣-马丁，1972 年，第 427 页。

[20] 萨摩利生平和活动的详细研究，见 Y. 佩尔松（Person），1968-1975 年。

[21] Y. 佩尔松，见 M. 克劳德编，1971 年，第 121-126 页。

[22] 同上，第 121-122 页。

124

图片 6.1 萨摩利·杜尔(1830 年前后-1900 年),1898 年 9 月被古罗上校(右第一人)的部队俘虏后的情景

点使他的反法战争受到很大阻碍。他购置军火的经费来自出售象牙和从南部布雷地区古老中世纪金矿中开采出来的黄金，也有在萨赫勒和莫西地区用奴隶换马匹的交易中获得的钱款。总之，这支军队不仅有良好的装备而且有良好的训练和纪律，它还具有高度的团结精神和和谐一致。

很显然，1882 年萨摩利第一次同法国人接触时，他的权力实际上正处于高峰。同年 2 月，法国的阿拉卜默萨中尉拜访萨摩利，通知他上塞内加尔-尼日尔司令部的命令，要他从凯尼耶兰撤退，该地是萨摩利去曼丁哥地区必经的一个重要市场中心。正如人们预料，萨摩利严词拒绝了。这导致博尔尼-德博尔德对他的军队的袭击。不过攻击者遇到沉重打击，不得不仓惶退却。萨摩利的兄弟凯梅-布雷马在 4 月间攻打巴马科附近韦尼亚科的法军。虽然他在 4 月 2 日的战斗中获得胜利，但在 4 月 12 日却被一支人数很少的法军打败。鉴此，萨摩利设法避免同法军作战，而把他的行动转向凯内杜古。 125

1885 年，当孔布占领了对萨摩利帝国经济十分重要的金矿产地布雷时，萨摩利意识到，他的国家已面临巨大的威胁。他决心用武力把法国人从这个地区驱逐出去。他用三支军队——他自己的部队、凯梅和马萨拉-马马迪的部队，承担这次军事行动。他们采用大钳形作战。布雷很容易就被夺了回来，而法军怕被包围急忙拔营而退。在这种情况下，萨摩利决定与在塞拉利昂的英国人修好。1884 年占领法拉巴后，他派使者去弗里敦，向英国总督提出，要求把他的整个国家置于英国政府保护之下。从萨摩利方面来说，这个建议仅仅是一种策略，他的意图决不是放弃他的主权，而是通过同一个强国结成同盟，使法国人尊重他的主权。[23]

当这项建议失败时，萨摩利转向法国人，于 1886 年 3 月 28 日同他们签订一个条约。他同意将他的军队撤至尼日尔河的右岸，但保留他在布雷和在康加巴的曼丁哥的权利。[24]他同法国人于 1887 年 3 月 25 日又签订另一项条约，修改上年条约的内容，萨摩利把尼日尔河的左岸割让给法国人，甚至同意把他的国家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萨摩利签署第二个条约，很可能是希望法国协助他反对提耶巴（锡卡索的法玛），他于 1887 年 4 月以整整 1.2 万人的部队攻击此人；而法国签订条约的目的在于他们要阻止萨摩利和当时正与法国交战的马马杜-拉米内结盟。当萨摩利发觉法国的行动不是作为盟国支助他，反而鼓励新近向他降服地区的背离者和反叛者，并企图阻止他从塞拉利昂取得军火的供应时，他于 1888 年 8 月撤围，并准备拿起武器抵抗入侵者。[25]他重整军队，于 1890 年 5 月与塞拉利昂的英国人签订条约，使他能够在今后三年中逐步增加购买现代化武器的数量，并以欧洲方式训练他的军队，建立排与连。他采取军事防御策略。当然，使用堡垒作为掩护是肯定的，因为他没有可能抵挡得住大炮。他的战略是使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性，这样他们就能随时袭击敌人，给敌人以重创，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26] 126

---

[23] J. D.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见 L. H. 甘恩（Gann）和P. 杜伊格南（Duignan）合编，1969 年，第 207-208 页。

[24] 同上，第 208 页。

[25] 同上，第 209 页。

[26] Y. 佩尔松，见 M. 克劳德编，1971 年，第 134 页。

1890年3月，阿尔希纳尔占领塞古，他企图在把上塞内加尔—尼日尔的指挥权交给恩贝尔之前打败萨摩利，所以他于1891年3月发动进攻。在阿尔希纳尔想来，萨摩利的帝国在首次遭受攻击之时就会崩溃。虽然这次攻击于4月7日占领康康，烧毁了比桑杜古，但其效果恰恰相反，因为这次攻击不但为萨摩利提供了有益的警告，而且又使他能继续向康康法军进攻，并在1891年9月3日达巴杜古战役中打败法军。

最后，萨摩利和法国人之间的大战在1892年终于爆发了。恩贝尔决心要打败萨摩利，于1892年1月率领1300名精心挑选的步枪兵和3000名运输工进攻帝国的中部。萨摩利亲自指挥经他仔细挑选的2500名士兵迎战恩贝尔。虽然，引用伊夫斯·佩尔松的话说，这些士兵"像凶煞神那样战斗，一路上勇猛坚守每一个防御据点"。㉗他们还是战败了，恩贝尔成功地夺取了比桑杜古、萨南科罗和凯尔瓦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恩贝尔本人也承认，同他遭受的沉重损失相比较，战果是十分有限的。此外，萨摩利下令在法军接近时，撤退平民。

但是萨摩利不抱幻想。在与恩贝尔的军队激烈战斗中，他丧失精良的部队1000多人，而法国人仅损失约100人，这使他深信与法国人打仗得不偿失。在他面前有两种抉择：或者投降或者撤退。他排除前者，决心放弃家园，往东迁到欧洲人达不到的地方建立新的帝国。他继续执行焦土政策，同时开始向邦达马河和科莫埃河方向东迁。虽然到1894年他丧失了供应他现代武器的最后通道——通向蒙罗维亚的通道。但他仍旧继续战斗。1895年初，他遭遇并击退来自鲍勒人国家由蒙泰伊指挥的一支法军。1895年7月到1896年1月间他继续征服阿布龙（吉亚曼）王国和贡贾的西部。那时，他已成功地在科特迪瓦内地和阿散蒂建立起新帝国（见插图6.1）。㉘1897年3月，萨摩利的儿子萨兰肯伊—莫里在瓦城附近遭遇并击败由亨德森指挥的一支英国部队，同时萨摩利本人在1897年5月攻打并摧毁了孔城，并向博博挺进，在那里他遭遇由科德雷利尔率领的一支法国部队。

他被夹在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在试图将英国人所觊觎的布纳的领土归还给法国以离间两国的策略失败后，他决定回到在利比里亚的托马盟国那里去。在途中他于1898年9月29日遭到古罗率领法军的袭击，在盖莱摩地方被俘，并被放逐到加蓬，1900年在该地逝世。他的被俘结束了一位现代学者所描述的"法国征服苏丹史中对单一敌人历时最久的一连串的战斗。"㉙

达荷美

达荷美（阿波美）的国王贝汉津像萨摩利一样，在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时选择了对抗的战略。㉚当19世纪的最后10年，法国宣布阿波美的属国波多诺伏为保护国时，直接的冲突发生了。法国这一行动对阿波美的经济利益是严重的打击。1889年，王储孔多上

㉗ Y. 佩尔松，见M. 克劳德编，1971年，第135页。

㉘ 同上，第136页。

㉙ T. C. 韦斯克尔（Weiskel），1980年，第99-102页。

㉚ D. 罗斯（Ross），见M. 克劳德编，1971年，第144页。

子通知南方河流总督巴约尔说，丰族人决不接受这种局面。1890 年 2 月，巴约尔下令占领科托努，并逮捕城内丰族人中的知名人士。孔多王子已在 1889 年 12 月以贝汉津国王的名义开始执政，他动员军队对法国人这一行动作出反应。那时，阿波美有一支常备军，在平时也有 4000 名男女战士。在战争时期，服兵役对全体男子是强制性的，由"亚马孙"支助，"亚马孙"就是令人畏惧的女战士。

每当黄昏时刻法国要塞就遭到攻击，同一时间，派遣到波多诺伏地区的一部分军队开始毁坏棕榈树，根据贝汉津说，那些经济上的反措施很快促使法国人要求和平。10 月 3 日，多热尔神父带了和平建议来到阿波美。条件是阿波美承认科托努为法国所有，并承认法国人在那里有权征收关税和常驻卫戍部队，作为回报，法国人将付给贝汉津每年 2 万法郎。国王接受这些条款，并在 1890 年 10 月 3 日签订条约。为了保卫国家的其余领土， 128 国王开始使他的军队现代化。在 1891 年 1 月到 1892 年 8 月期间，他向设在洛美的德国公司购买"1700 支速射来复枪、6 门各种不同口径的克虏伯加农炮、5 挺机关枪、40 万各种各样的弹药筒和大批枪弹和炮弹"。[31]

法国人下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征服达荷美。1892 年 3 月 27 日，法国波多诺伏的驻扎官乘炮舰"黄玉"号向韦默河上游旅行途中，遭到几个丰族士兵的射击。于是，法国人便找到了必要的借口。塞内加尔-法国混血种多兹上校受命处理此事，他于 1892 年 5 月来到科托努。法国人在波多诺伏集合了 2000 名军队，那里成了军事行动的中心。多兹把他的部队溯韦默河而上，10 月 4 日开始向阿波美进军。丰族人统一调动他们三个师约达 1.2 万人，部署在韦默河与阿波美之间抵抗入侵的法军。然而，丰族人军队的全部努力，如使用拂晓突击、出其不意的突袭、据点防御、骚扰入侵法军和其他种种游击战术的传统方法都不能奏效，无法阻止法军前进，更不用说要把法军击退，丰族人遭到严重伤亡，丰族人的损失据估计死亡 2000 名（包括几乎全部女战士）和受伤 3000 名，而法国损失只有 10 名军官和 67 名士兵。[32] 然而使丰族人军事计划受最严重扰乱的是多兹军队释放的约鲁巴奴隶毁坏庄稼的收获。阿波美面临着尖锐的粮食供应问题。为了不致饿死，有些战士回家寻找粮食并保卫他们的村庄，因为这些村庄正受到释放了的奴隶的掠夺。

随着丰族军队瓦解，不须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和平。多兹在卡纳扎营，接受贝汉津的求和建议，但索取巨额战争赔款并要求交出全部武器。这种条件显然对丰族人的尊严来说是不能接受的。1892 年 11 月，多兹继续冷酷地前进，进入阿波美。贝汉律在去往王国北部定居前把这座城市付之一炬。他没有如法国人期望的那样屈服投降或被人民废黜，他着手重整他的军队，他这样做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1893 年 3 月，他已能重新组起2000士兵，在法国占领区进行多次袭击。1893年4月，头面人物又提出和平新建议。他们准备割让王国南部的领土给法国，但不能接受废黜贝汉津，在他们眼里，他是人民价值观念的化身和他们国家独立存在的象征。因此，9月份法国人又发动另一次讨伐 129 战，多兹仍任指挥，当时，他已升为将军，这支军队成功地占领了阿波美的北部。1894年1

[31] D.罗斯，见M.克劳德编，1971 年，第 158 页。
[32] 同上，第 160 页。

月15日，古特希利被指定为国王登位，1894年1月29日贝汉津被人出卖遭到逮捕。[33]

鲍勒人和法国人

过去人们认为，几内亚和科特迪瓦森林地带的人民反抗法国是从1900年以后才开始的。[34]但是新近的研究，特别对礁湖地区居民和科特迪瓦的鲍勒人的研究说明，这一观点并不正确，法国人从海岸向内地渗透，一开始就激起人民敌对的反抗。[35]法国人第一次从海岸深入鲍勒人地区活动是由两支远征队进行的，一支是军事远征队，1891年由阿尔芒中尉和德-塔韦诺斯特中尉指挥，另一支是商务远征队，1891年3月由瓦蒂雷和帕皮隆率领。蒂亚萨莱的鲍勒人首领埃蒂恩·科梅南决心阻止这种渗透，他拒绝向阿尔芒和德-塔韦诺斯特提供一名翻译陪同他们前往北部，因此他们被迫返回海岸；同时，在瓦蒂雷和帕皮隆尚未到达蒂亚萨莱之前，埃蒂恩·科梅南就派人把他们暗杀掉。[36]为了惩罚鲍勒人，法国人发动军事讨伐，由斯托普中尉指挥，可是这支军队在1891年5月11日遭到埃蒂恩·科梅南军队的攻击，被迫狼狈逃回海岸。武力挫败后，法国人采取外交手腕，于1892年12月29日成功地同蒂亚萨莱和尼亚姆韦的鲍勒人签订一个条约，条约规定，法国人同意支付黄金100盎司换取该地与沿海非洲人和欧洲人的自由贸易。根据条约，法国人在1893年3月派遣第二支远征队到鲍勒人的地区，由让-巴蒂斯特·马尔尚率领，此人在西部苏丹以卓有战功闻名。他在去蒂亚萨莱途经邦达马河时，遭到埃蒂恩·科梅南的阻挡，后者决定："不让白种人通过蒂亚萨莱"。[37]因此马尔尚折回大拉乌，召集了120名士兵，于1893年5月18日开始入侵蒂亚萨莱，一周后埃蒂恩·科梅南逃走，法军进入该地。接着，马尔尚从那里出发，重又向北推进，1893年11月进入比埃凯克罗，法国人以后把它改名为布瓦凯。在这里，他遇到该城酋长夸西·比埃凯的反抗，当时后者是萨摩利的同盟者。因此马尔尚不得不向孔城推进，从那里他向巴黎强烈呼吁请求速派远征军占领孔城，才能抢在萨摩利和英国人的前面，同时和孔城的迪乌拉人签订条约。根据马尔尚的呼吁，法国于1894年9月派出由蒙泰伊率领的远征军，这支部队于1894年12月占领蒂亚萨莱。

蒙泰伊的军队遭到鲍勒人更坚决的抵抗，鲍勒人举起义旗，在12月25日和28日之间攻击蒂亚萨莱以北的沃苏以及阿瓦克鲁和莫罗诺的法军。正是由于鲍勒人坚决抵抗，才使法军当局命令蒙泰伊于1895年2月返回海岸。

从1895年到1898年是鲍勒人领土处于和平的时期，可是法国人于1898年9月打败和俘虏萨摩利后，决定开始有效地占领鲍勒人的领土，因而他们在布瓦凯建立起永久性军事据点，根本没有与鲍勒人商议。法国人还开始解放奴隶；他们俘虏并处死卡蒂亚科

[33] D. 罗斯，见M. 克劳德编，1971年，第166页。
[34] M. 克劳德，1968年，第95页；J. 博尼（Bony），1980年，第14-15页。
[35] T. C. 韦斯克尔，1980年，第33-141页；S. 科菲（Koffi），1976年，第120-189页。
[36] T. C. 韦斯克尔，1980年，第38-39页。
[37] 同上，第44页。

菲克罗的酋长卡蒂亚·科菲，目的在于激起该地区人民的反法情绪。主要由于这些挑衅性行动的结果，该地区鲍勒人的各部族再次起来造反，于 1898 年 12 月 22 日向法军要塞进行全面攻击，领导这次行动的部族首领有：洛莫的酋长科阿迪奥·奥科；恩班的酋长尧·吉耶；卡蒂亚科菲克罗被杀酋长的弟弟卡索；恩班的另一酋长阿卡福·布拉雷；瓦雷博鲍勒人的大酋长夸梅杰。法国宣布鲍勒人地区为作战地区并发动一连串战役作为回答。这些战役造成 1901 年 6 月法军攻占由 1500-2000 鲍勒士兵防守的金矿中心科昆博；1902 年 2 月俘虏和枪杀大酋长夸梅杰并俘虏阿卡福·布拉雷（阿卡福意为铁人），他于 1902 年 7 月在单人牢房里被活活打死。但是鲍勒人依靠游击战术，继续骚扰法军，直到 1902 年 11 月弗朗索瓦-约塞夫·克洛泽尔担任该殖民地代理总督，他理解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下令停止军事行动才恢复和平。㊳

英属西非被征服和对此的反应，1880-1900 年

当 1880 年到 1900 年法国人主要依靠武力来占领西非时，英国人与此相反，采用和平外交手段和战争相结合的政策。他们利用和平外交手段与非洲各国缔结一系列保护条约，这是他们在塞拉利昂北部、黄金海岸（现加纳）北部和约鲁巴兰某些地方使用过的 131 政策。可是其他地方，如阿散蒂、约鲁巴兰的伊杰布、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域，特别在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或多或少还是使用武力。这个地域的人民对英国人的反应也像法属西非的人民一样，他们依靠所有各种可以使用的选择办法，包括对抗、结盟和屈服，或者这些办法兼而用之。让我们以阿散蒂、南部尼日利亚和北部尼日利亚所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加以分析。

阿散蒂（黄金海岸）

在西非，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对抗，没有任何地方比黄金海岸阿散蒂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对抗有更长的传统。这种对抗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 1824 年的一次交战达到顶点，在这次战争中，阿散蒂人击败了英国军队和他们的同盟者，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也即当时黄金海岸总督查尔斯·麦卡锡爵士。㊴ 两年后，英国在多多瓦战役中报了那次战败的仇。在 1850 年和 1863 年间，战事不多，但是在 1869 年和 1872 年间，阿散蒂人发动三路进攻，结果占领了差不多全部黄金海岸的南部和沿海各国。为击退阿散蒂人，英国政府发动一场在当时组织最好的战役，由一个当时最著名的英国军官加尼特·沃尔斯利将军指挥。这支军队装备着最新式的武器，成功地把阿散蒂军队赶过普拉河，并在贝

㊳ 关于所有这些战役和游击战争以及鲍勒人使用的其他方法的详情，见T. C. 韦斯克尔，1980 年，第 98-141 页。

㊴ 关于阿散蒂兴起的详细情况，见J. K. 菲因（Fynn），M. 克劳德编，1971 年，第 19-33 页；A. A. 博亨（Boahen），1966 年；A. A. 博亨，J. F. A. 阿贾伊（Ajayi）和M. 克劳德合编，1974 年。

夸伊附近的阿莫阿福打败阿散蒂军队猛烈的殊死抵抗后，于1874年2月攻陷并洗劫库马西。[40]

这场阿散蒂人被英国人（1874年）决定性的战败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1880-1900年期间阿散蒂人的反应。首先明显的影响是阿散蒂帝国的分崩离析。根据福梅纳条约，阿散蒂人承认普拉河以南各附庸国的独立。沃尔特河以北的附庸国也利用阿散蒂军事力量削弱的有利条件与它脱离关系。甚至保留下来的帝国核心也开始分裂。英国急于使阿散蒂帝国从此不能复兴，它怂恿某些阿散蒂联盟的成员国宣布独立，德瓦本、科科富、贝夸伊和恩苏塔开始蔑视阿散蒂赫内的权威。[41] 库马西和德瓦本的冲突，实际上引起一场内战，直到前者失败和大批人民移居新近被宣布为英国保护国和殖民地的黄金海岸，战争才告终止。废黜阿散蒂赫内，部分是1874年战争失败的结果。在他的继承人7年后去世时，爆发了继承王位的内战，战事继续到1888年普伦佩一世登上王位成为新的阿散蒂赫内。

132

幸运的是，普伦佩证明有能力对付危机。在他即位三年内，他重新团结阿散蒂联盟（或邦联）的成员国，甚至劝说德瓦本返回阿散蒂。部分由于畏惧阿散蒂的复兴，部分由于法国人或德国人有可能夺取阿散蒂，英国人建议阿散蒂成为它的保护国。普伦佩坚定而有礼貌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这一事迹在许多地方都得到广泛引用。[42] 紧接着拒绝英国要求后，普伦佩在1892年入侵并打败恩科兰扎、莫和阿贝阿塞。英国人的反响是提出在库马西派遣驻扎官而英国则每年津贴阿散蒂赫内和其他主要国王作为报偿。阿散蒂赫内不仅拒绝了这个建议而且派遣一个具有很大权力的使团到英国觐见女王，"向女王陛下申诉损害我们王国良好状况的事情。"[43] 这个外交使团于1894年11月离开库马西，随从人员在300人以上，12月10日进入海岸角，1895年4月3日前往英国。英国政府不仅拒绝接见阿散蒂的使团，而且当使团还在英国时，便训令海岸总督向阿散蒂赫内提出最后通牒，强求对方接受英国的驻扎官并支付战争赔偿黄金5万盎司（这是1874年强加给阿散蒂的）。自然，阿散蒂赫内拒绝同意这些要求，因为他在等候派往伦敦使团的结果，所以更不会同意。

英国人以此为口实，对阿散蒂发动大规模的讨伐，由弗朗西斯·斯科特爵士率领。这支讨伐队未发一枪就于1896年1月进入库马西，因为普伦佩和他的顾问们决定不与英国人交战，而愿作为英国的保护国。尽管如此，普伦佩、他的母亲（当时也是女王）、他的叔叔伯伯们以及一些战事首脑都被逮捕，并把他们先流放到塞拉利昂而后于1900年放逐到塞舌尔群岛。[44]（见图片6.2）

为什么阿散蒂人在这次事件中决定不与英国人打仗呢？普伦佩流放到塞舌尔群岛后他自己答复了这个问题。当他的酋长们要求与英国作战时，普伦佩首先回想起在库马西

---

[40] J. K. 菲因，见M.克劳德编，1971年，第36-42页。

[41] 同上，第43页。

[42] 见本书第一章。

[43] I. 威尔克斯（Wilks），1975年，第637-641页。

[44] A. A. 博亨，1977年。



图片 6.2　阿散蒂的纳纳·普伦佩一世(1873 年前后-1931 年)在 1908 年左右被放逐到塞舌尔群岛时的摄影。他右边坐着的是纳纳·亚阿·阿散蒂瓦，她是埃德韦索女王和 1900 年阿散蒂叛乱的领袖；左边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内战的日子，以及恢复和平时和他登位时英国人所发挥的作用，而后他又说，"由于这个从英国政府手中得来的恩惠，我不准备同英国军队作战，不顾我将被他们俘虏。其次，134 我宁愿投降以保证我的部下和同胞的生命和安宁"。[45]

不幸的普伦佩自以为他能够打破常规，在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年代，能够使用外交武器来替代军事对抗。但鉴于1874年的惨痛经验以及英国人对阿散蒂拥有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普伦佩的决定恐怕是最现实的，最理智的和尊严的。

南部尼日利亚

英国人控制整个如今的尼日利亚所采用的机构和方法是变化多端的，同样尼日利亚人的能动性和反应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约鲁巴兰是由教会传教士和拉各斯政府取得的；奥伊尔河是由传教士和领事取得的；北部尼日利亚是由国家非洲公司（1886年后改称皇家尼日尔公司）和英国政府二者合力取得的。英国人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外交手段和军事对抗相结合，因此尼日利亚人的对策也是不断变化的，从公开的军事对抗到临时结盟和屈从。

英国的势力和贸易从1851年被占领的拉各斯渗透到约鲁巴兰的大部分地区，这主要是传教士活动的结果。到1884年，英国人已经和许多约鲁巴统治者缔结了大量反奴隶贸易协定、贸易协定和保护条约。1886年，英国政府还说服了从1879年起一直在作战的伊巴丹和埃基蒂帕拉波（包括埃基蒂、伊杰沙和埃格巴）签订和约。到1886年结束时，英国人在约鲁巴兰取得如此众多的成就，这已是人所周知的了。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进行了大量活动，而约鲁巴人从19世纪50年代起自相残杀了许多年，目前他们已嫌恶战争，需要和平了，因此，他们就接受英国人的干预。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约鲁巴兰中唯一能有效抵抗传教士、英国商人和拉各斯政府的只有伊杰布一国。英国人从该世纪90年代初就决心占领约鲁巴兰，所以决定给伊杰布一个教训，同时警告其余约鲁巴国家，让它们知道，反对英国是无济于事的。[46] 1892年英国人利用所谓侮辱登顿总督为口实，发动一次有充份准备的讨伐，讨伐队拥有来复枪、机枪和一架马克沁机枪装备起来约1000名士兵。伊杰布人勇敢地召集起7000到10,000人的兵力，但是虽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虽然有些人持有火枪，但是他们还是被侵略者打垮。[47] 看来其余约鲁巴135 国家从这次入侵中取得教训，很自然从1893年到1899年，阿贝奥库塔、伊巴丹、埃基蒂-伊杰沙和奥约都纷纷同英国谈判签订条约，并接受英国驻扎官。1895年英国人炮击奥约，其目的只是要阿拉芬人完全屈服。阿贝奥库塔保持名义上的独立直到1914年。

当约鲁巴人大体上都选择屈服的策略时，贝宁王国的统治者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却选择对抗的策略。虽则贝宁在1892年同英国签订了保护条约，它仍然决心保卫主权。当然，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是不能容忍的，以英国代理总领事和其他

---

[45] 上引同书引语。

[46] M. 克劳德，1968年，第126–127页。

[47] R. 史密斯（Smith），见M. 克劳德编，1971年，第180页。



图片6.3 贾贾(1821年前后-1891年)，尼日尔河三角洲奥波博国的统治者(1869-1887年在位)

五名英国人去贝宁途中被杀为借口，英国于1897年发动由1500名士兵组成的惩罚贝宁讨伐。虽然奥巴本人也许愿意屈服，但他部下大多数酋长却举兵回击入侵者。然而他们被打败，他们首都的珍贵青铜器财宝被掠夺一空，而后首都被焚毁。㊽

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像在尼日利亚很多其他地区一样，到1884年大部分酋长已和英国人签订了保护条约。有一些酋长，如卡拉巴尔和邦尼，同意英国传教士在他们国家传教，另一些酋长则不同意。此外，他们全都坚持有管理贸易和征收英国商人税收的完全权利。这点，新上任的英国领事（如休伊特和约翰新顿）是不能容忍的。抗拒英国领事和传教士的统治者的典型例子是奥波博的贾贾（见图片6.3）他坚持英国商人应缴纳税款，并下令在英国公司同意纳税之前完全停止河上贸易。领事约翰斯顿命令他停止向英国商人征税。但是贾贾不但拒绝服从，而且派遣一个使团去英国外交部抗议这个命令。当贾贾不顾约翰斯顿要用炮舰炮轰他的城镇的威胁，仍旧拒绝英国的命令时，1887年约翰斯顿以保证其安全为饵诱骗贾贾到一艘船上，立即把他逮捕起来押往阿克拉，㊾在那里，他受审讯，并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三角洲其他各国——老卡拉巴尔、新卡拉巴尔、布拉斯和邦尼——眼见三角洲国家中一个最有力量和最富有的统治者受到这样的对待都惊呆了，他们内部分裂，只能投降，并接受约翰斯顿强加给他们的具有统治权的顾问会议。

另一个公然反抗英国人的统治者是纳纳，他是伊策基里王国的河上总管。他像贾贾一样，坚持控制贝宁河上的贸易，因此英国人发兵占领他的首都。英国人1894年4月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但是9月份第二次进攻成功了。纳纳逃到拉各斯，在那里他向英国总督投降，英国总督立即加以审判，把他先放逐到卡拉巴尔，而后转到黄金海岸。㊿

137

北部尼日利亚的征服和反抗

如果说对南部尼日利亚的征服和占领是英国政府在商人和传教士支助下完成的，那么对北部尼日利亚的征服和占领是国家非洲公司（1886年起改名皇家尼日尔公司）和英国政府合作的成就。英国使用的主要方法同法国在西部苏丹的措施相似，即军事征服。在军事征服之前，北部尼日利亚统治者和皇家尼日尔公司之间先已签订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有计划地使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取得这个地区，后两者正分别从西方和东方威胁这个地区。

根据柏林会议确立的有效占领的原则，并为了赶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之前，皇家尼日尔公司感到必须向内地深入发展。向北推进的大门要通过伊洛林和努佩，而这两个国家都要坚决维护主权和独立。因而努佩首先在1897年遭到入侵。根据D.J.M.穆弗特的记载，皇家尼日尔公司的兵力，"有A.R.阿诺德少校指挥的31名军官和其他欧洲人，包括乔治·戈尔迪爵士本人以及507名普通士兵组成的7个连队，另外还有565名运输兵以及发射12磅炮弹的B.L.炮和发射9磅炮弹的B.L.炮各一门（都是惠特沃思的产品），5门有来复

㊽ J. B. 韦伯斯特（Webster）和A.A.博亨，1967年，第247-249页。

㊾ M. 克劳德，1968年，第119-123页；O. 伊基默（Ikime），1973年，第10页。

㊿ O. 伊基默，见M. 克劳德编，1971年，第227-228页。

线的前装发射 7 磅炮弹的炮和 6 门.45 口径马克沁机枪。"[51] 这支军队还配备有 11 艘船只组成的小舰队。努佩的埃米和他的大量部队（估计有 2.5 万到 3 万名骑兵和步兵，主要装备是弓、箭、矛、剑等传统武器）进行斗志旺盛的抵抗。但是皇家尼日尔公司终于获得胜利，废黜埃米，指定一个更顺从的人来接替。努佩失败了，其原因正如克劳德指出的，它不懂得"面对速射来复枪、大炮和马克沁机关枪，用骑兵正面冲锋是最最坏的军事战略"。[52] 同年，公司又向伊洛林发动同样的入侵。在遇到另一次斗志旺盛的抵抗以后，公司也迫使伊洛林屈服。

使人惊奇的是，北部的其他统治者并没有被敌人这些胜利吓倒。相反，除了扎里亚的统治者外，所有其他酋长在对异教徒难以平息仇恨的激励下，决心宁死不放弃他们的 138 土地和信仰。如索科托的素丹于 1902 年 5 月通知卢加德："在我们和你们之间，除了像穆斯林教徒和异教徒那样的关系外没有什么交道可打……像全能的真主嘱咐我们那样打仗吧"。[53] 因此英国人不得不发动一系列的战争——1900 年攻打孔塔戈拉，1901 年攻打阿达马瓦，1902 年进攻包奇，1903 年进攻卡诺、索科托和伯伍里。[54] 所有这些酋长国的统治者都起来应战，但是无法有效抵抗他们敌人的马克沁机枪、来复枪和发射七磅炮弹的前装加农炮，所以都遭到失败。

西非非洲人的反抗和反应，1900-1914 年

从上文所述可以清楚看出，到 1900 年，非洲人维护他们主权和独立的努力已经失败。从 190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段时期，可以看到在殖民地建立起各种各样的行政机构，首先是剥削新得到的产业的机构。如 1908 年 8 月新任科特迪瓦总督昂古尔旺所说：

> 首先必须建立的是树立我们权威不容辩驳的原则……当地人一方接受这个原则必须表现：对我们不论哪一个代表要毕恭毕敬的欢迎和绝对的尊敬，按统一的税率交纳全数税款 2.50 法郎，在建筑铁路和道路时认真合作，接受付费的驮运劳动，在劳动中遵守我们的忠告（原文如此），要依赖我们的司法机关的保护……凡表示不耐烦或不尊敬我们权威的迹象和故意缺乏善意合作的态度，立刻严惩。[55]

所有新获得的殖民地里的殖民者，都追逐这里概述的目标和使用这里概述的方法：任命地方专员和巡回专员，成立新法院，引进新法典和新法律，重新确认或黜免酋长，任命新人接替，采取直接和间接的税制，为建筑道路和铁路要求强制劳动——所有这些办法，自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

---

[51] D. J. M. 穆弗特（Muffett），见M 克劳德编，1971 年，第 283-284 页。

[52] M. 克劳德，1968 年，第 131 页。

[53] D. J. M. 穆弗特，见 M. 克劳德编，1971 年，第 284-287 页。

[54] 英国在北部尼日利亚进行的战争和那里统治者的英勇抵抗都是十分著名的，这里不须详述，详情参考 D. J. M. 穆弗特，见M. 克劳德编，1971 年；R. A. 阿代莱耶（Adeleye），1971 年； M. 拉斯特（Last），1967 年。

[55] J. 絮雷-卡纳尔（Suret-Canale）引用，1971 年，第 97-98 页。

在这第二阶段，虽然人们思想中的目标不同，西非人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战略是同样的。其主要目标有三种：恢复主权和独立，这意味着驱逐全部殖民统治者；要求改正或纠正殖民制度某些特殊弊端和压制性的做法；或在殖民制度的范畴内寻找适应的办法。这一阶段所采取的战略既非屈服也非结盟而是抵抗策略，而这个策略又有许多种形式：起义或造反、迁移、罢工、抵制、请愿和派遣代表以及最后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抗议。在这一阶段的领导层实际上仍和 1880 年到 1890 年间一样，主要还是传统的统治者。下面让我们简单地对这些战略分别加以阐述。

139

西非人在这个阶段使用得最普遍的武器是造反或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 1885 年和 1887 年间在塞内加尔由马马杜·拉米内率领的造反；孔博伊斯兰教派首领福德·西拉领导的起义；1898-1900 年尼亚米纳和冈比亚卡萨芒斯地区穆斯林统治者福德·卡巴领导的叛乱；1898 年塞拉利昂由拜伊·布里赫率领的反茅屋税叛乱；1900 年黄金海岸由亚阿·阿散蒂瓦（埃德韦索女王）率领的阿散蒂的叛乱；尼日利亚东部 1898-1900 年的埃库默库叛乱和 1898-1902 年阿罗人的反叛；1913-1914 年在达荷美博尔古的巴里巴人和阿塔科拉的松巴人的叛乱；1908-1914 年莫西人在上沃尔特的库杜古和法达·恩古尔马的叛乱；1915-1916 年古伦西人的叛乱；1908-1909 年间法属苏丹洛比人和朱拉人的叛乱；达荷美波多诺伏的起义；1900-1914 年间科特迪瓦的鲍勒人、阿库斯人、萨桑德拉人和古罗人的起义，以及 1908-1914 年间几内亚某些地区的多次起义。使人感兴趣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起义的强度增加了。[56] 有必要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三个典型例子，以说明这些反叛的性质和动机，它们是马马杜·拉米内领导的叛乱、反对茅屋税的叛乱和亚阿·阿散蒂瓦的叛乱。

马马杜·拉米内领导的叛乱

马马杜·拉米内的叛乱直接反对外国统治。索宁克人散居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上塞内加尔的领土。一部分人到 1880 年或多或少隶属于法国当局，而其他部分则受阿赫马杜的统治。架设电报线路和建造从卡耶到尼日尔的铁路线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工，这些工人主要在索宁克人中招募。工人所经受的筋疲力尽的劳动和不稳定的生活条件引起很高死亡率，其结果是出现抗议运动，这个运动不仅直接反对日常受到的侮辱，而且尤其反对来到本地区的外国人。[57] 马马杜·拉米内在这个运动中起催化剂作用，在他的周围集合全部过去和现在受新社会政治秩序之害的人。他带着可羡慕的朝圣者的称号于 1885 年回到祖国，他的祖国当时正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危机之中。当他开始向公众讲道时，

140

[56] 上述造反的详细情况，见O. 伊基默，1973 年；A. E. 阿非格博（Afigbo），1973 年；B. O. 奥洛隆提梅欣（Oloruntimehin），1973 b；J. 奥森托肯（Osuntokun），1977 年；M. 克劳德，1977 c；J. 絮雷-卡纳尔，1971 年，第 93-107 页；M. 克劳德，1968 年编，1971 年；A. 杜佩雷（Duperray），1978 年；I. 金巴（Kimba），1979 年；G. 亚佩（Yapé），1977 年；M. 米歇尔（Michel），1982 年；T. C. 韦斯克尔，1980 年；S. 科菲，1976 年；并见本书第 12 章。

[57] A. K. 唐迪亚（Tandia），1973年，第 83 页。

他把危机归诸于宗教上的原因，倡导严格的赛努西雅教义，这种教义不允许穆斯林生活在非伊斯兰的权威下。这个教义就足以使索宁克人自发地信奉他的纲领。他到哈索、古伊、班布克和邦杜旅行，每天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胞集合在伟大事业的周围。到 1885 年末，他已有相当可观的力量可供调动，准备为自由而战斗。

法国宠儿，邦杜的阿尔马米（酋长）布巴卡尔·萨阿达的去世，给马马杜·拉米内发动攻势的机会。由法国人指定继承已故阿尔马米的奥马尔·彭达拒绝同意马马杜·拉米内通过邦杜去冈比亚。因此 1886 年 1 月索宁克人的首领入侵邦杜，驻扎在尼日尔河畔的弗雷派遣部队去卡耶和巴克尔以保证后方的安全。于是，马马杜·拉米内把他的运动作了根本性的改变，此后讲道，他只讲对基督徒的全面战争。[58] 这个索宁克人谴责法国人以及他们的非洲同盟者，如邦杜的奥马尔·彭达、梅迪纳的桑巴拉以及在巴克尔、梅迪纳和卡伊定居务农的农民。有些在法国军队服役的索宁克人投奔马马杜·拉米内的营地，定居在法国据点内的一些索宁克人则向他提供有关法国军队动态的情报。

抵抗武器占优势的敌人，马马杜·拉米内能够依赖人数上的优势和他的士兵的宗教狂热，士兵们相信自己是为神和祖国而战。在巴克尔一役他被打败后，又求助于游击战术。1886 年 3 月，马马杜·拉米内决定攻打巴克尔，这个地方象征着法国人在此地域的存在和索宁克人的耻辱。他封锁城市，派兵占领所有入口。当若利上尉企图解脱这个紧紧的包围圈，带兵攻打以孔加尼为基地的索宁克人时，他进攻失败，被迫匆促撤退，在战场上遗弃 10 具尸体和一门加农炮。马马杜·拉米内于是以 1 万士兵猛烈攻击城市。然而这次攻击没有成功，离胜利仅仅差一线之际，索宁克人的司令部被炮弹摧毁。随后就发生一片混乱，马马杜·拉米内的战士纷纷逃跑。[59] 不过，根据他的命令还是割断了巴克尔和卡伊之间的电报线。

巴克尔的惨痛教训教育了拉米内，他知道用他目前掌握的武器绝不可能夺取法国设防的据点。因此他转而采取游击战术。从尼日尔返回的弗雷，恐吓吉迪马卡居民，要他们同马马杜·拉米内的事业断绝关系。他们的村子被烧毁，谷物和牲口被没收。这一政策只能加强索宁克人使他们国家摆脱法国占领的决心。马马杜·拉米内利用 1886 年的雨季重整军队。他在上冈比亚的迪亚纳建立司令部，在那里他建筑起堡垒，成为宣传中心和战争的基地。7 月，索宁克人攻打塞努代布，重占布莱巴内，并把法国人在邦杜的宠儿奥马尔·彭达处以死刑。[60] 1887 年以后，加利埃尼和阿赫马杜联合反对索宁克人，加速了这次起义的失败。马马杜·拉米内的儿子苏埃布遭到阿赫马杜部队攻击，被迫向哈杰·乌马尔的儿子交出迪亚富诺和吉迪马卡两地。他本人在企图再与其父会合时被俘并被处死。1887 年 12 月，拉米内最后在图巴-库塔被法军打败，这次战役，法军得到上卡萨芒斯的穆萨·莫洛所组织的辅助部队的协助。

141

[58] A. K. 唐迪亚，1973 年，第 89 页。
[59] 同上，第 92 页。
[60] 同上，第 95 页。



图片6.4 拜伊·布里赫(1845年前后-1908年前后)，塞拉利昂1898年反茅屋税叛乱的领导人，在被捕后摄

反茅屋税叛乱

1898 年的反茅屋税叛乱是塞拉利昂的滕内人和门德人对统治他们的英国人所实施的种种强化政权措施的反应。英国人任命地区专员，增加边境警察，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实施 1896 年保护国敕令（根据这项敕令，政府有权处置荒地），最后，对所有二间住房的小屋每年征税 5 先令，对较大房屋每年征税 10 先令。[61] 所有滕内人酋长一致决定拒付税金，并以他们中的一员拜伊·布里赫（见图片 6.4）为领袖起而叛乱。不久门德人也加入他们的起义队伍，因此卷入这场起义的人数几乎占保护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起义军袭击并抢夺贸易站，杀死英国官员和士兵以及所有被怀疑为帮助殖民政府的人。正如 1898 年 4 月一个地区专员的报告中写的，"其目的似乎是屠杀所有塞拉利昂人(即弗里敦的克里奥耳人)和欧洲人，而且干得非常彻底。这个国家在商业上被毁了，一些商人被杀，一些商店被烧。"[62] 到 1898 年 5 月，叛军离弗里敦只有 40 公里左右，英国人不得不急忙从拉各斯调来两个连队保卫这个城市。

这次叛乱的真实性质是什么？被叛乱吓昏的塞拉利昂英国总督认为，不但这次叛乱，143 而且包括当时盛行的一般对殖民统治的抵抗，都是"非洲人政治觉悟日益高涨和对本身价值和自治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表现"。如他所说的，"土著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白人需要他国家的物产和他的劳动而产生的价值；今后白人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他的单纯和对世事之无知在贸易中大获厚利了"。[63] 卡迪尤总督的分析，不可能是错的，这种分析对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和 1914 年之间在西非发生的大部分叛乱和游击战争都是同样适用的。

亚阿·阿散蒂瓦战争

如同 1898 年的反茅屋税叛乱一样，阿散蒂人在 1900 年的起义也是由英国人为巩固他们统治地位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激起的。英国人罢免一些反英的酋长，指派一些按传统不合格的人来代替，强征税收，这次是每个人征 4 先令，作为 1897 年战争的赔偿。但是真正促使叛乱爆发的最后导火线是英国总督阿诺德·霍奇森索取金凳作为自己的座位。金凳是阿散蒂人最神圣的东西，被认为是他们灵魂的化身和民族生存的象征。因此这种索取只能立即触发一场在埃德韦索女王亚阿·阿散蒂瓦领导下几乎包括全部主要国家的叛乱（见图片 6.2）。[64]

阿散蒂人武装攻击总督及其党羽，他们不得不躲进库马西堡垒避难，于是阿散蒂人包围了堡垒。在总督及其党羽从堡垒逃走时，阿散蒂人与英国人激战了几仗，从 1900 年

---

[61] 本节系根据J. A. 兰利（Langley），未注明日期。

[62]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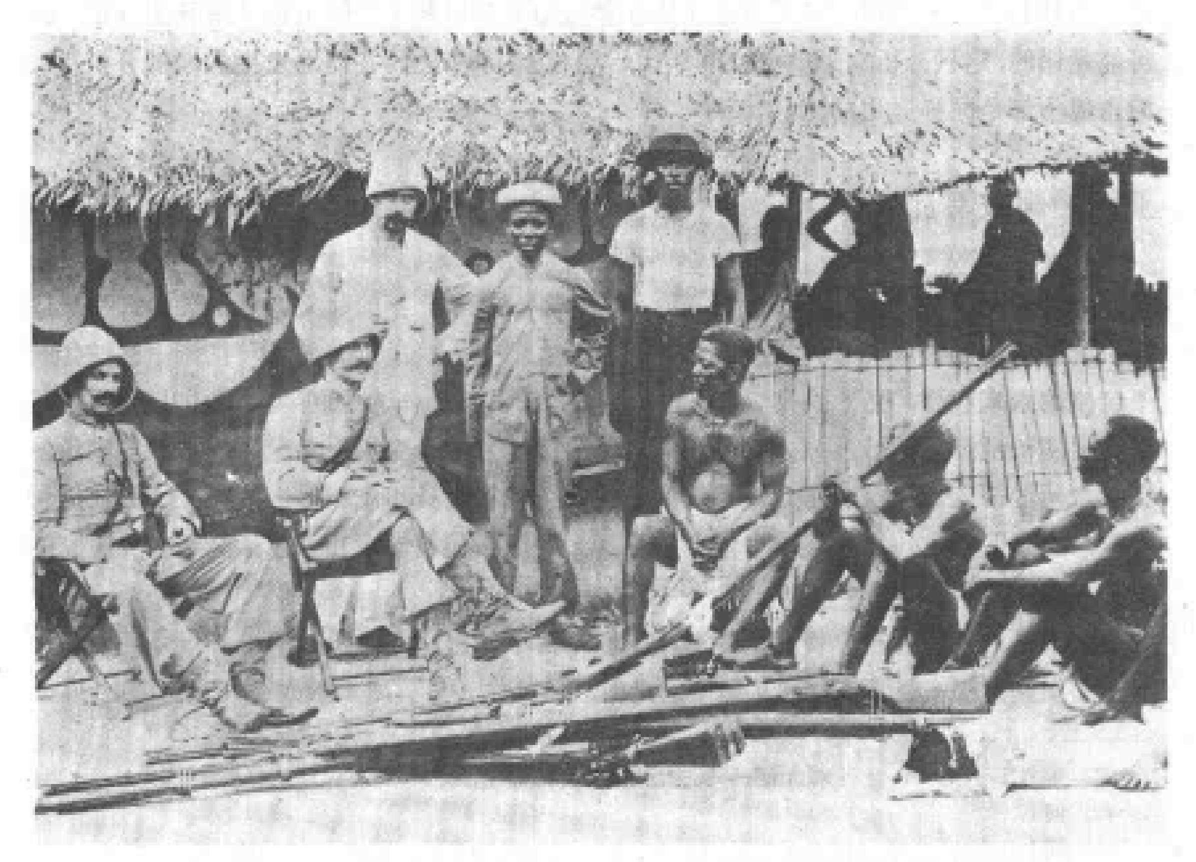
[63] 同上。

[64] 详情见J. K. 菲因，M.克劳德编，1971 年，第 46-49 页。



144

图片6.5(a)　法国军官在20世纪初镇压科特迪瓦人民的抵抗时，把一颗非洲人的头示众



图片6.5(b)　对法国占领科特迪瓦进行抵抗后，非洲酋长向布代中尉投降

4 月一直打到 11 月，11 月亚阿·阿散蒂瓦被俘，她和其他阿散蒂将军一起被放逐到塞舌尔群岛。

在科特迪瓦同样发生了叛乱、激战和游击战争。原因是反抗残酷的总督昂古尔旺为巩固法国统治和剥削殖民地而采取的横蛮措施，诸如强迫劳动和横征暴敛。鲍勒人的这场抗战爆发于 1908 年，一直延续到 1910 年，1910 年法国人使用臭名昭著的搜捕和彻底捣毁战术，以非洲抵抗史上没有前例的残暴和邪恶的手段，平定了一切反抗（见图片 6.5(a)）。这场战争结束时，鲍勒人的人口从 1900 年的 150 万左右降为 1911 年的 26 万人。[65] 鲍勒人的近邻古罗人，丹人和贝泰人坚持抵抗到 1919 年。　145

大规模迁移

西非人在 1900-1914 年间所采取的抵抗行动不只是起义和叛乱。抗议粗暴殖民统治的大规模迁移也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法国殖民地特别普遍，非洲人在那些地方没法进行武装起义，因为法国在并吞区驻扎了军事控制的部队，于是人们只能采取逃跑的办法，目的是为了避开法国的高压和凌辱。这样，1882 年到 1889 年间圣路易郊区的富拉尼人大量迁往阿赫马杜的帝国。1882 年住在圣路易郊外的 3 万富拉尼人，到 1889 年只剩下 1 万人。1916 年和 1917 年约有 1.2 万多人离开科特迪瓦到黄金海岸去。在这个时期还有大量人口离开塞内加尔去冈比亚，离开上沃尔特去黄金海岸，离开达荷美去尼日利亚。[66] 应该指出，这种叛乱和抗议性迁移，大体上是农村居民和这些殖民地的内陆部分人口采用的方式，那些人只是从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起才与欧洲人有直接接触。在沿海地区和新建城市中心，那里住着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并且出现了工人阶级，那里人们采取比较不激烈的行动，包括罢工、抵制、意识形态方面的抗议、利用报纸，最主要的则是由各种社团和运动派遣请愿团和代表团，到当地政府和殖民地的宗主国政府请愿。

罢　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罢工作为抗议的武器变得日益普遍，但在这个时期以前也已有过几次。早在 1890 年就发生达喀尔-圣路易铁路工人的罢工；1891 年发生在喀麦隆做工的达荷美妇女的罢工；1897 年拉各斯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巴兹尔·戴维森描述这次行动是“殖民地第一次重要罢工”；[67] 1918-1919 年在达荷美发生科托努和大波波划桨夫的罢工；1919 年几内亚发生科纳克里港码头工人的罢工。[68]　146

[65] J. 絮雷-卡纳尔，1971 年，第 95-103 页。关于鲍勒人抵抗最后阶段的详情见 T. C. 韦斯克尔，1980 年，第 172-210 页；J.博尼，1980 年，第 17-29 页。

[66] A. I. 阿西瓦朱（Asiwaju），1976 b。

[67] B. 戴维森（Davidson），1978 b，第 173 页；A. G. 霍普金斯（Hopkins），1966 b。

[68] J. 絮雷-卡纳尔，1977 年，第 46-50 页。

意识形态方面的抗议

回顾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抗议主要发生在宗教领域，即在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传统宗教的信徒之间。这样，正如奥洛隆提梅欣所指出，在上沃尔特的莫西人和法属苏丹的洛比人和班巴拉人中的传统宗教信徒团结一致反对法国文化和基督教、穆斯林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信徒，特别在西部苏丹一带的伊斯兰教信徒也重新信奉马赫迪教义，或者建立由谢赫阿赫马杜·班巴领导的穆里迪雅教团和由谢赫哈马拉领导的哈马利雅教团，以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存在。[69] 非洲人基督教徒，特别在英属西非殖民地的非洲基督教徒，也起来反对欧洲人对教会的控制和强加于他们的欧洲文化和宗教仪式。这种情况造成这些教徒的脱教，他们组织自己的救世主教会或千年至福教会或埃塞俄比亚教会，这些教会具有独特的非洲礼拜仪式和教义。例如，土著人的浸礼会，它是1888年4月成立于尼日利亚的第一个非洲人教会。[70]

上层精英组织的协会

主要由住在城市中心的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组成的各种俱乐部和协会，在这段时期里也是抗议殖民制度的暴行和罪恶的一种工具。这些团体利用报章、戏剧、短文和小册子作为他们从事斗争的主要武器。[71] 试举数例，这种起殖民统治监督者作用的团体有：1897年成立于黄金海岸的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1910年在塞内加尔成立的青年塞内加尔人俱乐部；以及1908年和1912年在尼日利亚先后成立的人民联盟和反对奴隶制及保护土著人协会。黄金海岸的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非常活跃，这个组织是为了抗议1896年的“土地法案”而成立的，该法案把全部所谓荒地或无主土地交给政府控制。该协会派遣一个代表团于1898年去伦敦晋见殖民地大臣，结果这个令人憎恨的法案终于被撤销。从那时起，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向当地政府和殖民部对各种各样的法案提出抗议。它两次派代表团去英国，第一次在1906年，要求废除1894年的“城镇法令”，第二次在1911年，反对1910年的“森林法案”。这个组织确实是西非上层精英和传统统治者最成功的喉舌，也是殖民主义最强有力的对手，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成立方才消失。在法属西非，青年塞内加尔人俱乐部成立于1910年，也积极发动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

147

从上述情况看就很清楚，西非人民设计出各种战略和战术，首先反对建立殖民制度，其后当他们早期的努力失败后，就转而抗拒殖民制度的某些具体措施和机构。这些不同的战略和方法，总的说来是不成功的。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这段时期结束的时候，殖民主义在整个西非已经根深蒂固了。

---

[69] B. O. 奥洛隆提梅欣，1973 b，第32-33页
[70] E. A. 阿扬代莱（Ayandele），1966年，第194-198页。
[71] F. 奥穆（Omu），1978年。

失败的原因

每次抵抗和武装暴动总是归于失败。至少人们从作战的结果看就是如此。虽然西非人既不缺乏勇气也并非不懂军事科学，但是他们面对入侵者的时候总是处于极大劣势。敌人的武器在技术上比他们优越，他们没有真正能抵消这种优势的长处。的确，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地形具有较多的知识，而酷热的气候，迫使欧洲人不得不在一年的某一时间停止军事行动，这两点偶而也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但大批的征服军是由欧洲人率领的非洲人。因而这些来复枪兵也有天时地利上的优势。西非人像马格里布人一样，甚至在数量上也并不经常比侵略军占优势(见本书第5章)。从被并吞和受保护领地来的几千名非洲人辅助部队，常常跟在入侵正规军的后面，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有计划地与他们的保护人一起抢劫受蹂躏国家人民的财产，目的在瓦解对方的内部组织。此外，西非各国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有组织的联盟，迫使敌人同时在几个战线作战。某些国家清楚地看到有这一行动的必要，但是他们推行这个行动的努力终归毫无结果，大部分抵抗者，当他们从失败中逐步认识到：不论是常规战争还是"堡垒"防御系统，面对拥有巨大毁灭性武器的敌人，没有成功的机会，但到那时候再进行游击战争往往已为时过晚。除上述情况外还须加上上面已经指出过的事实，即189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达成协议，各国不得再出售军火给非洲人。此后，非洲人遇到严重的后勤供应问题。最后，像其他地方的非洲人一样，除萨摩利外，西非人不得不使用过时的武器，如旧式丹麦炮、弓和箭来对付敌人的加农炮和马克沁机关枪。汇集所有这些因素，非洲人失败的根源就一目了然了。

回顾非洲历史上这段英勇史诗，不禁使人提出疑问，非洲人的抵抗是不是"英雄的狂热"或者是一种犯罪的态度。我们的作者否定了这种论点。从他们的立场看来，非洲军队面临装备占优势的敌人肯定是要被打败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抵抗者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从此萦绕在子孙后代的心中。 148

(吴壬林译)

7 东非非洲人的能动性和抵抗 1880-1914年

H. A. 姆万齐

149 关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非洲人对外国入侵和最终征服和统治非洲的反应已有不少著作。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有大部分的论述集中于抵抗者和所谓合作者之间的两分法，前者被颂为英雄人物，后者被视作叛徒加以谴责。这种分类法，在非洲也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是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的产物。投身民族独立运动的那些人，往往把自己看作发源于本世纪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的长期斗争传统的继承者。人们认为独立是件好事，争取独立是很自然的。因而，所有为维护独立而抵抗欧洲人入侵的非洲人都是值得仿效的英雄，在通过抵抗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历史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鉴于上面这一段话，可见这种观点是试图在事后认识的帮助下，使用现代的标准，解释过去的事件。在殖民时代，殖民官员把那些抵抗者说成目光短浅，而对那些与他们合作者说成目光远大。今天，东非民族主义史学家则谴责所谓合作者，特别是那些首领，赞颂抵抗者。①

在抵抗者之中还有分别。有些人与入侵者进行武装斗争，叫作积极抵抗。有些人虽然没有拿起武器但拒绝与入侵者合作，这种方式的抵抗叫作消极抵抗。对所谓合作者却不是同样区别对待，他们常被放在完全无区别的一个范畴里。

但是，正如阿杜·博亨教授所正确指出的，用英雄和坏人的对照来看待非洲历史是一种曲解。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当时许多不同团体或个人进行活动的环境条件。不同团体150 和个人能够作出的选择以及他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可能不同于政治家或学者强加给他们的解释。如博亨教授提出，要从独立采取的或有实力作后盾的外交手段来观察当时发生的事件和事件里的关键人物，才能看清问题。要理解外交手段能够做到的程度，必须理解产生对抗时在这个特定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对东非来说，考察19世纪90年代的这些因素，对研究以后发生的事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然而，如R. I. 罗特伯格和阿里·马兹鲁伊说过："不能否认引进西方的规范和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控制，在非洲到处为受影响的人民所怀疑"。② 但是，这种怀疑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对入侵的反应形式是由当时各个社会结构决定的。虽然所有社会都坚定不移地保护它们的主权，但对入侵的反应并不是完全一样的。"③ 形式多样是根据特定社会是否具有社会内聚力决定的。

① G. 穆里乌基（Muriuki），1974年，第233页。

② R. I. 罗特伯格（Rotberg）和A. A. 马兹鲁伊（Mazrui）合编，1970年，第18页。

③ M. H. Y. 卡尼基（Kaniki），见M. H. Y. 卡尼基编，1980年，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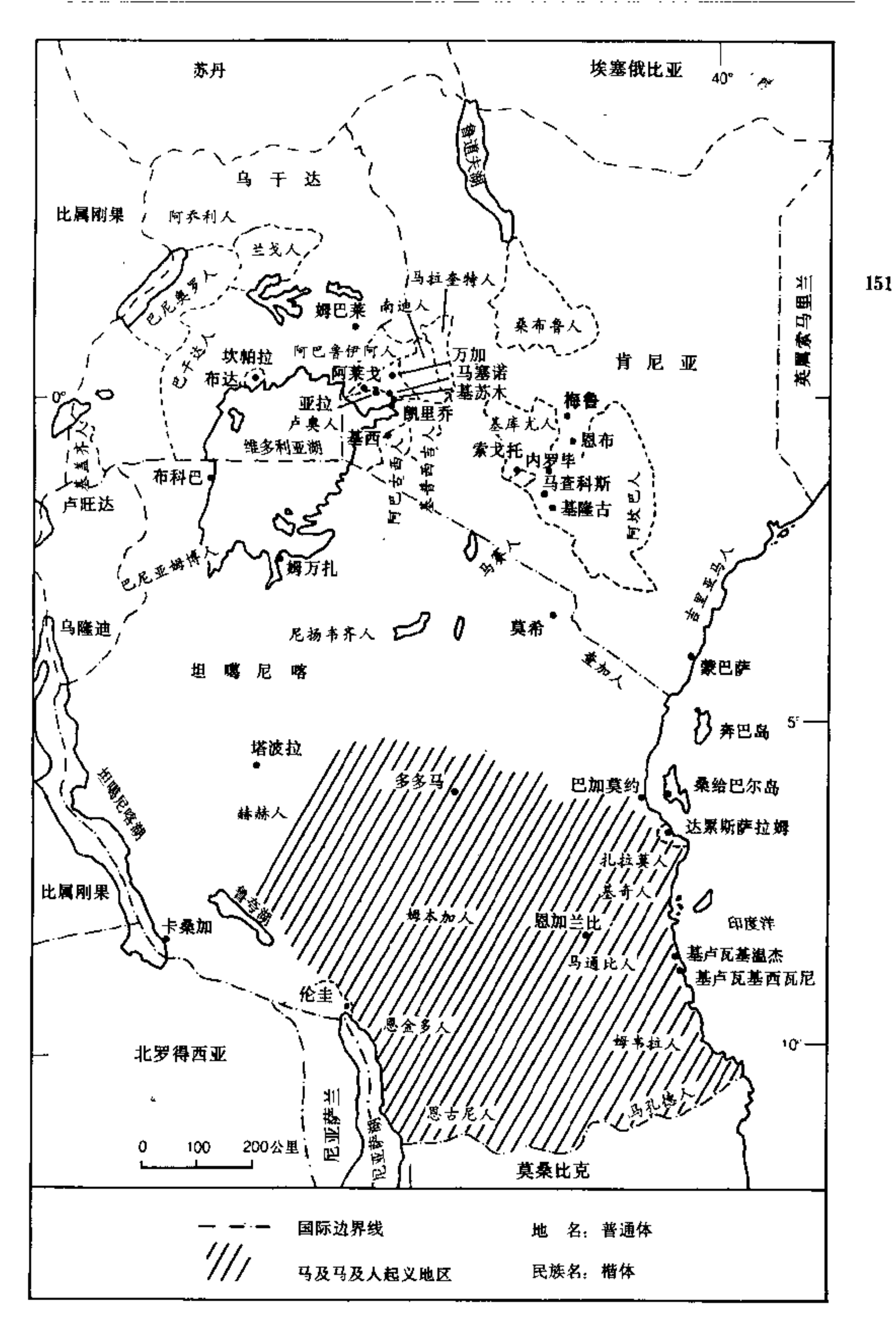


插图 7.1　东非的民族分布和政治实体，马及-马及人起义地区示意

19 世纪 90 年代——欧洲人占领东非前夕——这个地区的各个社会所处的社会组织阶段各不相同。[④] 有些社会如乌干达的巴干达人和巴尼奥罗人、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巴尼亚姆博人以及肯尼亚的万加人已达到具有高度中央集权政府的阶段（见插图 7.1）。在这样的社会里，对外国人入侵的反应大多根据国王或者整个领导集团的判断。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欧洲存在过的——"国王的宗教就是我的宗教"——就是这些社会的态度。另外一些社会，如坦噶尼喀的尼扬韦齐人或肯尼亚的南迪人正处于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常常被说成建国过程。然而，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社会都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可是没有中央集权政府不等于没有政府，这是过去某些外国人评论非洲社会时所犯的错误。

再说不同社会与欧洲人或阿拉伯人的接触程度有所不同，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是这个时期冲击东非的两种外部力量。从整体说，沿海岸地区的人同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接触比内地人早。就内地人说，有三、四个部族比其他部族接触阿拉伯人较久。肯尼亚的阿坎巴人和坦噶尼喀的尼扬韦齐人从事从内地到沿海的商队贸易——常常被称为长途贸易。[⑤] 巴干达人和肯尼亚的万加人在 19 世纪 90 年代前已经同做象牙和奴隶贸易的阿拉伯人有接触。受这些外界影响的深浅程度也决定各不同社会进行抵抗的形式和程度。

152　除了这些人为的影响外，还有 19 世纪 90 年代东非发生的生态变化，这种变化也影响对外国渗透的反应。整个地区经受干旱及随之而来的饥荒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压力，还发生了流行性的牛瘟。[⑥] 而且，有一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深地受到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畜牧社会如肯尼亚的马赛人，看来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有些马赛人家族如瓦伊亚基和恩琼乔家族，他们逃到邻近的基库尤人那里，在那里，他们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来到和后来建立起来的殖民制度方面，以及与殖民化以后的社会的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明显不同。[⑦] 还有些人逃到南迪人那里。[⑧] 另外还有一些人去当兵，先在万加国王穆米亚麾下和阿巴卢伊亚人一起当雇佣兵，以后投入英帝国部队作为征服现在称为肯尼亚这个国家的远征军的一部分。在征服南迪时这种现象尤其突出。[⑨] 马赛人的例子有助于说明在这个地区的不同社会的经济中已经出现混乱失调。这样，殖民主义到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个被经济危机及其伴随影响折磨得很厉害的地区。

欧洲人对东非的瓜分和非洲人抵抗的格局

东非的殖民主义大瓜分，涉及三个互相竞争的国家：桑给巴尔的素丹国、德国和英

④ 殖民主义出现之前，关于坦桑尼亚各社会的详尽论述参阅 A. M. H. 谢里夫（Sheriff），见 M. H. Y. 卡尼基编，198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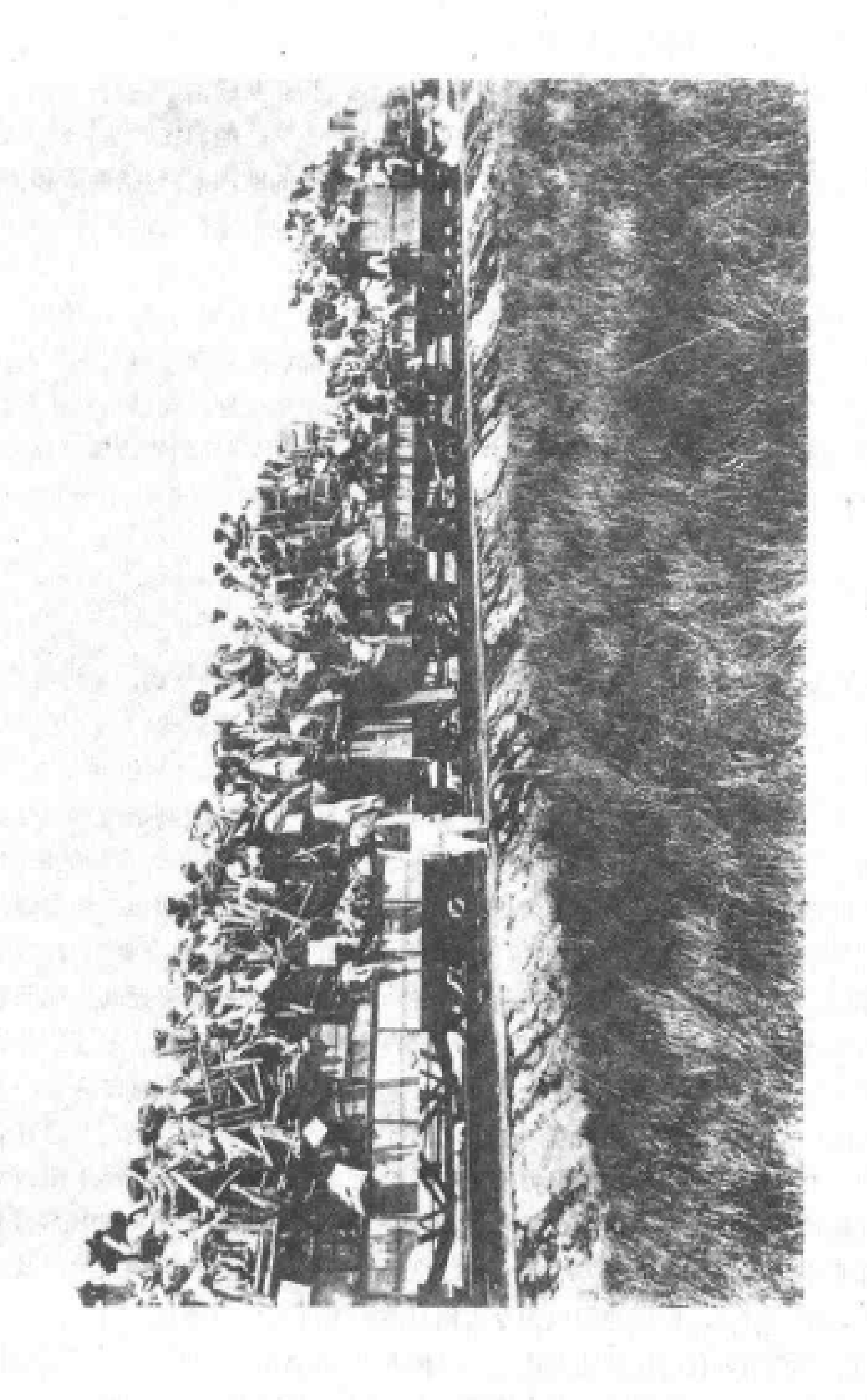
⑤ 见I. 基曼博（Kimambo），1970 年。

⑥ W. 罗德尼（Rodney），未注明日期，第 4 页。

⑦ G. H. 芒吉姆（Mungeam），1970 年，第 137 页；K. J. 金（King），1971 a。

⑧ H. A. 姆万齐（Mwanzi），1977 年。

⑨ K. J. 金，1971 a。



图片7.1 建筑乌干达铁路，一群铺路工正在铺设铁轨

国。第一个出场的是阿拉伯人，他们从桑给巴尔出动，对沿海地带和内地的兴趣主要是经商，经营奴隶和象牙贸易。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前，这些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商人满足于从沿海地带前来抢做生意。但是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阿拉伯人在东非内地的利益开始受到德国和英国公司的威胁，这两个国家的公司逐步渗入这个地区。面对这一形势，阿拉伯人为了保护他们商业上的特许权，打算从政治上控制一些地方。因而，他们在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吉吉建立起殖民地；在布干达，他们先同基督教徒合作以后牺牲基督徒的利益，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姆万加。[10]在内地的欧洲人，包括商人和传教士，都希望由本国政府占领东非，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以及使他们能自由地实行他们的野心而不受阻碍。

154 欧洲人向非洲推进的手段各地不同，但是从整体而言，最主要的特色是使用武力，倘若有可能的话，同时使用与一个部族结盟去反对另一个部族的外交手段。军队入侵往往同时进行掠夺。为了便于向内地推进，就建筑铁路。乌干达铁路，连结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内地与沿海地区，在1901年通到维多利亚湖盆地。德国同样开始修筑铁路和公路网。第一条铁路在1891年后从坦噶海岸开始修筑，于1905年到达乌桑巴拉山脉的山麓。

肯尼亚的反应

非洲人对所有这些侵略的反应（已如上述）既有军事的也有外交的，有时候也撤退、不合作或者消极服从。以肯尼亚的南迪人为例，他们武装抗拒通过他们领土建筑铁路。肯尼亚全体人民，对英帝国主义进行最强烈和最持久的军事抵抗，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1905年他们的领袖在去谈判途中遭到杀害时为止，这次谈判是英军司令官背信弃义安排的陷阱。这一事态削弱了南迪人抵抗的力量，最终导致英国人占领他们的领土。

南迪人能抵抗英国人超过7年之久是由南迪社会性质决定的。那里的社会划分为许多称为波罗里埃特（pororiet）的领地单位，来自各单位的战士，负责保卫自己的领地，由于这个原因，战士们在共同的茅屋内同吃同住。他们和常备军相差无几。这些领地军集合一起由传统的领袖“奥戈伊约特”（orgoiyot）统率。只有他才能决定部队什么时候进攻。统帅向每个领地会议派驻一位个人代表，通过他保持军队和领袖的联系。因为南迪社会生活的中心是领地而不是宗族，这意味着宗族之间没有对立的情况。这样就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就是这种凝聚力使南迪社会比其他邻近社会在军事上更占优势。马特森对此评述说，“令人吃惊的是，像南迪这样的小部族竟能使大得多的民族恐惧，而且能持续几乎不受惩罚地称雄一方达几十年之久。”[11]这种社会的社会内聚力以及战士们对自己和领袖充满信心，使得他们成为令人侧目的军事强国，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在军事上的成功使他们相信自己比其他人优越，白种人也不例外。G. W. B. 亨廷福特特别提到：南迪人认为自己，如果不比白人优越，至少同白种人同等；他们对我们的文明影

155

[10] R. 奥利弗(Oliver)，1951年，第54页。
[11] A. T. 马特森（Matson），1970年，第72页。

响带来的变化的估计，一定也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12] 南迪人成功地抗击英国占领超过 7 年，于是，由于胜利使这个社会结成一个战斗集体。

肯尼亚某些其他社会的反应就与此颇不相同。例如在肯尼亚中部，每一个领袖或部族或宗族对外国人入侵的反应是各自为政。[13]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基库尤人中瓦伊亚基的反应。他的父母原来都是马赛人，他们由于 19 世纪马赛兰发生动乱，迁移并定居在基库尤兰南部。在这里，部分因为瓦伊亚基和商队商人有接触，逐渐在当地有了势力。英帝国东非公司把他视作全体基库尤人的大酋长。但是如同穆里乌基所指出的，他的举止 “从一开始就说明，他对白种人的友谊，真正感兴趣。”[14] 他保证泰勒基伯爵的考察队安全通过基库尤南部。他同弗雷德里克·卢加德（此人当时是一家公司的代理人）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结义仪式在基库尤人中是最高信任的表示。结义后，瓦伊亚基准许卢加德在他的领土上建立堡垒。但是过后不久，瓦伊亚基提出诸如拥有火器的要求被这些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拒绝时，他转过来反对他们，并猛攻达戈雷蒂的英国公司驻地。随后，他再次改变策略，用外交手段和外国人结盟，以保全自己的地位，但是他却被驱逐出国。瓦伊亚基的行为确切地说明（有时人们疏忽）没有一个人终身是抵抗者或者终身是所谓合作者。人们改变策略是按照当时遇到的形势，也许由于他们对周围力量的认识有所深化。殖民地的形势是变动的，不是静止的，因此非洲人的反应也是变动的。

马赛人莱纳纳与马赛人中反对这个地区外国人存在的其他部落不同，他和英国人结成联盟。那些与英国人建成联盟的人经常被任命为殖民制度下的酋长，以此作为报酬。因此莱纳纳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成为肯尼亚马赛人的一名大酋长。非洲人抵抗的方式根据其社会性质和各社会对外来势力威胁其主权的看法如何而有所不同，[15] 所不同的是抵抗的程度。正如W. R. 奥奇恩所说，“实际上在肯尼亚到处都抗拒强加的殖民统治。英国人装备优良并雇用大批的雇佣兵，他们只有用暴力才能建立起殖民政权”。[16]　156

在沿海地区，马兹鲁伊氏族反抗英帝国东非公司的接管，这次抵抗由姆巴鲁克·宾·拉希德领导，他组织打了就跑的战术打击武器优良的英国军队。英国人调来印度兵增援，才打败了他。姆巴鲁克逃往坦噶尼喀，落入德国人之手。马兹鲁伊抵抗战争的爆发是因为英国试图干涉沿海土著社会的内部事务。自从马兹鲁伊氏族在肯尼亚沿海的塔卡朗古定居后，他们逐步在沿海许多地方扩展势力。例如他们得到从沿海的米杰肯达人那里购买谷物的垄断权，从而逐步控制了沿海谷类的销售。1877 年和 1883 年之间，吉里亚马氏族反对这种垄断，当时在这两个氏族之间发生战争，马兹鲁伊被击败。此后他们与吉里亚马取得某种谅解，这两个社会由此成为贸易伙伴。英国人的来到，干扰了这种安排，也干扰了马兹鲁伊社会的内部组织，这就是马兹鲁伊抵抗英国人统治的一个理由。

1895 年，当瓦利·塔卡朗古去世时，英帝国东非公司要选择他们中意的当地朋友作

[12] S. K. 阿雷普·恩盖尼（Arap Ng'eny）引用，1970 年，第 109 页。
[13] 见 G. 穆里乌基，1974 年，又见G. H. 芒吉姆，1970 年。
[14] G. 穆里乌基，1974 年，第 152 页。
[15] R. I. 罗特伯格和A. A马兹鲁伊合编，1970 年，第 18 页。
[16] W. R. 奥奇恩（Ochieng），1977 年，第 89 页。

继承人，他们不要姆巴鲁克，虽然姆巴鲁克更有资格继承，可是他以反对英国人的存在著名。⑰ 为了这个原因，姆巴鲁克千方百计要用武力把英国人从海岸地区赶走。

居住在离沿海不远内地的阿坎巴人，厌恶英国人干涉他们的事务。1889 年英帝国东非公司建立马查科斯商站，引起公司与当地社会的敌意。公司代理人掠夺四周地区的食物和财产——主要是山羊和牛。这些人还干预当地人民视为神圣的宗教神龛。人民对此的反应是，他们在姆西巴·姆韦阿的领导下，于 1890 年组织对公司商站的抵制，⑱ 拒绝向公司出售食物。只是等到公司代理人F. D. 卢加德来到，与当地人达成和平协议（包括签订一份"歃血结盟"契约）才恢复和平。

在肯尼亚北部基西马尤内陆地区后面，欧加登索马里人、马兹鲁伊氏族和阿坎巴人抵抗英国入侵。英国人在 1899 年再次调来印度兵才把他们打败。泰塔人拒绝向英国人提供搬运劳力并抵制商队商人干涉他们的国家；1897 年英帝国东非公司的部队在纳尔逊上尉的指挥下包围泰塔人，纳尔逊在报告中说，泰塔人"作了一次最坚决的攻击……迎着枪炮冲锋。战斗持续约 20 分钟，最后敌人向四面八方逃跑，遗尸满地，其中包括姆万盖卡。"⑲ 纳尔逊本人和他的部下 11 人被泰塔人毒箭射伤。

157

肯尼亚西部各地区，在阿巴卢伊亚人中反应的格局都差不多，包括军事对抗和外交结盟。万加的国王穆米亚特别擅长使用外交手段。他把英国人看作同盟者，能够利用他们在整个肯尼亚西部扩展他的势力，帮助他打败近邻对手，如伊泰索人和卢奥人，他和他们争吵已久。万加诸王传统上有使用雇佣军为他们事业打仗的习惯。因此，在穆米亚的思想中，英国人也仅仅是可以使用的另一伙雇用兵。同样，在英国人看来穆米亚是个自愿的代理人，可协助他们扩张，完成对整个地区的控制。确实，英国占领肯尼亚西部主要是通过穆米亚的帮助完成的。这种恩惠英国官员也坦白承认，其中哈里·约翰斯顿爵士特别提到："他（穆米亚）从一开始就以衷心的善意来者待英国官员和英国保护的想法。在乌干达整个困难时期，他的影响十分有助于保证英国人和东海岸交通的安全。"⑳ 1949 年穆米亚去世时，另一个殖民地官员也表达同样的情绪。当时地区专员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参加了葬礼，他在仪式中发表演词的结束语说，"在东非早期历史中的一位伟大人物逝世了。"㉑

坦噶尼喀的反应

坦噶尼喀反应的格局和上述肯尼亚的格局相似，就是使用武力，同时也使用外交上的结盟。㉒ 1891年和1893年姆本加人和德国军队发生冲突，当时在基尔瓦后面的

⑰ W. R. 奥奇恩，1977 年，第 90 页。
⑱ 同上，第 91 页。
⑲ 上引书引用，第 24 页。
⑳ W. G. 埃格林(Eggeling)引用，1948 年，第 199 页。埃格林又说，"乌干达为此应深深感谢穆米亚。"
㉑ W. J. 埃格林引用，1950 年，第 105 页。
㉒ 关于坦桑尼亚社会对殖民者入侵的反应，详情见A. J. 泰穆 (Temu)，M. H. Y. 卡尼基编，1980 年。

腹地出现由哈桑·奥马里领导的武装抵抗。马孔德人反抗德国入侵一直延续到1899年。[23] 赫赫人在他们的领袖姆克瓦瓦领导下，在 1891 年同德国军队作战，打死敌人 290 名。[24] 德国遭此重大损失，准备复仇。1894 年他们攻击赫赫人地区，占领它的首府。但是领袖姆克瓦瓦幸免于难。他在被敌人追捕四年后，为避免被俘，自杀身亡。

坦噶尼喀的沿海地区的人民集合在阿布希里周围，并在他领导下组织抵抗。[25] 坦噶尼喀沿海社会和肯尼亚沿海社会一样，几个世纪以来，斯瓦希里和伊斯兰的文化占优势。这里的人口既有阿拉伯人也有非洲人，两者自由通婚并从事当地贸易。以后到 19 世纪时，沿海的阿拉伯人因为需要象牙和奴隶，在内地大大增加其商业活动。此种贸易繁荣的结果，在沿海地带建立起许多新城镇。德国人的来到威胁着这种贸易，因为德国人试图以自己的贸易来取代它。当地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对此十分忿恨，并组织抵抗。 158

阿布希里是这次抵抗的领袖，他生于 1845 年，他的父亲是阿拉伯人，母亲是奥罗莫人（加拉人）。他是第一批在沿海定居的阿拉伯人的后裔，是自认为当地人的一个部落的成员。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反对桑给巴尔素丹国在海岸的势力，甚至提倡独立。青年时代，他曾组织商队深入内地经营象牙生意。他用赢利所得，购得一座农场种植甘蔗。他还参加过对尼扬韦齐人的战争。这个经历使他能够集合战士在以后用来抵抗德国人。在他领导下，1888 年 9 月沿海人民火烧停泊在坦噶的德国军舰，并通知德国人在两天内离开海岸。稍后他们攻打基尔瓦，在那里杀死 2 名德国人，而后在 9 月 22 日带领 8000 士兵攻打巴加莫约。德国人称这次事件为"阿拉伯叛乱"，他们派遣赫尔曼·冯·维斯曼前往镇压。他于 1889 年 4 月到达桑给巴尔，攻打巴加莫约附近阿布希里的堡垒，把他赶跑。阿布希里向北逃到乌齐圭，在那里他被人出卖，把他交给德国人，1889 年 12 月 15 日德国人把他绞死在潘加尼。1890 年 5 月德军炮击并占领基尔瓦，沿海地区抵抗最终失败。[26]

上述这些人是在坦噶尼喀拿起武器保卫独立进行斗争的人们中的一部分。但是德国人（和在肯尼亚的英国人一样）实行和一个部族结盟来反对另一个部族的分而治之的手段。这类同盟者很多。现只举两个例子，坦噶尼喀的乞力马扎罗山和乌桑巴拉山附近的马里莱和基班加两个部族，他们把和德国人交往看作接交朋友打败敌手的机会。这些人像肯尼亚的万加人一样，他们甚至在被德国人大大利用（其程度超过他们所能理解）的时候还自以为正在利用德国人。无论如何，海岸地区的阿拉伯人忠诚地受德国人雇佣，就像他们受雇于英国人一样，他们提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第一批当地人员。

乌干达的反应

160

乌干达对英国殖民主义也出现同样格局的反应（见插图 7.1）。从 1891 年到 1899 年

---

[23] J. 艾利夫（Iliffe），1967 年，第 499 页。

[24] 同上，1969 年，第 17 页；也见G. C. K. 瓜萨（Gwassa），B. A. 奥戈特（Ogot）编，1972 a。

[25] A. J. 泰穆，见M. H. Y. 卡尼基编，1980 年，第 92-99 页；关于阿布希里抵抗的详情，参阅R. D. 杰克逊（Jackson），见R. I. 罗特伯格和A. A. 马兹鲁伊合编，1970 年。

[26] J. 艾利夫，1979 年，第 92-97 页。

159



图片 7.2 阿布希里首长(1845 年前后-1889 年)，1889 年东非沿海人民抵抗德国和英国殖民主义的领袖



图片 7.3　被废黜的布干达国王姆万加（1866 年前后-1903 年）和被废黜的布尼奥罗国王卡巴雷加（1850 年前后-1923 年），被流放到塞舌尔群岛。图为押往海岸途中

这段时间，发生布尼奥罗国王卡巴雷加的军队和卢加德及其他英国官员率领的殖民军之间的冲突。卡巴雷加多次被打败后，改用外交手段。他两次试图同卢加德达成协议，但后者对这些姿态未予重视。[27]布干达的卡巴卡叫姆万加，他多次试图为布尼奥罗国王说情，也没有效果。最后，卡巴雷加采用游击战术，也许这种战术在东非是第一次出现。他从布尼奥罗撤退到北部兰戈地区，从那里他一再对英国军队进行骚扰。当时占领布尼奥罗的一个英国军官瑟斯顿评论说："卡巴雷加老是施展常用的诡计——尽可能进行骚扰，就是从不站出来堂堂皇皇地打一仗，他宁愿使用拿手的暗杀手段。卡巴雷加叫人把毒药给对我们友好的酋长，那个酋长吃了便死，于是我叫人杀死那个毒人者"。[28]瑟斯顿的描述，是游击战术的典型例子，卡巴雷加撤往邻国，目的在于骚扰自己国土上的占领军。不久姆万加在兰戈与卡巴雷加会合，但是他们的隐藏处于1899年遭到突袭，两位国王都被俘虏并押至基西马尤，姆万加在那里死于1903年。在这段情节中，卡巴雷加和姆万加所做的既有军事对抗也有外交上的主动行动，这种情况在下文还要谈到。

19世纪最后10年，在东非不得不对付帝国主义到来的那些人中，最伟大的外交家恐怕要数布干达的卡巴卡姆万加。布干达于1894年被宣布为英国的保护国。当1894年姆万加登上王位时，看来他对欧洲人就有怀疑，当时在东非的欧洲人多半是传教士，他力求限制他的人民与他们交往。巴干达人中那些坚信基督教的人和不服从他命令的人以卖国贼处死。[29]直到今天，基督教徒还把那些被处死者奉为殉道者。可是，姆万加激烈抵制英国官员接管他的国家，即使这些人乔装打扮为传教士也难以幸免。对付经常争吵的不同教派，他的外交才干也很显著。在一个时候，他玩弄手腕，促使基督教的两派（天主教和新教）反对穆斯林，因为他认为后者势力太强，威胁他对自己国家的控制。在另一个时候，他又同穆斯林联合，反对天主教或新教或者两者都反对，这要看他认为哪一个对他统治更危险。因此，姆万加可算得擅长玩弄分而治之的外交游戏，这个策略殖民国家在控制非洲的过程中使用得十分有效。在事态需要时，姆万加也采用使一些古老传统复活的办法，试图把所有外国人统统驱逐出境，就像1888年发生的那样。[30]在这次事件中，他想诱使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巴干达追随者去维多利亚湖的一个岛上检阅海军，然后趁此机会把他们遗留在岛上饿死。在湖上举行海军演习是巴干达历代国王的传统。姆万加企图施用这个计谋赶走外国人。然而这个计划被泄漏了，于是外国人发动一场政变，废黜姆万加，另立他的兄弟接位作为傀儡统治者。可是以后在1889年，姆万加策划复辟，如上文已经提到，结果他于1899年被放逐到基西马尤，1903年死于该地。

162

但是，在与乌干达其余部分不一样的，后来被称为"巴干达准帝国主义"的地方，有一些人与英帝国主义有牢固联系。就是这些巴干达人，特别在签订1900年协定以后，竭力向该国的其余德分推行英国殖民主义。他们之中引人瞩目的是穆甘达的一个将军卡

[27] A. R. 邓巴（Dunbar），1965年，第82页。
[28] A. R. 邓巴引用，1965年，第93页。
[29] R. 奥利弗，1951年，第54页；也见R. P. 阿什（Ashe），1894年，第55-82页。
[30] R.奥利弗，1951年，第55页。

昆古鲁，他主要领头向乌干达东部和北部扩大英国统治。例如，当英国决定突袭兰戈地区卡巴雷加的隐藏处时，就是他俘虏卡巴雷加的。[31] 1900 年协定使巴干达成为英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推进的伙伴。巴干达成为这样的一个补给站，即乌干达许多早期殖民行政人员都是巴干达人。因而人们对殖民主义的仇恨，针对巴干达人甚于针对殖民主义本身。后来折磨乌干达的许多政治问题起源于英国人与巴干达人之间早期的伙伴关系。

殖民统治下的东非

在平定东非人全部反对和抵抗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建立起牢固的控制之后，殖民国家开始从政治上和更重要的从经济上改变这个地区。如上文已经提到的，第一批经济活动之一就是修筑铁路，如在坦噶尼喀境内通向乌桑巴拉和乞力马扎罗地区的铁路，在肯尼亚境内连接海岸和维多利亚湖盆地的铁路。

随着铁路的修筑，欧洲殖民者纷纷来此定居。其目的是使东非从属于欧洲经济的部署，以便调整这个地区经济使之适合出口。他们要把这个地区变成欧洲原料的来源地而不是一个工业化地区。 **163**

有些殖民官员和白人移民的态度是把这个地区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地方。如东非保护地的英国行政长官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说过："在东非，我们有了应付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与外界接触和人口稀少地区——的宝贵经验，在那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规定移民办法并根据是否有利决定对外开放或关闭。[32] 因此毫不奇怪，英国行政长官竭力鼓励欧洲移民尽可能多地接取肯尼亚高地的土地。乌坎巴尼是 19 世纪 90 年代肯尼亚被白人移民占据的第一个地区。但是在肯尼亚全部民族中，马赛人被白人占去的土地比其他社会更多。他们的土地两次被夺走。[33] 第一次是在 1904 年，当时他们被赶往莱基皮亚保留地；而后是在 1911 年，他们再次被迫迁移，把土地让给白人移民。在这两起事件中，殖民政府都声称马赛人曾与政府订有交出他们的土地的协定。可是在后一次事件中，马赛人向英国法院控告这个决定，毫不奇怪，法院判决他们败诉。这些所谓的协定不顾马赛土地权的性质。土地权属于占支配地位的年龄组。因为谈判没有提到年龄组，所以这个协定是马赛人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坦噶尼喀也有白人移民定居。到1905年，在坦噶尼喀共有白人移民284名。[34] 主要居住在乌桑巴拉和乞力马扎罗地区。

从一开始，移民就企图控制这些殖民地。例如，1902 年他们在肯尼亚成立了一个种植园主和农场主协会，竭力要求将肯尼亚高地保留给他们。[35] 尽管使用印度人来修筑乌干达铁路，还是不准许印度人在这个地区拓居。埃利奥特同意协会的这个要求，并限制印度人居住在紧靠铁路两侧。继埃利奥特之后，每一个保护地行政长官和殖民地总督都

---

[31] A. R. 邓巴，1965 年，第 96 页。
[32] C. 埃利奥特 (Eliot)，1905 年，第 103 页。
[33] M. P. K. 索伦森 (Sorrenson)，1968 年，第 276 页。
[34] W. 罗德尼，未注明日期，第 5 页。
[35] R. K. 坦格里 (Tangri)，1967 年。

采取不准印度人在高地居住的政策。印度人对这种歧视的对策是组织自己的协会，竭力要求分享在高地居住的权利。1907年，他们向前来视察东非的殖民大臣温斯顿·邱吉尔递呈诉陈，可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集团的争议才告解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肯尼亚的商品作物或种植园经济牢固地掌握在白人移民手里，他们排斥非洲人和印度人参与。这种事态大大影响了肯尼亚非洲人对白人存在的反应。

164 坦噶尼喀和乌干达的局势与肯尼亚不同。在坦噶尼喀，从南部开始，非洲人首先受传教士，后来受殖民地官员的鼓励，从事商品作物的生产，基本上是棉花和咖啡。并且，还建立了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场，到1908年，在坦噶尼喀棉花出口中非洲人生产量达三分之二，而到1912年，非洲人的份额超过70%。[36] 同一时期，在乞力马扎罗地区四周非洲人生产咖啡的产量也赶上白人移民的产量。坦噶尼喀发生变化的程度可以从所雇用的工资劳动的人数看出来。据估计1931年坦噶尼喀挣工资的非洲人为17万2千人，[37] 或者说约占当时有劳动力男性人口的五分之一。总的说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属东非经济活动比英属东非经济活动的水平高，在采矿部门和制造消费品几个部门差距尤大"。[38] 这样，到1914年，坦噶尼喀劳动力的组织和利用的目标转向创造盈余，而得到的盈余都被殖民国家和欧洲商业所侵吞。和肯尼亚的情况一样，坦噶尼喀的殖民者意图控制殖民地，并在这一时期承担支配一切的统治权。

与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相比，意义最深远的经济改组大致是出现在乌干达。根据1900年协定在布干达分配土地，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拥有土地的阶级，这个阶段将忠心于殖民制度。这次土地分配因为出现了地主和佃户，引起不同阶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发展。此外，可以理解，乌干达将成为非洲人农业生产占优势的国家。这点是阻止白人大规模移民的因素之一，而在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就出现白人大量移民的情况。乌干达和肯尼亚不一样，但和坦噶尼喀的情况差不多，殖民地政权努力把出口型经济放在本地人的手里。农民生产的商品作物成为乌干达经济的主要支柱。在布干达开端的事情，最终扩展到这个殖民地的其他部分，尤其在西部，那里的气候和布干达相似，有利于作物生长。到1907年以这种方式生产的棉花占乌干达出口总数的35%。[39] 一般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乌干达和东非其余部分一样，现金交易已有牢固基础。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卖给亚洲和欧洲商人。货币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进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业已奠定。

165 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条件使非洲人直接面临一系列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茅屋税的实施、劳动力的需求、土地进一步丧失、缺少政治自由以及原有文化遭到侵蚀。根据推行每一项措施的方式有所不同，在非洲人中引起或反对或接受的反应和反响也大有差异。

实施征税，主要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作为提高岁入的手段，而是一种迫使非洲人离开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进入货币经济的方法。白人移民的农场和修筑公路之类公共工程都

---

[36] W. 罗德尼，未注明日期，第9页。
[37] 同上，第10页。
[38] 同上，第14页。
[39] C. 埃利希（Ehrlich），1957年，第169页。

需要劳动力。非洲人的劳动条件常常很恶劣，而传教士和商人之类帝国主义更阴险的代理人还施加其他影响。

1914 年前东非的反殖民主义运动

在殖民主义早期，除了少数情况下出现较广大区域的协调行动外，每个地方的反应都不相同。在肯尼亚，和在东非其他地方一样，诸如马兹鲁伊人和南迪人之类的民族的早期反应旨在反对外国威胁，保卫自己的独立。随后在这个国家内地的反应旨在使人民摆脱压迫和殖民统治。虽然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斗争时期，但有民族主义斗争开端的迹象。肯尼亚西部卢奥人抗议教会的控制，导致 1910 年在约翰·奥瓦洛领导下建立独立教会。[40] 他开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后在吉库尤参加苏格兰教会，以后在马塞诺又参加圣公会的正教传教会。就在马塞诺时期，他宣称受上帝召唤，开始建立自己的宗教。B. A. 奥戈特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写道：

> 经过长时间争论之后，P. C. 尼安萨……授权给他去创办他自己的教会，因为他的传道不破坏良好秩序和道德标准。所以 1910 年奥瓦洛建立他的诺米亚·卢奥教会……宣称自己是先知，否定基督的神性。在后几年中，在他的教区内信徒发展到超过一万人，建立他自己的小学，并要求建立……不受"不适当教会影响"的中等学校"。[41]

以后在 1913 年出现蒙博崇拜运动，这是一种反对白人统治，但把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运动。从卢奥兰传播到古西，从而显示出它有传播到肯尼亚的其他部分的潜力。这个运动的政治内容是不加掩饰的。如同创建人奥尼安戈·丹德所解释的："基督教是腐朽的，它要它的信徒穿着衣服的习俗也是腐朽的。我的信徒必须让他们的毛发自由生长……所有欧洲人都是你们的仇人，这样的时间已经不远了，那时他们将从我们国家消失。"[42] 殖民政权对此运动的反应是镇压，正如他们镇压其他向他们的统治挑战的任何运动一样。 166

和上文描述的类似的运动发生在肯尼亚东部的阿坎巴人中，也是举起宗教的旗帜。这个运动开始于 1911 年，当时有个叫西奥图梅的妇女，据说有神灵附身。但是，不久这个运动由一个名叫基安巴的男青年接过去，他把它转变为肯尼亚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仇议运动。[43] 他组织某种警察武装，帮助他实行他的威胁。然而，他被逮捕后遭到流放。这一事件是对乌坎巴尼白人移民虐待非洲劳工的一种抗议。

总的说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个阶段，肯尼亚的早期反殖民主义运动发生在肯尼亚的西部和东部。海岸地区的吉里亚马人趁战争的机会于 1914 年起义反对殖民统治。他们拒绝迁移，不愿把海岸地区的土地让给白人移民。吉里亚马人曾几次和英国人

---

[40] M. P. K. 索伦森，1968 年，第 280 页。

[41] 见本书第 26 章；也见B. A. 奥戈特，1963 年，第 256 页。

[42] M. P. K. 索伦森引用，1968 年，第 280 页。关于偶像崇拜问题的详细论述，参阅B. A. 奥戈特和W. 奥奇恩，见B. A. 奥戈特编，1972 年。

[43] M. P. K. 索伦森，1968 年，第 281 页。

发生冲突。在马兹鲁伊人抵抗英国人期间，他们在吉里亚马人中寻找同盟者——他们过去的贸易伙伴——吉里亚马人供给他们食物。以后在19世纪，吉里亚马人同英国人发生冲突，因为后者禁止猎取象牙。[44]再一次在1913年，吉里亚马人抵制招收青年到欧洲人农场去劳动。他们还反对以殖民制度下的头人会议来取代传统的长老会议。所以，1914年的起义是上述一系列反抗的顶点。英国人的答复是烧毁房屋和没收财产。吉里亚马人像马兹鲁伊人及其他人民那样，采取游击战术，但最终还是遭到失败。

乌干达比肯尼亚要平静些。但是在1911年，乌干达北部的阿乔利人起来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45]这次起义是为了反对英国人征募劳力以及解除他们的武装。殖民主义主要关心的一点是确保殖民地人民在残酷剥削下变得无能为力。由于这个理由，重要的是不使他们拥有武器；由此殖民当局发起收集武器和解除殖民地人民武装的运动。阿乔利人拒绝自愿交出武器。可是，他们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失败了。

167　这个时期对东非殖民统治的最严重挑战是马及-马及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坦噶尼喀，起义中既依靠宗教又使用巫术（见插图7.1）。汤森博士精确地总结了作为德国殖民史的特征；他指出“德国殖民史最初的二十年中……土著人受到最残酷的对待和最不公正的剥削……殖民主义冒险家、官员和贸易公司掠夺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剥夺他们的自由，甚至常常横蛮和残忍地夺走他们的生命。他们持续、猛烈的反叛正是他们悲惨和无助的悲剧性的证据。”[46]这种事态不只限于德国殖民地，它是非洲整个殖民时期的典型特征。强迫劳动、征税、折磨和恶劣的工作条件汇合起来才触发了马及-马及起义。然而，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实施村社植棉计划。这个计划要求人民每年为此劳动28天。但是收益不归劳动者，他们得到的报酬如此微薄，以致有些人拒绝接受。非洲人的反应并不是反对种植棉花，他们乐意种植这种经济作物。他们反对的是这个特定计划，该计划剥削他们的劳动并威胁非洲人的经济，因为它强迫人民离开自己的农庄到村社农场去劳动。

这次反抗运动的领袖是个住在恩加兰比的叫金吉基蒂勒·恩格瓦勒的先知，他利用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向德国人挑战时把坦噶尼喀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他教导人们，全体非洲人的团结和自由是根本原则，因此，人们要在反对德国人的战争中联合起来争取自由，这场战争是神的意旨，人们在战争中将得到复活的祖先的庇护。为强调并具体表现非洲人民的团结一致，他们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神殿，他命名为“神庙”，并制备药水（马及）。他说，这种药水能使喝过它的信徒不受欧洲人枪弹的损伤。这次运动从1905年7月持续到1907年8月，扩展到坦噶尼喀南部三分之一面积达26,000平方公里的地域。根据G. C. K. 瓜萨所说：

> 卷入马及-马及运动的有20多个族群。从它的组织规模和参加族群的众多来看，马及-马及运动与以前对殖民统治的反对和抗拒相比颇为不同而且远为复杂，因为以前的反抗通常只限于一个部族的疆界内。与过去的反抗比较起来，马及-马

---

[44] C. B. 史密斯（Smith），1973年，第118页。

[45] A. B. 阿迪莫拉（Adimola），1954年。

[46] J. 艾利夫引用，1969年，第3页。

及运动是使传统组织规模起根本变化的革命运动。[47]

战争在 1905 年 7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爆发，第一批牺牲者就是创建人自己和他的一名助手，他们在 1905 年 8 月 4 日被处绞刑。他的弟弟接过他的衣钵，继承"尼亚姆古尼"的称号（这个地区三大神灵之一），继续制备和分发药水，但是它不起作用。祖先未曾像许诺那样复活，运动被德国殖民当局无情地镇压下去。 168

马及-马及起义是东非抵抗殖民统治的第一个规模宏大的运动。根据约翰·艾利夫的说法，它是"坦噶尼喀古老社会以武力摧毁殖民秩序的最后一次尝试"，[48]同时它确实是农民反对殖民剥削的群众运动。它震撼了德国人在坦噶尼喀的殖民政权，德国人的回答不仅仅是镇压这个运动，而且还放弃村社植棉计划。在殖民地的结构上也有某些改革，特别是关于劳动力的征用和使用上，这些改革旨在使殖民制度较为适合非洲人的口味。可是造反本身失败了，这次失败确实使"古老社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去"。[49]

总的看来，在 1890 年到 1914 年之间，东非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列强把殖民主义强加给人民，在大部分情况下使用暴力，即使有时把暴力伪装成法律形式。非洲人对最早冲击的反应是军事对抗结合外交努力，虽然他们为保持独立的奋斗终归失败。在未进行军事或外交行动的地方，除非殖民者发出直接要求，人们默默容忍或者保持冷漠。殖民主义的建立意味着非洲人民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彻底改变。实行征税、强迫劳动和普遍剥夺政治权利。不少非洲人对这些改变作出强烈反应，有些人缄默容忍。在坦噶尼喀和乌干达，一些非洲人转向生产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和咖啡。在肯尼亚，非洲人不得生产经济作物，那里的经济以白人移民为基础。我们已经概述了非洲人对这种处境的各种不同反应，还有许多情况要留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中继续论述。

（吴壬林译）

[47] G. C. K. 瓜萨，见T. O. 兰杰（Ranger）和I. 基曼博合编，1972 年，第 202 页。
[48] J. 艾利夫，1979 年，第 168 页。
[49] 同上。



中非非洲人的能动性和抵抗 1880-1914年

A. 伊萨克曼；J. 范西纳

169 本章① 论述1880-1914年间中非抵抗欧洲人统治的不断变化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非地区包括比属刚果（今扎伊尔）、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诸国。中非和大瓜分前夕非洲绝大部分地区一样，居住在这个地区的许多民族，有的已组成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的还是小规模的政治实体。② 属于第一类的有比属刚果的隆达和卢巴王国，安哥拉的洪贝和乔奎国家，姆韦尼-马塔帕的莫桑比克王国，尼亚萨兰的翁迪王国以及赞比西河流域和林波波河流域由恩古尼人和科洛洛人建立的许多国家。属于第二类的有尼亚萨兰的尧人和湖滨通加人，北罗得西亚的比萨人和拉拉人，莫桑比克的塞纳人、通加人和乔皮人，安哥拉的基萨马人、巴刚果人和洛安果人，以及比属刚果的洛加人、芒戈人、恩贡贝-布贾人和博瓦人（见插图8.1）。虽然史学家可能过高估计这些社会内部混乱和紧张的程度，可是那里政治上的分裂、部族和地方的排他主义以及相互对抗阶层之间的内部冲突③ 确是严重限制了中非各族人民对欧洲人作出反应的能力。尽管有这些促成分裂的倾向，但是对抗和抵抗仍是中非人民对付欧洲帝国主义征服和占领居主导地位的反应。

171 我们不准备一个一个国家挨个介绍其反殖民主义活动。而是集中论述具备本地区反殖民主义特色的典型格局。通过阐述参加者的不同目标来分析非洲人的反应，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

（1） 旨在维护本地社会主权的反对或对抗；

（2） 旨在改进殖民当局强加的某些特定暴政而进行的局部抵抗；

（3） 旨在摧毁产生这些暴政的外来制度而掀起叛乱。

---

① 本章的写作受委托于1975年，完成于1976年。

② 详情见本书第6章。

③ 我们使用“阶层”一词，指的是存在于建立殖民制度之前大部分中非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因为未做广泛的实地考察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情况和阶级形成的过程，要肯定地描写出这些社会真实的分层深度常常是不可能的。到19世纪中叶，在有些商业社会中，阶级关系已经代替亲属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可变因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另外许多情况下，没有足够的资料能使人们作出明确的区分。卡捷琳·科奎里-维德罗维奇（Coquery-Vidrovitch）、克洛德·梅拉苏（Meillassoux）、伊曼纽尔·特雷（Terray）和莫里斯·戈德利埃（Godelier）的著作虽然见解不是全部一致，但对前资本主义非洲社会阶级形成的分析有重要的理论上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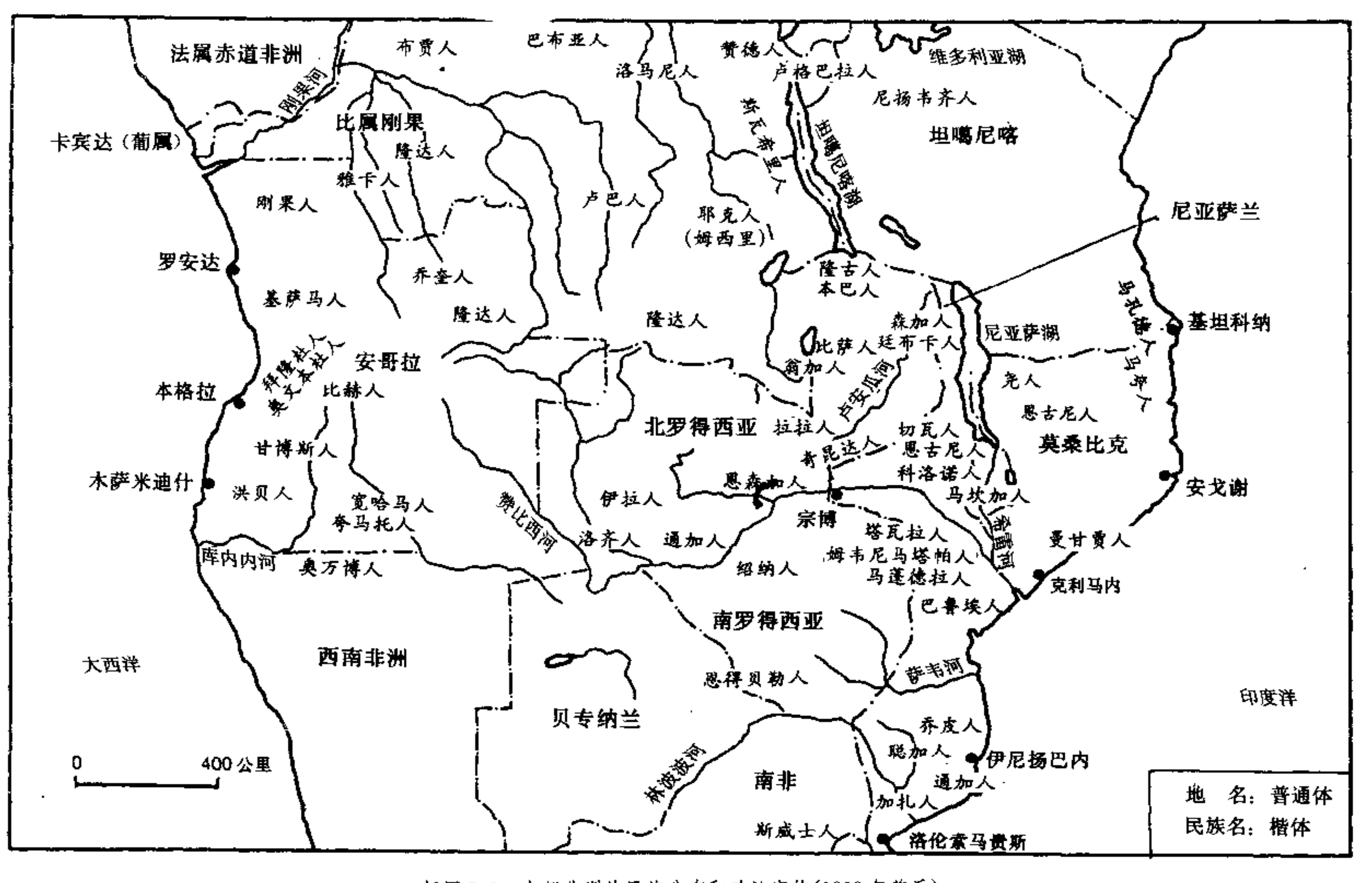


插图8.1 中部非洲的民族分布和政治实体(1900年前后)

——虽然，这里把局部的抵抗和全面的叛乱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参与这些抵抗和叛乱的人往往根据当时军事和政治的现实调整他们的目标。

维护独立的斗争：既有对抗又有结盟的时期

1880年以后，欧洲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加剧，这些国家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入侵非洲。柏林会议非常清楚地宣扬征服和占领的重要性，在这次会议上，有效控制成为欧洲占有领土得到国际承认的先决条件。中非人民的主权面临新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如洛齐人）使用外交拖延手段，而另一些人（如伊尼扬巴内的通加人和塞纳人）则同欧洲人结成联盟，努力从外来的非洲人贵族统治的高压下解放出来。许多中非国家和较小的酋长领地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自主权。虽然目标相同，但是他们的短期战略、部族构成、规模大小以及取得成功的程度却有很大不同。

中非人所采取的对抗战略有其普遍存在的同一理由。——他们要把欧洲人赶出去，保卫他们的家园、生活方式和生活资料。虽然政治独立的目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非洲许多国家也准备动员他们的一切力量来阻止对他们的文化自主和经济主权的侵犯。举例而言，在尼亚萨兰，戈马尼的恩古尼人于1896年攻击教会的传教所，部分是抗议基督教的破坏性影响，而在莫桑比克，巴鲁埃人挫败里斯本力图使当地王室人员改信天主教，把他们并入葡萄牙非正式帝国的企图。④ 经济侵略同样激发一些国家对欧洲帝国主义者采取敌视的态度。磨擦的主要原因是欧洲政府及其贸易和教会的代理人削弱某些内地国家中间人的地位，并终止与资本主义国家希望得到“稳定”的市场和原料不再相容的奴隶贸易。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间，尧人、马夸人、耶克人、奇昆达人、奥文本杜人、乔奎人以及其他一些部族猛烈抵抗这些外来的压力。同时许多农民和种植者为维护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和阻止掠夺他们的土地、牲畜、劳动力和妇女而进行斗争。

非洲领导人意识到，如果他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消除欧洲人武器上的优势。许多已经参加国际贸易的社会从进入武器市场得到好处，并以俘虏换取大量军火。在这一方面乔奎人、奥文本杜人和奇昆达人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他们的军队装备常常比企图征服他们的刚果自由邦和葡萄牙的部队还要优良。其他中非民族，先前没有大规模参与商业活动，他们也增加出口以获取现代化的枪炮弹药。例如，在19世纪最后25年，奥万博人、尚加安人，甚至几个非常保守的恩古尼人的支系民族在预期将同欧洲人冲突之前也购入现代化来复枪。⑤ 不论何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通过巧妙的外交途径扩充军火库。加

④ 关于葡萄牙竭力使用天主教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的论述，见A. 伊萨克曼（Isaacman），1973年；该书用人们口头流传的资料重新解释天主教仪式的意义。

⑤ W. G. 克拉伦斯-史密斯（Clarence-Smith）和R. 穆尔萨姆（Moorsom），1975年，第372-373页；该书研讨奥万博人对葡萄牙和南非殖民主义的冲击和反应；I. 林登（Linden），见B. 帕蔡（Pachai）编，1972年，第246-247页；该书谈到马塞科恩古尼人和英国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最早模式，提供不少有趣的资料；D. L. 惠勒（Wheeler），1968年，第585-602页；该书分析贡古尼亚内通过外交途径以求维护尚加安独立的努力如何最终遭到失败。



图片8.1　达巴酋长和人民一起接待一个欧洲人，1883年

扎人的领袖挑拨英国人反对葡萄牙人，并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武器，而本巴人（见图片 8.1）的战士从害怕英国人势力增强的阿拉伯人那里得到武器。[6] 其他国家如莫桑比克北部的基坦科纳和赞比西河流域的奇昆达人的政治实体甚至同意承认葡萄牙名义上的统治以换取大量武器的贮存，最终使用它反对里斯本的军队。[7]

不少非洲社会还通过内部军事革新增强他们的防御能力。巴鲁埃人办起了军火工厂，174 生产火药、来复枪，甚至制造大炮部件。[8] 人们还建筑起新式的大型防御工事，如科塔人的琼贝堡垒城镇和在赞比西河和卢安瓜河流域的阿林加斯（aringas）都是用来抵御欧洲人围攻的。[9] 其他非洲人，如马夸人、隆达人和活动在安哥拉南部甘博地区的一些互不隶属的部落，他们发展了游击战术，阻止帝国主义者最初的推进。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巴鲁埃人、塔瓦拉人、通加人和其他绍纳人中的巫师称为斯维基罗（svikiro）（见插图 8.1），他们提供一种神赋灵药，据说能抵销欧洲人的武器，并使敌人的子弹化为水。[10]

尽管许多非洲人全都主张阻止外国统治和得到现代化武器，但是他们使用的策略却有实质性的不同。在有些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激烈反抗欧洲人的早期入侵，尽管敌人拥有军事上的压倒优势。举例而言，切瓦人的领袖姆瓦塞·卡松古率领他的人民努力抵抗英国人遭到失败，最终于 1896 年宁愿自杀也不作俘虏。[11] 大约在同一时期，安哥拉的比赫人伏击一支企图穿越他们国土到内地建立据点的殖民军；南方的洪贝人，在里斯本拒付在他们境界内维持一个小堡垒权利的租金后，攻击葡萄牙的军队。[12]

另外一些非洲领导人则设法避免最初的对抗，希望能先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或通过谈判签订一项“公正”的条约，从而使他们国家的主权得到承认。几乎有十年时间，贡古尼亚内（图片 8.2）同英国人和葡萄牙人谈判，准备作出各种让步，只要不拒绝承认尚加安的独立。[13] 巴鲁埃的王室采取同样的政策，以谋求德国冒险家卡尔·彼得斯的支持，他们认为此人同俾斯麦政府关系密切，而 19 世纪末本巴人的零星抵抗是经过 15 年与英

---

[6] D. L. 惠勒，1968 年，第 591 页；A. D. 罗伯茨（Roberts），1974 年，第 202-203 页：该书是已出版的研究本巴人的最有价值的著作。

[7] N. 哈夫金（Hafkin），1973 年，第 375-377 页：该书对奴隶贸易和为保护传统而抵抗葡萄牙的史实作了重要分析；A. 伊萨克曼，1976 年，第 22-49 页：该书分析各种类型的抵抗运动，特别强调反殖民武装政治觉悟的日益增强。

[8] J. 德·阿泽韦多·科廷奥（J. de Azevedo Coutinho），1904 年，第 46-47 页：该书描述 20 世纪初葡萄牙人与巴鲁埃人的战争。

[9] M. D. D. 纽伊特（Newitt），1973 年，第 226-229 页：该书对强大的普拉泽罗家族以及他们同里斯本的关系作了重要分析。作者并在《种族》和《非洲历史杂志》上发表大量研究有关问题的著作。

[10] J. 范西纳（Vansina），1969 年，第 21-22 页；并见A. 伊萨克曼，1976 年，第 49-74 页、126-156 页：该书介绍绍纳人使用药物使欧洲武器失效的事迹。

[11] R. 坦格里（Tangri），1968 年，第 2-4 页：该书概述马拉维人最初抗议的格局。

[12] R. 佩利西埃（Pélissier），1969 年，第 67 页：该书是安哥拉南部发生多次战争的完整记录。作者最近即将完成一部安哥拉军事史总论的书。D. L. 惠勒，1963 年，第 334 页：该书对 19 世纪葡萄牙殖民政策作了全面研讨。

[13] J. J. T. 博泰尔霍（Botelho），1934 年，第二卷，第 419-433 页：该书是莫桑比克标准军事史，第二卷特别着重 19 世纪后期的军事冲突。D. L. 惠勒，1968 年。



图片8.2 贡古尼亚内和他的战士

176 国外交折冲后才发生的。⑭在最极端的例子中，像莫桑比克北部的基坦科纳和赞比西河流域的奇昆达帝国这样的国家，甚至愿意承认葡萄牙名义上的统治，只要对方不作认真努力对他们强加殖民统治。⑮然而这种战略必然招致对抗，因为柏林会议有明确的要求，即有效控制是国际承认占有殖民地的先决条件。无力进行有效反抗或者不理解殖民统治含意的许多中非社会，一开始不经抗拒地屈服了，但不久即起来努力争取恢复独立。这种延迟对抗的格局在刚果普遍存在。那里的土著人开始时认为所谓刚果自由邦的代理人是贸易伙伴和反对外国奴隶贩子的同盟者。只有当自由邦的官员们企图征税和征用劳力时，当地社会才认识到他们已经不经心地放弃了他们的自主权。在1885年到1905年期间，十几个名义上“被征服”的部族在刚果河的下流和中流叛乱。⑯在这些部族中最成功的是雅卡人，他们在1906年最后被征服以前，和欧洲人有效地作战超过十年。布贾人和博瓦人在19世纪末因反对橡胶种植园的强迫劳动而叛乱。在斗争达到高潮时，叛乱者发动5000多名工人，从他们在森林深处的基地出发，进行一场持久的游击战争。⑰

除最初反抗的形式不同外，抵抗者的地方观念和部族排他主义的程度也不一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些或大或小的社会，它们在抵抗入侵者时往往并不争取建立广泛的联盟。在安哥拉，比赫人、洪贝人和甘格拉人开始抵抗外国入侵者时，并没有得到共同仇恨葡萄牙的邻邦的支助，⑱而在莫桑比克，里斯本从奇昆达人的一些相互征战国家间的强烈争斗中得到好处，这些小国根本没有考虑相互结成有效联盟的可能性。甚至关系密切的一些恩戈尼人国家面对英国人在尼亚萨兰扩张时也不能或者不愿彼此合作。19世纪

177 90年代，马塞科人、戈马尼人和姆佩泽尼人都单独同为数不多的英国殖民军作战而被压服，他英国能够建立尼亚萨兰殖民地。⑲有时候在同一个国家内相互争斗的派别面对欧洲人入侵而不能团结，这只能说是他们目光短浅的排他主义逻辑的延伸。有许多例子说明对立的派别为了希望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国家。此种分裂的倾向削弱卢巴人和巴鲁埃人保持自主权的努力。⑳在巴鲁埃人的事例中，里斯本通过帝国代理机构——莫桑比克公司，诱使巴鲁埃贵族政权中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成员奇皮图拉与

---

⑭ A. 伊萨克曼，1976年，第49-74页；A. D. 罗伯茨，1974年，第229-292页：该书叙述巴鲁埃人尽力争取德国人支持的惊人事迹，见C.（K.）彼得斯（Peters），1902年，第116页。

⑮ N. 哈夫金，1973年，第375-377页；A. 伊萨克曼，1976年，第22-48页；M. D. D. 纽伊特，1973年，第295-311页。

⑯ C. 扬（Young），1965年，第283页（地图5）；F. 弗拉芒（Flament）等人，1952年，第106-531页；A. 勒热纳-肖凯（Lejeune-Choquet），1906年：该书详细叙述一些较小的起义，关于原始式抵抗叙述较多。也见于R. 哈姆斯（Harms），1975年，第73-88页。

⑰ F. 弗拉芒等人，1952年，第162-164页，449页：该书介绍领土被军事占领直到1908年的国家。参照M. 普朗卡尔（Plancquaert），1932年，第134、138页。

⑱ R. 佩利西埃，1969年，第67-72页；D. L. 惠勒，1963年，第334页。

⑲ J. 麦克拉肯（McCracken），见B. 帕蔡编，1972年：该书论述恩古尼人对欧洲人入侵的不同反应。I. 林登，见B. 帕蔡编，1972年，第241-244页。

⑳ J. 范西纳，1966年，第242-244页：该书综合研究殖民前的中非，着重点在扎伊尔。A. 伊萨克曼，1976年、第49-74页。

它结成秘密联盟。奇皮图拉同意承认葡萄牙的最高权力，以换取葡萄牙帮助他反对内部对手汉加。

也有一些非洲政治实体设法组成了有广泛基础的多部族反殖民主义联盟，以克服他们军事力量有限的弱点。例如，强大的加扎统治者贡古尼亚内向斯威士人呼吁，请其参加对葡萄牙人的斗争，而巴鲁埃人则建立多部族的联络网，包括通加人、塔瓦拉人和住在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不同部落的绍纳人。[21] 这种临时联合最经常出现在原来已经存在经济、亲属或宗教联合的地方，巴鲁埃人的情况就是典型。在马坎朱拉领导下的尧人联盟和马夸-斯瓦希里同盟，具备全部三种因素，而财政上的考虑是 19 世纪末命运不济的本巴-阿拉伯合作的基础。[22] 偶然，也有年代久远的敌对者为了争取生存，抛弃他们间宿怨，如中部隆达人和乔奎人反对刚果自由邦的联盟就是属于这一种。尽管它们相互间的敌意可以追溯到前一个世代，他们还是组成了联盟。同样的考虑也促使姆布鲁马的恩森加人和塔瓦拉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帮助奇昆达人以及安哥拉南部宽哈马人和夸马托人结成的联盟。

毫不奇怪，部族排他主义的程度和抵抗运动的规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凡非洲社会单独作战的地方，他们军队的规模和他们抵抗的潜力，总的说来总是有限的。恩古尼人国家和姆瓦塞·卡松古的切瓦人很快遭到灭亡，反映出孤立的政治实体面临的固有不利条件。有广泛基础的联盟常常能把庞大的装备良好的军队投入战场，一般能作持久的抵抗。马坎朱拉和他的尧人同胞的军队估计有 2.5 万人，相等于宽哈马-夸马托联盟的军队和巴鲁埃人军队的总和。[23]　178

因为抵抗运动未能达到最终的政治目的，就产生一种缩小和无视眼前军事成就和把抵抗运动一概视为失败的倾向。事实上帝国主义军队规模的大小、现代武器的多寡和准备是否充足都可以促成大幅度的形势变化。在许多非洲国家很快就被打败的同时，同样也有许多国家遏制住了最初的欧洲人入侵，并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在安哥拉南部，洪贝人和夸马托人击退葡萄牙人多次进攻，并在 1904 年的战役中杀死葡军派遣部队 500 人中的 300 人。[24] 奇昆达人国家在 19 世纪最后 10 年中接连多次打败里斯本组织繁乱的军队，而在北部尼亚萨兰，尧人使英国殖民军陷于困境达5年之久。[25]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刚果，乔奎人在最后屈服之前的 20 年间给刚果警察武装以重大的损失。[26] 也许最成功的要算斯瓦希里-马夸联盟，他们保持在葡萄牙人统治范围之外，直到 1910 年，而夸马

[21] P. 沃赫斯特（Warhurst），1962 年，第 59 页。

[22] A. D. 罗伯茨，1974 年，第 242、271 页。

[23] E. 斯托克斯（Stokes）（1966 a），见E. 斯托克斯和R. 布朗（Brown）合编，1966 年，第 267-268 页：该书研究洛齐人在莱瓦尼卡领导下求生存的策略；R. 佩利西埃，1969 年，第 103 页；J. 德·阿泽韦多·科廷奥（J. de Azevedo Coutinho），1904 年，第 43 页。

[24] R. 佩利西埃，1969 年，第 79 页。

[25] A. 伊萨克曼，1976 年，第 22-48 页；E. 斯托克斯（1966 b），见E. 斯托克斯和R. 布朗合编，1966 年，第 366-368 页：该书研究英国人的策略和马拉维各部族的反应。

[26] J. 范西纳，1966 年，第 226-227 页。

托人和宽哈马人到1915年才最后遭到失败。[27]

尽管有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功，但所有中非的独立战争最后全都失败了。这里有几个因素（这些因素大部分出现在大瓜分之前）有助于说明非洲人未能阻止欧洲人推进的原因，其中包括：非洲许多强大国家有征服小国的历史与传统；部族排他主义；统治阶层或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有时还有统治阶级和他们人民之间的分裂。上述因素的纯效果必然限制进行大规模有广泛基础和互相协调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可能性，而这种斗争却是抵销欧洲帝国主义军队拥有的火力上和军事技术上明显优势所绝对必需的。

此外，非洲人之间的激烈争斗，便于列强分而治之战略的施展，这些战略哈里·约翰斯顿和其他殖民官员运用得非常巧妙。在维护非洲独立和主权斗争的编年史中，不仅充满着非洲人投降于欧洲人的史实，而且还有大量为了报复过去他们邻国对他们的凌辱，因而帮助殖民国家的非洲人的事例。如伊尼扬巴内的通加人和塞纳人帮助葡萄牙反对尚加安人和巴鲁埃人君主；而在刚果，有些被统治者同比利时人合作，使自己从耶克人和阿拉伯人统治下或从捕捉奴隶者手中获得解放。此外，有些非洲领导人认为，同欧洲人联盟能够实现他们扩张主义的欲望，同时并能加强他们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这种考虑促使提普·提卜以及姆西里的几个儿子帮助刚果自由邦。[28]还有一些非洲社会，包括一些开始时反对入侵者的社会，它们后来同入侵者结盟，[29]以换取物质利益和在新的殖民地秩序下提高地位的许诺。这样，一旦尧人被打败，他们就帮助葡萄牙人征服姆佩泽尼的恩古尼人，转过来姆佩泽尼的恩古尼人又被葡萄牙用来打败巴鲁埃人。

如果没有非洲同盟者和非洲雇佣兵，欧洲人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人力代价，实现他们的统治。例如，葡萄牙军队最后于1902年“征服”赞比西河流域时90%以上的人员是被征募的非洲人。[30]安哥拉也存在同样的格局，虽然在程度上较轻。在北部，刚果自由邦的军队是由征集来的非洲士兵和一些桑给巴尔和豪萨的雇佣兵组成，只有军官才是欧洲人。哈里·约翰斯顿分而治之政策的成功也表现在大量非洲人参加英国占领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的举动。

早期反对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局部抵抗

殖民制度建立之前的抵抗，目的在于保持独立。20世纪初期农民和工人的抵抗与之

[27] N. 哈夫金，1973年，第384页；M. D. D. 纽伊特，1972 b，第670-671页：该书论述葡萄牙人和从事奴隶贸易的上层非洲人物之间相矛盾的利益以及对安戈谢地区的最后征服。R. 佩利西埃，1969年，第102-108页。

[28] L. 法兰特（Farrant），1975年，第108-111页；R. 斯莱德（Slade），1962年，第94-102页。关于姆西里的儿子穆昆达·班图，见A. 穆农戈（Munongo），1948年；L. 比特雷米厄（Bittremieux），1936年，第69-83页。此人几乎被桑加人完全唾弃。

[29] J. 麦克拉肯，见B. 帕蔡编，1972年，第227页；A. J. 达奇斯（Dachs），1972年，同上书，第288-289页；A. 伊萨克曼，1976年，第49-74页：该书研究所谓合作者的动机与影响，是这方面少数著作之一。

[30] 有些史学家喜欢用“合作”一词来代替结盟，对“合作”的理论分析见A. 伊萨克曼和B. 伊萨克曼（Isaacman），1977年，第55-61页。本卷编者反对使用“合作”这个词的理由见前面的引言。

不同，是直接由殖民政权力图巩固其霸权和推行旨在剥削中非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关系所引起。虽然对葡萄牙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殖民体制的详细考察和比较不 180 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但探讨一再引起局部抵抗格局的殖民制度固有弊端是很有用处的。[31]

殖民地官员们最关心的是把控制殖民地人民行动的行政体制制度化。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罢免相当一部分和他们不合作的"传统的"统治者，从而破坏了传统王位在宗教上和文化上的神圣性。占领者为加强他们脆弱的统治，派遣从雇佣军和同盟者的士兵中抽调来的非洲人警察，监视"殖民地酋长"的行动和威吓当地的老百姓。由于这些人希望升官发财和独占权力，所以，刚果、安哥拉、莫桑比克殖民政府所属的警察和英属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的土著警察都掠夺财物和一再滥用他们的权力，就不足为怪了。

殖民国家为向政府公共工程项目和欧洲人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贮备，采取强迫劳动的办法，并开征沉重的税收。

在刚果，非洲人被迫收割橡胶和在铁路及矿山上劳动，而在莫桑比克，各种多国特许公司是强迫劳动的主要获利者。有一些莫桑比克人被输往南罗得西亚、南非和圣多美，在圣多美他们同几千安哥拉人一起在可可种植园劳动。尽管细节各异，在征用非洲人到尼亚萨兰欧洲人的种植园以及随后到北罗得西亚矿区劳动时，这种强迫和恐吓的方式却是一再使用。[32]

留在家乡的农民也难免受征发。法律规定许多农村人口要在公共工程项目中义务劳动几个星期，否则立即要坐牢。他们还受当地官员贪得无厌的勒索，而且经常被迫以压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

总之，非洲人民在殖民统治下要付出沉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家庭或是临时或是永久地被拆散，当地农民生活在随时有遭欧洲人和当地雇佣兵凌辱的恐怖之中。在经济领域里，许多地区输出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从而加剧了原有的劳力不足，造成农业的停滞 181 和不发达。

这些暴政一再引起农民和工人的抗议，他们的目的在于减轻某些特定的苦情，而不是想消灭产生这些苦情的压迫制度。由于这种零星偶发的性质，许多局部的反抗往往被当代人同样被历史学家所忽视，尽管如此，"日常无形的抵抗"、离开劳动场所、"社会盗匪"[33] 和农民叛乱构成中非反殖民制度史的重要章节。

像美国南方的奴隶一样，许多非洲农民隐蔽地抗拒压迫性的制度。由于两者都缺乏

[31] 关于各个殖民政权政策的论述，阅T. O. 兰杰（Ranger），见L. H. 甘恩（Gann）和P. 杜伊格南（Duignan）合编，1969年；J. 斯滕格斯（Stengers），同上书；R. J. 哈蒙德（Hammond），同上书；G. J. 本德（Bender），1978年；E. 蒙德拉纳（Mondlane），1969年，第23-58页；H. 梅皮洛（Mebeelo），1971年，第71-90页；B. S. 克里什纳穆蒂（Krishnamurty），见B. 帕森编，1972年，第348-405页；A. A. 鲍维达（Boavida），1967年，概述葡萄牙在安哥拉的剥削。

[32] 关于强迫劳动的论述，见J. 达菲（Duffy），1967年；H. W. 内文森（Nevinson），1906年；C.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1972年。

[33] 这个词由于作者们的坚持而保留下来，本卷编者宁愿使用"义勇队活动"这个词组。

足够的力量，直接对抗不是可行的战略。于是他们通过逃税、怠工、偷偷地毁坏财产以表达他们的仇恨。像在美国那样，大多数欧洲人把这些“日常无形的抵抗”方式看作被统治者驯良与无知的不言自明的证据，而不是看成不满的表示。[34]

逃税在整个中非非常普遍。就在收税人员到达之前，所有或部分的村民逃往难以抵达的地方，直到国家官员离去。在北罗得西亚，关巴通加人是出名的有本领的逃税者，他们的邻人比萨人和翁加人也一样有本领，他们逃往巴圭卢沼泽地带。[35]这种做法在莫桑比克也非常普遍，以致一个官员厌恶地说，“不知有多少次六个或更多的成年人成批从村庄逃走，只留下一个免税的瞎子、病人或老人。”[36]那些有幸住在国境线上的非洲人，他们能在国境线两边来回移动，以躲避两方殖民地的税务人员。雅卡人周期性地逃过宽果河，这条河是划分安哥拉和刚果的边界线，而他们的同胞利用没有人巡逻边界线的有利条件进入法属刚果，留在那里直到当地税务官员前来骚扰。[37]住在尼亚萨兰-莫桑比克边境米伦杰地区和住在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之间盖雷齐河谷农村中对现实不满的人们同样使用这种策略。

182

农民们还想出一些逃避或减轻强迫劳动痛苦的办法。在最极端的状况下，如发生北罗得西亚的南瓦纳人和隆古人事件时，他们拿起武器，把征集人员驱逐出境。[38]对强迫劳动的不满还激发下刚果曼詹加人1893-1894年的暴动和橡胶收集地区无数次的起义。[39]其他危险性较小的策略包括假装生病、怠工、罢工和逃跑。在北罗得西亚阿伯康地区殖民官员一再抱怨说非洲人“磨洋工，必须有计划地加以鞭策。”最后工人完全停止劳动，直到保证给他们一份工资。[40]不愿意合作和频繁的旷工，使欧洲的官员们确信非洲人天生是懒惰成性。一个葡萄牙的行政官员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因为待遇坏而逃跑，他们也没有一点逃跑的其他正当理由……这样，我只能得出结论：他们逃离所做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几乎所有人都流露极不情愿工作的情绪。”[41]

---

[34] 对这个问题最早的论述，见R. A. 鲍尔(Bauer)和A. H. 鲍尔(Bauer)，1942年，第388-419页。最近对这一主题进行讨论的，有约翰·W. 布拉辛格姆(Blasingame)、尤金·吉诺维斯(Genovese)和彼得·科尔钦(Kolchin)等学者

[35] R. I. 罗特伯格(Rotberg)，1966年，第75页：这是一本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史，内有对殖民主义早期局部抵抗的资料。H. S. 米贝洛（Meebelo），1971年，第97-98页：该书是对抵抗运动（包括很少有人论述过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重要研究著作。

[36] A. A. C. 泽维尔（Xavier），1889年，第25-26页：该书是对葡萄牙统治的重要当代论著，包括局部抵抗的事例。

[37] G. 穆勒尔(Moulaert)，1945年，第28-43页：该书叙述1885年和1893年马尼扬加当地人民如何反对当局同法属刚果划定边界的企图，以便人们能够在搬运物件时逃走。1902年发生的新的边界事件引起外交上的对抗，边界最后在1908年划定。沿整个边界线，居民一会儿到边界的一方，一会儿又到另一方，逃避收税官和强迫的征集。这种叙述方式在文学和传说上多有出现。

[38] H. S. 米贝洛，1971年，第90-91页。

[39] F. 弗拉芒等人，1952年，第498-499页。

[40] H. S. 米贝洛，1971年，第95-97页。

[41] 20世纪基金会莫桑比克历史档案，Cx. 4-185，m. 37：安多尼奥·戈梅斯（Gomes）致政府副行政长官马塞克塞函，1916年11月18日。

其他心怀不满的工人破坏农业设备，焚烧仓库和抢劫属于特许权公司和当地商人的存货，以及毁坏运输和通讯线路。

逃越边界线是另一种表示不满的常用办法。虽然由于大批出走都是秘密进行的，难以作出确切的估计，但看来规模是很大的。据英国官方记载表明，在1895年到1907年之间，居住在赞比西河流域的非洲人逃往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人数超过5万，这些人误认为英国殖民主义比较仁慈。[42] 由于国界两侧通常存在同一或有亲缘关系的部族，这就使奥万博人和巴刚果人从安哥拉撤离，绍纳人和切瓦人从莫桑比克撤离十分方便（见插图8.1）。在尼亚萨兰，大量湖滨通加人和通布卡人为逃避付税从鲁库鲁流域迁移到英国人控制范围之外。[43]

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建立起难民社会，这也是撤离策略的一种变体。许多拒绝履行“法律”责任的农民，他们不越过国际边界，而是建立自治的飞地。这种现象发生在逃进内地的不满现状的本巴人中比较普遍。“没有人能到达那里，飞地上的居民获得他们拼命加以保卫的独立”。[44] 安哥拉南部的甘博地区也有同样的格局出现，那里成为犯法者和对现状失望者的避难所，莫桑比克与南罗得西亚之间崎岖的盖雷齐山地和刚果的森林和多山地带也是如此。[45] 虽然我们对这些社会的内部组织知道得很少，他们保持自由的意愿和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艰苦地域的决心，和美洲逃亡奴隶建设在荒岛上的孤独社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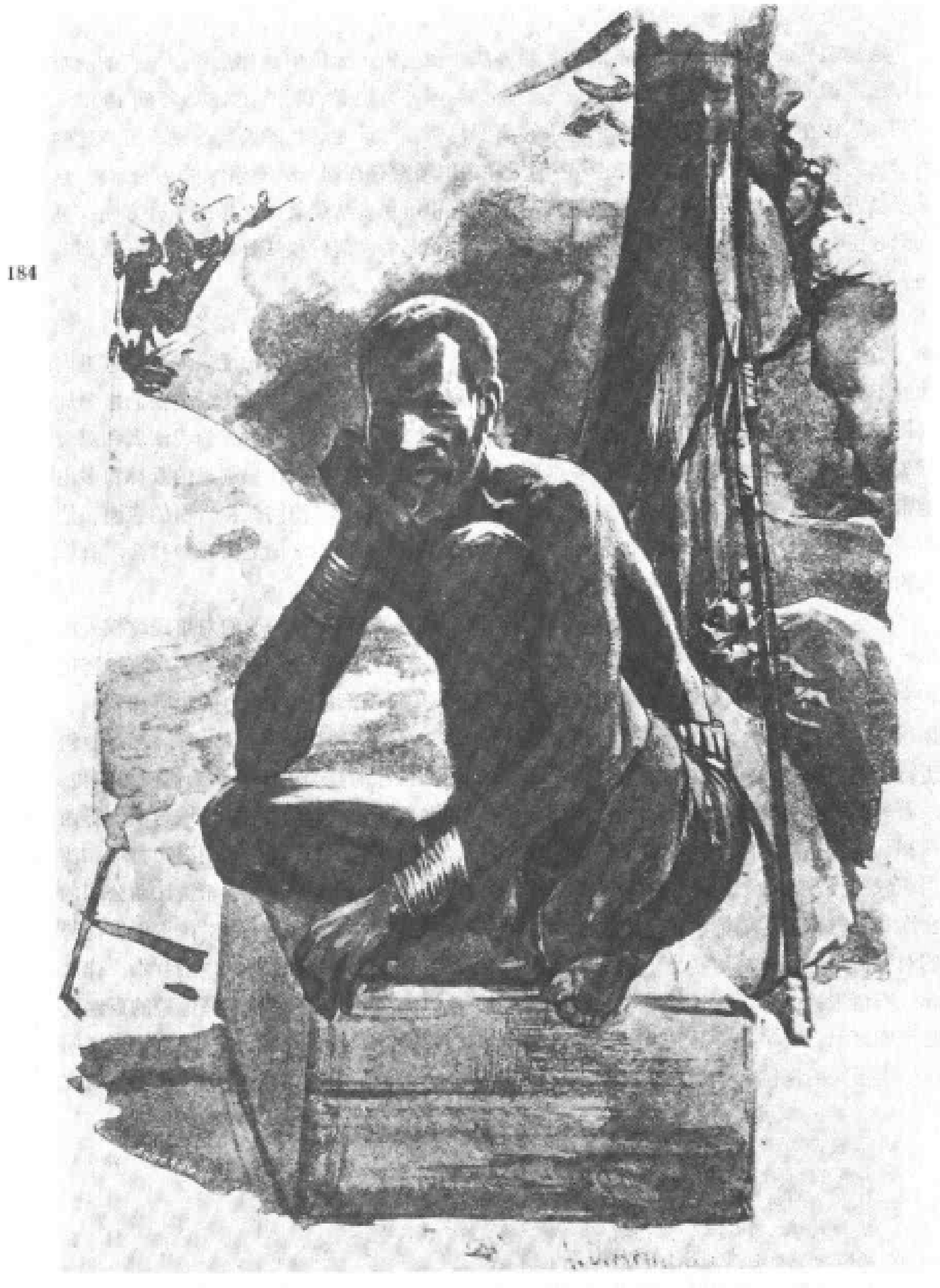
183

还有一些亡命的社会，则不满足于仅仅处在欧洲人控制之外，他们对殖民政权采取挑衅的姿态。他们袭击农村压迫的特定象征——诸如，种植园、劳工征集人、收税官吏和非洲人警察——以保护他们出生的村庄和有亲属关系的部族不受无穷的折磨和剥削。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分析，[47] 像西西里或巴西东北部的“社会盗匪”一样，领导他们进行攻击的首领虽然破坏殖民政权的法律，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没人认为他们是罪犯。最著名的“社会盗匪”首领叫马蓬德拉，他在1892年到1903年之间成功地与南罗得西亚和葡萄牙殖民军作战，同时保护当地农民不受收税官吏、招工者、剥削公司官员和滥用职权的行政官的欺凌（见图片8.3）。马蓬德拉及其一伙追随者一再袭击赞比西公司的仓库和农村商人的店铺，这二者都是经济剥削的象征。这些反叛者能够对抗占压倒优势的对手而生存下来，这是由于他们受到农村人民的一贯支持，按时供给他们食物、弹药和战略情报。[48] 还有许多别的“社会盗匪”在莫桑比克活动，其中包括马蓬德拉的后继人丹巴库尚巴、莫韦和萨马昆古，也有一些活动在安哥拉南部的威拉高地，这种情况说明这一类形式的抵抗是普遍存在的，对中非其他部分的有关情况也须加以探索。[49] 初步研究

---

[42] C. 威斯（Wiese），1891年，第241页。
[43] J. 麦克拉肯，见B. 帕森编，1972年，第227-228页。
[44] H. S. 米贝洛，1971年，第102-103页。
[45] R. 佩利西埃，1969年，第76页。
[46] 见R. S. 普赖斯（Price），1973年，第1-30页。
[47] E. J.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9年。
[48] A. 伊萨克曼，1977年。
[49] A. 伊萨克曼，1976年，第97-125页；W. G. 克拉伦斯-史密斯，1979年，第82-88页。

184



图片 8.3 马莲尚拉(1904 年卒)。1894 到 1903 年间,在南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抗击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统治的游击战争的领袖

表明，同样类型的抵抗在刚果也经常发生。沙巴省卡松戈-尼姆博的战事、基安富及其雅卡人追随者的袭击以及卢巴人对奎卢叛乱的支持，看来都与"社会盗匪"模式相符合。

有时，征来用于镇压反叛者的非洲人雇佣军本身也起来造反，抗议他们自身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的殖民政权暴政。低工资、粗暴的惩罚和欧洲官员的任性行为，通常会促使暴动的爆发。最著名的军队叛乱发生在刚果自由邦，1895 年那里路路阿堡的守备队全部叛变。由不满现状的无军衔军官率领，士兵杀死据点里的指挥官，以报复他残暴的统治。叛军控制大部分开赛省达六个月以上，但是最终被忠于自由邦的军队击败。[60] 两年以后又发生大量的野战军叛变。[61] 虽然关于葡萄牙殖民军中非洲士兵不忠行为的文字记载十分简略，可是殖民军向反殖民武装投诚的几次事例和 1917 年的特特人叛乱，至少说明存在仇恨的对抗暗流。[62]

185

在殖民时代早期，发生过许多次农民叛乱，但往往是比较局部性的，维持时间不长。农民很少能巩固初步所得的战果，也很少把他们的目标从攻击压迫他们的象征对象转变为攻击整个殖民制度。一般说来，增加和更严厉执行税收和对劳力的需求往往促使农民起义爆发。赞比西河流域从 1890 年到 1905 年间，至少有 16 次不同的起义发生。这些叛乱大部分针对莫桑比克公司和赞比西公司，里斯本把莫桑比克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给予它们控制。这两家投资不足的公司企图用强制征收沉重的茅屋税和输出劳力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些做法激起起义。[63] 在这个时期，安哥拉也发生几次小规模的起义。在 20 世纪最初 10 年间，伊拉人、关巴通加人和西隆达人中的农民叛乱与北罗得西亚的英国官员有关，而在刚果，据保守的估计，局部的农民起义每年在 12 次以上。[64]

虽然这些起义大部分是无定形的，千变万化的和限于地方性的，但在有些事例中参加起义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后来参加有更广泛基础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在莫桑比克南部的情况就是如此，那里通加农民在 1894 年征税叛乱被镇压后，就参加贡古尼亚内的起义；在赞比西河流域，塞纳人和通加人农民于 1898 年参加坎布恩巴叛乱。[65] 20 年以后，改信基督教的对现状不满的图兰特·阿拉瓦罗·布塔能够组织起反对葡萄牙人增加征集劳工人数的巴刚果人的群众运动。最后他的同盟者不但包括信天主教的北部农民，而且还有南部近期转信新教的巴刚果人。[66]

186

[60] 迄至目前为止，最好的记载是M. 斯托姆（Storme），1961 年，但它仅是长篇有计划研究著作的第一部分。这次叛变的人员一直战斗到 1908 年。

[61] F. 弗拉芒等人，1952 年，第 383-460 页。比曼尤（Bimanyu）论述这个主题的博士论文即将发表。

[62] 罗得西亚国家档案馆，N 3/26/2/2，R. N. L. B. 卡尼恩巴（Kanyemba）致总经理函，R. N. L. B.，1917 年 5 月 12 日。

[63] A. 伊萨克曼，1976 年，第 97-125 页。

[64] 1909 年前，零星迹象可在《地理运动》和《比利时殖民地》见到。从 1909 年到 1959 年，更明确的资料可以在《众议院公报》中找到。F. 弗拉芒等人，1952 年，第 530 页，提到从 1893 年到 1911 年单在开赛省就有 12 次重大的战斗。开赛省是大规模抵抗（由安哥拉获得军火）最著名的地方。公报提到每年进行警察行动的次数。另见R. I. 罗特伯格，1966 年，第 73-75 页；H. S. 米贝洛，1971 年，第 97-98 页。

[65] J. 德·阿泽韦多·科廷奥，1904 年，第 28-30 页；A. 伊萨克曼，1976 年，第 126-156 页。

[66] D. L. 惠勒和R. 佩利西埃，1971 年，第 89-90 页；J. 马库姆（Marcum），1969 年，第 53-54 页。

布塔的艰难尝试是不满现状改信基督教者新出现的反抗形式的一部分。那里的非洲人或者不能有效地表达他们对殖民主义的仇恨，或者怨恨由欧洲人支配的新教教会内对他们的歧视，他们常常组成独立的或分立的教会以医治受创伤的心灵。这种自主的宗教团体于 20 世纪的头 10 年在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纷纷出现。其中最出名的大概要算由威利·莫卡拉帕创建的埃塞俄比亚教会。莫卡拉帕和他的信徒们一再抗议欧洲传教士的歧视态度和限制有能力的非洲人上升的障碍。他们长期的目标是要表明没有欧洲人也能够独立地管理自己的宗教和世俗事务。[57] 其他教会团体如北罗得西亚的“守望塔运动”和莫桑比克的非洲人美以美会也都追求同样的目标。

除了农村地区的局部性抵抗，城市中心开始出现改良主义的鼓动。城市中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和黑白混血儿很快懂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传教士宣传的平等主义教义并不能消除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歧视。安哥拉的黑白混血种知识分子，诸如何塞·德·方坦斯·佩雷拉是第一批发泄他们的失意和敌对情绪的人。这些人接受全然不同的葡萄牙文化，他们对随着 19 世纪末欧洲移民大批来到同时产生日益增加的种族主义极为失望。为保护自己的特殊地位，他们在报刊上发表长篇社论和论文，哀悼日益下降的地位，同时要求里斯本保证他们的权利，并终止对非洲人的公然剥削。这些不满的表示证明毫不起作用，于是在 1906 年他们组织起第一个混血种人协会，为他们的权利进行游说。4 年以后，整个葡萄牙殖民地黑白混血种人知识分子的联盟组成。[58] 大约在同一时期，有几个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在莫桑比克出现。其中最重要的组织之一是非洲人协会，该协会出版《非洲呼声》报，它是莫桑比克的第一份抗议现状的报刊。像他们在安哥拉的同行一样，这些作者属于新兴的混血儿和非洲人资产阶级范畴，他们试图保护他们有限的经济权利和重申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平等地位。[59]

187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邻邦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的公务人员、教师和其他非洲人专业人员开始组织协会，保护他们相对的特权阶级地位，并鼓动在现有殖民秩序范畴里的改良。在 1912 年和 1918 年之间，这类组织纷纷建立，其中有北尼亚萨土著人协会和西尼亚萨协会。[60] 这些团体在两次大战中间时期成为中非政治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1918 年以前的殖民地起义

殖民地起义就其规模和目的来说，与局部抵抗是有区别的。这种起义不同于化整为零的和有高度排他主义倾向的零星抗议，它们以动员群众和部族多元为基础。被压迫农

[57] T. O. 兰杰，1965 年；R. I. 罗特伯格，1966 年，第 58-60 页。

[58] D. L. 惠勒和R. 佩利西埃，1971 年，第 84-86 页、93-98 页；D. L. 惠勒，见R. 奇尔科特（Chilcote）编，1972 年，第 67-87 页；J. 马库姆，1969 年，第 16-22 页。

[59] E. 蒙德拉纳（Mondlane），1969 年，第 104-106 页；作者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已故的创建人，该书力求把近期解放斗争纳入较广阔的历史结构里来研究。

[60] R. 坦格里，1968 年，第 5 页；J. 范·韦尔森（Van Velsen），见E. 斯托克斯和R. 布朗合编，1966 年，第 376-377 页；该书论述为保护次等社会名流阶层的地位而组织的协会，以及这些协会追求在殖民制度范畴内进行改良的努力。

民越来越多的参加进去（至少某些起义中是如此），显示出阶级考虑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与这个广泛的支持基础密切相关的是对起义目标的重新解释并大为扩展。对特定苦情的抗议被舍弃了，人们更倾向于主张摧毁产生这些苦情的压迫制度的战略。

虽然殖民地起义既反映较高水平的政治觉悟，也反映更强烈的反叛情绪，但它们与一般先于它们的分散而小规模的反抗不能完全区分开来。它们像流亡社会一样，反对从内部改良，追求独立而不是点滴改进。它们和农民叛乱及“社会盗匪”的相同点在于他们也采取进攻或对抗的战略。再者，参加局部的反抗常常能提高政治觉悟的水平，促使很多非洲人参加更激烈的反殖民行动。

从中非第一块土地被占领的1885年到1918年，发生了20起以上的起义。[61] 在五个 188 殖民地中——安哥拉、莫桑比克、尼亚萨兰、北罗得西亚和刚果——没有一国不发生起义，虽然发生在葡萄牙殖民地和刚果的起义占压倒多数，因为那两处统治的压迫性极其暴虐，而行政和军事结构却很脆弱，这促使革命斗争的多次发生。

这些起义虽然具体细节不同，但都面临同样的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回过来又产生共同特征，并严重地限制起义取得成功的能力。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要找到一个能动员和指挥群众运动的有威信、能负责、有特长的领袖；确定广泛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必须遵循的原则；找到武器和弹药的来源。

在建立殖民统治之前，为保持独立而进行的初期不成功的斗争，使许多最可尊敬和英勇的领袖付出生命或远离祖国。领袖中被杀的有切瓦人的领导人姆瓦塞·卡松古和耶克人的统治者姆西里。其他人，有的被放逐，如贡古尼亚内和巴鲁埃王属姆韦尼-马塔帕的奇奥科，有的被黜免，以王族中更懦弱更驯服的成员代替之，如洪贝人的统治者泰怀戈和基坦科纳的统治者谢赫·马哈茂德所遭遇的命运。历史领袖人物的消失和更迭使殖民地官员深信，他们已有效地“占领”各自的领域，这样必然会大大减少以后发生起义的可能性。可是，他们不理解土著人政治制度具有连续的合法性和生存能力，不理解源源不绝可供选择的领导人大有人在，也不理解许多中非民族争取自由的献身精神。

在起义中若干王族所起的卓越作用，否定了一般想象的在“大瓜分”时期严重的军事挫折使本地统治者的权威大为削弱的论点。国王地位所固有的神圣权力以及群众中的强烈反葡萄牙情绪，使得被放逐的姆韦尼-马塔帕统治者奇奥科能组织起1897年的叛乱。20年以后，又发生同一类型的起义，当时农圭-农圭从南罗得西亚返回，在1917年的起义中领导巴鲁埃人和邻近的赞比西人民。[62] 同样，拜隆杜人的统治者穆塔-亚-卡韦拉尽管名义上接受葡萄牙的权威，但他在1902年叛乱中建立起反殖民主义的联盟；在北部，登博人的统治者卡祖安戈农戈同他的支持者在1908年起来反叛。[63] 在安哥拉南部被废黜的夸马托人领袖西海泰凯拉重申他的权威，领导他的人民与宽哈马人结合成反葡萄牙联盟、 189

[61] 这个数字是最低估计数字，在进一步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后，无疑将予修改。

[62] T. O. 兰杰，1968 b，第1 2页；A. 伊萨克曼，1976年，第156-185页。

[63] D. L. 惠勒和C. D. 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见F. -W. 海默（Heimer）编，1973年，第75-76页；J. 马库姆，1969年，第16页；该书为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述及20世纪初期出现的近代解放战争的先例。

并掀起1915年的战争。[64]同样，刚果自由邦的官员们沮丧地发现，他们名义上的下属、隆达国王穆希迪，组织重大的叛乱，这次战争从1905年一直坚持到1909年。[65]

正如殖民地当局不理解王权的恢复能力，他们还过高估计他们新替补的统治者——"殖民"酋长施加违反人民价值观念和利益的号令的力量。举例而言，1904年的基坦科纳叛乱直接指向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傀儡统治者赛义德·宾·阿米西，后者终于被推翻，由合法的领袖谢赫·马哈茂德继位。[66]　同样，一个替补的王族成员篡夺权力促使1891年洪贝叛乱的爆发。[67]这样的情况不少，在马坎加，反映大多数人民情绪的长老会议要求"殖民"酋长奇辛加谴责葡萄牙人的统治，否则就要把他罢免。他无可奈何勉强同意宣布马坎加的独立，由此导致一场与里斯本军队的猛烈对抗。[68]

甚至在合法领袖被有效地废黜或被替代的地方，也会出现得到人民支持的潜在领袖。这些人在独立战争中常常起突出的作用。贡古尼亚内的主要副手和战争领袖马吉瓜纳组织1897年的尚加安起义。[69]著名的混血种战士坎布恩巴，他抗击葡萄牙人的功勋成为传奇一直流传至今，两年后在席卷整个赞比西河流域下游的塞纳-通加人叛乱中，他又起同样的作用。[70]在刚果的几次起义中，有不少领袖来自能动员群众支持斗争的普通人。例如，一个警察武装中对现状不满的军士坎多洛，领导1897年的军事叛乱，不像其他的兵变，这场叛乱企图赶走欧洲人，解放刚果自由邦。[71]

宗教祭司和巫师组织一些起义并使起义神化。宗教卷入战争，在殖民地时期之前已有发生，这是宗教在历史上作为家乡精神庇护力量的逻辑上的扩大。1909年，通加人的祭司马卢马号召立即驱逐在尼亚萨兰的殖民老爷们。"我们与白人打仗的时间已到，我们现在开始，在整个雨季作战。黑种人将起来把白种人赶出国境"。[72]马卢马随后领导通加人民作战。同样，姆博纳的祭司们在1884年马辛吉雷叛乱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有迹象表明，坎敦杜的宗教官员积极参与1904年的拜隆杜叛乱。[73]在刚果，女祭司玛丽亚·恩科耶预言，她的战争符咒会使欧洲人的枪炮无效。有了这一保证，她的追随者开始一场长达5年的战争，一直坚持到1921年。在伊卡亚叛乱（以著名的战争符咒命名）高潮时，烽火蔓延刚果一大片地区。[74]赞比西河流域的宗教领袖比任何地方的宗教领袖发挥更大

190

[64] R. 佩利西埃，1969年，第100-101页。

[65] E. 巴斯廷（Bustin），1975年，第48页。

[66] N. 哈夫金，1973年，第378页。

[67] R. 佩利西埃，1969年，第73页。

[68] A. 伊萨克曼，1972年，第132-133页；该书考察赞比西河流域"普拉佐"（prazos）的战事和非洲-葡萄牙人"普拉泽罗"对葡萄牙统治的抵抗。

[69] T. 科埃略（Coelho），1898年，第83页；J. J. T. 博泰尔霍，1934年，第二卷，第533-547页。

[70] J. 德·阿泽韦多·科廷奥，1904年，第26-28页，J. J. T. 博泰尔霍，1921年，第二卷，第549-557页。

[71] F. 弗拉芒等人，1952年，第411页。至少，他们试图占领前阿拉伯地区，即约全国的一半。

[72] R. I. 罗特伯格引用，1966年，第75-76页。

[73] W. 蒙塔古-克尔（Montagu-Kerr），1886年，第275-276页；D. L. 惠勒和C. D. 克里斯坦森，见E.-W海默编，1973年，第75页。

[74] G. 穆拉尔，1945年，第187-188页。

的作用。绍纳的巫师动员人民支持 1897 年、1901 年和 1904 年的流产起义。他们好几次公开宣称，一旦把外国侵略者赶走，由神降下的、威胁人民经济生活的干旱、饥荒和牛瘟统统会消除干净。1917 年女巫师姆博娅威胁巴鲁埃领袖农圭-农圭，除非他改变他不得人心的态度并同意参与反殖民叛乱，否则神就要停止对他的承认。后者被迫无奈，只好同意。[75]

随着新教传教士势力日益增强，有几个对现状心怀不满的改良信仰的非洲人试图在革命的千年至福教义名义下发动反殖民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中最著名的是尼亚萨兰的埃利奥特·坎瓦纳和约翰·奇伦布韦。前者是"守望塔运动"的成员，他预言经神批准的非洲国家新秩序将在 1914 年开始出现。在 1914 年前，坎瓦纳鼓励他 1 万追随者首先自我净化，特别要避免对英国统治者作任何猛烈反抗。[76]至于奇伦布韦，人们对他的最终目标还不完全清楚，他也设想一个神授的非洲国家，但是他和坎瓦纳不一样，他率领他的追随者在 1915 年进行一次流产的、也许是象征性的起义。[77]他死后成为反殖民主义的烈士，他的崇高地位超越他在世时的实际成就。

和奇伦布韦一样，几乎所有领袖都认识到需要建立超越地方性基地的联盟以求相互支持。反抗战争的连续失败说明单个政治实体缺乏必要的资源以阻止欧洲人的入侵。莫桑比克的马坎加人国家的领袖在 1899 年叛乱前就已正确预见到这一点，"所有部落的非洲人都必须在充分的善良愿望下联合起来，协调努力以获得大量武器和弹药的供应，一旦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定能把所有葡萄牙人驱逐出去"。[78]

191

建立有广泛基础的革命运动，一般遵循三种模式。第一，努力与文化上有关系的民族恢复历史上的联系，争取所有政治实体都能参加起义者阵营；第二，起义者设法获得强大部族的支援，这些部族彼此相隔遥远或过去彼此不和，先前没有作为同盟者考虑。第三，领袖们特别向不满当局的农民作经济上的呼吁。这三点组织原则可以在不同时间交替使用，也可以作不同的配合使用，以壮大起义的规模，并动员公众广泛支持，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

基于共同祖先的历史关系常常被用来扩大相互支持的基础。1904 年安哥拉拜隆杜起义时，穆塔-亚-卡韦拉从有血缘关系的翁本杜诸王国的援助中得到好处，而三年后在南部，几个奥万博酋长国与夸马托部族联合举行起义。[79]在莫桑比克，姆韦尼-马塔帕的统治者奇奥科得到一些独立的塔瓦拉政治实体的支援，原因是他具有塔瓦拉第一个国王姆

[73] W. 蒙塔古-克尔（Montagu Kerr），1886 年，第 275-276 页；D. L. 惠勒和 C. D 克里斯坦森，见 E. -W. 海默编，1973 年，第 75 页。

[74] C. 穆拉尔，1945 年，第 187 188 页。

[75] A. 伊萨克曼，1976 年，第 126-185 页。

[76] G. 谢泼森（Shepperson）和 T. 普赖斯（Price），1958 年，第 156 页。

[77] 关于奇伦布韦生平事迹的卓越著作，见 G. 谢泼森和 T. 普赖斯，1958 年。这一创新的学术性著作也包括坎瓦纳事迹的重要资料。

[78] J. 小费尔南德斯（Fernandes），1955 年，第 50 页。

[79] D. L. 惠勒和C. D. 克里斯坦森，见F. -W. 海默编，1973 年，第 76 页；R. 佩利西埃，1969 年，第 85 87 页。

托塔的父系后裔的特殊地位，而巴鲁埃人得益于与通加人多次缔结的联姻关系。[80] 以巫师等级网为象征的共同祖先的历史关系，有助于1901年、1904年、和1917年起义中原来互不联系的各绍纳酋长国趋于联合。[81] 而刚果的伊卡亚叛乱的扩展以共有的制度为基础，这种共同制度有利于居住在扎伊尔河河湾上原来互不联系的部族抱成一团。[82]

在寻求更广泛的联盟时，不同叛乱的领袖常常向同样憎恨殖民制度的前敌手发出呼吁。因此，拜隆杜能够得到以前下属部族包括卡松吉人、基万达人和恩加兰加人的支持，而尚加安人得益于"大瓜分"之前由于他们的扩张主义而不睦的各酋长国的支持。[83] 在许多情况下，和解只有在亲欧洲人部族领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行为所含意义之后才能实现。例如，穆希迪统治下的隆达人，开始时帮助刚果自由邦反对乔奎人，但是在1905年来了个戏剧性的转变，他们与过去的敌人联合共同斗争，这次斗争直到1910-1912年饥荒时方被扑灭。[84]（见插图8.1）在莫桑比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塞纳人，在1901年的巴鲁埃战争中，站在葡萄牙一方打仗，16年后，他们成为摧毁压迫性殖民制度的泛赞比西运动的一部分，热情地支持巴鲁埃人。[85]

192

起义者也接纳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农村工人以增加人员的数量，这些农民和农村工人作为个人都反对殖民当局及其资本家同盟者的不断榨取。起义者所要求的不是着眼于部族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也不一定是针对替补酋长。起义者号召遭受经济压迫的人参加起义，以消灭横蛮的税制、强征劳力以及产生这些暴政的制度。尼亚萨兰的坎瓦纳运动，开始以湖滨通加人的支持为基础，后来迅猛发展，参加者包括敌视殖民主义的恩古尼、森加和通布卡的广大农民。[86] 同样，奇伦布韦向农村群众的呼吁中也不提部族问题，代之以宣传结束剥削制度和创立由神批准的非洲人国家的需要。[87] 拜隆杜从非翁本杜农民中得到坚决支持者，这些农民深受强迫劳动和经济剥削之苦。在赞比西河流域过去曾通过局部抵抗以表示他们仇恨的许多农民，后来则参加多次爆发的起义。[88] 同一格局的反抗也发生在刚果，那里被剥削的橡胶园农民促使1904年库巴人叛乱的爆发。[89]

武器来自何处的问题，并不需要进行详细查考。只要列出以下来源就足够了：叛乱者通过同欧洲、亚洲和非洲商人订立秘密的贸易协议；袭击欧洲人的军营；得自开小差的非洲人警察和雇佣兵；和邻近的仍旧独立的部族联盟；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建立武器

[80] T. O. 兰杰，1968b，第1-2页；A. 伊萨克曼，1973年，第395-400页。

[81] A. 伊萨克曼，1976年，第126-185页。

[82] F. 弗拉芒等人，1952年，第411页。

[83] D. L. 惠勒和C. D. 克里斯坦森，见F. -W. 海默编，1973年，第76页；J. J. T. 博泰尔霍，1934年，第二卷，第433-467页。

[84] E. 巴斯廷，1975年，第48页。

[85] 这种忠诚的转变，详尽地记载于莫桑比克公司的档案中，卷宗号1633。

[86] G. 谢泼森和T. 普赖斯，1958年，第156页。

[87] 见G. 谢泼森和T. 普赖斯，1958年；G. S. 姆瓦赛（Mwase），1967年。

[88] D. L. 惠勒和C. D. 克里斯坦森，见F. W. 海默编，1973年，第76-77页；A. 伊萨克曼，1976年，第126-185页。

[89] 橡胶园农民发动这次叛乱。J. 范西纳，1969年，第21-22页。

和弹药制造工厂。虽然某些反叛者如巴鲁埃人和夸马托人能够建立起相当大的军火库，但是起义者很少有早期抵抗者拥有的大量火力。

把军事力量对比的极端不利、非洲人警察和雇佣兵规模日益扩大之类因素全盘考虑在内，所有起义都最终失败就不足为怪了。即使如此，不少起义还是取得重大（虽然短暂）的成功，打破一般认为非洲人驯服的想法。例如1904年拜隆杜人把葡萄牙军队赶出奥文本杜高地。三年后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南部以类似情况败于夸马托人之手。最大的军 193 事成就恐怕要算巴鲁埃人及其同盟者得到的胜利，他们在1917年的叛乱中有一个短时间解放了整个赞比西河流域。如果不是3万恩古尼雇佣军的插入，叛乱可能扩展到莫桑比克的其他部分。

结　论

本章论述非洲人面对欧洲人统治所表现的能动性和进行抵抗的早期形式。在整篇本文中，我们努力记载这种反殖民主义活动出现的频率和这种活动的活力和生气。绝大多数非洲人争取自由的愿望与少数雇佣兵和帝国主义非洲同盟者的野心形成对照，如果没有后者这些人，欧洲人也许不可能这样全面彻底地实施他们的统治。总之，非洲既存在着对抗和抵抗的传统，也存在着同欧洲人“合作”的传统。虽然政治形势千变万化。这两股竞争力量在中非和南非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依旧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

（吴壬林译）



南部非洲人的能动性和抵抗

D. 查奈瓦

殖民统治前夕的南部非洲

194 讨论19世纪非洲人对南部非洲欧洲殖民统治的反应时，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发生这些事件时广阔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主要的历史因素是扩张主义的移民的殖民主义、传教士的基督教精神及其所办的教育，最后则是祖鲁人革命及其副产品——"姆菲卡尼"(Mfecane) *以及恩古尼人的大迁移。在柏林西非会议时期（1884-1885年），欧洲各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展开激烈的竞争，英国人和南非白人（阿非利堪人）对南部非洲领土的争夺延续70余年之久。柏林会议以后在整个非洲其他部分十分流行的名词，诸如"条约"、"势力范围"、"有效占领"、"并吞"和"边境部队"，到1815年之后在非洲南部也广泛使用。非洲南部的欧洲移民和在非洲其他部分的欧洲移民不一样，一开始就有意在新天地里建立永久性国家，他们被那里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农地、廉价的非洲劳动力和丰富的矿产吸引住了。

到1880年，南非总共有四个白人政治实体：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分别有18.5万和2万白人，其中绝大部分讲英语；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二处各有5万以上白人，讲荷兰语。到1890年9月12日，又有一个英国殖民地马绍纳兰成立。在这五个移民殖民地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土著受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的统治。土著中的桑人和科伊科伊人受白人统治超过200年，而其他一些部族，如科萨人、姆丰古人、滕布人和姆蓬多人受各种形式的殖民统治近一个世纪（见插图9.1）。①

196 根据1852年的桑德河协定，英国人和阿非利堪人达成协议不向整个南部非洲的非洲人出售军火。这个协定剥夺了非洲人用来进行有效抵抗和自卫的必要手段。

因此，当欧洲各国通过禁止向非洲人出售军火的1890年布鲁塞尔总协定的时候，南部非洲的白人早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一直在执行解除非洲人武装的政策，虽然19世纪70

① 19世纪80年代以前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反应情况，见W. M. 麦克米伦（Macmillan），1963年；C. W. 德基维特（De Kiewiet），1965年；J. 菲利普（Phillip），1828年；J. S. 马雷（Marais），1957年

* "姆菲卡尼"一词专指19世纪初由于祖鲁王国的崛起而在南非引起的非洲各族间相互斗争、大迁移和重新组合的全过程。——**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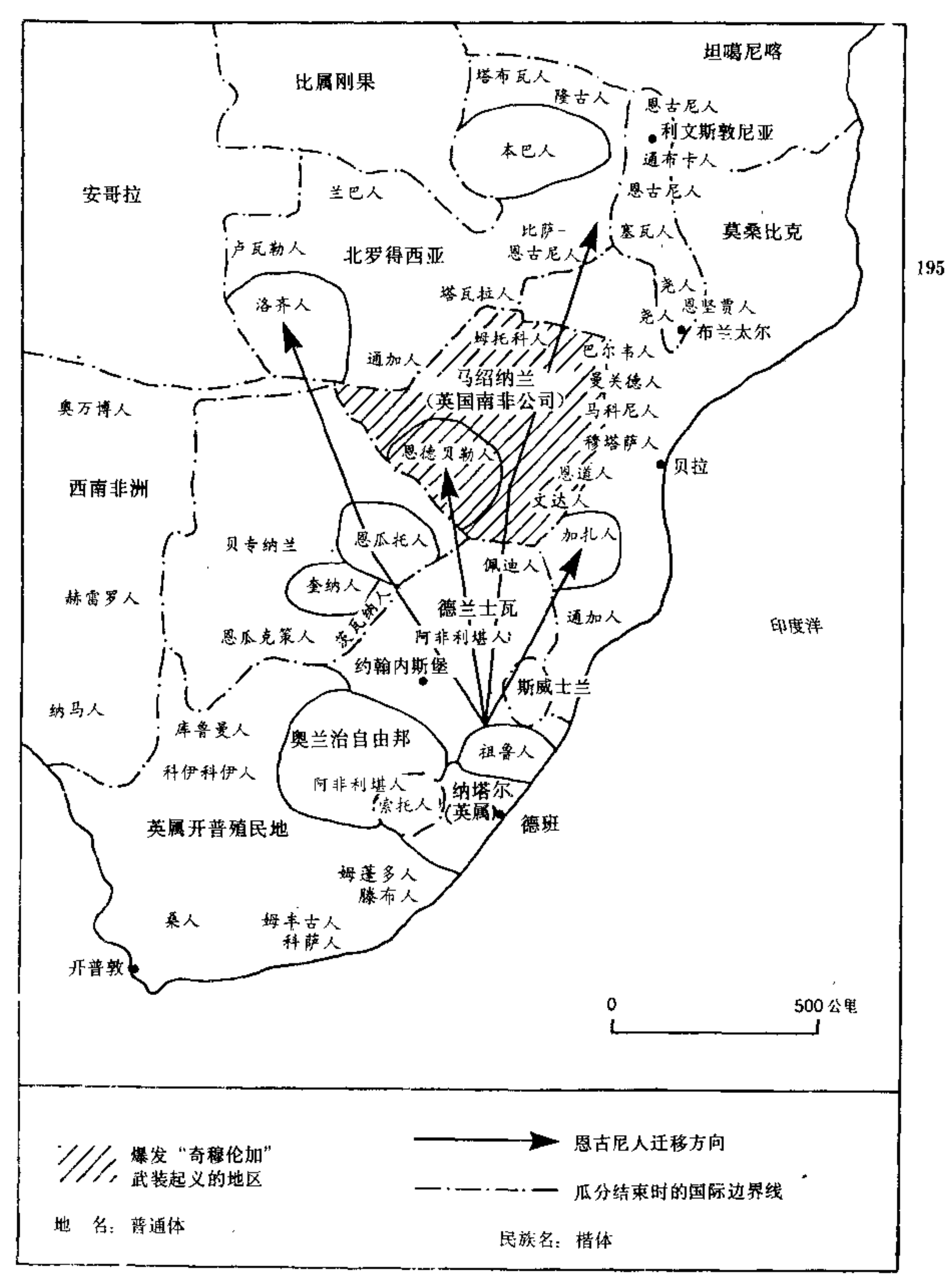


插图9.1　南部非洲的民族分布和政治实体，图示恩古尼人大迁移的情况和爆发“奇穆伦加”武装抵抗的地区

和80年代，非洲的某些部族还能够用从钻石矿场赚来的工资购买军火。除此之外，阿非利堪人、英国殖民者和英国政府三者之间长期保持一种超越于他们政治和经济差异的种族上求同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符合他们对非洲人进行征服、统治和剥削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不但采取共同行动阻止军火进入非洲人之手，而且在相互作战时一般都避免与当地非洲人结成联盟。这种态度相当严重地限制了非洲人的能动性和抵抗活动，而且也限制了供他们进行选择的机会。

祖鲁人革命及其后果

除上述情况外，19世纪初在南部非洲到处都有划时代的大事出现。这些大事包括祖鲁人革命和南非的"姆菲卡尼"；恩德贝勒的恩古尼人向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迁移、科洛洛人向北罗得西亚（现在的赞比亚）迁移和恩古尼人向尼亚萨兰（现在的马拉维）与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迁移；赞比亚北部本巴人的活动；尧人-斯瓦希里人结盟；和马拉维的奴隶贸易（参阅插图9.1）。这些大事中的某些事件以爆发性的速度蔓延开来，在整个南部非洲的无数非洲人社会引起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制度的一系列突变。这是一个建立国家和进行政治扩张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最强大和权力最为集中的国家对弱小和涣散的国家建立领地关系或势力范围。虽然许多当代欧洲政治家和观察家把这些意义深远的变化看作仅仅是非洲人野蛮、血腥和异教徒行为的爆发，但实际上这些变化应该被视作是政治创造力的表现，这种政治创造力导致出现新的部族间共同的体制和相互的忠诚，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这些意义深远的变化是创造性的，但却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造成无法计量的毁坏。像干旱、疫病和灾荒之类的自然灾害也往往伴随着这种暴力行为出现，从而扩大所产生的破坏的范围。这种连续不断的战争和灾难在弱小的和顺从的臣服社会中造成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不安全感和绝望感，有许多部族被迫躲避到山洞或条件恶劣的山顶栖身，以免遭受入侵者进一步的攻击。那里出现了贵族统治集团、阶级差别和苛捐杂税，但是却没有政治代议制或协商制度，结果很快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富人和穷人。

197

传教士的作用

传教士的基督教精神及其所办的教育，也是左右非洲人对殖民征服所作反应的进程和性质的关键因素。传教活动创造了一个由非洲人福音教士、教师、新闻记者、商人、律师和职员组成的阶级。这些人往往倾向于接受所谓非洲人文化低下的说法，接受白人移民的殖民主义是生活现实，他们崇拜白人的权力、财富和技术。[②] 这些人的典型例子是

② 详情参阅D.查奈瓦（Chanaiwa），见A.穆贡巴（Mugomba）和M.尼亚加（Nyaggah）合编，1980年。

蒂约·索加（1829-1871年），他是第一个接受英国联合长老会圣职的非洲传教士，也是姆瓜利教会的创始人，他在这个教会里向非洲人和欧洲人讲道，并把约翰·班扬写的《天路历程》一书翻译成科萨文，书名《乌-汉博、隆-汉比》（U-Hambo Lom-Hambi），这是洛夫代尔出版公司1867年出版的第一本非洲人执笔的书；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约翰·兰加利巴莱莱·迪尤布，他是卫理公会牧师，是美国黑人教育家布克·T.华盛顿的热诚追随者，是祖鲁基督教工业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纳塔尔地方的班图工商联合会的创办人和主席，以及非洲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再一个典型例子是约翰·坦戈·贾巴武（1859-1921年），这是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是英文-科萨文《伊姆武·扎班遵杜》（Imvo Zabantsundu）周刊的创办人和编辑；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叫沃尔特·鲁布萨纳，他是公理会牧师和唯一被选进开普省议会的非洲人。

从思想意识上说，这些由教会教育出来的非洲人一般都笃信传教士和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所鼓吹的普世主义、乌托邦主义和非种族主义思想。他们信奉立宪主义、渐进主义和文化同化作用，正像欧洲移民中少数自由主义白人所鼓吹那样。但是，他们也是布克·T.华盛顿的黑人经济自决学说和他的保守的调和政治的信徒。

他们像许多传教士一样，把非洲广大群众列为“愚昧之民”和“高尚的野蛮人”，他们通过引进基督教精神、教育、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新教伦理，承担起全面检查非洲传统的责任。他们一般都默许殖民主义扩张和征服，部分原因是他们像许多传教士一样把殖民主义和基督教及“文明”等同起来，部分原因是他们迷信欧洲武器和作战能力的“压倒优势”。

因此，在蒂约·索加看来，1857年的科萨人杀牛事件是他“可怜的糊涂同胞”的一次民族自杀。这些糊涂人成了有预谋的骗子的牺牲品”。无论如何，他衷心希望“这次痛苦的教训将（凭着上帝的恩赐）使卡菲尔人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收益”。他声称：“上帝有时要用可怕的事态来完成他的旨意。在当前的灾难中，我想我已经看到我们同胞今后不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将得到拯救”。③ 迪尤布在他所主办的报纸《伊兰加·拉斯·纳塔尔》（Ilanga Lase Natal）谴责班巴塔人的叛乱（1906-1908年），并进而劝导祖鲁人接受基督教和教育。贾巴武抵制非洲人国民大会，部分理由是因为他觉得当地人中的上层精英仍然需要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指引和领导。 198

当地上层精英在下面三种境界的影响下徬徨徘徊：一个是传教士、人道主义者和白人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境界；另一个是有时被他们蔑视的非洲群众的传统主义境界；再一个是欧洲移民种族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殖民主义境界，最后一个决定他们真正的生活和地位。所有这些造成他们自己的道德主义境界，并力图把非洲人和白人移民引向这个境界。

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殖民主义征服与传播基督教精神、普及教育和技术等同起来，于是他们鄙视非洲的抵抗运动，把它说成是野蛮和落后。他们谴责传统的非洲，结果只能是支持和鼓励他们所反对的殖民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布道、生活方式和

③ J. A. 查默斯（Chalmers），1877年，第140页。

信仰，有助于从心理上瓦解非洲人抗拒传教士-殖民者宣传的能力，就这样阻碍真正的非洲历史、种族和自由主义思想觉悟的发展。他们和追随他们的非洲基督教徒，或者站在一旁隔岸观火，或者躲在布道所里逃避现实，而不去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征服和占领的武装抵抗。

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反抗的格局

上述种种因素极大地影响非洲人对入侵的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化所作反应的性质和强度。总的来说有三种明显不同的能动性和反应模式：(1)由祖鲁人、恩德贝勒人、昌加纳纳人、本巴人、尧人和恩古尼人进行的激烈对抗模式；和曼关德、马科尼和穆塔萨大酋长领地的斗争模式；(2)由索托、斯威士、恩瓜托、茨瓦纳和洛齐等部族选择的成为保护国或保护地的模式，它们全都是独立的不纳贡国家，从英国求取保护以反对祖鲁人、恩德贝勒人、本巴人、恩古尼人和布尔人；(3)由无数小纳贡国、受攻击的遭难者和难民结成联盟的模式，如南非的科伊科伊人、科萨人、姆蓬多人、滕布人、姆丰古人和赫卢比人；北罗得西亚的比萨人、隆古人、伊瓦人和森加人；尼亚萨兰的塞瓦人、恩坚贾人、恩孔德人和通加人，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保护、和平和安全”。一些新成立的扩张主义王国之间存在着长期历史形成的敌对情况。它们中间不同文化的部族与王朝之间也存在着利害冲突。每一个统治者、每一个社会和个人都根据殖民化以前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现实情况，对欧洲人的日益加剧的侵略，作出他们各自的反应。

199

欧洲殖民主义者竭力利用他们所发现的这一局势。他们对当代非洲政治制度的研究，使他们能够预测非洲人的反应模式和抵抗方式。例如，他们发觉，当贵族政权强大并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当隶属的酋长懦弱而不团结时，或者至少感到有军事保护的需要，并相信居统治地位的贵族政权能提供这种保护时，祖鲁人、恩德贝勒人、尧人和恩古尼人的扩张主义才能顺利地为所欲为。

厌战情绪和不安全感，对于某几个非洲政治实体或个人接受英国保护或者与之结盟起很大作用。这种情绪同样也为英国允诺给予被压迫国家“解放”和“保护”、答应与弱小王国缔结“联盟”、对黩武王国进行侵略，从而干涉非洲事务，提供容易被人接受的借口。英国人使用“分而治之”的老练策略，结果他们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非洲的对立、害怕和虚弱。

祖鲁人、恩德贝勒人、本巴人和尧人——激烈对抗的政治模式

猛烈的对抗、遭受征服和毁灭对于祖鲁人、恩德贝勒人、本巴人和尧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和欧洲殖民主义者企图统治的是同一块领土和相同的民族。作为一个类型，他们占有或统治着南部非洲人口最稠密、土地最肥沃和矿藏最丰富的地区。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与欧洲人妥协或共存，只有占优势的力量才能生存下去。



图片 9.1　1879年爆发祖鲁人战胜英国军队的伊散德尔瓦纳战役的地点

祖鲁人是林波波河以南非洲最强大的民族。恩德贝勒人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本巴人在北罗得西亚，尧人分处在尼亚萨兰南部和北部。但是从一开始，祖鲁、恩德贝勒、昌加纳、科洛洛和恩古尼等王国就发现自己被强大和敌对的邻邦所包围：就祖鲁王国说，周围有布尔人、英属索托和斯威士；恩德贝勒王国周围有布尔人、葡萄牙人、洛齐人、昌加人和恩瓜托人；这些敌对的邻邦中任何一个都有力量征服和驱逐他们。布尔人和葡萄牙人在对外事务方面的做法是以不妥协为原则，采取袭击和征服的政策。

200 迄至19世纪70年代早期，祖鲁人、恩德贝勒人、本巴人和尧人还能保持他们的主权、独立和安全，他们还能成功地抵制传教士、欧洲商人、特许权所有人和征募劳工者的侵入。但那时，这些入侵者已经得出结论：征服和摧毁这些进行抵抗的非洲国家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自欺地认为，非洲人渴望基督教精神、通商和西方文化，只是非洲人的国王、官吏和军人所施行的袭击、暴虐和野蛮，无情地压制了“人们的抱负、事业和向往得救的愿望。”所以，这些外来者在传播基督教精神和通商之前，先采取征服的态度。

祖鲁人

祖鲁人在塞茨瓦约的领导下、恩德贝勒人在洛本古拉的领导下，决定采取对抗策略，——先礼后兵，先外交后武装抵抗。根据这一战略，塞茨瓦约首先继续贯彻他前任首领姆潘达的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塞茨瓦约的宿敌是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他一直保持和纳塔尔的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有效联盟，并和有名的纳塔尔土著人事务大臣狄奥菲卢斯·谢普斯通发展友好关系。但是当英国人于1877年吞并德兰士瓦并任命谢普斯通为行政长官时，塞茨瓦约的结盟办法很快就垮台了。谢普斯通竟然支持已经越过布法罗河进入祖鲁兰，并匆忙建立农庄、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布尔人。英国新任命的驻南非高级专员巴特尔·弗里尔爵士也一心要建立各殖民地的联邦。④谢普斯通说服他相信非得摧毁祖鲁的武装力量不可，否则这样的联邦不可能在南非取得成功，只要存在祖鲁国家就会威胁纳塔尔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他还主张，摧毁了祖鲁，将使布尔人相信，英国政府有响亮的种族关系观点和执行决定所需要的力量。

此时，塞茨瓦约向纳塔尔的代理总督亨利·布尔沃爵士呼吁，请其调解祖鲁-布尔的边界纠纷。亨利爵士指派一个边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这一纠纷作了调查研究，宣布布尔人的要求是非法的，建议他们退回到德兰士瓦河的一边。但是弗里尔为了达到建立联邦的目的，已经下定决心要摧毁祖鲁国家。所以他把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隐藏起来，一直到他得到入侵祖鲁的借口并取得军队的增援。讨伐祖鲁的借口出现在1878年7月

202 28日，当时酋长西拉约的儿子梅洛卡祖鲁、库祖鲁、切宽纳和他们的叔父祖鲁伦加越过布法罗河，带回进入河对面纳塔尔的几个酋长之妻。弗里尔和谢普斯通抓住时机，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事件。很快，南非和英国殖民部充满了祖鲁人立刻要侵犯纳塔尔的谣言，传教士被劝说离开祖鲁兰。就在这个时候，谢普斯通和弗里尔大肆颠倒黑白，说祖鲁军

④ C. F. 古德费洛（Goodfellow），1966年。



图片 9.2　恩德贝勒国王洛本古拉(1836 年前后-1894 年)，1870-1894 年在位

队是袭击和威胁的力量，污蔑塞茨瓦约为嗜血好战的暴君。

于是弗里尔命令塞茨瓦约向亨利·布尔沃爵士交出西拉约的儿子和兄弟，接受审讯，虽然，祖鲁人从未被征服，也没有被迫屈从英国的统治。塞茨瓦约表示愿赔款 50 英镑，并对这一事件进行道歉。1878 年 12 月 11 日弗里尔向塞茨瓦约发出最后通牒。通牒中要求交出被告同时赔偿 500 头牛，并在 30 天内解散祖鲁军队，允许传教士入境，和在祖鲁兰设立英国驻扎官。弗里尔明知，没有任何独立和自尊的统治者会同意这样极端的要求。

此后不久，于 1879 年 1 月 11 日，在切姆斯福德勋爵统率下，一支 7000 多人的英国军队，外加 1000 名左右白人志愿人员和 7000 非洲辅助人员，从三处入侵祖鲁。1 月 22 日，祖鲁军队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取得一次令人难忘的胜利，一举杀死入侵者 1600 人，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在 7 月 4 日，英国军队卷土重来，蹂躏祖鲁国土。塞茨瓦约被流放到开普敦，祖鲁兰被划分为 13 个分开的酋长国，由傀儡酋长管理。在这些酋长中有塞茨瓦约的对头齐布海布胡和他的表弟哈穆(后者在战争中叛变，投入英国军队)，甚至还有一个白人约翰·邓恩。祖鲁兰的肢解是推行分而治之政策、有步骤地毁灭一个国家的典型事例。为了使这种局面能够永远延续下去，英国人指令新任酋长解散所有军事组织，禁止武器输入和接受英国驻扎官的仲裁。

可是，酋长之间对立的程度如此严重，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加剧得如此之快，以致为了要在前祖鲁国最不安定地区"恢复秩序"，英国人不得不把塞茨瓦约召回。齐布海布胡被允许保有他的酋长国。可是很快爆发塞茨瓦约的军队和齐布海布胡军队间的内战。塞茨瓦约于 1884 年战争的高潮时，在逃亡中死去。幅员大大缩小了的祖鲁国此时由塞茨瓦约 15 岁的儿子迪尼祖鲁领导，他的权力和威望完全依赖白人的支持。祖鲁最后屈服于英国的统治。

恩德贝勒人

204 从 1870 年到 1890 年，洛本古拉像祖鲁的塞茨瓦约一样，一贯成功地执行一种精心设计的外交策略，以保护恩德贝勒国的主要利益。他限制外国人移民，并告诉异族白人，他不愿开放他的国家供他们开矿和狩猎。除此之外，他还玩弄一些计谋，如不断地从一个城镇搬到另一个城镇，挑拨一个欧洲国家、公司或个人与另一国家、公司或个人倾轧争执，并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以沮丧心急火燎的特许权获得者。他主动向英国政府寻求军事联盟或保护国地位，以此作为长期策略来反对德国人、葡萄牙人和阿非利堪人，同时防止南非无限制的殖民扩张。

这些外交抵抗的方式在 1888 年之前显然施行得颇为灵验。就在那一年，南非金融家塞西尔·约翰·罗得斯说服高级专员赫尔克里士·鲁宾逊爵士和贝专纳兰代理专员西德尼·希帕德爵士谋取约翰·史密斯·莫法特牧师的帮助。此人在恩德贝勒传教彻底失败后离开马塔贝莱兰，最后成为希帕德手下的副专员。莫法特为洗刷过去失败的耻辱，迫切要把恩德贝勒殖民化。并且，他对姆齐利卡齐、洛本古拉和恩德贝勒的统治者们能够

成功抵制基督教怀有一种深仇大恨。这样，在复仇、高傲和种族主义三种情绪的共同推动下，他亟望为毁灭恩德贝勒国铺平道路。[5]

莫法特决定支持罗得斯和特许公司，因为他注意到："除非这里的历史与南非其他地方的历史迥异"否则这家公司注定要征服和瓦解恩德贝勒民族。开始时，莫法特装作一名精神感召者，感兴趣的不是黄金、狩猎和征服，只是给"老朋友"以"友好的忠告"。"忠告"洛本古拉应该与英国"结盟"，而不可与阿非利堪人、德国人和葡萄牙人"结盟"。莫法特还诱使洛本古拉相信，他所作的仅仅是单纯恢复原来的英-恩条约而别无他求，此条约系洛本古拉的父亲姆齐利卡齐与前英国驻南非总督本杰明·德班于1836年签订的。所以在1888年2月11日，洛本古拉在以后称为"莫法特条约"的文本上签了字。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他同意在未通知女王政府驻南非高级专员并得到其认可之前，不与任何外国通信或订约，以出售、让予、割予和允许或赞同出售、让予、割予所谓在他控制下土地的全部或一部，或任何其他财产和资源。[6]该条约一旦付诸实施，英国对罗得西亚的占领便开始了。莫法特把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两地完全置于英国势力范围之内。

在19世纪后期欧洲国际公约的规定下，洛本古拉进一步迎合英国殖民主义。此后，恩德贝勒只能与英国打交道。至此，他的外交手段，即施展使欧洲国家彼此矛盾对抗的策略宣告破产。很快，大批英国特许权获得者和辛迪加纷至沓来，谋取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的开矿权和土地拥有权。这些热心的投机家唯利是图，爽快地给予大量枪械、军火、金钱、衣服、用具和装饰品，表现得十分慷慨大方，以求从他得到好处。 205

罗得斯注意到这种情况，于是就派遣拉德、汤普森和马圭尔[7]向洛本古拉要求签订垄断性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规定，可用它申请国王特许状，排挤其他英国特许权所有者和辛迪加。罗得斯要的"不仅仅是与每一个随时来到的冒险家共有的局部权利，而是单独控制整个国家的矿产资源"。凭"拉德特许权"（协议以此为名）的力量，罗得斯的公司于1890年占领马绍纳兰。

引起争论的"拉德特许权"之所以能够到手，主要是由于英帝国官员和传教士对洛本古拉的阴谋性欺骗。莫法特第二次被派往马塔贝莱兰，目的在于安排和确定洛本古拉如何接待罗得斯特使的来到。马法特假装像上帝使者一般的友好和中立，介绍拉德、汤普森和马圭尔是"声誉卓著的正人君子"，并高度赞扬和担保希帕德。在随后举行的四星期谈判中，他竭力为他们说好话。此后，希帕德偕吉尔德-亚当斯少校和16个骑警来到。经过与洛本古拉谈判九天后，他离去，六天后就签订特许权协议。根据拉德当时日记所写"几乎所有政治事务均是以最友好的精神谈判解决的"。

"拉德特许权"包括两个分开而又互相关联的部分：文字部分是关键性的，对特许权持有人有利；口头部分则对洛本古拉有利。根据书面协议（即向洛本古拉提出的原始草本），国王把在他王国、所属酋长国和领地内的全部金属和矿藏资源特许权给予特许权持有人，后者拥有完全而独占的支配权，同时也具有为获得这些资源做他们认为必要的

[5] R. U. 莫法特（Moffat），1969年，第233页。

[6] 同上，第370页。

[7] 详情阅P. 梅森（Mason），1958年；C. 帕利（Palley），1966年；S. 桑坎奇（Samkange），1967年。

所有事情的充分权利。后者还有权“采取任何必要和合法的措施”以排除所有其他寻求土地、矿物或开矿权利者的竞争。洛本古拉还进一步同意，未经特许权持有人事先同意，不给任何其他人或公司以土地或开矿特许权。

作为报答，特许权持有人同意无限期付给洛本古拉及其继承人每月100英镑。他们还同意给他1000支马蒂尼-亨利型后膛枪和10万发适用的子弹。协议草案规定，其中500支步枪和5万发子弹在着手开矿之前即交付给洛本古拉。特许权持有人还同意“在赞比西河上交付一艘汽船，装有适合在这条河上进行防卫目的的火炮”。

206

在谈判过程中，国王口头提出一些条件，他显然把这些条件看作是以后签订的协议整体的一个部分。根据赫尔姆所说，洛本古拉提出和被特许权持有人同意的条件有：(1)特许权获得者带入他领土内进行开矿的白人，每一次不得超过10人；(2)矿工不得在市镇及其附近挖掘矿井；(3)白人应“遵守他国家的法律，实际应如同他的人民”；(4)在需要时，矿工应在恩德贝勒人统帅率领下为保卫国家作战。特许权获得者也口头上澄清：所谓他们具有“为获得这些资源做他们认为必要的所有事情的充分权利”一语，他们的意思指的是建造工头居住的住所、运入和安装起他们需要的机器以及使用木材和水源。不幸的是，这些口头条件没有写入最后协议中，这样，根据欧洲契约法，不能算是协议的强制执行部分。

洛本古拉和他的顾问们从失望的未能取得特许权的申请者那里，尤其是从两个博学多知的非洲人约翰·库马洛和约翰·马孔加（他们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向他说明特许权的内容）那里，懂得自己是被骗了；知道欧洲报纸上已经公布了特许内容，并且罗得斯已经组成占领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的公司。当恩德贝勒人民知道特许权的全部意义和细节时，尤其是知道伟大的王朝和伟大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大灾难时，全国陷入一片震惊、恐惧和混乱之中。有些顾问大臣和战士发怒了，而洛本古拉则忧心忡忡，害怕失去权力。

洛本古拉在1889年2月的《贝专纳新闻》上发表否认特许权的声明。遵照他的命令，亲英的顾问大臣洛特希连同他的妻子们，孩子们和牲畜被姆贝苏团（Mbesu regiment）处死。一旦他得知罗得斯、传教士和南非的帝国官员勾结共谋时，他决定直接向在英格兰本土的英国政府控诉。他通过信件和派遣代表向维多利亚女王呼吁，要求废弃条约或宣布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为英国保护国。1889年1月，他派遣正式代表团到伦敦，团员中包括顾问大臣莫特谢代和巴比扬斯，他们晋见维多利亚女王和“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的几个领导人。顾问大臣回来时带来女王的问候，但条约未能作废。罗得斯获得垄断性的使该地区沦为殖民地的国王特许状。1890年初他的先行人员从南非出发，经过马塔贝莱兰进人马绍纳兰，于1890年9月12日在索尔兹伯里升起英国国旗。

207

从1890年9月到1893年10月，恩德贝勒国和马绍纳兰殖民地彼此警惕地注视着对方。像开普的科萨人和殖民者之间、以及纳塔尔祖鲁人和殖民者之间发生的情况一样，不可避免的军事上一决雌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893年英国-恩德贝勒战争的整个场景实际上如同1879年英国-祖鲁战争的复写副本，只是罗得斯代替巴特尔·弗里尔爵士，马绍纳兰公司负责人利安德·斯塔尔·詹姆

森博士代替谢普斯通，而维多利亚事件（1893年8月）代替西拉约事件。洛本古拉像塞茨瓦约一样，向詹姆森、罗得斯和英国政府呼吁试图阻止战争无效，但是当时他在任何地方既没有白人朋友也没有非洲朋友。入侵马塔贝莱兰的全部军队由1000名马绍纳兰和南非的白人士兵组成，其中包括帝国驻贝专纳边防警察部队200名。另外还有1000名绍纳人、姆丰古人、科伊科伊人和有色人种组成的辅助部队以及600名受卡马统率的恩瓜托骑兵。

洛本古拉不准备把他大约2万军队向装备优良的殖民军及其非洲辅助部队作自杀性的攻击，他和他的人民撤离马塔贝莱兰，向北逃往北罗得西亚。和塞茨瓦约一样，他也在逃亡时死于乱兵之中，不是死于天花就是死于心脏病。恩德贝勒国此时失去领导而四分五裂，恩德贝勒的顾问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在"集会树"下向詹姆森投降。殖民者立刻动手划定他们的新农场和矿产所有权。公司没收28万头恩德贝勒牛，保留24万头，把其余分配给白人骑警和一些非洲"友好者"。

征服马塔贝莱兰后，英国于1894年7月18日向公司颁发"马塔贝莱敕令"，给予它征收茅屋税和建立"土著部"以统治整个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权力。到1895年底，公司已依照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的模式，设立非洲行政体制，包括茅屋税、保留地和通行证制度，其目的在于剥夺非洲人的土地、牲畜和矿产以及强迫他们为白人做工。

恩瓜托人、洛齐人、索托人、茨瓦纳人和斯威士人的能动性和反应——保护国和保护地的模式

恩瓜托人、洛齐人、索托人、茨瓦纳人和斯威士人——他们与祖鲁人及恩德贝勒人不同，都和"伦敦政府派"强大的主张人道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结成联盟。这些传教士们非常反对"殖民地政客中某些阶层的"锤子加钳子政策——征服、掠夺和无休止地贬低全体有色人种"。⑧ 这些人中有支持卡马、塞特谢莱和卡塞齐韦的马更些，支持莫舒舒的卡萨利斯和支持莱瓦尼卡的科伊拉德。可是这些鼓吹人道主义的传教士只反对南非白人移民主义者的无限制扩张，特别反对布尔人和罗得斯的无限制扩张，以及反对当时发生的边境暴行和剥削的具体实例，因为这些事端破坏他们忠心耿耿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工作。他们坚信白色人种及其文化和宗教无庸置疑的优越，他们认为殖民化、商业和基督教精神三者是不可分离地联结成一体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必须由帝国对非洲人负责(家长般的监护)。他们希冀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有顺利的文化接触。他们认为，通过"保护"和"教化"非洲人的努力，可以把非洲人造就为新建殖民地社会中起日益增大作用的成员。他们通过信件来往、派遣代表和亲自考察民情，不懈地向高级专员、殖民部和英格兰慈善团体开展活动，以求获得这种"保护权"。尼亚萨兰之所以能成为英国保护国，主要是由于苏格兰传教士们进行了有效活动，热情保护布兰太尔、班达维和伊班达信奉基督教的非洲人和那里的教会布道所，使之不受罗得斯边境人员的侵犯。

208

⑧ W. 豪伊特（Howitt），1969年，第501页。

209



图片9.3 巴苏陀国王莫舒舒一世(1785年前后-1870年)

亲传教士的统治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普遍佳弱。他们得以成为君王主要出于政变。1875 年卡马赶走他的父亲塞科马和兄长卡马内，自立为王。卡马内带领拥护他的人逃走，在林波波河德兰士瓦一边建立他的王国。但是恩瓜托人中的效忠派和保守分子依旧忠于被废黜的塞科马。以后在 1884 年，莱瓦尼卡也被废黜，被迫逃往卡马的都城。1885 年莱瓦尼卡恢复王位，赶走篡位者塔提拉·阿库富纳。所有这些亲传教士的国王全都地位不巩固，经常面临内战和骚乱的紧迫危险。

并且，他们的国家都刚刚从祖鲁革命和恩古尼征服中幸存下来。索托和斯威士继续是祖鲁人长期袭击的目标，而恩瓜托、茨瓦纳、奎纳和洛齐则遭受恩德贝勒袭击和入侵之苦。此外，他们还是渴望占领土地和一贯嗜杀的布尔"挑衅好战者"的牺牲品。布尔人经常派出突击队袭击他们的村庄、捕捉牲口和俘掠劳动力，还和邻近的小酋长频繁缔结"友好条约"，然后宣称拥有土地权和势力范围。深受这种侵犯之苦，祖鲁人、恩德贝勒人和布尔人成为他们的宿敌。

正由于这些国王十分厌恶西方化和殖民主义原则，他们拼命寻求外国的支持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于是，他们采取与教会结盟和接受英国（宗主国）的保护作为政策的基本 210 依据。由于同样理由，凡与欧洲人有关的事务他们一概都向传教士请求指点并寻求精神引导，试图巧妙地应付这些人以加强他们在国内摇摇欲坠的地位。科伊拉德、马更些和卡萨利斯是莱瓦尼卡、卡马和莫舒舒最亲近的欧洲朋友、知己和外交部长。

出于必要，这些国王乐意默默接受基督教教义和接受保护国的地位。卡马和莱瓦尼卡成为经常参加宗教仪式的基督徒，像大多数改信皈依者一样，他们有时甚至显得比传教士还要虔诚。他们不但放弃他们祖先的传统、信仰和礼仪，而且使用他们的行政机构强制人民接受西方原则和基督教文明。他们禁止公众饮用含酒精饮料，所作的精神努力近乎固执着迷程度。他们强制实施严格的禁酒法令，其中包括禁止酿造非洲啤酒。他们越是由于实施此种手段因此失去民心，就越是不得不依靠教会。

事实上，这些国王之所以与传教士关系如此密切，主要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抗拒企图把他们从他们国土上撵走的那些人。通过与反对布尔人、反对祖鲁人和反对恩德贝勒人的传教士结盟，他们得以保持独立存在，一直维持到"大瓜分"前夕，随后又争取到帝国的保护，遏制当地和外来移民的殖民主义。这些国王积极争取保护国地位，虽然这种地位必然对他们的主权、拥有土地权和民权产生某些限制。处于保护国地位，他们保留名义上的自治，得到常驻英国警察部队的保护，同时他们的人民只要进行登记，有拥有武器的权利。总之，那些较小的非洲王国，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不可能阻止白人移民及其经济的发展，于是就通过得到保护国地位设法生存下来，而较强大的国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条件抗拒殖民化的威胁，反而遭到入侵、征服和摧毁。

茨瓦纳人

茨瓦纳人和斯威士人的情况清楚地阐明了这种模式的特色。在争夺贝专纳兰（现博茨瓦纳）的过程中有三个主要竞争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四个贝专纳兰的统治者（奎纳人、

恩瓜托人、恩瓜克策人和茨瓦纳人的统治者）以及他们与传教士的联盟，这些传教士主张实行英国保护和托管制度；第二种力量是德兰士瓦的布尔人，他们把贝专纳兰视作提供土地、牲畜、矿产和劳动力的天然腹地；第三种力量是以罗得斯为代表的开普殖民者，他们企图抢在布尔人扩张和与西南非洲（现纳米比亚）的德国人结盟之前控制贝专纳兰。非洲人统治者（如莫舒舒）试图抢在欧洲移民建立殖民统治之前获得保护国地位。当1876年荷兰归正教会在德瓦士兰的一个反对宗派"多帕"（Doppers）要求通过茨瓦纳领土去达马拉兰时，茨瓦纳的恩瓜托国王卡马大为惊恐，他写信给"英国人民的伟大女王"要求保护。他想要知道保护的条件，强调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应以"基督教道德规范"为指针。此外，他的冤家兄弟卡马内已率领追随者在德兰士瓦落脚，正和布尔人打仗，希望得到恩瓜托的王位（参阅插图9.1）。

在对待贝专纳兰问题的态度上英国人分歧甚大。罗得斯-鲁宾逊集团主张撤销帝国因素，建立移民殖民主义，包括与开普和德兰士瓦合并，只是由于德兰士瓦的拒绝，才使这个图谋未能得逞。但是马更些—沃伦人道帝国主义集团则像非洲人统治者一样，要求以先发制人的办法阻止移民殖民主义，因为他们在茨瓦纳的基督教皈依活动和举办教会学校受到移民殖民主义极野蛮和破坏性极大的反对。特别是马更些，他在南非和英格兰发动一场十分有效和成功的运动。⑨

在另一方面，德兰士瓦以渗透和合并的方式积极推行扩张政策，这种方式也是莫舒舒在索托南部推行的。一些布尔人与贝专纳兰南部的特拉平人和罗隆人签订假条约，随后宣告在伏伊堡成立由威廉·范·内伊柯克领导的斯泰拉兰"共和国"和在鲁伊赫龙德成立由盖·范·皮蒂乌斯领导的戈申"共和国"。德兰士瓦的战略是先联合"姊妹共和国"，然后加以吞并。同时，假条约所促成的误解大大加剧非洲人敌对者相互间原有的敌对情绪，并引起酋长曼库尔瓦内和马绍伍（特拉平）以及蒙特希瓦和莫谢泰（罗隆）之间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尽量多聘请布尔人为志愿兵和支助者。因之贝专纳兰南部成了（正如马更些所形容的）"无政府状态、攻打邻国和暴行的渊薮"。

1884年，英国派遣查尔斯·沃伦爵士前往恢复法律与秩序。沃伦宣布贝专纳兰南部为英国王室殖民地，同时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兼开普殖民地总督赫尔克里士·鲁宾逊爵士任命马更些为副专员，只是由于开普殖民地舆论反对他的"亲土人、反布尔人政策"，马更些很快就被罗得斯所替代。随后，经过与茨瓦纳一些酋长讨论，英国又于1885年宣布贝专纳兰北部为保护国。根据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的特许状，原来打算让贝专纳兰保护国与南罗得西亚合并，但是茨瓦纳统治者和他们的传教士联盟阻止合并的实现。1895年，这些统治者（卡马和1892年继塞特谢莱接位的塞贝莱以及恩瓜克策的巴索恩）由伦敦布道协会的传教士W.C.威洛比牧师陪同前往英国，通过觐见维多利亚女王、殖民大臣和慈善团体领导人，他们终于成功地保持保护国地位。

⑨ J.马更些（Mackenzie），1887年。

斯威士人

在大规模移民和纳塔尔及德兰士瓦共和国建立之前，斯威士人没有必要和移民殖民主义打交道。此时，王国由姆斯瓦蒂统治。这个社会由居统治地位的外来的恩古尼人和土著的索托人组成，前者建立了恩科西-德拉米尼王朝。恩古尼人通过征服和联姻建立起对索托人的统治，并以“对国王的共同忠诚”、“友谊”以及相互联姻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与索托南部和茨瓦纳一样，斯威士人也在祖鲁革命的蹂躏下生存了下来，但他们依然是祖鲁人袭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外交政策旨在争取建立防御联盟以抵御祖鲁人。所以，姆斯瓦蒂一开始就把纳塔尔和德兰士瓦的白人移民以及英国政府当作抵抗传统非洲敌人的潜在同盟者。[10]

另一方面，白人移民却一味对斯威士的土地、牲畜、劳动力和矿产感到兴趣。德兰士瓦特别对并吞斯威士兰兴趣很大，因为它想得到通过科西湾出海的通道。与此同时，纳塔尔和英国特别惧怕德国-德兰士瓦在建造通向科西湾铁路上的伙伴关系。可是他们不论哪个都不愿对斯威士兰承担直接责任，因为那里只不过是一块孤立于较大殖民地并远离交通线的小地方，又没有发现大量矿产。姆斯瓦蒂夹在布尔人和英国人你争我夺的夹缝中。更有甚者，许多布尔人和英国移民、商人、探矿者开始向姆斯瓦蒂施加压力，求索各种各样的特许权，包括个人土地拥有权、土地租借权、商业垄断、开矿权，甚至征收财政岁入和海关税收的权利。

姆斯瓦蒂在 1868 年去世之前已经授予外国人一些特许权。他死后斯威士兰发生继承危机，布尔人和英国人都进行干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傀儡继位。布尔人派一支军队打败其他王位觊觎者，把姆本泽尼扶上台，此人是姆斯瓦蒂第二个妻子生的幼子，是一个终日沉醉于白人酒中的荏弱的统治者。姆本泽尼稀里糊涂地批准各种各样的特许权，达到“最惊人的规模、种类和错综复杂”的程度，包括有几次把同一地区的土地、矿产和商业垄断权给予不同的个人。迄止 1890 年，计有 364 项业经登记的特许权，几乎遍及不到 1 万平方英里小小的斯威士兰领土的每一平方米。到此时，王室每年可得到特许权费约 1.2 万英镑。 213

但是特许权的大量授与，给布尔人和英国人提供损害斯威士兰主权的借口。到 19 世纪 80 年代，姆本泽尼被一大堆法律与秩序问题、他和白人特许权持有人之间的争议以及特许权持有人相互之间的矛盾争斗弄得晕头转向。起初，他要求英国保护和派遣驻扎官，但被英国拒绝。然后他转而求助于纳塔尔的土著人事务大臣狄奥斐卢斯·谢普斯通，后者于 1886 年派遣他的儿子（也叫狄奥斐卢斯）充当姆本泽尼有关白人事务的常驻顾问。姆本泽尼不加考虑地委任谢普斯通为由 15 个选任白人和 5 个委任白人组成的委员会的主席，在 1888 年他给这个委员会一份权利特许状，赋予它自治的权力。大部分特许权都是在谢普斯通担任常驻顾问期间（1886-1889 年）授予的，但是在姆本泽尼于 1889 年去

[10] J. S. M. 马策布拉（Matsebula），1972 年；R. P. 史蒂文斯（Stevens），1967 年。

世之前，白人组成的委员会同样解决不了特许权纠纷，姆本泽尼去世后，紧接着于1890年建立起布尔-英国双重统治。根据当年斯威士兰协定的决定，由这两个国家建立共管的临时政府委员会来治理斯威士兰，同时建立酋长法庭，调查特许权的合法性，结果在364项特许权中肯定352项有效。委员会拥立姆本泽尼的16岁儿子恩瓜内登位，并宣布由其母瓜米莱·姆杜莉担任摄政王后。

由于布尔人和英国人在南非的矛盾加剧，双重统治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根据1894到斯威士兰协定的决定，英国把斯威士兰交给德兰士瓦，交出对斯威士兰的"全部保护、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条件是德兰士瓦不得兼并斯威士兰。摄政王后和她的御前会议强烈抗议这个决定，甚至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英格兰呼吁，但终归无效。1895年德兰士瓦委任一名常驻特别专员，移民殖民主义由此篡夺了斯威士兰的主权。以后，根据1899到1902年英-布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弗里尼欣条约（1902年），又由英国占有斯威士兰。1903年6月25日英国政府发布斯威士兰敕令，宣布其为保护国，而1909年南非法令规定今后把斯威士兰、巴苏陀兰（今莱索托）和贝专纳兰三地总称为高级专员委任领地，并明确其并入南非联邦的条件。只是由于非洲人的强烈反对，合并始终未能实现。

赫卢比人、姆蓬多米塞人、巴卡人、森加人、恩坚贾人、绍纳人、通加人、塔瓦拉人等的能动性和反应——结盟模式

214

所有这些部族，内部都缺乏政治团结，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能抵挡白人殖民主义日益加剧的威胁。各邻邦之间没能结成外交和军事联盟。相反，他们相互间经常袭击、打仗，一般说来彼此互不信任。他们的部族构成是多种多样的，自治的酋长领地、游牧难民或被俘奴隶的群落、殖民主义者或传教士的保护地，各色齐全。他们大多是祖鲁人、恩德贝勒人、本巴人、尧人和恩古尼人的纳贡者或袭击受难者。

虽然，这些小部落中有几个（诸如，巴尔韦、曼关德、马科尼和穆塔萨大酋长国），像科萨一样选择武装抵抗殖民主义威胁的道路；但其他多数部落，如赫卢比、姆蓬多米塞、巴卡、森加和恩坚贾则选择与白人结盟，错误地希望由此可以得到保护和安全。从整体说，这些小社会习惯于在外交上经常改变结盟的对象，并倾向于倒向较强大国家一边，或者佯装不结盟，同时根据自己的利益试图操纵占优势的国家。在昌加米腊和姆韦尼·马塔帕两个王朝对立期间，绍纳人、通加人、塔瓦拉人、文达人和恩道人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经常使用这种策略，而索托人、姆蓬多人、姆丰古人、滕布人和通加人也使用同样策略来利用姆泰特瓦和恩德万德两个邦联的对立。根据上述原因，这些部族中有许多愿意与英国联合反对祖鲁人、恩德贝勒人、本巴人、恩古尼人和尧人。此外，一些小部族，如姆丰古人、滕布人、恩坚贾人、塞瓦人和塔瓦拉人在一段时间里始终在强大的军事势力影响下求生存。结果在他们的人民中造就了相当多基督教徒和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这些人不但舍弃传统文化，而且蔑视传统领导，使殖民者得益。

总之，英国人以答应结盟、保护和(或)“解放”为手段，轻易地把这些部族分而治之。从而在该地区建立永久性的白人殖民地。

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反应，1895-1914年

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实际上南部非洲的所有民族不是全部就是部分地被殖民地化了，所有地方都遭受着不同形式的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压迫。

不久，征收茅屋税、强迫劳动、严厉镇压传统的信仰与习惯，尤其是土地的转让全都实施了。白人移民需要人数越来越多的本地廉价劳动力到农庄和矿山为他们工作，还征收数额越来越大的茅屋税以满足行政经费不断增加的部分需要，这一类外来统治者的干预日益强化。非洲人被迫离乡背井，搬出家园，让给白人移民，自己去充当军队里的“志愿兵”。在罗得西亚（包括南罗和北罗）和尼亚萨兰，特许公司的官员索性搬用南非的“土著人法”。白人移民在罗得西亚最多，白人行政当局不能容忍阻碍它经济发展的任何事物，即使这些障碍是绍纳人的生命和权利。白人行政当局轻易地强占绍纳人的土地、牲畜、庄稼和储粮，强迫绍纳人从事强制劳动，为白人移民的利益服务。这些移民被吸引到马绍纳兰来，当局预先答应他们有较好、较轻松和较富裕的生活方式。最难以容忍的是殖民地所实施的司法制度以独断和无规律为特征。与所有这些同时并存的还有一连串自然灾害，包括天花和牛瘟的流行、干旱、甚至还有蝗虫成灾。[11]

215

当然，非洲人决不会面对这些苦难而漠然无动于衷。在这种殖民统治、失去土地、陷于赤贫、深受压迫和面临西方化的环境中，绝大部分人都会像科萨人一样，逐渐相信白人是所有苦难的根源。对外来者统治的仇恨——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产生日益增强的抗拒白人的情绪，也使许多政治领导人、广大追随者、僧侣、甚至过去敌对的部落之间产生一种强有力的联合愿望。由于难以忍受的压迫和剥削，起而斗争，旨在推翻殖民制度的典型反抗事例有1896-1897年的恩德贝勒-绍纳“奇穆伦加”武装抵抗、1904年的赫雷罗人起义和1906年的班巴塔或祖鲁人的反叛。

恩德贝勒-绍纳的“奇穆伦加”武装抵抗

“奇穆伦加”(Chimurenga)是绍纳人称呼他们武装抵抗形式的名词，这次抵抗运动在马塔贝莱兰起自1896年3月；在马绍纳兰则爆发于1896年6月。第一个死亡者是英国南非公司雇用的一名非洲人警察，他于3月20日被杀。[12]第一次袭击欧洲人发生于3月22日在埃塞克斯韦尔镇，当时有7个白人和2个非洲人被杀。于是，“奇穆伦加”很快蔓延到整个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参阅插图9.1），在一个星期内，在马塔贝莱兰杀死130个白人。

---

[11] D. 查奈瓦，1974年；R. E. R. 马丁(Martin)，1897年；T. O. 兰杰(Ranger)，1967年。

[12] 暴动的目击者的叙述（大部分为欧洲移民、士兵和记者），见R. S. S. 巴登-鲍威尔(Baden-Powell)，1897年；F. C. 塞卢斯(Selous)，1896年；R. E. R. 马丁，1897年。

非洲人使用马蒂尼-亨利步枪、李·麦特福特型枪、旧式象炮、毛瑟枪和旧式大口径短枪以及传统的矛、斧、圆头棒、弓和箭。他们抓这个时机发动“奇穆伦加”，因为当时216 公司大部分军队调往南非，参加对布尔人的詹姆森袭击。并且，有大批非洲警察携着他们的枪支弹药背叛公司加入他们非洲同胞的队伍，人数极多，于是（为了谨慎起见）就把其余“忠诚的警察”解除武装。

公司急忙动员白人组织起马塔贝莱兰救援部队，这支部队由帝国军队、罗得西亚志愿马队（移民）和部分非洲人组成。在极盛时期这支部队有2000名白人、250名卡马派来的恩瓜托人、200名殖民地（南非）土著人和150名左右罗得西亚非洲人，由参加过科萨-移民战争的老资格军人弗雷德里克·卡林顿爵士任最高统帅。“奇穆伦加”本质上是游击战争。骑警则依靠包围和爆破作战，他们还毁坏庄稼，强征非洲人的牛、山羊、绵羊、鸡和谷物，企图以此饿困反抗者并增加自身的给养。

在马塔贝莱兰，“奇穆伦加”从1896年3月坚持到当年12月，使公司蒙受重大损失。7月15日，公司被迫宣布对持械投降者采取宽大政策。1896年7月5日，恩塔巴·齐卡·曼博战役之后，塞西尔·罗得斯“决定尽可能抓住第一个谈判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出现，也要制造一个机会。”此时，他已放弃获得“全面和无条件胜利”的希望，因为战局长期拖下去或陷入军事上僵持的局面，都将引起公司破产，或迫使英帝国政府把殖民地改为保护国。8月，恩德贝勒人发觉自己被包围在马托波山地，经过长期作战，面对罗得斯提出的宽厚和平条件，他们最终决定选择谈判。随后出现的是罗得斯与恩德贝勒顾问大臣间一连串的和平会谈，会谈从1897年8月一直延续到1898年1月5日，当时罗得斯同意在公司10名委任官员中包含6名参加“奇穆伦加”的酋长（他们是顾问大臣德利索、索马布拉纳、姆卢古卢、西孔博、科莫和尼亚曼达）。罗得斯划拨土地供他们居住，捐赠谷物230万公斤，并允许纠正他们所不满意的措施。

公司在马塔贝莱兰取得到胜利与和平之后，就集中力量对付绍纳的“奇穆伦加”，那里的战争从1896年6月起同步激烈进行，并时断时续一直延至1903年。马绍纳兰“奇穆伦加”的领导核心在西部为马沙亚蒙贝大酋长国，在中部为马科尼大酋长国，在东北部为曼关德大酋长国。但是有几个小酋长国如尼安多多罗、塞克、沃塔、奇奥塔、奇克马夸、斯沃斯韦、兹温巴、马香加尼卡和马森布拉，他们有的自己主动进行“奇穆伦加”，有的与别人联合进行。

“奇穆伦加”像科萨杀牛事件的情景一样，被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历史学家称为返217 祖现象和千年至福，因为在“奇穆伦加”中传统的先知和僧侣起了重大作用。人们称这些人为“斯维基罗”(svikiro)。[13] 在马塔贝莱兰的主要的“斯维基罗”是穆夸蒂，在马绍纳兰西部为卡古比，在马绍纳兰中部和北部为内汉达(一位妇女)，此外还有一大批地方

---

[13] “斯维基罗”（svikiro）一词脱胎于动词库斯维卡（kusvika），其含义为“到达一个地方”。“斯维基罗”语义上的意思就是人、车辆或工具或媒介，神或精灵通过它与人们接触。这样，西方文化中的传教士、拉比和先知，穆斯林文化中的哈里发和马兰(mallam)，在绍纳人社会就叫“斯维基罗”。“斯维基罗”不可与医生——恩甘加（nganga在欧洲称巫医）一词混淆，也不可与算命先生混淆。“斯维基罗”一人兼有僧侣、知识分子、教育家和领导人的任务。这里为外国读者方便起见，我们译为“先知”。

性的低级先知。"斯维基罗"告诉恩德贝勒人和绍纳人，白人带来全部苦难，即强制劳动、征收茅屋税和鞭打，还有蝗虫、牛瘟和干旱之类的自然灾害。他们使许多非洲人深信：绍纳之神姆瓦里（在辛德贝勒为姆利莫）为他的人民深受苦难所感动，已发布命令将把白人赶出国境；所以非洲人不必畏惧，因为姆瓦里站在他们一边，将把白人射出的子弹化作无害的水。总的说，许多非洲人都相信，"斯维基罗"宣布的是姆瓦里的圣训，如不遵从，将为酋长国带来更多的苦难，也为个人带来不幸。

"斯维基罗"主要是革命的先知，他们使"奇穆伦加"的真正宗旨和人民的普遍意志结合成一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和他们的影响就会减弱。此外，作为绍纳传统的保护人和绍纳生活许多方面博学的权威，他们害怕欧洲传教士夺走他们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斯维基罗"明显的领导作用是在恩德贝勒(尤其是在绍纳人民中)发挥政治和军事的机能。他们是势力遍布全体酋长国的唯一权威，穆夸蒂、内汉达和卡古比的精神指导范围不止一个大酋长国。和大酋长不同，"斯维基罗"拥有一个周密而秘密的联络网，通过这个网络，他们交换无数信息，恰当地协调所作的努力。他们甚至能拥立前罗兹维国王的曾孙穆津加尼亚马·吉里·穆泰韦里为新王，恢复古老的罗兹维王朝和邦联。许多非洲人都赞成这次拥立行动，发誓效忠于穆津加尼亚马，可是由于穆津加尼亚马不久被白人移民逮捕入狱，邦联瞬即瓦解。与此同时，穆夸蒂被人暗杀，据说是被一个幻想破灭的门徒所弑。

卡古比和内汉达对大酋长国年轻尚武的贵族们影响最大，如对曼关德的穆琴瓦、马科尼的姆希里皮里、尼安多罗的帕纳谢。但是卡古比于1897年10月、内汉达在两个月 218 后先后被俘。1898年3月2日他们被控杀人罪，死于绞刑架下。两人的尸体被埋葬在众人所不知的地方．"这样，土著人不可能盗走他们的尸体，并宣称他们的灵魂已经降附到别的女先知或巫医身上。"

绍纳的一些酋长国由于没有领导权集中的政治-军事机器，没有枪炮与弹药，最主要是没有了"斯维基罗"，在1897年一个接一个被打败。9月4日，马科尼被钉上镣铐，蒙住双目，在骑警、"友好者"和他自己的子民面前被枪毙。据目击者《泰晤士报》（伦敦）记者报道，马科尼挺身屹立着死去，"其英勇与尊严迫使所有在场者莫不发出不由自主的赞美。"同样，一度几乎使索尔兹伯里和布拉瓦约交通陷于中断的马沙亚蒙贝在7月25日战役被杀。在7月到9月间，白人移民成功地包围了马绍纳兰中部的一些酋长国。曼关德在9月间被征服，但他的儿子穆琴瓦和几个顾问一起，继续进行抵抗，直到1903年，此时"奇穆伦加"终于被扼杀。

关于"奇穆伦加"的死伤人数，估计欧洲人死450名、伤188名，而非洲人死亡8000名。在死去的450名欧洲人中，372名是当地移民，占这个殖民地白人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余为帝国骑警和雇佣兵。但是，有几个最坚强不屈的绍纳部族继续进行"奇穆伦加"，甚至与正在抵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莫桑比克非洲人结成同盟。"奇穆伦加"之后最杰出的抵抗是罗兹维酋长国统治者卡敦古雷·马蓬德拉进行的斗争，这个酋长国处于乌佐埃地区，过去曾抵抗恩德贝勒人和葡萄牙人侵犯，保持独立。马蓬德拉没有参加"奇穆伦加"，因为他和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在拒绝支付茅屋税后，于1894年迁往莫桑比克北部，参加

了巴尔韦人反抗葡萄牙人的战争。1900年他回到罗得西亚，招募一支绍纳族的军队，由科雷科雷人和塔瓦拉人以及一些从马绍纳兰东北部和中部酋长国来的青年勇士组成，包括曼关达人和马科尼人。他与有头衔的穆塔帕和奇奥科结盟，通过他们又与崇拜姆瓦里的"斯维基罗"结盟。1902年6月以前，他对马绍纳兰北部白人移民和忠于白人的酋长国发动游击战争。以后，他再次迁往莫桑比克，加入正在进行的巴尔韦人的"奇穆伦加"，但是这支联合部队很快被葡萄牙人打垮，主要是因为后者有优越的火器。马蓬德拉回到罗得西亚，1903年8月30日他投降，以杀人和煽动叛乱罪被判七年苦役。他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至死。

赫雷罗人起义

219 赫雷罗人深感殖民统治给西南非洲带来越来越多的苦难，他们在1904年趁德国军队从赫雷罗兰撤走去镇压邦德斯瓦特人起义的机会，于1904年1月发动起义，杀死100个德国人，捣毁几个农庄并掠走一大批牛。德国政府派冯·特罗塔接替特奥多尔·洛伊特韦恩为德军司令。此人决定使用残酷无情的战术和大屠杀以取得全面胜利，并完全消灭赫雷罗人。赫雷罗6-8万人口中估计有75%到80%遭到屠杀；1.4万人被关入战俘营；2000人逃往南非。塞缪尔·马赫雷罗及其1000追随者越过卡拉哈里沙漠逃到贝专纳兰。

结果，全部土地和牲口被没收，禁止非洲人成立部族组织和举行传统仪式。除了为白人移民做工外没有其他生存下去的办法。非洲人自己的神和祭司被打败，这样就证明其无用。于是，人们大批改变信仰，信奉基督教。1915年，南非军队占领西南非洲，实施军事管制法一直到1921年。到此时已有10,673个南非白人和不再回国的德国移民一起参加移民的行列。非洲人只能在贫瘠保留地里进行勉强维持生计的农业劳动或者被迫以充当流动劳工为生。

命运尽管如此悲惨，可是赫雷罗人留下一份对殖民统治反抗、部族间相互忠诚以及文化上、历史上、种族上和国家意识上觉醒的遗产，这份遗产由整个南部非洲自由战士的后代继承。

结 论

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南部非洲实际上已不存在当地人的主权国家。非洲人的绝大部分此时进入反抗的第三阶段，以在殖民统治下以及殖民地经济和文化中争取有利的妥协为特征。事实上，这是反对殖民征服和占领的斗争的另一种反应形式，它属于非洲历史的不同篇章。因为到此时传统社会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领导已被征服、被殖民地化和遭到亵渎。传统的国王已由一个来自外国的土著人事务部长所取代，如纳塔尔的狄奥斐卢斯·谢普斯通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人物，其他地方则是所谓的"土著事务专员"和"土著人部"。非洲广大群众主要被看作是"黑人问题"，并且正如贾巴武所描绘的：是"在他们祖国中的"无土地者、无选举权者、奴隶、贱民和社会遗弃者，没有未来任何生活

出路。”[14] 更有甚者，这些人只是面临失去其本身特征危机的第一批非洲人，[15] 危机的成因 **220** 源自人为划定的殖民地疆界分隔了文化-语言-历史完全相同的部族；也源自处在整个白人移民统治世界的矿山与农庄、白人家庭以及基督教教堂与学校造成的文化冲击。

现在非洲人思想和行动的推动力集中于个人是否能获得白人世界的知识、技术和物质商品，以及暴露——同时希望纠正——在殖民控制结构中“土著人的无能”。[16] 这种倾向导致非暴力民权抗议运动的兴起，并集中体现在（本书后文将作阐述）1912 年组成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南罗得西亚土著人福利会、克莱门茨·卡达里的工会主义、所谓宗教分离主义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由教会教育出来的基督教精英填补了新的领导真空，这些人不但信奉普世主义、反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而且还信奉非部族主义。这样，他们成了破坏非洲酋长、部族和个人所主张的部族与宗派合作的第一批人。非洲人对殖民统治反应（反对殖民征服）的新路线，主要由受过教育的精英领导的城市群众所决定。农村群众有的留在保留地依靠只能糊口的生产过活，有的流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欧洲人的矿山、农田、厨房或工厂中的低工资收入者。

（李秀芬译）

---

[14] D. D. T. 贾巴武（Jabavu），1920 年，第 16 页。

[15] R. F. 贝茨（Betts）编，1972 年。

[16] 见S. T. 普拉切（Plaatje），1916 年；S. M. 莫莱马（Molema），1920 年。

10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马达加斯加：非洲人的能动性和对殖民征服与统治的反应

M.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

221 1817年10月23日签订并于1820年批准的英国-梅里纳条约[1]授与拉达马一世"马达加斯加国王"的称号。接着他于1822年2月14日宣布对全岛拥有主权（见插图10.1）。一个获得当时世界主要国家支持的王国从此在外交舞台上初露头角。可是对于这个王国的主权，法国一开始就提出争议，拒绝承认并以武力反对。直到1862年，拿破仑第三政府同拉达马二世签订了一项条约，才承认他为马达加斯加国王。在塔那那利佛当局看来，这就是承认了王国的存在，并且意味着法国放弃了领土要求，尽管在条约的序言中仍保留了"法国权利"，换言之，就是保留法国对于原有的贸易站和机构设施，以及对萨卡拉瓦和安塔卡拉纳保护国的特殊权利要求。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认为拉达马二世思想太自由化并过于讨好欧洲人，于是在1863年将他刺死，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局势。从1864年到1895年一直担任首相的赖尼来亚里沃尼采取了一项比较灵活政策，其目的在于保证王国的独立能够获得尊重。这样他虽然无力完成领土的统一，但他着手组建政府、行政机构和军队。尽管他的政敌不断搞阴谋，还有群众的不满，不时还爆发公开的叛乱，但他总算勉强成功地巩固了他的政权并且把被征服的地区联合在一起。可是与此同时，殖民帝国主义正在欧洲不断发展，法国再次企图统治马达加斯加。赖尼来亚里沃尼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而竭力开展的外交努力遭到失败。从1883年到1885年和1894年到1895年，法国两次发动战争终于把首相赶走和使王室政府瓦解。尽管法国控制了塔那那利佛，但是在伊梅里纳的一些农村地区及其所属的省份，法国人很快便遭到武装反抗。在一些保持独立而未被征服的地区，法国人发现必须同掀起英勇斗争反抗他们的一些小国国王和军事领导人进行斗争。然而，法国依靠技术优势最终还是消灭了这些互不协调的小块地区的抵抗。即使如此，在整个岛屿上，人民还是纷纷奋起，自行组织起来，首先是同殖民政权的暴政进行斗争，

[1] 梅里纳指的是伊梅里纳的居民，伊梅里纳是马达加斯加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其首府位于塔那那利佛。梅里纳王国以统一全岛作为己任。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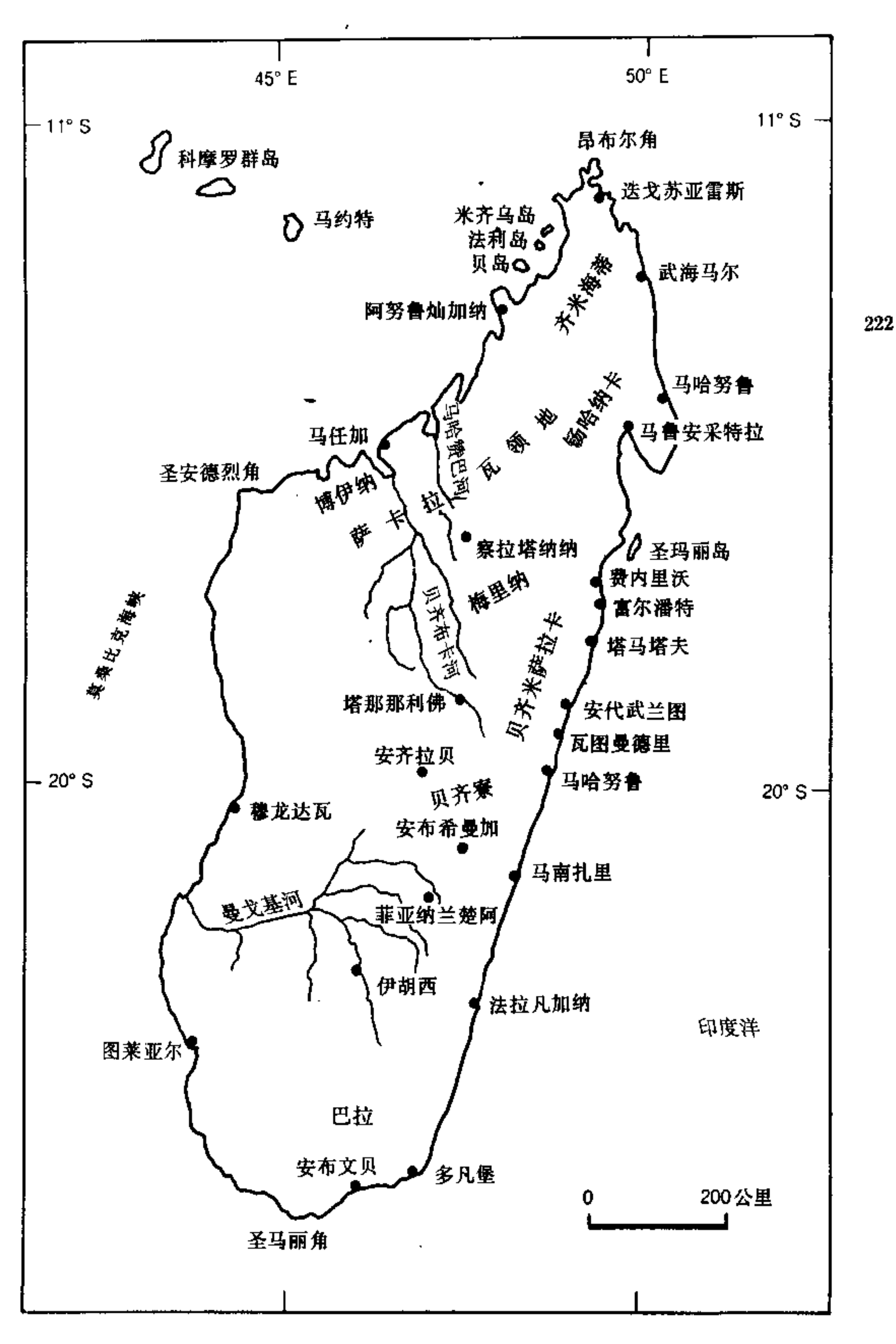


插图10.1 1900年前后的马达加斯加

223



图片 10.1 赖尼来亚里沃尼，1864-1895 年马达加斯加的首相，拉娜瓦洛娜二世和三世的丈夫



图片 10.2 拉娜瓦洛娜三世，1883-1897 年马达加斯加的女王，穿着宫廷礼服

后来则是为了恢复他们国家的独立。

一个在帝国主义威胁下四分五裂的国家

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内，法国又恢复了原来的殖民扩张政策。第一步，从 1870 年到 1880 年，也就是在普鲁士人手下吃了败仗以后，法国经历了一段反省时期，同时在本国内部培育自己的实力。然后，从 1880 年到 1890 年，一些主张共和政体的知名人士，如莱昂·甘必大和朱尔·费里开始感到殖民征服可以使他们的国家恢复在大国中间占一席之地的地位。敌对舆论迫使他们只好采取一种"小剂量"政策，不过他们仍然于 1881 224 年使突尼斯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尽管缺乏一个全盘计划而且资源有限，他们仍派遣远征军去非洲大陆、东京湾和马达加斯加。1890 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思想已在公众舆论中占了上风，加以商界开始对殖民冒险事业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兴趣，于是法国的野心也就更加明显突出了。[2] 马达加斯加在殖民宣传中被渲染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一块藏有无数财富的地方和一个英国垂涎已久的岛屿。从而马达加斯加遂成为众多野心和阴谋的目标。拉娜瓦洛娜女王政府因此一方面必须同这种外来威胁作斗争，同时还企图平息伊梅里纳及全岛普遍出现的潜在的和公开的紧张局势。

第一次法国-梅里纳战争前夕的形势[3]

法国对马达加斯加重新恢复兴趣源自大量宣传，由留尼汪岛法国议员蓄意掀起，通过右翼天主教集团不断煽动，后来又获得殖民派系的支持。这一系列来自不同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力图恢复并保卫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权利"。这种权利要求在人们记忆中扎根甚深，它使人们回忆起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曾宣布吞并该岛，也使人们回忆起 18 世纪时所作的一些无效尝试，企图以该世纪早些时候和王政复辟时期设立的贸易站为基点建立一个繁荣的"东方法兰西"。这种权利要求于 1884 年正式提交议会之前，在整个 19 世纪就已在大量书面文件中不断传播。留尼汪岛的院外集团要求彻底征服马达加斯加，以便留尼汪过剩的克里奥尔人口能向该岛移民，而英国人可能来开发的丰富资源也能保留下来供他们自己利用。在马达加斯加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工作不顺利，只能向低层社会阶级传播教义，因为大部分贵族家庭和有钱有势的平民都已转信新教。天主教传教士企图战胜新教的欲望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他们把新教徒描绘成英国人无数"狡诈的交易"所造就的产物。这种"背信弃义的英格兰"的理论在某些商界人士中获得了共鸣。商界人士竭力打算牺牲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利益去占领马达加斯加市场，他们试图以并吞该岛为手段而不是压低他们货物的价格来排挤英国人和美国人。殖民宣传迎合了人

[2] G. 雅各布（Jacob），1966 年，第 2 3 页。
[3] C. R. 阿热龙（Ageron），1978 a，第 114-118 页。

225 们的沙文主义情绪和自命为法国人承担着传播人道主义和文明使命的信念。为作好征服的舆论准备，"马达加斯加王国"被以明显的欺诈手法描述为一个"野蛮国家"，处于"外来部族"的统治下，"现行政府制度是暴政"，并且仍然从事奴隶贸易。

马达加斯加岛殖民化鼓吹者所制造的这些论调很难说有任何根据。被指责为亲英的王室政府，在对待外国的态度上，表现出一种受维护王国独立的决心所左右的敏感性。它企求得到每个强国的支持，出于那些国家本身的野心，它们是完全愿意提供这种支持的。④有人认为，马达加斯加不是大不列颠的附庸，两国之间建立牢固的信任完全是由于英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他们无意把该岛占为殖民地。那个"黑暗势力"占优势的所谓"野蛮"王国，事实上是由一位女王和一个自从1869年2月21日起就改信基督教的首相进行统治。他们曾经接受新教洗礼，多数的领导人和居民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这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并未阻止人民信奉天主教，也未阻挠法国传教士的活动。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足以证明政教之间确实存在着分离，即使在"女王宫廷的小教堂周围，首相也可以试图建立一个国家教会，即宫廷教会，由为他效劳的马达加斯加本地牧师和福音传教士主持"。⑤这种企图在耶稣会中引起了惊恐，同时也在"伦敦布道协会"(LMS)的代表中引起了"难以克服的疑虑"。

1877年，王室政府释放了由非洲大陆运来的马索姆比卡(Masombika)奴隶，并把他们安置在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1878年，政府彻底改动法制，自此之后，法律由三个法庭掌握，它们的任务就是进行调查，而由首相作出决策。作为一项立法创新的"305条法典"，⑥包含着民法、刑法和法律程序于1881年公布。所有上述措施再加上另外的一些新政都说明赖尼来亚里沃尼首相决心实现本国"现代化"，并决心使本国在同欧洲的交往中成为一个"文明国家"。

所有这些努力本应使那些受马达加斯加趋向文明和在那里传播福音的真诚愿望所感动的人们放弃武力行动，可是留尼汪的当选代表们，在天主教议员和殖民主义者的院外集团支持下，仍然顽固地要求征服马达加斯加。他们利用3个借口施加压力，迫使法国政府于1882年对马达加斯加采取了军事行动。

226 1878年，让·拉博德（他最初是拉娜瓦洛娜一世时期王国权贵们的一个商业伙伴，他们合伙经营武器和军火生产以及地产业，后来拉达马二世登位时，他成了法国领事）死于塔那那利佛，身后遗留一笔地产。他的侄儿爱德华·拉博德和康庞要求继承没有成功。来自巴黎的关于这笔遗产的要求是根据1868年签订的条约，该条约准许法国国民在马达加斯加有权获得地产，而塔那那利佛当局否决这项要求也是依据法律的，法律规定土地只能属于国王所有。"拉博德遗产"案件提出了土地所有权问题，这个问题是生活在该岛上的移民和商人直接关心的。关系重大的是他们能否有权获得他们所经营的土地或者至少能期望取得这块土地的长期租赁。⑦

④ E.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Esoavelomandroso)，1979年。
⑤ H.维达尔(Vidal)，1970年，第6页，注20中加以引用。
⑥ H.德尚(Deschamps)，1960年，第181页。
⑦ G.雅各布，1966年，第5页。

1881年4月，在对待托阿雷号事件上，法国同马达加斯加的矛盾发展到更加尖锐的地步。托阿雷号是一艘独桅三角帆船，船主是一个法国籍的阿拉伯人。他同另外3个穆斯林船员都在马拉比察湾被萨卡拉瓦国王巴卡里手下的人给杀害了。他们被杀害的地区是在梅里纳王国当局控制范围之外。这些人是一伙军火走私贩，他们曾受到口头盘问并被命令交出货物；可是他们却向萨卡拉瓦人开枪，后者还击把他们打死。法国人要求马达加斯加女王对于这次走私事件进行赔偿。⑧

在同一年里，两名英国传教士在该岛西北部的桑比拉诺沿海旅行时，他们说服该地区的萨卡拉瓦人酋长升起梅里纳王国的国旗。于是法国提出抗议，理由是法国曾于1840年和1841年同该地区统治者签订了保护条约。赖尼来亚里沃尼首相在答复中提醒法国人注意拿破仑第三政府同"马达加斯加女王"签订的1868年条约。

这次交往中明白显示出来的缺乏真诚使赖尼来亚里沃尼首相深信法国正在玩弄欺诈手段，企图促使他采取政策以便偿付赔款和购买武器军火。这些活动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它们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与法国人的紧张关系使得赖尼来亚里沃尼首相抽不出手来对拉达马二世已征服的地区进行同化，更谈不上谋求国家的统一。因此，不得不同法国领事博代进行谈判的乃是一位被国内问题团团围住的首相，而这位法国领事却突然中断与马达加斯加的外交关系并于1882年3月21日离开了塔那那利佛。

马达加斯加统治者陷于孤立，1882-1894年

1882年6月，勒廷布雷船长叫人把梅里纳王国国旗从安帕辛达瓦湾上空扯下而没有遭到任何抵制。赖尼来亚里沃尼首相仍然以为有可能避免发生冲突，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因此他派遣了一个以他的侄儿外交部长腊沃尼纳希特里尼亚里沃为首的使团从1882年10月至1883年8月到欧洲和美国访问，企图与法国人达成谅解，并从其他国家谋求支持。⑨但是，除了在伦敦、华盛顿和柏林签订了贸易协定，英国放弃其国民拥有土地的权利以换取租赁权，租赁期长短将由双方协议确定之外，马达加斯加的全权大臣取得的成就极少。尽管拉娜瓦洛娜二世的使节已同意在安帕辛达瓦湾撤去他们的国旗和警卫部队，并同意向外国人提供长期租赁权，但是在此时要在埃及放手大干的英国人的迁就下，法国仍然拒绝达成任何协议。1883年3月，法国海军炮轰马任加，从而爆发了第一次法国-梅里纳战争（1883-1885年），而此时马达加斯加的使团仍然还在欧洲。因此，外交活动已无法阻止战争，塔那那利佛当局痛苦而又惊讶地发现，主要大国都只关心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且有时，事实上是经常以牺牲小国来达成它们之间的协议。英国曾经被看作是一个忠实盟友，然而英国的态度却如此令人失望，据说首相因此而猛醒，惊叹地说，"原来英国和法国只不过是装出吵架的样子！"

227

法国就这样向一个外交上处于孤立的王国发动了进攻。由皮埃尔海军上将统率的一

⑧ P. 布瓦托（Boiteau），1958年，第172页。
⑨ P. M. 马蒂布瓦（Mutibwa），1974年，第218-246页。

支小型海军中队炮轰了马达加斯加岛西北部和东部的港口，并占领了塔马塔夫。法国人要求赖尼来亚里沃尼首相割让马达加斯加纬度16度以北的全部地区，还要求他承认移居在该岛的法国人有权拥有土地。首相继续顶住向他施加的压力，同时仍让谈判的大门继续敞开。在这场"虚张声势的"战争中，谈判要比军事作战进行得更加轻快。法国要求的目标在变：争论点已经不再是承认法国在马达加斯加西北部拥有历史上的权利问题，而是将保护国关系强加于全岛。赖尼来亚里沃尼首相坚持原来的立场并拒绝牺牲本国的独立。正当法国人和马达加斯加领导人采取两种看上去绝对不能妥协的态度时，他们的国民却陷于一种日益增强的厌倦情绪之中。在马达加斯加方面，封锁和战争消耗带来了经济危机并造成严重的政治动荡。至于法国人，东京湾的远征已经妨碍对马达加斯加作228战军队的增援。此外，倾向于协商的部长弗雷西内的观点已经压倒了鼓吹向塔那那利佛进军者所持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形势的发展促成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换句话说，就是乐于妥协。

相当含糊不清的1885年12月17日条约结束了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既没有战胜者也没有被消灭者。这项条约是如此含糊和模棱两可，以致双方认为怎样合适就可作出怎样的解释。根据条约，法国有权"在一切外交关系中代表马达加斯加"，还有权在塔那那利佛保持一位总监和一支警卫队。条约规定法国国民有权取得长达99年的长期租赁权，法国海军有权占领迭戈苏亚雷斯，同时法国政府还获得了1000万法郎的一笔赔款。此项条约没有提及"保护国"这个字眼，条约承认了拉娜瓦洛娜女王拥有全岛的主权并是土地的唯一主人。在同意批准条约之前，于1886年1月9日由首相要求经法方谈判者同意的"附件"或者解释性函件规定了总监的权力，确定了他的警卫队规模为50人，并将迭戈苏亚雷斯地区界限划定为向南向西各1海里，向北4英里。这些条款的意义很清楚是为了限制条约范围。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却无视这项"附件"，并且将1885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解释成为保护国条约。与此相反，赖尼来亚里沃尼控制下的马达加斯加政府，则拒绝考虑将该项文件作为在全岛建立保护国的条约，并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以反对法国的计划。这项解释是以不断引用"附件"作为依据的。"附件"限制了那些被认为不利于王国独立的条款的范围。塔那那利佛统治者相应地想利用法文本同马达加斯加文本的不同和附加议定书中所说明的澄清性文字来阻止保护国在马达加斯加出现。[10]

这样一来，由于对条约的不同解释层出不穷，首相与历届总监之间遂掀起一场长期消耗战。为了判定迭戈苏亚雷斯周围法国控制区的分界线进行了无休止的谈判。谈判尚未获得结果，法国海军就占领了该港口南部的一条广阔地带。第二场冲突是"领事证书"纠纷（由驻在国政府发出的领事官员正式书面认可和授权证书叫做"领事证书"），此事成了1885-1895年这个"幽灵保护国"整整10年中的头等大事。总监要出面颁发"领事229证书"以便证明马达加斯加是一个保护国，但是赖尼来亚里沃尼严加拒绝，以坚持王国的独立。直到英法于1890年签署一项协议，规定法国承认桑给巴尔为英国的保护国，作

[10] F.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1977 b。

为交换，英国接受“法国对马达加斯加的保护及其后果”。首相仍千方百计设法不放弃他原来的立场。这种外交上的困境，由于王国遭遇的经济问题而变得更加严重。

为了清偿欠法国的赔款，马达加斯加政府向“巴黎国民贴现银行”贷了一笔款项，并以该岛6个主要港口的关税收入作为此项贷款的保证。这6个港口是塔马塔夫、马任加、费内里沃、武海马尔、瓦图曼德里和马南扎里。由法国银行任命的代理人监督关税的征集，而此代理人的工资却由王室政府支付。这样就剥夺了马达加斯加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资金的需要，加上法国驻塔那那利佛第一任总监勒米尔·德·维莱施加的压力，迫使马达加斯加首相将大量土地特许权给予欧洲人从事开矿（贝齐莱乌的铜矿和博伊纳的金矿）和森林开发。乌埃瓦塔那那地区苏珀尔比金矿的租借地（以在矿井使用强迫劳动而臭名昭著）只给政府带来极少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工人逃跑并加入不法分子的行列，使本岛西北部出现不安的气氛，从而造成政府权力的严重削弱。在同一时期，东海岸的12处森林租借地也都给予了外国人。这批租让权持有者的资金有限，加上赖尼来亚里沃尼的态度，不管其外表如何，他总不愿意让他们轻易办成事情，这就使得开发马达加斯加森林的尝试不是全部成功。这些租借地既没有给王室政府带来富裕，也没有造福于当地居民，它们本身同样没有产生像外国资本家原来向往的那样良好的收益。[11]

由于给予外国人的特许权益未产生预期的效果，而关税的收入又不足以支付每6个月一次应交予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的欠款，因此为了补充国库，王室政府不得不增加赋税的数目并逐步扩大强迫劳动。除了必须承受常规的负担外，居民还得交纳每人1个皮埃斯特的所得税和一种普遍需交的捐款fitia tsy mba hetra，这种捐献在理论上是“志愿的”。有一些人公然拒绝完成强迫劳动制度所规定的任务，另一些人则沦为盗匪。抢劫团伙猖狂到了敢于在1888年攻打圣城安博希曼加，甚至在1890年攻打了首都。[12] 230

这些动乱威胁了本国特权阶级和外国居民的利益，使得法国总监感到惊慌，也暴露了“马达加斯加王国”政府面临的严重危机。法国议会尽量利用此种形势，再次派遣勒米尔·德·维莱前往该岛，并携带了一份建立真正保护国的计划，此人在1886年到1889年之间曾在该岛担任过总监。当赖尼来亚里沃尼拒绝此项计划时，法国议会以大多数票通过了诉诸战争的提案，梅里纳政府企图保持独立，只好默认。但是王室当局在完全不利的情况下于1894年投入了战争。

1894年的“马达加斯加王国”：衰弱与混乱

在被法国征服的前夕，“马达加斯加王国”由于国内严重紧张局势而更加衰弱。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看，拉娜瓦洛娜二世接受基督教洗礼标志着祖先崇拜的衰落和王室的（甚至地方的）神殿的消失，而神殿又是构成传统伊梅里纳的政治和宗教基础。它还造成数以

[11] M.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Esoavelomandroso），1979年，第186-193页。

[12] F.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1977 b，第50页。

千计的臣民被迫改变宗教信仰，而且由于神殿监护人被遣散，造成一些建立已久的僧侣统治集团的灭亡，最后还促成信基督教的一批上层人士的崛起。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问题全都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极为复杂。宫廷教会的支持者不仅处理国家事务，诸如人口调查、举办教育、招募军队和强迫劳动的征集等等，而且还利用他们自身的职位和经济体制上的有利条件，通过经商和放债敛聚财富。神殿监护人和地方要人原来享有的传统权力和特权都被剥夺殆尽，因此他们或是逃亡或是拒绝建造教堂甚至放火焚烧教堂，以此来对抗本岛领导人。[13] 此外，改信基督教的梅里纳人在支持官方教会方面也并非完全一致的。那些未同教会勾结成为一体的人和那些信奉一种大众化基督教、从圣经和当地历史以及民间传说中汲取灵感的人们，形成一个受过教育的上层精英集团，提出掌握政治领导权的要求。

这些人从事贸易并经常在集市日宣扬他们的观点。另外有些基督教徒为了反对官方教会的专横监护权力，转向天主教或者置身于某一个显贵的庇护之下。还有一些人则奋起为争取自身宗教生活上的独立自由而进行斗争，如安巴图纳康加的持异议者于 1893 年创建自己的教会，命名为特朗佐佐罗教会，即芦苇教会。[14] 这场持异议者运动形成于首都的中心，那里是基督教的堡垒，从而证明一些忠诚教徒也同样具有不安之感。

231

这种紧张局势进一步加速了伊梅里纳王国的衰败，局势由于外国特别是法国的压力以及由于塔那那利佛的主要人物所执行的经济控制的原始性质而进一步恶化，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实现由他们来创立一个民族国家的雄心壮志。那些亦官亦商的人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竭力利用强迫劳动制度（这种制度此时已失去它原有的作为仪式上义务的涵义），投资于土地，以及从事高利贷放债。反对首都这些权贵和宫廷教会信徒的是为数众多的小农和散工，他们对前者欠债累累，而强迫劳动制度使他们所受的苦难最为深重。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社会结构和政府机能的解体”，[15] 并暴露了“马达加斯加王国”内部根深蒂固的危机，因此，王国根本无力反抗法国的远征。但是，对于马达加斯加来说，还有比国家陷于困境更为重要的方面。同他们的领导人不一致的梅里纳普通民众，竭尽一切努力以逃避寡头统治压迫的属民，以及塔那那利佛的各独立王国，他们轮番地对法国的侵入和征服进行反抗。

一个对殖民征服进行缺乏协调的反抗斗争的国家

“马达加斯加王国”内部社会结构的解体，旧秩序的垮台，寡头的统治，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所有这些因素在人民群众当中造成一种深刻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抑郁。他们开始向往过去的理想化的情景并且鼓吹恢复传统。因此，不久之后，国家领导人便遭到猛烈的批评。1894 年和 1895 年殖民主义的征服又为政府的反对派提供了发泄自己意见的机会并加速了政府的垮台。这个政府早已受到梅里纳和下属各省的攻击。对于这

[13] F.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1980 年。
[14] S. 阿亚谢（Ayache）和C. 理查德（Richard），1978 年，第 133–182 页。
[15] G. 雅各布，1977 年，第 213 页。

个政府，独立的各个部族早已不予理睬，或者与之展开激烈争论。

领导的无能

法国的公众舆论和议会曾决定全力支持这次远征。军队拥有丰富的财力和大量士兵 232 供其调遣，而且地形也已由探险家和军事人员全部经过勘察，因此都是充分熟悉的。而马达加斯加方面，国家已远不如1883年时那样基础稳固了。年老专横的赖尼来亚里沃尼也变得不得人心了。他必须平定一系列包括他亲信甚至他子女在内的各种阴谋活动。面临这种情况，他既不敢完全信任政府中的达官显贵，他们时刻在觊觎他的高位，并盼望有朝一日取而代之；也不敢信赖军队，军队由于日益增多的开小差而组织紊乱，同时由于盛行的贪污腐败而士气低落。他的策略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发展。尽管他曾经作过零星的和缺乏条理的努力来购买武器弹药，试图把王国军队有效地动员起来，但是，他能真正信赖的盟友只有“热病将军”和“森林将军”。如同在1883年那样，他盼望实际难以通过的密林无路可行和当地气候有使欧洲人陷于虚弱的效用可以阻挡远征军向塔那那利佛进军。

事实上，这次战役确实使法国人遭受沉重伤亡，但这完全是由于国防部的某些部门缺乏远见而造成的。法国军队曾在马任加登陆，并准备在向首都进军时使用“勒费布弗二轮马车”。因此，他们不得不建筑一条公路。当他们在沼泽地带从事土方工程时，热病和痢疾突然流行，远征军成了一支“望不到头的凌乱队伍，夹杂在自身的辎重车队以及尸体和奄奄待毙的人群之中。⑯

王室军队没有向疲乏不堪的法国军队的侧翼或后方发动游击攻击。拉娜瓦洛娜的军队分散在各个港口。那些派去阻击法国人的军队，修筑了防御工事，可是一旦遭到炮轰或被包围，便立即撤离工事而溃散。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未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训练。他们迷惘失措而不是目的明确。一个名为腊吉斯蒂拉的前线军官在回忆军队中的意见分歧和冲突时写道：“四面八方都是一片沮丧的情绪，士兵当中和他们的头目当中都是如此，在人们得知首相的亲朋好友，特别是他的孙子腊齐马尼萨，受到特殊照顾仍然留在后方，在伊梅里那正享受着那些本应给予不得不忍受战争劳累和危险的人的荣誉时尤其感到沮丧。上述的腊齐马尼萨被军官们轻视地说成是“一个醒了之后马上又会睡着的孩子，只配烤烤白薯还差不多。”他竟晋升到“十五级”的品位，也就是当时等级制度中最高等级之一。这项晋升的宣布成了败坏士气和挫伤抵抗锐气的最后一击。⑰

鉴于这种形势，法国远征军总司令迪歇纳将军决定从主力部队中派出一支轻装的分队，主力部队当时由于疾病以及车辆和装备的拖累而停顿不前。这支分队驱赶他们前面的马达加斯加女王的正规军，迫使他们溃逃以后于1895年9月30日攻占塔那那利佛。而此时王室的军队不过是原先拉达马军队的一个苍白阴影而已。在这以前赖尼来亚里沃

⑯ H. 德尚，1960年，第230页；M. 布朗（Brown），1978年，第236-256页。

⑰ M.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1975年，第62页，注67中加以引用。

尼成功地压低了梅因蒂又排斥了安德里亚纳，两者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军队中的主要骨干，可是他没有设法去锻炼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由一些忠于他、重视国家财产、并且决心保持本国独立的人来正确指挥。首相为一群阿谀奉承者所包围，这些人一心只想迎合他，精于用一切手段填饱私囊，但是关于如何处理国事，他们就没有能力向他提供一丝一毫有益的忠告，他们的原则是谁掌实权就为谁效劳。这些人的大多数没有能力保卫王国的独立，后来往往成为殖民主义者热心的伙伴。他们否定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且经常打击人民群众。目睹王室军队可耻地溃逃和岛上领导人的"叛国行为"，人民群众遂奋起同法国人进行战斗。

伊梅里纳的"红方格袍"起义

在被征服情况下梅里纳人的态度从他们同政府相处关系的性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政府为赖尼来亚里沃尼首相的家族及其奉承者所垄断。[18]

伊梅里纳的6个行政区同统治寡头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一样。譬如说，瓦基尼西索尼是伊梅里纳国王的祖先发祥之地，也是最初奉立"伊凯利马拉扎"这类神殿的地方，因此拥有授予国王合法地位的特权。可是在整个19世纪，以倔强著称的瓦基尼西索尼居民在强迫劳动的重担下受苦受难，并深受阿瓦拉德拉诺人掌权的压力，阿瓦拉德拉诺人曾经支持伊梅里纳的贵族集团。瓦基尼西索尼的许多贵族被消灭了，如伊凯利马拉扎神殿监护人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所神殿先是被伊梅里纳的贵族集团没收，后来烧毁于1869年。从那时起，在瓦基尼西索尼南部，反抗基督教政府的行动遂围绕着对这所神殿的礼拜而日益明朗化。在该行政区的北部，继续信奉传统宗教的集团同基督教徒同时并存。可是，农村中基督徒内部出现分裂，如在安布希马拉扎的情形，那里的贵族和奴隶基本上都信仰天主教，而普通平民则是新教徒。在其他行政区，拥护传统信仰的人与基督教徒之间也可看到同样的鲜明区别。在安布迪拉诺，一个名为腊迈南德罗的地方，居民中有大量基督教徒，同阿瓦拉德拉诺的一个城镇保持密切关系。这个腊迈南德罗就在仍然崇拜神殿的安布阿纳纳的对面。

234

塔那那利佛被占领意味着城市基督教世界的崩溃，也激发了农村地区动员起来维护祖先的遗产。1895年11月的方德罗纳日(Fondroana)，也就是女王生日和公众休假日的这天，在安布阿纳纳首先爆发了起义(见插图10.2)。这次起义标志着居民反对法国征服的开始。这次大起义以"梅纳兰巴"(或"红方格袍")闻名，因为起义者"都用当地的红土把自己的衣服染红以便在远处不容易被发现。"起义者攻占阿里布尼马诺，杀死了省长以及一个英国传教士全家。起义者要求废止基督教礼拜、关闭学校、取消兵役和禁止强迫劳动。1896年3月，在伊梅里纳的南部和北部相继爆发了一系列起义，要求恢复古代的信仰和清洗统治阶级，目的是迫使法国人撤退。

"红方格袍"运动从王室军队开小差的士兵手中夺取武器，或者是从印度或克里奥

---

[18] S. 埃利斯(Ellis)，1980 a，1980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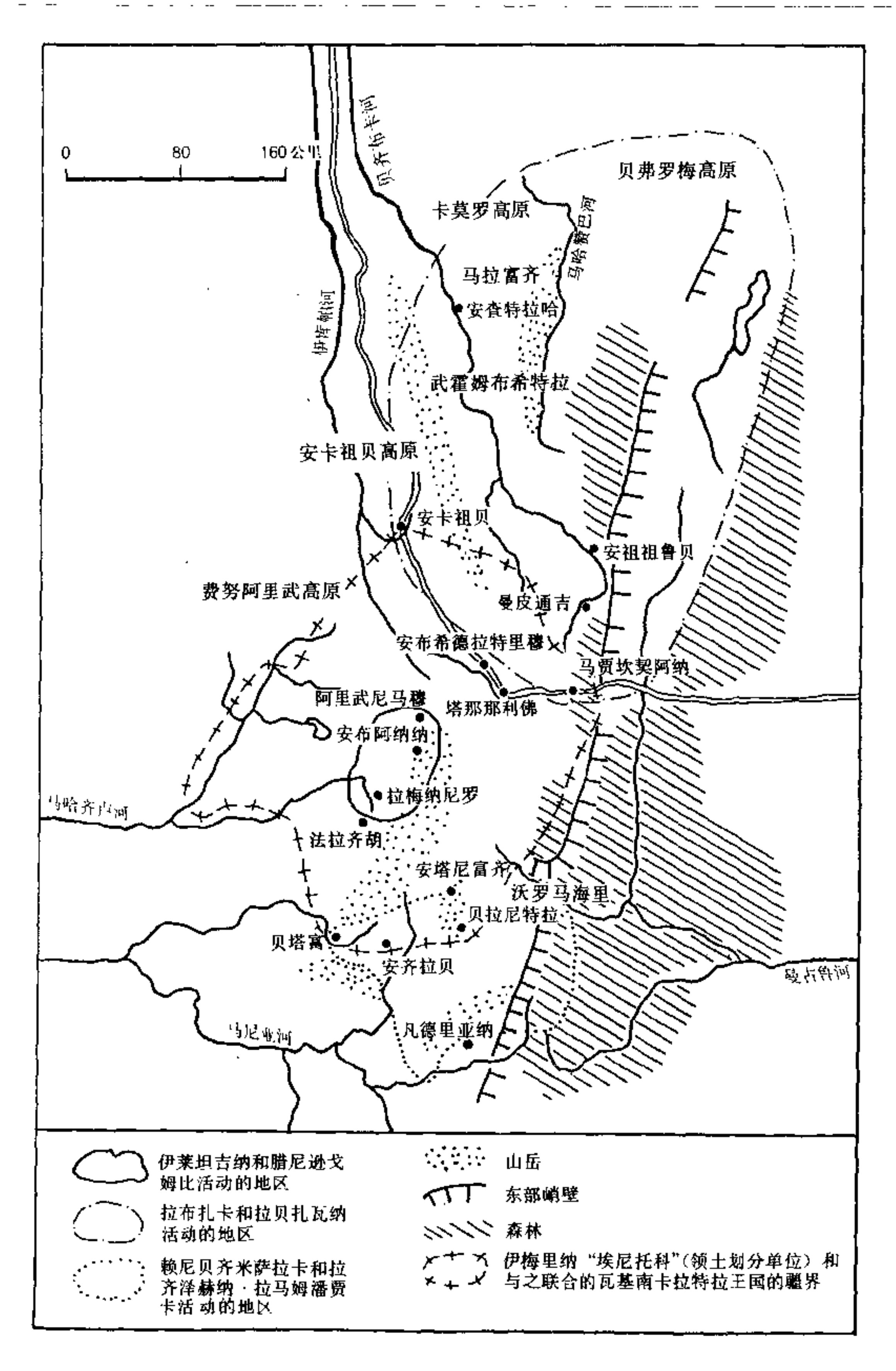


插图10.2 "红方格袍"起义的主要地区

尔商人那儿购买武器。这说明他们同沿海的交通还是比较畅通的。他们按照王室军队的式样组织起来，有一套完整的军衔并分编为若干个团。他们攻击寡头政府的代表人物，认为这批人掌权是非法的，应对失败负责。他们也攻击外国传教士和马达加斯加人福音传教士，认为这些人都是基督教的支持者，因而也就成为传统宗教信仰的敌人。他们根据这种认识开始焚毁教堂和学校，并将祖传宗教恢复到至高无上的光荣位置。对腊沃洛洛纳神殿的祭祀受到鼓励。古老仪式，诸如瓦利拉诺（valirano）和索特罗瓦卡卡（sotrovakaka）两种宣誓仪式再次经常地举行。

不过，“红方格袍”起义的某些行为脱离一部分居民群众。起义者所执行的策略中包含了对各地市场的攻击，目的是在人民思想中留下深刻印象，制造恐慌，从而破坏作为寡头统治所强加的束缚和秩序的象征的体制。但是这类袭击也能使他们充实自己的给养。这种对市场的袭击和对不投靠他们的村庄的庄稼进行抢夺，易于在定居的居民中造成思想混乱，以至分辨不清“红方格袍”起义同抢劫者或土匪有什么区别。殖民者及其本地的同伙利用这种混乱，使起义者孤立。

236 这种“红方格袍”起义一般都发生在伊梅里纳区域之内，特别是发生在一些长期不安定的地方。由于远离塔那那利佛，这些地区成了不法分子和逃兵的藏身之所。起义者西北面同萨卡拉瓦、东南面同贝齐米萨拉卡建立起联系，从而使采购武器变得比较容易。一般人要想进入这些地区是相当困难的，西北部边界为光秃而荒凉的塔姆波基察山脉，东部边界为大森林。这些地方一向居住的是牧民，他们受雇于首都的领导人，也享有中央当局给予的某种程度的自由。这些地区还向各金矿提供强迫劳力，从而造成这儿的居民对政府十分不满。因此，当地显贵和小行政区如伊梅里纳北面腊巴扎瓦纳和腊布扎卡的长官就不难利用这类不法分子和反叛者去反对外国人及其同伙，他们认为这些外来者应对造成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动乱负责，而这些动乱震撼了他们祖先的土地。事实上，被解放的奴隶的态度也是各地不同，甚至在同一地区也不完全一样。在伊梅里纳中部，那儿奴隶在居民中占很大比例，他们经常对于征服作出热情反应，转信天主教，这是忠诚于法国的一种表示，并返回他们出生之地。对比之下，在伊梅里纳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被解放的奴隶得为生活而挣扎，他们加入了起义。

“红方格袍”起义由五花八门的集团组成，他们对待许多问题的态度都带有模糊不清的色彩。例如，他们鄙视首都可是同时他们又崇拜首都。尽管首都是基督教的堡垒，又是他们向之挑战的权力的所在地，可是首都仍然是王国的象征，在群众的思想里仍然是伊梅里纳贵族集团的首都。首都的陷落预示着那种必须加以防止的混乱的来临。当“红方格袍”起义威胁着塔那那利佛时，起义者表现出既不赞同城市社会生活，但又急于保持同“王国首都”的接触。当他们企图把拉娜瓦洛娜同赖尼来亚里沃尼加以区别时，他们的态度甚至更加模糊不清，在他们看来前者是合法的君主，后者则是首相和篡位者，而事实上，前者却是由后者挑选指定的。他们企图诱使某些领导人离开寡头统治的其他人时可以说也是同样情形。这样，尽管“红方格袍”起义对外国人明显地势不两立，但对寡头统治集团的敌视就不那么显著了，程度上差别更大。

237 伊梅里纳的群众性抵抗运动由于残酷镇压而最终遭到失败。但是最为重要的失败原

因是由于各次起义之间缺乏统一协调以及未能与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爆发的起义联合一致。

王室权力统治地区的群众反抗

在其他一些地区，人民由于受到“红方格袍”起义带来的影响也对法国的征服作出一定的反应。1896年，在西北部的曼皮库尼地区，一个名为赖尼塔维的原梅里纳的地方长官，招集了一伙梅里纳逃兵和萨卡拉瓦牧民的杂色队伍，并把本地购买的武器提供给腊布扎卡的“红方格袍”起义者。他组织的起义是唯一以商业考虑占主要地位的“红方格袍”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区贸易的控制权。地区贸易原来全为印度人和克里奥尔人所垄断，这也就是他们所以遭受袭击的原因。在伊梅里纳邻近地区，“红方格袍”起义的领导人同当地国王和显贵保持联系，从而有利于他们的一些思想的传播。例如：塔纳拉·赖尼曼哥罗宣称他接到了来自塔那那利佛的赶走法国人的命令。[19]

别的地区就不存在这类关系。在那些控制最严因而剥削也最重的省份，1895年9月塔那那利佛的陷落成了向“马纳姆布尼纳希特拉”（主要是做官的商人）和对梅里纳移民以及外国人攻击的信号。例如在东部的省份，[20]生活在曼古鲁河下流的一支部族“沃里穆”的起义就触发了一系列暴动，从而1896年全年在这个地区形成惶恐不安的局势。起初这些起义的矛头完全对准梅里纳的寡头统治。直到1895年10月，该省总督赖南德里亚曼潘德里被召回塔那那利佛时，贝齐米萨拉卡人屡次摧毁士兵的稻田，拒绝向王室军队提供给养，有的干脆远走他处。从当年的12月起，他们公开袭击军事岗哨，主动出击，或者组织向梅里纳大农庄的进攻。起义者不伤害外国人的生命，因为他们误认为法国人是来把他们从压迫者手下解救出来。可是，占领军各分队为了扑灭起义所采取的极其严厉的措施使贝齐米萨拉卡人大为吃惊，后来使得他们相信法国人全然不是他们的朋友，而是梅里纳的同伙。从那时以后，起义者加强了他们的攻势，攻击法国人和梅里纳。直到1896年12月，“红方格袍”起义一直未曾衰落，但是，以后随着加利埃尼将军采取措施，使用本地酋长取代寡头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才使这一运动消声匿迹。 238

因此，被法国征服地区的人民可以说曾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反抗。

各独立民族的抵抗运动

开头时，法国人以为攻克塔那那利佛就能控制全岛。可是，在平定了“红方格袍”起义从而占领了伊梅里纳以后，他们才发现还必须征服各个独立地区。未曾受王室政府统辖的各族人民拿起武器抗击法国人的渗透企图。

在安本戈——这个地区的主要特征是政治上分为许多小单位——法国使用了好几种

[19] S. 埃利斯，1980 b，第212页。

[20] M.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1979年，第346-352页。

策略以图控制该地区。法国人力求与沿海和内地的主要酋长或土王达成谅解，但从1897年起，他们还是在大的村庄建立军事据点以维持本地区的秩序。[21] 可是，1899年初，出于抗拒殖民统治和坚持本地区独立的决心，在主要酋长领导下军事行动爆发了。这些起义者集团一个接一个杂乱无章地同法国人统率下从当地征集来的步兵发生冲突。这些法国人统率的士兵从来没有必要与两个对手同时作战，相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在任何地方自由地打击任何人。各伙的抵抗者彼此互相隔绝，即使面临共同敌人也不能联合一致。酋长们要对这种事态负主要责任，由于缺乏远见和自私自利，他们不能促进群众斗争的发展以保卫萨卡拉瓦的独立。

较大而又组织严密的王国梅纳贝的被征服开始于1897年，它成了加利埃尼所设计的政策的执行试点。这项政策包括三重目的：孤立和拖垮主要敌人——中央集权的梅里纳政府；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促使本岛各主要地区反对伊梅里纳而实现政治自治；利用那种自治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殖民化。[22] 托埃拉国王和聚集在安比基的他的主要酋长们，据说已准备放下他们手中武器，但是负责作战的法国热拉尔少校宁愿攻下都城而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并"屠杀所有跑不掉的萨卡拉瓦人，包括托埃拉国王本人在内。"这种残酷阴险的行为促使萨卡拉瓦人加强了自己的决心，一个由托埃拉国王的兄弟和王储英盖雷扎领导的组织严密的抵抗运动在梅纳贝全境掀起，一直持续到1902年。南部的安坦德罗伊和马哈法利人民也积极反抗法国的渗透企图，直到1904年方才屈服。

239

由于执行逐步吞并政策和经过长期的殖民渗透，加利埃尼于1904年前后得以宣布完成对该岛的统一。岛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摆脱不了塔那那利佛的权力，所有地区都得承认殖民者的政权。但是这种普遍降服于法国的统一造成一种新的形势，它是马达加斯加人为了改善其命运并且实际是为了恢复他们的独立而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的原因。

一个通过向法国投降而统一的国家和它对殖民统治的反抗

于1904年底告一段落的马达加斯加对征服和殖民渗透的反抗，可说是毫无结果。从官方来说，军事行动已经过去，由加利埃尼安排的各种行政、经济和文化的殖民机构从此能发挥作用，并能使法国得以一劳永逸地在岛上树立起至高无上的地位。

可是，就在1904年同一年，开始了以马达加斯加人民反对殖民压迫斗争为特征的新时期。

从殖民化到民族运动的萌芽

对马达加斯加人民来说，殖民地的处境意味着他们已经丧失了自身的自由和尊严。

---

[21] M.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1981年。

[22] B. 施莱默（Schlemmer），1980年，第109页。

尽管他们有时仍然发现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延续性，但他们却感到日常生活中受外国势力的永久性的压制，外国势力从他们手中夺走权力，并将他们变成被统治的属民，现在又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法国决定"开化"马达加斯加人民并"同化"他们，从而强迫他们变成另外一种人，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异化他们。这种破坏民族性格和改变岛上居民生活方式的企图激起种种反应。

从行政观点来看，殖民事业破坏了长期确立的政治体制。在伊梅里纳，加利埃尼于 1897 年 2 月 28 日宣布废止君主制度并于同年 4 月 17 日废除了贵族特权。在其他地方，他并未废除各地的王朝，至少不是从法律上加以废除。相反，他按照部长指示他干的那样，开始试图反对梅里纳的霸权，并着手实施所谓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早先曾经在苏丹（法属西非）和印度支那试验过。于是，原来的君王或他们儿子作为"土著地方长官"被纳入行政管理机构，同时在西部和西南部一些王国中间建立起"内部保护国"。但是这种制度证明并不令人满意，而从 1905 年起，梅里纳人行政协理人员的数目已增加到不相称的程度，因为梅里纳人被认为是比其他各族人更适合于"进步和适应"的材料。最后，加利埃尼将法国定居者和亚洲移民工人引进到这块新殖民地，这就大大疏远了当地人民。加利埃尼式的"法国-梅里纳综合体"被扩展到全岛，其关键性特征是村社组织（所谓由集体负责本地事务）和强迫劳动制度（于 1907 年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为"提供服役"，并于 1908 年到 1915 年之间普遍推行）。[23] 这就必须实际上放弃"民族政策"；必须在 1909 年关闭沿海的两所地区学校，一所在西北海岸的阿纳拉拉瓦，另一所东海岸的马哈努鲁（第三所则位于塔那那利佛），这些学校本是加利埃尼开办作为未来公务人员的培养基地的；并且必须逐步取消"内部保护国"。最后，加利埃尼以下列三项措施完成了马达加斯加的领土统一。第一项是行政区域标准化（在 1927 年到 1932 年之间曾三次企图划定行政地区的疆界）。第二项是广泛采用行政性的村社作为行使权力的中介。第三项是提出有限的一批法律，连同 1901 年的"土著人法"，形成现行行政性司法制度的基础，在这种制度内司法和行政合成一体。虽然在梅里纳，这些措施同赖尼来亚里沃尼采取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正说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可是在其他地区，这些措施则代表同过去的彻底决裂，而且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并不总是为马达加斯加人所理解，从而常常遭到抵制。

对于马达加斯加来说，殖民化也意味着本岛遭受外来少数移民的经济剥削。很早以来，这类所谓的殖民地"开发"就碰到人力资源的问题。自从加利埃尼重新使用梅里纳王室的强迫劳动制度，并在 1896 年和 1897 年决定把它推行于全岛以后，所有 16 岁至 60 岁有劳动能力的男子被迫每年都得完成无偿劳动 50 天。1900 年又建立了中央劳工局，负责为私营公司征募劳力。面对着马达加斯加人对任何形式征集劳工的反抗，政府遂加以接管，于 1926 年成立总工程招工处（SMOTIG），要求所有不是实际征集去服兵役的应征者，应在殖民地的建设工地劳动三年——后改为二年。被马达加斯加人视为"伪装的奴隶制"的总工程招工处，不仅被征召服役的人深恶痛绝，由于这种制度而失业的"志

[23] J. 弗雷迈加西（Fremigacci），1980 年，第 2 页。



图片 10.3 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塔马塔夫铁路工地雇用的工人

愿”的工资劳动者对之也同样深深痛恨。

殖民压榨由于强行征收土地而更加沉重，土地被接管后分配给殖民移居者。根据1926年颁布的法令，“在上述法令颁布之时尚未开发、尚未圈定或尚未经过特许授予的所有空地和无主土地”一概宣布为国家所有。[24] 从此以后，优良土地都归行政当局所垄断，外国移民侵占了土著人保留地，而马达加斯加人对于自己的祖传土地却不再有什么资格拥有所有权了。为马达加斯加人深恶痛绝的这种土地接管，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要算西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这些经济上的变化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的和文化上的改变。沿海地区部族社会的生活方式遭受破坏，还遭到日益衰退或结构崩溃的威胁。最肥沃的土地被没收；沉重的捐税负担迫使全体居民（像1921年在阿坦德罗发生的那样）源源不绝地流向留尼汪种植园和本岛的西北部；工人被强迫调遣；正规教育和基督教广泛传播；马达加斯加士兵离乡背井开赴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奴隶制度的废除；贵族阶层受屈辱——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造成一系列部落解体并使祖传的价值观念和各种习俗处于惨遭贬低的地位。在伊梅里纳，学校数目的大量增加和低级公务员大批得到录用，不但使原来寡头集团人员大为沮丧，他们由于征服而被剥夺了权力，同时也使殖民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兴上层精英失望，他们感到自己“被殖民制度故意排除在负责岗位之外”。[25]

总之，殖民压迫影响了马达加斯加社会所有各个阶层，虽然其形式在各地有所不同。同时，它也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 243

反抗殖民制度的最初反应

1904年，当有效占领可算是已经实现的时候，殖民者仍然觉察到局势是非常之不稳。1904年到1905年在本岛东南部爆发的起义进一步证实他们的这种忧虑。1904年11月在法拉凡加纳省爆发的起义很快向西蔓延，这是由于历史上久已存在的东部各族和巴拉族的传统联系所造成（见插图10.3）。面临共同敌人的各个部族之间的团结一致是起义得到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重重森林和悬崖峭壁的地理环境也给派来镇压起义的军队造成很大困难。起义者——在来自巴拉各族（诸如贝法诺哈）和东南部各族（诸如马哈维罗族和来自万加因德拉努地区的马西亚纳卡族和雷索希里族）酋长的领导下，或者在持不同政见的民兵（诸如科塔维下士）的领导下——向设在安帕里希、贝古古和埃西拉的军事据点发动猛攻。他们还向各租让地（包括“绿宝石公司”）发动袭击，杀死了“绿宝石公司”的老板孔雄中尉。在齐武里和贝基特鲁，当地征集的步兵或者是逃离他们的据点，或者像安塔尼莫拉发生的那样，参加了起义队伍。

加利埃尼竭力贬低起义，宣称这是因为当地人民“好战成性”的精神状态和“他们

[24] L. 腊皮里马纳纳（Rabearimanana），1980年，第58页。
[25] A. 斯帕森斯基（Spacensky），1970年，第24页。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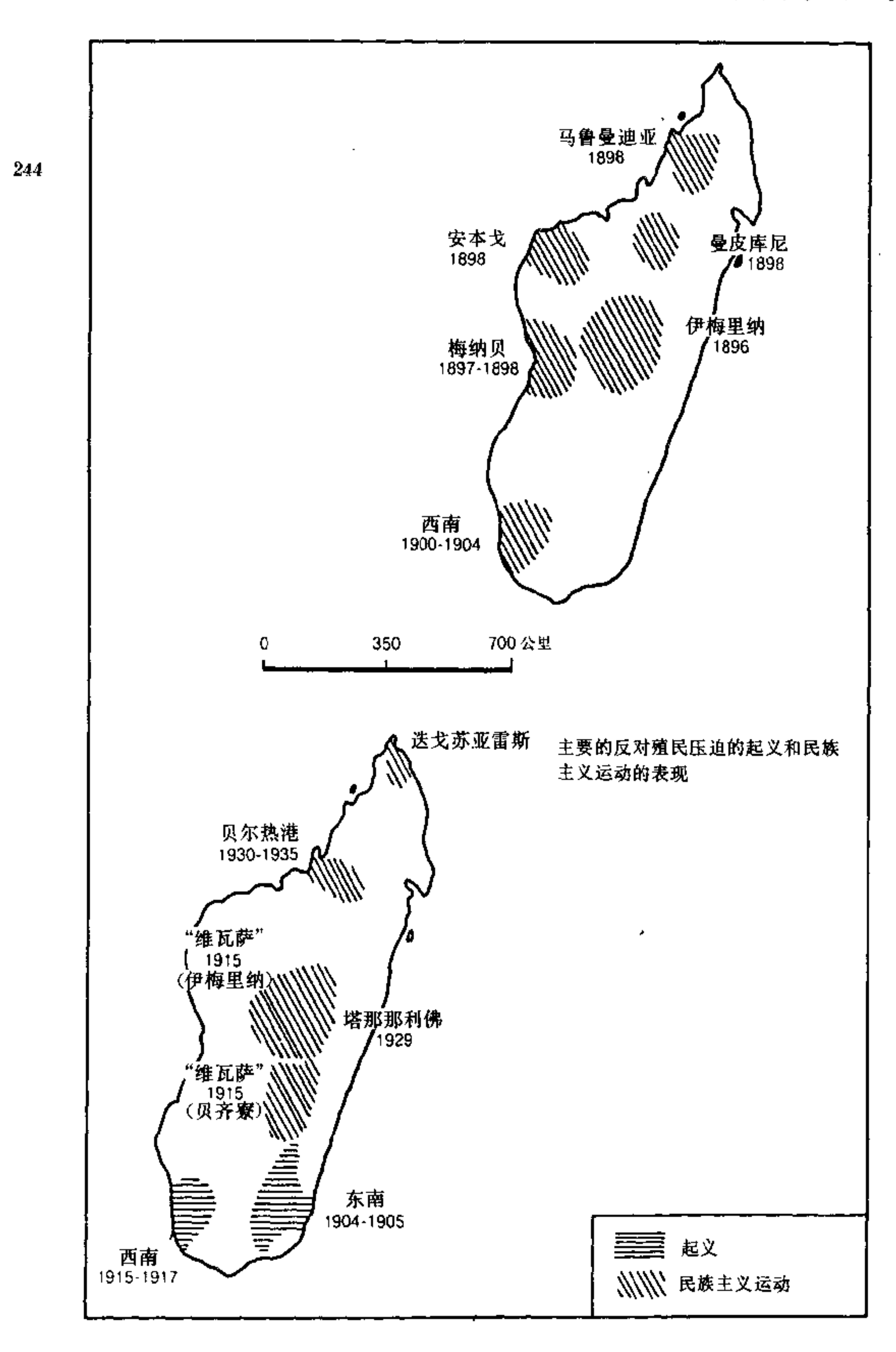


插图 10.3 1896-1935 年马达加斯加的抵抗、起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简况

喜爱动乱和抢劫的思想”所造成。他的继任者维克多·奥加尼尔则认为其原因在于“行政管理不当”(日益增多的税收、税收征集中的滥用权力和军事据点领导人或少数白人移民的专横态度)。这些解释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他们都忽视了起义的基本方面(为恢复自由而斗争)，也忽视了起义者的组织能力。起义者向着一切体现殖民统治的人发动进攻，不管这些人是法国的占领军，还是马达加斯加公务员或学校教员。G. 雅各布为他对 1904 年起义的研究作结论时写道，这次起义无疑地具有双重意义：“这是一场争取独立的战斗，也是一场反对殖民剥削的斗争。”㉖ 这场第一次反对统治压迫的起义遭到镇压，迫使马达加斯加人寻求别的斗争形式。

反对殖民斗争的最盛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消极抵抗：拒绝遵守命令；拒绝接受作为“文明”信号但又与殖民化和外国势力密切相关的任何事物；不让孩子上学校，某些阶层把学校看作仅仅是“殖民强迫劳动”的另一种形式；抛弃在南方沿公路建立的村庄，而法国人建立这些村庄的企图是要使居民居住得集中些。这些拒绝合作的活动似乎没有对殖民者带来威胁，他们认为马达加斯加已经在 1905 年建立起和平。但 1915 年西南部突然爆发了萨迪亚瓦希起义，“萨迪亚瓦希”是这次起义者的绰号。与此同时，在塔那那利佛，警察破获了一起名叫“维瓦萨”的秘密社团，VVS的意思是“像石头和钢铁一样的坚硬”(参阅插图 10.3)。 245

萨迪亚瓦希起义（1915-1917 年）是农民武装起义。1915 年 2 月初第一次爆发于梅纳兰德拉河的左岸，然后很快地波及安帕里希和齐洪贝地区。㉗ 萨迪亚瓦希起义者偷盗牲畜、袭击村庄、切断电线，然后遁入远离政府控制的据点的藏身之所。他们形成 10 人至最多 40 人的小股，非常灵活机动，并且深入到南部的广阔地区。整个村庄都公开地或暗地里支持萨迪亚瓦希起义，其原因是居民长期赤贫，而这种赤贫又受罕见却十分暴烈的大雨、强征牲畜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而日趋剧化，这次战争导致后备役军人的动员、捐税的增加、食物短缺和无法挣得足够现金来交纳捐税。

新教徒部长腊维洛贾奥纳在“日本和日本人”的标题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㉘ 这些文章号召马达加斯加仿效日本的榜样，日本把现代化和传统结合得如此巧妙。紧接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在塔那那利佛，7 名来自首都医学院的大学生于 1913 年 7 月建立了“维瓦萨”。这所医学院是当时为马达加斯加人攻读高等学位提供教学的唯一机构。同学生们站在一起的有职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小学教师。1905 到 1910 年间曾任总督的奥加尼尔的反教权主义，以及反对传教士的运动，使得特朗佐佐罗教会（Tranozozoro）获得有希望的新生，它的牧师们要求在教会布道和著作中都有“自由国家内的一个自由教会的生气”。㉙ 在他们反对“法国无神论”和反对采取“虚假法国方式”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强调新教信仰的民族传统，而新教的民主结构可以变成抵抗斗争的庇护所。㉚ 他们还重

㉖ G. 雅各布，1979 年，第 17 页。

㉗ F.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1975 年，第 135-169 页。

㉘ 同上，1981 年、第 100-111 页。

㉙ S. 阿亚谢和C. 理查德，1978 年，第 176 页。

㉚ J. 弗雷迈加西，1980 年，第 11 页。

视和促进马达加斯加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文学复兴、恢复本国过去历史上某些时期的崇高声望以及复活古老的得到参加秘密社团资格的仪式。“维瓦萨”虽然是一个地下组织，却在报上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号召马达加斯加人民为了祖国而不惜牺牲自己，以求得人民的进步和生活于自由和尊严之中。作为本民族使命的承担者，这个秘密社团是殖民政府无法容忍的挑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严厉的刑罚包括处以苦役，流放到设在拉瓦岛的集中营，如果主编们牵连在内就封闭报纸，以及从文官队伍中开除公职。更改学校课程为的是取消历史课，这门课程被视为是自由平等思想的传输工具，为学生提供了过多的思考领域，同时则增加对法语课的重视；重视本地方言以降低梅里纳语的地位，而若干年前梅里纳语曾被定为国语。所有这些措施都证明，殖民者对于上层精英中存在的民族主义萌芽已是十分警觉，对于其可能出现的后果又是多么害怕。这些镇压措施的结果却是促使马达加斯加人放弃地下活动，并从此以后转向通过新闻报刊和建立工会等等渠道来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

恢复尊严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0年是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准备和巩固中全国出现日益增长的觉醒。马达加斯加历史上的这种关键性转折点的开始应从退役士兵返回本岛的时候算起。

沉醉在荣誉之中的这些战争老兵认为他们同任何法国士兵一样地为法国服役过，因此，他们要求获得法国人享有的同样权利，他们的要求得到大量本国同胞的支持。面对着新闻界和商会反对全部授与法国国籍的态度，他们逐渐地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国形象：一种是遥远的但是很慷慨，另一种近在身边却是不公正的。因此，在腊莱芒哥的领导下，他们进行长期斗争以争取法国公民资格。

腊莱芒哥（1884-1942年）曾经是一名新教徒小学教师、一名职员和一名在巴黎求学的大学生，他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他在巴黎经常接触的一群人当中包括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特别是“人权同盟”的会员。这些人都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他于1922年返回马达加斯加时，他定居在迭戈苏亚雷斯。由于那里有海军兵工厂的工人还有马哈瓦维平原和安塔拉哈地区的土地使用权的复杂问题，因此成为开展宣传的理想环境。直到1929年5月，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一直是迭戈苏亚雷斯，而不是塔那那利佛。民族主义运动除了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鼓动之外，还痛斥殖民制度令人不能容忍的滥用权力——诸如西北部和阿劳特拉湖周围的征用土地；自由权利的消失；政府的专制和高压手腕以及1921年在高地地区和塔马塔夫为防止瘟疫突发中所表现的种族隔离。从他所使用的新颖方法中可以看出腊莱芒哥的创造性。用以发动反殖民统治的运动口号全是合法的和正统的，其根据就是既然按照1896年8月6日并吞该岛的法律，马达加斯加被宣布为法国殖民地，那么所有法国法律都应适用于此。向商界的陈述做得很成功，他们表现出比文官队伍更有干劲（文官们害怕政府的制裁），这项运动实际上是受到商人们的资助，特别是首都的那些商人。

腊莱芒哥集团因得到下列人员的支持而更加强大了，他们是：腊沃阿汉吉（前“维瓦萨”成员）、伊曼纽尔·腊扎芬德拉科托、亚伯拉罕·腊扎菲（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所属工会塔那那利佛支会书记）和朱尔斯·腊奈沃。腊莱芒哥集团还同几位左翼欧洲人联合一起，他们中间有阿尔贝蒂尼（一位律师）、迪萨克、普朗克和维托里。为了竭力表达并维护自身的要求，他们从 1927 年起出版了两份报纸——迭戈苏亚雷斯的《舆论报》和塔那那利佛的《马尔加什曙光报》。这些报纸必须同来自政府方面的各种零星报复行为进行斗争。在政治方面，他们这个集团要求“由扩大权力的总议会来处理总的国家利益”；取消政府总督和向法国政府派遣马达加斯加代表。[31]

就在腊莱芒哥集团进行活动的同时，崇拜“特朗佐佐罗”的宗教骚动又炽热起来。1929 年，按照“诉讼委员会”宣布的裁决承认“特朗佐佐罗”为一种当地的教会，马达加斯加教徒与欧洲新教牧师之间重新出现的争论才得到解决。从那以后，这个宗教派别就在宣讲宗教自治的掩盖下鼓动政治自治。他们的领导人都是腊莱芒哥和迪萨克的追随者。

迪萨克曾经同腊莱芒哥和腊沃阿汉吉一道组织了“马达加斯加本地人请愿团”要求取得法国公民资格；废除“土著人法”司法体制；并实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推行的社会和文化福利。迪萨克于 1929 年 5 月来到塔那那利佛解释请愿的目的。计划于 5 月 19 日召开一次会议，但是，“马达加斯加人民”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这次会议遂转变成为首都街头的一次大游行，游行队伍中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高呼反叛性的口号，如“自由和集会权利万岁！”、“打倒土著人法！”。这次空前的群众示威标志着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了决定性的阶段。（见插图 10.3）1929 年 5 月 19 日事件既代表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高潮，也代表民族独立要求的起点。这次事件还标志着真正的政治战斗精神的开端，它采取宣传运动的形式，建立政治基层组织和政党以及基础广泛的各类报纸。腊莱芒哥曾被流放到贝尔热港，他鼓动农民参加甘地在印度推行的抵抗方式。1931 年，他在对殖民部长保罗·雷诺的反对全部授予法国国籍的讲话的回答中，为民族独立的思想进行了公开的辩护。在 1934 年 7 月 20 日的《舆论报》上，腊沃阿汉吉提出“成立一个自由独立国家是天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35 年以后，公开以民族主义面貌的其他报纸也出现了。《马达加斯加民族报》和《正义报》经常鼓吹马达加斯加必须获得自由。可是，这个运动却正在失去原有的势头。事实上，“商界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撤回他们的支持……公务员怕牵涉到自身并害怕失去工作。新教牧师们对于局势发展带来的政治转折感到苦恼，退入他们的教堂中去。马达加斯加的中产阶级极其倾向于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且宁愿选择从法国公民资格中自然产生的直接个人利益。”[32] 给这场运动带来新的动力只好有待于“人民阵线”了。 248

[31] A. 斯帕森斯基，1970 年，第 30 页。

[32] F. 凯尔纳（Koerner），1968 年，第 18 页。

结　论

马达加斯加人民对法国征服进行的分散而又互不协调的武装抵抗未能阻挡殖民体制的建立。但是，殖民主义带来的必然后果和马达加斯加人遭受的巨大打击，威胁着将使他们丧失自己的特性，从而促使他们采取多种形式的斗争以求恢复自身的尊严。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促成了民族运动的诞生和有力地发展。尽管这样，在 1935 年(正如在 1940 年一样)，地区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意见分歧实在过多，阻碍了人们对殖民制度的全部内涵有一清楚认识，这也是殖民地行政当局之所以具有貌似不可动摇地位的原因。

(吴期扬译)

11

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 1880-1914年：两个非洲国家的幸存

M. B. 艾克潘
本章以*A. B.* 琼斯和*R.* 潘克赫斯特
的文稿为基础

"埃塞俄比亚应向上帝伸出她的双手。"神圣的、光荣的许诺！我们信赖的不是战车或战马……而是上帝。作为人民之一员，在回顾我们（非洲）的历史时，不论我们是在流亡异国他乡时考虑如何保存自己，还是在自己的本土考虑如何维护我们祖国免遭外来侵略，我们都不得不高声呼喊：迄今为止只有上帝帮助了我们。①

（爱德华·W. 布莱登，利比里亚学者，1862年）

埃塞俄比亚不需要任何人；她只向上帝伸出她的双手。②

（埃塞俄比亚皇帝曼涅里克二世，1893年）

我们过去从未理解到这是一个新的外交时代。就小国而言，这是一种不受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约束，或者甚至不受天然的正义和平等的基本原则约束的外交……大国开会瓜分小国而毋需同小国进行任何协商。小国是孤立无援的，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陆军和海军，无法用武力来对付武力。③

（阿瑟·巴克利，利比里亚总统，1907年）

上述引文表明了联结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纽带虽然是薄弱的，但却使两国联结在一起，还特别表明了由于参加瓜分非洲的争夺（1880-1914年）欧洲列强对这两个国家的侵略所带来的共同危险处境。本章将是这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在分割

① E. W. 布莱登（Blyden），1864年，第358页。

② R. 潘克赫斯特（Pankhurst），1976年。

③ A. 巴克利（Barclay），F. E. R. 约翰逊（Johnson）和T. M. 斯图尔特（Stewart）：《利比里亚调查委员会就法国-利比里亚边界问题致欧洲的报告》，存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LNA），档案标题："执行总统：总统委员会（EPPC）"。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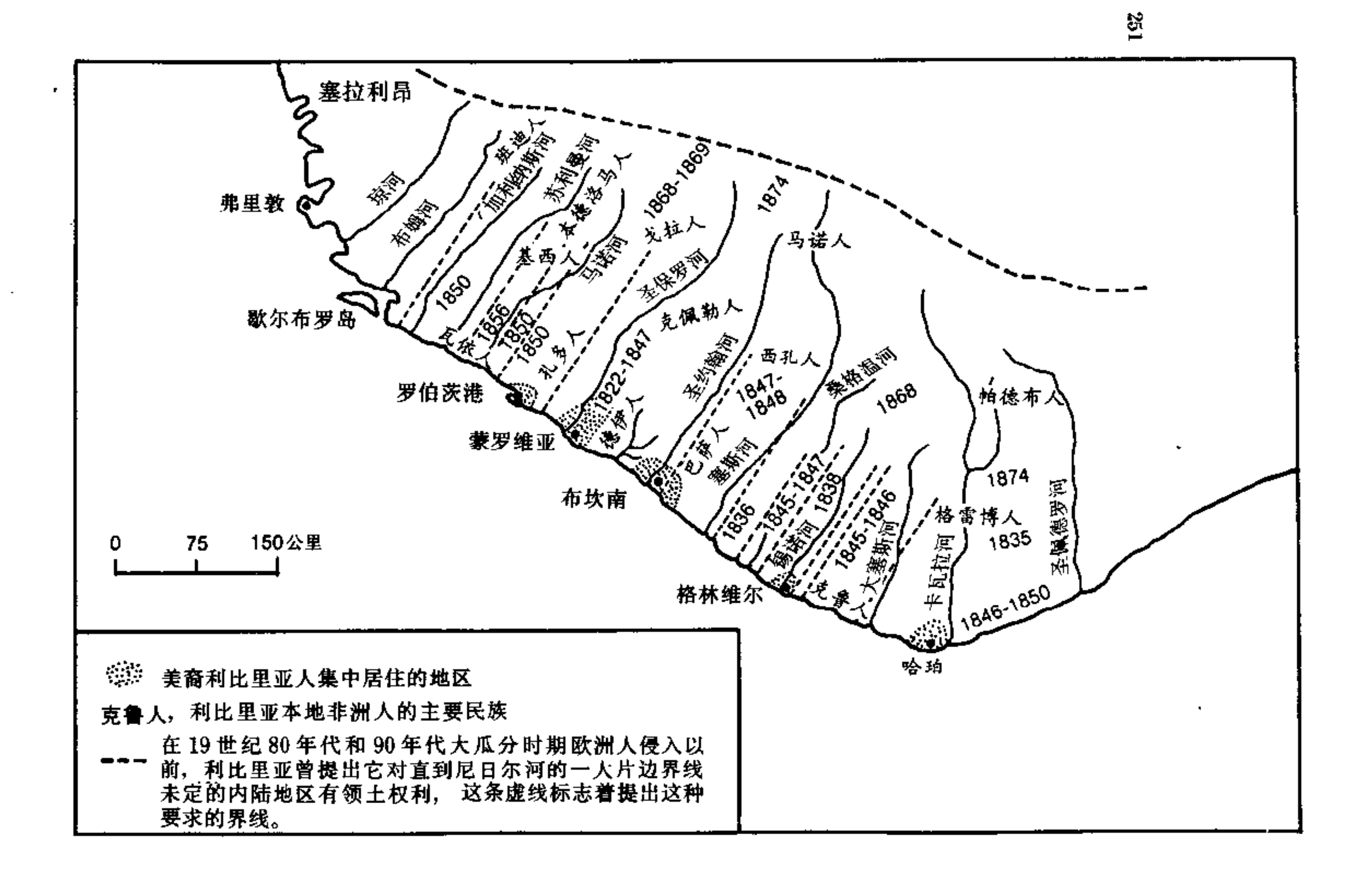


插图 11.1 利比里亚——1822 到 1874 年间被美裔利比里亚人兼并的领土(根据W. B. 摩根和F. C. 皮尤，1969 年)

与瓜分的严峻时期，当时欧洲国家已把殖民统治强加于非洲大多数地区。本章在介绍这两个国家的国土、人民和政府之后，将探讨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如何受到欧洲人用以统治 250 非洲的策略和方法的挑战和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对之作出反应。本章还将探讨这两个国家为何能逃过欧洲人的征服；以及在这两个国家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革。

列强瓜分非洲前夕的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

利比里亚

严格从法律角度说，利比里亚是"美国殖民协会"（ACS）的一块殖民地，是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于1822年创建的，其目的是为了安置愿意摆脱奴隶制和白人种族主义迫害的"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以及美国海军舰只从大西洋水域的奴隶船上营救出来的被夺回的非洲人（"被夺回的人"）。

由非洲裔美国移民的先驱于1822年建立的蒙罗维亚成为利比里亚的中心。从此以后，直到1906年前后，每年都有1.8万以上的新大陆的非洲人，其中大部分是在"美国殖民协会"的资助下，在利比里亚集体安家落户。他们分布在靠近大西洋沿岸地区30个以上的城镇里，这些土地都是由"美国殖民协会"或者利比里亚政府从当地非洲酋长手中取得的。他们几乎全是非洲裔美国人，但是其中至少有400人是来自巴巴多斯的非洲裔西印度群岛人，这400人1865年移民入境后即被集中安置在从蒙罗维亚深入内陆13公里的克罗泽维尔。有5000多名"被夺回的非洲人"（大部分来自刚果地区），也被安置在此地，特别是在1844年到1863年之间，起初是在美裔利比里亚人的照顾之下。从那时候开始，"美裔利比里亚人"这一名词一直是新大陆非洲人移民及其后裔的集体称呼。④

美裔利比里亚人急需土地用于耕作、贸易和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同时又面临英国人和法国人方面为建设贸易商行和军事驻地而寻求土地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利比里亚的领土从最初向非洲酋长租借来的沿海少数孤立的据点大大扩张。到1875年12月，扩张才实际上告一段落，据称，利比里亚在这段时间里沿大西洋海岸伸展达960公里，深入内陆约320公里到400公里，有人估计已远达尼日尔河（参阅插图11.1）。在这片土地上容纳着美裔利比里亚人和"被夺回的人"的居民点和老百姓以及当地的一些非洲族群和他们的领地。这些族群包括沿海的瓦依、德伊、巴萨、克鲁和格雷博人；还有更往内陆的戈拉、基西、班迪、克佩勒、洛马和曼丁哥人。⑤

美裔利比里亚人由于使用英语、实行土地个人所有和永久性转让，并且信仰基督教以及奉行一夫一妻制，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中贯彻的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当地非洲人是传统宗教信奉者或是穆斯林，他们操着自己的语言，保持土地村社所有制。他们

④ M. B. 艾克潘（Akpan），1973b，第217-223页。

⑤ 同上，1976年，第72 75页。

的村落都是由酋长和长老进行统治，由同年龄组人的组织或如波罗（管男人）和桑德（管女人）这类的社会政治组织加以协助。虽然他们赞赏美裔利比里亚人和白人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教育，但他们的某些长老却反对基督教的传播和对他们传统法律和习俗的其他干预。

252

由于缺乏有效的军事力量、缺乏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和资金，利比里亚政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公路、铁路、军事和行政据点以及建设美裔利比里亚人的居民点，也无力向内地酋长支付定期的生活津贴并邀请他们作为“公断人”，“代表”他们的人民参加利比里亚的立法机关，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其有效占领利比里亚领土的计划。因而当欧洲人于1880年前后（1884-1885年柏林会议达到高潮）开始对非洲大瓜分时，利比里亚大有被他们夺去大片它业已宣称属它所有的领土的可能。⑥ 基于这种情况，利比里亚政府在大瓜分期间基本上只关心保持其已经占有的领土。

自利比里亚于1847年从“美国殖民协会”获得独立，到这场大瓜分的前夕，利比里亚内部的发展不曾有多大的变化。立法机构仿照美国国会的模式建立，包括一个众议院和一个参议院。行政部门由两年一度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副总统以及由总统任命并得到参议院认可的内阁成员组成。在各州（地方行政单位）则由一名州长代表行政部门，州长领导本州的行政。尽管总统在理论上拥有巨大权力，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手段，在蒙罗维亚以外地区行使行政权力就十分困难，在共和党和真正独立党统治期间，州一级相当大的政治权力掌握在某些美裔利比里亚家族的手中，有时甚至延续好几代。被利比里亚一位批评家嘲笑为该国“封建领主和贵族”的这类家族包括：芒特角的霍夫、谢尔曼和沃森；蒙特塞拉多的巴克利、科尔曼、库珀、丹尼斯、格兰姆斯、霍华德、约翰逊、金和莫里斯；大巴萨的哈蒙和霍勒斯；锡诺的伯奇、格林、格里格斯比、罗斯和威瑟斯庞；马里兰的布鲁尔、多森、吉布森、杜伯曼和扬西。这些家族构成了本国政治上（不可避免地也是经济上）的上层集团。⑦

可是严重的社会分裂破坏了利比里亚的国家统一。例如，1847年独立前后成立共和国的两大政党（共和党，由黑白混血移民占支配地位；真正独立党，由黑人移民、刚果人和受过教育的本地非洲人占支配地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因而，它们愿意投入两年一度枯燥而又尖锐的竞选活动，争取政治优势，以便掌握共和国庞大的恩赐体制。从独立到1870年，共和党一直当政，1870年被真正独立党推翻，可是1871年共和党又重新掌权，直到1877年真正独立党再次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政权。此后，真正独立党一直统治利比里亚，直到1980年被塞缪尔·多伊军士长（现在为将军）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推翻。

253

更为重要的是美裔利比里亚人同利比里亚本地非洲人之间的分裂。整个19世纪，美

⑥ R. W. 舒费尔特(Shufeldt)：《世界巡礼，利比里亚和利比里亚的边界纠纷》（海军历史基金会收藏品，手稿部分，国会图书馆，华盛顿），舒费尔特致科平杰(Coppinger)，费尔南多·波，1879年5月8日。

⑦ 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执行部：通信总类1887-1899年》，罗斯（Ross）致奇斯曼（Cheeseman），格林维尔，1892年7月12日（EDCG 1887-1899）；《利比里亚信件》，15，丹尼斯（Dennis）致科平杰，蒙罗维亚，1871年8月22日；《塞拉利昂新闻周刊》，1899年6月3日；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利比里亚立法议会，参议院会议记录》，1849-1900年。

裔利比里亚人的政策是通过使本地非洲人开化和基督教化，并使他们享有与移民同等的权利，从而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对他们实行同化。虽然这项政策在“被夺回的人”当中(他们在人数上远比移民为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可是美裔利比里亚人关心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并以限制当地非洲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当地非洲人参与政治来保持他们对利比里亚的严密政治控制。在本地非洲人当中只有极少数可以同美裔利比里亚人（尽管这些人本身可能是文盲或穷人)平等地被赋予公民权利。从1875年起，利比里亚立法机关中当地非洲人的主要代表(大多是沿海的非洲人)由非洲酋长指派的“公断人”(或“代表”)组成，但各酋长领地每年先要向利比里亚政府缴纳“代表费”100美元。由于这类代表只能通过翻译就纯粹的部族问题“发言”,而且没有选举权,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只有十分微弱的影响。[8] 因此，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和酋长们都对他们有限的代表权感到不满。

此外，利比里亚政府还想方设法提高进出口关税和其他贸易和运输上的捐税，这些税收构成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为了便于征税和使美裔利比里亚商人控制对外贸易，从1839年起，政府规定外国商人只限在6个美裔利比里亚人控制的进口港进行贸易。这种限制和征税既疏远了对此反感的外国商人，也惹怒了当地非洲酋长。这些酋长早先曾经控制外贸并征收税款。于是外国商人和酋长往往联合起来抵制或公然反抗这种贸易限制和税收，或者呼吁欧洲国家出面干预。因此在19世纪的不同时期里，利比里亚沿海的瓦依族、克鲁族和格雷博族都曾掀起过武装抵抗，反对利比里亚政府控制他们的贸易和征税。[9] 254

埃塞俄比亚

经过一百多年的分裂，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1855-1868年在位）使古老的埃塞俄比亚帝国重新复兴。在打败了提格雷省、伯根德省、戈贾姆省、瑟门省、沃洛省和绍阿省强大的不断相互交战的封建君主或诸侯之后（过去在贡德尔的傀儡皇帝对他们几乎毫无控制权)，特沃德罗斯皇帝在其统治初期就使帝国统一在他的强大政权之下（见插图11.2)。[10] 这些省大多位于从厄立特里亚到阿瓦什河谷之间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居住的人口多为阿高人、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这些民族全都接受占统治地位的阿姆哈拉-提格雷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是：信奉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的基督一性论派基督教；使用关系密切的阿姆哈拉语和提格雷语；实行一种“以权势人物为核心结成一体的由上至下的等级制度”的社会政治结构；具有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经济产生了“对土地的严重依附”和通常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11]“以土地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应体

---

⑧ 只有在威廉·V.S.杜伯曼的总统任期（1944-1971年）内，方才实行改革，给予了非洲人与美裔利比里亚人以及同化于他们生活方式的本地非洲上层人士以几乎同等的权利。这些权利当中包括1944年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交纳两美元茅屋税的当地非洲人，从而废除了“代表”制；还包括将美裔利比里亚社会的县行政单位制扩大到利比里亚全国各地，从而废除了“间接统治”这种殖民类型的制度。

⑨ J. D.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1963年，第243页。

⑩ R. 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1965年，第70页；P. 吉尔克斯（Gilkes），1975年，第9-10页。

⑪ C. 克拉彭（Clapham），见R. 莱马钱德（Lemarchand）编，1977年，第36、37页。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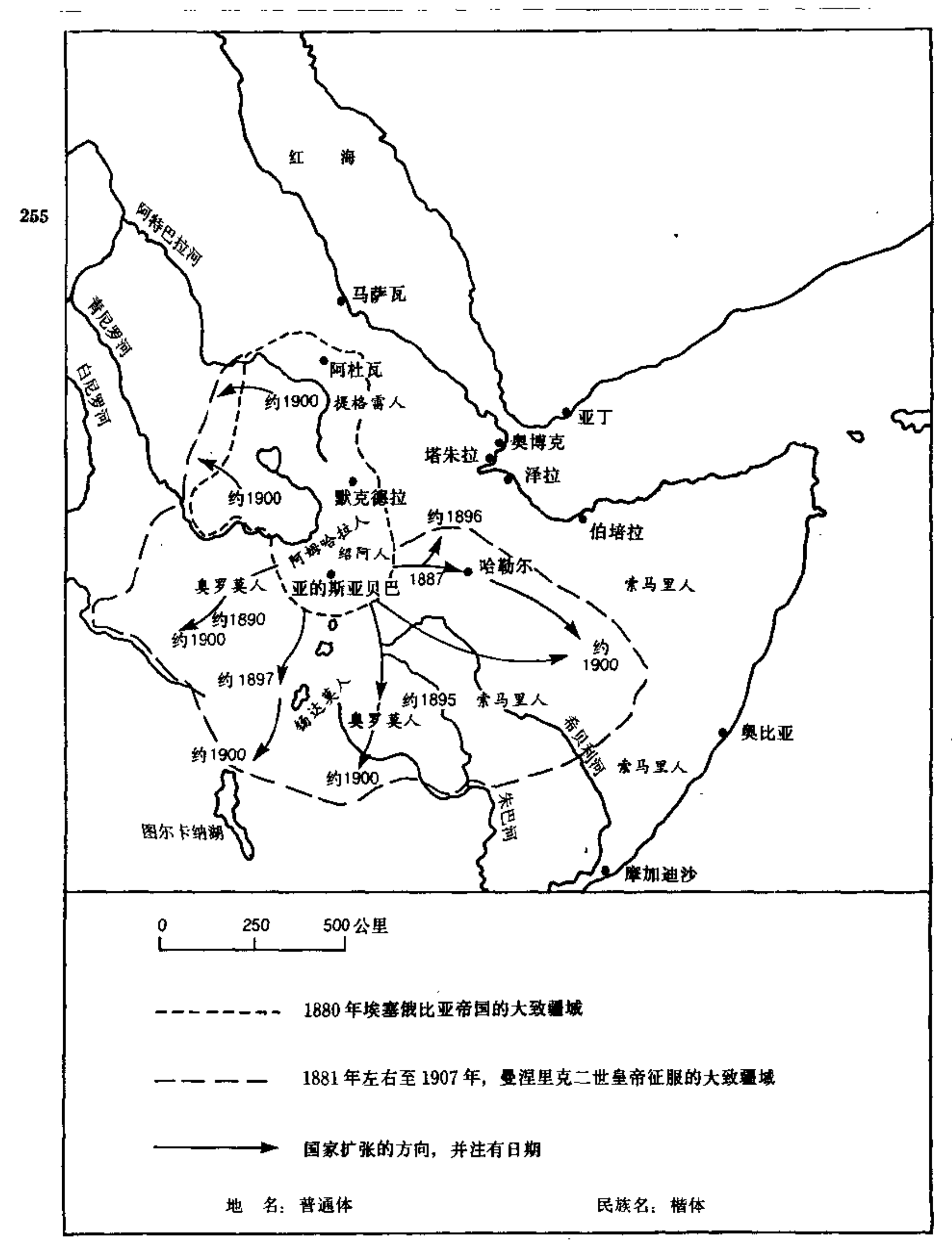


插图11.2　曼涅里克二世皇帝统治下埃塞俄比亚领土的扩张(根据J. D. 费奇，1978年)



图片 11.1　曼涅里克，1865-1889 年绍阿国王，1889-1913 年埃塞俄比亚皇帝

系。”

如同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及其他美裔利比里亚人居民点一样，在特沃德罗斯统治下重新统一起来的阿姆哈拉-提格雷核心也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埃塞俄比亚向周围地区进一步扩展的跳板，周围那些地区住的大部分是低地居民，对于其中的某些人，帝国政府过去曾几次偶尔实行过一种“权宜应付、常是不稳定的”联系或者管辖权。⑫ 但是阿姆哈拉-提格雷核心本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政治上由于地区对立而形成割裂；在地理上则由于深谷高地，经常阻碍交通和运输而形成分隔。

特沃德罗斯依靠优越的进口武器制服了各地的封建统治者，而他自己又于1867年4月终于被英国讨伐军队所挫败，历史事实生动地向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展示了现代武器对于控制帝国、逼制政治对手或防止外来侵略的重大意义。

作为特沃德罗斯的继位人，约翰尼斯四世皇帝（1871-1889年在位），如本书下文所述，全力以赴设法击退埃及和苏丹马赫迪追随者的入侵。自此之后，埃塞俄比亚的扩张超过所谓“历史上土地”的面积两倍以上，这种扩张大部分是在曼涅里克二世皇帝统治下（1889-1913年在位）实现的，他统治的时代正是欧洲大瓜分非洲的时期。⑬

257 到了曼涅里克统治时代，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体制已经固定成形了。埃塞俄比亚帝国体制由三个基本层次组成：县、省和国家。它建立在三个独立的轴心之上：经济、政治和宗教的轴心。领主、省督和皇帝分别统治着县、省和帝国，并在一种严格的“上下等级关系”中彼此相处。他们构成这个体制的支柱，因为他们每人“同时是行政长官、法官、军事首脑及廷臣”。按规定，由皇帝任命各省省督，由省督任命领主或分督，负责治理本省所辖的各个县。

领主享有某些权利，称为“古尔特”(gult)：基本上就是有权向该县的每家农户征收实物贡赋并征用劳力为他的农庄和他指定的其他项目做工。征收的贡赋中有一部分留作自用，剩余部分交给他的上司——省督。他负责判决本县的案件和纠纷；动员和指挥当地民兵；组织开发本县的公共工程；还要保证他的“教区”，通常就是他的县境，向当地埃塞俄比亚正教教堂履行其应尽的义务。⑭ 按照规定，各县居民替领主和教会尽的义务主要根据他们拥有赖以为生的土地而定，在阿姆哈拉-提格雷核心省份这类义务较轻。在这类省份里，土地的控制和占有全都按照“里斯特”（rist）制度，也就是说，大都按照个人的世系而定。实际上土地是不能转让的，因此，皇帝和省督也无法重新分配以实现恩赐其下属的目的。在曼涅里克所征服的南部和西部，这类义务是很沉重的。在这些地区，领主和“纳夫塔尼亚斯”（naftanyas）（文字意义上为“荷枪者”，指来自阿比西尼亚高地的移民）通过“古尔特”制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大量剥削当地人民。⑮

各省省督执行的职责同各地领主执行的完全相似，只不过范围更大些而已。在阿姆哈拉提格雷核心省份，省督大部分是从皇亲国或或者被认为忠于皇帝的本地贵族中选

---

⑫ H. G. 马库斯（Marcus），1975年，第140页。

⑬ 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96页。

⑭ D. N. 莱文（Levine），1974年，第114-120页；P. 吉尔克斯，1975年，第13-14页。

⑮ 同上。

用。在拥有大量可转让土地的南部和西部新征服地区，省督多为阿姆哈拉人、绍阿人或提格雷人以及其他北方贵族和军人，他们都享有“古尔特”制度规定的权利（或享有“里斯特-古尔特”土地，以代替省督的权利），作为对皇帝效劳的报酬。这样一来，能否继续保持对皇帝和省督的忠诚就极大地取决于所赐赏的“古尔特”权利的多少和施展权力的军事力量的强弱。⑯

在帝国体制中，皇帝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一身执行制度化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职能。克里斯托弗·克拉彭曾把这些职能区分为“保护性的”、“榨取性和分配性的”、“调节性的”和“象征性的”。皇帝作为个人统率他的军队，处理帝国事务，执行审判和恩赐。最重要的可能是由于皇帝自称为《圣经》上所罗门国王的后裔，并由阿布纳（abuna）——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的埃及人主教加冕和授予权力，因此他是国家统一和独立的象征⑰。 258

特沃德罗斯继承的帝国体制没有引人注目的“历史性的官僚机制”。⑱除了相对而言人数不多而职能明确的官位如帝国大臣和大法官以外，帝国行政大部分都由皇帝本人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如省督和领主处理。⑲特沃德罗斯本人就企图通过不断以出身微贱但忠于他和依附于他的军队将军取代现有的出身贵族的省督来创立一种官僚机制。但是，在反抗他越来越苛虐的统治的广泛起义中，这批新任省督都被原先的统治者所推翻和取代。⑳

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在政治体系方面的相似之处如上文所分析已是非常明显，毋须再行赘述。除了两者都拥有一个核心和边缘地区，并有一个中央政府外，两个国家都有以当地酋长领地（或者村庄）为中心的次政治体系。诸如利比里亚戈拉人的酋长领地或者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或者加拉人）的酋长领地（对此，本章未加论述）。这些酋长领地的政治体制同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多少有点区别。并且，两国的政治体系都是牢固地建立在核心享有特权的基础之上，两国也都广泛使用恩赐和同化的手段。然而，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帝国体制基本上是属于“非洲的”，不存在政党或议会，特沃德罗斯、约翰尼斯和曼涅里克三人都是依仗胜过对手的优势兵力方能成为皇帝，而不是通过选举。相反，利比里亚的中央政府则是彻头彻尾西方化的。无论如何，两国各自的政治体制都拥有或者已经发展起一种为遏制欧洲人为分割和瓜分非洲而发动的侵略所必需的机制和手段。

欧洲人对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侵略，1880-1914 年

在 1879 年以前，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都同欧洲国家多少保持着一种友好的关系。

---

⑯ C. 克拉彭，见R. 莱马钱德编，1977 年；P. 吉尔克斯，1975 年，第 28-29 页；D. N. 莱文，1974 年，第 120-121 页。

⑰ C. 克拉彭，见R. 莱马钱德编，1977 年，第 44-45 页。

⑱ D. 克拉米（Crummey），1969 年，第 465 页。

⑲ R. 潘克赫斯特，1967 年，第 12 页。

⑳ C. 克拉彭，见R. 莱马钱德编，1977 年，第 47 页。

259



图片 11.2 E. J. 巴克利，利比里亚国务卿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大瓜分时期里，这种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两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到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并带来截然不同的结局和后果。

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既未被邀请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柏林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的决议，诸如对当地实行“有效占领”的原则，利比里亚一开始就拒绝接受其约束。正如利比里亚国务卿埃德温·J.巴克利在 1887 年 6 月的声明所说，利比里亚认为柏林会议的决议“所涉及的是欧洲国家进一步获得非洲领土的问题，而不是非洲国家目前占有和将来获得领土的问题”。[21] 利比里亚人正确地坚持：作为一个非洲的政府和国家，利比里亚毋需任何“有效占领”，因为全体居民从来就是利比里亚人。 260

最后，为了避免丧失利比里亚所有的内陆土地，从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利比里亚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以实现有效占领。1904 年至 1911 年担任总统的阿瑟·巴克利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了十分机智的声明，他于 1906 年 12 月说道：

> 在柏林会议以前很久，利比里亚就是一个得到公认的国家……就利比里亚来说，完全有理由对那次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一些疑问。但是欧洲列强确实解决了国际法的原则问题，这也是事实，小国必须加以确认。其结果就是我们不得不使用边防警卫队和适当的官员来占领我们的边境，并在边境地区建立一个按照文明方式组织起来的政府。[22]

在分割和瓜分非洲的时期，欧洲帝国主义以 3 种主要形式出现在利比里亚：(1)欧洲国家强占利比里亚领土；(2)欧洲国家对于利比里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3)欧洲商人、金融家、特许权所有者和企业家控制利比里亚的经济，这些人都享有这些大国的信任和庇护。欧洲帝国主义在利比里亚的活动进一步削弱了利比里亚，使之陷于不稳定之中。

英国注意到利比里亚西北部的瓦依人邀其进行干预，而塞拉利昂商人及英国商人早已在瓦依海岸设点，同时英国也关心塞拉利昂的商业和岁入。于是，从 1860 年起，它就借口保护瓦依人和保护商人免受利比里亚的捐税负担，对利比里亚大肆进行干涉。经过了英国、利比里亚和瓦依人代表之间毫无结果的断断续续的商谈之后，英国于 1882 年 3 月将瓦依人酋长领地的大部分并入塞拉利昂，里然瓦依酋长从未希望英国人来进行统治（只是要英国干预一下）。（参见插图 11.3）。[23] 英国这项行动使利比里亚人大为惊讶，但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发表了一项十分动人但毫无效果的“备忘录和抗议书”以反对英国这一行动，并将这项文件的抄本发送给所有与利比里亚有条约关系的国家。文件恳求这些国家支持利比里亚并进行调解“以阻止一种预示利比里亚将遭受毁灭的事态发展”。在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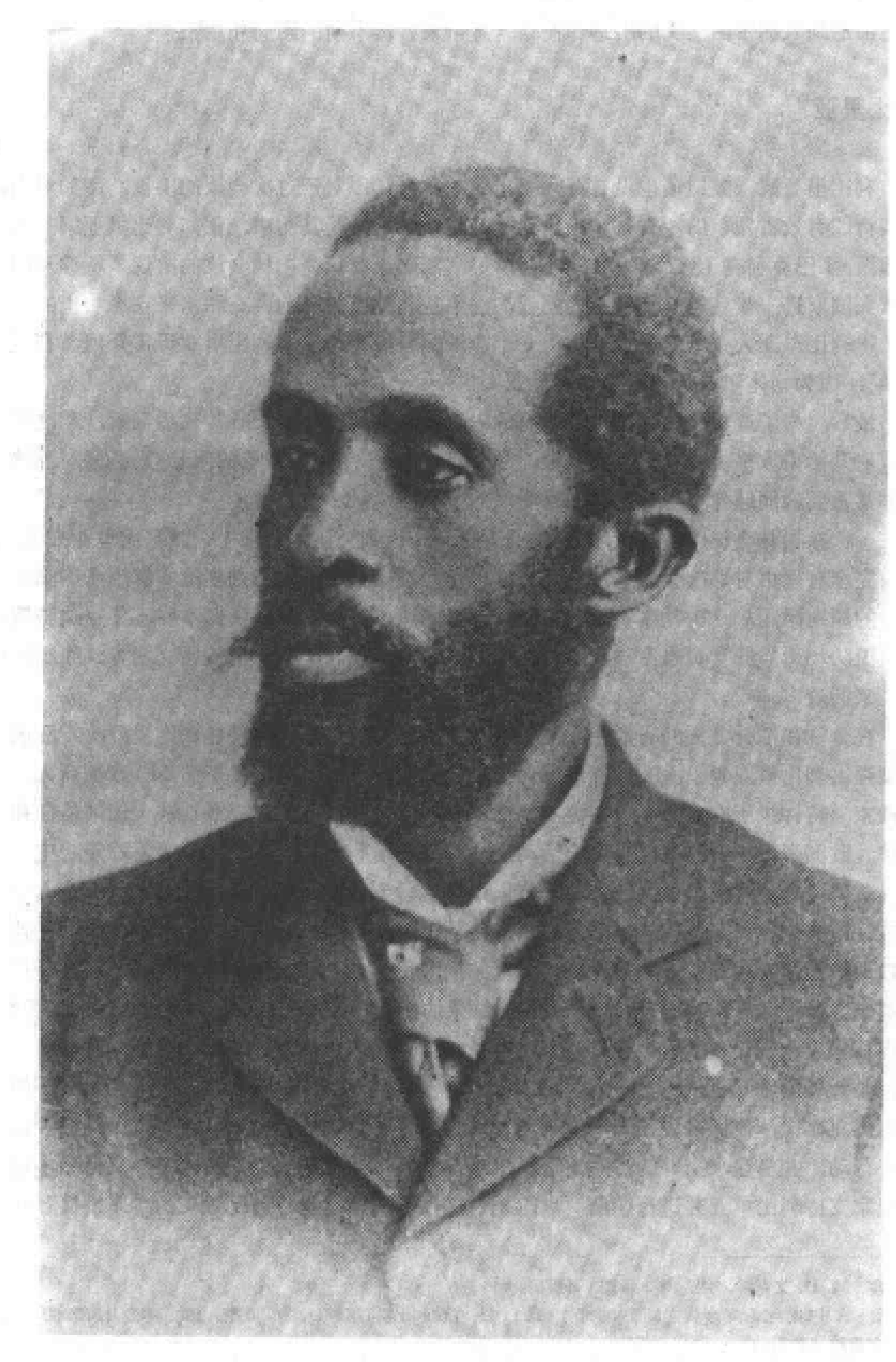
---

[21] M. B. 艾克潘，1973 b，第 223 页引用。

[22] A. 巴克利，《年度咨文》，1906 年 12 月 11 日，载《利比里亚公报》，第 30 期，1907 年 2 月，第 69 页，（下文简称《公报》）。

[23] 政府档案处，Kew（PRO），FO 84/1699 年，德比（Derby）致哈夫洛克（Havelock），1883 年 3 月 2 日；格兰维尔（Granville）致洛厄尔（Lowell），1883 年 3 月 10 日。

261



图片 11.3 阿瑟·巴克利，1904-1911 年的利比里亚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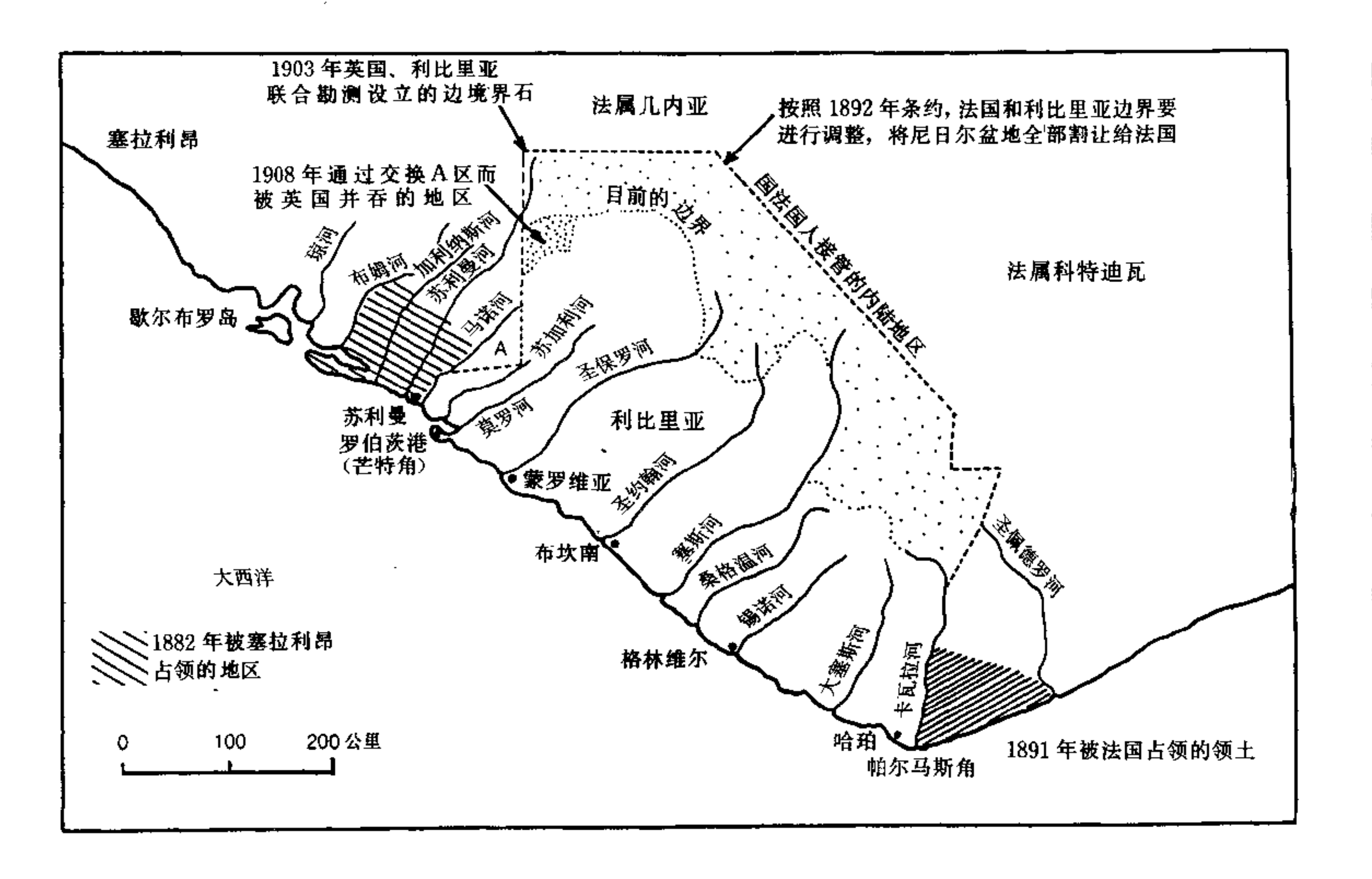


插图 11.3 英国和法国侵占利比里亚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1882-1914年（根据R. E. 安德森，1952年）

262

给予答复的少数政府中有美国的答复，利比里亚人特别期待美国进行干预，以使边界问题能获得“一个公正的安排”。但是美国政府很快就建议利比里亚默认英国的行动，这就使得利比里亚人的希望彻底破灭。利比里亚向之呼吁的其他国家大多为欧洲国家，它们本身正在加强扩张主义、或者正寻求在非洲扩大其领地，因此，对于利比里亚的呼吁都置若罔闻，或者不寄予同情。㉔1885年11月，利比里亚终于同英国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以马诺河作为利比里亚与塞拉利昂的边界，这是不利于利比里亚的。

同样，法国人也于1891年5月利用当地居民对利比里亚贸易政策的不满和利比里亚未能充分有效占领该地区而乘机并吞利比里亚东南部卡瓦拉河与圣佩德罗河之间的领土。㉕（参见插图11.3）。利比里亚人再次向“世界上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发出感情动人的呼吁，吁请他们说情，但全是枉然。㉖孤立无援而又软弱无力的利比里亚只得于1892年12月同法国签订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以卡瓦利河作为利比里亚同科特迪瓦的分界线，从而将卡瓦利—圣佩德罗河地区和一大片迄今仍未划定界线的利比里亚内陆割让给法国，作为法国放弃其对利比里亚沿海加勒韦、布坎南和布托含糊其词的领土权利要求的补偿。㉗

为了制止对利比里亚的进一步侵占，利比里亚政府于1890年和1892年分别派遣使节前往华盛顿和伦敦，要求美英两国承诺保持利比里亚领土的完整，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作出这种许诺。㉘

在1892年到1914年之间，英国和法国又进一步侵占了利比里亚更多领土，当时这两个国家正竞相霸占非洲内陆土地，随后同利比里亚划定了它们之间的领地边界。

一直局限于侵占塞拉利昂沿海地区的英国于1896年并吞了这个国家的内陆领土，并且在该地区强行建立一个殖民地政府，或称“土著人政府”。被英国兼并的领土包括坎里拉亨，这是卢阿瓦酋长领地的主要城镇。T. J. 奥尔德里奇曾于1890年代表英国政府同这块地方的酋长凯伊·隆杜签订了一项条约。1902年，由于居民的骚乱，一支英国军队趁机占领了坎里拉亨。

264

为了在坎里拉亨地区抢先制止英国人的占领，利比里亚政府于1907年2月在该地派出行政和海关官员，并驻扎一支武装部队，从而建立起“本地人政府”。但是英国军队不愿撤退。塞拉利昂总督G. B. 哈登-史密斯在当月访问该镇时由利比里亚武装部队护送，

㉔ G. W. 吉布森（Gibson）和A. F. 拉萨尔（Russell），1883年。

㉕ “非洲殖民协会”，第77年度报告，1894年1月，第9-10页；E. 赫茨勒特（Hertslet），1909年，第3卷，第1132-1133页。

㉖ 马里兰州，“法国对利比里亚：马里兰州公民为反对法国-利比里亚条约向利比里亚参议院呈交的一份文件，要求参议院否决这项条约，并请求法国克制；文件还引用利比里亚的契约以肯定利比里亚在圣佩德罗地区应享有的权利。”（1893年2月），存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内部通信、国务院、行政类（EDSDC），1855-1898年。又见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美国驻蒙罗维亚使节发出的函电（DUSM）11/70，麦科伊（McCoy）致格雷沙姆（Gresham），蒙罗维亚，1893年4月27日。

㉗ 国家档案馆，巴黎：“法国-利比里亚边界协议”；1892年，M. 12，8972；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DUSM 11/52，麦科伊致福斯特（Foster），蒙罗维亚，1893年2月1日。

㉘ H. R. 林奇（Lynch），1967年，第185页。

他承认该地区为利比里亚领土，英国只是“暂时”代利比里亚实行占领。[29] 可是，在1907年6月，利比里亚驻伦敦的总领事亨利·海曼向巴克利总统报告说，除非利比里亚同法属科特迪瓦和几内亚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法国和英国将考虑采取足以“损害利比里亚独立”的“极其严重的措施”。[30]

在这种威胁的影响之下，巴克利总统于1907年9月出访伦敦和巴黎，寻求对利比里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可是，这两国政府拒绝提供任何保证，法国政府甚至单方面起草了一项“边界”协议，按照此项协议，马科纳河彼岸的另一片利比里亚领土将割让给法国，并且规定利比里亚有责任在法属殖民地同利比里亚的边界建立哨所。“如果利比里亚政府本身由于缺乏财力无法及时在该地建立警卫部队，法国当局可以临时加以占领”。[31] 巴克利总统开始时当然拒绝签署这项协议，但是他曾对之强烈呼吁请求进行干预的美国政府却建议他签字，理由是“如果我们拒绝这项协议，法国将进一步侵略，最后我们将遭受更大的领土损失。”[32] 在此之后，他不得已只能勉强签署。这项片面条约只能解决法国同利比里亚边界的部分问题。其余部分问题的解决则自1908年7月开始，当时一个法国-利比里亚联合委员会开始进行边界勘定。[33] 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仍然不断威胁要占领利比里亚的领土。

英国对于法国1907年获得利比里亚的领土表现出明显的妒忌，因此也坚持获得坎里拉亨地区，并于1908年9月命令英国在坎里拉亨驻军司令勒梅热勒少校禁止利比里亚官员执行征收关税以外的行政职能。1个月以后，勒梅热勒又命令利比里亚人撤除他们的税卡并全部撤离坎里拉亨地区，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利比里亚同塞拉利昂的新的边界将定在莫阿河和马菲萨河的自然分界线。[34] 265

在1909年11月到1910年初期间，利比里亚政府试图通过劝说的办法从英国人手中取得坎里拉亨地区，但是完全徒劳。[35] 1911年1月，通过一项英国-利比里亚条约才使这个问题得到最后解决。根据此条约，英国保留坎里拉亨地区，但是将莫罗河与马诺河之

[29] A. 巴克利，《年度咨文》，1908年12月；美国国务院，《美利坚合众国派往利比里亚共和国调查团的报告书》，（首都华盛顿，1909年10月）；政府档案处(PRO)，FO 267/65，H. H. 约翰斯顿(Johnston)，《关于利比里亚人占领利比里亚西北部的备忘录》，1909年4月19日；FO 267/75 哈登-史密斯(Haddon-Smith)致埃尔金（Elgin），弗里敦，1907年3月28日。

[30] 巴克利致莱昂(Lyon)，蒙罗维亚，1907年8月9日，存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DUSM 326/202，莱昂致国务卿，蒙罗维亚，1907年8月9日一函的附件；EDCG 1905-1912年，巴克利致莱昂，1907年8月9日。

[31] E. 赫茨勒特，1909年，第3卷，第1140-1141页；R. L. 布埃尔(Buell)，1928年，第2卷，第790页。

[32] A. 巴克利、F. E. R. 约翰逊和T. M. 斯图尔特《利比里亚委员会关于法国-利比里亚问题前往欧洲的报告，1907年9月》，存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EPCEPG；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DUSM(NF)，326/345，埃利斯（Ellis）致国务卿，蒙罗维亚，1910年1月12日。

[33] 《内阁会议记录》，1909年8月6日。

[34] 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DUSM（NF）326/···，勒马丁（Lemadine）致巴克利，1908年9月30日；政府档案处（PRO），FO 367/209：库珀（Cooper）致勒梅热勒（Le Mesurier），科尼布，1909年11月25日。

[35] R. L. 布埃尔，1928年，第2卷，第784-789页；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DUSM(NF)326/339，埃利斯致国务卿，蒙罗维亚，1910年1月6日。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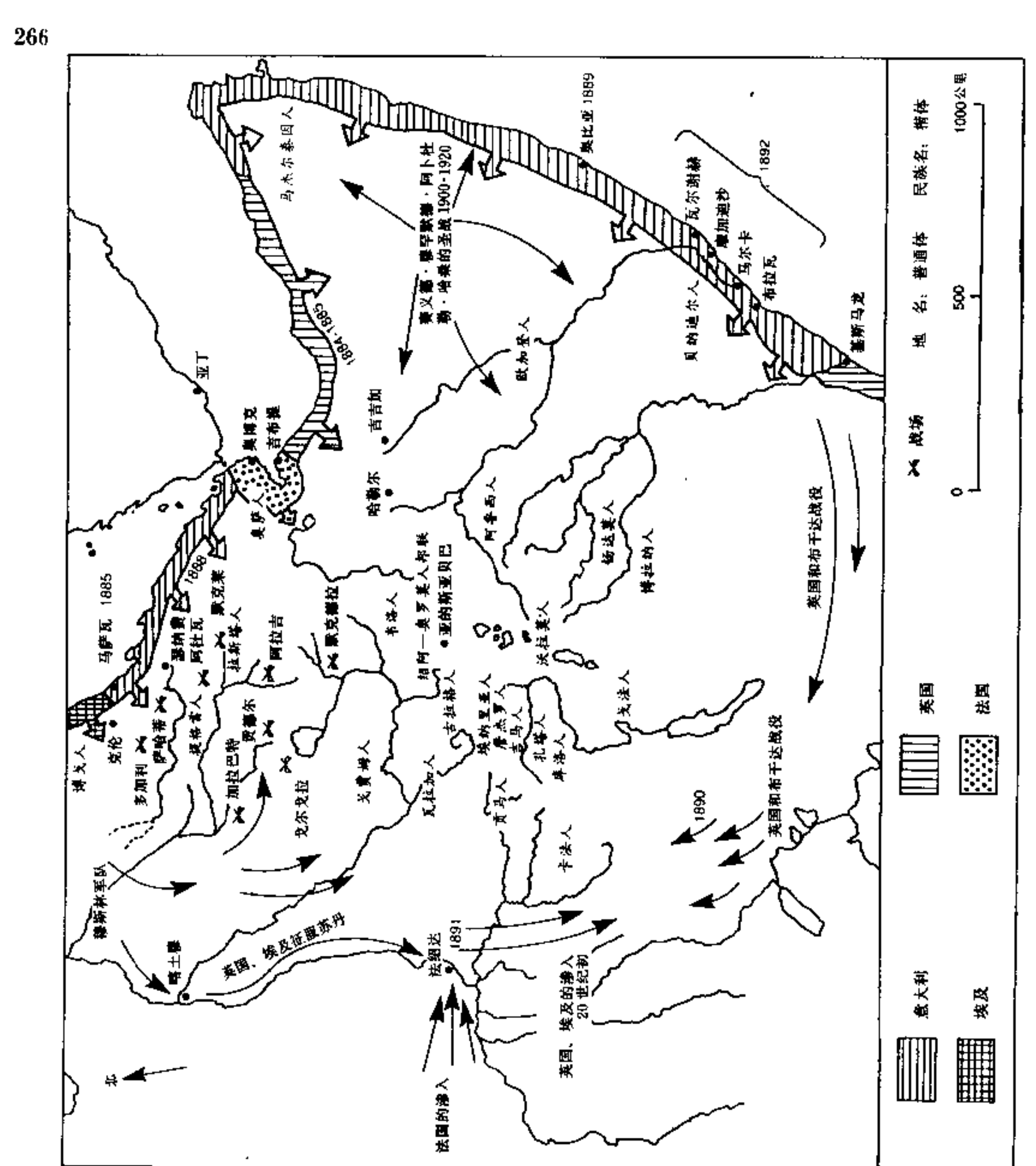


插图 11.4 列强对非洲的大瓜分与埃塞俄比亚（根据R. 格林菲尔德，1965 年）

间毫不足取的一片领土让予利比里亚，还付给利比里亚政府4000英镑的"补偿费"，用以开发被让予的领土。（参见插图11.3）（利比里亚还获得在马诺河自由航行的权利）。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新的边界最后划定完成于1915年。这样，利比里亚从英国侵略下得以幸存，但是却变得支离破碎，并陷入苦难之中。㊱

埃塞俄比亚

欧洲帝国主义侵犯埃塞俄比亚领土和损害其独立的计划同针对利比里亚的侵略计划同样凶暴（见插图11.4）。这项计划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869年，当时一名意大利的托钵传教士（名叫朱塞佩·萨佩托）花了6000玛丽亚·特里萨元从一个当地素丹手中购买了红海港口阿萨布。这个港口后来成为意大利一家私营航运公司鲁巴蒂诺公司的财产，并于1882年宣布为意大利的一块殖民地。㊲

约翰尼斯皇帝虽然是一个突出的爱国者，也是一名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的坚定信徒，可是他当时更多关心的是如何使埃及人从埃塞俄比亚撤退而不是意大利人的到来。㊳ 埃及人当时统治红海和亚丁湾非洲一侧沿海的许多地区以及邻近的内陆地带，包括马萨瓦 267 港和哈勒尔城。埃及于1882年处于英国占领之下，当时正面临苏丹马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起义，这次起义使得英国于1883年决定将英国和埃及的军队撤出苏丹。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在整个红海和邻近埃塞俄比亚的亚丁湾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了。由于几个有埃及驻军和欧洲居民的苏丹城镇被马赫迪分子包围，英国决定请求约翰尼斯帮助他们撤离。一名英国军官，海军少将威廉·休伊特爵士被派往同约翰尼斯谈判。约翰尼斯同意给予支持，但是他也提出了他的条件：最近被埃及占领的沿苏丹边境的领土应该归还给他。他还要求控制马萨瓦。他的第一项要求被认可了，但是对于马萨瓦港，英国只答应"在英国保护下"，埃塞俄比亚的货物，包括武器和军火都可自由转运。㊴ 1884年6月3日，一项体现这些原则的条约得以签订，随后，埃塞俄比亚著名的战将阿卢拉公爵解除了苏丹6处被围困的要塞。㊵

但是，此项协议的价德是短暂的，因为意大利人于1885年2月3日占领了马萨瓦。他们这样干是得到英国默许的，英国赞同意大利的扩张，希望以此来遏制瓜分非洲的主要对手法国的扩张。负责占领的意大利军官卡伊米海军少将向居民宣布，这次行动是取得英国人和埃及人的赞同的，并且许诺说："对你们的贸易，我不会设置任何障碍，相反，我的全部努力的目标就是促进贸易。"㊶ 可是这项声明很快就证明毫无价值，因为意大利

㊱ 政府档案处（PRO），FO 367/233，鲍德温（Baldwin），《年度报告》，1911年9月30日；A.巴克利，《年度咨文》，1911年12月12日。

㊲ 意大利外交部关于非洲的条约、公约、协定、议定书和其他文献资料（罗马，1906年）1-25-6。

㊳ 关于约翰尼斯王朝的简明编年史，参阅M.钱恩（Chaine），1913年。

㊴ A. B. 怀尔德（Wylde），1901年，第472-474页。

㊵ 同上，第35页。

㊶ E.赫茨勒特，1909年，第1卷，第8页。

人很快就终止向约翰尼斯皇帝提供武器，并且积极向内地渗透，一直达到萨哈蒂和维亚两村。阿卢拉公爵对于这种渗透提出了抗议，但是意大利人的回答却是在争议地区加强设防，并派出更多的军队。这支军队于1887年1月在多加里遭到了阿卢拉公爵的阻击，侵略者不得不撤出萨哈蒂和维亚，但他们借口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多加里"屠杀"，封锁了一切向埃塞俄比亚输运给养的航运。[42]

意大利人同约翰尼斯皇帝之间的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但是前者急于想避免艰难的山地战，劝说英国从中进行调解。一名英国外交官，杰拉尔德·波特尔爵士被派去会见约翰尼斯要求他同意让意大利占有萨哈蒂和维亚以及塞纳希特或博戈斯地区，后两者是埃及人于1884年割让的。当这些建议宣读后，约翰尼斯直率地回答说："对于所有这些建议我决不答应。根据与休伊特海军少将签订的条约，所有埃及人撤出的、位于我国边境上的地方，在英国的主张下全都转让了给我，而现在你们却要我重新放弃这片土地。"他对于英国背离条约非常愤怒并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提出抗议说，如果她希望保持和平，只有在意大利人留在他们的国家里而埃塞俄比亚人也同样留在自己的国家里的时候才有可能。[43]

268

面临日益增强的意大利威胁，约翰尼斯皇帝调动了在苏丹边境的一支驻军来增强自己的国防。马赫迪发现该地区没有设防，于是就发起攻击。约翰尼斯皇帝赶到默特马进行抗击，可是在1889年3月10日，当一次胜利的战斗临近结束时，他被一颗流弹击中而遭受致命重伤。他阵亡的消息促使他的军队陷于瓦解。于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北部出现极大的混乱。由于当时这个国家遭遇严重的牲畜瘟疫和饥荒，接着又流行天花和霍乱，这场混乱就更加严重了。[44] 在此困难时刻，意大利人迅速向内地推进。到了1889年底，他们已占领了一大片北部高原，并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厄立特里亚殖民地，首府设在阿斯马拉。[45]

就在约翰尼斯皇帝顽强反抗埃及和意大利侵略的大部分时间里，绍阿人的统治者、名义上隶属于皇帝的曼涅里克却同意大利保持着友好关系（图片11.1）。对曼涅里克来说，同意大利接触是有利的，因为意大利特使安托奈利伯爵是常驻他朝廷的唯一的外国外交官。此人为曼涅里克接近欧洲和欧洲的技术提供了方便，此外，意大利人还向他提供了几名医生和大量火器。由于同意大利的这种友谊，曼涅里克才能当上绍阿的国王（1865-1889年在位），并征服了南部和东南部阿鲁西、哈勒尔、库洛、孔塔以及西南部的古拉格和瓦拉加等富裕的地区。[46] 对意大利来说，同曼涅里克的合作也被看成是实现其扩张野心的有用之物，即使从长期来说不是必要的。这种友谊在1889年5月2日达到了

[42] 关于意大利扩张历史中的多加里战役和其他事件的当代意大利人的看法，可参阅A. 德亚科(Dejaco) 1972年的著作。

[43] G. L. 波特尔 (Portal)，1892年，第158页。

[44] R. 潘克赫斯特，1966年。

[45] A. B. 怀尔德，1901年，第49页。

[46] H. G. 马库斯，见L. H. 甘恩 (Gann) 和P. 杜伊格南 (Duignan) 合编，1969年，第422-424页；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98-99页。

高潮——也就是约翰尼斯皇帝死后不到 2 个月——当时在埃塞俄比亚的乌查理村曼涅里克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和平与和睦条约。

乌查理条约成了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它包含着对双方有利的条文。根据此条约，曼涅里克承认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阿斯马拉在内）拥有主权，与此同时意大利承认他为皇帝(他第一次得到的这类承认)，并且准许他通过意大利的领土输入武器和军火。可是条约最重要的部分是第 17 条，而对于这一条很快就出现了争议。这项争执是由于条约有两种文本引起的，一份是阿姆哈拉文本，还有一份是意大利文本。 269 在这两种文本中，第 17 条的意思有着很大的差别。阿姆哈拉文本规定，曼涅里克可利用意大利当局的服务，按照自己的意愿同别的国家进行联系，意大利文本却对曼涅里克的对外交往加以约束。[47]

虽然意大利很快利用本条款的意大利文本宣称埃塞俄比亚为其保护国，但两国的友好关系仍然保持了好几个月。[48] 曼涅里克派遣其堂弟、哈勒尔省的省督马康南公爵于 1889 年 7 月前往意大利商谈协议的实施问题，与此同时，意大利负责扩张的军官巴尔迪塞拉将军根据乌查理条约向厄立特里亚高原纵深挺进。8 月 2 日，他发表一项占领阿斯马拉的公告，而 10 月 1 日马康南公爵在罗马签署了一项乌查理条约的补充协定。在此补充协定中，意大利再次承认曼涅里克为皇帝，而曼涅里克则承认意大利对以当时实际边界为基础的红海殖民地拥有主权。还订出条款让意大利银行向埃塞俄比亚提供贷款 400 万里拉。[49]

但是，合作的想法很快就遭到挫折，因为意大利外交大臣克里斯皮于 10 月 11 日宣布，“根据意大利同埃塞俄比亚间的永久性条约的第 34 条，埃塞俄比亚国王陛下同意在处理他同其他国家政府的一切事务中通过意大利国王陛下政府。”[50]

克里斯皮的公告虽然在措辞上很婉转，但是却构成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实行保护国关系的明确权利。意大利的这项权利正式地被欧洲国家认可了。欧洲地图绘制者都在他们的地图上将这个国家标注为“意属阿比西尼亚”，而且当曼涅里克计划于 1889 年 11 月 3 日举行皇帝加冕典礼并将此消息通知各国政府时，使他感到懊恼的是，它们回答说，由于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保护国，它们只有通过意大利而不能直接打交道。后来英国又于 1891 年 3 月 24 日、4 月 14 日和 1894 年 5 月 5 日同意大利签订了 3 项议定书，划定了英国殖民领地同所谓保护国之间的边界。[51]

为了支持所要求的权利，意大利人又从厄立特里亚进入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他们越过早些时候同意的边界，渡过默勒卜河，于 1890 年 1 月占领了阿杜瓦镇。然后，

---

[47] C. 罗塞蒂（Rossetti），1910 年，第 41-44 页；E. 沃克（Work），1936 年，第 84-86 页；S. 鲁宾逊（Rubenson），1964 年；C. 季格利奥（Giglio），1968 年。

[48] 关于乌查理条约到阿杜瓦战役之间的意大利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史，可参看 C. C. 罗西尼（Rossini）1935 年；J. L. 涅杰（Niege），1968 年。

[49] C. 罗塞蒂，1910 年，第 45-47 页。

[50] E. 赫茨勒特，1909 年，第 1 卷，第 1、17 页。

[51] E. 沃克，1936 年，第 128-133、138-139 页。

270 他们通知约翰尼斯皇帝的儿子和提格雷省的统治者曼加沙公爵，在未得到曼涅里克认可他们对乌查理条约的解释之前他们将不会撤退。[52]

曼涅里克拒绝认可这个解释。1890 年 9 月 27 日，他给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写信，指出他发现该条约第 17 条的两种文本是不一致的，并且宣布说：

> 我同意大利签订友好条约，为的是我们的机密能够得到保守，我们的谅解不会遭到破坏。我说过，出于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们的欧洲事务可以在意大利国王帮助下进行处理，但是我不曾签订任何条约使我非得如此做不可，而今天我得正式声明，我不是接受这种做法的人。一个独立国家不会寻求别国的帮助来处理本国的事务，国王陛下您对此是十分明白的。[53]

决心不再进一步依赖意大利贷款，他开始偿还款项。意大利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陷入僵局。在随后的讨论中，意大利公使安托奈利告诉曼涅里克："意大利不能通告其他国家说自己误解了条约的第 17 款，因为意大利必须保持自身的尊严。"曼涅里克的配偶泰图皇后回答说："我们也已让其他国家知道，所说的条款，用我们文字写的文本上有不同的意义。同你们一样，我们也必须保持我们自己的尊严。你希望埃塞俄比亚作为你们的保护国出现在别国的面前，但这是永远办不到的。"[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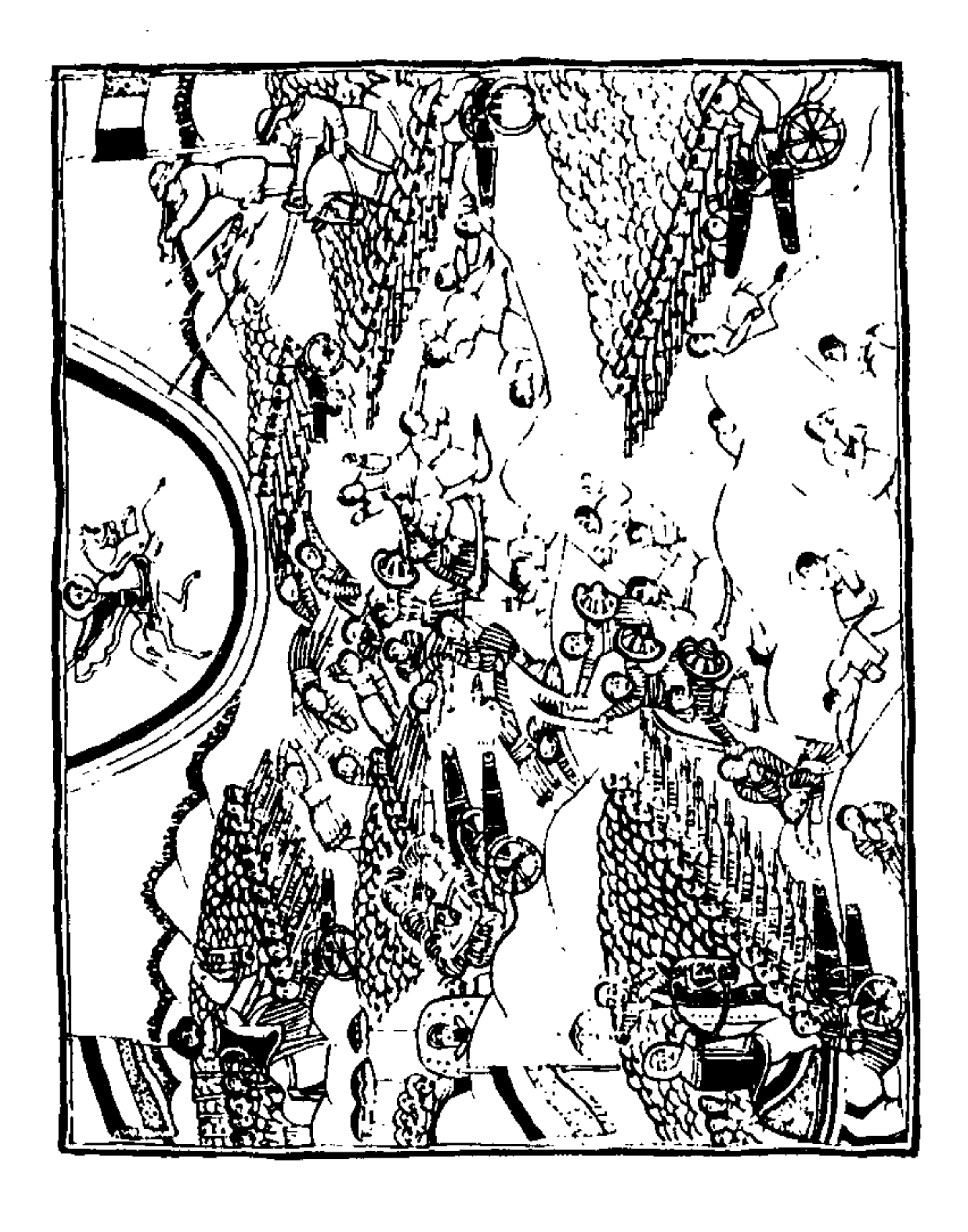
经过几年拖延，曼涅里克利用这段时间进口大量火器，主要是从法国和俄国进口，并且主要通过武力征服方式占领了卡法、沃拉莫、锡达莫、巴莱和欧加登、戈法、贝尼、尚古尔的部分地区以及博兰·奥罗莫（加拉）地区的东部和西部，他终于在 1893 年 2 月 12 日，宣布废除乌查理条约。同年 2 月 27 日，他通报欧洲各国并在提及意大利的要求时，间接引用圣经的语句，宣告说："埃塞俄比亚不依赖任何人，她只向上帝伸出她的双手。"曼涅里克是依靠实力地位来讲话的，因为当时他已拥有 8.2 万支步枪和 28 门大炮。[55]

意大利同埃塞俄比亚于 1894 年 12 月爆发了战争，当时一个名叫巴塔 · 哈戈斯的厄立特里亚酋长起来造反反对意大利的统治。1895 年 1 月初，意大利人攻击提格雷省的曼加沙公爵并占领了该省的许多地区。因此，曼涅里克于 9 月 17 日发布军队动员令，并以大部队向北方推进，这支队伍于 12 月 7 日在安巴阿拉吉山获得巨大胜利，年底又在默克莱大胜。意大利人退到阿杜瓦，在那里经过一段时间沉寂之后，终于爆发了最后的对抗（参见图片 11.4）。

272 曼涅里克处于相当坚强的地位。他有当地居民的支援。意大利人曾经没收厄立特里亚的土地以安置他们的殖民者，这个行动使这里居民的爱国主义大大加强。[56] 因此，居民们愿意给皇帝的军队带路并报告敌人的动向。相反，意大利人却面临着当地居民的敌视，并且缺乏精确的地图，因此在一个几乎陌生的国家里，他们陷入混乱。此外，曼涅里克的军队人数也多得多。这支军队除了大批使用古代火器和长矛的战士以外，装备现代步

---

[52] A. B. 怀尔德，1901 年，第 51 页。
[53] E. 沃克，1936 年，第 107 页。
[54] 同上，第 118 页引用。
[55] 同上，第 134-135 页引用。
[56] R. 潘克赫斯特，1964 年，第 119-156 页。



图片 11.4　阿杜瓦战役，根据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一幅油画绘制

的士兵就超过10万人，而侵略者只有1.7万人左右，其中10,596名为意大利人，其余是从厄立特里亚征集来的士兵。意大利人在大炮方面略占优势，但也只是56门对曼涅里克的40门，这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阿杜瓦一整天战斗的结果是曼涅里克的明显胜利和敌人的彻底失败。在战斗中被杀死的有261名意大利军官、2918名意大利下级士官和列兵以及2000名左右当地士兵，还加上永远失踪的意大利士兵954人以及受伤的470名意大利人和958名当地士兵。意大利伤亡总数超过投入战斗部队的40%，这支部队完全溃败了，除损失1.1万枝步枪外，还损失了全部大炮。[57]

由于曼涅里克获得了胜利，意大利于10月26日同意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和平条约，这项条约规定废除乌查理条约，并承认埃塞俄比亚的绝对独立。[58] 另一方面，曼涅里克出于未透露的理由并未要求意大利人撤出厄立特里亚，虽然他曾经常表示希望获得进入海洋的通道。于是意大利殖民地的南部边界就被确认在默勒卜河。

阿杜瓦战役使得曼涅里克国际声望大振。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派遣外交使团同他签订条约。同时，来自苏丹马赫迪、奥斯曼帝国素丹和沙皇俄国的使馆人员也纷纷来到。[59]

此次战役是自汉尼拔时代以来非洲人打败欧洲军队的一次最伟大的胜利。其结局在欧洲同非洲的关系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一名波兰旅行家波托基伯爵所指出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整个红海地区获得威望。他说，索马里人“对他们的邻国得以战胜一个欧洲强国感到种族骄傲。”[60]

对于这个黑非洲最后的本地独立国家，新世界的黑人知识分子也表现出日益增加的兴趣。海地人本尼托·西尔万是泛非主义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于1889到1906年之间曾四次来埃塞俄比亚旅行，每次都携带着海地总统亚历克西斯的往返信件；[61] 而威廉·H.埃利斯，一个古巴裔美国黑人，也于1903和1904年两度携带着经济发展和美国黑人来此移民的各种计划访问这个国家。[62]

273

埃塞俄比亚的冲击也波及到南非。在那儿，关于埃塞俄比亚向上帝伸出双手的圣经预言已于若干年前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00年在南非建立了埃塞俄比亚教会[63] 黄金海岸的知识分子J. E. 凯瑟利·海福德于1911年出版了《解除束缚的埃塞俄比亚》一书，这本书的出版表现了人们对埃塞俄比亚日益增多的关切。这本书是献给“居于世界各地的埃塞俄比亚儿子”的。

---

[57] G. F. H. 巴克利（Berkeley），1902年，第345页。

[58] C.罗塞蒂，1910年，第181-183页。

[59] 有关此时派往曼涅里克处的外交使团的情况，可参看 E.格莱琴（Gleichen），1898年；J. R. 罗德（Rodd），1923年；H. P. M. 德奥尔良（d'Orléans），1898年；R. P. 斯金纳（Skinner），1906年；F. 罗森（Rosen），1907年。

[60] J. 波托基（Potocki），1900年，第88页。

[61] A. 贝文（Bervin），1969年。

[62] R. 潘克赫斯特，1972年。

[63] G. 谢波森（Shepperson），1968年，第251-253页。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欧洲对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内部事务的干预，1880-1914年

利比里亚

与欧洲的侵犯同时而来，利比里亚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欧洲国家对非洲的分割与瓜分迫使利比里亚政府向本国内陆发展，以制服各本地族群，并建立一种殖民地类型的行政当局对他们进行统治。[64] 每个行政单位或地区，都是通过当地主要酋长配合政府任命的地区专员而进行"间接的"统治。1914年以前，大多数地区专员都是美裔利比里亚人或是受过教育的本地军官。这种行政当局基本上都是暴虐而腐败的。多数地区专员、他们的助手以及军队，由于薪俸微薄又不经常发放，并且很少受到蒙罗维亚方面的监督，都靠着所在地区生活。他们勒索食物，征集劳力为他们的私人农庄干活以及横征暴敛收取苛重的罚金（每个成年男子要交一元人头税，还要为公共建筑和道路工程服劳役）。[65]

本地非洲人不仅反抗利比里亚政府当局的军事征服——正如其他地区非洲人反抗欧洲人统治那样——而且也反抗利比里亚行政当局的暴行，这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直到被利比里亚民兵、利比里亚边防军和美国海军军舰征服为止，克鲁人断断续续地进行反抗，特别是在1915到1916年之间；格雷博人在1910年进行了反抗；基西人在1913年；克佩勒人和班迪人在1911-1914年；吉奥人和马诺人在1913-1918年；格博洛博-格雷博人在1916-1918年，戈拉人和班迪人在1918-1919年，乔魁尔-克佩勒人在1916-1920年；西孔人在1921年，也都进行了反抗。不同战线上爆发的这种绵延不断的战争和"土著人政府"的浪费和无能鼓励了外国的干涉并使得利比里亚政府的人力和物力都更加紧张。[66] 274

政府的收入总是不足。外援很少。大多数美裔利比里亚人乐意经商而不愿意从事农业。由于19世纪后期世界性经济萧条，他们受到严重打击。到1890年，当地的德国、英国和荷兰商人已经控制了利比里亚的对外贸易。自19世纪60年代起，利比里亚的主要出口商品咖啡，大部分是美裔利比里亚人种植园主和企业家生产的，他们使用"被夺回的人"和本地非洲劳工。由于经济萧条和在世界市场上与配制较好的巴西咖啡的竞争

[64] 至少有两位利比里亚总统公开承认，美裔利比里亚人对于本地非洲人的统治是属于殖民地性质的。他们是阿瑟·巴克利（1904-1912年在位）和威廉V. S. 杜伯曼（1944-1971年在位）——关于后者见他于1960年11月致利比里亚议会的《年度咨文》。参阅《利比里亚时代》，1960年11月25日，第9页。

[65] 利比里亚财政部，《财政部长向利比里亚共和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报告》，1921年12月（蒙罗维亚，1921年12月），第13-14页。

[66] M. B. 艾克潘，即将出版。

处于劣势，自从1898年以后，利比里亚咖啡价格剧烈下降。[67] 随之而来的利比里亚的咖啡生产和出口的大幅度削减和利比里亚外贸在数量上和价值上的普遍下降，使得政府的收入大为减少，政府收入主要为关税以及对贸易和航运征取的其他各种税收。此外，政府还缺乏有效的手段向不愿缴税的利比里亚的和外国的商人收取税金，也无法阻止走私。

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政府经常大量向利比里亚本国商人和当地的外国商行借款，以"维持其最一般的活动"。1896年11月以9%的利息向德国贸易商行A. 沃尔曼公司贷款1万美元，"用以支付政府的日常开支"。[68] 1898年2月又从荷兰商行"奥斯特·阿非利加斯·西"贷款1.5万美元，用以支付利比里亚立法机关开支。[69] 1900年6月从德国维歇斯和黑尔姆公司借贷一笔数目未定的款项，"用以按季支付政府人事费"——以上只是略举数例。[70] 此外，利比里亚政府还以苛刻条件从英国和欧洲的金融界1874年借款10万英镑；1906年借款10万英镑；1912年又借款170万英镑。为了偿还债务，利比里亚政府以本国关税收入作为抵押。为了保证和便利偿还债务，利比里亚关税从1906年起由英国官员进行管理；从1912年起，则由"国际监管团"进行管理。[71]

利比里亚在偿还债务之后只剩下很少一点资金，而且缺乏熟练的劳力，因此在任何程度上都没有条件开发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或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教会和慈善团体抢先承担了为大部分利比里亚小学和中学提供设备和资金，又为1862年创建于蒙罗维亚的利比里亚大学提供设备和资金。利比里亚的大部分教会工作也都由他们主办，为此他们多半雇用美裔利比里亚人和美国白人传教士和教师。

利比里亚贸易和农业的衰落以及19世纪后期起外援的减少，使得利比里亚政府加重了对本地利比里亚人的剥削，其方法就是通过劳役、人头税和其他捐税，同时也使得利比里亚人更加依赖政府提供工作。为了争夺这类工作职位和社会剩余财富的控制权，各个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其中有"建国之父"（独立前移居利比里亚的美裔利比里亚人的组织）和"本土之子"（在利比里亚出生的美裔利比里亚人的组织）等。

但同一时期也确实出现了社会的和经济的某些发展。1900年利比里亚政府重新开办利比里亚学院（该学院由于缺乏资金和进展于1895年关闭），从此之后，政府多少给予资助使之培养出更多人才。第二年，一位美裔利比里亚工程师T. J. R. 福克纳架设了联接蒙罗维亚和邻近几个城镇的第一条电话线。[72] 1900年，一家德国公司建立的电报站开业把利比里亚同外部世界沟通起来。在1906到1907年之间，一家英国人办的利比里亚开发公司利用1906年贷款的一部分从蒙罗维亚向内地修建了好几条公路。此外，一些外国公司还从利比里亚政府取得橡胶、矿产和其他项目的特许权加以利用，从而大发其

[67] M. B. 艾克浦，1975年，第136-137页。
[68] 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内阁记录》，1896年11月19日会议
[69] 同上，1898年2月11日会议。
[70] 同上，1900年6月13日会议。
[71] M. B. 艾克浦，1975年，第159页
[72] G. W. 吉布森，《年度咨文》，1901年12月10日。



图片 11.5 利比里亚学院的教师和学生，1900年

财。[73]

埃塞俄比亚

同利比里亚相似，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起，埃塞俄比亚也经历了重要的经济变革。

曼涅里克渴望他的古老国家能实现现代化，他对所有的新事物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所表现的这种兴趣使得一位意大利医生德-卡斯特罗将他描述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进步君主"，并且以幽默的口气补充说，如果有个冒险家提出修建一条通向月亮的自动楼梯，这位皇帝也真会请他来修建的，"即使仅仅只是为了看看它是否做得成"。[74] 在曼涅里克统治下出现了无数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第一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意为"新鲜花朵"，它到1910年已拥有10万居民。[75] 第一座现代化桥梁的建设也是此时实现的，它改善了困难的交通条件。1892年重新调整赋税，对军队实行什一税，从而从表面上结束了士兵掠夺农民的传统习惯。1894年，第一次发行国家货币，正如一项公告中宣布的"其目的是使我们国家的信誉得以提高，我们的商业得以繁荣昌盛。"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邮政系统。邮票同硬币一样也是从法国定制的，并于1893年公开出售。1894年颁布了一项建立邮局的法令。在发展邮政事业中充分利用了法国顾问人员，并于1908年加入"国际邮联"。1894年批准了从亚的斯亚贝巴到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港修建一条铁路的许可证，只是由于技术上、财政上和政治上都遭到严重困难，以致这条基本上由法国资本修建的铁路到1902年才修到德雷达瓦镇，到1915年才修到距亚的斯亚贝巴23公里的阿卡基。在20世纪初架设了两条电报线，其中的一条是在铁路工作的法国工程师沿线架设的，另一条则是意大利技术人员架设的，从首都通向厄立特里亚以及西部和南部。20世纪早期，从亚的斯亚贝巴到阿迪斯阿莱姆和从哈勒尔到德雷达瓦之间的第一批现代化公路分别在意大利和法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建成，而首都的木材供应，由于从澳大利亚引进桉树（可能是一名法国人引进的）而得到了改善。

在曼涅里克统治的后期，各种现代化机构纷纷建立起来。阿比西尼亚银行创建于1905年，是作为英资埃及国民银行的一家分支机构。亚的斯亚贝巴的第一所现代化旅馆"埃泰吉"由泰图皇后于1907年创建。曼涅里克二世学校是在埃及的科普特教派教师的协助下于1908年创立的。曼涅里克曾派遣学生去瑞士和俄国留学，这表明他对现代教育的兴趣。为了取代阿杜瓦战争期间建立的俄罗斯红十字会机构，曼涅里克二世医院建立于1910年，而国家印刷厂则成立于1911年。[76] 本人健康不佳和政府事务的日趋复杂化，促

---

[73] A. 巴克利，《年度咨文》，1911年12月11日；D. B. 霍华德(Howard)，《年度咨文》，1912年12月12日；《内阁记录》，1912年7月18日会议。

[74] L. 德卡斯特罗（de Castro），1915年，第1卷，第162页。

[75] 同上，第189-246页；E. 梅拉布（Mérab），1921-1929年，第2卷，第13-193页；R. 潘克赫斯特，1962 a，第33-61页。

[76] G. 塞拉西（Sellassie），1930-1932年，第2卷，第527-528页。

使曼涅里克于1907年建立了这个国家的第一届内阁，按照他的年谱作者加布雷·塞拉西的说法，这个内阁是由于“希望移植欧洲人的习惯”而建立起来的。在曼涅里克统治结束时，埃塞俄比亚已经置身于现代化的道路上。[77] 278

欧洲人对非洲的分割和瓜分对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产生的后果

欧洲人对非洲的分割和瓜分对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确实产生了一些有意思却又明显不同的影响。首先，这是整个非洲在帝国主义猛攻下得以幸存并保持自己的主权和独立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而且如上文所述，埃塞俄比亚不仅幸存下来而且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内将其东部和南部的边界线大大向前扩展了，但是利比里亚却把大块领土割让给了英国和法国。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的这种明显不同的影响应如何理解。换言之，就是这两个国家何以得以幸存，尽管一个国家丧失了领土而另一个国家则获得了领土。

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所以得以幸存是由于下列三项主要的共同原因：两国人民保持独立的坚定决心；当时两国领导人所表现出的外交上的机智；最后一项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它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没法占领这两个国家当中的哪一个。除了上述各项原因之外，还要补充一点，就埃塞俄比亚来说，那就是本身掌握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之所以扩大了领土而利比里亚却丧失了一部分领土则主要是由于两个国家的内部条件不同——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当然也还由于欧洲人对这些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程度不同。

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得以幸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国人民的坚强信念，他们深信万能的上帝注定他们会生存下去，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大大加强了他们反抗一切欧洲人蚕食和侵略的决心。在利比里亚人的意识中印刻着一种把上帝看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的坚定信念，而这种信念基本上出于他们在新世界所受的强迫奴役的经历。有好几任利比里亚总统都是福音传道传教士。事实上，利比里亚人总是把他们历史上的每个重大事件都看成为上帝干预的结果。正是这同一的信念构成了1893年埃塞俄比亚曼涅里克皇帝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声明的基础，他说：“埃塞俄比亚不依赖任何人，她只向上帝伸出自己的双手”，这段豪言壮语也是他于1891年8月致维多利亚女王函件中的精彩段落以及本卷第1章引录的他于1895年9月阿杜瓦战役前夕发布的公告的基调。[78] 毫无疑义，这两个国家人民的这种坚定信念使他们充满了决心，这大大有助于理解他们对于一切欧洲攻击的有效反抗。

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得以幸存的第二项主要原因是外交上的。一方面，这两个国家都善于利用一个欧洲国家去反对另一个欧洲国家，同时也能够通过外交手腕抗拒来自殖民国家的比较间接的压力。在促他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之间彼此对立方面，曼涅里克 279

---

[77] L. 德卡斯特罗，1915年，第1卷，第162页。

[78] 参见上文第4页。

肯定地获得了成功。他曾于1896年依靠法国的武器来反抗意大利并保卫自己。在1902年当法国企图更多地控制吉布提铁路时，他又利用了英国。正如德-卡斯特罗所说的，曼涅里克的目标就是利用欧洲的技术成就，而在政治上又不屈从于它们。据说皇帝曾作这样的逻辑推理："如果欧洲人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带来文明"、"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但是他们必须是带来文明而又不使我们丧失自己的主权。我们知道怎样从他们的文明中选择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地方从中获利"。[79] 利比里亚也一贯促使法国反对英国，又促使英国反对德国，而一旦感到日子不好过时，利比里亚也会毫不犹豫地引来美国作出一些必要的威胁的声调以便抵挡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各国决心阻止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全盘控制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也是这两个国家得以幸存的重要因素。仅就主要的经济原因而言，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不准备听任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控制利比里亚，因为这些国家的贸易商人在利比里亚都很活跃。为了感情上的原因，美国一心想保住利比里亚的生存。这样，从1862年10月正式签订商业和航运条约并得到国会批准的时候起，美国军事炮艇不断周期性地在利比里亚海域出现，以消灭本地非洲人对利比里亚政权的反抗，同时也缓和法国和英国借口利比里亚无力警卫本国边界而瓜分利比里亚的野心。[80] 平时，如果法国和英国当中任何一个国家企图使利比里亚丧失独立，美国就运用外交手段警告它们注意历史上的道德审判。因此，在1879年和1898年，美国曾警告法国和德国不要并吞利比里亚或者使其沦为保护国。[81] 基本上出于战略上的原因，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同样不愿看到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控制埃塞俄比亚。下述这件事是非常意味深长的，那就是1906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曼涅里克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导致他统治的帝国的瓦解，于是这3个国家聚在一起，秘密签订了一项三方协定，在协定里它们三家把埃塞俄比亚偷偷瓜分掉了，幸而这一行动在曼涅里克死前被他揭露。[82]

280 就埃塞俄比亚来说，在解释这个国家之所以幸存时，应该提到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也可以解释埃塞俄比亚为何能在本章论述的时期扩展其领土范围，这个因素就是埃塞俄比亚拥有的军事实力。假如曼涅里克在阿杜瓦战役遭到失败，埃塞俄比亚无疑地会在1896年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幸亏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意大利在非洲的军事实力，埃塞俄比亚在这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从而保住了本国的独立。甚至在阿杜瓦战役之后，曼涅里克仍坚持大力储备武器。英国旅行家约翰·博伊斯曾经证实这个事实，他指出，在20世纪初叶，"实际上全体阿比西尼亚人都以步枪武装起来，""在非洲，阿比西尼亚人是武装得最好的本地种族"，它"不容易被任何外国征服"。[83] 1902年为了纪念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的胜利而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军事检阅中，参加的军队估计有60万人——比帝国全部军事实力约少10万人，其中9万

---

[79] C. 罗塞蒂，1910年，第319-325页。
[80] C. H. 休伯里奇（Huberich），1947年，第1卷，第213页。
[81] E. W. 切斯特（Chester），1974年，第133页。
[82] C. 罗塞蒂，1910年第331页。
[83] J. 博伊斯(Boyes)，未注明日期，第22页。

人为帝国的常备军。[64] 全部军队都装备有现代化武器，包括步枪、机枪和大炮。大部分大炮和速射武器都储存在亚的斯亚贝巴，同各省省督的力量相比，皇帝的力量是大大地扩张了。[65] 正是这支军队才使曼涅里克有力量在19世纪80年代和整个90年代将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向外大大扩展。

如果说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确实幸存下来，那么利比里亚在幸存中受到肢解并变得贫弱了，这是本国军事力量薄弱和令人绝望的内部条件造成的。利比里亚的海军在任何年代都只有一两艘炮艇（包括英国赠送的炮艇在内）。直到1908年，利比里亚的陆军仅仅就是美裔利比里亚人民兵。到这一年才组建了"利比里亚边防军"作为上述民兵的补充。在1914年以前，民兵的人数一直保持在2000人以下，缺乏训练，装备和薪饷都很差。[66] 在利比里亚，军队主要是在战争期间征集当地非洲人，同时以"辅助性的"当地利比里亚"战士"协助。这支部队缺乏向战场快速运输的手段。到1880年，这支部队分为4个团——每个州驻扎一个团——每个团都由一名美裔利比里亚司令官率领，各司令官服从于作为军队总司令的利比里亚总统。[67] 巴克利总统于1906年5月在谈到利比里亚民兵第5团时，对民兵典型状况作了这样的叙述："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团司令官卡特上校同时也是一名传教士，经常不在部队里；中校是一名文盲；少校是一个聋子；这个团正在迅速瓦解，必须进行重建。"[68] 效率之差只等于民兵的利比里亚边防军，于1913年12月由3名美国军官和7名利比里亚军官再加上600多名士兵组成，分成12个以上的分队，分别驻扎在利比里亚内地。1914年以前，每个分队的军官在他管辖地区执行军事和行政两方面的任务。因而他得从军政部和内政部（这两个部之间彼此并不协调）接受训令并向它们汇报。同埃塞俄比亚军事力量形成明显对比的利比里亚军事上的衰弱造成利比里亚完全无力在欧洲人的争夺中抵抗侵略、保卫自己的领土。 281

内部情况也同样令人失望。如上所述，由于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原因，利比里亚政府长期濒临崩溃的边缘，并对本地和外国的债主欠下了巨大债务。根据蒙罗维亚英国总领事的说法，到1908年1月，利比里亚欠英国的债务每年达6万英镑，连续已有"好几年"。到1905年9月，它欠在利比里亚的德国商人的债务总额达12万美元。这类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在本章所述时期内不断干预利比里亚内部事务，而在埃塞俄比亚，欧洲国家从未这样做过，因为在埃塞俄比亚，他们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借口这样做。整个19世纪的最后30年，帝国主义国家派遣了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去利比里亚提出提供援助以供还其债务，只要利比里亚愿意接受他们的保护。法国是在1879年这样干的；德国是在1887年；西班牙是在1886年；每个国家都表示愿意整顿利比里亚的财政，重组其防务，建立并控制其边防军。同时，这些国家的常驻大使和代表以轻视的态度对待利比里亚人，并

---

[64] H. G. 马库斯，1975年，第217-218页。

[65] 同上。

[66] A. 巴克利，《就职演讲》，1904年1月4日。

[67] 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DUSM，10/22，附件，《巴克利致泰勒（Taylor）》，蒙罗维亚，1887年8月27日。

[68] 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内阁记录》，1906年5月3日会议。

且常常通过谴责利比里亚的贸易、海关和有关公民身分的法律，或者强迫它纠正对外侨的待遇，以此对它施加影响。英国在1869年9月、1870年8月、1871年4月、1882年的2月和6月、1886年11月，最后于1909年1月就是多次这样干的。[89] 同样，德国也于1881年2月和10月、1897年8月、1898年1月和9月以及1912年12月多次派来了炮艇恫吓利比里亚。每一次，德国政府都向利比里亚政府索取3000到6万美元的赔偿，提出的根据大都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所谓在利比里亚的德国领事或者德国商人受到利比里亚官员的"侮辱"，他们要求德国政府出面干预。

282　从1907到1909年的3年期间，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这种干预空前加剧，到1909年2月11日和12日著名的"卡德尔事件"中达到高峰。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利比里亚显然可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欧洲列强牺牲利比里亚利益，在利比里亚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而产生的对抗，以及利比里亚对这些国家或这些国家的国民所欠的债务。

欧洲在利比里亚进行的这类干预对利比里亚的政治和社会都发生深远的影响。首先，由于这种干预使利比里亚人分裂成为亲英国派和亲美国派，[90] 他们于1909年1月在蒙罗维亚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巴克利的示威游行和拥护巴克利的示威游行。[91] 此外，高薪聘用欧洲人推行列强所要求的改革也使得本来就已亏空的利比里亚政府的收入陷入极度的紧张状态之中。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干预，多亏1909年后美国常驻蒙罗维亚公使欧内斯特·莱昂的活动，他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完全同情利比里亚及其领导人急于得到美国支持的心情，否则，利比里亚无疑地将会沦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牺牲品。

埃塞俄比亚任何时候都未曾遭受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如此持久的干预。相反，正当利比里亚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之下的这段时期里，埃塞俄比亚由于阿杜瓦战役的胜利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而在国际礼遇中多少被当作一个平等的国家。鉴于部分地由于本国经济薄弱和欧洲人对其内部事务的积极干预造成了利比里亚军事上的软弱，尤其是造成了本国内部的混乱，令人惊奇的事实不在于利比里亚痛苦地和贫弱地幸存下来，而在于她毕竟幸存了下来。

（吴期扬译）

---

[89] 《利比里亚信件》，15，丹尼斯致科平杰，蒙罗维亚，1870年9月；《陈列室》LVIII，1882年7月，第90-91、123-125页；《公报》，1897年2月10日，第51-54页。

[90] 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DUSM 405/238，《莱昂致国务卿》，蒙罗维亚，1908年8月14日；伦敦。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国务院关于利比里亚内部事务的记录》，(RDSL)，1909-1929年，《里德(Reid)致国务卿》，伦敦，1909年2月14日。

[91] 政府档案处(PRO) FO 369/596，沃利斯(Wallis)致格雷(Grey)，蒙罗维亚，1909年3月11日。

12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M. 克劳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欧洲列强之间的一场争吵。非洲也直接和间接地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因为冲突开始时非洲的大部分都在欧洲交战双方国家的统治之下。有几场战役在非洲土地上进行，虽然这些战役并不足以影响这场世界战争的整个进程，可是对非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百万以上的非洲士兵卷入了在非洲或者在欧洲进行的战争。人数更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征充当搬伕(往往是强制性的)，帮助军队搬运给养，因为这些军事给养无法依靠公路、铁路和牲畜等常规的方式来运送。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和搬伕超过 15 万人。受伤和致残的人则远远超过此数。到战争结束之时，除了西班牙所属的一些小块领地仍然保持中立之外，所有非洲国家都加入了交战的这一方或者那一方。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在非洲的行政当局联合一致——多少是主动地——反对德国殖民地。(见插图 2.1)。甚至非洲大陆上一直保持独立的国家——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和达尔富尔也都纷纷地卷入战争。当 1917 年美国参战时，利比里亚宣布加入协约国的一方，亲穆斯林的埃塞俄比亚年幼皇帝埃雅苏公子宣布他的国家效忠于土耳其，从而引起协约国的严重不安，担心他会号召非洲之角的穆斯林进行圣战，因为在这个地区，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的军队仍在给英国制造麻烦。于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急忙向柏培拉、吉布提和马萨瓦挺进。但是这种干预是多此一举，因为惊恐的埃塞俄比亚基督徒贵族们在 1916 年 9 月把这个年幼皇帝推翻了。同样，名义上臣服于英埃苏丹而实际上保持独立的达尔富尔的阿里·迪纳尔素丹也起而响应土耳其的圣战号召，袭击法属乍得，进逼英属博尔努(北部尼日利亚)，并且策划在科尔多凡(苏丹)鼓动叛乱。但在1916年2月之前，他就战败身亡，于是达尔富尔全盘并入苏丹。 283

不论直接卷入战争与否，几乎每个非洲领地都由于德国人被挤出非洲贸易和由于海运舱位的稀少而造成战时进口物资的短缺，或者从好的角度讲，由于战略资源需求的突然猛增而大受影响。 284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人在非洲进行的几次战役① 以及随之发生的在获胜

① 关于多哥和喀麦隆战役，参阅F. J. 莫伯利（Moberly）编，1931 年；关于德属西南非洲战役，参阅《南非联邦》，1924 年；W. K. 汉考克（Hancock），1962 年，第 394-400 页；关于德属东非战役，参阅R. C. 霍登(Hordern)，1941 年，第 1 卷；关于德国的观点，参阅P. E. 冯·莱托-福尔贝克(von Lettow-Vorbeck)，未注明日期。在L. 莫斯利（Mosley），1963 年的著作中关于这次战役的复杂性有极为透彻的概要论述。

协约国之间重新分配德国的领地② ——瓜分非洲的最后篇章，都已写有大量著作。对比之下，关于这场战争对于非洲人的影响以及欧洲征服者战争前后强加给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情况，人们所写著作却要少得多。③ 欧洲行政管理人员的大批离去，白人征服者之间的相互残杀，他们对新近被征服的非洲人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残酷榨取，以及非洲人不时掀起范围广泛的反抗(虽然不总是直接或间接由于这场战争而引起的)，对所有上述种种，这些脆弱的行政管理机构能够经受到何种程度呢？让非洲人卷入欧洲人的战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本章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些内容广泛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这次战争对于非洲所产生的意义，简略地叙述一下各次军事战役的情况也还是十分必要的。

在非洲土地上进行的战争

欧战正式爆发后，在非洲的直接影响便是协约国对德国殖民地发动进攻。交战的双方都没有准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战事。确实出现过短时间的希望，认为撒哈拉以南可以免于战祸。多哥总督德林曾向其邻国英属黄金海岸（今加纳）和法属达荷美（今贝宁）建议应让多哥实行中立，以免让他们所统治的非洲居民目睹欧洲人互相残杀的情景。④ 在德属东非（今坦桑尼亚），总督施内博士有意避免冲突，以便使他生气勃勃的开发计划得以继续执行。战争正式爆发以后不久，英国人对达累斯萨拉姆进行炮击时，他甚至签署了一份短命的停战协议书，想使德属东非成为中立地区。⑤ 1885 年柏林协定的条款包含有传统刚果盆地中立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因此产生乐观情绪，认为这样就可以使非洲中部和东部免于战乱。⑥

285

但是，主张把德国在非洲的属地拖入战争的势力越来越急不可待了。在英国看来，它掌撒海上优势，帝国防务委员会制定的战略就是把战争扩展到敌方的殖民地。为了保持海上优势，必须使德国在非洲的通讯系统和主要港口全部瘫痪。对于协约国来说，在德国的殖民地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可以使这些属地成为战利品由胜利者分享。南非的军队总司令路易斯·博塔将军和国防部长J. C. 史末资正是主要考虑这些方面，因此即使面临阿非利堪人中不妥协分子的反对，仍然决定把南非军队投入协约国一边并向德属

② 特别参阅G. L. 比尔（Beer），1923 年；和W. R. 路易斯（Louis），1963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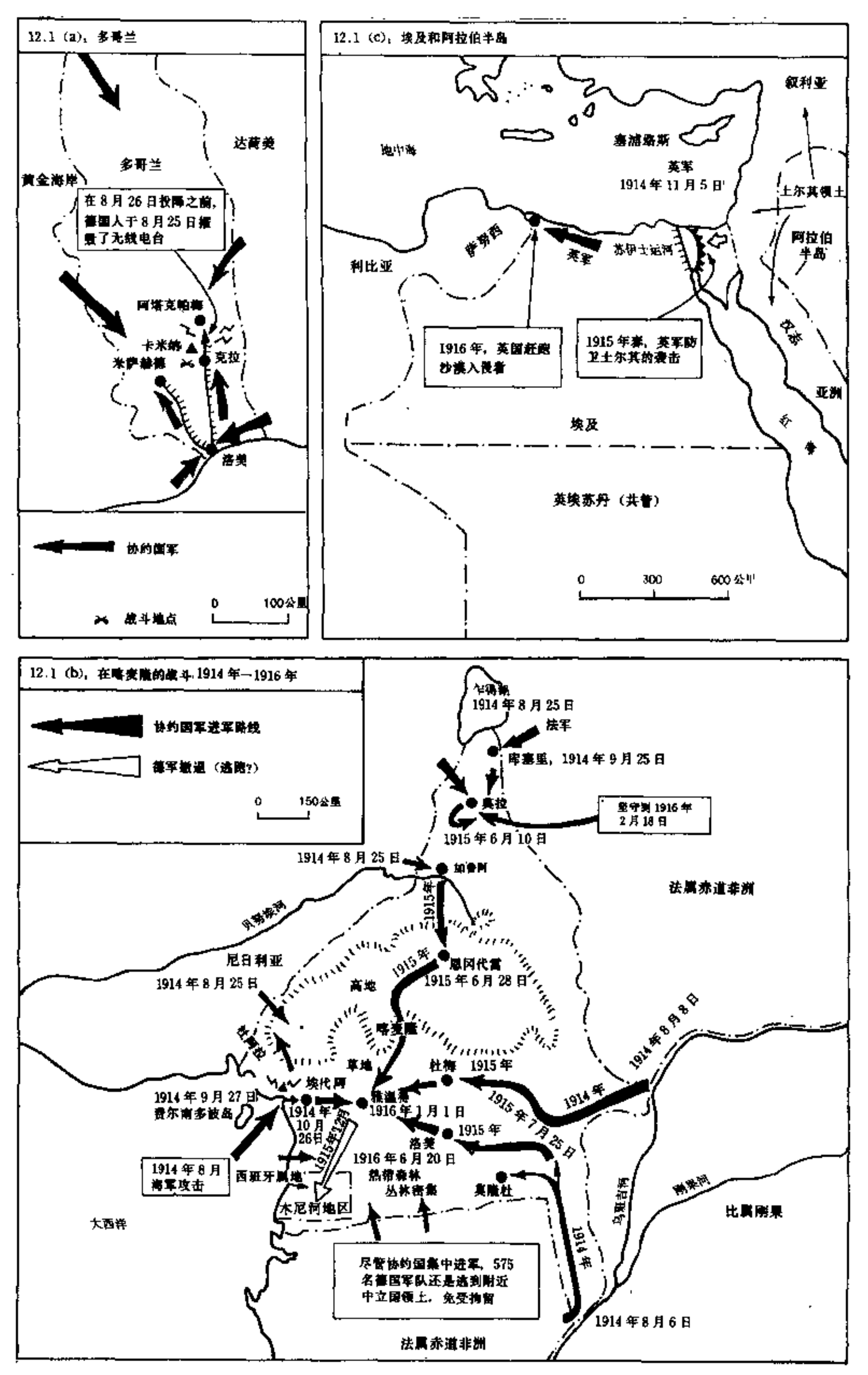
② 有许多论述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博士论文迄今仍未见发表，但可参阅 J. 奥森托肯（Osuntokun）1978 年的著作。自从 1977 年撰写本章以后，《非洲历史学报》出版了 1978 年第 19 卷，专载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方面的文章，主要是论述这次大战对非洲人的影响，从而可参阅这本重要的专题论文集中提出的某些观点。

④ R. 科尼文（Cornevin），1962 年，第 208 页。

⑤ P. E. 冯·莱托-福尔贝克，未注明日期，第 27-28 页。也可参阅 W. R. 路易斯，1963 b，第 209 页，引用H. 施内（Schnee），1919 年，第 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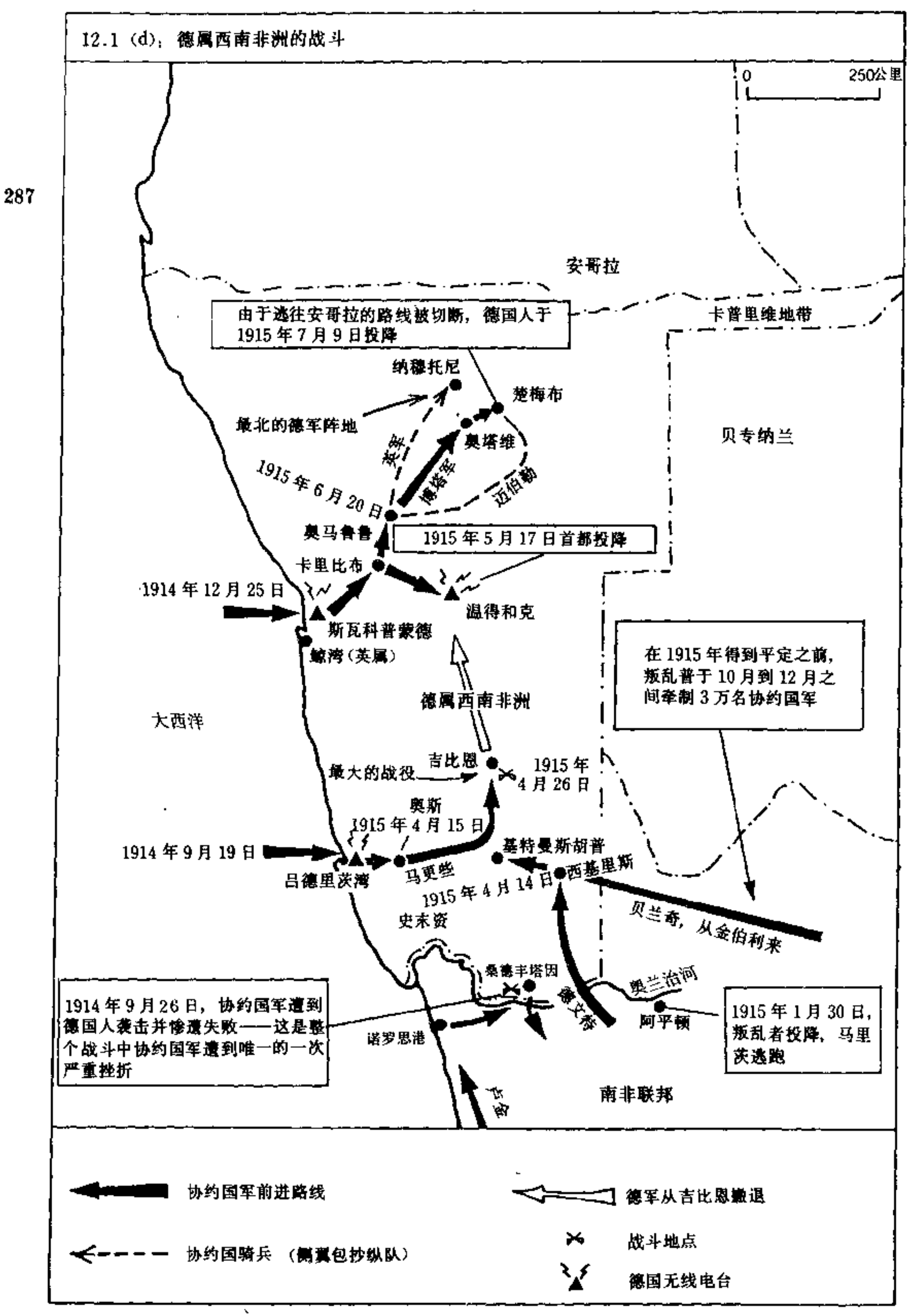
⑥ 关于刚果盆地中立对于德属和英属东非的意义的简短讨论，可参看W. R. 路易斯，1963 b，第 209-210 页。

插图 12.1(a)-(c)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非洲进行的战役(根据A. 班克斯，197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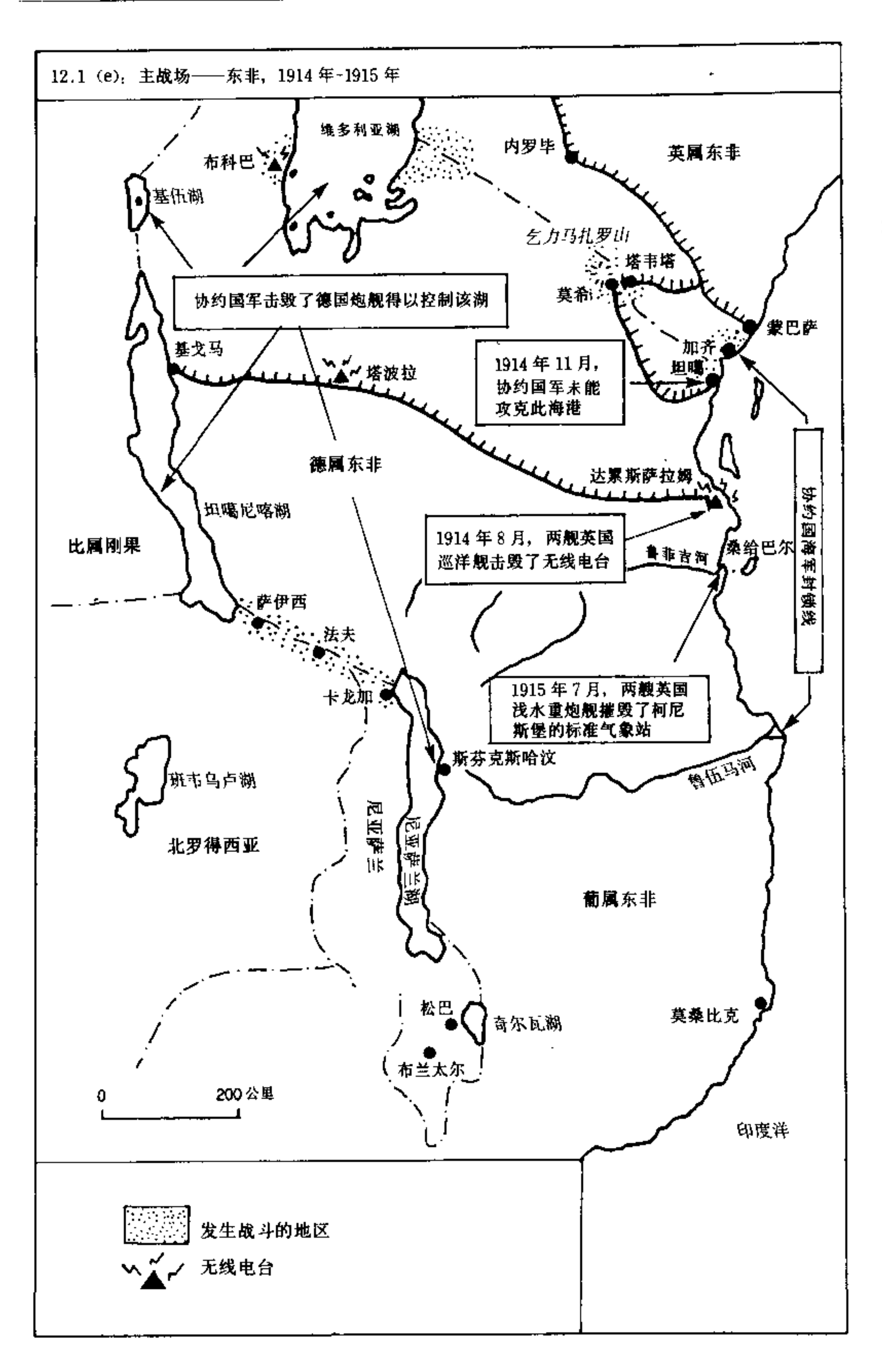


286

287


12.1 (d)：德属西南非洲的战斗
0 250公里
安哥拉
由于逃往安哥拉的路线被切断，德国人于1915年7月9日投降
卡普里维地带
纳穆托尼
楚梅布
最北的德军阵地
奥塔维
贝专纳兰
英军
博塔军
迈伯勒
1915年6月20日
奥马鲁鲁
1915年5月17日首都投降
卡里比布
1914年12月25日
温得和克
斯瓦科普蒙德
鲸湾（英属）
在1915年得到平定之前，叛乱普于10月到12月之间牵制3万名协约国军
德属西南非洲
大西洋
吉比恩
最大的战役
1915年4月26日
奥斯
1915年4月15日
基特曼斯胡普
1914年9月19日
吕德里茨湾
马更些
1915年4月14日
西基里斯
贝兰奇，从金伯利来
史末资
桑德丰塔因
奥兰治河
1914年9月26日，协约国军遭到德国人袭击并惨遭失败——这是整个战斗中协约国军遭到唯一的一次严重挫折
诺罗思港
阿平顿
1915年1月30日，叛乱者投降，马里茨逃跑
南非联邦
协约国军前进路线
德军从吉比恩撤退
战斗地点
协约国骑兵（侧翼包抄纵队）
德国无线电台

288



12.1 (e)：主战场——东非，1914 年-1915 年
维多利亚湖
布科巴
内罗毕
英属东非
基伍湖
乞力马扎罗山
塔韦塔
莫希
蒙巴萨
协约国军击毁了德国炮舰得以控制该湖
加齐
基戈马
塔波拉
坦噶
1914 年 11 月，协约国军未能攻克此海港
德属东非
达累斯萨拉姆
坦噶尼喀湖
1914 年 8 月，两舰英国巡洋舰击毁了无线电台
鲁菲吉河
桑给巴尔
协约国海军封锁线
比属刚果
萨伊西
法夫
卡龙加
1915 年 7 月，两艘英国浅水重炮舰摧毁了柯尼斯堡的标准气象站
斯芬克斯哈汶
鲁伍马河
班韦乌卢湖
尼亚萨兰
尼亚萨兰湖
北罗得西亚
葡属东非
松巴
奇尔瓦湖
莫桑比克
布兰太尔
0
200 公里
印度洋
发生战斗的地区
无线电台

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发动进攻，随后又参加了东非的战役。[7]博塔和史末资不仅把西南非洲看成南非未来的第五个省而垂涎三尺，而且企图通过协助英国在德属东非获胜，从而可以把被征服的一部分德国属地给予葡萄牙，以换取德拉瓜湾（德兰士瓦的天然良港）归属南非。[8]从英国的角度讲，西南非洲归属南非的前景可以保证南非参战并保持忠诚。[9]从法国的角度讲，对喀麦隆的侵占可以收复其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后忍痛割让给德国的领土（见插图12.1b）。甚至比利时（它曾根据柏林协定第10款宣布刚果——今扎伊尔——实行永久中立），一旦其自身的中立地位被德国人破坏，就积极加入对德属非洲领地的进攻，希望自己的有效参战能使自己在最后和平解决时享有讨价还价的地位。[10]

由于协约国占有海上优势并且德国殖民军队在数量上也少得多，德国殖民地难以防守得住。初期的乐观想法是预期德国在欧洲迅速取胜，从而避免其所属殖民地直接卷入战乱，甚至还可以实现将喀麦隆和德属东非连接起来的自西至东横贯非洲的野心，并且289 一劳永逸地挫败英国久已渴望的从好望角到开罗自南至北纵贯非洲的想法。[11]一旦明白无法取得速胜，德国又觉察到在非洲拖延战争可以把协约国的殖民地军队紧紧地牵制住而使其无法调往欧洲前线。德军东非司令P. E. 冯·莱托-福尔贝克将军就是出色地执行了这一战略，他在战争期间同协约国联军——一度10倍于他的兵力——不停地周旋（见插图12.1e）。

非洲的战事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只持续了很短的几周。协约国意图击溃德国的攻击力量，并保证德国海军不能利用其在非洲占有的港口。这样，多哥的洛美、喀麦隆的杜阿拉、西南非洲的斯瓦科普蒙德和吕德里茨湾在战争爆发后很快就被协约国军攻占。在德属东非，英国巡洋舰于8月份炮击达累斯萨拉姆和坦噶，虽然这两处港口直到战争后期才被攻克，但是德国军舰却不能加以利用。在埃及，当土耳其加入德国一边参战时，英国加强了苏伊士运河的防务。1915年2月一支土耳其的远征军被击退。自此之后，埃及遂成为英国对土耳其及其中东诸省进行作战的主要基地，并在随后的30年中成为大不列颠力量在非洲和中东的支撑点。

非洲第一阶段诸战役对全球战略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阶段的战事，除了从埃及发动的反对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之外，对于这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意义都不大。尽管协约国决定征服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这些殖民地被当作基地用以颠覆协约国的脆弱的殖民政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旦协约国获得全面胜利能够把这些殖民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分享。因此，南非政府一旦平定了得到西南非洲德国人支持的阿非利堪人的叛乱，便立即发动对西南非洲的入侵，只用了6个月时间便完成了。西南非洲战役是唯一没有非洲人军队参预的战役（见插图12.1d），因为南非联邦将军不愿武装在他们统治下

[7] D. 德农（Denoon），1972年，第121页。
[8] R. 海厄姆（Hyam），1972年，第28页。
[9] 同上，第26页。
[10] W. R. 路易斯，1963b，第19章。
[11] 关于一旦取得战争胜利，德国将建立一个自东至西横贯非洲的殖民地的论点，参阅F. 费希尔（Fischer），1967年，第102-103页和第596页的地图。



图片 12.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非德军总司令伯爵冯·莱托-福尔贝克将军（右起第二人）及其同僚

的非洲民众，与此同时，德国人在残酷镇压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起义后也不敢武装非洲民众。

291 旷日持久的喀麦隆战役基本上是由非洲人军队进行战斗（见插图12.1b）。尽管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仍花费了15个月以上的时间才完全攻占这块领地。

在东非，P.E.冯·莱托-福尔贝克鉴于不可能打败数量上10倍于己方的军队，于是他决定尽力依靠游击战术，以求至少可以将对方军队牵制住，越久越好。[12]直到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仍未战败，而是带领他那疲乏不堪的队伍通过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进入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在那里他得悉欧洲已经停战媾和。根据保守的估计，被冯·莱托-福尔贝克不到1.5万人军队拖住的协约国军约有16万人。如同在喀麦隆一样，非洲人组成的部队对于双方都很重要，他们中许多人作战勇敢，而且证明较之百病丛生的白人南非军更有战斗力。有时候，尼日利亚步兵每天的口粮只有半磅大米，根本没有别的可吃。[13]搬伕的境遇更是异常艰苦，估计至少有4.5万人在战争中死于病病。[14]

欧洲人的大批撤离

战争使得大量欧洲行政管理人员和商人从协约国所属非洲殖民地纷纷撤离。他们有的奔赴西线，有的志愿加入本地的军团而转战于非洲各地，在某些欧洲人原来就比较稀少的地方，白人减少达一半以上。在北部尼日利亚，许多政治官员都是从军队调来的，他们得应召回归自己原来的军团，与此同时，别的官员又志愿应征入伍，从而造成北部尼日利亚的官员走散一空。[15]某些县，例如博尔古，在战争的大多数年份里，甚至一个欧洲人官员都没有。[16]在北罗得西亚，多达40%的欧洲成年人都在服现役。[17]在法属黑非洲，适龄的欧洲人实行了总动员；而在英属东非，欧洲人都要进行登记为战争服务。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到处纷纷谣传白人将一去不复返。[18]在摩洛哥，总督路易·利奥泰必须把他的军队大批撤至欧洲战线，于是德国战俘被用来从事公共工程，以便使摩洛哥人相信法国正在赢得战争的胜利。[19]

292 这种大批撤离的结果是欧洲人担任的许多重要工作即使没有完全停顿，也是效率大

---

[12] 英国《官方历史》评论说，P.E.冯·莱托-福尔贝克成功地牵制了比南非战争中罗伯茨勋爵全部兵力还要大得多的一支军队达4年之久。

[13] W.D.唐斯（Downes），1919年，第90页。

[14] L.莫斯利，1963年，第234页。

[15] A.M.菲卡（Fika），1978年。

[16] 参阅M.克劳德（Crowder），1973年。

[17] L.H.甘恩（Gann），1964年，第163页。

[18] 在尼日利亚，英国殖民当局报告说，各种"小的起义都是由于战争和政府撤离的谣言引起的"，见《尼日利亚1915年年度报告书》，1917年，第23页。

[19] R.比德韦尔（Bidwell），1973年，第23页。

减。在某些场合，例如在塞内加尔，非洲人受到专门训练，以填补上述情况产生的空缺。[20]在英属西非，有些一直为白人把持的工作也由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来充任，正如理查德·拉思伯恩指出的，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非洲上层人士在战争中能够保持忠诚。[21]在法属西非，总督抱怨说，在他们的殖民地里，英国人不受总动员令的管辖，他们利用法国商业机构人员开往前线的有利时机，填补了由此形成的贸易真空。[22]只有在埃及，自从英国军队大量涌入，并利用埃及作为协约国军在中东发动进攻的基地，欧洲人的人数增加了。

从非洲人的观点看，白人之间互相残杀的景象远比欧洲人的大批撤离给他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是白人在殖民占领期间从未干过的一件事。特别使非洲人吃惊的是白人竟鼓励穿军服的非洲臣民去屠杀"敌对的"白人。原来，所有白人一向都属于单凭其肤色即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种族，对这个种族的污辱从来都要招来最残酷的惩罚。[23]

非洲人卷入战争

除了德属西南非洲的战事之外，协约国之所以能在非洲战争中获得胜利，主要原因在于有非洲人军队参战。在大战期间，非洲人军队不仅用来在非洲本土进行战斗，而且用来增援西方战线和中东的欧洲军队。此外，他们还是镇压各种反抗殖民政权叛乱的重要工具，正如他们在欧洲人征服非洲时所起的作用一样。

大战期间征集的非洲人军队总数超过100万，主要用来充实殖民政权原有的通常规模不大的军事力量。在大战爆发时，只有法国在其各个非洲殖民地驻有大量部队。虽然德国后来被指责在其殖民地推行武装化，但实际上只有对法国才可以准确无误地作此指责。除了军队以外，还征集了大量搬运伕，每个作战的士兵就需要大约3个搬运伕的支援。此外，北非人还被征集到工厂的工作台上劳动，以替代应征参军的法国人。后来大量阿尔及利亚劳工自愿移民到法国就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卷入某种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的非洲人总共达到250万人，远远超过非洲大陆人口总数的1%。 293

战斗人员和搬运服役人员的征集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在纯自愿的基础上，非洲人大量提供服务而毋需任何外界压力。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线的战争初期阶段情况就是如此，大量埃及贫苦农民为了获得比较令人羡慕的工资而自愿服务。毫无疑问，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有不少志愿当兵者，他们都确切了解应募入伍需要承担些什么。如果宗主国法国能保证他们享有公民地位的话，塞内加尔4个自治市镇内的塞内加尔公民都乐于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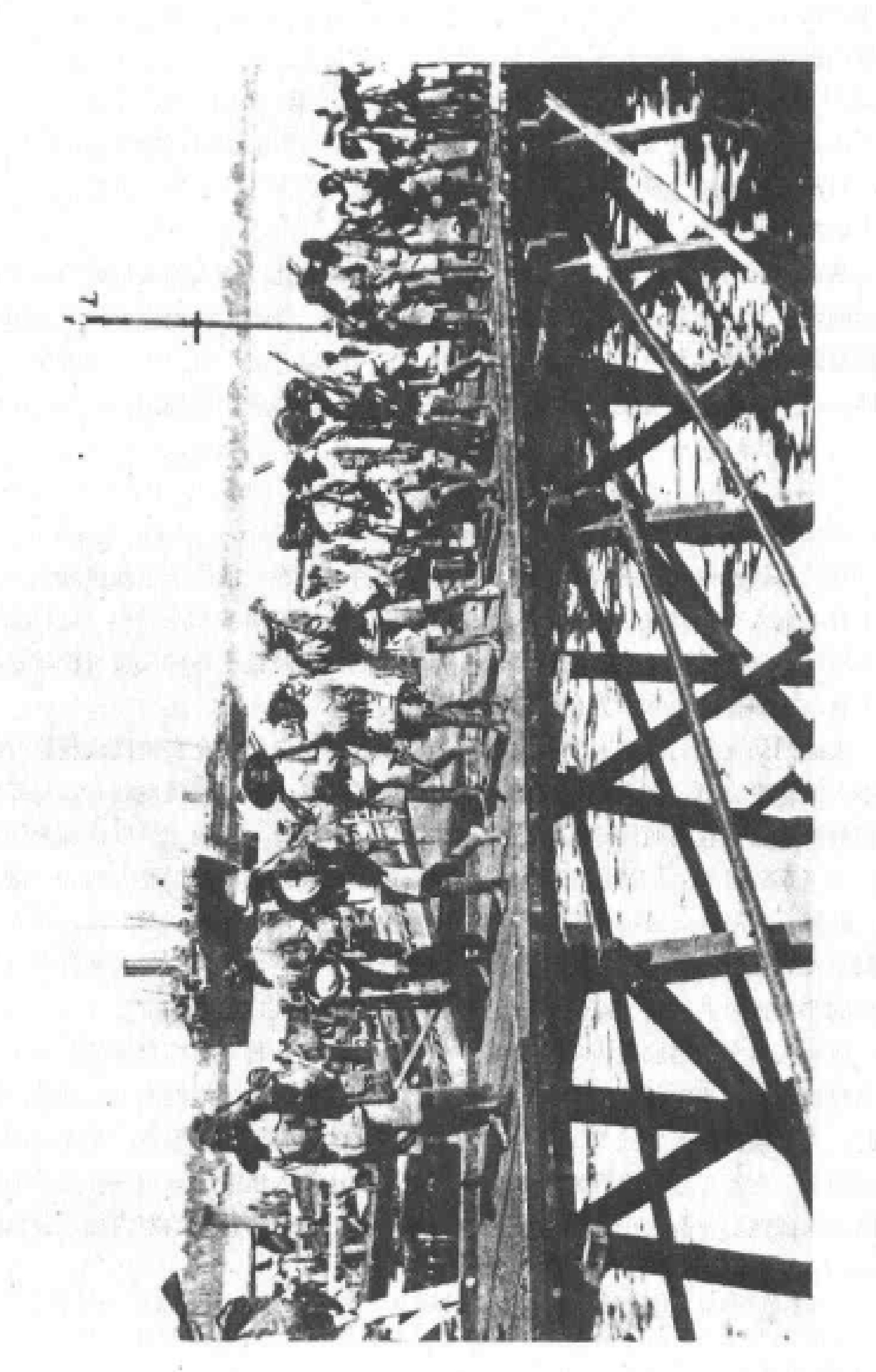
[20] 法属西非政府于1916年发表的有关培养和整顿土著干部的文件：《有关培养土著干部人员的通报》，达喀尔，1916年10月1日发表，第3-4页；《有关整顿法属西非土著代理干部的通报》，达喀尔，1916年10月1日发表，第27-28页。

[21] R. 拉思伯恩（Rathbone），1978年，第6页。

[22] 塞内加尔档案，达喀尔，系列D，卷号4 D 73，《招募土著士兵（1918年）》。殖民地部长和作战部长的报告和函件《恢复招兵：迪阿格内（Diagne）的使命》。《1917-1918年：招兵计划》。

[23]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Lugard）勋爵致其妻子的信，日期为1918年6月19日。M. 佩勒姆（Perham），1960 b，第549页曾加引用。

294



图片 12.2 德属东非战役——1917年12月，尼日利亚旅的士兵在林迪登陆

担宗主国法国人应尽的服义务兵役的义务。为此目的，塞内加尔议员布莱塞·迪阿格内促使议会在1916年9月29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写明：“正如1915年10月15日通过的法律所明确规定，塞内加尔实施‘同化’政策的自治市镇的土著人现在是、以后也将是法兰西公民。”在马达加斯加，4.5万名被征入法军的人都被说成是志愿参军的，[24]但大部分非洲人新兵都是违反自己的意愿被送入各种军队的、他们不是作为被强迫的“志愿兵”就是作为被征的士兵。

许多次征兵都是通过酋长进行的，酋长希望提供的人数能够达到政治官员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在有些地区，酋长不难获得一些真正的志愿参军者，但在另外一些地区，人们是被酋长强迫作为志愿兵送交给政治官员的。在北罗得西亚，战后许多酋长之所以不得人心就是由于他们在战时参与了士兵和搬伕的征集工作。[25]

可是，大量士兵和搬伕都是正式征集来的。在法属黑非洲，旨在建立一支黑人常备部队的1912年法令规定所有20岁至28岁的非洲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4年。其目的就是用黑人军队来取代在阿尔及利亚的警备部队，以便后者在战争发生突变的时刻能够开赴欧洲战场发挥作用。曼金将军写道：如果这场战争延长的话，“我们的非洲人部队将构成一支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后备军，这种后备军源泉是我们的对手所无法得到的。”大战爆发后，单是西非就有14785名非洲人军队，1915—1916年的征兵运动中还决定再征集5万名非洲人。这样一来在法属非洲开始了一种活动，昂古尔旺总督称之为“一场 295 真正的对人的搜捕”[26]。近年来又被纪德·奥森托肯描述为一种新的奴隶贸易。[27]酋长每人滩派到一定数额必须完成的征集男子人数定额，为了使他们的亲近下属或亲属逃避服兵役，他们搜捕异乡人和过去的奴隶。由于非洲人的出生年月都未曾登记注册，许多已超过和不够服兵役年龄的人也被征入伍。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文读到的，征兵运动激起广泛的叛乱，而一个地区一旦发生暴乱也就无法再征集新兵。法国政府由于渴望征集更多的男人，并且非常希望一个有名望的非洲人能够取得法国人在这方面无法获得的成功，遂于1918年决定任命布莱塞·迪阿格内担任征集黑人军队的高级专员。确定的征集目标为4万人，实际上他征集到63,378人，但其中很少人到过前线，因为1918年11月战争就结束了。

根据1915年义务兵役法的规定，英属东非采用强制办法征募士兵和搬伕，所有18岁到45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这项法令于1917年4月扩展到乌干达保护国。在北罗得西亚所有地方实行强迫征伕意味着这块领地1/3以上的成年男子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都被投入了搬运劳役。[28]1917年以后，由于叙利亚前线的严重需要，埃及的英属保护国政府被迫实施征兵和征用牲口的办法，而将早已许诺的由政府承受全部战争负担的诺言置之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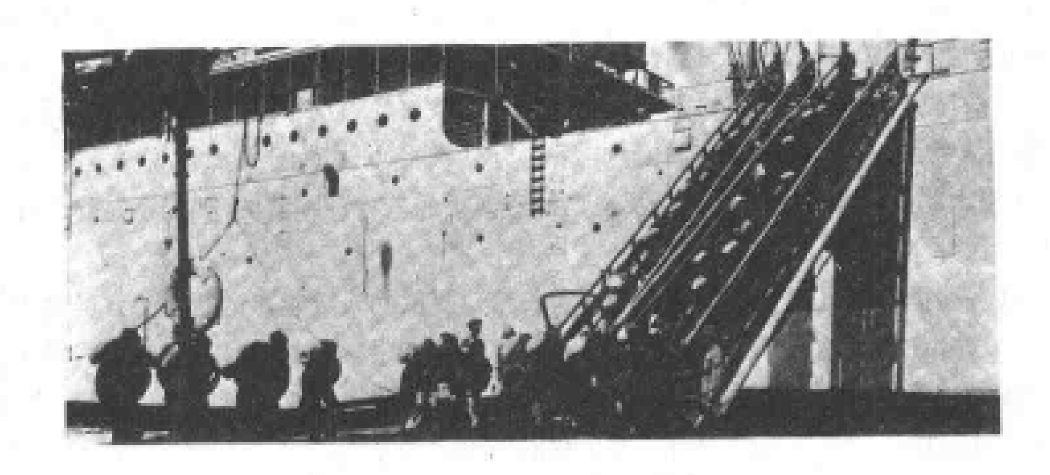
[24] H.德尚（Deschamps），1962年；G.S.夏皮（Chapus），1961年。

[25] L.H.甘恩，1964年，第1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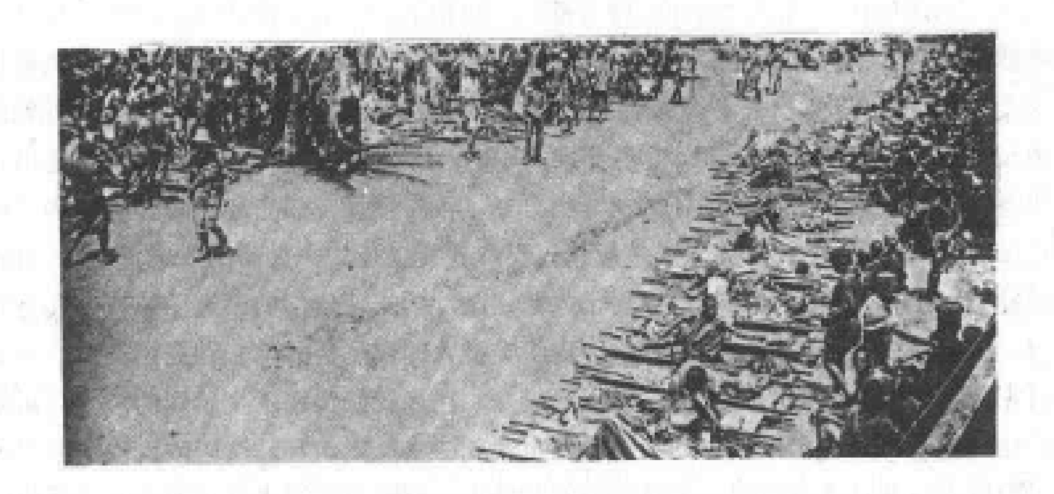
[26] 塞内加尔档案，达喀尔，系列D，卷号4D45，《科特迪瓦副总督致法属西非总督的报告》，1915年12月18日。

[27] J.奥森托肯，197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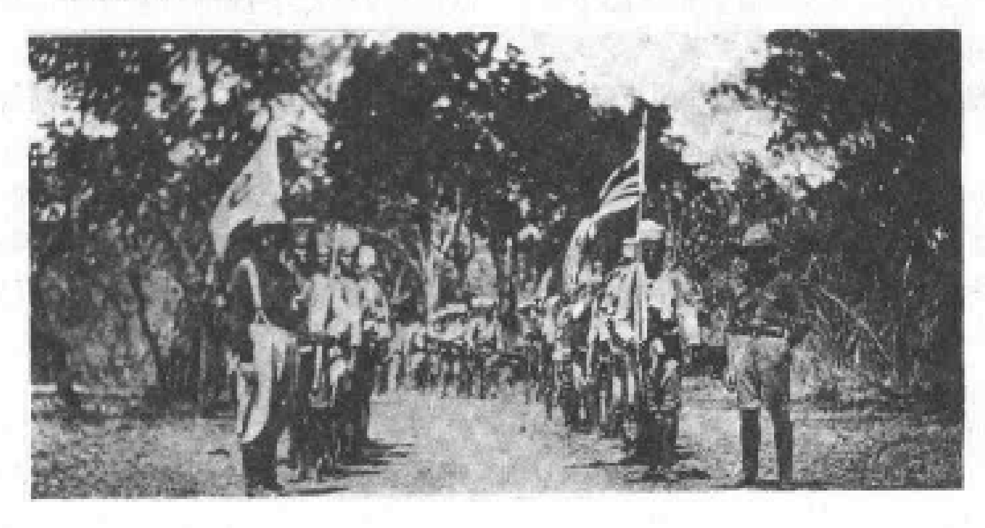
[28] R.霍尔（Hall），1965年，第102页。



296 图片 12.3 埃及劳动队上船去海外服役，此劳动队在埃及、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萨洛尼卡服役



图片 12.4 德属东非战役——1917 年 10 月 15-19 日马希瓦战役之后，人们正准备把尼日利亚旅的伤员从尼扬加运走



图片 12.5 德属东非战役——1918 年 1 月德国军队越过鲁伍马河之后，在恩达恩达的比利时非洲人部队正在向沿海地带进军的途中

顾。当村长把他们的仇人押进征兵代理人的怀抱或把牲畜带进贪得无厌的叙利亚商队时，他们实际上是报了宿怨。㉙在仍处于被征服的铁蹄下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致摩洛哥，殖民统治下的属民也被迫参战。在整个大战期间，估计有48.3万名来自非洲各地的殖民地士兵在法国军队服役，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强迫征集入伍的。在东非战役中，比利时人在刚果强征的搬伕高达26万人。㉚仅是上述这些数字就足以令人吃惊，特别是在欧洲人完成征服没有多久就出现这种情况。甚至奴隶贸易达到高潮时也未能抵得上上述任何一年的数字的1/10。

战争直接促成非洲大量人员的伤亡，在同一个时候，战争又促成1918-1919年非洲流行性感冒大爆发，使得无数人间接死亡。这场传染病是通过军队的调动和搬伕返回家乡而广泛传播的。

非洲人向欧洲人的权威挑战

297

协约国所属的非洲殖民政权经不起自身后院的动乱，它们的权威——在不少地方，如科特迪瓦南部、利比亚的大部分地区、或者乌干达的卡拉莫贾，脆弱地建立起来还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却因其统治下的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和其他形式的抗议而遭到广泛的挑战。结果使得协约国不得不抽出宝贵的人力和物力来对付当地的叛乱，而这些军事资源又是非洲和西线同德国人作战所十分急需的。这些资源是如此之稀少，而在某些地区，如法属西非和利比亚，暴乱又是如此的广泛，以致在军队调来之前，欧洲人根本无法重新控制暴乱地区。由于缺乏军队，法国失去对上塞内加尔-尼日尔和达荷美大部分地区的控制长达一年之久。这样一来，法国遂无力对付达荷美的博尔古人在1916年发动的暴乱，因为邻近的部族——诸如阿塔科拉的松巴人、塞梅雷的皮拉皮拉人以及奥荷里人——也都发生暴乱。摩洛哥的当地征服者利奥泰对宗主国要他把手下7万军队的半数调到法国，并撤至大西洋海岸，深感担忧，唯恐这样会导致暴乱。虽然他不得不把士兵放走一些，但他并未撤退，而且设法避开了对他权威的挑战。事实上，法国在整个大战期间不得不在摩洛哥保持3.5万名军队。在葡属东非，德国人的入侵鼓舞了葡属领地人民乘机推翻他们所痛恨的统治者。㉛

在大战期间兴起的广泛暴乱和抗议运动，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并非所有暴乱都同大战本身直接有关。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在利比亚），所谓暴乱，实际上就是原有的反抗欧洲人占领的斗争的延续。在多数情况下，暴乱和抗议的动机是错综复杂的。毫无疑问，欧洲人大批撤离所暴露的白人权威明显减弱，这种表面化的想象极大地鼓舞了早已在意料之中的起义，正如欧洲人特别是英国军队的大量涌进，抑制了埃及的起义。

战时的起义贯穿着若干主题：恢复业已丧失的独立自主的意愿；对各种战时措施，特别是义务兵役和强迫劳动的愤恨；宗教反对战争，特别是泛伊斯兰教反对战争；由于

㉙ T. 利特尔（Little），1958年，第128页。
㉚ C. 扬（Young），1965年，第219页。
㉛ C. P. 芬德尔（Fendall），1921年，第120页；又见J. 达菲(Duffy)，1959年，第367页。

战争造成一系列经济困难所引起的反应；对殖民体制某些方面的不满，随着战争年代的进程人们更充分体会到这个体制许多方面的实质。最后还有一个主题，在南非特别重要，那就是协约国属地居民的亲德国人情绪。

298 人们希望恢复原来不受白人统治的生活，即恢复原状，这种愿望在法属达荷美的博尔加瓦人和奥荷里-伊吉人的起义和尼日利亚的奥韦里省伊格博人各个群体的起义中清楚地表达出来。[32] 在西非，要求摆脱白人统治的意愿也程度不同地贯穿在绝大多数反对法国当局的起义之中。在大战爆发前不久失去其半自治地位，肯定是促成南部尼日利亚埃格巴人1918年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埃及，大战后立即爆发的华夫脱党暴乱基本上是由于要求摆脱最近强加的英国保护国地位而激起的，这种地位在短短4年的战时寿命中已证明它对于民族主义者和埃及农民同样都是不可忍受的。在马达加斯加，500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于1915年底被逮捕并被指控为“组织一个严密的秘密社团，其目的是要赶走法国人和恢复马达加斯加政府。”[33]

在大战期间，协约国主要担心的是土耳其投入德国一方会鼓励它们统治下的穆斯林居民产生不同政见。尽管土耳其的圣战号召在非洲穆斯林居民中实际引起的反响远比协约国殖民当局所担心的要小得多，但它们仍然十分警惕其统治下的穆斯林出现不满情绪，并竭力向穆斯林酋长和领导人保证，协约国从不仇视伊斯兰教。在埃及实施戒严法令和监禁民族主义者的部分原因就是惧怕土耳其的圣战号召会在埃及人当中引起同情的响应。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北部尼日利亚，英国人对于那儿伊斯兰教宣传可能引起冲击是非常敏感的，但是索科托素丹国的素丹和埃米尔们同英国人之间已建立起来的利害一致保证了大部分北部尼日利亚穆斯林的忠诚。

利比亚的赛努西·苏菲兄弟会当时仍在抗击意大利对他们国土的占领。这个组织响应土耳其的圣战号召于1915年11月向埃及西部发动入侵，给英国人带来了好些紧张时刻。由于3/4的埃及守备部队倒向了他们一边，赛努西兄弟会的军队攻下了埃及的塞卢姆港，当时英国人则从海上逃走。接着赛努西兄弟会的军队又向西迪巴拉尼和马特鲁港挺进。在此之后，英国人掌握了主动并将赛努西信徒赶回了利比亚。[34] 尽管在埃及吃了败仗，兄弟会成员和其他利比亚人一道仍然在卡拉达比亚战役中使意大利人遭受决定性失败，这是1896年阿杜瓦战役以来意大利人遭受的最沉重的一次失败。接着他们又把意大利人赶到海边，而意大利不得不将其大部分军队转移到奥地利战线，到了1917年，意大利已接近于全部丧失利比亚。[35] 这些胜利导致1918年11月16日利比亚西部的里波黎共和国和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酋长国的创立。意大利于1919年承认了这两个国家并批准两国可以成立各自的议会。根据1920年的拉杰马条约，意大利又进一步授予这些国家更多的权利。1922年1月，这两个国家成立政治联邦，选举赛努西教团（赛努西雅）的领导人

299

㉜ 参阅J. 奥森托肯，1977年。

㉝ N. 赫塞尔廷（Heseltine），1971年，第158页。

㉞ 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9年，第127-128页。

㉟ N. 巴伯（Barbour）编，1959年；K.提利西（al-Tillisi），1973年，第25-26、46-47、274-275、405-410页；A. M. 巴伯（Barbar），1980年。

伊德里斯·赛努西作为联邦的元首，并建立一个中央委员会，总部设在盖尔扬。

利比亚的起义在突尼斯南部得到同情的反响；为了镇压突尼斯南部的叛乱，需要1.5万名法国军队。[36]起义也在法属尼日尔和乍得的塔瓦里克人和其他穆斯林中间得到反响。在那些地方，伊斯兰教对于异教徒统治的憎恨和1914年的旱灾以及过于频繁的征兵业已激起严重不满。1916年12月，赛努西的军队侵入尼日尔，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塔尔基·塔瓦里克族的领袖考森和奥利明登·塔瓦里克族的酋长菲尔洪与阿加德兹素丹的支持。他们攻占了阿加德兹；为了击败他们，英国和法国非得组织一支联军不可。[37]

不仅伊斯兰教的起义给协约国的殖民地政权带来威胁。1915年1月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爆发约翰·奇伦布韦的起义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而罗得西亚的"基塔瓦拉守望塔运动"则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并号召不服从合法当局。他们利用了P. E. 冯·莱托-福尔贝克在大战末期对北罗得西亚入侵所造成的混乱。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加里克·布雷德（又称以利亚第二）领导的广泛运动也有类似的启示，宣扬英国殖民政府即将灭亡。在科特迪瓦，先知哈里斯于1914年12月被驱逐出国，因为"欧洲事态的发展比昔日更加需要在殖民地人民中间保持平衡。"[38]在肯尼亚，在尼安萨，战争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蒙博崇拜排斥基督教，并且宣称："所有欧洲人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从我们国家消失的时刻将很快到来。"[39]

触发起义的最重要因素恐怕是强迫征集男人入伍当兵和充当搬伕。对于强迫征集是如此的痛恨，以致于法属西非的几乎所有起义都是由此而引起的，强迫征集还在不然就很平静的黄金海岸殖民地激起了反抗。[40] **300**

约翰·奇伦布韦起义是由于征召尼亚萨人和对德作战开始几周他们遭受大量死亡而促成的。在奇伦布韦1914年11月26日致《尼亚萨兰时报》这一值得纪念和经过检查的信中，他抗议道："我们懂得我们被要求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洒出我们无辜的鲜血。……我们遭受的欺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要严重得多"。[41]

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肯定会酝酿甚至会激起对殖民当局的反抗。在尼日利亚的中西部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带，除非考虑到棕榈产品的跌价，以及作为这类产品主顾的德国人被排斥而造成贸易下降这样的来龙去脉，人们就无法理解大战初期为什么会爆发起义。[42]事实上，协约国领地居民的亲德情绪大部分出自德国人是非洲许多地区的贸易商这一实际情况；而且德国人被协约国排斥又是同战争第一年出现的经济萧条联系在一起的。

在南非，阿非利堪人于1914年掀起反对政府决定支持协约国的叛乱就是由于其亲德

---

[36] D. L. 林（Ling），1967年。

[37] 参阅A. 萨利福（Salifou），1973年；J. 奥森托肯，1975年。

[38] 科特迪瓦副总督1914年12月16日给省行政官员的机密备忘录，G. M. 哈利伯顿（Haliburton），1971年，第139页引用。

[39] B. A. 奥戈特（Ogot）在他1974年主编的著作中第264页引用。关于本节提到的起义的详尽情况，可参阅本书第20、26、27和29章。

[40] 参阅D. 基林格雷（Killingray），1978年，第46页；R. G. 托马斯（Thomas），1975年。

[41] R. I. 罗特伯格（Rotberg），1965年，第82页引用。

[42] J.奥森托肯，1977年。

情绪和对英国人的仇恨这两方面的原因。德国人自己也竭其所能在协约国的非洲属民当中挑起不满。沿着东北部尼日利亚边境和利比亚，他们特别显得活跃。在乌干达，大战爆发后不久，基盖齐大酋长尼英多在其异父兄弟卢旺达的姆瓦米的说服下，为了德国人，发动反对英国人的起义。[43]

在许多场合(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尼日利亚)，战争时期爆发的起义往往并非直接由于某项特定的战时措施所引起。这类起义多数是矛头指向殖民统治的某个可恶特征，如征税。1916 年在约鲁巴兰首次实行征税，再加上按照“间接统治”政策赋予传统的统治者更大权力，从而激起了伊塞因地方的起义。[44] 在法属西非，“土著人法”（一种带有一种歧视性的司法法令）的强行实施、行政边界的重新划定以及对酋长的镇压或对失去传统权势酋长的勒索等等，都是法属西非联邦所属各殖民地爆发起义的主要触发原因。

这类起义，不论其原因如何，均被殖民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叛乱者”都被强征入伍，遭到鞭挞，甚或被当众绞死。酋长则被流放或被囚禁，村庄被夷为平地，以作为警告。但是并非所有抗议行动都具有暴力性质。许多人企图通过移居出境或用其他逃避方式来摆脱其痛苦的根源。这样一来，在塞内加尔、几内亚、上塞内加尔-尼日尔和科特迪瓦诸法属领地，居民大量向邻近英属领地移民，A. I. 阿西瓦朱将这种移民称之为“抗议性移民”。[45] 为了逃避征兵队，全村的男女都遁入丛林。青年人宁愿砍断自己的肢体也不愿到殖民军队去服役。抗议性移民达到如此巨大规模，以致造成法属西非的属民估计因此丧失了大约 6.2 万人。[46] 在桑给巴尔，男人成天到处躲藏，并在树上过夜，以免被强征去充当军队的搬伕。[47]

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后果

宣战给非洲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经济破坏。在一般情况下，随之而来的是非洲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同时因人们断定今后进口货物必将短缺，从而造成这类货物价格的上涨。在乌干达，一夜之间进口货就上涨了 50%。[48] 由于协约国把德国人从它们的领地排斥了出去，非洲同欧洲的贸易格局就发生了急剧变化，而在这些领地，有的地方例如塞拉利昂，过去进出口贸易中的 80%是同德国人进行的。德国本身拥有的非洲殖民地，甚至在被协约国占领之前同宗主国的贸易就已中断，因为各处海洋全在协约国控制之下。德国一度是热带非洲的主要海外贸易伙伴，现在几乎完全被排斥在非洲大陆贸易活动之外，因为只要协约国完成对德国殖民地的占领，那里全部德国人便都被拘留起来，他们的农场、商行和工业都由占领国加以接管。在法属非洲各领地，那里的法国花生加工工业迄

[43] W. R. 路易斯，1963 b，第 213 页。
[44] J. A. 阿坦达（Atanda），1969 年。
[45] A. I. 阿西瓦朱（Asiwaju），1976 b。
[46] M. 克劳德，见J. F. A. 阿贾伊（Ajayi）和M. 克劳德编，1974 年，第 506 页。
[47] H. M. 史密斯（Smith），1926 年，第 191 页。
[48] K. 英厄姆（Ingham），1958 年，第 191 页。

至当时总是收购由德国人进口的油料种籽，但是，由于这些工业全都座落在法国东北部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因此现在没法这样做了。法国原来一直是冈比亚花生作物的主要进口国，可是现在却被英国取代了，英国对冈比亚花生作物的进口份额已从1912年的4%上升到1916年的48%。[49] 实际上，德国商人几乎全是被英国人所取代，从这一点就差不多可以表明，在英国（同德国一样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看来，就非洲殖民地的角度说，世界大战是扩展经济的一个天赐良机。在通常情况下，被排挤的德国商人一般都是由统治该殖民地的国家的侨民来取代，这些侨民一般都是早已在当地经商的。在法属西非，由 302 于法国商人受战时动员的影响，英国人遂比法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更大。[50]

战争爆发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很快就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是加强协约国战争力量所必需的产品价格暴涨。埃及的棉花从1914年每公担3埃镑涨至1916-1918年的每公担8埃镑。[51] 但是增长的需求并不一定反映为价格的上涨，殖民地政府往往要控制付给生产者的价格。某些国家在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害十分严重。以黄金海岸为例，其主要出口作物可可的需求程度如与油料种籽相比，就差得很远。此外，以非洲为基地的进出口商行的收购能力，由于大量欧洲人员自愿或被迫参军服役，也遭到严重损害。在法属西非，到1917年，约有75%的欧洲商人由于战争而离去。[52]

由于实行价格控制，尽管出口商品的价格往往并不反映对该项出口商品的需求，尽管劳动力的需求也并不总是反映为增加工资，但凡是能够买得到的进口商品，在整个大战期间其价格都是上涨的。尽管大多数非洲人都处于自给自足经济，不受物价飞涨的影响，不过，以工资为生或者以生产出口农产品为主的人，却深受其害。埃及棉农发现他们从自己产品提价中所得到的利益抵销不了燃料、衣服和谷物等项费用的急剧上涨。[53]

战争期间，非洲殖民地经济受国家干预的程度逐步增加，国家干预的形式有：控制价格，征收粮食作物，强迫种植某种作物，为主要工程项目征集劳动力，还有分配航运舱位。一般来说，这些干预都是有利于统治该殖民地的殖民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商行的。在尼日利亚，诸如约翰·霍尔特公司、联合非洲公司之类大公司都成了收购代理商，并且在航运舱位和申请银行贷款这两方面获得优先地位，从而导致那些规模较小的进出口公司，特别是尼日利亚人掌握的公司遭受损失。[54]

传统的自给农产品，包括甘薯、木薯和豆类也被用来作为给养供应欧洲的协约国和供应非洲及中东前线的军队，由此使得自给经济以外的人们生活更加困难了。凡是自给农产品被征集（大量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按低于自由市场价格收购的地方，生产者本身也同样受损害。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到战争结束时，埃及农民已经陷入难以为生的地步， 303

---

[49] P. H. S. 哈顿（Hatton），1966年。

[50] M. 克劳德，见J. F. A. 阿贾伊和M. 克劳德编，1974年，第506页。

[51] G. 贝尔（Baer），1962年。

[52] M. 克劳德，见J. F. A. 阿贾伊和M. 克劳德编，1974年，第506页。

[53] M. Y. 扎伊德（Zayid），1965年，第76页。战争期间，全部生产急剧下降，参阅 P. 奥布赖恩（O'Brien），见P. M. 霍尔特（Holt）编，1968年，第188-190页。

[54] J. 奥森托肯，1978年。

一方面是由于物价飞涨，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谷物和牲畜被征用。[55] 在法属西非，要求成年男子去作战的需求同对他们所生产的高粱、小米和玉米等等的需求发生了矛盾。到1916年，法国出现难以克服的粮食危机，因为法国的主食小麦短缺达3000万公担；需要数是9000万公担，可是生产数却只有6000万公担。第二年，全世界都出现小麦短缺，法国本身的收成更是降低到只有4000万公担。[56] 换句话说，在这两年内，法国必须从国外寻求大量小麦或其他代用品。于是，离法国不远的北非就成了明显的补给来源，连征服时间还不长的摩洛哥也被列为法国粮食补给的来源，甚至连马达加斯加这样距离遥远的地方也被要求提供粮食。除了上述粮食需求之外，正在进行战争的领地的自给农民，特别在东非，还得遭受军队的勒索，军队由于给养成了问题，只好就地解决生活问题。

对军队和搬伕的需求，加上对增加出口的需求和对生产自给农产品的需求，造成战争期间非洲大陆许多地方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在北罗得西亚征集搬伕以支援东非战争，结果就切断了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加丹加传统的劳力来源。[57] 在刚果的比利时殖民当局为这个国家的矿业强迫征集劳工。大战末期流行于东非和中非的流行性感冒特别严重地侵袭了正在遣返中的搬伕，从而造成肯尼亚和罗得西亚劳动力更为严重的短缺。欧洲人员和非洲人员同样出现短缺；在南罗得西亚，白人铁路工人一直是雇主可以随意解雇的，原因是有顶替工可用。可是，现在这些铁路工人却处于如此优待的地位，以致过去遭到雇主和政府抵制的工会也可以建立起来。[58]

进口商品的短缺还导致生产下降，如在埃及，农业全靠进口的化肥、农具和灌溉机器维持；但是，这样也鼓励了某些国家发展进口代用工业，特别是在南非，本地产品的海外市场潜力只是在这时才被充分意识到。[59] 在比属刚果，由于与被占领的宗主国的关系中断，战争成了增强自给自足能力的重大促进因素，正如战争初期在德属东非出现的那样。大战期间，英军涌进埃及和2亿英镑注入埃及经济，成为埃及工业发展的一项重大推动力量。

304 战争带来了内燃机，而且随着内燃机的引进，通向非洲许多地区的公路也随之出现。在东非，旷日持久的与德军作战和运送给养的问题导致了若干条公路的兴建，例如从德属东非的多多马通向尼亚萨湖北端图库尤的公路，使得原来需要两三周的路程缩短为两三天。[60] 在一些军事活动持续不断的地区，和一些需要运输设施的地区，海港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蒙巴萨、比塞大、哈考特和达喀尔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尼日利亚，战争期间开办的埃努古煤矿就是为了给铁路提供本地的燃料。

战争期间，政府的收入一般都减少了，因为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除了向宗主国作出贡献，以支助战争外，各殖民地承担了当地战事的绝大部分军费

---

[55] T. 利特尔，1958年，第128页。
[56] H. C. 科斯尼尔（Cosnier），1922年。
[57] L. H. 甘恩，1964年，第164页。
[58] 同上，第172页。
[59] F. 威尔逊（Wilson），见M. 威尔逊（Wilson）和L. 汤普森（Thompson）编，1971年，第135页。
[60] P. 米切尔（Mitchell），1954年，第38页。

负担。除非由于军事急需非得修建不可，所有公共工程全都陷于停顿，经济发展计划则直到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是束之高阁。

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

世界大战对非洲产生的社会后果在各个殖民地有很大的不同，它取决于各殖民地卷入战争的程度，特别是在那里征集士兵的多少或进行军事活动的程度。不幸的是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很少重视战争对非洲社会的冲击。这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因为对于某些地区如东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兰杰所说的）是东非曾经经历过的“欧洲绝对权力最令人恐惧的、最富有破坏性的、也是最胡作非为的大暴露。军队卷入的规模、火力的猛烈、破坏和疾病所波及之广，非洲人死亡之众——所有这些都为当初殖民征服战争所望尘莫及，即使对马及-马及起义的镇压也无法与之相比。”[61] H. R. A. 菲利普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的写作中谈到“1914年到1918年的经历着实有效地把肯尼亚本地人从多少世纪的沉睡中唤醒”。[62] 与研究战争对非洲的政治影响相比较，从事于研究战争对非洲的社会影响者比较少。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搬伕以及劳工从他们村庄的狭隘世界中被驱赶出来，送往几千里之外，战争对于他们的冲击以及他们返乡后给本地社会带来的冲击[63]在殖民历史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这次世界大战为许多非洲人打开了新的窗户，特别是对那些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更是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马杰里·佩勒姆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写道：“非洲人过去基本上是被封闭在同他们的欧洲统治者的双边关系之中，一旦他们的视野超出这种樊笼，看到他们自己是非洲大陆和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非洲人产生的影响无论作什么样的估计也难以说是过高的”。[64] 在非洲许多地区，战争带来了一种推动力量，即使不总是促进民族主义活动，至少也会促使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对他们的欧洲主人采取一种更多批评的态度。贝思威尔·奥戈特认为非洲人同欧洲士兵共同分享的战争经历对于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具有同样的影响：

> 非洲士兵很快发现了欧洲人的弱点和力量之所在。在此之前，欧洲人一直被大多数非洲人奉为超人。事实上，担任准尉和军士的非洲军官在教欧洲志愿兵学习现代战争技术。欧洲人并非万事通晓，这点已越来越清楚了。回乡的搬伕和士兵四出传播这种对白人的新看法；肯尼亚的非洲人在20年代所表现的自信和自负，很多都与这种崭新的见识有关。[65]

他还指出，有意义的是，肯尼亚有几位非洲政治领导人，曾在东非的战争中或者战斗过

305

---

[61] T. O. 兰杰（Ranger）1975年，第45页。

[62] B. A. 奥戈特在1947年主编的著作第265页加以引用。

[63] 可参阅诸如M. J. 埃钦伯格（Echenberg）1975年；Y. 佩尔松（Person），1960年，第106-107页，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老兵在基西社会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作为现代化的促进力量。

[64] M. 佩勒姆，1961年，第45页。

[65] B. A. 奥戈特，见B.A.奥戈特编，1974年，第265页。

或者出过力。在几内亚，老战士的归来往往预示着遣散营出现罢工和骚乱，以及对酋长权威的攻击。[66]

如果说，战争使得非洲人争取恢复他们业已丧失的殖民化之前的主权的企图宣告终止，那么战争也激发了非洲人争取参与欧洲人强加于他们的新政体管理过程的强烈要求。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4点建议的鼓舞下，这些要求甚至扩展为民族自决的权利。伍德罗·威尔逊的14点建议是对于苏联在1917年10月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立即缔结和平条约建议所作出的反应。对于北非的阿拉伯国家，1918年11月英法联合发表声明，宣称协约国打算给遭受土耳其压迫的人民以公民权利。这个声明展现了一系列阿拉伯人获得独立的前景，可是，正是这些答应给土耳其诸省以自由的国家自己统治下的另外一系列阿拉伯人却被拒绝给予同样的自由。

埃及萨阿德·扎格卢勒的华夫脱党就是以该党试图派往凡尔赛和会的代表团——Wafd作为党的名称的。该党派代表团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埃及独立，并为此而去进行谈判。[67] 在突尼斯也有类似情况，尽管战对驻节长官阿拉佩蒂特就像英国在埃及干的那样紧紧地控制着民族主义者，可是战后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还是致电美国威尔逊总统谋求他的援助，以实现他们民族自决的要求。[68]

306

尽管威尔逊的14点建议并未激起撒哈拉以南非洲立即要求独立，可是他的自由激情却促使西非民族主义者希望自己能对凡尔赛和会施加某种影响，而且激励他们要求在与本身有关的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69] 正如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的一位代表，塞拉利昂人F. W. 达夫所指出的，“非洲各族人民被强制违反自己的意愿去干那些不符合他们最高利益的事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70] 在苏丹，威尔逊的14点建议（加上1916年阿拉伯起义的鼓舞）证明是苏丹民族主义的一个转折点，表达了新一代有政治觉悟的青年的态度。他们都毕业于政府办的学校而且掌握了某些西方现代技术。[71]

许多非洲领地都为战争作出了人力和物力各个方面的重大贡献，作为报答，他们希望至少应在社会和政治上实行改革。在某些情况下，殖民政府也特意作出实行改革的承诺，作为对他们统治下的居民所提供的援助的一种回报。法国政府曾向布莱塞·迪阿格内作出保证，只要他能为法国征集到欧洲前线所需要的补充兵员，法国肯定战后在法属黑非洲实行一揽子改革。征集兵员他办到了，但改革却从未实现。[72] 作为对阿尔及利亚在战争中作出贡献的报答就是阿尔及利亚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改善。但是，这方面的改善却遭到法国移民的强烈反对，而阿卜杜勒·卡迪尔的孙子哈立德埃米尔则视为太有限，他严厉批评法国政府，结果在1924年被驱逐出境。他被公正地称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

[66] A. 萨默斯（Summers）和R. W. 约翰逊（Johnson），1978年。
[67] M. 扎伊德，见P. M. 霍尔特编，1968年，第341-342页。关于华夫脱党的活动，参阅本书第23章。
[68] N. A. 扎亚德（Ziadeh），1962年，第60页。
[69] J. A. 兰利（Langley），1973年，第107页及其他各处。
[70] 塞拉利昂代表F. W. 达夫（Dove）：《英属西非国民代表大会备忘录》，1920年。
[71] M. 阿卜杜勒·拉希姆（'Abd Al-Rahim），1969年，第94页。
[72] M. 克劳德，1977 d，见M. 克劳德，1977 a，第117页。

运动之父。[73] 在突尼斯，一个代表阿拉伯社会的 30 人代表团访问了贝伊（Bey），要求政治改革，并提请他注意战争中突尼斯作出的牺牲。[74] 1920 年支持建立立宪党的动力，肯定大多数来自复员回乡的士兵和劳工，他们对于在自己国家里所处的附属地位是非常不满的。[75] 在英属西非，通常绝对忠诚于英国而对德国人持批评态度的新闻界也认为对这种忠诚的报答应是让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在殖民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76]

这次世界大战不仅对非洲民族主义是一种促进力量，而且对白人民族主义同样也是一种催化剂，突出的是在南非。在那里，阿非利堪人的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这种叛乱所表达的精神并未泯灭。正如威廉·亨利·瓦奇尔曾经说过的：

> 这次叛乱再次肯定了布尔战争所得出的教训，那就是武力不可能解决问题，战斗必须在政治舞台上进行。因此，从实际意义上讲，布尔战争所体现的现代阿非利堪民族主义在 1914 年叛乱中产生了。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的话，布尔人或者会更好地适应博塔和史末资的调和政策。战争迫使他们下决心组织起来，首先是秘密地采用“阿非利堪兄弟会”的形式，然后又采用“纯化”的国民党的形式。[77]

在肯尼亚，当地白人移民利用战争与殖民政府处处针锋相对，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进展。他们保住了由白人选举立法议会代表的权利，1918 年以后，他们在议会中形成了多数。这个情况，加上使白人高地可以实现种族隔离的“皇家土地法令”、对非洲人采用假冒通行证法的“土著人登记法令”、和拨出南迪保留地的大部分用作战后安置白人士兵的“士兵安置计划”，使得占少数的白人在肯尼亚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78]

肯尼亚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就是反对白人社会享有的这种特权，特别是关于土地方面。因此，1920 年成立的主要由酋长组成的“基库尤协会”，旨在保卫基库尤人的土地权益，而哈里·图库在一年后建立的“青年基库尤人协会”则是以保卫土地和劳工为目的。[79]

在南非，战争期间，阿非利堪民族主义和共和派骚动的兴起引起斯威士兰和巴苏陀兰（今莱索托）的非洲人领袖的严重关切。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被并入南非联邦，而南非联邦则日益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主义政策，1913 年公布的“土著人土地法”的条款就是明证。在阿非利堪人的压力下，南非联邦有可能获得独立，而从此之后非洲人的利益就更得不到保障。正如索托国民会议的西蒙·法莫特所声称，他的人民惧怕“南非联邦，因为我们知道布尔人将有一天会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独立。”[80] 在南非联邦内部，“南非土著

---

[73] C. V. 康弗（Confer），1966 年，第 113 页。
[74] N. A. 扎亚德，1962 年，第 88 页。
[75] 同上，第 123 页，关于立宪党的活动见本书第 24 章。
[76] F. 奥穆（Omu），1968 年，第 44-49 页。
[77] W. H. 瓦奇尔（Vatcher），1965 年，第 46 页。
[78] G. 贝内特（Bennett），1963 年，第 35-45 页。
[79] 同上，第 45 页。进一步了解细节，参阅本书第 26 章。
[80] R. 海厄姆，1972 年，第 80 页。

308 人国民大会”(后来改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战后向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递发了一份备忘录，列举非洲人在西南非洲、东非的战争中以及在法国的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并且提醒说进行战争是为了解放被压迫人民和给予每个民族决定自身主权命运的权利。[81] 英国殖民部告诉非洲人国民大会说，英国不能干预南非的内部事务，而国民大会的申请未能提交给巴黎和会。

结 论

世界大战使得对殖民主义看法的国际舆论气氛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前，欧洲殖民国家只对他们自己负责。战后，在凡尔赛和会上，按照新提出的关于统治殖民地人民的道德标准，审查了他们当中一员德国的殖民统治记录，并发现是不够格的。[82] 毫无疑问，如果对其他殖民国家的记录也进行同样的审查，必将发现大多数国家同样是不合格的。[83] 把对所谓落后民族的管理视为一种“神圣委托”的观念，这种观念在18世纪90年代禁止向非洲人出售酒精的禁令中表达得很清楚，如今则在委任统治书中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在委任统治中，胜利的协约国代表国际联盟接管德国殖民地的统治权。——“负责……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居民的物质与精神上的福利和社会进步。”[84] 在理论上强调了对国际负责的原则，但由于国际联盟本身的软弱，如对于在南非委任统治下的西南非洲当地居民的悲惨生活条件就很少能有所作为。[85] 1896年在伦敦举行的社会党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宣布的自决权利，如今由伍德罗·威尔逊，一个世界大国的主要领导人加以宣布，与此同时，新成立的苏联则对所有形式的在非洲的殖民主义一概都加以抨击。

即使在战后的年代里，被统治各族人民的命运也并未变得好多少，甚至连乐意改革
309 的设想也由于经济萧条而流产了，[86] 然而关于殖民统治道德的尖锐问题却开始被提了出来。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民族主义运动酝酿成熟，最后导致许多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例如，英属西非国民大会领导人诸如J. E. 凯瑟利·海福德和H. C. 班科尔-布赖特，通过国际联盟才获得一次国际听证机会，听取关于他们自己同多哥殖民当局的关系，并援用国联规约作为争取“公正对待我们人民”的一项宪章。从长远看，委任统治的观念后来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托管制度思想，其中包含了托管领地最终独立的明确目标，这些托管领地将受到“中立的”检察团的巡视。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了非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其惊心动魄的程度比不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很重要的。它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非洲

[81] L. 库珀（Kuper），见M. 威尔逊和L. M. 汤普森编，1971年，第439页。

[82] 可参阅在外交部历史处指导下编写的《德国殖民地开拓手册》，第36卷，伦敦，1919年，和C.菲德尔（Fidel），1926年。关于德国在多哥殖民统治的记录，见M.克劳德，1968年，第241-248页。

[83] L. H. 甘恩和P. 杜伊格南（Duignan），1967年，第79页。

[84] 这是对非洲委任统治的标准说法。

[85] 参阅R. 西格尔（Segal）和R. 弗斯特（First），1967年。

[86] A. 萨罗（Sarraut），1923年，就是一个例子。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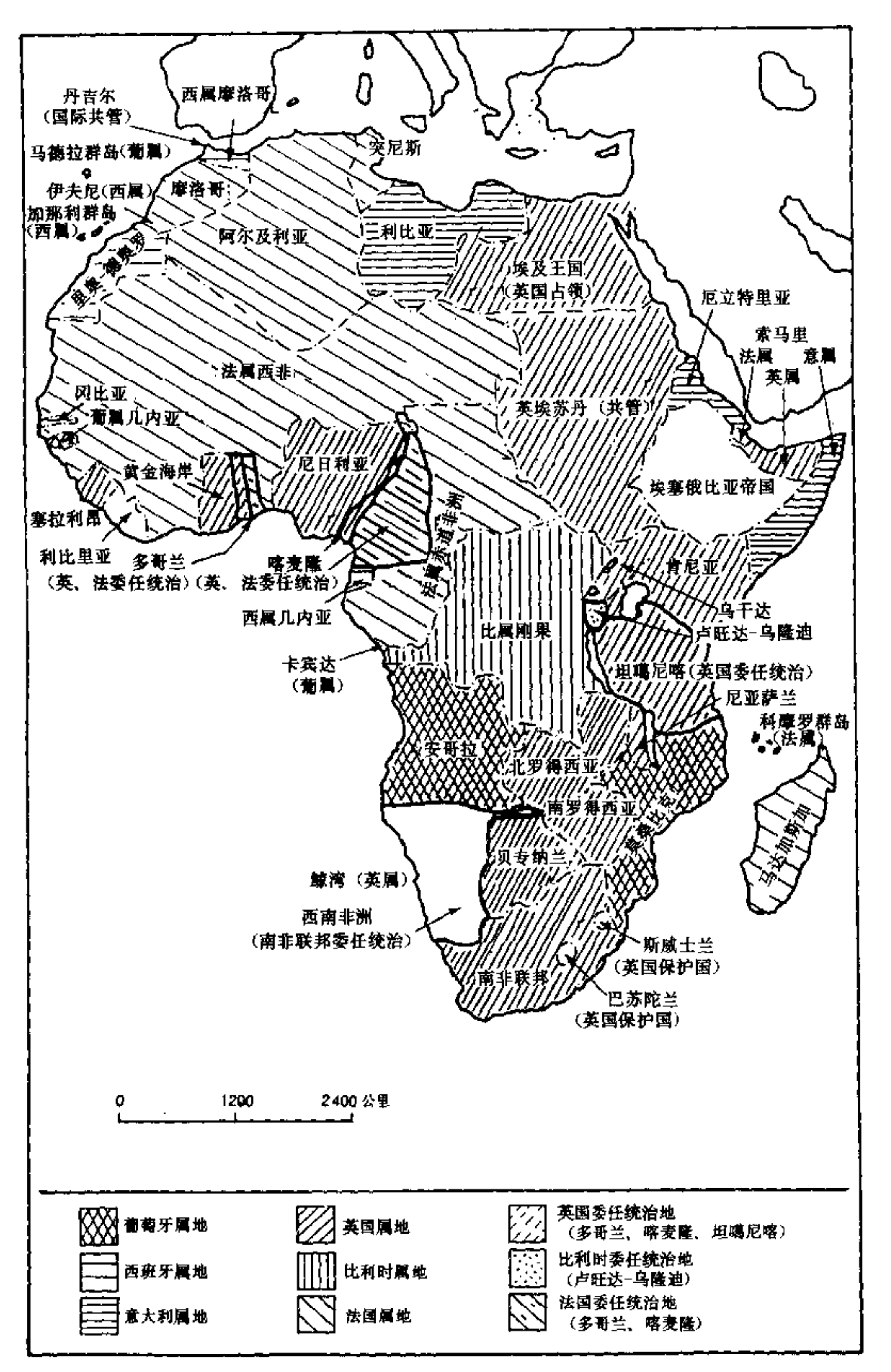


插图 12.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疆域的变化(根据F. D. 费奇所绘图, 1978 年)

地图的重新排定，同目前的局面大致相似(见插图 12.2)。作为殖民国家的德国完全从非洲消失了：在喀麦隆和多哥，它为法国和英国所取代，在西南非洲为南非所取代，在德属东非则为英国和比利时所取代，比利时得到了面积较小、但人口稠密的两个省份卢旺达和乌隆迪（今卢旺达和布隆迪)。[67]

在凡尔赛举行的关于协约国胜利者之间分配这些领土的复杂谈判完全属于欧洲历史的范畴，虽然喀麦隆和多哥被分割的方式（极少考虑历史的和部族的因素）注定要给这些领土及其邻国的一部分居民制造巨大的痛苦，特别是给多哥和黄金海岸的埃维族。就前德国殖民地的非洲居民而言，其命运并未因更换主人而有明显的改善。确是有不少非洲人对原来主人比对新的主人更有好感。当法国人推行其强迫劳动制度和英国人不如其日耳曼兄弟那么有干劲开发其殖民地时，在喀麦隆和多哥就滋长一种怀恋旧政权的情绪。[68] 因为法国和英国都把自己看成是委任统治领地的临时监护人，多哥兰的两个部分，如果与科特迪瓦和黄金海岸相比，经济发展程度就差得多。坦噶尼喀的发展也比不上肯尼亚和乌干达。如果说西南非洲在南非的“管理”下获得令人注目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迅速扩大的移民人口；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德国统治下的残酷经历只不过换成了一个执行种族主义政策的政府的暴政，由当地白人进行殖民和开发并享受一切成果罢了!

311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基本上是一场欧洲人的战争，但非洲被深深卷入其中。这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瓜分非洲的终结，也标志着非洲人企图恢复以瓜分前政治实体为基础的独立的终结。对于许多非洲国家来说，战争虽然代表了社会和经济发生巨大动乱的时期，但是战争也为欧洲人在非洲的统治带来了 20 年的平静时期，只有法国和西班牙所属的里夫，法属毛里塔尼亚和意属利比亚这些地方例外。

但是，民族自决和殖民国家应负担责任的思想在战争期间就播下了种子。在随后的和平时期，这些思想对发展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民族主义者争取更多参与政府活动的要求转化为完全控制政府的要求，则尚有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起的催化作用。

（吴期扬译）

[67] 关于导致和会作出将卢旺达和布隆迪划归比利时的谈判情况，参阅W. R. 路易斯，1963 b。

[68] 参阅C. E. 韦尔奇（Welch)，1966 年，第 58 页。

13 欧洲人统治的方法和制度

R. F. 贝茨
M. 阿西瓦朱审校

"土著人政策"

紧接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征服并占领非洲之后或者与之同时，非洲就被戴上一副殖民统治的框架，这种框架既非规格一致，也非简单露骨，而是由一些普遍持有的思想和观念所构成。过去任何时候，在任何遭受欧洲人统治的大陆，殖民政策都未曾被称作"土著人政策"提出来过。尽管"土著人"一词用于"土著人"行政管理时具有多种各不相同的定义，但通常这个名词都是用以形容非洲人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普遍承认，只有在一些补充性或辅助性的职能中使用本地的人员，并利用本地的机构体制，才能使殖民统治有效地维持下去。 312

这种认识完全是19世纪在非洲进行活动的那批欧洲人确立的殖民形势所带来的后果，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南非是突出的例外。非洲大陆的大片土地，从气候上看都不适于白人大量密集移民，其实当地居民在地理上也居住得相当分散，这使得欧洲人无法有效地实行直接统治。非洲被视作是一个热带种植园群体，居民都是按照外界制定的目的被征召来劳动，而且必须听从欧洲人的指导。弗雷德里克·卢加德爵士（后晋升为勋爵）于1922年在他名为《双重委任》的著名著作第一版中，对"双重委托"所下的定义是：人们普遍公认，并从理论上证明欧洲人的出现是正当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世界上其他地区，同样也是为了非洲。

因此，按照当代帝国主义的思想逻辑，欧洲人出现的目的被说成是担负"责任"或进行"托管"。1923年发表的英国政府《肯尼亚白皮书》确立了"土著人至上"原则，其中包含了这样的声明："国王陛下的政府认为自己是代表非洲居民履行一种受委托的责任，……委托的目标应该说是为了保护土著种族并使之进步；……。"① 法国殖民部长阿尔贝·萨罗在他的著名论文《开发法属殖民地》一文中认为"应当加以承认的唯一权利就是强者保护弱者的权利"。他接着说，法国正在保证其殖民地的"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的发展"。② 314

① 《在肯尼亚的印度人》，Cmd 1922（1923年）。

② A. 萨罗（Sarraut），1923年，第19页。

图片13.1(a)-(d)　殖民地总督和行政负责官员

313



图片13.1(a)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勋爵(1858-1945年)。历任高级专员；1900-1907年、1912-1914年任北尼日利亚总督；1914-1919年任尼日利亚总督。



图片13.1(b)　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古尔旺，1908-1916年任科特迪瓦副总督。



图片13.1(c)　约瑟夫·西蒙·加利埃尼将军(1849-1916年)。1886-1888年任法属苏丹高级指挥官；1896-1905年任马达加斯加总督。



图片13.1(d)　阿尔贝特·海因里希·施内(1871-1949年)。1912 1918年任德属东非总督。

这两个声明都表露了家长式统治的态度，这种态度彻头彻尾地贯穿在欧洲人对非洲殖民地的看法之中，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提出的委任统治制度的出现既被国际化又被制度化了。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22条的说法，殖民统治、特别在非洲，此时被宣称为一种以高等文明的名义承担的一种责职，把“对这类人民（殖民地居民）的监护……委托给进步的民族”。③ 在这类漂亮的言辞后面隐藏着一种文化的和种族的优越感，它形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经常表现为把非洲人描绘为“幼稚”，或“尚未成熟”。这种凭空设想的社会条件需要欧洲人的统治长期延续下去，这就意味着对非洲的殖民控制将延长到难以预计的未来。

至于业已有了大量永久定居的白人少数居民、而且目下还在接纳更多这类移民的那些少数地区，预期的未来状况将是一种永久性的殖民，以及在有关政治和财产的一切事务中，继续由欧洲人保持优越地位。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领地内（南非除外，因为在南非已经强制实行严重不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合作发展的思想也经常有所流露，而非洲人居民则被正式告诫必须接受和听从欧洲人的指导。

除了这类考虑之外，殖民政策并无明确的最终目标。结果，殖民政策往往限于短期措施而不是确立含义明确的制度，它含义模糊，既包含英国式的自治概念，也包括法国式和葡萄牙式的政治一体化概念。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殖民行政管理就是大致上在这些“差异性”和“一致性”的政策中力求平衡，它被这种政策的执行者说成是凭经验办事，是一种文化上和政治上求适应的做法。

然而，所有上述这一切思想和实验其根源都在世界大战以前。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地图上占领”非洲以后，紧接着便出现了军事征伐和军事统治，这就产生了许多甚至19世纪末期以前就被采用的政治控制方法。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就是许多这类早期的做法构成为官方政策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行政上的权宜之计被上升到完整理论的地位。回顾起来，这个时期可以清楚地看作是殖民行政机构官僚化出现的时代。 315

虽然在非洲如何进行殖民统治起初并没有普遍公认的方法，然而大多数思路却集中在可以称之为联合行政管理的办法上（通常称为间接统治）；这种方法使非洲当权者在传统具有的或者欧洲人强加的政治任务中同殖民政府联合起来，但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之所以普遍赞同这种广泛的统治原则，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19世纪后期夺取殖民地的历史模式是一个构成因素，因为单是面积这一点，就给殖民统治增添新的问题。第二，对非洲内陆的渗透很快就使得可用于管理新占领地区的欧洲人人数无法跟上需要。而且，由于这种向非洲内陆的渗透扩展到了欧洲文化尚未触及的许多地区，于是，任何类型的直接统治都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因而不是马上就能行得通的。正如一些评论家早已指出的，④ 主要由于这些情况，作为沿海小块领地特征的直接统治就让位给了在

③ 苏联在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时，对国联规约的某些条款持保留态度，苏联特别不赞成规约的第22条，因此，拒绝向委任统治委员会派遣代表。

④ 见M. 佩勒姆（Perham），1960 b，第140-141页；J. D. 费奇（Fage），见P. 吉福德（Gifford）和W. R. 路易斯（Louis）编，1967年，第703页。

内地较大领地行之有效的间接统治。此外，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由于特许公司统治的垮台，急需对统治薄弱的大片领土建立起国家控制。然而这种形势转过来又需要（德属东非除外）类似于各特许公司先前使用的松散方法的一种非正规统治，这在意属索马里最为明显。

除此之外，还有出自欧洲文化观念和公开宣布的政治意图方面的原因。不仅这种"廉价"帝国的原则（宗主国只需付出很少代价或者毋需直接付出代价）得到广泛的支持，而且人们一致赞同这种以最少的社会混乱保证获得本地人最大合作的办法。谈到英国对非洲的政策时，卢加德宣称："为了取得成功并促进人民的幸福和福利，各种机构体制和统治方法都必须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传统和成见之中"。[5] 同样，法国殖民部部长乔治·莱格在1906年也说："我们殖民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严格尊重被征服或被保护的民族的信仰、习惯和传统"。[6]

316 这些涉及到人员短缺和需要把代价削减到最低限度的解释和论点本身又同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直接相关，正是这个问题决定了所有殖民政府在20世纪全都采用联合行政管理制度。这个问题就是19世纪盛行的同化政策或者直接管理政策的失败。不论是法国在塞内加尔的四个自治市镇，还是英国在塞拉利昂、黄金海岸（今加纳）和拉各斯（今尼日利亚境内）的皇家殖民地，到19世纪末，这种同化做法不仅因非洲人文化上的反抗而惨遭失败，而且由于新近出现的欧洲殖民上层人士同本地出生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日益激化，法国和英国官员本身也丧失了这方面的热情。在法国殖民地和英国殖民地，19世纪末都明显地出现西方化非洲人的期望遭到系统的挫折。正如A. E. 阿非格博所说，[7] 19世纪末期，在英属西非殖民地出现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被系统撤换下来，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担任着负责的职务。与此同时，在塞内加尔和其他地方非洲人取得法国公民资格的条件也变得更加苛刻了。由于新政权开始实行在政府中限制雇用非洲高级技术人员，在19世纪末出现的欧洲殖民者同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之间的伙伴关系丧失了，正是这一情况造成行政人员的人为短缺。

由于上述这些情况，没有一个殖民国家立刻全盘整顿原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尽管如此，殖民政策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全过程，有的勉强接受和被迫适应这类结构，如在葡属安哥拉和德属东非，有的则为保持原有制度作出周密细致的努力，如在英属北尼日利亚或法属摩洛哥。然而，各地殖民体系的基本要求，都起更改非洲基本体制宗旨的作用，因而也有破坏其职能和削弱这些体制本身的作用。举例而言，大多数非洲国家是靠征服取得的这个事实，加上某些当权酋长遭到流放或被废黜，于是整个酋长的统治也就声名扫地。普遍征收欧洲人布置的捐税肯定是另一种破坏性的殖民措施。即使是向当今所谓的现代化方向作最微不足道的努力，也起着改造当地制度的作用。如果说多数非洲居民并未因欧洲人的出现而受到经常性的影响，非洲的基本政治制度却是受到经常性影

---

[5] F. D. 卢加德（Lugard），1929年，第211页。

[6] 《殖民地函电集》，1906年7月12日，第1页。

[7] A. E. 阿非格博（Afigbo），见J. F. A. 阿贾伊（Ajayi）和M. 克劳德（Crowder）主编，1974年，第443页。

响的。

殖民统治及其体制结构

从摩洛哥素丹的皇宫到东部和南部非洲酋长的村庄，欧洲人殖民行政官员都在寻找 317 和利用"土著人当局"作为其同伙或代理人，通过他们，外国统治者可以有效地向广大的非洲人居民提出要求。不管现存制度被更动的程度或被纳入欧洲人需要的程度是多么微乎其微，这类权力的配置是很不对称的。高踞行政体系顶端的是总督或驻扎长官，他虽然最后还得向本国政府负责，却常常享有最高的统治权力。

他所掌握的机构体制，在规模上和复杂性上出入很大，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他通常有某种咨询委员会或由商业界加以支助。在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的体制中，殖民当局的中央集权性质，保证了立法权控制在宗主国的手中。但是在英属非洲殖民地，由任命或选举产生成员或两者兼有组成的殖民地议事会作为原始议会形式的机构出现，其职能从咨询到立法不一，这就虽非有意，却又必然为今后政治权力的转移铺设了通路。尽管在殖民地议事会的体制中开始出现了非洲人，特别是在英国式的体制中，但这些议员的人数以及他们被有效任命的方式保证了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不会对欧洲人统治方式带来令人注目的冲击。

所有殖民体制中最关键的体制结构是地区或者省一级的单位，在法属西非名之为"治理圈"(cercle)。这种带有军事色彩的名称的连续使用，使人想起殖民地夺取的本质。统治"治理圈"的是一名欧洲行政官员，由他行使殖民权力，指挥他的欧洲部属和已纳入殖民政府的非洲当局的活动。

最重要的和人们议论最多的非洲人组成部分就是本地酋长。的确，在黑非洲的各个殖民政权都依靠酋长(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委任的)，他们是行政结构的基本要素。法国殖民行政官员罗贝尔·德拉维涅简明地解释了这种制度的性质（从某个方面讲不仅适用于法属西非的情况），他写道："任何殖民化都少不了土著人政策；任何土著人政策都少不了领土的控制；任何领土的控制都少不了在殖民政权同居民之间起着联系作用的本地酋长。"⑧

酋长活动同整个非洲大陆的殖民体系结成了一体，这一点虽然没有任何观察家或评论家产生过怀疑，但是，关于各欧洲国家利用这些酋长的情形，学术界则存在着很大争议。⑨主要问题一直集中在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关系上，集中在把欧洲人的权力授予非 318 洲人统治者和欧洲人干预这些非洲人统治者所享有的传统权力的关系上。尽管大多数学者的兴趣倾向于研究英国和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控制方式的区别，在那里，即使最终效果没有区别，其传统做法还是各有特色的。也许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历史角度加以观察，对大陆政策来一次总的回顾，但是仍应对法国和英国的活动给予特别重视。

⑧ R. 德拉维涅（Delavignette），1946年，第121页。

⑨ 见H. 德尚（Deschamps），1963年；M. 克劳德，1964年；M. 克劳德和O. 伊基默（Ikime）合编，1970年；A. I. 阿西瓦朱（Asiwaju），1976 a。

关于“土著人当局”对殖民秩序重要性的最著名解释就是卢加德的阐述。他把讨论得最多和模仿得最多的统治方法归纳成理论：间接统治。就像殖民统治领域中许多行政官员一样，他把广泛的非做不可的工作装做是出于好心而做出来，只是很少官员把那种好事写得如此有说服力。

在“皇家尼日尔公司”的权力转移给国家以后，卢加德面临着北尼日利亚的广阔领土急需有人管理，同时又面临着人员和资金严重短缺，他认识到任何直接统治的建议都是无济于事的。不过，这种结论也得到他早年在乌干达服役时形成的信念的支持。那个信念便是利用当地已有的机构体制是进行殖民统治的最好方法。从 1900 到 1907 年，卢加德在担任北尼日利亚高级专员的任期内，把他的一般实践进一步加以发展，并在他下达给行政官员的许多指令中作了透彻详尽的说明，后来这些指令印行为《政治备忘录》一书公开出版。

关于他政策的最好概述可参阅他 1906 年向下属军官发布的一系列指令。他竭力主张建立“一个单一政府，在这种政府中，本地酋长有其明确的职责并享有公认的与英国官员平等的地位”。[10] 因此，后来成为间接统治体制基础的乃是一种合作的体制而不是一种从属的体制，英国驻扎官的身份基本上是作为顾问，而不是作为执行官，而非洲的“酋长”——此处指的就是富拉尼族埃米尔——继续保持其传统的作用，不过现在是由强塞进来的殖民政府谨慎地加以指导，而不是刻板地加以硬性规定。在他试图把埃米尔纳入殖民体系的努力中，卢加德希望让他们继续享有大部分原来的职责、作用和官位特权，以便他们能在当地居民的心目中继续保持合法统治者的形象。

卢加德式统治虽说精髓在于利用现有职位上的现有当权者，但其目的不仅于此。在319 司法和税收这些方面就要求按照欧洲方式进行改变。[11] 卢加德的传记作者在一篇为他的政策辩护的文章中写道：“间接统治的巨大任务就是掌握赛场，维持平等的比赛条件，使得非洲人可以在守旧性与适应性之间加以权衡作出自己的选择”[12]。这项任务能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官员对当地习俗和机构体制的了解，当然也还要取决于本地土著人当局在他们本身机构体制的框架内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调整的愿望。

以上略述梗概的北尼日利亚的间接统治与另一种间接统治可以媲美。后者也似卢加德式的间接统治，在穆斯林政治制度占统治的地区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间接统治方式一直传到非洲以外，它最早是由法国人给以理论上的解说。他们所标榜的“联合政策”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同古老的政治同化的概念成为强烈的对照。保守的殖民理论家朱尔斯·哈曼德，在他 1910 年出版的有影响的著作《统治与殖民化》一书中有很长的一节为这种政策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解释。他在文中写道，联合就是“间接治理，就是保存经过改良的被征服人民的机构体制的治理方法，并尊重他们的历史”[13]。

---

[10] F. D. 卢加德，1919 年，第 298 页。

[11] 对于间接统治在尼日利亚带来的变化在 1980 年O. 伊基默主编的著作第 25、26、27 各章中已有仔细的引证。

[12] M. 佩勒姆，1934 年，第 331 页。

[13] J. 哈曼德（Harmand），1910 年，第 163 页。



320

图片 13.2 路易-于贝尔·利奥泰(1859-1935 年)，1912-1925 年任法国驻摩洛哥总督

通过1923年萨罗的《开发法属殖民地》这本著作的出版，这种政策披上了官方的神圣色彩。

"联合"的办法起初是用于印度支那，后来才被推广为对非洲的政策，然而作为一种殖民实践，它具有地理上的限制。仅仅只是在摩洛哥，法国人才认真地考虑到它，而且在那里基本上是由于总督路易-于贝尔·利奥泰特别重视当地人的问题，他在这个保护国的初创年代，施行统治很少受宗主国政府的限制。在整个摩洛哥，素丹国家的各种形式都被保留不变，而地方一级行政活动则同卢加德所建议的非常相似。法国的民政监督官对伊斯兰教执法官（根据伊斯兰法执行地方行政官职务的穆斯林官员）只是以顾问身份而不是以监督身份发挥作用。在摩洛哥的西班牙统治区也有类似的安排，在那里，伊斯兰教执法官在西班牙民政官员（相当于法国统治区的民政监督官）指导下工作。在意属索马里，伊斯兰教执法官也在行政上保留过去的地位，不过在那里有委任的酋长同他一起负责当地政府的事务。

从理论上讲，这种间接统治也适用于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活动，但事实上实践却与此大有出入。在一段常被引用、被看作最足以说明两次大战之间法国在此地区实际采用的各种方法的文字中，法属西非总督若斯特·旺·沃朗奥旺在1917年写道："酋321长"并无自己的权力，因为在一个"治理圈"里不能有两个掌握实权者……；只能有一个！只有"治理区"的司令统帅一切；只有他才是真正负责的。土著人酋长仅是一种工具，一种辅助物"。[14]因此，尽管法国官方发表各种声明，法国人仍然不是间接使用本地当局，而是在殖民政府中直接使用他们，把他们完全置于从属地位。葡萄牙人也是按照类似方式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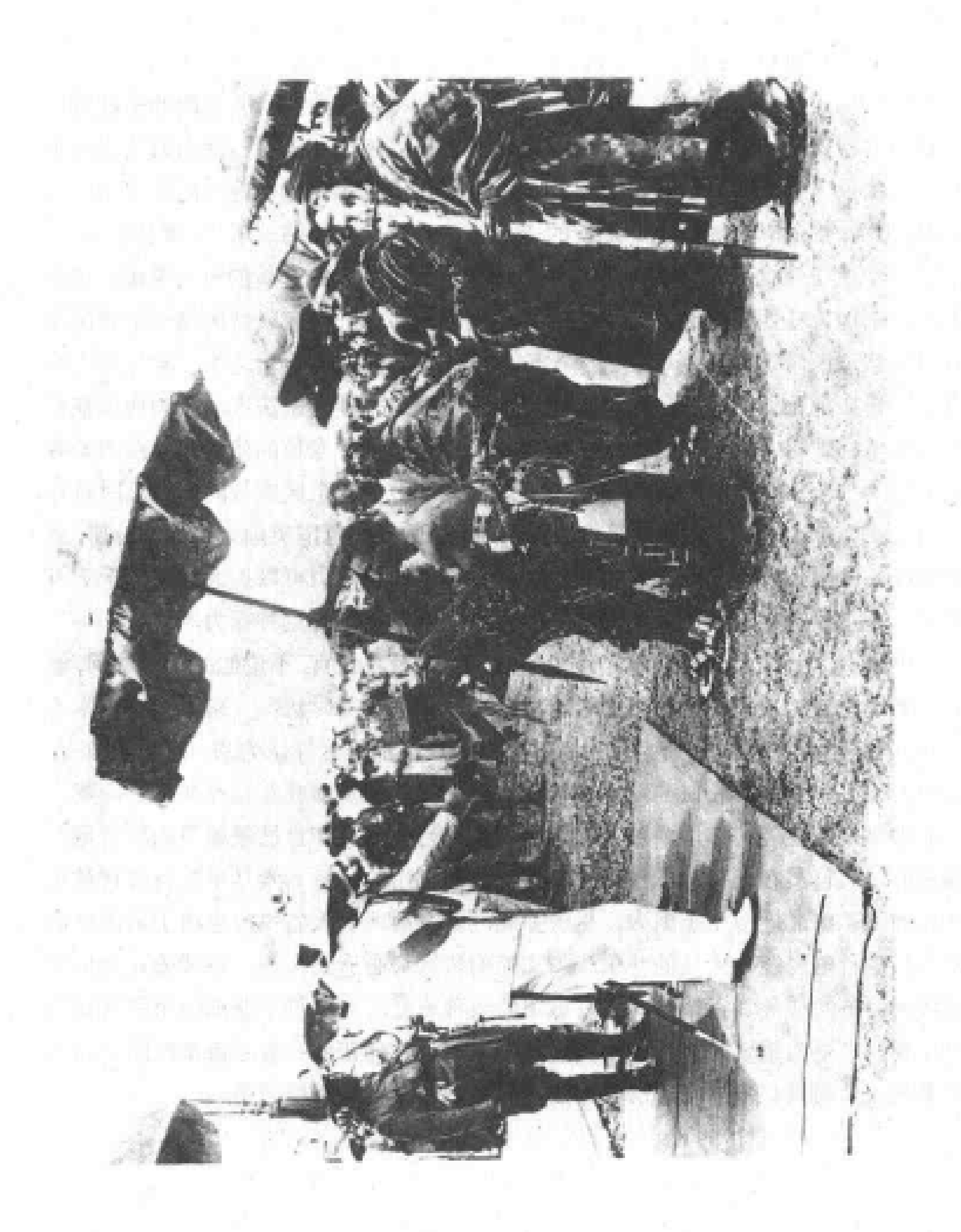
虽然卢加德的间接统治方式被某些人批评为过于保守而遭到怀疑[15]，但是一开始执行就在北尼日利亚获得成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广到英属非洲的许多地区，其中包括新近吞并的原德国殖民地坦噶尼喀和喀麦隆。甚至比利时人在1920年以后也在刚果采用这种方式。尽管没有任何地方能像在尼日利亚的豪萨-富拉尼族地区那样具有如此令人满意的条件和取得如此成功的效果，但是，英国人还是试图模仿当地习俗的框架，甚至诸如地方议会那样新创立的机构也同当地的组织形成协调一致。但是最令人吃惊的例外是南非，在那里，"土著人当局"的概念原是白人少数居民用来保证建立非洲人地方政权的一种手段，现在却改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把非洲人强迫迁入保留地。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酋长成了行政代理人而不是"土著人当局"，其传统作用和权力被大大削弱或者被剥夺了。这种地位上的变更，甚至在一些属于间接统治的区域也在所不免，这是不难解释的。显而易见，传统职能由于新的需要而扩大，如增加了收税、人口普查、或者召募劳动力和征兵。凡是欧洲人看来在传统权力职位上缺乏满意的人选的地方，其他人员，诸如退伍军人、军士或者职员就被任命担任酋长。在法属殖民地和葡属殖民地，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在这些地方，在酋长职位

[14] J. 旺. 沃朗奥旺（van Vollenhoven），1920年，第207页。

[15] 关于近期的评价，见S. 阿布巴卡尔（Abubakar），O. 伊基默编，1980年。

322



图片 13.3 间接统治的实例——威尔斯亲王 1925 年巡视黄金海岸时在阿克拉接见酋长们

人选的增补中，本地应起的作用，多半已遭到破坏。于是，酋长有时被赋予他们的职位原来不具有的政治重要性。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被安置在没有头人的社会任职，他们本来并没有在那里进行管理的意图。这两种情况的实例在尼日利亚的伊博人、肯尼亚的基库尤人和乌干达北部的兰吉人中都可找到⑯。

随着欧洲人的行政机构的建立，酋长就像一般行政人员那样受人操纵，为了满足殖民需要，他们可以任意被调动或者被撤职。在被认为是多余的地方，酋长的职位就被废除；在被认为对殖民统治有利的地方，酋长职位又会设立起来。也许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出现在比属刚果（今扎伊尔），在那里，1918 年以后，殖民部长路易·弗朗克提出的改革导致殖民秩序的一次巨大更改。酋长的人数从 1917 年的 6095 人削减到 1938 年的 1212 人。此外，为了巩固殖民政权，还采用了一种名为"区"的全新的行政单位。依照类似的方法，法国人在西非也建立一种新的行政单位，将一群村庄联结成为一个"区"。用一位省督的话来说，这种区是"在一个本地行政代理人的权力管辖之下，此代理人称为区级酋长"。⑰ 在利比亚，根据 1929 年 8 月 31 日发表的一项皇家法令，全国居民都归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管辖。这项法令允许按照省督的决定和地区专员的建议把殖民地的各游牧民族划分为"部族"和"次部族"。甚至英国人在尼日利亚东区实行间接统治时也作出了类似的变更。本地许多统治者情况相当复杂，他们的权力范围英国人也无法分辨，面对着这种情况，英国人采取了委任酋长的原则。这种酋长的权力可以扩大到有成千上万居民的地区，不过只有依凭殖民政府颁发的委任状才能直接享有这种权力。⑱

与这些因素有联系作为破坏力量起作用的就是当地行政长官。不论他的意向如何，他总是成为一名代用酋长。正如德拉维涅带着满意心情叙述的当时情况：殖民长官根本不是一个行政官员，而是一个司令官，他控制下的非洲居民都是这样认为的。他明确断言，他的基本职能"是像一个酋长似的发挥作用"。⑲ 卢加德希望英国驻扎官在北尼日利亚一般发挥的那种含蓄和谦逊的作用，被法国和葡萄牙的行政官员在自己领地里加以否定，这两个国家的行政官员在运用地方权力时都是鲜明而突出的。意属索马里的行政官员在同当地酋长的关系中最近似于英国人，尽管如此，就在后两类人当中，也由于殖民统治的苛刻要求和执行殖民统治人员的性格，卢加德的格言势必遭到修正。卢加德式间接统治取得成功所必备的那种真正微妙而带有感情的亲善态度，在服役于非洲的殖民军官当中是很少见到的。更为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强行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社会必备条件同非洲的习俗格格不入，从而只有依靠不正常的方法才能被纳入本地的制度之中。

---

⑯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R. 泰格诺（Tignor），1971 年；J. 托什（Tosh），1973 年；A. E. 阿菲格博，1972 年；W. R. 奥奇恩（Ochieng），见B. A. 奥戈特（Ogot）编，1972 年；G. 穆里乌基（Muriuki），见B. A. 奥戈特编，1972 年。

⑰ 《经济、政治和社会行动纲领》，1933 年，第 185 页；J. 絮雷-卡纳尔（Suret-Canale），1971 年，第 323 页内曾加引用。

⑱ 更详尽的情况见A. E. 阿菲格博，1972 年。

⑲ R. 德拉维涅，1946 年，第 29 页。

殖民统治的目的和强加的负担

除了官方宣扬的一套言词之外，殖民化在世俗事务上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最明显 324 地说，这些目标就是维持秩序、避免沉重的财政开支和建立一支劳动大军。这支大军起初是用于搬运工作，后来用于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但也用于商业目的。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目标被加到地方统治的职能上，并通过三种方式加以实现：司法制度的更改、强迫劳动的推行和个人税的征收。尽管上述第一项是欧洲人在所有问题中最喜欢卖弄聪明反复评论的主题，但后两项才是殖民体制真正的最大动乱因素。

欧洲司法制度的引进通常都适当重视非洲的习惯法，在穆斯林法律同时并存的地方，例如在意属索马里，也重视穆斯林法律，但是其效果是有限的。正如黑利勋爵曾经指出过的，欧洲法律的基本概念同非洲制度的基本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为后者的目标针对的是对犯罪的惩罚而不是被侵害者得到补偿。⑳ 殖民者经常试图采取双轨司法制度：凡是涉及非洲人的民事诉讼根据殖民前法律模式进行处理，而刑法和涉及欧洲人的诉讼则直接归殖民地当局司法管辖。

然而除了葡萄牙殖民地是明显的例外，非洲各地都按照欧洲人所理解的非洲人的需要而建立或者加强法庭制度。㉑ 在本世纪的头10年里，索马里的意大利人和东非的德国人特别企图扩大非洲酋长或地方长官的司法职能。但这一时期，这项工作中最为精心推敲并获得最大成功的成果却出在西非海岸：卢加德贯彻推行的"土著人法庭"。"土著人法庭"是他三足鼎立的"土著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工具，用来"反复灌输一种责任感，并在原始的社会里培养一些纪律意识和对权力的尊重"。㉒ 这种法庭都由非洲人主持，基本上致力于处理内部事务，并尽可能地严格恪守非洲习惯法，只有当非洲的基本习惯法同英国根本准则相矛盾的地方才加以修改。英国的许多属地和托管地都采用这种卢加德模式。比利时人在刚果也竭力仿效。

同这种方法形成直接对照的是法国人的做法，它倾向于瓦解非洲人的权力，最终使得地方行政官成为负责的司法官员。可是，在法国制度中最为独特和最不公平的组成部分要算是"土著人法"。㉓ 这套做法在19世纪70年代首先使用于阿尔及利亚，80年代又 325 被输入法属西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仍然在上述两个地区作为制度继续加以执行。根据1924年公布的一项法令，它授权所有的法国行政官员对一系列的违犯法规的行为，从不及时纳税到对法国官员怠慢无礼，均可给以处罚，最高为15天的监禁和一笔罚金。

比法律制度的影响更为广泛的就是所有男人最终都得负担的各种个人税项。个人税项起初是作为促进殖民地财政自给的一种手段，而制定这些税项也由于下列思想的启发，

---

⑳ 黑利（Hailey）勋爵，1957年，第591页。

㉑ 关于这种方式最生动的案例研究，见O. 阿德沃耶（Adewoye），1977年。

㉒ F. D. 卢加德，1929年，第548页。

㉓ 关于近期的详尽研究，见A. I. 阿西瓦朱，1979年。

那就是它们可以促使非洲人进入欧洲人的经济体制并可以扩大货币经济。到了20世纪初期这些税项又作了调整，这是其他殖民制度所没有的，它们已经经历了似乎是一个明显的循环发展的过程。㉔ “茅屋”税是殖民统治早期的一种明显的形式，也是导致非洲人大量斗争和抗议的一个根源。㉕ 到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茅屋”税普遍地被一种人头税或按人征收的税所取代了，直到殖民统治末期，这种人头税仍是一种主要的税收形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有几次打算把这种税按不同地区或按土地潜在产量的估计进行分级征税。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几处属地和比属刚果实行一种所得税，不过这种所得税当时只影响非洲人以外的其他人种，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收益需要交纳所得税。

在这个一般模式范畴里还存在着许多地区差别，最突出的就是同卢加德“土著人当局”思想有关的那种模式。正如他在《双重委托》这本书里所写的，“税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制度的基础，因为税收提供了向埃米尔及其所属官员支付报酬的手段”。㉖ 这种方法赖以发挥作用的制度是“土著人国库”，这是查尔斯·坦普尔爵士首创的主意，他曾作为卢加德的下属，服役于北尼日利亚。每个土著人当局都可从他所在地区征集的税收中得到一定比例的返付金额。这笔款项形成“土著人国库”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土著人国库”还有各种执照费和法庭收取的罚金加以补充。埃米尔或酋长从这项金额中提取他自己的收入并向他下属官员提供薪俸。剩余资金则用于兴办公共事业和各项改进工作。最初使用于酋长统治地区的这种制度，随着间接统治的推行不仅扩展到了东非和西非沿海的英国属地，而且还扩展到了比属刚果。

326 在所有的殖民统治方法中，税收制度最为明显地促进了殖民统治官僚政权的发展。税收制度给行政官员和非洲酋长规定了一项共同职能。在审估税额和征收税款的过程中，酋长经常联合当地长老会议或名流会议，提醒人们记住新体制拥有制订规章制度的权力。㉗ 此外，在这类税收官员之后，很快出现了一些行政代理人，他们成了新型殖民地上层人士的一部分。在这些人士中间，最为惊人的和最有争议的就是德国人在东非使用的“阿基达”(akidas)。这是一批操斯瓦希里语的官员，他们在欧洲人统治之前就已在沿海地区供职。他们按照重新确定的职位被用来替德国殖民当局收税和征集劳力。1936年，在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任用了专职的非洲职员从事收税，再次表明这种官僚化的倾向。

伴随着货币税的实行短暂地出现了劳役税。这是欧洲人企图为殖民事业的经济组织强征劳力的一种最明显的表现。采集税是在刚果自由邦收获野生橡胶时征收的税，它是这类税收中遭受批评最多的一种税。但是从时间上看，实行得最久的要算法国的养路税，这是要求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所有男人都得负担的一种劳役税，除非交纳现金得到

㉔ 黑利勋爵，1957年，第676页。

㉕ 见本书第6章。

㉖ F. D. 卢加德，1929年，第201页。

㉗ 卢加德特别赞赏对个人征税，认为这是标志着对于每个人应按财力为比例向国家尽义务的原则的承认。同上，第232页。

豁免；它在1944年才被废除。相反，在喀麦隆，德国人则允许通过“缴纳”劳役的方式豁免交纳人头税。在乌干达一些地区，英国继续采用“卢瓦罗税”（luwalo），这是殖民前的征取一个月劳动的公共工程税，直到1938年，这种税才为一种货币税所取代。而这类捐税乃是所有殖民国家都采用的强迫劳动手段以外的方法。

欧洲人行政官员经常关心的是殖民政权所支持的新工程和新兴行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从而在上世纪结束之前，他们推行一种实质上强迫服役的制度，对劳动力施加控制以满足私营的和公共的需要。到了20世纪早期，由于搬运的需求日益减轻和日益注重国际舆论，这种直接强迫劳役大为减少。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强迫劳动的推行，虽然有某种修改，仍然是殖民统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少法国殖民政府的情况是如此，例如在西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殖民政府，特别是在铁路的建设上仍然通过养路捐的方式使用了大量非洲人。再者，法国殖民官员还经常批准征集劳动力用于商业目的，例如用于赤道非洲的橡胶种植园和科特迪瓦的森林。[28]而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当时依旧到处充斥，足以激起公众的愤怒，安德烈·纪德在他所著的《刚果纪行》（1927年）一书中所作的著名评论对此有极其清楚的记载。 327

在德属西南非洲和南非联邦出现的劳动法规是劳动法规中压迫最利害的形式。战后，西南非洲成为南非的委任统治领地之后，南非联邦的政策当然也随之扩展到了那里，但是在此之前的德国政策，在性质上和严厉程度上都同南非联邦内部制定的政策极其相似。那里早就强制推行了通行证法，还有身份证，两者都是限制非洲人自由迁移；没有劳动合同的非洲人都得受流浪惩罚法的制裁，而劳动合同又是专为德国雇主的巨大利益而设计的。在南非联邦也有通行证法和反流浪的法令，违反者要服劳役，即使是付给最低工资。1923年的《土著人（城镇地区）法》和1927年的《土著人管理法》进一步强化了上述通行证法，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法，诸如1922年的《学徒法》则有效地限制了一个非洲人可能采取的就业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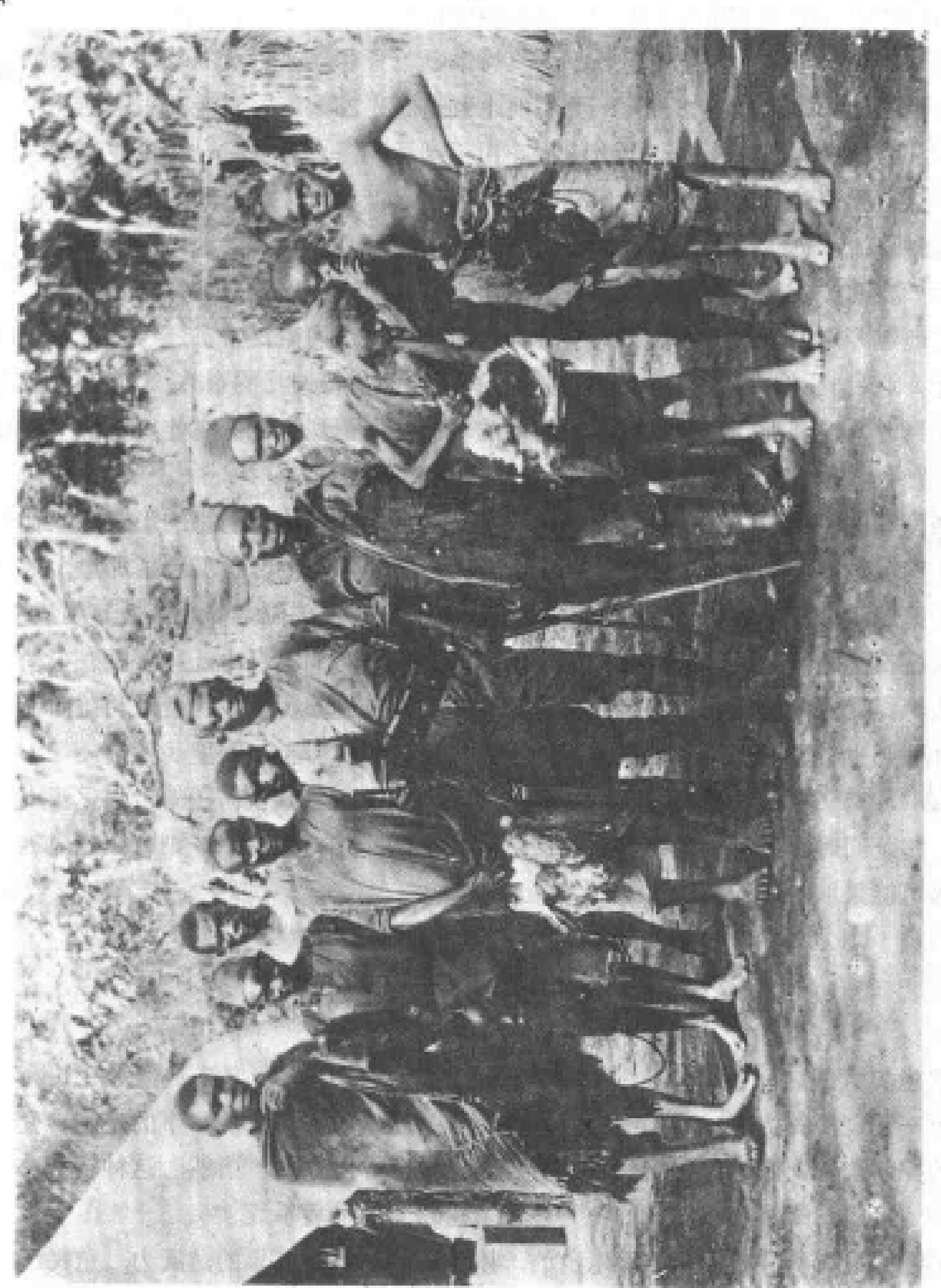
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不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提出的和实行的殖民统治理论和方法是何等变化多样，但是出现一种官僚统治模式则是十分明显的。当时，殖民统治已从军事的控制转变为文官制度的控制，与此同时，直接使用武力也为行政诱导所取代。当然，这种转变决不是否定这样的事实，即依靠欧洲武器作为显示殖民权力的最后手段。

正如殖民统治最狂热鼓吹者所津津乐道的，殖民统治的赢得依靠的是武力，殖民统治的维持也同样是依靠武力。铭记这条格言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在它们的军事机构中大量利用从当地居民中征集来的人员。尽管组织形式和战斗力依地区和具体国家的目标不同而有所不同，但这类殖民地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基本上是执行了治安职能，

[28] 关于科特迪瓦的情况研究已收入Z.塞米比（Semi-Bi），1973年和R.P.阿努玛（Anouma），1973年的著作之中。

328



图片 13.4 强迫劳动——在 1917 年 4 月德属东非战役中，东非土著士兵在鲁伏河附近替文职政府征集劳动力

并且在这方面有新建立的保安部队相配合。由于他们经常被派往在文化上和部族上都是陌生的地区服役，于是，非洲士兵就从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分化出来，而经常遭到当地居民的敌视。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由于欧洲人不让非洲人担任领导职务，遂使这种军队从来没有像亚洲和近东的类似军队那样，在独立运动中发挥政治作用。事实上，对于在其统治下的非洲人仔细制定过重要军事政策的唯一殖民国家就是法国。从20世纪的最初年代起，法国就把撒哈拉以南非洲看成是在世界上保持法国军事姿态所不可缺少的人力储备地。

然而，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在这个被当代人标榜为“殖民和平”的时期里、军事活动仍然不时以严重的方式打断非洲的日常事务。欧洲人公开表示希望尽可能保持非洲军事上的中立，事实上此种愿望从未付诸实施。法国人于1919年执行了一 329 项征兵法，从而每年都可以获得一万人的非洲人部队。英国人建立起一支苏丹防卫军，独特之处是同时配备了苏丹人军官和英国人军官，但是基本上是用于近东和东非的帝国战略需要。同时兼具占领军和治安军特性的比属刚果保安部队，在这段时期内经常被用来平定不同宗教相结合的宗教运动的反抗。[29] 在公开战争的规模上，事态倒是易于衡量的。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征服利比亚的战争以及同时期西班牙和法国为解决摩洛哥的里夫战争所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一清二楚的。但这些战争在规模上都远远赶不上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进行的掠夺性战争，本章所讨论的时期随这场战争一起悲剧性地告一段落。

以上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非洲军事形势的叙述并没有严重削弱这样的论断，即欧洲殖民方法和实践的分歧意向，回顾起来，似乎是最为值得重视的。殖民地的官僚主义化的确为非自觉地趋向民族独立的运动奠定了部分基础，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种新型的政治上层人士的轮廓正在慢慢地出现，因为在各种殖民行政机构的低层职员和委任的酋长们——特别是在英属殖民地——正在学会运用（那怕仅是很有节制地）拿破仑的诫命：“有才能者有前程”。训练学校，例如达喀尔的威廉·蓬蒂学校，就是负责培养教育工作者和行政官员。殖民政府越来越需要依赖这些人。主要是在城镇地区，“变革之风”正在缓慢地兴起。

虽然，这并不是欧洲人殖民官员的真实意图，即使在他们口口声声强调“土著人至上”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下述的想法，即只有依靠他们，非洲居民的福利才能得到保证，并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有效地组织起来。正如克罗默勋爵曾经指出的，优良的政府和独立的政府在殖民地结构中是相互对立的目标。因此，殖民制度是作为一种专制制度而存在的，这个制度决不会认真地考虑把政治权力授与它假定为之服务的非洲人。殖民制度最普遍的特征就是家长式统治，分担职责至多只能容许在白人移民众多的地区实行。“土著人至上”的目标和解释在肯尼亚屡经变化的史实对这一点是富有启发性的。 330 1923年的白皮书使用了“土著人至上”的概念作为拖延印度裔居民要求在殖民地事务

[29] 在关于非洲军事历史发展的几本研究著作中，最优秀的简明介绍，也是本文评论中常加引用的是J. S. 科尔曼（Coleman）和B.小贝尔蒙特（Belmont Jr.），见J. J. 约翰逊（Johnson）编，1962年。

中享有平等代表权的一种手段。随后发表于1927年和1930年的白皮书却限制了这个概念，并且包含了对人数日益增多的当地白人居民让步的内容，当地白人居民现在被准许参与“托管”的职责。因此，“土著人至上”这个概念实际上并不含有非洲人利益占支配地位的意义，仅仅是对他们的利益表示尊重而已。

即使为了产生某种责任制殖民政府而实行议会制的地方，这种制度的实行也是为了使白人优势得到保证。例如在阿尔及利亚，1919年的若纳尔法批准的双重选举团选举制规定了阿拉伯人进入财政评议会的比例要低于欧洲人，这种初期议会机构只代表利益集团而不是代表地理区域。在南非，当地实行的议会程序中，非洲人丝毫不起作用。《1936年土著人代表制法》规定的代表制实际上是把非洲人从开普殖民地的选举名册中删去，在整个南非联邦内把他们的政治地位限于选举有限数目的白人，由这些白人来代表“土著人利益”。在这两个主要的白人移民殖民地里，同所有其他有欧洲人定居的殖民地完全一样，人口上的少数事实上却是政治上的多数，这样就排除了同欧洲类型的民主政府有任何相似之处。

如果说不同殖民方法的政治总效果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相互类似而不是彼此歧异，那么，在为转移殖民政权选择时间的准备工作中，方法的差别就很重要了。殖民政权在非洲的最终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人继续统治的能力——财政的、军事的和道德的条件的综合——在非洲民族主义压力下日益衰退。然而在殖民主义的最后10年里，前此建立起来的控制方法对决定变革的进程很有影响。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强调“一致性”、还是强调“区别性”以及是着重中央集权、还是着重地方自治，这时都成为实际的决定因素。正如我们将在这部《非洲通史》结束卷中看到的，最顺利的权力转移是通过英国式“威斯敏斯特体制”完成的。它是殖民地立法议会的派生物。通过殖民地立法议会产生了政治反对派，这在黄金海岸独立成为加纳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激进的变革发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较后一段时期出现在葡属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这些地方，同化主义者认为这些地区都是本民族国家的海外延伸部分。

殖民统治方法上的歧异在历史上不像对殖民形势估计上的相同那样重要。尽管公佈了在国际联盟文件中被奉为神圣的声明，也无视自己的全球地位由于世界大战而遭到削弱，在非洲的欧洲列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并未想到政治权力转移的必然性。除了埃及外，非洲被看成是殖民主义将长期保持的一个大陆，而且殖民统治方法的制订全都是为了适应欧洲人的利益和意愿。因此，不管所采用的具体的殖民统治做法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最基本的政治活动就是让非洲人去适应欧洲人的目标。

331

两次大战之间时期，全部历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殖民体系建立起总的行政管理结构，独立后头10年的民族主义政府就建立在这个框架里。在欧洲人安排好的结构内进行政治活动的初步规律化是那个时期欧洲人向当时非洲引进的现代化的主要方面，只不过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吴期扬译）

14 殖民经济

W.罗德尼

征服和新的生产关系，1880-1910年左右

332

自15世纪后期以来，非洲作为一个外围和附属的部门加入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但是在被迫接受欧洲殖民统治的前夕，非洲土地上的日常经济活动并没有受外国的直接控制。这一状态是非洲丧失主权以后，才以缓慢的过程逐渐形成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以前，还不能说殖民经济体系已经达到全盛时期。因此，自1850年到1935年可说是具有殖民主义特点的生产关系奠立基础的时期。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而且有时可能还要晚一些，非洲人的反抗和抵制，才使踌躇满志的殖民者陷于困境。非洲人对于破坏他们经济独立的企图反应强烈，这在前文讨论过的一些较为著名的反殖民抵抗事件中已经说明，如塞拉利昂的反茅屋税叛乱、安哥拉的拜隆杜起义、德属东非的马及-马及战争以及南非的班巴塔叛乱。

非洲人目击了以公路、铁路和电报诸形式表现的新型经济的最初物质成就。运输及交通线是征服的序曲，它们是占领区的后勤必需品，为的是使占领区能成为进一步侵略的补给站。非洲统治者往往对欧洲人建造的运输和交通基本设施抱有敌意。他们指使人们推倒电线杆，破坏火车铁轨，如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法国军队首次出现在尼日尔／塞内冈比亚地区时所发生的那种情况①。然而，很少公路或铁路属于纯军事用途；为便于征服之用的同一条铁路，也用于榨取花生、棉花等等。

333

沿海各地的非洲经济很快就沦为殖民国家经济的附属体，而内陆民族往往是最后才被带进产品收集、种植经济作物和工资劳动的网络中去。为了使某些非洲港口具备深水泊位和活跃的装卸能力，需要花相当大一笔费用②；但是这却比投放在建造深入内地的公路或铁路干线的资本要少些。因此，殖民经济运转得迟早的决定因素之一，就在于到海岸的距离。

影响到牢固树立殖民经济的最有决定性的可变因素是非洲各地原已介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这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愿意管辖他们已经熟悉的地区，又一方面是因为殖民前的

① G.甘尼尔（Ganier），1965年；参阅本书第6章。
② R.G.阿尔比恩（Albion），1959年。

外贸倾向使得当地非洲人社会对殖民经济的新事物比较敏感，如种植专为卖给欧洲人的作物。从塞内加尔到塞拉利昂、从黄金海岸（今加纳）到尼日利亚和从刚果河到安哥拉这些贩卖奴隶的地区，其沿海地带是最先被欧洲殖民者侵占的。这些地方，在正式的殖民统治以前，就出现了殖民经济的特点，因为非洲人和欧洲人互相都致力于刺激出口商品，使之作为奴隶贸易的"合法"代替品。西非的统治者、职业商人及居民中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人懂得保持对外贸易关系和获得进口货物的好处。当然非洲人愿意与欧洲人贸易并不总限于沿海地区。欧洲人知道，他们与西非的贸易根基在于内陆。实际上，他们过高估计了在他们进入这些地区的时候容易弄到手的财富的数量。这就是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欧洲人对尼日尔/贝努埃两河汇合处上游地带农村在商业上十分重视的原因。

在非洲大陆的东边，印度洋贸易并不完全面向欧洲国家，而且欧洲人和非裔欧洲人也不能控制东非的远距离贸易。殖民者非得排挤掉阿拉伯、斯瓦希里和印度的商人不可。东非的经济所强调的前提，即殖民活动首先集中在那些较早卷入洲际交易的非洲地区。英国和德国最感兴趣的沿海地区就是桑给巴尔（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素丹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他是向欧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美国人供应象牙、奴隶和奴隶种植的丁香的最早买办。从斯瓦希里沿海城镇开始，欧洲殖民者继阿拉伯人之后，谋求获取位于湖泊地区的商队路线的终端。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叶，维多利亚湖地区已经出现"大瓜分"，在沿湖一带，殖民企业很快移植到已有高度水平的非洲经济活动中去。当英国人于 1902 年筑成他们自蒙巴萨到维多利亚湖的铁路时（见插图 16.3），它吸引了原先就在南边的坦噶和巴加莫约的商队运输的相当一部分货物。为了与英国人竞争，德国人在 1905 年也开始建造一条由海岸到内地的铁路，这条铁路正穿过贩卖奴隶和象牙的路线到达坦噶尼喀湖。这个湖泊位于中非的深处，它也是阿拉伯人的贸易网络地区，为欧洲殖民者提供了最初的经济基地。

334

北非结合了东非和西非的某些特点，并以鲜明的特色表现出来。北非的经济既是非洲穿越撒哈拉商路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地中海综合经济的一部分。与欧洲经济打交道的早期经验，使北非社会有些部分适应了为欧洲进行的密集生产和在当地市场上广销欧洲商品。但是界限分明和剥削成性的统治阶级尽管愿意与欧洲人保持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却决心捍卫国家的疆界。因此，殖民统治常是在保持北非人名义上权力的同时向前推进；而殖民经济则在完全征服当地政权以前，就已建立起来。

欧洲对埃及进行殖民地化，其序幕可追溯到 1798 年拿破仑的远征。19 世纪欧洲人的出现打乱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济改革。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引进长纤维棉花，是 19 世纪 40 年代埃及作为一个主要农业生产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条件。英国和法国在使埃及工业化失败以后，就设法控制了埃及的贸易，并打进土地和抵押品的国内市场③。在阿尔及利亚，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对法国人的艰苦抵抗仍在继续，但那个时候，当地白人移民的农业却已占据了这个国家，成为阿尔及利亚殖民经济的主要特点，并且不同

③ C. P. 伊萨维（Issawi），1963 年。

程度地在马格里布各国和利比亚出现　突尼斯进入殖民时代是在1881-1882年；摩洛哥和利比亚则在1912年部分地被并吞。马格里布各国建立起白人移民经济的时间各地相隔大约30年——首先自1860年起在阿尔及利亚，然后自1890年起在突尼斯，最后自1920年起在摩洛哥④。意大利在利比亚的移民比法国在马格里布的移民要少，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当地白人移民农业直到利比亚人民完全被打败才建立起来，这大约是在1931年。

虽然在北非这块土地上各国殖民经济的起始年份相差很多，但通常以19世纪80年代作为殖民制度的开端仍是恰当的。欧洲列强主要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使北非经济沦为殖民地附属地位。当大量资本投入苏伊士运河，当从埃及到摩洛哥的统治阶级接受大量贷款时，北非也就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一过程在1880年达到顶峰，导致当地政权的依附性日益增加，最后导致被这个或那个拥有利益的欧洲国家篡夺了主权。因此，虽然殖民经济在北非出现的时间早、历史长，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欧洲的垄断资本地位突出之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确立。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南部非洲。 335

到了帝国主义瓜分时期，在南非欧洲人定居的地方有好几万白人与非洲人保持经济联系。由于趁非洲人劳动力处于白人指派之下强迫转让土地，非洲人的经济独立遭到了破坏。在19世纪，白人和黑人“处于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之际”⑤。这种新的联系开始成为殖民性质，只是在于它们把占人口少数的外来移民与占人口多数的本地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主／从地位，但是由于发现钻石和黄金引起大规模的资本涌入从而这种联系很快就发展成为另一种类型的殖民关系。

在南非开采钻石和黄金如果没有现代技术和相对地大量集中的资本是无法进行的。无论是英国政府或是自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采矿垄断企业都绝不想听任矿产资源由布尔人控制；当地下资源及非洲劳动力可望赚取巨额盈余汇回宗主国之际，也决不愿意让荷兰移民的农业利益集团在可耕地、水、牧场和牲畜方面享有优先权。布尔人的社会组成除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之外，还有奴隶种植园、封建领地及家长制社会等因素。当金伯利发现钻石（1870年），特别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黄金（1886年）之后，资产阶级分子决心统治南非的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不管其属何种族。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也是反帝国主义的抵抗性质的战争，尽管在含义上十分反常，因为在此同时，双方都企图进一步巩固移民的殖民主义。本书第9章讨论过的布尔人移民自治的企图遭到失败和该地区内非洲各族人民的被压制，标志着南非殖民经济的形成，它毫无疑问加速了将原料、利润及其他收益源源不断地转移给资本主义宗主国。

资本与强制手段，1900年左右到1920年左右

非洲的抵抗运动使经济殖民地化的步伐大为减慢，至少从1880至1910之间的30年是这样。此外，欧洲垄断资本的眼前利益是不多的。在谋求积累的重商主义时代，非洲 336

④ S. 阿明（Amin），1970年，第256页。
⑤ C. W. 德基韦特（de Kiewiet），1965年，第34页。

博得受高度重视的优先地位，但是尽管随着瓜分和征服而来的政治-经济控制增加了，19世纪非洲地位相对默默无闻的状况却一直持续到殖民主义的早期。以垄断资本主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投资趋向来看，有关非洲殖民经济的增长数字并不引人注目。这些数字中关系最大的是有关进口和出口的数字，因为进出口部门是殖民经济的关键特征。非洲进口的货物数量增长缓慢。除南非以外，进口货物单上主要项目不是机器、工厂或高级消费品。贸易的增长通常意味着产品种类的扩大，这是19世纪中叶的特点，而商品种类尚未彻底摆脱奴隶贸易时期的模式。欧洲与非洲的交易中，棉布仍占主导地位，在本节论述的整个时期中，许多地方棉织品进口从来不曾失去优势，虽然其他家庭用消费品，如厨房用具、收音机、自行车及缝纫机，后来在普及方面有所增长。

非洲内部出口商品的生产进展缓慢，而且并不总是稳定的。例如天然橡胶生产只是19世纪80年代在西非享有短暂的突出地位。在东非和中非，较有规模的橡胶工业经过1912-1913年的国际价格危机就衰落了；结果最后弄得只有利比里亚被认为它的橡胶产品是一心开发非洲的欧洲人所一度广为兜售的东西。在殖民时期，非洲主要产品较常见的产量曲线包括本世纪头20年中产量微不足道的第一阶段和随之而来的1930年前产量明显增加的第二阶段。棉花、棕榈油、咖啡、花生及可可在其相应产区都表明这一特点。

在殖民时期的早期，只有小量外国资本投入非洲的工业及农业。南非又显然是例外；在较小的程度上，阿尔及利亚也吸引了白人移民及采矿资本。然而缺乏资本的情况可能被夸大了⑥，因为在非洲的殖民经济中，资本并不是用来调动劳动力并由此获得盈余的唯一手段。相反，是强制手段起了主要的作用，把劳动力和经济作物带到市场上去。在欧洲，封建主义的衰落和伴随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兴起经历了残酷地破坏农民的独立性，并从而产生了一个工人阶级，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入工资劳动作为生存手段。在非洲，**337** 当地乡村经济的自主权遭到更为猛烈的破坏，因为没有内部的社会机制使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可供投资于非洲的欧洲资金自然只好与非洲劳动力发生关系。但是，这样的资本数量不足，不能通过优厚的工资和高的价格吸引劳动力；而从非洲人的观点来看，固有的困难是，在服从于帝国主义经济中心的同时，从独立的非资本主义结构跳到半资本主义结构，造成了损害。因此，不得不以大量强迫干预的办法征集非洲劳动力，或是赤裸裸的强制，或是披着新的殖民政权的法律外衣。

公开的强迫劳动形式和勉强伪装起来的奴隶劳动形式，是殖民经济在非洲得以巩固的突出因素。本世纪早年，圣多美岛的葡萄牙人的“契约劳工”和利奥波德国王所属的刚果自由邦（今扎伊尔）的恐怖行为都是骇人听闻的，因此不得不做一些改革，或者至少是加一点伪装，以平息西欧自由派舆论的抨击。欧洲的工人阶级有时同非洲的反抗者联合起来共同纠正这种情况。在1904年到1907年间，德帝国政府成功地无情扑灭喀麦隆、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和德属东非（今坦桑尼亚）的非洲人骚动；此后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帝国国会内通过立法促使殖民制度改革。当1918年后，如何处理德属殖民地成为一项问题提出来时，英国带头提出，应该永远剥夺掉德国拥有殖民地的权利，因为德

⑥ S. H. 弗兰克尔（Frankel），1938年。

国的殖民主义被认为强制性更为利害。经过整理的论据归罪德国官方依旧使用奴隶劳动和广泛采取鞭刑。德国人的反应是对这些指控进行辩解，并反称英国人（及法国人）犯有这种罪行。⑦事实真相是，在征集非洲劳动力和强使其留在生产场所方面，殖民生产方式具有的强制程度无论哪个国家都超出凡常。

殖民统治刚开始的时候，私人资本有时也自己采取警察行动和强制措施。持有特许证和享有租让权的公司就往往如此，它们在非洲的南部和中部以及尼日利亚和德属东非特别活跃。乍看起来，这些公司在积累过程中似乎不受什么限制。然而，它们承担了破坏非洲政治独立和为殖民经济打基础所必需的武装干涉的费用。它们的残酷行径确实不受任何限制，在人口稀少难以征集劳动力的地方特别是这样，如在法属刚果（今刚果）。但是特许公司执行不了强制性的国家职能。欧洲国家只好直接担负起管理各自殖民地的职责——一般在19世纪90年代——由在当地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机器代表私人资本家 338 管理经济。私人资本家通常由于放弃自己的政治特权而得到补偿，这清楚表明殖民政权所维护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补偿是资助这些公司的一种手段，可以使它们的企业更加稳固，胜过过去它们实际上与非洲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时的情况。

宗主国政府和它们在非洲的殖民政权为了经济剥削，必须继续推行政府强制手段，因为面对着非洲人的反对，殖民经济往往只好拼命打开一条出路。在很多地方，白人移民类型的社会经济结构能够兴旺发展之前，先要夺取非洲人的土地。只有在政府帮助之下，必要的公路和铁路之类基础设施才能建成，而政府支持的一个方面就是征用非洲劳动力。运用税收以建立货币经济，这种办法已是众所周知不需详述了。税收无疑是主要的强制手段驱使非洲人接受工资劳动或从事经济作物生产；随之而来的增税加深了非洲人的困境。欠税人有时为私人资本所利用，但更常见的是政府利用他们来修建和维修行政中心、公路和桥梁。

殖民政府对得到许可对殖民地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势力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奴隶制的残余遭到禁止，因为它们已不合时代。欧洲雇主对非洲人施加鞭笞或体罚是受到非议的，到20世纪20年代一般都已立法加以反对。殖民政府像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力图保留对合法暴力形式的垄断。与此同时，它设法一再向欧洲投资者或白人移民保证，政府的权力毫无问题是供他们使用的。只不过是由司法形式的刑罚取代了雇主命令下的鞭笞罢了，乞灵于司法刑罚的程度则远远超过欧洲对付工人的情形。整个20世纪30年代，非洲的劳工法一直十分落后：不履行合同差不多总是不按民事犯罪处理，而作为刑事犯罪；非洲工人单方面终止合同，继续被认为是“开小差”，带有这一术语的一切军事含义。

非洲有些地区较之其他部分更早倾向于以外贸为方向，也有一些非洲人主动与欧洲人建立起殖民经济关系。自19世纪前期以来，西非人已试种新的出口作物，德属东非及比属刚果东部的人民则显著不同，他们是在鞭笞刑罚驱使下才改种棉花和其他出口作物。东非商队贸易者并没有像西非殖民以前时期的贸易那样使大量的非洲人同欧洲市场及欧洲货物发生接触。因此，当地人并无强烈的主动动机要把他们的一部分劳动力从满足自 339

⑦ H. 施内（Schnee），1926年。

己的需要中抽出来。可是即使在西非，殖民政府也不得不常常向耕种者施加压力，以保证他们参与到殖民经济中去，并按照欧洲资本规定的条件办事。瓜分正好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反复的危机背景之下这一事实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例而言，自1883年以来，欧洲人极想在塞内加尔扩大花生生产，当时由于价格下降，对非洲人明显地没有吸引力，于是只好靠税收来提供有力的"推动"⑧。在有些地区，由于殖民以前时期的贸易使非洲经济的依附性根深蒂固，因此殖民经济关系传播较快，而刺激殖民经济所需的强制力则相应而减少了——虽然从来没有完全不用过。

欧洲的资本与强制压力下的非洲劳力的结合，使产品获得可观的盈余，供作欧洲人的消费和出口。因为采矿和种植园以及进出口商号的资本不是本地的，所以作物和矿产大量输送出口，利润外流。不过毕竟有些积累用作再投资，这就使得南部非洲资本的增长达到巨大的数量，它并且加速了西非商业公司的垄断化过程，使它们有可能支持和联合在欧洲的制造业与销售企业。在阿尔及利亚和南非，以及较小程度上在突尼斯、肯尼亚、南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来自殖民经济的最初利润也使白人移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并有明显的经济活力。

非洲人对殖民地经济的参与，1920到1930年

殖民经济在非洲形成的年代里，强制手段在经济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后它又取得在资本主义中心从来不曾具有过的突出地位。到了一定的情况下，各个殖民地的经济变得较少地依赖外力和依赖非经济的制裁手段作为主要的推动力。这一转折点一般首先在英属和德属殖民地、随后在法属、继而在比属与葡属殖民地出现。每当它出现时，非洲人就把货币经济作为生活中的现实来看待——一种他们无法逆转，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他们准备欢迎的新秩序。这一新阶段涉及到在谋求生计和参与强加的商品生产经济这二者之间加以选择。殖民地非洲生产着范围广泛的农业和矿业出口物品，但是对任何340 非洲社会来说，在当地只可能有一种选择——或者是在欧洲人的农庄照管葡萄，或者是种植一英亩棉花，或者是每天下矿井。真正的选择是受生态环境和特定的殖民政权的政策制约的。不过非洲人对于涉及他们本身的条件也施加影响。他们开始是对工资率及价格表示反感；最后则卷入来源于殖民经济又对殖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各种社会及政治问题的议论之中。

从非洲大陆整体而言，上述阶段的开始并没有精确的日期标志。这个阶段与征服时期和强制性经济关系占优势时期往往是重叠的。在法属赤道非洲和葡属领地，原始性的强制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30年代。必须参照各个殖民地和同一殖民地内各个地理地区的具体情况来估算转折的时期。有些地方在20世纪头10年结束时殖民经济就已经固定下来。它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此后又在较高水平上恢复。

采矿业主宰了南部非洲的战后经济，几乎把整个地区变成单一的殖民经济。首先，

⑧ M. A. 克莱因（Klein）编，1968年，第285页。

垄断化和卡特尔化的过程保证了在当时的南非联邦、西南非洲和南北罗得西亚的巨额资本取得霸主地位。其次，采矿中心的经济力量需要并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这种劳动力队伍扩展到不是以采矿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地区——最为明显的是一些高级专员统治地(巴苏陀兰，现今的莱索托；贝专纳，现今的博茨瓦纳；以及斯威士兰)、尼亚萨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葡萄牙人与南非政权相勾结，继续保证有大量工人自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源源流入南非。这使人想起奴隶制度，但矛盾的是，对许多非洲人来说，到矿山去反倒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殖民主义在南部非洲内部造成极大悬殊。在少数地点引进大量集中的资本，在这些地点以外经济活动则处于低潮。资本所到之处，非洲人就得有纳税义务，他们需要的各种消费品都必须以现金购买。在这一点上，矿山常常显出是唯一的谋生机会。

种植园部分的殖民经济，其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与矿山部分相同。从地理上讲，这两部分在南部非洲是重叠的，在比属刚果和北非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重叠的。种植园把大规模的资本与大量劳动力结合起来。一个强大的国际公司控制了比属刚果的油棕种植园，德属东非的西沙尔麻种植园由得到工业和银行资本支持的德国大公司主宰；即使在英国人管辖下这个产业相对地比较分散，从事西沙尔麻种植仍然需要有很大一片土地和一座 341 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工厂。政府总是站在种植园主一边，给他们以不可估量的帮助，便于他们用压低的工资获得劳动力供应，从而取得超额利润。因为在非洲东部、南部和中部的特定地区内不存在可以赚得货币收入的其他形式，所以种植园成了吸引远离家乡的劳动力的场所。坦噶尼喀有大量劳动力自尼亚萨兰、北罗得西亚、莫桑比克及卢旺达-乌隆迪（今卢旺达和布隆迪）涌入。英国政府避免与葡萄牙政府缔结条约，以躲避从莫桑比克获得正规化的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供应完全依靠坦噶尼喀与莫桑比克之间的差别而获得，因为莫桑比克的货币经济薄弱，而且那里一直存在着公然的强征赋税和强迫劳动，吓得非洲人纷纷逃越边界。

各类工资谋生者只占非洲成年人口中的极少数。毫无疑问，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在非洲人口中占最大比例——形成所谓的挤奶型经济，在这种经济体系下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直接交换未经加工或只是极初步加工的经济作物。[⑨] 对非洲人来说，种植经济作物比从事工资劳动有稍大的活动余地。在出口作物之间偶尔也有所选择。粮食作物是为家庭消费生产的，有时生产是为了在当地出售以取得货币，极少是为了出口。非洲农民利用这种环境中有限的伸缩性，来决定他们所要种植的或准备出口的种类和数量。价格是由宗主国的代理机构决定的，但是农产品价格可因农民改种别种作物或将其存货投入当地市场而受到少许的影响。在少数极端的事例中，他们转而采取对出售其产物“索取高价”的办法，即使这意味着使他们自己受到严重损失。

每当小农耕作与雇佣劳动相抵触时，非洲人的选择几乎无例外地倾向于自己耕种。实质上，非洲农民生产的所有农业主要产品都与别处的种植园有关——最明显的如拉丁美洲的咖啡和东印度群岛的棕榈油。非洲社会的力量在于它那里有农民种植的深远影响。

⑨ R. 杜蒙（Dumont），1966 年

中非人口密度低，成了有着强迫劳动坏名声的享有特许权公司的活动场地。在中非发展起来的这种白人移民农业，继续对农村无产阶级采取强制手段、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莫桑比克及安哥拉的蔗园、西沙尔麻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也出现在比属刚果，成为资本密集型农业。这使利弗兄弟公司能于1911年在比属刚果建立油棕榈种植园。他们还申请在英属西非获得类似的特许权，但是遭到拒绝，因为当地殖民政权正确地认识到，像这样的一个冒险事业必须要用暴力制服成千上万的居民。此外，殖民主义者在西非早已得到证明，非洲农民在生产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并为欧洲贸易界提供优厚利润方面是成功而且有活力的。法国人坚持在西非推行白人移民农业，但这种形式与非洲人的小规模生产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在东非、尼亚萨兰及南罗得西亚不得不采用立法来补助和保护白人移民经济使之不受非洲人竞争的影响，否则就无法得到足够的劳动力。在采矿只不过是农业殖民经济的局部插曲的地方，非洲人还是再一次选择小农生产，例如，在阿散蒂及黄金海岸的西部省和坦噶尼喀的萨克马兰德就难于招募到当地的矿工。

342

虽然有一些非洲人社会是被迫种植经济作物的，但也确有一些非洲人面对着官方的漠不关心或敌意，却主动种植经济作物。他们迫切需要运输和销售方面的基础设施，一俟铁路线完成，他们就抓住机会。有许多情况，在殖民政府修建桥梁和公路支线之前，他们就自己动手了。新作物的种子来自殖民政府、传教士、欧洲人的农庄及已经从事种植新作物的非洲人。可可和咖啡是两种最出名和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它们的扩种主要依靠非洲人的主动性。次要的作物，如茶叶、烟草及除虫菊也体现了这同一原则。此外，非洲人特别勤奋于种植赚钱较多的作物。以可可来说，只要勉强适用的地方都可作为种植地。在另外场合中，非洲人的选择促进了反对不公平的殖民立法的斗争。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可以看到，坦噶尼喀的几处高原地区，非洲人坚定不移地要种植阿拉伯品种咖啡，而不愿做雇佣劳动或种植收益较少的罗伯斯特品种咖啡。非洲人种植咖啡树的速度要比殖民政权的破坏来得快，他们确实获胜了。⑲

在小农耕作成为殖民经济压倒一切的主要形式的地方，它在从实际生产地带以外的广大地区吸引劳力资源方面起了与矿山和种植园相同的作用。塞内冈比亚的花生种植，吸引了来自塞内加尔和尼日尔两河内地的季节性劳动力；黄金海岸和科特迪瓦种植的可可，吸引了上沃尔特的劳动力；而乌干达咖啡种植者则求助于卢旺达-乌隆迪及坦噶尼喀的劳动力，以扩展生产。经济作物种植以及矿山和农业的工资劳动合在一起，占直接参加殖民经济的非洲人中的压倒多数。然而新的商品关系又产生或转化出一批其他的活动。非洲广阔的森林资源得到认真的高度重视是相当晚的，但是在加蓬早就出现了采伐木材的工业，而凡是具有森林资源的地方，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一类的企业在经营。运输网是更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因素。成千上万非洲人在港口、在火车上、和在公路网发展的地方，作为卡车司机找到有工资的工作，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顶戴搬运业衰落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343

随着殖民经济日趋成熟，非洲社会的任何部门都不可能处于旁观地位。尽管有着保

⑲ W. 罗得尼（Rodney），未注明日期。

守的名声，即使不是更早，到20世纪20年代，所有畜牧部落都被卷入货币经济之中。他们出售肉类供当地消费，有时连同皮革一起出口。在后来组成索马里的那些地方，这种现象成为那里殖民经济的主要表现。渔业人口也同样受到影响。传统项目干鱼及熏鱼的贸易像肉类和其他食品贸易一样，变得依附于主要出口经营者的现金，并且敏感地反映了以"可可钱"、"棉花钱"等等为收入的农民的季节性购买力。非洲人自然尽可能采取有利可图和惬意的方式来赚钱。殖民政府、教会及私人公司雇用低级职员、工匠及（殖民政府和教会所属）学校教员。受教育与得到这些职业的机会有关，这种机会特别是与城市人口的增长有密切联系。没有念完小学的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得到较受尊重的有薪金的职业者，便填补到殖民经济的空隙中去，成为仆人，或成为警察或军队中的一员，或寻求各种形式的城市"非法经营"，诸如卖淫。

非洲人个人的反应基本上只不过是对强加给他的殖民经济的动力做出响应。他们扩大和加强了这种经济，并认可了各种剥削方式。

工资一直极低，蓬勃向上的倾向受到抑制，购买力不断下降，部分原因是由于周期性的通货膨胀，部分是由于工资被压低或落在商品价格的后面。白人移民及其他住在当地的欧洲人以及外国企业的经理联合起来压低工资，并通过发放工作证使劳动保持半封建性，这种证件严格地限制了劳动力由一个雇主自由转移到另一个雇主处去。在本文所谈到的这整个时期，雇主对工人组织总是抱有敌意，因为后者对提高工资率能起作用。落后的计件工资制度被广泛推行，而且工人生病、伤残、失业及年老都得不到救济金。此 344 外，主要是季节性迁移带来劳动力的经常流动、技艺水平低以及普遍的种族观念，都使非洲工人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与资本家对抗时处于不利地位。

非洲农民挺身反对商业制度。西非商人的公司通过"联营"进行垄断是众所周知的，同时整个大陆的贸易公司则以提高价格拒绝竞争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实际上，像东非的"亚洲人"和西非的黎巴嫩人这类中间商人，也彼此间规定好价格和条件，使得非洲农民出售货物时，很少有选择的余地。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在过秤、加工过程（如在轧棉厂）、运输、计算收入、偿还贷款或预付金等可做手脚的地方，都有受欺骗的可能。非洲人生产者也从贸易中间人和商业公司零星购买。在殖民经济和宗主国之间显然存在着基本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反映在非洲人所得的报酬很低，而进口的制成品价格相对很高，两者相去悬殊。这种悬殊也反映在与宗主国相比较殖民地工资标准很低。当然，不平等的交换不单纯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来自政治权力的不对称，也由于非洲人生产者在组织上和技术上的薄弱。[51]

非洲人不论是否生产供出口的剩余商品，都受到殖民制度的剥削。征税的范围越来越广，征来的税款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远远不如用在建设政府及经济基础设施的多。矿山、农场和种植园的流动劳工是在对以前的自治村和当地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得来的。这样，资本就逃避了支付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像奴隶制度下一样，到来的劳工完全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以外形成起来的。工人从来得不到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也得不到

[51] S. 阿明，1974年；A. 伊曼纽尔（Emmanuel），1972年。

任何社会福利，因为他们兼做农民，而且在他们做工的一生中，他们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都是在停滞不前的水平上自食其力，欧洲人认为非洲人生活就该维持这种水平。同样地，进入当地市场或出口市场的经济作物是作为超过农民维持最低生活部分的剩余而产生的。但如果出于这些原因，就下结论说殖民地是存在“现代的”和“传统的”两个不同部门的“双重经济”则完全错误了。⑫所谓生气勃勃的现代飞地和落后的传统形式是辩345 证地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出口部门的增长之所以有可能，只是因为它能经常从非洲各地社会以土地、劳动力、农业贡赋及资本的形式取得好处。这些社会的停滞不前有其外来诱因而不是本身固有的。如果它的劳力被抽走，它的理论基础被摧毁，像这样的“传统形式”就不再存在。它的农业生产不是下降便是不能维持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下，按资本主义说法是没有增长的孤立地区，它仍然受到非洲出现资本主义的影响。

依赖与压制，1930-1938年

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生产关系经历了不少年头。在这段时期里，无数自给自足的非洲人经济或者遭到破坏，或者转化为从属性的。他们之间相互的联系中断了，像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与东非和中非湖泊地带的商业间关系的情况就是那样。非洲与世界上其他部分以前存在的联系，主要是与印度和阿拉伯的联系，也受到了不利的影响。一大批互无联系的殖民经济形成了。经济的分隔并不完全像政治的分隔那样，因为较强的资本主义大国会侵蚀较弱国家的殖民地。在1917年组成英美公司以后，甚至英国也不得不容忍美国资本渗入南非。不过，一般都把武断地划定的政治分界线作为经济的界限，它们都是小规模的、人为的，而且分别面向欧洲。它们缺乏洲内的、地区间的或内部的联系。这些就是依赖外界的前提，表现在资本、市场、技术、服务部门，甚至在决策过程上。

从定义上说，殖民经济是殖民国家经济的延伸。非洲经济首先被纳入它们各自的殖民国家的经济之中，随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领先国家的经济之中。最明显的联系之一是海运。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海运资本家能有此运转能力。葡萄牙几乎完全数不上；而美国到19世纪在非洲贸易中才有相当的扩展。在海运业中，竞争与垄断的趋向并存。许多国家以给予补贴和制订特定的海运法谋求保证殖民地的商业能增加宗主国的海运吨位。然而在本世纪之初，“海运联合会”作为解决竞争与建立垄断性运费的机构出现了。较弱的国家在海运联合会中极少或完全没有代表，而德国人甚至在他们丧失了非洲殖民地以后，还是主要与会的代表⑬。

346 银行是早期垄断资本主义最有权力的机构。它们为非洲剩余产品的出口建立主要通路，使资本基金得以自由流出殖民地而毫无阻碍。最初是私人银行在大多数殖民地发行流通的钱币，到建立起法定货币局以后，这成为中央银行的职能。殖民国家的财政部为了本身的利益以及最终为了金融资本的利益，操纵殖民地的货币储备，因为殖民地的储

---

⑫ A. 马弗热（Mafeje），1972年；C. 梅拉苏（Meillassoux），1972年。

⑬ C. 勒布斯彻（Leubuscher），1963年。

备金投资是由宗主国的货币市场决定的。通过经营海上保险和支持大资本家的投资企业，银行主宰了殖民经济。它们贷款给当地白人移民和非洲人以外的零售商，同时为了资本家和更重要的是由于种族主义的原因，它们拒绝贷款给非洲人。殖民地的信贷限制法令不时证明了这一点。

殖民经济的运转情况大部分可以从海运公司和采矿康采恩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为了了解剥削性的机构如何能起到作用，就必须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加以分析。殖民制度限定非洲殖民地生产供出口的初级商品，反过来又使它们依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制成品和技术。这种死板的国际劳动分工不可能永久保持，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出现了向加工业及轻工业制造转移的局面。不过，1935 年以前这段时期的状况更接近于典型的殖民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塞内加尔的压榨油籽的积极性受到法国制造商的强烈反对，有一大段时间被压了下去。在坦噶尼喀，少数西沙尔麻种植园资本家在 1932 年得以建立一个制绳厂，但是其产品一到伦敦市场，就遭到来自英国制绳商的强烈反对，使得殖民部毫不含糊地重申非洲必须限于出口原料的生产这一原则。除少数例外，殖民地总倾向于生产单一作物，依赖于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专门市场。

国际劳动分工在殖民经济中表现为生产与消费之间越来越大的分隔。在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中，生产的大部分从不打算用来满足当地的需要及消费。相反，在零售市场可以买到的各种货物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外。当地的手工业严重地受到欧洲人的竞争和操纵，这种情况在殖民统治之前的时期已经有所表现。到 20 世纪 20 年代殖民经济已经根深蒂固，非洲人生产着他们根本不消费的东西，而又消费着他们根本不生产的东西。实际上，国内需求不能刺激国内资源的充分利用。进一步的有害后果是，殖民者随便浪费某些非 347 洲资源，而又忽视另外一些非洲资源，因为他们的取舍标准是某一特定资源对欧洲的效用而不是对非洲的效用。主要的经济因素，诸如储备、投资、价格、收入及产量，与满足国内的需求全都没有关系。为了这些结构上的原因，非洲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近期研究对老的殖民地发展公式提出异议，并断定是殖民主义产生了经济依赖性、片面性和不发达状况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非洲经济演变的最重要事件是 1929-1933 年的大萧条。当它严重地打击了相互依赖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也必然打击了有严重依赖性的非洲殖民经济。在此过程中，这些经济的范围和特点都暴露无遗。

自 19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危机造成非洲经济增长缓慢，并使已经附属于货币关系的非洲人处境艰难。这种趋势的严重性在 1930 年当非洲大陆感到其影响时还只刚刚开始。萧条的到来始于非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部门——矿业、种植园及经济作物种植地区。可是，它通过所有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渠道扩散开来，给非洲人造成灾难，这些非洲人卖粮食给工人或其他农民及牧民，后者感到以当时价格脱手他们的牲畜是不合算的。专门从事贸易的非洲人很快都受到影响，即使是做本地产品像柯拉果这样贸易的人也是

⑭ W. 罗德尼，1972 年；J. 雷耶马穆（Rweyemamu），1974 年；E. A. 布雷特（Brett），1973 年。

如此。事实上，被认为是传统体系的豪萨或迪乌拉商人也同样受制于殖民经济。他们成功之处是能与新秩序较量，并使自己转变(例如，成为卡车主)，但是一当重大的像萧条那样的外界因素造成通货收缩，影响到他们的以种植经济作物和赚取工资为生的顾客时，他们就无法抵抗了。

在殖民经济中每个参与者都采取步骤对付萧条的影响。主动权在资本主义企业方面。银行和商号缩减业务，以便在经济作物地区保持它们在重要中心城市的存在，如在达喀尔、拉各斯及内罗毕，同时则关闭内地及较小省会的分行。出口商行在首先牺牲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获得实惠，在 1930 年农作物上市时，他们对生产者采取杀价的办法。作为雇主，他们大量裁减工人和降低工资。除采金业仍蓬勃开展外，各个生产部门所有大雇主的主要反应都是收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资劳动者人数有相当大的增加，但在 1931-1934 年间，下降了 50%或更多些。同时，虽然许多白人移民和小商号破产了，殖民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继续取得虽已减少却仍然可观的利润。

348　非洲人对危机的反应是同欧洲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进行斗争。为了对付降低工资，工人愈益频繁地拿起罢工的武器，而且罢工人数也日益增多，尽管工会尚不存在或尚未发展。记载工会出现以前非洲工人阶级自发斗争的文献比较少，[15]但是商业周期性衰退和战争看来是加剧了矛盾，这可以从 1920-1921 年的萧条期、1929-1933 年的大萧条期，以及 1938 年的衰退期出现的骚动看出来。同样地，决不可能仅仅出于偶合，黄金海岸的农民拒卖他们的可可，并且抵制外国商店，这发生在 1920-1921 年，又发生在 1930 年和 1938 年。外国商行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继续积累，而长期确立种植经济作物的工人和农民则力图克服穷困，并竭力维护其在较好的年份得到的任何即使很小的收益。

非洲人方面另一条防线是从货币经济中脱身。先退出的是新近才被带进货币经济的地区或与货币经济只稍有接触的地区。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就有过类似的现象，把某些地区重建殖民经济的任务留给殖民地政府。坦噶尼喀的许多农民较之黄金海岸的农民兄弟在卷入现金交换上的程度要小得多，他们在 1930 年以后的年代直接了当地要放弃经济作物种植。在这方面他们并不很成功，因为殖民地政府运用权力进行干预，使双方力量对比不利于被认为是返回到野蛮状态的一方。殖民当局开展“生产更多作物”的运动，官僚主义法令以毫不掩饰的强制形式，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要非洲人扩充种植面积。这种运动，不仅得到商人支持，而且也得到需要原料的工业家和帝国棉花种植协会之类强有力的宗主国组织的支持，这类组织在不景气过后的年代中仍很活跃。

在萧条时期，大多数基本建设项目都搁置下来了；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地方，投资都放在扩充廉价的初级生产方面，并使用强迫劳动来完成，法国尼日尔河管理局的灌溉工程即是如此。在经济关系中全面恢复强制手段，表明在危机时殖民经济不得不以非经济手段来维持。非洲人的劳动力和税款使铁路保持运行，并维持殖民地收入。可是非洲人民大众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的是由于削减已经很微薄的社会服务，诸如医疗和教育，他们不得不对这些服务付更多的钱。1934 年以后的复苏年代里，给非洲人的工资、价格和

[15] H. 多伊奇兰德 (Deutschland)，1970 年。

各项设施都仍然在紧缩，与私人资本回复到高利润水平形成鲜明对比。

殖民政府对遭受萧条苦难的非洲人，给予最小限度的救济。他们暂停征税，给予价 349 格补贴，像法国人对花生所做的那样。他们试图缓和最粗暴的中间人剥削方式。采取这些措施是出于无可奈何，因为没有货币在流通，也因为在一个国家降低价格，必然会迫使绝望的农民长途跋涉，把他们的产品走私到即使只有微利可图的地方去。就中间人而言，政府需要限制他们垄断已经降低的利润，而不是让他们把利润汇出国外。然而在东非，"亚洲人"商人在保持货币经济不受损害和避免回复到以货易货方面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正如他们的资本曾是整个地区内硬币使用和小额货币兑换得以推广的最初基础一样[19]。因此，归根到底，英国政府采取合作态度，保护这些零售商及产品购买者的利益。自萧条中摆脱出来的非洲人受到更多的官僚主义控制(旨在增加生产)，并仍然束手无策，难于摆脱进出口商行和当地买办的操纵。

在大萧条里显示出来的依赖性说明了自殖民主义到来以后约五十年中非洲人生活的变化程度。在早期，这种冲击常是轻微的，但是随着殖民主义的进展，就形成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在殖民经济阶段，还是在民族主义阶段，对经济进行研究都没有受到重视(在后一阶段人们曾以较大力气投入以本地人的观点研究非洲历史)。上述这一缺陷妨碍了对如何吸收殖民地经验教训的讨论，因为许多变化是经济性质的，而其他政治、社会或文化性质的变化其基础也都是经济活动。由于货币经济增长的结果，非洲社会更加分化，形成了新的阶级。在非洲各个地区，无产阶级化程度有限，广泛存在的是农民化。后者内部孕育着进一步分化的种子。与资本主义模式中所有农民社会相同，大的农民在损害小农和无地劳动者的情况下发迹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所有经济作物地区都有大农民出现，他们私人拥有土地，雇佣劳动力，偶尔还运用新技术。第二个出名的阶层是有特权的少数人，他们在殖民制度初期接受教育，那时为了使殖民经济得以发挥作用，引进了某些技术。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销售网的最低层是非洲人，他们在西非和北非成就突出。获得成功的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非洲商人和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共同构成萌芽期的小资产阶级。在非洲的半封建地区，旧日有产阶级中往往有他们的根子，而且由于这个原因经常受到欧洲人的纵容。但是更为惊人的事实是，不论殖民政策如何，殖民 350 经济的运转有利于这些阶层的发展，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他们是附庸性殖民制度的一部分。

(吴慎娴译)

---

[19] J. S. 曼加特 (Mangat)，1969年。

15 原法属、比属和葡属地区的殖民经济，1914-1935年

C.科奎里-维德罗维奇

351 不论就其总的形态而言还是从殖民政策的观点来看，法属、比属和葡属殖民地在不少方面有相同之处。*这些殖民地或联邦拥有幅员辽阔的土地，尽管人口一般少于英属非洲，尤其是法属赤道非洲和安哥拉的人口更为稀少（见插图15.1)。① 莫桑比克和卢旺达-乌隆迪（今卢旺达和布隆迪）成为邻国南、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和比属刚果（今扎伊尔）的劳力库藏，同样，法属西非的沃尔特地区（今上沃尔特）向科特迪瓦和黄金海岸（今加纳）的可可种植园提供莫西族劳力。②

的确，依靠大量投资开发这些地区相对说来时间较晚。如插图 15.1 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那里投资的数额并不大。

在经济领域中，本章所述这段时期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的开始和结束以两个严重的创伤为标志。第一个创伤便是世界大战，它触发殖民地经济空前繁荣，尽管在 1921 至 1922 年期间曾出现短暂但又十分严重的危机。这种繁荣实际上正反映出 20 年代宗主国的繁荣。这次经济发展虽然令人惊讶，但相对而言却是短命的，它的结局是 1930 年危机带来的崩溃，尔后便是持久的衰退。这一切不仅导致经济，而且造成社会和思想上的极度混乱。这一时期结束时，非洲法语和葡萄牙语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353 那些原先对宗主国大体上依赖性还不十分严重的殖民地，此时开始成为紧凑的殖民剥削经济体制结构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重视进口资本设备，宗主国从中获利不少，但给殖民地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不过矿业国家（尤其是比属刚果、在较小程度上来说还有安哥拉以及作为南非兰德地区出口通道的莫桑比克）与其他地区情况很不相同。前者采矿业或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资，而后者仍完全是农业经济。还有一个不同点是剥削方式。法属赤道非洲和刚果长期以来处于垄断公司的剥削之下，而法属西非和面积不大的卢旺达-乌

---

* 编者注：本章写了 1974 年，修改于 1980 年。

① 据S. H. 弗兰克尔（Frankel)，1938年，第170页和202 203页，1936年的人口密度比属刚果为 4.2 人/平方公里；法属黑非洲为 2.8 人/平方公里；安哥拉为 2.4 人/平方公里。

② 1936 年莫桑比克和卢旺达-乌隆迪的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 5.1 人和 6.8 人。在法属西非必须看到萨赫勒半沙漠地区和土地较肥沃的沿海地区之间的差异。沿海地区人口密度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小小的多哥（14.4 人/平方公里)。同上注。

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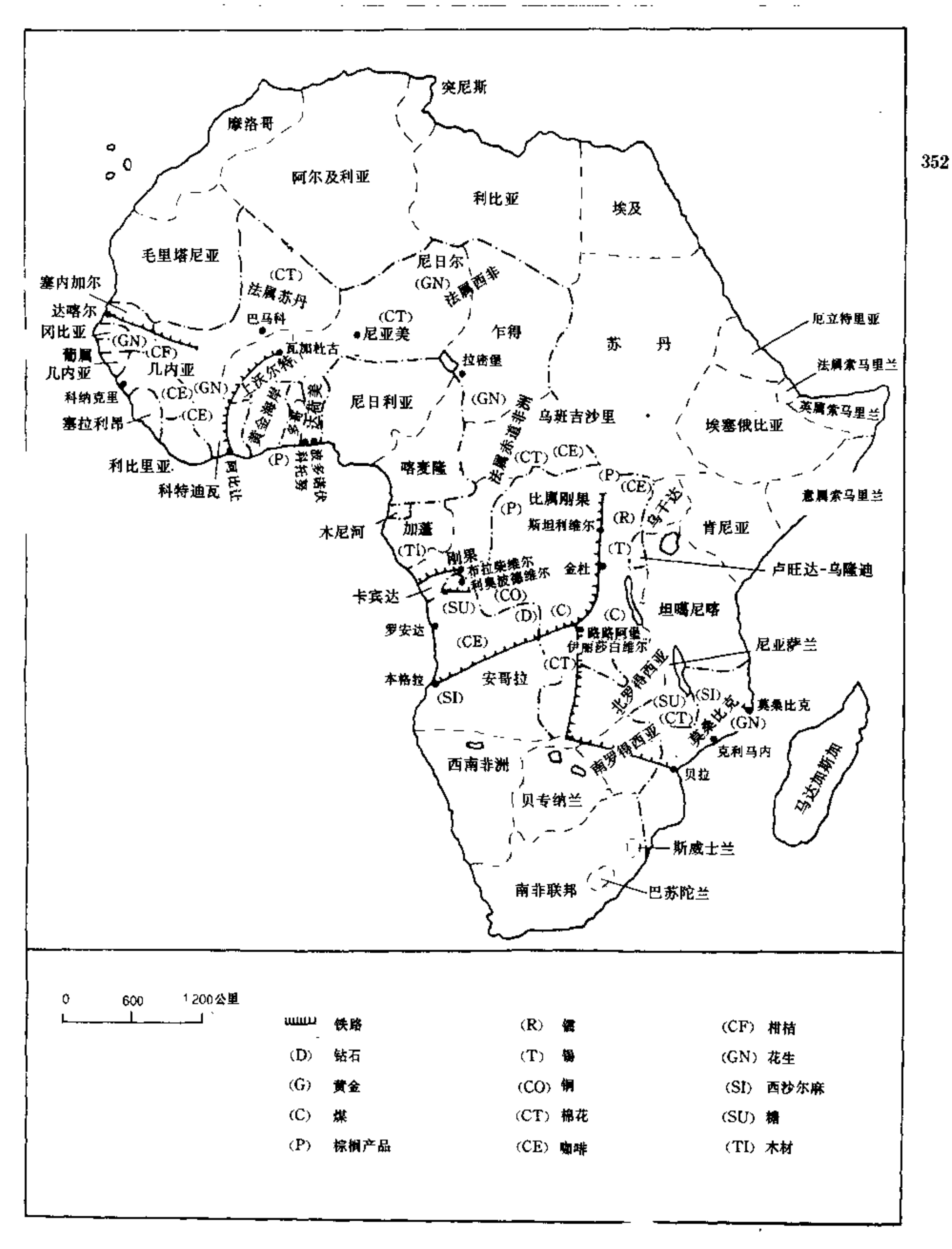


插图 15.1 法属、比属和葡属殖民地资源（根据格朗迪迪埃，1934 年）

354 隆迪则是“挤奶式经济”的竞争性制度，即以出口传统方式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和进口消费品为基础的经济。葡属殖民地自然条件较好，但主要由于依附于一个“欠发达”宗主国而遭受损害，因为这个宗主国本身就缺乏开发所需的财力。

为资本设备筹措资金

附图（见插图 15.2）表明比属刚果和法属西非对外贸易的情况十分相似，大萧条时期前夕外贸额接近 2000 万英镑。另一方面，安哥拉和法属赤道非洲的外贸额只有上述数额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1930 年，安哥拉的外贸额为 47.5 万康多，或略低于 500 万英镑，而法属赤道非洲则为 430 万英镑。相比之下，卢旺达-乌隆迪的对外贸易简直微不足道，1930 年仅为 7000 万比利时法郎，约等于 36 万英镑。

表 15.1 在黑非洲的投资（百万英镑）

地区	累计投资 1870-1913 年[1]	累计投资 1914-1936 年	占在黑非洲总投资% 1936 年
英属非洲	695	421[2]	77
法属黑非洲[3]	25	29.5	5.7
包括:			
法属西非		30.4[4]	2.5
法属赤道非洲		21.2[4]	1.7[9]
多哥和喀麦隆		18.6[4][5]	
德属殖民地	85		
葡属殖民地		66.7	5.4
包括:			
安哥拉	很少	31.9[4][6]	2.6
莫桑比克		34.7[4][7]	2.8
比属殖民地：刚果，乌隆迪	40	94.4[8]	11.7
总计（非英属领地）	至少 150	190	22.9

① 据S. H. 弗兰克尔（Frankel），1938 年，第 149-159 页；据G. 佩什（Paish），1909 年，1910-1911 年。

② 不包括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投资（1.265 亿英镑）和在坦噶尼喀的投资（3350 万英镑），S. H. 弗兰克尔，1938 年，第 202-203 页。

③ 弗兰克尔明显地低估了在法属黑非洲的投资额（也许低估了三分之一），因为他的估算额只包括参加股票交易所的公司。

④ 1870-1936 年。

⑤ 包括约 1580 万英镑的早期德国的投资。

⑥ 包括约 1600 万英镑的英国资本。

⑦ 2000 万英镑英国资本。

⑧ 减去德国在卢旺达-乌隆迪的投资（900 万英镑）。

⑨ 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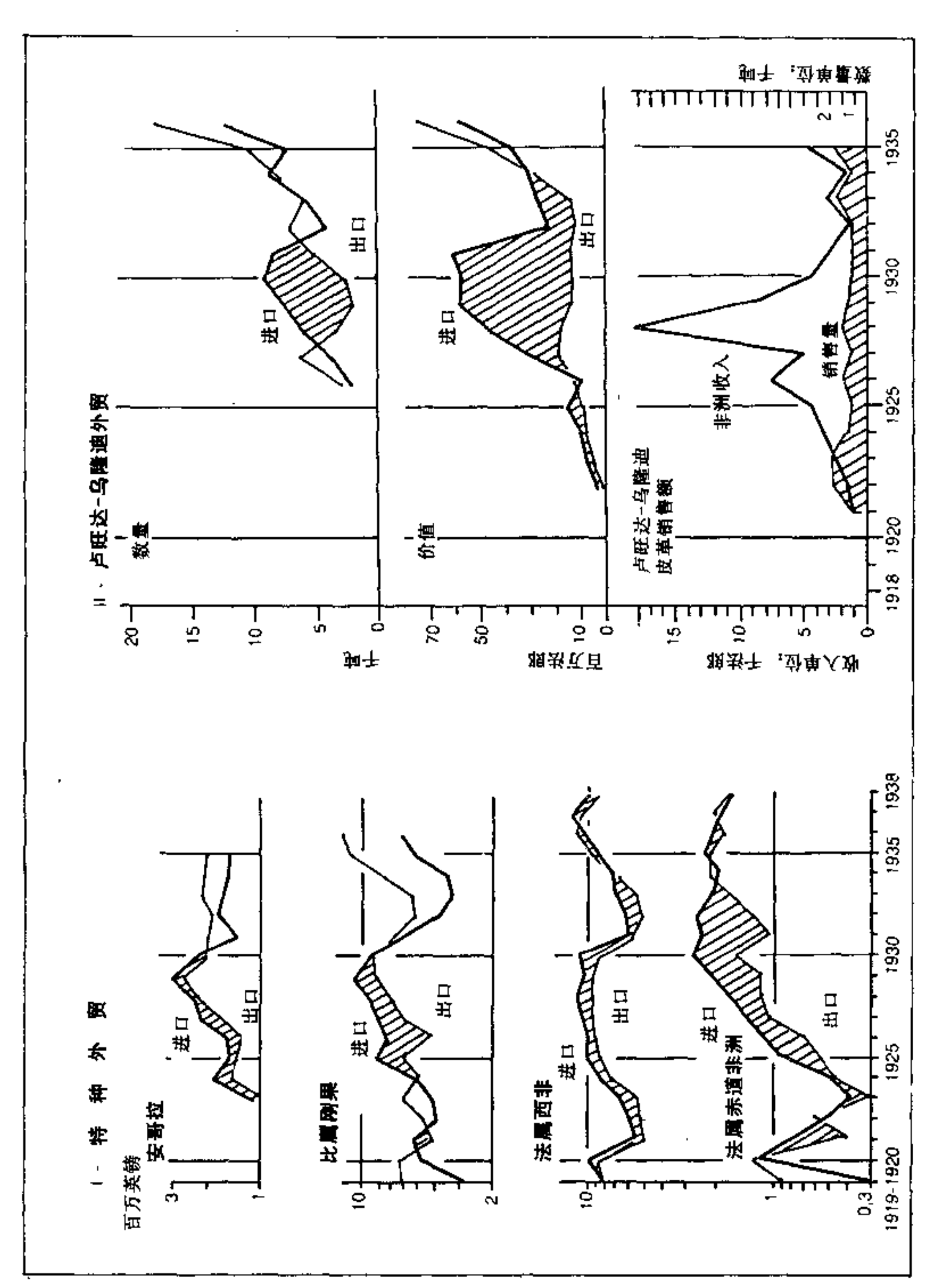


插图 15.2 原法属、比属和葡属地区的殖民地外贸(根据F. P. 克里蒂安，1970 年)

然而代表1920-1930年的所有曲线图都显示为一个常数，即便通货膨胀往往夸大实际进口商品量的总值(参见卢旺达-乌隆迪的曲线，按英镑计算可以消除大陆上通货膨胀对其他数字的影响)。在所有领地中，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转折点时并在1925-1930年经济最景气时期达到顶峰的贸易逆差，表明了人们对资本设备投资的重视。指出这一时期中运输基础设施部门，尤其是港口、铁路和公路的重要性，或许是多余的。这是与采用机动车运输的作法有关的新现象。1932年比属刚果的累计投资额的65%是投入矿业、运输、房地产，或与铁路或矿区发展有关的辅助性农业和商业设施。1927-1930年期间，为公共工程而进口的商品平均占特需商品进口额的47%。1929年，诸如煤、焦炭、矿物油、金属产品、机器、船舶、车辆之类的资本货物几乎占进口总额的一半，[③]而法属西非只占三分之一。结果，在比属刚果的累计投资额从战前的12.15亿比利时法郎激增至1935年的30亿金法郎。[④]比属刚果的投资额在1920-1924年间增长已经很快，1924-1929年期间翻了一番还多，接近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最高水平，紧接着便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突然下跌。比利时公司的年投资额从1929年的14亿比利时法郎跌至1932年的2.76亿比利时法郎，即从约3亿金法郎跌至0.5亿金法郎。

表15.2 比属刚果投资增长情况（1950年10亿比利时法郎）

1920	1924	1929	1933	1938
6.6	11	29.7	30.9	30

资料来源：J. P. 皮曼斯（Peemans），1968年，第383页。

356 然而，从财政角度看，各殖民地仍很贫穷。尽管外贸的增长带来了海关税收的增长，尤其是人头税的增长，这些殖民地仍然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购置资本设备不得不采取向宗主国大笔举债的政策。

奇怪的是，向宗主国大笔举债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最初是由比属刚果在20年代末期那一段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开始举债的，1928-1932年举债达到顶峰。从1931年起法属西非也开始大笔举债，30年代的经济崩溃教训使政府深信必须立即实施资本投资的计划。

1909年时，比属刚果的国债不足2.5亿比利时法郎，这个殖民地以后，特别是1928年以后，借了约35亿比利时法郎或接近6亿比利时金法郎的债。[⑤]法属西非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1920年以后还不得不在借得上述债额的四分之一上凑合着使用，或者说只借了法律批准债额的三分之一。两次战争之间时期批准的债额为17.5亿比利时法郎，而借到的6.3亿比利时法郎或约1.2亿法国金法郎实际上在1935年才全部付给。这一数额只相当于法属赤道非洲债额的一半。法属赤道非洲更加贫穷，也更想仿效比利时人的榜样，已较早开始奉行举债政策，以建设基础建设项目。所借之款几乎全部投入刚果-大洋铁路的建筑，也就是1920-1936年期间所借的约3亿金法郎，或者说法律批准的全部

③ F. 帕塞莱克（Passelecq），1932年，第1卷，第417-420页。
④ S. H. 弗兰克尔，1938年，第167页。
⑤ 在该时期中，比利时法郎与法国法郎的比价在100：70上下浮动。

债额都投在其中。

结果造成外债的增加。在出口商品价格急剧下跌的大萧条时期，随着外债偿还额的不断增加，使得实现预算平衡越发困难。至1933年，刚果债务的年偿还额（约2.98亿比利时法郎）占该殖民地预算收入的88%左右，或者占其预算支出的几乎一半或接近其出口收入的一半。法属西非的债务不像刚果那么沉重（1933年时要支付的数额为0.4亿法国法郎）。在大萧条时期最困难的几年中，年偿还额达到总预算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不过若把总预算和领地预算统统算入，那么外债年偿还额只占法属西非总收入的5-8%。当时法属赤道非洲的外债年偿还额超过其总预算的80%（1934年达到81%）。关于葡属领地 357 的确切情况材料很少，但这些领地也是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1936年，安哥拉欠债几乎达100万康多，相当于870万英镑或2.2亿法国金法郎。这显然多于法属西非的债务，而安哥拉出口收入只有法属西非的七分之一，⑥ 可是这个数字不及比属刚果债务的一半，而比属刚果的殖民地预算与安哥拉相等。

从总体上看，在大萧条的年月中，上述地区外债年偿还额的增长速度明显地比负债最多的英属领地快得多。见表15.3。

表15.3 年偿还债务额，1928年和1935年各领地偿还率比较（以百分比表示）

	比属刚果			法属西非			法属赤道非洲		
	1928	*1935*	增长率%	*1928*	*1935*	增长率%	*1928*	*1935*	增长率%
国家岁入	20.6	79.3	384	2.5	6.8	367	16.6	47.1	284
出口（特种贸易）	9.5	26.8	282	1.5	6.9	460	17.2	46.6	271

资料来源：S.H.弗兰克尔，1938年，第182页和C.科奎里-维得罗维奇（Coquery-Vidrovitch），即将出版。

由于货币价值波动，确实有些困难，但从比属刚果和法属西非之间的比较仍可看出开发方式的不同。被认为从中可获取更大利润的比属刚果，也的确对外资特别眼红，但其经济弱点也十分明显。比属刚果的债务比法属西非严重得多，尽管它的矿业地位重要，但出口贸易额却不如法属西非。最为重要的是，它的预算收入由于海关税率低和对非洲人的征税少故而大大低于法属西非。结果在大萧条时期出现了更严重的财政赤字。

表15.4 殖民地的若干统计数字（百万法国法郎）

	法属西非			比属刚果		
	1928	*1935*	增减率%	*1928*	*1935*	增减率%
债务年偿还额	17.2	54.8	+218	87	225	+158
一般预算收入	723	593	− 18	420	290	− 21
出口值	1144	698	− 39	915	850	− 7
关税收入	213	142	− 33	?	79	
人头税	143	152	+ 6	75(?)	64	− 15

⑥ S. H. 弗兰克尔，1938年，第371页；J. 达菲（Duffy），1962年，第139页起。

358 实际上，这种明显的不一致现象是由于不正常的剥削水平。刚果正迈入资本剥削的阶段，而法属西非仍徘徊在“挤奶式经济”的阶段。在大萧条的前夕，法属联邦的贸易优势有一半以上（1928年为52.7%）仍旧依靠出口塞内加尔的花生，这种贸易优势正是唯利是图的眼光短浅的贸易政策的明证。它仅限于以高价向非洲生产者出售进口商品和低价收购农作物，听任农作物的生产停留在传统经济部门(挤奶式经济中)，剥削其中的差额来牟取利润。这块殖民地应该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因为殖民化的基础是给宗主国带来利润，因此它只能依靠不断扩大的贸易量所带来的海关税收和沉重的国内税收过日子。尽管出现了大萧条，使工商业停顿并断绝了非洲人的收入，但宗主国拒绝给予任何财政援助。同样，最后一次向陷入绝境的法属赤道非洲提供财政援助是1928年，其实法属赤道非洲自1910年至1934年总共只得到3.75亿法国法郎的财政援助。宗主国袖手旁观，等到最为严重的萧条时期才承担偿付债款本息，1935年价值为0.8亿法国法郎。⑦

然而，在整个萧条时期，人头税继续增加，或者至少很少降低。1929年法属西非征收的人头税是1.56亿法国法郎，1931年是1.81亿法国法郎，征收最少的是1935年，为1.53亿法国法郎。虽然法国最终同意努力向其非洲殖民地投资，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措施，采取的方式是发行国家担保的值券，年利为4-5.5%，50年还清。换言之，这些法属殖民地实际上仍然需要偿付其获得的资本设备。当然，法属赤道非洲十分贫困，致使其宗主国最后接收了几乎全部债务。但是在法属西非，包括债务本息法国负担开支的比重在1931年至1936年之间减少了，降至只占全部支出的16%。这就是说，开发这块土地最主要的是利用当地居民的劳动。

由于这种依赖税收和掠夺而不是依靠生产和投资的陈旧的经济模式脆弱不堪，大萧条便触发了它的崩溃。1934年，殖民地预算事务报告人告诉法国议会说，殖民地已财源枯竭，建议由国家出钱购买资本设备。同年，召开了宗主国和法国海外属地经济会议，首次试图制定某种资助计划。但是，这一计划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实施。⑧

359 尽管比属刚果的萧条来得既突然又严重，出口额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即从1930年的15.11亿比利时法郎降至1933年的6.58亿比利时法郎，但其相对价值下降得并不那么厉害，而且很快便恢复了。这从出口额至1935年又增至12.03亿比利时法郎这一事实中看得十分清楚。当然，比属刚果的生产水平依然很有限。与南部非洲的英属殖民地相比，比属刚果的矿产量至少可以说是少得可怜。尽管1935年比属刚果的矿产量占其出口总额的62%，安哥拉的矿产量占其出口总额的30%，但这两个殖民地的矿产出口值加在

表15.5 各殖民地外贸（进出口总额）的相对重要性（占黑非洲贸易总额的比重）

	法属西非	比属刚果	安哥拉
1928年	5.9	4.7	1.3
1935年	5.8	4.1	1.1

⑦ A.莫勒（Moeller），1938年，第3-5页。

⑧ C.科奎里-维得罗维奇（Coquery-Vidrovitch）和H.莫尼奥特（Moniot），1974年，第407-409页。

一起，仍不过占黑非洲矿产品总值的6%。

这块比属殖民地的经济活动早已是资本主义类型，它具有技术先进和长期投资方针的有利条件。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严重的预算危机主要是由于投资量的减少而引起的，不是由于出口额的下降造成的。比属刚果的岁收比法属西非少，但能以大量的私人资本和国家资助加以补偿，国家除贷款外还给以巨额津贴补足赤字。这些支持的数额在1933年至1937年之间高达6.87亿比利时法郎，这还不包括殖民地的彩票收入，办彩票所得的利润（2.71亿比利时法郎）用于弥补1934年和1935年的部分赤字（当时的赤字为6.73亿比利时法郎，是正常开支额的47%）。自1914年至1935年，刚果总共“花费”了比利时1.125亿金法郎(不包括贷款)，接近宗主国1908年至1950年期间开支总额的一半。⑨

简而言之，即使（或者说由于）刚果“花费了比利时很多的钱”，可是刚果和法属联邦不同，一俟大萧条后工业得以恢复，它就能够“起飞”。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夸大这种现象。大萧条结束后各地的出口额又都超过进口额，这一事实证明，前一个时期的资本设备只不过进一步促进这样一种政策的制订。这种政策基本上仍以外来剥削而不是为本地自身利益谋求殖民地发展为中心。

工人的负担

这段时间——划分为以加剧对工人剥削为特色的两个困难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非洲人的日子很不好过。在殖民地“发展”的那些时候，非洲人使殖民者感兴趣的只不过因为他们代表一种商品或者一种生产工具。另外，只是出于提高他们的效 360 率的考虑才开始采取一些劳动保护措施。但是，这种不稳定的生活水准经不起一丁点动乱，它后来垮于大萧条之中。如同一位法国行政官员所说，“我早就注意到，当土著人家庭保持适当和正规开支预算时，他们便入不敷出。土著人能够生活下去可真是个奇迹。”⑩

劳工

尽管强迫劳动制在各地都已正式废除，但是劳工的缺乏导致强迫现象的出现，其中既有赤裸裸的强迫，也有通过非缴纳不可的任意规定的税款来实行强制劳动。

强制劳务和对种植作物的硬性规定

无偿使用劳工的现象在各地都很常见。战后，法属联邦正式批准征用无偿劳工建设本地的或与殖民地利益有关的项目。开始时劳役期定为每年7天，对劳工的需求不久使法属西非改为12天，法属赤道非洲改为15天。1922年10月6日通过的法令，于1925年1月7日修订后规定：个人可以花钱免服劳役，免一天劳役的价格根据货币经济渗透

---

⑨ A. 莫勒，1938年，又见J. 斯滕格斯（Stengers），1957年，第394页。

⑩ M. 于尔瓦（Urvoy），1940年。

的程度定为50生丁至2法郎不等。

这种强制义务，尽管有限，却非常不得人心，因为原先根本不必考虑劳工吃饭问题，但现在倘若派工的地点与村庄的距离在一天的步行路程之内，劳工的伙食仍然要由妇女负责解决。况且，这种强制劳役还不包括强制（但有偿的）征用劳工修筑铁路。从1921年至1932年，为修筑刚果-大洋铁路在法属赤道非洲雇用了127,250名男劳力，离村时间加起来总计达138,125年。1928年以前估计有2万人左右死亡。⑪在法属西非，与这种强制劳役同时实行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军队第二部分”制。根据这种制度，可按照未被应征服兵役人数一半的比例，征用劳工投入“社会性和公用”项目。⑫最后，在大萧条前夕，征召搬伕的做法虽在绝大多数地区日趋减少，但仍然给卢旺达造成混乱，尽管在那里强制性无偿劳役期从每年29天降至13天。⑬

361 这一时期的特征还有强制性的作物种植硬性规定。这一政策最初源于19世纪末的比属刚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方针又恢复了，首先于1915年在乌干达实施了强制种植棉花方案和在黄金海岸实施了强制种植可可方案。⑭在刚果，东部省强制种植水稻，而强制种植棉花则从马涅马和韦莱河传遍整个殖民地。1930年，“国有土地”面积多达100万公顷以上，结果，刚果收获了1.5万吨稻米和3万吨棉花；约有10家公司控制了111家轧棉厂。虽然这种新事物特别不受欢迎，但仍然在法属联邦得到采用。1916年第一次实施与“战争努力”有关。而它得以继续存在从一开始时就是由于依靠法国补贴的方法人为地维持价格。与此同时，形成对照的是尼亚萨兰（今马拉维）政府停止了对棉花生产的补贴，比属刚果也减少了对棉花生产的补贴。法属赤道非洲，在费利克斯·埃布埃行政长官(1927-1928年)的策动下，授予4家公司大片“保护区”产品的收购垄断权，以换取少量的资本设备。⑮这种方案是仿效根据1921年8月1日的法令而在刚果出现的比利时垄断公司的模式。

与此同时，在法属西非开始的强制性种棉规定，也是法国政府尼日尔河管理局的主要点子之一(1933年)。在那里，始建于1937年的一些专门发展起来的村落中心后来垮得很惨，这是因为无法解决人口的问题、以及生产的棉花产量太低、质量太差，棉花的出售价从1928年的1.25法郎降至1929年的90生丁、1931年的70生丁，在1933年至

表15.6 法属西非棉花，平均5年的出口量（吨）

1910-1914年	1915-1919年	1920-1924年	1925-1929年	1930-1934年	1935-1939年	1954年
189	467	895	3500	2500	3900	1300

资料来源：圣马科（San Marco），1940年。

⑪ G.索特（Sautter），1967年。

⑫ 1926年10月31日法令。马达加斯加也采用了这种制度。

⑬ P.德德卡（de Dekker），1974年。每年须服劳役的时间从1928年的15天减至1931年的13天。但在比属刚果，强制性无偿劳役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增至每年120天。M.梅莱埃(Merlier)，1962年，第95页。

⑭ F.帕塞莱克，1932年，第1卷，第281页。

⑮ C.科奎里-维得罗维奇，1972年，第475-477页。

1936 年期间又跌至 60 生丁。

在所有葡属殖民地中，行政当局未能保障种子的分配和提供技术指导，造成这种制度的低效率。尽管如此，这种制度还是以一种特别古老的方式在莫桑比克公司的领地内盛行。莫桑比克公司创建于 1891 年，对一块面积达 1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行使长达 50 年的主权。因此，它是世界上唯一在 1930 年时仍在行使主权的公司。它还占有该殖民地 1918 年至 1927 年间贸易总额的 11.6%，领土总额的 6.5%和总人口 4%的劳动力。[16]

后果并非总令人十分失望。正是在大萧条的转折点上，科特迪瓦、喀麦隆和卢旺达-乌隆迪掀起了种植可可和咖啡的大规模生产，尽管仍采用强制种植制。在卢旺达-乌隆迪领地内于 1925 年实施了试验性的"咖啡方案"（要求每个酋长或小酋长必须种植半公顷咖啡），当大萧条的影响一开始出现，这一方案立刻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 362

表 15.7 卢旺达咖啡出口量（吨）

1929 年	1932 年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50	100	375	1150	2000

资料来源：G. 莫利托尔（Molitor），1937 年。

这种冒险性作物种植迅速起飞的原因，首先是因为非洲人不堪重负，在大萧条最艰难的时期没有其他出路，只得通过增加生产来弥补收入的下跌，以此抵消货币的贬值。但是在大萧条结束时，农民最终看到了所干的确实有利可图，便自愿种植新的作物。表 15.8 所示的是 1936 年在法属西非起飞的惊人状况。

表 15.8 法属西非出口量（吨）

	1935 年	1936 年
咖啡	5300	43,500
可可	6700	49,700

资料来源：《1905-1957 年法属西非的出口发展》，见《法属西非和多哥广播协会会刊》，第 36 期，1958 年 7 月。

这种冒险性的作物种植为非洲人支付人头税和满足主要的消费需求提供了最低水平的现金，而人头税和主要消费需求的满足反过来又导致了强制性种植制的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旨在资助生产者的机构的作用绝非微不足道。如农业信用社（于 1931 年在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建立）保证了近期和中期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支持将生产资料转变为私人财产。只有加入了法律承认的协会（储金互济会、农业协会等）的农民和用自己的名字进行登记的财产（而不是家庭遗产）拥有者才有资格获得资助。[17] 土著人储金互济会在法属西非的会员人数在 4 年中增加了 4 倍，从 1929 年的 22 个增至 1933 年的 101 个和 1936 年的 104 个。该会同样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它们常常引 363

[16] E. 博姆（Bohm），1938 年，第 155 页。

[17] 1931 年 6 月 26 日法令，M. 德桑蒂（Desanti），1940 年。

起行政长官的注意。当然，这些长官之所以感兴趣仅仅是从通过强制认捐获取额外资金的角度出发的。1940 年，在塞内加尔，只有辛-萨卢姆的两、三个组织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18] 迄至此时，无论在农田、矿区还是在铁路修筑项目中，强制劳务仍是普遍现象。

劳动制度与立法

在法属非洲，征工是在当局的控制下进行的。按规定，1921 年以后在法属赤道非洲进行的征工数额不得超过“能劳动的成年男性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加蓬，自 1926 年起，随着对森林采伐量的不断增长，新的森林所有者被告诫，他们开发伐木点要由“自己承担风险，因为完全意识到他们可能找不到在伐木点所需的劳力。”[19]

在比属刚果，征工数额被限于“成年男劳力”的 25%。在 20 年代中期，由于劳动力储备的枯竭，限定征工额降至 10%。但是总的说来，实际的征工额大大超出官方的规定。[20] 在葡属殖民地，犯人服的“刑罚性的劳役”和 14 至 60 岁男劳力每年至少从事 6 个月的“道德和社会义务性”劳动之间，只存在着细微难分的区别。[21] 国家“毫无顾忌地采取强制性行动，在必要时强迫非洲的野蛮黑鬼干活，这就是让他们通过劳动提高素质，以改善谋生手段、走向文明”。[22]

犹如瘟疫的征工机构在刚果特别盛行。在那里，国家把征工权力下放给诸如加丹加劳动交易所之类的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专事在农村招募矿工的私营机构。1926 年，政府为了减轻劳力缺乏的矛盾，把在马涅马（东部省）和卢旺达-乌隆迪的征工垄断权授予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23] 最后，在葡属殖民地不时爆发丑闻，如 20 世纪初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可可种植园使用强制和奴隶劳动的丑闻。这些种植园每年使用 2000 至 4000“自愿应征者”。1930 年，葡萄牙根据其新奴隶政策，拒绝了日内瓦国际会议提出的“关于间接强制劳动的劝告”。1947 年，安哥拉的议员恩里克·加尔沃举行了闻名的抗议活动。当时他报告说有 200 万非洲人被驱逐出葡属殖民地，结果他于 1952 年被捕。[24] 1903 年，在莫桑比克为德兰士瓦征募矿工的任务交给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人劳工联合会。为了同意洛伦索马贵斯铁路得以保留南非运输量的 47.5%，作为交换条件，1928 年的协定授权给约 250 个征工机构每年可征募多达 8 万非洲人。1913 年至 1930 年期间，每年平均征募了 5 万移民，累计达 90 万人之多，其中有 3.5 万人为此丧生，回国时身体尚可的只有 74 万人。这样，出租劳力及货物的中转，就成了殖民地主要的财源（1928 年为三分

364

[18] M. 蒂皮尼埃（Tupinier），1940 年。

[19] G. G. 安东内蒂（Antonetti），1926 年，1927 年。

[20] M. 梅莱埃，1962 年，第 134-135 页。“成年人”的定义很不严格，指“达到正常成年人发育水平”的任何人。H. 伦纳德（Leonard），1934 年，第 382 页。

[21] 1911 年的劳工法。《热带非洲土著人劳动制度与组织》，布鲁塞尔，1929 年，第 224-315 页。

[22] 调查委员会的建议，纳入 1914 年 10 月 14 日的劳工法；J. 达菲的引语，1962 年，第 132 页。

[23] B. 费特（Fetter），1976 年，第 90 页。

[24] E. 博姆，1938 年，第 124 页；J. 达菲，1962 年，第 185 页。

之二)。[25] 1928年至1929年间，来自移民许可的收入占预算收入的9.8%，铁路税收占预算收入的28%，除了上述两笔收入，还应计入归国劳工所支付的关税(25%)，以及通过人头税征收的和汇回家或带回国的款项的收入部分。[26]

卢旺达-乌隆迪为加丹加矿区扮演了一个同样的角色，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1930年，在总数为35万的能劳动的成年男子中，有7300人栖身刚果，其中4000多人在加丹加居住。[27]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自然灾害的袭击，出现了大规模自愿迁移的现象。1928年至1929年的大饥荒时期，约有2.5万卢旺达人移居乌干达。还有从强制劳动中逃亡出来的，有点类似上沃尔特的莫西人大规模迁移的情况，后者在黄金海岸找到避难所。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所有殖民政权都感到需要制定一些劳工条例。在此之前，这些条例完全流于形式，而随着工资劳工的增多，它们的执行变得不可缺少。[28] 各地的劳工条例都大同小异。这些条例分别规定劳工合同的合法期限在刚果最多为3年，在法属和葡属殖民地最多为2年。然而，各地都未规定必须把合同登记在劳工手册上，若登记就必须纳税。虽然从1922年起，法属联邦当局规定了法定“最低工资”，但没有进行检查，违背规定的现象甚多。下列这种现象并非罕见：签定了为期一年合同的非洲人，两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才被送回国；他们的工资不是以货币而是以实物支付，定量食品并不按原协议分发，还有对稍有不服管制的劳工课以沉重罚金。此外，在标榜劳动自由的名义下，雇用不受任何规定约束的日头工，持续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365

在矿区和铁路修筑项目中最为严重的人力危机，导致比属刚果改变政策。直至本世纪20年代，比属刚果的情景与南非矿区一样，非熟练劳工在其6至9个月的短期劳工合同期满后即被解雇，替以他人。1922年在进行了一次调查后，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进行改革。在这以后的两年中产量翻了一番。产量的迅速增长导致非洲劳工人数的相应增长，从7500人增至1.4万人。这便是著名的比利时式“温情主义”的起源。对劳工居住区的整修于1926年开始动工。一年之内，用于劳工的费用增加了40%，尽管工资额不再占预算的五分之一以上。1930年，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居住区的人口出生率首次超过死亡率，这在当时是中非地区最佳的生产条件了。[29] 由于1928年后雇用正规化和在工人生活各方而提供领导（工余活动、宗教、教育等等），稳定人力的政策获得显著的成功。当时由于大萧条的影响，1930-1932年间工人人数从16,000人缩减到5000人。这种情况激发了北罗得西亚人反对遣返政策的一系列骚动，矿工居住区以外的劳工也爆发了一系列骚乱，来自卢旺达-乌隆迪的人也于1932年起来反抗。

---

[25] E. 姆姆，1938年。

[26] 见J. 卡多佐（Cardozo）所绘表，1931年，第29页。

[27] P. 德德卡，1974年。

[28] 在比属刚果，1922年修正了1910年的一项法令，它涉及的是受雇于“文明雇主”或“缴纳个人税”(非人头税)的刚果及其邻近殖民地“所有的土著工人”。在法属赤道非洲，1902年的一项法令在1907-1911年期间又恢复实施，并于1922年彻底修正，尽管只是到1935年才公布第一个规定如何实施这一法令的总的法令。在法属西非，只是在1928年时才公布将地方措施重新组合的第一个总法令。在葡属殖民地，1911年的劳工法分别于1926年和1928年加以修订（萨拉查法）。H. 伦纳德，1934年。

[29] B. 费特，1976年，第113页。

税 收

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经济状况无可辩驳的改善并未对非洲人的生活水平带来多大影响。的确，挣工资已成惯例，在刚果的工人10年中增加9倍，从1917年的4.7万人增至1927年的42.7万人。只是在大萧条影响业已缩小的1937年，这一人数才被突破。[30]然而，42.7万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却不算大，不到刚果"能劳动成年男子"20%，而这些"成年男劳力"中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还有2%是卢旺达人，[31]迟至1950年卢旺达人依旧只占法属非洲总人口的2%。[32]

366 就业人口曲线上升的同时，工资却未同步增长。因为20世纪20年代通货膨胀在欧洲国家是普遍现象，只有英国情况不同，英国当时仍然坚持其货币紧缩政策。到1926年，法国法郎的价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五分之四，比利时法郎的价值下跌得还要多一点(1926年比利时法郎与法国法郎的比值为100：87.60，第二年稳定在100：71)，更不必提葡萄牙埃斯库多急剧膨胀的情况了。由于宗主国通货膨胀，非洲进口货物价格上涨，而出口价没有变化，非洲人的实际工资趋于下跌。

所作出的唯一奏效的努力是以现金支付逐渐代替实物支付。这一作法自1916年起在比属刚果被采用，后来又慢慢地在法属赤道非洲被采纳。但是，这导致以现金纳税的做法。要求所有成年劳力都必须现金纳税，自本世纪初以来，现金缴税被视为一个国家进入货币经济的标志，它同时还被视为国家发展的条件。

纳税问题对被卷入殖民地生产周期困境的非洲人的购买力，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殖民渗透的完成和行政机构的发展在战后更为加强，这使得非洲人更加难以用逃跑和暴乱的方式来对抗。一旦税收更加正规化，所征得的税款终于开始发挥作用，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财源。结果，这种情况导致两次大战之间人头税增加的速度比工人工资增加得更快。

实际上，农民的收入始终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种植强制性作物的农民的收入更是如此。1928年至1932年期间，在比属刚果的70万棉农年收入平均为165比利时法郎，种植稻谷的农民收入只是略微多一点，为170比利时法郎。[33]法属赤道非洲的情况更糟。1928年至1932年期间，每年（法律规定劳动200天为基础）种植20英亩棉花的乌班吉农民的收入只有9.2至40法国法郎不等，几乎抵不上税收额。[34]

雇佣劳工的工资虽然还不至于如此糟糕，但也赶不上通货膨胀，尽管在货币经济占上风的地区工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一些。中刚果的每月平均工资从1912年这一公认工资水平最高年份的25.45比利时法郎(1913年为19.30比利时法郎)跌至1920年的19.35

---

[30] 比属刚果政府年度报告，1919-1939年。

[31] 35万成年男劳力中有7300人。P. 德德卡，1974年。

[32] T. 霍奇金（Hodgkin），1956年，第118页。

[33] M. 梅莱埃，1962年，第83-84页。

[34] 圣马科（San Marco），1940年。

比利时法郎，直到 1929 年才增至 30 比利时法郎左右。[35] 加蓬林区的工资水平要高些（40 至 50 比利时法郎），差不多刚当于比属刚果的平均水平（每月 60 比利时法郎）。[36] 367

生产发展最快的地区，税收也相应增加。例如，在加蓬，相当于纳税的工作量在整个 10 年内（从战争结束后不久的 23 天到大萧条前夕的 18 天）甚至有所减少。然而，总的说来，税收负担还是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农民，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当时工人大量被解雇，热带货物价格狂跌。一般说来，非洲人承受的直接税收负担远远超过其工资水平，这使他陷于负债和贫困。在税收增加的同时，物价跌至最低水平，并把农民的工资也拉了下来，此时，非洲人的处境尤为困难。在几内亚和科特迪瓦进行的一些实地调查结果表明，在那些艰难的年月里，农民入不敷出，至少在货币经济的结构里是如此。尽管能变现钱的作物同时增加了，但所有事实表明贫困化程度甚为严重。农民掏空微薄的底子，耗去最后一点他们千辛万苦挣得的银子，甚至卖掉了为数不多的家庭物品。

虽然我们很难把所涉及的这些地区进行比较，但可以看出它们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相似或不同之处。在各葡属殖民地，人头税负担始终是最沉重的，因为官方规定人头税相当于 3 个月的劳动，并可以用劳动来抵偿。按照估算，每日的工资相等于人头税总额的 1-1.5%。法属西非的人头税也相应的高。1915 年，在法属西非平均每个居民交纳的直接税为 2 个法国法郎；在法属赤道非洲为 1.55 法国法郎；在比属刚果为 1.35 比利时法郎。越是必须依靠本地资源度日的殖民地，税收就越重。 368

表 15.9 殖民地预算收入总额中人头税的比重

	%						百万法郎		
	比属刚果		法属西非		法属赤道非洲		人头税总额		
	对非洲人的征税	关税	对非洲人的征税	关税	对非洲人的征税	关税	比属刚果（比利时法郎）	法属西非（法国法郎）	法属赤道非洲
1928 年			20	29.4	22.6	27.3	-	144	27
1931 年	21.2	21	28	18.4	22.5	30.9	115	181	38
1932 年	29	19.6	28.7	19.9	24.6	30.9	109	168	37
1934 年	22.5	18.9	27.1	21.1	19	30.3	82	154	41
1935 年	22.4	27.9	25.8	23.9		46.5	91	153	

资料来源：《比属刚果殖民地政府年度报告，1932-1938 年》。《法属西非统计年鉴》第 1、2、3 卷，1932-1938 年；《法属赤道非洲统计年鉴》第 1 卷，1936 1951 年。

作为一般规律，殖民地预算的收入来源都相同：25%来自关税收入，25%来自人头

[35] 年度报告，中刚果，法属赤道非洲档案，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档案 4（2）D。见C. 科奎里-维得罗维奇，1972 年，第 490-492 页。

[36] 举例而言，在 1927 年，31.5 万工人的工资额为 2.27 亿比利时法郎，即一年 720 比利时法郎或一月 60 比利时法郎（1927 年 60 比利时法郎＝42.50 法国法郎）。1924 年，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支付 30 天实际工作日的工资为 30 至 45 比利时法郎之间。B. 费特，197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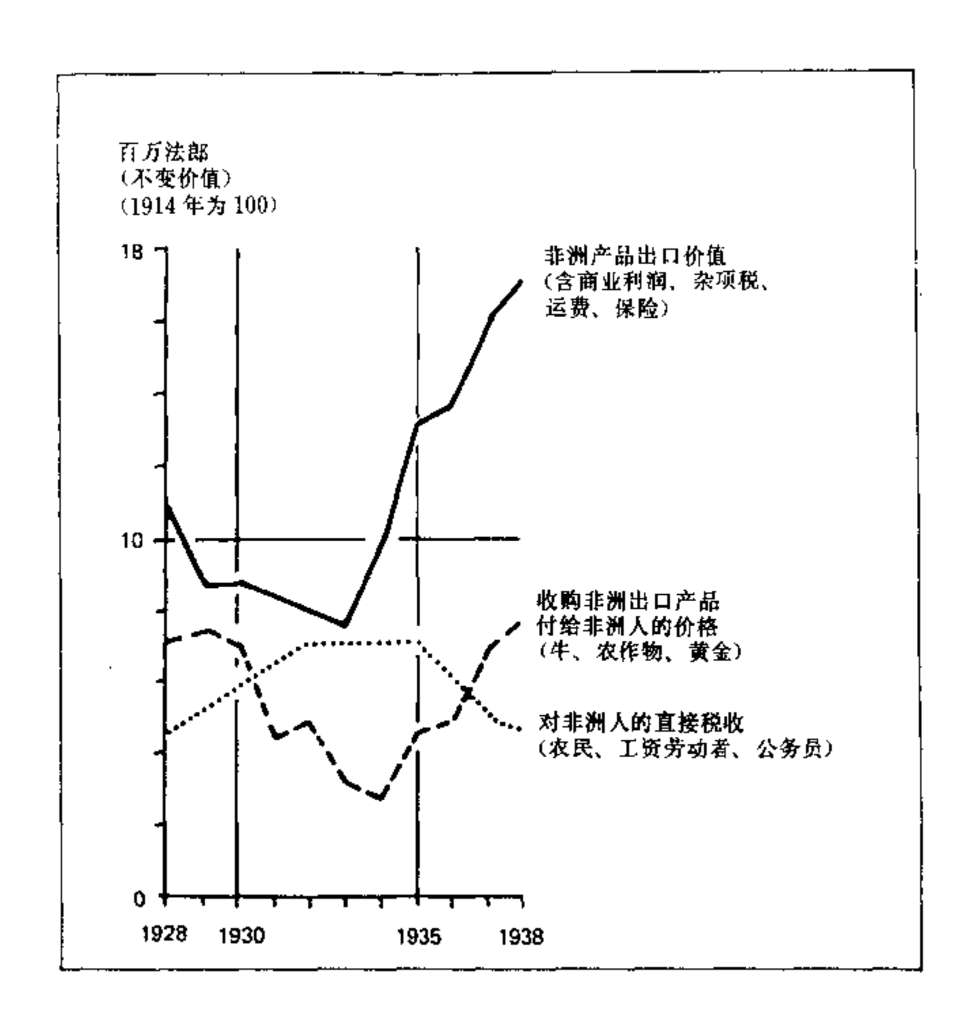


插图 15.3 1928 至 1938 年法属几内亚非洲货币几种可能发生情况的近似估值
(根据M. 特朗塔迪, 1976 年)

369 税。[37] 不幸的是，由于大萧条的缘故，当局试图用人头税弥补关税收入的不足。1932 年各地的关税收入已降至占预算收入的 20%以下。尽管如此，刚果税收制的压榨程度还是最轻。虽然 1931 年刚果居民的人均赋税水平几乎与法属当局征税水平相等(人均赋税：法属西非为 12.48 法国法郎，法属赤道非洲为 11 法国法郎，而刚果则为 11.50 比利时法郎，即 8.30 法国法郎)，但在大萧条期间赋税水平则大大下降了。1931 年至 1934 年期间，比属刚果人头税的总收入下降了 29%，而法属西非只下降了 15%，更不用提法属赤道非洲，那里在 1929 年至 1934 年期间人头税总收入反而增加了 43%。

在法属非洲，尽管大萧条时期地方行政官员有时要求大幅度削减税收，但实际上由于法国未予足够的资助，他们开始减税时不得不"极其谨慎"。[38] 而另一方面，在刚果如

[37] 1928 年至 1935 年，法属西非近一半的预算收入(43-45%)来自人头税和关税；三分之一的预算收入来自其他税收，特别是间接税(15-20%)和铁路收入(占 13-16%)，前者主要由当地居民负担(土地税、牲口税、消费税和流通税)，后者常常出现赤字；其余的收入(仅 21-24%，与比属刚果情况相似)则来自各种公营和私人企业(国家财产、许可证、企业收入、工厂收入)。表 15 9 的资料来源引自《统计年鉴》。

[38] 在喀麦隆的共和国调查委员会第 68 号通告，1932 年 9 月 19 日，雅温得档案馆，APA-10895/A。

果说在本文论述时期结束时整个情况变得更坏，但税收水平仍在一个月的工资以下。此外，税收加上基本需要（以购买印花布表示）所需工时，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开赛）上升为接近5个月，但总的看来从1920年起（如果不是从战争以前开始）已有下降。后来固然又增加了一些，也不过只是一个半月的劳动收入。

表15.10 3个农业地区年人头税价值与月工资的比较（月工资总额：1912-1933年＝100）

	税收					税收加印花布				
	1912年	1920年	1924年	1928年	1933年	1912年	1920年	1924年	1928年	1933年
下、中刚果	65	50	36	31	78	106	175	198	119	138
开赛	75	37	41	22	59	175	482	291	143	135

资料来源：J. P. 皮曼斯，1968年，第361页。另一方面，在法属西非，据西非商业公司估计，迟至1940年各种税收占花生种植农年收入的一半。资产负债表的附属报告，公司档案。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项早期的投资政策虽然当时仍处雏型阶段，但后来导致一种更富有活力的生产制度，至少可以说，它与法属萨赫勒地区实行的那种阻碍型的剥削制度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在法属萨赫勒地区，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产品，当局仍然对非洲人进行压榨，以避免经济崩溃。

危机及其影响

非洲人的处境一直非常艰难，1930年时，它变得与本文论述时期开始时一样凄惨。

生产

370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规模的交战，但它使生产在短期迅速发展。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如加蓬的奥库梅木材业，它完全依靠德国的市场，战争爆发后骤然关闭），外国公司的出口和利润都有相当的增长。实际上，非洲法语区的“战争努力”特别严厉：1915年发起了“加紧生产计划”；1916年和1917年又扩充了计划内容。[39] 为种植和收获所谓战略产品（橡胶、油料作物、木材等等），组织了劳动营。最为重要的是，法国政府暂时保障了这些产品的收购。法国政府1918年相应地征购了14万吨油籽，1919年的征购量近300万吨。诸如蓖麻油和橡胶等一些商品的生产当时兴旺了一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停止收购，这些商品的生产便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起来。然而，总的说来，战争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组织生产（1917年殖民地经济会议的作用也正在于此），结果在1921年至1922年激烈而又短暂的危机过后，于20年代初便创建了第一批大型的投机性事业，如乌班吉沙里（今中非共和国）的棉花产业、加蓬和科特迪瓦的木材业。

[39] 参考法属赤道非洲1915年2月13日通告，C. 科奎里-维得罗维奇引用，1972年，第492页。法属西非情况见M. 米歇尔（Michel），1982年。

由于完全相反的理由,触发物价崩溃的1930年的危机却导致从根本上重新考虑生产目的和技术，至少对迄至那时属于挤奶式经济的法属领地是如此。

这场危机并非生产过剩危机。产量极低意味着这些产品只占国际贸易额的很小一部分(例如，塞内加尔的花生出口虽占法属西非收入的50%，但只占世界产量的5%)。这些产品得以迅速出口是由于宗主国通过补贴（尽管是有限的）政策加以保护的缘故。补贴内容包括在法属西非付给外国公司的出口奖励，以补偿价格下跌的损失，在法属赤道非洲宗主国承诺偿付国债，当时法属赤道非洲因海关收入的赤字已临近崩溃的边缘。

非洲人由于已无能力承担沉重的征税（尽管物价和工资的下跌、赋税仍然保持高水平)，他们以增加生产来弥补收入的减少。如上所述，正是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热带作物（咖啡、可可、香蕉、棉花）的生产完全是由于当地小农的生产而兴旺起来。尽管物价很低，出口量全面下跌的现象（1932年数量极大）很快改观。若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年平均出口量水平衡量，首次超出这一水平的是1931年，然后1934年起再次上升。这固然是从1924年至1928年兴旺时期开始的努力结果，但也与危机年代大力推行的，依靠1913年向法属殖民地提供的贷款，发展运输基础设施的政策分不开。

371

但是，由于分派这些资金时正值最深刻的萧条时期，因此这些资金基本上未花在扩充现行的计划上，而是用于(尽管只有一部分)消除国内赤字上，特别是用在喀麦隆(那里劳动营已经停办）和法属西非（那里一半以上的项目继续由联邦自己靠已大大缩小的财力来资助)。另外，正当殖民地的预算收入由于海关收入的下降而崩溃时，这种大规模贷款的政策导致了内债的激增。

这样，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明显的经济变化使农民既有所得也付出了代价，这是因为生产者赋税负担加重时正值价格跌至最低点之际，而农村劳工的工资也相应地下降了。很明显，税收收入的增加，农业人口中逐渐取代强制劳动的工资劳工队伍的扩大，与冒险性作物种植的扩展有着必然的关系。但是，这种农业生产必然触发由于当地“新富”、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商人企业家的出现，而产生社会等级分化过程。这些人靠利用大多数人的贫困和负债而赚钱发迹。例如，在整个危机年代，非洲国家的储蓄，无论以储蓄户数还是储金计算，都在稳步上升。这种储蓄的增长无疑是“买办”中下阶层的资金，这些人受惠于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很快就懂得他们的地位取决于能否迅速采取资本主义的比赛规则。

另一方面，对大多数贫穷的小农来说，似乎已经陷入赤贫的极限。这些非洲人耗尽几乎全部的储备，抵押出土地，沦为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分成制佃农（如科特迪瓦可可种植区的佃农)。此时，甚至再无必要以严格的强制性劳工立法来约束他们。自1931年开始，缺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此时再也不能避免使用钱了)，他们越来越不可能退回到那种自给自足的粮食种植的传统生产方式，因为那种生产方式甚至不再能维持生存了。严格地说来，农民不再有任何选择余地。[40]

---

[40] 法属赤道非洲情况见G. G. 雷斯特（Reste)，《给殖民部的经济报告》，布拉柴维尔，1937年6月24日，国家档案馆海外部分，巴黎（ANSOM)，丰兹·盖吕，827。法属西非情况见吉斯卡·德斯坦（d'Estaing）向殖民部递交的关于他1931-1932年法属西非之行的报告，ANSOM，《政治事务》，539。参见C. 科奎里-维得罗维奇，1977年和（编）1976年。

缺粮、饥荒和流行病

372

整个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是极为严重的缺粮危机。

1915年至1918年期间的战争经济有某些非常严重的含义。危害最大的措施是，正当军队（法属赤道非洲仅1万士兵，法属西非16万多一点）耗尽乡村粮食之时，实行了为宗主国征收食物的政策。

在加蓬，强制性种植的作物只有四分之一留给本地消费。中刚果与乌班吉沙里甚至连木薯也都出口了，1915年出口量为210吨；1917年为157吨。[41] 在法属西非，由于决

表15.11　法属西非，征收粮食的出口量

	1916	1917	1918	1919	总计
玉米	1.5	4.6			6
小米	9.6	3.6	1.3	1.6	16.2
稻谷		2.7			3
总计	11.3①	11.1②	3.2②	3.3②	25.2

①　包括木材、柯拉果和戈纳基埃（gonakie，柯拉果的一种）。

②　加上豆类。

资料来源：《法属西非政府综合年鉴》，1917-1921年，第55页。

定出口当地大宗作物，结果当局掏空了存粮仓库，由于1911年至1912年连续两年的半干旱和1913年一年的大旱，存粮原已不多。这次干旱遍及从塞内加尔至瓦代和乍得的整个苏丹地区。开始只不过是周期性的粮食短缺，后来情况不断恶化，出现了破坏性的饥荒，夺走了可能有25万至30万人的生命，[42] 这一局面直至法属苏丹（今马里）提供了4000吨谷物才稍为缓和，这4000吨谷物是既无船只又来不及运往法国而留下的。[43]

在法属赤道非洲，强制性征购一直延续到20年代，以支援刚果-大洋铁路工程项目。在那里，1918年开始的饥荒于1922年至1925年间扩大到该国的北半部（沃勒-恩特姆），它可能使芳族人口下降了一半，即从14万降至1933年的6.5万。[44]

身体变得虚弱的人们接着又成为流行病的牺牲品：天花开始流行，特别严重的是来自欧洲的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开始传播，法属赤道非洲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生。[45]

这一时期内一再出现的一个特征是，殖民制度造成的缺粮导致严重的饥荒（尽管饥荒并非总是引起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举例而言，被誉为比属刚果“粮仓”的卢旺达在出 373

[41] 参见法属赤道非洲1915年2月13日通告；C. 科奎里-维得罗维奇，1972年，第492页。

[42] J. 絮雷-卡纳尔（Suret-Canale），1964年，第169-172页。

[43] H. C. 科斯尼尔（Cosnier），1921年，第253页。

[44] G. 索特，1966年，第859、864和871页。

[45] 霍特（Huot）、马赞（Marzin）、里科（Ricau）、格罗斯菲莱兹（Grosfillez）、达维德（David），1921年。

现了一场干旱之后，于1928年和1929年又爆发了一场饥荒。[46] 饥荒确是那些已被挤奶式经济弄得虚弱不堪的国家更形虚弱的表现，尽管这些国家的出口额有所上升。

严重饥荒的情况确有发生。如1930年在尼日尔发生的饥荒，对此泽尔马-宗赖人迄今难忘。紧接着又来了一场蝗灾。但是，正如当时充满自我批评内容的报道所表明的，殖民制度对饥荒程度的加重负有很大责任。过高的赋税（10年间从1.25比利时法郎增至7比利时法郎）促使当地人纷纷逃往黄金海岸，而不再在当地种植作物。1927年以后由于在尼亚美设立行政管理设施和铁路的延伸，强制性劳务量增加了。这彻底打乱了种植季节，尽管变化不定的降雨状况使种植时令显得特别重要。非强制性种植的小米的供应完全靠当地酋长。1931年，由于行政当局拒绝降低人头税并坚持收集税款，迫使农民还要为逃离者和死者纳税，有一份报告描绘了这种局面："整个村落消失了……整个年龄组的人大批大批死亡"，[47] 在某些地区，死亡率高达50%以上。

但是，全面地看，这次灾难并不十分骇人听闻。饥荒由于运输设施的修建而得到缓解，流行病也因开展的第一场卫生运动而停止传播。不过，各地都受到了价格下降和就业机会减少的严重影响。"正是支付给生产者的价格，最使人们感觉到衰退的严重。当地人的购买力比以往任何一次危机都下跌得厉害。"[48]

十分明显，在非洲法语区，当巨大危机出现时大规模的向城市移民显然开始了。虽然总人口的增长停滞（法属西非的居民1931年为1440万，1936年为1460万），尽管城市就业情况很糟糕，城镇人口由于大批贫穷农民的涌入而大大膨胀。例如，1936年在法属西非，工资劳动者的人数不超过16.7万，几乎不到总人口的1%。然而1931年和1936年期间，达喀尔和阿比让的人口增加了71%，科纳克里的人口翻了一番。更触目的是像瓦加杜古这样的内地贫穷小城镇，它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内也增加了三分之一，一改原来的发展趋势。

374

这一时期内总人口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的现象特别能说明普遍的贫困状况。相比之下，各地的社会开支都趋于上升：卫生保健开支和药店及医疗设施数量的平行增加有效地制止了传统疾病（锥体虫病、性病、麻风病）的发展。反而言之，1931年至1936年的艰难时期，人们对流行病（流行性感冒、天花等疾病）的抵御能力特别弱。因此很容易把日益增加的发病率与身体虚弱和毫无抵御能力的人们的极度忧伤和物质赤贫状况联系在一起。[49]

经济的平衡表

当地人民由于处于行政当局严格的控制之下并很少参与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所以在本

[46] 这场饥荒并未妨碍随后木薯出口量的上升，从1930年至1934年期间，所登记的木薯出口量从239吨增至2515吨。P. 德德卡，1974年。

[47] F. 菲勒斯塔（Fuglestad）的引语，1974年，第25页。

[48] 上奥果韦公司，向股东大会的报告，1930年；该公司档案。

[49] 参见C. 科奎里-维得罗维奇，即将出版。

文论述的时期结束之际处于悲惨的境地,而当时的制度本身则处于变革之前的阵痛之中。

私营部门

的确,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是那些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创建的大公司的崛起。

表15.12 在刚果开业的比利时公司,1929年

	运输	银行	矿业	农业工业	商业(偶尔包括农业、工业)	林业(或林业、农业)
数量	23	24	27	125	88	9
资本(百万法郎)	2167	1037	951	1982	1196	105
每一公司平均资本	94	43	35	16	14	12

资料来源:F. 帕塞莱克,1932年,第362页。

比属刚果处于这一发展趋势的最前列。大萧条前夕,比属刚果有278家工商企业,还有36家外国公司的办事机构,这一数目还不包括零散的私人拥有的地方工商业。在3年内公司企业总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从1926年的4500家增至1929年的6000家。

1919年至1930年期间,投资额增加了10亿金法郎,包括殖民地发行的10亿。当时据估算,政府手中的有价证券(1928年约为160亿金法郎,1930年9月市场价格跌至50亿,降为私营部门拥有资产的三分之一)为私人手中的刚果有价证券价值的一半。 375

但是,尽管这些部门的生产经营早已多样化,但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矿业和铁路业。4个主要的公司(兴业银行、昂潘、科米尼埃和布鲁塞尔银行)共有资本60多亿金法郎,接近资本总额的75%。[50] 投资最多的是兴业银行,占了投资量的一半,它控制着3家铁路公司、3家百货公司、2家银行、12家矿业公司、6个种植园、3家金融公司、11家工商企业和一家房地产公司,也就是说,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矿业生产(铜矿、钻石矿、镭矿和相当一部分金矿)、所有的水泥业和最重要的水电设施。[51]

兴业银行成功的原因是它矿业生产的高水平,其中最重要的一家矿业公司是根据它和加丹加特别委员会签订的协定于1906年创建的上加丹加矿业(铜矿)联营公司。加丹加特别委员会本身是从加丹加公司接管过来的(1891年),它于1900年受刚果自由邦的委托,管理该地区的经济,并于1910年铁路通到伊丽莎白维尔(今卢本巴希)时开始经营福米尼埃矿(开赛钻石矿),该矿的勘探工作始于1907年,1914年着手开采。

相比之下,其他特许公司显得有点无所作为,因为它们绝大多数尚未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开发它们所占的庞大地区。

法属赤道非洲的情况更是如此。[52] 1900年以来,法属赤道非洲一直陷于瘫痪,这是因为搞了一项为期30年的命运不济的特许权计划,从而把土地廉价卖给了约40家大垄断

[50] S. H. 弗兰克尔,1938年,第292页。

[51] 此外,它还拥有另外7家公司的大量股票,并且是另外15家公司的董事会董事。见同书第294页。

[52] 参见C. 科奎里-维得罗维奇,1972年。

公司，而这些公司绝大多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破产。仅存的几家公司有的已改变为纯粹的商业公司，如在加蓬东半部地区的上奥果韦公司和1911年利弗兄弟公司买下来的奎卢尼阿拉地产公司；有的改为棕榈种植园公司，一直处于不发达的状况，如上、下刚果法国公司；还有一些则通过生产一些无利可图、甚至早已为人唾弃的产品以帮助延长不合理的专制性统治和贫困，如桑加-乌班吉林业公司。该公司依靠1200万比利时法郎的资金，通过重新纠集中刚果和乌班吉沙里原来的11家特许权公司，垄断着1700万公顷土地，并且垄断对野生橡胶的收割，一直保持到1935年。另一方面，1913年即被发现的乌班吉钻石却到30年代才开始开采。唯一兴旺的是加蓬的奥库梅木料。这是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胶合板业的一种原材料。

在大萧条前夕，107家公司的资金总额名义上为3.09亿比利时法郎，若以金法郎计算，1913年以来刚刚增加一倍，而当时私人股东的资本达0.7亿比利时法郎。国家在投资方面仍发挥着支配作用，这被视为一个国家贫穷的特征，私营部门早已把购置设备的大笔开销的包袱甩给了政府部门。

利弗兄弟公司取得成功与其他公司有天壤之别。它从第一次在比属刚果购买棕榈油开始（以1911年从比属刚果榨油业公司租借75万公顷土地为基础），很快便将其棕榈油生产帝国的范围扩大至整个西非（加蓬/中刚果、尼日利亚、喀麦隆）。最后，又与英国公司与德-荷人造黄油托拉斯合并于1928年组成尤尼利弗公司，后者与联合非洲公司这一英国大集团一起，建立起一系列法国子公司（法国尼日尔公司、塞内加尔诺索科公司、科特迪瓦法国公司等），这些子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规模逐渐扩大。[53]

法属西非实际上仍然是以农产品出口为基础的商业公司的领地。即便在这方面，与比属刚果的差距也很大。

表15.13 1943年法属西非企业中的投资（以百分比表示）

	商业	种植园	林业	矿业
所有企业	38	18	12.5	7.5
仅公司一类	42.8	11至12	11至12	8.8

资料来源：J.德勒什（Dresch），1952年，第232-241页，以殖民部1943年的调查为基础，经济事务专辑，第52匣。

1938年，法属联邦只有50来家商业公司，申报的资金总额刚刚超过6亿法国法郎。[54]当时，有10家公司申报的资金超过0.2亿法国法郎，而其中的两家就占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两家中一家是创建于1906年的西非商业公司，拥有资本1.25亿法国法郎；另一家是创建于1887年的西非法国公司，拥有资本0.75亿法国法郎。[55]然而它们的投资额在战前微不足道，在最好的年份平均也很少超过0.1至0.2亿金法郎，尽管在本

[53] M.谢里尔（Sherril），1973年，第48页。

[54] M.蒂皮尼埃，1940年。

[55] 1945年对这两家公司的股份投资额占法国股票交易所中法属西非商业公司资本的84%，占法属西非全部企业资本的52%。P.瓦当（Valdant），1946年。

章涉及时期结束时，它们已占到法属非洲总投资额的10%。[56]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贸易的内容只是把国内产品收集和运送到港口，出口未加工或半加工的产品，并将换来的主要为消费品的进口制成品在国内出售，因此这种贸易并不需要大笔资金。毋庸置疑，本世纪20年代是挤奶式经济的鼎盛时期，而通货膨胀是利润的主要来源：自1913年至1920年，法属西非的对外贸易自2.77亿增至11.43亿法国法郎。在5年的时间内，英国向非洲输出的棉织品价值翻了两番；考虑到英镑价值的稳定性，若按1914年法国价格计算，增加了800%。在几年时间内，西非商业公司和西非法国公司的机构遍布整个西非，到1924年它们差不多已经达到最后的形态（西非商业公司拥有的机构当时为140家，1930年为145家，1940年为250家；西非法国公司拥有的机构当时为141家，1930年为191家，1939年为411家）。不过它们在商业活动更为活跃的英属领地上也开展了业务经营：西非法国公司从尼日利亚收购棕榈油制品和锡；西非商业公司从黄金海岸收购可可，不久可可业务占到该公司总营业额的三分之一。

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尚未真正开展、工业化基本上还不存在，以及传统的贸易经济仍构成法属西非经济活动的主体，因之繁荣主要建立在危险的不牢固的基础上，无法抗拒商品价格体系的崩溃。所以大萧条的影响显得格外严重。

对葡属殖民地来说，它们尚未设法在这些不同道路面前作出抉择。莫桑比克处于无所作为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它仍处于特许权所有人政权的控制下。在这个政权下，尼亚萨公司由于其灾难性的营业记录于1929年便丧失了它的垄断地位，而与此同时莫桑比克公司的掠夺相当有效率，赞比西公司把大片良田作为转租地占用。[57]莫桑比克遭受大萧条的打击十分沉重，这从1929年至1933年间出口额下降一半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在安哥拉，迪亚曼集团利用比利时和英国的资金对采矿进行了首次尝试。自1920年以来，该公司尽管对安哥拉的贡献仍属有限，1929年为60万英镑，占安哥拉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但仍不失为该殖民地的主要财政支柱。该公司享有免交各种赋税及关税的待遇，完全控制了劳动力和市场，此时已在建立自己的垄断帝国。

资本设备与生产

378

就资本设备与生产而言，经济上的收支平衡表在本章叙述时期终了时情况仍然很差。主要的一项成就是铁路建设。到处由国家取代或大力资助原先的私营公司。比属刚果的铁路网大大扩展了。用于这方面的投资从1920年的4.8亿金法郎增至1935年的5.35亿金法郎，永久性铁路长度从1940公里增至2410公里。截至1934年，政府提供的铁路建筑资金总计22.71亿金法郎。1934年，铁路运输收费也相应地达到1.03亿金法郎。[58]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矿区修建广泛的铁路网络。1918年接通加丹加与罗得西亚的铁路系统，1928年通至下刚果，1930年以后铁路又朝着本格拉方向延伸。但是，铁路收益

[56] 这两家公司的历史见C.科奎里-维得罗维奇，1975年。

[57] E.博姆，1938年，第155页。

[58] S.H.弗兰克尔，1938年，第407、414页。

不平衡情况仍旧极为严重(平均年收入为1%左右)。只有运输量85%为铜的加丹加铁路线是个例外。实际上，人们把修建铁路视为不错的投机事业而不是公共服务事业。其目的不是提高运输量，而是增加利润，达到此目的的途径就是拼命提高运费率，高运费率得到禁止铁路与公路竞争规定的保护,[59]但也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尤其在产品价格下跌的时期更是如此。铁路建筑显然给葡属殖民地带来了好处。1930年时安哥拉有2348公里铁路线，莫桑比克有1936公里铁路线。它们从过境转运业务中得到大部分财源，这方面的收入约占莫桑比克外贸收入总额的80%。[60]

法属赤道非洲于1913年开始一些宏伟的铁路修建工程,包括修筑加蓬铁路以及连接刚果和乍得的铁路。[61]最后又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建设刚果至大洋干线的艰巨任务（自1922年至1934年，干线长度不足500公里)。这条干线开拓了原先非依赖比属刚果不可的地区。另一方面，矿产资源贫乏的法属西非只搞了几项对原有的杂乱无章的铁路网络中垂直于海岸的部分加以扩展的工程。这充分表明殖民剥削的古老、分割和外向型的特性。在运行使用中全长为3500公里的铁路线上，上述扩展工程在1921年至1934年间为550公里。

379 作为一种革新，更为重要的是在热带大草原地带修筑公路网，公路的建成结束了人力搬运的落后状态，改变了产品收集和流通的条件。法属赤道非洲乌班吉公路网的修筑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6年共修了4200公里。但是，使用该路的车辆并不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商用车辆。1930年车辆还不到1000辆，1931年为1500辆，1945年也只不过2850辆，其中有600辆用于旅游业。[62]

法属西非用公路收入弥补铁路的亏损。1937年，2.7万公里公路向17,229部车辆开放，其中包括近万辆货运卡车和轻型卡车。1926年至1934年期间，用于公路修筑和港口改进项目的资金几乎相等于铁路的投资，达4.75亿法国法郎，而铁路的投资为5.2亿法国法郎。[63]

尽管如此,所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在大萧条袭来之前未能来得及对出口量产生影响。无疑，有一些殖民地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安哥拉的棉花、咖啡、甘蔗、西沙尔麻和玉米；莫桑比克的椰子、花生和大米；加蓬和科特迪瓦的木材；几内亚的香蕉。但是出口几乎仍以矿产和油料作物为主。没有哪块殖民地的形势像比属刚果那样优越，那里情况的改善也不过靠两三类产品，这些产品至少已经部分经过加工。这些产品中有植物油和铜。植物油的产量从1914年的2500吨增至1921年的0.9万吨、1930年的6.5万吨。

---

[59] 铁路和公路部门均处于垄断地位。参见《1928-1934年划定汽车运输垄断的界限》，向比利时参议院递交的第108号报告，1935年，H. S. 弗兰克尔引语，1938年，第409-411页。这项政策与英属领地的政策相似，例如在黄金海岸，政府在同一时期禁止种植者用卡车运输他们所生产的可可，以确保铁路部门的利润。G. B. 凯（Kay）编，1972年，第431页。

[60] 根据S. H. 弗兰克尔著作中的表，1938年，第369页。

[61] C. 科奎里-维得罗维奇，1972年，第286页。

[62] 同上，第284页。

[63] 《西非统计年鉴》见表15.9资料来源中所引书。

铜的产量在 1922 年至 1931 年间增加了两倍，即从 4.3 万吨增至 12 万吨，但 1932 年由于减少产量的国际协议减至 5.4 万吨。

表 15.14 比属刚果，出口价值（以百分比表示）

	1927 年	1928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矿物	61	61	60	67	70	60	54	59	62
棕榈制品，棕榈油	20	19	17	14	11	17			12
棉花	5	8	9	8	8	8			11
总计	86	88	86	89	89	85			85

资料来源：S. H. 弗兰克尔，1938 年，第 289-301 页。

肯定，安哥拉看来也拥有同样的潜在资源。然而，葡萄牙的漠不关心使安哥拉无计划的农业生产承受气候和投机活动的风险，以致安哥拉停滞不前达 10 年之久。[64]

对于法属赤道非洲来说，它刚刚从加蓬林业垄断中崛起，1930 年其木材出口量略过 40 万吨。虽然自 1923 年以来喀麦隆的出口量增加了两倍（从 4.8 万吨增至 12.4 万吨），但到 1934 年时，对该国的开发还只刚刚真正开始，当时出口值达到 0.73 亿法国法郎，其中约 60%是可可和油棕产品。最后，法属西非虽然慢慢地有了几种新产品，但其二分之一以上的出口仍然依赖于塞内加尔的花生，而且这些花生出口时几乎全部未经加工。

表 15.15 法属西非，出口价值（以百分比表示）

	1928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1936 年
花生	52.7	47	46	47	38	42	49	53	53
棕榈制品，棕榈油	13	14	14	13	12	6.5	6	8	10
木材	7.5	6	7.5	5.5	4.5	3	3	3	1.6
可可	9	8	9.5	10	16	13	11	8	7.7
咖啡								0.3	0.3
香蕉				0.1	0.3	0.4	0.4	0.3	0.4
总计	88.2	75	77	75.6	70.8	64.9	69.4	72.6	73

资料来源：《法属西非的出口发展》，见表 15.8 资料来源所引书。

结 论

简而言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段时间结束时经济收支平衡表有赤字，这从生产下降、多样化经营不足的殖民者角度来说是如此，同时从贫困、人心惶惶的非洲人角度来说也是如此。然而，不管外表如何，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经

[64] S. H. 弗兰克尔，1938 年，第 371-373 页。

济的结构。在这方面，1930年的危机使人注意到有必要采取一种由国家指导的协调统一的政策。这预示着殖民地计划的制定，在这种计划中，国际劳动分工为组织专业化的集中生产区提供了根据。简言之，工业化殖民主义强国（尤其是法国）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把当时仍处于边缘地带的殖民地世界结合进全球性的商品生产和分配系统中去。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色是人口趋势的逆转。至少在法语地区是如此，人口下降的趋势在20年代中期似已停止。战争告诉人们非洲是人力资源的储藏库，也告诉人们战争威胁着非洲的人力资源，而且这种威胁正发生在殖民地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劳动力需求的时候。当然，30年代末期尚未出现人口爆炸问题。当时人口重新开始增长还是有助381 于加快复苏的过程。诚然，殖民地的开发很快又以更大的劲头重新开始，殖民地人民当时正日益与现代经济结合成一体，他们准备对殖民地的法律不再起消极的或反叛的作用。当然，在英属殖民地和南非联邦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葡属殖民地仍然穷得可怜。比利时的温情主义总是乐于投资的，但同时却有计划地拒绝为非洲人促进殖民地内部的进步。而法国最终认识到必须对生产进行大量投资，即便这样的投资不能很快产生收益。早在1936年，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提出一项既带现代化色彩又属改良主义性质的统一的殖民地计划。尽管这项计划因缺乏资金而不能按既定方针很快实施，但却确是把改革首次引入了法属联邦，正由于这些改革，最终允许成立非洲人工会和政党。

（张志军译）

16 原英属地区的殖民经济

M.H.Y.卡尼基

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时，英国人已在热带非洲的许多地方牢牢地站住了脚，这些地方包括：尼日利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冈比亚、塞拉利昂、肯尼亚、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尼亚萨兰（今马拉维）、乌干达、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南非（见插图2.1）。殖民经济正在上述地方十分明确地形成。本章将分析这一类殖民经济的性质和主要特征。 382

英国与其他殖民者一样，并没有形成一套可以概括所有殖民地生活各个方面的普遍适用的殖民主义理论，也没有形成一套接近普遍适用的殖民主义实际做法。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乎其难的，因为被迫接受殖民统治的各族人民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和背景，并生活在极其不同的环境之中。许多情况需要地方当局的行政官员根据当地条件来处理。但是，尽管不存在一种成型的理论，但是对殖民关系进行严格的分析还是可以找出某些基本的设想，而这些设想曾是殖民经济各项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的指导原则。第一，希望殖民地为工业化帝国列强的机器提供原料（农产品和矿产品）。第二，殖民地必须进口帝国列强的制成品。这两种设想把帝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经济阵营：殖民地和宗主国。关键在于，这是一种很不对等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殖民地有义务首先向英国出口，然后方能考虑其他甚至出更高价格的买主；而英国却没有专从其殖民地进口的义务。英国可以通过合理的经济选择进行贸易，哪国的价格低就买哪国的东西。殖民地人民在进口贸易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有时候，由于殖民地的国家机器迫于英国的压力，对非英国商品提高关税，殖民地的人民不得不购买昂贵的英国制成品。第三，殖民地必须自己支持自己。殖民地人民不得不为一般行政管理和所搞的一切有限的发展项目筹措收入。

要明确地或含蓄地使殖民地行政官员明白这些指导原则。但是，还有一个具有同样重要性却已被有些殖民地行政官员和其他殖民主义辩护士弄得面目全非的设想，这就是英国人同其他殖民者一样，来到殖民地的主要目的（如果不能说是唯一的目的）就是发财致富和促进自己的利益。殖民地人民的发展与否与他们无关。如果殖民地有的地方果真得到"发展"，一般说来那只是旨在促进殖民者利益的活动的副产品。倘若认为殖民地国家机构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考虑帝国主义的非官方代表的利益，这种想法纯属臆想。这些非官方的代理人主要是通过商业公司、矿业公司和银行进行活动。他们在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和各种委员会内代表集团的利益，或者起着压力集团的作用。正如绝大多数殖民 383

地的情况，没有组织得很好的非洲人代表，因此白人移民和外国公司的代表得以在牺牲当地居民的情况下从殖民地政府那里获得许多特许权。换言之，殖民地的政策和实践是由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非官方的人物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比行政当局更为直接。他们从当地居民手中收购农产品，同时向他们出售进口商品。他们还雇佣了当地劳工。在这两方面，不存在什么政府干预。很明显，进出口货的价格以及工资水平要比地区专员一年一度去农村征税之行，对人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更大。这种状况绝非少数殖民地的特殊现象。这是殖民地经济关系的正常现实。由于这种关系主要属于经济范畴，因此殖民地的实际做法是由经济规律制约的。①

从英国对非洲实行有效占领之初开始，英国政府便意识到它刚获得的殖民地的经济力量对促进英国的海外利益所具有的潜力和重要性。1895 年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十分明确地向议会透露了这一想法：

> 我们在所有这些新国家中的任务是为不列颠的商业、不列颠的企业、不列颠资本的使用铺平道路，因为现在发挥我们民族商业能量的其他道路和其它出路正由于越来越牢固的商业原则而逐渐被堵塞……
>
> 用不了几年，我们的人民将成为主人，我们的商业将占上风，我们的资本将统治……
>
> 384 诸位勋爵，这是一种巨大力量，但它要求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设法把它引进到它即将发挥作用的国度里，你们必须为它开辟道路。②

不错，道路打通了，各殖民地的国家机构都为在殖民地中“有条不紊地”管理经济活动创建和保持了有效的环境，包括维护“法律和秩序”，这种环境有助于有效地开发殖民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生产资料所有制

在 1935 年以前的这一时期内，英属地基本的和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英国对土地的态度和政策因地而异，甚至在每一地区内各殖民地之间也不相同。但是概括地说来，英属西非的非洲人实际上仍控制着自己的土地，而在英属东非和中非，许多非洲人则被剥夺掉了土地。不过，在每一个地区，各殖民地之间的情况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乌干达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坦噶尼喀，绝大部分沃田掌握在当地非洲人手中。也有少数情况例外，例如乌干达的布干达，坦噶尼喀的布科巴和乞力马扎罗地区以及肯尼亚的吉库尤兰，大片的土地并没有市场价格，由村社共同拥有。村社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耕作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更为缺乏的生产资料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

外国人、大部分是英国人，设法在有矿产和木材资源的土地上得到并保持特许权。这

① J. S. 弗尼瓦尔（Furnivall），1948 年，第 8 页。

② R. D. 沃尔夫（Wolff）引用，1974 年，第 134-13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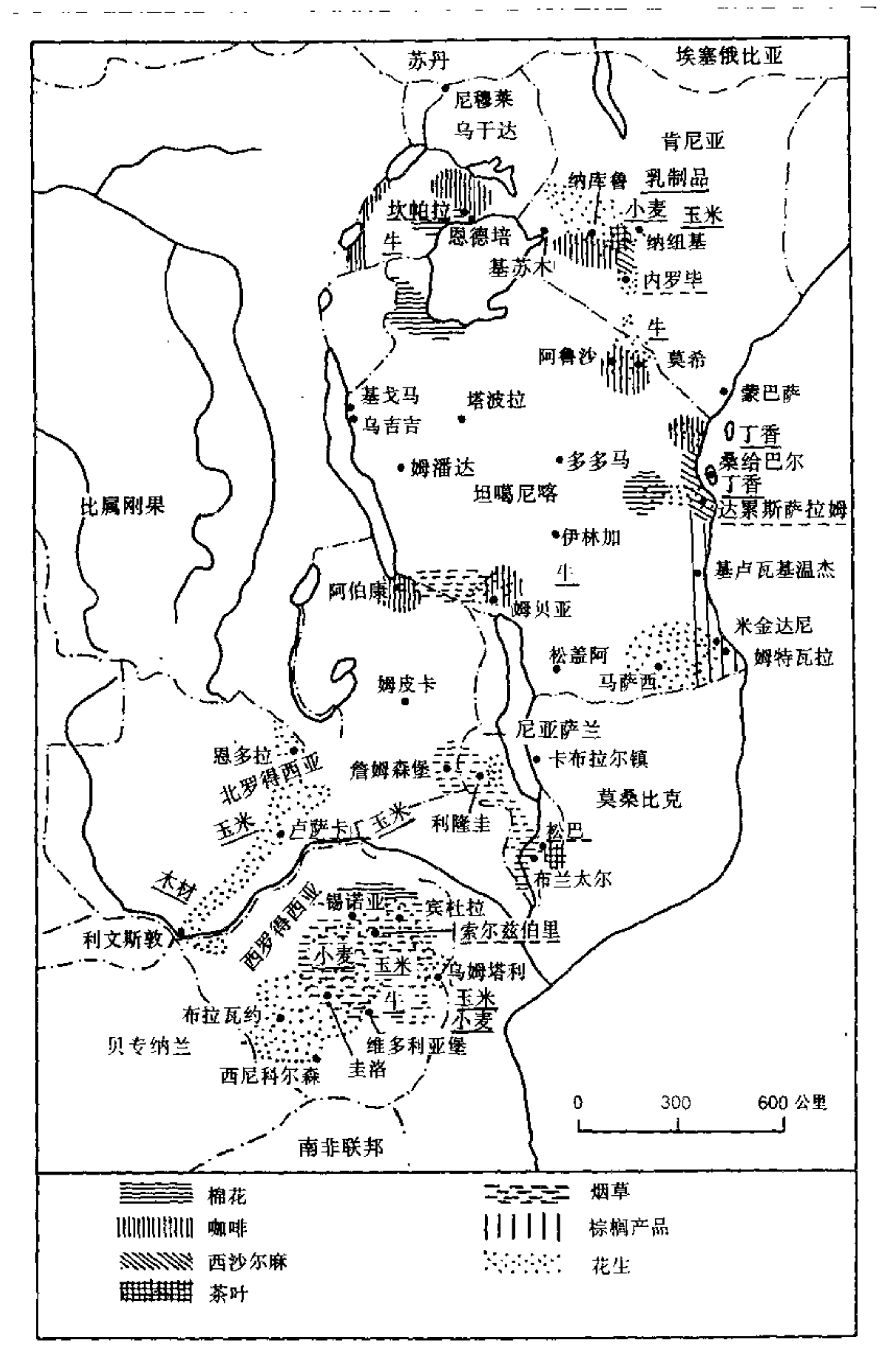


插图 16.1 东非，原英属地区的经济发展，农产品(根据R. 奥利弗和A. 阿特莫尔，1972 年)

种情况对当地农业村社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在肥沃的可耕地上蕴藏着矿产的地方，严重的困难就出现了。几乎毫无例外，矿物资源属于英国君主或者君主的代理人，并由帝国主义的官方或非官方代理人决定的方式加以处理。

在肯尼亚和中非，情况与德国人统治下的坦噶尼喀一样，非洲人拥有一点土地，但土质肥沃的可耕地中的大部分却被白人移民所用。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土地被剥夺的过程及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在M.P.K.索伦森[3]和乔万尼·阿里吉[4]撰写的作品中有着很充分的记载。书中提到，英国人对本世纪初的肯尼亚经济活动的看法导致他们在肯尼亚以外的地区寻找代理人。书中还说，与处于中央集权政治机构统治下的乌干达（尤其是布干达）的发达的农业相反，肯尼亚的大多数社区的经济甚为落后，以致不能靠它作为经济发展的跳板。因此结论是，白人移民被选中来组成属地经济生活的基础。[5]这种思路只解答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英帝国范围内有许多地区的土著经济也很不发达。肯尼亚的沿海地区就是突出的一例。这些地区未被白人移民所殖民化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肯尼亚高地肯定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可以提供给欧洲拓居者。除其他因素外，温和的气候显然是一个吸引白人移民的重要因素。移民所占的土地绝大部分位于海拔1400米以上。这些地方降雨量最多而且最可靠。总之，被剥夺的土地位于条件最佳的农业生产区。

386

第7章已经谈到东非土地刚开始被剥夺时的情况。特别在1919年以后，肯尼亚土地的被剥夺形成令人注目的趋势，而且价格低得犹如无偿奉送。1903年时，肯尼亚被剥夺给欧洲人的土地还只有2000公顷左右。到1914年，被剥夺的土地面积增至26万公顷左右，1930年则进一步上升到约为274万公顷。[6]这是相当大的一大片可耕地，因为肯尼亚高地（约9万平方公里）占肯尼亚的面积不到15%，然而在30年代以前却养活着全国75%以上的人口。丧失土地最多的是基库尤人，但南迪人、马赛人、基普西吉斯人和其他一些部族也失去了土地。

获得土地的可能性以及殖民当局为推广白人移民农业而进行的宣传，吸引了许多欧洲人，其中有冒险家，也有真正的移民。1903年，在肯尼亚的欧洲人仅596人。两年之后人数增至954人，其中700人是南非人；[7]截至1914年3月底，欧洲人增至5438人，1929年12月底肯尼亚的欧洲人共有16，663人之多。[8]早期移民中的许多人，尤其在1910年以前，得到土地只花了很少钱或根本没花钱。其中有德拉米尔勋爵，他后来成为一个大地主，一度拥有4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9]1902年至1915年之间获得的土地是采取租借99年的方式。1915年，行政当局将土地租借条件作了修改，使之更有利于当时已成为

③ M. P. K.索伦森（Sorrenson），1968年。
④ G. 阿里吉（Arrighi），1967年。
⑤ R. D. 沃尔夫，1974年，第47-67页。
⑥ 同上，第57、60页。
⑦ 同上，第54、103页。
⑧ 同上，第107页。
⑨ E. J. 赫克斯利（Huxley），1935年，第287页；M. P. K. 索伦森，1968年，第86页及其后诸页。

一股颇有影响的政治势力的白人移民。1915 年皇家土地法令把租借期从 99 年延长到 999 年。同时，它还降低了 1902 年法令规定的租金水平和必须进行土地改良的最低标准。

许多被剥夺的土地并未用于生产。一方面急需土地的非洲人没有土地或使用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欧洲人则用土地进行投机以牟取暴利。到 1930 年，欧洲人手中多达 64.8%的土地未被用于“任何类型的农业生产活动。”⑩投机牟取利润同时产生土地的兼并。到 1912 年，5 个土地占有者一共占有被欧洲人剥夺土地总面积的 20%。有一度，位于裂谷最肥沃地段 50%以上的被剥夺土地为两家辛迪加和 4 个私人所拥有。也正是在这一地区投机活动最为猖獗。1908 年以每英亩半先令价格出售的农场，于 1912 年倒手时的价格增至每英亩 10 先令。两年之后，同一土地在市场上再次易手的价格为每英亩 20 先令。⑪ 387

在南罗得西亚，转让给欧洲人的土地更多。1890 年至 1900 年期间，欧洲企业家和冒险家纷纷涌入该国，希望发现“第二个兰德”，但未能找到，只发现了一些小型的零星的矿藏。许多欧洲人从代表英国君主统治并拥有特许状的英国南非公司手下买下土地，然后便在马绍纳兰定居下来，成了农庄主。接着在 1894 年，为镇压恩德贝勒人而被招募来的维多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纵队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 6000 英亩农田。于是，剥夺土地的范围又扩大到马塔贝莱兰。与肯尼亚的情况不同，该地欧洲人的人口增长得很快，在 1900 年至 1935 年期间，南罗得西亚的欧洲人比热带非洲其他任何属地都多。至 1901 年，他们的人口达 1.1 万人。不到 10 年，他们的人口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2.3 万人。到 1926 年，南罗得西亚的欧洲人超过 3.5 万，其中，出生在罗得西亚的占 29.9%；出生在英国的占 29.2%；出生在南非的占 32.6%。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欧洲人人口的增长更多是由于移民而不是繁殖。

欧洲人人口的增长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土地被剥夺。在1900年至1935年整个时期，欧洲人占有的土地多得不成比例。1911 年，他们占地 770 万公顷，只略小于土著人保留地的面积。随着土地的不断被剥夺，至1925年时，欧洲人拥有的土地面积约达1250万公顷，几乎占了距铁路40公里范围内、海拔900米以上气候适宜、降雨充足而又可靠的所有土地。⑫相比之下，到1925年非洲人在土著人保留地之外买下的土地面积仅只 1.8 万公顷。这一数字生动地表明，非洲人在当时那种环境中没有能力与欧洲人展开竞争。但直至此时，土地所有权尚未得到有利于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的严格的法律保障。真正从法律上牺牲黑人多数的利益以促进白人少数的利益的是 1930 年通过并于 1931 年4月正式执行的土地分配法。该法把南罗得西亚划分为四大类地区，⑬土著人保留地（22.4%）其中的土地是根据非洲人习惯法占有的；土著人购置地是供非洲人个人购作农田的保留地，这也可被视为是对非洲人丧失在南罗得西亚其他地区购置土地权利的补偿；欧洲人地区（50.8%）包括当时欧洲人已经拥有的土地和额外的7700公顷土地， 388

⑩ R.D. 沃尔夫，1974 年，第 60 页。

⑪ 同上。

⑫ G. 凯（Kay），1970 年，第 50 页。

⑬ 同上，第 3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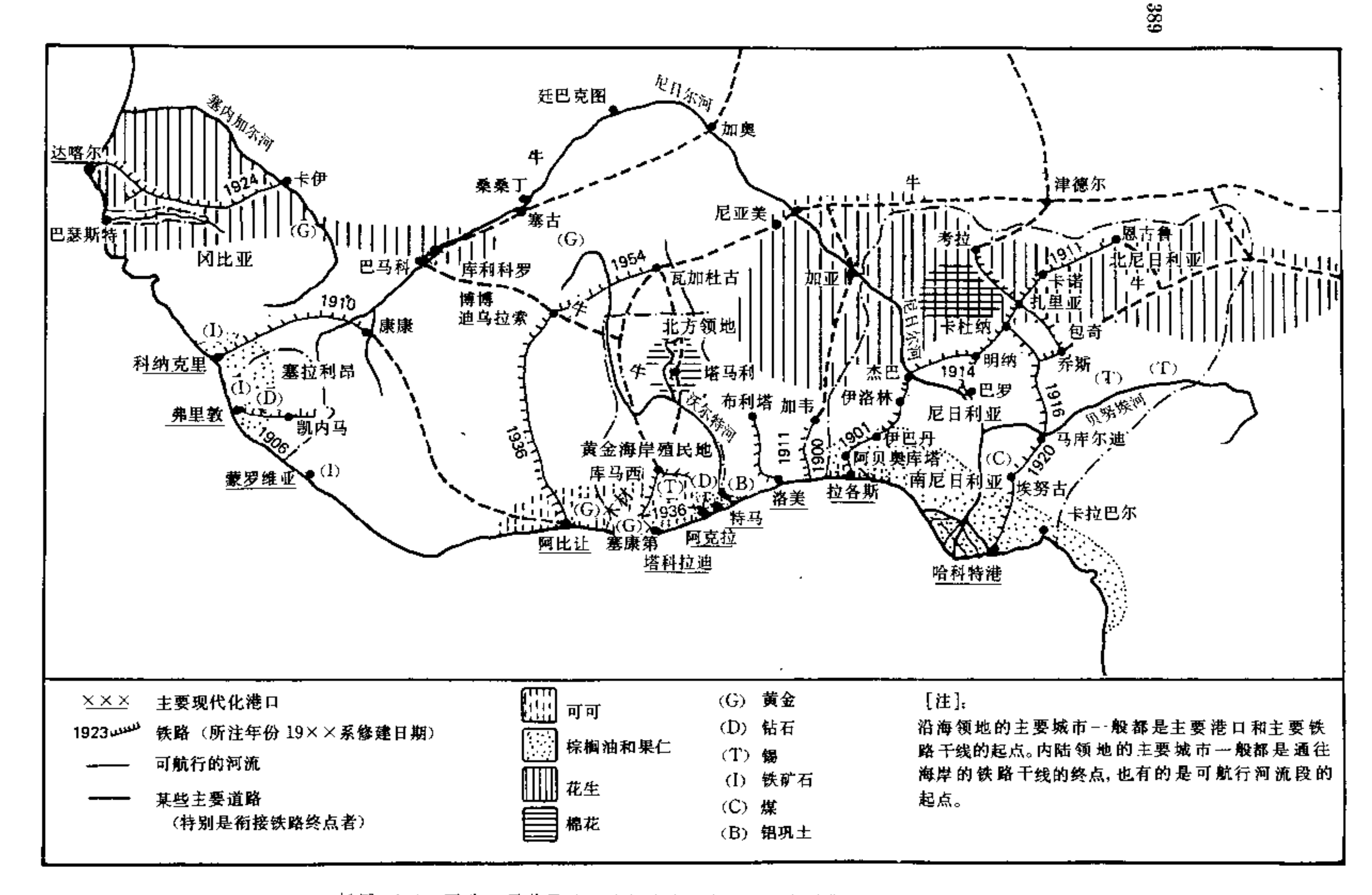


插图 16.2　西非，原英属地区的经济发展（根据R. 奥利弗和A. 阿特莫尔，1972 年）

这些土地从此之后只能为欧洲人所拥有或占用,"所有城市均在欧洲人地区之内;"⑭ 未分配地(18.4%)包括72万公顷贫瘠不毛的土地,这些土地由政府掌握,可于将来分配作任何其他用途。显而易见,1930年的土地分配法把种族偏见带入土地的分配,但是并不否定1925年以前各种族之间的土地分配状况。它实际上否定了各种族在各自的划定地"分别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南罗得西亚当时实行的是由白人占支配地位的内部自治,所以白人少数分得的土地才如此之大。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有两种作用。它既是生产的要素,同时也是投机的目标。

在北罗得西亚,转让给欧洲人的土地相对少些。统治该地直至1924年的英国南非公司,通过19世纪90年代与当地酋长达成的条约,获得了除巴罗兹兰之外全部领地的土地占有权。⑮ 这家公司成功地动员白人纷纷移居进来,而被剥夺了土地的非洲人则被迫迁移他地,有时也得到一些补偿。到1921年,在全部3634名欧洲人中,从事农业的有714人。⑯ 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北罗得西亚的土地被大体划为三类。专为非洲人保留的土地面积总计为2874万公顷,包括巴罗兹兰(1497万公顷)和土著人保留地(1376万公顷)。已经分配给欧洲人的土地在343万公顷以上,其中,222.5万公顷为两家公司所占有;120万公顷为农庄。剩余的6070万公顷土地为森林和动物保护区。⑰

在英属西非(见插图16.2),英国人企图(甚至比在东非更早)直接控制土地、划定森林保留区以及把土地作为特许权授予欧洲种植园主和受让人。早在1894年,后来又在1897年,英国人在黄金海岸提出一项土地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把所谓的空地置于英国人的直接控制下。正如本书第6章所指出的那样,当地人民对此的反应是,受过教育的上层精英和当地传统统治者于1897年在海岸角组织起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以抵制所提出的这项法案。该协会于1898年5月派出一个代表团赴伦敦。代表团成功地说服了英国殖民部放弃这一法案。所提的理由是:在黄金海岸并不存在空地;每一块土地都属于这个或另一个大家族。1910年至1920年期间,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的英国人也曾提出类似的法案,但被以赫伯特·麦考利为首的上层精英和传统统治者创建的反对奴隶制和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所击败。该协会击败这项法案的方法是向伦敦的枢密院提出上诉,结果枢密院的判决是土地为"村社拥有的无可非议的权利。"⑱ 由于西非人取得了这些胜利,英国人只得放弃直接控制土地的政策,尽管从理论上说,英属西非所有被征服的土地,如尼日利亚的贝宁、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以及像拉各斯那样割让给英国君主的土地 390 全都属于英王所有;而诸如北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北部领地等保护地内的土地由英王替当地人民代为保管。⑲ 但是,1906年至1925年期间,像利物浦的肥皂和人造黄油巨头W. H.利弗等欧洲人和英国棉花种植协会等团体,发起了一系列十分激烈的运动,要在

⑭ G. 凯,1970年,第30页。
⑮ R. E. 鲍德温(Baldwin),1966年,第144-145页。
⑯ 同上,第41、146页。
⑰ 同上,第149页;
⑱ J. F. A.阿贾伊(Ajayi)和M.克劳德(Crowder)编,1974年,第576页。
⑲ T. O. 伊莱亚斯(Elias),1971年,第1-33页。

英属西非建立种植园。后来在黄金海岸、南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也的确建起了一些种植园。但是，这些运动失败了。到1930年，英属西非的土地中只有较小的一部分被剥夺之后归殖民地统治者和其他欧洲人使用，大部分被剥夺的土地则用于开矿。

上述后果既不是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经过周密考虑的政策，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把英属西非的土地保留给非洲人，也不是由于西非在19世纪后期获得"白人坟墓"坏名声的缘故。正如A.G.霍普金斯所指出：

> 所谓热带地区对健康有害的说法并未能阻碍欧洲人在比属刚果、法属赤道非洲和马来亚建立种植园，也未能阻挠西非心情迫切的欧洲申请人。并且，到了20世纪初，对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的控制越来越有效，所谓"白人坟墓"的坏名声亦开始消失。[20]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英属西非的土地免于被大规模地剥夺呢？第一个答案是霍普金斯称之为"幸运的地理状况"，人们发现西非的矿物资源并不十分丰富。第二个答案是，在西非建立种植园的行动没有成功。其所以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那些在这些地区经商的其他英国公司因未能染指种植园的开发而提出强烈反对。其次是由于所建立的少数种植园因资金缺乏、"对热带情况全然无知"、劳力缺乏和世界供应的变动而遭惨败。再者，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西非人自己成功地在他们的小农场上，运用自己简朴的方法满足了诸如可可、花生和油棕之类作物的出口需要，这就没有必要再在这些地区建立种植园制度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任何试图夺取大片土地或为种植园采用大规模强制劳动，都可能激起西非人的反对。[21] 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因素，英属西非人才免受土地被剥夺之害，而英属东非和中非的非洲人就遭受了此种厄运。

生 产

所谈到的殖民经济以两大部门为特征：一个部门主要为维持生产者生计和满足国内市场；另一部门主要为初级产品的出口而进行生产。早在殖民统治之前很久，自给生产已经有相当发展，殖民当局对这种生产很少给予注意。英国人在19世纪末遇到的是西非农民以十分简单的技术生产大蕉、甘薯、木薯、大米和玉米，英属东非和中非生产香蕉、玉米、木薯、小米以及其他种种作物的情况也与之相差不远。通常年景大多数家庭生产的东西足够自家食用糊口，此外还将很小一部分投入交换领域。帝国主义的官方和非官方代理人对自给经济成分没有多大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并不能直接促进国际资本的利益。它与出口经济部门不同，并不赚得支付进口所需的外汇，也不能为宗主国工厂提供原材料。因此，难怪这种经济成分为殖民当局所忽视。

经济作物

出口部门主要关心农产品和矿物这两类初级产品的生产。除欧洲移民占有大量土地

[20] A. G. 霍普金斯（Hopkins），1973年，第212页。

[21] 同上，第213-214页。

392



图片 16.1 尼亚萨兰的农庄(卢詹达庄园)中，正在劳动的采茶者

的个别地方外，热带非洲原英属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部门，几乎全部掌握在数百万非专业性小生产者手中．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只是在黄金海岸南部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尼日利亚西部，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成功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了可可种植农场。[22] 在经济兴旺的年代里，非专业性生产者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会以赚取最大的利润。[23] 但是，由于他们只是部分地结合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因此既没有完全受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不利的国际经济条件的冲击，也没有完全遭受各种各样的殖民剥削。小型农场主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有：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西部的可可；尼日利亚、塞拉利昂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黄金海岸的棕榈油和棕榈仁；冈比亚和北尼日利亚的花生；乌干达、尼日利亚和坦噶尼喀的棉花；以及乌干达和坦噶尼喀的咖啡（见插图16.1和16.2）。桑给巴尔（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生产的丁香不属于这一类，而英帝国所需的丁香几乎全部来自桑给巴尔。在丁香种植园工作的是非洲劳力，但拥有丁香种植园的却是阿拉伯人。

在殖民制度下参与经济作物的生产，并没有给非洲生产者带来过度的感情上的震动。首先，这不涉及任何根本性技术革新。其次，这些作物或类似的作物中有许多在殖民时代之前很久就已开始种植和加工。

就棕榈油业而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使西非人得益的行业，因此在生产和加工两方而都不需要作出多大改变。对生产者来说，可可、咖啡和棉花（布干达）这三种是新作物，但它们都很容易适应传统的生产周期。因此，出口经济部门发展很快。[24] 在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技术革新的情况下，这种迅速发展只能归功于土地和劳力方面投入的增长。[25]

实际情况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希望我们相信的正相反，所提及的这些国家的农民出口经济部门的建立，并不是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实际上，在有些地方的进展还是在官方的阻挠政策和做法下取得的。即便是英国人大大引以为荣的黄金海岸的可可业，也基本上是由当地人发展的。而极其赞扬帝国主义对非洲的扩张的阿伦·麦克菲，却情误地把黄金海岸可可业的发展归功于殖民行政当局。对他来说，"黄金海岸的可可生产业似乎毫无疑问的是政府抚养的孩子。"[26] 但是，近来的学术研究成果[27] 使人注意到，政府对可可业创建阶段的贡献是多么有限。的确，在有些情况下，一些其高薪来自农业生产者赋税的农业专家比生产者更为无知，他们的建议后来证明是灾难性的。[28] 尽管农业部的生产指导经常有误，但可可业还是得到了发展。19世纪90年代初，几乎从零开始，到1903年农民将可可种植面积扩大到1.7万公顷以上。1928年可可种植而积达36.4万公顷。[29]

394

[22] P. 希尔（Hill），1963年。
[23] H. 姆英特（Myint），1968年，第50-52页。
[24] S. H. 弗兰克尔（Frankel），1938年，第193页。
[25] 见R. 谢雷谢斯基（Szereszewski），1965年。
[26] A. 麦克菲（McPhee），1926年，第41页。
[27] S. H. 海默（Hymer），见G. 拉尼斯（Ranis）编，1971年，第129-179页；又见G. B. 凯编，1972年，第12-35页。
[28] G. B. 凯编，1972年、第13-15页、231页。
[29] S. 拉·阿尼亚内(La Anyane)，1963年，第40、100页。

在25年的时间内，可可已取代橡胶和棕榈油成为第一位的国内出口商品。[30] 1934年，黄金海岸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40%。但直至此时，可可生产业并未从本国进行的科研工作中获得什么帮助。正如西非调查委员会所指出的：

> 非常不寻常的情况是，1937年以前在可可种植地带竟然没有一家农业站，针对该作物的需要进行研究。农业部的官员在当地条件下没有任何机会获得有关知识，真难以设想如何能希望他们在育种或其他措施上能提出正确的建议。[31]

政府对农民生产的实际帮助只限于两个有关方面：一、制定和贯彻执行控制产品质量的规格；二、引进农业技术，以增加或维持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在上述两方面，主要由于“有关专家”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所取得的成功非常有限。[32]

在肯尼亚和南、北罗得西亚，经济作物的生产随着20世纪时间的推移，日益转入白人移民之手。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的非洲农业生产者相当有效地与白人移民进行了竞争，他们生产出供应人数日益增多的雇佣劳动者的大部分粮食。确实，在1914年之前，肯尼亚的非洲农民对经济作物和出口部门的贡献比白人移民更大。在这一时期内，白人移民正全力以赴以求站稳脚跟，却不很成功。也正是这一时期，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影响还比较小。不久，白人移民和种植园主发现他们能够有效 395 地参与经济作物的生产，只要他们通过各地的殖民当局采取行动，有计划地把非洲生产者的作用降到最低水平。但是低效率的白人移民农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力。正如一位肯尼亚行政官员在1905年估计形势时所说，“土著劳力对土地的开发来说，犹如雨露和阳光一样需要。”[33] 于是殖民者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主要仿效南非的措施，迫使非洲人为白人劳动。首先是强化了业已开始的剥夺土地的进程。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剥夺非洲人可供选择的现金收入来源。

北罗得西亚的情况特别惊人。在那里，非洲生产者力图利用矿业劳动在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市场这一有利条件。在20年代初期，他们向商人售出的玉米量还是微不足道的，但到1927年，他们玉米出售量达到3万袋（每袋200磅）。1930年他们出售的牛占牛市场销售总额的50%，到1935年，他们出售的玉米约10万袋。[34] 这些情况并不符合那些此时已组成强大压力集团的白人移民的利益。他们对降低向矿工售出的农产品价格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是为扩张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提高其产品的价格。1928年至1929年期间，政府为了促进白人移民的利益，在那些非洲人和欧洲人争同一片土地的铁路周围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建立起土著人保留区。这项措施除减缓当时已有的非洲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把铁路沿线左右各30公里宽地带大都留为欧洲人居住区，从

[30] 1915年，可可超过了国内出口值的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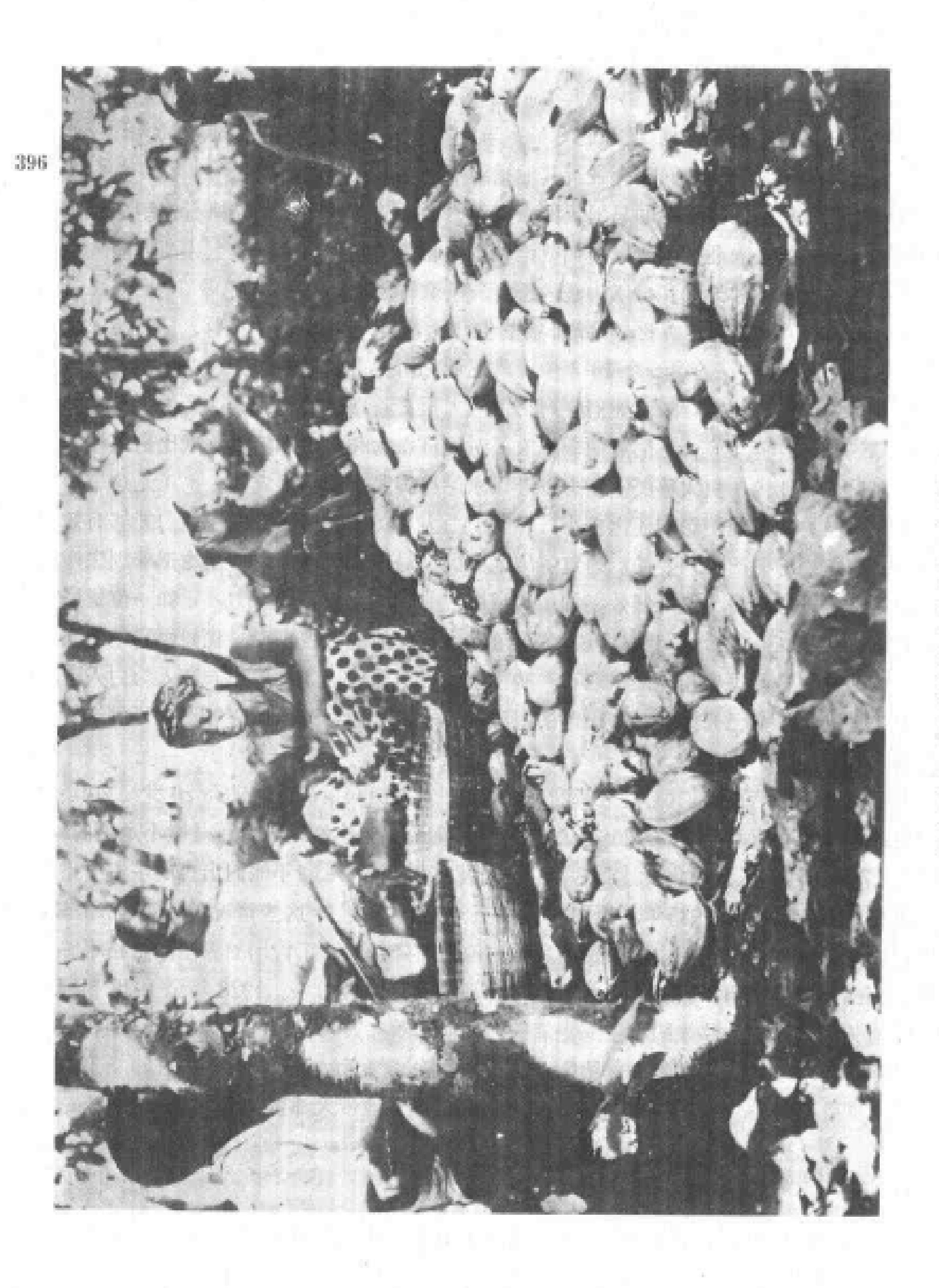
[31] 《西非调查委员会，1938-1939年》（伦敦，利弗休姆信托公司，1943年），第185段，引自G. B. 凯编，1972年，第231页。

[32] 西非的情况见M. H. Y. 卡尼基（Kaniki），1972年，第63-67页。

[33] M. F. 希尔（Hill），1956年，第7页。

[34] R. E. 鲍德温，1966年，第150页。1930至1935年间，欧洲人供销售的玉米产量从16.8万袋增至21.1万袋。

396



图片16.2 黄金海岸的非洲农民正在剥可可

而"大大地限制了"非洲人在商业市场中潜在的竞争能力。㉟ 采取这些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立法会议的一位欧洲人当选议员在1930年曾透露了当时的感情。他说，"英帝国首要关心的是促进不列颠民族的英国臣民的利益，然后才关心其他英国臣民、受保护的民族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先后顺序就是如此。"㊱

的确，殖民当局一心想以牺牲当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白人移民的利益，这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看得很清楚。第一，1936年颁布了玉米管制法令。依照这一法令，设立玉米管制局，授权该局按规定价格收购和出售全部玉米。市场被分为国内和出口两部分，国内市场的价格高于出口价格。欧洲人生产者分得国内市场的四分之三，而非洲人 397 只分得四分之一。㊲ 一年之后，又有牛销售和管制法令限制非洲人参与牛的买卖。根据这一法令设立的牛管制局有权规定牲口的最低价格和调节牛的进出口量，而低于这一价格出售牲口就是违法。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说，制定这种法令是为了提高牛肉的质量，但是其"主要目的"是"防止竞争损害相当大一部分欧洲人的养牛业。"㊳

第二，从农民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压低。南罗得西亚，粮食收购价在1908年至1911年期间下跌得尤为厉害。但是即使采取了上述两项措施，绝大多数非洲人也未受能获得工资的就业机会所引诱而去白人移民农场和种植园劳动，这主要是由于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工资极低的缘故。这种状况并非肯尼亚和南、北罗得西亚所独有，热带非洲的其他地区也一直存在这个问题，直至20世纪20年代。㊴

第三，收税或增税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是为了迫使非洲人去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效劳。1913年肯尼亚的总督曾生动地阐明其中的指导原则：

> 我们认为，税收是迫使土著人离开保留地去寻找工作的唯一可行方法。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提高土著人的生活费用……这便是提供劳力和决定劳力价格的关键。提高工资水平不会增加而会减少劳力的供应。㊵

第四，在许多殖民地，强制劳动是合法的。非洲人被迫每年为公用项目和移民农场及种植园劳动一定的天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接着便根据南非的经验采用了臭名昭著的通行证制度以调节劳力的供应。1920年7月以后肯尼亚实行了通行证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每个非洲成年人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kipande），身份证上载有由雇主记录的干何种工作，干过多长时间，所挣得的工资额等等。非洲人若不携带或丢失身份证，就会被处以罚款和/或最高3个月的监禁。通行证制度大大限制了非洲人的行动自由。非洲人不能随意离开其工作。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合同关系受到刑法的约束，原先辞去工作是个权利，现在却成为触犯刑法。非洲人决心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从对数以千计的所谓"逃跑者"的指控中就可证明。

㉟ R. E. 鲍德温，1966年，第150页。
㊱ 同上，第147页。重点为作者所用。
㊲ 同上，第152页。
㊳ 同上，第153-154页。
㊴ E. J. 伯格（Berg），1965年，第394-412页。
㊵ 《东非旗帜报》，1913年2月8日。

此外，非洲人还被禁止种植某些作物。例如，在肯尼亚，非洲人不得种植该国“最赚钱的经济作物”咖啡。[41] 直到本世纪 50 年代茅茅运动才打破了欧洲人的这一垄断。

398 这些措施导致的主要后果是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南罗得西亚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规模比本章所提及的其他国家更为广泛。[42] 欧洲人以不足果腹的工资水平雇用非洲劳力，为国内市场和出口，生产经济作物。1927 年在肯尼亚，从事商品农业生产的非洲人在 8.37 万至 11.7 万之间，占全部工资劳动者的 50%以上。生产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咖啡、小麦和西沙尔麻。1905 年玉米种植面积仅为 325 公顷，到 1920 年猛增至近 1.25 万公顷，9 年之后又增至 9 万公顷以上。[43] 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白人移民已把非洲农民逐出这一重要的大宗作物的生产和贸易领域。咖啡种植面积也增长很快，1905 年为 32 公顷，1920 年超过 11，250 公顷，10 年之后猛增到近 3.9 万公顷。[44] 1913 年咖啡和玉米出口为本国赚得 64，991 英镑；1920 年这两种作物和西沙尔麻的出口值为 566，556 英镑；1930 年时它们的出口值达 2，429，655 英镑，其中咖啡占一半以上。[45] 这些发展导致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1913 年国内出口总额中，纯非洲人生产部门提供了 24%，纯欧洲人生产部门仅占 5%。显而易见，直到此时欧洲劳力对商品农业影响还很小。1932 年，非洲人地区提供的出口份额降至 9%，而欧洲人地区的份额增至 76%[46]。于是在殖民地肯尼亚经济中这种重要特征形成了。

南罗得西亚的白人农场主开始试种棉花、柑橘、烟草，但只有烟草种植真正获得成功，20 世纪 20 年代它成为最主要的农业出口产品(见插图 16.1)。未经加工的烟草出口值在 1927 年达 125.4 万英镑，为 1909 至 1937 年期间最高水平。它占国内出口总值的 19.9%。[47] 然而，烟草只不过是该国许多作物中的一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市场消费的经济作物（特别是玉米和畜牧业产品）比为出口生产的烟草价值更高。举例而言，除 1926 至 1928 年这 3 年外，1920 至 1929 年之间的玉米产值占农作物总产值的 50%以上。[48] 由于玉米是一种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玉米出口量的增长受到高运输成本的限制。 399

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农业与北罗得西亚和肯尼亚的情况一样，是靠政府的大力资助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政府的资助是通过贷款、科研和技术咨询的方式提供的。1938 年，一位本人是欧洲人的农业长官曾经抱怨给非洲生产者的帮助太少，但他的意见被忽视了。[49]

---

[41] R. D. 沃尔夫，1974 年，第 141 页。
[42] G. 阿里吉，1970 年。
[43] R. D. 沃尔夫，1974 年，第 73 页。
[44] 同上。
[45] 同上，第 54 页。
[46] 同上，第 137 页。
[47] S. H. 弗兰克尔，1938 年，第 231-232 页。
[48] 同上，第 239 页。
[49] 《土著人发展局第一、二次会议记录》，卢萨卡，1938 年，第 12-17 页，在此谨向提供这份参考材料的莫德·蒙坦巴（Maud Muntemba）小姐致谢。

在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组成了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并通过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国家的特色，这种情况比热带非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突出。[50] 早在1926年，南罗得西亚欧洲人从事农业的就比在其他任何部门都多（占总从业人数的22.9%）。[51] 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从事农业的欧洲人有4305个，其中2733人为农场主；从事采矿业的欧洲人有2899个。[52]

矿产品

热带非洲好几个原英属领地拥有各种丰富的矿物资源（见插图16.2和16.3）。黄金海岸、南罗得西亚、坦噶尼喀和塞拉利昂开采金矿。钻石开采则是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重要产业。铜矿生产仅限于北罗得西亚，而铁矿生产仍然是塞拉利昂的专业。开采作为重要能源的煤的国家只有尼日利亚和南罗得西亚。绝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两种矿物，只有南罗得西亚和塞拉利昂拥有多种矿物资源。塞拉利昂1929年开始开采铂矿和金矿，到30年代中期又开始开采铬矿、铁矿和钻石。

上述国家中矿物资源的发现并不是殖民统治时期偶然出现的事情。早在殖民时代以前很久，有些矿物已被人所知并已加以利用，有些矿藏则已被特意寻矿者所发现。在殖民时代之前，南罗得西亚和黄金海岸就以其潜在的矿物资源而不是以农业发展前景而引人注目，当地的人们开采和利用黄金已有好几个世代了。同样在尼日利亚，当地老百姓在白人渗入内地之前已经开采和利用锡也有好几代了。这样，到了殖民统治时期，有一些地方的勘探早已由当地人在采矿的地点开始了。从19世纪90年代起，期望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的念头吸引了许多欧洲人和许多资金进入南罗得西亚，但是并没有找到“第二个兰德”，只发现了一些小矿藏。小矿主和白人农场主一起构成了农村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并未卷入大规模的国际性资本主义，而是开始表现出一种该国所特有的明显的特征。 401

除少数情况下，开发矿物资源的一般都是外国资本。造成这一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有些情况下所需的资金超过了非洲人的财力，例如，北罗得西亚的铜矿开采和塞拉利昂的铁矿开采。第二，也是更为普遍的原因，殖民当局蓄意有计划地不让非洲人从他们国家的矿物资源中得到好处。矿物资源一经发现，就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把垄断权交给帝国主义企业。甚至在非洲人祖祖辈辈以来一直在采矿的地区，如发现非洲人拥有矿产但不拥有许可证的话即为非法。非洲人不得从事钻石开采。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钻石业全受联合非洲精选托拉斯所垄断，这是一家开采数种矿物资源的强大的多国公司。授予该公司以垄断权的借口是，若存在着数家公司，就难以对钻石市场加以控制。无论提出的理由是什么，殖民当局屈服于国际资本，恶毒地将当地人民排挤出这一当时赚钱最多的产业。塞拉利昂精选托拉斯被授予勘探、开采和处理所有钻石的全部权利，

[50] G. 阿里吉，1967年，第20页。
[51] G. 凯，1970年，第46-47页。
[52] S. H. 弗兰克尔，1938年，第2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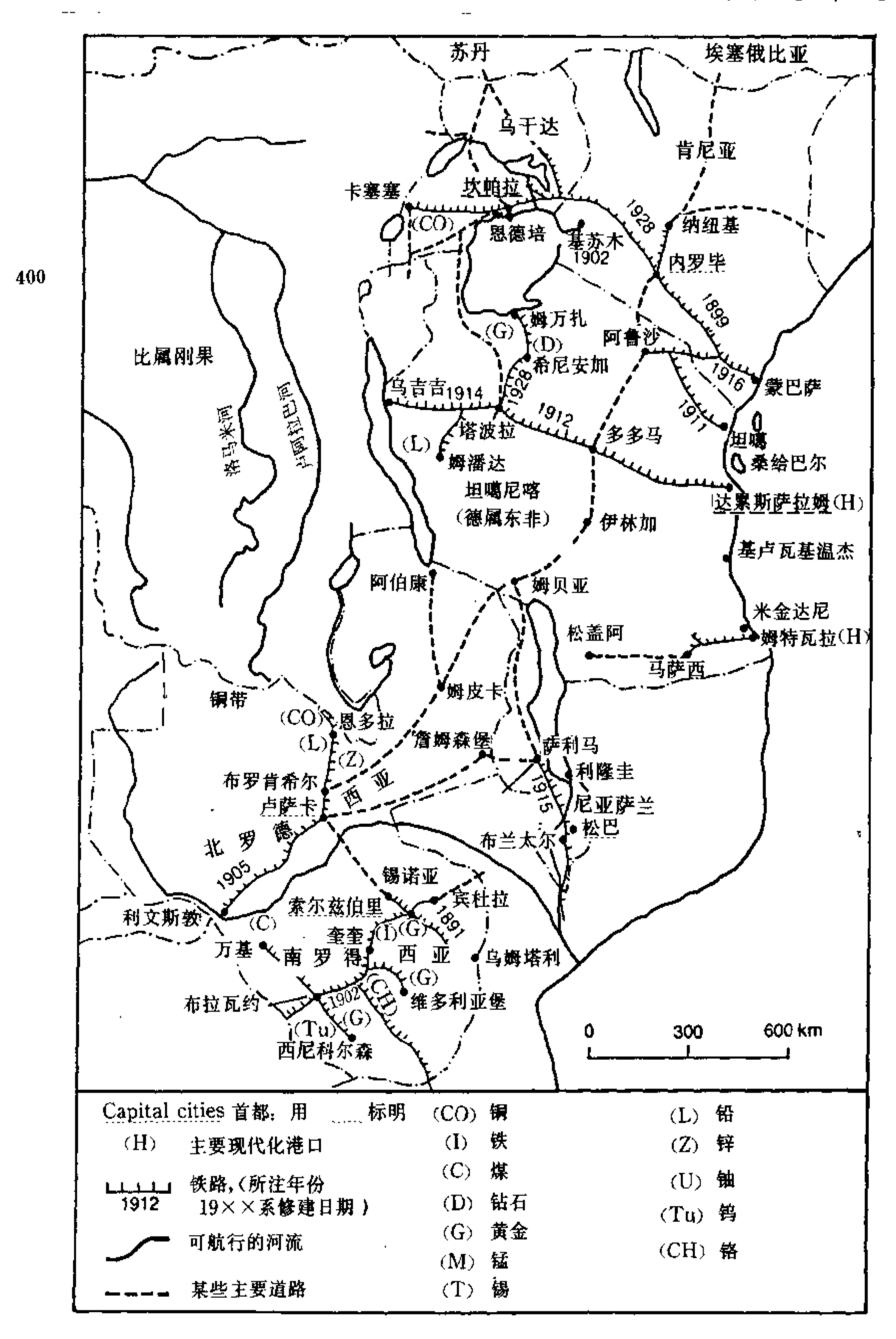


插图 16.3 东非，原英属地区的经济发展，矿物（根据R. 奥利弗和A. 阿特莫尔，1972 年）

这项权利的期限为99年,从1933年开始计算。[53] 直至20世纪50年代政府才不得不使非洲人参与开采钻石合法化，因为当时已不可能掌握如此广大的钻石产地。[54]

但是，即便是在非洲人一开始就有可能获得采矿许可证的地方，也还存在好些规则和专门细节把非洲人的参与缩小到最低限度。例如，在尼日利亚锡矿开采业中，矿主若在他本人不在时将矿区交给一位非洲人负责（不论他是否合格）即是一种犯罪行为。[55] 在塞拉利昂，非洲人若看不懂用英文写的1927年采矿法令，就得不到采矿许可证。这样，不懂英语的人就被直截了当地剥夺了参与采矿的资格。[56] 尽管如此，采矿业仍然发展成为一种有活力的产业。

表16.1 矿物价值在国内出口总额中的比例

国别	1913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塞拉利昂	a	a	a	4.0	7.4	21.5	44.7	52.0
尼日利亚	8.4	13.1	9.3	11.0	6.7	9.1	17.6	15.7
黄金海岸	33.0	17.8	25.6	25.1	29.3	34.8	46.6	41.0
北罗得西亚	26.7	28.9	29.4	51.2	85.7	86.8	84.2	72.0
南罗得西亚	93.3	66.0	65.5	69.2	72.8	79.2	78.2	79.9
肯尼亚	a	10.0	7.0	8.0	8.0	9.0	7.0	6.0
坦噶尼喀	a	3.0	n	n	n	n	n	12.0

注：a＝甚少或少量。
n＝没有资料。
资料来源：根据年度报告计算。

上述国家的出口部门发展迅速。出口产品主要为农产品和矿产品。到1914年时所有国家都已经历了10年的明显发展。 402

人们视矿物资源为“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57] 殖民官员竭尽全力地想有“重大发现”。但是，矿物资源对殖民经济的重要性明显地被夸大了。的的确确，正如表16.1所示，矿物资源对一些国家，尤其是南、北罗得西亚、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的出口贡献很大。在黄金海岸，矿物资源自本世纪初起就已变得颇为重要。1905至1909年期间，矿产品，主要为黄金，占国内出口总额的40%以上，随后9年中有8年它所占比例在30%以上。这一比例在20年代跌至20%以下，但在1935年时它高达41%。[58] 南罗得西亚的情况更为突出。1909至1913年期间，矿产品（主要为黄金）占国内出口总额的90%以上。从此后直到1935年的大多数年份中，它所占的比重也都超过70%。在北

[53] 协议的一份副本存于政府档案处，Kew (PRO)，CO 267/644/22008/第一部分/1934年。
[54] H. L. 冯·德兰 (Van der Laan)，1965年。
[55] E. G. 查尔 (Charle)，1964年，第38页。
[56] 非洲人通过与那些能看懂英语的人合伙，绕过了这种歧视。
[57] S. H. 弗兰克尔，1938年，第210页。
[58] 同上，第320-321页。

罗得西亚，铜矿自1910年以来就一直在开采，但只是到了20年代后期铜矿产区全面投产之时，矿产品才对出口产生重大影响。自1931年起，矿产品占国内出口总额的50%以上，随后几年比例上升很快。塞拉利昂的采矿起步晚些，然而到1935年时，矿产品占国内出口总额的50%以上。1936年热带非洲英属领地的矿物出口的重要性顺序如下：北罗得西亚：509.4万英镑；南罗得西亚：442.2万英镑；黄金海岸：212.4213万英镑；塞拉利昂：124.5万英镑。有意思的是，尽管尼日利亚的矿产品本身很重要，但从占出口总额（仅14%）的比例来说又显得不那么重要；而塞拉利昂出产的矿产数量虽不大，但却占到该殖民地出口总额的56%。

403　矿产品对出口的重大贡献会错误地引导我们夸大其对总的财富的贡献。然而，非洲人参与采矿程度有限这一事实可指导我们作出正确的估计。采矿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外国资本，从采矿业中得到的利润被纷纷汇出国外，肥了外国股东的腰包，或被用于发展非洲以外的经济。例如，皇家尼日尔公司的特许证于1899年被吊销时，该公司获得15万英镑，以作为放弃后来建立起锡矿那个地区的采矿权的补偿。根据同一项协议，该公司还将获得多达50%的矿区使用费，期限为99年，[59]对当地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南、北罗得西亚的情况更为糟糕，在那里采矿权一直被英国南非公司所把持，直到1933年国家以20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采矿权为止。[60]但是即便在发生这一变化之后，当地人也很少被视为矿业生产的受益者，更没有被当作矿业生产的受益者来对待。甚至到了1942年，英国殖民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还厚颜无耻地作了这样的记载，“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把矿产品所得价值留给当地居民，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为开矿出过任何力量。”[61]然而即使在殖民当局把矿物资源收归国有的地方，如塞拉利昂、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国家从矿业中收入很少，主要来自矿区使用费和所得税收入。1935年塞拉利昂从矿业得到的直接财政收入为3.41万英镑，仅占财政收入总额的5%。[62]

对当地人民来说，工资仍是从采矿业获得大笔收入的唯一途径。但是如同在白人移民农场和种植园里做工的情况一样，工资被压得很低，以致工资劳动者不得不通过从事农业进行补贴。种族歧视在这个领域里是重要的指导原则。[63]欧洲雇工的工资比非洲雇工高许多倍，即使他们干的工作相同。很少授予非洲人可以提高他们生产率以及随后提高工资的重要技术。在南罗得西亚，白人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控制了劳工市场，[64]非洲工人甚至不准成立工会。即便是在摆脱了白人移民控制的地方，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为集体谈判重要特征的工会才得到法律的认可。南罗得西亚的情况例外，在那里采矿

404　业“为当地许多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65]与南非的情况相反，那里的采矿业是制造业

---

[59] P. 鲍尔（Bower），见M. 佩勒姆（Perham）编，1948年，第5页。

[60] 同上。

[61] J. A. 道（Dawe），会议记录，政府档案处，PRO, CO 54028/42，J. A. 道是殖民部的次官助理。

[62] M. H. Y. 卡尼基，1972年，第238、239页。

[63] R. E. 鲍德温，1966年，第42，82-99页；P. 鲍尔，见M. 佩勒姆编，1948年，第23页；G. 阿里吉，1967年，第25-26页；G. 凯，1970年，第57-58页。

[64] G. 阿里吉，1967年，第20-21页；G. 凯，1970年，第57-58页。

[65] G. 凯，1970年，第24页。

的“最初创建者和保护者”，而南罗得西亚以外地方的矿业则没有什么促进别的行业的作用。[66] 而且，采矿业带来的那点点好处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农田遭到破坏，灌木林和经济树木被毁，传统生活方式被打乱，法律和秩序普遍混乱不堪。

上述国家的出口经济成分有两大特点。第一、出口的农产品和矿产品没有经过加工。因此，绝大多数出口产品的价值较低。第二、存在着单一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那些基本上依靠农产品出口的国家的经济处于十分虚弱的地位。只有拥有三、四种作物（可可、棕榈油产品和花生）的尼日利亚，还有肯尼亚，国内的经济发展较为多样化。殖民地行政官员在 1929 至 1934 年大萧条时期表现出的恐慌和混乱，生动地暴露了单一经济的弱点。

货币与金融

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英国人也在其殖民地采用了现代货币，以取代传统的实物交易、商品货币和诸如砂金、玛瑙贝之类的“货币”。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鼓励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以及欧洲制成品的进口。殖民国家特地通过三种主要方式来促进和鼓励采用现代货币。这三种方式用霍普金斯的话来说，就是“停止使用传统货币的方式；用欧洲硬币支付日益扩大的劳工队伍的方式；以及坚持以现金而不是实物的形式收税的方式。”[67] 这三种方式都很成功，到 1910 年，欧洲货币在西非已广泛使用。在英属殖民地中，使用的有好几种英国硬币。1912 年成立了西非货币管理局，向英属西非提供货币。1913 年该管理局发行了首批币值 2 先令、1 先令、6 便士和 3 便士的硬币，3 年之后又首次发行纸币。在英属东非，英国人开始实行的是在英属印度通行的那种货币制度。但是，1920 年设立了专为 3 个殖民地发行硬币和纸币的货币管理局。应该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货币都与伦敦的英镑挂钩。

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在英属非洲地区建立了金融机构。在西非，1894 年第一家开业的银行是英属西非银行，随后于 1926 年开业的是巴克莱银行（自治领、殖民地和海外业务）。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英属西非的银行业务完全被这两家银行所控制。在英属东非和中非，国民银行和格林德利银行相继出现，不久便控制了当地的金融业。这些银行的业务在以下三个方面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第一、银行把所有的资金，包括非洲人的储蓄存款都用于在英国的投资。这意味着，这些银行以牺牲贫穷的殖民地为代价，促进了富有的宗主国的资本积累，因此，也就推动了富有宗主国的经济发展。第二、也是更为严重的是，据近来研究成果表明，所有这些银行的放款政策全都歧视非洲企业家而有利于英国人和亚洲人。[68] 第三、由于银行业成了欧洲人独占领地，非洲人完全被剥夺掉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训练和实践的机会。

405

[66] S. 帕特森（Patterson），1957 年，第 150 页。
[67] A. G. 霍普金斯，1973 年，第 206 页。
[68] 同上，第 209 页。

市场销售

殖民地行政官员严重地忽视了市场销售。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于上述所有国家。西里尔·埃利希归纳这个政策“与流传的神话相反，实际上仅仅是尚未试验过的乌托邦，”[69]只适用于1940年以后的时期。的确，设立市场销售局是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的事情。30年代中期之前，绝大多数规章制度主要是针对两大问题：发放贸易许可证和检查某些出口农产品的质量。1932年坦噶尼喀的销售合作社得到法律的认可，但是在5年时间内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此之前，英国作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未对其领地上的非英国商业公司和个人的活动进行限制。例如，在联合非洲公司于1929年建立之前，西非法国公司和西非商业公司这两大法国公司，在西非英属领地与英国公司展开相当有效的竞争。20年代中期，这两家公司在塞拉利昂拥有的分支机构和“工厂”比任何英国公司都多。[70]然而，不存在任何保护当地人民的措施。殖民当局主要关注的是扩大进出口贸易，增加关税收入。

当然，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倾向于不论何人，只要可能为此作出贡献都会受到鼓励。这样，印度商人在东非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中非经商，不仅获得批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鼓励。在东非的亚洲人口增长情况如下：乌干达：1910年为2000人，1917年为13，026人；坦噶尼喀：1913年为18,784人，1931年为23,422人；肯尼亚：1921年为22,800人，1931年为26,759人。鲍尔教授注意到在西非，“不喜欢和不信任地中海东岸诸国人的情绪”“在官方圈子里十分明显，”[71]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对地中海东岸人，尤其是黎巴嫩人真正持敌意的并非官方人员，而是商业公司的白人代理人，这种敌视态度是对地中海东岸诸国人成为强有力的贸易对手作出的反应。[72]有些地方，英国公司似乎获得优先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公司受到尊敬，而是由于它们借助英国政府的帮助，形成强大的压力集团，对殖民政策的制订者施加影响。[73]

406

同样，埃利希概括出如下结论“在整个英属非洲地区，殖民行政机构的态度很少鼓励土著人的从商积极性。”这种说法[74]相当切合实际。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扼杀当地人的积极性。首先是，官方总的政策主要是（在殖民形势下是可以预料到的）促进帝国主义的利益。因而，当地人民未能逃脱大型公司吞噬之害。甚至，他们非常容易遭到摧残。20世纪的头10年，随着铁路的修筑，欧洲公司通过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排挤非洲商人。欧洲公司通过资本的集中，以低价出售方式挤垮小型的、通常是一个人经营的非洲人商店。用这种方法，19世纪出现的当地西非大商人纷纷被挤出商业。接着，大

[69] C. 埃利希（Ehrlich），1973年，第660页。
[70] 见M. H. Y. 卡尼基，1972年，第58-60页。
[71] P. T. 鲍尔，1954年，第148页。
[72] 斯莱特（Slater）致艾默里（Amery），保密信件，CO 267/607，1925年1月11日，附件3和5。
[73] C. 埃利希，1973年，第652页。
[74] 同上。

型欧洲公司又进一步将其业务范围从批发扩大到零售。T. J. 奥尔德里奇所描绘的塞拉利昂在 1908 年时的如下情景，也适用于英帝国其他许多地方：

> 起先，大型欧洲公司纯粹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地道道的商业机构……当时其业务范围严格地限于批发；它们进口商品，收购当地产品，将其运走。它们从不做零星买卖，而是以原包装售出进口商品。它们只经营大宗买卖，而是把零售业务完全交给塞拉利昂商人……现在这一切全都改变了。中间商的业务不再同于以往，因为从事进口的大型公司渐渐地把中间商的业务自己接了过去，它们一方面仍做批发生意，另一方面为自己利益也做起了零售生意。[75]

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洲商人因为没有担保品，所以得不到银行贷款。此外，这里面也常常搀杂着一些种族偏见。 407

许多学者对欧洲商业公司的作用作出评价，其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它们把非洲与西欧和美洲的市场联接起来意义深远。这些公司在非洲先收购产品，然后出口。另外，它们还进口和出售各种各样的制成品，其中绝大多做为纺织品。麦克菲、鲍尔和霍普金斯很正确地重视商业公司在总体上扩大贸易范围和发展经济作物部门的作用，但是他们很少提到这些公司的剥削倾向。[76] 从商的欧洲人、印度人、黎巴嫩人以及有限范围内的非洲人，主要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占有农民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他们低价收购农产品，却以较高的价格售出所进口的商品。这里引用拉丁美洲农民的状况颇为恰当。

> 阻碍小自耕农经济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市场机制。由于农民在契约上的劣势地位以及三种商业职能（产品收购者、贷款供应者和消费品推销者）通常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小规模经济生产所产出的任何剩余大多转移给中间商，而不可能用于再投资。[77]

在白人移民占支配地位的地区，如南罗得西亚，“欧洲土地拥有者出售其佃农的产品，也经常替邻近农民出售产品，已成惯例。”[78] 这种作法把非洲人的竞争力减少到最低水平，同时确保移民占有半垄断性地位。

偶尔，非洲生产者通过集体拒售的方式（即拒绝把产品运往市场），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可可种植农受到国际市场力量影响很大的黄金海岸，曾出现过数次拒售事件。最为严重的一次可可拒卖发生于 1930 年 10 月至 12 月间，被称为“为谋取高价而进行的一次经济罢工，”“矛头针对大型外国收购公司以及它们”对黄金海岸经济的“垄断控制”。[79] 除了拒售可可之外，黄金海岸人还对欧洲商品进行抵制。酋长为维持拒售行动曾抓了些人，也罚了些款。这一运动的效果对殖民地经济关系的基础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殖民政府同外国公司一样，依靠可可贸易保持财政收入。显而易见，这场运动对两者都不

---

[75] T. J. 奥尔德里奇（Alldridge），1910 年，第 73-74 页。

[76] A. G. 霍普金斯，1973 年，第 188-209 页；A. 麦克菲，1926 年，第 32-105 页；P. T. 鲍尔（Bauer），1954 年。

[77] S. 皮尔斯（Pearse），见 T. 沙宁（Shanin）编：1971 年，第 73 页。

[78] G. 阿里吉，1970 年，第 209 页。

[79] S. 罗迪（Rhodie），1968 年，第 105 页。

408 利。因此，殖民当局用武力打击这场运动，对支持拒售的酋长处之以罚款和监禁。[80] 在1937-1938年的可可收获季节中，又爆发另一场大规模拒售运动，以反对那些最重要的可可出口公司，它们原来订有协议，规定了可可的最高收购价格。这一次拒售运动扩展到西尼日利亚，最后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才告结束。据以诺埃尔为首的一个调查委员会[81] 披露，这种涉及到数以千计的中间商的销售体系效率低，浪费大，对西非的生产者和西欧的消费者双方都不利。

联合非洲公司是一个由许多前英国公司组成的集团，1920年以后是西非贸易中名声最响、势力最大的公司。30年代期间，仅它一家就经营近一半的西非海外贸易，在英属西非，[82] 特别在尼日利亚，占据着支配地位。在东非和中非也有该公司的分支机构，但这些机构在那里的作用要小得多。在东非和中非不存在类似联合非洲公司的机构。

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使非洲的这些属地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大萧条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1932年，英国属地开始实行帝国关税特惠制。从英帝国进口的海关税率定在10%至50%之间，低于一般税率。但是，由于属地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微不足道，这项安排的受惠对象显然就是英国。1931年9月，英国殖民部向负责管理属地的官员颁发一项通知，要求他们帮助英国，并提请他们注意：

> 联合王国的利益和殖民地及附属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连在一起的，联合王国面临的任何危险也就是威胁整个帝国的危险……倘若英国信誉的总垮台和英镑汇他下降，必然使殖民地受到的破坏将不轻于联合王国。[83]

尽管对非英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很高，但对属地消费者有利的商品的进口仍增长很快。全部来自日本的帆布鞋、人造丝和棉布增加特别显著，它们的价格远远低于享受关税保护的英国商品。1934年，坦噶尼喀达累斯萨拉姆的地区长官注意到，“本地区几乎每家商409 店”都堆满了日本货。[84] 这种情况在当时经济不景气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坦噶尼喀的一位殖民官员也许不无夸张地说道，“若不是来自日本制造的大批廉价棉织品在所有城镇乡村的铺子里出售，非洲的平民现在只得身着树皮。”[85] 但是，英国政府关心的是英国工业的成功，而非领地贫民的福利。1934年又向非英国商品开了一刀，将关税普遍提高到100%。此外，对日本纺织品的进口实行了配额制。于是发生了一些孤立的抗议，反对这些措施，但是殖民地的人民不得不付高价买贵货，从而牺牲自身利益来促进帝国主义利益。

基础设施

市场销售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基础设施。很久以前，铁路、公路、电报线路、港

---

[80] S.罗迪，1968年，第109-115页。
[81] 大不列颠，调查西非可可销售委员会（伦敦：HMSO，1938年），第157页等处。
[82] A. G. 霍普金斯，1973年，第199页。
[83] 《西非邮政与贸易报》，1931年10月24日，第4页；《塞拉利昂皇家报》，1931年10月15日。
[84] 达累斯萨拉姆地区长官1934年年度报告，第4页，坦桑尼亚国家档案馆，54/4。
[85] 同上，1933年年度报告，第3-4页。

口的修建就为殖民当局所注意。虽然这些设施有助于总的行政管理，但其主要任务还是输送出口商品。因此，难怪铁路和公路的修建位置和总的走向很少考虑属地总的福利。绝大多数铁路从海岸直通内地经济作物或矿物资源产地。横向的和连接殖民地之间的铁路只建了很少几条。因此，铁路只服务于有限地区，尽管它们很重要，它们在“开发”大陆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被夸大了。[86] 只是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才修筑了一些比较高级的铁路交通网，其主要目的是把散布很广的矿区和白人移民农业地区连成一片，并为这两种地区服务。黄金海岸南部的可可种植带也从铁路运输中获得很大好处，而没有出口作物的北部领地则完全被忽视（见插图 16.2、16.3）。

绝大多数铁路都由政府或官方机构修建、拥有和掌管，英属西非的第一条铁路是 19 世纪 90 年代在塞拉利昂修筑的。在该殖民地运营首列火车是 1897 年，到 1909 年，穿越富饶的棕榈油生产地带抵达彭登布的东部主干线（365 公里）已经竣工。由布布扬至马克尼的北方支线（132 公里）则于 1915 年通车。在塞拉利昂开始兴建铁路后不久，其他领地也纷纷仿效，并取得了甚至更佳的效果。所有的主干线于 1920 年修毕。在坦噶尼喀，英国人接管了德国人于本世纪早些时间修筑的两条铁路。

在铁路修筑中得到私人资本资助的只有南、北罗得西亚和塞拉利昂。贯穿南、北罗 410 得西亚的南北走向的主干线是南非铁路系统的延伸，是由英国南非公司修筑的。该干线于 1897 年 10 月修抵布拉瓦约，并于 1904 年在维多利亚瀑布处越过赞比西河。参与开发矿区的一些公司修建了好几条支线。[87] 主干线于 1905 年修抵利文斯敦（当时北罗得西亚的首府），翌年修达布罗肯希尔。这条铁路最终由一家新办的公司——罗得西亚-加丹加联轨铁路和矿业公司——于 1909 年修至刚果边境（见插图 16.3）。在塞拉利昂，1933 年以来一直在马兰帕开采铁矿的塞拉利昂开发公司，在 30 年代初期修筑了一条从马兰帕至公司装卸码头佩佩尔的 83 公里长的铁路。此线为该公司专用。至于公路的修筑，殖民当局和地方政府都进行了。只要条件许可，非洲酋长便动员其人民将当地经济与广阔的世界相联系。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公路只能起到官方所有铁路的支线作用，而不是由它替代铁路。这样，纳税人就不得不维持这些费钱但又没有多大作用的公路系统。

现代化运输的最重要贡献是大幅度降低了运费。由此产生两个相互关联的影响。第一、人力运输被机器所取代，从而把不足的劳力解脱出来投入其他生产活动。第二、运费的下降使生产者的利润增加，对扩大经济作物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非洲生产者从中获益的情况不多。商业公司以及其他从事出口贸易的公司急于从中捞到好处，它们倚仗其势力大，得到了最大的份额。在白人移民地区，运费高低很据欧洲人的需要而定，从而迫使非洲经济部门受损而移民的农业受益。

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铁路的影响很大。1902 年是乌干达铁路通过肯尼亚高地把内陆地区与蒙巴萨相连接的那一年。在此之前，运费使来自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提高了 150%。拉各斯铁路于 1911 年修至卡诺时，也带来类似的后果。它大大加快了花生

---

[86] A. 麦克菲，1926 年，第 47-48 页、108-115、126-127 页。

[87] G. 凯，1970 年，第 42、44 页。

业的扩展速度。花生出口量由原来最高2000吨增加到1916年的5万吨，1929年达到11.7万吨。在北罗得西亚，铁路也大大促进了出口经济部门，尤其是促进了矿业的发展。[88]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中，铁路的贡献相对要小些。在本章涉及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铁路财政有负债。[89]应当强调的是，尽管现代运输好处很多，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出一种411 出口型经济。"的确……现代化运输主要对那些虽然充满着未知数，但已经开始显示其经济潜力的地区有吸引力。"[90]

航运是基础设施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殖民时代以前就已存在，但在殖民统治时期增加了其效益和重要性。在英属西非，这一领域到1900年时被一家名为老登普斯特航运有限公司的英国公司所控制。这家公司是所有在西海岸经营的英国航运公司于1890年合并的产物。1895年，该航运公司与一家名为沃尔曼的德国航运公司达成彼此不展开竞争的协议，因而得以固定不利于顾客的运费标准。在东非和南部非洲，控制航运的是联合卡斯尔航运公司。

南非，1880至1935年

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和属地中，南非在本章讨论时期所发生的经济变化的影响是如此的独特、如此的显著，然而又如此的臭名昭著。因此值得在此专门叙述一下，不论叙述得多么简短。

1869年时，南非——由开普殖民地与纳塔尔两个英属殖民地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两个布尔人（阿非利堪人）殖民地组成。如同欧洲在非洲的任何其他殖民地和移民定居地一样，经济贫困不堪，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边缘(见插图27.1)。在南非的欧洲人总计仅26万，其中20%居住在开普殖民地。[91]开普殖民地境内人口超过1万的城市只有开普敦一个，到1860年还只有3公里长的铁路线，没有任何通汽车的公路，运输全部靠牲口，制造业也只限于制造运货马车、家具、鞋、制革。[92]1860年南非的出口商品全是初级产品，总额为250万英镑，其中最主要的产品为羊毛，其次是铁和皮革。D.霍巴特·霍顿得出的结论是，"(开普）殖民地（在1860年）的总的特征是，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主要从事畜牧业和自给农业；非常贫穷，全靠国内资本积累很难迅速发展；但又缺乏可开发的资源，因此无法吸引外国资本。"[93]而开普殖民地当时还是南非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省。其他殖民地的条件更差，尤其是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

412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南非的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导致这种变

---

[88] R. E. 鲍德温，1966年，第17-18、171-172页。

[89] S. H. 弗兰克尔，1938年，散见各处。

[90] A. G. 霍普金斯，1973年，第198页。

[91] P. 柯廷（Curtin）、S. 菲尔曼（Feierman）、L. 汤普森（Thompson）和J. 范西纳（Vansina），1978年，第329页。

[92] M. M. 科尔（Cole），1961年，第396页。

[93] D. H. 霍顿（Houghton），见M. 威尔逊（Wilson）和L. 汤普森编，1971年，第4页。



图片 16.3　南非的黑人矿工在劳动

革的主要是一件事，即发现了矿物资源。首先分别于1867年和1870年在格里夸兰和金伯利发现了钻石，然后又于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了黄金。在格里夸兰发现钻石后5年内，南非年钻石出口额达160万英镑以上。1880年钻石出口额增至500万英镑以上，超过南非所有其他产品的总出口额。[94] 1899年，德比尔斯联合矿业有限公司出现，它"把钻石矿重新组成高度资本化的集中领导的现代产业，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并通过伦敦钻石辛迪加建立起世界性的销售垄断。"[95] 同时，钻石出口额持续增长。1905年约为1000万英镑，1910年超过1500万英镑。发展更快的是1886年发现的黄金的开采业。1890年出口黄金达1000万英镑，遂使黄金成为南非的主要出口产品。1905年黄金出口额增至2500万英镑；1910年在4500万至5000万英镑之间。

南非采矿业的兴旺所带来的影响极其惊人，并表现在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钻石的发现首先导致吞并金伯利地区，然后又于1877年吞并德兰士瓦本身。最后，在英国人惨败于伊散德尔瓦纳之后，又导致1879年征服祖鲁兰。这些事都是引起1881年的第一次英布战争的导火线，面布尔人打赢了这场战争。同样，黄金的发现导致了林波波河以南的所有非洲国家被兼并，1896年的詹姆森袭击，和最后1899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终于导致了1910年南非联邦的建立。本书第9章已论述了这些意义深远的政治影响的某些方面，以及非洲人对此所作出的反应。

第二，由于矿物资源的发现，资金和技术人员从英国、欧洲和美国纷纷涌入。的确，1880至1939年之间对非洲殖民地的大量投资几乎完全投入南部非洲。根据P. 柯廷和其他一些人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据统计，外来的投资的人均数，在南非为56英镑，南、北罗得西亚为38英镑……比属刚果为13英镑，但在热带非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超过10英镑。"[96] 这种投资不仅促进了矿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南非基础设施。正如霍顿所指出，南非得到的投资最多是毫不足奇的；格里夸兰原先是一处"被人遗忘的荒芜地区，只有几百名在其酋长沃特布尔领导下的格里夸人在此居住。"由于发现钻石，该地"瞬息间变成世界关注的中心。"[97] 黄金的发现也给德兰士瓦和林波波河以南的地区带来了同样的变化。

414

采矿业对南非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同样带根本性的影响。在这之前，移民定居点和城镇相距甚远(约翰内斯堡距开普敦1540公里)，而人烟稀少又排除了修建铁路的可行性。但是，黄金和钻石的发现不仅使铁路和公路修筑成为十分必要，而且也切合实际。因此，19世纪70年代开始修筑从各地——开普敦、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和德班——首先通往钻石产地，1886年后又通往德兰士瓦的铁路，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铁路干线长度从1869年约110公里增至1889年的1700公里、1899年的3300公里，1905年的4190公里(见插图16.4)[98] 建筑铁路同时又修筑公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修筑的省级公

[94] 见插图2："南非产品的出口，1861-1910年，"同上，第18页。
[95] 同上，第13页。
[96] P. 柯廷，S. 菲尔曼，L.汤普森和J. 范西纳，1978年，第500页。
[97] D. H. 霍顿，见M. 威尔逊和L. 汤普森编，1971年，第11页。
[98] 同上，第20页。

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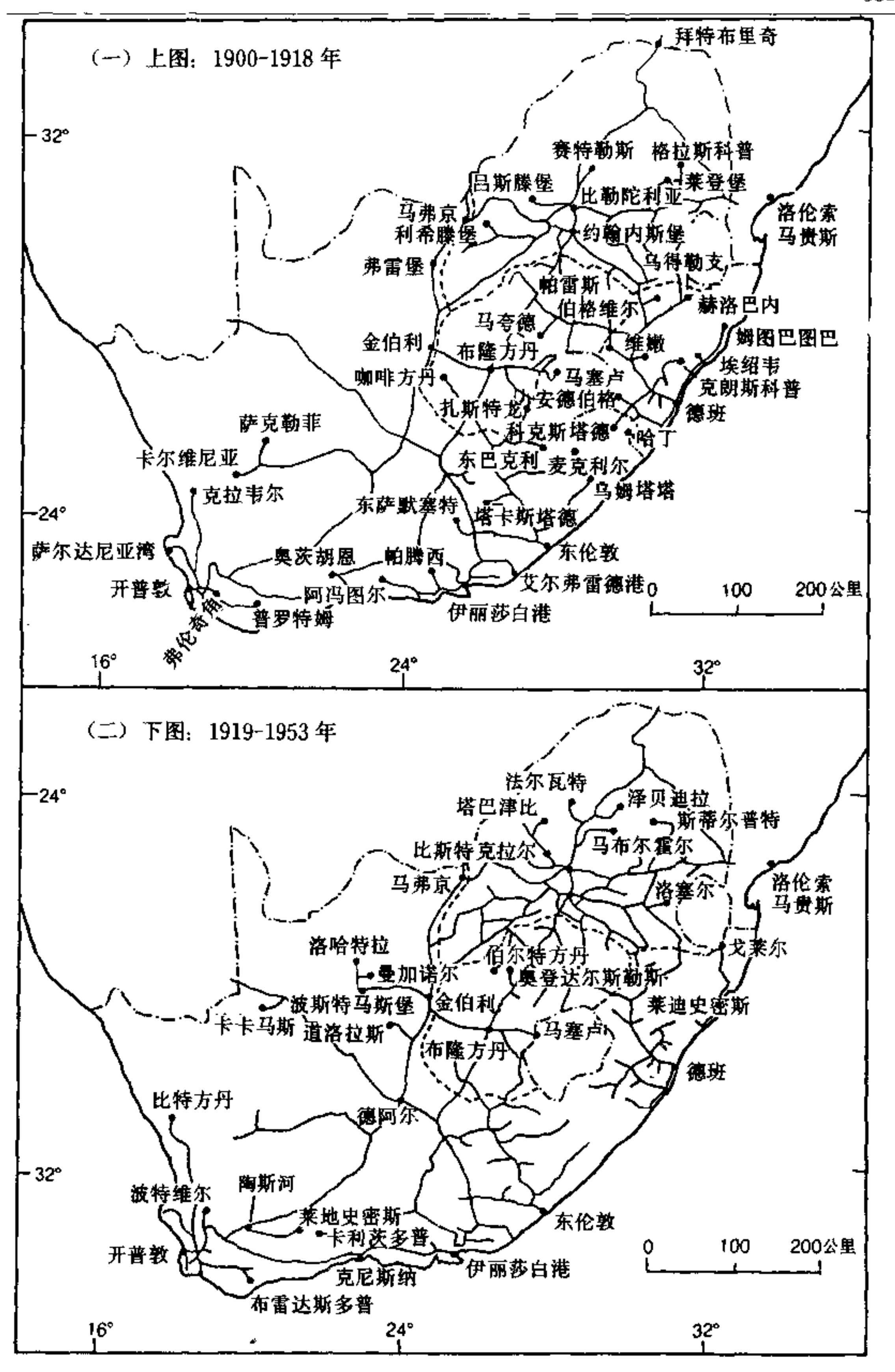


插图 16.4 南非铁路网的扩展，1900-1953 年 上图：1900-1918 年；下图：1919-1953 年(根据M. M. 科尔，1961 年)

路总长度为7.5万公里，此外还修筑了许多农场道路。

第四个重要影响在于劳力和土地方面，以及随之出现的城市中心的发展。开采钻石和黄金所形成的对劳力的需求量几乎是无穷尽的。为了确保劳力的供应，也为了更好地维护白人地位（尤其是阿非利堪人），特别是在20世纪的10和2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的立法，迫使非洲人离开他们的农田和出生地，迁至矿业和其他工业中心地区。这些立法中有1913年的土著人土地法、1911年的矿区和工厂法及其1926年的修正案、1922年的学徒法、1923年的土著人（城镇地区）法、1927年的土著人管理法，以及最后1932年的土著人服务契约法。这些法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土著人土地法。按照这项法令，南非88%的土地留给仅占人口20%的白人专用。[99]剩余12%的土地被列为非洲人的“土著人保留地”。这项法还废除了非法居留和五五分成耕种制。根据五五分成耕种制，允许非洲人在白人的一块土地上耕种，作为报酬，他们需将一半的产品交给白人。这项法令还制止非洲人从非洲人以外的其他人手中购买保留地之外的土地（开普省除外）；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规定也是如此，总督特别准许的除外。这项法令就是这样打击了非洲社会的基础，很快就导致成千上万独立的非洲牧民和农民离乡背井，离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屋和土地以及白人所有的农庄。的确，用利奥·库珀的话说，这项法令把这些非洲人改变成“没有土地和可以随意剥削的无产者。”这是一种最坏的经济依附形式。这项法令又使按地区实行隔离的原则在南非得以推行。这项法令一直实施至1936年而未加以任何修改，到1931年，约600万非洲人所占保留地总面积仅8.8万平方公里，而180万欧洲人却占据着1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00]

416

1911年的矿区和工厂法及其1926年的修正案和1922年的学徒法也把非洲人从许多需要熟练技术的职业中排除出去，同时为熟练劳工（大多为白人）和非熟练劳工（大多为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规定了不同的工资等级。1935年，白人矿工的平均工资为非洲人的11倍。[101]1923年的土著人（城镇地区）法、1927年的土著人管理法和1932年的土著人服务契约法也都根据白人工人的利益，对非洲人的行动、居住和就业作出规定。例如，1923年的土著人（城镇地区）法对非洲人采取了强制性的居住区隔离，以制止“不受欢迎的混居”。1924年采取的文明劳工政策强化了对有色人种工人的歧视，它规定非白人工人将由贫穷白人取代。[102]最后，1911年的土著人劳动章程法还规定，在矿区和工厂的非洲劳工若破坏契约，即为刑事犯罪。

所有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全部后果是把非洲人逐出他们的老家和农场，赶进新建的矿业和工业中心地区和欧洲人农场，使他们成为工资劳动者。在本章论述时期内，在矿区工作的劳工人数大幅度增长。1906年时，矿业雇佣了16.3万人：1.8万白人，9.4万非

---

[99] P.柯廷、S.菲尔曼、L.汤普森和J.范西纳，1978年，第505页；D.K.菲尔德豪斯（Fieldhouse），1981年，第75页；F.威尔逊(Wilson)，L.库珀(Kuper)，见M.威尔逊和L.汤普森编，1971年，第126-136、436、440页。

[100] D.K.菲尔德豪斯，1981年，第75页。

[101] P.柯廷、S.菲尔曼，L.汤普森和J.范西纳，1978年，第502页。

[102] D.韦尔什（Welsh），见 M.威尔逊和L.汤普森编，1971年，第183-184页。

洲人和 5.1 万华人；1918 年这一人数增至 29.1 万人，其中 3.2 万为白人。到 1936 年，非洲矿工人数多达 30 万，其中约 40%来自德兰士凯和西斯凯土著人保留地；25%来自葡属莫桑比克；近 15%来自巴苏陀兰。应当注意的是，尽管有上述种种法令，从这些数字看，来自南非境内的劳工仍然不够，因此就不得不从莫桑比克，巴苏陀兰，甚至尼亚萨兰和南、北罗得西亚招募非洲劳工，1899 年以后还引进了一些华人契约工。同时，也应该强调指出，部分是由于上述立法的缘故，绝大部分雇用的非洲人并不是长期工，而是流动工和季节工。因此，他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因工作的变动而往返于白人地区和“非洲人保留地”之间。

417

采矿业的迅猛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城市化。由于工人迁居到新建的采矿和工业地区，一些崭新的城镇诞生了，而某些原有城镇也飞速扩展。这样，1866 年时尚不存在的金伯利，到 1877 年已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为 1.8 万的城镇，而约翰内斯堡到 1900 年已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人口达 16.6 万的大城市。在同一时期内，原有的城镇，如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也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居住在城镇的白人比例从 1890 年至 1891 年期间的 35.8%增至 1936 年的 65.2%，非洲人的比例从 1904 年的 13%仅增至 1936 年的 17.3%。

也是部分由于采矿业的迅速发展，南非经济的另外两个部门也出现了巨变。这两个部门就是农业和制造业。南非人口的激增和新出现的城镇人口为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创造了新的市场。这一市场又由于南非联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西南非洲成为其委任统治地而进一步扩大。新建的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促进了这些产品的运输，农场主则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以及 1913 年土地法所提供的有利条件。1927 至 1937 年期间，政府还采取了好几项措施，例如保护性关税、建立各种销售管理局、扩大金融机构等，以在牺牲黑人农民利益的基础上为白人农场主提供帮助。其结果是，白人农场主不仅为国内消费提供了足够的产品，还于 1907 年以后开始出口玉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出口肉类和蛋类，20 年代后期起出口食糖和乳制品。但是此时，非洲人几乎在商业性农业中绝迹了，成为白人农场的工资劳动者。使非洲人处境变得更坏的是，他们的工资或始终停滞不长，或增长得极其缓慢。1914 至 1934 年期间，已婚的非洲农业工人平均工资从每月的 6 至 10 先令仅增至 8 至 12 先令。另外，开普的白人农业工人平均月工资从 1866 年的 2 英镑 18 先令 1 便士增至 1952 年的 19 英镑 7 先令 7 便士，而非白人农业工人的月工资仅从 12 先令 10 便士增至 2 英镑 7 先令 10 便士。这样，在本章论述的时期内，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更形扩大，黑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恶化了。

变化更激烈的是制造业部门。由于这种变化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并未在大多数其

D. H. 霍顿，见 M. 威尔逊和 L. 汤普森编，1971 年，第 15、19 20 页。

F. 威尔逊，见 M. 威尔逊和 L. 汤普森编，1971 年，第 113-114 页。

D. 韦尔什，见 M. 威尔逊和 L. 汤普森编，1971 年，第 173 页。

F. 威尔逊，见 M. 威尔逊和 L. 汤普森编，1971 年，第 132-136 页。

D. 韦尔什，见M. 威尔逊和 L. 汤普森编，1971 年，第 158 页。

同上。

他非洲殖民地发生，因此也更耐人寻味。正如莫妮卡·科尔所指出，“英布战争之后改变418了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而1910年4个省的统一激发了民族情绪的高涨，这种民族情绪表现在渴望工业发展和争取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109]因此，白人确实开始推动经济发展，到1912年时建立了一些工业。这些工业包括水果保藏、制果酱、酿酒、制皂、制烛以及制造风车、水泵、水力钻孔机、门与篱笆等小型机械工业，还有制靴、制鞋和成衣等行业。[110]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造部门的发展得到了特别的鼓励，目的在于使该国的经济多样化，尽量减少对矿业的依赖，同时也为“贫穷白人”提供就业机会。为了进一步促进这一部门的发展，政府不仅于1924年实施了保护性关税，还于1921年设立了工商管理局，于1923年设立了电力供应委员会，于1928年建立了南非钢铁公司。这些努力的成效从这一部门雇工人数中可以看出。1918年，制造部门雇用了12.4万人，其中4.4万为白人；1928年所用人数增至14.1万。制造业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萧条之后的发展更为迅速。到1939年，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品、成衣、皮革、鞋类、化学制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制品的产量价值达7500万英镑左右，该部门成为仅次于矿业的第二大国民收入来源[111]。

从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与绝大多数殖民地的情况不同，南非的经济在1880至1935年期间确实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到1932年，南非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17亿英镑，1937年时又增至3.20亿英镑。此外，南非经济的多样化程度很高，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它依靠矿业、制造业和农业。1932年，南非的采矿、制造、建筑和铁路部门雇工人数多达55.5万，其中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印度人和非洲人。[112]这一切首先是由于黄金和钻石的发现，也部分由于在本章涉及时期里南非白人从英国人那里获得了几乎是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所有这一切显著的发展都是以牺牲非洲的非白人、尤其是非洲人和有色人种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正如1932年任命的土著人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所说，当“贫穷白人”这一现象完全消失的时候，非白人的处境已急剧恶化。在保留地，人口过多和贫困的现象极为普遍，这种现象造成向城镇和矿业中心大量移民，419但在城镇和矿业中心，非洲人工资低、倍受种族歧视，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贫民窟和黑人区。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不得长期安家在这些地方，他们中绝大多数成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暂时移居者，因而成为“两个世界的人”，[113]因为正像霍顿所描绘的那样，“他们与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世界都有着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本章论述的时期内，南非的非洲人离乡背井，没有土地，工资微薄，倍受种族歧视，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所忍受的痛苦远远超过非洲其他地方的非洲人。

[109] M. M. 科尔，1961年，第396页。
[110] 同上。
[111] 同上，第399页。
[112] D. H. 霍顿，见M. 威尔逊和L. 汤普森编，1971年，第35页。
[113] 同上，第35页。

结　论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英国殖民主义通过把热带非洲的经济融合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已深深地扎下了根。英国属地几乎不拥有任何工业，依然是初级产品的重要来源。非洲农民和工人由于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加工，在 1929-1935 年间同世界其他地方一起经历了一些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不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是殖民经济关系的受惠者，而前者受的剥削更为深重。各地在 30 年代中期所呈现的落后和贫困，揭露了国际资本对生产剩余的强占。殖民地行政官员常常竭尽全力试图通过限制非洲人耕作的办法来阻止土壤肥力日益严重的衰退，尤其在人口压力威胁土地生产力的土著人保留地。更是如此。但是，欧洲人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到处都不受限制。譬如说，没有任何人提出矿物资源不能复原，因此不应开采。[1] 而且被普遍视为一个现代产业部门的矿业生产，在这里对工业生活只作出最起码的贡献。其实，南非的矿业纯粹是靠在农业部门的基础上通过付给工人以不足果腹的工资，才兴旺起来的。本章论述的时间所形成的经济特征，有许多都一直持续到独立后的年代。

（张志军译）

[1] R. E. 鲍德温，1966 年，第 160 页。

17 北非的殖民经济

第一部分：A.卡萨卜
第二部分：A.A.阿卜杜萨拉姆
F.S.阿布塞得拉

420　20世纪头25年中，北非各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埃及和苏丹)的经济并不是以同样步调发展，也不是经历相同的阶段，这是因为它们沦为殖民地的时间各不相同（见插图17.1）。

第一部分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经济，1919-1935年

A.卡萨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29年经济危机时期的经济状况

1919年时，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殖民地已有89年，突尼斯成为法国殖民地已有38年，摩洛哥才7年。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当局采用的政治、行政、经济和金融体制早已牢固建立，同时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剥夺农民土地和为宗主国利益而搜刮民间膏脂的过程早已在进行(摩洛哥才只刚刚开始)。世界大战只不过放慢了这一过程的速度，一俟战争结束，这一过程又高速发展。

农业殖民化对农村社会的破坏

在阿尔及利亚，白人移民庄园的扩展主要是由长期一贯执行的“官方殖民化”政策促成的。从土著居民手中夺得的土地由当局划分成块，分给欧洲移民，并给予这些移民定居建业的所有各种便利（贷款、工具、住宅等等)。由政府出钱为他们建造殖民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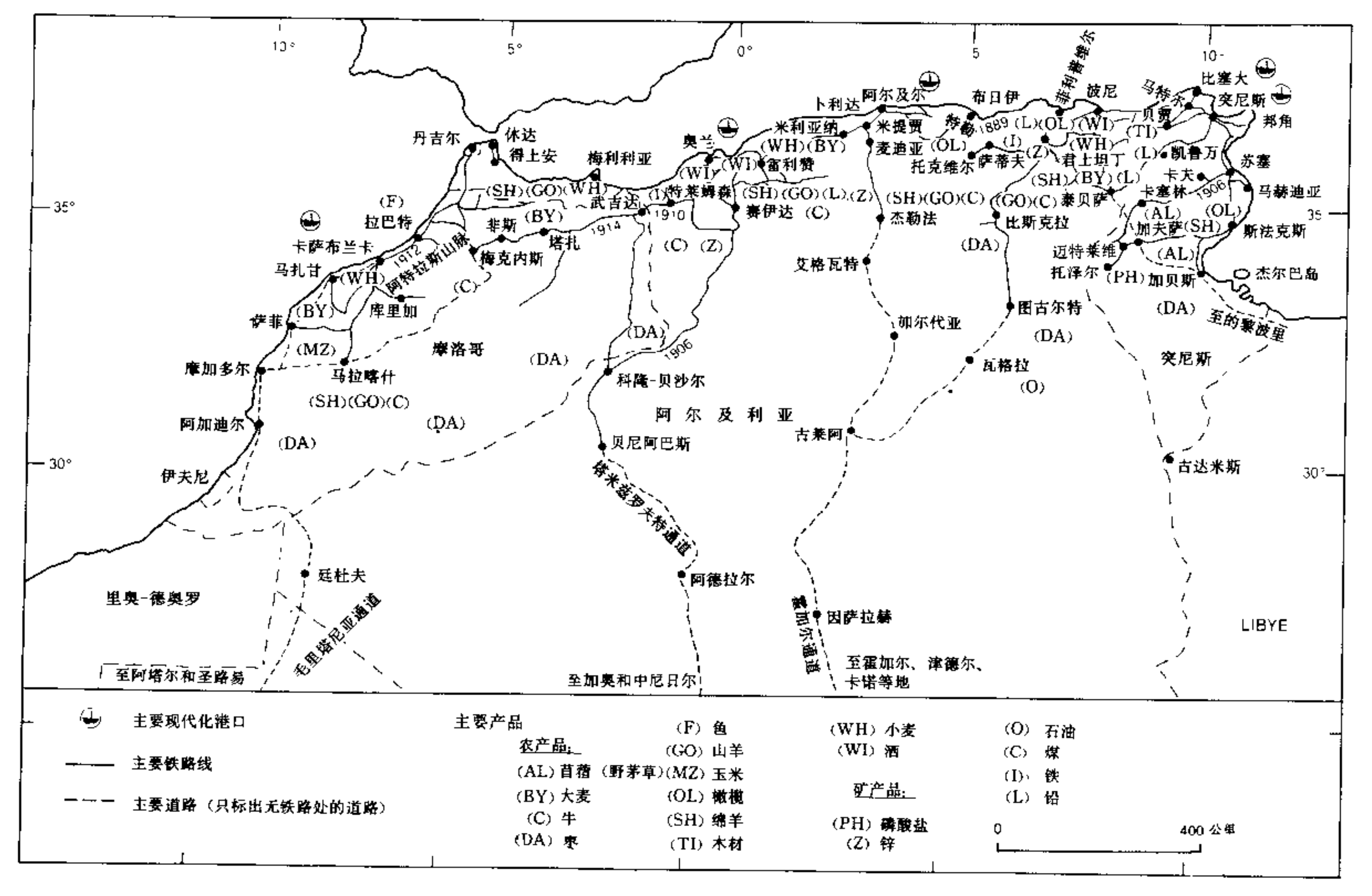


插图 17.1 西北非，殖民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根据F. D. 费奇，1978年）

421

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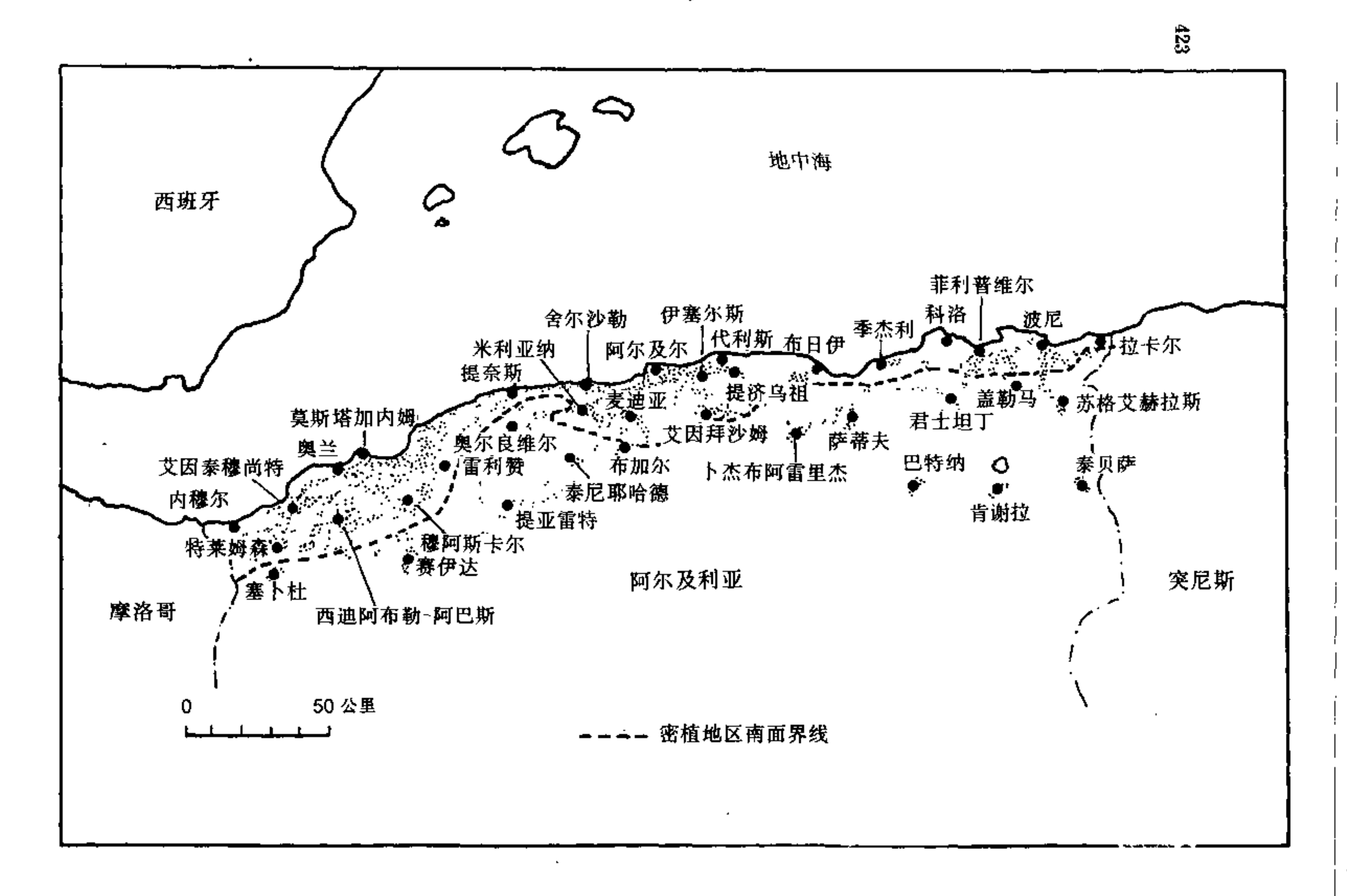


插图 17.2　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葡萄种植區，1930 年左右(根据《法兰西帝国百科全书》，1946 年)

并提供必需的服务（商店、学校、医院等等）。

战后，官方殖民化进程失去了势头(1921年至1931年期间所分配的国有土地仅为7万公顷)，取而代之的是私人殖民化。在经过一段短暂的放慢时间后(1918-1920年)，殖民化的发展又重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尽管地价上涨了。这是由于1926年8月4日通过了土地立法的缘故。这项法令简化了调查程序，以全面调查代替个别调查，通过这样的程序强占当地人民公有的土地。由于这个法令，欧洲移民获得了数千公顷计的村社公有土地。1930年，阿尔及利亚的25,795个白人移民的庄园面积共计233.4万公顷。① 这些庄园主要坐落在特勒这块土质最好、水源最充足的地区，即奥兰、西迪阿布勒-阿巴斯、穆阿斯卡尔、米提贾、斯基克达和安纳巴这些平原地区，以及君士坦丁、萨蒂夫、盖勒马等高原地区（见插图17.2)。 422

在经济大萧条之前，这些庄园面积就很大。平均面积为90公顷。100公顷以上的大庄园只占欧洲人庄园总数的20.6%，为移民土地总面积的73.4%。“1920至1930年期间欧洲人农业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这种大庄园，特别是特大庄园的增加。”②

在突尼斯，剥夺农民的过程从1881年保护国的建立就开始了。1881至1882年的“资本殖民”允许大资本公司（巴蒂诺莱公司、马赛信贷公司、突尼斯土地公司等等）控制了近43万公顷土地，接着便是“官方殖民”。这种“官方殖民”是担心“意大利祸害”的保护国当局系统地加以实施的。③“官方殖民”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突尼斯的法国人口，并促进“法国人的殖民”，为此还拨出相当数目的专款。除了意图将突尼斯人手中的土地转让给法国人的立法外——如1898年11月13日的贝伊法令要求虔奉宗教的基金会每年向国家交纳至少2000公顷土地；1903年7月22日的贝伊法令把山区划归国有等——保护国当局还向移民提供了大笔经济援助。当局向欧洲人农场信贷机构、白人移民合作社和农业联合会提供补贴，并为移民农场提供分20年偿还的无息建场贷款。与此同时，当局在大量移民的地区拨公款修筑公路和铁路，在有移民定居的农村地区建立移民村庄、改进供水和排水系统。1931年，在突尼斯的移民庄园的土地达70万公顷左右，它们与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一样，大多坐落在该国水源充足、土质最肥沃的地区。因此在特勒移民的土地面积近40万公顷，而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只占30万公顷。上述面积包括法国人的庄园和意大利人的庄园（后者为4.36万公顷）（见插图17.3)。 424

典型的意大利人的庄园很小，不足10公顷。来自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移民一般为葡萄种植农、商品菜园经营者和苗木培植者，他们居住在邦角半岛沿岸的突尼斯-比塞大地区。而另一方面，法国移民的庄园一般都很大，例如在迈杰尔达中部的阿布萨利姆地区，80%的法国人庄园面积超过500公顷。④

在摩洛哥，农业殖民无疑比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要晚，但它却借鉴了阿尔及利亚和

① C. R. 阿热龙（Ageron)，1979年。

② 同上，第484页。

③ 1911年，意大利人的人口为8.6万，法国人的人口为4.6万。

④ A. 卡萨卜（Kassab)，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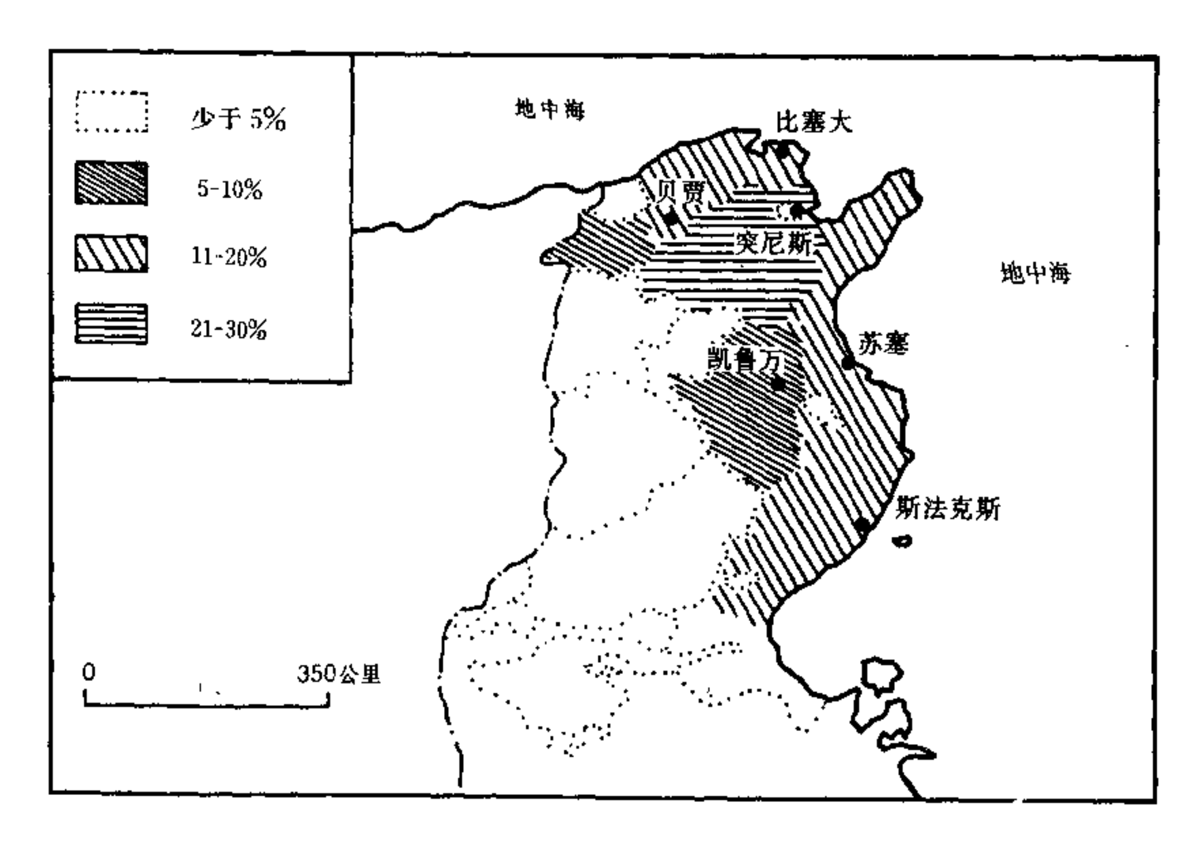


插图 17.3　1921 年突尼斯农业殖民化状况(根据F. 蓬瑟，1952 年)

突尼斯的经验。1918 年摩洛哥农业殖民开始，1923 至 1930 年期间发展速度很快。保护国当局希望整个谢里夫帝国能吸引大量欧洲人移民，因此同样有计划地推行官方殖民。当局以国家土地和村社公有土地转化为大小不一的移民庄园的形式，给予移民（其中 60%来自阿尔及利亚）。同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不一样，这些土地并非无偿赠送，而是廉价出售；如同在突尼斯一样，买者必须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和生活，可同样得到优异的待遇，如宽厚的地价付款条件，足够的安置和设备贷款，土地清理、机械化、耕种等方面的补贴，免交农机设备进口关税，农业友好协会的短期贷款等等。

425　在同一时期内（1922 至 1932 年），私人殖民占有了 35 万公顷以上的土地。⑤绝大部分移民土地属于法国人所有，只有一小部分是由西班牙人、比利时人、瑞士人和意大利人耕种。这类土地大部分位于大西洋摩洛哥平原(沙维亚、杜卡拉和阿卜达)，赛斯和摩洛哥东部（特里法平原)。面积为 100 至 500 公顷之间的庄园占所有欧洲人农场的 50%。

农业殖民的特征

尽管当局尽力设法增加在农村定居的法国人，但官方殖民未能在北非的农村建立起

⑤　1932 年，官方殖民剥夺了 20.2 万公顷非洲人土地。

大批法国人移民点。除了在葡萄园和果园中劳动的小农（突尼斯的意大利人、摩洛哥的西班牙人）外，欧洲人移民并未能形成像当时法国国内那类真正的农民。他们主要是大农场主，拥有大片土地和种类繁多的农机设备，经常还拥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农场建筑物。他们与银行、各种农业信贷机构、研究所，以及许多与殖民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行政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经营的基本上是有风险的农业，产品旨在出口，而不是在本地市场上出售。大多数移民只从事一种作物的生产，如葡萄、谷类或橄榄(在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地区，移民农业经济几乎全部集中在葡萄生产上，而在君士坦丁的高原和突尼斯特勒平原上则种植单一的谷类作物。

面积达几百公顷的庄园采取这种专业化生产，使得有可能把农业劳动变得更加合理化，并系统地采用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履带式和轮式拖拉机出现在北非农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拖拉机连同用它牵引的设备（犁铧、圆盘犁、多圆盘犁、耕作机、条播机等）渐渐为人广泛使用。继收割打捆机后，联合收割机也广为使用，节省了大量农业劳力。新型农机逐渐使得有可能把旱地耕种技术应用于特勒平原半干旱边缘的谷物产区，从而扩大了小麦，特别是软麦的种植。

与此同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拉巴特等地的研究所对农业经济进行了大力研究。这种研究给欧洲人移民提供了适应北非土壤和气候的谷物、果树、烟草等新品种。

使用了先进技术的这种农业常常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1919 至 1929 年期间，各部门的产量持续增长。1920 至 1925 年期间，突尼斯的葡萄酒产量大幅度提高，从 498,148 百升增至 918,853 百升。阿尔及利亚的葡萄酒年均产量从 1916 至 1920 年间的 6,853,000 百升增至 1931 至 1935 年间的 18,371,000 百升。[⑥] 小麦的产量也有显著增长。尤其是作为欧洲人基本作物的软麦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都有显著增长。 426

在摩洛哥，欧洲人移民的软麦产量由 1920 年的 68,285 公担增至 1935 年的 188.4 万公担。摩洛哥的农民在面积较大的土地上（222,815 公顷），只收获 131.6 万公担。

当地市场无法吸收数量不断增长的农产品。以葡萄酒为例（当地绝大多数的居民是穆斯林），几乎所生产的全部葡萄酒都不得不出口。小麦生产也过剩，尤其是在雨水多的年份。

这种高度机械化的农业需要大量投资，因此总是不断地要求贷款。1919 至 1930 年期间，大多数移民债台高筑，不仅是为了增加其房产设施，也是为了配置农机设备。

农业部门的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北非绝大部分人口（80%以上）在农村种田为生。土地所

⑥ C. R. 阿热龙，1979 年，第 487 页。

有制笼统地说包括私人土地、公有土地以及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教会或慈善团体保有的土地。各类土地的相对面积因地而异。例如，城镇周围的殖民地区以及特勒和摩洛哥的赛斯这类水源充足的平原大多为私人土地，而公有土地主要在高地牧区，例如靠季节性放牧为生的扎埃人的土地，和靠放养绵羊、山羊、骆驼、马为生的半干旱地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高海拔平原、突尼斯的高、低草原地带）。

在私人土地地区，存在着一整套土地拥有者等级制。最上层是少数大土地拥有者，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部分可耕地和牧地。这些大土地拥有者在摩洛哥尤为普遍。同样在阿尔及利亚，尽管白人移民土地扩大了许多，穆斯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掌握着相当多的土地。可是任何地方都没有摩洛哥那么多的大土地拥有者。"大庄园主要集中在莫斯塔加内姆、麦迪亚和君士坦丁三行政区。在君士坦丁 1914 年时拥有 100 公顷以上的土地拥有者有 834 人；1930 年时 1463 名土地拥有者平均占有 185.4 公顷土地。1930 年莫斯塔加内姆行政区的土地拥有者平均占地 263.7 公顷，麦迪亚的土地拥有者平均占地 367.3 公顷。最后，就整个阿尔及利亚而言，1930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7035 个土地拥有者（即占全国人口 1.1%）占有穆斯林地区的 21%的土地。"⑦

427

在突尼斯的突尼斯城，同样生活着一批拥有土地的贵族。其土地大部分在谷物生产地特勒（贝贾、马特尔和卡夫）。耕种这些土地的方法是全北非都采用的一五分成制。这种方法严重妨碍了种植技术和方法的进步。"中等"或"富裕"这一类土地拥有者所占地位并非不重要。据说，1930 年时他们占阿尔及利亚土地拥有者总数的 22.6%，占穆斯林地区土地总面积的 34.8%。⑧

小块农田大多集中在城镇周围和肥沃的产粮平原（如摩洛哥的赛斯平原、突尼斯的迈杰尔达中部平原），以及有移民定居点的山区（卡比利亚、里夫和大阿特拉斯山西部）和沙漠绿洲。

农业产量和牲畜数很容易出现波动，这是因为降雨量变幻莫测，饥荒尽管不断有所减少，但仍相当频繁。另外，高利贷仍在农村造成混乱，只有大农场主才有办法叩开欧洲人建立的信贷机构的大门。但是早在 1907 年的突尼斯和以后在 1922 年的摩洛哥建立了土著人储金互济会，主要是为了向小农提供种子贷款。⑨ 殖民当局向白人移民提供的财政资助大得无法相比。例如在 1917 年到 1929-1930 年期间，摩洛哥农民⑩ 从土著人储金互济会所得到的短期贷款为1900万摩洛哥法郎，而1925至1930年期间，于1920年建立的不动产信贷基金会发放给白人移民（约4000户）的长期贷款一项，就达1.4亿法郎。⑪

⑦ C. R. 阿热龙，1979 年，第 59 页。

⑧ 同上。

⑨ 极其有限的现金贷款附带着如此严格的条件（有约束力的义务、以第三方担保或以土地作抵押为形式的保证、用地契作抵押等等）以致只有少数"富裕"农民才能得到。

⑩ 1926 年的农村人口据估计为 545 万（占总人口的 87.9%）。

⑪ R. 胡夫赫尔（Hoffherr），1932 年。

殖民主义制度下农村社会的变化

尽管如此，北非农村社会在殖民占领下还是有明显的发展。一方面，北非大农场主从移民那里得到启发，在采用他们的技术、方法、甚至作物品种（葡萄和软麦）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另一方面，许许多多在移民农场和北非大农场主农场工作的乡下人成为工资劳动者，并因此而无产阶级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拖拉机和现代化农机设备的使用使得白人移民和本地人大 428 农场主对土地的追求更加贪婪。不论他们是拥有还是租借到一些现代化农机设备，为了使这些设备创造利润，他们得不断设法增加产量并以此增加他们的财产。但要这样的扩张成为可能，在国家已无剩余土地的情况下，唯有牺牲耕作规模很小和中等的穆斯林农民，这些农民被迫越来越退往山区或丘陵地带的深处。为了扩张到干草原牧民所占用的地区，并把干草原的一部分用于移民，殖民当局不惜一切手段使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定居下来，成为谷物和果园种植农。例如在突尼斯高地干草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向移民分配土地，对当地人也相应分配了土地，意在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自 1922 年以来，已经给某些耕种公有土地和宗教慈善团体土地的人分配了许多面积相同的小块土地。"[12]

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殖民地点扩至当地人需要大面积土地以放养其牲畜的地区，而牧民则开始趋于定居，它也导致人们生活更形贫困和纷纷逃离本土。

安排基础设施新方法中的殖民特征

采矿业

欧洲人在北非三个国家殖民，不仅意味着白人移民夺走了大片最好的土地，也意味着主要为了外国公司的利益而大量开采地下资源。

人们很早就对这些资源进行勘探，并且很快就着手开采。在阿尔及利亚，第一批矿区的开发是 1845 年。在突尼斯，卡夫萨的磷酸盐的资源在 1885 至 1886 年之间(即沦为保护国才 4 年时）已经发现了，并从 1889 年起进行开采。

在摩洛哥，组织矿物资源勘探和开采的第一项采矿法令的公布是在 1914 年。法令规定了"矿区归首先占有者所有"，这个规定导致了种种弊端。1923 年的法令重新修改采矿规定，旨在制止投机者的活动，可是反面延缓了有系统地对本国矿物资源的开采。除了自 1920 年以来一直在开采的胡里卜加磷酸盐矿之外，摩洛哥到 1928 年时矿石出口量仅 8000 吨左右。但是，探矿者和申请采矿特许权者犹如一群蝗虫大量涌至。1938 年 9 月 15 日至 1939 年 1 月 1 日之间发放的勘探许可证达 3500 份，探矿许可证达 400 份。

---

[12] J. 德普瓦 (Despois)，1961 年。

1923年杰拉达煤田的发现导致了摩洛哥采矿立法的再次修订。这一年，建立了矿产勘探和合股局，专门致力于寻找固体和液体燃料；而1929年11月1日的法令简化了早期的采矿规定，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自此时起，对矿物资源的勘探和开采的速度开始加快。杰拉达煤田以及海尼夫拉铁矿和伊米尼锰矿得到系统的勘探。位于上穆卢贾的奥利铅矿是北非最大的铅矿之一，很快设备装置齐全并投入了生产。摩洛哥东南部的阿布·阿拉法锰矿产地于1933年与武吉达通了火车，位于阿特拉斯山脉中的阿布·阿齐兹的钴矿、位于米卜拉登的铅矿和锌矿、乌尔米兹的锡矿和阿泽库尔的钼矿也都相续投产。在经济危机的前夜，摩洛哥似乎是北非矿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就产量和出口量而言，占第一位的是磷酸盐。其出口量从1921年的8232吨增至1930年的117.9万吨。

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磷酸盐矿（库韦夫和卡夫萨）、铁矿（贝尼萨夫、文扎和贾里萨）以及铅、锌等多种矿物资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得到开采，这些矿产品几乎全部向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出口。对这些矿物资源进行开采的统统是外国公司，由外国公司提供采矿所需的资金、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等。例如，奥利与米卜拉登矿业公司是在佩尼亚罗亚-摩洛哥公司的控制之下，而后者与巴黎-米拉博德联合银行、巴黎与荷兰银行以及法兰西海外矿业局有联系。图韦西特的锌矿和铅矿属比利时皇家阿斯图里安纳矿业公司所有，美国的摩根财团是泽利贾矿最大股东之一。在突尼斯，贾里萨铁矿受代表巴黎联合银行的阿尔及利亚信贷和金融公司的控制。同样在阿尔及利亚，所有矿物资源也都掌握在外国，尤其是法国资本家手中。

交通与港口

为了把各矿产地与出口港口相连接，阿尔及利亚很早（1844年起）就修建了铁路，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在沦为保护国初期修了铁路。到1919年，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铁路的主要干线均已竣工。它们把大城市（大多靠近沿海地区）彼此连接，并接通了矿产地与主要出口港口（奥兰、阿尔及尔、安纳巴、突尼斯、斯法克斯和苏塞）的交通。在摩洛哥，铁路建筑速度稍慢，这是因为1913年11月4日法德条约中有一条款规定，法国在修建丹吉尔-非斯的干线（见插图17.1）之前不得修建其他铁路。直至1923年4月第一条卡萨布兰卡-拉巴特路线才开工。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大多数铁路不同，摩洛哥的铁路网主要采用标准轨距(1.44米)。但是，与其他北非国家一样的是，摩洛哥的铁路也具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主要干线连接城市和大西洋沿岸港口；轴线的服务对象则是内陆的矿产地和大城市（非斯、梅克内斯、马拉喀什）。铁路完全由外国公司修筑和管理。

公路交通网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于大多数欧洲人居住的大城市和那些建立了白人移民庄园的农村地区。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分公路网建在欧洲人农场和规模最大的城市集中的地区——特勒的北部。

港口基础设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港口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造主要是为了给法国和外国制造品打开北非国家的市场大门，同时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

1919年，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港口基础设施已建造完成，但摩洛哥几乎还未动工。直至1917年卡萨布兰卡港口配套工程才完工。此后，该港吞吐量迅速稳步增加，从1920年

的 40 万吨增至 1927 年的 222 万吨（含 119.8 万吨磷酸盐）。[13] 该港装卸量占摩洛哥各港口总吞吐量的 80%以上。而摩洛哥第二大港口盖尼特拉（原利奥泰港）的吞吐量 1927 年只有 19.1 万吨。

在所有这些港口装卸货物的类型表明了贸易的殖民地性质和北非三国与法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海关和财政制度的不公正

海关制度

由于阿尔及利亚是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商品可以对等地免税进入彼此的境内。外国货物进入法国或阿尔及利亚时都须交纳同样的关税。在垄断的情况下，法国船队拥有独占的权利，行驶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港口之间。这样，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关税同盟，它是“经济世界中所能得到的最完美的一种关税同盟。”[14] 但是，这种同盟的关系使得阿尔及利亚始终处于原料、农产品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的地位。 43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突尼斯的海关制度是根据 1890 年 7 月 19 日和 1898 年 5 月 2 日的法令执行的。后一个法令给予法国制成品，尤其是金属产品、机器、纺织品，以特惠待遇。但是，同样的外国商品也不必根据法国的税率纳税。结果来自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充斥突尼斯市场。1928 年缔立不平等的关税同盟，它规定突尼斯允许免税的农产品不再规定限额，而法国的商品有的完全免税，有的与外国同类产品比，受利税率的保护。这样，在突尼斯的市场上，法国商品就可以同其他工业国家的商品展开竞争，有的时候甚至挤垮了对手。结果，这种情况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使突尼斯无法实现工业化。

摩洛哥与外国的商业和关税关系更是不公正和不平等的。阿尔赫西拉斯条例（1906 年）为在摩洛哥市场经营的签字国规定了严格的经济平等原则。凡进入摩洛哥的货物，不论来自何方或由何国船只运输，一律按价收税 10%，此外附加公共工程特别基金会的税 2.5%。这种“门户开放”制度使得出口大国在摩洛哥倾销其制成品和农产品，而摩洛哥则得不到报酬，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可以在基础设施修建期间（1920 年至 1930 年）以竞争性的价格买到所需的物资。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摩洛哥感到了这种制度的弊端，感到这种制度“在该国开始朝着综合性经济方向发展而新建工业需要必不可少的保护时，越来越成为摩洛哥繁荣的障碍。”[15]

尽管如此，摩洛哥不得不求助于间接性保护主义措施，限制某些外国食品的进入。这样，1921 年 2 月 22 日的法令规定小麦、大麦及麦类产品的进口必须要有许可证；1929 年 6 月 4 日的法令实际上禁止外国小麦和面粉的进口，但是，工业制造品仍然按以往同

[13] 同铁路一样，这些港口是由摩洛哥行政当局发行并由法国政府担保的一系列公债的方式建造的（1916 年和 1920 年的公债额为 2.9 亿法郎）。

[14] L. 布易（Bouis），1946 年，第 2 卷，第 56 页。

[15] R. 胡夫赫尔，1932 年，第 243 页。

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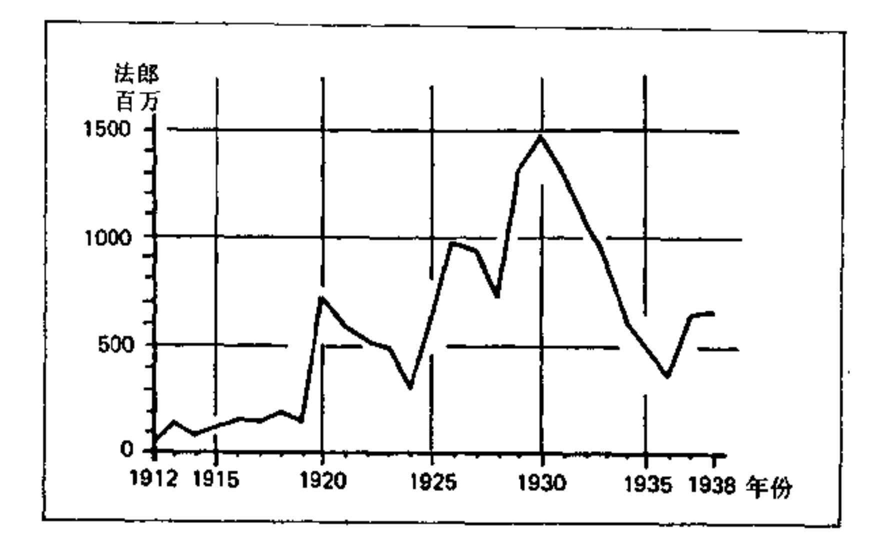


插图 17.4 摩洛哥贸易逆差状况，1912-1938 年(根据《法兰西帝国百科全书》，194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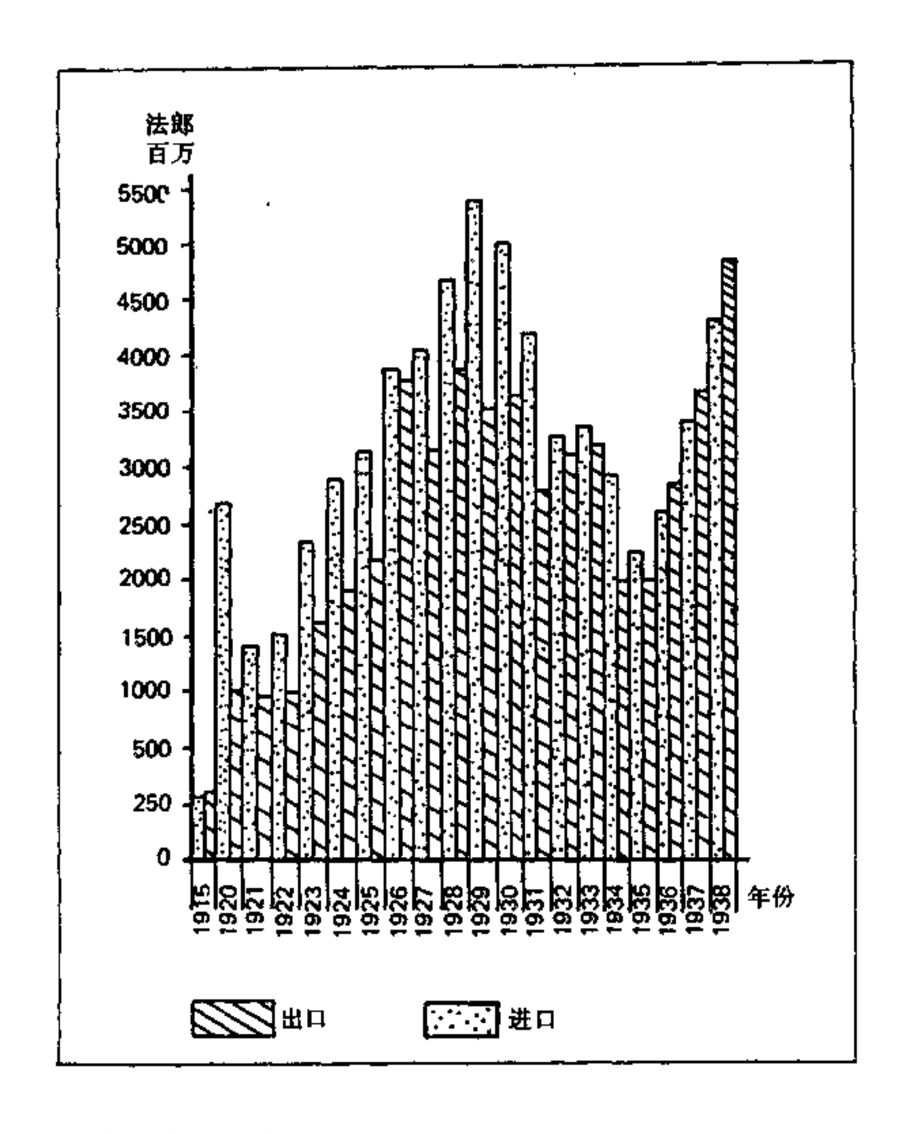


插图 17.5 阿尔及利亚的对外贸易，1915 1938 年(根据《法兰西帝国百科全书》，1946 年)

样条件不断涌入摩洛哥。

北非出口的特征清楚地反映出北非经济及其关税制度的性质。例如，1920至1930年之间，摩洛哥出口的主要是磷酸盐和谷物。北非进出口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几乎是持续 433 的贸易逆差．所有三国的进口额远远大于出口额(见插图17.4，17.5，17.6)。例如，突尼斯进口额1929年达19.84亿法郎，而出口收入仅为14.08亿法郎。

最后，关税制度要对农村和城镇手工业的破产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财政制度

法国当局接管北非后干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制定金融和财政制度。它们设立一个财政管理局，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编制预算和检查开支。预算的严肃性和严格性使收支得以平衡，1919至1930年期间基本上能维持收支的平衡。但是，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开支超出了收入，到1939年，突尼斯的预算赤字在1亿法国法郎以上。

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海关税收、土地税、农产品税(在摩洛哥称塔蒂布)和消费品税(间接税)，总之，是来自当地人，税收“普遍加在当地纳税群众身上，当地人的(财政)负担常常变得沉重不堪。”[16]

另外，为了购置设备，北非三国不得不频繁借款。1930年，阿尔及利亚欠法国20亿 434 法郎，[17] 1932年摩洛哥的债务总额达16.91亿法郎。[18] 用这些贷款所购置的设备首先是使欧洲康采因控制的现代经济部门得益，然而偿还债务的钱则大部分来自穆斯林。1931年，摩洛哥国债还本付息的支出占该国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

经济大危机期间(1930至1935年)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危机与北非的主要经济部门

北非遭受经济危机袭击的时间稍迟。经济危机的影响在1932年以后才充分感受到。但是对摩洛哥的影响略早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19] 当时摩洛哥恰巧处于经济潜力的发展阶段。

最先受经济危机影响的经济部门是白人移民农业。我们知道这种经济部门对贷款和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很大。一旦价格骤跌和外国市场途径受卡或变少，用机械化耕作但负债累累的农场主便无力向借钱给他们的各种信贷机构偿还借款。采矿业情况也一样，由于生产国几乎不对矿物原料在国内进行加工或使用，因此，采矿业彻底依赖国外市场。

国内经济也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经济的不景气和价格下跌影响了国内经济对农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手工业情况也是如此：手工业在摩洛哥的大城市(非斯、梅克内斯、

[16] R.胡夫赫尔，1932年，第292页。
[17] C. R. 阿热龙，1979年，第414页。
[18] R. 胡夫赫尔，1932年，第304页。
[19] J. 伯克 (Berque)，19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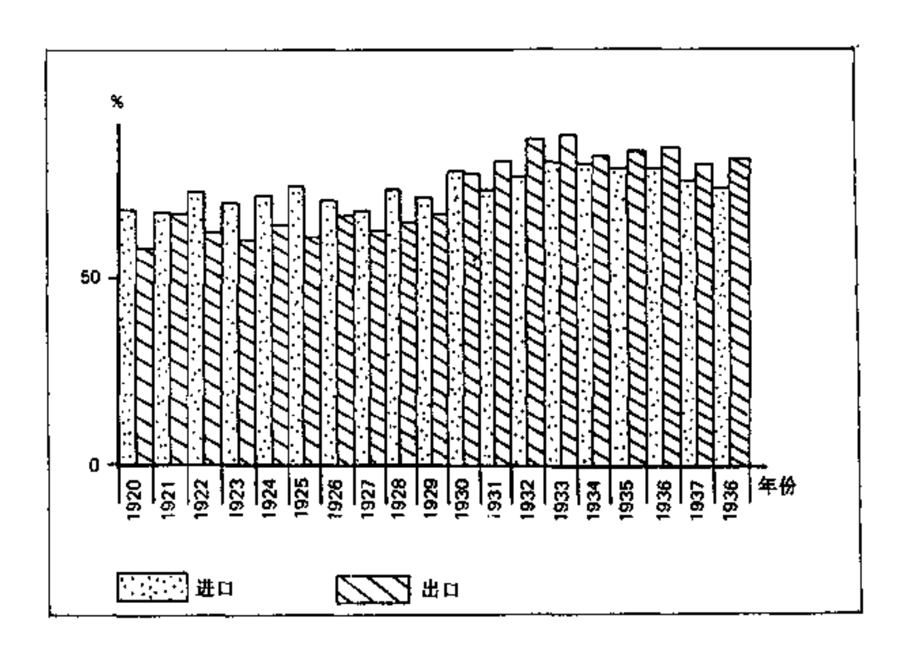


插图 17.6 与法国的贸易额在阿尔及利亚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1920-1938 年(根据《法兰西帝国百科全书》，1946 年)

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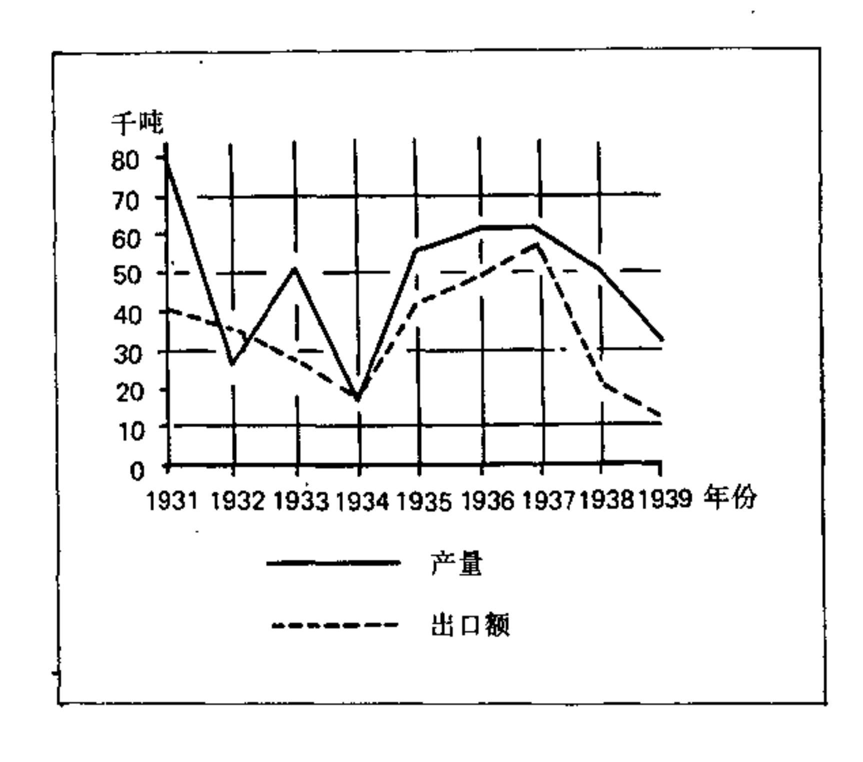


插图 17.7 突尼斯橄榄油产量与出口额，1931-1939 年(根据《法兰西帝国百科全书》，1946 年)

马拉喀什）和突尼斯的大城市（突尼斯、凯鲁万、斯法克斯）的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此时，手工业产品对外出口实际上被割断了。

危机对白人移民经济的影响

农业

最先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欧洲人农业部门是那些对国外市场尤其是对法国市场依赖程度最大的部门，即葡萄酒酿造业。例如，阿尔及利亚1913年的葡萄酒出口额占出口总值的66%。每百升葡萄酒的平均售价1927年为168法郎，1931年时跌至108法郎，1934年时又跌至54法郎。经济的不景气，外加赶上大丰收，尤其是1935年的大丰收，造成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酒窖里葡萄酒贮存量大幅度上升。当时，葡萄酒酿造业是白人移 **435** 民经济的奠基石之一，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在突尼斯，有1,372个欧洲人业主以此谋生，“因此，酿酒业的破产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法国人农村殖民地区的破产，而对这些人的定居，政府曾给予了极为慷慨的资助。”[20]

经济危机也影响橄榄油业，特别是突尼斯的橄榄油业。突尼斯每年生产的橄榄油三分之一用于出口，主要向意大利出口，也向法国出口。此时，意大利对本国橄榄油生产者进行补贴，鼓励他们以低价出口，从而保护本国的橄榄油业。到1932年，意大利对外国橄榄油进口征收寓禁性的关税。1935年意大利停止从法国和法兰西帝国各地进口橄榄油，以报复法国的禁运措施，这项禁运措施是根据国际联盟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于1935年10月5日通过的。无疑，第一个受出口和价格的下跌[21]打击的是突尼斯的生产者，但对斯法克斯地区拥有大片庄园、主要为出口而生产的白人种植园主来说，这 **436** 也是一个打击。橄榄油出口额从1930年的409，800公担跌到1936年的20万公担。“这是又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欧洲人种植业停滞，标志着法国在斯法克斯地区殖民扩张的终结。”（见插图17.7）[22]

对当地农民和欧洲移民都至关重要的带有风险的第三种农业是谷类生产。1934年，阿尔及利亚白人移民的小麦种植面积在100万公顷以上；在摩洛哥，欧洲人耕种的土地中，近96%用于谷物生产。但是，移民主要生产的是用于法国面粉加工业的软麦。例如在突尼斯，种植软麦的16万公顷土地几乎全部属于欧洲人。在这个部门也出现了小麦价格和出口额同时下跌的现象。欧洲人出口的突尼斯小麦从1931年的价值291,408,000法郎降至1934年的60,845,000法郎。

矿业中的危机

1927年，世界市场上的矿产品价格上升的状况已变得不稳定，矿物出口的下降趋势

---

[20] J. 蓬瑟（Poncet），1952年，第300页。

[21] 曾于1925-1928年间达到每公担1000法郎以上的橄榄油价跌到1930年的700法郎和1933年的300法郎。

[22] J. 蓬瑟，1952年，第302页。

在1931年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摩洛哥磷酸盐的出口量从1930年的177.9万吨降至1931年的900,731吨；突尼斯的磷酸盐出口量则从360万吨降至1932年的最低点162.3万吨。一方面售价持续下跌，一方面主要成本上涨。1932年，1吨突尼斯的磷酸盐装货港的主要成本为65.77法郎，但售价却为53.77法郎。[23]其他矿产品(铅、锌、铁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经济危机导致了大批矿山的关闭，特别是那些原来勉强维持和股本分散的矿山。

危机对穆斯林经济的破坏

如果说北非绝大部分人口以农业为生，正是农业部门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最为严重。

受经济危机损害的主要产品是谷类(特别是硬麦和大麦)、羊毛和油类，尤其在突尼斯是如此。

各种类型的生产者都受到危机的严重冲击，不论是作为国内和国外农产品销售网的一部分的那些人，还是靠自给经济维持生计的小农。例如，突尼斯硬麦在1928至1931年之间的价格比1926年下跌20%，1932年时平均达到45%，1935年(大萧条到最低点时)达到60%。[24]1935年，大麦的价格跌至1926年的75%。[25]由各类畜牧业者生产和主要用于出售的羊毛，1935年时的价格降至1926年价格的60%。经济危机同样打击了因进口制造品竞争已变得十分萧条的手工业。例如，突尼斯手工业品出口额在该国出口总额中的比例，由1920至1925年期间的3%减至1930至1935年期间的1.95%。[26]

437

在这种情况下，北非三国1931年至1936年期间对外贸易总额的不断下降是不足为怪的。与1927年和1928年相比，1936年突尼斯对外贸易额下降了近40%。摩洛哥的外贸总额从1929年的3,780,606法郎降至1935年的1,750,518法郎。阿尔及利亚的外贸额也大幅度下降，从1930年的998.3万法郎降至1936年的670.2万法郎。

经济危机对社会的影响

首先必须看到，危机对社会的影响极其严重。那些无力偿还债务的负债累累的白人移民和北非农场主面临破产。许许多多尚未欠债的人也被迫借款和抵押其财产。得不到银行或农业贷款机构帮助的中等农民和小农只得求助于农村或城镇中的放债人，用以偿还旧债。

经济危机为城镇和乡村中的金融家(常常也就是放债人)、大商人以及占有大片土地的富翁增添了大笔财富，从而大大加剧了社会分化。财产和农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农村(以及城镇的)大财主手中。在阿尔及利亚，“另一方面，以谷物和绵羊价格骤跌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占有50至100公顷土地的土地拥有者生活艰难，同时进一步加剧只

---

[23] 突尼斯大议事会，第11次会议(1932年11-12月)。法国部分，矿业同业公会董事布瓦塞(Boissée)的报告，第29页。

[24] A. 努希(Nouschi)，1970年。

[25] H. 安纳比(Annabi)，1975年。

[26] A. 卡萨卜，1976年。

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贫困程度。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大片土地被拍卖、相当一部分土地被最富有的人买下来的现象。”㉗许多特大型白人移民庄园和穆斯林庄园的形成就是在经济大危机年代。由于农业危机和自然灾难，北非的好几个地区、尤其是干草原地区经常发生干旱和饥荒。为数众多的农民破产了，由于饥饿或税务官逼债而纷纷涌入城市。经济大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农民逃离农村的现象加剧，和市郊贫民窟的出现或发展。㉘此后，凡是城市、不论大小，都未能避免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这种现象极为普遍。

经济萧条还导致建筑业停滞、矿山和工厂关闭，从而造成大批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工人等城市居民失业。1932年阿尔及尔有12%的工人失业……(1935年)阿尔及尔77%的建筑工人失业。”㉙ 438

解决危机的方法

政府干预

如此严重的危机不能不引起当局的关注，结果，国家对组织各经济部门生产的作用扩大了不少。殖民地当局和法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针对农业部门，因为绝大部分北非人口以此为生，而欧洲人移民区的未来也以此为基础。

为帮助酿酒业所采取的措施，尤其在突尼斯，是增加免税在本国销售葡萄酒的定额，整个北非地区不得扩大葡萄种植园的面积，同时以发放补偿金的方法鼓励人们拔掉葡萄树。

至于谷类的种植，政府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使之恢复了正常：增加软、硬麦的库存，对贮存给以补助；规定了软、硬麦的最低价格，错开轮流出售库存谷物的时间；政府发放了由它担保的仓库栈单，凭此农民可获得为其产品价值三分之二以上的银行贷款；在法国国内推行的控制、保护和调节谷物市场的一系列措施也在北非三国实施。

为了在各部门实施这些措施，设立了一些半官方性质的机构（谷类管理局、油类管理局和葡萄酒管理局）。

为了结束针对无力偿还债务的白人移民和北非农民受到债权人施加的取消典押品赎取权和控告等威迫，阿尔及利亚设立了清理债款基金会(1932年)；突尼斯设立了土地基金会（1932年）和突尼斯信贷和清理基金会（1934年）。面临财产被剥夺的负债人还可得到缓期还债、减债和抵押贷款等待遇。

农村社会的苦难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主义的动乱，使得法国当局开始对北非农民的状况进行调查。1933至1935年间，北非三国实行了一项农民的政策。

㉗ C. R. 阿热龙，1979年，第509页。

㉘ 举例而言，卡萨布兰卡城的本姆西克、突尼斯城的迈拉辛和贾巴尔阿赫马尔诸贫民窟。

㉙ C. R. 阿热龙，1979年，第43页。

农民政策

439 在阿尔及利亚，1933年7月9日的法令设立了土著人储金互济会基金库。这使政府可以通过该组织专门向穆斯林发放贷款和补助金。基金库还同农业贷款基金会一样，通过发放清理贷款帮助农民摆脱债务。当地人事务理事会的"社会经济"部还制订了某些更新农民生产技术的措施；它发放长期的植树贷款以及为购买肥料、犁具等物的短期贷款。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尽管能提供一些帮助，但还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发放给农民的贷款对于"数目庞大的农民"[50]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所采取的更新穆斯林农业和增强农民地位的措施也未真正坚持下去。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国家也着手向农村地区提供贷款，解决土地使用权问题，促使农民的农业生产多样化。但是，所实施的法令没有大规模的运动作后盾，以致难以改进和扩大牧民和农民的生产方法或增加赤贫者所拥有的土地。

农业中的新趋势：经济体制中持续不变的殖民地特性

经济危机清楚地暴露了单一种植的危害，而这种耕作制度在欧洲人农场主中占压倒优势。政府通过鼓励扩大果园种植业、促进商品蔬菜的生产和发展灌溉等方式来促进作物多样化。

由于西班牙内战和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的制裁，西班牙和意大利向法国的水果出口中断了，致使法国市场向北非生产的水果敞开了大门，从而促进了果树栽培，尤其是柑橘树种植的迅速发展。在阿尔及利亚的米提贾、突尼斯的邦角、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海尼夫拉、梅克内斯、武吉达等地区办起巨大的种植橘树、细皮小柑橘树和柠檬树的果园。为组织水果的包装、销售和出口，还成立了诸如突尼斯标准化管理局等半官方机构。

沿海平原商品蔬菜生产和早熟蔬菜和水果生产的发展，与水利灌溉的发展和开发利用地下水和河流资源分不开。摩洛哥境内，在巴赫特河上(1934年)、在塔德莱境内卡斯巴-扎伊达尼亚的乌姆拉比（1936年）和拉莱塔凯库斯特的瓦迪纳菲斯（1936年）分别修筑了大坝。在西迪苏拉杰曼地区、塔德莱平原和特里法斯平原等地建成了灌溉区。

在突尼斯的特勒粮食产地，特别是欧洲移民大庄园中种植了大片橄榄树。

440 尽管如此，北非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加工业，有的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如面粉加工厂、榨油厂、酿酒厂、面食加工厂、啤酒厂、罐头厂，有的以矿物为原料；后者对矿石或是进行一些粗加工(如熔铅厂)，或是进行较为复杂的制造(如连二磷酸盐和过磷酸钙工厂)，然后再出口。

公司大多是小型的，几乎全部掌握在欧洲人手中，产业工人的人数并不多：1938年整个阿尔及利亚为4万人。[51]尽管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极低，但北非的城镇发展很快。摩洛哥盖满房屋的地区所占的比例从本世纪初的7%增至1936年的15%以上。大商业中心

---

[50] C. R. 阿热龙，1979年，第497页。

[51] 同上。

(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和突尼斯城)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卡萨布兰卡1900年时只有2万居民，1936年增加到257,400居民。这些城镇虽然工业很少，但拥有庞大的第三产业，它们犹如磁铁一样，吸引着寻求工作的乡下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北非的经济是典型的殖民地型体制：二元的和外向的。由于缺乏资金、长期使用陈旧过时的生产方式、拥有的土地零散以及从业者被赶到产量很低的土地等诸方面原因，北非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发展停滞。实际上，北非人被排挤出现代经济部门(银行业、矿业、加工工业以及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实施机构)。但是，由外国资本控制的这些部门也严重依赖于外界的决策中心和市场，并且只能或多或少被动地忍受着这些决策中心的选择和市场的波动所带来的后果。

第二部分

利比亚、埃及和苏丹

A. A. 阿卜杜萨拉姆
和F. S. 阿布塞得拉

利比亚

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黎波里的经济是围绕着农业（包括畜牧业）和贸易这两方面的主要活动而发展的。农业活动在农村地区进行，贸易则在城镇中经营。对绝大部分人口来说，这两项活动是主要职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土耳其统治者未曾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是，意大利人却力图对这种经济进行某些激烈的改革。本节的第一部分叙述奥斯曼统治的末期，第二部分叙述意大利占领下的经济状况。 441

奥斯曼统治时期的利比亚经济（1880-1911年）

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活动仅限于农业、贸易和小手工业。在奥斯曼统治时期，农业生产墨守陈规。翻地用的是牲畜拉的木犁。小麦和大麦是主要作物。其他作物有枣、橄榄油、柑橘和牲畜。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随季节而变幻不定的降雨量。在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的平原上牧养着大批牲畜。其中有些牲畜向邻国出口。据估计，1906年的羊出口量为50万只左右。1908年仅昔兰尼加一地就出口了5.8万头牛和34万只羊。

在贸易方面，由于缺乏公路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因此使用车马的商队不但在当地城镇之间搬运商品，而且也运输商品往返于的黎波里和其他非洲邻国的大城市之间。商队有主要通道5条，3条通往南方，1条通往东方，另一条通向西方（见插图17.8）。有一条通道由的黎波里开始，经过盖达米斯、加特、阿伊尔和津德尔通到（尼日利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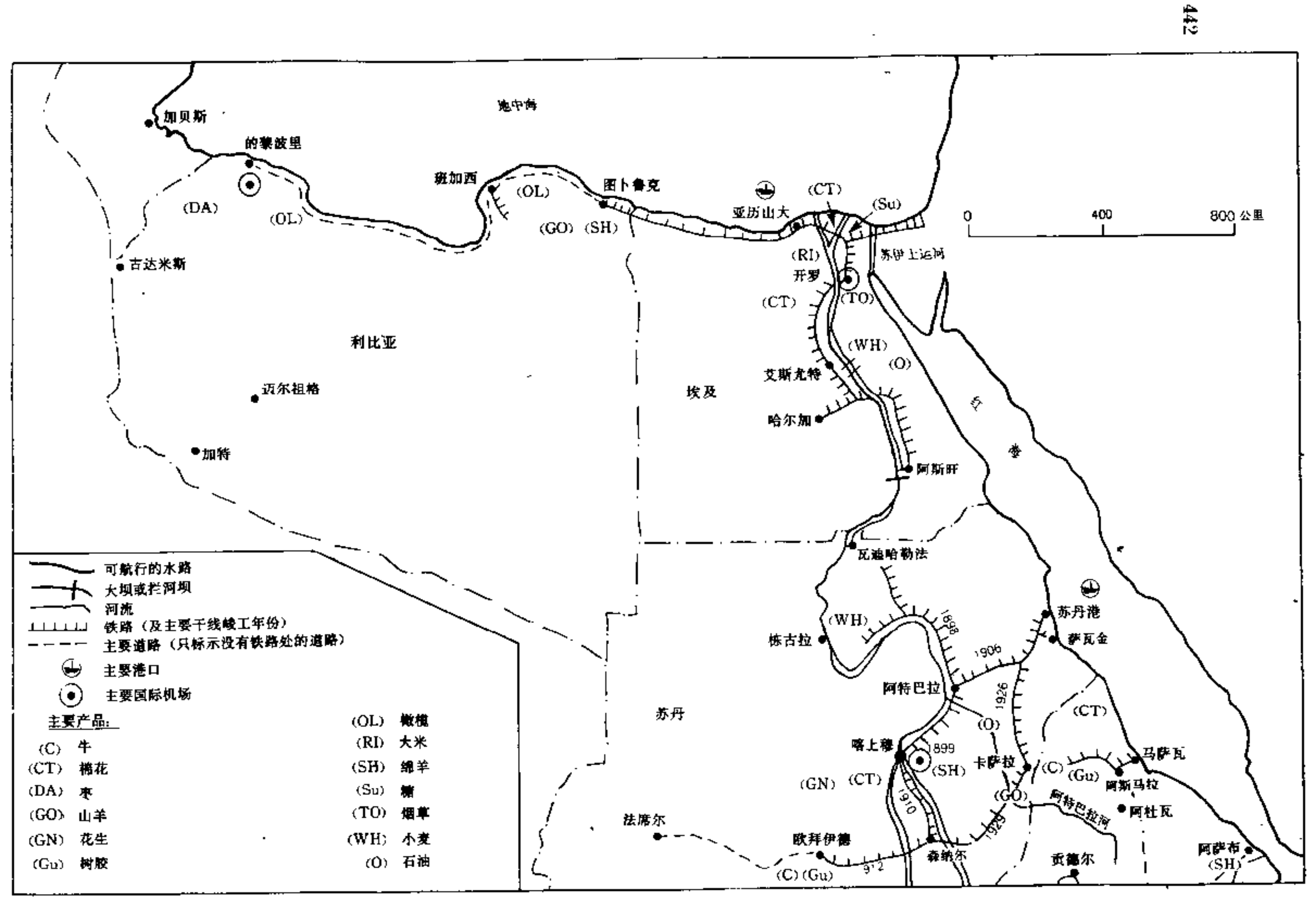


插图17.8 利比亚、埃及和苏丹，殖民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根据J. D. 费奇，1978年）

卡诺。第二条通道由的黎波里，经过迈尔祖格、塔贾尔希、比尔马、努伊格尼和库卡瓦抵达（尼日利亚的）博尔努。第三条通道由班加西通往（乍得的）瓦代，途经乌吉拉、库夫拉和提贝斯提。另一条通道东边从班加西至（埃及的）塞卢姆，西边从的黎波里通往突尼斯。[32]

商队贸易把玻璃器皿、服装、丝绸、调料和纸张运往博尔努和瓦代，运回诸如皮革、象牙、鸵鸟毛之类商品。但是从19世纪末起，商队贸易开始衰落。随着别的非洲国家沦为殖民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运费较低的通道。现代化的、效率更高的运输手段取代了旧方法。结果，商队贸易的重要性渐渐地减少了。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港口的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与欧洲和其他邻国的贸易十分兴旺。向那些国家出口的货物有牛、绵羊、羊毛、山羊毛和驼毛、枣、大麦、小麦、茅草。进口货物有棉织品和丝织品、玻璃、火器、大米、糖、茶叶和咖啡。其主要贸易伙伴是意大利、英国、马耳他、埃及、突尼斯、法国、奥地利、德国和希腊。

工业的规模不大，仅局限于几种手工艺产品。这些小工业包括纺织、编席、制革、制皂，以及一些金银加工作坊。到1911年有织布机约2000台，毛纺机约550台，丝织机120台左右。[33] 这些本地工业生产男女民族服装，帐篷和地毯也是当地制作的产品。有些私人小作坊制造些作工精致的装饰品，如手镯、戒指、耳环等。其他一些工业，如晒盐和烟草业，则由政府垄断。 443

虽然奥斯曼对的黎波里的第二次统治长达70多年(1835至1911年)，但对利比亚的经济发展并未作出什么努力。没有执行认认真真的政策来改进诸如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制度。当时在该国开办的技术学校也寥寥无几。忽视经济发展的部分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土耳其面对本国重重难题而自顾不暇。当时土耳其一方面与邻国交战，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企图保住它在欧洲的领地，并防止帝国解体。结果，很少想到去促进利比亚的经济发展。土耳其政府关心的似乎只是收税。

奥斯曼统治时期在的黎波里实行的税收制度包括成年男人人头税、农产品什一税和所得税。其他税收还有地产税、遗产税、对非穆斯林成年男人征收的免服兵役税、金银加工税，对于进出口货物则征收关税。[34] 此外，政府通过食盐和烟草的专卖也获得大笔财政收入。这些税收加重经济的负担，使之发展缓慢。它们还激起了几次反抗运动，造成政治动乱，并削弱了土耳其对该国的控制。

意大利占领时期的利比亚经济（1911-1942年）

意大利对利比亚发生兴趣从19世纪末开始。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意大利也想在北非建立一个立足点。但是直至20世纪初意大利才开始推行其殖民政策。起初，意大利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这一目的，使用罗马银行作为它的特洛伊木马。

---

[32] F. 科罗（Coro），1971年。

[33] 同上，第79页。

[34] A. J. 卡希亚（Cachia），1975年，第72页起以后诸页。

罗马银行是第一家在利比亚开业的意大利金融机构。它于 1907 年在的黎波里开业。不久，它在其他一些城市开设分支机构，扩大了业务范围。其业务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事务，而且还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等方面的投资。罗马银行在的黎波里开办了橄榄油加工厂和面粉加工厂，并在昔兰尼加建立了牧羊场。此外，它还开辟了利比亚主要城市与邻国间的航线，并购买土地，派遣勘探队寻找该国的矿物资源。这些活动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做法引起人们对它在利比亚的真正作用产生怀疑。结果，土耳其当局对该银行的活动加以限制，如果说并未使之受挫的话。[35] 意大利 1911 年侵犯利比亚的借口之一正是罗马银行受到的敌视态度（见第 5 章）。

意大利占领时期的经济政策

意大利 1911 年入侵利比亚时，梦想把这块新的殖民地变成意大利工业原料供应地和意大利产品的市场，并且成为解决意大利人口问题的途径。意大利的意图是把利比亚变为意大利的一个组成部分，所采取的每项措施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的。意大利人对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投入大量资金。

农业移民

意大利在利比亚实行的农业计划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私人移民和殖民式移民。

在意大利占领初期，为了鼓励在利比亚实行殖民式移民，意大利政府向富有的意大利人赠予大块土地，以便他们把这些土地开辟成农田。这些土地有政府的公地，也有从其原占有者手中剥夺来的土地。到 1929 年，所征得的土地已达 58,087 公顷。这些土地全都租借给意大利农民，租借期为 90 年。在后来一段时间，这些土地的租借者被要求安置更多的意大利农民，这件事对先来的移民和政府来说都是个负担。政府对私人移民提供的补贴达 6200 万英镑，此外还有从储蓄基金中抽出的近 1.58 亿英镑的贷款。[36] 根据这一计划移居利比亚的家庭只有 2031 家，远远低于意大利政府所期望的水平。[37] 于是，意大利政府开始推行一项新的移民计划，以加快移民速度，但是在 1932 年民族抵抗运动结束之前，未能实施任何重大的开发计划。

民族抵抗运动被镇压下去后不久（详见本书第 5 章），意大利政府便着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包括利比亚的一些地区，特别是绿山地区。其目标是在 25 年的时间内再安置 30 万意大利人。[37] 这项任务交给了私人和半官方的机构去完成。这些机构把私营部门和半公营部门能掌握的资源集中起来，为这项新的开发计划提供资金。这些机构是：利比亚殖民事务局、全国社会福利机构、意大利烟草公司。这一计划的内容包括为移民清理土地，提供水源，建遣农场房屋和有关设施，提供牲畜和设备等。作为报答，

[35] F. 马尔杰里（Malgeri），1970 年，第 17 页起以下诸页。
[36] M. M. 沙卡西（Sharkasi），1976 年，第 67-71 页。
[37] 同上，第 71 页。
[38] 同上，第 72 页。

移民以向这些机构交纳大部分农产品的方式支付开发费用，交纳的农产品折价计入他们的帐户。[39] 过一段时间后，移民可以拥有自己的农场。截至 1936 年，移民计划开支约 8 亿英镑，但再安置的意大利人只有 8.5 万人。[40]

工　业

意大利人没有在利比亚开办什么大工业，不过他们的确开办了一些小型工业，这些行业在意大利入侵前就已存在。在的黎波里建造了一座小型的金枪鱼加工厂，同时橄榄油加工厂的加工能力增至每年 2200 吨。[41] 盐业生产增长很快，年产量从 1927 年的 1.4 万吨增至 1937 年的 5 万吨。[42] 另外，的黎波里于 1923 年建立了第二家规模较大的烟草厂。还建立了两家制鞋厂，一家于 1923 年建于的黎波里，另一家于 1929 年建于班加西。食品加工厂和纺织厂仍在继续大量生产。当时在生产的其他工业还有建筑材料、沥青、火药、油脂和肥皂工厂。在本章叙述的时期内，一共有 789 家工厂，其中大多数位于的黎波里。意大利占领时期，当地手工业工场由于其具有特色和市场不大而得以继续存在。

发展基础设施

在意大利占领之前，利比亚的基础设施很不发达。为此，意大利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大量投资。它建造了公路、铁路、港口、现代化的通迅系统、水力工程和公用设施建筑等。1913 年至 1936 年期间，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额达 8.7 亿里拉。[43] 对基础设施投资 **446** 额如此之大的用意是发展经济以使意大利获益。其目的是为意大利人提供职业，为意大利产品得到潜在的市场。

但是，对于这笔巨额投资，利比亚人并非不曾付出代价。利比亚人口由于战争而减少了。为反抗意大利人的占领，许多人战死，还有一些人死于集中营。另外，大批人移居邻国。集中营中的幸存者过着近似奴隶般的日子，在监督下为修筑沿海公路和新的农业开发项目干活。意大利人的目的是把当地人赶到内地贫瘠的土地上去，并把意大利的多余人口重新安排在利比亚最肥沃地区定居。

意大利人还使利比亚的牲畜数目减少。许多年来，内地的利比亚人以羊和骆驼为食物、原料来源和运输工具。但意大利人宰杀和没收了大量牲畜。留下来的牲畜由于被逐出牧地、赶到集中营附近的荒凉地带又饿死不少。表 17.1 表明牲畜数在意大利占领时期内急剧下降。

意大利人直到 1932 年抵抗运动结束后才明白他们对利比亚的牲畜财富造成破坏的程度。虽然他们后来力图鼓励畜牧业，但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将牲畜财富恢复到原先水

---

[39] J. 林德伯格（Lindberg），1952 年，第 11 页。

[40] M. M. 沙卡西，1976 年，第 72 页。

[41] 同上，第 33-34 页。

[42] 同上。

[43] J. 林德伯格，1976 年，第 46 页。

表 17.1 利比亚的牲畜数，1926 年和 1933 年[44]

年份	绵羊	山羊	牛	骆驼	马	驴和骡
1926 年	800,000	70,000	10,000	75,000	14,000	9000
1933 年	98,000	25,000	8,700	2,000	10,000	5000

平。这主要是因为所造成的破坏削弱了经济基础，使当地人沦为赤贫，同时降低了他们自我挽救的能力。

最后，更为糟糕的是，意大利人未对利比亚人进行行政管理方面的培训，也未向他们提供足够的教育。正如K.福拉扬所指出，“1939 至 1940 年期间，意大利人（占总人口10%左右）的孩子有 81 所小学，而占人口 85%的利比亚人只有 97 所小学。”[45]此外，意大利人有 7 所中学，利比亚人只有 3 所。甚至在警察和军队中，利比亚人的晋升不能高于中士衔。只有很小数量的利比亚人于 1934 年后才获得相对重要的行政职务。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利比亚的经济发展在此后许多年中都受到影响。

447

埃 及

穆罕默德·阿里 1840 年的战败标志着埃及现代经济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他的思想体系主张在国家控制和占有下同时发展农业和工业部门，他的一系列方案使该国走上了通向出口型经济的道路。[46] 1850 至 1920 年期间，他倡导的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以促进棉花的种植和出口为目的，从而把埃及转变为高度专业化的单一作物经济。20 世纪 20 年代，埃及出现了工业化趋势，主要是生产替代进口货的产品。在本章论述的时期内有两种占主要地位的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农业上集中种植出口作物，尤其是棉花；另一种是工业化的趋势。为适应这两种趋势，进行了一些结构改革。本节将探讨导致产生这两种趋势的种种因素。

出口型经济

基础设施的发展

在本章讨论的这段时期内，埃及基础设施的发展规模惊人。但是，这种发展集中在与棉花和棉花出口有关的活动上。一些重大的水利灌溉项目上了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阿斯旺水坝于 1902 年竣工，1907 至 1910 年期间又加以增高。三角洲堰坝进行了加固并投入使用，济夫塔、艾斯尤特和伊斯纳水坝情况也同样如此。在伊斯梅尔统治时期(1863

[44] J. A. 阿伦（Allan），K. S. 麦克拉克伦（McLachland）和E.T.彭罗斯（Perose）编，1973 年，第 52 页。

[45] K. 福拉扬(Folayan)，1974 年，第 7 页。

[46] C. 伊萨维（Issawi），1963 年，第 24 页。

448



图片 17.1　1937 年时的阿斯旺水坝(埃及)

年至 1879 年）挖掘了约 13,500 公里长的水道。这样，耕地面积由 1881 年的 476 万费丹增加到 1911 年的 566 万费丹。由于扩大了终年不断的灌溉系统，可以种植一茬以上的作物。因此，种植面积增至 1911 年的 771 万费丹。㊼ 大部分新增面积用于种植棉花，这不仅由于棉花比其他作物更赚钱，而且也由于英国对此给予鼓励，因为棉花既是经济作物，可使埃及有能力偿还他务，也是兰开夏急需的原料。换言之，英国希望，并成功地把埃及作为为其国内纺织业提供原料的产地。㊽ 棉花产量从 1879 年的 312 万坎塔增至 1913 年的 766 万坎塔，即在 24 年的时间内增加了 140%。㊾

由于要运输棉花，需要扩大运输和交通网。人们在这方面费了很大气力（见插图 17.8）。连接三角洲所有主要城市的铁路和开罗至上埃及的铁路相继竣工。第一条铁路在 1853 年通车，1877 年时，标准轨距铁路共长 1519 公里。在英国占领时期，这类铁路的长度增加了一倍多，到 1909 年达到 3200 公里。此外，还有 1600 公里长的狭轨铁路。亚历山大的港口设施进行了更新并不新扩充。1869 年开始通航的苏伊士运河边上又建立起苏伊士城的新港和塞得港。这些建设项目大大促进了农业部门的改造，把自给自足型农业改造成为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业。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英国当局对经济带来的主要影响大都反映在灌溉和运他领域。改建几座拦水坝和建造阿斯旺大坝保证埃及得到常年不断的灌溉，扩大了作物种植总面积。然而，必须记住英国人正在为满足其棉花需求开发其他可供选择的途径。美国内战前，英国纺织业的棉花供应完全依靠美国，而此时英国不再如此，它在寻求别的棉花来源。与印度、巴西等其他可能的棉花供应国相比，埃及略占优势。换言之，英国主要关注的是确保其纺织业有棉定的原料来源。因此，政府基本建设开支大部分用于促进出口经济部门，就不足为奇了。有人提出，尽管埃及财政困难，但为增加财政政入以支付其外债，必须对水利灌溉网投入大笔资金。受益于这类公用设施投资的作物主要是棉花。其他受益部门也都与出口需求有关。

自由贸易政策

成为本章研究时期特色的根本性变化之一，是政府信奉自由贸易政策。这与穆罕默德·阿里的做法迥然不同。穆罕默他·阿里把政府干预当作促进发展的必要措施。克罗默勋爵是一位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在埃及任英国财政顾问和高级英国官员达 24 年。他反对通过征收关税来保护幼小的新工业。他对埃及各纺织品公司所持的否定态度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提出，“在埃及鼓励一个受保护的棉织工业的发展，对英国和埃及双方的利益都有害无益。”㊿

不管怎么说，埃及政府受到种种国际贸易协定的约束，即便它想保护幼小的新工业也做不到。根据 1838 年英-土条约规定，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地方，外国商人可按 8%或

㊼ C. 伊萨维，1954 年，第 34 页。1 费丹＝0.56 公顷。

㊽ 同上，第 35 页。

㊾ 1 坎塔棉花＝45 公斤。

㊿ C. 伊萨维的引语，1954 年，第 37 页。

更低些的价格统一税做买卖。[51] 这一条约为自由贸易打开奥斯曼帝国的大门，外国商品纷纷涌入没有保护的埃及市场。有人认为，这项条约"在一个多世纪里阻止这个国家作任何工业化的新尝试"。[52] 1930 年 2 月 16 日，条约期满，埃及重新获得了财政自主权。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这使埃及能够改变关税体制，以保护正在崛起的国内工业。这一关税改革使埃及进入替代进口品工业发展的阶段。

投资模式

盛行于这一时期的投资模式有利于农业。1880 年至 1914 年期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与其他国家相比，这可算高投资比例。然而大部分投资都投向了农业和城市建筑业，而投入工业的资金未超过固定资本形成总值的 2.3%。大多数作者用相对利润率来解释资本积累的这种结构，认为农业投资比工业投资利润大风险小。但是，R. 马布罗和S. 拉德温认为，用其他一些因素，主要是政府政策的因素，可对此作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53]

埃及投资者更喜欢投资在土地和不动产上，而对工业项目投资不那么感兴趣，因为土地拥有者的社会声望更高些。由于"农业资产阶级"处于社会等级的最高层，因此成为该阶级的一分子还可享有某些特权。因而农田向大土地拥有者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897 年，大土地拥有者（拥有 50 费丹以上）的人数占土地拥有者总数的 15%，他们占有农田总而积的 44%。1913 年，大土地拥有者占土地拥有者总数不到 1%，但却占有 44.2%的农田。因此在同一时期内，大庄园的平均规模由 183 费丹增至 193 费丹。[54] 上述情况的出现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土地拥有者的投资集中投在土地上，造成投资模式的偏颇。除此之外，外国人享受着治外法权条款规定的财政和司法豁免权，使他们在工业投资方面处于优于埃及竞争对手的位置。但是，人们对没有保护的埃及市场进行投资的兴趣不大，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工业化一直被人忽视。

埃及当局还认为，为了增加本国的财政收入和使埃及有能力偿付外债，必须鼓励棉花生产和出口。自 1858 年开始积累起来的巨额国债花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一些君主的奢侈生活上。1880 年的债务清理法确定埃及的国债额为 9837 万英镑。在这以后的 20 年中，又借了 1820 万英镑。到 1914 年，埃及每年应偿还的外债额达 850 万埃镑。[55] 争取外贸顺差对偿还这些债务来说至关重要。 451

美国的内战刺激了埃及的棉花生产和出口。棉产量从 1860 年的 50 万坎塔多一点增至 1865 年的 210 万坎塔，1890 年为 410 万坎塔，1913 年达 770 万坎塔。然而，棉价在美国内战的刺激下急剧上涨一段时间后，便开始连续下跌，直至上个世纪末，而产量的增加不足以抵销棉价的下跌。在本世纪头 10 年中，棉价涨了一倍多，棉花的产值比占领

[51] D. C. 米德（Mead），1967 年，第 15 页。
[52] R. 马布罗（Mabro）和 S. 拉德温（Radwan），1976 年，第 18 页。
[53] 同上，第 21 页。
[54] 同上，第 25 页。
[55] C. 伊萨维，1963 年，第 27 页。

初期增加了2倍多。1916年，每坎塔棉花售价增至38美元，1919年又增至90美元。出口额激增至1920年的8800万埃镑，使外贸盈余有很大积累。[56]

英国当局在财政方面的成就是，确保恰当地收集和管理政府由于这笔盈余额而增加的财政收入。以削减开支为内容的财政改革铺开了，但被视为能产生补偿性收益的水利灌溉工程开支不在削减项目之内。来自出口的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偿清了占领时期的所有借款，到1913年时把伊斯梅尔时期的债务减少了1000万英镑左右。

取代进口货工业的发展阶段

毫无疑问，英国当局进行了许多有利于埃及经济的改革。其主要成就在于财政领域、水利灌溉工程以及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但是同样确实的是，英国当局对埃及工业化持敌视态度，而自由贸易政策导致埃及对棉花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英国当局采取了几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它们标志着注意力转向工业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萧条。大萧条造成国际上对包括棉花在内的原料需求量骤减。这种情况转过来又表现为埃及所有经济活动严重收缩。因此，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的呼声越来越响。另外，20年代后期埃及的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这种情况加重了要求不要单一重视棉花，而要把注意力转向其他项目的压力，虽然棉花仍是出口的大宗。这一时期内还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1919年的革命标志着埃及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巅峰，抱有关于埃及今后发展的新思想的民族企业家的出现也反映了这一点。另外，虽然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农业生产的增长与人口增长速度保持着同步，但是本世纪头25年中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农业总产量增长了30%，而人口却增长了近50%。[57]埃及的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的吸收能力，因此需要发展其他经济部门，以便提供就业途径和提高人均收入。最后，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货不足，建立了一些新兴工业，但是如果要确保它们能在不断加剧的外国竞争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则须给予它们保护。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埃及在1930年获得财政自主权之后，政府对为数众多的可能与本国产品进行竞争的消费品征收15%至20%的关税。在此之后的几十年中，关税保护措施扩展到所有带有竞争性的外国商品。这样，便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取代进口工业品为内容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有好几种指数表明工业的增长。第一种指数是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1937年，在雇用10人以上的制造业厂家中工作的约有15.5万人，而1916年还只有3万人。另一种指数是工业产量的增长。例如糖产量从1917年的7.9万吨增至1939年的15.9万吨；在同一时期，水泥产量由2.4万吨增至35.3万吨；机织棉布产量由1917年的720万平方米增至1939年的13,260万平方米。[58]第三种指数是1939年时当地生产的某些工业产品在满足当地需要时所达到的高比例。（见表17.2）

[56] C. 伊萨维，1963年，第31页。
[57] D. C. 米德，1967年，第16页。
[58] C. 伊萨维，1963年，第44页。

20 年代另一个重要情况是民族企业的崛起。1920 年开办了第一家完全由埃及人拥有和管理的银行——米斯尔银行。它为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发展开拓道路。该银行把私人资本从传统的投资途径中吸引过来。1940 年时米斯尔财团拥有 21 家附属公司。据估计，1922 至 1938 年期间在所有合股工业公司实收资本增长额中，米斯尔银行的股份占 45%。这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米斯尔银行大大推动了埃及的工业发展。这一期间里的投资情况表明，投入的当地资本越来越大。促使投资结构朝着工业项目方向变化的因素有：接二连三的棉花危机；外国人从事当地工业生产获得利润所表明的某些工业部门可能获得的高额利润；以及米斯尔银行及其所属各公司所创造的国内投资机会。 453

表 17.2 埃及，各项工业产品的当地生产数和当地需求量，1939 年[69]

商品	当地产量所满足的需求(%)	商品	当地产量所满足的需求(%)
糖	100	肥皂	90
烈性酒	100	家具	80
卷烟	100	火柴	80
盐	100	啤酒	65
面粉	99	植物油	60
棉纱	96	烧碱	50
鞋类	90	棉织品	40
水泥	90		

总之，在本章所涉及的这一时期内曾有数次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尝试。穆罕默德·阿里打算在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推行工业化计划遭受失败后，经济朝着专门从事一种出口作物生产的方向发展。在鼓励扩大可耕地和棉花出口的英国占领时期，这种趋势更形加强。赞成这一趋势的人提出了三个主要论点。第一、自由贸易和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实行专业化生产会提高福利水平；第二、需要财政收入来偿付所积累的国债；第三、种种国际条约限制了埃及为新建工业提供保护的能力。结果便形成了一种出口型经济。另一方面，20 世纪头 30 年的特点是，经济结构朝着工业化方向改变。这是由于几方面因素促成的，即农业连年危机造成埃及贸易条件恶化，民族企业的崛起，重新获得财政自主权，以及政府对工业的政策和态度的改变。因此工业在本章叙述时期将结束时发展很快。

苏　丹

如本书上文所述，苏丹在上个世纪的最后 25 年中出现了高涨的宗教运动，触发了一场反对土耳其-埃及统治的暴动，最终导致马赫迪国家（1881 至 1898 年）的建立。大约在同一时期，埃及被英国占领，不久，苏丹又重新被英国占领。接着，苏丹被置于英-埃的统治下。本节的第一部分将简要地论述马赫迪国家的局势，第二部分则突出叙述英-埃统治时期的重大事件。 454

[69] M. M. 卡马什（el-Kammash），1968 年，第 41 页。

马赫迪国家（1881至1898年）

马赫迪国家建立了与众不同类型的政府和司法体制。马赫迪政府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制定一种基于伊斯兰教义的简单而又实用的税收制度。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天课”。它对货币按2.5%、对牲畜和粮食按10%征税。由于这一税收制度简便，对社会环境适应力强，甚至在马赫迪政权垮台后仍继续实行。马赫迪政府鼓励农业和贸易，因为这两方面的活动都有利于支持军队并为它提供武器弹药。

然而，马赫迪国家是短命的。导致它垮台的有几个因素。首先，马赫迪于1885年去世后爆发的权力之争造成了马赫迪运动的内部斗争。其次，巩固对全国统治的进程中过度地耗费了国家的资源。另外，这一新生国家不得不在边界上与好几个欧洲殖民主义列强进行斗争。[60] 马赫迪国家企图向北方的埃及扩张，然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行动，因为它促使当时在埃及的英国人占领了苏丹。

英-埃统治

英-埃征服苏丹，结束了马赫迪主义者统治下短短的民族独立时期。但是幸运的是，殖民当局没有采取高压手段。英国在苏丹的殖民政策较为温和，并为发展该国的经济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努力。英国当局在苏丹的主要功绩是：发展了基础设施和实行了现代化的农业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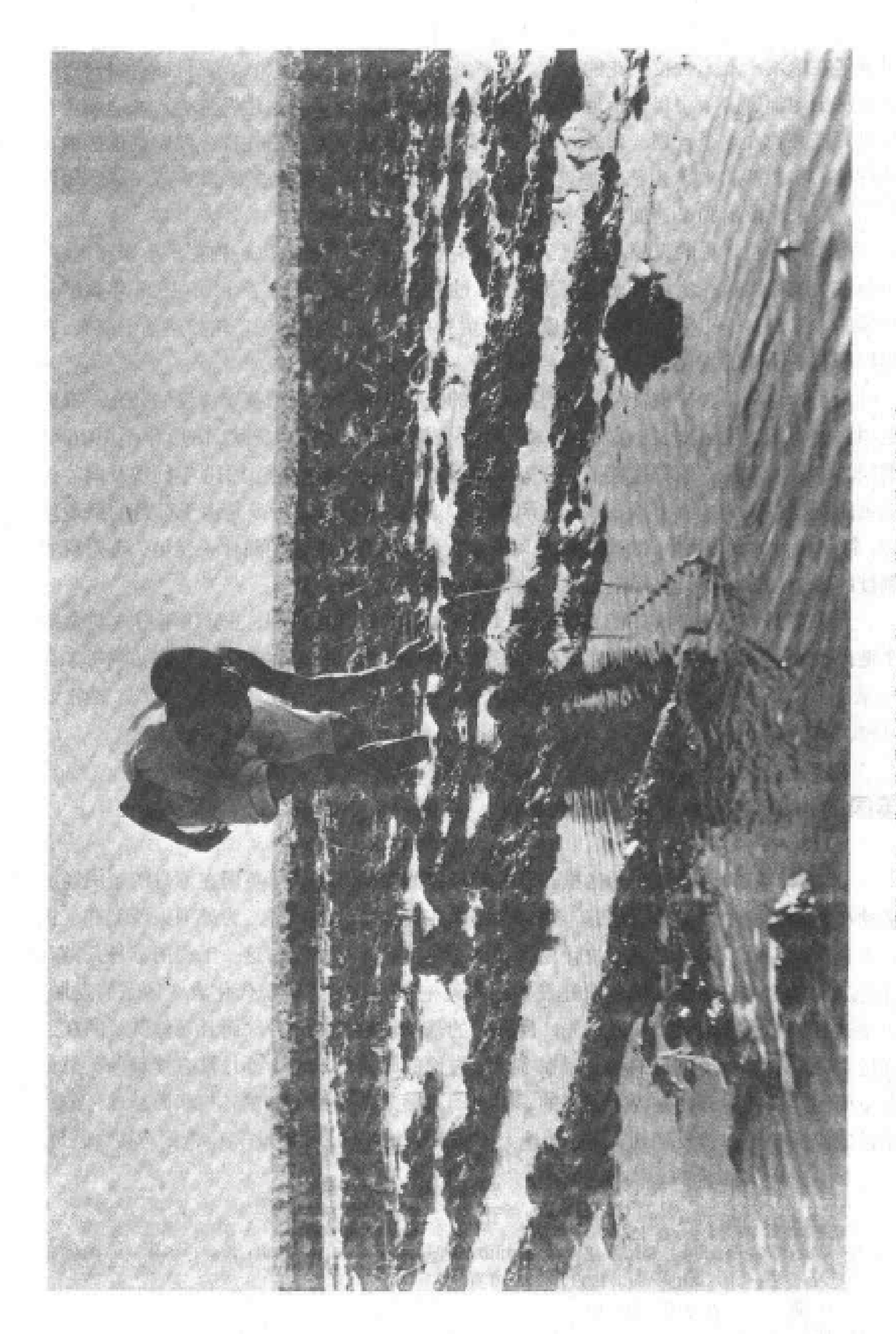
基础设施的发展

在英国对苏丹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英国人修建了铁路、港口、水坝，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见插图17.8）。第一条铁路建于1896至1898年期间，它是为战争使用的。455 后来这条铁路延伸到阿特巴拉并为从苏丹北部经埃及至地中海的交通运输服务。1906年苏丹港建成时，又修建了一条将苏丹港与阿特巴拉相接连的铁路。接着于1910年这条主干线又延伸至森纳尔。1924年再修建另一条贾齐拉至红海的铁路。同时开办的一些蒸汽轮船运输把该国的南部和北部相连接。这些现代化的和效率高的交通运输工具促进了农产品的运输并大大降低了运输费。英国当局还支持发展教育制度。除此之外，为改善水土资源的利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了灌溉，建造了一些扬水站并挖了几条运河。

农业的发展

从一开始起，英国人就认识到苏丹巨大的农业潜力。他们开始进行棉花种植试验，打算将此作为埃及棉花生产的补充。1905年宰达卜的最初试验结果很有希望，试验便扩展到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之间的贾齐拉平原，该平原土质肥沃程度为苏丹之首。于是便

[60] P. M. 霍尔特(Holt)，1970年，第204页起随后几页。



图片 17.2　苏丹的贾齐拉灌溉工程——在棉田里劳动的农民

制定了一项开发贾齐拉平原的雄心勃勃的灌溉工程。苏丹种植园辛迪加这一私人康采恩得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种植棉花的特许。这一安排要求政府、辛迪加和苏丹佃农进行合作。政府从土地拥有者手中租借土地，并为水网化和扬水站提供基本建设资金。辛迪加负责少量开支并管理这个计划，此外，它还为棉花的运输和销售作出安排。佃农则承担棉花的种植。销售所得收入由三方按以下比例分配：佃农得40%，政府得35%，辛迪加得25%。后来，政府和辛迪加所得比例改变为38%和22%。[61]

按照贾齐拉工程的设想，要把20万公顷土地变为水浇地，以种棉花、小米和饲料。但是这项工程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耽搁。不过，1919年重新修订了计划，1925年森纳尔水坝的竣工使这一工程受到世人的瞩目。[62]贾齐拉工程的成功促进了诸如运输、灌溉、轧棉厂等有关活动的发展。

为了为这项工程提供资金，当时所实行的税收制度得到一项英埃协议的补充，根据这项协议，埃及将为苏丹的开发项目和预算平衡提供财政援助和贷款。1899年至1916年期间，埃及为苏丹的预算提供了280万埃镑的援助，而1900年至1910年间埃及向苏丹提供的贷款总额为540万埃镑。[63]其所以要求埃及给予赠款和贷款是由于苏丹的赋税较轻。每一费丹的土地税在10至100皮阿斯特之间。在英国占领期间什一税仍为苏丹税收制度的一个部分。对贸易及不同类型的工业也征收其他赋税[64]

457

为了促进对土地的利用，四分之一的耕地两年后开始征税，8至10年后才对全部土地征税。其余的税收，包括家畜税则按部族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征收。人头税每人在25至80皮阿斯特之间。1912年开始征收财产税。此外，还按船只的载重量征收船只税。

英国的殖民经济活动对苏丹的影响

与法国及意大利分别在马格里布及的黎波里的活动相比较，英国在苏丹的殖民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赞扬的。土地并不像在其他殖民地那样，为外国人所剥夺，也并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贾齐拉计划也被证明对英国和直接参与这一工程的苏丹人都有好处。现代化运输体系加上港口建设和灌溉设施都有助于苏丹现代化农业体系的发展。但是这种情况也有其消极而。首先，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极不充分，而且显然其目的在于促进英国的利益多于苏丹的利益。在本章所讨论的时间内，整个苏丹没有建筑一英里公路。而所建铁路，开始是为了英国的军事行动，后来则是为了在贾齐拉和西部地区分别推进他们的棉花和橡胶计划。和其他绝大多数殖民地一样，工业化完全遭到忽视。但是，

---

[61] W. N. 阿伦（Allan）和R. J. 史密斯（Smith），见J. D. 托西尔（Tothill）编，1948年，第608-609页。又见A. 盖茨克尔（Gaitskell），1959年，第70页。

[62] A. 盖茨克尔，1959年，第94页。

[63] 同上，第35页。

[64] H. A. 滕里（Tunley），见J. D. 托西尔编，1948年。

对英国在苏丹的殖民统治的最大指控则是从经济上、社会上完全忽视了苏丹的南部。这种忽视无疑是造成苏丹南部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苏丹南部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

(张志军译)

18 殖民统治的社会影响：人口方面

J. C. 考德威尔

458 19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年是非洲人口情况的分水岭。这一时期开始时，非洲人口仍很稀少，至少按旧世界的标准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它看来增长不快，并显然易受越来越多的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的影响。到了1935年前后，由于死亡率越来越得到控制，人口无疑地在增加，为其后1/3世纪间人口增长一倍奠定了基础，这差不多肯定地促进并巩固了独立。

许多指标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年代之间发生的变化，有些指标有助于说明人口情况的变迁。在1880年，沿海地区以外有欧洲人存在的内地主要限于阿尔及利亚和南非。在前者，主要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马耳他的30多万移民巩固了法国军队的胜利；在后者，人数类似的欧洲人（主要是荷兰和英国血统）这时其先锋向北远达林波波河（参看插图1·1）。其他地方，欧洲人正开始对埃及和突尼斯实行控制；在塞内加尔和黄金海岸（现今加纳），他们统治了某些沿海居民；他们还持有一些飞地，如冈比亚、塞拉利昂、拉各斯、利伯维尔以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一些地方。到1935年，欧洲人的行政当局控制了差不多整个大陆（参看插图12．1）。在这半个世纪里，欧洲医学有了长足进步，由对于大部分非洲主要疾病的原因毫无所知进而有能力对大部分疾病加以遏制或治疗；的确，到这个时期结束时正是磺胺制剂为这个大陆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化学治疗时代。这半个世纪还经历了差不多整个铁路建设时期，它也是从一个几乎所有陆地运输都靠人力搬运的时代过渡到一个卡车成倍地增加、奔驰在日益扩大的尘土飞扬或泥泞难行的公路网上的时代。

人口增长情况

459 人口学家满有把握地发表过各种非洲人口变化表格①，而事实真相是，关于19世纪的人口数字，我们最可靠的知识乃是借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项人口普查，从之追溯而得出来的。假使这些调查声称非洲人数是现在说的两倍，我们大概也要把本世纪以前的各国人口估计数字向上调整差不多同样幅度。

① 参看联合国，1973年，表II之4，第21页。

常被引用的19世纪人口估计是W.F.威尔科克斯和A.M.卡尔-桑德斯的数字，近年又增加了J. D 杜兰德的数字。② 头两家的数字实际上毫无根据，其所以获得承认几乎完全由于反复出现和由于显然因彼此关系密切而造成的势力。

事实上威尔科克斯只是重述一位17世纪的意大利作家B. 里乔利的估计数字。③ 他作此决定的理由是：这个作家是一位"有学问的耶稣会神父"，他"总结了当时的知识"。威尔科克斯还假定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之间非洲人口没有增长。④ 其实更多地影响里乔利的是数字的神秘性而不是扎扎实实的人口统计证据。他估计的全球人口为10亿人，他把这10亿人按亿数分配到各个大陆。为了考虑到非洲确然不是无人居住的情况，同时允许亚洲人口有一个非常大的估计数字，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好给非洲摊上1亿居民。威尔科克斯解释自己利用这些估计数字的理由时声称：非洲那些在1931年未闻人口密度有迅速增长的地方——即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北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冈比亚、南非和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除外的地方——其人口密度与里乔利为整个大陆所定的数字相同。⑤ 可是这种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威尔科克斯使那些当时人口情况极不清楚的国家原封不动，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的人口没有变动，没有什么理由说明何以它们过去的密度就该同排除在外的各国相同。威尔科克斯争辩说，直到晚近时期没有证据表明非洲人口有增长，他主观地继续以1亿作为截至1850年的非洲人口估计数字。

卡尔-桑德斯的估计数字实际不是另成系统，而仅是对威尔科克斯估计数字的注释。它们较少关心最主要的估计数字，而是趋向于关心那些本来可以不必重视的次地区的数字。因此，他接受了如下说法，认为：就其1650年人口估计数字而言，威尔科克斯大概是对的，1650年仅仅是在他那时代和非洲大陆广泛进行人口普查以前三百年。但是他说，未曾考虑到的是，奴隶制度造成的破坏很可能引起1880年以前人口数减少，然而随后由于北非人口的较快增长，这种人口减少已被抵消而有余。⑥ 他于是得出结论说，到1800年必然达到9000万人的低水平，随后在整个19世纪过程中人口增长了1/3。⑦ 460

在19世纪的全部或一部分时间里非洲人口下降的说法流传颇广，但说得有根有据的却比较罕见。有位观察家认为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两种情况：欧洲人不熟悉稀疏的农耕居民群体，因而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见到的是人口减少的地区；而博爱主义者则希望相信，在主要由他们自己人造成一个时期的毁灭性混乱之后，他们带来了帮助。⑧ 另一位观察家则认为，对人口的过高估计数字是产生于欧洲列强大规模向前推进的时候，为的是

② W. F. 威尔科克斯(Willcox)，1931年；A. M. 卡尔-桑德斯(Carr-Saunders)，1936年，第17-45页；J. D. 杜兰德(Durand)，1967年，第136-159页。

③ B. 里乔利(Riccioli)，1661年，1672年，第630-634页。

④ W. F. 威尔科克斯，1931年，第45页。

⑤ 同上，第53-54页。

⑥ A. M. 卡尔-桑德斯，1936年，第34-35页。

⑦ 同上，第42页。

⑧ R. R. 库津斯基(Kuczynski)，1948-1953年，第II卷，第120页。

鼓励人们对参加这种行动的各家欧洲公司进行投资。[9] 想从H.M.斯坦利之流探险家的记载中推算出巨大的人口肯定是很方便的，一方面因为这些探险家往往选取最高数字，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往往沿着河流或道路行进，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人口密度异常高的地区。

杜兰德的人口系列数字显然是个重大变化。对非洲的大部分人口，即位于撒哈拉以南的人口，他做了追溯性的估计，据认为是使用了联合国关于 1920 年的数字。[10] 但是，由于他后来在得出自己的中等估计数字时置 1920 年数字于不顾，认为它意味着由当时数字至 1950 年的联合国数字（那是他接受的）所估算出来的人口增长率（每年 1.5%）太高了，不大可能，于是这些逆向推测的数字其实际依据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各项人口普查。即使如此，杜兰德也没有说出否定联合国 1920-1950 年数字所隐含的人口增长率的理由，因此人们仍然有怀疑，里乔利的影响通过威尔科克斯和卡尔-桑德尔传递下来继续占着统治地位。他看来力图为自己的方法作合理的解释，得出结论说："当加进北非的估计数字时，这个［中等估计数字］大致同威尔科克斯的推测数字一致，即这个时期（1750-1850 年）全非人口稳定在大约 1 亿人的水平。[11] 杜兰德关于北非的估计数字所依据的是 19 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头几十年这个期间对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人口增长的研究，[12] 而他的中等估计数字则准备以 1.25%为这个地区 1850-1920 年间的年增长率。

461

更说明问题的是杜兰德的低估计数字和高估计数字。例如，对 1850 年他的数字分别定为 8100 万人和 1.45 亿人，于是得出的误差限度约为上下 30%。关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类似估计数字所得误差限度在 10%之内，而关于欧洲的估计数字误差限度为 4%之内。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字其所以不可靠，部分理由是缺少文字记载。以下事实说明数字完全可能不可靠：在本篇写作时，关于尼日利亚的人口争论，争执的数字相差达 2000 万人；而类似埃塞俄比亚这样的人口大国其人口数量更是有极大的不可靠性。

显然，没有人晓得本章所包括的时期中非洲人口究竟是多少，特别是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似乎没有人准备把 1880 年的数字估计为 1 亿人以下或 1.5 亿人以上；到 1900 年，低估计数字与高估计数字距离接近起来，大概在 1.15 亿人与 1.55 亿人之间；而现今更加清楚的是，到 1935 年已超过 1.5 亿人大关。这个时期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没有真正清点过人口，而某些人口普查则简直名不副实。北尼日利亚的 1911 年人口普查只用一张纸头送往伦敦。[13] R.R.库津斯基花费多年从事三巨册[14] 总数大致有 2500 页的写作，极为细致地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关英国在非洲的全部殖民地及其两个托管地的人口资料。对这位人口学家来说，研究世界的古香古色事物有引人入胜之处，但是如果以为它对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的人口水平或趋势起多么重要的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

可是，根据近年的论据对非洲人口的特点作某些阐述，并进而考察那些形成非洲人

---

⑨ J. 絮雷-卡纳尔(Suret-Canale)，1971 年，第 37 页。

⑩ J. D. 杜兰德，1967 年，第 152-153 页。

⑪ 同上，第 153 页。

⑫ 特别是C. V. 凯泽(Kiser)，1944 年，第 383-408 页；L. 薛瓦利埃(Chevalier)，1947 年。

⑬ C. K. 米克(Meek)，1925 年，第 169 页。

⑭ R. R. 库津斯基，1948-1953 年；1939 年。

口特点的各种力量，还是可能的，而且几乎肯定地是有益的。

人口从近于稳定呈现为易受冲击的状态

除了非同寻常的时期（诸如目前科学技术革命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口增长率必然相对较低，而平均死亡率必然大致等于平均出生率。这是由于人口指数增长的特点所形成。指数增长使得看来很低的增长率经过一段持续时间会生出巨额的人口。低至每年 0.5%的增长率（出生率仅高于死亡率 5‰）经过一千年会增加为 15 倍。即使非洲人口在 1900 年高达 1.5 亿，也完全不见得这个大陆在一千年以前人口会超过 1000 万。 462

因此，可以假定现代以前时期的死亡率比出生率少 5‰以内。应当注意的是，这是经过非常长的时期的平均数字。整个大陆在过去一千年中人口可能有摆动变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有许多个别的社会经历过灾难性的人口下降随后又回升起来。然而如果说 19 世纪初以前在北非或 19 世纪末以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回升会达到每年比 1%高很多的自然增长率，那就太令人难以设想了。这里所说的是平均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证据（大部分来自近代时期以前的欧洲）表明，在大多数年份里出生数字总是超过死亡数字；在较少的几年由于疫病、饥荒和战争造成死亡率高得可怕的时候，则死亡数字赶了上来。

因此，如果非洲的出生率水平保持相当稳定的话，那么通过考察近来的出生率结构就可以对过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有所了解。从本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非洲大规模人口调查次数之多超过世界任何别的地方。⑮ 这些数据资料是不容易解释的，主要因为非洲各地居民在文化上还不习惯于把人口学家所需要的那种资料（特别是确切的年龄）看作是重要的或认为是可以定量表示的。可是，恰是这些困难产生了新的分析方法（就非洲数据资料的挑战引起人口统计学方法的革命而言），提供了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资料。⑯

揭示出来的模式多种多样，超过了对长期人口稳定性的理论探讨本来使人预期的程度（数据资料的缺点很足以说明这种多样性的某些情形）。然而，很清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居民中，妇女在其生育寿命中平均生 6.5-8 胎，总出生率接近 50‰甚至更高。例外的是非洲中部 50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一个长方形地带，包括加蓬、喀麦隆、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扎伊尔北部的大片地方。在这里，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胎数显然不超过 6 胎，有些地方则降至 4 胎以下，整个地区的总出生率在被调查的儿童出生时（本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肯定在40‰以下。对这些数字的解释（即使不算是原 463

---

⑮ 例如，W. G. 邓肯(Duncan)，1973 年著作所载各个出生率调查表中可以看到非洲占有突出地位。

⑯ 这种方法论的记述见W. 布拉斯(Brass)等人，1968 年，第 108-142 页所载W.布拉斯和A. J. 科尔(Coale)合著文；A. J. 科尔和P. 德梅尼(Demeny)，1967 年。后来的研究结果和解释见W. 布拉斯等人，1968 年，所载A. J. 科尔和F. 洛里默(Lorimer)文；又见W.布拉斯等人，1968 年，所载A. J. 科尔和E. 范德瓦勒(van de Walle)文；H. J. 佩奇(Page)和A. J. 科尔文，见S. H. 奥明德(Ominde)和C. N. 埃吉奥古(Ejiogu)合编，1972 年；又见H. J. 佩奇文，载J. C. 考德威尔(Caldwell)主编，1975 年。

因），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很多妇女根本没有孩子——有些地方这个数字高达2/5。

如果我们的注意力限于低生育率区以外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通过使用稳定人口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时期以前的撒哈拉以南各国人口作某些虽无把握却也不会太大出格的推测。⑰但是首先应提一下两个成问题的问题。一个是出生率，它极其不可能曾经高于目前的水平。它也许是一直不变的，如黄金海岸和加纳的人口普查在50年间所记录的年龄结构的资料所提示的那样。⑱另一方面，卫生条件日益改善，可能减少了不育症和生育力低下症，至少是像肯尼亚和毛里求斯的情形所提示的那样。⑲果然如此，那么近代时期以前的生育率就不大可能低于目前所见的90%，更不可能是在80%以下了。另一问题是人口很可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几世纪以来平均有高达0.5%的增长率（其原因后文将有论述）。完全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社会，妇女平均生育5.5-7胎，出生率达42-50‰，而出生平均寿命为20至30岁，死亡率为38-50‰，婴儿死亡率则为每千胎死亡数250至375。一个中等的假设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妇女平均很少生育多于6胎；人口增长平均为0.33%；出生平均寿命约为22.5岁（约为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水平）；⑳总出生率约为48‰，总死亡率约为45‰，婴儿死亡率约为300-350‰。靠着文化和宗教维持的热带非洲各地的高出生率，无疑是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一个疾病最为猖獗的地区的高死亡率所引起的反应。

这种局面丝毫不足为奇。在非洲大陆的偏僻地方，卫生条件的这种状况一直逡巡徘徊，差不多进入我们这个时代。50年代末在马里的调查和60年代初在上沃尔特的调查所464 得的经过校正的数字表明，总死亡率接近40‰，而婴儿死亡率接近于，甚至超过300‰。㉑可是，如果现在所称中部非洲低生育率区的出生率假设是从过去一直保持下来的水平，那么上述局面就同这个地区的低生育率持久不变的情况相矛盾。假设死亡率水平有如上述（鉴于事实上西海岸赤道地带林区的卫生条件大概长期以来比别处更坏，这是一个保守的假设），可以得出结论：在过去若干世纪中，那些平均每个妇女生5胎的地区经历的人口下降平均在每年0.5%以上，而那些平均生3.5胎的地区，平均下降每年超过1.5%。不可想象会是长时期如此；后一种下降率的人口将是每40年减少一半，而两种情况都表明，在与欧洲人接触的早期，人口比一向所认为的要多得多。不可避免的结论是：生育率在这个地区是在较近时期才下降了，大概是在本章所述的时期内。

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可能影响长期人口变化的各种力量，以及可能曾在上个世纪

⑰ 所用的数表是A. J. 科尔和P. 德梅尼，1966年第220-435页所载的“北部”组。

⑱ J. C. 考德威尔、见W. 伯明翰(Birmingham), I. W. 诺伊施塔特(Neustadt)和E. N. 奥马博埃(Omaboe)合编，1967年，第94页。

⑲ 毛里求斯的出生率，在整个世纪平均低于40‰，从1943年的33‰上升至1950年的50‰，是抗疟运动期间和运动刚刚过后时期出现的最大的增长；威廉·布拉斯认为肯尼亚的出生率在50年代上升了（个人通讯）；而D. J. 范德卡（van de Kaa)认为新几内亚的当代出生率在上升，其卫生和社会变化的状况同非洲一些地方所见到的相似(D. J. 范德卡，1971年)。

⑳ L. I. 达布林(Dublin), A. J. 洛特卡(Lotka）和M. 施皮格尔曼(Spiegelman), 1936年，第42页。

㉑ P. 坎特雷尔(Cantrelle), 见J. C. 考德威尔主编，1975年，第102页。

内产生引人注目的短期影响的各种力量。通常人们假定，在传统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主要限制在于食物的多寡。然而，E.博塞鲁普则提出：临界的人口密度不会导致马尔萨斯所说的情况，而是导致种植方法的变革。他说："（直到近代）在前工业化社会中看到的人口的低增长率，不能解释为是由于人口过多食物供应不足的结果，在解释人口趋向时我们必须为其他因素留有余地……医药的、生物的、政治的等等因素。"㉒非洲的过去可能较此远为复杂，最后的界限可能是粮食资源的界限，虽然不常发挥作用。可供农耕的土地是那些未被其他用途占用的土地；例如，诸交战王国之间濒于荒废的土地被当作无主土地选择使用。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土地似乎很少随时都在使用，或是由于刀耕火种或热带草原轮作方法意味着在任何既定时间里，大部分土地处于休耕，或是由于猎人和食物采集者需要有巨大的土地面积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只是偶尔才出现极端饥荒的状况——由旱灾或蝗灾引起，或由于战争或疫病所造成的混乱引起。危机通常是突如其来，不容人们大量地临时进入休耕地；㉓实际上，土地的负担能力达到了极限，结果造成巨大的死亡率，在数十年间人口数目跌降。粮食生产制度的能力所受到的压力通常（但非总是如此）过于短暂和突然，不足以引起博塞鲁普所说的随后在土地使用方法方面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可能发生在人口数目持续地逼迫着耕作制度的粮食生产能力的时候，其情况或是死亡率的高峰已由于卫生措施或其他行动而有所下降，或是这些高峰由于运气或地理条件而有所缓和。危机之后的几十年人口停留在大大低于它们对粮食供应构成严重压力的水平；㉔人口在增长，但是速度不大，因为它们仍受各种可怕疾病的摧残。当人口减少了的时候，增长率可能有所上升，因为传染病的传染机会暂时减少了。㉕但这远不是肯定的情形，因为灾难也许已造成社会如此混乱（例如孤儿数目增加），以至于往往提高了由于其他原因的死亡率。

465

1880年以前和以后决定人口变化的各种冲击力量

对人口平衡的最明显的冲击力量是奴隶贸易。虽然本章所论述的时期开始时正是大西洋奴隶贸易已濒临灭绝的时候，谈谈这个贸易的规模及其持久的影响还是很必要的。

某些数字惯常为人们所接受，用来衡量热带非洲人被运往新大陆的数量，其来历同非洲人口估计数字起源于里乔利的情况非常相似。柯廷指出，所有现代历史学家几乎都是间接引用库津斯基的估计数字，库津斯基则是袭用W.E.B.杜波依斯的估计数字，而杜波依斯的来源是爱德华·邓巴的未经研究的揣测数字，邓巴是19世纪中叶一位支持墨西

㉒ E.博塞鲁普(Boserup)，1965年，第14页。

㉓ 这个论点，很大部分是根据对70年代初萨赫勒和埃塞俄比亚的旱灾所作的第一手调查，该调查在J.C.考德威尔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有报道。

㉔ 关于这种压力的讨论，参看W.阿伦(Allan)，1965年。

㉕ 这显然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北美移民中间的情况，同他们原来定居的社会中的情况形成对照。

哥政治事业的美国政论家。[26] 在未来的研究者对原始资料作出更为全面的调查以前，目前别无选择只有使用柯廷本人的估计数字。柯廷估计，总共有刚刚超过950万的奴隶到达新大陆，各个世纪所占的数字比例如下：15世纪——3.4万人(占总数0.4%)；16世纪——24.1万人（占2.5%)；17世纪——134.1万人（占14.0%)；18世纪——565.2万人（占59.1%)；19世纪——229.8万人（占24.0%)。[27] 这一规模巨大的人口迁徙，加上19世纪时渡过大西洋的数量极小的自由迁徙[28]，在南北美洲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至少有部分非洲人血统的人口，到撰写本书时为止其人数为被运往美洲的奴隶数目的许多倍，并且显然使非洲成为本大陆以外移民人口仅次于欧洲居第二位的大陆。这一事实的全部历史意义尚有待于探讨。

466

根据奴隶的输出额（首先按在南北美洲登陆的人数计算）可以算出移民率，受公认的条件限制，那就是不真正了解他们所来之处人口基数的大小。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使用杜兰德的中等估计数字和低估计数字[29]（使用后者是因为后面将说到，它比新的人口稳定不变的估计数字较接近于实际)。年代集中在四个时期（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年平均率按每千基本人口计算，中等估计所得的移民率在18世纪高至0.5，在19世纪初降至0.4，而同期的低估计数字高至0.9，却下降到0.6。这两个时期的撒哈拉以南数字，中等估计的移民率将为0.6和0.4，而低估计的数字则为1.1和0.6。然而大部分奴隶来自非洲大西洋沿岸范围颇窄的一些地区，主要来自塞内加尔至安哥拉一带，大部分来自距海岸500公里以内的出生地。假设这些地区当时拥有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1/3左右，以此可以得出所有四个时期的移民率，按中等估计数字计算为0.1，0.6，2.5和1.8，而按低估计数字计算则为0.2，0.8，3.1和1.9。这些数字还应加上贩卖奴隶过程中造成的额外死亡数字。大西洋航程中的损失数字大致是从头两个世纪的大概1/5分别降到18世纪的1/6左右和19世纪的1/10左右。[30] 在捕获奴隶及长途跋涉前往海岸时，在非洲境内肯定还有大量人口丧生。这种附加的死亡率，有的是无论如何总要发生的，因为，分析一下西非的奴隶来源就很清楚，当诸如富拉尼人在尼日利亚互相征伐之类的内部战争中产生大批难民和俘虏时，供出售的俘虏人数就大量增多。[31]

467

[26] P. D. 柯廷(Curtin)，1969年，第3 8页；这些估计数字的大部分中间来源是R. R. 库津斯基，1936年，第12页。

[27] 由P. D. 柯廷1969年，第116、119、216和234各页的表格得出的数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1978年1月31日至2月4日在海地太子港举行的非洲奴隶贸易问题专家讨论会上，对于被运往新世界的奴隶的确切人数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般认为，柯廷的数字偏低，正确的数字约在1500万人至3000万人之间。参看会议的最后公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考文献》CC-78/CONF. 601/7，巴黎，1978年7月17日，以及J. E. 伊尼科里(Inikori)：《奴隶贸易与大西洋国家经济，1451-1870年》，向会议提供的工作报告，CC-76/WS/22，巴黎，1976年10月1日。

[28] 例如，1841至1867年，有36100名非洲人被招募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参见G. W. 罗伯茨(Roberts)，1954年，第235页。

[29] 用J. D. 杜兰德的方法得出16世纪和17世纪的估计数字。

[30] P. D. 柯廷，1969年，第275-286页。

[31] 同上，第260页。

但是毫无疑问，沿海市场的存在必然增加反复无常的暴力事件，造成许多无法无天的行为和极为粗暴地执行习惯法的牺牲者。因此，按上述办法计算出来的数字恐怕至少在16世纪和17世纪要加上一半，在18世纪要加上1/3，而19世纪或许要加上1/5。

损失数字这样加大以后，即便是运用到低人口估计数字，所得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全非洲水平也分别不会超过1.3和0.7。这个数字将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平均相差一个点(也即每年自然增长率为0.1%)得到补偿。当范围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时，这些数字分别为1.4和0.8；而进一步范围缩小到这个人口数的1/3时，所得水平为4.2及2.9。后两个数字大有可能引起人口下降或使增长趋势停止（在没有其他重大变化促使人口统计的差额趋于增长的时候），因为现代以前社会的自然增长似乎很少曾在长时期中平均水平高达0.4%。人口出现某种下降的地区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自卡宾达至卢安达的沿海一带及其内陆地带。这一片海岸及其内陆，即使把现今安哥拉以及扎伊尔的很大部分乃至赞比亚的一些地方包括进来也不见得会有400万人以上，而提供的奴隶数字单是19世纪就大大超过100万人，这表明损失的比例（依照上面使用的公式计算）接近于每年1%，结果几乎肯定地造成人口下降，某些地区甚至造成人口灭绝，特别是在安哥拉。

那么，1880年时候持久的影响是什么呢？外运的奴隶此时微不足道了：还有那么几年，源自苏丹南部的奴隶循尼罗河而下，运到埃塞俄比亚、东非或者还有中东；而实际上直到1913年奴隶还继续自安哥拉运往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种植园。桑给巴尔(现在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奴隶贸易1873年以后实际停止了，而且从不曾有过大西洋贸易那么大的规模，尽管它或许形成了人们离开内陆的主要道路，特别是离开经由塔波拉向西的道路。在大陆内部仍然有家庭奴隶，这由1904年法属西非的报告可以证明，它表明几乎1/4的居民处于某种奴役状态，[32]但是这对人口的影响大概很轻微。到1880年，大西洋贸易虽有400年之久，而贩奴一半发生在大约1770年之后，先是美洲棉花繁荣引起的反应，然后又是来自巴西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引起的反应。 468

在这刚刚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那些被成功地运过大西洋的人加上那些在被捕获时或在随后的转运过程中死亡的人，大概有600万人，其中约450万可能是男人，约150万是女人。[33]这些人即使是在别的情形下可能活到1880年的比例也很小。1840年以后被运出的数目下降，至多只有25万人。但是，更大的损失来自妇女的转运。即使是按人口不增不减的净繁殖水平计算，150万妇女将产生300万成活的儿童(产生的人数等于她们自身加上配偶)，而小小的自然增长水平(每年0.3%)便可以使这个数字到1880年达到325万人，假定大部分奴隶是在这个时期的较早阶段捕获的。因此，总数损失400万人看来似是合理的估计。对于非洲或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整体来说这是很小的损失：也许分别为4%或5%，按每年0.5%的自然增长率等于8或10年的增长数。可是对于奴隶主要来源地区而言，情况就不大相同了。在这种地方，如果我们应用上面所用的同一假设（也即，这个地区有着撒哈拉以南人口的1/3)，则损失将达到15%或至少是一代人的增长数。

---

[32] J.絮雷·卡纳尔，1971年，第66页。

[33] 所用性别比例，从P.D.柯廷，1969年，第41页，脚注37得出。

这些计算包含有两个有争议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人口不受马尔萨斯极限的束缚，因为粮食供应由于有额外种植或主食发生变化可以增加。假使情形不是如此，那么人口通常将增长极少，但其增长速度在缓降以前将足以弥补贩卖奴隶所留下的损失，这就意味着奴隶贸易对于人口总数影响极小。另一方面，在考虑早期运走的那一半奴隶，即考虑在1770年以前三个世纪中被掠走的奴隶时，又假定确实存在某种马尔萨斯的限制。如果这种假设没有充分根据（并且如果奴隶商品的性别比例在几个世纪中几乎相同），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中等的自然增长是限于1770年以后时期，则另外损失400万人；如果不限于1770年以后时期，则另外损失500万人。第二个假设（争议要小得多）是：非洲的女人普遍结婚（这甚至在性别不平衡地区也由于多妻制习惯而得到保证），这意味着大批男人被弄走对于繁殖影响很少。事实上正是非洲的婚姻制度减少了奴隶贸易所造成的创伤。

469 一个更为微妙的变化在500年间也一直影响着奴隶来源地区和其他内地地区，它大概对人口有更大的影响。这就是主要由于对外接触所引起的食物来源的变化。

目前非洲一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在多雨的热带，其范围环绕西非海岸迄至刚果盆地，再远达东非高地。这片地方绝大部分本来覆盖着浓密的森林，其中许多地方至今仍是如此。它现在是非洲大陆2/5居民的家乡，但过去并非一直如此。这片广大地区最不寻常的特点是，很大比例的粮食500年前在当地尚无人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的科学膳食研究所作的仔细评定，㉞以及其他旁证资料，都表明木薯已是当今沿海从科特迪瓦到安哥拉以及内陆地带远达东非高地西坡地带最普遍食用的主要作物。在这一带最常食用的另一作物是玉米，它成了安哥拉和东非从肯尼亚延伸到莱索托和纳塔尔这一广大地区的主要食物。在卢旺达和布隆迪，主食按重要性次序为：豆类、甘薯、木薯和土豆。

据某些权威说（虽然其他权威对此有争议），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在6000多年前经由埃及传到非洲，约在3000年前到达西非热带草原。㉟作物种植的转变惊人地成功，结果在埃塞俄比亚和西非驯化了许多野生作物，甚至产生了高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尼日利亚北部的诺克文化。栽培作物进入更为多雨的热带非洲不是那么成功，虽然当地驯化的薯类较为耐雨，在森林的边缘地带生长得很好，西非品种的稻米也是如此。公元初年，更适宜赤道非洲的一些植物（香蕉——尤其是它的大而不甜的品种羊角蕉——和亚洲薯蓣）传到东非，慢慢地向西传播。㊱但是征服森林是长期的缓慢过程，农业和人口在森林地带缓缓地发展，的确发展得很慢，直到15世纪，覆盖着森林的刚果盆地北部才稀稀落落地居住了猎人和食物采集者，而今天还有相当多的地区是由这类人居住。㊲

470 从人口史的角度看，重要之点是：500年前森林是极少数人住居的地方。主要的例外

㉞ M. P. 米拉克尔(Miracle)，见C. 加贝尔(Gabel)和N. R. 贝内特(Bennett)合编，1967年，第201-225页。米拉克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G.P.默多克(Murdock)1960年所用的人类学资料有不足之处，也证明了一些政府机构在那一年前后所作的精心的抽样调查的价值。由于有米拉克尔的批评引起的保留意见，这里引用默多克作为补充资料。

㉟ R. 奥利弗(Oliver)和J. D. 费奇(Fage)，1962年，第25页；G. P. 默多克，1960年。

㊱ R. 哈利特(Hallett)，1970年，第16-17页。又参看C. O. 索尔(Sauer)，1952年，第34-35页。

㊲ D. F. 麦考尔(McCall)，1964年，第142-143页；D. W. 菲利普森(Phillipson)，1977年，第220-230页

是森林的边缘地带、沿海以及地区之间的重要通路。例如在尼日利亚，第一类的例子是拉各斯两侧的咸水湖地区，第二类的例子是旧奥约。而第三类的例子则是伊费和贝宁，两者都在一条大道上，这条大道在尼日尔河最下游到达三角洲之前易于通行又便于横渡之处跨过河流。彼时以来，人口向森林移动的趋势持续不断，且以加速度进行，至今未已。再举尼日利亚之例，那是现代的情况：翁多以南（在人口拥挤的约鲁巴兰中部的东南方）的雨林已经开辟出来成为集约耕作的地带，这主要是60年代初修建从伊杰布-奥德到贝宁的公路的结果。

毫无疑问，森林人口增加那几乎完全是靠着自然增长而不是由于移居。同样明白的是，这个过程在19世纪加快了，而在本篇所涉及的时期则以空前的速度进行。玉米只是1830年以后才传到刚果盆地北部一些地方，到1900年左右成了赞德人最重要的作物。在肯尼亚，玉米在19世纪80年代就为人所知，但直到19世纪末，它的重要性限于滨海地方，[38]而在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它在本世纪头几十年才重要起来。[39]木薯的大发展则更晚了。在西非，直到巴西客（指从巴西回来的非洲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本是作为奴隶运往巴西的）于19世纪来到几内亚海岸传授"加里粉"（木薯粉）的制作方法以前（"加里粉"似乎是由巴西客集中地传播到原来种植薯蓣的地区），木薯的传播由于不大懂得如何泡制以除去全部毒质而受到阻碍，但自1900年左右以后它发展得非常快。[40]木薯在塞内加尔谈得上有规模的种植只是1900年以后的事；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以北地区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以前谈不上有规模的种植。[41]一切证据都表明如此。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亚洲稻米大量地代替了本地稻米，特别是在西非的极西部；当时就连较为古老的椰薯，即芋艿，在19世纪也得到了补充，由于从太平洋引进了新型品种。[42]

研究食物史的人会注意到膳食方面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可是人口学家必然强调：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地方发生变化已有500多年，这很难不引起人口增长，而这些变化在19世纪末仍在加速度进行，对恰是曾被掠取奴隶的地区肯定产生特别强大的影响。

以上是决定人口变化的几种主要因素，但无疑还有其他因素。商业即是其一，虽然 471 商业活动究竟是否带来了繁荣，是否带来了在困难时候购买粮食的能力，以及是否在少数存在商业的地方或许带来了某种保健医疗，其程度超过它带来的由于同陌生人接触增加而引起疾病，这是人们争议不决的问题。到1880年，非洲的经济作物包括埃及的棉花，桑给巴尔的丁香，纳塔尔的蔗糖，和塞内加尔日益增长的花生种植面积，而在阿尔及利亚，一个主要以小麦和果酒为基础的欧洲移民经济正在建立起来。贸易有一个方面几乎肯定对健康具有有害的影响，那就是烈性的含酒精饮料流入这个大陆。这种贸易之得以发展有两个原因：首先，含酒精饮料在欧洲能廉价生产，售之可得巨利；其次，在不存在人们可以广泛接受的交易媒介的经济中，成为真正问题的是，什么货物可以被接受来交

[38] M. P. 米拉克尔，1966年，第95-99页。

[39] M. P. 米拉克尔，见C. 加贝尔和N. R. 贝内特合编，1967年，第219-220页。

[40] W. O. 琼斯(Jones)，1959年，第79页。

[41] 同上，第80-84页。

[42] B. F. 约翰斯顿(Johnston)，1958年，第26页。

换非洲的产品。[43] 玛丽·金斯利认为，贸易的酒类是纯正的，很可能比大麻的为害小。[44] 1909 年一个调查酒类贸易的委员会同样具有这种观点。[45] 烈性酒被大量推销，常常作为工资。1894 年，尼日尔河沿岸保护国政府总岁入的一半和关税收入的 95%来自烈性酒类；到 1894 年，靠这个来源的政府收入总额近 200 万英镑。[46] 1892 年布鲁塞尔协定曾试图在刚果（今扎伊尔）限制这种贸易而未能成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酒类贸易在热带非洲也没有得到成功的控制。

对于另一种贸易货物——枪枝，也可以提出差不多相同的疑点。正是火器使得人数相对较少的一批人得以控制人数较多的奴隶，如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在东非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较长时期内，那些商业化最为先进的地区首先发展起一个商业、行政和文明的基础设施：港口设施、公路、贸易事务所、经济作物种植，最后还有学校、医疗设施以及可能出现的下降的死亡率水平。在西非，那些卷入奴隶贸易最深的地区在这种发展中有着领先的趋势；伊格博人和阿散蒂人的某些经商才干差不多肯定地是在这种贸易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北非，排水系统、垃圾收集以及其他卫生措施到 19 世纪中叶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某些城市确然已经开始。其动机主要是出于保护新来的欧洲人居民的愿望，但无疑地也影响了本地的居民。19 世纪 40 年代，这些措施在阿尔及尔的影响尤其巨大，因为法国人力求控制霍乱。[47]

472

殖民主义的影响

开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欧洲人向前推进运动，最常见的辩解之一是，各地新建立的稳定的行政机构减少了由于部族之间的战事和袭取奴隶活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卢加德很强调这一点，声称尼日利亚有较多的荒芜地区是周期性破坏的见证。[48] 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肯定存在着某种不安全，许多村庄都建在有险可守的地点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安全能有保障之后农民就从这些村庄发起“下山运动”移往更适合从事农业的地方。[49]

所谓有较大安全感的说法从长期来说是对的，但在最初几十年里则大成问题。非洲的不安定由于同欧洲人的接触而更形恶化了。无论如何，差不多可以肯定，欧洲人行政官员和传教士都对此加以夸大，他们各自谋求为自己所带来的那种新秩序作辩解。其实

[43] 参看H. M. 斯坦利(Stanley)的评论，引文见L. 米德尔顿(Middleton)，1936 年，第 288 页。
[44] M. H. 金斯利(Kingsley)，1897 年，第 662-668 页。
[45] R. 施拉姆(Schram)，1971 年，第 115 页。
[46] 同上，第 114-115 页。
[47] J. R. 莫雷尔(Morrell)，1854 年，第 87 页。
[48] F. D. 卢加德(Lugard)，1929 年，第 66 页。
[49] R. M. 普罗瑟罗(Prothero)，1965 年，第 39-40 页；R. M. 普罗瑟罗，见C. 考德威尔和J. 奥孔乔(Okonjo)合编，1968 年，第 252 页。

许多被袭击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牲畜和谷物，[50] 尽管毫无疑问这些财产的主人在保护它们时是冒着风险的。新政权不那么经常强调的则是，由于它们的干预而在非洲各地造成严重的生命死亡。死亡很少是由于最初推广行政机构而造成，多是由于镇压随后发生的反叛和继之进行讨伐而引起，这种镇压和讨伐显然常常带来极大的破坏，因为它们打乱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周期造成饥荒。例证包括：1886 年在塞内加尔，由于反对修建铁路有数千人被杀；[51] 1893 年在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恩德贝勒战争；1895 至 1907 年在刚果自由邦旷日持久的镇压巴特特拉人叛乱；以及 1901 至 1906 年间在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大的灾难折磨着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1905-1906 年的马及-马及叛乱中德国人在那里采取了"焦土"政策，造成恐怕有数十万人的死亡，主要是死于饥饿；[52] 而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德国的军队在那里进行的战斗无疑又一次提高了死亡的数字。比较复杂，但肯定是由于欧洲人来临而间接引起的，是 1800 年以后在祖鲁民族周围地区造成的破坏，和从 1879 年开始直到 1906 年最后叛乱为止历次祖鲁战争中造成的破坏。占领并未解决一切内部争执，有些争执由于行政官员或传教士站在某个部族的一边而更加尖锐了。在非洲大陆许多地方，殖民统治下的和平使务农的部族得以侵占游牧民的土地，就像马赛人和图阿雷格人的疆域都曾发生的那样。 473

肯定地，在有些地方稳定的政府显然促成了 19 世纪的人口连续增加。埃及从 19 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推广水利和卫生工作时起，[53] 阿尔及利亚在法国人于 1879 年镇压了一切反抗以后，显然都出现这种情形。[54] 这种安定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在两个世纪之交文官政府代替军政府成为常例的时候，是由于各宗主国要求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当局应该财政自给，[55] 于是越来越集中注意交通事业和出口生产。

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主要的人口问题恐怕是集中在所谓"劳工问题"和中部非洲各地的特许权获得者规划上。

在 19 世纪末叶，殖民地开拓者的中心信念是殖民地应该有利可图。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决定于非洲劳工。利润决定于货物的搬运，而这在大部分热带非洲意味着人力搬运，因为拉车的牲畜常由于采采蝇为患不能使用，而动力推动、装有车轮的运载工具则由于缺乏公路和铁路也不能使用。在中部非洲最有利可图的产品最初是象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搬运象的长牙。随着 19 世纪 80 年代末充气自行车轮胎的发展和 90 年代的充气汽车轮胎的发展，产生了对橡胶的大量需求，有一个世代种植园的橡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第一个马来亚橡胶园于 1910 年开始生产）。在这期间，热带非洲和南美洲靠野生橡胶满足需求，非洲发现的野生橡胶大部分是藤本植物，也需要大量劳力进行采集和初步加工。

[50] W. M. 麦克米伦(Macmillan)，1938 年，第 47 页和以下各页。

[51] P. 加法雷尔(Gaffarel)，1905 年，第 80-84 页。

[52] 参看C. J. 马丁(Martin)，见K. M. 巴伯(Barbour)和R. M. 普罗瑟罗合编，1961 年，所报道的估计数字死亡人数高达 50 万。

[53] C. V. 凯泽，1944 年，第 385 页和以下各页。

[54] R. 奥利弗和J. D. 费奇，1962 年，第 150 页。

[55] 同上，第 204 页和以下各页。

困难在于自给自足的农民需要的东西不多，常觉得固定的雇佣有点做奴隶的味道，[56]并觉得这些活是妇女干的。[57]欧洲人由于眼看巨额利润从手里溜掉感到落空失望，对非洲人这种态度丝毫不表同情，认为“必须让恐惧心理代替雄心和贪婪作为动机情绪以迫使他们充当劳工”。[58]解决的办法是原始的并且往往是残暴的。为了管理的目的，实行强迫劳动，由酋长们指定谁该去做工。各地都征收人头税和茅屋税，在有的地方可以以劳役474折抵税款（实行这种税制的早期较为常见）。1896 年法国人在征服之后推行税制，随后上沃尔特的莫西人，先是试图增加生产和贸易，但不久青年人就开始去黄金海岸寻求有工资的季节雇佣，结果发现 1906 至 1910 年之间税款负担增加了两倍。[59]这种制度有很长的历史；它被用来作为法国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实行殖民化的新方法的一个内容。当时莫西人被雇来在科特迪瓦各条铁路以及其他旨在改善法属西非基础设施的工程项目工作，尽管本世纪 30 年代由于卡车数量增多，人力搬运渐渐消失。[60]此外，非洲人还被招募和征召参加军队和充当警察。在某些地区，劳动力从海外招募，例如在本世纪开始时输入印度人修建蒙巴萨-乌干达铁路，以及早在 1860 年就输入印度人到纳塔尔种植甘蔗。到处是劳动力的流动，或是为了要把它集中在需要劳力的地方，或是因为某些非洲民族被认为是较好的或较愿意干活的工人，或是由于他们同某种商业经济接触较久，或是由于他们有年代久远的具体的文化特点。

在 1880 年以后的 1/3 世纪里，很多这种劳动力流动带来了骇人听闻的高死亡率。劳工常被转移到会受新的疾病袭击的地区；而且在自己家乡显然不受疟疾感染的非洲人，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不但得恶性疟疾，甚至得黑尿热病。[61]有的移居劳工不遵循非洲各地广泛采用的周到的卫生措施，特别是不在村庄外面和远离河流的地方大便[62]，于是污染了他们的饮水供应，使痢疾和新近由外界传来的伤寒病和副伤寒病蔓延起来。肯定地，做工营地的条件促进了性病和腹泻的蔓延。工人们身上带着大量的热带非洲常见的寄生虫和疾病媒介，他们往往过度拼命地做工超出力所能及的程度，结果弄得疾病染身而不能自拔。许多劳工因为饥饿变得衰弱了，一方面由于他们所得到的膳食同他们习惯食用的有惊人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搬运工和其他工人都吃不饱，显然因为欧洲人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有点不加分析地认为非洲人靠着土地生活。[63]关于 19 世纪的死亡率人们知475道得很少，但1915年驻圣多美普林西比的英国领事声称，当地的契约劳工死亡率为

---

[56] J. C. 米切尔(Mitchell)，见K. M. 巴伯和R. M. 普罗瑟罗合编，1961 年。

[57] R. 奥利弗和J. D. 费奇，1962 年，第 202 页。

[58] W. G. B. 德蒙莫朗西(de Montmorency)，1906 年，第 149 页。

[59] E. P. 斯金纳(Skinner)，H. 库珀(Kuper)主编，1965 年，第 60-63 页。

[60] M. L. 贝茨(Bates)，见V. 哈洛(Harlow)和E. M. 奇尔弗(Chilver)合编，1965 年，第 624 页。

[61] H. B. 托马斯(Thomas)和R. 斯科特(Scott)，1935 年，第 309 页。

[62] R. H. 福尔金厄姆(Faulkingham)，J. H. 贝尔丁(Belding)，L. J. 福尔金厄姆(Faulkingham)和P. F. 索尔巴恩(Thorbahn)，1974 年，第 31-35 页；I. O. 奥鲁布洛耶(Orubuloye)，未注明日期，第 77 页。

[63] R. R. 库津斯基，1939 年，第 50-51 页；J. 絮雷-卡纳尔，1971 年，第 26 页和以下各页；E. P. 斯金纳，见H. 库珀主编，1965 年，第 65 页。

100‰，[64] 而1922年在布拉柴维尔通往海上的铁路工作的强迫劳工，据计算也有相似的死亡率。[65] 同后一数字对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喀麦隆铁路的死亡率数字为150‰。[66] 莫西人从这种处境得出一条谚语，他们说："白人的活会吃人"。在20世纪20年代，上沃尔特的法国殖民当局进行干预，使在科特迪瓦铁路工作的建筑工人口粮和工资有所改善，以图减少死亡人数。[67] 当时存在的那些种植园普遍也是类似的恶劣情况，这由喀麦隆1902年一年劳动力损失1/5得到证明。[68]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在中部非洲，即刚果自由邦（后来的比属刚果，而后是扎伊尔）、法属刚果（后来的法属赤道非洲）和德属喀麦隆，这几乎丝毫不差就是低生育带的地区。从1890年左右起，给予特许权获得者以自由邦广大地区上地上的全部物产。而从1892年起，又创立利奥波德国王的私人领地作为这个制度的补充。在10年之间，这个制度已传播到其他两个地区，几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保持原封不动。实际上，安德烈·纪德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还有大量残余存在。[69]

这些制度都有极大的类似之处。非洲人发现，他们连蓄积起来的象牙也不再归自己所有了，而且不得不杀死大象以获得更多的象牙，搜索森林以寻取橡胶。欧洲的一些心肠最硬的地痞流氓流浪到这里成为特许权获得者的代理人，并且得到许可利用殖民政府的统治机构达到离奇的程度，包括使用其军队、警察和法庭。征税和强迫劳动，虽然在理论上是有限度的，然而被这些代理人重新解释成意味着如此不断的劳动，以至作物种植深受影响，从而食物也深受影响。居民不情愿被征劳役，不情愿交出习惯上一直是他们村社共有的东西。监禁不是处罚的好办法，因为它减少能够利用的劳动力。代替的办法是鞭笞、毁肢、以妇孺作人质、焚烧村庄和大量杀戮。毫无疑问，由于村庄的劳力组织被打乱和发生全村逃亡的情况，随之就出现瘟疫和饥荒。[70] 没有人保存足够的人口记录，但是人口大量下降是人们广泛同意的。这种人口下降数字大概是根据对瓜分以前各地人口所作的夸张估计，和根据居民业已逃亡的沿小径和河岸地带人口消失的事实。但是很难回避这样的结论：在1890至1910年间或甚至更晚时候，这个地区人口确是下降了（那种认为数以百万计居民逃往最近的英属领地的说法，简直得不到那些地区的各种报告书和人口调查的支持）。更难设想，然而或许并非不可能的是，这个时期的疾病（性病和其他传染病）发生程度造成该世纪后半叶或在更长时间里仍然是妇女高度不育症的病因。也很难认为最近联合国的一本有关"文化冲击"和"调整过程"的出版物对这 476

[64] E. D. 莫雷尔(Morel)，1920年，第157-158页。

[65] R. R. 库津斯基，1939年，第162页。

[66] 同上，第61页。

[67] E. P. 斯金纳，见H.库珀主编，1965年，第65页。

[68] R. R. 库津斯基，1939年，第58页。

[69] A. 纪德(Gide)，1930年，散见各处。

[70] 主要由于这个时期在欧洲进行的辩论因此有广泛的文献。参看J. 絮雷-卡纳尔，1971年；E. D. 莫雷尔，1906年；1920年；L. 米德尔顿，1936年；以及甚至比属刚果和卢旺达-乌隆迪的新闻和公共关系署，《比属刚果》，第1卷，布鲁塞尔，1959年。

个地区情况的报道是言之成理的。[71]

殖民侵入最终还是导致人口大量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建立了一种经济基础，前文有几章所讨论的许多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尼日尔河三角洲棕榈油出口的发展，1870至1900年间在南部非洲发现金刚石然后又发现金矿，19世纪90年代黄金海岸本地可可种植业的发展，以及本世纪初期在刚果与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之间发现巨大的铜矿藏。

然而最早对死亡率水平产生影响的发展大概要算是公路和铁路的深入各地了。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部分铁路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公路也在改进；到20世纪30年代末，数量有限的卡车已能通往大陆的几乎每个地方。这种体系使得政府或商人有可能把粮食送到饥荒地区。运输网之存在加上有了在很大范围内为人们所接受的货币，促进了生产剩余粮食以供应市场。自1920年左右起，饥饿死亡人数（与雨量不足的情况有关）不断下降，而大死亡率的高峰（它们使得平均死亡率维持其水平）开始受到重大打击。直到那个时候，即使是像乌干达这样的国家光是一年也有10万人以上因饥饿而死亡，1918-1919年它显然就是如此。[72]

传教士对死亡率很可能有着虽然不大却十分实际的影响，这同开设医院可以说毫无关系。一位权威说，“他们的学生学会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掌握殖民制度所开辟的新的生活环境。”[73]

477 最后，西方的医药对非洲究竟有何影响？简短的回答是，除了对某些传染病的急救措施以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仅有的贫乏的医疗服务主要集中在救治欧洲人；那时以后，当时仍然无可非议地被认为是非洲主要富源的非洲劳工才逐渐得到医疗服务，而本世纪中叶以前可以说几乎不曾试办过什么群众性医疗工作。以下事实就足以证明当时医疗服务几乎没有什么作为：迟至1939年，黄金海岸每年医疗预算只为每人2先令，尼日利亚只为每人5便士。[74]

居民易患的疾病令人不寒而颤。迟至20世纪30年代，据报道坎帕拉的情况是：“每一个就医的病人都是潜伏的或现发的疟疾患者，并带有一种或多种蠕虫。其中50-80%患有或曾患梅毒或雅司病，或两者都有。淋病也是如此。而在其他疾病中，麻风病、螺旋体热和痢疾也远非罕见。”[75]蠕虫病包括钩虫病、蛔虫病、血吸虫病、丝虫病和麦地那龙线虫病。此外还有各种传染病诸如黄热病、天花、嗜睡病（锥体虫病）以及新从外界传进来的结核病和霍乱之类。直到19世纪快要结束，欧洲人更加容易因当地的地方病致死。本世纪初英属西非军队中的死亡率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欧洲人士兵的死亡率为非洲人士兵的9倍。[76]

---

[71] 联合国，1973年，第31页。

[72] D. A. 洛（Low），见V. 哈洛和E. M. 奇尔弗合编，1965年，第110页。

[73] R. 奥利弗和J. D. 费奇，1962年，第204页。

[74] R. R. 库津斯基，1948-1953年，第1卷，第10页。

[75] H. B. 托马斯和R. 斯科特，1935年，第303-304页。

[76] 根据R. R. 库津斯基，1948-1953年，第1卷，第16页所列的数字推算，原数字所列的总死亡率，欧洲士兵为427‰，非洲人为46‰。

欧洲当时并未在医药上为自己在非洲的冒险事业作好充分准备。19 世纪初，英国的出生平均寿命不到 40 岁；而到 19 世纪结束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出生平均寿命已达 47 岁左右，死亡率接近 20‰，婴儿死亡率接近 200‰。[77] 而且医药革命迟迟才把注意力转到热带疾病。虽然天花接种自 18 世纪以来就已为人所知（主要因为该病并非热带特有的病），但是象皮病、疟疾和黄热病的传染途径，只是在 1877 年、1897 年和 1900 年才分别得到证实。并且除了使用奎宁以及有限度使用砷化合物治疗梅毒和雅司病以外，防治热带疾病的药物和疫苗的开发工作到本世纪 20 年代才真正开始。尽管如此，热带病医学学校在欧洲早在 1897 年就在利物浦和伦敦，1900 年在汉堡，1901 年在布鲁塞尔，其后又在巴黎、波尔多和马赛等地建立；在非洲，1912 年已在开普敦建立，1918 年在达喀尔建立。

在热带非洲，官方医疗工作长期以来属于军方的业务，虽然小型民用医院在 19 世纪 90 年代已开始出现。1840 年第一位传教士医生抵达塞拉利昂。自此以后，从事医务工作的传教士，其中有的是非洲人（主要是塞拉利昂人），开始散布于西非各地。这种服务绝大部分集中在救治军人、行政官员和传教士，虽然也对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和教会人员中的非洲人给予一些医疗。真正的成绩只是在本世纪初期方才取得，这表现在黄金海岸欧洲人官员的总死亡率从 19 世纪最后 20 年的 76‰水平降至 1902 年、1903 年和 1904 年分别为 31‰、22‰和 13‰，而且即使把年龄构成考虑在内，同英国自大约 1912 年以后的水平比较起来也占有优势。[78] 其所以有此成绩据解释是由于有了防治疟疾和黄热病的卫生措施，治疗热带疾病的方法有了改进和实行隔离的生活区。卫生措施必然对于居住在主要行政中心的人数相对很少的非洲人有某种影响，特别是在拉各斯，经威廉·麦格雷戈总督和罗纳德·罗斯医生（他验明了疟疾传播的机制）在本世纪初年采取措施以后。应用欧洲人的方法来改善非洲人的健康相对说意义不大，因为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提供了更多的诱惑物；另一方面随着本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到来，各殖民国家削减了卫生经费。1924 年，尼日利亚理论上的医疗设施是每 20 万人有 1 名医生，而事实上只有 1/4 的医生职位有人任职。实际上，到 1939 年该国的医生与人口比例低于 1914 年的数字。[79] 即使这些数字也是夸大了非洲人得到医疗的机会，因为在本世纪 30 年代有 12 所医院满足 4000 名欧洲人的需要，而 52 所医院却包管了 4000 万非洲人。[80]

在没有很多医生的情况下，大量的治疗工作事实上要看能否建立起农村诊所利用辅助医务人员的服务提供足够的医疗，以及能否组织起本地的自助性医疗事业。在尼日利亚，1904 年在伊巴丹开设了一个门诊部，以后几年又继而在约鲁巴诸城镇建立了另外一些门诊部。[81] 到 1910 年，塞拉利昂政府对每个区卫生状况改进最为明显的两个村的酋长

---

[77] N. 基菲茨(Keyfitz)和W.弗利格(Flieger)，1959 年，第 32-36 页；L. I. 达布林、A. J. 洛特卡和M. 施皮格尔曼，1936 年，第 61 页。

[78] R. R. 库津斯基，1948-1953 年，第 1 卷，第 17-18 页。

[79] 同上，第 9-10 页。

[80] W. 罗德尼(Rodney)，1972 年，第 225 页。

[81] R. 施拉姆，1971 年，第 125 页。

给以奖赏。[82] 到1934年，乌干达全部重要中心都设有医院，农村地区则有88个分诊部，
479 当年就诊人数共达1,378,545人次。[83] 人们不应夸大这些变化的重要性：许多门诊部的情况是，药品奇缺，服务人员搞不清要干什么，直到本篇写作之时，非洲农村很多地方还是处在这种状况。安德烈·纪德在本世纪20年代末参观乌班吉河岸贝图地方的医疗设施，强烈不满地说，用来防治中部非洲疾病的供应得到的只是碘酒、硼酸和芒硝。[84]

非洲死亡率明显下降（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肯定如此）之获得很可能是由于饥荒和传染病所引起的周期性死亡率高峰受到遏制。这种下降有的可能只是对于因欧洲人到来而引起的某些疾病的死亡率上升的一种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所有权威都认为当时嗜睡病流行遍布热带非洲，主要是由欧洲人的活动引起，常假定是由于新的交通往来和对于丛林的扰动使采采蝇散布开来或把它们带到村庄近旁的结果。[85] 同样，本世纪初年所谓梅毒瘟疫在乌干达的流行，人们认为是一种新现象，并郑重其事地严肃对待，开展对它防治的运动，结果创立了乌干达医务部。在喀麦隆，据说1895年还不知道有梅毒这种病，而1905年则广泛流行。关于非洲的梅毒病实际情况或许比这更为复杂。引致这种疾病的细菌同雅司病十分相似，很难想象某种形式的梅毒在非洲大陆没有长久的历史；[86] 虽然有明显证据表明某些恶性梅毒是从南部非洲各矿区传播开来的，可是较轻的地方性梅毒似乎久已广泛流行，而在乌干达可能是由某种接种方式传染的。[87]

防治传染病的运动从本世纪起势头越来越大，显然取得某些成就。英国人通过使采采蝇同人隔离的方法来防治嗜睡病：阻止鸟兽饮用居民地区的水坑，清除丛林，以及尤为壮观的是，迁徙各地居民，如迁离维多利亚湖的坡岸。法国人治疗了大量的具体病例，
48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E.雅莫医生的工作，他使用了砷化合物阿托克西(atoxy)。喀麦隆有一个人口12.4万的地方，经过这样治疗，1924年总死亡率为81‰，其中由于嗜睡病的死亡率为36‰，到1930年那里的传染病已被遏制。在乌干达，嗜睡病最初是在1901年得到辨认，据称到1906年当大规模人口转移开始时它已导致20万以上的人死亡；到了1918年人们已有充分信心，这种疾病正在被遏制下去，可以让一些人迁回他们的故乡。[88] 在本世纪最初1/3的期间，腺鼠疫的爆发远非罕见：在最初10年中埃及报道有6000病例，其中一半导致死亡；[89] 截止1932年，乌干达记载几乎有万人由此死亡；[90] 1908年阿克拉此病大流行；1924年拉各斯此病大流行；1925年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族各地区此病更

---

[82] 阿农(Anon)，1910 a。

[83] H. B. 托马斯和R. 斯科特，1935年，第304-305页。

[84] A. 纪德，1930年，第33页。

[85] 近年的各种分析证明了最初的看法，虽然所依据的理由略有差别。A. J. 达根(Duggan)1962年的著作认为，嗜睡病是由于各殖民地政府允许各族人民和他们的牲畜可以更自由移动而传播开来；J. 福特(Ford)1971年则把这种论点更推进一步，认为由于人、家畜和野兽一系列新型的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态平衡，使得相当长时期中疾病大为流行。

[86] F. 卡特赖特(Cartwright)和M. D. 比迪斯(Biddiss)，1972年。

[87] J. N. P. 戴维斯(Davies)，1956年，第1041-1055页。

[88] D. A. 洛，见V. 哈洛和E. M. 奇尔弗合编，1965年，第111页。

[89] 阿农，1910 b。

[90] H. B. 托马斯和R. 斯科特，1935年，第309页。

普遍的流行。[91] 英属西非采取的防治措施表明此病是可以遏制的。当阿克拉此病大流行时，城市被封锁起来，注射了35,000剂量的哈夫金氏疫苗。黄热病的大规模流行自塞内加尔至苏丹都有发生，间隔时间无法预测。在1927年时拉各斯近郊亚巴地方的洛克菲勒实验室已研制出一种疫苗，但由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大规模应用，截至1935年防治这种疾病的成就全靠城市地区的灭蚊工作和使用蚊帐。这个时期麻风病是否有所减少尚拿不准；阿利波尔油(alepol oil)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在尼日利亚使用，但是到1938年据估计仍有1%的人口患该病[92]（见图片18.1）。天花预防接种规模极小，到本世纪30年代末年，大概只是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南部这种疾病才有显著减少。[93] 相反，同欧洲人的接触以及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席卷非洲，结果造成本世纪的最高年死亡率，虽然死亡率的增长或许不如亚洲那么大，因为非洲许多地方的居民住处仍然比较与外界隔绝所以才免受其害。本世纪初年，南部非洲各矿山死亡率仍然很高。一个1907年的调查团报告德兰士瓦的情况使人注意到，当时各矿山的死亡率热带非洲人为71‰；比较起来来自南部温带的非洲人死亡率为28‰，而白人则为19‰，上

481



图片18.1 一个流动的麻风病诊所在乌班吉沙里地区班吉以北的一个小村庄中进行工作

[91] R. 施拉姆，1971年，第121-122页，第196页。
[92] 同上，第231页。
[93] R. R. 库津斯基，1948-1953年，第1卷，第11-12页。

述各死亡率数字分别是从两年前的130，35和20降下来的。[94] 在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对灾害之冠的疟疾的防治，进展甚微，疟疾不使人致死也使人衰弱，被归咎于其他原因的许多死亡人数实际根源在于此症。

482

截至1935年的人口动向

以上对非洲人口数字可能有互相抵消作用的各种因素试作的分析其详细程度远超过前此以总人口数字来估计人口变化所作的尝试，然而仍不能由之得出关于人口趋势的任何真正令人信服的看法。变化的关键无疑地一直是死亡率的水平和趋势。没有证据表明生育率的变化对整个大陆有大的影响。在中部非洲的低生育率地区生育率也可能在一个时期下降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科研项目认为，对于按年龄的生育率进行的分析表明，在本篇所考察的时期里，这种情形出现在喀麦隆北部、中非共和国、加蓬、尼日尔、苏丹和扎伊尔的一些地方。[95] 有些地方由于妇女健康有所改善，生育率可能有若干增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进步在1935年以前并不显著；无论如何，我们从年龄结构数字所得到的证据表明它有惊人的稳定性。[96] 一夫多妻的婚姻格局可能有了变化；但是，虽然人们广泛认为这个制度抑制了生育率，可是来自热带非洲的证据表明很少出现这种后果。一夫多妻婚姻制度下的妇女可能平均生育胎数少于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妇女，因为有较大的趋势是更多的妻子不到育龄就结婚。同时继承兄弟的妻子是一夫多妻婚姻制度中一部分妻子的来源。[97]

在那些有充分统计数字的地区，有明确证据表明本世纪头几十年中人口确有增长。例如：在埃及，1882至1937年之间人口很可能增长一倍；[98] 在黄金海岸，1921年人口普查与1931年人口普查之间人口明显地增长1/3以上，这决不会完全是普查工作更趋完善的人为现象；[99] 还有在南非，那里的总人数和非洲人人数在1904年普查到1936年普查之间都接近于增长一倍。但是这些都是繁荣非凡和行政作用不同寻常的地区，举行人口普查一事就部分地证明了这点，必须假定这些地区比起整个大陆来人口增长更为迅速。

483

已知这一切否定因素，再说又没有人真知道本世纪以前的非洲确切人口数，下述趋势好像比迄今所曾提出的任何论点都更有道理。主要由于农民侵入热带森林，整个大陆

[94] 阿农，1911年。又见阿农，1913年。据其报道南非议会中提出的质询迫使土著事务部长承认矿工的死亡率被故意低估了，因为把矿工居住区的死亡人数排除在外，而在居住区迟至1913年每月死亡人数表明年死亡率为200‰或更高。

[95] W. 布拉斯等，1968年，散见各处。

[96] 这是加纳1921年至1960年的情况：J. C. 考德威尔，见W. 伯明翰，I. W. 诺伊施塔特和E. N. 奥马姆埃合编，1967年，第94页；关于北尼日利亚1921年至1952-1953年的人口普查，见C. K. 米克，1925年，第180页，又E. 范德瓦勒，见布拉斯等人，1968年。

[97] 参看H. V. 穆香(Musham)，1951年，第354-363页；P. O. 奥哈迪凯(Ohadike)，1968年，第264-268页。

[98] C. V. 凯泽，1944年，第385页和以下各页。

[99] J. C. 考德威尔，见W. 伯明翰、I. W. 诺伊施塔特和E. N. 奥马姆埃合编，1967年，第20-23页。

每年有0.25%的人口增长率（在森林地带大概为0.5%）看来是1500至1840年这个时期合理的估计数字，并假设18世纪和19世纪初食物的加速度变化抵销了奴隶贸易造成的破坏。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这样提出是合理的：增长率在1880年左右达到0.5%的高峰，但是随着欧洲人瓜分并占领撒哈拉以南非洲所产生的影响，增长率又有所下降。虽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些地方人口增长可能继续逡巡不前，但北非和南部非洲各地，可能还有黄金海岸，增长的人口可以补偿1900年前在刚果自由邦和法属刚果所进行的杀戮而绰绰有余。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大陆的人口增长在本世纪初期达到低潮约为0.25%，此后又继续升高，结果是直至1920年增长率平均为0.5%，而那时到1935年平均为1%。假设1935年的数字为1.65亿人，据之向后推测，则得出如下的不同年代人口估计数字：1500年——4700万人；1840年——1.04亿人；1880年——1.2亿人；1900年——1.29亿人；1920年——1.42亿人；1935——1.65亿人。

上述推测数字的精髓在于它认为新石器革命三千年间一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缓慢发展，带来了更集约的土地利用和更稠密的居民点。在表明人口持续增长时，这套数字只能同杜兰德的低估计数字相比拟，两套数字关于1500年左右的人口规模接近一致。但是上述推测数字意味着19世纪和20世纪有较低的增长率，这个时期它同杜兰德的中等估计数字接近得多。上述推测数字意味着我们所考察的时期开始时非洲人口约为1.2亿，其后55年中增长了37.5%，1935年达到1.65亿。

人口的重新布局和城市化

55年中，人口大量流动，这对于决定新非洲的性质有很大影响。增添4500万人意味 484 着他们每个人所居住的空间，其面积不可能与他们的祖先相等。于是，人们加快了向无人居住的地方迁移。更重要的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西非的流动工人开始作远程的迁移，寻找有工资的工作（南部非洲要更早一些，而东非则稍晚）。最初他们是为纳税所驱迫，但后来购买物品和远游异地的欲望变得强烈起来；开始时他们几乎都是季节性迁移者，但较长期的移居逐步地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每年几乎有20万迁移者从热带草原涌入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各地政府对迁移的人很少加以限制，南非和南、北罗得西亚除外，那些地方迁移限于是临时的，限于成年男子，原因是害怕他们定居下来，并且还有来自白人工会的压力。

这些移居人群的大部分不是流向种植园和矿井，而是流进城镇，结果保证了大部分地区都有一些庞大的中心足以维持全国性的行政当局和第二产业。当然，在尼罗河流域下游非洲有一些古老的城市，在马格里布、西非大草原、尼日利亚的约鲁巴兰和黄金海岸中部还有一些较新的城市。然而到1880年为止非洲大约每300人中只有1人居住在人

由联合国估计数字推导出来、作了某些调整以便同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人口普查得出的关于人口的新知识相一致。

J. 考德威尔，1971年，第246页。

R. 奥利弗和J. D. 费奇，1962年，第219-220页。

口超过 10 万人的中心城市，比较起来，亚洲大概每 50 人中有 1 人，而欧洲是每 15 人中有 1 人。[93]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更是如此。在热带非洲，如果尼日利亚除外，列出 16 个在 20 世纪具有重要意义的城镇，我们可以估计 1880 年的合计人口大约为 8 万；到 1930 年，这个数字增长了 5 倍，超过了 50 万（这就为其后 40 年增加 10 倍以上奠定了基础）。1931 年达喀尔人口已经增长到 5.4 万；弗里敦达到了 4.4 万，但这仅是半个世纪以前人口的两倍；阿克拉为 6 万；亚的斯亚贝巴为 6.5 万；内罗毕为 4.8 万；而达累斯萨拉姆为 2.5 万。尼日利亚的规模不同；伊巴丹有 40 万人口，而在本章所谈的时期初年大约有 15 万居民；拉各斯可能增长一倍达 12.6 万人；其他 10 个约鲁巴城镇合计人口将近 50 万，可能比半世纪以前的人口多不了多少；然而在北方，卡诺自 1880 年起的 50 年中人口大约增长一倍达 8.9 万人，其他 11 个城镇总共从大约 15 万增加到 20 万。[94] 在萨赫勒地区，诸历史名城人口毫无疑问在下降，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没有成为法国人的主要行政中心；到 1931 年，廷巴克图、加奥和莫普提的人口总共大约只有 1.5 万人。在北非，很多历史名城保持了自己的重要性；在本章讨论的这个时期，开罗、亚历山大和阿尔及尔的人口都增加了 3 倍，分别为 100 多万人、60 万人左右和 25 万人；到 1931 年，其他 14 个马格里布古代城镇的人口总数已达到近 150 万，意味着在半个世纪中至少增加一倍；而苏丹的喀土穆-恩图曼有 15.9 万人。到 1931 年，南部非洲（南非、罗得西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14 个最大城镇的总人口已大大超过 100 万，大约在前半个世纪中增长了 10 倍，约翰内斯堡人口接近 40 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们纷纷涌入新建的港口、矿业城镇和行政城市，它们在整个地区纷纷兴起，大约每 20 年规模就增长一倍。在北非有一些新的城镇，但大部分是在较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约每 35 年增加一倍。在半个世纪中，这些大的城镇增长了约 400 万人，地区均势发生了变化。结果这些中心城市的居民总数，北非的比例从 3/4 下降到少于 3/5；南部非洲的比例从 1/15 上升到 1/6；热带非洲的比例从 1/5 上升到 1/4（而在热带非洲内部，尼日利亚除外地区所占的比例从 1/4 上升到 1/3）。

未来的基础

到 1935 年为止，非洲成功地经受住欧洲人殖民行动对人口产生的冲击。现在它的出生数字远远超过死亡数字；在这个大陆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日益发展壮大的城镇里，生活不再是十分不安定了。不可否认，它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在全大陆范围内，死亡率可能仍然远远超过 30‰，出生平均寿命几乎不超过 30 岁），但恰是热带非洲的各种疾病，比所有其他因素都更重要，大大地遏制了入侵者，使非洲免于成为另一个拉丁美洲。即使如此，非洲大陆的白人人口仍增长了 30 倍，从 1800 年的 2.5 万人（主要在开普地

[93] 根据P. M. 豪泽著作计算出来，见P. M. 豪泽(Hauser)主编，1957 年，第 53-95 页。

[94] 大部分尼日利亚城镇的数字来自W. 巴斯科姆(Bascom)，1959 年，第 29-43 页。

区)增加到1880年的75万人，其中5/6在南非、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到1935年，它又增长了5倍，达375万，其中一半在南非，1/4在阿尔及利亚，再有1/5在北非其他地方。同一时期，亚洲人（除了少数中国人的小社区，其中最大的在兰德，其余几乎全部是印度人)从大约5万人增长到33万人有余，其中2/3在南非。变革就要到来，但很少人清楚地预见到它。这由20世纪20年代欧洲人对阿尔及利亚各个种族人数所作的认真评价 486 看得很明显："在非洲的大部分法国人不必再担心害怕会有真想推翻其权力的企图；因为，正如他们所指出，有80多万欧洲人对付550万土著人，这些土著人只是乌合之众，除能进行零星骚扰以外成不了什么气候。"[*]

1935年非洲处于人口迅速猛增的边缘，它将使非洲的人口(据我们估计，已从1880年的1.2亿增长到1.65亿)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达到2亿，到60年代中期达到3亿，而在70年代中期必然会达到4亿。后一数字中，会有5000万人是居住在居民超过10万的城市之中，这同19世纪80年代进行瓜分时的非洲还在辩论如何产生劳动力问题的情况实在相差太远了。

最后，是否这些重大变化主要是甚至完全是殖民侵入的结果？这样提出问题是中肯的。毫无疑问，稳定的居民群体被打乱，导致刚果自由邦和中部非洲其他地区死亡率猛升，也导致19世纪时和一般情况下在本世纪，非洲大陆其他一些地方死亡率缓慢下降，而人口加速集结在城镇和矿区，则几乎完全由于工业革命以及同来自工业社会的人接触日益增多的缘故。这个过程的大部分即使没有殖民统治也会发生：商人肯定会引起贸易中心发展；欧洲的医学院肯定会对保护商人和其他人免于热带疾病的问题发生兴趣；传教士肯定会为建立医院体制奠定基础。

尽管如此，直接的殖民统治肯定是加速了所有这些进程。最终，在本章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接近结束时，它由于日益增多地、有效地输入和利用流行病控制技术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能在饥荒地区分发食物的运输系统，因而肯定地有助于降低巨大的死亡率高峰。对行政中心的需要，为新的城镇提供核心，而各殖民地政府向自己宗主国的国民作出人身安全和投资安全的保证，促进了商业居留地、矿区市镇以及种植园的发展。没有各殖民地政府，欧洲企业家完全可能甚至比已有的情况更富于掠夺性、更加凶残。欧洲人通常指着这些成绩为自己的殖民渗透辩护。然而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历史证明，这些成绩大部分是迟早总会取得的。工业化的发展不可逆转，同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取得妥协(从这些地区得到所需要的原料）是绝对必要的。

（陈绂　施兰卿译）

---

[*] G. 卡瑟利(Casserley)，1923年，第50页。

19 殖民统治的社会影响：新的社会结构

A.E.阿菲格博

变化与连续性

487 在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对抗中，变化是欧洲殖民统治向所谓的传统社会引进的新事物。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来说，变化一词（应用到殖民地人民身上）意味着进步，意味着从静止和生产力极低的传统文化以戏剧般的、有益的、直线的方式过渡到生气勃勃和无穷发展的现代化。但是对于殖民地民族主义者来说，变化一词主要意味着"破坏"，意味着对非洲人不同情也不理解的帝国主义者毁坏了殖民地人民田园诗般的世界的过程，留给他们的是动乱、不安定和变幻无常。

尽管态度各不相同，这两个对立面对殖民形势下的变化和传统社会有许多共同的假设。这些假设包括认为传统社会基本上是静止的，因此与现代价值观念相对立，结果传统社会与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自然关系是一种彼此冲突的关系；它们一旦接触，新的价值、态度和结构必然要取代传统的价值、态度和结构；在任何殖民地或地理区域，传统社会对欧洲文化的冲击作出的反应都是相同的。

然而近来有许多学者指出，对于非洲，上述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欧洲人强行统治的社会远不是静止的。相反，它们是几个世代甚至是几个世纪和几千年变化的产物。事实上，人们可以断言，"非洲的现代化是从最早时期开始的持续发展的过程。"诸如职业专门化、人口城市化、社会的流动以至劳动力的迁移，所有这些通常都与变化和现代化密切相关，它们在非洲沦为殖民地之前就已发挥作用。

"传统-现代化"的两极模式，连同伴随它的所有冲突和不相容的含义也不能应用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洲所经历的变化的整个领域。非洲文化对西方新事物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非洲不光是扬弃和改变了某些风俗习惯和信仰，而是在社会的一个阶层里保留了些，同时在另一阶层里又作为新的选择对象被接受。这样，当人祭、奴隶贸易、杀死双胞胎等等过去早已存在的恶习被社会所舍弃，而新旧思想在宗教领域里同时并存时，488 一方面，西方化的上层新英阶层接受欧洲理想的一夫一妻制，作为合乎期望的公众形象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而在法律保护下广大城市和农村群众却实行一夫多妻制。当今，非洲土著的建筑传统和欧洲的建筑传统同时并存；地方部族集团和民族主义同时并存；地

方和地区封闭经济和全国性货币经济同时并存；农村和城市生活同时并存；西方官僚机构和传统地方当局同时并存；可兰经私塾和西方化学校同时并存。

这样，许多当地的非洲体制和思想很轻易地在外来的欧洲价值观念冲击下存在下来，或者甚至融合起来。以伊格博人为例，他们经常被认为是大规模地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按照西尔维亚·利思-罗斯的说法，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伊格博人会以他悠然自得的心境同时接受圣餐和传统的巫医巫术，“在他新建的水泥和平锅形屋顶住宅周围的花园里并排地种上‘文明’社会的木槿和异教家庭仪式上用的奥吉里西(Ogirisi)树。”① 玛格丽特·里德描述了恩古尼人如何把基督教会和西方教育与他们的社会结合为一体，把两者作为工具，以保证他们的文化得以在现代世界中保存下去。他们认为在婚礼和葬礼中混合采用基督教和传统的恩古尼仪式是没有矛盾和困难的。② 法勒斯教授也描写过一些乌干达部落如何“热心地和成功地”接受许多现代化的成分，同时又限制它们的影响，使之适应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其要害在于殖民地的非洲人很可能完全明白一个带根本性的真缔，即接受“新方式能增加供选择的范围”③，对自己有利。

把非洲社会对欧洲影响的反应轻易地加以一律化必定会引起误解。人们必须牢记非洲大陆领土广阔，非洲文化种类繁多、五彩缤纷，个人和部落在性格和心理上千差万别，因此，甚至对同一刺激的反应很可能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不相同，而且同一社会和同一个人由于时间不同，反应也会各异。在尼日利亚，人们的注意常常集中于伊格博人、约鲁巴人和“豪萨-富拉尼”人对间接统治的不同反应。在肯尼亚，基库尤人接受西方的新事物，进行修改以适合他们自己，而他们的许多邻近部族对此则往往采取相反的态度。

因此，人们可以接受下述观点，即这样的变化对殖民地非洲并非新颖，而且没有任 489 何非洲社会同欧洲人接触而不受相当程度的影响，也没有任何非洲社会在接触中遭受破灭。人们也必须承认，在殖民统治下，变化这个思想概念已为非洲统治者和他们所谓的朋友们所自觉接受，甚至那些殖民官员，他们强烈主张间接统治的政策和做法，强调保留传统体制和价值，也认识到变化的必要。确实，在间接统治下，人们希望当地的体制机构和统治者能够作为引进变革的媒介，引进的数量和方式都是殖民当局所能接受的。各个殖民地的行政当局都认识到变化是使非洲现代化的唯一方法，也是使非洲进入（对西方有利的）西方轨道的唯一方法。当地的上层精英也都赞成通过变化的途径使非洲站立起来并使非洲国家在世界各民族大家庭中成为平等的一员。

变化的主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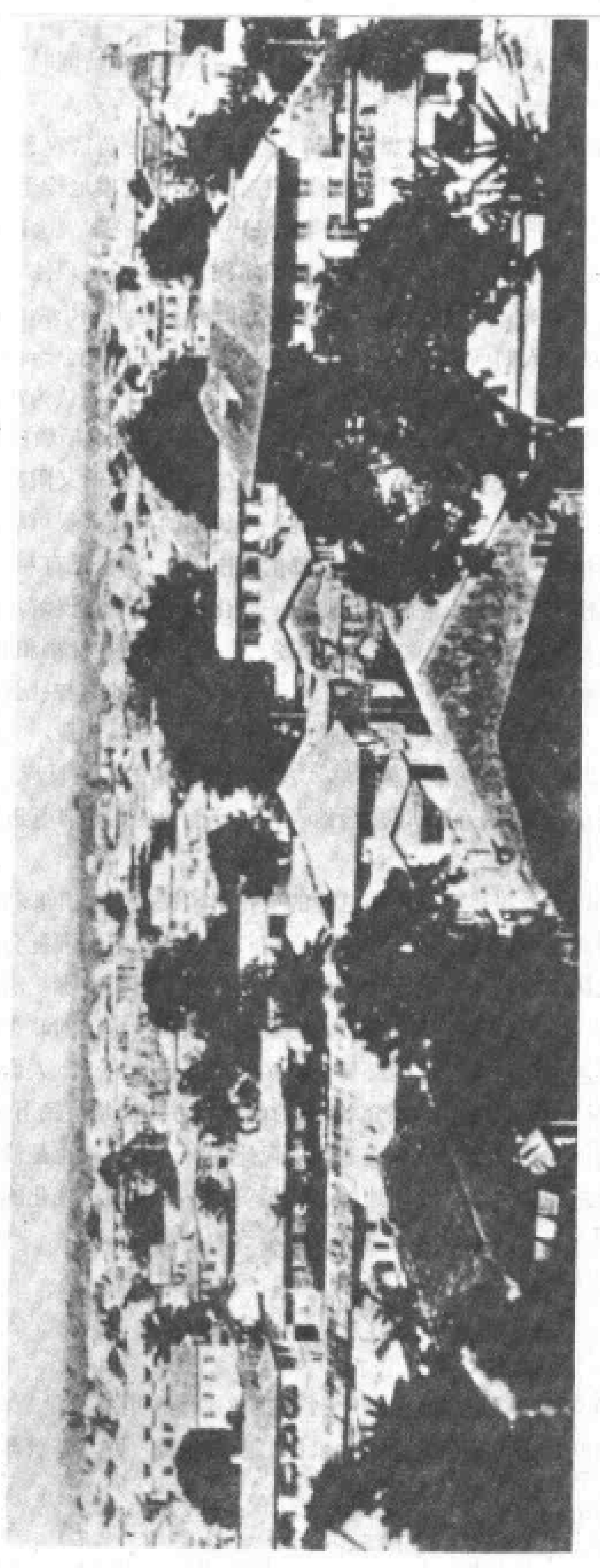
在改变殖民地非洲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是易于一一列举的。它们是殖民征服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上的殖民、西方教育、西方基督教、西方经济力量

① S. 利思·罗斯(Leith-Ross)，1939年，第293页。

② M. 里德(Read)，见V. 特纳(Turner)编，1971年，第362页。

③ J. R. 古斯菲尔德(Gusfield)，见J. L. 芬克尔(Finkle)和R. W. 盖布尔(Gable)合编，1971年，第19页。

490



图片 19.1　殖民统治下西非的主要港口之一——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全貌

和日益增长的城市化。这些力量的大部分，特别是军事征服、政治上的霸占和巩固以及经济上的剥削，究竟怎样渗透非洲并牢牢掌握非洲社会的具体细节，已在本卷其他各章叙述。现在留下来要说的先是城市化和西方教育，接着再分析所有这些力量联合产生的社会影响。

在谈及城市化时，有必要强调变化的这一重要力量并非欧洲人统治引进非洲的。相反，在欧洲殖民主义进入非洲以前的好几百年里，这一力量一直在发生作用，它为职业专门化、人口的聚集、社会的流动等等提供全部机会。在北部、东部、西部和南部非洲沿海以及诸如苏丹地带和约鲁巴兰那一类的内陆地区，由于政治稳定和国际贸易的促进和影响，全部古代市镇中心和以后陆续形成的城市集聚中心都在那里。但是不可否认，欧洲人的统治确实给非洲城市化带来新的动力。因为它加强了已经向那个方向起作用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其结果是在许多地方兴起新的城市中心（如尼日利亚的伊格博和伊比比奥地区，那里过去没有经历过城市化）以及许多旧的中心进一步扩大。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改进了交通工具，建设起新的政治和行政总部以及新的贸易、矿产和农业开发的中心。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850 和 1950 年间是非洲大陆与欧洲接触并受外国统治的关键性的一个世纪，一百年间非洲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 3.9%，而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 2.6%。这就清楚地说明殖民地非洲城市普遍迅速增长的原因。城市发展和膨胀的新的突然加速意味着它在社会变化中所起催化作用的增强。 491

不同于城市化，西方教育确是欧洲带给非洲的，虽然这种教育不是由西方机构单独传播的。正确的说法是，非洲的教育革命是三个与其利害休戚相关的集团所起的作用——基督教教会、殖民地政府和当地非洲人的积极性，以排列先后表示重要的程度。对基督教教会来说，学校是关键性的机构，办学是吸收教徒最可靠的手段，也是会众得以长期自行保持的最可靠手段，会众的存在可以保证教会在白人传教士撤退的情况下仍能继续办下去。教育事业和传播基督教福音在非洲许多地方是如此紧密相关，以致在非洲许多地方“支起传教士的帐篷”已经成为建立学校的同义词。在恩古尼人中，据说每次开办学校都是建立教会的先声。④

至于殖民地政府，则希望通过学校培养所需要的充当殖民官僚机构下层的低级办事人员，以期在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各个方面创造条件，使欧洲人能尽可能开发他们认为至今尚未充分开发的非洲资源。为此目的，殖民地政府不仅建立和办理世俗学校，而且以津贴的方式支持教会的教育事业。此外，殖民地政府推行政治上的殖民，使教会可以深入非洲大陆的腹地，毋须担心他们代理人的安全。政府创办的世俗学校对非洲的许多穆斯林地区传播西方教育特别重要，因为政府害怕那里无限制的教会活动会引起穆斯林的暴力反应。

关于当地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殖民统治建立之前，埃及和马格里布各国的统治者业已引进了西方教育，作为填补他们的社会和欧洲之间在技术上差距的努力的一个部分。在黑非洲，当地的积极性在传播教育中也起了某些作用。从 20 世纪 20 年代

④ M. 里德，见V. 特纳编，1971 年，第 359 页。

起，基库尤文化界的民族主义者建立和管理他们自己的学校，这种学校和教会学校不一样，它们赞成基库尤文化。在乌干达和南部尼日利亚，当地的统治者和头人与殖民地政府或教会联合建立学校。在这些地方，有些新兴的上层精英也自己建立和管理学校，特别是在中等教育一级，由于经常感到自力更生的需要，导致他们往往创办独立于殖民地政府和教会的技术中学，而很少办普通中学。

492

虽然要笼统地列举引起殖民地非洲社会变化的各种力量是容易的，但要举出每一种力量带来的具体变化却不那么容易。事实上每一种力量的影响是那么深入，因此要指出所有事例中哪一种力量究竟引起什么变化是没有意义的。

例如，军事征服和殖民地政府的建立，不仅打败了旧的政治和军事首领，而且也打败了传统宗教的垄断者和掌握巫权者，因为后两者也同样参与抵抗运动。因此，抗击殖民主义列强的战争的失败，很容易导致对旧祭司和神的信仰的丧失，而且导致皈依想象中更优越的征服者的信仰。征服者的成功还有其他方面的效果。旧时的军人阶级在新体制下再也不能在他们原来的岗位上继续以当军人为生。旧的政治官吏原来以统治人民为生也无法继续统治了，除非他们被招募进入殖民地的政治机关，或者成为间接统治下的"本地当局"，或者成为所谓直接统治下的税收官员和收集情报的代理人。换句话说，许多旧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和宗教界的上层分子不得不接受代替旧职的或另外设立的新职务。因此，那些抓住外国统治提供的新经济机会的人并非全是单纯对新经济体制的吸引力的反应。某些移居新城市中心的人，他们的行动不是受城市生活的诱惑，而是因为军事征服和随后的政治上的殖民，使他们在农村的地位逐渐被废止因而立脚不住。总之，殖民者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胜利在许多地方震撼了社会的根基，并要求各个阶级对新的体制作出适当的适应。

基督教的引进也复如此，基督教试图废除传统的神祇和信仰。例如，在基督教扎根的任何地方，许多传统的祭司和其他搞迷信的人物就得另行就业。奴隶获得自由，这就强使那些过去依靠奴隶劳动生活的人要靠他们自己做工，或者转而依赖工资劳动生活。过去为神灵和妖魔保留的土地现在拿了出来，有的作为耕地，有的作为建立社会新兴机构之用，如学校、医院等等。年轻的一代进学校上学、学习新技术，学会技术为政府、商行或教会所雇用。因为这些职业的大部分只有在城市地区才能找到，这就意味着皈依基督教也可以看成为要想生活在城市里的预先安排。再举一例，一个人可以到城市寻找经济的发展，他同时仍然可以坚定地忠诚于传统宗教。但是过了一定的时候，他与家乡神祇的神殿和宗教礼仪在肉体上长期疏远，同时新环境里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压力，使他逐步转变为勉勉强强的基督徒了。一种社会力量如何经常产生多种影响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493

新的社会结构

外国统治对非洲社会产生的许多后果中，最立竿见影的是政治后果。原有的非洲国家，除了利比里亚和1935年以前的埃塞俄比亚，全都丧失了大部分的主权以及它们参加

世界事务的权利，除非间接地通过它们的新主人；甚至非洲邻近部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权利（除了最起码的和非官方的联系）都受严格的限制，如果这些邻居，发现他们现在是在所划的殖民地边界线不同两方的话。举例而言，尼日利亚的埃菲克人去喀麦隆传统市场的道路被割断了；约鲁巴人被剥夺掉直接公开参与达荷美（今贝宁）境内那些地区事务的权利，那些地区以前是大名鼎鼎的约鲁巴帝国的组成部分；同时，安哥拉的巴刚果人和他们在加蓬和法属刚果的亲友无法有比较密切的交往。

进而言之，外国统治者改变并简化了非洲的政治地图，过去这里是无数疆界不断变移和含糊不清的相互对立的独立国家和村社共同体，而现在我们却有了固定的和疆界清楚的几十个殖民地。在国际边界会议和国际条约中都曾试图考虑先前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区域。然而，还有其他角度的考虑，例如相互竞争的列强的权利要求、自然边境（山山水水）的吸引力、以及经纬度线，这些考虑常常比非洲人的要求有更大的份量。结果是，关系紧密的有时先前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往往发现被划在列强同意的边界线的两方。

如果说部族完整的长远要求经常不受尊重；那么被征服国家和帝国对领土完整的眼前要求就更不会受到尊重。索科托哈里发国统治区和博尔努帝国在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的边界线确定时，丧失了大块领土。萨摩利·杜尔和拉比·伊本·法德莱拉的“游牧帝国”的命运是干脆被毗邻的欧洲人殖民地瓜分殆尽。中非的姆西里和提普·提卜的次等帝国同样被比利时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所瓜分。过去殖民主义和国际法把持下强加在殖民地头上的陈腐的边界线如今变成了非洲独立国家的国际边界线，所有民族时时为这种边界线而牺牲自由和权利。时至今日，没有一场重大而剧烈的变动，要期待这些边界线中的任何一条有重大变动是没有可能的。非洲之角发生的事态表明，在非洲地图上这些凭想象而产生的边界线是永久不变的。 494

值得一提的新政治结构的另一方面是把外来的欧洲官僚行政结构强加在先前的非洲政治体制之上。在欧洲和非洲结构之间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关系模式。我们举本章所述的时期内两个领头的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的政策为例，就可以发现在它们每一个的制度内部都有不同。法国人对他们所征服的帝国、王国和酋长国比起英国人来很少关心维护它们的原状，而是把法国的政治制度加在当地的行政管理上。因此法国人往往打破旧的最高权力机构，发给养老金让统治者退位，而英国人则努力把当地的统治者和他们的政治体制拴在他们帝国的行政机构上。这是一般的模式。但是在摩洛哥，法国人却力求维持国王和他的政治体制，并在行政上继续加以使用；而英国人有将近 30 年在黄金海岸（今加纳）的阿散蒂以及 20 来年在尼日利亚的贝宁，都是采取打破这两个帝国当地原来的行政体制的办法。⑤

然而，我们发现即使在北部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埃米尔酋长国，殖民国家和埃米尔们之间的利益看来相当和谐，但是欧洲的行政体制和当地的行政体制之间却从来没有有机的联系。结果是，殖民地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如纯世俗方面）两种体制能并肩运行，而在某些其他方面，彼此却独立地工作，有时还抱着相反的目的反其道而行之。

⑤ A. E. 阿菲格博(Afigbo)，见J. F. A. 阿贾伊(Ajayi)和M. 克劳德(Crowder)合编，1974 年。

在殖民时代早期就已引人注目的外国统治对社会的另一个影响就是非洲人的地位普遍下降。殖民主义至少在大陆先前存在的阶级结构之上，加上一层额外的领导人和引导者。在东非，殖民者鼓励亚洲人移民，殖民主义事实上加上了两个阶级。在各个殖民地，欧洲人都是政治、经济、和教育权力的垄断者，除了东非有一小部分经济权落在亚洲人的手里。在这种形势下，非洲人成为几乎没有权利的人，仰求欧洲人有时仰求亚洲人的领导和示范。

这种社会关系的结构以虚构的种族理论为支柱，这种理论试图把人类大家庭不同的分支排成一个文明的等级次序，非洲人（黑人）在阶梯的底层，而欧洲人则占据顶层。特别在南部非洲，那里的白人移民与人数大大超过他们的班图人处于长期冲突之中。那里495的种族主义理论特别严厉，白人滥用圣经的权威以加强冒牌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针对黑人来说，这种理论假定当地人文化贫乏，这样就有必要和可能以含米特人的影响来解释非洲的历史和社会进化。

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种族主义理论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一种否定非洲人的政策，不管非洲人受过多好的教育，在殖民地政府机关中不可能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在西非，种族主义理论意味着从 19 世纪中期对非洲人的开明政策的后退，这种政策一度使非洲人能够获得与欧洲人相同的岗位。上述理论在城市还导致非洲人与欧洲人被强行隔离。城市里不但有欧洲人的居住区，还有欧洲人的医院、欧洲人的俱乐部以及其他设施，并与专为非洲人使用的建筑物截然分开。所有这一切的作用是使非洲人产生一种自卑自贱的感觉，使他们丧失自信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总之，使其思想状态常常处于不加鉴别地模仿欧洲列强。然而幸运的是，某些非洲的先行人物被所有这些论断所激怒，他们引用历史事实和基督教义对殖民主义整个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外观表示怀疑。他们这样做，大有助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铺平道路。

从宏观上看，非洲殖民统治往往使种族的不同转化为阶级的分野。但是比较细致的分析表明，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的非洲人整个形成单一的阶级。开始时是继续保留着殖民前的阶级结构，但是新的变化力量及时地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新安排，并出现了新的阶级。

虽然殖民前的非洲曾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不少的途径，使人们能够通过个人成就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它的阶级结构却过分重视出生门第。不仅仅官员职位，而且某些受人尊敬的职业（诸如祭司和家庭经营的铁匠）情况也是一样。外国统治却为非洲社会结构带来意义深远的变化，它的方法是简单地强调个人才能和成就，而不论出生门第，在非洲社会结构体制的传统操纵者控制所不及的地方提供许多上升的机会。此外，它亵渎许多非洲机构和体制，以破坏旧贵族的权威和尊严，并侵蚀他们所保持的令一般人敬畏的威望。

殖民地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由于废除奴隶和宣布在世俗和神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传统社会最下层的人民提供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和命运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

城市中心不论姓氏门第，给以前的奴隶和与之雷同的人提供可以不受历史阻碍而活496动的舞台，从而加强了法律和道德革命的效果。同样，城市中心对农村地区其他阶级的



图片 19.2 求知——乌干达门戈CMS中学在上课

人一直有而且至今还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有些人来到城市，出于本人自己的意志去寻找财富，其他一些人进城是为了对付农村地区，特别是白人移民垦殖区殖民当局的税收和土地政策。那些迁入城市定居的人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掌握高技术，很快上升为新的上层精英，或者徘徊于那个阶级的边缘成为次一等的上层分子。那些运气差的移居城市的人，很少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则沉沦到城市社会的底层，成为市民群众，有些学者称之为城市无产阶级，他们中许多人发现自己只能任凭雇主的支配。另外有些人则学点手艺知识，建立起独立经营的各种各样能存在下去的买卖。他们不同于他们的农民兄弟，不是凭土地谋取生活，他们与现代影响关系较密，住在贫民窟。

新兴的社会上层精英和城市无产阶级都是改变农村殖民地社会的重大动力，但是前者无可置疑地在殖民地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上起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超过城市传统的上层分子以及城市和农村广大群众的地方是他们有文化。事实上在非洲非穆斯林地区，外国统治的最重要的唯一革新便是学文化。甚至在穆斯林地区，罗马文字文献的传入对穆斯林教育是个新的促进。文化对许多非洲人具有一种新的魔力，它看来能打开现代世界的宝藏，于是非洲人不惜任何代价来追逐它。只有理解非洲第一代职员、译员和教员所施展的力量、权力和影响之大，才能懂得文化对于非洲各族人民的魅力。文化使上层精英得以接触西方世界的科学和社会思想，使他们有能力在非洲的命运问题上同殖民国家进行对话，使他们熟悉欧洲社会的风尚。这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便为本国不甚幸运的同胞所竭力模仿。

但是，不是殖民地非洲所有的新兴上层人物都是因为接受教育才进入这个阶层的，也不是所有因受教育而进入上层的人都达到一律标准。如露西·梅尔教授和其他学者所指出，某些人之所以能进入这个阶层是因为他们从经营大农场或大商店赚了钱，可以资助受过较好教育却比较贫困的兄弟的政治抱负。⑥ 乌干达的某些棉花和咖啡农场主，尼日利亚西部和黄金海岸的可可农场主，科特迪瓦的咖啡农场主以及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花生农场主都能获得新兴上层阶层成员的资格，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经营上获得成功。同样，特别是在西非，许多只受过一点点教育的非洲人能置身于初级产品生产者和欧洲大商业公司之间充当经纪人，他们商业上的成功也为他们进入上层阶层提供通行证。然而还有些人之所以被认为是上层人物，因为他们掌握着群众组织(例如工会)，他们能给予受过较好教育的上层精英以群众支持，而后者迫切需要这种支持，以使殖民国家相信他们是人民的喉舌。相反，在东非和中非，允许进入上层集团的非洲人相对的少，这是殖民地统治者有意执行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印度、葡萄牙和希腊小商人活动的结果。事实上在不少这类地区，原来的上层分子实质上已经消失。

498

主要由于上层人物的资格和背景极不相同，因而要精确地为何许人算得上殖民地非洲新的上层人物下定义是相当难的。人们合理的结论只能是：在殖民统治时期，任何非

⑥ L. 梅尔(Mair)，见V. 特纳编，1971年；P. C. 劳埃德(Lloyd)编，1966年；M. 基尔森(Kilson)，见L. H. 甘恩(Gann)和P. 杜伊格南(Duignan)合编。



图片19.3　殖民地的板球——造就新的社会精英

洲民族中新上层阶层兴起的问题，主要是该民族能够得到多大数量和哪一种教育和经济机会，以及他们能把这些机会作多大有效运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迄今为止进行的全部研究表明，凡宣传西方教育最得力，为非洲人提供从事贸易和商业性农业机会最多的地区或殖民地，能产生的上层精英人数往往也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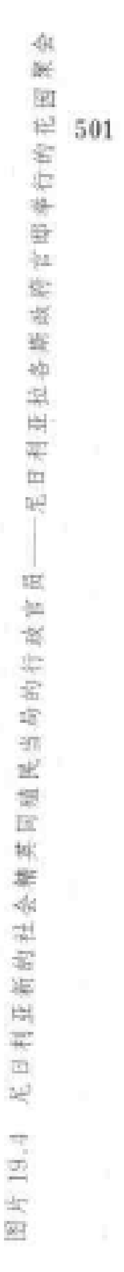
非洲有些部分，尤其是尼日利亚的伊格博、伊比比奥、奥戈贾、蒂夫、伊多马、比罗姆、安加斯和瓜里等没有酋长的民族中，那里很难识别传统的统治者并使他们替殖民政府做工作。于是许多在殖民前原只是一般平民的人当上了新兴的上层人物，其中有些甚至来自奴隶阶级或来自尚未同化的移民。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这些阶级的成员在传统上层人物退出舞台的时候往往首先接受西方教育，力求投身于新的职业，并移居到城市中心。但是一俟西方教育的好处和新职业的利益得到证实，传统上层阶层的成员也会参加进去。某些殖民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英国，有意识地以多种效果来鼓励这些觉醒较迟的传统上层集团，诸如为他们建立特殊的学校。这些人拥有用自己的产业或作为地方当局薪俸得来的财富，因此他们往往有条件培养自己的儿子们，使他们不仅能进当地的高等学校，而且可以进欧洲和美洲的高等学校。

但是在非洲的另外一些部分，传统的上层人物很早就响应号召，接受西方教育和现代化商业企业。在埃及，就是这个阶级带头建立西方式学校的。在布干达，同样是这个阶级最快认识到西方教育和商业性农业的好处。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阶级对西方教育也采取同样态度，把孩子们送到欧洲和美洲受教育。正是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保持在本国土地上的领导地位。

新兴上层人物包含社会许多不同阶层人士这个事实，使轻易随随便便就大谈其新兴上层人物与传统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够慎重的。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有相当一段时候新兴上层阶层并非由这个地方的当地人组成，因此沿海的上层社会和内地的传统社会存在冲突和竞争的倾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前者对传统领袖往往不屑一顾，而传统领袖则对前者持有根深蒂固的怀疑。19世纪黄金海岸（今加纳）和约鲁巴兰（尼日利亚）许多新兴上层集团的创始成员（或至少人们认为他们是如此）与内地民族有血缘上的关系。

非洲还有一些地方（在那里第一代新兴上层人物中不包括遣返回国者，诸如从奴隶船上解放的奴隶或从南北美洲返回家乡的非洲人），人民在部族和文化上的关系甚至更为密切。其结果，在整个19世纪，甚至在本世纪的早期，那里的新老上层分子建立起了合作的传统，新兴上层人物被认为是当地社会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媒介。总之，新兴上层人物能够学会新的技能去帮助他们的人民适应欧洲人来到后出现的问题。在黄金海岸和在埃格巴兰（尼日利亚）新兴上层人物与传统的上层分子在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和抵制欧洲人统治的斗争中共同合作，只是这种努力没有成功。

但是随着殖民统治扎根渐深，新旧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新兴的上层分子错误地期望：欧洲要使非洲现代化，必将使用他们集团的成员作为完成这一目标的工具。但是在殖民统治下，实际上是欧洲人的官僚们承担了新上层分子为自己安排的任务。殖民行政当局并没有要新上层人物成为工作的伙伴，反而愿意使用降职到地方政府的传统统治者。这种情形特别在英国统治下的非洲更为普遍，在那些地方英国人努力维持原来



图片19.4 尼日利亚新的社会精英同殖民当局的行政官员——尼日利亚拉各斯政府官邸举行的花园聚会

的统治家族，1906年后比利时统治下的非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甚至在法属地区，极大部分的酋长领地已被摧毁，但旧统治家族有时还是被保存了下来，有一部分人被用做村级和区级官员。至于那些没有传统阶层的地方，在地方政府供职的人常常被命名为“酋长”，并分派给他们和传统统治家族的成员同样的职务。

502　因为新上层分子受到排斥，他们公开反对殖民列强，这种公开反对，传统统治者并不参加。他们得以继续存在完全依靠殖民列强，因此手脚被绑住了。同时也由于传统统治者的大部分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无法参加新上层分子夸夸其谈的辩论。无论如何，如果他们接受新上层分子的论据，他们将听任自己降到第二等或甚至第三等地位。由于他们不是站在新上层分子一边，后者把他们视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反过来，他们把新上层分子视作革命者，认为这些人要摧毁万古常存的习俗，要把世界颠倒过来。

双方都受帝国主义宣传的挑拨，投入自命为人民代言人的斗争，这使事态更趋恶化。新上层分子自称是人民的代言人，传统统治者则加以否定，声称只有自己才有这个资格。殖民政府则支持后者的声称。这种意见分歧所产生的敌意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黄金海岸阿肯-阿布亚夸的酋长纳纳·奥弗里·阿塔爵士与英属西非国民大会领导人之间的纷争，也能从同一时期以哈里·图库的青年基库尤人协会为一方和传统统治者控制下的基库尤协会为另一方的争执中看到。⑦

然而，上述事实还不能使人们得出如下结论，即在1880到1935年期间，新上层人物和传统统治者之间的经常关系毫无例外地只有冲突。这种关系的性质往往随地点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法属地区，在外国统治下新上层分子和传统统治者两者都默默无闻。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专制政权的压制逐渐缓和，当时涌现出来的法属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也包括传统统治者及其后代。

在黄金海岸，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崛起前的主要政党——统一大会党，曾代表新老上层分子之间的某种和睦关系。如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布干达等地区的传统统治者积极对西方影响作出响应，他们和新上层人物之间没有出现必然的冲突。在伊格博人那样的社会中情况也相同，传统上层分子在殖民统治时期早已没有原来的那种统治者的气势。在任何情况下，新上层人物不全是帝国主义神话里那种毫无根基的当地人。传统统治者也不全像后来民族主义者所说那样，是蒙昧主义的反对改革者。两个集团在人们一般公认的偶尔争论的短暂冲动之外有更多的共同点。

新组织的兴起

503　殖民地统治除了使新结构兴起外，还对非洲社会结构引进别的许多变化。这里，我们要谈一谈新组织的兴起，这些组织作为媒介有助于许多个别人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庭适应殖民地社会新的要求和规范。这种新组织一向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是“自愿”发起的。它们之所以被称之为“自愿”，仅仅由于人们加入这些组织不必具备诸如门第、村庄或部

⑦ D. 金布尔(Kimble)，1963年，第389-396页；K. J. 金(King)，1971 b

族--类生下来就决定的条件。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其中某些组织，特别是以部族为基础的福利或改善生活条件的协会，它们的成员并非自愿加入的，因为参加与否的实际选择，一般是一种被排斥的办法。

非洲学家们对产生这些组织的社会条件看法是一致的。它们一般发源于城市中心，虽然其中某些组织（诸如以部族为基础的组织）及时建立了农村的分支机构。事实是，如沃勒斯坦教授恰当地指出的，人们从“传统的农村迁移到现代城市地区”，导致“个人的情绪混乱与迷惑方向”。⑧ 因此，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殖民地政府都无法插手和解决这类移居者的需要，他们必须逐渐地发展自己的机构、体制和准则，使自己能在城市这个陌生而令人兴奋的社会环境里有意义地生活下去。

戈弗雷·威尔逊研究东非时指出，在殖民地社会的压力和那些组织的建立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关联。正因为如此，肯尼亚的非洲人由于他们的传统文化受到殖民统治和白人拓居者侵入这一非同寻常的双重压力，他们就比邻近地区如坦噶尼喀和乌干达有较强和更多基于部族的协会。由此可见，协会的形成包含有个人自我保护和自我稳定的因素。此外，城市的生活条件，创造了使这类组织较易组成的机会，正如托马斯·霍奇金指出的，城市提供了“物质中心……，那里具有共同特定利益的男男女女，可以互相交往。”⑨

虽然有人正确地指出，要把各种组织清晰地分门别类是困难的，特别因为它们的职能实在多种多样。但这里我们还是把它们大致分成为三类。

第一类可以说是纯社交性的组织。它们旨在推进社交和娱乐。由于城市中没有传统方式的文娱、憩息和公民训练（如化装舞会、同年龄组交往和传统节日活动），这些组织就成为十分必要。还有各殖民地欧洲人社会中大肆宣扬的现代欧洲社会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吸引力，也是一个促成因素。这一类组织包括足球俱乐部、男女童子军、辩论会和校友会。 **504**

第二类组织是同部族的联合会。这类组织是农村部族集团向城市地区的延伸，可分村庄、氏族和部族三个等级。它们主要起两种作用，一是帮助新来城镇的人，使其尽可能顺利地适应城市生活条件。一个人刚进城市，他首先接触的总是他本村庄或氏族联合会的成员，后者会协助他找到住所并介绍他到雇主那里劳动或到工匠师傅那里学习现代技术。这些人也教导他在城市中应该如何举止。会员有困难时能通过这种组织得到帮助。一旦他们的生意受到损失还可获得贷款，继续经营下去。凡经过这类组织批准的丧葬、结婚和其他费用，根据具体情况也能得到贷款或捐款资助。⑩

部族联合会的另一作用，是给“国内进步的舆论提供渠道”，特别是通过国内会员与

---

⑧ I. 沃勒斯坦(Wallerstein)，见J. S. 科尔曼(Coleman)和C. G. 罗斯伯格(Rosberg)合编，1970年，第319页。

⑨ T. 霍奇金(Hodgkin)，1956年，第84页。

⑩ 关于部族为基础型的自愿协会的兴起和所起作用的精辟分析，参阅M.班顿(Banton)、见沃勒斯坦编，1966年，第402-419页。

国外会员之间保持组织上的联系。要这样做他们得对家乡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感兴趣。开始时，此举使联合会受到多疑的殖民地官员的反对和阻碍。例如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国家仍然牢牢抱住使用土著人当局的思想，这些联合会的形成，引起了官方圈子的不安。这些联合会的活动好多次成为秘密情报机构调查的目标。

第三类组织是工会，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要与雇主进行谈判。因为大部分现代城市中心出现于活跃的商业、采矿业和交通枢纽，那些地方有雇佣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机会。所以这些城市很快成为人们聚集处所。这些人主要靠能挣到工资或薪水的工作谋生。这些人，特别是在最低一级劳动岗位上工作的那些人，往往被不恰当地看作是马克思观点分析中的无产阶级。除了被大雇主的工资所束缚的那些人外，（大雇主有殖民地政府、商业或矿业公司、教会等等），还有独立劳动的工匠，他们为城市人口提供一定的日常必需品。

这类城市居民的生活被紧缚在变化莫测的世界经济和市场上，虽然它们的结构和行为这些人毫不理解。在这毫不熟悉的经济世界里，为了自我保护，拿工资或薪金的劳动者组织了工会，目的在于有效地同雇主谈判以取得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条件。独立劳动的工匠，也组成同业行会，这类组织旨在固定价格标准、制订学徒细则等等。工会和同业行会也常能起到联系感情的作用，以金钱和建议帮助有困难的成员，并为会员安排适宜的葬仪，提供受教育的条件和奖学金，偶尔还举办宴会。

505

1880至1935年期间，这些新组织逐步涌现。基尔逊教授指出，到1937年，在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肯尼亚和其他地方所有行业的商人和工人都已有了组织。他的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如金布尔教授对加纳的研究，耶苏富教授和阿纳纳巴先生对尼日利亚的研究、V.汤普森和R.阿特洛夫对法属赤道非洲的研究和R.H.贝茨对赞比亚的研究，都清楚地表明，这些组织的黄金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真正来到。①

出现这种情况的理由很多，这些组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教育传播的广泛程度，这方面的影响和城市化的影响一样，真正显示出来需要一定时间。除了西非的海岸地带、马格里布、埃及和肯尼亚外，这一般需要30多年的时间。在南非，那里由于早期的工业和交通革命，条件应该是相当理想的，可是越来越蛮不讲理的布尔人民族主义和其他白人的反对，抑制了非洲人的能动性。这些组织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据说殖民地非洲只有“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它基本上依靠移居的工人（劳动力的一种），而据说这类工人不愿加入工会组织。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殖民地非洲，挣工资的人数还很少。20世纪50年代这一数字估计为400-500万人。最后还有许多禁令加上专制和剥削成性的殖民地政权，大部分殖民当局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或40年代早期才承认工会的合法性。

如上文所述，外国统治的社会影响在整个非洲大陆远非完全相同。关于教育的传播、新经济力量的取胜和城市化的扩大，以及由此而来的新上层分子的兴起，西非的步伐看

① 例如M. 基尔森，见L. H. 甘恩和P. 杜伊格南合编，1970年；D. 金布尔，1963年；T. M. 耶苏富(Yesufu)，1962年；W. 阿纳纳巴(Ananaba)，1969年；V. 汤普森(Thompson)和R. 阿特洛夫(Adloff)，1960年；R. H. 贝茨(Bates)，1971年。

来最快、后面按顺序是埃及、马格里布、南非、东非和中非。如果我们不以地理区域而以殖民国家来作比较，我们发现，英属领地发生的变化较大，后面是比利时和法属非洲，葡属非洲远远落在最后面。甚至在英属领地之中，所受的影响也有差别。变化明显的英属地区是埃及、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乌干达和塞拉利昂，随后是肯尼亚和南北罗得西亚(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如果我们拿殖民地逐个来分析，我们发现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的南部远比北部发生的变化更大。另一方面，在法语非洲，西非殖民地位居第一，后面是北非殖民地，最后是法属赤道非洲。在法属西非内部，塞内加尔和达荷美(现贝宁)占领先地位，其他殖民地远远落在后边。 506

事实上，变化的扩展和影响受许多因素的控制，而决非任何殖民地政府或者非洲部族所能任意支配或主宰。首先，在列强强加的殖民统治时期，存在着某些特定领地或地理区域与欧洲接触的时间较长和范围较广的问题。西非和南部非洲自 16 世纪以来就与欧洲保持相当正规的接触。因此到 19 世纪初期沿海一带有好几个地方已经存在半城市化生活条件，如圣路易、班珠尔、阿克拉、拉各斯、奥伊尔河诸港口、罗安达以及开普。这些地方为传播西方教育和西方基督教以及西方商务渗入内陆提供了阶石。另一方面，非洲大陆的东海岸只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前后才与欧洲保持经常的接触。

这种时间因素的区别，对于试图说明非洲不同地区和国家所受变化影响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欧洲建立统治之前的 19 世纪这一部分时间，是欧洲同非洲关系最为开明的阶段。在废除奴隶贸易和强加殖民统治之间的这段时间，欧洲大致上准备鼓励涌现一批合乎条件的非洲人在促使这个大陆走向“文明”的事业上与之合作。这意味着鼓励非洲人在教育和商业方面的能动性。结果是西非通过这种政策的运用获益最大。

但是，强加的殖民统治连同伴随而来的狭隘的种族歧视政策，使非洲自由民参与教育事业和商务的道路上布满了种种障碍，结果是早期的自由政策在外国统治开始时尚未扎牢根基的那些地区受到的阻碍最为严重。殖民国家一般对非洲新兴上层分子抱有疑虑，设法使用放慢发展学校的办法限制他们的成长扩大。而成功地从学校毕业的那些人，由于不准他们进入殖民地机关工作而受到打击。同时他们参加新商业公司的机会也被限制到最低程度。

至于这一地区有无白人移民，对于变化影响的大小同样十分重要。在西非，白人移民极少，这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西非人在教育和经济事务中相对地进步较快的原因。但是在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南北罗得西亚、南非和葡属领地白人移民则大批地流入。在比利时刚果，白种人移民不多，但是公司统治和移民影响同样粗暴和苛刻。这些移民的利益和非洲人的利益相冲突，于是白人利用他们对殖民地政府的影响，阻挠或抑止非洲人的发展。 507

最后还有一个非洲人对外国影响反应各不相同的问题。在尼日利亚，伊格博人比富拉尼人在接受西方文化上远为热忱。在肯尼亚，基库尤人比邻近民族更早看到西方教育的优势。伊斯兰的文化保守性和排外性（特别在西部苏丹）往往妨碍西方影响尤其是西方教育的扩展。另一方面，在北非和埃及，居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上层分子试图保证在引进西方科学和商业的同时使伊斯兰文化长存。他们的这种立场导致伊斯兰文化和西方科

学思想的结合，产生丰硕的成果。由于西部苏丹穆斯林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显出类似的能动性，他们对付殖民地统治者的挑战就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结果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可能决定这个地区可以接受哪一种类型的西方影响和影响的程度应是多少。

（吴壬林译）

20 殖民地时代非洲的宗教

K.阿萨雷·奥波库

强加于非洲的欧洲殖民统治，不仅仅是在各殖民地建立起强大的欧洲人政治、经济 508
和社会力量，同时也是文化上强迫非洲人服从，利用文化来支持殖民主义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上层建筑。本章所讨论的是殖民统治在宗教方面的体现以及非洲人对它的反应。

殖民统治前夕非洲宗教生活状况

殖民统治之前时期的非洲传统宗教

传统的非洲宗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非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正如伊曼纽尔·奥比奇纳贴切地说的：

> 人类经历的所有重要领域几乎全都与超自然现象、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虔诚相联系……这些……是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部分，它们对于正确地解释传统社会情况下的经历是非常必要的。①

宗教在非洲各族人民整个生活方式中这种无所不在的状况，使得传统宗教在它从之产生的文化结构中具有明显的完整性。

传统宗教的基础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包括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看法，而且也包括他们对宇宙的性质、对人的本性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对于在各地有着不同称呼的神的性质的认识。上帝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神灵，他没有形象，也即没有肉体的肖像，而被认为是宇宙的造物主和扶持者。权力、公正、善行和永生都归于上帝，而作为一切权力的源泉，上帝掌有生死之权。他给人奖赏，但是在人们堕落时他也 509
惩罚他们。他在许多方面好比是人类社会的太上皇，是所有事体中的最后权威。总之，上帝不像人类，他完全在造物之上，但是同时他又卷入人事，赡养万物，伸张道义。人类倚赖上帝作为高于自己的力量。因此，上帝是超越宇宙的，同时又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内的。

① E. 奥比奇纳(Obiechina)，1978 年，第 208 页。

510



图片20.1 赞比亚一次割礼仪式中的"马基希"(Makishie)角色。舞蹈者代表着祖先的神灵

神灵分一系列等级。上帝之下是祖先神灵，他们总是受到敬畏。然后还有一些神祇，他们被认为具有给人类以奖赏或是以灾难、疾病乃至死亡降罚于人的能力。各种的神都有他们的崇拜者、祭司和神龛，他们之中有一些同周围环境的各种事物特征有联系，但是这些具体可见的物体只是神的住所而不是神的本身。

除这些超自然的存在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精灵或神秘力量，由于他们能帮助人类或为害人类而受到承认、获得重视。其中包括施行巫术、魔法和妖术的人。最后还有用于保护目的和用于攻击目的的符咒、护身符和避邪物。

关于人的总概念是：他是非物质本体和物质本体的复合物。人的非物质部分（灵魂）在他死后仍然活着，而物质部分（肉体）在人死后便分解了。因此死亡并没有结束生命；它只不过是生命的延伸。死者仍是社会的成员，据认为有一个死者的社会与生者的社会并存，两个社会之间有着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是由死者、生者和尚未出生的人组成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家系。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人就意味着属于一个社会，那就要参与那个社会的信仰、典礼、仪式和节日，② 社会成员的身份比成员的个人身份更受重视。因为社会的基础更多的是义务而不是个人的权利，而个人权利的表现在于履行其义务，这使得社会成为一连串相互间的关系。此外，人生被看作和被理解为是出世、青春期、结婚和生育，以及死亡和来世的循环。一个人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生存阶段；他必然迈向下一阶段；为了使过渡顺利，要举行专门的仪式以保证不发生中断，使前进和新生永远继续下去。③

非洲的传统宗教不仅无所不在，它还使人受看不见的力量的约束，帮助他们同非人类的力量建立恰当的关系。它也使人与他们的同胞结合在一起。宗教起到黏固剂的作用，把各个社会结合到一起，支持它们使它们稳定。此外，传统宗教帮助人们认识和控制各种事件，解除疑惑、忧虑和有罪感。 511

但是情况不是静止的，因为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必然发生变化，而每一代又在其经验基础上增加了宗教和文化的遗产。并没有妒忌之神会阻碍崇信或增加一些新神或新的信仰；出现了新的信徒和神龛，而另外一些则衰落了。有些神证明具有威力，他们的神龛到处遍布，而被击败的部族集团转而信奉征服者所崇拜的神并非罕见。因为生命的特点在于运动，只要发生的变化不违背非洲人的价值准则，它们就会被认为是正常的。

殖民统治之前时期的伊斯兰教

除了传统宗教，殖民统治之前时期传入了两个外来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关于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兴起和传播，前面几卷已有论述。殖民统治之前时期，伊斯兰教的最大扩张发生在19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伊斯兰教的斗士们不满于伊斯兰教对非洲传统宗教做出了不可容忍的迁就，因而宣布圣战，其目的在于坚决复兴伊斯兰教的信

② J. S. 姆比蒂(Mbiti)，1969年，第2页。

③ K. A. 奥波库(Opoku)，1978年，第10-11页。

仰，恢复其原先的纯洁性。这些圣战导致建立了一些神权政治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被强加于人民，于是人们普遍皈依伊斯兰教。这些神权政治国家横跨西非的苏丹地区，从塞内加尔延伸到现今的北尼日利亚，包括富塔贾隆、富塔托罗、索科托素丹国和博尔努帝国。④

在东非，伊斯兰教自海岸向内地推进，但是东非的穆斯林不同于他们的西非伙伴，他们似乎对贸易比对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更感兴趣。他们专心致志于保持自己与内地的贸易联系和永保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然而东非的某些地区经过漫长的岁月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在沿海地带发展起一个新的文化；斯瓦希里文化之产生乃是由于班图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混合。斯瓦希里语如今是东非大部分地方通用的混合语言。

伊斯兰教在殖民列强到来之前就有很大的进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非洲许多地方伊斯兰历法代替了传统的节日循环，以及阿拉伯语的许多外来语和概念被采用到豪萨、富拉、曼丁卡等非洲语中来，使它们丰富起来。朝圣归来的朝圣者采用了新的服装款式，连同在非洲许多地方游历或常住的穆斯林学者和虔诚的信徒们的示范作用，阿拉伯文化开始对非洲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包括穆斯林的建筑、头衔、音乐和阿拉伯文化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在比较富有的那部分非洲居民中间，在苏丹地区尤其显著。

尽管在殖民列强到来之前伊斯兰教取得了许多进展，可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西非一些神权政治国家灭亡了，东非伊斯兰教的贸易和经济势力削弱了。然而殖民统治却为伊斯兰教提供空前发展的机会。

殖民统治之前时期非洲的基督教

殖民统治建立以前，基督教（以前几卷已有述说）在非洲大陆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于7世纪以伊斯兰教的兴起而告终，在沙漠和北非一些地区留下了一些零散的基督教居民区。埃塞俄比亚自4世纪以后一直坚持信奉基督教。15世纪葡萄牙探险活动时期开始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又在奴隶贸易中结束，奴隶贸易紧随探险活动之后，持续了约三个世纪。第三阶段，1800-1885年，这一阶段随18世纪末年欧洲出现了巨大的传教觉醒而开始；从19世纪40年代起的一段时期标志着传教事业自海岸向非洲内地大力推进，而在这以前的时期，传教特点是集中于非洲沿海，主要在欧洲人的海岸飞地，以及在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地理考察活动大大提高了欧洲人对非洲内地的了解，因而使得向内地推进成为可能。此外，很多传教士从戴维·利文斯敦的探险活动及其思想中得到巨大鼓舞；利文斯敦通过他的丰富著作使其探险成果为人所熟知。他认为传教士应该建立一些基督教与文明的中心，它们将不仅促进宗教而且也促进商业和农业。他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沿着古老的商路深入到非洲内地的许多热忱的传教士广泛共有的观点。还应该提及的是医学在19世纪取得的进步，它使许多热带病得到控制，因而使传教士较易于在非洲许多地方定居下来。

④ M. 拉斯特(Last)，见J. F. A. 阿贾伊(Ajayi)和M. 克劳德(Crowder)合编，1974年。

在内地生活的机会使传教士们对非洲越来越了解，这在后来成为19世纪最后25年瓜分非洲开始时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欧洲国家对于取得非洲领土日益感到兴趣，传教士们在非洲一些地方为之铺平道路，并且很自觉地充当欧洲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大部分 513 传教士坚定地认为，假若需要有欧洲人的干涉，那么这种干涉应该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国家。正如罗兰·奥利弗所指出："他们希望确保由他们自己的国人进行干涉，或由最可能为他们教派的工作提供最好机会的大国进行干涉。"⑤

此外，大部分传教士认为，非洲的殖民地政府不仅可以提供深受人们盼望的安全和保护（这能帮助他们纠正奴隶贸易带来的弊病），而且将促进和保证非洲人发展新的经济机会。因此传教士们热情地鼓励欧洲人的干涉行动，特别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认为在道义上那是正当的事业。

非洲的传统宗教与殖民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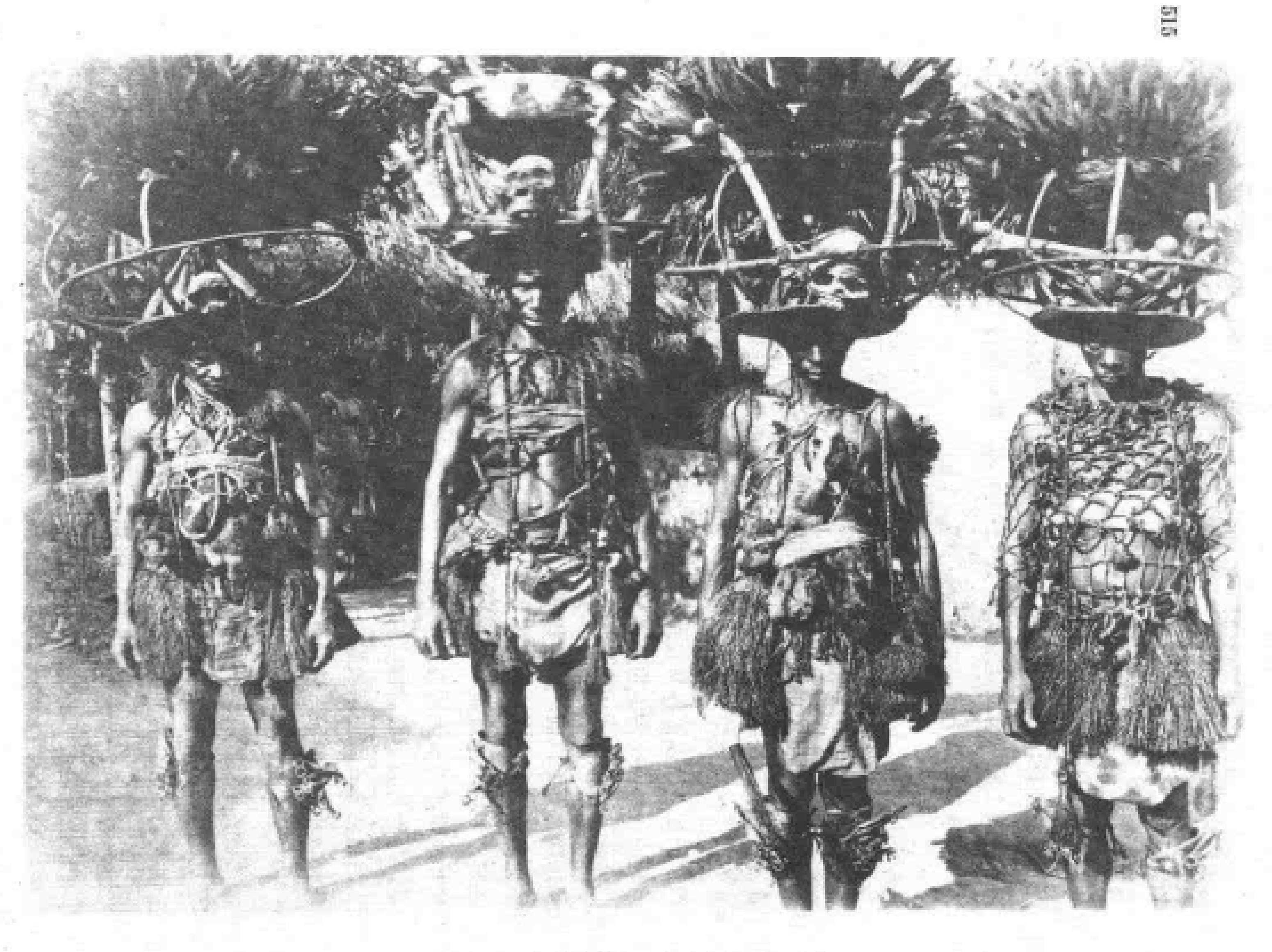
1885年起在非洲建立的殖民统治使得欧洲势力向内地深入传播，而在这以前欧洲势力集中在沿海。在殖民统治时期，整个欧洲人的干预都以一种设想为依据，即干预是为了促成开发，非洲文化即使不被全部摧毁也必须加以改变。由于非洲文化是同宗教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所以很容易看到，随便什么欧洲殖民政策都会非常剧烈地同支持着非洲传统宗教的一些原则发生的冲突。况且，从一开始，非洲传统宗教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面临着加强自己的必要。

在殖民统治开始以前，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左右，传教士曾是西方文化的传授者，从一开始他们就对非洲宗教持毫不妥协的态度。他们不仅一心想使非洲人改信基督教，而且一心想把他们改造成西方文化的信奉者，这种文化被认为是充满了基督精神而且具有基督精神所赋予的极大活力。事实上，在大部分热心的传教士心目中，这两者并无区别。但是，尽管传教士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不加区别，他们却毫不留情地千方百计改变非洲人的生活方式，使宗教脱离生活其他方面。传教士们向皈依者教导说，生活可以分为灵魂领域和世俗领域，这种教导与非洲文化的主要基础，即宗教与生活的统一，背道而驰。传教士的这种教导是企图攻击使非洲社会团结在一起的黏固剂。许多有洞察能力的非洲统治者早就看到这种危险信号，他们最初是竭力抵制教会渗透进自己的社会， 514 认为那是对传统权威的挑战和威胁。传教士们、殖民行政官员们也是一样，鼓吹反对迷信精灵、神秘力量和各种神祇、巫术、魔法、献祭牺牲和仪式典礼、禁忌和崇拜祖先，这样就削弱了祭司、女祭司、术士、求雨者和神圣君主等非洲传统领袖和宗教仪式领导人的势力。殖民行政官员们引进西方医术以及他们对"异教徒"习俗的打击也导致削弱巫医和草药医生的作用。于是古老的制度受到严重的威胁，非洲社会的各个方面则纷纷起来企图保卫它、保护它。

殖民行政官员虽可以说主要是对控制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感兴趣，然而属于

⑤ R. 奥利弗(Oliver)和G. 马修(Mathew)合编，1971年，第69页。

515



图片 20.2　塞拉利昂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

宗教的问题不能孤立于他们的关心重点之外。殖民列强也同传教士们的教导有相同看法。殖民统治者通常对某些宗教习俗采取敌视态度，设法消灭它们，同时对其信徒进行镇压。殖民地政府试图破除信奉巫术和神裁法这类习俗，神裁法意味着，在难于判断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时候，"抬着"尸体靠巫术或魔法来探明哪个人或哪些人被认为是造成死亡的肇事者。

非洲人对这些打击所作的反应有许多种。首先，那些保持不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干脆继续坚持传统的信仰，并且经常公开地或秘密地举行主要的仪式活动，以此来反对殖民统治和蔑视基督教会对他们传统习俗的谴责。至于那些皈依基督教、其信仰和态度受到新的宗教强烈影响的人，所表现的反抗则是把某些传统信仰跟自己一起带进新的宗教，其结果是造成一种混合的思想。

非洲人利用他们的宗教作为武器来抵制殖民统治及其对非洲价值准则的威胁，并且在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中常常依赖巫术和倚赖祖先以及各种神祇的干预。20 世纪的头 20 年，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格博族勇士们倚仗这种方法来保卫自己不受外国的侵略。阿巴卡利基地区的埃斯扎人以及乌兹瓦科利人和阿罗人可以作为例证。⑥ 有些狂热崇拜的集体显然是反抗殖民统治的聚集点，例如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的"姆瓦里"(Mwari)，或塞拉利昂和其他西非地区类似"波罗"(Poro)这样的秘密会社。在马达加斯加和刚果盆地也出现一些战争符咒运动。在东非，特别是在肯尼亚，一些非洲人先知起来重振宗教的活力⑦ 以抵抗殖民主义，例如 1922 年头几个月中马查科斯地区基隆古人中间发生的情况（参看第 26 章）。利用宗教和巫术两种办法来反抗殖民统治和压迫的最著名的运动 516 之一是 20 世纪最初 10 年发生在德属东非的马及-马及运动⑧（参看插图 7.1）。这个运动虽然惨遭失败，但它以事实证明，面对欧洲人的压迫可以从非洲的传统宗教中吸取力量、形成团结，而非洲的传统宗教并非局限于某些地方的支离破碎的力量。此外，马及-马及运动播下了非洲民族主义的种子，它后来发芽成长，成为争取独立的斗争，最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斗争终于取得成果。

另一个与马及-马及相似的狂热崇拜是尼亚宾吉(Nyabingi)崇拜，它也遍及广大地区，超越部族和地区的疆界，在卢安达（现卢旺达）、坦噶尼喀西北部（现坦桑尼亚）和乌干达都有。像马及-马及的追随者一样，它的信徒认为符咒力量可以使欧洲人的子弹失去作用，他们还相信有祖先英灵附在身上。它创始于 19 世纪末年，逐渐壮大，终于在 1928 年爆发为乌干达基盖齐地区反对欧洲人占领的起义（参看插图 7.1）。正如E·霍普金斯所说："直到它在 1928 年最终遭到镇压为止，这个运动成功地使三个殖民国家的行政势力在大约 20 年中无能为力。⑨ 德国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人那里接管了卢旺达的比利时人都未能压制这个运动，即使在镇压了 1928 年起义之后，这种崇拜还继续存在，直到 1934 年遭到最后镇压。

⑥ A. E. 阿菲格博(Afigbo)，1973 年。

⑦ 建立独立的教会，与欧洲人控制下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同时并存，也是非洲人为了同一目的的反抗行动。

⑧ 详见第 7 章。

⑨ E. 霍普金斯(Hopkins)，载R. I. 罗特伯格（Rotberg)和A.A.马兹鲁伊（Mazrui)合编，1970 年。

其他崇拜则通过复兴传统宗教的各个方面，并把它们同自基督教借来的思想结合，从而积聚力量反对欧洲人的压迫。例如，蒙博(Mumbo)崇拜就是如此，它被肯尼亚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古西人用来支持他们开始于1900年的起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⑩]（参看插图7.1）。

在黄金海岸（现今的加纳），英属殖民当局对某些宗教习俗采取了敌视态度，废除了一些宗教习俗，并力图禁奉某些神祇和禁止举行某些崇拜仪式。由此，对阿基姆·科托库地方的保护神卡塔韦雷的崇拜于1907年遭到政府取缔。[⑪] 在这以前，德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摧毁了凯泰-克拉奇地方崇拜登泰神祇的一些神龛，其祭司遭到政府监禁并被处决。科罗博人被迫放弃了他们在科罗博山上的居民点，因为英属殖民当局破坏了他们在那里的定居点，并且镇压他们对保护神科托克罗和纳杜的神龛进行的崇拜。

517

殖民当局打击对巫术的迷信，并通过订立巫术法令和采取禁止非洲巫术的措施开展消灭巫术运动，企图一举把它消灭。尽管有传教士和殖民行政官员这两方面双管齐下反对巫术，在皈依基督教者和未改变宗教者中间都仍然存在对巫术的信仰，非洲人在这方面继续我行我素。

应该提到的是，在西非出现了一些新的教门想保护人民免受巫术的为害，例如黄金海岸的阿伯利娃（老年妇女会）崇拜，它于1908年被政府镇压。消灭巫术运动中流传最广的是东南非洲和中部非洲的巴穆卡比教门，它广泛分布于莫桑比克、尼亚萨兰（现马拉维）、南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坦噶尼喀南部（现坦桑尼亚）以及比属刚果（现扎伊尔）（参看插图8.1）。这个教门的人喝一种药汁，据信它能使他们摆脱巫术或不受巫术的影响。[⑫] 这个教门兴盛于本世纪30年代初期，它同时借用了非洲传统宗教和基督教的思想。

由于有些非洲人继续用传统的方法消灭巫术，殖民当局制定了一些巫术法令。例如在乌干达，1912年通过了一项巫术法令；1921年加以修改，加重了处罚，监禁期由1年增到5年，并规定持有用以施行巫术法力的巫术用品属于应受处罚的罪行。[⑬] 但是殖民当局的这些法令以及传教士和皈依基督教的非洲人所作的谴责全都证明了对于迷信巫术的制止作用有限。

另一种打击非洲传统宗教的形式是采取措施反对为男孩和女孩进入成年而举行的成年仪式。对非洲人来说，成年仪式的目的不仅在于让少男少女要做好进入成年的准备，它也是为了让他们做好适应集体和社交生活的准备，它是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中一个极关重要的部分。

在非洲许多地方，成年仪式涉及男孩受割礼和女孩切割阴蒂，这是极大争论的源泉。传教士们觉得这些仪式为他们的风格和神学所不可接受，他们在反对这些仪式的斗争中经常寻求殖民当局的帮助。打击这些仪式等于是攻击人的概念和宗教生活结构的核心意

⑩ 详见前面第7章和后面第26章。

⑪ H. 德布伦纳(Debrunner)，1967年，第255页。

⑫ T. O. 兰杰(Ranger)，见D. B. 巴雷特(Barrett)编，1971年，第132页。

⑬ E. 霍普金斯，见R. I. 罗特伯格和A. A. 马兹鲁伊主编，1970年，第311页。

义，非洲人对这种攻击所作的反应是普遍十分强烈。特别是在东非，割礼问题，特别是切割阴蒂问题，激起了极为剧烈的反应。传教士觉得切割阴蒂令人厌恶，试图从皈依基督教者的生活中把它彻底清除掉，至于就割礼而言，则只要删去它的“异教徒的”、“相信精灵的”和“蔑视宗教道德的”方面，他们准备同它融洽相处。 518

在坦噶尼喀南部马萨西主教管区以及在肯尼亚的中部省，可以看到基督教传道团体及非洲各族人民在割礼问题上最严重对立的一些事例（参看插图 7.1）。在前一地区，采取的是适应的方针，其结果是试图修改“詹多”（男性割礼）和“马兰戈”（女性割礼），由基督教会主办，并删除被认为或被断定为“非基督教的”一切成分。这个方针避免了传统成年仪式以及基督教传道团体和实践之间的正面冲突，虽然基督教会删掉了女子成年仪式中一个主要部分，即延长阴蒂，因而不能使“马兰戈”具有在其他情况下传统成年仪式所享有的那种尊严。然而教会认识到它的成员需要同时既是基督教徒又是自己社会中经过完全成年仪式的成员；这个目标要设法在教会内部达到而不是去造它的反。[44]

但是肯尼亚中部省的情形则是，教会对待成年仪式的方针导致了正面冲突。在这以前，非洲人原已开始感到压力，对英属殖民当局心怀怨恨，因为它把非洲人的大片土地拨给欧洲人移民。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传教团体的活动，例如苏格兰教会传道团（1891 年在乌坎巴尼，1898 年在基库尤），巴伐利亚福音路德会(1893 年在乌坎巴尼)，非洲内地会（1896 年在乌坎巴尼）、福音传教会（1897 年在内罗毕），正教传教会和非洲内地会（都于 1901 年在内罗毕），它们开始诋毁阿坎巴、梅鲁、塔拉卡、马赛和其他各族人民所拥有的传统，特别对男孩、女孩都进行割礼的成年仪式。因此，欧洲人的到来给非洲人的国土和传统带来了双重的压力。

传教士们最感厌恶的是女子的成年仪式，他们猛烈地加以抨击。苏格兰教会传道会、非洲内地会和福音传教会从 1920 和 1921 年开始禁止在他们的教堂里举行这个仪式。在基督徒中间施行男子割礼不是干涉得那么厉害，但各教会要求应在医院或私人住宅中施行。随着反对女子切割阴蒂的压力日益增长，英属殖民当局终于承认它是“有害的”习俗，将通过“教育”逐渐使它终止。但是非洲人认为男女的成年仪式都在他们社会生活中有意义深远的目的，任何突然的废除或禁止都将大大地扰乱他们心理、社会和宗教上的安全感。 519

非洲人对于否定女子割礼的态度的反对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进入公开化了——开始于 1923 年。例如，在基库尤人中间建立了一些独立的学校，其目的是恢复这个习俗，并为那些由于女子割礼问题而不能进教会学校的孩子们提供教育。1929 年，一支舞蹈歌曲名叫穆蒂里古(muthirigu)对反对女子成年仪式的传教团体和基督教徒加以嘲弄，此歌在基库尤人中间迅速传播，但第二年遭到英国殖民政府的禁止。此外，非洲人的反抗还表现为基库尤、恩布和梅鲁各族人民中有许多人退出新教和英国圣公会的教会。一个独立的教会非洲正教产生于 1928 年，而 1930 年基库尤人中间出现一个先知运动，宣传上

[44] T. O. 兰杰，见T. O. 兰杰和I. 基曼博(Kimambo)，1972 年。

帝对欧洲人和传教士的审判即将来临，但迅即遭到殖民地政府的取缔。

非洲人的反抗继续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包括骚乱、袭击教会学校、试图阻止布道者主持礼拜仪式，甚至在基贾贝地方杀害了一名传教士。同非洲人抗议传教士对女子割礼的态度结合到一起，还有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它终于产生了在政治上对外国统治的反抗。[15] 可是，在阿坎巴、恩布和梅鲁各族人民中，女子成年仪式问题没有像在基库尤人中间那样造成如此紧张程度，而只是由之产生了独立的学校和独立的教会。

所有这些对非洲宗教的打击和非洲人对他们的回击，总的说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使得非洲宗教极大地恢复了活力。

伊斯兰教与殖民统治

在殖民统治时期，伊斯兰教的处境似乎比传统宗教好得多。殖民大国到来之前已经建立起穆斯林统治的地区，伊斯兰法提供了区域的而不是部族的一致性，它能左右人们对权威的服从；[16] 这有利于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和商业。穆斯林并且善于劝人入教因而有众多的皈依者。

交通的发达使穆斯林的人员可以深入到过去不曾向他们开放的许多地方，而随着贸易商路由纵贯撒哈拉沙漠改为沿着西非海岸，穆斯林人数在殖民统治早期在沿海地区还寥寥无几，此时则开始增长。1891至1931年塞拉利昂的穆斯林人数稳步增长就说明了这个情况。在那里，1891年穆斯林占人口的10%，而1901年，1911年，1921年和1931年分别占12%，14%，19.5%和26.2%。[17]

520

西非沿岸的穆斯林进一步增加的另一个促成因素是阿赫默底雅派穆斯林利用近海海路来到这里传教。他们虽被有些人看作是异端邪说，但是他们在穆斯林中间促进对西方教育的兴趣方面起很重要的作用。

各殖民地当局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不一。有的认为伊斯兰教是比传统的非洲宗教较为开明的宗教形式；另外的则认为穆斯林的习惯制度是先进的社会习惯制度，可以利用它为殖民当局的利益服务。因此伊斯兰法的法庭得到允许建立，在某些地区穆斯林统治者被赋予较大的权力。[18] 穆斯林也被殖民当局下级官员雇用作为向导、代理人和办事员。这使得穆斯林同非洲各族人民有密切接触，正如T.S.特里明厄姆所说，这使得拥护传统主义的人熟悉了"伊斯兰教的外在特征，使这个博得好感的宗教的信徒提高了声誉，也使得伊斯兰教人员得到便利进行宣传和施加各种压力"。[19]

并不是所有殖民当局都对伊斯兰教加以青睐。比属刚果的政府就特别敌视伊斯兰教，

---

⑮ 关于这方面的深入讨论，参看F. B. 韦尔伯恩（Welbourn），1961年，第135-143页。

⑯ D. L. 威德纳(Wiedner)，1964年，第245-246页。

⑰ J. S. 特里明厄姆(Trimingham)，1962年，第226页。

⑱ 例如，在北尼日利亚，间接统治首先在那里试行，英国政府支持穆斯林统治者的权力，而且殖民权力位于作为北尼日利亚官方宗教的伊斯兰教之后。

⑲ J. S. 特里明厄姆，1962年。



图片 20.3 非洲北部一座清真寺大门口，正面

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基督教化”和“文明化”使命的威胁。只准许建了几座清真寺，在这个殖民地内绝对禁止设立穆斯林学校。⑳

其他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企图把欧洲文化强加于他们的属民，不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认为他们都有义务通过把法国文化的“好处”传授给自己殖民地的属民来提高他们的水平。英国人对待穆斯林国家的政策是确信能够得到穆斯林统治者的合作。法国人不像英国人，他们的想法不是这样。他们在企图征服大部分西苏丹的时候，起初是想限制穆斯林控制的地区。他们极力避免官方公文往来中使用阿拉伯文，他们甚至公开帮助那些不接受穆斯林传教工作的人如帮助班巴拉人。此外，法国人千方百计确保穆斯林统治者不被任命来统治非穆斯林的民族。为了有效地阻挡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律体系的推广，他们甚至设法振兴传统宗教，并把非洲习惯法编成法典以作为反击力量。㉑但是法国人对伊斯兰教比对非洲传统宗教更为熟悉，尽管他们对前者怀有畏惧和敌意，在他们的打算达不到目的的时候总是定下心来想方设法对付伊斯兰教，建立各种机构来研究穆斯林的生活、信仰、习惯和制度，搜集有关的文献资料。㉒

522

殖民列强决心拆散大的穆斯林国家和宗教团体，并在他们中间挑起对抗和竞争。于是，英国人在北尼日利亚废除索科托素丹国，而法国人则公开鼓励部族和王朝的抗争，导致了图库洛尔帝国的瓦解(见插图6.2)和各苏菲主义教团的数目激增，他们拒绝承认西非提加尼教团(提加尼雅)的全体穆斯林成员有同一个哈里发。

在西非的两个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都愿意并且极想向穆斯林们保证在一定条件下有崇拜真主的自由。他们极想看到一个切断国际联系和削除其世界性色彩的西非伊斯兰教。

殖民大国特别想要防止的是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的泛伊斯兰教运动。当土耳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德国一边，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作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据说颁布命令对欧洲不信真主的人进行全面造反的时候，这种担忧就成为现实了。

殖民大国后来不像以前那样对伊斯兰教仅仅是宽容默认而是开始对它加以鼓励。因为他们终于宁愿同伊斯兰化的非洲人打交道而不愿同基督教化的非洲人打交道。据报道有一个法国官员在1912年说过“伊斯兰化的黑人总的来说是温驯的人民，他们感谢我们的武器给他们带来的安全；他们只想在我们权力的蔽荫之下和平地生活。”㉓

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影响也得到殖民列强的赏识，据说列强认为它是“传统社会的狭隘的排他思想同现代生活和经济利益的较为广泛的冲动和需要之间的桥梁。”㉔因此，顺从的穆斯林领导人受到很大鼓励，常常得到官方的恩赐，如各种勋章和奖赏。为他们修建了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并且还帮助他们去朝圣和游学。但是，与此同时，那些不听从殖民当局的命令、表示违抗的穆斯林则受到惩诫，常是受到折磨。

---

⑳ 参看N. S. 布思(Booth)，见N. S. 布思编，1977年，第325页。

㉑ 参看J. F. A. 阿贾伊，未注明出版日期。

㉒ 同上；又参看M. 克劳德，1968年，第359-361页。

㉓ 引文见J. F. A. 阿贾伊，未注明出版日期，第22页。

㉔ 同上。

但是，穆斯林们出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理由还是反对殖民统治。虽然各殖民地当局，如法属殖民地的，在他们的西非领地中成功地获得穆斯林的某些支持，可是有大批穆斯林决心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正性，因此他们不能容忍向不信真主的基督教政府屈服，他们谋求使自己的国家摆脱法国的殖民主义。这种愿望导致了马赫迪主义的复活，旨在 523 结束异教徒的统治。马赫迪相当于基督教的弥赛亚(救世主)，他被认为必将在世上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建立一个正义的政府，使社会最终能摆脱异教徒的统治。马赫迪主义在西非苏丹地区的许多地方崭露头角，在上几内亚、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成为反法情绪的一种表现，特别是自 1906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他以反法或反殖民化的姿态出现的伊斯兰教运动还有哈马利雅运动和赛努西教团(赛努西雅)。前者由哈马拉教长创始，活动于塞内加尔、法属苏丹、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后者由穆罕默德·本·阿里·赛努西创于利比亚，它成为领导利比亚反抗意大利殖民主义的力量。1860-1901 年之间赛努西教团传播到突尼斯、埃及、撒哈拉中部、苏丹中部以及塞内加尔。

赛努西教团有在利比亚反对外国统治的传统，它发展起来不仅作为一个宗教团体而且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它虽把土耳其素丹看作是所有穆斯林国度的哈里发，但它反对土耳其的统治。这个教团之所以没有拿起武器来反对土耳其的唯一理由乃是彼此共同的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至于意大利人，那就没有这种共同的结合力了。这个教团坚决抵抗意大利人的侵略，从 1911 到 1932 年领导利比亚人进行抵抗。1912 年土耳其的统治退出利比亚以后，赛努西教团担任了全面领导和解放利比亚的责任。指挥抵抗的各项命令和公告都是以赛努西教团政府("al-Hakuma al-Sanūsiyya")的名义发布。最后赛努西教团的成员终于在其他穆斯林国家获得承认，不但被认为是利比亚的解放者而且被认为是"奋斗派"(Mujahidin)。K.福拉扬曾经写道：

> 赛努西教团为利比亚抵抗运动提供卓有成效的领导作用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使得它成为一个宗教运动，成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骨干力量的典型范例。这个教团实际上有着非洲最悠久的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事实上，赛努西教团的作用并不因 1932 年他们军事实力垮台、意大利占领利比亚而告结束。更确切地说，直到利比亚取得政治独立的那一年(1951 年)，赛努西教团继续为利比亚奋斗，就像伊芬迪亚 (effendiya)阶级曾经为埃及的民族主义或马格里布的民族主义奋斗一样。[25]

19 世纪末法国入侵上沃尔特，最轰轰烈烈的对抗者是穆斯林，据报道，大部分穆斯 524 林曾告诉当地的莫西人说，一旦黑人成为穆斯林，白人就会离开他们的国土。[26] 此外，19 世纪后半叶，萨摩利在西非和拉比赫在乍得地区的征战使得他们同欧洲人发生冲突，有助于使伊斯兰教同反对殖民统治一致起来。

但是伊斯兰教在殖民统治下兴盛起来了，这是由于比起传教士们所强加的基督教以

---

[25] K. 福拉扬(Folayan)，1973 年，第 56 页。

[26] N. S. 布思，见N. S. 布思编，1977 年，第 323 页。

及由于殖民主义引起的传统生活的瓦解，它有许多有利条件。许多人把伊斯兰教看作本地的宗教，是由非洲人传播的宗教，它的信徒不是同社会脱节而是同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比之下，基督教徒则往往创立自己单独的社会并且过着一种基本是欧洲的生活方式。因此滕内语（塞拉利昂）把基督教徒和欧洲人都叫做“波托”（poto），这并非纯属偶然。[27]另外，不像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较能迁就非洲传统的社会和宗教的习惯制度，如魔法、巫术、一夫多妻制和村社制度。因此，做一个穆斯林并不需要同传统根本决裂，而基督教传教士则坚持要同传统根本决裂。“它〔伊斯兰教〕比起基督教更多地强调团结而较少强调竞争与个人成就”。[28]伊斯兰教另一有利的资产是，由于殖民统治到来之后带来了种种破坏，社会结合起来需有新的基础，而伊斯兰教提供了这一基础，因为它拥有可以提供给那些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根源的人的重要力量。

在论述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的“大发展”时，N.S.布思曾经写道：

> 在某些地区这可能是由于伊斯兰教被看作是一种抵抗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统治的途径，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是由于殖民政策无意中支持了它。大概是一种复杂的道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敌视态度和欧洲人的利用穆斯林和穆斯林习惯制度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者都促使伊斯兰教得到发展。做一名穆斯林可以是一种在殖民制度下获得有利地位同时又表现得同西方文化有一定距离的办法。它是成为世界性社会一部分的一条途径，这个社会得到欧洲人勉勉强强的尊重，同时却又提供一个可以表效忠诚的中心和一个表现独立自尊的基础。新的外国文化和宗教的压力有利于加强同另一种宗教的一致感，这种宗教虽然最初也是外来的，但已成为本地舞台上被承认的角色。[29]

525 但是这种承认并没有造成完全放弃传统世界观的结果；事实上，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基督教，已成为传统信仰和习俗的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这是因为这些“客座宗教”往往主要是用作为非洲传统宗教基础的基本概念来加以理解的。于是，对大多数非洲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意味着虔诚信教的许多方式之一，伊斯兰教补充着传统宗教，而传统宗教又弥补着伊斯兰教的若干不足之处。

可是在非洲穆斯林中间有同传统观点根本不同的若干变化。伊斯兰教信条中关于最后审判和在未来生活中信奉真主者与不信奉真主者的隔离，同传统的概念差别悬殊，传统概念强调人们死去的祖先的社会。伊斯兰教被认为拥有新的力量源泉，人们加以汲取用来获得生命的完整，用来治疗和用来改进穆斯林社会中的生活。

殖民统治时期的基督教

殖民统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首先，殖民地行政官员和传教士们有着相同的世界观，他们都来自同一文化。第二，殖民当局十分赏识传教

[27] J. 卡雷法-斯马特(Karefa-Smart)和A. 卡雷法-斯马特(Karefa-Smart)，1959年，第19页。
[28] R. W. 赫尔(Hull)，1980年，第146页。
[29] N. S. 布思，见N. S. 布思编，1977年，第320页。

士们的活动，经常向教会学校提供资助。第三，在每一块领地建立殖民控制，保证了这块领地的和平和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得到了殖民当局的保护。第四，引进高效率的交通手段和建立货币经济，促进了商业和贸易，也引起了新的生活方式的来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后来流行于整个非洲，其特征是村社制度崩溃了，而让位于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总之，在非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可以说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和助手，而传教士们的活动则是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推进和渗透的重要部分。

作为征服者的宗教，基督教被认为包含着白人权力来源的奥秘，至少它提供了在白人世界接受教育、就业和获得权势的机会。传教士布道的强有力之处在于基督教的排他特性，特别是按照欧洲传教士们对它的理解和解释。运用口头语言，或者直接宣传福音、创办学校和开展医疗工作，传教士们使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19 世纪末叶标志着基督教传教士的非凡成功。结果在过去从未有过基督教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基督教团体，而许多皈依基督教者又在自己的人民中进一步宣讲福音。使许多非洲语言形成文字以及在学校里讲授欧洲语言，把读写能力带到了非洲许多地方。由于把非洲语言变成了文字，出现了许多用非洲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 526

基督教和教育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许多非洲人之接触基督教是通过传教士所建立的无数学校。而且在非洲许多地方，学校实际上就是教会。关于学校对于传教事业的重要性，伊莱亚斯·施伦克曾作如下表述：

> 如果某个民族有其正规教育，能读会写，那么我的传教工作计划会有所不同。但是现在我确信，开办学校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对那些连圣经都不会读的基督教徒评价很低。一个最小的学童就是个传教士，他同成人们建立起联系，没有学校就不会有这种情形。[30]

传教士对在非洲推行货币经济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教会在非洲很多地方发展种植园，除了种植当地粮食和引进新的作物以外，他们还帮助推广商品作物，如可可、咖啡、棉花和甘蔗。

最重要的是，基督教输入了许多新思想。这些思想其实也并非全新，传教士们所宣传的和非洲人所信仰的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如信奉上帝、服从上帝的旨意，他是人类的最后审判者和造物主。

然而传教士们对非洲的宗教和文化持否定态度，从一开始就决心要扑灭它们。传教士们宣传说，只有在圣经中启示其性格特点的那个上帝，才是唯一的上帝，所有其他的神都是人的幻觉；圣子耶稣才是最终的启示，是人类唯一的救世主；而教会则是神的恩典唯一的施与地方，教会之外得不到灵魂的拯救。因此，欧洲传教士们认为，把所有的人带到拯救灵魂和感谢神恩的场所去，是他们的神圣职责。

由于深信自己拥有唯一的真理，传教士们便指责所有的“异教徒”。他们鼓吹反对一切传统的习俗，包括洒奠酒、举行隆重的祭礼和跳击鼓舞，以及生活事件中传统的典礼（如少女进入青春期的仪式）和有关丧葬的习俗。他们还否认非洲人所信奉的神和巫术及其他超自

[30] 引文见H.德布伦纳，1967 年，第 145 页。

然力量的存在。总之，要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不再是一个非洲人，而是使用欧洲文化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样，基督教就对非洲文化起着分解的作用。

527 对于教会的努力，非洲人的反应表现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认可、拒绝和适应。无疑，很多非洲人欣然接受了这种新的信仰。在本文所回顾的这段时间内，基督教在非洲赢得的地盘比过去两三个世纪中赢得的要多得多。第一批信奉基督教的非洲人似乎是那些被非洲人看作是被社会遗弃的人，以及为人们所践踏的人，如传统的非洲社会里的麻风病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上的残疾人。这类人中包括那些曾因违反某种传统的戒律而在逃避迫害的人，以及那些生双胞胎属于禁忌的社会中生了双胞胎的母亲们，这些母亲在教会机构中为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寻求庇护。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信奉基督教并无所失；相反，他们从传教士关于平等和兄弟关系的教育中，也"从人不应该宿命地接受他或她的生活地位是超出人力所能控制的思想"中获得了希望、信心和鼓舞。[31]

殖民统治时期基督教的传播，不是完全出自传教士的主动性。非洲的信教者、读经班人员和牧师们都热忱地传播基督教。同时有些传统的统治者，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莱瓦尼卡和洛本古拉，都尽一切可能给传教士们以帮助。基督教在非洲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洲信教者的热忱，1914 年以后的时期尤其如此。非洲人福音传道者作为走出自己部族圈子的传教士进行活动的事例，不可胜数。例如，布干达的福音传教士们把基督教传给了其他各族，如班尼亚卡雷人、巴基加人、巴托罗人、巴吉苏人和兰吉人；巴干达的福音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远达卢旺达和比属刚果。他们之中名望卓著的有卡农·阿波罗·基维布拉亚（1866-1933 年），此人作为一名在比属刚果的传教士，在俾格米人中间从事传教活动（1896-1899 年和 1915-1933 年）。[32] 在西非，约鲁巴人主教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在尼日尔河流域从事传教活动。巡回各地的利比里亚人先知威廉·韦德·哈里斯于 1910 年至 1915 年间在科特迪瓦和黄金海岸的阿波罗尼亚地区进行巡回传教，使大约10万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从科特迪瓦被逐出后，撤到黄金海岸。他在这两个地方活动的结果是在科特迪瓦建立了哈里斯特教会，在黄金海岸建立了十二使徒教会。[33]

如前所述，也还有一些非洲人，他们全然抵制基督教的启示，而固守自己祖先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他们认为这些传统有比传教士所宣扬的更有意义、更加重要的东西。他们之中有的人参加了对那些成为基督教徒的人进行迫害和排斥的行动，但其他人只是参加旨在使人类同神灵的力量保持和谐的献祭和礼仪。从这些人当中产生了一些宗教和文化的领袖以及草药医生。正是他们主要地担负起责任维护非洲的价值观念，并提供有关529 非洲传统文化的知识。

分立派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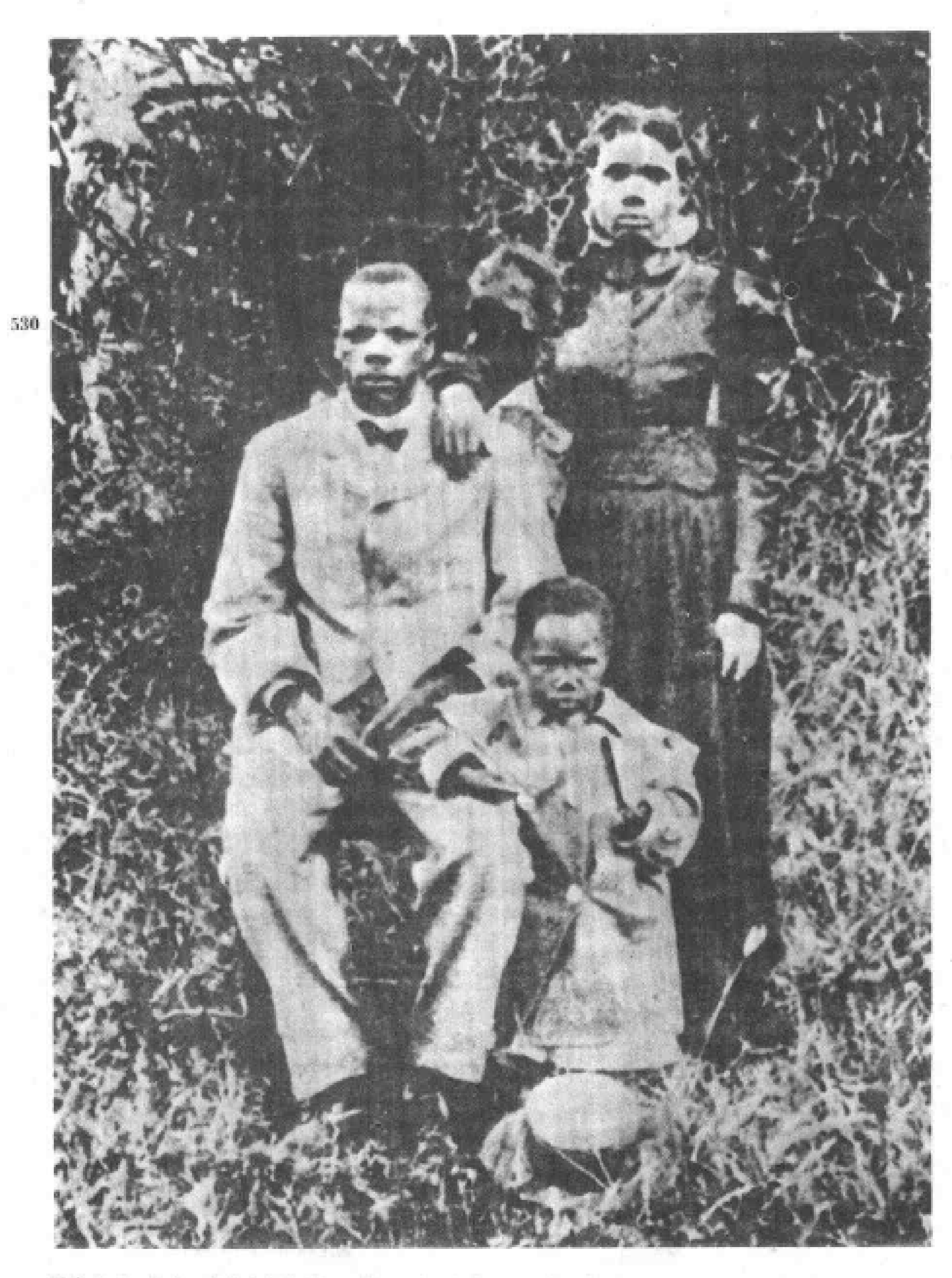
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所选择的是适应新的宗教，建立起后来被人们称为分立派或

[31] R. W. 赫尔，1980 年，第 143 页。
[32] 参看A. 勒克(Luck)，1963 年。
[33] 详见G. M. 哈利伯顿(Haliburton)，1971 年。



图片 20.4　威廉·韦德·哈里斯(1865 年前后-1929 年)，利比里亚出生的西非人福音传教士

530



图片 20.5 约翰·奇伦布韦牧师(19 世纪 60/70 年代-1915 年),教士和 1915 年尼亚萨兰起义的领导人,同他家庭的合影

自治的教会，这一发展代表了基督教在非洲的历史的第四阶段。这种教会有两大类型，即那些从原已存在的独立教会中分裂出来的教会和那些独立于业已存在的任何一个宗教团体的教会。从大多数情况看，这些教会寻求把更大量的非洲人的信仰和习俗揉合进基督徒的生活中去，超过了传教士控制下的教会所允许的程度。它们所表现的是非洲人希望找到“一个觉得安适自在的地方”，以及把非洲人关于礼拜的思想纳入基督教礼拜仪式中去的愿望。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因素，是由于圣经被翻译成许多种非洲语言，非洲人可以读圣经，并有了自己的解释。在自己对基督教圣经理解的基础上，非洲人建立或创立他们自己的教会。这样就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掌握在传教士手中的对基督教圣经进行解释的垄断权。

这些分离出来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非洲人对殖民主义的反应或适应，具有摆脱束缚的性质。尤其是在欧洲人定居地区，那里政治迫害情况十分严重，这种教会数目激增，吸引着非洲民族主义者。南非的埃塞俄比亚教会（“黑人教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们强调非洲人的自我完善和政治权利。奈赫米阿·泰尔于 1882 年脱离卫理公会传教士的教会，并于二年后创建了滕布教会，这是创立于非洲的第一个独立教会。[34] 第二个独立教会是由美以美会牧师曼吉纳 · M. 莫科恩于 1892 年也是在南非创建的，也是第一个被称作“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教会。这种“埃塞俄比亚教会”（“黑人教会”）运动扩展到南部和东部非洲的其他地区。

在殖民地非洲的其他地区，分立派教会经常对殖民统治公开表示敌意。例如，约翰·奇伦布韦在尼亚萨兰建立起他的天佑勤奋传道会，激烈攻击英国殖民地实行的税制和征兵入伍的做法，终于在 1915 年领导一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未遂武装抵抗运动，以后被逮捕遭处决。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守望塔运动开始出现，并从尼亚萨兰向南罗得西亚在绍纳人中间传播开来，成为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宗教运动。蔓延在中部非洲和刚果的非洲守望塔运动又别是一个团体，其起源可追溯到埃利奥特·坎瓦纳 1908 年在尼亚萨兰北部创始的这个地区的分立派教会运动。这个运动以“基塔瓦拉”（天国）或守望塔教会著称。在北罗得西亚，这个运动的千年至福传道者们曾预言殖民主义即将彻底崩溃和世界末日即将到来。[35]

531

非洲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情况，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西非威廉·韦德·哈里斯的事例上文已有叙述。在比属刚果，西蒙·基班古于 1921 年建立起以先知西蒙·基班古命名的“耶稣基督之乡教会”(EJCSK)。他的追随者们拒绝向比利时的殖民行政当局纳税，并宣布，面对政府推行的强迫劳动，他们拒绝提供劳动力。这些举动对殖民当局构成真正的威胁，于是西蒙·基班古被捕入狱一直囚禁到 1951 年死于狱中以防止这个国家发生大暴动。但是基班古主义却从刚果河下游的发源地继续向外扩展。[36] 由西蒙-皮埃尔 · 姆帕迪创立的“黑人新基班古主义传道会”，后来以“土色布分子”（“Khakists'”）著称，从下刚果发展到法属刚果和乌班吉沙里（现中非共和国）。

[34] 参看B. G. M. 森德克勒(Sundkler)，1961 年，第 38-39 页。
[35] 详情参看本书第 27 章。
[36] 同上。

532



图片 20.6 先知西蒙·基班古(1890 年前后-1951 年),比属刚果"耶稣基督之乡教会"的创始人

与基班古和姆帕迪所创始的运动方针相似的有皇家非洲人步枪队的退役军人鲁本·斯巴达斯·莫卡萨在乌干达创始的运动。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了拯救全非洲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非洲进步协会和非洲基督教救世军，以及他所创立的非洲正教的分支都显示出所有这些运动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乔丹·恩古马在尼亚萨兰创立的“上帝和耶稣基督权威教会”与莫卡萨在乌干达创办的教会如出一辙。

其他的教会，以宗教改革的精神，强调了欧洲人传教团体创办的教会所忽略的基督教神学的某些方面。南非的锡安山教会强调圣灵附体、治病和预言，广泛流行于东非和南部非洲。在肯尼亚的阿巴卢伊亚人中间发展起来的圣灵教会，[37]是由雅各布·布卢库和丹尼尔·桑代于1927年创建的。它把接受圣灵洗礼、讲多种语言和对罪行的坦白忏悔看作是成为这个教会正式成员的必要先决条件。对圣灵同样重视也使得阿尔法约·奥登戈于1932年在肯尼亚的卢奥人中间建立起他的圣灵教会。西非的各种非洲人教会和阿拉杜拉教会也都强调圣灵附体。

另外还有些教会范围较为狭窄。我们已经看到，诺米亚·卢奥传道会是由约翰·奥瓦洛于1910年在肯尼亚西部的卢奥人中间创立的。这个教会施行割礼，并以此作为得救的一个条件。虽然卢奥人没有施行割礼的传统，但教会施行割礼是为了与圣经上的惯例保持一致。[38]其他一些教会是专门为了接纳那些因不能遵奉传教士创办的教会所坚持的一夫一妻制而被驱赶出来的人们，以及接纳那些早已是多配偶而不能加入教会的人们。20世纪30年代在坦噶尼喀的伦圭地区兴盛起来的“非洲民族教会”就是这种教会的一例。[39]

533

土著基督教

上述教会之外，另有一批教会，它们不是缓忧解愁的产物，也不是社会紧张情绪的产物，它们的感召是来自一种比较积极的思想。自从把基督教推荐给非洲人这个过程的最早时期，有些信教者就全盘接受新的信仰。另外不少人则根据自己已知的基础来接受它，按照非洲传统宗教的基本的主要概念来理解基督教，把教会的福音同自己的持久的宗教需要联系起来。

因此，基督教之到来不是仅仅取代传统宗教的信仰和习惯，而是补充它们。换言之，某些非洲人基督徒利用基督教的若干方面来加强传统信仰中需要加强的各方面，同时又利用传统信仰来加强基督教被认为有所不足的方面。因此他们提出了他们真诚地认为富有意义的宗教，而他们的基督教可以看作是非洲方式的笃信宗教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称它为土著基督教的原因。

构成土著基督教的基础是宗教上创新和文化上完整性的表现，它不仅仅是像有些学者常常说的那样是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反作用、一种反应或一种适应。通常，但有少数例

---

[37] O. 奥廷加(Odinga)，1967年，第69页。
[38] E. S. 阿蒂埃诺-奥迪安博(Atiento -Odhiambo)，1974年，第10-11页。
[39] T. O. 兰杰，未注明日期，第16-20页。

外，对土著基督教运动的发生和迅速发展所作的解释是得自这些运动自身以外的因素，这使得它们既具有功能上的合理性，又具有功能紊乱的畸变性质。这类解释虽未必全然不正确，却有过分强调外部因素在产生这些运动中作用的倾向。因此，在它们被称做“独立的”教会时，暗含的意思是指这些教会以外另有某种更为重要的所指。

534　在采取大胆步骤把基督教嫁接到非洲传统以后，土著教会由于它对福音的描述同传统的非洲人世界观可以相容而且也能在非洲人对事物看法的范畴内理解，从而满足了信徒们信仰上的渴望。

为了满足成员们信仰上和情绪上的需要，提供了各种崇拜方式，从而使得基督教能像传统宗教那样包括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满足人类一切需要。其中包括治疗术，它在传统宗教和土著基督教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怎么说都不会过分的。治病疗效有助于体现人性的完整，在这方面宗教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治病，占卜、预言和显圣这些宗教需要也充分得到满足，因为他们的坚定信仰认为上帝通过显圣来启示未来和灾难的原因。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全都否定存在巫术、妖术之类邪恶力量，土著教会却承认它们的存在，并提供基督教的保护源泉来针对邪恶力量，坚信耶稣基督可以有效地进行保护和治疗。

承认巫术、妖术之类邪恶力量存在的现实，就是承认非洲人世界观，并使人联想起圣经的世界观，它承认世上有精灵、妖怪、天使、神仙以及魔王。否认这些神灵，像传教士们那样，就是西方化而不见得符合于圣经(因为圣经是承认这些神灵的)，那只是公开否定上帝的神力。

这些教会的产生为非洲人在基督教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才能提供了锻炼的机会，一个真正的非洲人的基督教在这些教会中得到了表现。随着这个情况，出现了非洲基督教神学的开端。这些教会打破了部族、甚至国际疆域的界限，把各族人民团结到共同的信仰与习惯之中，在非洲人生活发生巨大、激荡的变化的时刻，这些教会为许多人提供了宗教和文化的庇护。

产生于殖民统治时期至今还颇为活跃的土著基督教教会的范例有：黄金海岸的“使徒启示会”；尼日利亚的“黑人基督教会”；加蓬的“邦齐教会”；肯尼亚的“祖先神灵教会”和尼亚萨兰的“祖先神灵教会”；南罗得西亚的扎祖鲁人中间最初的“白鸟教会”；南非的“班图人联合和班图人习俗保护基督教会”；刚果的“黑人教会”；西南非洲（现今的纳米比亚）的“赫雷罗教会”。[40]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教会，它们或是在名称上加上主要部族的名字，或是在名称上含有非洲色彩的形容字眼，以此来突出他们的基督教的土著性质。这里只举加纳的基督十字军教会之例作为详细说明。

535

基督十字军教会之例

按照上述看法，黄金海岸（今加纳）的基督十字军教会[41] 可以认为是一个土著基督

---

[40] 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参看J. B. 韦伯斯特(Webster)，1964年；H. W. 特纳(Turner)，1965年和1967年；R. I. 威什莱德(Wishlade)，1965年；V. E. W. 海沃德(Hayward)编，1963年；C. G. 贝塔(Baeta)，1962年。

[41] 进一步读物可参看K. A. 奥波库 (Opoku)，见E. 法肖莱-卢克(Fasholé-Luke)、R. 格雷(Gray)、A. 黑斯丁斯(Hastings)和G. 塔西(Tasie)合编，1978年。



图片20.7　先知M. 杰胡·阿皮亚赫·阿卡德哈三世，基督十字军教会(黄金海岸/加纳)缔造者的孙子和继承人在这个教会一年一度的“和平节”时坐在6人抬的大轿上

教的教会。因为，同传统的阿肯族社会组织方式相关联，这个教会的创始人杰米西米汉·杰胡-阿皮亚赫先知，按照阿肯族的方式重新组织基督教，并以按照阿肯人对事物的看法可以理解的方式来传达基督教教义，从而成功地适应了基督教。这个教会开始时是1919年的一个祈祷团体叫做正信会，属于黄金海岸中部地区戈莫阿·奥关地方的卫理公会。但到1922年，它的领导人布道师威廉·埃吉扬卡·阿皮亚赫和他的徒众被逐出卫理公会，于是这个团体就建立成为一个全面的教会。

这个创始人不但创立一个教会成为它的神职总首脑，而且还建立起一个王朝成为始祖，带有尊号阿卡博哈一世（始王）。他的儿子则尊称阿卡西比纳（王子），据该教会的会章“按照圣灵的指令，他拥有神圣权利保持这一继承世系”[42]。创始人的妻子女先知纳索洛莫阿·杰胡-阿皮亚赫成为这个教会的阿卡提提比（母后）；于是，国王和王后同时也是基督十字军教会的最高权威。作为一个宗教运动的先知和领导人，杰米西米汉·杰胡-阿皮亚赫规定了他的教会的基础是“土著的基督教教会，创办起来作为我们微薄的礼物——奉献给基督的一种非洲生产的‘没药’，这是我们的神圣而珍贵的礼物，尽管别人奉献的可能是黄金或乳香。”[43]

这个教会是按照以军事编制为基础的传统的阿肯族国家“奥曼”(Oman)的结构组织起来的。在“奥曼”的最上头是纳纳·阿卡博哈(Nana Akaboha)，他集宗教和世俗权力于一身。阿卡博哈有他的大队及分队的首领，这种阿肯族国家结构的重要性在于它同这个教会全部历史和发展结合在一起，这个教会的使命感和命运感反映在这种组织划分之中。

这个教会的总部莫扎诺(Mozano)，起着阿亨克罗(ahenkro)，即传统阿肯城邦首邑的537 作用。阿卡博哈住在这里，有关这个教会的一切重大决定都从这里发出，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和平节”(Asomdwee Afe)。在阿亨克罗有圣祠和圣场，信徒们在那里祈祷和接受治疗。

这个教会的成员与其他人区别的地方在于使用铜戒指和铜十字架，它们起着“部落标记”的作用。每个成员所起的圣名也是这个教会所特有的，也起着“部落标记”的作用。这个教会有自己的语言叫“圣语”(osor kasa)，它们用于互相招呼、问候和进入家屋时候所说的话；教会内使用的名字也是来自这种语言。虽然它不是一个广泛的语言，但是它足以给这个教会增添特色成为一个有自己语言的“奥曼”。这个教会的成员资格没有部族和地位的界限，主要决定于找到这个教会来寻求解决生活中问题的人的需要。像传统宗教那样：

> ……在十字军教会(Musama)这个“奥曼”里实行的基督教是一种实地干的宗教，它是对传教士的基督教的逆反。后者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型的宗教，而基督十字军教会这种宗教却意味着日常的生活，它对当代生活的各种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不像传教士的基督教那样否认有恶魔、巫婆和妖精的存在，十字军教会承认

---

[42] 基督十字军教会会章，莫扎诺(Mozano)，1959年，第11页。

[43] 同上，第11页。

这些精灵的存在但证实了上帝的威力超过它们。[44]

基督十字军教会在它对当代生活的许多问题寻求满意的答案的时候从阿肯族的宗教和文化中汲取大量的东西，并且把卫理公会教义中的许多成分同一个强大的非洲人政治实体结合起来。它所代表的是那种认为可以在非洲文化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基督教教会的信念，从而在非洲进一步推广了基督教。

结 论

自1880至1935年的非洲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的宗教多元性不是被摧毁而是得到肯定。正教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获得很大进展，这全靠殖民地行政官员的某些活动。非洲的传统宗教作为东道宗教构成了新宗教赖以建立的基础，虽然到头来它的总观点发生了许多变化。它在制度习惯方面的表现受到新的殖民秩序很大影响，但是它的世界观甚至在立誓信教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中间还是继续存在。宗教多元性在非洲许多地方产生了对抗、竞争甚至冲突，但与此同时也为宗教之间的对话创造机会。

传统宗教被削弱也意味着削弱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这些制度倚靠宗教取得活力和支持。因此，道德、家庭关系网、村社的密切结合，以及酋长制度虽不是完全被推翻却是大大衰弱了。 538

这个时期非洲产生了土著基督教会，通常被称作独立的、分立的、分离主义的教会，或“埃塞俄比亚教会”（“黑人教会”）。引起的因素很多，但殖民地的地位和识字的普及则是关键性的。可是，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一发展标志着非洲基督教历史上的第四阶段，这个时期里，在非洲人领导下产生了一种新牌号的基督教，它同非洲人对现实的观点可以相容，从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它的信徒。这些教会为它的成员提供一种替代方法，代替历史悠久的传统的草药医生和占卜者，虽然人们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去找他们（土郎中）。

总的说来，几种宗教同时并存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存在着单一的传统宗教，这种情况导致了思想的激动，丰富了宗教生活。三种宗教彼此互相借用，以便对它们的非洲人信徒保持自己的重要作用。

但是面临日益增长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世界观、现世主义、不稳定、对自然的过度开拓，乃至于无神论（这些随着西方的影响来到非洲），传统宗教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宗教对一般人事提供另外一种看法，它既不脱离日常生活又不脱离自然。它的世界观令人耳目一新，同现代生活的精神世界方面大量充斥的枯燥乏味形成对比。

（陈绂　施兰卿译）

[44] K. A. 奥波库，见E. 法肖莱-卢克、R. 格雷、A. 黑斯廷斯和G. 塔西合编，1978年，第121页。

21 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文艺

沃利·索因卡

539 1976年2月，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和拉各斯之间的一个警察检查站，一名男子因持有被认为是盗窃来的古物而被捕。他带有两麻袋青铜器和木质雕刻品，但他一口咬定所有这些都是他个人的财产。警方后来发现他没有撒谎。此人不久前才皈依伊斯兰教，在伊巴丹某居住区生活和工作。从他的麻袋里发现的这类约鲁巴神雕像，经常由移居的劳工带进城市，在城市的临时住所里，他们用这些神像满足那些背井离乡的工匠、小贩、城市职员和其他劳动者精神上的需要。但是，这个居住区的头领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开始规劝其邻人也改信伊斯兰教。这个盗窃嫌疑犯本人改变信仰后，人家告诉他应当懂得，要想使居住区成为适合于真主神灵居住的地方，就必须放弃他原来的宗教象征物。但他不忍心毁坏这种神像，便决定送回故里，即他的村庄，现在这些神像就重新安放在那里。

这件事是文化形态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的一种常见格局，它提供了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在遇到宗教和其他更加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形式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以至复兴的恰当例子。1976年发生的这件事，其实在非洲遭受外来统治的那个更加富于戏剧性变化的时期是非常司空见惯的，因为那个时期整个民族连同它的社会组织以及经济和艺术格局都必须服从外部势力进行最大限度剥削的战略。奴隶贸易曾在两个多世纪的时期里进一步加剧非洲内部的自相残杀，导致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浩劫。殖民军的惩罚性袭击、传教士不容异教存在的态度和缺乏谅解——所有这些外来因素彻底改变了非洲大陆文化发展方向的常轨。不同的外国统治方式或者外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相互影响的不同方式，自然会在流离失所的非洲人中间引起或形成不同的文化反响。比利时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540 以及英国在东非实行的移民式殖民主义，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在这个大陆上是最残酷无情的。这种统治方式造成了最名副其实的真正使非洲人离乡背井的状况。阿拉伯人本身开拓的疆域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扩张主义虽然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性质，不过仍然在大地景观中留下了强烈的文化印记。然而我们从那个时期看到的现实，却是非洲各民族真正文化的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恢复，甚至其生命力更加旺盛。

非洲艺术

很难估价殖民贸易对艺术创作力所产生的质的影响。某些艺术手段显然并没有受到



图片21.1 约鲁巴人某香戈神祠里的木雕佛像

542



图片 21.2 加纳阿肯人的一尊黄铜库多

影响；例如喀麦隆艺术家的"彩色涂珠"技艺或约鲁巴人、鲍勒人、巴科塔人中流传的宗教题材雕刻艺术。然而，另一些艺术手段，不论形式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尼日利亚伊格博人的姆巴里(Mbari)壁饰艺术虽然仍保留着它的色彩感染力，但是从城里返乡的匠人的作品已经开始出现"流行艺术"的粗糙，这是因为这些人突然接触到所有色彩和质地的颜料的缘故。过去这类壁饰艺术受当地制造的颜料的质地以及品种稀少的限制。

意味深长的是，在法国治理下上沃尔特的博博-迪乌拉索-库米纳省库米纳区一年一度的艺术节中一项特出的内容，便是"传统派"和"现代派"对颜料选用问题进行争论。传统派面具艺人主张使用天然颜料的古老技法，不仅是由于它们的色泽和质地令人满意，而且由于他们感到艺术品的各种材料之间应该形成一种有机的联系。现代派则发现使用进口颜料不仅方便而且具有更大的变化可能性。附带提一下，这个庆祝丰收的艺术节吸引邻近各区的铁匠、织布工、染色工、雕刻艺人、舞蹈艺人和乐师，特别是迪亚加索的著名乐师，即卡雷人，会合在一起，它提供又一个例子，表明即使在殖民当局采取居民分片隔离居住制度迫使劳动者服从的条件下，非洲人的集体艺术创造力依然持久不衰。正是在一年一度至少有上述那么巨大规模的节日里，散居各地的人们举家涌入市镇，用艺术手段表明他们真正的世界观。

即使在殖民冒险事业初期，工厂产品就已经开始充斥非洲市场，本地的技能几乎无法与之匹敌。从阿散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精制容器福罗瓦（forowa)和库多(kuduo)的制造艺术的衰落中可以看到正常的群体社会发展中艺术的融合作用已不复存在，这些容器的装饰主题同非洲其他许多民族的一样，都是表现传统的训诫、谚语、道德箴言和历史掌故的图案和符号。像金砝码一样（可以肯定说它的商业效用已经开始降低)，福罗瓦仍旧普遍用作盛鼻烟、油膏等物的容器。但是这种产品的生产当时已经大半被英国工厂所替代，这些工厂可以用各种金属试制这种容器，如多兰·H.罗斯① 就提到过一个铸有"伯明翰，1926年"字样的银制福罗瓦。对比之下，在同一时期里，独木舟的装饰在形象与情趣的美学结合上却并来发现有经历同样削弱过程的迹象；它们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机动车辆一起，披着织成的布，继续使那种可以称之为"活动教学"的村社教育办法长期保留了下来。 543

非洲的建筑

如果稍稍仔细观察一下非洲人真正和谐的传统住所的内外布局，就不难发现当地人建筑天才方面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高超而精致的表现，它与当时比利时，特别是法国，通过实行种植园奴隶制度的方式，迫使非洲人接受的那种严格管制的分片聚居计划形成鲜明的对照。安德烈·纪德在其《刚果纪行》（1927年）中如实地作了详尽的描述：

"马萨人的茅屋确实别具一格。它不仅新奇而且美观；打动我的心的，与其说

① D. H. 罗斯(Ross)，1974年，第45页。

是它的新奇，不如说是它的美丽。它的美如此完善无瑕，宛如天然形成。它毫无装饰，毫无不必要的点缀。从底基起线条一贯到顶，似乎经过精确计算而成，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人们会直觉地感到，甚至连材料的耐力也一定经过计算。再向北或向南一点，粘土中一定是掺了大量的沙子，以便使它不易裂开，像阿格里帕万神殿一样，顶端收束成圆形天窗，成为茅屋内部采光的唯一窗口。茅屋外壁刻有若干整齐匀称的凹槽，既给这种几何形状增添了生气和特色，又可作为登上高达20-25英尺屋顶的脚磴，有了这种凹槽，盖屋顶时就无需使用脚手架。这种茅屋像花瓶一样用手工建成，它不是泥瓦匠的作品，简直是陶工的作品……

从灼热的户外走进茅屋，室内空气凉爽，沁人心脾。门的上方是一种壁龛式格板，犹如大钥匙孔，上面放着瓶瓶罐罐和家用器具。四壁平滑，经过磨光和油漆。进口对面放着一种土制高桶，桶壁饰有几何图案花纹浮雕，漆成白、红、黑三色，十分精美。这些是谷桶，土制圆盖用粘土泥封，非常光滑，犹如鼓面上的皮革。渔具、绳索和工具悬挂于木钉上，有的屋里还竖着一束长矛或一具蒲草编的盾牌。全家人就在这好似古罗马埃特鲁斯坎人墓冢的朦朦微光中，度过酷热的白昼；夜晚，牛、羊、鸡等等畜禽都进入屋里与人作伴……各有固定的地方，一切整洁，井井有条。只要房门一关上，屋内便与外界隔绝。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②

544

如果断言这个时期所有非洲人的住房建筑都能使旅行者抒发出这样的情感，固属徒劳，但人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当时非洲城市建筑几乎都没有认为这种传统建筑的结构技巧是值得借鉴的。

城市继续照搬或迎合欧洲城市模式，即如前所述，采取生硬的“方格子”形式，这种做法促使非洲人丧失了个性，并使他们固有的群体感淡漠了。尽管如此，必须承认，不少孤立的小块传统住房仍得以成功地立足于举目皆是的异国风采的建筑物的中心。即使在比属刚果（今扎伊尔）、塞内加尔、黄金海岸（今加纳）、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首府“高楼耸立”的中心区，也整齐地挤杂着一些早在19世纪建成的传统居住区，隐蔽在混凝土大厦的阴影之中。这些居住区通常以一个公用水井为中心。一条环形的或长方形的甬道伸入院子，一排家庭住宅联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屋顶，排水系统汇合起来，流往大街上的明沟中。即便在住屋不止一层的地方，空间性和平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呈现出同样不受拘束的特性。从巴西返回非洲大陆的人在这方面贡献极大。甚至在非洲内地的一些小城镇里，也有许多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传统建筑发展受到抑制的孤立事例，不断使人感到，在这个人类的创造性和功利主义的最直接产物方面，失去了美的东西。非洲的现代城市一直使人感到，环境根本不是按照本身的条件，而是按照殖民者的想象来改变的，因而产生种种失去本来面目的后果，即使在受到都市影响的壁饰、雕刻、音乐等等其他艺术形式方面，情况也是如此。

② A. 纪德(Gide)，1930年，第217-218页。

非洲音乐

真正的非洲人民音乐仍然使我们想到,它依旧是非洲大陆文化意志获得新生的源泉,而根本无法替代。在这方面"沙龙"所起的作用如何,难以肯定。除了极少数例外,西非沿海地区的音乐,完全重蹈欧洲各国在19世纪最后25年所逐步加深接触的南部非洲那些地区的命运。其模式如出一辙:教育"土著"的责任落在了传教士身上,他们开办学校,兼用哄骗、威胁(以远征军的不时出现为其后盾)、商业性诱惑之类手段,加上那 545 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在文化上的优越进步已有各种各样不容置疑的表现,使他们得以在学校里让那些勉强上学的学童充满学习热情。大批儿童所受的这种教会教育,其性质如何毋庸赘述,但绝不能认为这种改变原有文化信仰的过程仅仅发生在这些受到迷惑的小学生身上。从开普到冈比亚,做法大同小异:

> "纳塔尔的两位音乐家甘尼先生和A.E.罗兰兹先生组织了一支约有14人的祖鲁人合唱队,教他们唱的不是本地民歌,而是英格兰的无伴奏合唱曲、四重合唱曲和民歌。据说他们唱得不错,先后到南非和英国开巡回音乐会。在英国至少有5名队员离开歌唱队,随后接受了伦敦几家音乐厅更优惠的薪金而名誉扫地。1892年成立的这支祖鲁人合唱队后来就无声无息了,然而它是较近年代杰出地演唱欧洲合唱歌曲的许多非洲人合唱队的先驱。"③

这件事的发生,很可能与在此两年前的一件事有某些关系,当时美国一个黑人歌手演唱团曾震动德班。这些美国黑人歌手"不用伴奏,演唱了《我的肯塔基故乡》、《老黑奴》、《铃儿响叮当》等等昔日最受人喜爱的歌曲……那丰富的内容,特别是听腻了蹩脚的模仿他人的歌曲后,听到真正的黑人歌声,"④使听众欣喜若狂,因此在德班激起了对异国音乐的爱好。

这位作者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件事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在早些时候曾这样描写另一位德班人从事音乐事业的经历:

> "威廉·斯威夫特从音乐活动发展到从事音乐研究,研究工作使他在空闲时间到祖鲁人的村寨听本地人的歌曲,后来他自己用外出时随身携带的小提琴演奏这些歌曲。他把通过这种办法收集到的24首歌曲中的几首在音乐会上演唱,在音乐会上这些歌曲被粗鲁地称为'异教徒的歌曲'。"⑤

斯威夫特先生在德班的沙龙里给高雅的欧洲人唱的这些"异教徒的歌曲"当然也会同时在物质、精神、经济和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的环境里演唱。同样的歌曲,对库尤人(中部非洲)来说,是在为播种和收获、死亡和生育等举行的仪式上祈求振兴村社的生命力而唱的歌曲(当然,完全有把握设想,没有几个欧洲人曾收集到这些非洲民族真正的祭祀歌 546 曲)。但是,在这里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是音乐的作用和社会功能,因为只有通过音乐而

③ G. S. 杰克逊(Jackson),1970年,第117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50页。

不是其他艺术形式才最容易把握各民族活的文化现实。⑥例如，在一个极其精通木薯种植而享有名望的库尤族农妇的葬仪上，库尤人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作象征性摹拟表演，这时我们就会被引入一种肯定生命将会永存的想法，甚至非常实际地激发活着的人活下去的信心。摹拟表演和歌词有意识地表现出把死者种植木薯的神奇技艺传给生者，有时又同时突然提高声音和加剧动作，使整个村社成员的感情发泄出来，消除他们的悲痛，增强他们为生存而继续奋斗的力量。这种音乐已经超出了单纯“歌曲”的范畴。

但是音乐并不仅仅用于祭祀那些神奇的或知识渊博的人。其孪生姐妹——演说术，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人们在正式社会交流，包括政治安排和司法治理方面喜爱使用的手段，它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更无须加以强调。不过，把音乐和演说术结合为正式的司法体制，可以看作是非洲文化的另一特性，在这种文化中，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独成一体的社会活动，而是一种构成整体所必需的社会活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伊多马人使用一种传统的司法程序，即在一种基本上是戏剧式场面中利用半合唱方式判案。以合唱式应答为背景，争执双方就像正式演员那样陈述各自的理由，然后走出由人围成的半圆形背幕，再次回到人群之中。姿态有意模仿戏剧动作，甚至为了达到不和谐的效果面尽量加大动作的分寸。审判过程持续两天以至一周。瓦图齐人打官司也同样富有戏剧性。A. P. 梅里亚姆描写班巴勒人的诉讼场面提供了典型的一瞥，使我们得见人民对盘踞在该地、越来越加强社会控制的殖民主义抱着何种态度。这种当代生活的现实虽然以多种方式在文化宝库中形成，但始终未能支配音乐风格的实际运用：

一方：　　我呆在屋里本不想出来，但他找上门来要我当众辩论此事，于是我离开房子来到这里。[唱]“我好比一只蟋蟀爱唱歌，但四周的土墙挡着我。有人逼我跳出洞，所以我要唱起来。”让我们辩论吧，不过要缓缓来，慢慢来，否则我们就得去见白人法官。既然你逼我来，太阳落山我们也得在这里辩论下去。[唱]“我好比门前的一只狗，不见骨头决不走。”

547

另一方：　　谁也不能同时走两条路。你既说这又说那，两者之中必有一个是错的，为此我才攻击你。[唱]“一个贼与另一个贼谈话。正因你坏我才攻击你。”⑦

尽管有浪漫主义、种族自负感和其他形式的情绪和偏见的倾向，但不能否认音乐在非洲各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主要事实。当代一位绍纳族音乐家曾说过：

非洲的历史大都从歌曲中流传下来。[当你弹着姆勃拉琴(mbira)唱起歌时]你眼前就会出现全面反映昔日景象的画面，和过去时代朦胧梦幻中的人物，这些都……进入现代生活的焦点……你几乎能看到你的祖先再次步履蹒跚地走向现今的世界……⑧

至于马里人、塞内加尔人、冈比亚人和几内亚人社会中的“格里奥”(griot,乐师)，人们不仅仅把这类人当作为社会喜庆活动增加欢乐气氛的因素，而且把他们作为社会情况的记叙

⑥ J. H. 恩凯蒂亚(Nketia)，1975年，第21-24页。

⑦ A. P. 梅里亚姆(Merriam)收集，引文见R. 布兰德尔(Brandel)，1961年，第39-40页。

⑧ E. 马朱鲁(Majuru)，引文见 P. 伯利纳(Berliner)，1978年，第133页。

者、历史学家和文化形式的维护者，这点对绍纳族的乐人同样十分适用。他们的乐器姆勃拉琴引起上文所引的评论。一位黑奴的后代，在70年代从美国返回非洲寻访他的冈比亚祖先时，曾写了一首叙事诗，其中极力赞扬“格里奥”们。[⑨] 他从“格里奥”在西部苏丹的发源地向南到中部和南部非洲，打算得到这类人及其同行们在更加暴虐和动荡的年代里幸存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即使对于南部非洲以及它传奇式的“建立帝国”的历史和它随之而经历的战争和暴力征服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50年也是当地居民异乎寻常不安全的时期，具有无数在暴力下被四处驱散的事实。

在这个文化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姆勃拉琴幸存下来，实际上在它的大量弹奏者之间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宗教的和世俗的社会结构之间成功地建立起文化的同一性。绍纳人在暴力迫使下在开普和中部非洲之间迁徙的后果之一是，现在已经难以说清他们的乐器演奏法——实际上是他们的音乐的社会功能——有多少传入或是来自莫桑比克、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刚果（今扎伊尔和刚果）和乌干达，这些地方姆勃拉琴的演奏十分普遍；又有多少传入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那里在19世纪末逐渐集中了大多数绍纳人（见插图8.1）。但不容争辩的是，姆勃拉文化已经成为散落各处的绍纳人之间结成一体的纽带，并在他们不断而剧烈的离散中保存了下来。

绍纳人认为姆勃拉音乐是他们共同的伟大祖神查明努卡所赐，查明努卡似乎确有其人，是19世纪前期的一个国王。这种音乐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其渗透彻底，致使举凡排解纠纷、婚礼、丧礼、田野劳动、生育、加入团体以及其他许多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它。姆勃拉乐器本身被认为“能够使其乐声上入天堂，并与神灵世界沟通联系”，因而实际上也就是能将生者的活动与思想同他们祖先的灵魂联结在一起。 548

琴手们有的定居一地，有的四处巡游，他们并不总是等人上门来请。不过著名的姆勃拉琴师常常受几百英里以外的聘请，或因慕其艺术盛名，或因其演奏风格被认为最适于某种特定目的——通常是为了使巫师能够更好地阴魂附体。从这可以看出，一个有文化内聚力的社会就是这样越过地理疆界而维持下来的。通宵的比拉（bira）仪式先是巫师阴魂附体，然后转入纯粹的社会娱乐，如跳舞、唱歌、吟诗（包括喜剧）、演哑剧等，被恰当地描绘成“集体的彻夜长游”。阴魂附体的巫师复原之后还要裁决纠纷，对种植、收获以至政治等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咨询意见。

遍布于非洲的姆勃拉琴可以恰当地说明非洲音乐文化内在的演变。这种乐器本身的传统形式是装在一个葫芦里面的弹拨板，当然有上百种不同的式样。主要的一种式样是大扎齐马姆勃拉(mbira huru dzadzima)，它被视为“所有祖先的姆勃拉”，是伟大祖先查明努卡本人的琴。临近19世纪末恩德贝勒人南下时，绍纳人就是带着这种姆勃拉琴进入德兰士瓦的，此后不久由于欧洲人开始深入内地，恩德贝勒人又北返。南非的文达人和伦巴人，以及北罗得西亚南部各处的卡兰加人在同一个时期也使用这种类型的乐器。总之，自从1865年查尔斯·利文斯敦和戴维·利文斯敦发表的着作中第一次描写并图示了扎齐马姆勃拉琴以后，它至少有半个世纪享有盛誉。

---

⑨ A. 黑利(Haley)，1976年。

但是在20世纪初，另一种可与之相匹敌的祭礼玛沙韦（mashawe)被引进绍纳人地区，使用的是恩吉拉(njira)式的姆勃拉。不出10年，这种式样开始占了上风。演奏恩吉拉时常用鼓甚至笛子伴奏，因此它开始成为人们偏爱的形式，特别是在诸如结婚、子女出生等社会庆典上。使用两种乐器的两派人甚至用各自的乐器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命名——用扎齐马式的叫姆勃拉人，用恩吉拉式的叫恩坚贾人。这一部族区分在地域分布上也很明显，并且影响社会习俗发生细微的变化，但是并没有破坏姆勃拉文化的整体统一。

549　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日记也证实了姆勃拉社会富于感情的特性。这些报道把姆勃拉琴声比作齐特琴、大键琴和键琴的声音。[40] 这些日记中说、歌声带有某种葡萄牙法多歌曲(fado)的感情色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歌曲是南非的葡萄牙殖民者怀念家乡的音乐。可见离乡背井的遭遇在任何语言中都能产生可感觉得出的音乐共鸣。

姆勃拉不同于其他一些非洲社会音乐形式，它不是宫廷艺术，而是真正的人民的音乐，是所有被迫离散的社会群体的音乐。它的演奏者之所以在社会中受人高度尊敬，他们的职业之所以深受人们重视，是因为他们被看成是人们与来世相通的艺术媒介。此外，他们是随时可接近的职业艺人，因此在剧烈动荡的时代便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艺术家们就是这样精通自己的艺术形式，就连一些传教团体尽管起初显然持敌视态度，最后也被争取过来了。20世纪20年代各类姆勃拉乐器已经开始慢慢进入南罗得西亚的教堂管弦乐队。在教会的季节性节日，渐渐地可以听到根据姆勃拉旋律试编的曲子了。教会学校学生再也不致于因在课余弹拨“魔鬼的乐器”而被开除了。

但是，不论在教会院子以内或以外，音乐的社会结合作用仍旧是非洲大陆文化生活的最强烈特征。不论作为沟通神灵的媒介还是作为社会娱乐的艺人，不论作为历史学家、或者甚至作为侍奉特权阶级的宫廷侍从，音乐家构成各种文化手段中最重要的特征。

戏剧艺术

在大多数情况下，戏剧艺术乃是音乐艺术的延伸或提高，上文提到的一些例子相当有力地说明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出界线，不过，由于戏剧艺术是在19世纪通过与外界影响接触而发展起来的，它们就比音乐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从传统形式转变为适应性形式的过程。西非沿海地区在伊斯兰式的结构和基督教传教活动这两者的双重冲击下，确实使形势、转变中的各种形式和地方色彩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而返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奴隶带来了他们所流亡的国家的娱乐形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装束式样和语言风格，其影响又进一步加强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影响。[41]

550　在整个19世纪，戏剧职业化成了尼日利亚旧奥约帝国的一种生活方式，代表着从国王葬礼仪式上的面具表演发展成为世俗戏剧的演化。奥约帝国在北方富拉尼人的数次进攻和南方属国叛乱引起内战兵燹中分崩瓦解，导致职业剧团向南方流散、并跨过边界进

[40] P. 伯利纳(Berliner)，1978年，第41页。

[41] J. H. 科佩托夫(Kopytoff)，1965年，第86-133页；J. F. A. 阿贾伊(Ajayi)，1965年，第25-52页；R. W. 朱利(July)，1968年，第177-195页。

入达荷美(今贝宁),而与此同时,在它的发源地却不复存在。获得胜利的穆斯林禁止大多数戏剧表演形式,特别严禁在纪念祖先的节日上演的那种类型的戏剧,因为表现真的人物是穆斯林宗教极其厌恶的事。

在奥约,这些剧团曾受到一个稳定的君主政体的保护,但为时不久,国家的政治生活瓦解,不再能促成戏剧的进一步普及和世俗化。因为当时,传教士已经开始从沿海一带初期占据的立足点向北推进,往往紧跟在他们后面的便是有武力作后盾的商业性剧团。⑫ 他们严禁他们的信徒信奉任何异教,从而完成了穆斯林未竟的任务。这些剧团像家族行会那样经营,实行保守行业机密和履行参加仪式之类一整套人们熟稔的做法;演出的题材也根深蒂固地与传统紧密相关——所有这一切使他们被认为是魔鬼般的罪恶崇拜。基督教传教士和穆斯林一样,不仅仅以禁止演出为满足。就像在南部非洲禁止姆勃拉琴一样,凡与此种戏剧艺术有关的乐器,同样大力加以禁用。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真空,于是回乡奴隶的文化正好填补了这个真空。奴隶贸易过去曾促进了西海岸人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尽管事实上它显然破坏了受影响社会的文化生活。正如在南部非洲一样,传教士管地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保证有某种程度的安全,归顺穆斯林领主也能得到一定的保护,但安全的代价是不可避免地放弃纯正的固有艺术。这样,文化更迭的完整过程开始完成:奴隶时代在破坏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之后,现在,在它的垂死阶段,又使这些非洲大陆的子孙们重返故土,带来了一种新型文化,取代旧式文化。⑬

然而,胜利的得来不是很简单的。"异教"戏剧经受住了冲击,不仅保持了它的形式而且有意识地使自己成为抵御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事实证明,这种艺术形式历久不衰,它后来以种种形式加入了当时一些知名的殖民人士着手进行的各种使戏剧具有一定意义的试验。此时,19 世纪已进入最后的 30 年,西海岸受到那些返乡基督教徒创造性的影响。这批人确信自己学来的艺术的优越性,力图向业已左右他们生存的白人殖民者证明,黑人不仅能够欣赏而且能够演出欧洲的高雅艺术。幸好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尽管这种有意识的努力使得这些返乡基督教徒切断了同内地土著人在文化方面的联系,土著人则仍旧"稳妥地、牢固地恪守自己的风俗习惯"。⑭

551

新型的(欧美)戏剧表演形式呈现了由西向东发展的方式,主要是滥觞于人们在利比里亚、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的流亡生活,然后逐渐东移,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新血液。塞拉利昂的还乡者自称为"新斯科舍人",他们那种粗俗化的杂耍表演曾在沿海一带长期受人欢迎,但是当它传到更东边的黄金海岸、达荷美和尼日利亚等国后,不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到 20 世纪头 10 年,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已在西非明显形成,这就是"歌舞表演会"。它起源于西海岸各大城市中一种迎合中等阶级趣味的"上流社会"剧种。⑮ 那是一种粗野甚至淫亵的滑稽闹剧,夹杂着许多经过提炼适于在音乐会上演唱的码头工人号子,因为音乐会上可能有殖民当局上层人士光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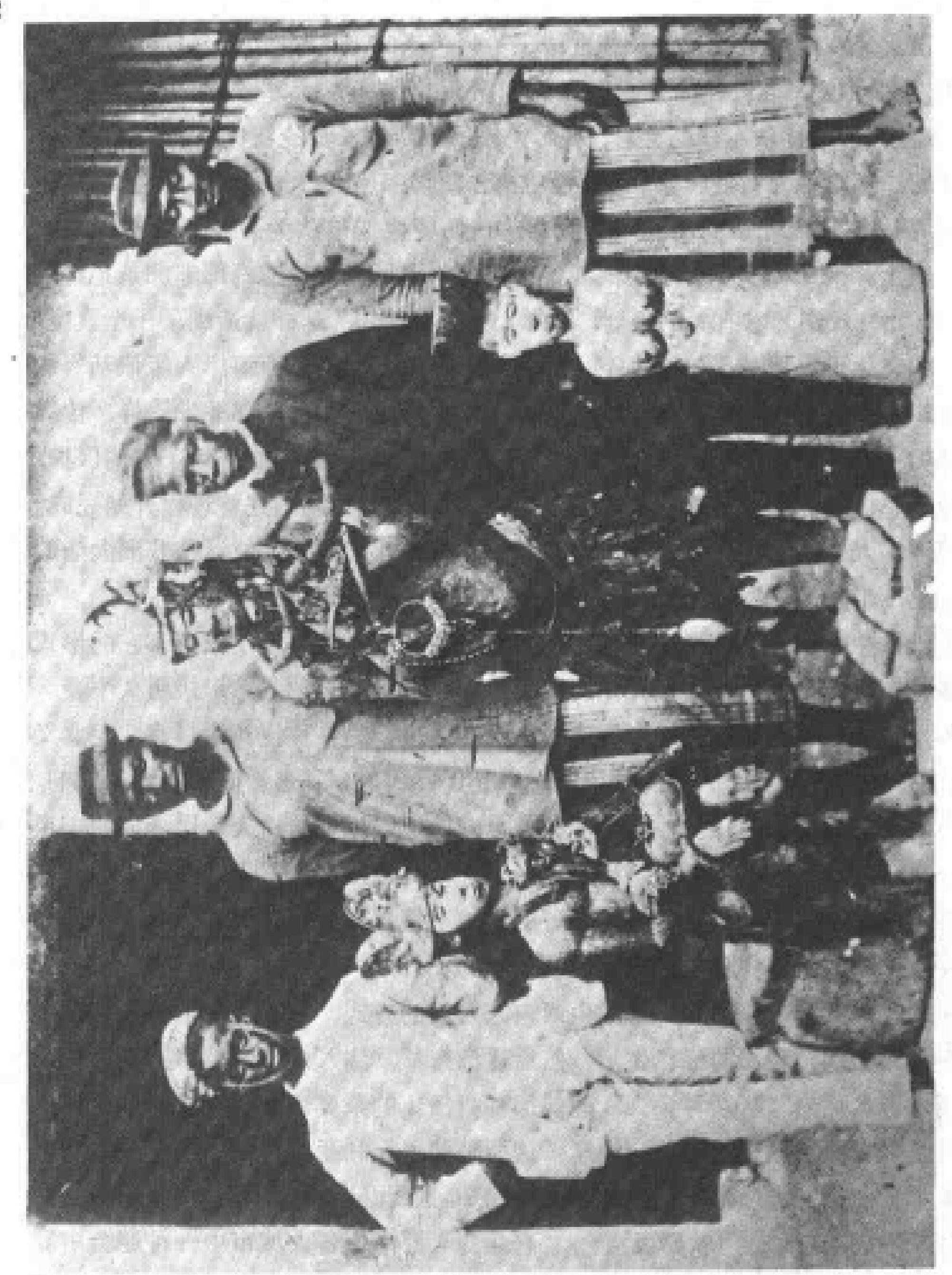
⑫ E. A. 阿扬代莱(Ayandele),1966 年,第 29-70、117-123 页。

⑬ J. F. A. 阿贾伊,1965 年,第 126-165 页。

⑭ R. W. 朱利,1968 年。

⑮ B. 特拉奥雷(Traoré),1972 年,第 2 章;O. 奥贡巴(Ogunba)和A. 伊雷莱(Irele)合编,1978 年。

552



图片21.3 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1808-1891年）访问贝宁市时与三位当地非洲人以及他们的神像合影

为音乐会演出成立了一些“学会”，它们是仿照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厅和美国杂耍场的模式建立的。基督教教会举办自己的音乐会，教会学校也卷入了这种音乐会热——发奖日、地方长官巡视、维多利亚女王诞辰等等良辰吉日都要举行。黑人传教士也不甘落后，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牧师就是著名的例子，他是一个以保护和鼓励这种艺术形式著称的成就杰出的黑人高级神职人员，而詹姆斯·约翰逊牧师则使拉各斯众所周知的布雷德弗鲁特教堂变成了戏剧演出的一块跳板。[16] 从巴西还乡的奴隶为这里的戏剧增添了一种虽是异国的却并不生疏的情调，他们的音乐很容易在西海岸和刚果一带的传统歌曲中找到共鸣。这些地方，城市压制当地音乐的时间还不长，因此这种歌曲还没有完全被人们忘掉。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10年中每逢圣诞节和新年都可以看到主要城市弗里敦和拉各斯这两个首府的街头到处都有酷似拉丁民族宗教节日的各种小型露天表演，其中卡雷塔(caretta)——一种化装成半人半兽森林之神的化装舞会[17] 流行的时间最长。

但是，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在抵制外来艺术形式全面占领阵地方面，一直发挥着作用。[18] 宗教及其各种机构在这方面又起了基地的作用。非洲宗教界不能容忍基督教文化帝国主义的过分行为，如在一个“全人类”的教会中禁止使用非洲乐器和吟唱非洲曲调，因此开始了分立运动。从 1882 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分离主义运动普遍出现，主要是由于非洲人需要按照祖先传下来的文化模式礼拜神祇。[19] 此时，在西非，主要是在拉各斯，出现一种独特的“歌剧”风，起初是教堂的大合唱，后转向把圣经故事改编为戏剧，直到脱离教会而演出世俗故事和建立职业性的巡回剧团。这个过程与当时暂不为人注意的阿格贝吉乔戏剧(Agbegijo Theatre)同时，从奥约帝国阿拉芬国王神圣的丧葬仪式演变为宫廷娱乐，此后又独立存在并在地域上扩大。从 19 世纪 80 年代的“学会”所举行的演奏古典音乐和演唱英格兰民歌的普通音乐会到 1902 年埃格比-伊费教会联合剧社所演出的历史剧《埃莱吉格博国王》，可以明显看出即使在尼日利亚南部西方化的上层人士中也发生了思想感情的转变。教会不喜欢这种情况。它把这种正在演变的艺术拒之于教堂和教会学校的大门之外。可是这样一来，反而促使人们加快建筑剧院，特别是专为表演艺术设计的剧院，以表示和教会针锋相对。这实际上是财力不相上下的各殖民地上层集团之间的争斗。到 1912 年，戏剧娱乐表演已经完全脱离了教会的控制，致使拉各斯殖民当局颁发了一个“剧院和公共演出管理条例”，规定演出团体必须在领到执照后才能公开演出。在当时拉各斯那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气氛中，采用这种政治检查制度的策略是否有效，值得怀疑；有意义的是该条例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553

“歌舞杂耍”剧团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在黄金海岸的《鲍勃兄弟和他俩的卡罗来纳女友》一剧中见到的那些剧团名称，使我们了解到许多这类剧团的鼓舞人心的情况。在

---

[16] J. F. A. 阿贾伊，1965 年，第 206-238 页；R.W.朱利，1968 年，第 196-207 页；E. A. 阿扬代莱，1966 年，第 175-238 页。

[17]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卡雷塔是拉美化了的“格雷代”(Gelede)假面具舞会，此时又从南美重新进入其发源地。

[18] 关于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尼日利亚的情况，参见J. 哈奇(Hatch)，1971 年，第 7 章；F. A. O. 小施瓦茨(Schwarz Jr.r)，1965 年，第 1、2、4、章。

[19] B.C.雷(Ray)，1976 年，第 6 章；也见本书第 20 章。

黄金海岸开创多种“歌舞杂耍”演出传统的功劳，应该归于一位小学校长耶利老师。[20] 他的学生鲍勃·约翰逊及其“阿克西姆三人演出组”很快便超过了校长，成为黄金海岸文化界，实际上西海岸一带，人人皆知的人物。[21] 更加重要的是，鲍勃·约翰逊的创新，其功绩在于开创了黄金海岸“歌舞表演会”的传统，那就是出现了各种专业团体——唱歌、滑稽、舞蹈、摹拟剧、喜剧。但是从文化的连贯性意义上说，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于他们在上演当代剧目时，在台前增加了一个传统口头传说中的固定角色——狡猾的骗子阿南塞(蜘蛛)。这种戏剧形式除提供大量纯喜剧笑料外，很快便发展成为一种评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手段。

鲍勃·约翰逊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在戏剧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可以带着他的歌舞杂耍团到其他西非城市演出。30年代的西非完全可以夸耀自己有一整套保留剧目，演出戏剧史上折衷派艺术中最光怪陆离的作品，甚至问世未久的电影，这时也在西非的舞台上留下自己的痕迹。鲍勃·约翰逊的某些表演动作就取材于查理·卓别林的恶作剧，就连服装和著名的步法也没有漏过。为庆祝英帝国节而举行音乐会的想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当代的想象力，使今日的现实脱离了殖民统治时期西非的历史现实。在这些音乐会上，像“叫化子米尼”之类的歌曲与“上帝留给我们的福音”和利比里亚码头工人的生活剪影同时成为晚会上的音乐节目。

当鲍勃·约翰逊筹备首次西非巡回演出时，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最负盛名的“歌舞表演会”主持人的休伯特·奥贡德，正在从当牧师的父亲和信奉奥苏格博神(osugbo)、当时是女祭司的祖母，这两种互相竞争的影响下形成他的美学观念；[22] 在塞内加尔，一位欧洲教育家夏尔·贝尔则在一所著名中学里着手彻底改变欧洲的文化移入政策。所有这些对殖民者的意图又是另一种嘲讽。回顾一下阿贝·布瓦拉、保罗·霍利之类衷心亲法的非洲人在著作中以各种方式阐述的同化政策的教育性质，就能更好地理解这方面发展的程度、并正确评价这种演变进度缓慢的原因。布瓦拉尽管提出一些广泛的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论证，[23] 但他对塞内加尔的班巴拉、萨拉科尔、沃洛夫、塞雷尔、图库洛尔和摩尔各族的文化、哲学、语言和社会结构等等方面考察的结果，却认为从非洲社会汲取不到任何现代文化发展可借鉴的东西，他认为没有前途，只有坐待“所有称之为‘乡村习俗’的那些即使不是不体面也是粗俗的生活方式的消失”。即使他这些奉承法属世界宗主中心的话算不上是法国同化政策的基石，无疑也对该项政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威廉·蓬蒂师范学校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这种保守主义在此后数十年占了上风的情况下诞生并得以长期存在的。[24] 这所著名的师范学校为法语非洲服务，其做法同英语西非的阿奇莫塔学院和东非的马凯雷雷学院一样。建立这些学院的目的都是为未来的教师和下

[20] J. C. 德格拉夫特(de Graft)，1976年。

[21] E. 萨瑟兰(Sutherland)，1970年。

[22] 参见M. A. 法迪普(Fadipe)，1970年，第7章。

[23] A. 布瓦拉(Boilat)，1853年。

[24] B. I. 奥比切雷(Obichere)，见J. L. 巴兰斯(Balans)、C. 库隆(Coulon)与A. 里卡尔(Ricard)合编，1972年，第7-18页。

层文职官员提供基本的欧洲式教育。以威廉·蓬蒂师范学校的课程为例，这样的文化教育当然都是法国式的——法国的戏剧、诗歌、音乐、艺术、历史和社会学。但是贝尔任校长期间，却着手制订学生文化教育的新方针。自1930年起，他便鼓励学生回到自己的社会中去从事文化指导。布置的作业促使学生去探索本地艺术的形式和实质。要求在威廉·蓬蒂师范学校学习的各殖民地学生在假期结束返校时都带回一个根据他们的研究而编成的戏剧节目，指导工作完全由学生们自己掌握。由于这种新型的戏剧艺术社会活动的一般观众不只限于欧洲人官员和“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也不只限于塞内加尔一地，因此它的影响遍布法语非洲的不同社会阶层。不过，能说这是产生它的那个文化的真正发展吗？ 555

回答必然是否定的，尽管这种试验不无指导作用。期望在那个时期法国戏剧的“经典”模式会完全让位给非洲传统表现形式，未免要求太高了。威廉·蓬蒂学校所代表的“社会”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它同它在有素质的观念和文化的目的两方面对其文化宝藏加以劫掠的那个社会实在相距太远。这种状况当然并非威廉·蓬蒂学校所独有，凡殖民者为完成其在非洲的使命而设立的其他学校和机构一概都是如此。因此威廉·蓬蒂学校的戏剧表演只是为了满足法国殖民者想看异国情调戏剧的需要。即使当这种戏剧带着它们自己的题材“到人民中去”的时候，它依然只是一种丝毫没有触动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真正的文化意识的新奇玩意儿而已。

埃及的文学复兴[25]

在文学领域，埃及和西部苏丹的情况不同，前者是文学复兴，后者则是殖民统治时期基本上敌对的各派势力在向非洲文化渗透中直接或间接地相互支持。

拿破仑·波拿巴占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在军事、社会和经济领域实行改革，他派教育使团到欧洲，特别到法国，以及1822年在布拉克创办印刷厂，这一切都为西方和伊斯兰东方两个世界之间开始新的关系铺平了道路，并使埃及进入一个新时代。埃及文学复兴的这个准备阶段，在埃及总督伊斯梅尔执政期间（1863-1879年）加快步伐，自19世纪下半叶起达到决定性发展的高潮。 556

一系列因素为现代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首先，自19世纪70年代起，深受西方政治、科学和文学思想影响的大批黎巴嫩-叙利亚基督教徒知识分子，[26]为

---

[25] 论述埃及文学复兴的这一节，由新加坡大学马来问题研究部的Y. A. 塔利布(Talib)教授供稿。——编者注

[26] 这批移民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向广大读者介绍18、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和科学思想的主要潮流。他们是评论杂志《贾米赫》的创办者法拉赫·安顿(1874-1922年)；销路颇广的评论月刊《文摘》的主编叶尔古卜·萨鲁夫(1852-1927年)，该杂志是普及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的媒介；多种主题的多产作家杰尔吉·宰丹，他特别是通过他的评论杂志《新月》月刊教育了好几代人，而且不仅限于埃及还远及阿拉伯东方地区。

在穆斯林著作家中，最著名的是法特希·扎格卢勒，他通过将边沁的《立法原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埃德蒙·德莫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是怎样产生的》等书译成阿拉伯文，介绍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学。他的杰出继承者卢特菲·赛义德是《日报》和《埃及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使徒》的主编。详见J. M. 艾哈迈德(Ahmed)，1960年；A. 胡拉尼(Hourani)，1962年。

了躲避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而陆续移居埃及。在埃及的穆斯林中间，也出现了一批新派上层精英，他们持有阿富汗尼的伊斯兰现代派观点和“阿布杜的文学和学术复兴思想。”㉗但是，当地文学作品都是欧洲的，研究计划中带有人文主义的偏见，一些作家集团各有自己的观点和兴趣。

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改革，各种研究院和学会、一个国家图书馆(1870年)、一些世俗大学的建立和创办，以及原有的宗教大学（如爱资哈尔大学）的改革和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导致产生一批有闲暇、受过教育和有兴趣的公众，从而形成读者和听众。这个结果若拿以前的情况来衡量，可算是真正的文学和学术的复兴”。然而，当地文学出品仍旧主要依靠翻译欧洲人的著作，这种情况在英国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之前和以后都一直盛行。随后这种方式及时地让位给改写与模仿欧洲作品，最终才产生了独立创作的作品。

这种文化的觉醒以及临近19世纪末埃及正在变化的政治气候，反映在报刊杂志的广泛发展上。1898年时已经出现了169家报刊，到1913年增至282种。㉘在杰出的穆斯林改革家阿富汗尼的影响下，㉙作为进行教育或评论政治的工具，期刊受到人们广泛赞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日益成为整个一代文人和学术界领袖所喜爱的表达意见的媒介。报纸同样成为在短篇小说、话剧之类新文学形式方面进行尝试的园地。为了表达和阐释新吸收的外国思想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古典阿拉伯文体”。

557

但这引起了一场论战。应该改革古典阿拉伯文体呢？还是应该发展一种适于当代埃及文学的现代阿拉伯文体？这成为古典派和现代派两个阵营争论的焦点。前者欣赏“深奥的文体，满篇晦涩字句，点缀着文学典故和宫廷文学式的内容渊博的辞藻”。后者的成员主要是叙利亚-黎巴嫩移民，受过西方教育，笃信基督教。主张采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容纳口头语和阿拉伯化的外国词汇”。

在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中出现的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即西方的理想和准则与伊斯兰传统观念之争。在最初阶段，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是努力接受西方思想呢，还是干脆置之不理。对立态度的对抗表现为文化方面的小争论，还没有“有吸引力的团结中心”。但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在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一切方面都强烈地感受到以新的生活条件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挑战。对这种挑战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反应，集中表现为富有战斗精神的伊斯兰改革者和注重理性的自由派之间的权力之争。㉚对埃及的文化特性和民族特性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如蒂尤菲克·哈基姆、迈哈穆德·台木尔和塔哈·侯赛因这样一些文人在他们的各种社会、文学和历史著作中提出的法老-地中海学说；㉛卡瓦基比提出的阿拉伯主义；㉜以及在纳赛尔主义出现之前，大多数学者提

㉗ N. 萨弗兰(Safran)，1961年，第57页。

㉘ M. 兹韦默(Zwemer)，见J. R. 马特(Matt)编，1914年，第129页。

㉙ 见A. A. 库德西-扎德赫(Kudsi-Zadeh)，1980年，第47-55页。

㉚ 特别是倾向西方的作者所写的论战著作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塔哈·侯赛因的《论蒙昧时代的诗歌》(1926年开罗版)，此书怀疑伊斯兰信仰的基础。

㉛ 主要参阅塔哈·侯赛因《埃及文化的未来》，开罗，1938年（1954年英译本）。

㉜ 如在他的著作《乡村之母》中的论述（塞得港，1899年）。

出的埃及的非洲文化没有充分发扬光大。

这个时期埃及在外国统治下发生的文化变革，唤起了较巨大的政治觉醒，后来在新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终于表现出来。

西部苏丹的文学

看来在殖民统治时期渗入西非西部苏丹地区的主要争夺势力是殖民主义势力（即欧洲势力）和以迪乌拉人为代表的穆斯林势力。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要在西部苏丹人的社会结构中去找。西部苏丹人的传统等级制度承认有技术的行业集团对与它们的行业及其活动有关的材料和地理区域拥有权威，赋予伊玛目(iman)或阿里目(alim)（伊斯兰师表）以学术、写作和交流领域的垄断权力，同时拥有间接控制同欧洲殖民国家之间发展通商 558 关系的权力。

在历史上，阿里目本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代表。这个群体散布在西部苏丹非穆斯林民族中间，它与众不同，往往主要是一个文化单位，以其宗教信仰和高效率的商业组织为特色。这群人被称为迪乌拉人。他们渗入西部苏丹各国的主要目的在于经商；他们到博博-迪乌拉索、孔城、邦杜库以及其他城镇定居，经商的路线是从黄金海岸、上沃尔特的金矿产地和其他热带矿区直到撒哈拉沙漠。[33] 他们不仅建立城镇，而且创办城外驿站，将主要中心城镇与撒哈拉商路连接起来。而且，迪乌拉人（这名称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主要职业——贸易）同样关心维护和发扬他们的伊斯兰文化，并成为摩尔人和阿拉伯人进一步渗入西海岸热带雨林地带的纽带。现在仍保持有这样的文献记载：比普通阿里目更有造诣的迪乌拉学者卡拉莫科(karamoko)每逢"安息日"访问开罗的学术中心，并在这些地方的法庭上留下一些精通法律的判决（这等同于威廉·阿莫所受到的回敬，阿莫是加纳的一个获释奴隶，18 世纪曾在德国维滕堡和耶拿大学发表哲学论文）。[34]

不可否认，传入西非地区的伊斯兰文学大部分都很保守，偏重修辞，形式呆板，所采用的一套方法是生搬硬套而不是融会贯通，内容基本上只限于伊斯兰经典的诠释和法规(圣训和教律)。尽管如此，西海岸和北非与中东之间不断的学者来往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珍贵的手稿交易同迪乌拉人的世俗物质贸易一起兴旺发达，这证明非洲学者对阿拉伯文化知识有着强烈的追求。历史著作许多出自阿拉伯学者之手，与出自欧洲化的沿海城市的学者或移居国外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学者的著作一样多。譬如，对西海岸，主要是 1920 年对科特迪瓦的伊斯兰教师的藏书的一次调查，发现收藏的手稿涉及历史、语言（阿拉伯语语法）、诗歌、数学、逻辑学、法学等领域。[35] 559

有文字的文化的存在，即使仅仅是在无文化的广大群众的金字塔顶尖上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中存在，仍然对大多数人，而且也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这种金字塔式的

[33] 关于迪乌拉人的详细情况，见Y. 佩尔松(Person)，1968-1975 年，第 1 卷，第 95-122 页；M. 克劳德(Crowder)所编书（1971 年）中第 113-126 页Y. 佩尔松的文章。

[34] 详见W. 亚伯拉罕(Abraham)编，1964 年；N. 洛克纳(Lochner)，1958 年。

[35] J. 古迪(Goody)所编书（1968 年）中 I. 威尔克斯(Wilks)的文章。

文化结构，正是产生于外来文化的各项准则。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优势是在外来文化起着改变宗教信仰的作用的情况下形成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此，伊斯兰文化渗入西苏丹的经历，仅仅在性质上有别于欧洲-基督教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侵入，至于所造成的后果则两者并无二致。由两种在历史上相对立的文化所产生的两种书面文化，在一块“顺从的”土地上相遇，就导致双方都加强各自的手段，特别是先来的一方，因为它眼看自己精心耕耘的土地就要丰收在望了。双方自然都不理会或有意否认他们所争夺的地区原先存在什么真正的价值观念，当然也就假定它是一个文化真空。非洲文化体系容许不同信仰共存，自然而然也就相信了这种假设，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竞争双方都提出来的假设。正是非洲文化本身表现出某种容纳各种信仰的可能性。伊斯兰教在当地人表面上容忍的顺从中丧失了自身正统教义的许多重要成分，包括后来分裂成几个教派的正统教义。

前面已经论述了“土著们”为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否定非洲文化的手段所采取的策略；在迪乌拉人改变人们宗教信仰的政治体制下，伊斯兰文化也遭到同样的抵制。在某些情况下，迪乌拉人的群体被当地社会彻底同化。这种完全同化的例子虽属罕见，但是I.威尔克斯在其资料丰富的论文[56]中曾举出一个例于，即加纳西北部吉拉帕的塔加拉人。同化的过程完全是不知不觉的。如同前面提到的库米纳镇的葬仪的事例一样，非洲人在实际上和仪式上都保留了土地管辖权，因此，虽然在城市里，与法国和伊斯兰“教化人”的教会接触，不可否认地对改变宗教信仰者有利，但按季节“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取代了“无保障的”群体和个人。这就是迪乌拉人的命运。

此外还应记住，随着殖民主义成为有组织的事实和城市中工业的蓬勃兴起，来自遥远北方（马里、毛里塔尼亚）的穆斯林移民加入了南方城市中心的劳动大军。这种情况吸引了“乌里玛”(ulamā学者)或卡拉莫科(karamoko智者)前来主持宗教仪式，他们很快在城市居民群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迪乌拉人为了坚持更新或振兴伊斯兰教的战略，通过派遣“乌里玛”到显示出宗教热情减退的穆斯林居民群体中去的办法，来努力保持穆斯林群体之间的不断接触。这样需要他们去主持宗教仪式的要求越来越多，使正宗合格的人员疲于奔命。而且这些乌里玛通过作为移民劳工和在各产业公司的新经纪人手下当初等会计的白人之间的联系人，被视为“思想领袖”，因此往往不愿放弃这种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威信，也不愿放弃城里的舒适生活。于是，到一些迪乌拉人的村社去主持宗教仪式便成了一种摊派任务。这种要求常常向一些甚至不是迪乌拉的人提出。有文化就受到尊重，这对非穆斯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某些村庄或者当地的酋长或农夫常常请求当地的迪乌拉人当教师。当地人所属望的一些人物有时成为巡游学者，来往于各“乌里玛”（伊斯兰学者）之间。在19世纪，这些地区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精英（大多是穆斯林）的特权，为许多人所垂涎。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按级高升，逐步成为卡拉莫科，掌握自己的伊斯纳德(isnad)，即传述圣训的线索，说不定会通过一些想象的或传闻的学者，把自己同先知穆罕默德本人联系起来。谢克·哈米杜·卡内在其美妙的著作《前途未卜的冒险》[57]中，描述的就是这种由于伊斯兰教义的哲学而在西部苏丹地方形成的“非基督

560

[56] J.古迪所编书(1968年)中I.威尔克斯的文章，第165页。

[57] C.H.卡内(Kane)，1972年。

教”式的征服气氛。

当时西非受过西方教育的著作家们，并不是人人都认为穆斯林文化的挑战就一定与非洲人的真正才智大相迳庭，或者肯定与沿尼日尔河、沃尔特河和塞内加尔河一带由改宗基督教的黑人建立的传教点当时热情传播的基督教价值观念水火不相容。在像阿贝·布瓦拉那样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或者他勇敢的同胞、学者兼军人保罗·霍利看来，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文化值得在法国高等学府里研究，在那里这些学问不会毒害那些容易受影响的非洲人，尼日利亚的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走得更远，他准备让人学习和讲授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文化[38]。因为通过把圣经和教义问答译成阿拉伯文，也许还会导致伊斯兰信仰和社会中“比较粗俗的方面”得到改善。

但出生于圣托马斯、后移居利比里亚的西印度群岛人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则坚信，伊斯兰文化在世界所有主要文明中最适合于非洲人的气质和文化现实。在他看来，伊斯兰教只不过是为非洲人重新创立一种具有自己可靠结构和体制的非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是主要的组成部分。[39]这位鼓吹黑人精神(négritude)的先驱一心想的是彻底调整非洲教育，使它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而转向更适合非洲实际的方向。穆斯林-阿拉伯文明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活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正是这种文明后来在这种改革中起了主要作用。布莱登研究了自古代起的黑人历史，发表了他的发现，即在埃及最早曾存在黑人文明，认为希罗多德是比后来欧洲的注释家们更值得重视的评论家，因为后者非但不是所记述事件的“当代人”，而且以种族主义偏见滥用自己的学术地位。[40]

561

但是，形成布莱登为非洲文化重新确定方向斗争主要内容的并不仅仅是古代历史。非洲人历史上晚近发生的事件以及他本人的文化和才能，甚至在“新大陆”不利环境中的发展，都激励布莱登去研究历史书籍。他宣称像纳尔逊海军统帅那样的欧洲人物的历史，比起像图森·路维杜尔那样的黑人英雄的历史来，简直不值一提。这是革命的甚至是危险的说法，意味着一个着重分析非洲近代经验的新学派的出现，这比布莱登提倡在西非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在他拟创办的大学中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化的主张甚至更加过分。难怪在他生前，这样的大学根本没有成为现实。但是，我们今天所掌握的证据表明，这位西非的“海外回归者”虽然精通西方传统文化，但却是瓦解西非沿海基督教传教士巨大势力的直接促进者。1891年1月2日，他在拉各斯布雷德弗鲁特教堂对拥挤的听众发表演说，强调欧洲的教会精神与非洲人的社会和传统是水火不相容的。几个月之后，还是在拉各斯“正统的”布雷德弗鲁特教会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产生了非洲土著联合教会，如前所述，随着分裂运动向西非的西部和北部发展，结果对非洲人的文化生活造成种种影响。[41]

---

[38] R. W. 朱利，1968年，第188-189页。
[39] 同上，第46-47页、第218-219页。
[40] E. W. 布莱登(Blyden)，1887年。
[41] J. F. A. 阿贾伊，1965年，第254-255页；E. A. 阿扬代莱，1966年，第201-203页。

欧洲语言的文学

西非和中部非洲用欧洲语言写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构成了对抗殖民主义的最强大力量。口头文学作为一种讽刺性的发泄不满的手段仍保留着它的地位，哑剧、舞蹈和以假面剧出现的新形式也同样随时跟纵殖民统治现象并加以评论。但是真正激发文学想象力为反对殖民主义服务的却是用殖民宗主国语言写成的新闻报道、诗歌、话剧和小说等文学作品。[42] 从利比里亚到拉各斯的西非沿海地区，出版小册子之风大盛，其规模堪与 18 世纪的英国相比。肯尼亚也是如此，不过在东非的情况下这似乎大部分掌握在亚洲移民手中，大部分杂志也是一样。这些简短的小册子印刷便宜，易于散发，刊登激烈的文章反对外国的统治和剥削，反对殖民当局的欺骗行为和对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尊严变本加厉的侵害。葡属罗安达在 1841 年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随即出现了维护非洲人事业的活跃的新闻事业。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注重文体风格，无论哪种殖民宗主国语言的报刊都是如此。塞内加尔的阿赫马杜·迪盖·克莱多尔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暴行的控诉，虽是义愤填膺，却是结构严谨的散文。向英国殖民事务部的请愿书也成为一种艺术，一门写外交文章的学问。

早期的"国会议员"不论是任命的，是法国当局的归化民或是英国当局批准的群众代言人，即所谓立法会议的成员，往往利用外国统治者的语言打破这些统治者以为殖民地行政官员已经驯服的幻想。这样，《西非报道者》杂志的一位名叫威廉·格兰特的人尽管抱着真诚的感激心情，甚至向英国读者和可能慷慨解囊的慈善家献媚的态度，1882 年却在自己的杂志上写下了（或是允许刊登）下面一段冷酷无情的控诉文字：

> "每艘靠岸的轮船……都带来大量价值较低的东西以换取贵重的和有用的物品……这仍旧是欧洲人同非洲做买卖中长久存在的一个污点。即使运来的是毫无价值却也无害的一些不实用的东西来换走有价值的物品，这种交易也应受道德上的非难，更何况那些舶来品不仅价值微不足道……而且往往确实是有害的。他们运回家的东西使他们发了财，却常常把使人陷于贫困乃至毁灭的东西留给非洲人。回顾起来令人悲痛，在许多情况下，欧洲商人常常使非洲主顾一贫如洗……。除非自负的、开化的欧洲人同"野蛮的"非洲人之间的商业关系建立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否则他们决不能在非洲获得传播文明思想的立足点。但是只要还是一坛接一坛地运来朗姆酒……即使再增加传教士和专职慈善家们的说教，对于欧洲文明也将毫无裨益。"[43]

格兰特是一个为进行面向非洲的教育改革而热情奋斗的人，他深受布莱登的影响，力求建立一种以大学为顶端的教育体系，他主张大学只是一种旨在研究和教授与非洲有关的各学科的机构，反对"强调欧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那种传统的文化教育"。他写道，必须"由他们（指非洲人）自己教育自己"。20 世纪头 20 年，黄金海岸的保护土著居民

[42] 见C. H. 卡内，1972 年；M. 贝蒂(Beti)，1971 年；A. K. 阿尔马(Armah)，1973 年；W. E. G. 塞基伊(Sekyi)，1915 年。

[43] 引文见R. W. 朱利，1968 年，第 142 页。

权利协会的年鉴中，有许多维多利亚式的散文杰作，特别是J.E.凯瑟利·海福德的一些演讲词。这些文章颇有古典作品那种用词恰当，机智地进行嘲讽的味道。不少地方官员在巡视平靖后的领地时，常常碰到令人吃惊的遭遇：来到时迎接他们的是“效忠演讲”，离开时却被一些精通英语的黑人演说家的“表面上温顺的侮辱”激怒，悻悻而去。

1911年凯瑟利·海福德发表了他的《不受束缚的埃塞俄比亚》[44]，这是非洲最早的小说之一，是一次兼采各种风格的尝试，对瓜分非洲并使之殖民地化的贪婪和种族傲慢态度既进行尖刻的讽刺，又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凯瑟利·海福德毕生的作品都坚持不渝地关注黑色大陆的命运，始终拒绝接受殖民行为或在思想上承认其权威。奇怪的是，《不受束缚的埃塞俄比亚》在那个时期里竟没有为人所知的效法者，始终是一枝独秀。相反，非洲却出现了一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和文化界名流，如尼日利亚的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和塞内加尔的巴卡里·迪亚洛。他们和阿贝·布瓦拉一样，替欧洲殖民主义辩护，认为它对非洲来讲是具有积极意义和值得称颂的经验。克劳瑟是一位新教神学家，但非常嫌恶自己出身异教社会，忧虑重重，因此，在他看来基督教（殖民主义只不过是其代理人或实施者）从最根本意义上说，乃是上帝拯救一个信奉异教的大陆的工具。至于巴卡里·迪亚洛则完全被法国文化的优越所倾倒。

殖民主义者奉行的文化替代政策，其结果造成的困境，主要就在于这种思想上的异化，它在非洲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个性中形成一种痛苦现象。即使是最激进地反殖民主义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也常常明显地看得出，对他们的社会中所经历的、并在他们个人扩大知识领域中所接触到的欧洲文化，有着明显的迷恋和偏爱。马达加斯加的天才诗人让-约瑟夫·拉伯亚利维洛（？-1937年）的悲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信他就是由于无法克服他的殖民地心灵中这种内心痛苦而自杀的。这种情形使早期殖民统治确立阶段许多有表达能力的非洲人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性质。这有利于殖民者，特别是法属、葡属和西属领地的殖民者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从而导致新生的上层精英有意疏远，甚至否定非洲人创作才能的真正源泉。无论在创作灵感、文学形象还是风格的转变方面，“原始主义”成了倒退的证据；这种情形延缓了非洲文化再洗礼的整个过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保证了在海外的欧洲殖民官员们纷纷进入这个不可思议的社会，并被这个社会所接受。

也有例外的人，这些人在把同化政策变成政治艺术的移民环境下显得尤其令人瞩目，像西尔维里奥·费雷拉、安东尼奥·何塞·德·纳西门托和弗朗西斯科·卡斯特布兰科这样的诗人就是如此。他们从19世纪末起所写的诗，就公开指责移民的种族偏见。但是与此同时，在安哥拉以及其他葡属领地（实际上在所有殖民领地）都逐渐形成一种对天天受侮辱的现实采取逃避主义的形式。圣多美岛的卡埃塔诺·达科斯塔·阿莱格雷的诗便是一例。他的充满情爱、赞美黑人妇女美丽的抒情诗，在死后出版，[45]可以说是后来在称作“黑人精神”（nēgritude）的文化运动中出名的黑人自我教化文学流派的先驱。 564

[44] J. E. C. 海福德(Hayford)，1911年。

[45] C. da C. 阿莱格雷(Alegre)，1916年。

“黑人精神”文化运动的主要接生者是马提尼克的艾梅·塞泽尔、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桑戈尔和法属圭亚那的莱昂·达马，其摇篮则在法国。“黑人精神”文化运动带来了诗歌创作的繁荣。[46] 并非所有诗歌全是达科斯塔·阿莱格雷式的“宣传”诗，但是它们的出现应归功于人们重新意识到非洲的现实。对非洲现实的重新认识通过这一派人具有说服力的觉醒而变成一个具体的纲领。简而言之，这是一场反叛，一场反对法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一时得逞的同化战略的反叛；发起这场反叛的先驱们认识到他们就是这种战略的产物。然而，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场运动起源于3个马提尼克大学生创办的《正当防卫》杂志一期中的“宣言”。他们在这篇宣言中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的“资产阶级习俗”，否定了一些欧洲文学形式及其强加给黑人的虚构的个性。但是，作为替代物，他们又采取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兰波、布雷顿和其他欧洲良师的学说，这个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殖民地文艺界和知识界所兜的圈子。

本章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以黑人精神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告结束，这个运动在以后20年间对创作情感的形成起着无可争辩的支配作用，不仅法语殖民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而且葡语殖民地和英语殖民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均如此。今天，在毫不妥协地反对黑人精神文化运动的人们中间，有在50年代初期反对葡萄牙同化政策的斗争中曾经给黑人精神文化运动以新的活力的一些非洲领导人。这些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历史观与黑人精神文化运动的信条是不可调和的。因此确切地说，黑人精神文化运动只是一种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历史现象，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随着社会越来越需要更加全面的分析方法和剧烈的药方才能奏效时，它已经失去了在感情方面的那种支配作用。

(舒展译)

[46] L. 凯斯特卢特(Kesteloot)，1974年；A. 伊雷莱(Irele)，1964年，第9-11页；D. S. 布莱尔(Blair)，1976年。

22 非洲政治和非洲民族主义 1919-1935年

B. O. 奥洛隆提梅欣

为了正确评价本章将要论述的各种事件，我们有必要对非洲民族主义的性质作明确 565 的认识。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区分19世纪以后欧洲的民族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殖民统治下的非洲的民族主义。在欧洲，民族主义表现为各个承认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并由共同的历史所维系的社会群体要求以自己的政治组织（国家）的形式实现其独立的、享有主权的存在的愿望。当时所为之奋斗的是确保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同政治生活组织即国家两者间的一致。如同希腊、意大利和德国的例子所表明的，从这种民族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一般都是民族国家。

在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同欧洲殖民帝国缔造者们作斗争并力图阻止建立殖民体系的那些国家和集团，它们的强烈愿望同激励着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各种愿望，实质上是一样的。然而，这次战争的一个特征是，战争结束时宗主国主子们与非洲独立和主权的保卫者们相比，其地位得到了巩固。尽管各种思潮正在酝酿发展，对作为一个体系的帝国主义起着破坏的作用，但殖民统治却业已成为现实，其程度之深使得一些作者把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称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的“黄金时代”。

大多数业已形成的殖民地，是由若干文化和历史相异的民族群体所组成，对它们来说，臣服于一个共同的外国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相互团结的主要基础。殖民地的这种形势，对这些民族群体来讲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它们非得形成外国统治下新的同一性不可。虽然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是把许多不同文化的民族纳入同一个帝国主义行政当局管辖之下，但这已作为既成事实为人们所接受。新的同一性形成的起点是承认不同文化的民族具有基本的非洲属性。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殖民地行政管理单元 566 都代表了非洲人开始视为雏型国家的领土界限，他们围绕着这些雏型国家设法在人民中间造成一种共同归属感。

在殖民地条件下，政治和社会发展是以殖民者为一方和以被殖民者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洲领导层精英的倾向性一定程度上是由殖民地行政管理形式所决定的。如果行政管理的结构和（或）政策是区域性的，如法国各殖民地联邦，那么，那里的非洲领导人往往就具有区域性的观点。因此，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非洲民族主义斗士（在斯瓦希里语中他们被称为“瓦纳希阿萨”）一直被认为首先是泛非主义者，而不是欧洲观念中的民族主义者。关键在于非洲的民族主义与同一现象在

欧洲的表现采取了截然相反的途径。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的是，在一些会使国家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共同体的文化民族还没有熔合在一起之前，就建立了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应当接受詹姆斯·科尔曼的看法：

"……在很多情况下，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并不是那种对一个力求保护和维护其自身权利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统一体的归属感，而是一些具有种族意识的现代派的运动，这些人力图在欧洲主子强加的人为边界之内，由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政治和文化的新民族……"①

我们必须认识到，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相互关系的制度，是以某种类型的种族主义为基础的，而由于在殖民地形势下的发展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对于作为争取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来说，种族意识乃是其发展的首要条件。

非洲民族主义者被看成是"现代派"，这反映了他们是在一种由外部因素确定的环境下进行活动的这一事实。这种环境把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定义等各种外来的体系强加到他们头上，而他们取得成功的条件就是非得接受这些体系不可。非洲民族主义是一种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现象，这从大量有关创立民族和民族统一主义的著作问世，即可看出。也许，能够确切说明非洲这种现象的字眼，应是如E. S. 阿蒂埃诺-奥迪安博在第 26 章中讲的斯瓦希里语的"希阿萨"(siasa)。

一般说来，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需要一种社会基础。这种基础通常是靠通过教育体系传播殖民者的文化而建立起来的。在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教育体系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567 成为衡量在殖民地社会中培养一批新型精英的标准。然而，传播殖民者的外来文化，不仅能带来融洽的文化接触，而且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冲突，这从被统治民族的激烈反应中即可看出。除此之外，还始终存在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利害冲突的问题。前者竭力要永久维持控制，后者则或者通过适应殖民制度的框框，或者通过恢复独立和主权，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斗争。

正如 M. 克劳德在本书第12 章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非洲各地涌现出来的受过教育的精英重新燃起希望。他们期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各自所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他们期望被殖民统治者承认并接纳为同事；但是随着殖民地形势日益成为现实，他们发现，他们的各种期望都破灭或落空了。即使大批欧洲人在战争期间被征召入伍曾给有知识的非洲人带来许多就业机会，然而战后时期的现实很快就引起他们的失望和不满。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不仅发现，与在同一个殖民地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受过同等训练和具有同等经验的欧洲人相比，他们的地位低下，而且在社会上也处于陪衬地位。他们远离自己土生土长的社会环境接受教育，满心期望他们所受的教育能使他们跻身于欧洲人的世界，他们这些人在志向、生活方式、抱负和对物质和社会方面得到酬报的期望等方面都与本民族普通民众格格不入。② 因此，殖民主义所固有的偏狭思想对他们设置的各种障碍，乃是他们不满、仇恨以至鼓动人们反对殖民政权的根源。

① J. S. 科尔曼(Coleman)，见P. J. M. 麦克尤恩(McEwan)和R. B. 萨克利夫(Sutcliffe)合编，第 177 页。

② 见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为F. 法农(Fanon)所著书（1967 年）写的序言。

任何政府都利用中间机构，主要是为了节约和增强效率，殖民地政权当然也不例外。正如R. F. 贝茨在本书第13章所指出的，各殖民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传统体制和传统领导阶层的上层人士，以便于他们控制所辖领地的人民。固然，殖民地官员在寻求这类权力机构和人员的同时，往往也树立和培植一些他们所能了解和利用的新机构和新人员。例如，尼日利亚东南部的"授权酋长"，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马赛族中和乌干达除布干达以外一些地区的土著权力机构，以及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统治下大多数所谓的"酋长"。但即便是这样，那些被吸收进来维持殖民统治的上层人士的待遇，也并不比在殖民地体系内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非洲人好多少。同受过教育的新型精英一样，"传统的"统治者两头落了空。一方面，在他们的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传统地位和作用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殖民主子大都只是把他们作为统治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伙伴。丧失了实权、社会地位和威望，是导致他们中间许多人心怀不满的根源。

只有少数几位殖民地行政官员懂得如何妥善处理"传统"非洲上层人士和新型非洲精英之间以及这两派非洲人同殖民政权之间这两方面的不和谐的关系。这少数几位出众的官员是：摩洛哥的利奥泰将军（后晋升元帅）、北尼日利亚的弗雷德里克·卢加德爵士（后受封勋爵）和黄金海岸（今加纳）的戈登·古吉斯伯格爵士。即便是这些人总的策略也不外乎是抑制受过教育的新型精英的各种愿望，这批人常常被说成是野心勃勃的新贵。一般说来，在这两派非洲领导层人士之间的关系上造成冲突的局面，而由宗主国的主子来充当"传统"领导人物和政府体系的保护人，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派都会对殖民政权产生不满情绪。1917年，若斯特·旺·沃朗奥旺总督在以下这段富有洞察力的文字中着重强调这个对殖民主义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具有潜在的爆炸性质： 568

> 土著酋长，无论是我们精心保留下来的昨天的酋长，还是我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今天的酋长，都抱怨蒙受了耻辱。行政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译员"，即各种辅助人员，也抱怨自己只是"工具"，并没有得到作为合作者应有的地位。这些收入微薄、境遇十分悲惨的精英，由于被赶出了自己土生土长的社会，同时又不被欧洲社会所接纳，在两方面都遭到冷遇。所有这些人都充满着失望、不满和痛苦的情绪，事实将会证明，不注意到这种情绪是危险的。③

他提出了一个当时在殖民统治者中间无人会赞成的办法："必须使这些精英得到承认，并由我们来给予更好的对待。应当进行的改革，不要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上，而应见诸实施。"④

若采取他所提的主张，势必会与帝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因此，这个建议在当时没人理睬。相反，殖民当局却集中力量加强控制，掠夺殖民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欧洲战后经济和公用事业的恢复问题。然而国际环境及其在殖民主义和殖民事务方面的自由主义倾向⑤最终必将导致态度的改变。

③ 法属西非基金会塞内加尔档案(ASAOF)1917年17 G 61/2，第10页。
④ 同上，第20页。
⑤ 见A. 萨罗(Sarraut)，1923年；F. D. 卢加德(Lugard)，1929年。

但是，殖民主义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和传统的统治者。像迄今为569 止那样，把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非洲民族主义仅仅看成是上层精英和城市中的现象是错误的。近来的研究成果日益表明，在农村地区，主要是由于采取了新的经济和财政措施，实行了新的司法制度，特别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引起极大的不满情绪和反殖民主义怒火。举例而言，20年代从上沃尔特和科特迪瓦流入黄金海岸的抗议性移民，在非洲许多地方作为殖民主义象征的酋长被其臣民们废黜的浪潮，当然还有尽人皆知和广为记载的西非拒售可可运动，⑥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并不仅仅限于城市中心和上层精英当中，在农村和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工人中间也产生了共鸣。一般都承认，对农村反殖民主义情绪和活动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两次大战之间时期城市精英的运动与农村没文化群众的运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假若有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也还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本章难以作出任何综合分析。今后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必将被这一诱人的新课题所吸引。

两次大战之间时期非洲民族主义和政治活动的另一个现象是对文化复兴的关注。这是对殖民主义否定被殖民者的文化这一严峻现实的必然反应。文化复兴是坚持和维护自我同一性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斗争首先是坚持和维护作为非洲人的同一性，然后才是作为特定文化民族成员的同一性。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不过所谓“排外主义”运动和宗教运动，以及“埃塞俄比亚教会运动”也都属于这类活动。

此外，殖民主义的范围包括一切方面，它影响着或潜在地威胁着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殖民主义的运动势必包括各个方面。作为一种旨在保持稳定的制度，殖民主义当然受到一切要求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建立公正与平等关系的主张的威胁，无论这种要求是工人团体、教会组织，甚至是殖民地行政管理机构内部提出的，还是通过要求提供学校和卫生服务设施等社会福利的宣传活动而提出的，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殖民主义体现了建立在种族歧视基础上的不平等现象，凡是要求在人与人关系的领域确立平等原则的要求，都等于是要求废除殖民主义制度。

在思想方法和体制结构方面，欧洲的影响越来越多，这也影响着非洲人的反应。凡570 遭受欧洲人统治最久的地区，非洲人往往更倾向于接受欧洲的政治文化，对此抱着最大的期望，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可以逐步实现自决。由于他们最容易受欧洲教育的影响，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并且愿意采取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因此，他们在鼓动实现他们所要求的变革时，倾向于遵循宪政途径。殖民地的立法机构，恰好提供了对口的讲坛，这对他们也是一种鼓励。

在埃及和英埃共管下的苏丹、阿尔及利亚（特别是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和奥兰三地区）、法国的保护国摩洛哥和突尼斯、英属和法属西非沿海地区这些地方，非洲人活动的特点是主张宪政，所采取的办法则是施加那种合乎西欧政治程序的政治压力。采取这种

---

⑥ P. 詹金斯(Jenkins)编，1975年；B. O. 奥洛隆提梅欣(Oloruntimehin)，1973 a。

策略的一个原因是非洲民族主义者既要与直接的殖民地当局对话，又要与殖民宗主国内的自由派政治集团和舆论界对话。

随着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日渐增多，和新的经济和社会集团的出现，宪政道路具备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些新集团纷纷涌现，成为推动旨在确保非洲具有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人力的殖民地经济和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建立教育机构）的动力的一部分。在许多殖民地，新兴的劳动大军逐步组成了工会，通过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活动给非洲民族主义增添了势头。由于殖民地的劳动方式体现了殖民统治的一切弊病，特别是建立在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正基础之上的残酷剥削，劳资关系自然便成为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宗主国公民和殖民地非洲人之间是一种对抗性关系。劳工在非洲民族主义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十分重要。⑦

殖民国家所鼓吹的各种官方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构成另一个决定因素。正如约翰·皮尔所说，"意识形态就像宗教理想一样，即使在还没有完全被人们充分认识清楚的时候，也构成决定行为方式的一个因素……，""发展与人们对本身所处的地位的理解和对其未来的憧憬是分不开的"⑧ 非洲民族主义者在确定方针和斗争方式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不同集团采用不同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它们的愿望并以此来评价所取得的成就。在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看来有可能通过"同化"政策，即个人获得具有充分权利和义务的法国公民地位，来结束殖民主义，因此那里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当中就产生了继续要求在更大范围和更多地区实行该项政策的倾向。而英国领地的非洲民族主 571 义者则抱着最终获得独立、成为单独的主权国家（尽管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的希望，因此不言而喻，在此期间，他们比较明确地关心的是改革和参政，为他们最终取得独立作好准备。区别不在于争取自由这一目标，因为他们全都渴望自由，所不同的是斗争方式。而方式又取决于行动前后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则是由各种意识形态与各殖民地实际作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⑨

与意识形态这个因素相关联的是移民因素，移民因素表现在以下方面：殖民化进程的相对深刻程度，殖民地人民希望的破灭，或对非洲人的要求漠不关心的情况。移民因素说明了，为什么在移民占统治地位的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没有类似移民问题的法属领地，非洲民族主义在语气和激烈程度上会存在差异。在移民占统治地位的肯尼亚、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南非，同其他英国殖民地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差别。1923 年就肯尼亚非洲人而发表的非洲人利益至上的宣言（又称德文希尔宣言）的实质，同样表达了其他地区有见识的英国殖民政府的思想。这些领地的各种经历都是由于移民们决心通过实行被称为"极端殖民主义"的做法以便永久维持对土著居民的统治而造成的结果。⑩

⑦ G. 巴兰迪尔(Balandier)和B. 达迪(Dadie)合编（未注明出版年月），第 202-406 页；I. 戴维斯(Davies)，1966 年。

⑧ J. D. Y. 皮尔(Peel)，1968 年。

⑨ B. O. 奥洛隆提梅欣，1971 年，第 33-50 页。

⑩ J. 达菲(Duffy)，1962 年；W. 明特(Minter)，1972 年。另见B. O. 奥洛隆提梅欣，1972 b，第 289-312 页。

非洲民族主义与国际局势的发展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非洲民族主义者所处的境遇基本上相同：政治和社会自由被剥夺；外国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剥削非洲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无权享有本应有助于殖民地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进步的设施和服务；或者当变革势在必行之时，殖民者便采取旨在限制和转换事态发展方向的行动，以便达到永久维持殖民统治的主要目标。

针对殖民主义者所造成的这种局面，非洲大陆北部的民族主义者要求在新的殖民领地结构的条件下恢复失去的主权和独立；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则要求改善各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便能真正享受公民的自由权。非洲民族主义者在争取实现他们的这些愿望时，得到了国际形势发展的帮助。这些发展包括例如在本书第12章所提及并论述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国际联盟所表示的，应当将殖民地人民的发展作为殖民主义的主要目标，并作为衡量帝国主义主子特别是在委任统治地执行任务情况的标准。提出这种认为国际社会应对委任统治地负有责任的主张，对某些民族主义者是一种鼓舞。在政治方面，国际上意识形态的发展，例如列宁主义的反帝共产国际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世界其他大洲争取独立的潮流，也都激励着非洲民族主义者。西尔维斯特·威廉斯、马库斯·贾维、威廉·杜波依斯和其他美国和加勒比地区黑人影响下产生的反帝的泛非主义也起到了同样的推动作用，这将在后面论述。[11]

572

1927年2月，由共产国际主持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结果组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同盟(简称反帝同盟)。来自西欧、北美、中美、南美、加勒比地区、亚洲和非洲的约18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使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团体如以总书记芬纳·布罗克韦（后成为布罗克韦勋爵）为代表的独立工党、激进派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代表汇聚一堂。来自非洲的与会者包括梅萨利·哈吉和哈贾利·阿卜杜勒-卡迪尔（马格里布）；穆罕默德·哈菲兹·贝伊·拉马丹和易卜拉欣·尤素福（埃及）；拉明·桑戈尔（法属西非）；乔莫·肯雅塔（肯尼亚）；以及J. T. 古默迪和I. A. 拉古玛（南非）。出席的还有殖民地联盟的代表如马克斯·布隆库，以及来自海地的卡洛斯·迪安布洛希斯·马丁斯。[12]

当时在欧洲和某些非洲殖民地还有一些致力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的运动和反对奴隶制的团体在开展活动。1917年马库斯·贾维在美国创建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也对非洲某些殖民地产生了影响。

与所有这些致力于改善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力量相对立，一些狭隘、倒退的种族主义政治学说也在蔓延并产生影响，这类学说在欧洲法西斯和纳粹政权，以及在殖民地实行镇压政策的专制政权，特别是在意大利所属各殖民地，已经制度化。即使在像法国那样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法西斯主义和纳

[11] 见本书第29章。

[12] I. 盖斯(Geiss)，1974年；G. 帕德莫尔(Padmore)，1956年。

粹主义也能找到追随者。这一事实也反映在对殖民地形势的看法上。总的说来，欧洲的 573 工业和商业资本家仍旧把殖民地看作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的财产。

非洲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的表现形式

尽管殖民地的环境和总的国际环境大体相同，但非洲各地民族主义和政治的实际表现形式——斯瓦希里语“希阿萨”一词恰当地概括了这种现象——却因地而异，即使在同一帝国主义主子统治下的各个领地也不尽相同。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个殖民领地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获得的，因此有着不同的殖民主义经历，而且殖民统治持续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影响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瓦纳希阿萨”）的行动方式和激烈程度的因素包括领导的类型、以思想方式和体制结构出现的欧洲影响的传播范围和程度上的不同、白人移民人数的多寡和势力的大小，最后，还有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和实际做法的差异。

民族主义运动以及随之出现的殖民地政治，几乎无一例外地由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型精英所领导和控制。这些人最具备了解欧洲政治文化的能力，因此能按照后者所阐明的条件对殖民政权作出有效的反应。有时他们积极与“传统的”上层领导人物进行合作，尽管这两派人之间的关系经常是紧张的。以这样的合作为特点的地方，举例而言，有在黄金海岸同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的合作，还有在尼日利亚南部、摩洛哥等地以及在肯尼亚的基库尤人中。有的地方，如在利比亚和摩洛哥，领导权在“传统的”上层人物手中。但是多数情况下，由于那些代表或是被罗致来代表传统领导上层人物的人被殖民当局当作控制的工具，因此，就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来说，是把传统的上层人物当作帮凶对待，这些人则因此而受到攻击。

表达非洲民族主义的愿望和要求以及表达具体的不满情绪的渠道，是政党和青年组织。只有在少数存在殖民地立法机构的地方，政党才有意义。在埃及，英国在 1922 年单方面宣布了虚假的独立，赐予了一个议会，从而为组织政党和开展政党活动提供了可能。实行宪政的局面使得萨阿德·扎格卢勒的华夫脱党和民族主义党有可能在争取恢复埃及的完全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⑬。在英属西非的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实行的 574 宪政改革，尽管重要性要小一些，但也为政党的出现和进行有意义的活动铺平了道路。在这种宪政改革之前，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的各种活动都轻而易举地遭到破坏。⑭ 而在此以后，例如，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就对殖民当局和当地人民施加比较持久的影响。同样，在塞内加尔，政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那里大议会于 1920 年后改为殖民地议会，提供了讲坛。

致力于争取公民自由权和人权的青年组织、部族团体、同学会以及其他运动，在所有各殖民地都发挥了宝贵的作用，而不论其实行宪政的情况如何。特别是在那些由于殖

⑬ 见本书第 23 章。
⑭ 见本书第 25 章。

民统治具有镇压性质而使政治活动不能公开进行的地区，这些组织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青年组织对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活动起着促进作用，它们的活动将在本书第25章加以论述。这些组织包括：成立于1929年的黄金海岸青年大会，拉各斯（后改为尼日利亚）青年运动，青年埃及，1921年在肯尼亚成立的哈里·图库的青年基库尤人协会，苏丹毕业生大会，青年加蓬人和青年突尼斯人。这些运动有的是跨地区的，有些则是跨殖民地的。前者包括由梅萨利·哈吉领导的北非之星、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南非大会和由尼日利亚人拉迪波·索兰克领导的在整个英属西非吸收成员的西非学生联合会。

为非洲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政治活动作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包括1917年在美国建立的马库斯·贾维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在非洲的几个分会，例如，尼日利亚促进协会（1920年）。此外还有像加蓬的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同盟，葡属安哥拉的罗安达和葡属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的非洲人联盟，成员来自利伯维尔、班吉和布拉柴维尔等地的安德烈·马祖瓦建立的法属赤道非洲土著人联谊会，由托瓦洛·奎纳姆（达荷美，今贝宁人）领导的捍卫黑色人种世界联盟（1925年），由库亚泰·加朗（法属苏丹，今马里人）和拉明·桑戈尔（塞内加尔人）领导的捍卫黑种人委员会，后又改称联盟。[15] 在国际上，则有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和由西尔维斯特·威廉斯和威廉·杜波依斯组织的历届泛非主义者大会。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运动也成为反对殖民主义体系的斗争中的重要力量，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加如此。

575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流行的攻击殖民主义体系的武器多种多样。在前期极为普遍的起义和造反已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报纸、书籍、小册子、请愿、抗议性移居、罢工、联合抵制、投票箱、布道、清真寺成了民族主义者经常利用的手段和阵地。报纸成为传播这些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观点的极为重要的工具。知识界的人数慢慢地增多，为在此期间不断增多的报纸和期刊提供了读者和市场。除了在非洲出版的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报刊来自非洲大陆以外，它们成为传播国际性运动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宣传的工具。这些报刊有日报、周报、双周刊和月刊。还有一些是在可能情况下才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有些报纸和期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出现了，如1900年创刊的宣传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阿拉伯文报纸《旗帜报》，《塞内加尔民主报》和1891年创刊的《拉各斯纪事周刊》。但是，大多数报刊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创刊的。这类报刊有《尼日利亚时报》（1921-1930年）、《每日时报》（创刊于1926年）、《拉各斯每日新闻》（1925-1938年）、《非洲潜望镜》（达喀尔，1929年）、《法属西非》（共和-社会主义极）、《西非信使报》（达喀尔）、《非洲晨邮报》、《黄金海岸时报》（阿克拉）、《突尼斯行动报》（1932年）和《波多诺伏新闻》（其副标题和部分栏目是约鲁巴语）。以非洲语言出版的报纸除了埃及的《旗帜报》外，还包括约鲁巴语报纸《阿凯德·埃科》（拉各斯，自1932年起发行）和《达荷美之声》。来自非洲以外的有受共产主义者影响和泛非主义的期刊，像《黑人种族》、《黑人世界》、《黑人之声》、《人民之声》以及《新时代》和《埃塞俄比亚新闻》、《黑人呼声》、

⑮ 见I. 盖斯，1974年；J. A. 兰利(Langley)，1973年。

《非洲时报》和《东方评论》、《圣战者》、《纽约时代》和《有色美国人报》。除了报纸外，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还撰写剧本、小册子、传单和许多书籍，对殖民主义体系进行尖锐的批判和讽刺。

报纸成为跨越边境扩散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活动的工具。这样，报纸一直是使殖民地行政官员感到不安的来源，30 年代中期颁布的各种反煽动法和试图通过针对某些出版物的立法来设置铁幕的作法就表明了这一点。后来，无线电广播的普及，使殖民地统治者为隔绝外界对殖民地的影响而采取的压制手段更加难以实施，而且效果更差。

正如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实行宪政和利用报纸、广播作为表达意愿的工具，取决于该殖民地是否有立法机构或者有无希望建立这类机构，以及是否有相当数量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能够恰当地利用这些机构和表达意愿的工具。而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决定了要以接受西欧的政治发展模式为前提，而这种政治发展模式，民族主义者如果没有自己的经验是不能正确评价的。因此，教育普及的程度不同，就使非洲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政治的表现发生重大的差别。由于欧洲国家专心致力于让殖民地为它们支付行政管理和服务设施的费用，因此相对而言在普及西方教育和提供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方面几乎没做什么事情。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殖民地非洲的许多地区，小学校仍然寥寥无几，中等教育更属罕见。在英属中非、法属赤道非洲和西非苏丹以及葡属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实际上没有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在这些地区，不可能设想民族主义者会采取宪政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殖民主义思想。 576

正因为这样，人们才必须了解这一时期传统主义的或“排外主义”的社会-宗教运动所起的作用。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某些章节中已经看到的，特别应当提及的是那些表达土著的思想意识和那些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思想意识的救世主运动。这些运动具有求解放的性质，所表现的基本上是当社会群体处在不得不表示对生活条件不满和渴望求得新生的情况下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同殖民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因为殖民主义所代表的是对本地文化的否定和对殖民地人民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压迫。用兰特纳里的话来说，“它们反映了参加这些运动的人们对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物质、社会和心理环境所抱有的急切心情和希望。”⑯

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中出现的这类运动，有的已在本书第 20 章中有过论述，其中突出的例子是南部和东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教会运动”以及南部和中部非洲以千年至福主义的鼓吹者为先锋的运动。其中著名的有基塔瓦拉（非洲和刚果守望塔运动），在南北罗得西亚有众多追随者，一直扩展到刚果（今扎伊尔）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在比属和法属刚果有很多追随者的基班古主义运动（由西蒙·基班古在比属刚果创立）和由西蒙-皮埃尔·姆帕迪在下刚果创立的新基班古主义的“黑人传道会”。后者别称“土色布分子”，在法属刚果和乌班吉沙里（今中非共和国）的居民中有一定影响。上述这些运动有的是由于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但又对殖民地社会有组织的教会中宗教的表现感到失望 577

⑯ V. 兰特纳里(Lanternari)，1974 年，第 483 页。

而产生的。那些力求保护非洲人免遭殖民主义压迫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发现，教会的态度充其量是漠不关心。于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以宗教改革的精神分离出来，而这种宗教改革精神是基督教在许多社会中发展和传播时所具有的特色。如同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宗教改革运动一样，非洲民族主义者创立的教会和运动，旨在实行基督教的思想意识，如人人兄弟友爱、信徒皆是一家，而无种族和肤色之别，从而结束歧视和压迫。

精神状态与社会和物质的状况紧密相连，这一点从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宗教仍有必要作为表达非洲人的愿望的工具，但采取的具体行动则包括劳工骚动和拒绝纳税。如同基班古和姆帕迪创立的运动一样，鲁本·斯巴达斯·莫卡萨在乌干达创立了非洲进步协会和非洲基督教救世军。莫卡萨曾在英国皇家非洲步枪团服役，他表示将不顾任何个人安危，为拯救非洲而奋斗，他的话表达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共同目标。当他着手在乌干达建立非洲正教的一个分支机构时，他的声明清楚地阐明了其政治和社会目的，他说该教会是"……为所有能正确思考问题的非洲人，即那些希望在自己家中享有自由，而不是永远被人当成侍役的人建立的。"莫卡萨的教会发展到了肯尼亚。类似的组织还有乔旦·姆苏马在尼亚萨兰创立的"上帝和耶稣基督权威教会"以及西非的许多非洲人的和阿拉杜拉会的教会。

伊斯兰教既是宣传救世主义的讲坛，又代表着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抗衡的力量。对穆斯林来说，马赫迪相当于基督徒心目中的弥赛亚。在北非和西非，在苏丹和索马里兰，马赫迪教团置殖民当局于困扰之中。而在意大利统治下的利比亚，正如本书已经论及的，赛努西教团可能是通过伊斯兰教反映非洲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思潮的最明显的例子。泛伊斯兰主义——文化领域中的泛阿拉伯主义在宗教方面的表现——和萨拉菲亚的思想，也在埃及、马格里布和英埃苏丹北部的民族主义和殖民地政治活动中起着突出的作用。作为一种反对殖民主义的力量，赛努西教团的影响扩展到西非的部分地区，殖民当局发现，哈马利雅教团、提加尼雅教团和穆里迪雅教团等伊斯兰运动不断对殖民制度的安全造成威胁。

这些伊斯兰运动把处于不同殖民当局统治下的信徒有力地联系在一起。正如M.克劳德在本书[17]所表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土耳其传播来的泛伊斯兰意识形态是使非洲许多地区的殖民当局头痛的问题。这是一个殖民统治者力图通过交换信息和各殖民地间的合作来解决的问题。

578

尽管遭受殖民统治的非洲受西方影响的程度有深有浅，但不同形式的文化运动是反映非洲民族主义的共同基础。在整个非洲，各种非洲文化和制度对遭受殖民统治的人来说具有恢复活力的作用而且今后也将继续如此，这一点本书已经加以论证。即使是非洲受过教育的精英中最西方化的人，也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管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有多深，从根本上讲他们仍是非洲人。本书前面业已提到的和下文还要提及的青年运动，大多数都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不管欧洲通过学校体系如何进行侵蚀)，对维护他们的自我同一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基库尤人的各种团体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

[17] 见本书第12章。

泛非主义运动和本书第 21 章讲到过的在 30 年代初出现的含义很不确定的概念“黑人精神”，以及本章提到过的所谓“排外主义”和“宗教”的运动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非洲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政治活动的表现形式，构成了欧洲殖民者和遭受殖民统治的非洲人之间辩证关系中的对立面。鉴于在这个时期，欧洲本身出现了独裁政权和狭隘思想扩大的趋势，所以殖民当局普遍采取暴力和强制剥夺合法权利的办法加强控制，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危及殖民当局安全的不仅仅是非洲人的反抗。欧洲思想方式和体制结构的传播也使殖民者头痛。对教育的质量和规模普遍进行限制的企图，意味着担心欧洲的教育以及政治和社会思想对作为一种关系体系的殖民主义具有破坏作用。正是为了防止正在隐隐出现的这种危机，才普遍出现了反对在各级学校开设人文科学课程，和宁愿多设农村学校、职业学校和致力于培养中级人才的技术培训专科学校，而不愿设立大学的作法。这种思想是为了避免再出现印度的例子，在那里，自由主义教育的推广，成了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活动扩展的重要杠杆。这也说明为什么像威廉·蓬蒂师范学校（法属西非）、亚巴高等学院（尼日利亚）、阿奇莫塔学院（黄金海岸）、戈登纪念学院（喀土穆）和英属东非的马凯雷雷学院（英属东非）这类学校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和规模。[13]

但是，企图对可能在殖民地发生的社会变革的措施和类型加以控制的作法本身，又构成引起反殖民主义不满情绪的另一个根源，对民族主义运动起着火上添油的作用。世界经济危机从两个方面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它限制了殖民地当局在不借助宗主国的任何补贴而生存下去的情况下可供使用的资源。普遍的趋势是不顾失业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冻结就业机会，以削减用于可给殖民地人民带来好处的改善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开支，来维持殖民统治。同时，农民靠他们生产的原料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而进口的欧洲制成品的价格却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更沉重的赋税和频繁使用廉价劳动和强迫劳动，使得对殖民地人民的横征暴敛变得更加严重。 579

最后，1935 年开始的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是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它使得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反殖民统治的敌对情感进一步加深。意大利入侵时所使用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腔调，更加突出了欧洲在非洲所实行的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性质。曾经对国际联盟寄予厚望的人彻底失望了。保护受到伤害的非洲自豪感的愿望，正是泛非主义思想和“黑人精神”之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在这时重新抬头的原因。同样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捍卫埃塞俄比亚独立的国际性组织，这个国家象征着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争取最终独立的希望。

不论是当地的和国外的报刊和期刊，自然都成为传播反殖民主义、反欧洲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工具。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采取了许多针对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正在缓慢发展的无线电广播的镇压性行政措施和立法措施。采取种种努力，以防止或限制印刷品、报纸、期刊和无线电收音机的传播和推广，即使这些东西来自殖民地行政官员的本国也不例外。通过新闻检查制度和反煽动法令，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当地的报刊实行严

---

[13] B. O. 奥洛隆提梅欣，1974 年，第 337-357 页；D.B.艾伯内西（Abernethy），1969 年，第 79-88 页。

格控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方便殖民当局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特点是对民族主义的愿望采取更加不容忍的态度和剥夺公民的和人身的自由与权利。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殖民主义和非洲民族主义以一种辩证的关系而存在。非洲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活动在这一时期没有取得很大成就，但确实在殖民地官员中引起某种担心。这一时期针对反殖民主义活动采取的所有镇压措施就是这种担心的反映。他们对非洲民族主义提出的挑战所做的反应，发展到力图使非洲隔绝于世界发展总潮流之外的地步。这种企图不仅是不现实和自相矛盾的，而且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使非洲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很快就发展成为彻底推翻殖民体系的运动。

（樊建译）

23 东北非的政治和民族主义 1919-1935年

H. A. 易卜拉欣

导　言

580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有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东北非争夺占优势的地位，一种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由宗教信仰激发的爱国主义。苏丹的马赫迪和索马里的赛义德·穆罕默德流传不绝的传统力量，设法将宗教和爱国主义情绪最直接地融汇一起。另一方面，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则愈益世俗化（见插图4.1）。但是即便在埃及、伊斯兰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政治舞台上仍相互影响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10年，左右埃及政局的民族主义者萨阿德·扎格卢勒深受激烈的泛伊斯兰主义革命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影响，阿富汗尼曾参与"最初在伊斯梅尔统治下唤起民族觉悟和激发不满情绪的活动"。[1]不过，说扎格卢勒领导的运动基本上是一个世俗的爱国主义运动还是有道理的。苏丹南部的抗议运动基本上也与宗教无关；而在苏丹北部和索马里亚，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是宗教因素同政治密不可分的时期。

这些年月中，除了宗教与世俗势力在政治上相互影响的关系之外，还有民族主义与经济问题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一时期中有好几年是世界现代史上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年代。20世纪20年代末，帝国主义列强本身正陷入日益深重的衰退之中，一直发展到大萧条。而东北非各殖民地却早在大萧条冲击工业化世界之前的10年到20年，就已经受到严重的经济压力了。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东北非的另一个特点是，一方面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反帝国主义的新的战斗精神也同时增长。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是欧洲扩展最后边疆的年代——新的领地被吞并，殖民统治得到加强。这是帝国主义在非洲领土扩张的最后阶段。但是同一时期也出现了殖民地各族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精神的高涨，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有效的政治组织的开端。这在东北非地区以埃及最为突出，当然绝不仅限于埃及。

581

造成这些矛盾的因素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在非洲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中，埃及受到战争的影响最为直接。不管怎么说，当土耳其作为德国的同盟国参战后，英国

[1] A. 胡拉尼(Hourani)，1962年，第108-109页。另见N. R. 凯迪(Keddie)，1968年。



图片 23.1 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扎格卢勒帕夏（1857 年前后–1927 年）1920 年在一次要求英国撤军的示威集会上演讲

便认为这不但可以作为结束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残余宗主权的借口，而且可以作为宣布埃及为英国保护国并扶植由英国挑选的新君主政权的借口。宣布埃及为保护国以及新君主政权的性质，都成为激发埃及民族主义者不满情绪的主要催化剂。随着英国指挥的50万大军进驻苏伊士运河担任守卫，使该地区军事化，又加强了埃及人民的新的战斗精神。

英国也加强了在苏丹的地位，这反过来又激起了新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欧洲帝国主义固然是在非洲拓展它最后的领地，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也唤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觉醒。不过，也不能忘记，这一时期埃及的民族主义仍旧受它自己的某种形式的扩张主义的影响。埃及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仍旧把苏丹看作埃及的属国，力图在那里恢复埃及的有效主权。

下面我们列出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东北非的基本矛盾：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宗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帝国主义的最后边界与反殖民主义的新边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爱国主义和地区扩张主义之间，特别是在埃及与苏丹关系方面的相互关系。

现在让我们进而按国家详细分析这些发展，但要记住，这一时期出现在东北非的某些经济问题，在为民族主义的宣传鼓动和人民中间的不满情绪造成敏感气氛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埃　及

1919 年革命

由于英国在 1914 年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埃及民族主义者感到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团体，在行将来到的与英国的冲突中代表整个民族。于是，杰出的埃及领袖萨阿德·扎格卢勒和他的两个同伴在 1918 年 11 月创建了埃及华夫脱党，或称“埃及代表团”。

华夫脱党在对待变革问题上采取激进态度。它的最终目标是赢得埃及彻底独立，确 583 保埃及对苏丹的主权，并废除给予居住在埃及的外国人以专有特权的投降条约的全部条款。虽然华夫脱党的章程没有公开提到后两个目标，但这显然是一种策略行动，即先取得自由，然后再来解决后两个问题。②

扎格卢勒及其同事们不仅代表现代行政官员、律师和其他非宗教界专业人员这批新兴的埃及社会精英，还代表一批新兴的土地所有者。就社会成分来讲，他们“属于地方上一些新近拥有土地和具有专门职业的阶层。”③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以前外来的土耳其-埃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贵族政权不得不把领导权交给长期受压迫的职业界社会精英。

华夫脱党复辟激进的策略以加强自己的领导。它散发传单，组织公众集会，并且征

② A. M. 拉马丹(Ramadān)，1968 年，第 431-432 页。

③ P. J. 瓦蒂基奥蒂斯(Vatikiotis)，1969 年，第 252 页。

集“全国所有代表性组织正式签署的意向书，大意是华夫脱党为埃及民族唯一的正式代表，负责并受权谈判埃及的前途”。④ 此外，华夫脱党还通过有效地表达人民的不满和要求而动员全国支持它的立场。

1914年12月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这一无法接受的侮辱性步骤，被华夫脱党坚决斥之为非法的，只能视为是一种战争行为。它要求履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原则和协约国给弱小民族以自由的承诺，立即废除这个决定。

与此同时，经济困难有助于民族主义事业。第一次大战期间困扰埃及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使民众普遍产生一种受剥夺的感觉。虽然英国政府许诺承担战争的一切责任，但埃及远征军还是被调去保护苏伊士运河，并部署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大批埃及农民被强制入伍，前往协约国充当劳工，和参加骆驼军团。他们的粮食和牲畜被征用而得不到足够的补偿。生活费用急剧上涨，对政府雇员和非熟练劳动者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他们的工资并未同时相应增加。虽然棉花行情上涨，土地所有者却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英国为了增加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而限制棉花的种植面积，同时固定棉花价格并限制其出口。华夫脱党一再强调英国应对这种不公正现象负责，并呼吁埃及人团结在它的周围革除这种弊政。这一有力的宣传运动导致各阶层人逐渐疏远英国当局。到1919年全国 584 到处充满不满情绪，形势一触即发。⑤ 英国的经济掠夺为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抗议准备了条件。

英国政府未能正确估计声势浩大的新民族主义精神的力量和规模，它傲慢地坚持埃及的永久保护国地位，这是严重的判断错误。接着它又顽固地拒绝让战时首相侯赛因·鲁什迪和扎格卢勒向巴黎和会提出埃及问题，这无异于给已经是爆炸性的局势火上浇油。但是在英国所有大错中最失策的是1919年3月8日逮捕扎格卢勒及其两名同事，并将他们放逐到马耳他。这就是引发1919年革命的火星。

华夫脱党动员群众行动的直接后果是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示威游行，以及运输工人、法官和律师的大罢工。爱资哈尔大学以及中学和职业学校的学生积极投入这场民族主义斗争。外省很快也加入了总抗议运动，更加大胆地破坏铁路交通和电话通讯。英国军事人员也常常受到攻击，以至于发展到3月18日从阿斯旺开往开罗的火车上有8名英军官兵在代鲁特被杀害。简而言之，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华夫脱党现在成为全民族的唯一代表，扎格卢勒从此控制全国政治舞台直到1927年去世为止。

1919年革命的确是现代埃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第一次动员了埃及所有各阶层（农民、工人、学生、土地所有者和知识分子）和教派（科普特教徒和穆斯林）起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科普特教会的领袖人物事实上也同样参加了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有几个人还当选为华夫脱党的中央委员。由此也可以衡量出新兴的世俗化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像另一个新的运动，即妇女参加反英公众示威的运动一样。

④ P. J. 瓦蒂基奥蒂斯，1969年，第255页。
⑤ P. G. 埃尔古德(Elgood)，1928年，第227页。

这场全国性动乱迫使英国开始采取同民族主义者和解的政策。艾伦比勋爵被任命为特派高级专员，他释放了扎格卢勒及其同事们，并允许他们前往巴黎。英国政府任命个以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米尔纳子爵为主席的特别调查团，就“骚乱”起因和埃及作为保护国最适于实行什么样的宪法提出报告。虽然华夫脱党组织了全国规模的有效活动，抵制米尔纳调查团，但该团还是得出结论，认为应该与民族主义者谈判达成一项联盟条约，以取代不得人心的保护关系。这是华夫脱党的一大胜利。

英国同时被迫承认华夫脱党是埃及民族的正式代言人。米尔纳甚至更进一步邀请扎格卢勒赴伦敦进行非官方谈判。其结果产生了米尔纳-扎格卢勒 1920 年备忘录，规定两国建立攻守同盟，并在战败国同意的条件下将它们在埃及的权利转交给英国。但是备忘录只字未提苏丹，因为在米尔纳看来，苏丹的地位已在英-埃共管协定中明确规定了。⑥尽管由于华夫脱党坚持完全独立和埃及对苏丹的主权，导致这些谈判破裂，但是这个备忘录成为此后所有谈判的起点。 585

1922 年 2 月 28 日的独立宣言，是 1919 年革命的最大成果。英国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单方面废除保护国地位，承认埃及的独立，但条件是在同埃及签订协定之前必须保证在以下几个方面维持现状(通常称为保留条款)：即帝国交通通讯的保障，埃及的防务，保护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利益，以及苏丹的地位。⑦ 1922 年 3 月 15 日正式宣布埃及独立，福阿德素丹成为埃及国王，称福阿德一世。但这是真正取消殖民制度吗？还是英国仍旧守卫着殖民帝国的新边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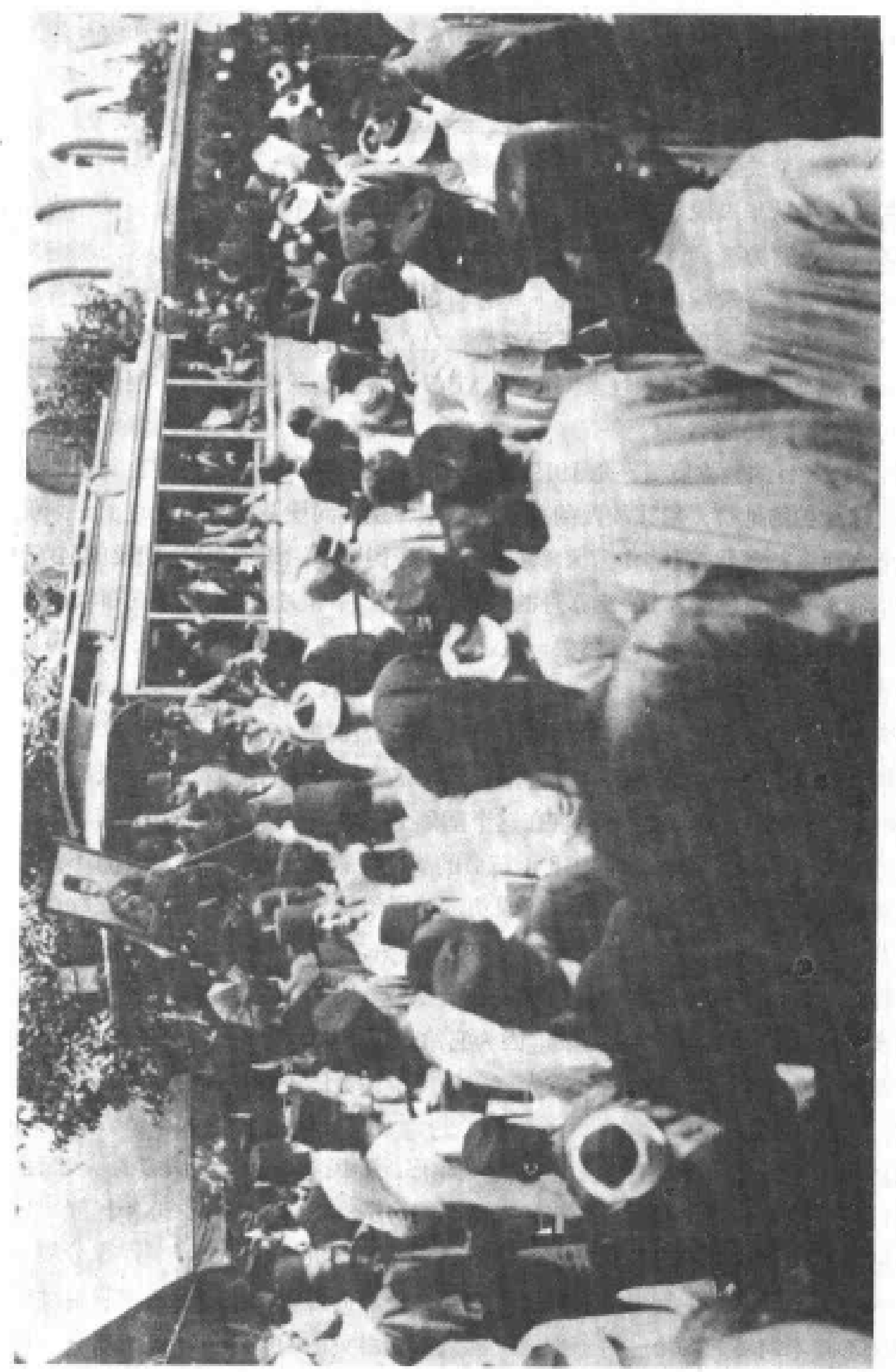
独立宣言给埃及政府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有较多的自由。它恢复了 1914 年撤销的外交部，允许埃及派遣外交和领事代表。此外，宣言规定在埃及实行宪政，这是民族主义者自 1883 年以来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⑧ 在这个基础上，颁布了 1923 年的宪法。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同 1919 年革命的战斗性很强的思想相比较，它不论在政治领域和宪政领域都只不过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保留条款，特别是关于英国继续在军事上占领埃及的规定，使宣言授与的独立大为减色。此外，外国人继续享有治外法权，而英国强制签订的共管协定仍旧为治理苏丹规定了一套宪政体制。同样，1923 年宪法并没有为在埃及实行宪政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因为它给予国王以广泛的权力，如选任首相、解散内阁、解散议会或推迟议会会期等等大权。这使得议会民主在埃及开始实行之前就遭到了破坏。

民族的意愿未能完全实现，主要是由于 1919 年形成的民族团结逐渐破裂的结果。由于某些人觊觎华夫脱党的领导权和对民族独立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分歧，1920 年民族统一阵线内部由阿德里·亚坎领导的温和派和扎格卢勒领导的激进派之间出现了严重分裂。前一派认为埃及人没能赢得国际力量对自己事业的支持，而且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因此不得不向英国妥协。另一方面，激进派则对英国的顽固立场大失所望，而 587

⑥ 米尔纳（Milner)，1921 年，第 24-34 页。
⑦ J. 马洛(Marlowe)，1965 年。
⑧ A. 拉菲(al-Rāfi'ī)，1969 年、第 1 卷，第 39-40 页。

586



图片 23.2 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拥护国王福阿德一世的示威游行，时间 1920 年前后

对1919年⑨人民的觉醒印象极深，因此他们主张坚持斗争直至英国答应埃及民族的一切要求。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华夫脱党和整个国家不幸分裂成扎格卢勒派和阿德里派两个对立的集团。因此华夫脱党成为一个代表大多数埃及人的政党，而不再是替全民族说话的统一组织。

英国“分而治之”的殖民外交政策充分利用了华夫脱党队伍的这一分裂。殖民行政官员通过操纵和欺骗手段鼓励阿德里派与扎格卢勒派疏远。艾伦比在镇压扎格卢勒派的同时，迎合温和派并与他们谈判独立宣言。尽管扎格卢勒称该宣言为“民族灾难，”⑩尽管华夫脱党组织了强烈的抗议运动，宣言仍然起到了过渡性的帝国边疆的作用。

谈判年代，1924-1935年

在宣言发表以后的时期里，民族主义斗争的主要焦点集中于通过与英国谈判摆脱已经削弱了的保留条款。1924至1935年间共举行了4次谈判：即1924年的麦克唐纳-扎格卢勒谈判，1927年的萨尔瓦特-张伯伦谈判，1929年的马哈茂德-亨德森谈判，1930年的奈哈斯-亨德森谈判。⑪但是4次谈判均归失败，因为英国拒绝作出任何有可能放松它对埃及的占领或改变苏丹现状的让步。这种拒不妥协的立场与宫廷在英国鼓励下（即便不是策划下）成为强有力的反华夫脱党势力中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英国在1922年扶植福阿德上台，作为它与“极端主义的”华夫脱党之间的缓冲物，并力图通过国王实施它的愿望。尽管野心勃勃和专制的福阿德在1919年曾支持过华夫脱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但他希望控制并利用这一运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使它成为加强自己声望和权力的手段。”⑫但是他很快便意识到扎格卢勒遵循一条独立的道路，并怀疑扎格卢勒计划推翻君主制度，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这种情况导致国王与华夫脱党之间的尖锐敌对局面，成为迄至1952年以前埃及政治的特点。英国鼓励这种敌对局面并利用它以实现其帝国利益。 588

福阿德为了阻止华夫脱党掌权，在不到7年的时间内3次（1924、1928和1930年）中止实施1923年宪法，每次都任命自己选定的首相。在1930年的制宪政变中，宫廷首相伊斯梅尔·西德基以一部民主成分更少的宪法取代了1923年的宪法。新选举法的主要目的是把华夫脱党排斥在政权之外。⑬在此后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实际上处在反华夫脱党政府的统治之下。这种对埃及宪政机构的不断干预使得议会政治和议会制度无法在埃及政治生活中扎根。

1935年以前统治埃及的历届宫廷政府特别是西德基政府（1930-1933年）对华夫脱党采取镇压手段。该党的领导人被监禁，报纸被取缔，支持者被免除政府和其他文官职

⑨ 1919年5月巴黎和会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关系。
⑩ A.拉菲，1969年，第1卷，第135页。
⑪ H.A.易卜拉欣(Ibrāhīm)，1976年，第15-16页。
⑫ E.凯杜里(Kedourie)编，1970年，第90-91页。
⑬ O.特威迪（Tweedy)，1931年，第198页。

务。殖民地行政官员不仅赞成这种极端措施，有时甚至采取直接行动侮辱华夫脱党。例如，扎格卢勒的党虽然在1924和1926年两度成为议会多数党，但都不允许他出任首相。

宫廷和英国驻扎官的联合镇压活动，使得华夫脱党的威望日渐衰落，团结遭到破坏。一部分华夫脱党的领导人由于不满扎格卢勒继任者奈哈斯那种被他们称之为"缺乏创见的领导⑭，于1932年脱离了该党。党内大部分领导人由于缺乏力量和意志再与殖民主义直接对抗，遂于30年代中期决定与英国妥协，以加强自身反对宫廷的力量。⑮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势必要在民族要求上作出让步。这种软弱立场的结局就是签订了1936年的英埃条约，使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合法化，并保持了苏丹的受英国支配的政府。

苏　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年代，苏丹人以各种各样的行动和情绪表现出它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抵抗。在苏丹北部，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和宗教界民族主义者马赫迪分子组织了这一反抗运动，在南部，抗议活动基本上还是局部性的。

589

青年抗议运动

在1919-1925年间，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些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在苏丹政治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批人主要是戈登纪念学院和喀土穆军事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他们建立自己的各种团体，通过这些团体积极从事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运动。最早的"青年"团体是1918年建立的恩图曼毕业生俱乐部。但在战后不久又建立了两个政治性更强的秘密团体，即1919年建立的苏丹人联合协会(LSU)，和更加重要的、由当时最杰出的民族主义领袖阿里·阿卜德·拉蒂夫在1924年5月创建的白旗联盟（WFL)。

许多英国著作家一直不提20年代初期的苏丹民族主义运动，认为它并不具有代表性，其倡导者不过是埃及的代理人和爪牙。但是近来苏丹学者的研究说明，尽管苏丹民族主义运动在策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与埃及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它是土生土长的，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为主要目标。苏丹人联盟协会和白旗联盟的纲领都强调首要的任务是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这个运动的独创性主张在阿里·阿卜德·拉蒂夫及其3位同事于1924年5月15日给总督的一封电报中说得很明白。这份重要文件明确地提出苏丹民族和民族自决权，根本不承认英国和埃及所宣称的由它们来决定苏丹未来的权利。⑯

苏丹民族主义者提出与埃及统一的号召显然只是一种政治口号而不是民族主义信仰的原则。这主要是一种权宜之计，旨在赢得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埃及的同情与支持。此外，看来是由于英国拒绝承认苏丹的民族自决权，并且企图利用当地人和宗教领袖来永久维持英国的统治，民族主义者才被迫提出这个统一的口号。从这个角度看，"对民族主

⑭ A. L. A. 马尔索(Marsot)，1977年，第139页。
⑮ H. A. 易卜拉欣，1976年，第24-25页。
⑯ 这封电报的正式译文见H.阿布丁(Abdin)，1970年，第48-49页。



图片23.3 1953年的喀土穆大学学院，该处是戈登纪念学院

义者说，统一的主张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灵活的办法和对策”。[17] 一旦苏、埃的共同敌人英国被赶出苏丹，苏丹民族主义者期望也能说服埃及撤出。传统的和保守的领导集团提出的“苏丹人的苏丹”口号，被一些知识分子看成是英国人为排除埃及独霸苏丹所策划的阴谋，因而根本不屑一顾。

苏丹民族主义者从华夫脱党的榜样中受到鼓舞，将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加以概念化和阐明，形成一种反对外来统治的思想。但他们不是从宗教的角度来阐述他们的反抗思591 想，而是着重讲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受的苦，总是强调指出殖民者的贪婪和异族统治。阿卜德·拉蒂夫 1922 年为《文明概》撰写的《民族的要求》一文通篇都是对政府的批评。

民族主义者在传播自己的主张和进行大规模宣传时，起初主要使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将传单寄往全国各地。1920 年 11 月以一位“忠诚的劝告者”的名义将一份著名的通告的油印件寄往数百个地址，在通告中猛烈抨击英国在埃及和苏丹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号召两个民族团结起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18] 有时传单张贴在公共场所或在街上散发。此外，苏丹民族主义者有时还将一些材料秘密送给同情他们的埃及报刊发表，并组织戏剧和文艺演出。

但是，到了 1923 年，民族主义者已经放弃这些收效不大的秘密宣传方法，改用更加革命的手法。他们认为与英国殖民政权公开对抗是扩大民族主义运动基础和动员人民支持自己主张的最好途径。民族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精神，显然是有意识地仿效埃及华夫脱党的榜样。[19] 他们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也越过喀土穆的殖民地官员向英国的开明舆论界呼吁，争取他们支持苏丹的民族自决要求。

这种政治斗争方向和策略的改变，导致 1924 年在喀土穆以及若干省府和城镇爆发激烈的政治动乱。白旗联盟在阿特巴拉、苏丹港、欧拜伊德和尚迪组织了一系列示威和暴动（见插图 4.1），特别是在联盟主席阿卜德·拉蒂夫和他的两个同事于 7 月被捕之后。苏丹民族主义的非宗教因素在这些暴动中表现得更加显著。

苏丹军界人士特别容易接受白旗联盟的思想和宣传。军校学员受到激励，在北部和南部一些城镇举行示威，喀土穆军校的学员荷枪实弹在城里大街上举行游行。

苏丹军官中有许多人是丁卡族人，他们拿起武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筹划并举行了592 1924 年 11 月在喀土穆的重大军事叛乱。这次叛变的主要政治动机是向正要离开的埃及军队表示团结和同志关系。[20] 苏丹部队离开兵营开往北喀土穆与埃及部队会合。不能排除他们曾计划与埃及同事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但是英国军队在途中向他们开火，导致 11 月 27 日晚上直至 28 日凌晨的一场激战，据称苏丹部队牺牲了十几个人。事后军事法庭又处决了 3 名苏丹军人，并判处其他参与者长期徒刑。

---

[17] H. 阿布丁，1970 年，第 4 页。

[18] M. 阿卜杜勒·拉希姆(Abd al-Rahim)，1969 年，第 102-103 页。

[19] H. 阿布丁，1970 年，第 64 页。

[20] 英国利用英国驻苏丹总督李·斯塔克勋爵在开罗遇刺事件为借口，除提出其他要求外还勒令埃及军队立即撤离苏丹。

这次反叛行动的彻底失败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后 10 年知识分子“遭到挫折、医治前几年的创伤，重新考虑将来的计划和斗争方法”。在政治上这 10 年是幻想破灭和无所作为的 10 年。殖民政权的敌视态度及其对公开政治活动的坚决镇压，迫使受过教育的阶层退而依靠文学、宗教和社会活动，“作为另一条出路和重行集结力量的手段”。[21] 他们在各个城镇建立了学习小组，创办了一些报纸和杂志。这些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充满生气的报刊，“表明了那一代人的活力和对事业的诚挚。”[22] 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特别是诗歌，表达出对英国官员的傲慢和专横的憎恨和讥讽。

20 年代初期第一次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这样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民众的支持。这主要由于民族主义者既没有也不愿意同在国内拥有大批追随者的地方势力和宗教力量结成联盟。但是这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比热带非洲其他附属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得要早，而且，构成它的思想各种成分经历了 10 年政治低潮而依然存在下来。因为它的最重要政治口号——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在 40 年代由兄弟党和其他主张统一的党派接了过来。

马赫迪分子对殖民统治的反抗

马赫迪运动是苏丹人在喀土穆周围的都市省份以外地区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一种早期武器。在这一时期，马赫迪战士和新马赫迪分子都以自己的方式反对殖民统治。

马赫迪分子的历次起义

在英埃共管时期（1899-1955 年）的第一个世代中几乎年年都要发生一次反对殖民主义的马赫迪分子起义。虽然这股争取千年至福的浪潮后来在苏丹的定居地区逐渐平息下来，但是达尔富尔的马赫迪分子仍旧长期十分活跃（见插图 4.1）。许多人自称是救世的先知，宣布进行反对“异教徒”英国人统治的圣战。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领导 1921 年尼亚拉暴动的苦行僧阿卜杜拉·西海尼。 593

尼亚拉暴动同以前历次起义一样，目的是为了推翻“异教徒”殖民统治，并在苏丹恢复“光辉的”马赫迪国家。除了这种基本的宗教动力以外，强制推行集权的殖民地行政管理、增加牧业税以及过高征收什一税，都是促使达尔富尔人参加这次暴动的因素。[23]

西海尼率领的 5000 勇士在 1921 年 9 月 26 日进攻尼亚拉要塞和市集。他们占领了要塞，放火烧毁了近旁的一座建筑物。如果西海尼不是身负重伤的话，他的第二次进攻本可以使敌人陷于混乱。这次交锋中殖民军有 43 人阵亡，21 人负伤，而苏丹战士死于战火中的至少有 600 人。

尽管西海尼本人于 10 月 4 日被当众绞死，他的追随者却继续进行战斗。他们在离尼

---

[21] H. 阿布丁，1970 年，第 98 页。
[22] M. 阿卜杜勒·拉希姆，1969 年，第 113 页。
[23] H. A. 易卜拉欣，1979 年，第 459-460 页。

亚拉大约 80 公里远的地方聚集了近 5000 人的队伍。面对这种危急事态，殖民官员派出一支强大的讨伐部队扫荡达尔富尔南部地区。他们逮捕了许多人，烧毁房屋，抢走牛群，没收财产。达尔马萨利特地区这个时期的抵抗运动一直延续到 1922 年 5 月才告终。

尼亚拉暴动无疑是 1924 年以前苏丹最重要的一次反殖民主义暴动。不同于以往历次马赫迪运动，它"几乎实现了它提出的最近目标"，并充分使殖民者再次产生"对大规模宗教煽动的暴动的固有恐惧"。[24] 虽然这次起义没能摧毁殖民统治，但它有限的胜利被视为对殖民者的一次警告。

新马赫迪分子

1914 年以后，马赫迪的遗腹子赛义德·阿卜杜·拉赫曼意识到宗教狂热再也发挥不了作用，只有按照"苏丹人的苏丹"这一信条与英国人合作才最有利于苏丹民族和马赫迪教派的利益。这种宪政主义并非出于真心，事实上是为政治现实所迫。因为赛义德显然认识到武装起义只会导致彻底毁灭。

同样，赛义德也看得很清楚，搞政治和宗教宣传需要财政上的支持。因此，他尽力扩大自己的农业和商业企业，到 1935 年他已成为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资本家。殖民当局天真地期望在非政治领域给他施展雄心壮志的机会而阿卜杜·拉赫曼却利用这项财富加强教派的武装组织。他通过巧妙的策略和顽强的竞争，机智地避过殖民者的种种限制，在西部传统的马赫迪分子活动中心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并吸引了大量新的追随者，开辟了新的势力范围。赛义德看到，在东部，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已开始取代宗教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便在 30 年代特别努力争取知识阶层的支持。[25]

594

到 1935 年，新马赫迪分子就这样成为反对殖民主义的重要政治力量。它促成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和宗教的势力之间可能达成的团结，这成为 50 年代具有强大民族主义吸引力的独立阵线的核心。独立阵线在 1956 年实现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

苏丹南部当地人民的抗议运动

这一时期，苏丹南部的非洲各族人民继续发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这一抵抗运动具有 3 个令人瞩目的特点。它并不总是甚至也不经常是对行政当局明显压迫的反应。相反，其基本目标在于结束英国殖民主义在非洲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抵抗运动此时已经扩展到过去虽对殖民统治抱冷淡和怀疑态度，但并不十分敌视的那些部族。最重要的是抵抗规模空前扩大，斗争中这个地区最大的两族丁卡人和努埃尔人特别活跃。他们不顾一向存在的地方隔阂，在为应付紧急事态而推举出的领导人带领下集中进行抵抗。这些领导人有的是宗教领袖，常常是具有神赐才能的"先知"。在这次重大的抵抗浪

[24] M. D. 戴利(Daly)，1977 年，第 144 页。
[25] H. A. 易卜拉欣，1977 年。

潮中，有两次起义值得特别注意：即阿利亚布丁卡人起义（1919-1920 年）和丁卡人起义（1927-1928 年）。非洲传统宗教对这些起义的性质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受轻视和受压迫同样是激起阿利亚布丁卡人在 1919 年的公开起义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统治阿利亚布人的基层殖民官员马穆尔行为不端，特别是他抢夺牲畜和妇女。这次起义似乎是苏丹南部其他各族都将参加的一次总计划的组成部分。[26] 虽然博尔丁卡人由于遇到困难未能起义响应阿利亚布人，但根本不属于丁卡族的曼达里人却实际参加了这次起义。[27]

阿利亚布丁卡人起义从 1919 年 10 月 30 日开始，当时大约有 3000 名战士攻击索巴特河南岸明坎曼的警察所。警察所本身被阿利亚布人所攻占，但马穆尔设法逃跑了。两 595 天之后，一群曼达里人闯入穆拉的电报线路护线站，杀死 3 名护线兵，缴了他们的枪。11 月 2 日阿利亚布人再次发动进攻，袭击了客栈，打死两名警察。[28] 尽管丁卡人的这次进攻最后被击退了，但是殖民统治者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一些殖民官员和许多警察在战场上丧命。

丁卡族在历史上的这次危机中，很大一部分人发现了他们有神授能力的领袖，一个名叫布尔·约尔的人，他的“神赐”名字阿里安迪特更是尽人皆知。先知阿里安迪特发挥建立政治组织的伟大才能，在 1921 年动员丁卡各族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他的纲领简单而激进：结束殖民统治，事实上就是争取丁卡人的独立。[29] 他的战斗力很强的支持者不断进攻殖民者的据点，但是在 1922 年 2、3 月他们被打散了。

努埃尔各族人则在南部地区对殖民主义进行另一场难以应付的挑战。尽管英军不断进行讨伐，他们却不认输。在他们看来，自己只是打了几次败仗，却并没有输掉整个战争。他们的抵抗斗争在 1927-1928 年暴动时达到最高潮。

西部努埃尔人在强有力和影响很大的先知加卢亚克的领导下拒绝服从当局的命令。1927 年 12 月，当西部努埃尔地区长官弗格森到乔尔湖视察时，数千名努埃尔战士向他的一行人进攻，打死了弗格森和随行的 18 人，其余随行人员狼狈逃走。

与此同时，索巴特河以南洛乌地区的努埃尔人也起义反抗殖民主义。他们颇有影响的领导人先知格威克·恩贡登拒绝会见包括总督本人在内的所有殖民官员。他派遣使者到洛乌地区的各地以及邻近的努埃尔部族，传递准备与“土耳其人”作战的信息。[30] 殖民当局知道恩贡登随时可能发起进攻，遂采取强硬措施镇压他所领导的运动。

为对付这些起义采用了极端的和不加区别的暴行，导致大量死亡和破坏。但是丁卡人和努埃尔人的英勇抵抗，使英国殖民主义者深知，仅靠暴力是不会生效的。这迫使他

---

[26] L. L. 马伍特(Mawut)，1978 年，第 80 页。
[27] G. N. 桑德森(Sanderson)，1980 年，第 4-5 页。
[28] R. O. 柯林斯(Collins)，1967 年，第 77 页。
[29] G. N. 桑德森，1980 年，第 22 页。
[30] O. 迪杰内斯(Digernes)，1978 年，第 88 页。

们在30年代早期开始对苏丹南部各族人民采取新的和解与“照顾”的政策。

索马里兰

索马里人长期以来一直具有根深蒂固的索马里民族的共同情感，这种情感被一种真正一致的民族文化所加深，被一种对伊斯兰教的强烈忠诚而加强。[31]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索马里民族主义者同他们的前驱和后继者一样，在索马里各地区进行反对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斗争时，都求助于这种民族一致性（见插图4.1）。

596

除了这个基本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在起作用。这些都与殖民主义在索马里社会结构中引进社会新事物有关。殖民势力实际上已经摧毁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推行他们自己的一套东西。他们在索马里亚各地区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把所有实际权力都集中在殖民地行政官员手中。除了最基层的工作外，不给索马里人以任何有权力的职位。殖民当局任命酋长，在英国保护地叫头人（akils），在意属索马里亚称头领（capos），他们只起咨询作用，是殖民当局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工具。这些做法确实大大背离了大多数索马里人过惯了的当地传统的自由制度和游牧生活方式。索马里人民怀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对所有外国人尤其是白人基督教徒的传统鄙视，他们必然要抵制这种剧烈的变革。

在殖民地时代以前，索马里人除诉讼费和进出口税外不向政府缴纳任何赋税。但是各殖民大国拼命利用他们新任命的不尊重传统权威的酋长们动员和开发索马里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索马里兰有史以来第一次征收直接税，在意属索马里亚征收年度茅屋税，在英国保护领地则征收牲畜税。此外，索马里劳动力被迫到殖民者开办的企业做工。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招收了2000名索马里人为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其中400人死亡，1200人受伤。[32]意大利殖民官员经常派出征募队，为他们在索马里亚的种植园提供需要的劳动力。这些招来的索马里劳工按部族分组，强迫他们集中居住在殖民村里。所有这样的虐待和剥削，导致人们普遍憎恨殖民主义。

因此，1919-1935年期间，索马里人对殖民统治的反抗是对这些社会变化的直接反应，它表现为两种类型，即地方性的和以一批社会精英为代表的抗议运动。

地方性的抗议运动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在各欧洲殖民地和埃塞俄比亚占领下的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人抵抗运动，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从来没有涉及到所有索马里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索马里人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单一的自主的政治单元。相反，他们分成一些经常相互敌对的大部族，这些部族各自“又进一步分裂成为大批从属的亲属集团”，每个集团通常只

597

[31] I. M. 刘易斯(Lewis)，1963年，第147页。

[32] V. 汤普森(Thompson)和R. 阿特洛夫(Adloff)，1968年，第10页。

有数千人。[33]

这些地方性的起义次数太多，情况千差万别，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但从对其中几次起义的考察中，即可看出这些起义的主张是什么。

加扎勒区的哈吉·哈桑公开拒绝殖民官员要所有索马里酋长和族长上缴火器和弹药的命令。他直言不讳地答复地区专员说：

"我不接受你的命令。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到你那里去，因为你已经撕毁了我们之间的契约……政府有政府的法律，我们有我们的法律。我们不接受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命令。我们的法律是上帝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法律……如果你们闯进我们的土地寻衅，我们将用各种方式战斗……真主说过：少数人能打败多数人。世界已临近末日，只剩下 58 年了……我们不想再留在这个世上了，不如按穆斯林法律去死。全体穆斯林万众一心。"[34]

虽然哈吉·哈桑被俘，但是抵抗精神没有被扼杀。班图族系的埃勒人在布尔阿库巴附近发动了另一次起义。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正在拓展新的边疆。对意大利把奥比亚和米朱提因两个省并入其殖民地的企图的抵抗（见插图 4.1），再次显示了索马里人民维护自己社会的传统和自由社会结构的决心。奥比亚素丹尤素福·阿里·克纳迪德向米朱提因素丹提议结成联合阵线对付入侵者。但是地区之间的分歧使这一倡议没有成功。

虽然奥比亚在 1925 年被吞并，意大利人出钱让尤素福到摩加迪沙去养老，[35]但是布尔又爆发了一次勇敢的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乌玛尔·萨马特尔，他是米朱提因人，意大利人指派他担任本地人的酋长。萨马特尔攻占了布尔的要塞，他的军人固守要塞中心建筑物。意大利部队包围了要塞，但他们又被尤素福·阿里素丹的地区军事指挥官赫尔齐·古尚率领的周围地区居民所包围。殖民军于 11 月 15 日退回布德布德，丢下了 38 具尸体，其中有意大利驻节长官本人。11 月 30 日，意大利人又在博特败绩。[36]萨马特尔及其一部分追随者越过边境进入埃塞俄比亚，与渗入欧加登的意大利人作战，同时攻打边境哨所。

意大利人在米朱尔坦素丹国遭到更加顽强的抵抗。当地的著名素丹欧斯曼·马哈穆德拒绝屈居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他和他的人民的低劣地位。尽管殖民者进行镇压，他领导的运动继续蓬勃发展，坚持抵抗入侵者的斗争持续了近两年之久。但他终于在接近 1927 年年底时被捕，受到与他的亲属尤素福一样的待遇。[37]但斗争仍在他的儿子和法定继承人赫尔齐·博戈领导下继续下去。 598

[33] I. M. 刘易斯，1963 年，第 147 页。
[34] R. L. 赫斯(Hess)引用，1966 年，第 151 页。
[35] G. O. 伊萨（'Īsa），1965 年，第 172 页。
[36] R. L. 赫斯，1966 年，第 154 页。
[37] I. M. 刘易斯，1965 年，第 99 页。

在力主进行决死一战的传统酋长们的支持下，赫尔齐袭击了意大利人在哈丰角的基地，1925年12月初又将一支意大利驻军赶出了霍尔迪奥。6周后他再次发起大进攻，威胁到瓜达富伊角的意大利军事设施。赫尔齐又大胆攻击诺加尔河口的埃尔。[38]殖民主义者又如法炮制，逮捕抵抗运动领袖并将其驱逐出境。赫尔齐被遣送到埃塞俄比亚，但他几年后又回摩加迪沙，后因患天花死于该地。

与此同时，英国保护地的许多索马里人对赛义德·穆罕默德起义的永远怀念，使他们牢固地保持着反抗精神。他们始终保持主动和警觉，一旦发现殖民政权软弱之处，便进行骚扰。法拉赫·乌马尔和哈杰杰·巴希尔·尤素福等支持赛义德·穆罕默德的人继续进行斗争。[39]此外，反对英国人的地方性的起义，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沿东部边境一带此起彼伏。宗教领袖把在英国保护地新推行的西方教育看成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工具，因而也是对伊斯兰教的威胁。1920和1935年试图实行这种教育时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最终发展成为两次暴动：1922年在布劳的暴动和1936年在巴罗的暴动。巴罗暴动时，新任命的英国教育局长受到雨点般石子的欢迎。[40]

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地方性起义同样重要。法属索马里的两大族阿法族和伊萨族索马里人都对殖民当局抱敌对态度。塔朱拉和高巴德两个阿法族素丹国在这方面尤为活跃。1931年，法国人把高巴德的素丹驱逐到马达加斯加。[41]

阿乌萨的素丹长期来一直反对法国渗入这一地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他自己深受其害。法国控制了从沿海到埃塞俄比亚边境之间的地区，剥夺了他过去从当地人民和商队贸易中得到的收入。于是，亚尤素丹在迪基勒设伏并逮捕了新任法国总督李普曼。599 1935年，李普曼的继任者阿尔贝·贝尔纳及其16名索马里士兵在穆尔海图被杀。1935年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并支持阿乌萨的素丹向法国提出领土要求之后，素丹的活动更加积极。[42]

殖民国家不同有关部族商量，也不考虑部族的分布和放牧的需要，便专横地划分索马里的国境。例如，加达布尔西族和伊萨族被一分为二，分别归属英国和埃塞俄比亚，伊萨族甚至还有一部分归属法国。有时边界线横穿许多族的区域把它们分割，有几处原属某个族的土地却划给了没有传统所有权的新主人。结果造成要求索回失地或要求与被划入另一地区的亲属团圆的骚动。索马里人民经常抵制殖民者这种以武力强行划界的行径。例如1932年受命前往勘定英国保护地边界的英国-埃塞俄比亚联合委员会便遭到当地部族人民的暴力反抗，委员会负责官员被杀死。[43]

---

[38] R. L. 赫斯，1966年，第155页。
[39] G. O. 伊萨，1965年，第130页。
[40] I. M. 刘易斯，1965年，第103-104页。
[41] V. 汤普森和R. 阿特洛夫，1968年，第11页。
[42] 同上。
[43] I. M. 刘易斯，1965年，第106-107页。

索马里兰的这些反对殖民统治的地方性起义，规模和性质都有局限性。由于它们都是在索马里人传统的分散体制范围内进行的，因此极难形成大范围的联合行动。不同部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对抗以及部族内部争夺水源和牧地的争斗，大大削弱了索马里抵抗斗争的力量。[44] 殖民官员利用这种局面，挑动一个族去反对另一个族，并从中为自己寻觅代理人和同盟者。殖民主义对这些起义采取强硬政策也是这些起义受到限制的另一个原因。但是，这些斗争毕竟构成前一个时期斗争的继续，并为索马里人民进一步抵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以社会精英为代表的抗议运动

索马里半岛内外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和具有政治觉悟的索马里人在反对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指派的酋长的活动中，组成了自己的"青年"团体。政府官员、商人、海员等索马里现代民族主义者通过这些团体开展政治活动。

原来曾担任殖民政府官员的哈杰杰·法拉赫·乌马尔，是现代政治家的先驱，1920年成为在英属保护地积极活动的民族主义者。他抗议殖民当局的暴行，宣传改善经济设施，发展教育事业。有意义的是，他的活动不仅仅限于有关英属索马里兰的事务，而且对整个索马里的情况也深切关心。英国人把他流放到亚丁，他在当地索马里人的合作下创立了索马里伊斯兰协会。这个协会虽说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但致力于增进索马里人的利益。哈杰杰·法拉赫·乌马尔通过在亚丁报纸上发表文章，向英国政府、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写信请愿，促使英国公众注意到索马里人的民族愿望。 600

在这些"青年"活动中，最主要的是30年代中期英属保护地主要城镇里殖民政府下级官员组织的秘密集会和商人建立的政治俱乐部。这些组织并没有试图扩大，只限于精心挑选的人员参加。[45] 但是他们在大小城市中为表达人民的不满情绪和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法属索马里兰情况也是如此，1931年在吉布提建立的海员工会也显示了对政治的兴趣。这个组织的兴趣并不严格限于海员事务，而且还包括"索马里人在政府中的代表地位和他们在领地经济中应分享的权利"等民族问题。[46]

从这些初期尝试性的组织开始，1935年出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最重要的"青年"团体索马里民族联盟(SNL)。它从成立伊始便是一个"为消除对抗民族爱国主义的一切传统势力而奋斗的泛索马里组织"。[47] 民族联盟几度更名，到1951年已成为英属保护地的一个成熟的政党。[48]

---

[44] E. R. 特顿(Turton)，1972年，第124页。
[45] S. 图瓦尔(Touval)，1963年，第65页。
[46] 同上，第70页。
[47] I. M. 刘易斯，1961年，第286页。
[48] 同上，1963年，第148-149页。关于该党强调索马里民族地位的党纲见上引书第149页。

但是这些以社会精英为代表的团体在动员民众参加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我们不该忘记，知识分子是有条件组织和坚持现代政治运动的唯一阶层，他们人数极少，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索马里兰各个部分实际上都忽视西方式教育。此外，殖民当局迅速采取措施处罚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中的活跃分子，譬如免除他们的政府公职或调到偏远地区。尽管如此，这些团体所唤起的程度有限的觉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政治觉悟。

在这方面还必须提到大约在1920年发明的索马里语本国字母表，即“乌斯曼字母表”，是根据其发明者乌斯曼·尤素福·克纳迪德而命名的。主张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索马里语的保守派宗教领袖和意大利殖民主义者都反对使用这套字母。[49]但它还是在有限的范围通用，后来被民族主义者赞誉为“索马里人成就的象征”。[50]

601

结　论

上面我们叙述了1919-1935年间东北非政治变革的基本事实。但重要的是把这些主要事件放在前面提到的各方面相互关联的更广阔的背景下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东北非的一些地区，宗教与民族主义相互影响。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在埃及，趋势明显向世俗的民族主义发展，但在索马里和苏丹北部却不那么明显，因为那里的宗教界政治色彩比较浓。在苏丹南部，民族主义运动仍处在基本上是地方性抗议活动的水平，有时还受当地宗教信仰的制约。

其次，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这一地区甚至在工业世界大萧条开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地区性和全球性经济失调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促使东北非，特别是埃及的政治气候更容易对爱国主义号召作出积极的反应。经济困境的少数好处之一就是有时可以产生爱国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埃及在经济上遭受的苦难和剥削，就有助于唤起民族主义情绪。

第三，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既有帝国主义的新扩张，也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新高潮。如前所述，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在扩展其最后的领土边界，一方面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埃及从1914年起沦为保护国，甚至在1922年正式“独立”之后，它仍旧被迫屈居英国附庸的地位。另一方面，埃及于1919年达到的令人惊愕的团结（尽管为时不长），确实迫使英国帝国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让步。

这一时期不应因从策略上考虑面有意规避的一点是埃及在与苏丹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萨阿德·扎格卢勒以及以后华夫脱党领导人所主张的埃及民族主义，包含埃及对苏丹拥有主权这一不切实际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当时被认为是恢复千年至福的事业。

不过，即便是埃及的这种扩张主义做法也具有解放的作用。苏丹的亲埃情绪往往同时是反英情绪。它也为埃及和苏丹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团结的基础，有助于他们创造出

[49] R.巴拉维(al-Barāwī)，1973年，第77页。
[50] I. M. 刘易斯，1965年，第115页。

自己的“尼罗河流域统一”的神话，以便反击索尔兹伯里勋爵以前所创造的征服尼罗河的神话。

索马里亚和苏丹的民族主义斗争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埃及人的斗争对其邻国具有启发性影响。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解放的种子确实已经撒播到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的土地上。 602

（舒展译）

24 马格里布和撒哈拉的政治和民族主义 1919-1935年

J. 伯夸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殖民主义的反应

603 寻找"民族主义"（用这个词并不十分精确）① 迹象的政治历史学家，最初只是在突尼斯发现了明确的证据。在阿尔及利亚，他注意到日渐增长的症候，却又对其含义不明感到困惑。在摩洛哥，民族主义政党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几年才诞生，即使到那时也还得同难以克服的旧传统进行斗争。在利比亚，面对步步进逼的意大利帝国主义，人民仍专注于维护主权和独立的问题，正如在第5章中看到的，这一斗争一直持续到30年代。因此，本章不论及利比亚。

公开的战争和消极抵抗

当时在摩洛哥，柏柏尔人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普遍存在。很明显，这是殖民统治之前时期早已存在的现象的延续。但是，这时已与穆莱·哈桑统治时的情况不同，② 那时候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按照官方的杜撰，把它说成是拒绝纳税之类无关紧要的事。在本章讲述的这个时期，法国人在对中阿特拉斯山脉地区进行渗透时，遇到了比素丹们更大的困难③，尽管这一渗透仍然是在"马赫增"(Makhzen)即"合法政府"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从此以后，"马赫增"是基督徒所控制的了，因此导致了远比以往部族骚动更为危险的反应。民族的抵制采取了排外和圣战的形式，抵抗扩展到整个大阿特拉斯山区和中

① 在这里，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爱国主义"；参见M. 拉舍拉夫(Lacheraf)，1963年，第69页。正如安沃尔·阿卜德·迈利克(Anouar Abdel Malek)建议的，就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独立主义"('nationalitaire'〔'nationalitarian'-pro-nationality〕)要比"民族主义"（'nationaliste'〔pro-nation〕）正确。

② 参看纳西里(Al-Nāsirī)，1907年，第277页和以下各页。此书由欧仁·菲麦(Eugène Fumey)译。

③ 见A.纪尧姆(Guillaume)，1946年，第47页。

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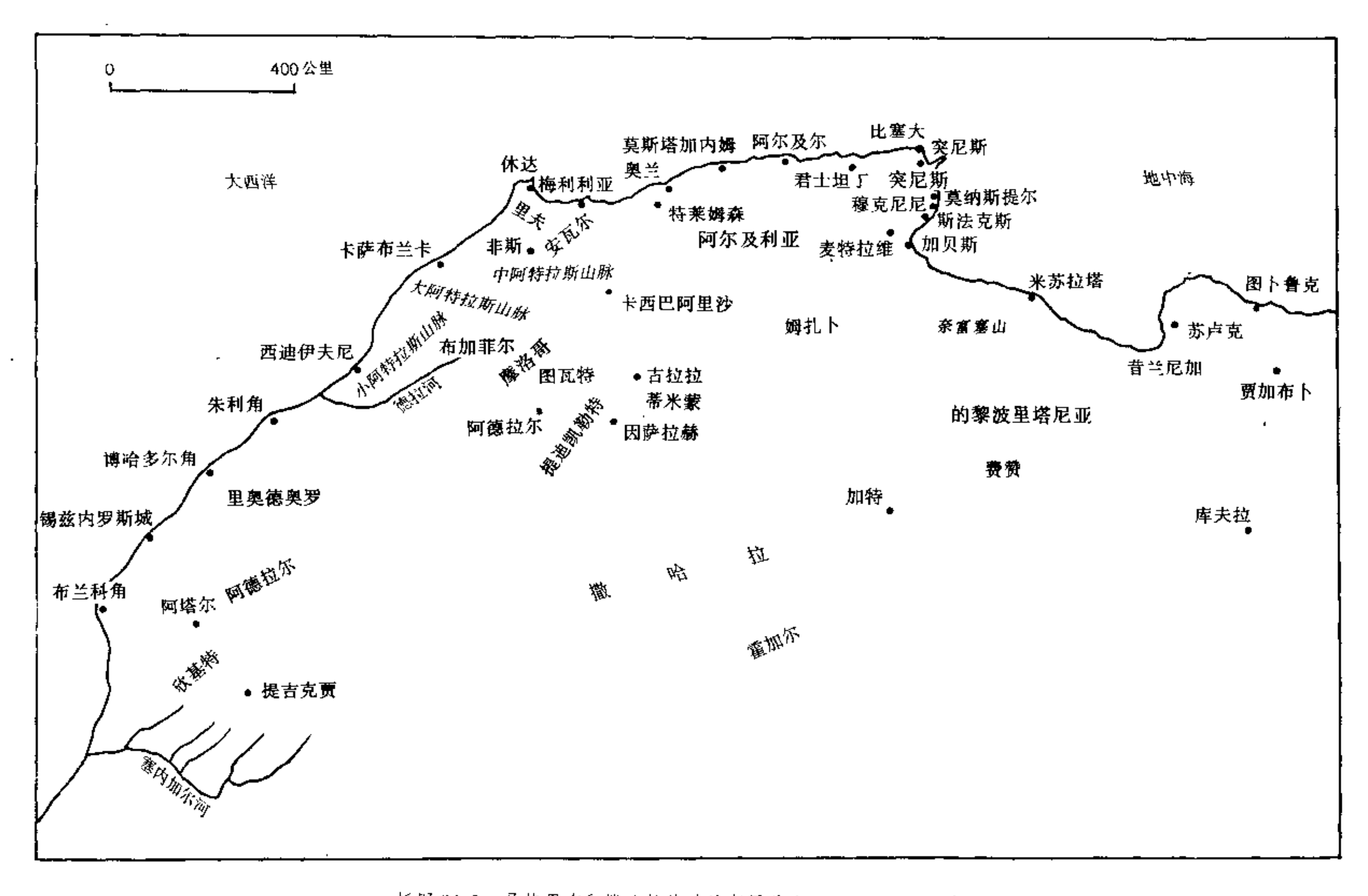


插图 24.1　马格里布和撒哈拉的政治与民族主义，1919 1935 年

605 阿特拉斯山区。在南部和西南部，它遇到了非洲大陆特别强硬的部位。④在塔扎走廊以北，大部分割让给西班牙的沿海地区仍未被征服。在东面很远处，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的另一端，⑤一些独立组织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进行活动，而赛努西教派则在绿洲中巩固他们的阵地。⑥把这样广泛存在的现象仅仅看成是守旧派的不轨活动当然是估计过低了。在我看来，它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村社自由的传统。

在马格里布的其他地区，与这种战争绵延的情况同时存在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现象，形势日渐稳定，建立了文官政府。很可能是许多人的行为掩盖着不同方式的反对态度。反对态度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效忠派提出的抗议，还有消极抵抗。但是，正如一位眼光异常敏锐的总督所写的，"在土著人中谈不上什么消极"⑦。他注意到，"到处都一样，某些不满情绪竟然如此异口同声，以致在这些问题上可以说存在着公众舆论"。一旦遇有机会，这种公众舆论就采取反抗的形式。在埃米尔哈立德短暂的竞选经历中，这种舆论迅速转化为政治行动，使统治者感到震惊。⑧哈立德曾在法军中担任上尉，是伟大的阿卜杜勒·卡迪尔的孙子，一度颇得民心。他以他"穆斯林人格"的名义，颂扬阿尔及利亚的荣誉，强调阿尔及利亚由于提供了那些士兵，应该受到法国的感激。哈立德的党在阿尔及尔市政议会的选举中击败了温和派，在当局看来，这个党如此危险，以致他们宣布选举无效。随后，这位埃米尔又赢得了第2次和第3次选举胜利，但是最后被迫离开阿尔及利亚(1923年)。在法国本土，他一段时间内仍很活跃，尽管他的目标可能不再限于法国和马格里布。⑨

突尼斯的立宪争执

19世纪下半叶，突尼斯曾经历过一次改良主义的高潮，这次高潮在某些方面甚至比

606 埃及和土耳其的类似运动来得更早。⑩这些尝试的失败并没有削弱其对开明的资产阶级的吸引力，这个阶级过去一贯倾向于以东方而不是以西方为自己效法的模式。现在，对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的原则寄予的希望，取代了对奥斯曼帝国的留恋，民族主义也如同埃及华夫脱党的情况一样改换了调子。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塔阿勒比和他的朋友们决定，为他们的事业向法国本土的舆论界，特别是社会主义派的舆论直接发出呼吁。他

④ 这一地区后来通称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边界地区，在今毛里塔尼亚北边和撒哈拉沙漠西部，通称为里奥-德奥罗。当时仍是部族袭扰活动的场所，同时，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艾奈恩的继承人们正在试图进行组织工作。

⑤ 在这一地区，拉佩里尼将军在他意外身亡之前，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团结塔瓦里克人的工作，这个部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接受赛努西教团的宣传鼓动和各种独立运动的影响而觉醒。

⑥ 1923年意大利人不得不在昔兰尼加再次同赛努西教派及其支持者作战，到这时才把"密苏拉塔共和国"镇压下去。

⑦ M. 维奥莱特(Violette)，1931年，第396页。

⑧ M. 卡达谢(Kaddache)，1970年，第65页和以下各页。

⑨ A. K. 塞阿杜拉 (Sa'dāllāh)，1969年，第420页和以下各页。

⑩ 见J. 卡鲁伊(Karoui)，1973年。

们的小册子《苦难的突尼斯》（1920 年）对殖民地境况的恶化进行了生动的分析。他们成立了宪政党（1920 年 2 月），目的在于恢复突尼斯的独立地位。

他们的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保护国制度打断了这个阿拉伯-地中海民族的复兴。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同著名的法国法学家的意见相反，[11] 唯一的反响是贝伊在开始确定自己的立宪时限已经过了 75 年以后，才行使贝伊的权力。的确，在突尼斯的咨询议会里，从 1907 年起就有本地人的代表。代表由被指定的成员组成，并且同法国成员一样，只有财政权。1920 年年底，大多数法国成员和几乎半数当地成员都要求进行改革，要求代表由选举产生并扩大其权力。但是，宪政党违背了自己当初的激进建议(1920 年 6 月)，发表了一个"正中保护国下怀"的改革宣言(1921 年 12 月)。纳西尔贝伊 1922 年 4 月 3 日的准最后通牒遭到的是恐吓。[12] 但是翌年，颁布了各项贝伊法令和驻节总督的命令(1922 年 6 月)[13]，设了立卡伊德辖区、地区和中央的代议机构，由各级选举产生；[14] 已经建立了一个司法部，由改革家海鲁丁的儿子掌管；这就是一场力图同时争取当地统治者和法国议会支持的运动所取得的仅有的一点点结果。谢赫塔阿勒比被关押了好几个月。他的获释并没有促进他的党的团结：该党分裂成两个集团，活跃的程度不同。在殖民地的背景下，正如梅特尔・盖拉蒂的经验所表明的，温和行动总是受到怀疑。但是，谢赫塔阿勒比和梅特尔・萨菲（埃萨菲）的激进主义，由于没有取得哪怕微小的成功，有陷入可怕的孤立、面临被消灭和脱离事态发展进程的危险。"现在，最初的兴奋已经过去，宪政党进入了潜意识状态，带有已经偃旗息鼓的'圣战'的纯理论色彩……"[15] 607

群众性村社

马格里布的农村地区，绝大部分由传统的村社聚合而成。对摩洛哥的统治显然是依赖这些村社，并把酋长的地位制度化。但是，在这种官方体制下面，可以觉察出存在着更有可能引起骚乱的不大好对付的传统体制。长期以来，法国的政策一直是充分利用各自为政和只效忠于地方的现象。1863 年的参议院法令建议把阿尔及利亚人划分为"杜瓦里"(duwārī)，即地区。1884 年法律的实行甚至给这些"杜瓦里"以类似法国含有村社的意义。[16] 1919 年，不论是柏柏尔人的抵抗力量，还是在其他各地已明显出现的舆论力量，都以各种不同形式从普遍的民主意识中抬头：这种力量的兴起，就柏柏尔人来说是原始的和防御性的，在其他地方则遭到失败，显然被压服下去，但就两者来说，基本上

---

⑪ C. A. 朱利安(Julien)，1972 年，第 67 页；R. 勒图尔诺(Le Tourneau)，1962 年，第 65 页和以下各页。这两本书详述了本章试图加以解释的一些事件，参阅它们可以对有关情况得到更多的了解。

⑫ C. A. 朱利安，1972 年，第 69 页。

⑬ 关于这些措施的来龙去脉，见R. 巴列克(Balek)，1922 年，第 240 页和以下各页。

⑭ 意大利人通过在昔兰尼加设立一个"阿拉伯议会"（1921 年 4 月 30 日），旨在采取超出人们所要求的权利的主动行动，但却没有产生所希望的安抚效果。

⑮ R. 巴列克，1922 年，第 286 页。

⑯ J. 伯克(Berque)，1970 年，第 137 页和以下各页。

都是通过“杰玛”(djemā'a)[17]而表现出来。法国人考虑到这种日渐抬头的社会力量，并把最终与之和解作为原则和目标。这样做并不是荒谬的，从长远来看，很可能就是由此而导致了阿尔及利亚农村地区的解放，和宗主国的政治制度渗透到那里。

这无疑就是通常称为若纳尔法的1919年2月4日法律以及使该法生效的两项法令的最终目标。该法赋予具有一定资格（如曾在法军服役，能用法语读写，在农村拥有一定土地，等等）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参加选举村社会议和包括市长在内的某些市政官员的权利。[18]近50万穆斯林有权参加初级选举，其中大约10万人有权选举省的和中央的议会。但这样做并没有消除不平等。例如，在市政会议中，穆斯林代表发现他们处于少数，只占成员总数的1/3。虽然这使人数众多的阿尔及利亚人无法赢得胜利，[19]但是由于最基层的选举团日渐扩大，以及阿尔及利亚人的代表现在已能够参加选举市长，这就使保守分子震动很大，感到起了破坏作用，尽管实行这些措施畏首畏尾，距离人民的要求相差甚远。[20]

608

工人们的最初反响

在突尼斯，雇佣劳动者高度集中，例如在麦特拉维矿区的情况，但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什么抗议的征兆。至于在阿尔及利亚，工业化还不够发展，社会状况又极为专制，在开始时无产阶级群众除了通过人数很少的一批受过欧洲工联主义熏陶的先锋分子外，无法表现出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突尼斯，穆罕默德·阿里的早期活动[21]以及塔希尔·海达德所提供的分析[22]，对于阶级组织产生了某些影响。前者富于冒险性的生活，使他接触到德国社会主义，并成了恩韦尔帕夏的朋友，在当时，恩韦尔帕夏可能是最清楚地意识到怎样才能把西方的主导思想同伊斯兰人民的民族主义高潮结合起来的人。海达德则以对国内问题的分析补充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国外经验。他论述了工人问题和妇女问题，表现出对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有着清晰的理解。码头工人（先是突尼斯城的，然后是比塞大的），里夫王宫的水泥工人和其他工人，对海达德这两方面的努力作出了实际的反应。

在比塞大，9个地区工会于1924年10月12日合并。它们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但却受到社会党国际法国支部的强烈批评，因为该支部对这个新组织与民族主义的联系感到担心。宪政党不参与它认为的妥协性勾结，但是，它却在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于1925年2月组成的联盟。联盟除宪政党外，还有大议会、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

[17] 村社的家长以及管理村社的“集体”。

[18] C. R. 阿热龙(Ageron)，1966年。

[19] 即使他们通过归化选举了市长，结果也是如此。这事发生在卡比利亚的梅克拉。在那里，行政法院不顾信誉，宣布选举无效。

[20] 但是，C. A. 朱利安(1972年，第377页)认为这项立法对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的影响恐怕并非微不足道，他看来是对的。

[21] P. 马梅(Mamat)，1964年；A. B. 赫尔马西（Hermasi)，1966年。

[22] T. 海达德(al-Haddād)，1927年。

三者的本地支部。这种联盟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加上它们的争吵、和解以及立场的千变万化，往往使人们看不清这些运动同样都具有的自发性特征。同时，派别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预示着在作出抉择时必将发生冲突。法国社会党在图尔代表会议上对党的政策和工会问题发生了分裂。这样，争取实现自己目标的殖民地半无产阶级就受到各种各样互相对立的势力的影响，初步形成了几种将会造成不同结果的不同选择，比如，阿尔及利亚人阿马尔·乌兹甘和本·阿里·布库尔特，以及突尼斯人莫赫塔尔·阿 609 亚里。举例来说，将要出现的发展趋势会给予迄今按伊斯兰标准确定的民族特性以什么地位？民族特性是否会被无产阶级的一般愿望所淹没？

北非的舞台还没有可能提供明确的答案。[23] 1924 年，正是在巴黎，在马格里布的移民中间建立了“北非之星”。其创始人中有一名是法国共产党的积极成员，阿卜杜勒·卡迪尔·哈杰·阿里。新组织是在一种革命的和反殖民主义的精神下建立起来的，丝毫没有把工人阶级自身的问题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起初，它得到了埃米尔哈立德的支持。

流行的制度和日益增长的反抗

20 世纪 20 年代，马格里布各国的交往日渐扩大。城镇由于农村来的新居民而开始扩展。新的一代长大成人，他们不知道战前生活是什么样子。[24] 一切都要求变革。殖民当局和传统当局，在变化不定的关系中，彼此互相怀疑。这种事态发展使殖民统治者感到担心，设法采用巧妙的和高压的手段加以平息。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主宰殖民地的习惯做法却是听其自然，尽管在宗主国法国有一派人谴责滥用职权和缺乏效率，认为这是招致危险的根源。

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可以觉察到事态的加速发展已经减慢了速度。1923 年，两名主要领导人，塔阿勒比和哈立德同时离开，似乎削弱了反对势力。但是在摩洛哥，当局又不得不面对别的看来更为紧迫的困难。

未来事件的先声：里夫共和国

1925 年到 1926 年间，里夫人的领袖穆罕默德·本·阿卜德·卡塔比（即阿卜德·克里姆）将民族斗争引向高潮，引起很大反响。把这场斗争说成是“叛乱”，仅仅当作一个插 611 曲，是过低地估计了事件的意义，现在人们承认，这些事件是很久以后事态发展的先声。[25]

---

[23] 镇压一刻都没有放松。例如，在突尼斯，组织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的尝试，看来由于组织者被逮捕，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被放逐而归于失败。直到多年以后（1937 年），突尼斯的工会才在 1932 年 9 月 16 日被承认合法之后，在人民阵线的背景下恢复了独立活动。但在第二个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与拜尔加西姆·盖纳维遭到镇压后，工会运动又一次被政治镇压所扑灭。

[24] 关于突尼斯，见F. b. 阿舒尔('Ashūr)，1956 年　关于阿尔及利亚，见T. 迈代尼(al-Madanī)，1963 年，第 92 页和以下各页，353 页和以下各页。又见A. 伯克(Berque)，1947 年，第 123 页和以下各页。

[25]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尽管在军事方面，阿卜德·克里姆的活动无疑预示了 1954 年以后发生的事件，但并非一切方面的潜在因素都已为人们所认识。

610



图片24.1 阿卜德·克里姆(1882-1963年),梅利利亚区穆斯林总法官,1921-1926年里夫战争中抵抗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摩洛哥领袖



图片24.2 里夫战争,西班牙军队展示阿卜德·克里姆部下士兵的首级

里夫人始终没有放弃斗争。阿卜德·克里姆的军事才能使西班牙（1921年7月在安瓦尔）遭到殖民战争史上最著名的惨败之一。[26] 1924年11月，当西班牙人被迫撤离沙夫沙温以巩固自己的战线时，他们遭到了又一次同样致命的失败。

阿卜德·克里姆是西属保护国一个穆斯林法官(kādī)的儿子，因此，他是在一个和解的环境中出生和长大的。他一度曾在非斯的卡拉维因经学院学习，可能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伊斯兰现代主义。[27] 他在自己当代人中间的地位既是一位政治领袖，又是一位穆斯林改革家。他除了具有军事才能外，还心胸坦荡，政治上精明强干，因此比起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同他地位相当的利比亚人——如苏莱曼·巴鲁尼、兰丹·沙蒂威，特别是乌麦尔·穆赫塔尔——来，在国际上影响更大。[28] 他给自己的氏族，即贝尼沃尔吉勒，以及周围的村社带来的变化是深远的。他使这些经常进行氏族仇杀的集团恢复了伊斯兰教法、禁止集体宣誓和加入兄弟会，并禁止已婚妇女跳舞。象征着毗邻村社之间互相攻击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每个村子的小守望塔，即"伊什布朗"(ichbrawn)，被拆毁了。[29] 甚至在安瓦尔大捷之前，在卡马举行的一次贝尼沃尔吉勒、坦萨曼、贝尼图津和卢库亚各族之间的会议，就已使"里夫国家的结构具体化"。[30] 因此，"里夫共和国"（其宣布成立的日期有人说是1923年1月18日，有人说是2月1日）乃是一种尝试：即既改革传统的国家，而又不破坏其积极的方面，如促进集体协商和合作的一些习惯作法。

这种改革的动力，应该同当时在整个伊斯兰-地中海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埃及三角洲，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的拉卡，等等)的其他类似尝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31] 要确定这些尝试是否属于民族主义的征兆，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在殖民主义国家看来，由于阿卜德·克里姆同法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实际上，法共还为支持他而号召举行了一次罢工），这些活动的同时出现就变得更加危险了。[32] 在1925年10月12日爆发的那次罢工中，许多法国工人示威反对在摩洛哥进行的殖民战争。在全国范围，还发生了由法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统一总工会和共和国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从1926年春天起，第三共和国投入了异乎寻常的兵力迫使阿卜德·克里姆就范。[33] 但是，摩洛哥的其他地方没有进行反抗。[34] 尽管军事解决办法使西班牙得以在它自己统治的地区建立有效控制，但它并没有消除阿卜德·克里姆试验的重大意义。

612

---

[26] 这次惨败被正确地描述为"恩图曼战役的颠倒"，这指的是1898年基奇纳摧毁马赫迪国家的那次战役。见A. 优素福(Youssoufi)，未注明日期，第113页。

[27] 然而应当指出，后来他曾猛烈攻击把现代主义引入摩洛哥的主要人物谢赫布沙·易卜拉-杜卡里。

[28] A. 米苏拉蒂(al-Misurātī)，1964年，以一位利比亚爱国者的观点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

[29] D. 哈特(Hart)在1973年巴黎举行的里夫共和国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未曾出版。

[30] A. 优素福，未注明日期，以及上面注29中提及的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31] J. 伯令，在注29中提及的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32] R. 加利索(Gallisot)，在注29中提及的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33] 阿卜德·克里姆于1926年5月26日向法国当局投降。

[34] 尽管作了个别姿态，但人民的希望和同情仍然遭到扼杀。在非斯，少数青年伪造了一份据说是里夫共和国领导人写的传单，表示感谢国内著名人士的声援。

当时阐述形势的文献

1901年，阿尔及利亚被批准建立一种称为"财政评议会"的政体，即一种内部的政治自治，几乎一直到殖民统治终结，白人移民的代表都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1927年，当这个小小的农民议会拒绝批准总督对于社会福利和学校午餐的少得可怜的预算时，它实际等于宣告了自己的死刑。莫里斯·维奥莱特在一本预言式的名为《阿尔及利亚将能生存吗?》的书中指出了这一点。他提议的解决办法当然是极端正统的，更说不上是激进的。[35] 但是，该书建议扩大1919年的代表制改革，在这方面它表现出明显地进了一步[36]。后来，维奥莱特进一步主张，应该给予少数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以选举法国议会议员的权利，同时又不失去他们基于"个人身份"所享有的其他选举权。

法国移民曾利用这种身份强调他们地位的不同，这给法国历届政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借口，不赋予阿尔及利亚人以完全的法国公民权。对于这两方来说，提到这种身份恐怕都不过是寻找借口，一方是用它来表示拒绝，另一方则用它来表示否决。但是，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按字面理解同化的概念，认为就是成为法兰西联邦的一部分——表现出来的热望却令人吃惊。不能轻率地把这说成是欺骗，而要从不同的层次上加以解释，其中最根本的恐怕就是获得解放的热望。这种语义上的复杂现象明显地表现在费尔哈特·阿巴斯1922年到1927年间发表的文章中，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书于1931年以《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为名出版。[37]

这些文章当然已经过时了。但我们不应忘记，他的论点，他对苦难的同情，以及他的希望的宽厚，尽管也许构不成一种政治上的基本原理，但仍然在道义上和概念上为一种可能的政治目标提供了基本轮廓。殖民化被斥责为"没有思想的强权，没有灵魂的头脑"。伊斯兰受到尊重的权利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尽管这一点长期以来已不为人们所注意。很久以后于1930年为这些文章撰写的序言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认真地加以区分。对于法国人来说，"殖民化不过是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冒险事业，后来又由适当的行政制度加以捍卫"。相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则是：

> 名副其实的变革，是推翻由信仰、思想和古老的生活方式构成的整个旧世界。它使整个人民面对突然的变化。整个民族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现自己不得不改弦易辙，否则就会灭亡。这种形势必然导致在道德方面和物质方面失去平衡，其严重程度与彻底分崩离析相去无几。[38]

如果有人想从那一阶段的科学作品中——从L.米利奥、奥古斯丁·贝尔纳、R.莫尼埃，甚至E.F.戈蒂埃的著作中——寻找对社会变革所下的如此精辟的定义，那将是徒劳的。

---

[35] M.维奥莱特谨慎地宣称他自己反对极左。

[36] M.维奥莱特，1931年，第474页。

[37] 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āt 'Abbās)后来又回顾性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见F.阿巴斯，1962年，第113页和以下各页。

[38] F.阿巴斯，1931年，第9页。

就连C. A. 朱利安当时发表的、在唤起北非觉醒方面发挥了公认作用的引人注目的历史综合论，也不能对这一深刻的见解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看法，还导致了陶菲克·迈达尼的《阿尔及利亚之书》(1931 年) 的问世。这本书的扉页上有缩图画家拉希姆画的代表"乌里玛"(即伊斯兰教贤哲改革会)的三重装饰图案。就全书来说，一方面描述阿尔及利亚人的困境，要求承认他们作为一个阿拉伯民族的权利，同时避免进行论战，力求客观。这本书至今仍然是当时的文献中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关于阿尔及利亚音乐的一章，[39] 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该书的这一部分还中肯地论述了阿拉伯语出版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40] 和文学复兴的迹象。[41] 作家和诗人的名单，对进一步进行研究颇为有用，不过应注意名单中略去了"青年阿尔及利亚人"，因为这些人渴望被人看成是法国人，其中包括费尔哈特·阿巴斯。 614

伊斯兰改良主义

如上所述，书的扉页上印有"乌里玛"的装饰图案。在今天，人们正确地着重探讨这个团体的民族目标以及它的宗教目的。谢赫阿卜杜勒·哈米德·本·巴迪斯的纲领，[42] 虽然目的在于消除一些具体的影响，但比起当时占突出地位的其他各种计划来，实际上也许更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其他计划由于下面有行政当局玩弄的花招而上面又有政治阴谋面失去了作用。最引人注目的尝试实行时往往并不是最有效的：例如，本贾卢勒博士在君士坦丁的冒险活动，或"埃鲁斯"(Elus)[43] 的平等主义的要求。这位谢赫一方面注意不去公然冒犯法国的宗主权，另一方面坚持进行"知识和道德的改革"，为此他提出了同一性的问题，摸到了大多数人的脉博，并同中东的类似运动遥相呼应。这样，他求助于一种完全可以同西方民主相比的模式。他首先着眼于明显存在的社会上的涣散和道德水准下降的种种现象。他把阿尔及利亚说成他的"沃坦"(watan)即家园，而不公然说成是一个"道莱"(dawla)即国家，把伊斯兰说成是他的宗教，把阿拉伯语说成是他的语言，既巧妙地运用了策略，又预见到文化在非殖民化中所起的作用。

另一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方面是地理因素。如血统关系所表明的，这一运动的领导人包括若干外省的姓氏：不仅有君士坦丁省的贵族世家，如本·巴迪斯，面且有泰贝萨、米拉和西迪·奥克巴等家族。[44] 这个运动不满足于在中部高原，特别是阿尔及尔和其他城

---

[39] T. 迈达尼(al-Madanī)，1963 年，第 339 页和以下各页。

[40] 同上，第 343 页和以下各页。

[41] 同上，第 353 页和以下各页。

[42] A. 穆尔塔德(al-M.Murtād)，1971 年，第 54 页和以下各页，115 页和以下各页，179 页和以下各页。又见A. 梅拉德(Merad)，1967 年。

[43] 这一名称当时用来指一个联合会的成员，该会于 1927 年 9 月 11 日由选进阿尔及利亚各个代表会议的穆斯林知名人士组成。穆斯塔法·拉舍拉夫注意把这些政治家的活动同"伊斯兰教贤哲改革会"(乌里玛)的活动区分开来，尽管他对后者持批评态度。见M. 拉舍拉夫(Lacheraf)，1965 年，第 188 页和以下各页。

[44] 1931 年建立的伊斯兰教贤哲改革会最著名的成员中包括谢赫阿拉比·泰贝萨、谢赫穆巴拉克·米拉和谢赫塔依布·奥克比（一个著名的讲演者）。

市地区建立"争取进步小组",而且旨在扩大到"偏僻的农村"。谢赫贝希尔·易卜拉希米在特莱姆森进行了深入的鼓动,这类努力以传道以及组织交谊团体和互利协会等活动形式进行,变得越来越流行。

615 随之而造成的这一运动的活动中心的大量增加,往往只是被当作外人几乎无法理解的神学方面的争论记载下来。但是所有这些动荡现象,不论是在伊斯兰贤哲改革会还是某些对立者如穆斯塔加奈姆的谢赫本·阿勒瓦等人的支持下造成的,[45]还是像在姆扎卜绿洲那样产生于根深蒂固的分歧,[46]都反映了迄今与世隔绝或者除自相对立之外行政当局一直无法唤醒的那些村社,初次接触世界范围的问题了。谢赫本·巴迪斯和他的朋友们通过赋予北非的伊斯兰教以教理上的大变革而树立了一个榜样。这种变革是许多世纪以来所没有尝试过的。例如,他们对古兰经的评注,是文化上的一大功绩。[47]他们甚至大胆到要对宗教中超越自然而存在的永恒之物和偶然存在的变化之物加以区别;[48]要研究一些最重要的趋势同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不同社会集团和年龄集团、经济阶层、个人以及道德主张所发挥的作用;并要写出详细的专题文章。这样的研究无疑会表明,这个时期是阿尔及利亚社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对帝国主义的三项挑战及其反应

今天看起来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庆祝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一百周年的活动[49]并没有引起公开的指责,而人们在这个非殖民化时代回顾往事时总认为殖民地人民必然会那样做的。[50]在许多当时关心要求公正和平等的阿尔及利亚人看来,这些似乎很可能引起宗主国法国的民主分子们注意的庆祝活动,首先重新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尽管幻想很快就破灭。统治机构中一些位居显要的穆斯林——当选的议员、本地籍的司法行政长官和巴查加斯(bachagas)——厚颜无耻地争相奉承法国人,[51]从而使传统贵族和那些一贯从妥协政策得到利益的人仅存的权威丧失殆尽。对白人移民的荣耀的赞颂,这时达到了神话般的程度,从而使一种法国除了偶尔间歇外几乎无法摆脱的政策固定了下来。更为严重的是,统治当局简直看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弱点。就宗主权的学说来讲,这固然没有

616

[45] A 伯夸,1936年。毫无疑问,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徒的骚动,绝不仅仅限于"贤哲会"的活动。

[46]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谢赫拜亚德和谢赫阿提菲耶等学者。见M. A. 达布尔(Dabbūr),1971年。

[47] 谢赫本·巴迪斯和谢赫本·阿舒尔可能是在穆阿斯凯尔的谢赫阿布·拉斯(18世纪末)以后最早致力于这一非常艰难的任务的人,尽管摩洛哥学者谢赫伊本·海亚特(Ibn al-Khayyāt)这样有名的人表示不同意。见后者在非斯发表的有关这一问题的石版印刷小册子。

[48] 根据谢赫易卜拉希米(Ibrāhīmī)在穆罕默德·本·舍本教授墓旁所作悼词中的一段颇不寻常的话,《希哈卜》(Shihāb),1928年,5月号。

[49]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整套当时的文献,其中绝大多数令人气愤地持官方腔调,但是幸好还有一些科学的叙述胜过其他。

[50] 在法国共产党的合作下,某些城市组织了反对性的宣传活动。见A.乌济加尼(Ouzegane),1962年,第171页和以下各页并散见各处。教师工会,以及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本哈吉也曾勇敢地提出抗议。见M.卡达谢,1970年,第193页。

[51] 关于某些令人痛心的例子,见M.卡达谢,1970年,第192页。

什么问题，因为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几乎没有人公开对这种理论提出挑战。但是，既有这种理论，就必然产生这样的责任，而负这种责任的官员，却几乎谈不上宽宏大度、更缺乏洞察力。这样一幅图画不是太阴暗了吗？我们承认，也有一些比较明亮的斑点。这里所指的是做每一件事都尽量少用强迫手段。毫无疑问将要进行剥削，但是剥削要合法，借助文化上的声誉而使之缓和一些，表面上显出一种共和的气氛，避免使用暴力，甚至乞灵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自由。这种登峰造极的帝国主义，表面上看起来却是最高形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我们在今天实在难以理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法属北非，历史学家看到的远不是像英属埃及当时那种动荡不安的形势。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良好气氛，它所产生的结果，以及它为人们所接受的事实，并没有好好加以利用。这可以从阿尔及尔的庆祝活动那种洋洋得意的挑衅口吻中，以及更加典型地从1930年5月7日至11日在迦太基举行的圣餐大会上看出来。这次大会，在突尼斯的年轻人心目中，是一次反对北非伊斯兰教的十字军。[52]无论如何，这样的集会同许多马格里布人仍向之寻求希望和理解的各种思想——法国革命的伟大原则，饶勒斯的传统，进步的神话等等——完全不是一个调子。

在摩洛哥，1936年5月16日的"柏柏尔敕令"，[53]把柏柏尔习惯法纳入法国殖民地司法系统，为中产阶级青年提供了一个评估所处地位的机会和采取大规模行动的第一块跳板。它被看成是对伊斯兰的攻击和分裂国家的企图，是无视1912年的承诺。尽管其用意是作为一种地方性的、限于局部实行的措施，但这一行动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反响，而在当地，它使迄至那时为止只限于在两、三个大城市进行秘密小组活动的反对派公开化了。

在1936年6月20日到9月30日的三个月当中，[54]发生了120多起事件，大多数发生在清真寺，穆斯林在遭受苦难时进行祈祷聆听教义的地方。这些祈祷活动被看成是对公共秩序的极大威胁，以致当局用传讯、监禁和殴打来加以对付。非斯城的一个代表团 617 前往首都，8月31日，其三名成员被投入监牢，包括"来自卡拉维因的一名年轻学者"阿拉勒·法西，[55]和"巴黎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的毕业生"拜尔·哈桑·沃扎尼。这两个人代表着抵抗运动的两股推动力量——正统的和现代的——几乎具有象征意义的结合。而镇压恰恰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被捕人数增加到150人，很多店铺同以前一样，关门表示抗议。尽管有官方的禁令，清真寺的祈祷声又传了出来。街头发生了冲突。如果人们把保护国的魔力解释成一种催眠术、通过它，技术上的优势和利奥泰的威望在那么长的时间一直把这个国家控制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么，这种魔力是确实无疑地被打破了。

[52] J. 伯奎，1970年，第253页和以下各页。

[53] 同上，第250页和以下各页。

[54] 《马格里布》杂志1933年5-6月特刊，该期杂志是在贝热里(Bergery)、勒诺德尔(Renaudel)和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等著名人士赞助下出版的。

[55] 一个古老家族的成员，当时已是一个知名诗人和学者，他又发现自己有演讲和组织的才能，曾撰写大量作品，其中同本事件关系最直接的是《马格里布独立运动》，开罗，1948年，和《自我批判》，开罗，1956年。关于他，见A.戈迪奥(Gaudio)，1972年，及阿莱米(El Alami)，1972年。

在巴黎，三年之后，《马格里布》杂志为这些事件出了一期专号。让·龙格和其他著名的法国人士，特别是好几个年轻的摩洛哥人，提出了一套合乎逻辑的论点。法国同情者虽然正确地把1930年的“柏柏尔敕令”看成是老一套的殖民主义宣传伎俩，但由于他们自己持反教权主义观点，因此，在解释柏柏尔人的反抗活动中存在许多明显的宗教因素时，他们就显得难以自圆其说。一位法国的社论作者写道：“谁都应该知道，在东方和所有穆斯林国家，宗教和民族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位给这份杂志撰稿的摩洛哥人则不那么自满自足地写道：“在我国，我们已经准备好给予柏柏尔人以在法国一般说来拒绝给予布列塔尼人的东西。但是，我们希望这是在伊斯兰的范围内进行的，因为伊斯兰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宗教，而首先是一种文明”。这样，他就在辩论中提出了文化因素，而这一因素是很多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的。

走向对抗

这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有一半是在法国同马格里布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过去的。当然，经济形势很难说是有利的。战后立即出现的萧条几乎还没有过去，世界性衰退又已逼近。世界性衰退于1932年波及马格里布，加重了1925年重新出现的普遍萧条的经济状况，而一直延续了整整10年之久。这使劳资关系，即法国殖民者618 和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机械化、计划化、合作社，甚至公职人员工会化的进展，都使法国人加强了对这块殖民地的控制。事实表明，统治当局无法缓和这种控制在受其统治的人们身上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加剧了不平等状况的经济恶化同政治要求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还需更加具体地加以探讨。[56] 在我看来，社会变革和恢复共同特性的要求，在促使北非的觉醒中，是比不平等现象更强有力的因素。总之，各种各样的动机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派系利益之上的愿望。“沃坦尼英”，即摩洛哥“爱国者”当时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北非之星”几乎还没有在阿尔及利亚站住脚。宪政党还沉溺于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中。法国共产党在当地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它的激进理论。[57] 推动行动的力量大都还是潜在的。发表政治观点在各种俱乐部、委员会和没有名称的小组中进行，甚至只是散播某些主张，而不是在政党本身中进行。

行政当局尽管不理解这些观点的细微差别，却很善于利用个人的利益和对立。但它不太重视政治抗议的作用。在它这一方，手段优越，始终如一，甚至在表面上意见一致。但它却忘记了在似乎正常的表面之下，各种力量正在聚集。一旦发生了什么事件，政府就归咎于当地的或国外的“捣乱分子”，或者“赤色分子”，用这种态度为极端保守主义

---

[56] 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见J.伯克，1970年，第101页和以下各页，又见A.努希(Nouschi)，1962年，第31页和以下各页。这一分析对如何评价这一阶段中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着力进行。

[57] 法国共产党除在里夫战争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之外，总的来说，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本身，直到人民阵线时期，仅仅限于单纯地对殖民主义。在此之后“正在形成的国家”这一观点才占了上风。

619



图片 24.3 突尼斯新宪政党领袖哈比卜·布尔吉巴(1903年生)

和镇压进行辩解。

新战术和行动的障碍

布尔吉巴和他的朋友们（包括巴里·基卡·塔哈·沙法和马塔利博士）所采取的方针并非要么一切目的都达到、要么干脆就不干，与此完全不同，他们的目标是谨慎地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一个暂时的、甚至是放长线的立足点。[58] 他们为突尼斯合作社遵奉传统的主席进行辩护，因为这样做可以争取舆论界的支持。他们甚至支持驻扎官提出的一项措施，不过就像我们可能会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这项措施在他们看来"客观上"有助于他们的事业（这项建议是，预算中用于法国官员的部分应予缩减）。[59] 对于大清真寺和为宪政党提供了很多成员的突尼斯中产阶级，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批评或嘲讽。事情已经很明显，整个运动将由于萨赫勒的人们已经变得更富战斗性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使农村地区政治化[60] 将是新宪政党的目标之一。导致新宪政党诞生的这次分裂，发生于在希拉勒堡举行的一次气氛活跃的农村代表大会上（1933 年 5 月 12 日至 13 日），[61] 这决非偶然。与此同时，与驻扎官公署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例如在莫纳斯提尔和穆克尼尼。为了使镇压合法化，发布了令人反感的法令，布尔吉巴则由于使用了"令人反感"这个形容词，在南方同他的朋友一道遭到监禁（1934 年 9 月 3 日）。[62] 他虽身处困境，但仍继续为他的事业辩护。

在阿尔及利亚，行政当局力图限制伊斯兰贤哲改革会影响的扩大，把宗教方面的兄弟会和官方的教士集合起来反对他们，而后者的水平极低。[63] 当局看到人们成群地涌去听新教士布道，他们本能地感到这些新教士是在使伊斯兰教具有必要的新精神，于是决定禁止他们在清真寺里讲经。1933 年 2 月 16 日，以起草者命名的"米歇尔通告"和三项补充法令规定由官方垄断这方面的活动。[64] 随后爆发了示威游行，参加者不仅有教徒，还有工会会员和极左派的激进分子——一个本可能发挥作用的联盟。人们公认的事实是，在那时出现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派的某种"分裂"，[65] 1935 年法国总工会和统一总工会(CGTU)的重新统一远没有弥合这种分裂。北非之星在进行了好几年秘密活动后，于 1933 年 6 月在阿尔及利亚本土重新开始公开活动。[66] 该组织的主席梅萨利·哈吉从 1927 年起就使用独立一词。在日益增长的动荡不安中，1934 年 8 月在君士坦丁发生了反犹太

[58] 特别见 A. 布尔吉巴(Bourguiba)，1954 年，散见书中各处。

[59] 同上，第 10 页，35 页和以下各页。

[60] 相对于城市而言，则是"恢复"农村地区。在阿尔及利亚的"贤哲会"的活动中，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方面的效果(mutatis mutandis)。

[61] J. 伯夸，1970 年，第 289 页和以下各页，部分是根据 M. 布尔吉巴(Bourguiba)的回忆。

[62] A. 布尔吉巴，1954 年，第 70 页和以下各页。

[63] A. 伯夸，1951 年。

[64] 全文见A. 努希，1962 年，第 69 页。

[65] 一个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于 1938 年 7 月成立

[66] A. 乌济加尼，1962 年，第 84 页和以下各页。

人骚乱。[67] 这到底是阴谋策划的，还是自行爆发的，是转移方向，或者是挑动的结果，并不清楚。但不管是什么，它是一次其激烈程度使所有政治家感到震惊的街头暴动。但是在 1935 年 1 月的下一轮选举中，本贾卢勒博士的反对派候选人在君士坦丁获胜，这表明大多数人的同情向着哪个方向。尽管获胜者是个坚定的同化主义者，[68] 但他却招致当权势力采取疯狂的预防措施。显然，在阿尔及利亚公共生活的这种形势尚不明朗的激进化中，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提出什么样的理论，而是这种理论提出什么具体建议或者实际上引起了什么。

621

在摩洛哥，法国移民深受萧条之苦，并被当局强加给他们的一些限制所激怒，于是提出了一个最后通牒。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事态发展，正好与巴黎 1934 年 2 月 6 日的骚动发生在同一天。就在这个时期，摩洛哥出版了一份民族主义的期刊。阿拉勒·法西正在其中崭露头角的摩洛哥行动委员会于 1934 年 12 月 1 日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如被采纳的话，定会在这个保护国的发展进程中显出它的真正的重大意义和目标。[69] 在西属摩洛哥，反抗已经在托雷斯(Torrēs)和纳西里(Nāsirī)更公开地表达出来，[70] 并与北部农村建立了联系，[71] 1934 年 5 月 10 日在非斯举行的一次示威，几乎危及穆罕默德五世的前途。

改革方案的提出，恰好与消灭南部最后一个反对派中心同时发生。[72] 从此，历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离开了由利奥泰主义和土著人事务部使之超越自然寿命而苟延残喘的那条早已过时、近乎传奇式的历史道路。这一巧合在摩洛哥之外也产生了影响。“巴鲁德”的终止，可能也就意味着“阿拉伯局”的完结。[73] 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也是一样，社会变革削弱了原有的团结一致，也创造了新的团结局面。大城镇的街道，甚至农村的集市场所，都成了群众行动的舞台，阶级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可以跨越传统的分野而组织这些行动。在法属北非所有三国，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在那里，部长雷尼耶进行了一次炫耀成就的调查），政府对这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展作出的唯一回答，就是操纵选举，[74] 并采用最新式的镇压手段。[75]

---

[67] A. 努希，1962 年，第 74 页和以下各页。

[68] 见本贾卢勒(Bendjellūl)为A. 克苏斯(Kessous)的书（1935 年）写的序言。

[69] 详细的分析见R.勒图尔诺，1962 年，第 189 页和以下各页。

[70] R. 雷泽特(Rēzette)，1955 年，第 83 页和以下各页。

[71] 通过利用非斯的零售商销售网。这些联系远达山区和苏斯河，在那里吸收了著名的通称为穆赫塔尔·苏西(Mukhtār al Sūsī)的战士。

[72] 梅雷比雷布由来自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法军采取联合作战行动而攻克。廷杜夫最后于 1934 年被占领。

[73] “巴鲁德”(barud)的意思是“火药”，因此转义为“战斗”，非洲的军队用它来表示那些由于“绥靖”而荣誉受到藐视的人民进行的军事的、甚至孤注一掷的抵抗。“阿拉伯局”是一个世纪前由拉莫里西埃创建的，一直是法国当局用来统治不同传统集团而采用的典型方法。城市里没有与此相同的组织，即使在马格里布的农村地区，随着事态的进展，这种方法也已变得过时了。

[74] J. 梅诺（Menaut），1935 年。

[75] 除了突尼斯的“禁止流氓滋扰政令”以外，还有阿尔及利亚的 1935 年 3 月 30 日法令和摩洛哥的 1935 年 6 月 29 日敕令。

行政当局之所以拒绝采取行动，其原因不完全在于莱茵河对岸日益增长的危险和由622 此而给法国保守派提供的理由。有关三方——宗主国法国、殖民者和民族主义运动——所采取的态度，促使前两方尽量维持现状，因为当时第三方还没有力量提出严重的挑战。盲目的忠诚，使北非的欧洲人缺乏任何独创性，而对这种效忠，宗主国法国则报之以无条件支持。例如，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些自称是“阿尔及利亚人”的欧洲人，主张“区域独立”，以便使自己可以从中获得超额利润，但又不走得太远，以致作为一个“自治领”或在其他某种安排下冒单独面对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的风险。如他们所说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但又是没有民主的法国。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形势实质上也是一样。

暂时的结论

关于本章刚刚论述过的这个时期，并不是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记事性历史经常遇到秘史所造成的障碍。对于今天还是谜一般的人物、情况和决定，今后的研究将使其更加清楚明白。我们也不得不把某些关于社会历史的判断留待将来去作。经济动荡和政治紧张两者之间是否有密切的联系呢？部族，或者更确切些说文化的两重性，似乎比阶级分化更足以解释有关各方所抱的态度。此外，由于冲突涉及比马格里布广泛得多的地域，因此北非的各种事件，也许受东方有关事件的影响比受法国的政策的影响更深，虽然比较间接。不过法国的政策似乎仍占据突出的地位。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变化无常的因素汇集成一个总的图表，或者至少是根据某一因素同其他因素的关系而衡量其中每一个究竟有多少份量。

在本章所述的这个时期，科学、意识形态和行动，都倾向于对事物持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也适用于法国左派和当时北非的大多数理论。这只会使那些能够避免这种偏向的运动更引人注目，尽管这也会带来种种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件很大程度上证明它们是正确的。

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作出预言是很容易的。今天，我们知道本章描述的形势其后果，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其结局是什么。那些结局是否也可能不同于此呢？特别是所有三个法属北非国家中那些值得尊敬的人提出的改良主义是不是本来会达到其合理的结局，即以现代方式建立起这三国与法国之间的团结关系呢？现在要回答说“不会”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应该避免这样简单地解决问题。

623 当我们提出事件实际发展过程所未曾实现的某种可能性时，我们不仅仅是责备当时的当权者，犯了错误和滥用了权力，而这些也许确实妨碍了事件按其正常的进程发展。我们同时也是就当时的一些言论和行动的真正意义向我们自己提出疑问。我们希望人们早就想到，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期，马格里布的形势，比其他许多问题更应当按照一种地下运动的思想方法来解释，因为在那里，不明显的，甚至隐藏的东西，要比明显可见的东西更重要。

走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国际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重新确认独立的民族特性的道路？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三种选择中，第三种占了上风。但是，在当时这并不是明确的，

而是往往要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做出选择——伊斯兰的或者世俗的，西方化的或者说阿拉伯的，温和的或者革命的。在 1935 年，谁也说不出两种思潮中哪种会占上风，甚至哪一种将会战胜殖民主义体制。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在将来其他阶段，究竟会出现其他什么东西有可能或仍然有可能以其他方式占据支配地位，历史也许尚无定论。

（艾平　庄红译）

25 西非的政治和民族主义 1919-1935年

A. 阿杜·博亨

624 正如本书第6章和第12章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非的大部分地区，对殖民主义的抵抗平静下去了。正如M. 克劳德所指出，[①]除了在科特迪瓦、尼日尔、黄金海岸（今加纳）的某些地区和尼日利亚东部外，大多数西非人在大战期间对他们的殖民统治者表现了忠诚，有些传统的统治者甚至以金钱的方式自愿为帝国的战争努力提供人力和资源。然而，在战后，非洲却以更充沛的激情和更坚强的决心，重新对殖民主义进行反抗。的确，如果说1919到1935年这一阶段是殖民主义在西非的全盛时期，那么，这一阶段也是非洲人对殖民主义的抵抗和民族主义活动的开展在西非达到高潮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西非的非洲民族主义和政治活动，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殖民地本身的形势；受过教育和从事专业的社会精英的数目以及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特别是在城市地区；20年代和30年代总的经济状况；因扩大种植经济作物而在农村地区引起的社会、经济变化；最后，还有泛非主义思潮和泛非主义活动扩大到西非地区。M. 克劳德（本书第12章）已经详细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非洲和民族主义活动的影响。在这里只需指出，首先，强行征募大批非洲人入伍引起了巨大的愤怒，特别是在原法属非洲地区。第二，战争向非洲人证明，白人也毕竟不是超人，因而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抵抗。第三，战后，"效忠"的西非人期待着对他们的忠诚给以更多的报答，并允许他们更多地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感情由于美国总统626 伍德罗·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宣告的自由民主和自决原则而变得更为强烈了。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使相当一批西非人比以往更趋向于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和进行抵抗的运动。

在这一阶段，殖民制度本身也变得巩固了，这一制度的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也变得更为明显。正是在这一阶段，非洲传统统治者和殖民主子之间的同盟加强了，发布了各种法令，极大地增加了这些统治者的权力，实际上把新的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和专业工作者集团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行政管理之外。

使这一因素变得更富爆炸性的是，随着西方式教育在当地的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求学，这一时期，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和专业工作者集团在数量上有了很大增长。

① 见本书第12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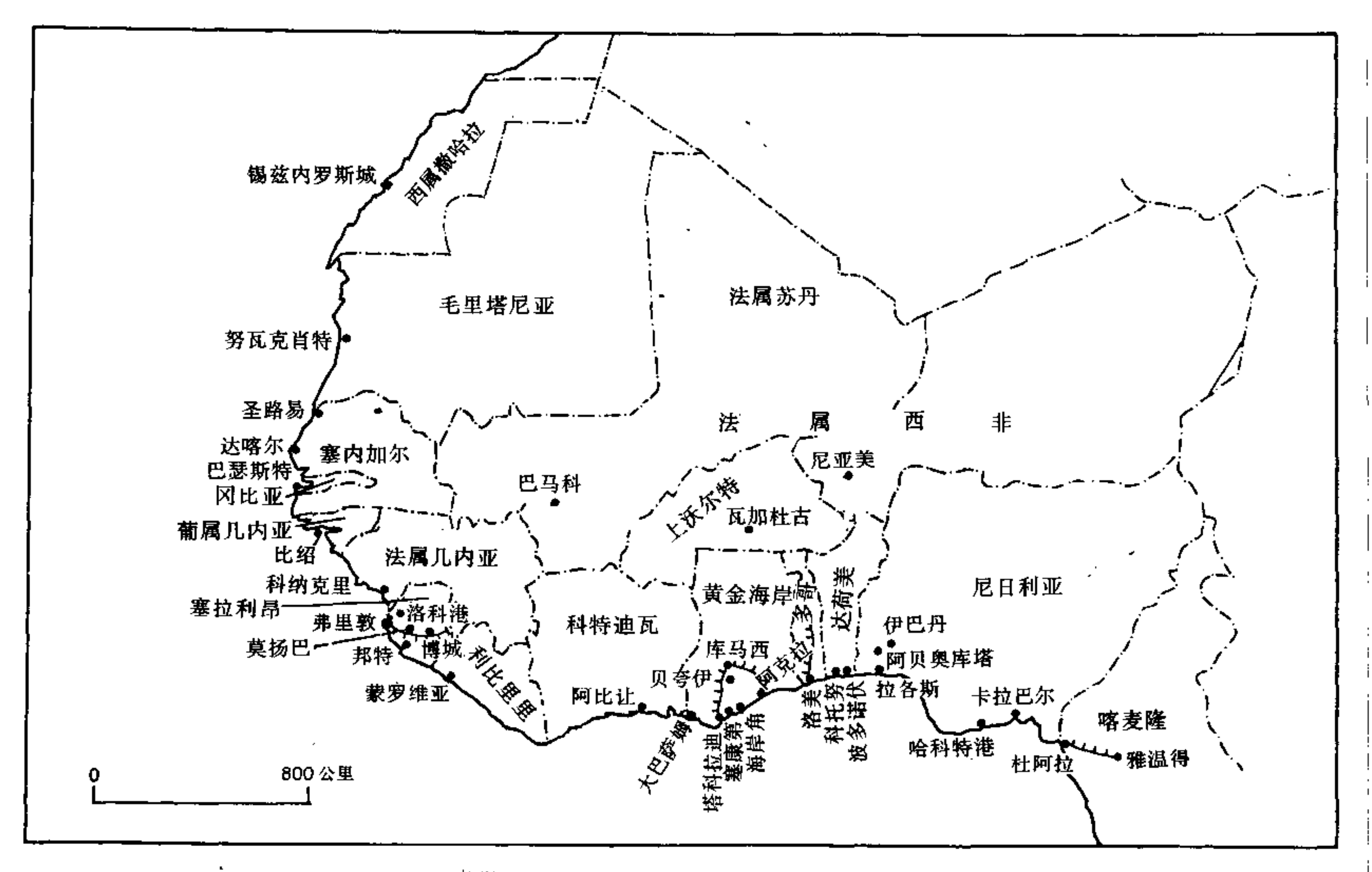


插图 25.1 西非的政治和民族主义，1919—1935年

同样，在农村地区，扩大种植可可、花生之类经济作物的结果，使数目不断增加的青年男女，变得甚至比传统统治者更为富有，他们不但对加到他们酋长头上的非传统的、专制的权力感到不满，而且对把他们自己被排除出新设立的所谓土著人权力机关的州委员会感到忿忿不平。所有这些社会变更无疑决定了西非民族主义和政治活动的特征。

但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经济状况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的确，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语西非的民族主义政治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殖民经济中的商业危机和变化是以何种方式影响殖民地的律师、商人等社会精英和教师、文职官员等准精英以及工人的能动性和反应的。因为，西非的"经济革命"不仅带来了货币经济，扩大了商业，它还把某些社会的和经济的价值观念带给了非洲的企业家和某些社会阶级——主要是律师和商人阶级。尽管这些社会阶级的地位，特别是小商人，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对它们的地位产生更为直接和重大影响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业事务日渐复杂化，市场不断扩大以及外国公司相互间激烈竞争，这意味着非洲商人要么必须提高效率，要么就只能在殖民经济中发挥二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控制、歧视性出口关税、通货短缺和海运能力的损失，使经商和从事专业的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全世界和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结为集团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塞拉利昂，受过教育的阶级和非洲商人以及大城市里的失业者的沮丧心情，在627 1919年的骚乱中和同年的工人罢工中公开地表现了出来。在这些骚乱中，对大米涨价的抗议采取了攻击叙利亚和黎巴嫩商人的形式。骚动的矛头尽管指向地中海东岸诸国的商人（人们指责他们囤积居奇，从而造成生活必需品短缺，并排挤当地经纪人），实际上这些暴力行动是针对被认为是管理殖民经济的办法所引起的不公正，所采取的抗议活动激烈而并非协调一致。抢劫和骚乱从弗里敦扩大到莫扬巴、坎加洪（1919年7月25日至26日）、马诺、波亚、马孔普、博城、邦特、曼盖和洛科港。当时，形势极为严重，以致不得不从黄金海岸调来部队。除了骚动，铁路和公用部门的技术人员和劳工也举行了罢工，要求同政府职员一样得到战时津贴，并抱怨工资过低和食品价格上涨。② 在冈比亚，物价上涨也产生了社会和政治影响，导致零星的抢劫和偷盗事件的发生。一场海员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同时爆发，导致工会的成立，特别是冈比亚土著人防卫同盟的成立。

1921年的萧条也在西非商人中引起了更为频繁的动荡不安，有些商人在财务上破产了。发行纸币和收缩银币也与事无补，人们指责欧洲商人囤积通货，抬高物价。黄金海岸一家报纸说，"国王、酋长和所有阶级很快都会成为乞丐"，除非西非人团结起来，保护自己不受勾结在一起的大资本家们的狡诈手段的伤害。总的说来，所有这些经济困难导致西非新闻界鼓动成立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废除皇家直辖殖民地行政制度，使非常人在经济管理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在行政和立法机构中有更多的代表权。

最后一个背景因素，是泛非主义运动的兴起，尤其是W. E. B. 杜波依斯博士和马

② 伦敦档案局，Kew，CO 267/582/45278；又见《塞拉利昂新闻周刊》，1919年7月19日，第8页。

库斯·贾维的活动，特别是在 20 年代。这方面的问题在本书第 29 章将详细论述，但是在这儿要简略说明一下，杜波依斯组织的历次泛非代表大会——1919 年在巴黎；1921 年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1922 年在伦敦和里斯本；1927 年在纽约，这些大会均有西非代表参加——不仅使整个非洲、特别是西非的民族主义活动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国际化，而且使全世界的黑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他们作为被蹂躏和被压迫的种族的共同处境，使西非更多的人加入到民族主义的事业中来。

让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一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谈一谈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要求：先是英属西非，尔后是法语西非的各种组织和运动。 628

英属西非的政治和民族主义

青年联盟和青年运动

这类组织中最为常见的是部族联盟和青年运动或协会。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在西非的许多国家确实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实际上是一大批部族的、福利的、文化的、同学会性质的，自愿参加的青年协会、俱乐部、社团和运动。在尼日利亚的城市，如伊巴丹、阿贝奥库塔和拉各斯，成立了许多伊格博人的联盟。仅在黄金海岸殖民地和阿散蒂地区，到 1930 年，就有多达 50 个这类俱乐部和协会，其中大部分是在 1925 年到 1930 年期间建立的。③这类俱乐部如：海岸角的阿奇莫塔讨论小组、文学与社交俱乐部和尤里卡俱乐部；塞康第的最佳俱乐部和文学与社交俱乐部；阿克拉的青年人俱乐部、宇宙俱乐部和罗杰俱乐部；安纳姆进步协会、埃维人联盟、库马西的阿散蒂科托科人协会和贝夸伊科托科人联盟。J. B. 丹凯把这些俱乐部和协会中的一部分组织成青年大会运动，1929 年在阿克拉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I. T. A. 华莱士·约翰逊建立了他的青年联盟和西非青年联盟。1934 年，成立了尼日利亚青年运动，近来一位尼日利亚学者指出，这一运动"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青年知识分子——H. O. 戴维斯、纳姆迪·阿齐克韦、沃恩博士、科福·阿巴约米博士、奥巴费米·阿沃卢瓦。"④

所有这些俱乐部和协会要么是由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领导的，要么是由年轻的律师、医生或商人领导的。虽然这些领导人的目的是从国民大会那样的保守的老民族主义领导人（关于后者下文还要进一步提及）手中夺过政治领导权，但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提出过任何激进的要求，尽管 20 年代和 30 年代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唯一的例外是西非青年联盟。这些领导人的要求往往局限于更多的教育设施、质量更高的大学教育、提高工资和薪金、在立法和行政委员会中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废除种族歧视、允许非洲人担任级别较高的文官、为非洲人提供经济机会、以及改善殖民当局同非洲人的关系。丹 629 凯1929年在阿克拉召开的黄金海岸青年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确实就是这样一些要求。

③ K. O. 黑根（Hagan），1968 年。

④ G. O. 奥鲁桑亚（Olusanya）的文章，见O. 伊基默（Ikime）主编，1980 年，第 558 页。



图片 25.1 塞拉利昂新闻工作者、工会活动家、泛非主义与民族主义政治家I. T. A. 华莱士·约翰逊(1894-1965 年)在一次政治集会上讲话

尼日利亚青年运动提出来的要求也与此相似。它主张非洲人在立法委员会中应享有多数，要求所有尼日利亚人在其中享有累进代表权。尼日利亚青年运动的章程还要求实行普选，批评间接统治和让欧洲人的商业和经济利益集团在立法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的作法，并强烈要求逐步实行文官尼日利亚人化。在经济领域，它同黄金海岸青年大会一样，要求给予非洲人参与经济的平等权利。它甚至还提出了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的纲要，其中优先考虑制造业、银行业、纺织业和运输业。它还建议设立合作团体，帮助尼日利亚人收买一些工业；还准备建立农业银行，协助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它谴责外国公司的垄断行为；呼吁为了尼日利亚工人的利益，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在社会-文化方面，尼日利亚青年运动的章程要求由国家出资实施群众性教育和小学教育计划，并建议把实施保健和成人教育计划作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职责。

这些运动中唯一的激进组织西非青年联盟是由I. T. A. 华莱士·约翰逊领导的，他是一个塞拉利昂工会活动家，1931至1932年曾在莫斯科学习（见图片25.1）。他抱着为了推翻殖民制度而建立一支以雇佣劳动者和城市失业者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力量的目的回到西非。他组织工人并以他那近乎煽动性的、言辞激烈的文章和巧妙地利用当地人不满的现象，特别是失业状况、食品价格上涨和1929年以来可可出口价格下降造成的失望情绪，唤起工人反对殖民制度。通过这些他在黄金海岸建立了青年联盟。由于他动员这些力量，并利用他们使当地政治激进化，殖民当局把他看成是共产党人雇用来组织殖民地青年的危险激进分子，于是把他驱逐到塞拉利昂。在塞拉利昂，他在弗里敦和博城建立了青年联盟的支部，并创办了一份报纸《哨兵报》，宣传反对恶劣的劳动条件和教育法令。

除了进行报纸宣传和组织请愿外，这些青年运动还参加地方上的选举，并采取罢工行动。于是，它们被卷入了塞拉利昂的弗里敦（1926-1931年）和冈比亚的巴瑟斯特（今班珠尔）（1929年）的示威、骚动和罢工。在阿克拉，由科乔·汤普森（阿克拉的律师）和尼日利亚报纸编辑纳姆迪·阿齐克韦领导的青年运动在曼比党的统一旗帜下，参加了阿克拉市的选举，反对像F. V. 南卡-布鲁斯博士那样的年龄较大和较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而青年联盟则参加了海岸角的地方选举。得到阿齐克韦的《西非向导报》支持的尼日利亚青年运动还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并取得成功的竞选运动，反对赫伯特·麦考利的保守的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该党自从1923年成立后一直在拉各斯政坛占统治地位。 631

但是，青年运动的成就并不大。他们在30年代竞选中取得的成功没有能把保守的领导者赶走，事实证明，他们具体的经济纲领在半直辖殖民地管理制度下也是无法实施的。然而，尽管青年运动的许多活动，除了在城市地区取得了一些选举胜利外没有在政治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效，但1945年以后英属西非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某些领导人在青年运动中取得的经验。

政 党

除了这些青年运动外，还组织了若干政党鼓动实行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赫伯特·麦考利1923年在尼日利亚建立的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该党所声称的目标是：

保障作为英帝国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的人民的安全和福利，高举“权利、真理、自由和正义”的旗帜迈向民主的最高峰，直到实现其“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同时保持对英王陛下的君权和本人毫不动摇的忠诚态度，采用的方法和一般程序严格遵守宪政原则。⑤

这个党的纲领包括：提名和选举立法委员会的拉各斯成员，使拉各斯取得市的地位和完全实现地方自治；发展高等教育并在尼日利亚全境实行义务教育；使文职人员非洲人化；在尼日利亚实行自由公正的贸易和平等对待尼日利亚的商人和生产者；最后，在受控制的私人企业制度下，对尼日利亚的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开发。该党使用通常的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参加拉各斯的选举，并在 1923、1928 和 1933 年取胜，召开群众集会，以及像在 1930 年所做的那样，派出代表团同总督讨论“诸如贸易萧条以及任命和废黜酋长之类的全国性的问题”。⑥ 该党在 1938 年的拉各斯选举中被尼日利亚青年运动击败以前，一直在拉各斯的政治中占据统治地位。

632

工 会

另一个表达反殖民情绪和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的工具是工会运动。在南部和中部非洲建立了很多工会，其中最早的是克莱门茨·卡达里 1919 年在南非组织的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该组织在南罗得西亚的支部成立于 1927 年。然而法国政府似乎直到 1937 年才允许在西非进行工会活动，而英国正式对工会表示容忍是 1932 年在冈比亚，1939 年在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1941 年在黄金海岸。⑦ 但是，尽管在这一阶段中，工会活动没有得到官方允许或鼓励，还是出现了一些工会，这主要是生活费用高昂的结果，这些工会有塞拉利昂的铁路工人工会，1919 年成立的尼日利亚机工工会和冈比亚土著人防卫同盟。这些工会的典型武器是罢工、抵制和阻止上工。第一批罢工风潮发生在铁路和矿山工人之中。1919 年，在塞拉利昂爆发了一次铁路罢工，1926 年又发生了一次。1924 年，在黄金海岸的奥布阿西，阿散蒂金矿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埃努古煤矿的罢工发生于 1925 年，达喀尔至圣路易铁路的罢工也发生于 1925 年，⑧ 所有这些罢工都是为了提高工资和改善服务条件而进行的。

跨领地的运动和国际运动：英属西非国民大会

本章迄今论及的协会、政党和运动，就其组织和外观来说，都是地方性的和仅限于本领地范围内的。但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政治运动与这一时期到来前夕和这一时期

⑤ 转引自 J. S. 科尔曼（Coleman），1958 年，第 198 页。
⑥ 同上，第 199 页。
⑦ M. 克劳德（M. Crowder），1968 年，第 351-352 页。
⑧ 同上，第 352 页。

之后的政治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在英属西非组成了一个跨领地的运动以及在殖民统治者的宗主国首都出现了一些国际运动。前者是西非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后者如在伦敦组织的西非学生联合会。

毫无疑问，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西非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最为有趣的一个。[9] 它是在黄金海岸的律师和知识分子J. E. 凯瑟利·海福德和尼日利亚的阿基万德·萨维奇博士共同努力下创立的，而且，它的领导权从始至终都不在传统统治者手中，而是在律师、医生和商人这样一些专业人员手中。该运动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凯瑟利·海福德，他的理想主义、政治眼光和对非洲人民团结的信念，使得英属西非国民大会从 1920 年一直存在到 1930 年，并把泛非主义的特点注入西非政治，只有克瓦米·恩克鲁玛在 25 年以后的活动可以与之相比。 633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分析英属西非国民大会领导人的社会背景和职业背景时所指出的,[10] 这一领导集团继承了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所渴望得到的个人主义。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信条，如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进步和各种利益自然协调一致的信念，以及"有秩序的自由"同财富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此外，对其大多数领导者来说，"英属西非"是作为一个比黄金海岸、塞拉利昂或尼日利亚更为重要的实体而存在的。这种把各部分等同于整体的看法，一直存在到 1929 年和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到那时，较狭窄的民族观念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11] 受过教育的西非城市"中产阶级"，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离开塞拉利昂散居到国外去的人，同沿海城市里的同类人比同他自己内地的同胞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更容易互相交往。

这些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由于听到别人说他们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历史可言，他们又意识到自己的社会-经济集团在殖民制度下机会极为有限，因此，无怪乎他们宁愿选择一种想象中的"西非国家"，而不愿要一种他们在其中没有发言权的政治制度，一种无论如何是外来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是压迫性的政治制度。黄金海岸的报纸不知疲倦地谴责外来统治。正如一篇社论所说："用英国的政府制度取代以前存在的制度，是一种任何具有自尊的民族都不能容许的侵犯。"

然而，尽管有那么多反对"外来统治"的表现，但却从未提到同殖民强国断绝联系；外来统治固然很坏，但也有充分的理由赞同它；要求给予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以更多的机会，提出温和的要求，比完全赶走外来统治要好些；而且，即使在英国国旗之下，仍然可以获得"自由"。即使是被当局视为拉各斯政治中的"牛虻"的赫伯特·麦考利，也发自内心地谈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带来的许多幸福。"英属西非国民大会也宣称： 634

[9] 详细情况参阅J. A. 兰利（Langley），1973 年。

[10] 同上，第 4 章。

[11] 举例而言，《黄金海岸导报》1928 年 9 月 26 日宣称："黄金海岸民族的思想是一个根本的思想"《塞拉利昂新闻周刊》1928 年 10 月 27 日的一期也说："不管有什么相反的说法，塞拉利昂总是我们的国家……"然而，有趣的是，在 1918 年至 1929 年间，在报纸上找不到真正大量的证据，表明新闻界不是一贯以一个较为广泛的西非观点，而是以各个殖民地的观点来看问题。W. D. 埃德蒙（Edmund），1951 年，第 113 页。

> 大会的政策是严格维护并防止破坏英属西非各附属国同大英帝国的联系，毫无保留地维护帝国自由公民的一切权利和只要纳税就应享有有效代表权的基本原则……促进在英国国旗下的英属西非政治体制的发展……最终保证在其境内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保证实现人人机会平等，为了人民而维护人民的土地。⑫

最后，这些领导人还认为，由于自己的社会和职业地位，他们是唯一能够通过立宪手段控制像洛思罗普·斯托达德和麦迪逊·格兰特那样一些歇斯底里的美国种族主义者所宣称的"有色人种反对白人至高无上地位的高潮"的阶级。

尽管在言词上大谈种族问题，但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基本上是政治目的极为有限的合作主义者，是一些准精英，他们的利益同他们所鼓动加以反对的外国统治者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受到外国统治者的保护。为了强调这一事实，重要的是应该弄清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的主张属于什么性质。尽管他们自称以"人民"的名义讲话，然而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实际上，他们力图加以调和的是殖民制度本身的内部矛盾，目的是保护和扩大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又不打乱整个制度；因此，他们主张实行宪政，并承认英国殖民统治的好处。除了泛非主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代议制机构，来保护他们的社会-经济利益，增加他们在殖民地社会中的机会。⑬

1920年3月11日至29日，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在阿克拉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来自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在非洲、伦敦、一直到遥远的西印度群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⑭包括了大会决议的"恭顺的请愿书"宣称其成员"对国王陛下的君权和本人真正的忠诚和热爱"。他们建议不是以摧毁而是以修改现存政府结构为前提；鼓吹的宪政改革包括改组西非立法委员会，以便使一半成员由英王指定，另一半由人民选举。此外，由部分选举产生的各议会控制税收。他们谴责只任命欧洲人担任高级官职的僵硬的殖民政策。他们要求设立市政机构；根据1872年E. W. 布莱登在塞拉利昂总督约翰·波普·亨尼西的支持下提出的方针，建立一所西非大学。

635

他们对战后实行的种种财政经济控制以及外国公司日益增长的权力表示不满。令人感兴趣的是，大会在失望之余，受商人们的影响，以及贾维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通过佩特里亚克·J. G. 坎贝尔牧师施加的影响，作出决议：

> 本会议认为在英属西非各附属国，贸易竞争应不受限制，因此，它对棕榈仁出口税法令的通过表示极大的不满……鉴于合法的非洲商人和发货人在取得英国货轮舱位方面迄今遇到的困难，本会议欢迎海运方面的竞争，并特别提到"黑星航运公司"。

大会还建议进行司法改革，特别是建立一所西非上诉法院。大会认识到"新闻在民族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决定建立一个西非新闻联合会，一个由有经验的报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将研究如何更好地协调英语西非新闻界的新闻政策。大会还建议出版一份

---

⑫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章程。又见《英属西非非洲人大会决议》，阿克拉，1920年，第9页。

⑬ 见E. J.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4年，第176-177页；和M. 基尔森（Kilson）的一篇十分有用的文章，1958年。

⑭ 《黄金海岸时报》，1931年9月15日，第11页；《西非民族》，1931年4月9日。

称为《英属西非国民评论》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正式机关刊物，由凯瑟利·海福德任主编，由“国民大会创立基金”提供资金。

对卫生和医疗改革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塞拉利昂的H. C. 班科尔-布赖特医生还宣读了技术性极强的论文。代表们还讨论了种族居住隔离和政府服务设施中非洲医生的地位问题。对长期存在而且十分重要的土地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大会尖锐地宣称："本会议认为，在英属西非人民的土地方面，托管原则已实行得过分了，因此，宣布普通英属西非人完全有能力支配和照顾他们自己在土地上的利益是恰当的。"

会议谴责欧洲列强所享有的不考虑或不顾非洲人民的意愿而相互交换、瓜分非洲国家的权力，宣称这等于是变相的奴隶制。会议特别指责英、法两国政府瓜分多哥，以及在没有征求和考虑有关人民意愿的情况下把喀麦隆交给法国政府的行为，并恭敬地要求国王陛下政府作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使 4 个英属西非殖民地中的任何一个的完整受到破坏的行为。最后，会议决定成立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并决心向伦敦提出自己的观点。 636

一个有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代表参加的代表团于 1920 年前往伦敦，请求英王陛下政府同意在 4 个殖民地成立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见图片 25.2)。代表团由黄金海岸的凯瑟利·海福德率领。代表团还向各个议会派别和人道主义组织发出呼吁。它得到利物浦商会、《西非》杂志编辑艾伯特·卡特赖特和一些有影响的社会人士的支持。但是，由于休·克利福德爵士（尼日利亚总督）、戈登·古吉斯伯格（黄金海岸总督）、以及以纳纳·奥弗里·阿塔阁下为首的一批黄金海岸酋长的反对，特别是由于米尔纳子爵担任国务大臣期间殖民部持反对态度，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的请愿遭到了拒绝，主要的理由是西非国民大会的领导集团并不代表 4 个西非领地的大多数人民。

大会后来又在弗里敦（1923 年 1 月至 2 月）、巴瑟斯特（1925 年 12 月至 1926 年 1 月），和拉各斯(1930 年)举行过会议，然而，该运动的宣传性政治活动大多数是由在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成立的各领地委员会进行的。得到弗里敦社会精英全力支持的弗里敦会议批准了该运动的章程，规定了主席、总书记、执行委员会、财务书记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能。弗里敦会议还建议为该运动创办一份名为《英属西非评论》的杂志，报道各个领地支部的所有活动。以塞康第（黄金海岸）为活动基地的总书记将接受各领地委员会书记每季度送来的报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弗里敦会议上批准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章程还谈到西非经济合作，敦促国民大会各支部就在经济上开发西非的方法和手段，对舆论特别是对非洲的商人和企业家进行教育。

1925 年 12 月 24 日至 1926 年 1 月 10 日举行的巴瑟斯特会议，回顾了 1920 年以来地方委员会就建立选举代议制提出的请愿遭到拒绝的情况，作出决议说“能够就明确有效地表达公众舆论做出规定的宪法是最好的宪法”，在冈比亚殖民地完全实行选举代议制的时刻已经来到，最后，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的各分会，应该严肃地考虑成立英属西非联邦的问题，该联邦将设有一名总督，并在适当的时候请求英王陛下政府对此进行深入而同情的考虑。 638

巴瑟斯特会议还主张建立国民学校，在所有城市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在农村地区进

637



图片 25.2 1920 年访问伦敦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代表团成员：(从左向右)，就坐者：H. C. 班科尔·布赖特医生(塞拉利昂)，T. 赫顿·米尔斯(黄金海岸)，奥鲁瓦酋长(尼日利亚)，J. E. 凯瑟利·海福德(黄金海岸)，H. 范·海因(黄金海岸)，站立者：J. 埃杰顿·辛格尔(尼日利亚)，H. M. 琼斯(冈比亚)，赫伯特·麦考利(尼日利亚)，T. M. 奥鲁瓦(尼日利亚)，F. W. 达夫(塞拉利昂)，E. F. 斯莫尔(冈比亚)

行工业和农业教育，建立农业银行和合作社，争取西非的"商业和经济独立"，以及成立西非上诉法院和任命非洲人担任司法机关中比较高级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西非国民大会冈比亚分会的冈比亚妇女附属委员会参加了巴瑟斯特会议的讨论。在赫伯特·麦考利的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的支持下和J. C. 齐泽、W. B. 尤巴牧师和E. M. E. 阿格贝比等拉各斯分会积极分子的努力下，第4次会议最后于1930年在拉各斯举行。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取得了什么成就呢？尽管它的活动在整个20年代一直继续进行，但主要的成就是1923年在尼日利亚、1924年在塞拉利昂、1925年在黄金海岸实行了新宪法，这些宪法承认了选举代议制的原则。过去一般认为这一变化是当时的尼日利亚总督休·克利福德爵士主动促成的，⑮但是现在，本作者已经确凿地证实，作出这一让步是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各分会不断对各自的殖民地行政当局施加压力的结果。⑯英属西非国民大会还在英属西非的政治领导人中间成功地培养起一种团结的和具有共同政治命运的感情。除了这些以外，它没能取得经济独立和4个英属殖民地的统一，也没能使殖民制度有任何改善或者削弱。相反，到30年代，殖民主义的地位比20年代更形巩固。

两次大战之间农村的政治或农村群众的民族主义

在青年运动、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和工会这些问题上，我们探讨的一直是在原英属西非的城市中、由受过教育和从事各种专业的社会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活动。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对西非其他国家的进一步研究将证实或者否定或者修改这些结论）非洲的民族主义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地区，在农村地区也同样是存在的；在各个大酋长管区、州和村社，主角一方面是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平民与农民，另一方面是传统的统治者。后者有时同他们统治下的人们合作反对殖民制度，有时又被统治下的人们攻击为殖民制度的代理人。这一问题的另一个仍然没有弄清楚的方面是，农村的政治活动同城市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联系，两者是怎样或者是否相互影响。 639

让我根据迄今在加纳进行的有限研究⑰得出的结果来探讨这一问题。在黄金海岸，如同西非的其他英国殖民地一样，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特征是农村地区通过实施一系列法令和法律已经建立了间接统治，且已得到巩固。这些法令和法律包括1910年的土著人司法权修正法令，1925年的古吉斯伯格宪法，1927年的土著人行政管理法令和1931年的土著人行政岁收法案。所有这些措施赋予传统统治者以前所未有的征税和判处法院罚款的权力，根据R. L. 斯通的看法，通过这些法律是"力图使酋长成为（殖民）政府机器的一个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繁荣阶段与衰退和通货膨胀阶段交替出现，后者发生于1915至1917年、1929至1930年和30年代的后半段。在这个时期，可可经营扩展到农村地区，特别是阿古阿本和阿肯阿布亚夸等地，从面出现了越来越多

⑮ 见J. A. 兰利，1973年，第4章。

⑯ 同上，第243-245页。

⑰ 见R. 阿多-费宁（Addo-Fening），1975年；J. 西门森（Simensen），1975 a；及R. L. 斯通（Stone），1975年。

年轻富裕的农民和进行长途贩运的商人。在社会方面，这一时期初级教育扩大到农村，培养出来的人有一些流入城市，也有一些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或做小买卖。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这些变化，乡下人开始要求政治地位上的相应变化，特别是在州和省的地方议会中取得代表权，而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法令，这一要求一直无法实现。因此，农村群众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些机构中取得代表权，最重要的是限制传统统治者和各县地方长官越来越大的权力，取消或削减强加给他们的某些罚款和税金。

最近在加纳进行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农村地区普遍利用两种主要工具：一种是阿萨福（asafo）这一传统工具——讲阿肯语的平民为了军事和社会目标结成的不受传统统治者或政治精英控制的永久性组织。另一种则是一些新成立的团体，如分别于1910年和1928年成立的可可种植者协会和黄金海岸可可种植者联合会。这些团体采取的办法是请愿和拒售可可。农村地区出现的阿萨福中最为有趣的是夸胡阿萨福。[18]

640 1915年，由夸胡各地的平民组成的夸胡阿萨福在阿巴蒂菲集会，把夸胡的阿曼赫尼召到会上，迫使他签署了他们准备好的一份文件，其中包括有关“管理本州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规定。1917年，这份文件得到夸胡州委员会的正式批准，后来被称为“马格纳卡塔”（大宪章）。

在这份文件中，减少了传统统治者征收的税款和罚款，制定了课税和罚款的条例。全夸胡委员会也将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酋长和平民的代议制机构，不出席者将受到罚款的处罚。更为有趣、涉及面更广的是有关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些规定。食品贸易将集中于某些城镇，将规定一个有关市场价格和交易收费的详细清单，禁止从夸胡地区出口鱼和猎获的野味，此外还做出了有关婚姻、家庭对债务的义务、葬礼、酋长与人通奸等事项的规定。正如J. 西门森所说的，“这个宪章可能是从黄金海岸殖民统治早期流传至今的最详细的文件，它表明平民试图限制传统上层人物的权力，并在司法和立法领域中更为有效地施加自己的影响。”[19]

农村地区的平民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废黜他们的传统统治者，这成了两次大战之间时期黄金海岸农村政治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从1910年到1944年，仅在阿肯阿布亚夸一地，就有至少33起废黜分区酋长的事件。提出的指控通常从滥用权力、不适当地出卖土地、横征暴敛，一直到殖民当局强加的强迫劳动等等。

所有这些废黜事件中最有趣、最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932年。当时，阿肯阿布亚夸的所有阿萨福团联合起来要罢免本州所有主要分区的酋长，并继续把废黜的矛头指向阿曼赫尼本人，即纳纳·奥弗里·阿塔阁下。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阿布亚夸州委员会批准实施殖民当局建议的赋予该委员会向属下征税权力的土著人行政岁收措施，加速了阿萨福行动的爆发。正如J. 西门森指出的，向阿曼赫尼提出的指控表明，“平民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许多麻烦是由于酋长们正在被纳入殖民政府的行政机构，从而不再受到人民的控制这一事实所造成的”。[20]因此，阿萨福的行动，既是针对传统统治者的，也是针

[18] J. 西门森，1974年和1975b。
[19] 同上，1975a，第37至38页。
[20] 同上，1974年。

对殖民行政当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只是由于殖民统治者及时干预才挽救了奥弗里·阿塔本人，尽管他对某些要求作出让步，例如阿肯阿布亚夸学者联合会的 3 名成员在 641 1933 年被接纳进入州委员会。

农村群众采取的另一手段是拒售可可。这样，1921 至 1922 年，1930 至 1931 年，以及 1937 至 1938 年，可可种植农在两个受过教育的人约翰·克瓦米·阿尤和温尼福里德·泰特-安萨的领导下，拒绝出售可可，直到收购价格提高。[21] 1937 至 1938 年的拒售活动，得到了包括阿肯阿布亚夸的大酋长纳纳·奥弗里·阿塔阁下在内的一些传统统治者的支持，规模特别广泛，被霍普金斯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农村不满情绪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表现。"在阿肯阿布亚夸、阿古阿本和阿肯斯韦德鲁等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农村活动。

根据迄今进行的研究，城市和农村的运动之间似乎没有正式的联系，尽管有一些个人基础上的接触，如J. B. 丹凯同阿肯阿布亚夸的平民之间的接触，海岸角的一名民族主义者律师科比纳·塞基伊同登基拉和安扬阿巴萨等地的平民之间的接触。[22]

从黄金海岸的情况来看，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政治和民族主义活动看来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地区，在农村地区也明显地存在，参加者有平民和农民。毫无疑问，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同样将证实迄今在加纳得出的结论。

英属西非民族主义活动的后果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属西非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人民和殖民地政府只产生了十分有限的影响？首先和最重要的答案是，不论是英属西非国民大会还是青年运动，都从未得到广泛的群众响应，而且在城市和农村的政治活动之间也没有任何意义重大的联系。这样，殖民统治者就可以借口那些领导人并不代表人民而将他们一笔勾销，实际上，休·克利福德爵士和殖民部都采用了这一战略。克利福德曾把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的领导集团说成是"一群自封的非洲绅士，他们徒劳而又错误地追求在非洲建立既不适宜也无法进行工作的宪法和政府模式"。

第二，不管说得多么慷慨激昂，不论是英属西非国民大会还是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都并不准备使用任何激进的手段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人们曾经认为，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一种崭新形式的激进政治活动在西非发展起来了。但是事情很明显，从各种民族主义集团和协会的目标和手段看，尽管出现了经济萧条，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中却并没 642 有产生这种革命性的发展。如前所述，应该把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民族主义政治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其间，酋长和知识分子都参加了鼓动性的政治活动）和某些 1945 年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成长时期。无疑，在 30 年代中期，一度有过某种激进主义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这些运动是温和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殖民地体制范围内从事它

---

[21] A. G. 霍普金斯（Hopkins），1966 b。

[22] R. 斯通，1975 年。

们的政治活动的。政治独立肯定不包括在他们的纲领之中。

第三，这些运动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这极大地妨碍了他们的活动。在所有的殖民地中，保守分子与温和分子之间，以及他们两者同国王之类原有的传统权贵之间都出现了冲突。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同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的领导人之间，以及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同以纳纳·奥弗里·阿塔阁下为首的黄金海岸传统统治者之间发生的实际上就是这类冲突。这些冲突极大地削弱了该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拉各斯分会内部的不和与个人冲突，以及基托伊·阿贾萨的《尼日利亚先锋报》和拉各斯保守派的反对，英属西非国民大会第4次会议直到1930年才得以在拉各斯召开。第四，1923年到1925年之间获准实施的有限的选举代议权，对民族主义运动似乎起了政治上的麻醉作用。最后，凯瑟利·海福德1930年去世，毫无疑问给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中英属西非，特别是黄金海岸的民族主义活动以最后的致命打击。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到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结束时，英属西非的政治活动和民族主义正处于最低潮，后来发生的两大事件才使之恢复了活力，这就是1935年的埃塞俄比亚危机和1939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这两者的论述都属于本书最后一卷的范围。

法语西非的政治活动，1919-1935年

我们对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法属西非殖民地非洲人政治活动的知识仍然存在一些空白。但是，从目前可以得到的颇为有限的证据来看，似乎那一地区在那一时期相对来说缺少政治活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看来是由于法国对非洲人的政治活动和组织采取更加限制的态度，以及在法属西非缺少能与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那些非洲人报纸相比的生气勃勃的非洲人新闻事业。然而，同英属西非的活动一样，法属西非的活动也有其地方性和国际性两个方面。的确，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23] 1924至1936年间，许多法语非洲的政治活动发生于巴黎。但是，由于这些政治团体大多数是激进的，并同激进的法国政党和工会站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反殖民主义宣传对法国当局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些团体包括由达荷美的民族主义者律师科乔·图瓦卢·乌埃努亲王1924年在巴黎创建的捍卫黑色人种世界联盟。这一运动针对当时达荷美（今贝宁）和整个法国殖民地的状况进行宣传活动，并同贾维在美国组织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有紧密联系。另一个团体是捍卫黑种人委员会，它接替了乌埃努的联盟，是由塞内加尔的一个共产主义者拉明·桑戈尔领导的，直到1927年桑戈尔去世。这时该委员会在另一个法语西非马克思主义者、法属苏丹的蒂马奥·加兰-库亚泰的领导下，改名为捍卫黑种人联盟。这些团体虽然令人感兴趣，但它们没有在西非活动，尽管下文还要谈到，它们的某些反殖民主义出版物，以及它们在法国的左翼同盟者的出版物，的确渗入到某些法属西非殖民地。

643

[23] 对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论述见J. A. 兰利，1973年，第286-325页。

同样，法国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如人权同盟（类似英国反奴隶制协会）在法国的某些殖民地有自己的分支机构，但由于当地很少或者没有有组织的非洲人政治活动，这些机构被非洲人用来当作对殖民当局提出抗议的工具。

塞内加尔的政治和民族主义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有非洲人政治活动的法属西非殖民地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是塞内加尔和达荷美。在塞内加尔，从 19 世纪起，4 个市镇就选出代表参加法国议会众议院。尽管城市地区的非洲人根据 1833 年的法令被视为公民，但代表他们的是混血人即克里奥尔人议员，直到 1914 年，布莱塞·迪阿格内才成为塞内加尔的第一个非洲黑人议员。迪阿格内从 1914 到 1934 年在法国众议院中代表塞内加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非洲军队的高级专员，曾担任众议院殖民地委员会主席，并为泛非大会 1919 年在巴黎召开作出了贡献，尽管后来他同这一运动的美国黑人领导人发生了争吵。[24]

迪阿格内还是第一个创建政治组织的塞内加尔政治家。这个组织叫共和社会党，是他在 1914 年为联合达喀尔和圣路易的各个部族组织而建立的。1914 年，迪阿格内在离开塞内加尔差不多 20 年后，以候选人的资格出现。当时，更多的塞内加尔人正在进入城市，种植花生的经济也在发展。在此同时，由于传统酋长在政治上失去了地位，马拉布特（伊斯兰教派首领）正在农村地区成为一支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城市里年轻的塞内加尔职员和学校教师也正变得不满于现状。后面这一批人来源于“青年塞内加尔人”，这个组织讨论政治和文化，要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薪金，以及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后来，这个组织改名为青年塞内加尔人党，并有自己的刊物《民主报》。这个党参加了 1914 年的选举，不过无法提出一名候选人。 644

1914 年，布莱塞·迪阿格内在城市地区争取到了大马拉布特的支持，以及青年塞内加尔人党和某些自由派法国人在政治上的赞助。他虽然属于塞雷尔部族，但却博得了达喀尔和圣路易的其他部族，如莱布人和沃洛夫人的欢迎。实际上，他在进行竞选时，曾广泛使用沃洛夫语。迪阿格内没有求助于种族问题，相反，他谈论的是塞内加尔非洲人的政治代表权，非洲人在政治上的觉醒，以及各殖民地“合理的演变，而不是残酷的革命”这样一些问题。[25]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迪阿格内一直强调在 4 个市镇中维护非洲人的公民权和选举权的重要性，而他的欧洲人和克里奥尔人对手（他们从 1900 年起一直控制着 4 个市镇的政治，一直把选举席位看成是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封地）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个问题，并把迪阿格内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候选人。事实上，就连某些非洲人，特别是莱布族，一开始也反对迪阿格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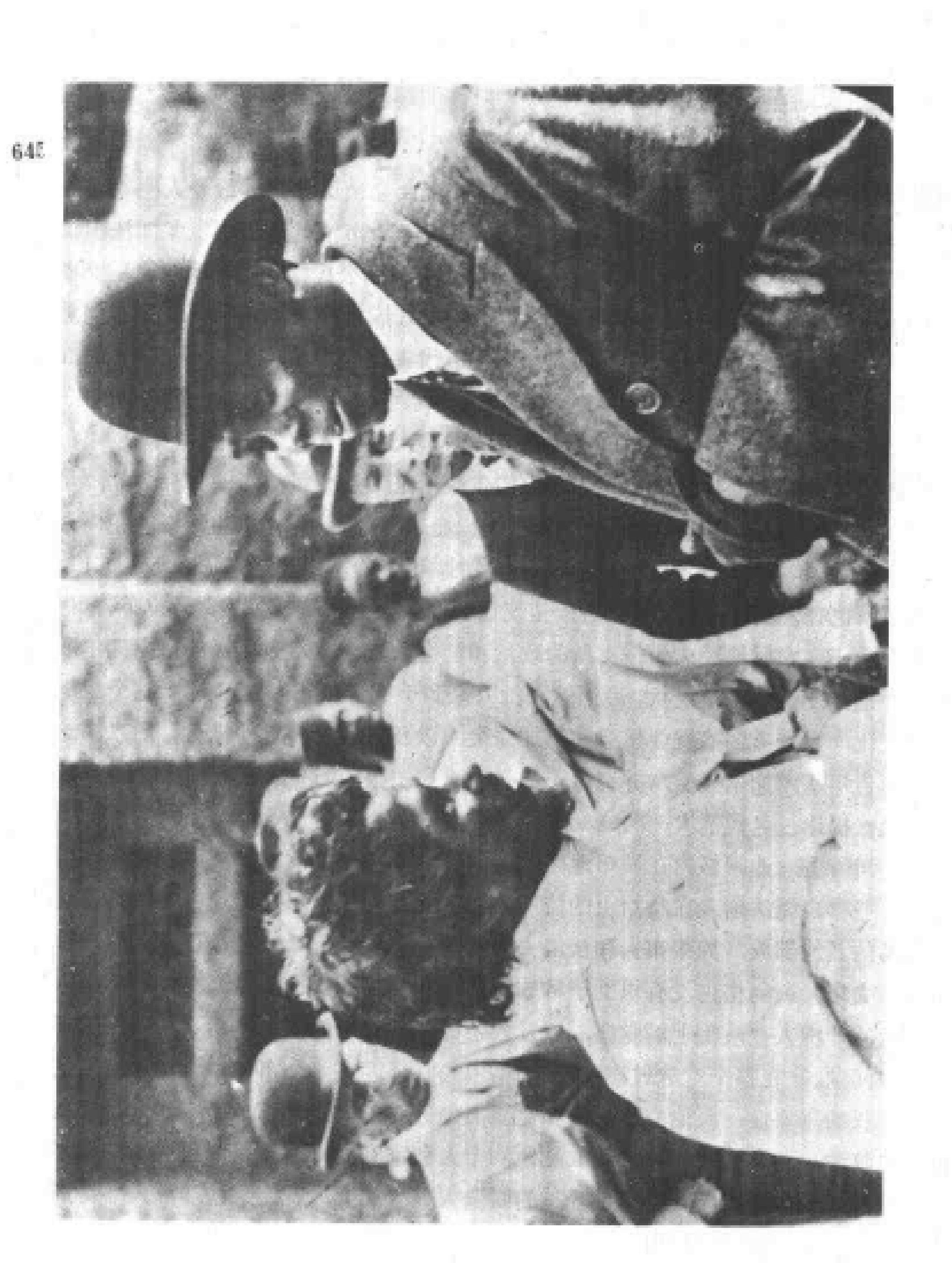
迪阿格内不仅在竞选中主张争取非洲人的选举权，他还鼓吹正式承认古兰经的法律

---

[24] 关于 1919 至 1940 年间法国政治同塞内加尔政治相互作用的一般背景，以及布莱塞·迪阿格内生平事迹的详细情况，见G. W. 约翰逊（Johnson），1966 年；T. 霍奇金（Hodgkin），1954 年；M. 克劳德，1962 年；M. 布莱格（Boulegue），1965 年。

[25] 转引自G. W. 约翰逊，1966 年，第 246 页。

645



图片 25.3　塞内加尔第一个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的布莱塞·迪阿格内(1872-1934年)于1914年5月选举后在达喀尔向他的选民致意

和习惯法。他还要求在商业方面给非洲人更多的让步：建立一个殖民地委员会来管理法属殖民地的财政；在达喀尔建立一所卫生学校；获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对法国在军事征服中从莱布人手中夺走的土地给予赔偿。主要由于他精力充沛的竞选活动，不记名投票，以及农村地区穆斯林组织在政治上的支持，迪阿格内在1914年的选举中获胜，在1914年7月，成了第一个进入法国众议院的非洲人议员。他竞选获胜本身，就是在非洲人参与和组织塞内加尔政治方面的一次革命。非洲选民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不再是殖民者和混血人的投票工具。

布莱塞·迪阿格内并没有向法国争取独立，他鼓吹平等和尊严，以及由塞内加尔非洲人掌管行政和市政机构。直到1934年去世，他一直忠于这个渐进式的纲领。继承他的姆加兰杜·迪乌夫也没有偏离这一方针，虽然前面提到的激进知识分子把20年代和30年代的布莱塞·迪阿格内看成是保守派，甚至是反非洲分子。尽管如此，他在政治上唤醒了塞内加尔，确实是为40年代和50年代的塞内加尔政治家和民族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646

达荷美的政治和民族主义

在达荷美，除了通常是由非洲人通过人权同盟当地支部这个或许是唯一得到允许的"政治"讲坛提出抗议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各个宗教派别内部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同关于酋长职位和继承权的争执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事实上，这是1923年波多诺伏事件的部分起因。但是，非洲的知识分子由于受过教育和已经社会化，并不一定参与部落酋长的政治活动或者按部族界线分成派系。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达荷美政治活动家是路易·汉坎林，他把参与部落酋长政治（他支持波多诺伏穆斯林的索格尼格布教派、反对约鲁巴穆斯林的何塞·帕赖伊索教派）同反对殖民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26] 汉坎林曾在塞内加尔受教育，在达荷美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13年回到塞内加尔。他就达荷美的殖民地管理不善在法国和塞内加尔的报纸上撰写批评文章，并在布莱塞·迪阿格内1914年进行竞选时协助他。通过布莱塞·迪阿格内，汉坎林在巴黎找到了工作，但他在那里卷入了激进政治组织，于1921年被遣送回达荷美。在巴黎时，他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达荷美信使报》，谴责达荷美的殖民主义弊政。这份报纸后来被殖民地联合会接管，该联合会激进的亲共刊物《巴黎》一度曾由越南革命家胡志明主编。通过这些激进组织，图瓦卢·乌埃努的《贱民联盟》和贾维的《黑人世界》开始传入达荷美。

回到达荷美后，汉坎林恢复了当地的人权同盟和法国-穆斯林委员会的分支机构。通过这些分支机构里的同事，法国和美国的激进的和共产主义的报纸传到达荷美知识分子手中，请愿书和对当地行政当局的不满传到了巴黎。在加蓬也是如此，1919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类似的组织。劳伦特·安特齐韦，一个曾在塞内加尔学习的加蓬青年，1925年从法国回国，恢复了人权同盟在利伯维尔的分支机构。他在法国时曾编辑出版两种杂

[26] J. F. A. 阿贾伊（Ajayi）和M. 克劳德（Crowder）（编），1974年，第511；565-567页。M. 克劳德、G. W. 约翰逊的文章。

647 志：《加蓬回声》和《非洲之声》。

1923年2月至3月，部分地由于税收增加以及1919年萧条和1920至1921年萧条之后棕榈仁价格下降，再加上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和金属货币短缺，私人企业中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汉坎林在法国-穆斯林委员会和人权同盟中的朋友也组织召开了群众集会。[27]为了驱散这些集会，殖民当局不得不调来军队，而非洲人的反应则是开展消极抵抗运动，从2月13日一直延续到3月初。在怀达也发生了罢工。有的酋长甚至要求其他酋长抵制新的税收。殖民当局采取的措施是逮捕抵抗运动领袖，从多哥和科特迪瓦调来更多的军队，并宣布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一直延续到1923年6月。由于抗议运动的几乎所有领袖，包括汉坎林，都被逮捕和流放，达荷美的民族主义活动停止了。随后到来的是一段政治沉寂期，同其他法属西非领地的情况一样。

保守的和激进的法属西非民族主义者（在这一时期，保守派肯定占多数）的主要分歧在于：布莱塞·迪阿格内领导的保守派满足于"象征性的代表权"和法国殖民地臣民的逐步演变，由挑选出来的"文明分子"代表非洲居民；而库亚泰、桑戈尔、乌埃努和盼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个殖民地能够发生巨变的少数激进派非洲知识分子，则主张通过可以在法国或殖民地进行活动的激进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善于表达自己的主张的政治组织，使非洲人的代表权能有大幅度增加。而后一批人还鼓吹争取在殖民地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在法兰西帝国内部实现某种自治的可能性。直到激进派遭到布莱塞·迪阿格内和法国当局的严重挫败后，他们所主张的激进主义才把自治和从法国手中取得独立作为一个目标。这显然不是法属西非总的政治演变的特征，因此，这种激进主义的寿命不长，而且一直到1945年以后的宪政变革，法属西非的殖民地政治格局始终遵循着布莱塞·迪阿格内和姆加兰杜·迪乌夫的方式和思想，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一时期，除了1923年在波多诺伏发生的示威和骚动——那是由于穆斯林同传统集团中得到政府支持的派别相互间的竞争、征收捐税和棕榈仁贸易恶化造成的，并被一群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所利用——之外，按照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或麦考利的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的路线而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几乎没有在法属西非出现过。

（艾平　庄红译）

---

[27] J. A. 巴拉尔（Ballard），1965年；R. 布埃尔（Buell），1928年，第2卷，第16-17页。

26 东非的政治和民族主义 1919-1935年

E. S. 阿蒂埃诺-奥迪安博

斯瓦希里语的"希阿萨"(siasa)一词，可以用来概括本章题目中两个关键的词。"希阿萨"既包括反抗和不满，也包括宣传鼓动和采取行动。它既包括那些充满活力的个人自发采取的行动，也包括有组织的团体所进行的活动。从事"希阿萨"的人被称为"瓦纳希阿萨"(wanasiasa，单数为姆瓦纳希阿萨〔mwanasiasa〕)。英国殖民当局把"希阿萨"看成是"煽动"，"瓦纳希阿萨"是"煽动者"。但是，除了英国人这种显然过于简单的理解之外，还在各种规模不同的组织和兴趣不同的领域中存在着重要的不同看法。最近的学术研究① 颇为有益地指出，不同层次的人对"瓦纳希阿萨"关心的角度各不相同，因此所注意的也是其从事活动的不同舞台。这种分类法，与早先约翰·朗斯代尔从编史学角度提出的说法相比，是一个改进。② 朗斯代尔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东非政治基本上是以地方为中心的活动。因为，如果说政治的基础是地方上的群众和群众中某些特定人的不满情绪，那么他们表达意见的场合就会不同：从当地酋长的"巴拉扎"(baraza)到伦敦殖民地国务大臣的文件卷宗；从得到批准的政治集会到在山头上召开的对抗性群众大会和森林中的武装战争演习。因此，同一个地方性问题，可以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层次提出，采取什么行动，取决于阐明这个问题的人的看法，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压力下，哪一层次最容易引起反响。因此，"希阿萨"代表着某一特定地点某一特定时刻对殖民主义邪恶的一种集体意识。这个专门用语可以同时包括各氏族、各民族和各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因此，本章所论述的政治活动，是由具体的集体意识产生的活动。它们是群众性的活动。每个运动都会有领导者，但运动是群众开展的，领导是先锋。因此，本章下文的设想是：每个运动和每个领导人背后都聚集着群众。③ 而根据表达意见的层次和场合，其中某些活动后来可以纳入民族主义行动的范畴。

648

650

① D. A. 洛(Low)和J. M. 朗斯代尔(Lonsdale)，见D. A. 洛和A. 史密斯(Smith)(编)，1976年，第40-48页。

② J. M. 朗斯代尔，1968 a。

③ 同上。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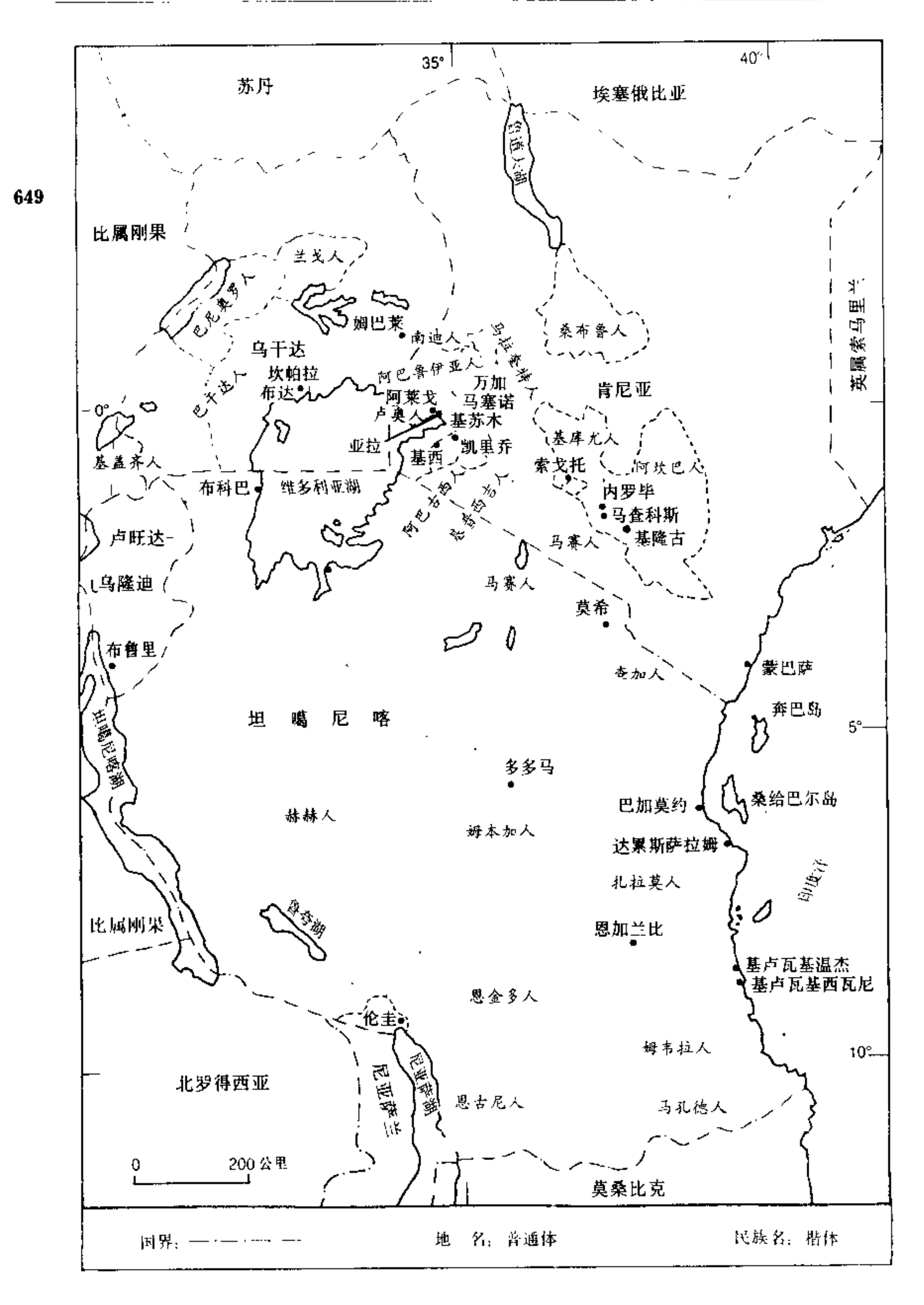


插图 26.1 东非的政治和民族主义，1919-1935 年

宗教抗议运动

宗教是东非人从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初期就开始使用的一种武器。进行抵抗要求进行动员，而在很多地区，宗教领导人民起来完成这一任务。最初的抵抗时期也是先知的时代。非洲人虽然在战场上的实际战争中战败了，但抵抗的情绪仍然深深地埋在许多人心中。在南迪，传统领袖"奥戈伊约特"（Orkoiyot）的追随者仍在活动，保持着警惕。很长时间里，这个先知式的领袖多次把南迪人动员起来抵抗殖民主义的暴虐行为。④同样，肯尼亚的殖民地档案中也充满着关于巫医和"莱邦"（laibon）在马拉奎特、凯里乔和桑布鲁制造麻烦的记载。在乌干达西部，基盖齐的"尼亚宾吉"膜拜活动的追随者那些年里一直受到监视。这样，这些传统的宗教抵抗运动就成为将前一时代的抵抗运动延续下来的一种因素。但是，从 20 世纪头 10 年进入第二个 10 年后，殖民主义的力量似乎更强大了，的确，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最坏的魔鬼已来到了尘世。殖民力量稳住阵脚，重新改组或者取消了固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把他们自己的体制强加给各个村社。看起来，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为了起来反对具有多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需要在精神上重新振作起来。这种精神上的需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满足的，第一，出现了新一代的非洲先知。第二，建立了一些同欧洲基督教会并存的非洲独立教会，以此来为许多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但却难以容忍在传教士的恩赐下的生活的非洲人提供"一个感到安适的地方"。⑤

尽管现有历史著作没有充分论及这方面的情况，但那些非洲先知事实上采取了相当多的主动行动，起来缓解殖民主义带给社会组织的重要压力。这些宗教革新是一些抗议运动。这类活动从本世纪第二个 10 年开始，在整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一直延续下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更多的类似活动出现。它们代表着什么，可以从对肯尼亚的坎巴人和阿巴古西人的两项研究中看出。

坎巴人从 19 世纪初就同各种殖民势力有接触，当时，坎巴商人往返于沿海一带。⑥ 19 世纪 40 年代，传教士接踵而至，随后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更加强劲有力的基督教化活动。但是，基督教同伊斯兰教一样，并不能打动坎巴群众的心。真正侵入坎巴社会成为一种有形力量的是作为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殖民主义。在本世纪最初的 20 年里，殖民当局依靠他们新任命的那些不尊重传统权威的酋长，以税收、土地和劳工等形式大肆掠夺坎巴人的资源，殖民地的这种形势在坎巴群众中广泛造成遭受掠夺和遭遇挫折的感觉。前资本主义式的解决冲突的社会机构，达不到约束这些酋长和他们的治安人员的目的。随着群众越来越感到失望，于是他们求助于宗教运动，并把宗教运动作为抗议的工具。这些运动以先知的形式出现，存在于 1910 年到 1922 年之间。1901 至 1911 年间，在马查科斯县出现了一个叫做"卡桑比"（Kathambi）或"恩加伊"（Ngai）的广泛流传的膜拜对象，许诺一个千年至福的太平盛世就要到来。有一段时间这一膜拜运动的领

④ P. K. 阿拉普·马古特（Magut），见B. G. 麦金托什（McIntosh）（编），1969 年。

⑤ F. B. 韦尔勃恩（Welbourn）和B. A. 奥戈特（Ogot），1966 年。

⑥ J. F. 芒罗（Munro），1975 年。

袖使英国当局感到恐惧，于是作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应。但是，人们认为改革得还不够，尽管千年至福运动的浪潮已经过去，坎巴社会中仍然有一些人不愿同殖民统治的形势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强迫征募非洲人参加运输队，加上殖民当局处处都无法处理战后坎巴群众面临的众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响应迎接千年至福以解决社会中的紧张状况的响亮号召。

随着这样的号召而崭露头角的是恩东耶·瓦·考提。1922 年头几个月，他开始在马查科斯县向基隆古人宣讲先知的预言。随着 1920 至 1921 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在当地爆发，作为一种反响，恩东耶的运动得到发展。由于这场经济危机，许多坎巴人发现，越来越难以弄到足够的钱交税。同时，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而税收负担却在 1920 年从每人 3 卢比增加到 8 卢比。1920 至 1921 年的币制改革，先是把卢比变为弗罗林纸币，然后又变成硬币先令，使人们在现金交易中遭受损失。更糟糕的是，一场旱灾使坎巴人这些年的生产大幅度下降，又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吸收剩余男性劳动力。正是在这种贫困的形势下，恩东耶·瓦·考提预言千年至福的太平盛世和救世主即将降临，可以解决现余匮乏。他自称是先知，能够预言何时降雨。他请妇女到他家里，按宗教舞步（基卢米）跳舞。他还说，神，即恩加伊在他的梦中出现，宣布他恩东耶已被选中在 652 一个将要降临尘世的新时代领导人民。在这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欧洲人将被赶走，随后，人间将像殖民主义时期来到之前一样美好，有足够的水，没有税。当恩东耶按神的旨意建好祭坛后，神将给他送来书籍、衣服、步枪和一条电报线路。“这条电报线路”，恩东耶预言道：“将提供我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手段。只要神一把这些东西送来，我就要掌管整个国家。”但是他没有能掌管国家，因为祭坛还没建好，县里的地方长官就逮捕了他。把他驱逐到肯尼亚沿海的西鲁地方去了。恩东耶再也没能回来，他同以前和后来的许多活动分子一样，死于流放之中。由于他的离开，这场运动也就瓦解。这表明这次运动同其他运动一样，动员者的作用是关键的。

与恩东耶·瓦·考提的预言活动同时出现的另一运动，对“蒙博”的膜拜，则不那么容易镇压下去，它延续的时间要比恩东耶长。这一运动，植根于卢奥人和阿巴古西人对殖民当局的共同仇恨。这种仇恨可以追溯到英国人 1904 和 1908 年对阿巴古西人和 1908 至 1920 年对阿莱戈的卢奥人进行的军事占领战争。⑦ 由于英国人强迫这些人为修筑道路和殖民者农场主提供强制性劳动，他们的仇恨进一步加深了。此外，还有招人痛恨的茅屋税，对于那些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人来说，这一负担将外沉重。传教士的家长作风对这种不满更是火上浇他。同乌坎巴尼人一样，阿巴古西人开始寻找能够许诺一个较好世界景象的新思想。他们在卢奥人的“蒙博”膜拜活动（一种对传统的湖神的膜拜，其影响在 19 世纪时达到顶峰）中找到了所需要的东西。这种膜拜在本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以抗拒白人存在的政治运动的形式复活了。蒙博神灵在 1913 年一次显灵中对阿莱戈地方塞杰氏族一个叫翁扬戈·邓迪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⑦ J. M. 朗斯代尔，1977 年。

我选择了你作我的代言人。离开家去告诉所有的非洲人，特别是阿莱戈的人民，从今以后我就是他们的神。我亲自选择并且信奉我的那些人将永远富足。他们的庄稼将自行生长，再也不需要劳动。我将使牛、绵羊和山羊大批地从湖里走出来，到相信我的那些人那儿去，但是所有不相信我的人、他们的家人和牛羊都要死掉。

基督教腐败不堪，它让它的信徒穿上衣服的作法也是如此。我的追随者必须让他们的头发生长，永远也不要洗。所有的欧洲人都是你们的敌人，但是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将从我们的国家消失。

同在乌坎巴尼人中间一样，预言谴责欧洲人，否定他们的生活方式。由于预言简单 653 明了，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对于传统宗教崇拜的法力的阐述同对于晚近政治现实的感受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一运动很快从夏亚县的阿莱戈发展到南尼安萨，并于 1914 年通过另一个卢奥人先知莫西·武奥德·阿乌马的传播，开始在古西人中间出现，据说这位先知“许诺能消除一切罪恶”，并预言“所有白人将很快离开基西，在那以后，当地人将和平地拥有他们的土地”。

1914 年，德国人进攻了英国设在基西镇的营地，使白人将立即离开的预言出其不意地成了现实。非洲人看到预言兑现了，于是参加了骚乱活动，劫掠了县里的殖民活动和传教活动的中心。后来的报复是残忍的，英国人镇压骚乱时，大约有 150 名阿巴古西人被杀。但是这并没有吓倒那些追随者，尽管逮捕频繁发生，领导人不出所料地遭到驱逐，他们还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连续不断地进行活动。而且在蒙博膜拜活动进一步巩固阵地的过程中，它又在古西兰同更加土生土长的“萨卡瓦”膜拜活动交织在一起。萨卡瓦是 19 世纪古西人的一个先知，阿巴古西的预言家们说他将于 1921 年年中的某个时候重新出现。一个女预言家博奈丽丽着手纠集一个组织，使人民为萨卡瓦的归来作好准备。殖民当局的反应是援用“滥用鸦片法令”打击这一运动。这并没有吓退那些追随者，他们在 1921 年和 1922 年继续传播“萨卡瓦”膜拜活动和“蒙博”膜拜活动。虽然受到殖民当局的镇压，这些运动在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在古西兰一直十分盛行。“蒙博”的信徒尽管在该县遭到迫害、驱逐和禁止，但他们继续传播预言和咏唱他们那不屈不挠的歌曲：

萨巴耶，拉埃希，萨巴耶
伍里安德，你要走了
乔治，你要走了
萨巴耶，拉埃希，萨巴耶⑧

然而众所周知，“乔治”（白人）并没有走，蒙博的王国也没有到来。但是抵抗的精神却是不能扼杀的，只是转入地下，到 50 年代又重新露头，使古西的英国殖民当局再次感到烦恼。

同样起重要作用的第二种宗教抵抗，是基督教独立教会的出现。正如我们在本书第

⑧ B. A. 奥戈特和W. R. 奥奇恩（Ochieng），见B. A. 奥戈特编，1972 a，第 173 页。

12章和第20章中论及的，某些这类教会起过反对教会中欧洲庇护者的抗议运动的作用。654 所有这类教会的目的都是超越了传教的作用，给它们为之服务的群体提供它们认为确实有益的济世良方。但是，在说明了独立教会的这种共同目标后，重要的是指出这一时期在东非出现的许多不同类型教会的性质。有些是"埃塞俄比亚"教会，正如K. 阿萨雷·奥波库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强调的是非洲人的自我完善和政治权利。另外一些则属于"锡安山"教派，强调圣灵附体，强调治病，强调预言。除此之外，各个独立教会还有不同的教义、礼仪、组织和意愿。叙述一下这些独立教会的渊源，可以最清楚地说明这些区别。

东非地区最早的非洲人独立教会，是1910年由约翰·奥瓦洛创立的诺米亚·卢奥教会。奥瓦洛原是英国圣公会传教会的追随者，后来，先是皈依伊斯兰教，继之又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在本书第7章中已经提及。[⑨] 读者可能还记得，他曾在幻觉中被带到天堂。关于那个地方，有这样的描述：

>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尘世间所有民族都希望进去，但是天使关上了门。当尘世上所有民族都聚集在天堂门外时，天使首先让犹太人进去了，第二批是阿拉伯人，在他们后面进去的是约翰·奥瓦洛、天使加百列和天使拉斐尔，他们三个是一起进去的。白种人想在他们后面进去，但是天使把门关上，把白人赶走，用脚踢他们。

奥瓦洛关于上天堂的幻觉，除了有目的地表示反对白人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不同宗教经历和背景的综合。这种综合又进一步带进了他的新教会的作法中，这个教会日益增多的追随者必须遵命施行割礼，遵守十诫，而且不准吸烟、饮啤酒或跳舞。正如奥戈特所注意到的，[⑩] 就本质而言，奥瓦洛并不拒绝外来宗教，他只是希望非洲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来接受它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守望塔教会"向中非和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南部的非洲人发出的启示，也同样令人兴奋：世界正处于最后一个时代，欧洲的大帝国和民族是撒旦的工具，历史上的教会也是一样。所有这些都将在一次最后的伟大斗争中被推翻。然后，世界将为真正的信徒所继承。这一预言在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很容易地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哈诺克·辛达诺从1917年起就在那里布道，反对殖民制度下的酋655 长、殖民地行政当局和传教士的权威。到1919年，这一运动传播到坦噶尼喀，在卡桑加、曼布韦、乌菲帕和姆波齐地区颇为流行。1923年形势发展到危机的地步，当时英国人指责这一教会诽谤传教士控制的教会，17人遭到逮捕和监禁。这并没有吓退追随者，这一宗教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继续传播。同"蒙博"膜拜活动一样，它是群众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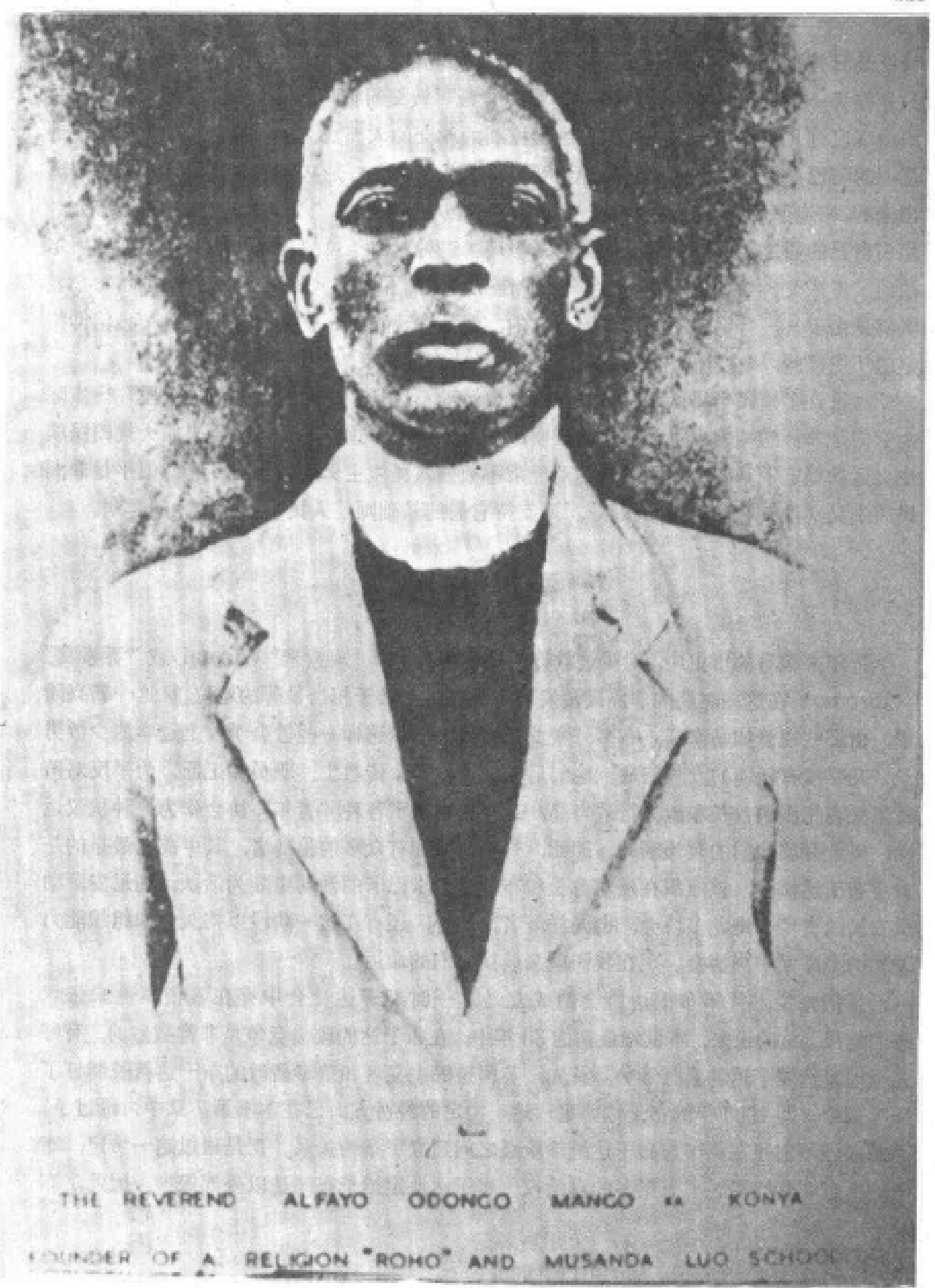
守望塔教会运动试图给殖民化的农村地区人民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通过拒绝承认酋长、传教士和英国官员的权威，为信徒建立新的村庄，这个教会的追随者企图建立他们感到安适的新社会。同诺米亚·卢奥教会一样，它试图建立完整而健康的社会，来代替被殖民主义摧毁了的社会。

但是，另有一些教会建立时，眼界要比前面所述的两种想法更为狭窄。这类运动的

⑨ 见本书第7章，又见O. 奥廷加(Odinga)，1967年，第68-69页；B. A. 奥戈特，1974 b，第262-263页。

⑩ B. A. 奥戈特，1974 b，第262-263页。

656



图片26.1 1932年在卢奥人(肯尼亚)中创立乔洛霍(圣灵)教会的阿尔法约·奥东戈·曼戈牧师

特征是只关心一个问题。例如，从30年代起在坦噶尼喀的伦圭县盛行的非洲民族教会，只是作为一个专门接纳那些因一夫多妻“背叛”教义而被传教士控制的教会革出教门，或由于已有几个妻子而未能加入传教士控制的教会的人而成立的。⑪同样，1927年在肯尼亚的阿巴卢伊亚人中间建立的迪尼亚罗霍（圣灵教会）是从公谊会非洲传教会中分离出来的。⑫迪尼亚罗霍的追随者坚持认为，一个人必须接受“圣灵的洗礼”，开诚布公，坦白自己的罪过，才能算得上纯正的基督徒。这种对“圣灵的洗礼”的强调还导致阿尔法约·奥东戈·曼戈1932年在卢奥人中建立起他的乔洛霍（圣灵）教会。⑬虽然每个教派都是由于某一特定的不满情绪而建立的，然而在建立后，就必然会根据每一种信仰特定的历史经验，“在斗争中”发展起自己一套特定的教义、礼仪和组织。

尽管许多殖民当局认为，这些宗教抗议运动不过是“一时冲动的消极手段”，⑭实际上它们是非洲精神的力量和活力的证明，并以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为后来的大规模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些运动经常不被列入民族主义的编年史，它们似乎是非洲民族主义“没有合法身份的叔叔”。而支持它们的基础则是人民，农村地区的群众。

657

青年协会

近年来编写的历史中，对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即“阿索米”(Asomi)或“乔索莫”(Josomo）在这一时期的非洲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给予相当显著的他位。⑮这一新兴阶层，由那些在诸如马塞诺、布多、索戈托和桑给巴尔这样一些教会学校上过学的少数男子（几乎没有任何妇女）组成，他们后来成了教师、传教士、职员和工匠。为了反对殖民主义者指派的酋长和地方行政当局，这些人组织了各种“青年”协会作为一种抗议运动，以此开展他们的政治活动。因此，这些协会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其中成立最早的是青年布干达协会，该组织在反对酋长和布干达的卡巴卡的活动中颇为活跃。在尼安萨动员农民的青年卡维龙多协会，也同样著名。此外，还有在这一阶段以持久力和组织能力著称的基库尤中央协会。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它们的命运。

举例来说，青年布干达协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干达社会中存在着根本性紧张状态的结果。总的说来，本世纪最初的30年中，在布干达的政治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有好几个因素造成了这种紧张形势。首先，英国殖民主义者和信奉新教的布干达酋长制订了一项法令，即1900年的布干达协定。这一协定的经济方面已在本书第7章中讨论过了，除此以外，它还在英国与布干达统治阶级之间建立了条约关系。正是通过这一协定，布干达比东非其他地区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布干达协定给予布干达以外部保护，因此，布

⑪ T. O. 兰杰（Ranger），未注明日期，第16-20页。

⑫ O. 奥廷加，1967年，第69页。

⑬ B. A. 奥戈特，见K. J. 金（King）和A. 萨利姆（Salim）编，1971年。

⑭ J. S. 科尔曼（Colemen），引自J. M. 朗斯代尔，1968 b，第12页。

⑮ A. M. 卡拉尼(Karani)，1974年；B. E. 基普科里尔(Kipkorir)，1969年；G. P. 麦格雷戈(McGregor)，1967年；I. N. 基曼博(Kimambo)和A. J. 泰穆(Temu)（编），1969年，第4章。

干达的政治活动具有内向的形式，提出的问题是一些对干达社会有特定关系和后果的问题。这一活动的内在动力是酋长。这些封建领主从协定中受益，得到了大片个人的和官方的地产，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传统氏族首领（巴塔卡bataka）、农民（巴科皮bakopi）和“青年”人的批评。既然布干达的卡巴卡是协定的最大受益者，“青年”人充满怀疑的眼睛、嘴巴和笔当然不会放过他。的确，在这个群体的人们中间出现政治不和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协定及其后果，即在社会中促成了新的社会阶级，使很多集团，如穆斯林、天主教徒、巴塔卡和巴科皮感到不满。新任命的酋长的所作所为，也有很多使人不满意的地方。在1918年以后的岁月里，他们越来越不得人心。他们是殖民地的官僚，而不是传统的领袖，为了取悦于他们的新主子，他们情愿置布干达所得到的又保护人又受人保护的关系予不顾。此外，作为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他们有时被视为对传统生活方式进行令人不快的变更和干扰的工具。例如，他们要实施保健和卫生规定，这在农民当中是不受欢迎的。那些受过西方教育而又没有被吸收进统治集团的社会精英，充分利用了这些不满情绪。 658

在这一反抗活动中带头的是青年人，[16]其中最著名的是Z. K. 森桐戈，他是一个思想清晰的小册子撰写者，把移居内罗毕的布干达人组织在一起。1919年，他创立了青年布干达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

1. 从各个方面改善乌干达；
2. 对可能处于痛苦之中的、应该得到帮助的（原文如此）干达人以帮助；
3. 确定能使我们得到并维持我们的教育的最好办法。

在他们的许多证词和文章中，这些领导人对布干达的酋长表示不满，指责他们不经陪审团审判即关押人民。他们表示不满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的：他们希望取消乌干达保护国政府对棉花贸易强加的种种限制。第三，他们提出了典型的新一代的要求：改善现有的教育设施，开办政府学校，扩大为女孩子提供的教育设施，在布干达设立高等教育机构。

如果说这是一个温和的开端的话，那么，在随后的三年里，青年布干达协会变得更加不妥协了。到1921年，它成了一个种族主义的、反亚洲人的组织。亚洲人成了那个时期经济方面不满情绪的方便的替罪羊。那年森桐戈在《乌干达先驱报》上指责亚洲人是非洲人的直接剥削者。“剥削我们，然后又把我们来之不易的钱偷偷地拿到印度去为自己谋私利的——对我们进行双重掠夺的，除了印度人还能是谁?”他得出结论说，“印度人的所作所为只是要蒙骗本地人。”到1922年，青年布干达协会又进一步反对君主政体了，攻击酋长和卡巴卡，提出乌干达应该是一个共和国。那年，约瓦西·佩托、乔斯瓦·纳卢马和优素福·穆卡萨——他们三个都是纳米伦贝医院的助理医师和布多高级中学的毕业生——写了一封信，攻击卡巴卡达乌迪·奇瓦道德败坏，不能很好地管理“卢比里”（官殿），以及支持酋长。他们写道，“卡巴卡是毫无用处的废物”。最后他们要求为布干达制订一部宪法。很明显，干了这些事，不论酋长、还是卡巴卡都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于是展开了一场败坏这些人声誉的运动。开始是“卢基科”（Lukiko）通过了一项法律，

[16] D. A. 洛，1971年，第53-55页。

659 规定攻击卡巴卡为非法，理由是这违背传统习惯。触犯者将判处徒刑。那三个写信的人成了这一法律的牺牲品。三个人都由于写那封信而于1922年7月遭到监禁。此外，在后来的几年里，卡巴卡达乌迪·奇瓦本人撰写了一些小册子，力图通过攻击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唤起群众对他本人的支持。他指责这些人"外国化"。[17]这种一语双意的攻击，再加上协会的某些支持者被拉了过去，当上了小官，这个组织的内部团结受到破坏，最后终于逐步归于失败。

卡维龙多纳税人福利协会，[18]是一个受传教士影响的典型产物。这个组织的前身，是1921年下半年由尼安萨的马塞诺学校的校友创立，后被传教士们搞垮的青年卡维龙多协会。当时面临的问题是1920年该殖民领地的地位将从英属东非保护国变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肯尼亚殖民地和保护国。协会的领导人认为这种转变包含着英国人改变非洲人地位的不祥企图，可能还会导致欧洲人到肯尼亚西部的土地上定居。对领地地位的关心，加上地方上的不满情绪，促使马塞诺学校爆发了罢课行动。乔纳森·奥奎里、杰雷米亚·阿沃里、鲁本·奥穆洛和西蒙·尼延代作为教师参加了这一行动。很快就传说，将在伦德哈召开群众大会，讨论卢奥人和阿巴卢伊亚人的不满。

这次集会于1921年12月23日举行。结果是建立了青年卡维龙多协会，以乔纳森·奥奎里为主席，本杰明·奥诺尔·贡巴为书记，西蒙·尼延代为司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有要求使尼安萨成为一个自治的行政单位，建立单独的立法机关，由一名选举产生的非洲人任主席；要求选举中尼安萨和南尼安萨的大酋长；废除声名狼藉的"基潘德"（身份证）；减少茅屋税和人头税，使妇女不再缴税；要求增加工资；撤销直辖殖民地地位，恢复保护国地位；颁发个人土地所有证书；废除强迫劳动、解散在亚拉、拉布奥尔、尼亚海拉和帕普翁迪蒂的劳动营；以及在中尼安萨建立一所政府学校。此后，一个代表团带着这些决议去见省专员。随后，代表团又要求去见总督，当面向他呈交这些决议。第一次，第二次专员都不予接见，但是，随着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最后，总督于1922年7月8日在尼亚海拉会见了请愿者。没有任何一项要求马上得到同意，

660 但从这一冲突经历中得出的经验是，新兴的精英阶层表现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动员群众的能力。这是因为他们表达了当地群众的不满情绪。因此，必须遏制他们。选择的办法是由一个可以接受的传教士、副主教欧文担任殖民主义者的保护人。1923年，青年卡维龙多协会感到他可以成为一个对他们有利的中间人。就欧文而言，则是找到机会来充当这些人的保护人，使他们成为"守法的"公民。1923年7月，他们把青年卡维龙多协会（更加为人所共知的名称是"皮尼奥瓦乔"）主席的职务，交给了欧文副主教。

欧文立即着手从内部进行破坏，使之成为一个体面的组织。他把这个组织的支持基础从广大群众转到精英阶层。把强调的重点从政治宣传转到要求改善住房、食品、衣物、教育和卫生条件。经常要求成员像宗教仪式那样以单调的声音重复保证：不弄脏泉里的水、每周消灭多少只老鼠，一年种两百棵树，不把牛尿混到牛奶里去（一个传统的难以

[17] D.A.洛，1971年，第101—108页。

[18] M.奥卡罗-科吉旺（Okaro-Kojwang），见B.G.麦金托什（编），1969年。

解决的问题)，修建厕所，给村里的每一所茅舍做一张床，不酗酒，不鼓励 16 岁以下的少女结婚。换句话说，欧文使这个组织失去了群众政治活动锋芒。从此以后，这个组织成了软弱无力的卡维龙多纳税人福利协会。每当出现政治上的不满，欧文就鼓励并组织这时已默不作声的领导人给当局写备忘录。这些备忘录往往很尖锐并能刺痛殖民当局，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备忘录十分讲究社会身份和形式，因此也是软弱无力的。在这一时期，备忘录成了斗争的基本武器，于是这些领导人被人称为“备忘录先生”。[19]

1931 年，协会分裂为卢奥人派和阿巴卢伊亚人派，这使它变得更加软弱无力。协会的卢奥人一翼直到 1944 年一直在欧文的领导下勉强地维持下来，由于欧文的干涉，以及让激进的领导人担任一些受人尊重的职务——乔纳森·奥奎里和奥丁多都当了酋长，西蒙·尼延代被指定为地方土著人委员会的委员，阿平迪成为东非紧密协会的联合遴选委员会中尼安萨的代表——这一翼鼓动反抗的态度被窒息了。当然也有拒不顺从的人，如阿杜沃·尼安多杰和约翰·保罗·奥洛拉。后者来自阿莱戈地方，从 1927 年起在基苏木商会中特别活跃。但是，这些努力是针对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不满而采取的，同 20 年代初全面的群众性政治纲领相去甚远。然而尽管如此，卡维龙多纳税人福利协会对毗邻地区还是起了鼓舞作用的。

毗邻地区是乌干达东部，在那里，埃里萨·马萨巴于 20 年代初建立了布吉舒福利协会。协会的宗旨除了保证“为提高巴吉苏人的地位而努力”，密切注视肯尼亚白人移民的动向，防止他们侵犯巴吉舒人在埃尔贡山地区的土地之外，还有清除巴干达代理人，建立地方领导等。同马萨巴的组织同时存在，并追求同样目标的还有青年巴奎雷协会。建立这一组织的目的，是阻止巴干达获得姆巴莱镇周围的土地，并教育其成员“学会正确地传授知识和正确地种植我们的作物”。

661

这一时期更难对付的组织，是基库尤中央协会。这是一个反映农村地区基库尤人不满情绪的运动，始建于 1924 年。它的总部设在穆兰加的卡胡希亚，也就是在那儿，在约瑟夫·康埃塞和詹姆斯·贝乌塔的领导下成立了这个组织。关于该组织的主张，贝乌塔曾说过，“我们基库尤中央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夺回欧洲人从我们手中夺走的土地”。[20]

但是哪些人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呢？基库尤中央协会这一机构代表着基库尤人中那些拒绝完全接受欧洲统治的观念与实际的人。他们的态度比现体制下的酋长和教会学校的学生更富于战斗性。一句话，基库尤中央协会代表反对派。那么该组织成员反对什么呢？由于基库尤中央协会的领导人从未明确地表述过他们的目标，因此很难简单地加以说明。但是一般地说，他们抗议在基库尤社会中反映出来的过火的殖民主义行为。白人统治者在文化方面的傲慢态度使基库尤人受到的种族侮辱，还有殖民当局许多令人生厌的政策和行动，都不断受到严厉批评。

从 1925 年总督访问穆兰加地区时，基库尤中央协会的领导人向他列举的一系列不满中，可以看出该协会领导人的一些态度。他们对 1915 年的皇家土地法令提出抗议，该法

---

[19] O. 奥廷加，1967 年，第 61-94 页。

[20] J. 斯潘塞（Spencer），1971 年，第 94 页。



图片26.2　肯尼亚最早的民族主义组织东非协会的创始人和领袖哈里·图库(1895-1970年)



图片26.3　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和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1963-1978年在位)乔莫·肯雅塔(19世纪90年代-1978年)

令使所有非洲人成了王室可以任意处置的佃户。他们还要求释放哈里·图库，并任命一个"享有审理我们案件的权力、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由我们人民的大多数选举产生的"大酋长。请愿书还涉及殖民当局给当地人民制造出来的问题，例如强迫修建卫生的茅舍以防止瘟疫，禁止非洲人种植棉花和咖啡等。最后，还提出了一些改良纲领，要求当局扩大训练医院护理员的设施，建立一所高级中学，以及建立一所女子学校。这些要求未能打动殖民当局。

但是，官方的蔑视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领导人。到 1927 年，协会邀请乔莫·肯雅塔担任协会总书记的职务，从而同基安布的政治家们建立了某种和睦关系。次年，肯雅塔就任了这一职位。 663

由于当地的和国际上的原因，基库尤中央协会的命运在以后两年有了改善。肯雅塔作为总书记进行的努力导致了文化复兴。为了争取基层群众对协会的支持，肯雅塔通过他创办的一份基库尤语报纸《穆伊格威塔尼亚》，呼吁基库尤人为他们的文化遗产而自豪。每月一期的《穆伊格威塔尼亚》版面上，充满鼓励读者把自己看成基库尤人的谜语、成语和故事。这份报纸还详细地叙述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日常活动，以引起读者对它的注意。次年，当基库尤兰的各教会间爆发重大争执的时候，这一文化复兴运动更加深人。当时争论的问题是已在本书第 20 章提到过的施行女性阴蒂切割礼的问题。

这也是肯雅塔在伦敦进行活动的 10 年。从 1928 年基库尤中央协会向希尔顿·扬委员会请愿和提出证据开始，基库尤人一直把他们在土地问题上的不满放在他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中心。肯雅塔是向这一委员会提交证据的基库尤中央协会代表团的成员。关于证据的声明包括了他们不满的核心问题。这一声明提到，"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使政府发给我们土地所有证，然而至今未能得到，我们无法知道，这是我们的土地呢，还是皇室的土地。"[21] 1929 年，当基库尤中央协会派肯雅塔到伦敦去阐明他们的要求时，他再次申述了对非洲"保留地"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否有保障所持有的关注。在伦敦，肯雅塔把基库尤中央协会的宗旨归纳为：保障土地所有权，增加实用性教育设施，取消妇女交茅屋税，和享有立法委员会代表的选举权。两年后，当非洲人受到邀请向肯尼亚土地委员会——该机构是根据英国议会 1931 年关于应该对非洲土地问题进行调查的建议而设立的——提出证据时，这一问题再次特别强烈地提了出来。基库尤中央协会积极参与协助基库尤各世系（姆巴里）提供他们的证据。当报告发表后，基库尤中央协会又联合所有基库尤政治集团起草了一份一致表示拒绝和抗议的备忘录。由于这些抗议被置之不理，土地问题在基库尤政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并在 20 年之后导致了茅茅战争。

这些"青年"协会没有取得胜利，然而如果说它们归于失败那也是不公平的。尽管现体制不断通过拉拢某些领导人，同时监禁另外一些领导人的办法来破坏他们的活动能力，然而他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遗产是，利用撰写小册子，和运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双管齐下地揭露殖民主义的基本罪恶等方法，表达了非洲人对殖民制度的不满。 664

---

[21] C. G. 罗斯伯格（Rosberg）和 J. 诺丁汉（Nottingham），1966 年，第 94 页。

局部性协会

专门为了解决边界问题而建立的局部性协会数目太多，形式繁杂，难以一一列举。虽然在1933年以前，殖民当局确曾划定了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桑给巴尔和索马里兰的边界。但是，当试图组织各领地内部的行政管理时，殖民地统治者建立了省、县、区和乡，下面又有分区、分乡等区划，它们所划定的边界把许多部族、氏族和家族分割了开来。在很多情况下，属于同一个部族的土地却被分给了对这些地区并没有传统权力的好几个新主人。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造成骚动不安：有的是煽动夺回失去的土地，有的是要求允许分属不同分区的同一个氏族重新统一，或者要求通过建立专门适用于一个氏族或准氏族的分区来划定明确的行政区域界线。这类争执是地方性的，但是这类局部性骚动的激烈程度和持久性却使殖民当局不能对之熟视无睹。此外，许多"新人"发现他们能在这种内部冲突中发挥作用：提供证据，在法庭上进行诉讼，向县长、殖民地总督以至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提出备忘录。在这些冲突中，局部性暴力行为的潜在可能性总是很大，宿仇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

1932年，讲卢奥语的卡盖尔氏族为了从他们的邻居万加人那儿夺回"失去的土地"而建立的乌干亚-卡盖尔-卢奥人（恩佐亚河南岸）协会，[22]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这类冲突。与此相对照，比较著名的穆本德-班约罗委员会[23]则坚持不懈地要求布干达把"失去的地区"霍亚加、布干加伊齐、布韦库拉、布鲁利和鲁贡乔归还给乌干达的布尼奥罗王国。但是一般来讲，殖民者不可能满足局部性协会提出的这些要求，而正是因为这些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些协会就为开展以地方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提供了途径。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懈，英国人把所有这类活动都称为"菲提纳"（fitina）——小规模的顽固行为——而置之不理。但是，宗派主义毕竟是乡村政治的主要因素。

665

促进性协会和工会运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在政治上不太重要的由非洲农场主和商人组织的商业协会。这些组织开始往往是针对某个特定目标建立的，但是由于殖民地现状中每天都有令人烦恼的事，它们很快就成为对本地区殖民制度中存在的所有不公正现象表示抗议的工具。于是，它们的经常性活动就成了群众的领导与殖民当局在当地的代表之间的对抗。乞力马扎罗土著种植者（咖啡）协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该协会建立于1925年，目的是"保护和促进山区土著咖啡种植者的利益"。[24]一方面由于欧洲殖民者害怕有组织的非洲人的游说活动，另一方面由于该组织领导人约瑟夫·梅林约与各方面的英国行政官员和非洲人酋长之间的个人冲突，这个组织被迫开始过问其他问题，诸如土地注册、土

[22] B. A. 奥戈特，见K. J. 金和A. 萨利姆（编），1971年。
[23] J. B. 克耶尤内（Kyeyune），1970年。
[24] S. G. 罗杰斯（Rogers），1972年和1974年。

地转让和使用、同肯尼亚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政治权利、以及在中央立法委员会和莫希县用水管理委员会中的代表权问题，等等。在地方上，该协会采取的姿态往往被看成是有意反对酋长的权威。事实也确是如此。在这方面，它同 20 年代中期东非地区许多地方性抗议运动相类似。这类组织的存在表明，殖民当局 15 至 20 年前精心培养的官方酋长式上层人士之外，又出现了新一代的社会精英。这些新兴人物不仅在查加人和基库尤人中间，而且在兰吉人、㉕坎巴人㉖和哈亚人㉗中间都很活跃。他们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表明在地方社会中，一个年龄组的人应该把权力交给另一个年龄组的人了。

一般来说，他们的主张是，殖民者委派的酋长们不必把自己看成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唯一工具，新出现的社会精英阶层认为他们也应被吸收进来参与这一进程。因此，当布科巴-巴哈亚联合会于 1924 年成立时，它的雄心之一，就是给人民提出建议，“使他们变得文明”。组织这一联合会的布科巴的政府职员和地方商人——克莱门斯·基扎、苏埃迪·坎加谢基、卢多维克·凯塔巴和赫伯特·鲁基齐瓦——宣称，成立这一组织是“为了建立一个发展我们国家的机构，和为了建立一种对我们相互都有好处的易于实现文明化的制度”。实现这一“文明化”的两个途径是接受教育和种植咖啡。在整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这个组织一直致力于这些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同他们认为妨碍进步的殖民当局和酋长发生冲突。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联合会不过是又一个基西木上著人商会之类的贸易协会，建立这类协会的目的是力图夺取一点当时亚洲人商会所享有的特权。在有关东非的历史著作中，它们被描述为“现代”人㉘领导的“促进性”协会。㉙在这些“现代”人中，有休·马丁·卡扬巴、弗朗西斯·鲁穆基拉和 30 年代末期的哈里·图库。东非的历史学家一直在就这些人对启发非洲人的政治觉悟贡献究竟多大有不同看法。一方面，有些学者强调这些人为非洲人民提出了理想，㉚另一方面，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推行现代化的人所追求的主要是个人利益，因此在非洲政治的激进主义中没有他们的合法地位。㉛总的说来，促进派的出发点主要是捍卫他们自己和本阶级的利益，因此很难说他们在群众活动的政治中发挥了领导作用。㉜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支持群众的事业才成为这批社会精英的任务。工会运动的历史清楚地表明，现代派同群众缺乏联系。 666

与工会本身的活动不同，雇佣工人中间的抵抗活动，很早即在东非出现。殖民当局最早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迫使非洲人在殖民者的农场里和新建的雇佣行业——例如肯尼亚-乌干达铁路线，坦噶尼喀的中央交通线，以及公共工程部门——中为他们作工。殖民统治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立法，规定订立受刑罚约束而履行的“服务契

㉕ J. 托什（Tosh），1973 年和 1978 年。
㉖ J. F. 芒罗，1975 年，第 7、8 章。
㉗ G. 海登（Hyden），1969 年，第 4、5 章。
㉘ J. 艾利夫（Iliffe），1969 年，第 123-161 页；1979 年，第 405-435 页。
㉙ J. 艾利夫（编），1973 年。
㉚ 同上；K. K. 詹穆罕默德（Janmohamed），1974 年。
㉛ 见E. S. 阿蒂埃诺-奥迪安博（Atieno-Odhiambo），1973 年，对J. 艾利夫 1973 年所编书的评论。
㉜ E. S. 阿蒂埃诺-奥迪安博，见B. A. 奥戈特（编），1975 年，第 218-222 页。

约"，任何违反契约的行为都被视为刑事犯罪，要受到罚款和或监禁的惩罚。作为对这一立法的补充，特别是在肯尼亚，根据土著人登记法令，实行对所有够条件的非洲男性劳动力进行登记的办法，正是根据这项声名狼藉的法令，在非洲人中实行了遭人痛恨的"基潘德"（kipande）身份证制度。但所有这些并没有阻止工人进行罢工。[53] 肯尼亚第一次为人所知的非洲人罢工，1902 年发生于蒙巴萨，当时有 50 名警官放下了他们的警棍。随后，1908 年，马泽拉斯的非洲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同年，内罗毕的非洲人力车夫举行了罢工。4 年后，蒙巴萨的船工，接着是内罗毕的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等等。在这些单一行业的罢工中并没有发生组织工会的行动，无论如何这在当时会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是这 667 些罢工的确代表了这样的思想，即可以就劳工方面的不满采取行动。这也是作为 1919 年以前几年的特征的非洲人的日渐觉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战后的岁月里，这种觉醒逐渐成熟，成为全面的政治觉悟。1919 至 1922 年间非洲人面临的经济问题和苦难，使人们认识到劳工问题与非洲人在其中活动的整个政治经济局势有着某种联系。将在这一时期担负起政治领导的"青年"，基本上是城市非洲人，而劳动群众的悲惨处境他们不会看不到。因此，工人中的不满常常是他们的备忘录和讲话的组成部分。例如，1921 年 6 月 11 日青年基库尤人协会成立时，劳工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哈里·图库对那天会议情况的总结证明了这一点。他向报纸写道：

> 星期二……青年基库尤协会的一次会议在潘加尼村举行，议题是土著人工资下降的问题，有人建议并获得通过，……为了向政府表明土著人在工资下降问题上的不满……（协会应该）致函尊敬的土著人事务首席专员，要求他向总督阁下提出这一问题。[54]

这个备忘录按时送交土著人事务首席专员。它要求殖民当局停止削减工资，并责成白人移民采取同样行动。备忘录还谴责强迫劳动，反对登记制度，抱怨茅屋税税率过高，等等。有一种说法符合这一组织（及其后继者东非协会）的情况，即认为它"既是一个政治协会，又是一个一般的工人联合会"。这种说法也完全适用于当时也反对强迫劳动的青年卡维龙多协会。用它来概括说明那些参与这一时期非洲工人斗争的组织也是恰当的。20 年代肯尼亚的非洲人政治活动经常涉及劳工问题，反对强迫劳动，要求提高工资，取消向妇女征税。这些要求，譬如说，构成了 1924 年向奥姆斯比-戈尔委员会提交的意见书的一部分内容。同样，非洲领导人在基库尤中央协会 1928 年向希尔顿·扬委员会提交的备忘录中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但是，工会组织本身的情况怎么样呢？殖民当局容忍的是职员协会而不是真正的工会，前提是这些职员联合会必须披上福利的外衣，而不是去从事直接的工会活动。当时所希望的是，新出现的非洲熟练工人将组织他们自己的排他性的精英式俱乐部。在这 668 一思想指导下，1922 年英国人允许成立坦噶尼喀文职人员协会，又于 1933 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同意成立肯尼亚非洲人文职人员协会。坦噶尼喀领地非洲人文职人员协会[55] 是马

[53] M. 辛格（Singh），1969 年，第 45 页。

[54] 转引自同上书，第 11 页。

[55] J. 艾利夫（编），1973 年，第 73 页。

丁·卡扬巴为了“在其成员中促进社会和教育发展”并“促进政府各机构中其成员的福利”而创立的。它既是一个工会，又是一个社交俱乐部，其活动包括体育运动和晚间课程。这一组织以其公开宣扬精英主义而著称，关心的主要是精英阶层的特权。尽管卡扬巴曾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然而，随着驯服恭顺的卡扬巴得到主子更多的青睐，在殖民行政当局的阶梯上高升，他的协会似乎也于20年代末消声匿迹了。因此，这一组织的成就，即使在其存在期间也是有限的。

肯尼亚非洲人文职人员协会的确切起源尚不清楚，但这个组织确实曾向1933年成立的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领地刑事问题司法管理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重要的备忘录。[36]这份备忘录的起草者，是当时任协会总书记的一个名叫纽兰·吉布森的人，以及伊什梅尔·伊索戈、H. G. 谢德拉克和艾伯特·阿维诺。这份备忘录涉及到同司法制度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它请求把国内所有法律译成斯瓦希里语，要求在所有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都要有顾问陪审团，以及废除“基潘德”身份证制度。备忘录还批评了流浪罪法令和集体惩处法令，敦促取消向寡妇、失业者和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征税。除了这份备忘录外，再没有什么材料说明这个组织还干了些什么。关于肯尼亚非洲人教师联合会的材料也很少，这个组织在埃利乌德·马图和詹姆斯·吉丘鲁的领导下成立于1934年。

但是总的看来，可以说这些精英阶层的联合会并不能清晰地反映整个劳工形势，因为这一时期整个劳工形势的特征是不断在工厂、海港、车间以及白人移民的农场中采取罢工行动。由于官方不许可进行工会活动，在广大的非熟练工人和劳动群众中间又没有通讯网，因此，在工作现场举行的个别罢工自然就成了表达不满情绪的渠道。对这类罢工的情况知道得很少，特别是关于乌干达和坦噶尼喀的情况，其原因也许在于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有限，而不在于研究题目本身。但是，说非洲劳工中间经常出现遭受剥夺的情绪，那是不会过分的。

全领地范围的政治运动

669

本章的论述到目前为止谈的全是在不同层次上表现出来的地方性的政治活动。如果谈到非洲人全领地范围的政治尝试，这方面的经验是失败的，或者说缺少认真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并无贬意，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很少有非洲人把自己看成是坦噶尼喀人或肯尼亚人。政治觉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包括整个殖民地国家的整个疆域。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乔莫·肯雅塔、阿基伊基·尼亚邦戈和姆比尤·科伊南吉那样的人，他们获得了罕见的机会，到欧洲和美国去旅行，同那些从整个帝国的视野看待殖民地形势的人交往。1930年以后，肯雅塔无疑在英国扩大了眼界，不仅看到非洲的事业，还看到黑人总的悲惨处境。同样，姆比尤·科伊南吉在美国接受教育，特别是他同拉尔夫·本奇博士的关系，开阔了他的视野。到1933年，他已向殖民事务部起草备忘录，抗议对他父亲科伊南吉酋长以及统而言之对所有肯尼亚非洲人所施加的不公

[36] M. 辛格，1969年，第24-25页。

正待遇。但是这类人数量很少，况且，他们远离家乡，因此，没有机会组织当地的群众。

在这种背景下，哈里·图库的东非协会，就其眼光包括了整个肯尼亚殖民地以及更远的地方（至少是在书面上）这一点来说，在20年代初实属独一无二。东非协会是1921年在内罗毕由哈里·图库、杰西·卡里乌基、乔布·穆丘丘和阿卜杜拉·塔拉拉等人创立的。[37] 来自其他领地的非洲人也很突出，包括青年布干达协会不屈不挠的Z. K. 森桐戈和一个来自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的没有指出姓名的尼亚萨人。这一组织当然是超越部族的，其名称反映了对整个肯尼亚的关注。但是其成员主要是基库尤人。赋予这一组织以生命力和指导的是哈里·图库，一个在财政部工作的职员。

图库同其他几个居住在内罗毕的基库尤青年感到，有必要把他们自己结成一个团体，同由酋长把持的基库尤协会对抗。有人认为，这些年轻的基库尤人以布干达青年协会作为自己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图库和内罗毕的这些年轻人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全肯尼亚的非洲人组织。正如他1921年在《东非旗帜报》上所写的，感到"除非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组成一个协会，否则肯尼亚的土著人将永远没有发言权"。对团结的这种追求，使图库同当时居住在内罗毕的坎巴、卢奥和于达族的青年亲如手足。于是，1921年7月1日，

670 他们正式成立了东非协会。这一组织就"基潘德"身份证制度、强迫劳动、过高的捐税以及教育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图库直接把这些决议用电报发往伦敦的殖民部。印度政治家A. M. 杰文杰和B. M. 德塞支持了他们，帮助图库起草致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并为该协会印制大张印刷品。同亚洲人的这种联系，当时在移民中间轰动一时。然而，最近的研究无庸置疑地表明，图库并不是印度人手里的卒子，当时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于这种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图库为了使非基库尤人参与他的协会所进行的努力。他在内罗毕的交往自然使他试图在坎巴人中间宣传他的协会。但是，如果说城里的坎巴人对此很有热情的话，农村的坎巴人却并非如此。当图库在马查科斯的伊卡蒂同马森杜酋长一起举行一次公开会议时，长老们回绝了他的建议，拒绝在他提出的文件上签字，并劝他回到"坎巴人与之很少共同之处"的基库尤人那里去。[38] 尼安萨的情形不同。在那里，图库的协会找到了相应的组织，青年卡维龙多协会。到1921年12月，青年卡维龙多协会的领导人同图库取得了联系，并向他保证一起为国家"战斗"，并为他的基金提供了资金支持。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青年卡维龙多协会并不从属于图库的组织。[39] 强调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即两个协会只是取得了联系。它们的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个组织影响了另一个。这两个组织的联系人是詹姆斯·贝乌塔，当时是图库的组织的成员，受雇于马塞诺。用他自己的话说：

> 〔在马塞诺〕有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教师，他们大都对政治感兴趣，并希望了解东非协会。这是我们知道的内罗毕之外唯一的一个关心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我把两个组织联系起来**；这些未来的卢奥人政治家和东非协

[37] K. J. 金，1971 b。

[38] J. F. 芒罗，1975年，第126页。

[39] M. 奥卡罗-科吉旺，见B. G. 麦金托什（编），1969年，第120页。

会的支持者。这些人……很热情，并捐献了90卢比，汇往内罗毕支持那个运动。他们希望同基库尤人和沿海的人民联合起来，我想，使他们产生这种兴趣的是我。[40]

由于马赛农村邻近内罗毕，马赛人在本世纪头20年又在土地问题上遭受了英国人的折磨，于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马赛人中的精英，就成了20年代初期城市里发生的任何抗议运动的天然盟友。所有这些马赛人中的精英分别在索戈托，或者在基贾贝和西伊阿佩伊的非洲内地教会学校受过教育。他们成了马赛人中哈里·图库的支持者。[41]他们中间包括梅泰伊·奥莱·穆蒂安和莫隆凯特·奥莱·森佩莱。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们曾在马赛农村地区组织过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城市工作人员。他们在农村的马赛人中产生影响是1923年以后的事，当时他们被派回到自己的地区。正是在家乡的这块基地上，他们组织起对后来的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支持。 671

使图库得以同布干达人建立联系的是他的个人关系。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以坎帕拉为基地的青年布干达协会，该会的书记约瑟夫·卡穆莱盖亚就几个问题同图库通过信。卡穆莱盖亚把图库介绍给美国黑人界，于是图库写信给W. E. B. 杜波依斯博士、马库斯·贾维和塔斯基吉学院，要求美国黑人援助东非协会。然而，并没有建立什么持久的联系，尽管贾维的报纸《黑人世界》被寄给了图库。[42]所有这些都不过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殖民当局对图库的这些类似平民主义的主张感到恼火。1922年3月14日他被逮捕，准备把他押送出境。他被关在内罗毕的警察局里时，他的追随者和内罗毕的普通群众举行了罢工，他们在警察局院外设置了纠察线。随后就发生了这类殖民地冲突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警察惊慌失措，于是向人群开枪，打死了21个非洲人。这天是1922年3月16日。

这一事件之后，图库被放逐到基斯马尤，他的组织也陷入混乱。从这以后，基库尤农村地区的政治活动更多地具有部族性质。新出现的组织是基库尤中央协会。英国的火药迫使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罗毕的非洲人成立多部族政治组织的任何要求都宣告终结。

坦噶尼喀的前景也不比其他领地好多少，正如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1929年成立于达累斯萨拉姆。在塞西尔·马托拉、克莱斯特·赛克斯、姆齐·宾·苏迪和拉马丹·阿里的领导下，该协会宣布其宗旨是“不仅在本领地，而且在整个非洲捍卫非洲人的利益”。[43]然而，实际上除了少数成员转到内地高原工作，如1933年马克·马凯贾被派往多多马，并在那儿建立了一个分会外，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的影响在后来的6年中并没有超出达累斯萨拉姆。即使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它的成就也仅限于建立一个俱乐部会址。它还曾向政府请愿，要求任命一个非洲人市长，但没有成功。1931年和1932年，内部分裂使该协会成员减少，直到1934年才由桑给巴尔分会采取主动振兴该协会。除了殖民当局的镇压外，还可以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即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从政治角度来讲，不存在什么肯尼亚人、乌干达人或坦噶尼喀人。 672

---

[40] 转引自J. 斯潘塞，1971年，第10页，（黑体字是作者用的）。

[41] K. J. 金，1971 a。

[42] 同上，1971 b。

[43] G. G. 哈吉瓦亚尼斯（Hajivayanis），A. C. 姆托瓦（Mtowa）和J. 艾利夫，见J. 艾利夫（编），1973年，第235页。

结 论

本章试图通过考察各种类型的活动，叙述1919至1935年间东非政治和民族主义的范围、性质和局限性。主要的角色是群众，而政治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希阿萨”，在这些年代里是“青年”人。这些人在本世纪头20年从引进教会教育中获益，并能在殖民当局面前表达非洲人的不满。他们所关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不满情绪，鼓动人们反对殖民主义带来的那些灾祸。这些人在不同层次上开展活动，从地区性的“巴拉扎”(baraza)即群众大会，到向殖民地总督或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请愿。他们建立政治组织的努力往往为殖民主义势力所挫败，没有一个协会实现了全部目标。但是，这些组织在其存在期间，时时提醒殖民当局，“非洲人的声音”可以从殖民地行政体制以外的渠道发出。然而，在非洲人存在不满情绪的许多领域，并没有结合成正式的组织，在这个时期没有出现工会，因为很少有领导人试图组织这类运动。本章注意到这一时期非洲人活动的局限性：由于它们主要是以地方为中心，因此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全领地范围的政治运动。

（艾平 庄红译）

27 中部和南部非洲的政治和民族主义 1919-1935年

A. B. 戴维森
A. 伊萨克曼
R. 佩利西埃

在安哥拉、贝专纳（今博茨瓦纳）、比属刚果（今扎伊尔）、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673 巴苏陀兰（今莱索托）、尼亚萨兰（今马拉维）、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以及南非联邦（今南非共和国）这些极不相同的国家中政治生活也一直呈现出极大的差别。这种迄今仍然显而易见的差别，在1919至1935年这段时间里就更为可观。这些差别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些国家曾分属不同的殖民帝国：英国、葡萄牙或比利时。另一原因是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地位，有些成为殖民地，另一些成为保护国，其中还有一个是自治领。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是它们极不相同的经济水平，从而导致不同类型的社会区分。中部和南部非洲新的反殖运动若与东非及西非相比较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本章的目的在于考察中部和南部非洲群众性抗议不断变化的性质，着重考察南非、比属刚果及原葡属殖民地。[①]

南部非洲和比属刚果的经济和政治背景：概论

南部非洲的特点既来自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渗透的特征，也来自远比非洲其他地方更为复杂的社会种族区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欧洲成分”能如此迅速发展，使“传统的”非洲经济如此相形见绌。这种经济模式以及种族区分的复杂性可归因于殖民化进程 674 的途径，而这种途径又取决于自然条件以及非洲这一地区的丰富的自然资源。

到1919年，南部非洲大部分地方经济生活的发展进程被打乱的程度远超过这个大陆的其他地区。成百万人已被纳入资本主义剥削范围之内。20世纪20年代中叶已有20多

① A. B. 戴维森（Davidson）主要负责探讨南部非洲和比属刚果的经济、政治背景以及南非及其毗邻领地的群众性抵抗部分。A. 伊萨克曼（Isaacman）撰写有关莫桑比克和比属刚果部分，并与R. 佩利西埃（Pélissier）共同撰写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经济、政治背景的概论，R. 佩利西埃还撰写了安哥拉部分。

万流动劳工，其中有从遥远的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召募而来受雇于南非矿山的。② 有6万以上的劳工在刚果的铜、锡、钻石和金矿中劳动。③

由于欧洲人从事农业的发展以及南部非洲一系列国家中土地大规模从农民手中被夺走，除刚果棉花种植之类强迫种植部门之外，非洲人无法参与出口作物的生产与贸易。④由于同样的原因，涌现庞大的非洲人资本主义式的农民和商人阶层的道路也被堵塞了。而在其他许多白人移民较少的殖民地中，这些阶层的涌现却成为一种特征。这样，失去土地、农民被窒息、被无产阶级化、被城市化的进程，在南部非洲各国进行得比非洲其他地区更为迅速和深入。⑤

正如本书第16章所述，在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形成长期存在而人数又相当可观的非洲人和非欧洲裔无产阶级队伍，要比其他地方更快。工业城市和港口的工人代表着其中较为先进的部分。矿山和城市中大多数非洲劳工最初来自季节性劳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季节性职业的收入来维持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劳动力固定化的过程。结果使这里比西非和东非大部分地区更早地涌现出非洲人的城市无产阶级。在白人所拥有的农场上还有数量更大的季节工。随着土地被剥夺，农村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迅速扩大。

知识分子的出现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才确立民族意识和政治认同感。知识阶层的发展取决于欧洲人进行殖民化的特点和相对而言接受教育的可能性。非洲人在南方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的“高度”远远低于西非。在西非，由于缺乏长期定居的白人移民，非洲人比较容易担任办事员或在文职机关中找到职位。在南部非洲，白人垄断了一切可能向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开放的就业机会，无论这些机会是在政府部门、经济部门、教会还是生活的其他领域内。

675

从而，南部非洲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更接近于人民。这是由于在这些地区他们直接来自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之中，而不像西非的某些国家来自“解放”了的奴隶及其后裔。残酷的种族歧视使南部非洲的非洲人无例外地一概成为牺牲品，因此不可避免地使知识分子更接近于人民。在那里，非洲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更难以起居间人的作用。

南部非洲反殖民主义抗议活动的另一关键性显著特征在于下列事实：反对殖民秩序的人不仅来自非洲人，也来自数量相当大的非非洲人居民——有色人种、印度裔人以及进步白人。结果，非洲人成为主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反殖力量。这一点在斗争的整体特点上留下了它自己的烙印。⑥

另一个对南部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整体特征起作用的情况在于其国际联系。南部

② 关于南非矿工人员构成的统计数字见非洲研究中心，1977年，24 c。

③ C. 佩林斯（Perrings），1979年，第56、84、176页。

④ B. 朱西威基（Jewsiewicki），见M. A. 克莱因（Klein）1980年所编书。

⑤ C. 邦迪（Bundy），1979年；G. 阿里吉（Arrighi），1970年；I. R. 菲米斯特（Phimister）与C. 范·翁塞伦（Onselen），1978年。

⑥ 即使是在这种极其明显的种族主义环境中，殖民政权仍不得不依赖忠于自己的酋长和非洲警察。这些人已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种联盟削弱了那种只从种族而不考虑阶级和部族因素来分析抵抗运动的论点的份量。

非洲的工会运动和早期的民族主义活动都得到了来自国外的大量援助。同时，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强有力地抨击比属刚果的压制性殖民政策。最后，由于南部非洲更为紧密地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与外部世界有着更多的交往，从而使那里能更敏锐地感觉到世界性的变化。1919-1935 年间世界上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有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延续到 1923 年的革命运动的高涨；殖民体系危机的开始；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本章所包括的时期行将结束时发生的爆发于 1935 年的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反响。

南非及其周围领地的群众性抗议、民族主义运动和政治

南非对殖民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对，主要采取 4 种方式：第一种是农民抗议，这种抗议经常是零散的、孤立的、多数是不引人注目的，但在这一阶段农民抗议的各种表现极为广泛。此外，许多农民和城市居民通过在南非极为兴旺的独立教会作为媒介来反对文化上的狂妄自大和种族主义制度。另一些人参加非洲大陆最早的民族主义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还出现了工人运动的萌芽，其标志为克莱门茨·卡达利所领导的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得到迅速的发展。

676

由于南非许多农村地区从自耕农经济变成劳动力的储存地而造成的日益贫困化与经济前途的不稳定状态，农民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以缩小或消除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多数抵抗方式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土地和牲畜，抗议增加捐税和召募劳动力。经常采取的是个人行动，如逃亡、漏税、违反登记法以及袭击忠于殖民者的酋长和警察。⑦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采取更为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方式进行反对，如反消毒运动。

国家推行更为严格的牛羊消毒规定以及增加消毒费用的企图，从 1913 年到 1917 年在德兰士凯全境引起了广泛的农民反抗。尽管许多农民都懂得保护畜群免遭东岸热病感染的必要性，但他们仍反对在农村经济承受严重压力时过高征税。反消毒运动采取了多种斗争形式。庞多兰的农民开始时拒付税款，芬戈兰的农民组织了抵制活动，禁止任何人参加消毒计划。最富战斗性的行动出现在东格里夸兰，在那里消毒池被炸毁和遭到破坏，抗议者还袭击前来破坏他们运动的警察。从农村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角度看，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反抗活动的规模以及忠于殖民者的酋长无力控制其富有战斗性的农村臣民的活动这一事实。⑧ 4 年后，德兰士凯的农村妇女组织了一系列抵制欧洲商人的活动，以抗议他们操纵物价和拒绝以赊购方式提供必需商品。1922 年农村妇女这一运动扩展到东北省和东格里夸兰。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商人都埋怨“女权运动”的煽动者。抗议者在农村商店设置纠察线，而且不顾当局的威胁，强行阻止顾客进入商店。最后，政府的干预

⑦ W. 贝纳特（Beinart）及C. 邦迪，见M. A. 克莱因所编书，1980 年；A. T. 恩佐拉（Nzula）、I. I. 波铁辛（Potekhin）及A. Z. 朱斯马诺维奇（Zusmanovich），1979 年，第 104-106 页；E. 鲁（Roux），1964 年，第 88-120 页；A. B. 戴维森，1972 年。此处以及其他地方有关材料引自题为《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史》的集体著作现代部分，俄文，见莫斯科出版《科学》。

⑧ W. 贝纳特和C. 邦迪，见M. A. 克莱因所编书，1980 年，第 280-284 页。

和忠于殖民者的酋长们的威胁削弱了这场抵制。[9]

677 农民起义在西南非洲周期性出现。南非政府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有效地在那里巩固其权力。其后，简·史末资政府对邦德斯瓦特人残酷地进行了镇压，后者是南方牧民纳马人的一支。他们的动乱是由增税引起的。1922 年 5 月，一支 400 人的配有机枪和飞机的队伍向他们进行了军事讨伐。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非洲人的住所成为空袭的目标。约有 100 名非洲人被杀，150 人以上被监禁。[10]

3 年后，这个国家中部雷霍博斯河边的"有色人居民群体"也遭到了同样残酷的对待。这一居民群体由于德国统治时期与殖民当局所签订的协议遭到违反而进行抗议，拒不接受南非当局的新要求。该居民群体的法律顾问就当局的非法对待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1925 年 4 月村庄被部队包围，飞机在天空出现。村民提出"投降"，约有 640 人被捕。[11] 国际联盟讨论了邦德斯瓦特人与雷霍博斯人的问题，因为西南非洲是委任统治地。但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的暴行。相反，1932 年当奥万博兰的乌库阿比人暴动时，当局仍用飞机、装甲车对待他们。

大多数农民暴动是自发的，有着很大局限性。一些早期的基础较广泛并组织得较好的运动要归功于非洲的基督教会和教派。农民为这种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虽然城市居民往往在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非洲基督教会或称"独立的当地人教会"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初看似乎难以理解，人们在反对欧洲征服者的斗争中竟然从这些征服者向他们传播的宗教中汲取思想上的激情。而事实正是如此，而且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是由于旧的非洲宗教的特点。莫斯科研究非洲宗教的学者B. I. 夏雷芙斯卡雅博士指出："热带非洲和南部非洲当地的传统宗教——早期国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地方性的特点，它使人分离而不是团结"。[12] 基督教的信念，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使这些新皈依的人把自己同一个比单一的部族集团更大的群体联系起来。只有周围环境迫使人们放弃旧的团结方式，而又看不到走

678 回头路的前途时，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这些新的皈依者正是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通常，这些人在与传统及占优势的习惯决裂时是最为彻底的。难怪反殖民主义抗议活动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对那些把新的信仰带给他们的人的幻想的破灭。他们把欧洲人视作真正的基督徒，由于已设立的教会普遍实行种族歧视，这种幻想破灭了。他们希望在这一信仰中坚持自己的权利和价值，摒弃一切与白人有关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白人已是压迫者、骗人精和一切邪恶的缩影。

在意识形态上这些教会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它们都认为，根据基督的真正教义黑人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而欧洲传教士是在歪曲圣经。非洲教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救世主主义。他们相信救世主第二次降临时会是一个黑人。这些教会和教派的信徒们相信：基督第二次降临后，将进行一千年美好与正义的统治，到那时殖民主义者都将被赶出非

---

[9] 转引自前引书，第 286-287 页。

[10] E. 鲁，1964 年，第 143-144 页。

[11] R. 弗斯特（First），1963 年，第 101-105 页。

[12] B. I. 夏雷芙斯卡雅（Sharevskaya），1968 年，第 215-216 页。

洲。[13]

独立教会中的锡安山教派与埃塞俄比亚教派都在南非传播得特别广泛，并且都是代表持不同政见的一个重要方式。其成员发展极快，1918年有76人，1932年增至320人，10年后甚至超过了800人。[14] 从社会运动的观点看，主张分立的埃塞俄比亚教会有着选举产生的干事、旗帜、宪章和准军事组织，代表坚持在教会组织的范畴内实行非洲人自治的一派。与此相似，锡安山教会常由具有神力的反欧洲人的先知掌握领导权。他们传播神的启示，并希望重建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白人统治的社会。[15]

尽管国家实行严格管制，独立教会仍不时进行公开的起义活动。早在1884年，一位卫理公会传教士奈赫米阿·泰尔就动员其在滕布兰的信徒蔑视政府官员。[16] 1921年，被称为上帝选民派的一个埃塞俄比亚教会分支在伊诺克·姆吉季马的领导下，坚决拒绝从昆斯顿的非法移民区迁出。上帝选民派强调，《新约》是白人所捏造，应不予置理。只要信仰古代希伯来方式，耶和华最终将把他们从压迫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甚至在一支庞大的警察与军队逼近时，仅以大刀和长矛武装起来的上帝选民派信徒仍毫不畏惧。"耶和华教导我们：不能让你们烧我们的茅屋，把我们的人民从恩塔贝兰加赶走，或者让你们抓走你们想要抓走的人。"[17] 结果，用机枪武装起来的士兵打死了163名、打伤了129名上帝选民派信徒。 680

还有一些富有战斗性的独立教会把神的启示和简化的贾维主义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其创始人韦林顿·布特莱齐为名的韦林顿运动。这一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盛行，直至30年代中期。他向其德兰士凯追随者保证，美国黑人将驾驶飞机前来支援并解放他们。布特莱齐宣布：解放后捐税和消毒费将被取消，并将向全体人民散发服装。当政府官员发觉他的激进观点和战斗性词藻时，他们把他流放，并逮捕了他的几名副手。但他的影响继续存在，并有一系列分离主义的学校与教会组织起来传播他的言词。20世纪30年代早期有不少富有战斗性的追随者拒付消毒费，有时还袭击政府官员。[18]

到30年代下半期，非洲基督教运动作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工具，结束了它的全盛时期。在绝大多数南部非洲国家中这一作用让位给更高形式的组织和斗争。

除了古老的形式农民起义和非洲基督教会运动外，1919-1935年间，在南部非洲以及大陆的其他地方，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不以部族群体为基础的非洲人政治组织。它们是一些由非洲人社会精英和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在南部非洲这些新兴社会精英所组成的组织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成立于1912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19] 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团结政治上积极的非洲人的主要组织。成立之初是作为南部非洲英属地区所

---

[13] T. 霍奇金（Hodgkin），1956年，第93-112页。

[14] B. G. M. 森德克勒（Sundkler），1961年，第76页。

[15] 同上，T.霍奇金，1956年，第99-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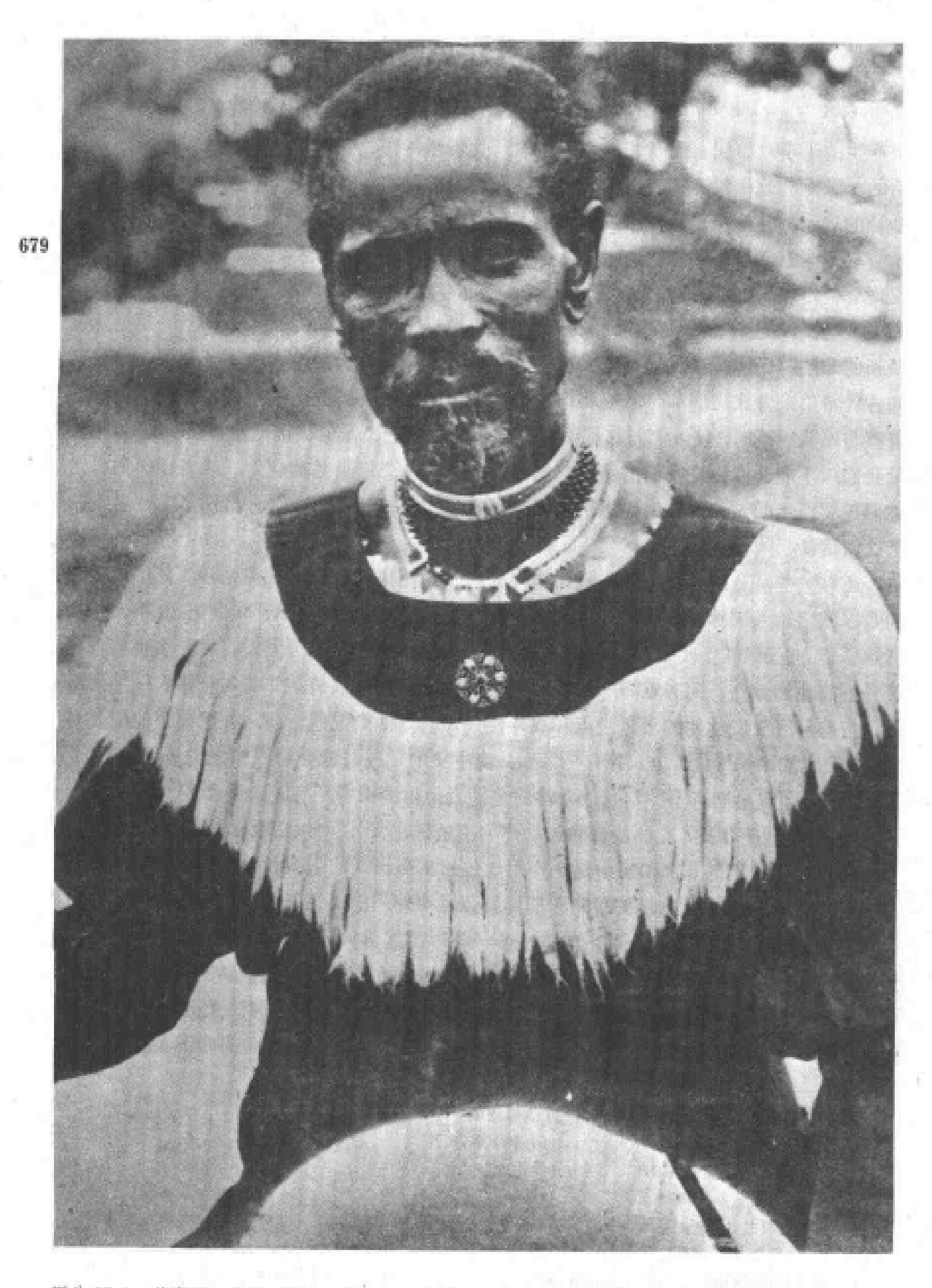
[16] E. 鲁，1964年，第78页。

[17] 转引自前引书，1964年，第136-137页。关于上帝选民派的详细情况，见R. 埃德加（Edgar），即将出版。

[18] W. 贝纳特及C. 邦迪，见M. A. 克莱因1980年所编书，第280-284页。

[19] 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早期历史见E. 鲁，1964年，第74-76页；H. J. 西蒙斯（Simons）和R. E. 西蒙斯（Simons），1969年，第132-136页；G. M. 格哈特（Gerhart），1978年，第21-39页。

679



图片27.1 艾赛亚·申贝（1870-1931年），南非一个锡安山派非洲教会纳查里特浸礼会的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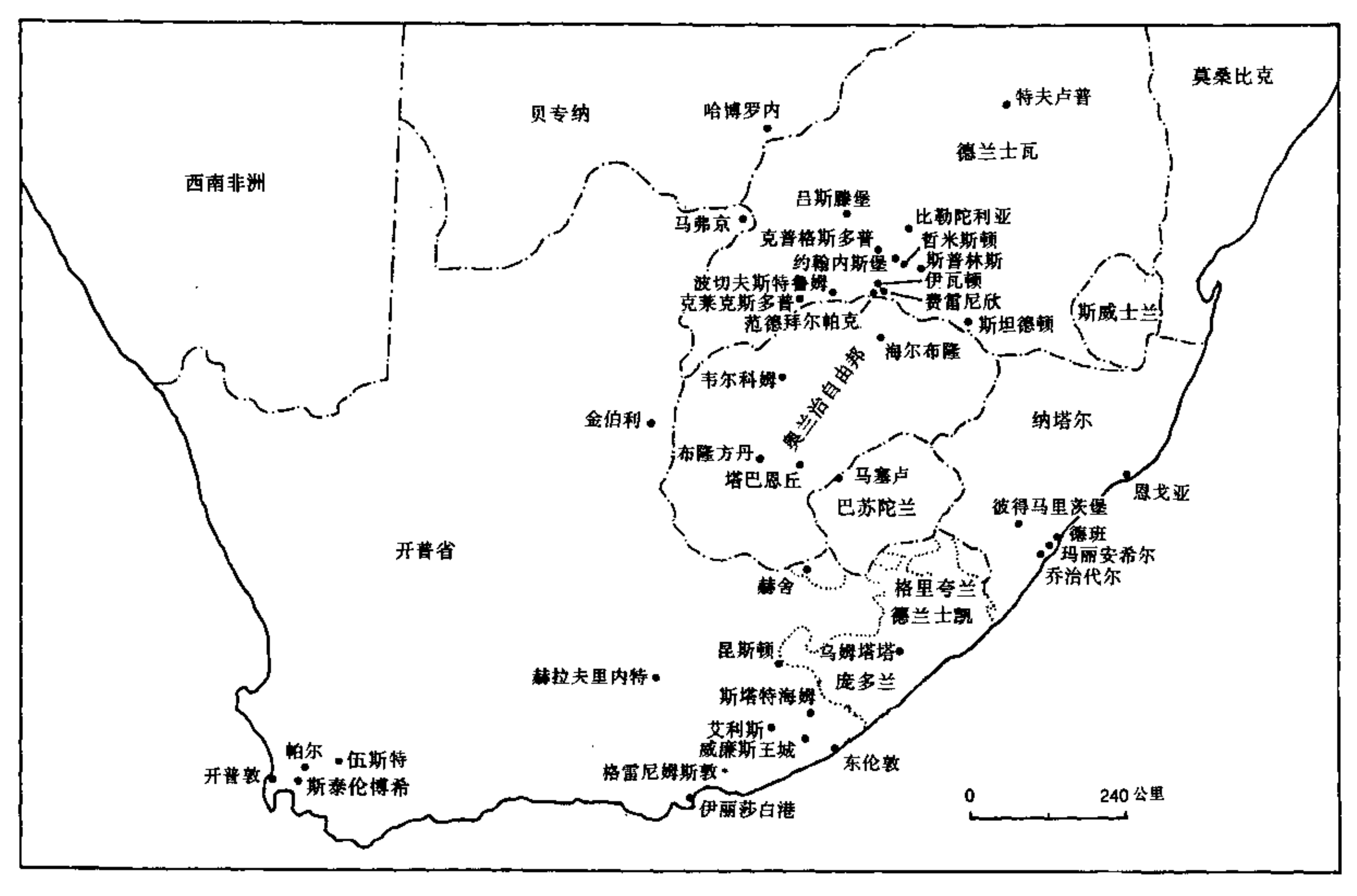


插图 27.1　南非的政治和民族主义，1919-1935 年（根据G. M. 格哈特，1978 年）

有国家的非洲人的组织，其成立大会有来自罗得西亚、巴苏陀兰、贝专纳和斯威士兰各地的代表参加(见插图27.1)。此后，全国性的组织在上述各个国家出现。这些组织照例受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很大影响。非洲南部、中部甚至东部的许多全国性组织不仅借用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名称，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的阶段内也沿用其组织机构、纲领和章程，并因袭了它的方法、优点和缺点。20年、30年、甚或40年之后，继非洲人国民大会之后建立了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尼亚萨兰、坦噶尼喀、肯尼亚、乌干达和巴苏陀兰相类似的组织。

其格局和先例被如此紧密地加以沿用是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时多数非洲国家还682 没有任何知识分子或工人阶级，更谈不上有非洲人的政治组织。当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涌现出来时，那些致力于团结其本国非洲人的人，其目光不可避免地要看看南非联邦内已存在的组织。另一个帮助传播这种影响的重要因素是流向南非联邦的流动劳工。他们逐渐影响非洲中南部的国家，如莫桑比克、尼亚萨兰、南罗得西亚、巴苏陀兰、贝专纳和斯威士兰。当这些人们回到自己村庄时，不仅带回了矿工的职业病，也带回有关外界的知识，如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人民，以及他们争取自身权利斗争中新的团结方式。

到两次大战间隙的初期，非洲人国民大会经历了7年风暴式的活动。其初创阶段直到1925年在年会上采用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名称时始告结束(在此之前该组织称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同年大会通过了会歌与会旗。会歌名为“上帝保佑非洲”，而三色旗——黑、绿、金黄——则象征着人民（黑色)、绿色的田地与草原（绿色）和该国的主要财富黄金(金黄色)。[20] 1919 1935年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政治组织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1926年它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反对当时南非总理J. 赫尔佐格政府试图推出的一系列种族主义法令。1926年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布隆方丹召开了全国大会，大会尖锐地谴责了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要求从宪法上保证全体居民不分肤色一律平等，并决定抵制政府召开的傀儡式“土著人会议”。

同年年底，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一些非洲人组织，如“有色人”的主要政治组织“非洲政治组织”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建立的南非印度人大会（由原有的纳塔尔和德兰士瓦的一些组织合并而成)，共同在金伯利召开第一届非欧洲人大会。大会参加者拒绝“一切基于肤色或种族划分的政策”。他们谴责国内实行的种族主义，强烈反对赫尔佐格的新立法，并号召“南非非欧洲人各个部分的人士更紧密地进行合作”。这标志着一种突破，它是为在南部非洲建立反对种族主义的统一战线迈出的最早的一步。[21]

683 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活跃于国外，对南非人长期参加泛非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所罗门·T. 普拉彻参加了1919年在巴黎召开的泛非主义者大会。1927年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詹·古默迪访问了苏联。

但是，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却有所衰落。当时的领导权掌握在害怕共产党影响的温和派手中。直到30年代中期，由于准备召开全非

[20] M. 本森（Benson)，1966年，第16页。

[21] A. 莱穆莫（Lemumo)，迈克尔·马迈尔（Michael Marmel）的笔名，1971年，第60-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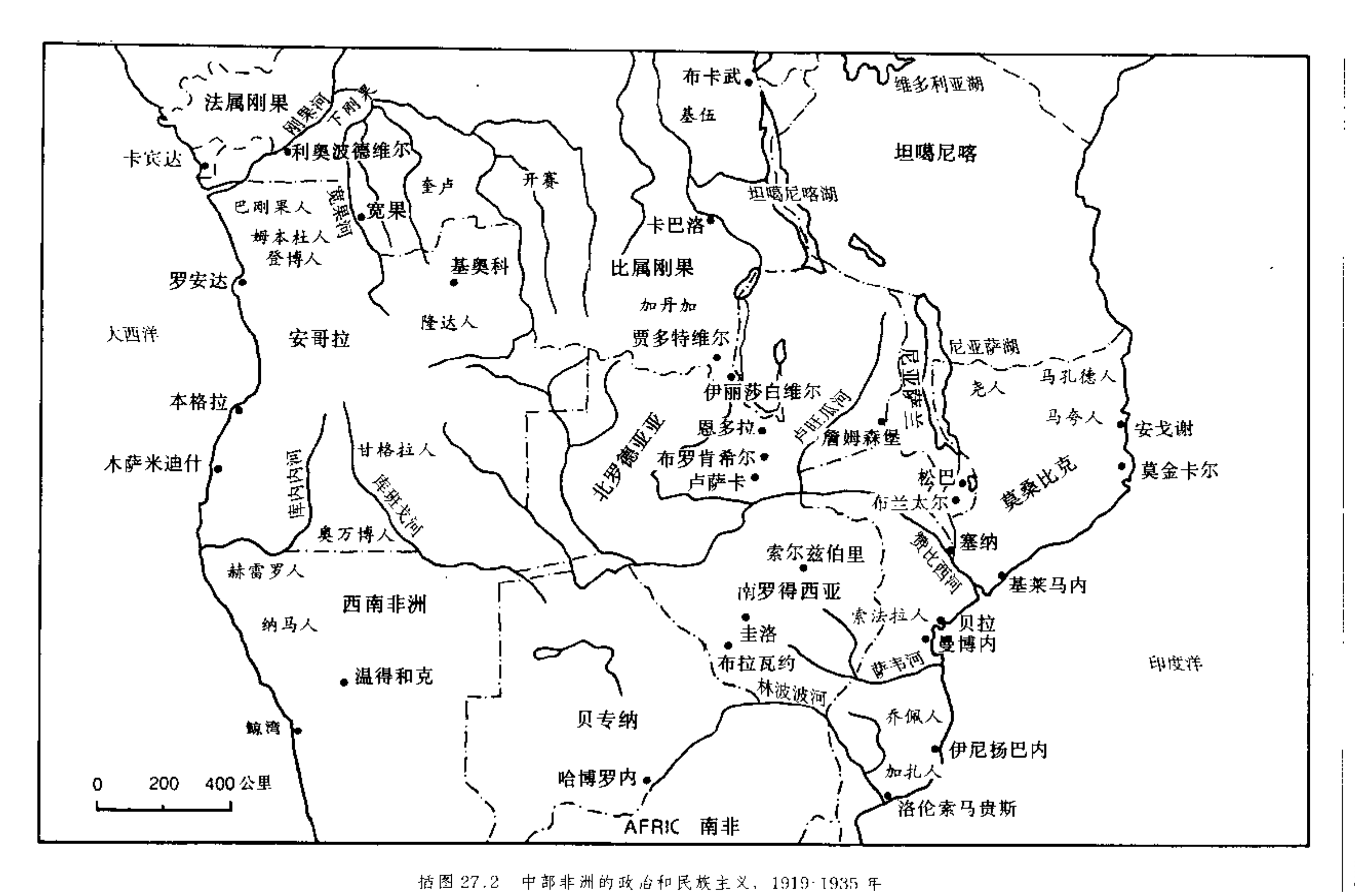


插图 27.2　中部非洲的政治和民族主义，1919-1935年

洲人大会以抗议赫尔佐格立法才又重新活跃起来。全非洲人大会 1935 年 12 月在布隆方丹召开，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来反对土地和选举权法案。大会派出代表团会见赫尔佐格，表达了非洲人民的不满。[22] 但是大会未能就纲领达成协议，也未能制订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

在毗邻的南部非洲国家，非洲人政治组织的涌现也大致沿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尽管并没有发展到南非那样的程度。按照通常的规律，人们总是从为对付地方性问题而组织起来的“土著人协会”、“土著人大会”以及“福利团体”开始，后来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这些组织成为反映本群体日常需要的工具。它们收集并向殖民当局递交申诉、请求和表示不满的呈状。他们逐步把居民纳入政治活动，组织入政治组织或促成此类组织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尼亚萨兰出现了第一个“土著人协会”，20 年代后期此类协会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仅 1933 年在各大城市（松巴、布兰太尔、利莫、利隆圭、约翰斯顿堡、卡朗加和奇拉祖鲁）就组成了 15 个之多。在北罗得西亚，第一个“福利协会”成立于 1923 年，它是直接按照尼亚萨兰同类组织的模式组成的。创建者中有肯尼思·卡翁达之父戴维·卡翁达。[23] 1930 年在这一保护地的行政中心利文斯敦成立了一个相类似的组织。创建者中有两位政府文职雇员艾萨克·尼伦达和爱德华·坦博（二人均为尼亚萨兰血统）。该组织有会员 350 人，并得到通加族酋长们的支持。此后协会在很多地方纷纷涌现，特别是在铜带及铁路沿线城镇，诸如：卢萨卡、马扎布卡、布罗肯希尔、恩多拉、乔马、卢安夏、钦萨利、阿伯康、卡萨马、詹姆森堡以及其他城市和村庄。[24]

在南罗得西亚，新型的政治组织也在战后初期组成。罗得西亚班图选民协会在 1923 年 1 月成立，以便为非洲人谋取更多的选举权和讨还被抢走的土地。其活动仅限于布拉瓦约地区和马塔贝莱兰的某几个地区。在圭洛有一福利协会，在马绍纳兰有一罗得西亚土著人组织。[25]

685

在与南非联邦紧密相连的英国保护地巴苏陀兰、贝专纳和斯威士兰，反殖民主义力量和非洲人国民大会联系密切。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中，马阿马·赛索是索托人，约书亚·莫莱马是茨瓦纳人。在成立大会上当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位名誉主席中，有巴苏陀兰的最高统治者莱齐亚二世和茨瓦纳各主要部族的酋长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报纸《阿班图-巴托》（Abantu Batho），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斯威士兰最高统治者的专款资助。巴苏陀兰最活跃的组织是“贫穷者同盟”，该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贫穷者同盟的社会基础为农民，其中不少人在德兰士瓦充当季节矿工。该组织由马弗曾和约赛尔·莱费拉两兄弟担任领导人，他们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建有联系。[26]

贫穷者同盟的支持者认为英国已违反了与莫舒舒签订的保护条约，从而丧失了对巴苏陀兰的合法权利。部分是由于其极为激进的立场，部分也由于该同盟自 1928 年起日益

㉒ A. 莱穆莫，1971 年，第 74-75 页。

㉓ H. S. 米贝洛（Meebelo），1971 年，第 235-243 页。

㉔ R. I. 罗特伯格（Rotberg），1966 年，第 115-134 页。

㉕ T. O. 兰杰（Ranger），1970 年，第 95-109 页。

㉖ E. 鲁，1964 年，第 212 页。

接近南非共产党，它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感到害怕。英国当局命令酋长们禁止同盟的集会，但是 1928 年 8 月贫穷者同盟为反对这项禁令在马塞卢发动了一场抗议示威。这是巴苏陀兰历史上第一次群众示威，有几千人参加。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J. T. 古默迪从苏联回来后，贫穷者同盟邀请他在巴苏陀兰的一次集会上讲话。因此，该组织在一段时期内被当作"莫斯科的工具"而遭迫害。但它仍继续保持活跃。㉗

南部非洲所有早期政治组织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其成员经常是已经成为专业人员的一些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这些协会和团体经常缺乏明确的行动纲领，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它们为其他人数更多、存在时间更长而更有成效的组织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工业化地区的工人运动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另一新形式。把那些参加早期罢工和参加与罢工几乎同时出现的工会的人称为工人是带有某种保留的。他们多数人，至少是在精神上，有时甚至在经济上，仍在很大程度上过着农村生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产阶级特性。即使如此，非洲的无产阶级运动可溯源于此类早期活动。1918-1920 年在南非联邦发生了最早的群众抗议活动。罢工爆发于德兰士瓦矿山，但罢工者为来自中部和南部非洲许多国家的季节工。㉘第一次群众运动在 1918 年初因抵制矿主向矿工销售食品及工业制成品的商店而发生。这次抵制是由德兰士瓦矿区之一威特沃特斯兰德东部的矿工发动的。 686

第二次罢工发生在约翰内斯堡，参加者为清扫和收集垃圾的工人。罢工者人数较少而组织较好。1917 年在约翰内斯堡市政服务行业雇员中建立的非洲工业工人工会的成员可能参加了此次罢工。罢工遭到镇压，参加者受了审，其中 152 人被判处两个月苦役。这场"垃圾桶罢工"表明任何一部分非洲工人的劳动都是维持大陆上这一最大工业中心的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当时，该市街道上堆满垃圾和污物，有发生传染病的危险。

此次罢工触发了一场更广泛的运动。在举行集会抗议逮捕和不公正判决过程中产生了在 1918 年 7 月 1 日举行非洲工人总罢工的想法。总罢工也将支持非洲工人每天工资增加一先令的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此虽有保留，但仍同意了这种设想。面对这种压力，当局取消了对罢工工人的判决，路易斯·博塔总理并接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分会领导人祖鲁·索尔·姆萨纳为首的非洲人代表团，听取了他们的申诉。总罢工被取消了，但是 7 月 1 日仍有三个矿山的 15,000 名非洲工人停止工作。警察只有在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之后才得以迫使那些拿着斧、锄和金属管作武器的工人进入矿下。在随之而来的镇压中，被控告鼓动罢工的被告席上非洲人与欧洲人兼而有之。被告中有：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分会副主席D. S. 莱坦卡，《阿班图-巴托》报的主编L. T. 姆瓦巴札，非洲工业工人工会三名成员N. D. 恩戈约、H. 克拉依和A. 塞奇韦，以及 1915 年成立的南非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的三位白人社会主义者领导人S. P. 本丁、H. C. 汉斯康比和T. P. 廷格尔。在审讯过程中，检察官根据打入非洲工业工人工会内部的警方密探的报告，控告本丁、汉斯康比和廷格尔煽动约翰内斯堡和矿山的工人罢工。

㉗ E. 鲁，1964 年、第 212-213 页。

㉘ 矿工较小规模的抗议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见P. 沃里克（Warwick），收入E. 韦伯斯特（Webster）所编书，1978 年；S. 莫罗尼（Moroney），收入E. 韦伯斯特所编书，1978 年。

1920年2月新的罢工席卷了德兰士瓦22家矿山，有71,000名非洲工人参加。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从每日2先令增至5-10先令）、给以获得更为负责和待遇更好的职务的机会、大力改进公司经营商店的工作以及放松肤色的限制。罢工者表现了出色的团结精神。人们不得不对这些属于不同部族群体、说不同语言的人能达到如此高度的一致，感到惊讶。军队和警察均投入镇压罢工。[29] 这场罢工是非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直到1946年才发生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罢工，同样也是在德兰士瓦。

687

在罗得西亚，第一次群众性的工人阶级行动是1935年5月发生在北罗得西亚的铜带矿山。矿工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捐税并抗议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抗议并非完全自发的，罢工者采取的做法表明他们中有一批人对运动进行着有组织的领导。到处散发号召罢工的传单，都是用多数矿工的家乡语奇本巴语写成的。罢工于5月22日在穆弗里拉矿开始爆发，次日被军队镇压了下去。但5月26日罢工扩展到恩卡纳矿，5月28日卢安夏矿也开始罢工。在与军队的冲突中有28名罢工者伤亡，并有大批工人遭到逮捕。这场罢工的反响远远超出了铜带。因为铜带与邻近的加丹加一样，它的许多季节工也是从非洲其他地区吸引来的。[30]

当非洲人无产阶级运动向前发展时，白人工业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却趋于消沉。1922年初，德兰士瓦白人矿工的武装起义是南非白人工人最后一次大的行动。当非洲人无产阶级人数增加时，白人工人不断被指定为监工，发展成为工人贵族。战后初期，在席卷南部非洲的工业活动最高浪潮的基础上成立了最大的非洲人无产阶级组织。20世纪20年代这一行动达到顶峰而后又走向衰落。非洲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是1919年在开普敦非洲人和有色人码头工人罢工中诞生的。第一次成员会议时参加者不足30人。但5年后，在1924年会员已达3万人。到1927年发展到10万人（其领导人甚至声称达25万人），在南非联邦以外的罗得西亚及其他国家均有它的会员。非洲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力图把行业根本不相同的人团结在一起。把市政服务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矿工、海员、农工、工厂工人、港口和运输工人以及从事贸易和服务业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在非洲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会员中既有有色人也有非洲人。[31]

688

非洲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的章程前言，反映出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 鉴于工人及其雇主利益的对立，前者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只得到所创造财富的一部分作为报酬；而后者依靠剥削工人劳动力为生，以利润方式剥夺工人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必须不断地围绕人类劳动成果的分配进行斗争，直到工人通过自己的组织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生产资料，由工人拥有并掌握，用于为全体而非少数人谋福利。在这一制度下不劳动者不得食。

---

[29] 有关这些罢工的材料见P. L. 邦纳（Bonner），收入B. 鲍佐利（Bozzoli）所编书，1979年；E. 鲁，1964年，第132-134页；H. J. 西蒙斯和R. E. 西蒙斯，1969年，第220-243页。

[30] R. I. 罗特伯格，1966年，第161-168页。较小规模的罢工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31] 对非洲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的分析见P. L. 邦纳，收入E. 韦伯斯特所编书，1978年；C. 卡达利（Kadalie），1970年；S. W. 约翰斯（Johns），收入R. I. 罗特伯格和A. 马兹鲁伊（Mazrui）所编书，1970年；K. 勒克哈特（Luckhardt）和B. 沃尔（Wall），1980年，第39-46页。

分配报酬的原则将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非洲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为自己规定了众多的各色各样的任务。它向会员承诺要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养老金、疾病和失业津贴以及保护工人权利。非洲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宣布整个非洲大陆为其活动范围。

该工会在南非联邦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克莱门茨·卡达利（约自1896-1951年）是从尼亚萨兰来到南非的季节工。他曾在尼亚萨兰毕业于教会学校，因而能成为教员。非洲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点。但在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时，由于它分裂成了三派而急剧衰落。[32]

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早期的非洲无产阶级组织，即前述非洲工业工人工会中也能感觉到。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在该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联盟是由南非的白人社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活动家组成的。这些人日益认识到无产阶级不分肤色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在1918-1920年向黑人和白人工人发出的呼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当1920年2月德兰士瓦非洲人矿工罢工时，社会主义者在白人矿工中散发了一份由联盟领导人之一S.P.本丁（1873-1936年）所写的题为“不要破坏罢工”的传单。其中一部分内容如下：

> 白人工人们！你们听到新的劳动大军的到来吗？土着工人们开始在觉醒。…… 689
> 白人工人们！不要排斥他们。……站在劳工一边，即使是土著劳工，来反对我们共同的资本家老爷们。[33]

在早些时候发给非洲人工人的题为“致班图工人们”的传单中，社会主义者们写道：“尽管你们肤色不同，你们是世界工人的同类。一切为工资而工作的人都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劳工兄弟群体”。[34]

另一份1918-1919年以英语、祖鲁语和索托等语言书写的传单向“南非黑、白工人们”发出了如下的呼吁：“作好准备的方法是在车间中联合起来，作为工人，不分肤色联合起来。要记住对某个人的伤害，不管他是黑人还是白人，即是对整体的伤害。”[35]当时这类呼吁很难实现。工人们，无论是黑人工人或白人工人，人数都过少，也太不老练。但是，重要的是了解到这样早的时候在非洲土地上已经传播这种思想了。

1921年在开普敦召开的大会上，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与其他南非社会主义者组织合并，宣布成立了南非共产党。这是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共产党。该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提出了它的奋斗目标。它谋求将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想与真正的国际主义相结合。这种国际主义代表着更为进步的成员的思想，即在国际上促使完成下列任务的日子早日来到：“永远结束阶级战争，使人类不再在压迫者的打击下退缩，生活必需品与设施、舒适与文化、尊严与权力将属于劳动者而非剥削者，没有人再被称为主人或仆人，而同

---

[32] C.卡达利，1970年，第52-53页，第61-62页。
[33] E.鲁，1944年，第46-48页。
[34] 见《南非联邦》，1922年，第288-289页。
[35] 见《国际》，约翰内斯堡，1919年4月25日。

样都是工人伙伴。”[35]

应该承认，南非共产党不可能立即制定一项包罗万象的计划以解决南部非洲特殊的和复杂的问题。可能在开始时他们过多地依靠了欧洲的经验。在南非特定的条件下出现这一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从南非共产党早期的成员全都只是白人和受西欧——特别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巨大影响，再加上南非情况的复杂性，就足以解释这一点。然而，到了本世纪30年代初，非洲人占了党员中的多数，总书记成了一位祖鲁人艾伯特·恩佐拉（1905-1934年）。从此，民族的解放成了该党工作的中心。

690 比属刚果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

国家控制日趋加强、种族主义的罗网日趋严密，精心制订的保护政策以及传染病的流行，削弱了比属刚果社会抗议的效力。[37]尽管如此，群众性的反抗活动仍在继续，只是规模比较小，活动方式也不同于前一阶段。

刚果农民的反抗经常是分散的，不易觉察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目的在于避免或缩小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破坏性影响。逃税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更为频繁地发生着。数以千计的刚果农民，在国家税收官员到来之前，越过边界逃到毗邻的安哥拉和法属刚果，另一些人则消失在丛林之中。安哥拉边境地带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这里葡萄牙殖民主义存在的程度极小，同时也由于历史上的纽带把边界两面的巴刚果人联系在一起。许多农村人口利用同一战略避免为国营项目、矿山或欧洲人种植园劳动。据一位被命令去加丹加铁路线劳动的长者回忆“我们只是逃离开我们的村子……但无人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甚至博马的白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夜晚离开村庄走向卢阿普拉河，好心肠的渔夫把我们渡过河去。”[38]另一些农民拒绝种植强迫他们种植的棉花或水稻，或者种植的数量少于规定的总数。[39]

但是，当国家的政治机构扩展到更为边远的地区，并建立起一个忠于殖民者的酋长们组成的网络时，留在殖民地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可能性就大为减少了。从1917到1924年间征得的捐税增加了400%以及被迫种植棉花的农民人数急剧增加这些事实中，反映出国家权力的加强。[40]据估计1935年有90万以上的农民陷入了棉花种植体系。

691 考虑到此种力量对比上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常发生的那种直接对抗到这时几乎完全消失就不足为怪了。偶尔，不满的农民会袭击压迫的象征——忠于殖民者的酋

---

[36] A. 莱穆莫，1971年，第117-120页。

[37] 关于殖民统治时期的概况见B. 朱西威基即将出版的书；J. 斯滕格斯(Stengers)，1974年，第391-440页。对动乱的讨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直到最近，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段平静时期，因而只集中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总的说来作品中还另有一种经济方面的倾向，即把农民单纯看作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在殖民地资本主义体系内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这一看法否认了那些在决定自己命运中起一定作用的农民作为历史动因的尊严，把他们当作无动于衷的、淡漠的牺牲品。

[38] 转引自C. 佩林斯，1979年，第153页。

[39] B. 朱西威基，收入M. A. 克莱因所编书，1980年，第62-68页。

[40] B. 费特（Fetter)，1976年，第83页；B. 朱西威基，收入M. A. 克莱因所编书，1980年。

长、非洲人警察和收税者。据说，1920 到 1922 年间在下刚果曾发生过远比这更为危险的农民起义。10 年之后，在宽果地区发生过类似行动。[41] 1931 年在奎卢的彭达农民和工人中也发生过这类暴动（见插图 27.2）。捐税的大幅度增长、农民到手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了 50%，以及尤尼利弗公司降低种植园职工工资的决定，对群众的不满火上浇油，导致了 1931 年的大起义。起义者还得到了额外的参加者，由于一个名叫马泰穆-阿-凯内尼亚的“先知”揭示了祖先的教诲，号召非洲人杀死并破坏这里所有白人的牲畜和物品，以及一切欧洲人统治的象征，作为上天干预与结束白人统治的先导。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有 400 名以上的彭达人和 1 名欧洲人在此过程中丧生。[42]

宗教性政治运动吸引了更多的农民追随者，部分原因是由于殖民当局对政治组织执行严格禁令。他们的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 1921 年衰退所造成的难以预测的经济前途，以及 10 年后的萧条，所怀有的不安与失望。

这些运动中最大的是以一位巴刚果农民西蒙·基班古为名的基班古运动。作为传道师，基班古宣称自己曾与神接触，从而具有医治疾病、战胜巫术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他在 1921 年对那些以能有一位黑色的弥赛亚而自豪的追随者们宣称：他是上帝的使者、先知和儿子。基班古的巴刚果语名字是“根脊”（在一起），是受天赐才能的象征。[43]

基班古还笼统地、但模糊地宣称他将把非洲人从殖民主义压迫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的反殖民主义言论，他的日益高涨的声望，以及他的一些追随者所表现的战斗性，使比利时官员坚决认为必须把他除掉。1921 年 9 月 14 日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来他被放逐到加丹加。在那里他像一个殉道者一样死于 30 年之后。[44]

尽管基班古本人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的追随者们使这一运动变成强烈的反对欧洲人的运动，而不单纯是宗教性的。该运动“刚果属于刚果人”的口号，给自发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性抗议提供了出路。基班古主义者劝说群众不为欧洲人工作，不种殖民当局强迫他们种植的作物，不交捐税，不送子女入教会学校，并且普遍地不服从比利时人。[45] 692
他们的赞歌充满了对基班古英雄业绩的歌颂。并且根据比利时官员的看法，他们一直怀有希望：基班古及其弟子们将“回来结束殖民统治”。[46]

20 年间，基班古运动不时再生，一般都发生在局势极度紧张和经济上有压力的时候。他的信徒们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积极参加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的宣传甚至在 1921 至 1925 年间影响到扎伊尔南部的铁路工人、白领工人和榨油工人的罢工。尽管遭到残酷镇压，基班古主义者毫不畏惧。仅在 1921 年运动刚开始时就有 37,000 人从下刚果被逐走。但他们仍坚持从事活动，并在流放地吸收新的信徒。相互间往往只有松散联系的基班古主义的各种分支在刚果全境出现。基班古主义者在刚果还与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非

[41] A. T. 恩佐拉，I. I. 波铁辛及A. Z. 朱斯马诺维奇，1979 年，第 108-111 页。
[42] 同上；E. 巴斯廷（Bustin），1975 年，第 119-120 页。
[43] G. 巴兰迪（Balandier），见P. 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所编书，1965 年，第 443-460 页。
[44] 同上，第 450 页。
[45] 《非洲史》莫斯科，1968 年，第 391-392 页。
[46] G. 巴兰迪，见P. 范·登·伯格所编书，1965 年，第 450 页。

洲基督教会以及法属刚果法国殖民主义的反对者们保持联系。

在基班古开始他的活动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个较大的独立的教会运动——非洲守望塔运动，在刚果普遍地被称为基塔瓦拉。最初支持它的基地似乎是在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坦噶尼喀。到1923年来自北罗得西亚东部和坦噶尼喀西部的布道者开始在加丹加省，主要是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劳工召募站附近地区，吸引了大批信徒。[47]基塔瓦拉运动的名称在斯瓦希里语中是“统治手段”之意。在其强有力领袖托穆·尼伦达（又称穆瓦纳·莱萨——上帝之子）的领导下采取了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姿态。除了“非洲属于非洲人”、“种族平等”等战斗性口号外，尼伦达及其主要副手们还鼓励其信徒们暗杀欧洲人及其非洲同胞，特别是忠于殖民者的酋长们。

到1926年，基塔瓦拉运动已在加丹加南部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当地曾发生过一系列的传染病，在那里也最能深刻地感受到劳工召募制度的毒害。该运动的影响还达到开赛省和基伍省的矿区。当矿工在合同期满返回家乡时，把基塔瓦拉的影响又带到了东部及赤道地区。尼伦达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及其与某些持反对意见的酋长的日趋紧密的关系，都使殖民当局深感担心，遂于1926年派军队去逮捕他。尼伦达逃到北罗得西亚，在那里被英国当局扣留，并最后被处决。[48]

693

像基班古运动一样，除掉了先知并不能削弱群众对基塔瓦拉的支持。在农村地区，基塔瓦拉传教师们组织了反捐税的抗议活动，并激起人们对殖民者所任命的酋长的不满情绪。一个由蒙巴·拿破仑·雅各布领导的分支开始大规模渗透到伊丽莎白维尔（卢蒙巴维尔）的劳工、铁路工人以及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所雇用的矿工中去。基塔瓦拉信徒们帮助组织了1931年伊丽莎白维尔的抵制运动。5年后又在贾多特维尔的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分司工厂的工人骚乱中起重要的作用。在贾多特维尔罢工中，一名直言不讳的基塔瓦拉成员引用宗教经文攻击按种族发给不同工资的不公正行为。他手中举着圣经声称：“这本书说得清清楚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上帝并未创造白人来统治黑人……黑人干活但仍处于贫穷悲惨的境地，而白人的工资却比黑人高出如此之多，这是不公正的。”[49]贾多特维尔罢工之后，国家试图再次粉碎基塔瓦拉运动未能得逞。此后，基塔瓦拉运动在1941年的伊丽莎白维尔罢工中又起了重要作用。[50]

从30年代才开始举行罢工这一点，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速度在比属刚果都远不如南非。铜、锡和铀矿在加丹加的发现，钻石矿在开赛省的发现，以及金矿在基洛莫托的发现，迅速促进了一支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到20年代，约有6万以上的劳工参加了矿产的发掘。

---

[47] 关于刚果基塔瓦拉运动的最重要的分析见即将出版的J. 希金森（Higginson）的著作。大部分关于基塔瓦拉运动的讨论来自这篇文章。

[48] 同上。

[49] 转引自C. 佩林斯，1977年，第50页。

[50] J. 希金森，即将出版。基班古运动和基塔瓦拉运动并不是刚果唯一的宗教性政治运动。活跃于班敦杜省的穆冯古、卢库苏及姆佩韦等派别鼓动非洲人不为比利时人工作，而要作好比利时人被赶走后的准备。这也是30年代班敦杜省和西开赛省“多嘴蛇”派（或称人蛇派）的主张。扎伊尔南部的“黑色传道团”和通济派以及“豹人”运动则反对在扎伊尔北部强迫种植出口作物。

正如非洲其他地区一样，非洲人对于低工资和矿山工作条件恶劣的最初反应是逃跑。大批农民逃离加丹加省与开赛省以躲避为加丹加劳动交易所工作的代理人。该交易所是一个在加丹加召募并分配劳工的机构。还有些人是在抵达矿山后不久逃跑了。逃跑成为如此严重的问题，以致加丹加劳动交易所早在 1914 年就实行了通行证制度，并设立指纹局以追踪“逃亡者”。[51] 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些高压策略，逃亡仍继续盛行。例如，1918 年明星矿和利卡赛矿的逃亡率分别为 74%和 66.5%。尽管逃亡率在 20 年代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 20%到 35%之间。直到大萧条时期，由于缺乏其他方面可供选择的收入来源，才使这一战略产生相反的作用。[52] 694

当数以千计的人逃离矿山时，留在加丹加的人为改进就业条件开始组织了起来，尽管这种组织往往是极其初步和零散的。举例而言，1921 年路易希的许多矿工，停止工作，去伊丽莎白维尔向政府官员控诉他们所受的虐待和口粮不足的情况。两年后在卡康特韦矿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53]

大萧条造成了新的经济前途莫测。当矿业界力求降低成本时，就业机会消失了，工资下降了，劳动条件也更形恶化。尽管以解雇威胁矿工，但是 1931 年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的基普希、鲁阿希以及姆斯韦努・迪图矿山中仍都发生停工和劳工“暴动”现象，使生产暂时陷于瘫痪。[54] 同年，工人们还在伊丽莎白维尔组织过一次运动，以抵制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所属各商店及独立的欧洲商人抬高日用品价格。这场抵制运动在结束前已扩展到邻近地区，并得到建筑工人、木工和砌砖工人的支持，这表现了工人觉悟的提高。[55] 上加丹加地区行政长官对这一新的战斗性哀叹道：“尼格罗人充满着无限的高傲”，他轻蔑地说，“他们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了，他们不再被动地服从命令。他们讨论发给他们的命令，讨价还价，有时还蛮横无礼。”[56]

战斗性的加强也在 1935-1937 年间加丹加矿工和其他行业工人阶级的一系列罢工中表现出来。雇员们对低工资和种族歧视的抗议使上加丹加矿业联营公司在贾多特维尔的工厂以及在马农和姆万札的矿山关了门。大湖铁路公司所雇佣的尼恩巴和卡巴拉的铁路工人以及尼恩巴国营棉纱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57] 虽然其领导人被捕，罢工被镇压，但是群众情绪激昂，地下组织也在发展，集体的自信心不断增强。所有这一切为 1941 年的大罢工奠定了基础，这次加丹加全省所有锡矿和铜矿的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他们的目标超过了狭隘的经济要求。一名欧洲观察家注意到：“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即把白人驱赶出去，以基塔瓦拉的黑色旗帜取代比利时的蓝色旗帜，以表示政权的改变。”[58] 695

至于比属刚果政治组织的建立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发展，像工人运动一样，远比南非

[51] C. 佩林斯，1979 年，第 153 页。
[52] 同上，第 171 页；B. 费特，1974 年，第 208 页。
[53] C. 佩林斯，1979 年，第 213-235 页。
[54] J. 希金森，即将出版，第 8-10 页。
[55] 同上，第 9-10 页。
[56] 转引自B. 费特，1974 年，第 217 页。
[57] J. 希金森，即将出版，第 10-13 页。
[58] 转引自前引书，第 60 页。

缓慢则确是事实。像巴刚果协会这样明确无误的民族主义组织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产生。[59]但本章所论及的这一阶段中，像姆班尼（Mbeni）那样的秘密团体却日益增多，这种团体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殖民地派驻德属东非的非洲人士兵传播回来的。姆班尼最初是一些舞蹈团体，也为其成员提供自助网络。其领导人经常按欧洲军队的模式使用军衔，因而给人以印象：他们具有某种程度的欧洲式权力。尽管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殖民统治，但他们往往以歌曲和舞蹈嘲弄欧洲人官员，表达了群众对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的不满。姆班尼各团体拒不接纳那些被认为是欧洲人支持者的非洲人。那些与欧洲人有密切关系的人不能担任领导职务。[60]

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明确的抨击与对忠于殖民者的人的攻击，引起了急于镇压一切形式社会抗议的比利时官员的关注。1923年，一个政府的小组委员会得出结论：姆班尼各团体已变得日益激进，并为共产主义的渗透开了方便之门。3年之后，一切非洲人的城市组织，包括姆班尼在内，全被置于殖民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政府还鼓励本笃会传教士们去组织那些与姆班尼相竞争的团体，后者的成员向姆班尼各团体的成员挑动械斗。到30年代中期，政府的破坏，群众性械斗，姆班尼内部的倾轧以及大萧条时期城市居民的流离失所诸因素都使此类团体的影响和重要性遭到削弱。[61]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经济、政治背景：概论

安哥拉与莫桑比克尽管距离遥远，民族组成与经济情况也千差万别，但是这两个殖民社会之间的共同点却超过了与它们毗邻的国家。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由此而产生的群众性反抗，根植于四个方面的因素：殖民国家固有的弱点，殖民政权发展起来的极权主义本质，葡萄牙缺乏资本以及对强迫劳动与同化政策的双重依赖。

696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安哥拉与莫桑比克仍有数量可观的地区处于里斯本有效控制之外。殖民当局牢牢控制着罗安达、本格拉、贝拉和洛伦索马贵斯等沿海城市周围地区及其腹地，但对内地广大地区的殖民统治实际上有名无实，只能经常依靠与当地酋长和非洲人警察的联盟关系，而这些人的忠诚程度是大可怀疑的。

举例而言，安哥拉南方的奥万博人直到1914年仍保持着有效的独立，邻近的甘格拉地区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917年，而隆达人的基奥科家园直到1920年才被占领。在北方，刚果地区的反对活动持续到1915年，而登博暴动者对殖民政府的公然反抗持续到1918年。[62]

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情况不过略为好一些。北方一些素丹领地和尧族酋长领地在1914年以前一直有效地反抗着殖民政权。直到1921年马孔德高地仍停留在殖民统治势

[59] 举例而言，见H. 韦斯（Weiss），1967年；C. 扬（Young），1965年。

[60] B. 费特，1974年，第210-215页。

[61] 同上。为了全面研究姆班尼团体在非洲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发展和扩散，参阅T. O. 兰杰，1975年。

[62] R. 佩利西埃，1977年，详细探讨了上述暴动。

力范围之外。更有甚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军队从毗邻的坦噶尼喀入侵莫桑比克北部时，一些处于尼亚萨公司严厉统治下的马夸酋长领地的人把他们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甚至在殖民政府已牢固控制住局势的殖民地的南半部，官员们仍担心爆发一场大规模起义（见图 27.2）。[63]

在战后的余殃中，里斯本加强了其统治的独裁性质。共和国早期的“开明”政策让位于更具压迫性而未必更为有效的计划。共和国由于无能和腐败，最后在 1926 年被银行家、实业家、僧侣统治集团和军队的保守同盟所推翻，这为安东尼奥·萨拉查的法西斯政府上台铺平了道路。为了确保社会和谐和永保殖民统治，萨拉查极端民族主义的总体思想的设计出笼了。各殖民地政权也像葡萄牙的政府一样，采取了广泛的镇压措施。检查制度、告密者、秘密警察和军队都被用来镇压一切反抗，不管出现的是黑人还是白人。

第三个共同点是由于宗主国贫穷而造成的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特殊的经济剥削方式。在本章所研究的时期内，葡萄牙从其非洲殖民地攫取资源的能力主要依靠对强迫劳工的动员和控制。这是由于它本身的经济既体制陈旧又濒于破产，没有能力输出开发所必需的固定资本。1899 年，一个旨在分析安哥拉与莫桑比克开发前景的官方调查委员会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最后一点：

697

> 我们需要土著劳工。我们需要它既是为了改善这些劳工的状况，我们需要它也是为了欧洲的经济和非洲的进步。没有非洲人，就不能发展我们的赤道非洲。开发该地所需要的资金（而它又是如此需要开发）也取决于能否获得用于开发的劳工。需要大量的、廉价的、强壮的劳工……而这种劳工永远不可能由欧洲移民充当。[64]

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税收法以迫使许多从事农业的非洲人离开土地，从而开始产生半无产阶级。税收法确实为殖民当局提供了新的岁入来源，但并未获得殖民政权预期规模的廉价劳动力。许多农民种植新的或额外的经济作物来支付税收，从而避免被召募为劳工。在莫桑比克的人们宁愿到毗邻的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矿山和种植园去做工，那里所付的工资比资金不足的葡萄牙公司和种植园要高出 200-300%。

既然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新生的资本主义成份无法通过税收的“刺激”或有竞争力的工资来吸引劳工，正如本书第 15 章中所详细叙述的那样，殖民政府早在制定第一个土著人劳工法时就非凭借赤裸裸的强迫手段不可了。强迫劳动的法律基础在该劳工法的第一条就作了叙述，虽然强迫劳动几经伪装才一直维持到 1961 年：

> 一切葡萄牙海外土著居民都有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通过劳动来获得他们所缺少的用以维持并改善他们社会状况的东西。他们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完成上述义务的方法。但他们如不能完成上述义务，行政当局可以强制他们来完成。[65]

殖民当局确实使用了强制手段。地方行政官员完全可以决定谁是“没有用的”，实际上由于提供非洲劳工，这些站长从欧洲种植园主、商人、工厂主和农民手中得到的礼物

---

[63] 关于这一时期非洲人抵抗的情况，见A. 伊萨克曼，1976 年；M. D. D. 纽伊特（Newitt），1981 年，第 57-64 页。

[64] 转引自J. M. 达·席尔瓦·库尼亚（Cunha），1949 年，第 144 页。

[65] 同上，第 151 页。

698 和好处补充了他们菲薄的薪金的不足。结果使农村地区变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地。当白人移民的庄园、修筑道路、扩建罗安达、洛伦索马贵斯以及贝拉三市的港口、铺设铁路线以及家庭仆役或任何公私差役需要劳工时，地方行政官员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他们的统治和权力满足这种需要。虽然从法律上讲妇女是免于强迫劳动的，但她们经常惨遭同样的命运。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在1924年访问安哥拉与莫桑比克时观察到：

> 女人，甚至孕妇或带有吃奶孩子的妇女，被送到锡佩斯附近去修筑道路。政府在偏僻的地方搭一些小工房给她们住。不付工资，不给食物，为期一至五周，视情况而定。但同一个妇女在同一年内仍可能再次被征。村中其他人为她们送饭，有时要走整整一天的路程。年仅15岁的女孩子就被征来，有的还被管事的强奸。她们在手执棍棒的黑人监工监督下劳动，每天6点钟上工，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一直劳动到日落。有些妇女因干重活而流产。[66]

1926年以后，农民们特别是在莫桑比克，还被强迫来种植棉花，并按被压低的价格出售给欧洲特许公司。不这样做就等于犯罪，要受到相应的处罚。[67]

最后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实行同化的政策。殖民政权以此争取新生的非洲资产阶级，给他们披上葡萄牙文化的外衣，使他们免遭某些最臭名昭著的殖民统治的虐待。由土著人政权法正式加以规定，这一政策保证绝大多数的安哥拉人和莫桑比克人被固定在从属的种族、文化和阶级的地位。这一立法把非洲人分成了两部分：能读、能写他葡牙文的极少数人，他们放弃了"部落习俗"而受雇于资本主义行业，并从中得到报酬，这类人被划分为同化人；或称新土著人。他们至少在原则上享有与葡萄牙公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在理论上任何一个非洲人都有可能改变其法定地位，但是殖民地资本主义体系所强加的限制，诸如缺乏学校，有工资的就业机会极少以及政府官员在文化上的傲慢偏见，有效地排除了这种改变的可能性。因此，99%的非洲居民的最起码的公民权也得不到承认。[68]

699 安哥拉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

被欧洲人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非洲人，他们遭受体罚，有时还遭到来自殖民当局的蛮横无礼与贪婪的待遇，他们应付劳工召募者以及狼狈为奸的政府官员和葡萄牙居民，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成为无处容身的人。然而，他们也确实具备一些办法来逃避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压力。

第一种抵抗的方式是拿起武器，但这种方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被坚决地放弃了。因为这种方式最终是无望的，并注定是要失败的。情况是领袖人物越来越少，多数武器被没收，除个别情况外在公开的市场上已不可能买到火药。第二条出路是逃匿。

---

[66] E.A.罗斯（Ross），1925年，第40页。

[67] A.伊萨克曼，M.斯蒂芬(Stephen)，Y.亚当(Adam)，M.J.霍曼(Homen)，E.马卡莫(Macamo)和A.菲利莱奥（Pilião），1980年。

[68] G.J.本德（Bender），1978年著作中对同化的幻想以及相应的关于葡属热带的理论作了有力的说明。

当情况变得难以忍受时，整个村庄抛弃耕地，迁移到殖民当局鞭长莫及的地方。农民逃亡到北部与东部地区的极为普遍，那些地区仍有效地处于里斯本控制之外。这种逃亡往往可以持续好几年不被发现。

第三种解决办法更为激进，这是一切意图和目标中最具决定性的一个。广泛的证据证明，有大批人秘密迁到比属刚果、北罗得西亚甚至西南非洲。农村居民经常背负着幼儿长距离地通过穷山恶水，以逃避葡萄牙人专制的殖民统治。如果他们被殖民当局或当地非洲警察捕获，男人被毒打并被投入监狱，妇女遭受奸污。

第四种抵抗殖民统治的方式是非洲人利用殖民地宗教而创建的宗教式的或称弥赛亚式的崇拜。在安哥拉这种超自然方式的叛乱背后看不出任何当地能动精神的痕迹。因为绝大多数独立的教会最初来自比属刚果，后来才传入安哥拉北部的巴刚果地区。

不同于比属刚果的是：这里的独立教会信徒较少，存在的时间也短。1918年的马富卢起义有时被称作第一次导致武装起义的安哥拉弥赛亚式抗议。[69] 西蒙·基班古的追随者在居住于安哥拉境内的巴刚果人中赢得了一些信徒，殖民当局由于害怕其对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巴刚果民族主义的复活，在1921和1922年竭力镇压基班古运动。但是，尽管他们做了极大的努力，地下组织却继续活动，而且像在比属刚果一样，基班古在被捕后获得了一种殉道者的气氛。[70]

其他不那么出名的教派有1930年在卡宾达出现的马艾格尼和1924至1930年间在 **700** 姆本杜人中涌现出来的转瞬即逝的卡桑古拉运动。基塔瓦拉运动也在1932年前后从比属刚果和北罗得西亚传入安哥拉东部。两年后一位来自刚果的与基班古运动有关的先知在庞博地区吸引了一批追随者。1936年在刚果边界附近活动的马扬吉（或称恩伦沃）教派禁止它的一切成员与白人友好。尽管资料极为零散，但看来这种以宗教形式表这的抗议，影响是有限的。只有到20世纪50年代托科主义兴起，才出现一个独立教会吸引大量稳定的信徒。但是托科主义表现出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把白人殖民主义者描绘成恶人，而另方而又教导人们顺从。[71]

上述抗议多数以农村为基地，而罗安达与里斯本的同化了的知识分于和新闻记者则直言不讳地揭露殖民主义的弊端，并重新肯定了自己的安哥拉人身份。实际上，见诸文字的大量有关抗议的资料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中叶。这些最初的民族主义者中，最著名有教士安东尼奥·何塞·德·纳西门托（1838-1902年）、律师兼新闻记者何塞·德·方坦斯·佩雷拉（1838-1891年）、作家乔基姆·迪亚斯·科遍罗·丹·马塔（1857-1894年），以及其他一些与题为《沙漠中的安哥拉之声》的出版物有关的组织的成员，该书于1901年在里斯本出版，是一部强烈地反对殖民主义的著作。[72] 君主制的垮台（1910年10

---

[68] 见R. 佩利西埃，1977年；W. G. 克拉伦斯-史密斯（Clarence-Smith），1979年，第88-89页。

[69] A. 马格里多（Margarido），收入R. 奇尔科特（Chilcote）所编书，1972年，第37-39页；R. 佩利西埃，1978年，第165-167页。

[71] A. 马格里多，收入R. 奇尔科特所编书，1972年。

[72] 这种见诸文字的抗议传说资料见D. L. 惠勒（Wheeler），收入R. 奇尔科特所编书中，1972年。

月）和共和政府的成立，受到了同化人的欢迎，也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希望。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已在下降，在他们的故国奴隶制仍在秘密地进行。但是，即使在这一自由化的浪潮中，这些接受了更多教育的非洲人中刚刚萌生的民族主义感情，也只有在葡萄牙才能比在安哥拉更为公开地流露出来。

1910年在里斯本组成了侨民联盟，不久又组织了殖民地联盟。两年后，住在里斯本的来自各殖民地的非洲移民组成了保卫非洲权利委员会。在安哥拉本土，一个由安哥拉文职人员组成的小小的安哥拉联盟，在1913年正式获得诺顿·德·马托斯总督的承认。但几乎马上就发生分裂，导致非洲人同盟的出现。尽管这类组织不断发展扩散，但它们都缺乏应有规模的支持者，影响也极其有限。

远比这类组织的组成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1916-1917年的北宽札"阴谋"，因为它暂时把一些已被异化的知识分子和住在罗安达内地的姆本杜农民联系了起来。这一行动的领导人是小安东尼奥·德·阿西斯（1887-1960年）。他是一名律师、小说家和新闻记者。[73] 他强烈地谴责殖民压迫以及给予白人移民社会的优惠待遇。他认为移民社会"仍主要由一批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也不知将去何处的人所组成，他们为利欲所推动，只是为了攫取、夺走他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74] 由于害怕同化人与农民间联盟的发展以及担心起义会接连发生，殖民当局迅速采取了行动，小安东尼奥·德·阿西斯被捕，仅免于被流放。

701

在里斯本，主要由来自圣多美的黑白混血人领导的保卫非洲权利委员会没有什么力量。其中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在1919年分裂出来建立了非洲人联盟。后来罗安达的安哥拉联盟也依附于后一组织。为了避免为左翼分子所接管，保卫非洲权利委员会于1921年改组为非洲人国民党。穆泰蒂斯和穆坦迪斯这两大城市组织代表着当时在葡萄牙占优势的两股泛非主义潮流。非洲人联盟选择了杜波依斯博士的改良主义；而非洲人国民党则更同情于马库斯·贾维的哲学。[75]

1921年，当坚决反对安哥拉联盟和非洲人同盟的诺顿·德·马托斯高级专员回来后，这两个组织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1922年他正式取缔了这两个组织，并下令逮捕小安东尼奥·德·阿西斯，安哥拉联盟几名有影响的成员被流放，并且最终正式解散了安哥拉联盟。他还取缔了"排外主义者"的报纸，取消了同化人文职人员的晋升机会。安哥拉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经这次打击后转入地下。此后，1922至1925年间在罗安达-马兰热走廊曾发生过几起零星的反对强迫劳动的抗议。国家利用这些抗议所提供的机会，粉碎了知识界持异议的最后痕迹。[76]

安哥拉的情况变得如此困难，使非洲人的各协会不得不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政策。非洲人国民党走得更远，甚至在国际联盟为葡萄牙的强迫劳动辩护。这样，当1926年里斯本建立起军事独裁，随之而来建立萨拉查政权时，它发现安哥拉知识分子反抗的意志早

[73] A. 小德阿西斯（de Assis），1917年。
[74] 转引自D. L. 惠勒，收入R. 奇尔科特所编书，1972年，第81页。
[75] 关于这次分裂的有关情况见E. A. 弗里德兰（Friedland），1979年，第119-120页。
[76] R. 佩利西埃，1978年，第233页。

已被摧毁殆尽了。安哥拉联盟把强硬分子"清洗"出去以后,在1929-1930年间被允许以非洲国民联盟的名义重新出现。在20年代被各种限制的洪流所屈服的非洲人同盟也以安哥拉本地人协会的名义再次出现。这两个组织被削弱了维持其活力的主要力量,致使政治上根本不起作用,只能追求单纯的社会目标。 702

在上述两组织瓦解的同时,葡萄牙的两个主张泛非主义的"政党"也趋于没落。1931年它们合并为非洲人民族主义运动(这是葡萄牙国家心目中的民族主义),最后在奥利维拉·萨拉查博士的无情的镇压下消失了。非洲国民联盟和安哥拉本地人协会的当地领导人,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失去工作的威胁下,停止活动达20年之久(约自1925-1945年)。同化人政治作用的下降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特别是在白人移民人数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后者曾屡次起来反对宗主国的统治(特别是1924-1925年),最后发展到反对独裁统治(1930年更为引人注目)。但这些企图只是间接地影响到被压迫的非洲居民。[77] 非洲人已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外人,在欧洲人心目中,他们显而易见的作用仅仅是他们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参加的少数几次罢工,如1928年的码头罢工或1933年的铁路罢工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毫无结果。因为在白人工人和黑人非技术工人之间没有持久性的团结。更何况黑人工人得不到被征加入殖民军的非洲士兵的支持,也无法寄希望于同化人的联盟,同化人的呼声早已被当局所窒息。

莫桑比克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

莫桑比克群众性抗议的模式与安哥拉相似,只是在规模上和强烈程度上有所不同。这里武装起义寥寥无几,见诸文字的传说资料不多,与泛非主义运动的联系也开展得不好。但在另一方面,莫桑比克有文献记载的农民和工人的反抗则明显地多于安哥拉,独立教会的数目更多,更具有政治影响。

农民反抗向殖民地资本主义体系提出了翻来复去的挑战。当然并非全体农民、甚至也非多数农民都进行反抗。由于地域、部族、宗教、原始的亲属依附关系、严格的劳动进度、以及一系列其他因素所起的分化作用,个体农民相对来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反抗,这一点要让历史去进行详细分析。农民的活动必然是孤立的、分散的和零星的。他们的有限目标,整体意义很难评价,却易于被忽视。然而莫桑比克的农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体系的严格约束下,却能采取行动,不同程度地缩小葡萄牙统治的破坏性影响。对他们来说斗争的中心是反对侵占他们的劳动以及劳动的成果。 703

在殖民时代初期,逃税行为在整个莫桑比克农村极其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地发生。农民们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以减少或逃避应交纳的年度税金。农民们通常以谎报年龄及婚姻状况的办法来减轻他们的财政负担。许多已成年的年轻人声称尚未成年,有时在税收官来到之时临时住入未成年者的茅屋中。丈夫们经常把年轻的老婆藏起来,或者假称她

[77] E.塞克(Sik),1964年,II卷第314-315页,所作解释与此不同。

们是外出工作的兄弟或朋友们的妻子。在茅屋税作为税收主要方式的莫桑比克南部，大家庭的全体成员挤进一间茅屋，声称这是他们唯一的住处。[78] 甚至已确定税款之后，许多农民继续进行欺骗，力求拖延或甚至不交税款。甚至到了 1928 年，曾在该殖民地中部任职的一名深感失望的葡萄牙官员还如此写道：

> 曼博·库萨拉拉、楚奥和卡潘加的村庄头人和农民们正从事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极抵抗。让他们带税款来交纳时，他们根本不带任何钱来，而是商讨长期延迟支付，而延期后他们又无例外地再次过期不交。在万不得已时，每人只带来占本村应交税的很小比例。这样在每笔帐了结以前要经过许多月份，常常要经过无限期的拖延。[79]

另外一些农村人口则躲进内地。据官方报告说：妇女们往往声称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去。而实际上"他们只是临时逃走，只要收税人或查户口的官员一离去，他们就回村"。[80] 住在靠近国际边界线的农民，则来回于边界两侧以躲避一切税收。

成千上万在乡间的莫桑比克人，被迫种植棉花或为移民的农场、种植园和国家的公共工程去干活，他们为必须向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的劳动量多少而争执不休。最为极端的则完全拒不出工，逃至毗邻的殖民地。逃亡是既艰苦又危险的，但是到 1919 年，据估计仅尼亚萨兰一处就有 10 万以上莫桑比克北部的人前去定居。[81] 甚至在政府控制较严的南方，殖民官员也承认，"非洲人由于怕种棉花而逃离苏尔·德·萨韦省的事屡见不鲜……据报告，许多土著人甚至抛弃土地，放火烧了自己的茅屋。"[82]

另一些逃亡者为了不愿和家族与传统的家园断绝一切联系而逃到人烟稀少的落后地区。至少有几例首先逃到崎岖的山地，或沿海的沼泽地，建立了永久性的逃亡者社会，在那里困难的地形成为阻挡葡萄牙人渗透的天然屏障。在这些逃亡者的社会中，有一些在恶劣的环境和殖民当局的武装干涉下坚持了下来，维持了多年的独立。[83]

生产棉花的农民和农工的反抗所使用的最普遍的方法可能是偷偷地保留自己一部分劳动。这种战略比逃亡的危险性小，而且至少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种自己的庭园。据官方报告，农民极少按规定时间播种棉花，极少按最低限额面积种植，也极少遵守规定的除草次数或在收获后焚烧他们的土地。[84] 莫桑比克南部的欧洲种植园主咬牙切齿地抱怨那些工资被大大压低了的劳工们的"顺从"。他们这样说是为了驳斥他们中的另一个人的假设："如果你在订合同时每月给一镑，你就可以得到相当好的人"。[85] 伊尼扬巴内的总督

704

---

[78] J. 努涅斯（Nunes），1928 年，第 116 页。

[79] 泰特档案，多种文献，马拉维亚民政区殖民当局 1928 年施政报告，文献第 8 号《迈努埃尔·阿纳尔多·李贝罗（Ribeiro）致施政官迈努埃尔·阿尔维斯（Alves）函》，维安纳，未注明日期。

[80] J. 努涅斯，1928 年，第 116 页。

[81] L. 维尔（Vail），1976 年，第 402 页。

[82] 转引自A. 伊萨克曼，M. 斯蒂芬，Y. 亚当，M. J. 霍曼，E. 马卡莫和A. 菲利莱奥，1980 年，第 596 页。

[83] 同上，第 597-599 页。

[84] 同上。

[85] E. A. 罗斯，1925 年，第 50 页。

也重复类似的抱怨。他对恩古尼男劳动力不愿干活并认为这是“女人的事”这一点大为感慨。[86]

注意到了那些导致农民与流动劳工分裂以及破坏任何意义上阶级团结的诸因素，对农村的抵抗很少采取集体形式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农村中的不满偶尔也会纳入更为激进方式的抗议。在1917至1921年期间，整个赞比西河流域的农民，为强迫劳动、增税、强迫种植棉花、奸淫、征兵所激怒，参加了由巴鲁埃王族后裔和绍纳宗教界人士领导的起义。他们当时确定的目标是解放自己的家园和取消压迫他们的殖民制度。[87]以后的20年间，在莫桑比克北部的埃雷蒂、莫金卡尔和安戈谢等地，在税收和强迫劳动的冲击下发生了一系列地区性的农民起义（见图27.2）。[88] **705**

在恐惧与高压下无法公开反抗时，农民们和农工们往往用殖民官员所不懂的文化上的象征来表示他们的敌对情绪。例如，居住在莫桑比克南部的乔皮人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保留歌曲，一般用来谴责殖民当局，特别用来谴责收税的官吏：

> 我们仍然充满怒火；世事总是一样
> 大女儿必须缴税
> 纳塔纳利告诉白人让他独自一人
> 纳塔纳利告诉白人也别管我
> 你，长老们必须过问我们的事情
> 因为白人委派的人都是没人教养的野种
> 乔普人已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权利
> 让我把苦处向你诉……。[89]

塞纳甘蔗种植园所雇佣的工人在劳动时所唱的歌更明显地充满了敌意。他们往往用最淫秽的语言来描绘欧洲人监工。[90]在北方的马夸和马孔德的艺术家们嘲弄包括非洲人和欧洲人都在内的政府官员。他们用极有风格的雕刻丑化这些人的容貌，把他们刻成毫无人性。[91]

城市工人与他们在农村的同行一样，在开始阶段以个人的零星行动来逃避或缩小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他们在招工者到来之前逃离村庄，大规模逃亡、“游荡”，偶尔也破坏机器或原料。虽然上述行动继续成为抗议强迫劳动的主要方式，但在20世纪第2个10年，城市工人开始改变策略，他们在新的体制中组织起来，以改进他们的就业条件。

这一阶段有几个因素对莫桑比克工人组织起来一事发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一，他们

---

[86] 伊尼扬巴内省《省督报告，1913-1915年》，洛伦索-马贵斯，1916年，第41页。

[87] A. 伊萨克曼，1976年，第156-185页。

[88] J. A. G. 德·梅洛·布兰昆霍（Branquinho），1966年，第81-83页，108页，114页，193页。

[89] 转引自E. 蒙德拉纳（Mondlane），1969年，第103页。

[90] 见L. 维尔及L. 怀特（White），1980年，第339-358页。

[91] 这些雕刻中最精彩的部分收藏在楠普拉城的楠普拉博物馆。

的人数过少，莫桑比克迟迟得不到发展的资本主义成份几乎不雇用固定工人。其二，国家明令禁止非洲人组织工会。而白人劳工运动，除少数特殊例外者外，又怀着官方意识

706 形态那种种族主义和文化上的偏见，一直持敌对的态度。[92] 因而，人数既少、又孤立于更广泛的工人运动之外的非洲工人们，面对着国家和资本联合在一起的敌意，其处境明显是不能令人羡慕的。

尽管如此，早在 1911 年以弗朗西斯科·多明戈斯·坎波斯、阿尔弗雷多·德奥利维拉·吉马雷斯以及阿戈斯蒂霍·何塞·马赛亚斯为首的一小部分人，试图组织一个非洲人联盟以包括所有洛伦索马贵斯的非洲工人。对他们来讲问题十分清楚，黑人工人要生存就必须组织起来。他们特别就部族主义的分裂倾向以及工资待遇较好的工人不愿与普通的日工相联合的危险提出警告。他们的传单骄傲地宣布："在我们的组织中不区别对待"。在工人阶级斗争与团结的问题上，他们也同样是毫不含糊的。尽管他们善于雄辩，批评有力，但来自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和白人工会运动的强大反对，再加上黑人工人中的明显的不团结，使非洲人联盟还未开始工作就受挫折了。[93]

尽管一开始就受挫折，但仍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洛伦索马贵斯工人的零星的活动。据报道，1913 年商业联合会的雇员，1917 年电车工人、1918 年铁路技术人员以及 1919 年一家工程公司的雇员都发生过罢工或停工事件。[94]

像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港口工人是劳动力中最富有战斗性和组织较好的队伍。20 世纪头 20 年洛伦索马贵斯已发展成国际商业的一大中心。它把德兰士瓦、斯威士兰和莫桑比克南部与更大范围的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虽然该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有着重要性，而国家竭力防止任何扰乱交通的企图，但在 1918 至 1921 年期间仍发生了 7 次大罢工。罢工是由于航运公司和运输公司拒绝增加非洲人工资以赶上恶性通货膨胀率而引起的。例如，从 1918 到 1920 年，大米、豆类、马铃薯和肥皂等日用必需品的价格翻了一番。1920 年大米已卖到每公斤 3 分钱，相当于大多数港口工人的平均日工资。[95]

港口的罢工一般都遵循大致相同的模式。心怀不满的工人们通过非正式的基层网络组织了起来，不调整工资就拒绝出工。他们聚集在港口的主要通道口，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殖民地总督派出军队粉碎罢工，并逮捕其领导人。同时用强迫劳工来破

707 坏罢工、使港口继续运转，罢工很快被压了下去。即使有的地方雇主们同意增加工资，但他们事后又食言，就像 1919 年罢工中那样。虽然如此，不顾上述挫折和法西斯政府开始执政，1926 年以后罢工仍在继续，只是没有以前经常罢了。[96]

最激烈的港口冲突可能要算 1933 年的基年塔罢工。港口官员和有关公司在受世界性大萧条影响的困境下，决定把本来已经很低的码头工人的工资再降低 10%-30%。降低的

---

[92] J. 卡佩拉（Capela）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对白人工人运动作了重要的考察。

[93] 《直言报》，1911 年 6 月 24 日。

[94] J. 彭维纳（Penvenne），未注明日期。

[95] 其他非必需品增长率更高。

[96] 举例而言，可参阅 J. 彭维纳即将完成的论文。彭维纳女士目前即将完成她的关于洛伦索马贵斯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博士论文。这将增加我们对莫桑比克劳工运动的极为宝贵的知识。

部分等于工人们1921年罢工之所得的5倍。当决定一宣布，工人们就离开了工作，午饭后拒绝复工，使港口陷于瘫痪。罢工的领导人发誓，不取消削减工资的决定不复工。雇主们在面对港口瘫痪的情况下，同意了他们的条件 但当港口工人复工时，发现自己已被封锁在港口内，并被那些强迫他们卸下所有船只货物的警察所包围。此后又宣布削减的部分不再恢复。洛伦索马贵斯的一家报纸登载了码头上的愤怒与失望："腹内空空的工人们面对着他们的老板，而脑满肠肥的老板给他们的却是空头的许诺。"[97]

这里也和中部和南部非洲其他地方一样，独立教会成为工人、农民对新的社会秩序和对已有的基督教教会的伪善发泄仇恨的另一种组织机构。一份政府的秘密报告指出，独立教会之所以得人心是由于"在更大的社会中有种族歧视以及欧洲传教士们对土著人的冷淡这两方面的原因"。[98] 早在1918年，在莫桑比克活动的已知独立教会就有76个。20年之后，其数目激增至380个以上。[99] 信徒人数从少数几人到像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那样万人以上不等。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组织遍布于4省。

实际上所有独立教会都可以溯源到毗邻的南非和罗得西亚的锡安山教派和埃塞俄比亚教派的运动。心怀不满而又人地生疏的莫桑比克流动劳工（他们主要是在矿山工作）从这些教会得到安慰。他们回到故乡后，就仿照南非和罗得西亚同行的样子，或组织分支，或组织独立自主的教派。强大的非洲人美以美会背后的实际支持者塞缪尔·伯利兹曾与南非卫斯理会的一个黑人分支有过长期联系。塞巴斯蒂奥·佩达迪·德苏泽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是仿照他在德班参加的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模式组成的。[100]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某一特定的使徒式领导人的声誉就足以吸引莫桑比克人参加他的集团。由于大部分流动劳工来自殖民地的南半部，独立教会在洛伦索马贵斯、加扎、伊尼扬巴内和苏法拉等地区得到最大的支持。

从社会运动的观点看，莫桑比克的埃塞俄比亚教会最令人感兴趣，因为这些教会经常作为独立自主的机构进行活动。莫桑比克人在这样的机构中能选举自己的负责人，有自己的预算、章程、旗帜、甚至准军事组织。总之，在一个封闭的极权主义体系内，他们代表着一种"自由空间"的场所，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一点点自治以及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尊严。而另一方面，锡安山教派则更多地求助于他们先知的神力干预以及摧毁压迫人的殖民秩序的启示。

从明白无误的反殖民主义角度看，莫桑比克的独立教会从主张激进主义到主张清净无为无所不有。根据政府的秘密报告，最初以加扎和马尼卡地区为基地的美以美教会是破坏活动的中心。政府混进去的人报告说，该教会在布道及秘密集会中煽动反对白人的情绪，并明确地攻击压迫性的殖民政权。据说其负责人员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着接

708

[97] 转引自J.彭维纳即将出版的论文，第20页。

[98] J.A.G.德·梅洛·布兰昆霍，1966年，第77页。

[99] 同上，第73-80页。

[100] 同上；E.莫雷拉（Moreira），1936年，第28-29页；H.I.F.德·弗雷塔斯（Freitas），1956-1957年。

触。[101]政府的其他调查还发现了如下证据：美以美教会主张暴动，其成员曾数次袭击殖民政府及忠于殖民政府的酋长。这一教派最后被指控曾帮助组织1952年曼博内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看来此类起义活动只是某种例外。多数独立教会并不采纳明确的反殖民主义纲领，而把他们的反对仅限于口头批评，有时也利用启示录式的幻觉。[102]

也有一些迹象说明在莫桑比克北部可能存在着伊斯兰改良主义运动，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居民有着反对殖民统治的传统。在本世纪20年代，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曾抗议强迫劳动、低工资以及在基莱马内地区盗用土地等等弊端。一些穆斯林酋长与他们的追随者，参加了30年代初的起义，但起义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103]

709

莫桑比克城市知识界的抗议虽不像安哥拉那样有较深的基础，但仍为改良主义者说教的重要论坛。1908年非洲人同盟的机关报《非洲人》在洛伦索马贵斯的出版是对变革的第一次尝试性呼吁。非洲人同盟是两年前由有色人大家族所组成的一个社会性和民间性组织。尽管他们有着相对的特权地位，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但非洲人同盟中一些主要家族仍把为被压迫的非洲人讲话，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确实，《非洲人》在报头上勇敢地声明："致力于保卫莫桑比克土著居民"。继之出版的《非洲之声》也遵循同一目的，自认为是非洲农民和工人的保卫者。在发行7周年之际，《非洲之声》骄傲地宣称它是非洲人最好的保护者，并且是他们用来反对不公正待遇的唯一武器。"[104]

以上两份报纸的新闻报道和评论，都突出强调一再出现的4大弊端——强迫劳动、非洲人自由劳工的恶劣工作条件、白人移民享有的优越待遇、以及受教育机会的缺乏。对编辑们来说，这4者是殖民压迫本质的象征。在这一阶段中，报纸的社论有力地揭发并详细地记载了强迫劳动制度固有的弊端。他们抗议在强制征募劳工时所使用的残酷手段，抗议强迫劳工的低工资与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欧洲监工的专横和反复无常。他编辑们特别感到愤怒的是那种惯用的作法，即抓"非洲妇女去修补和建筑道路，既不给她们供食品，也不付一文工资"，而且"逼迫她们在雨季他奴隶似的睡在路旁的泥棚之中"。[105]

这两份报纸还就自由非洲工人的工作条件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他们沉痛地揭发了农民们在名义上是自由的农业工人，而实际上被迫在欧洲人的庄园工作，"从日出干到日落，一个月也挣不到一个先令"。在南非矿山中劳动的莫桑比克人"被剥夺了选择雇主的权力……像苍蝇似地在矿上死去"。他们还揭露：非洲工人如果拿不出适当的证件就要被捕，并遭鞭打。而政府利用这些强迫劳工来破坏罢工和压低自由工人的工资。[106]把非洲人冻结在最低工资的职务内，而把最优厚的职务保留给欧洲人。这种无形的肤色歧视的惯例，也成为有些社论的攻击目标。

710

对肤色歧视的抗议成为敌视整个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国家政策有利于白

[101] H. I. F. 德·弗雷塔斯，1956-1957年，第II卷，第32-35页。

[102] 同上，第134页。

[103] J. A. G. 德·梅洛·布兰昆霍，1966年，第56、81、108页。

[104] 《非洲之声》1926年12月24日。

[105] 同上，1925年2月28日。

[106] 同上，1924年12月13日；1927年7月30日；J. 彭维纳，1978年，第10页。

人移民而无视本地居民的需要。《非洲人》一篇措词尖锐的社论质问殖民当局：是什么逻辑要接受那些对殖民地毫无贡献而生活奢侈的白人“社会渣滓”？

葡萄牙普通人在非洲人中被称为姆马杰（普通葡萄牙移民），他们离开葡萄牙时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黑人土地上短期停留，捞够钱，然后全部储蓄起来，回到葡萄牙安享他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只有天知道，这二、三年甚至四年中，他们作出了什么样的牺牲。

（在葡萄牙）人们可想到为了省下这300或40万雷斯这些人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这是一首痛苦与凄惨的诗。有些人过的是地地道道的疯狂日子。只是为了用这种微不足道的金属片装满他们的皮箱。黄金热！

他们住在猪圈里，没有光，不通风，往往四、五人住在一起以减少开支。他们习惯于三个人吃一个人的饭，因为这样开销可以少些。一顿肮脏的有汤或菜的午餐，更确切地说不过是黏黏糊糊的热水里无助地漂着五颗游离的豆子。[107]

虽然这两份报纸社论的调子是谨慎而充满改良主义色彩的，只不过是向殖民政府呼吁善意和公正。但是日益增长的失望引起愤怒，甚至也产生对制度的潜在威胁。在萨拉查政权（1928-1968年）实行独裁主义统治以后不久，上述较为大胆的语气就更加经常地出现。粉碎了任何改良幻想，甚至最享有特权的非洲人和混血种人也产生了失望情绪。《非洲之声》一篇题为“够了”的社论引起的反响，最清楚地反映了他们的愤怒：

我们实在够了

对支持你们，对由于你们的愚蠢与需求的可怕后果

所带来的痛苦，对你们滥用权力，我们都够了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你们政治上和行政上的决断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我们再也不愿意作出越来越大的无谓牺牲……够了……[108]

尽管他们勇于对殖民弊端提出批评，也自认为是被压迫非洲人的保护人，但是这些大家族生活在一个完全脱离工人、农民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工人、农民在一天艰辛劳动之后回到的是贫民窟、工房和村庄。更何况作为新生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成员，这些人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因此往往与享受特权较少的同事有矛盾，他们不赞成对殖民地资本主义进行更为激烈的批评。殖民地精英中的混血种人与非洲人之间紧张的对抗，进一步削弱了非洲人同盟的影响，并有助于它的早日消亡。[109] 711

到本世纪30年代初，他们之间的仇恨进一步加深，为殖民政权提供了破坏他们最后一线团结的机会。为了投合心怀不满的非洲人成员的心意，政府官员说服一些人分裂出去，在1932年组成“尼格罗菲里奥协会”。作为一种额外的鼓励，殖民政府为其提供办

---

[107] 转引自J.彭维纳，1979年，第10页。

[108] 《非洲之声》1931年2月27日，英译文引自J.达菲（Duffy），1959年，第305页。

[109] 采访刘易斯·伯纳多·霍瓦纳（Honwana），1981年10月3、4日；R.汉密尔顿（Hamilton），1975年，第164-167页。

公场所、家具、书籍、以及慷慨的赠款。同时，一位著名的葡萄牙商人保罗·吉尔·多斯桑托斯还给这一新组织的几位领导人提供充当劳工召募人的职位。4年之后，萨拉查政权执行极其严厉的新闻检查法，从而有效地窒息了《非洲之声》的声音。

在此阶段，一小批住在葡萄牙的莫桑比克知识分子，帮助组织起一些与更广泛的与泛非主义运动相联系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洲人联盟和非洲人国民党。非洲人联盟与W. E. B. 杜波依斯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后者则对贾维主义表示更大的同情。但两者都未能在殖民地获得大量的支持者，其行动也往往是象征性的。[99]

结　论

总之，中部和南部非洲各国的非洲人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为1935年以后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此阶段，反时殖民统治抗议活动的最先进方式是在南非联邦。在那里，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的进程，使非洲人卷入资本主义经济的时间早于其他非洲国家。南非的政治性组织和民族主义运动，一时成为非洲南部、中部和东部许多国家的样板。

（屠尔康译）

[99] E.A. 弗里德兰，1979年，第119-121页。

28 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 1914-1935年：殖民统治时期两个独立的非洲国家

M. B. 艾克潘；*A. B.* 琼斯；
R. 潘克赫斯特

英王政府将和美国政府一起，以最强烈的措词，敦促利比里亚政府向即将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提出委派一个管理委员会（治理利比里亚）的请求。……英王政府还将对利比里亚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说服该政府在国联帮助下申请一笔贷款。① （伦敦英国外交部，致华盛顿特区英国驻美大使，1931年1月。） 712

* * *

我不要协定，除非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包括（海尔·塞拉西）皇帝的脑袋。……即使我得到了所有的一切，我也宁愿为阿杜瓦复仇，我已做好充分准备。② （意大利法西斯领袖，B.墨索里尼，1935年8月。）

* * *

从表面上看来，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的争端对利比里亚来说，似乎只有一些学术理论上的意义。但是只要对围绕着争端事实的内在含义进行更深一步的考虑，即使那些最不善于思索问题的人们也能认识到局势对一个像利比里亚这样的国家具有最严峻的意义。难道国际联盟不应该有能力伸张它的道义力量以保持国际间的尊严、礼仪和安全，而只能让世界上较小的国家像事实上它们经常遇到的那样，成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们的牺牲品吗？③ （利比里亚总统埃德温·J. 巴克利，1935年12月。）

以上引语能够充分说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许多年月里，欧洲帝国主义的军队侵略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以及把同样是非洲人和帝国主义侵略牺牲品的利比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继续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本章将用对比的语言来探讨这种侵略以及利比

① R. E. 安德森（Anderson），1952年，第110-111页。
② E. M. 罗伯逊（Robertson），1977年，第160-162页。
③ E. J. 巴克利（Barclay），1935 b，第15页。

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两国对侵略的回答，同时也将探讨1915至1935年期间，这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发展状况。

713

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社会－文化的发展，自1915至1935年

在这段时间里，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面临着国家的完整和生存遭到威胁的严重问题。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上个世纪这两个国家的版图都有巨大的扩展，各族人民和各自文化的显著差异也在不断扩大。那么，这段时期这两个国家究竟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呢？

关于利比里亚的居民情况，作为一个集团的美裔利比里亚人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据报道，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末叶由于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有所下降，而美洲黑人实际上已停止向这里迁移。这种情况使部族间通婚与私通的现象增多，这主要发生在美裔利比里亚男人和当地土生的妇女（她们中许多人都在利比里亚学校中受过教育）之间。于是，相应地增加了美裔利比里亚人与当地非洲人混血的利比里亚人。这类利比里亚人和当地土生的非洲青年被美裔利比里亚人的家庭当作学徒或被收养以后，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被美裔利比里亚人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同化。④

美裔利比里亚人人口的下降很可能也加多了他们集团内部通婚，相应地促使他们自19世纪末叶以来就已盛行的大家族制度继续延续了下来。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已经建立根基的家族，正如本书第11章所列举的，有：谢尔曼家；巴克利家，科尔曼家，库珀家，丹尼斯家，格兰姆斯家和莫里斯家；格林家，格里格斯比家，罗斯家、威瑟斯庞家和沃雷尔家；布鲁尔家，多塞家，吉布森家和杜伯曼家。这些家族连续不断地为利比里亚的政界和经济界提供绝大多数的领导人。⑤的确，到本世纪20年代，对这些家族来说，通过一些相互间的协商来分配议会的席位、部长的职务、和其他高级的公职，已经成为惯例。而且，在议会举行正式选举前几个月就进行此类活动了。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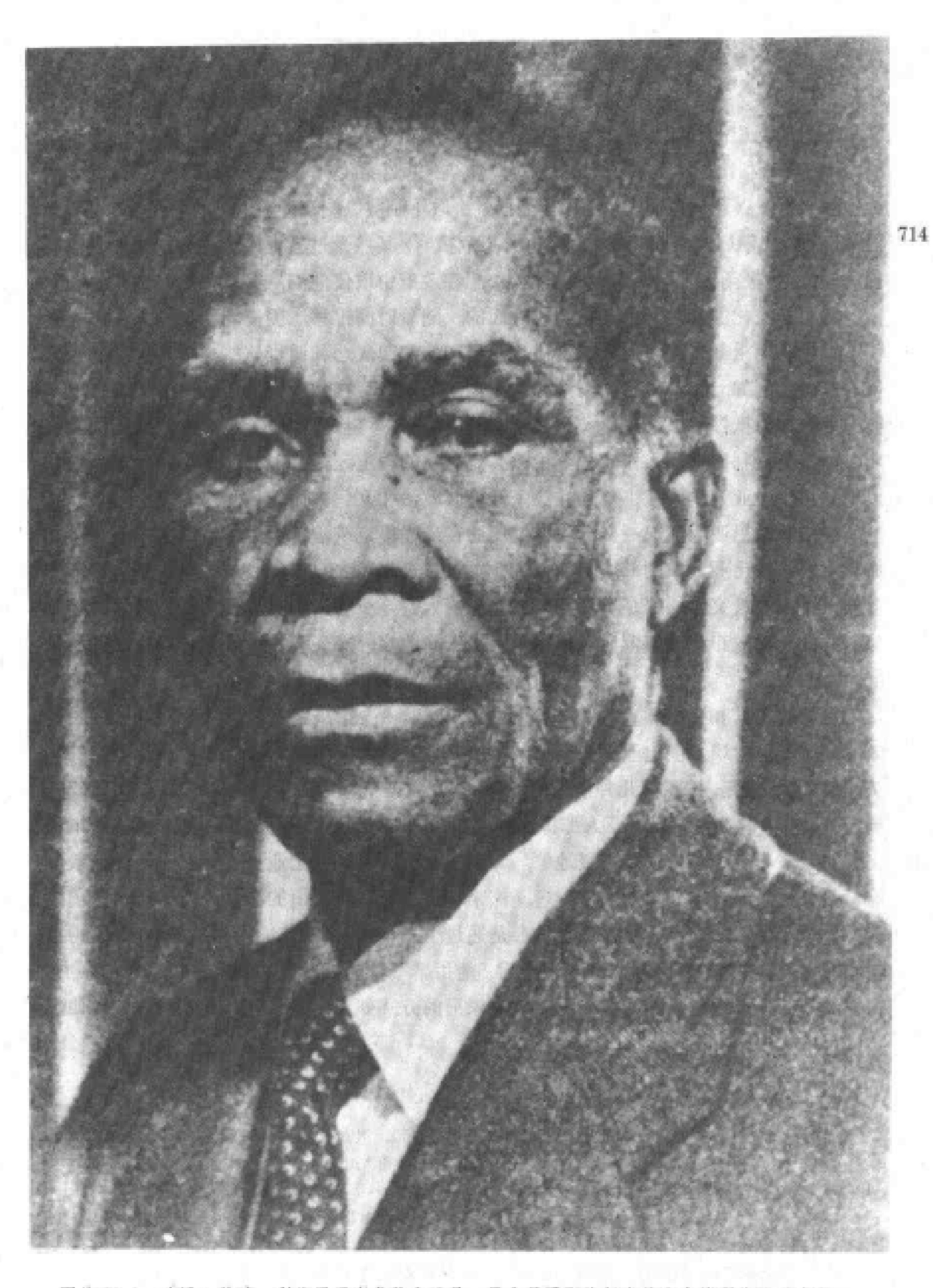
至于当地土生的利比里亚人，由于学校的逐步增多和遍布利比里亚的基督教的传教工作，或多或少提高了他们的读写能力和现代化程度，并使他们吸收了某些美裔利比里亚人的文化。这种被同化了的土生利比里亚人，被美裔利比里亚人视为“文明的”（或“半文明的”）人，他们使这些人中的极少数在政治上和公民权利方面享有和他们平等的地位。这些人中的个别受惠者，上升到显著的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如像本杰明·W.佩恩博士，他本是一个在美国受过医学训练的巴萨人，在本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身居内阁公众教育部长的职位；又如亨利·图·韦斯利，他本是一个格雷博人，在本世

715

④ C. L. 辛普森（Simpson），1961年，第84-88页；H. A. 琼斯（Jones），1962年，第153页。

⑤ 美国国家档案馆（USNA），国务院有关利比里亚国内事务的纪录（RDSL），1909年至1929年，4/88，美国国务院备忘录，1924年6月16日。

⑥ 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有关利比里亚国内事务的纪录，1909年至1929年，4，克拉克（Clarke）致美国国务卿，蒙罗维亚。



714

图片 28.1 迪沃·特威，利比里亚克鲁族参议员，是身居要职的极少数土生的利比里亚人之一

纪20年代初期当上了利比里亚的副总统；又如迪沃·特威，是克鲁族的参议员（见图片28.1）；还有莫莫卢·马萨奎奥，他本是一个瓦依人，在本世纪20年代多次当过代理内政部长和利比里亚驻德国的领事。⑦

尽管如此，甚至那些有幸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更不用说那些没有选举权的群众和深受压迫的土生的利比里亚人——对于“美裔利比里亚人的统治”也或多或少地感到不满，因为美裔利比里亚人理所当然地被视作利比里亚的政府。做为一种规律，受过教育的土生利比里亚人总是力求改革利比里亚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图改善土生利比里亚人的处境。但是，像1930年那样，当国家发生强迫劳工危机时，某些受过教育的土生利比里亚人的领袖们，居然积极图谋推翻美裔利比里亚人，想在政府中取代他们，这种现象还是罕见的。⑧

然而，文化的渗透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随着时间推移，美裔利比里亚人自己也接受了土生利比里亚人许多方面的文化，而当初他们曾厌恶和谴责这些文化是迷信的未开化的东西。例如，相信魔术、巫术和“土药”的功效；在波罗同龄组织主管下举行成年礼；用人作为抵押品以偿还债务和其他义务的习俗。⑨但是在1935年本书研究的截止日期以前，美裔利比里亚人作为一个集团其非洲化的程度还是有限的，还不致于使他们和土生的利比里亚人之间在主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区别模糊不清。

像在利比里亚的情况一样，埃塞俄比亚在曼涅里克统治下大肆扩张的主要后果就是加重了埃塞俄比亚人口的部族多样性。经过上述扩张，在1914年以前并入埃塞俄比亚的各族人民中，最突出的就是奥罗莫人，他们的人数至少与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之和相等，并且几乎散布在埃塞俄比亚一半领土上；除此之外，还有古拉格人、锡达莫人和贝尼尚古尔人。⑩

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作为一个集团，在本章所述的时期一直保持着他们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埃塞俄比亚其他人的统治，其地位类似美裔利比里亚人在利比里亚的寡头政治集团。但是，按照好几种估计，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占埃塞俄比亚总人口的33%到40%，⑪不像美裔利比里亚人那样在本国居少数地位。他们虽然构成一个特权集团，但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以及高级地位，却集中在少数埃塞俄比亚贵族家庭手里。高级政府机关负责人或者下列头衔的获得者，都来自上述家庭。头衔的次序是：国王、御前顾问、公爵、侯爵、武士。曼涅里克主要是通过上述贵族（以及他们所指挥的军队），用征服的方式，扩展埃塞俄比亚版图的。此后，他用“军队驻扎区”的方式占领征服的领土，与非洲其他地方来自欧洲的殖民主义者所采用的方式如出一辙。⑫因此，这些贵族和他们

716

⑦ R. L. 布埃尔（Buell），1947年，第751页。

⑧ 见下注。

⑨ 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LNA），大巴萨州卷宗（未编目），史密斯（Smith）致金（King）函，下布坎南，1924年11月14日。同上，拉塞尔（Russell）致金函，下布坎南，1928年5月5日。同上，哈里斯（Harris）（为银行）致金函，北哈兰维尔，1928年8月6日。

⑩ E. 厄伦多尔夫（Ullendorff），1960年，第30-44页；R. 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1965年，第98-108页；G. W. B. 亨廷福特（Huntingford），1969年，第35-37页。

⑪ E. 厄伦多尔夫，1960年，第31页；G. W. B. 亨廷福特，1969年，第23页。

⑫ 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48-49、119、136、460-462页。

后代中的许多人以及军队驻扎区居民的后代、政府的官员们，“甚至基督教教士们都经常采用可能是最坏的‘殖民’途径”或者种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埃塞俄比亚其他“有轻微不同的部族集团”。⑬而他们自己，譬如说，却以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缔造者自豪，自认为是“以知识报效国家和皇帝的人”，并且自认为是“把埃塞俄比亚从古代传下来”直到子孙后代的功臣。⑭

这和美裔利比里亚人把自己当作利比里亚国家的缔造者时所表现出来的“殖民观点”非常相似。正如1951年5月威廉·杜伯曼总统所吹嘘的，被遣送到利比里亚来的非洲人是新大陆在奴隶制的艰辛和鞭笞之下训练出来的：

> 给这儿带来了文明、教育和宗教，而且将此传授给了当地的土著，因为有了这些，才能希望这两部分人建立起一个非常团结和统一的国家。……他们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自从有了他们，这里的一切东西就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包括政府大厦、学院、学校校舍、教堂和正在扩充的经济、工业、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道路、桥梁等等。⑮

自认为是国家或帝国的缔造者，就像殖民地的欧洲人居民自认为是在尽“白种人的责任”一样，错误地断定凡是在非洲发现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一切进步，或者广义上的“文明”的迹象，均应归之为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地化的结果。⑯

阿姆哈拉和提格雷以外的人（即奥罗莫、锡达莫、古拉格人等等），本世纪上半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重大发展，就是不断增强“阿姆哈拉化”，尽管遭到穆斯林的、传统的、以及其他势力的反抗。这种“阿姆哈拉化，主要是由于随着曼涅里克的征服和帝国行政设施的建立而来的强制性的基督教化，在埃塞俄比亚学校里贯彻的基督教教育，阿姆哈拉语作为埃塞俄比亚全国性语言的声誉，以及来自阿姆哈拉和提格雷的商人和科普特教士的活动，还有不断地城市化把其他地区的流动劳工吸引入阿姆哈拉文化的势力范围。⑰阿姆哈拉化在本章所述这一时期的表现，程度不同地包括：使用阿姆哈拉语言、服装和日历；改变宗教信仰；变更政治制度和结构；以及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化。⑱但是，就像在利比里亚一样，文化的渗透并不都是朝一个方向进行的。有些座落在较为孤立的驻扎区的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居民最后也有被当地人同化了的。⑲

717

而且，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分裂成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包括奴隶、农民、⑳支持摄政王塔法里·马康南（后来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新生知识分子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些人赞成改革和设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㉑与之对立的则是一个由大多数大贵族们和科普特教会的高级教士们组成的保守集团，这集团支持佐迪图女皇并赞成区域自治，他们

---

⑬ 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105-106页。
⑭ 转引自前引书，第107页。
⑮ W. V. S. 杜伯曼(Tubman)，1951年5月，见E. R. 汤森(Townsend)（编），1959年，第98-99页。
⑯ L. H. 甘恩（Gann）和P. 杜伊格南（Duignan），1967年，第15章与22章。
⑰ W. A. 沙克（Shack），1969年，第8、48、138-139页。
⑱ G. W. B. 亨廷福特，1969年，第27-29、55-58、68页；W. A. 沙克，1969年，第202页。
⑲ W. A. 沙克，1969年，第25页。
⑳ R. V. 维沃（Vivo），1978年，第38-39页。
㉑ 同上，第37页；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147页。

结成了维护埃塞俄比亚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屏障。㉒

因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部族上和文化上的多元型以及社会的不平等，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产生了实际的冲突（有些冲突将在本章进行研究）。

政治发展

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在政治体制及其进程中遇到的压力和紧张，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核心内部的、周围边缘的、和介乎核心与边缘之间的。

利比里亚的核心——真正独立党，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自始至终牢牢掌握着权力，极少受到正式反对党的挑战。这种情况到20年代起了一些变化。这时，人民党在前总统丹尼尔·B. 霍华德的领导下于1922年成立，对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独立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即使如此，也没有产生问题。鉴于利比里亚非常腐败的政治文化和由统治的政党行使压倒一切的政治影响，人民党只有通过投票箱这一宪法手段才能把真正独立党拉下马。

的确，自从19世纪90年代起，正式的反对派非常微弱和零散，大多数是由某个特定的问题而临时组成的，只有在全国举行大选时才形成政党。这种缺乏连续性的情况，明显地表现在那些政党的名称变化上：在1897年5月和1899年5月的选举中称作统一党；在1901年5月的选举中称作人民党；在1911年5月的选举中称作全国统一真正自由党；在1921、1927和1931年5月的选举中再次称作人民党；在1935年5月的选举中称作统一真正自由党。而且，反对党所竞争的只是议会中很有限的议席。在1897、1903和1905年的选举中，它只提出了参、众两院的候选人，而提不出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在1907和1919年的选举中，真正独立党是唯一参加选举的政党。因而绝大多数真正独立党的候选人都以压倒多数获胜，反对党的候选人获胜的只有极少数。㉓

718

因此，除了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人民党向真正独立党提出过严重挑战以外，利比里亚到20世纪已逐渐发展成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而且是非洲国家实行一党制中最早的一个。

各式各样的因素促成了上述的局面。自19世纪末叶以来，曾为许多利比里亚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与商业衰落了，使利比里亚政府成了劳动力的主要雇主，并成为向绝大多数利比里亚人提供收入和高级社会地位的源泉。㉔ 因此，日益重要的是，公共部门或政

㉒ 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151-152页；R. V. 维沃，1978年，第36-38页。

㉓ 美国国家档案馆，DUSM 14/88，莱昂(Lyon)致海(Hay)，蒙罗维亚，1905年1月13日；同上，莱昂致艾德(Adee)，蒙罗维亚，1905年5月8日；美国国家档案馆，DUSM(NF)405/112，莱昂致国务卿，蒙罗维亚，1907年5月20日；T.J.R.福克纳(Faulkner)，1927年；"贾纳斯(Janus)"，《前总统C.D.B.金在1935年5月7日全国大选中的失败及其原因》，存利比里亚国家档案馆，系未加标记的卷宗资料。

㉔ 美国殖民协会与萨诸塞州（ACS），利比里亚信件，28，史蒂文斯（Stevens）致威尔逊（Wilson），蒙罗维亚，1901年5月1日。

治部门的负责人，不论是未来的还是在职的，都必须支持政府，实际上也就是支持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独立党。其次，在 1915 到 1935 年这段时期里，利比里亚的公共系统和政治过程中，比以前更为严重地存在着贪污和不正之风。真正独立党和人民党在本世纪 20 年代全过程和 30 年代早期的激烈竞争，更形加重了选举中的歪风，而绝大多数是出自居统治地位的真正独立党之手。例如，在 1927 年 5 月的选举中，C. D. B. 金总统宣称得票 23.5 万张，他的对手人民党的T. J. R. 福克纳得票 9000 张。其实，当年整个利比里亚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不超过 1 万人。㉕

再其次，在 19 世纪，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区分往往是个人品格上的冲突或者是对分享社会剩余物资存在着分歧，而不是有什么明显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面的不同。例如，1911 年由真正独立党分裂出来的集团组成了人民党，这是利比里亚副总统、马里兰的杰罗姆·J. 多森在争取提名为真正独立党总统候选人时，败于该党的全国主席丹尼尔·B. 霍华德的结果。在 1927 年也有类似情况，许多真正独立党的党员参加了人民党，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赞成那个党的纲领，而是因为他们反对C. D. B. 金总统争取“第三届连任”。㉖由于利比里亚人中不存在重要的意识形态或政策上的分歧，所以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执政党内或反对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主要是美裔利比里亚家族之间，在控制社会剩余物资上的勾结成相互争夺。 719

最后，如果利比里亚的政治基础扩大到把当地土生的利比里亚人也包括进去的话，事态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是除了图·韦斯利、特威和极少数本书业已提到过的人之外，没有出现这样的政治进程。因此，利比里亚的政治体制保持在基本上保守的状态，而主要在为美裔利比里亚人的上层利益服务，并使他们的政治上的优势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埃塞俄比亚

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形务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和利比里亚恰好形成对比，特别是在政治权力和特权的性质与范围方面。至于政治体制结构的根本性问题、政治变革的程度、阶极组成和利益，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诸方面，两国仍有很多共同之处。

曼涅里克的晚年对埃塞俄比亚来说是艰难的岁月。在他长期患病期间，皇帝于 1908 年年中指定他的孙子埃雅苏公子——一个 12 岁的孩子当他的继承人。㉗在那一年的后期，当他瘫痪不能说话时，曼涅里克指定他以前的将领塔桑马公爵为摄政王。塔桑马于 1911 年逝世，于是埃塞俄比亚国务会议宣称，埃雅苏已经长大，在他们的指导下完全可以自己当政了。直到 1913 年 12 月曼涅里克去世，由于他生病造成的权力真空，助长了埃塞俄比亚贵族各派的政治阴谋，并鼓励政洲殖民列强插手埃塞俄比亚的内部事务。㉘

㉕ T. J. R. 福克纳，1927 年。

㉖ 无名氏，《1926 至 1929 年利比里亚大事秘密日记》（藏总统官邸）（MS）。

㉗ R. 潘克赫斯特（Pankhurst），1976 年。

㉘ R. 格林菲尔德，1965 年，第 131-132 页。

埃雅苏公子是瓦洛统治者米海尔公爵的儿子，他生来性情急躁，除了很少具有他祖父的管理国家的才能外，还缺乏在瓦洛以外的统治基础。而曼涅里克的老臣们，其中来自绍阿的占据优势，却都恨他。对他的反对渐渐地具体朝向他的对内政策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他对穆斯林人口的友善态度以及他的外交政策，集中反对他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720 大战爆发后支持了德国、奥匈和土耳其。因此，贵族、教会高僧、可能还有驻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协约国代表团，勾结起来于1916年9月废黜了他就不足为怪了。他在1921年被囚禁，直到1935年他死去为止。[29] 曼涅里克的女儿佐迪图于是立刻被宣布为女皇，已故皇帝的堂兄弟马康南公爵的儿子塔法里担任摄政王和王位继承人。佐迪图女皇的加冕礼于1917年2月11日举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双重权威的政权，权力由女皇和摄政王分享，每人有一个皇宫、有一班明显不同的追随者和经常是相互冲突的政策。

塔法里就任摄政王是件重要的大事。他是一位坚定的领导者，他想恢复曼涅里克所从事的现代化政策和坚持已故皇帝在保持埃塞俄比亚独立上所做的努力。塔法里·马康南所具有的强烈个人风格的行政素质，使他能在摄政期间部分地把权力逐渐扩展到公共事务的某些关键领域，即：他在朝廷中的副手们、各省、军队、教会和佐迪图女皇。塔法里于1928年10月7日进爵为埃塞俄比亚国王，并完全掌握了对政府的控制。他的进爵典礼招来了佐迪图和她的支持者们对他的进一步憎恨和反对。1930年3月，佐迪图的丈夫古格萨·沃利公爵起来造反，但是摄政王在极小的空军协助下击败了他。第二天佐迪图去世了，塔法里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成为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图片28.2）。他的加冕典礼于1930年11月2日举行。[30]

海尔·塞拉西这样加强了他的政治地位以后，便着手进一步推进埃塞俄比亚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他于1931年颁布了一部成文宪法，以牺牲原有贵族为代价，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31] 宪法规定了两院制的议会，有一个任命的参议院和一个国民议会，后者同样是任命的，"直到人民能够进行选举"为止。

既然海尔·塞拉西把1931年的宪法视为埃塞俄比亚政治史上的里程碑，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它使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有了改变？更重要的是在本章所涉及的期间政治发展究竟如何？譬如利比里亚，虽然有过一些政治变化，但这些变化既非根本性的，也非结构方面的。埃塞俄比亚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反映在摄政王（后来的皇帝）的权力逐渐加强，而牺牲了原先贵族和教会的权力。这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对担任公职者日益强调以政绩为标准，同时淘汰贵族中的最保守者；由一些埃塞俄722 比亚领导人，包括海尔·塞拉西本人，明确表示需要现代化；并正式颁布宪法。

至于说到政治发展，包括根本性的规范化、制度化以及埃塞俄比亚政治文化中的其他结构性变化，在这一段时期内几乎没有。相反，除了政治集权有所加强外，社会的分离主义，文化上的地方主义，以及奥罗莫、锡达莫、提格雷和古拉格各族人中的民族沙

---

[29] 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136-146页。

[30] E. 沃（Waugh），1931年；L. 莫斯利（Mosley），1964年，第151-163页。为编年史列举的该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事件，见S. P. 佩特里迪斯（Petrides），1964年，第157-159页。

[31] 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168页。



721

图片28.2 海尔·塞拉西一世，埃塞俄比亚皇帝，1930-1974年在位

文主义，仍然继续是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突出特征，严重地阻碍着整个国家的一体化。[32]

其次，1931年的宪法远不是一次激进的改革，对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文化直接的影响甚微。它让海尔·塞拉西的绝对权力原封不动，并大量保留了贵族的特权地位。海尔·塞拉西从上述阶层中任命参议院的议员，而贵族和“当地土司”（酋长）则任命国民议会的议员。[33]议会几乎没有立法和制订政策的主动权，根据皇帝的旨意召集和解散，它只是在皇帝交给它的案件上盖盖橡皮图章。[34]到意大利入侵时，议会就几乎不存在了。[35]同样，大臣们也几乎不允许有任何主动或独立行动。他们是在议会之外接受任命的，并直接向海尔·塞拉西负责。[36]

埃塞俄比亚的这一切明显地和利比里亚有所不同。因为利比里亚宪法虽然也给予利比里亚总统以广泛的宪法权力，但它们远非是绝对的。当埃塞俄比亚的议会俯首贴耳并自鸣得意时，利比里亚的议会却在政治上是积极主动的。最显著的区别也许在于埃塞俄比亚不存在政党，其原因可归咎为：皇帝在埃塞俄比亚的事务中有着历史性的支配地位，以及缺乏经济上的发展或西方化的社会精英来有效地改变埃塞俄比亚的保守主义。[37]

总之，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在下述的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方面，其共同特征要比差别为多。如它们的保守主义；不平等的和接诿的社会准则；缺乏全国一致性、经济发展、或对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坚定信念；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不友好的、贪婪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包围下的脆弱的政治独立。

723

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和社会变革，1915-1935年

利比里里

1915至1935年对利比里亚政府和绝大多数利比里亚人来说，从许多方面看都是经济上艰难的岁月。自19世纪末叶起，利比里亚作为主导部门的贸易和农业趋于衰落，从此之后，利比里亚政府的岁收（绝大部分来源于关税）急剧减少，许多利比里亚人丧失了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

利比里亚政府一方面为了偿还利比里亚日益增多的债务（包括1870年英国的贷款），一方面为实现本国的发展，遂于1906年以6%的利息从一些英国资本家那里借到了5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新的贷款并没能使问题有所缓解，于是利比里亚政府在1912年得

[32] E. M. 罗伯逊，1977年，第31-33页。
[33] 同上，第169页。
[34] 转引自前引书，引自J. E. 鲍姆（Baum），1928年。
[35] 同上。
[36] 同上。
[37] R. L. 赫斯（Hess）和G. 洛温伯格（Loewenberg），载入P. J. M. 麦克尤恩（McEwan）编，1968年，第199-201页。

到某几个欧洲银行利息为 5%的 170 万美元贷款作为补偿时，就撤销了上述贷款。从此，利比里亚的岁收分成了主要由关税构成并专门用来支付 1912 年贷款的利息和作偿债基金的“专用岁收”，以及由利比里亚政府制定的各种国内费、罚款、租税构成的“国内岁收”（包括向当地利比里亚人征收的茅屋税）。利比里亚政府用后一类岁收来支付主要的公用事业的开支，包括政府雇员的薪给。“专用岁收”的征集和管理则委托给一个由一名美国人担任“海关总监”、并由法国、德国和英国人担任监税官的“国际监管团”办理。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专用岁收”的收入下降了，主要是贸易收缩的结果。这是由于曾经控制着大约四分之三利比里亚贸易的德国人撤退所引起的。[38] 更何况利比里亚的主要出口物咖啡的价格，以及其他利比里亚产品像可可、象牙、棕榈油、棕榈仁和巴西棕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也一落千丈。[39] 于是种植者大量削减生产，致使利比里亚的出口和相应的海关税收下降得更为厉害。因此，从 1916 年起就无法如期偿付或全部付清 1912 年贷款的每年利息和偿债基金。[40] 应支付的欠款因而积累起来，到 1918 年 9 月 30 日，竟高达 178,657 美元。与此同时，“国内岁收”大部分由于利比里亚官员们的贪污而不足以支付利比里亚主要公用事业的开支，如支付政府雇员的薪给，而这已经是大加削减了的。

724

面临破产之际，利比里亚政府在 1917 到 1918 年间，开始向英雇西非银行经常不断地和大量地借钱。[41] 然后，从 1918 年末到 1921 年之间又试图向美国政府借一笔高达 500 万美元的贷款而未获结果。[42] 上项企图的失败迫使利比里亚政府采取若干旨在刺激贸易和增加岁收的措施，其中包括一项抬高关税的修订税率，向外商重新开放利比里亚的内地贸易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对外关闭），以及提高港口和入港的费用。[43] 与此同时，利比里亚政府对全球黑人促进协会的计划表示赞赏。该协会是以美国为基地的新大陆黑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由牙买加的马库斯·贾维领导，它的计划旨在动员资本和黑人移民到利比里亚来开发资源。但这类计划从未真正实现。[44]

对利比里亚来说，幸运的是从 1923 年年底开始，其经济有了逐渐改善的迹象。利比里亚政府从出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收的德国财产中雇得了 15.4 万左右的美元。[45] 而

---

[38] A. 夏普(Sharpe)，1920 年，第 302 页；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有关利比里亚国内事务的记录，1909 至 1929 年，4，扬（Young）致美国陆军部，蒙罗维亚，1915 年 10 月 7 日。

[39] 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有关利比里亚国内事务的记录，1909 至 1929 年，5，邦迪(Bundy)，《外交季度报告》，蒙罗维亚，1919 年 8 月 2 日；同上，4，C. 扬，《查尔斯·扬少校关于利比里亚情况的备忘录》，蒙罗维亚，1915 年 10 月 7 日。

[40] D. E. 霍华德(Howard)，1916 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有关利比里亚国内事务的记录，1909 年至 1929 年，4，《查尔斯·扬关于利比里亚情况的备忘录》。见上注。

[41] R. C. 班纳曼（Bannermann)，1920 年；R. L. 布埃尔，1947 年，第 2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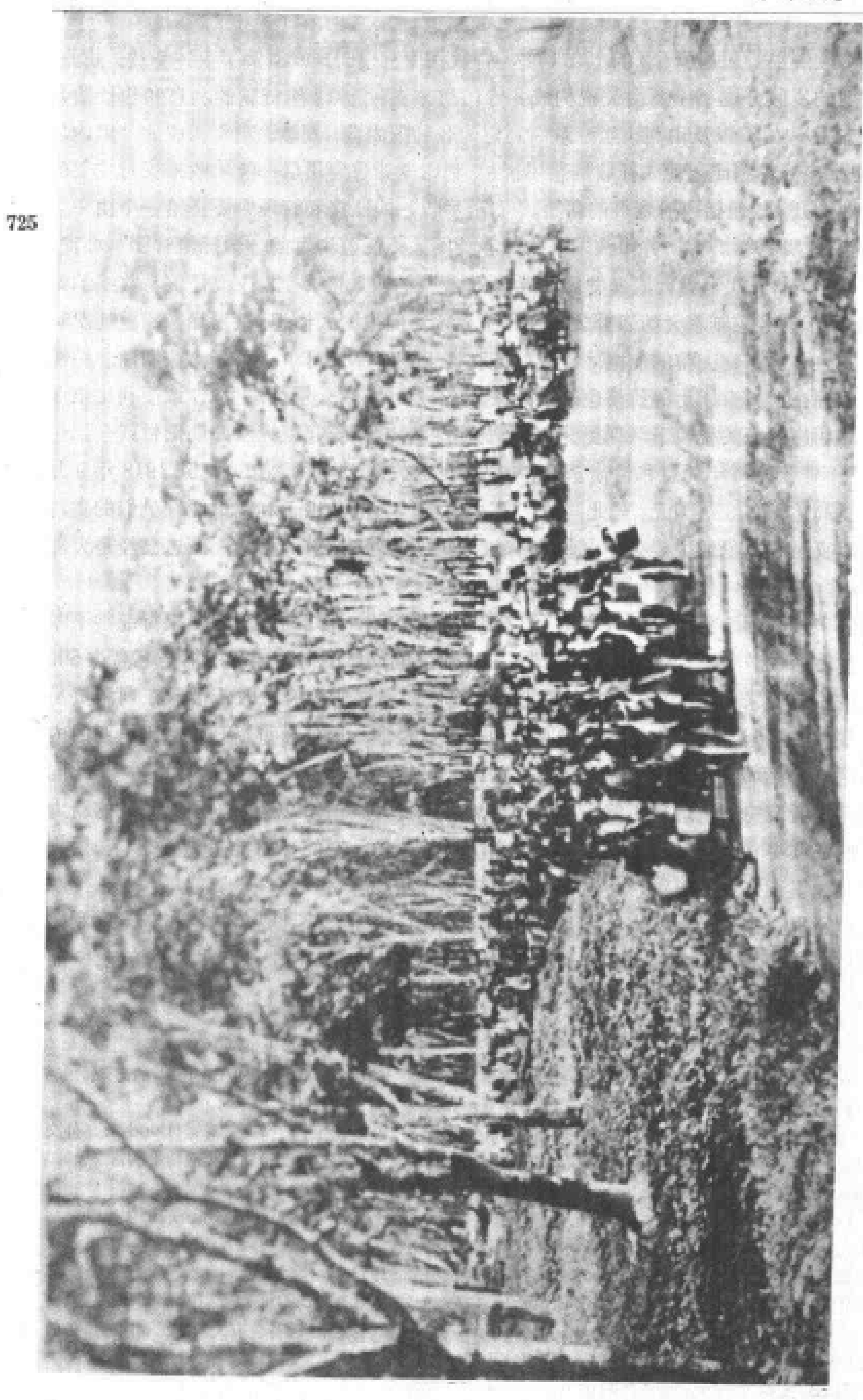
[42] R. C. 班纳曼，1920 年；F. 斯塔尔（Starr)，1925 年，第 113 页；C. D. B. 金，1924 年，第 2-3 页。

[43] R. L. 布埃尔，1928 年，第II卷，第 769-770 页；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有关利比里亚国内事务的记录，1909-1929 年，8.882/032/43，伯尔（Bur）致美国驻节公使，蒙罗维亚，1923 年 2 月 1 日。

[44] M. B. 艾克潘（Akpan)，1973 a。

[45] R. L. 布埃尔，1928 年，第II卷，第 767 页。

725



图片 28.3 利比里亚橡胶业，种植园的劳动力队伍

且，1922 年 12 月采取的财政措施，特别是新关税的实施，开始导致偿清债务了。[46] 随着利比里亚对外贸易的复苏，特别是德国人在 1922 年以后又参加进来，以及利比里亚的内地贸易区重新向外商开放，出口上升了，而贸易平衡开始向有利于利比里亚一方转移。例如，1923 年头 9 个月的出口值比 1922 年同期超出了 16.9 万美元。[47]

正当利比里亚政府财政开始恢复之际，由于下列情况使得经济更为光明的前景变得指日可待了。1926 年，一位名叫哈维·S. 费尔斯通的美国人，从利比里亚政府获准租借为期 99 年的 100 万英亩土地的权利，在利比里亚种植和出口橡胶。而利比里亚为此可以从美国金融公司得到一笔 500 万美元的贷款来从事基础建设，包括道路、医院和学校，以及用来支付它的债务。[48] 该项贷款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从而大大增强了费尔斯通和美 726 国在利比里亚的影响。

关于橡胶生产，费尔斯通对两个巨大的种植园进行投资，这对利比里亚经济，在短期内产生了并不太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就业方面。首先是费尔斯通成了利比里亚劳动力的最大的雇主[49]（图片 28.3）。不过，绝大多数利比里亚雇工属于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主要从事清理土地和种植，或者担任工匠和技工的活。其次，费尔斯通为其利比里亚（和美国）雇工们修建了若干卫生所和学校，还把橡胶苗分给希望种植橡胶的利比里亚人。[50] 不过，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费尔斯通的橡胶生产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特定的地区。它没有把影响扩大到绝大部分不发达的利比里亚农民经济中去，也没有和后者发生联系，特别是和 80%以上当地利比里亚人所从事的水稻生产无关。只有到 1935 年开始大量出口橡胶时，橡胶才变成利比里亚的主要出口商品（这种状况持续到 1961 年被铁矿石超过为止）。[51]

1935 年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勘探确认了博米山存在着铁矿石，虽然实际开采和生产是较晚的事，即在 1951 年才动手。[52] 其次，1935 年还标志着英国和欧洲作为利比里亚主要贸易伙伴的优势终止了，它们的地位从 1936 年起被美国所代替，这是由于利比里亚橡胶出口增加，而且绝大部分是运往美国。[53] 不过应该注意到：利比里亚大部产品——棕榈油、棕榈仁、巴西棕、咖啡、可可、柯拉果——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从经济不景气一开始就急剧跌落，利比里亚的贸易不论是数量和价值都统统下降了。在整个 30 年代，贸易收支都不利于利比里亚。[54] 从 19 世纪末叶以来，欧洲人的公司一直控制着利比里亚的进出口业。但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一支人数不断增加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商

[46] C. D. B. 金，1924 年，第 9 页。
[47] 同上，1923 年，第 7 页。
[48] A. G. 琼斯（Jones），未注明日期。
[49] C. D. B. 金，1928 年，第 8 页。
[50] C. M. 威尔逊（Wilson），1971 年，第 137-138 页。
[51] 利比里亚贸易与发展股份有限银行，1968 年，第 76-77 页。
[52] R. W. 克洛沃（Clower），G. 多尔顿（Dalton），M. 哈威茨（Harwitz）和A. A. 沃尔特斯（Walters），1966 年，第 197-201 页。
[53] 利比里亚共和国，1941 年，第 36-40 页。
[54] 同上，1940 年，第 8 和 11 页。

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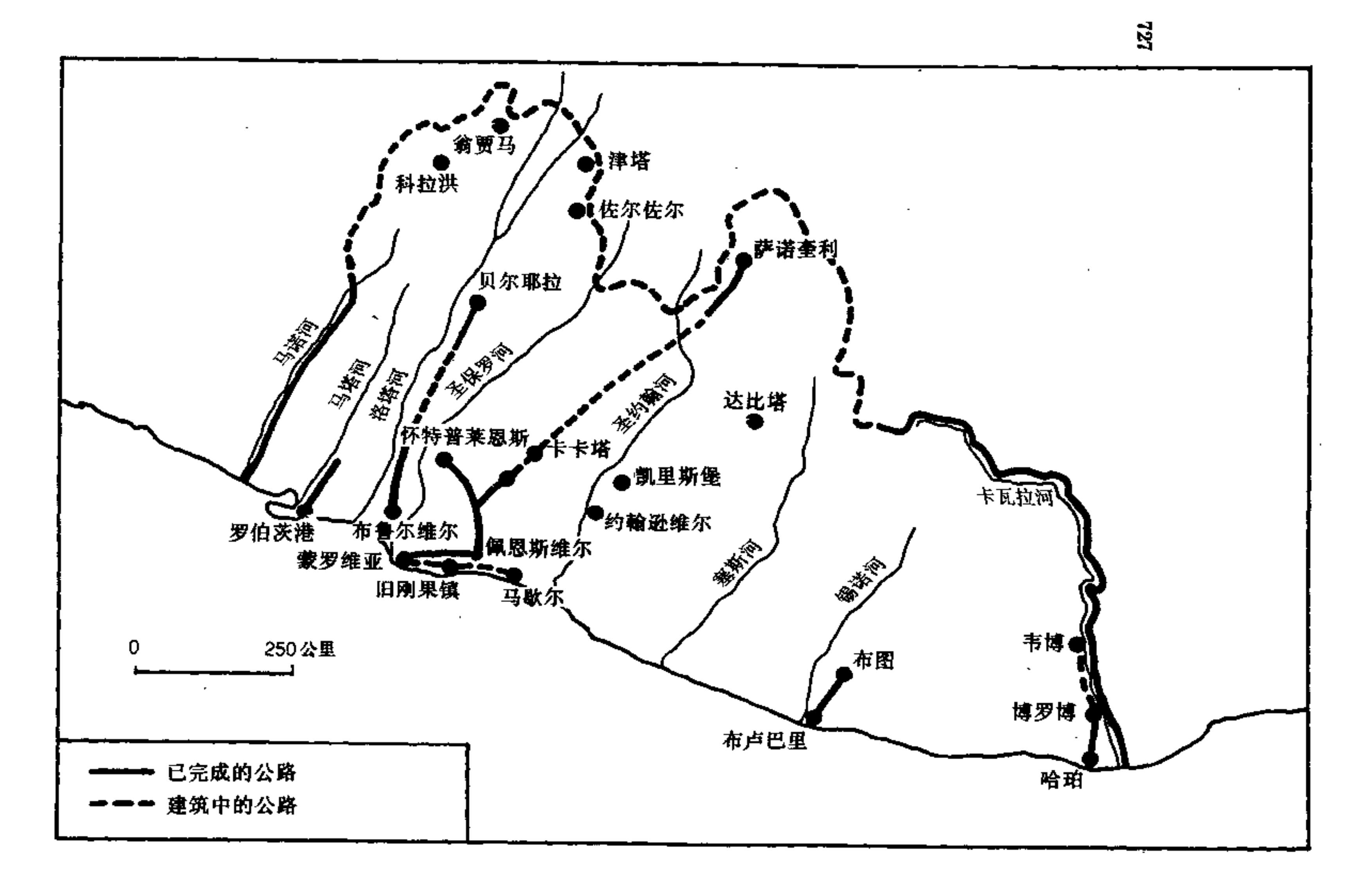


插图 28.1　1925年利比里亚道路位置

人加入了欧洲人的行列，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之末，于 1935 年控制了利比里亚大量的零售业。[55]

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1915 年至 1935 年），由于或多或少有点凄凉的经济，利比里亚政府面临着连续支付债务后财源常年枯竭，没可能在任何程度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局面。由阿瑟·巴克利总统开始实施的筑路计划加快了速度，但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土生劳工的强迫和无偿劳动（插图 28.1）劳工们甚至要自备锄头、大砍刀和干活用的其他工具。[56] 利比里亚政府在本世纪 20 年代——这在利比里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偏僻的内地设立了若干小学校。[57] 1930 年末，政府开办了布克·T. 华盛顿农业和工业讲习所来训练低级的和中等水平的技术与农业人力。[58] 1934 年，在蒙罗维亚成立了一所迫切需要的师范学院。[59] 原有的学校如利比里亚学院和西非学院据说成绩都不错。[60] 1927 年 8 月，设在蒙罗维亚的中央政府，通过建立一些广播站，创办了与利比里亚沿海一带以及与美国通讯的无线电通讯事业，这些广播站大大地补充了已有的效率不高的利比里亚沿海一带的电话事业。[61] 1924 年，政府在蒙罗维亚设立了一座医院。1927 年，在蒙罗维亚购进并安装了一座发电厂，向该市提供电力和照明。[62]

728

美国的传教团体自利比里亚立国以来，就一直为建设学校、医院和教堂作出贡献，这些单位由热心创办事业的人掌管，如甘塔地方美以美教会的医生和人种史学家乔治·W. 哈利夫妇。[63]

但是教育事业的任何重大发展，更多地是受政府岁收不足所限制，同时也受到利比里亚政府传统的戒备心的限制。即利比里亚政府把内地向传教士、商人和其他外国人开放时，总担心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影响当地土生的利比里亚人“起来造利比里亚政府的反”。[64]

更令人反感的是，利比里亚政府一贫如洗，无力如数或按时支付政府官员的薪俸，从而多少怂恿了他们的贪污和剥削行为，如偷窃政府的款项或勒索当地土生的利比里亚人。最臭名昭彰的违法行为是：某些著名的美裔利比里亚人，把当地土生的利比里亚人强迫运载到费尔南多波，为那里的西班牙种植园主劳动。这一事件发展成为一起严重威胁到利比里亚主权的国际上关注的丑闻。[65]

---

[55] Z. B. H. 罗伯茨（Roberts），1934 年，第 6-7 页。
[56] 国际联盟，1930 年，第 147-170 页。
[57] C. D. B. 金，1922 年，第 23-24 页；1924 年，第 5-6 页。
[58] C. M. 威尔逊，1971 年，第 154 页；F. 斯塔尔，1925 年，第 128-129 页。
[59] E. J. 巴克利，1934 年，第 2-4 页。
[60] 同上。
[61] C. D. B. 金，1927 年，第 33-36 页。
[62] A. D. B. 亨利斯（Henries），1963 年，第 90-91 页。
[63] C. M. 威尔逊，1971 年，第 154 页。
[64] 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有关利比里亚国内事务的记录，1909 年至 1929 年，882/00/705，克里奇洛（Critchlow）致贾维（Garvey）函，蒙罗维亚，1921 年 6 月 24 日。
[65] 参阅后面探讨利比里亚强迫劳工危机部分。

729 埃塞俄比亚

在曼涅里克所征服的边远省份征收封建贡赋和对农民与奴隶的劳动大肆剥削的结果，使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国库具有充足的财源。但是，埃塞俄比亚像利比里亚一样，没有进行过任何有意义的经济发展。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发生的一些经济和社会变化，对有效地改变埃塞俄比亚基本上是封建性质上经济和保守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开创者是摄政王塔法里·马康南。他的第一步改革项目之一就是扩大了曼涅里克的政府体制，于1922年增设了一个商务部和一个公共工程局。1923年他开办了伯哈尼那·萨拉姆（Berhanena Salam），或称"光明与和平"印刷所。这是从德国买来的，由曾在厄立特里亚接受过瑞典传教士教育的加布雷·克雷斯托斯·塔克尔·海南诺特负责管理。这个印刷所于1925年以同名出版了一份报纸，还有一些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并在发展阿姆哈拉文学方面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66]

改革埃塞俄比亚的奴隶制不仅会冲击埃塞俄比亚的内部稳定，而且也会冲击埃塞俄比亚与外部大国的关系。因此在这方面的改革是犹豫不决的 十分注意国际关系的塔法里，很快地意识到国际联盟及其集体安全体系所能带来的好处。他在1919年国际联盟刚成立时就为埃塞俄比亚提出加入申请。但是，虽然法国给予了支持，英国却争辩说，埃塞俄比亚恐怕难以尽到它作为一个成员国的义务，尤其是关系到废除奴隶制的义务。在《威斯敏斯特公报》和其他英国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对埃塞俄比亚奴隶制的尖锐攻击，并建议欧洲列强或国际联盟应该加以干预。

塔法里在奴隶制问题上也许从外交角度的考虑超过了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于1922年7月发表了一项敕令，重申过去对贩卖奴隶的禁令，对奴隶贩子规定了严厉惩处的办法，并向英国政府保证，他愿意保护并教育那些在海上被释放的奴隶。他在1924年9月15日又发表声明，提出对围捕奴隶者处以死刑。[67] 摄政王对奴隶制越来越强烈的观点，有助于埃塞俄比亚加入国际联盟。虽然它仍遭到英国的反对，但却得到了意大利和法国的支持。而这两个国家都想由此而在亚的斯亚贝巴得到有影响的地位。于是，埃塞俄比亚终于在1923年9月23日成为国联的成员，摄政王为此签署了一项声明，表示遵守一切有关禁止奴隶制的主要国际协定。

730 在颁布反对奴隶制的命令之后，摄政王几乎立即由两位主要的贵族戈贾姆的海卢·塔克尔·海南诺特公爵和提格雷的塞约姆·曼加沙公爵陪同，前往巴勒斯坦、埃及、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意大利、英国、瑞士和希腊访问。他会见了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来、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和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要求他们在就近的殖民地转让一个出海口给埃塞俄比亚。他的这次外交活动正好与该三个殖民列强

---

[66] C. F. 雷伊（Rey），1927年，第28-29页。
[67] C. 桑福德（Sandford），1946年，第58页。

要保持埃塞俄比亚孤立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毫无收获。塔法里回国时仅带回了一些含糊的许诺，英国归还了 66 年前掠夺走的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的王冠。

但是从埃塞俄比亚的内部事务而言，这次出访可以和彼得大帝在西欧的逗留相媲美。[68] 因为这对唤醒埃塞俄比亚社会面向外部世界，使之认识到需要采用外国的新发明和发挥埃塞俄比亚人力的作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摄政王和海卢公爵购买了几辆汽车，从而在埃塞俄比亚贵族中树立了一种新的风气。结果，亚的斯亚贝巴的车辆迅速上升到数百辆之多。[69] 被送出国深造的埃塞俄比亚青年的数目不断增加，主要去的国家是：黎巴嫩、埃及、法国、英国和美国。

1924 年，一座新医院"贝特·赛义达"（Bet Sayda）在摄政王主持下建成，由一个瑞典人库尔特·汉纳医生管理。[70] 两年以后，塔法里不顾传统主义者的反对，开办了这个国家的第二个现代化教育机构"塔法里·马康南学校"，由一位法国校长管理；其课程包括法语、英语、阿姆哈拉语、阿拉伯语和科学等课程。塔法里在开学典礼讲演中提到了教育的"迫切需要性"，没有教育国家就不可能保持独立。他号召他的同胞们兴办学校，因为只是空口说白话的爱国主义已经过时了。[71] 这段时期其他方面的发展还包括：1925 年聘请比利时军官来训练摄政王的卫队，1927 年给两位希腊人以特许权在西部边界从戈雷到甘贝拉之间建筑一条公路，1929 年从法、德两国购进了第一批飞机，它们的到来一直受到贵族中某些人的保守主义阻挠。

海尔·塞拉西加冕之后仍继续他的现代化事业，并得到三位外国顾问的协助：外交方面是一位瑞典人弗吉将军；财政方面是一位美国人E. A. 科尔森；法律问题则是一位瑞士人M. 奥伯森。[72] 但是，发展受到了世界经济萧条的严重影响，导致出口下降和外国投资有可能削减。尽管如此，1930 年还是宣布了一道命令，对土地进行调查和登记，并于同年成立了教育部。1931 这一年有三项重大进展。第一是颁布了经过辩论的成文宪法。其次是以国家银行——埃塞俄比亚银行——取代一家外国拥有的私人公司——原来的阿比西尼亚银行。第三是通过了一项补充法令以逐渐根除奴隶制。它规定所有的奴隶在他们的主人死后必须获释，并表示"奴隶制完全消灭"的一天即将到来。[73]

731

在交通方面也作了努力，1932 年建立起公共工程部，并重新开始道路的建设。一座临时的广播电台在 1933 年开始运转，并于 1935 年为一个意大利公司安装的更大功率的电台所取代。又开办了一些新学校，其中最好的是政府办的，仍有一些教育方面的活动由传教士们从事，尤其在省一级是这样。到 1935 年，亚的斯亚贝巴已有 14 所政府办的学校，共有 30 名外籍教师和将近 4000 名学生。省一级的教育也开始出现由政府创办的学校，如在德塞、贡德尔、吉吉加、拉卡姆蒂、德雷达瓦、哈勒尔、阿斯贝特费里、安

---

[68] R. 格林菲尔德，1965 年，第 157 页。

[69] R. 潘克赫斯特，1968 年，第 290-291 页。

[70] L. 法拉戈（Farago），1935 年，第 132-133 页。

[71] R. 潘克赫斯特，1962 b，第 266-267 页。

[72] G. L. 斯蒂尔（Steer），1936 年，第 28-29 页。

[73] A. L. 加德纳（Gardiner），1933 年，第 202 页。

博、季马、德卜勒马科阿、默格勒以及萨拉尔等地所做的那样。1934 年还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霍勒塔建立了一所军校，由瑞典教官们管理。[74] 在国外学习的学生人数增加到好几百人。在医疗方面也进行了很多工作，主要是由传教士们经办，著名的有北美联合长老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团和意大利天主教传道团，它们都在亚的斯亚贝巴开设了医院，与此同时，苏丹内地传教团在阿卡基开办了一个麻风病院。[75] 其他方面的进展，包括建立一个部分由归国留学生组成的小规模文职人员体制，它以工资代替了来自采邑的收入，并不断以现金缴纳的税款代替了实物贡赋。1934 年颁布了取消农民服劳役的公告，1935 年有了改革土地税的立法。但是，一切关于现代化的努力都被迫在眉睫的意大利法西斯入侵的阴影所笼罩。[76]

总之，1915 到 1935 年这段时间里可以看到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而深入。不过，这些变化仍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两国仍然是经济落后和社会不发达的国家。利比里亚的商业、农业和矿业企业中外国国民和公司的投资比在埃塞俄比亚的要大得多；外国投资一方面帮助了现代化的进程，另方面也导致了外国对利比里亚经济的控制大于埃塞俄比亚。

732

外国对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侵略，1915-1935 年

利比里亚

在本书第 11 章中已经谈到过的外国对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干预，在 1915 到 1935 年这段时间里继续存在。如像在大瓜分的年代里那样，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事态和环境与欧洲和美洲的事态和环境，都为干涉提供了土壤。

首先，利比里亚政府的一贫如洗和多年负债，部分地加强了外国——如国际监管团、英属西非银行和由美国政府支持的费尔斯通财团对利比里亚金融当局的控制。利比里亚的经济也受欧洲人、美国人和黎巴嫩人企业的支配。其次，利比里亚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的不良状况，成为政治上严重对立的真正独立党和人民党之间主要的争论题目，并引起大量的国际上的关注。在利比里亚国内，反对派领袖福克纳为了获得当地土生利比里亚人的支持，谴责政府在公共工程中使用强迫劳工，强迫招募出口海外的劳工，对利比里亚内地的管理混乱，以及在全国选举中舞弊。[77] 他在 1927 年第二次竞选失败后，还到欧洲和美国去旅行，不仅是为了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也是为了给执政的真正独立党的金总统丢脸。[78]

---

[74] E. 弗吉（Virgin），1936 年，第 117-124 页；A. 泽沃斯（Zervos），1936 年，第 223-232 页。
[75] A. 泽沃斯，1936 年，第 255-257 页。
[76] R. 潘克赫斯特，1968 年，第 177-179 页。
[77] T. J. R. 福克纳，1926 年。
[78] A. G. 琼斯，未注明日期。

1930年1月在福克纳访问美国的时候，有影响的《纽约时报》报道了利比里亚管理混乱的情况。同时，它作了有利于福克纳的报道，称他为"思想进步的公民"。[79]早些时候，在1929年英国报纸也刊登过几篇对利比里亚政府尖锐批评的社论。更重要的是，美国报纸和英国报纸的报道，以及外国传教士和访问者所写的其他的报道，都指控利比里亚政府和某些有势力的美裔利比里亚人实行奴隶制，招募强迫劳工和契约劳工，向欧洲人的殖民地——特别是西班牙岛屿殖民地费尔南多波岛出口或贩卖移居劳工。[80]

英国充当了外国攻击的先锋，指责上述的出口，并于1907到1909年，要求为了改善利比里亚这种令人不快的状况，必须把利比里亚政府置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81]美国同 733 样也责骂利比里亚"所谓'出口'利比里亚劳工到费尔南多波岛的做法……几乎与有组织的奴隶贸易无异"。美国接着含蓄地暗示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考虑"某些有效而坚决的行动"[82]来结束这种局势！

或许金总统有点欠考虑，他不仅否认了上述指控，而且向国际联盟呼吁要求进行调查。国联遂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利比里亚，组成人员包括由一名英国牙科医生卡恩伯特·克里斯蒂担任主席，一名美国黑人社会学家查尔斯·S.约翰逊博士，和利比里亚前总统阿瑟·巴克利。委员会只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既未去费尔南多波岛，也未提出任何对西班牙的指控材料。最后于1930年9月8日提出了委员会的报告。报告称，不存在有组织的奴隶贸易的形式，但劳动力的浪费和被强迫招募来从事公共工程、供私人使用以及与利比里亚边防军和政府高级官员勾结进行出口却实有其事。[83]报告还考察了美裔利比里亚人和当地土生利比里亚人的关系以及利比里亚政府的一般行政管理，认为二者均不能令人满意。[84]因此，委员会向国际联盟建议，利比里亚应该置于一个"能干而热心的白人政府管理"之下。[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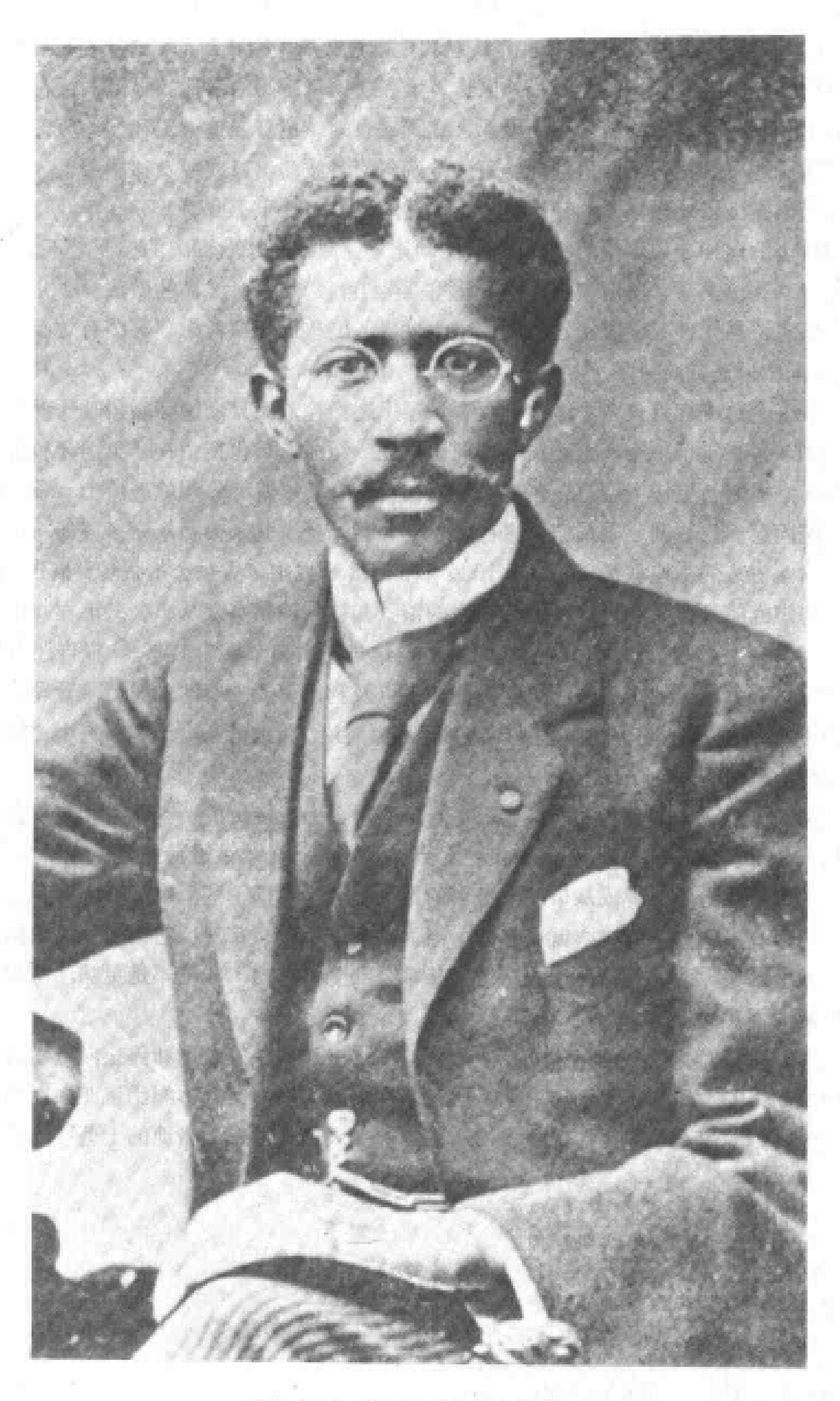
从利比里亚国内大量的悲惨状况来看，委员会绝大多数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在许多方面都是公正合理的。但是，如果委员会对当代欧洲的殖民政策进行过客观的研究的话，它对利比里亚政府所忽视或从事的事务中的错误就会少苛求一些，也许赞成对利比里亚实行"白人政府管理"的决心就会小些。因为欧洲殖民政权在对待它们的殖民地臣民所采用的某些政策方面，包括使用强迫劳工从事公共工程在内，即使不是更甚，至少也和利比里亚同样残酷。[86]

国际联盟对克里斯蒂报告的反应是强迫利比里亚废除奴隶制和停止向费尔南多波岛出口劳动力，改组利比里亚政府，并实行基本的改革以便给全体利比里亚人以平等的机会。就美国而言，联邦政府对报告中透露的"令人惊骇地压制当地的土著"的情况表示

---

[79] R. E. 安德森，1952年，第98页。
[80] A. G. 琼斯，未注明日期。
[81] 同上。
[82] 利比里亚共和国，1930年，第1页。
[83] J. G. 利伯诺（Liebenow），1969年，第64-70页；国际联盟，1930年，第168-170页。
[84] E. J. 扬西（Yancy），1934年，第201-220页。
[85] J. G. 利伯诺，1969年，第64-70页。
[86] A. G. 琼斯，未注明日期。

735



图片 28.4 利比里亚总统C. D. B. 金

了“极度的震惊”。它敦促说，为了不使美国和利比里亚之间的传统关系产生紧张，利比里亚政府必须立即废除“奴隶制和强迫劳工这对孪生的灾难”，并开展“一场全面的制度改革……。”[87] 该项声明导致了弹劾机构的设立，由利比里亚议会对副总统艾伦·扬西（他是招募劳工的主管人）和金总统（图片28.4）进行弹劾。他们二人在弹劾法案通过之前，于1930年12月初就辞职了。[88] 734

于是立即成立了一个由埃德温·J.巴克利接替金总统的新政府，它决定执行国联的建议。随之，利比里亚议会在1930年12月到1931年5月通过了若干法令：废除出口劳力、用人作抵押、和国内的奴隶制；用自愿的村社劳力从事公共工程以代替强迫劳工；向外国商人重新开放全部内地，并把内地行政区划改组为三省，配有各省和下属各区的专员和大酋长。[89]

虽然有这些改革——当然，利比里亚政府不可能有效地、或自觉自愿地彻底加以贯彻——英国和美国还是拒绝承认巴克利政府，却通过各自的代办来管理它们在利比里亚的事务。特别是英国不间断地攻击利比里亚，并推动某些措施以结束利比里亚的独立。巴克利担任总统不到两个月，英国就要求美国一起向利比里亚政府发出联合提议，以“最强烈的措词”敦促它向国际联盟请求委派一个克里斯蒂报告中建议的管理委员会。[90]

联合提议极力主张“利比里亚政府应该有一段时间委托给一个国际管理委员会”以实现由英国、美国和德国（被英国劝说参加了上述活动）的使节们于1931年1月21日向巴克利总统提出的必需改革。巴克利和他的内阁及时而正确地拒绝了上述要求，因为他们认为“接受的后果就不仅是践踏了共和国的宪法，而且也等于是让国家的主权和自治听任他人摆布”。[91] 不过，巴克利和他的内阁仍表示准备并寻求接受来自国际联盟的帮助，特别是以专家的形式在诸如经济、司法机构、公共卫生和“土著”行政等领域进行的帮助。[92]

于是，国联又另外委派了一个调查事实的代表团，这次由8个国家所派代表组成，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委内瑞拉、波兰和利比里亚，担负着终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工，并给利比里亚以技术援助的使命。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成员，但也被要求派出一名代表。这次又任命了一个英国人叫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的担任了新调查团的团长。还任命了一个以法国律师亨利·布鲁诺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就利比里亚必需进行的财政和行政改革向调查团提供咨询，以使国联的援助成为有效。调查团随之于1931年6月至7月访问了利比里亚，调查情况和搜集资料，并写出了报告。 736

和它的前任一样，第二次的调查团为改进利比里亚国内的行政、财政和公共卫生也草拟了详尽的计划。1932年1月布鲁诺委员会也向国联呈送了它的报告。报告的建议在

---

[87] 利比里亚共和国，1931 a，第2-3页。

[88] A. G. 琼斯，未注明日期。

[89] 利比里亚共和国，1931 a，第11-12页；1931 b；E. J. 巴克利，1934年。

[90] R. E. 安德森，1952年，第110-111页；A. G. 琼斯，未注明日期。

[91] E. J. 巴克利，1931年，第37页。

[92] 同上，第38页。

许多方面都与克里斯蒂调查团的相似，但就整个报告而言却减少了对利比里亚不利之处。由传统的非洲村社劳工来代替强迫劳工从事公共工程；允许当地土生的利比里亚人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非洲酋长的权威和尊严要得到利比里亚政府的确认；当地土生利比里亚人受教育的机会和通往利比里亚内地的交通工具要加以改善。内地分为三个行省，由外国人担任省的正副专员，他们的下面则是由利比里亚人担任的各区县长官。调查团还建议，为了使利比里亚的财政得到合理的改善，费尔斯通必须修订 1926 年贷款协定的条款。[93]

国联对利比里亚事务的这种干涉，大大加剧了许多当地土生利比里亚人对他们政府的反对，特别是克鲁人、格雷博人和瓦依人。他们中许多人相信"白人"将很快从美裔利比里亚人手中接管利比里亚政府，因此他们不再缴税或派强迫劳工参加筑路之类的公共工程。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边界、耕地和酋长身份的纠纷中，重新挑起部族内部的斗争。

为了保持和平与秩序，巴克利总统于 1931 年 5 月派遣了一支利比里亚的边防部队到克鲁族和格雷博族的地区，并向该部队的指挥官、美裔利比里亚人T. 埃尔伍德·戴维斯上校专门指示说，这支队伍是"一支武装巡逻队，而不是一支讨伐队"。[94] 但是，在巡逻过程中，该部队与大酋长朱阿·尼姆里领导的萨斯敦的克鲁族人还是发生了枪战，这件事又为外部干涉利比里亚事务提供了新的论据。一些抱有偏见的报告提交给了国联，其中包括英国驻蒙罗维亚的代办赖丁斯的报告，[95] 他描述这是一支被命令来任意毁灭克鲁族人民的生命财产的讨伐队。

737

可以预料，美国和英国政府对这类报告的反应是，要求利比里亚政府"在国联、美国和利比里亚就该国未来的政府管理体制作出安排之前"，[96] 必须停止对克鲁人的所谓军事报复。利比里亚政府从它的立场出发立即向国联就美、英这种侵犯利比里亚主权的新威胁提出抗议。[97] 此外，巴克利总统派了一个三人调查团，由一位在利比里亚财政部门受聘的美国人温思罗普·A. 特拉维尔领导，在克鲁人的沿海地带查明情况。

上述调查团随后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否决了对边防军派遣队肆意破坏的指控。[98] 而且，对利比里亚来说，幸运的是国联并没有按美、英提出的把一个外国统治强加在利比里亚头上，而是派了一位英国医生梅尔维尔·D. 麦肯齐博士作为代表，帮助利比里亚政府安抚克鲁族人。

而且，在收到布鲁诺报告后，国联的利比里亚委员会草拟了关于利比里亚"援助计划的总原则"。这些原则于 1932 年 9 月 27 日由委员会正式通过，并为利比里亚政府有条

---

[93] B. N. 阿齐克韦（Azikiwe），1934 年，第 165 页。

[94] E. J. 巴克利，1931 年，第 8 页。

[95] J. 赖丁斯（Rydings），1932 年。

[96] E. J. 巴克利，1932 年，第 2-4 页。

[97] 同上，第 7-8 页。

[98] 同上，第 9-14 页。特拉维尔（Travell）调查团的其他成员是两位利比里亚人：锡诺埃的F. A. K. 拉塞尔（Russell）博士和蒙特塞拉多的J. F. B. 科尔曼（Coleman）博士。实际上该调查团写了一份多数人的报告（拉塞尔和科尔曼）和一份少数人的报告（特拉维尔），而后者明显地是利比里亚政府所接受的那份报告。

件地接受了。即只有在它与费尔斯通举行的谈判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接受。1933 年 6 月在伦敦举行了财政方面的谈判，其结果由参加谈判的国联财政专家莱特哈特写出报告。在“总原则”和莱特哈特报告的基础上，国联的利比里亚委员会又草拟了一份体现有关援助计划的建议和改革的“议定书”。内容包括聘请外国“专家”担任省的正副专员；国联理事会在征得利比里亚总统的同意后，任命一位利比里亚政府的“首席顾问”，作为利比里亚政府和国联之间的联络官；为共和国内的医院和卫生保健工作派两名医务官员。

如果国联委员会的这些建议确实得到实现的话，在利比里亚就可能产生美裔利比里亚人的领袖们所一贯害怕的激烈变革。这样做也可能会严重侵犯利比里亚的主权和大量耗费利比里亚的金钱，因为考虑到“首席顾问”有着广泛的权限，而外国专家们的工资也很高。因此，毫不奇怪，巴克利总统在同意接受体现在国联利比里亚委员会“议定书” **738** 中的援助计划的同时，却对“首席顾问”的权限和实现计划将包含的费用做了某些保留。但是，国联委员会拒绝修改计划。当利比里亚不顾英、美政府重新以外来干涉进行威胁而拒绝全盘接受计划时，国联委员会撤回了计划。[99]

于是，利比里亚政府草拟了一个“三年发展计划”，规定了利比里亚国内改革的内容，包括利比里亚政府早已提出过的修改 1926 年贷款协定的要求。[100] 上述计划赢得了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的支持，并在 1935 年成为费尔斯通、美国和利比里亚政府之间谈判的基础，在谈判中还对贷款做了必要的修改。而最重要的革新是下述的原则：“国家岁收首先应该用于政府开支，而不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只把支付财政费用、利息和偿债基金后之所余用于政府开支。”[101] 每年“政府开支”的基数定为 45 万美元，从政府岁收中按年及时拨出，把支付政府主要需要放在首位，放在利比里亚必须偿还的债款前面。贷款的利息也从 7%降低为 5%。[102]

随着利比里亚和费尔斯通关系的改善，利比里亚和美国的关系也相应地有所改善，从而最终在 1935 年 6 月 11 日发展到美国政府对巴克利政府的承认。[103] 英国于 1936 年 12 月 16 日仿效了美国。[104] 经过这些事变，利比里亚独立的危机可以说正式过去了。

注意到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即在国联中虽有列强的强硬压力，但同时也始终存在利比里亚的辩护者和同情者。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单个的非洲人和美国黑人，或者是黑人的宗教、企业或知识分子组织，他们理直气壮地争辩说，在非洲的欧洲人殖民地，其内部状况在许多方面和利比里亚一样糟糕。因此他们极力声辩说，利比里亚的独立绝不应该成为维护费尔斯通之类白人经济利益的牺牲品。他们还争辩说，不该用双重的标准来谴责利比里亚，而对白人在殖民地进行的压迫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上述这些个人和组织，包括W. E. B. 杜波依斯博士，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约翰逊，尼日利亚记者 **739**

---

[99] E. J. 巴克利，1934 年，第 2-4 页。

[100] 同上，1934 年；R. L. 布埃尔，1947 年，第 41-44 页。

[101] E. J. 巴克利，1935 a，第 3 页。

[102] 同上。

[103] 同上，1935 b，第 14 页。

[104] 同上，1937 年，第 14 页。

纳姆迪·阿齐克韦，洛特·凯里浸礼会国外传教团协会，非洲人美以美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一部分黑人报刊，像巴尔的摩的《非裔美国人》。他们为利比里亚问题所作的努力，很可能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利比里亚在强迫劳工危机方面的政策，虽然这种影响并不特别巨大。

埃塞俄比亚

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里，外国干涉埃塞俄比亚内部事务的后果甚至更为持久、也更为严重。1906 年的三方协定把埃塞俄比亚划分为英、法、意三国的势力范围，这是欧洲帝国主义干涉迟早要在埃塞俄比亚复发的迹象。曼涅里克 1913 年的逝世、埃雅苏公子的继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刺激了意大利，特别是使它从 1913 年以来对埃塞俄比亚的帝国主义野心得以复苏。因此，在 1913 到 1919 年之间意大利殖民部极力主张落实意大利在非洲殖民的“最低”方案或“最高”方案。而两种方案都是专门图谋使意大利控制红海并使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大利独家的势力范围”。不过，英国和法国在东北非的帝国主义野心和意大利的方案相冲突。最后，决定性的凡尔赛和约使得意大利方案的绝大部分未能实现。

虽然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有殖民野心，对阿杜瓦之役有着痛苦的回忆，而且许多意大利人还存有雪耻的想法，但是在塔法里·马康南摄政时期，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的实际关系却异常地良好。意大利在 1923 年支持埃塞俄比亚进入国际联盟，而且也是塔法里 1923 年破天荒的出国之行所访问的国家之一。尽管在 1925 到 1926 年期间，由于意大利要求在埃塞俄比亚得到一个势力范围而发生摩擦，但两国仍在 1928 年 8 月 2 日签订了一项为期 20 年的友好调解条约和一个补充协定，允许意大利有权从阿萨布到德塞之间修筑一条公路，同时埃塞俄比亚则在港口将得到一个免税区。不过，这些计划实际并未实现，因为意大利的政策开始从和平渗透转向武装干涉了。

1930 年法西斯政策开始改变，担任意大利殖民地部长的德·博诺元帅鼓动意大利部 **740** 长会议增加他的预算，为了“向祖国有限的范围以外扩张”。1932 年他访问了厄立特里亚，1933 年他与墨索里尼举行了密谈，建议入侵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欣然同意，命令他“全速前进”，并“尽快做好准备”。采取的相应步骤是改善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殖民地的陆地、海上和空中交通，同时法西斯间谍开始在埃塞俄比亚酝酿政治颠覆。1934 年 3 月 18 日笼罩着意大利企图的秘密公诸于世，墨索里尼在向法西斯党演说时，公然要求那些殖民地已“饱和”的国家不要阻拦“法西斯意大利在文化、政治和经

A. G. 琼斯，未注明日期。

R. L. 赫斯，1963 年，第 105-108 页。

W. R. 路易斯（Louis），1963 a。

R. 潘克赫斯特，1976 年。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俘获的意大利文件 112809。

E. 德博诺（de Bono），1937 年，第 12-13、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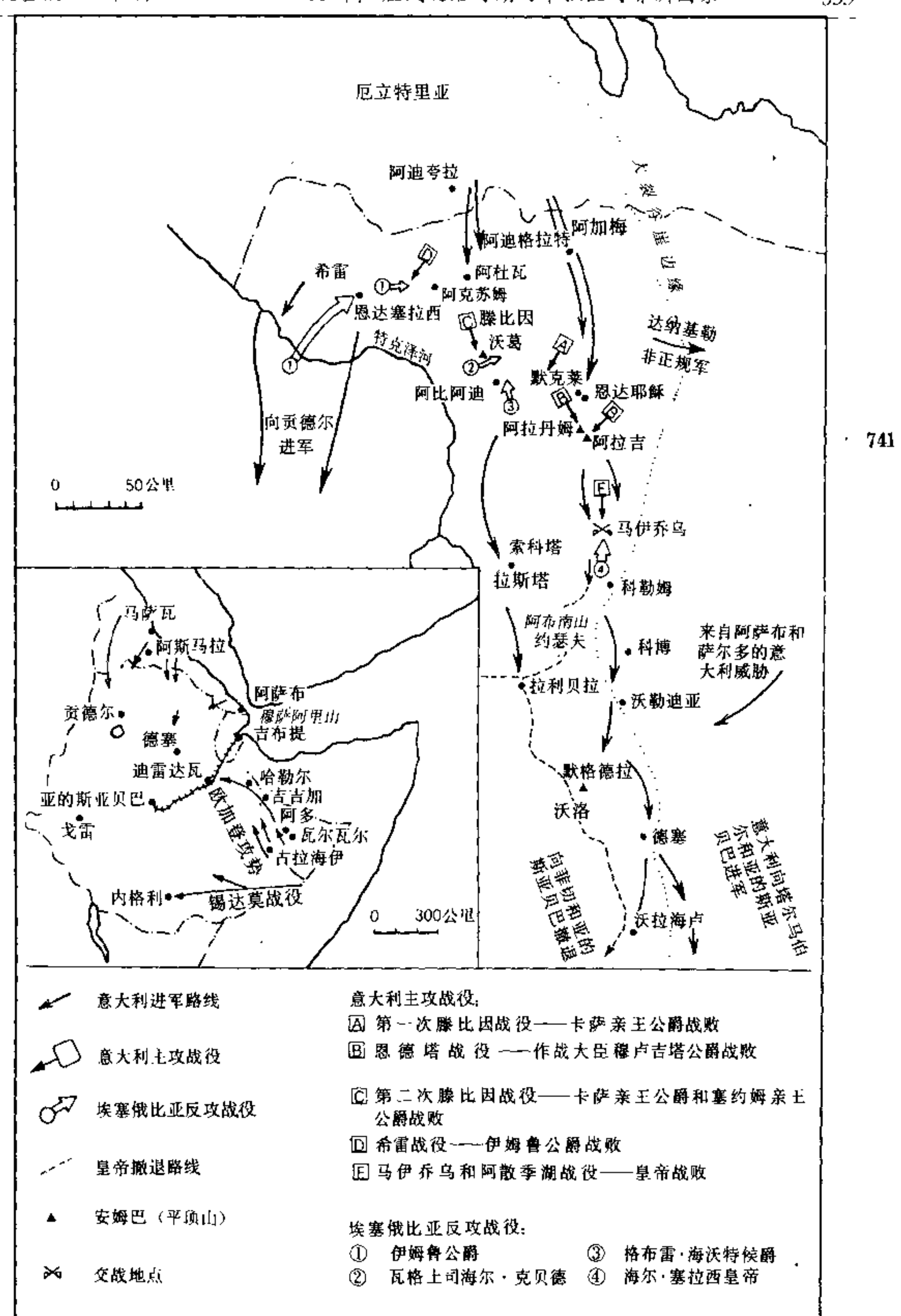


插图 28.2 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亚示意

主图——北方战役

附图——侵略全貌(根据R. 格林菲尔德，1975 年)

济方面的扩张”。

墨索里尼以1934年的瓦尔瓦尔事件作为侵略的口实。一个划定埃塞俄比亚和英属索马里边界的英、埃边界委员会于该年11月23日到达瓦尔瓦尔泉水处。该地位于埃塞俄比亚境内160公里处，这一地段与意属索马里的边界未经划定。边界委员会到达时发现这里已被一支意大利武装力量所占领。委员会的英方首席代表克利福德上校遂向意大利人提出抗议，认为他们的存在有碍于英国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的行动自由，但英国代表为避免发生“国际事件”而后撤了，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的代表们则停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于是两军对峙，直到12月5日一声来历不明的枪响突然使一场冲突爆发了。在此之后，装备欠佳的埃塞俄比亚人撤退了。埃塞俄比亚乞灵于1928年的友好调解条约，而意大利则拒绝调解，要求道歉。要埃塞俄比亚承认意大利对瓦尔瓦尔地区的主权，并付给20万玛丽亚·特丽萨币的赔款。[111] 迫切希望避免一场战火的英、法两国，极力要埃塞俄比亚接受条件，但海尔·塞拉西害怕这样一来会鼓励意大利进一步扩张，因此予以拒绝，并于12月14日将此事提交国际联盟。墨索里尼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不愿投降之后，于12月30日发出密令准备入侵。由于埃塞俄比亚的辽阔和多山地势，入侵需要相当多的准备。

国联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次争端，但墨索里尼几乎已经准备好攻击了，所以根本不关心诉讼程序。国联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为了满足意大利，它建议将埃塞俄比亚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使埃塞俄比亚不能像墨索里尼声称的那样危及毗邻的意属殖民地。不过，独裁者已不再需要任何的妥协了。10月2日，他下了动员令，翌日意大利军队在德博诺统率下未经宣战就从厄立特里亚跨过了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同时意大利空军轰炸了阿杜瓦。一支来自意属索马里的军队也从南方发动了攻击。（插图28.2）

742

这次侵略虽说经过了长期的准备，依然引起了世界的震惊。国联于10月9日举行全体会议，由50票对1票（意大利）3票弃权（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和匈牙利）通过决议，确认意大利为侵略者，因它已破坏了国联盟约。[112]

国联在英、法殖民大国的控制下，不顾近乎全体一致的谴责，惧怕触怒墨索里尼而不敢采取苏联所提倡的立即全面的制裁。国联代之以成立一个相应的委员会，它提出包括4种分类禁运的有限经济制裁，这些制裁只适用于各会员国，共包括：(1)向意大利出口武器和军用品；(2)向意大利提供资金和贷款；(3)从意大利进口所有货物；(4)向意大利出口某些原料，包括橡胶、铝矾土、铝、铁矿和废铁。上述制裁的第一项于10月11日付诸实施，其他各项到11月18日才开始实行。[113] 凯恩斯勋爵把这些禁令描述成“相当温和的经济制裁”，[114] 并被证明是完全无效的。事实上，如温斯顿·邱吉尔所评论的那样，这些禁令“并不是使侵略者瘫痪的真正的制裁，而只是那种半心半意的使侵略者可以容

[111] R.辛马鲁塔（Cimmaruta），1936年；A.德·拉·普拉德尔（Pradelle），1936年，第149-160页；G. W. 贝尔（Baer），1967年，第45-61页。

[112] S.希尔德（Heald）（编），1937年，第192-193页。

[113] 同上，第193-194，203-207页。也见L.维拉里（Villari），1934年，第151-219页。

[114] 《新政治家与国家》，1935年11月28日。

忍的制裁"。[115]

意大利军队并未因这种无效的措施而有所顾忌，而且一再受到独裁者的电报催促，因为他要抢先在国联感到需要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之前迅速取胜。意军于10月6日攻占阿杜瓦，又于11月8日攻占默克莱。随之，埃塞俄比亚的抵抗迫使侵略者停止了前进。为此德博诺被召回，于11月16日代之以巴多格里奥元帅。他面对着一支强有力的埃塞俄比亚反击力量，并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前进。墨索里尼希望瓦解埃塞俄比亚的士气，于是坚持让他的军队使用毒气。[116]

国联有限制裁的失败导致要求扩大制裁，特别是石油。这是极端重要的东西，正像墨索里尼后来向希特勒承认时所说的那样，如果石油制裁被采纳的话，他"就不得不在一星期之内从阿比西尼亚撤军"。[117] 英、法两国却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它们相信墨索里尼会把这看作是一种战争行为。英、法两国的外长霍尔和赖伐尔为此于12月7日在巴黎会晤以策划一项新的妥协。这种妥协有两项主要的原则：第一，"交换领土"的办法，埃塞俄比亚把欧加登和提格雷的大部让给意大利，以换得一个或在红海，或在亚丁湾的港口；第二，意大利将在亚的斯亚贝巴以南的埃塞俄比亚较大部分地区内得到一个"经济扩张和殖民的地区"，该地区仍属埃塞俄比亚所有，但意大利在那里拥有独占的经济权利。这是一个向该死的侵略者投降犯罪并彻底放弃国联精神的计划，当该计划的消息向法国报纸泄漏后，在许多国家中掀起了愤怒的浪潮，特别是在英国。于是霍尔被迫于12月18日辞职。[118]

743

埃塞俄比亚到1935年底就这样成了世界上的头号新闻和国际上令人振奋和愤慨的中心。[119] 一位英国的外交大臣被认为是英国叛臣而下台了，而在埃塞俄比亚崎岖的群山之中，一支使用最新式的战争武器包括毒气在内的强大的法西斯军队，却被埃塞俄比亚装备很差的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所阻挡而暂时被迫停止前进了。[120] 这是大卫和歌利亚式的战斗在非洲大陆上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殖民战争中重演。虽然埃塞俄比亚军队很快就遭受失败，但是意大利人在1936年5月6日攻占亚的斯亚贝巴之前仍面临着好几场严峻的恶战。随之而来的是意大利法西斯长达5年的侵占掠夺，而其中4年时间是由埃塞俄比亚的爱国者们独自作战的。[121]

独裁者的侵略立即在非洲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122] 1935年8月，一群非洲人和非

---

115 W. S. 丘吉尔（Churchill），1948年，第172-173页。

116 A. 德尔·博卡（Boca），1969年。

117 P. 阿洛伊斯（Aloisi），1957年，第324页。

118 S. 希尔德（编），1937年，第316-413页。

119 对意、埃危机的新近评介，见F. 哈迪（Hardie），1974年。

120 关于战争情况见海尔·塞拉西（Haile Sellassie），1936年；G. L. 斯蒂尔，1936年；E. 德博诺，1937年；P. 巴多格里奥（Badoglio），1937年；R. 格拉齐亚尼（Graziani），1938年；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196-266页；A. J. 巴克（Barker），1968年；A. 德尔·博卡，1969年；G. 罗奇特（Rochet），1971年；F. 班迪尼（Bandini），1971年。

121 R. 潘克赫斯特，1970年。

122 W. R. 斯科特（Scott），1966年和1972年，第132-138页；R. 罗斯（Ross），1972年。

洲裔人士，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国际非洲人阿比西尼亚之友的组织，它的委员会成员包括：西印度群岛的C. L. R. 詹姆斯、英属圭亚那的P. McD. 米勒德博士、马库斯. 贾维的妻子艾米·阿什伍德·贾维、索马里的穆罕默德·赛义德、黄金海岸的J. B. 丹凯博士。这个团体的宗旨，如它的秘书长乔莫·肯雅塔所说，是"尽一切力量来帮助阿比西尼亚保持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92]

随后爆发的战斗，使埃塞俄比亚排在每张报纸的头条新闻上，对非洲人造成沉重的冲击。克瓦米·恩克鲁玛当时是一个路过英国的学生，他回忆起当年他看到宣布"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标语时，他感情十分冲动。他补充道：

> 一刹那之间几乎好像是整个伦敦城突然向我个人宣战了。接着有几分钟我什么也不能做，只是瞪着每一张冷漠的脸，对他们这些人会了解殖民主义的邪恶表示怀疑，于是我祷告将会有一天我能尽自己一份力量推翻这种制度。我的民族主义思想猛然高涨起来；为了完成我的目标，如果需要，我准备赴汤蹈火。[93]

744

同样的情绪席卷了整个非洲。尼日利亚的知识界人士纳姆迪·阿齐克韦在他的报纸《西非向导》和《彗星》上辟出大量篇幅报道埃塞俄比亚的斗争。后来在他的有影响的著作、曾被誉为"非洲人的圣经"的《非洲的复兴》一书中，回忆了黄金海岸一所典型的学校里，当学生们听到"黑人士兵在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援助下是如何机智并压倒他们的敌人"时所引起的振奋。

埃塞俄比亚，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外国牺牲品，也是主张集体安全舆论的振作点，就这样在1935年底成为非洲在殖民统治下觉醒的火样炽烈的象征。

欧洲帝国主义干涉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结果

到1936年年底时，利比里亚顶住了外国的干涉而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主权，相反埃塞俄比亚却被打败，她的主权被终止了——虽然是暂时的。什么是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呢？

直到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发动侵略之时为止，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内部局势固然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对决定外国干涉的最后结果毫不相干。的确，两国的局势在任何重要的方面都无二致。两国的中央政府都有国内的反对派，他们与外国势力结盟，寻找机会利用外国干涉的局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较明显的有：在野的利比里亚人民党以及封建贵族像海卢亲王公爵和海尔·塞拉西·古格萨侯爵。[94]

两国虽然都不乏准备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卫祖国的热心爱国者，但两国在军事上与它们的潜在的或实际的外国侵略者相比却实在太微弱了。利比里亚所有体格强壮的男子民兵（绝大部分是美裔利比里亚人）多数未经正规训练而且缺少武器。边防军是利比里亚

[92] 《新时代与埃塞俄比亚新闻》，1954年1月30日；R. 马康南（Makonnen）公爵，1973年，第112-120页，又见S. K. B. 阿散蒂（Asante），1977年。

[93] K. 恩克鲁玛（Nkrumah），1957年，第22页。

[94] 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192-194页。

的常备军，它的训练和装备同样很差，而且没有固定的和充足的薪给与生活给养。例如1920年9月时，拖欠部队官兵的薪给总数高达90,689.52美元，这大大地挫伤了士气。[126] 745 至于部队的纪律和训练据说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以至“极难使一项命令按文字或者按精神得到贯彻。”[127] 部队的总人数1917年11月为821人，1920年12月为767人，1925年12月为744人。1935年一位利比里亚的作者把利比里亚在自卫事务中的能力描写为“不比婴儿强”多少，她既无海军也无空军。[128]

至于埃塞俄比亚的武装力量，则是由各省总督和地方士司的封建队伍、中央政府的部队、和海尔·塞拉西自己的常备军三方所组成的。[129] 而只有最后一种军队是经过训练并以现代方式装备起来的。而其他都是些“缺乏所有各种训练的人，他们只有天生的战争本能和固有的传统而已。”[130]

非常清楚，不论是利比里亚或是埃塞俄比亚都不能和欧洲侵略者的武力相匹敌。利比里亚幸存下来而埃塞俄比亚未能幸存的极为重要的区别，也许因为后者面临的是坚定的欧洲军事干涉，而另一个则没有。

从这一点出发，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干涉发生在这一国家而不在那一国家。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记住下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直到1935年底，不论是利比里亚还是埃塞俄比亚都没有从国际联盟内外的外国列强中或国联本身得到任何坚定的同情、支持或保护。美国不顾它对利比里亚的承认和传统的友谊，在发生强迫劳工危机的时候，多次地表示和欧洲殖民列强一鼻孔出气，这些列强早已对利比里亚的主权存有野心，特别是支持对利比里亚设立一个国际管理委员会的计划。

利比里亚政府巨大的外交能力，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利比里亚的杰出的知识分子埃德温·J. 巴克利总统以及利比里亚驻日内瓦的谈判代表和国务卿路易斯·A. 格兰姆斯两人。利比里亚的领袖们以武力或说服的方式平息了本地的反对，他们牢牢地抓住在利比里亚实行民族自决的原则，为他们国家的主权伸张了正义。但是，埃塞俄比亚的领袖们包括海尔·塞拉西在内，也都是外交上的能手和他们国家主权的热心捍卫者，其所以不能像利比里亚一样幸存下来，似乎最终得仔细研究一下下列的事实，即埃塞俄比亚有一个疯狂残忍的帝国主义国家作为邻居，它一心想扩张领土，尤其要报阿杜瓦之役的仇，而且为此在实际上进攻埃塞俄比亚。另一方面，英、法两国在非洲已经拥有辽阔的殖民领土，而且没有阿杜瓦之仇可报，因此它们没有动机因素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那样非要去进攻和征服利比里亚不可。

（屠尔康译）

[126] 利比里亚共和国，1920年，第9页。
[127] M. 斯泰坦（Staten）少校，1925年。
[128] E. J. 扬西，1934年，第93-99页。
[129] R. 格林菲尔德，1965年，第194-195、199-201页。
[130] E. 弗吉，转引自前引书，第194页。

29 非洲和新大陆

R. D. 罗尔斯顿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部分的作者：
阿尔布凯克-莫朗）

746 大量移居在外的非洲人群体或巨大的非洲影响曾影响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如古希腊和古罗马；葡萄牙（15 世纪以来）；加勒比地区；美国（17 世纪以来）；英国（18 世纪以来）；加拿大（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巴西（特别是 18 世纪以来）；沙特阿拉伯；印度；某种情况下还有土耳其。与此同时，在美洲来来往往的非洲商人、水手、译员、教员和学生，以及在非洲重新定居的北美黑人、非裔巴西人和非裔古巴人，又都代表着散居在非洲大陆以外的非洲人相互间的差别。非洲与美洲这两个主要的黑人世界长期以来通过人员交流、文化资料交换和政治思想的勾通而保持着联系。本章的目的是叙述非洲历史上殖民时期这一阶段非洲人与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之间的相互影响。

1880 至 1935 年这一时期，非洲人和美洲黑人的联系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1)返回非洲运动，或称黑人移民（大部分来自北美，但也有来自加勒比地区和巴西的）移往非洲各地（大部分是到西非，但也有到南非和非洲之角的）；(2)美国的传教活动，非洲裔的美国传教士成了在非洲的“福音传播者”；(3)非洲学生到美国的黑人学校和大学上学的洪流成为双方中间通道的一种新形式；(4)泛非主义者的种种活动，包括召开多次大会，成立各种组织，以及教育、文学、商业交往，使得非洲人接触到了美洲的黑人世界，并且有助于对殖民地非洲事态的发展施加影响；(5)非洲文化的价值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得以持续存在，并有所演变。以上五个方面将在本章分段逐一加以讨论。

747 返回非洲运动

虽然 19 世纪上半叶北美黑人移居利比里亚的热情已明显有所下降，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非裔美洲人仍然对移居非洲抱有兴趣。的确，如果稍有不同，那就是早期受到的像黑人丹尼尔·科克尔、洛特·凯里、约翰·B. 拉斯沃尔姆、保罗·卡夫、亨利·H. 加尼特、马丁·R. 德拉尼等人所鼓动的向非洲移民的传统，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最后 25 年，而且范围越来越大。例如，1878 年南卡罗来纳州和利比里亚联合外迁轮船股份公司就曾把 206 名黑人移民送往利比里亚。1881 年，亨利·H. 加尼特被任命为美国常驻利比里亚的公使兼总领事，实现了他本人早期的信念：1889 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圣·托马斯的泛非主义者爱德华·W. 布莱登博士从利比里亚到美国进行访问，代表美国殖民协会

大力促进黑人对移民活动的支持。除此之外，在1880至1900年期间，亨利·麦克尼尔·特纳主教用了很大功夫把近代史上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相互交往中长期占优势的两种传统结合起来：即向非洲移民和传播基督的福音。当1888年巴西官方禁止奴隶制的时候，由于成千上万名巴西籍黑人回到了西非，同样也产生了非洲人和美洲黑人之间的广泛的相互影响。这些非裔巴西人在他们过去的老家尼日利亚、达荷美(现在的贝宁)、多哥和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或邻近地区重新定居之后，他们在技术、商业方面的能力和政治上的抱负似乎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形势。可能是在这些地区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区分，从而不容易看出当地非洲人和非裔巴西人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利比里亚差异却是明显的)，也看不出两者在社会和政治目标方面有什么区别。

利比里亚虽然早在大瓜分时代之前就已由美国白人通过美国殖民协会创立成国家，但一旦要考虑在两个黑人世界之间作任何的移民时，它仍然拥有特殊的地位。部分由于布莱登大力谋求支持美国殖民协会计划的结果，1889年美国参议院终于对一项援助黑人向非洲移民的法案进行了辩论。同样，在1892年前后，黑人向美国殖民协会申请去利比里亚定居的人数剧增，数百名黑人农民从阿肯色州和俄克拉何马州来到纽约，要求转往非洲。更有甚者，特纳主教于1893年访问利比里亚后，他热情地报告说，“黑人在此地（利比里亚）拥有的唯一东西……是人格、自在，和最充分的自由；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主人，而且俨然以主人的方式走路。”[①] 特纳主教在1896年再一次断言：“我相信我们这二、三百万人应该回到我们祖先所居住的土地上去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文明、法律、习俗和制造风格……而不再是发牢骚者和周期性的抗议者，也不再是那个宣称注定要统治别人的白人国家的威胁。”[②] 通过特纳主教的努力，1896年3月有300多非裔美洲人移居到利比里亚。即便是当时还年轻的W. E. B. 杜波依斯——后来他强烈反对用移民办法解决美国的黑人问题——也认为，与在美国“乞求公正和承认的屈辱经历”相比，特纳向非洲移民的想法不失为一种值得称赞的选择。[③] 748

特纳主教在利比里亚的时候，曾向他所谓的美国“黑人资本家”建议说，“如果他们开展与利比里亚的贸易，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但响应者寥寥无几。虽然有些人在1899年确实组织了一个非洲开发协会，但其主要目的是鼓励非裔美洲人购置土地和在中东非定居。该会将出售为非洲人申请者提供的股票和土地优惠权，但只卖给非裔美洲人或非洲人买主。[④] 特纳主教后来又在亚拉巴马州的国际移民协会担任顾问，该协会在1900年停办之前向非洲输送了大约500名移民。其中有些留在了利比里亚，有些则又返回美国。留在那里的按理说过得不错，而且不少人显然是发迹了。但是，那些回来的人却讲了许多关于土地贫瘠、缺乏食物和居住条件很差的可怕故事。这些故事降低了任何大规模的非裔美洲人移民运动的可能性，即使在1895至1900年美国黑人的前景日

① L. 戴维斯（Davis），1974年，第3页。
② 同上，第5页。
③ 同上。
④ A. C. 希尔（Hill）和M. 基尔森（Kilson）（合编），1971年，第192-194页。

趋黯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不过，许多非裔美洲人显然仍在认真考虑移居非洲的问题，而在美国和加勒比地区的另一些人则仅仅是从有公开歧视惯例的地区搬到附近别的地方。

20世纪开始以后，返回非洲的接力棒又传到了另外一些人手中。例如，20世纪初期有位迪安船长，曾想在南非建立一个美国黑人移民区，以在那里形成一个强大的黑人国家。当迪安在南非逗留极短的时间以安排这一居民区时，白人当局却以“挑衅活动”之名将他驱除出开普。1914年，又有一位黄金海岸的非洲人艾尔弗雷德·C.萨姆酋长来到了俄克拉何马州，他以非洲能提供更大的机会说服了60名左右的黑人农民和他一同航行到黄金海岸的盐湖。当人们发现萨姆酋长的说法纯系吹牛，且受到禁止美国移民入境的黄金海岸官员多方限制时，绝大部分俄克拉何马州人终于又回到了美国。但是，在鼓吹非洲人和美国黑人进行移民上，谁也不如1887年出生在牙买加的马库斯·贾维那样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

由于他总是以打动黑人的自尊心来进行呼吁，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贾维把成百万非裔美洲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非洲。杜波依斯后来观察到“(贾维出名)没有几年，有关他活动的消息，他的许诺和计划的内容就传到了欧洲和亚洲，而且渗透到了非洲的每个角落。”[5] 贾维在加勒比地区和中南美的旅行以及他在英国两年的逗留，使他相信黑人的普遍困境需要有一个战斗性很强的自助计划。他在伦敦的经历特别有两个方面影响了他的思想：由于阅读了布克·T.华盛顿的《从奴役中站起来!》(1899年)一书，贾维后来说，他因此“注定了”要当一个种族领袖；[6] 其次是他和埃及知识分子杜斯·穆罕默德·阿里的相遇，后者在他的《在法老们的土地上》(1911年)一书中坚定地批评了英国和美国的对非政策。杜斯自己在伦敦定居以前，早期曾以戏剧演员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在美国进行过旅行和短暂的工作。

回牙买加之后，贾维在1914年制定了他要进一步促进向非洲移民及其他有关的计划方案，并取名为全球黑人促进与保护协会和非洲人村社共同体联盟(后来简称UNIA)。28岁的贾维受了布克·T.华盛顿著作的感染和杜斯榜样的鼓舞，怀里装着拯救种族的方案来到美国，方案的内容是：为牙买加的黑人设立工农业学校，为非洲和美洲的黑人通商建立一支黑星船队，更重要的是为该种族建立一个“中央国家”。长期以来成为非裔美洲人移民理论中心的利比里亚，又成了贾维移民计划的天然目标。

1920年5月，贾维派了一名使者来到利比里亚，他展示了协会的目的：把协会的总部移到利比里亚；为利比里亚建立学校和医院提供财政援助；清理利比里亚的债务；在利比里亚建立非裔美洲人的居民区，他们会帮助发展农业和开发自然资源。[7] 利比里亚政府热情地答应了协会的最初要求，且在蒙罗维亚城外划出一块土地，随之贾维派了一组技术人员来勘查这一地点，并准备建立2-3万户移民的住宅，这是贾维打算从1924年开始用两年时间来遣送的人数。但是，当贾维的技术人员于1924年5月抵达马里兰县的时候，他们遭到逮捕拘留，并于1924年7月被驱逐出境。不久利比里亚政府下令连协会也被禁止，

[5] W. E. B. 杜波依斯(Du Bois)，1968年，第277页。

[6] A. J. 贾维(Garvey)(编)，1923-1925年，第I卷，第126页。

[7] 见M. B. 艾克潘(Akpan)，1973 a；F. 乔克(Chalk)，1967年，第135-142页。

750



图片29.1　马库斯·贾维（1887-1940年），全球黑人促进协会的创始人和领袖

贾维在利比里亚的殖民计划遂告破产。

751 与此同时，在非洲大陆另一端的另一个聚集地点，贾维在20年代末期派了一个由熟练技术人员组成的小小代表团，去调查非裔美洲人移民到埃塞俄比亚的可能性。代表团并没有受到预期的那种欢迎。到3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出现了一个很小的非裔美洲人居住区。其中有些人来是贾维动员号召的结果，但更多的人则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来的。新近和早先的研究成果都揭示了大量非裔美洲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关系的资料。[8]但是这个题目仍然是非美关系中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位名叫阿诺德·福特的黑人犹太教教士，1930年从巴巴多斯（经纽约）移居到埃塞俄比亚，并在唱黑人灵歌的坦鲍林俱乐部工作，“该俱乐部后来因为歧视当地埃塞俄比亚顾客而被政府关闭”。[9]福特在纽约的哈莱姆区时深受贾维教导的影响。似乎可以说，虽然协会的代表团在非洲之角未能像在利比里亚一样建立起机构间的关系，但它成功地使一批未来的黑人移民确立在那里服务的思想。作为贾维的信徒迁往埃塞俄比亚的人数估计多于利比里亚。因为，尽管埃塞俄比亚更难于进去，它的古老和雄伟——按照贾维的想法——可能比“美裔利比里亚上层精英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式反非政治具有更大的吸引力”。[10]因此，当贾维和利比里亚政府公开决裂后，他的许多追随者显然是满怀喜悦地向往这个新天地的。

但是，20年代和20年代以后移居埃塞俄比亚的非裔美洲人，虽然一般都受到过贾维的鼓动，他们行动的直接动因却很可能是由于偶遇埃塞俄比亚学生，或者与20年代末偶然来到纽约的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接触，这些代表团来纽约是“为非洲聘请经过培养的黑人殖民地工作者”的。[11]而且，福特和特纳主教一样，都相信非裔美洲人由于有多年受难和逃亡的经历，他们负有一种拯救非洲的特殊任务。福特自己就是由于响应了法拉沙人（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犹太教徒）代表团的召唤于1930年动身去埃塞俄比亚的，而且一直呆在那里，直到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1935至1936年）时死去为止。[12]当福特到达埃塞俄比亚时，他遇到的大部分非裔美洲人是牙买加人，偶尔也有些其他的非裔加勒比人。最近一段叙述表明“西印度人显得比某些美国人更有准备作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在埃塞俄比亚的生活”，虽然他们二者都不时遭受歧视。[13]

752 当然，在贾维之前就已有非裔美洲人移居埃塞俄比亚，但那只不过是一些个别的移民。例如，19世纪90年代一位海地人本尼托·西尔万曾向曼涅里克二世朝廷呈上过一份“泛尼格罗人”组织的计划。然而，非裔美洲人移来的最大的浪潮，无疑是发生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是因为贾维和利比里亚人决裂之后，以及在皇帝继位的过程中，有成千

⑧ 举例而言，见C. 库恩（Coon），1936年；K. J. 金（King），1972年，第81-87页；W. R. 斯科特（Scott），1971年。

⑨ C. 库恩，1936年，第137页。

⑩ K. J. 金，1972年，第82页。

⑪ 同上。

⑫ 在年代上略有出入，见H. 布罗茨（Brotz），1970年，第12页与W. R. 斯科特，1971年。

⑬ K. J. 金，1972年，第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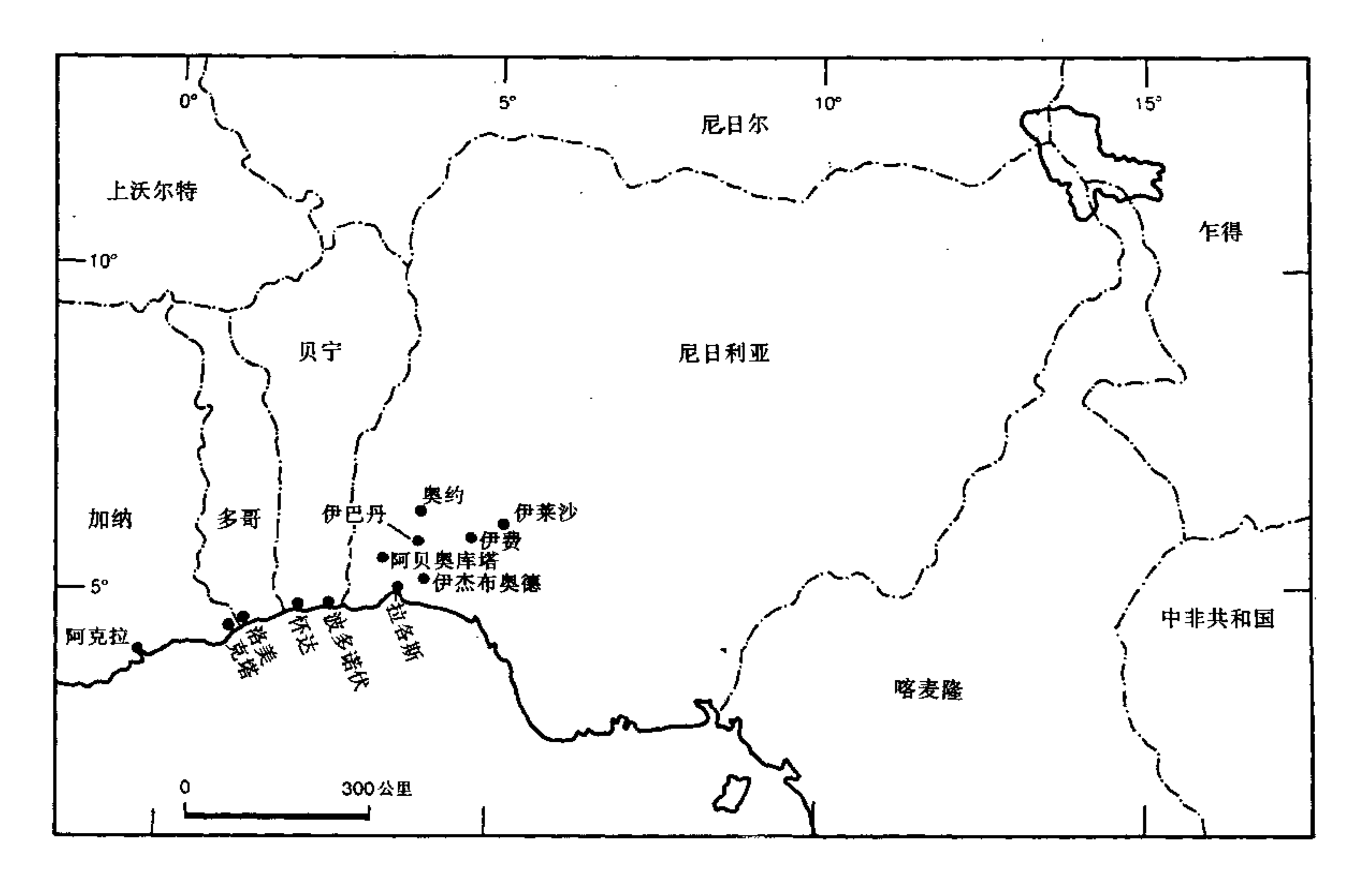


插图 29.1 18世纪和19世纪西非的非裔巴西人据点

753

人与埃塞俄比亚旅行者见过面，受影响来此。紧接海尔·塞拉西1941年复位之后，又有一股非裔美洲人（大约20人）前来埃塞俄比亚的新细流，不过这个时期已超出本章叙述的范围。总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从美洲来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移民高潮，是与贾维、福特和皇帝的活动有关的，在此之前或之后的时期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14]

非裔巴西人

巴西与非洲西海岸之间的接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建立了定期的货运和客运航线，它们代替了以往的贩奴船。只要提两家就行：皇家非洲公司和非洲轮船公司都定期往返于托多苏斯桑托斯港与拉各斯港之间。据1890年10月11日的《时代周报》报道，比夫拉号轮船经过首次航行回到拉各斯时，它载有110名乘客和400吨货物。这两个海岸之间的贸易量在那时是相当可观的。据皮埃尔·弗吉尔称，[15]从巴西出口的“主要是雪茄、烟草和酒”，进口的是非洲“当地用欧洲棉花纺成的纺织品以及柯拉果和棕榈油”。从1881到1885年的5年之间，平均年进出口总值分别为19,084英镑和11,259英镑。

两洲沿岸之间的贸易，除了上述重要意义之外，还导致非洲资产阶级的出现，他们是来自巴西和古巴的前奴隶。这项活动始自18世纪末，[16]到1835年“马来斯（Malês）”（穆斯林奴隶）起义之后变得更加引人瞩目。这一帮移民主要定居在尼日利亚和达荷美的沿海城市，较少的一部分人定居在多哥和黄金海岸（见插图29.1）。他们在这些沿海地区组成了他们的社会，从而避免了去内地，只有那些参加进约鲁巴和豪萨群体的人，他们不仅有定居在拉各斯的，而且也有定居在内地城镇，如阿贝奥库塔的。[17]移民中有很大部分人曾是巴西的“得益黑人”，换句话说，他们是住在城里很自由地从事某种行业的奴隶

754 （如泥瓦匠、木匠、填船缝的人等），他们把挣来的钱分给他们的主人。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技术知识。他们中一些杰出的营造业者在波多诺伏、怀达建筑了住宅区，特别是在拉各斯修建了“巴西区”。[18]时至今日，在该城的蒂纽布广场和坎波斯广场仍可找到使人联想起巴伊亚式的楼房以及天主教拉各斯大教堂或竖立在城中央的清真寺那样的大建筑物。在内地约鲁巴人居住的地区也可以看到有些像上面说的楼房那种样式的建筑物。在维达和波多诺伏发展起一种建筑，不论是宏伟的大厦还是简单的式样，都严格遵循殖民地时期的甘蔗厂和种植园所特有的那种“大屋式”结构的布局。

在达荷美，有些人幼年时期上过英、法传教士办的学校，由于有此学历被殖民当局用来当助手使用。这一伙人由于他们的宗教、住宅和衣着，并且由于他们从事大西洋贸易和在殖民机构任职，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地位。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为欧洲人社会所

[14] 见W. R. 斯科特，1971年。
[15] P. 弗吉尔（Verger），1968年，第623页。
[16] 见C. W. 纽伯里（Newbury），1961年，第36-37页。
[17] 见L. D. 特纳（Turner），1942年，第65页。
[18] D. 阿拉埃登（Araedon），见S. O. 比奥巴库（Biobaku）编，1976年，第40-41页。

接受，[19]而且由于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和当地居民也不能保持良好关系。

这夥人逐渐地丧失了他们的非裔巴西人特征，虽然他们仍拿着从巴西带来的《基督教旨教科书》和《青年小说家》之类的书籍，[20]但是在学校里用来讲课的语言却逐步地全部转化成法国或英国殖民者的语言了。不仅如此，约鲁巴的后代为了和当地社会打成一片，又回过头来使用约鲁巴名字，有些人还开始在传播新教教义的非洲人教堂里做礼拜。

在拉各斯，这夥人的社会一直保持它的特性。例如，每当节日来临，人们都要按照奥罗拉救济会的惯例，到街上去跳民间舞。在1900年[21]，他们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小的中产阶级集团，但是时间一久，这个集团的明显特征消失了。一度被当作贸易用语的葡萄牙语，在尼日利亚被英语所代替，在达荷美被法语所代替。[22]曾经有过少数不同方式的抵抗：例如1920年在波多诺伏创办了《达荷美导报》，[23]到1922年，它一直刊登对法国殖民当局的批评。另一份由非裔巴西人后代办的创刊时间稍晚的《达荷美之声》[24]，刊 755 登了抱怨从事外贸困难的文章，在法国殖民机构建立之前情况确实如此。

黄金海岸的非裔巴西人，由于他们那种或多或少西方化了的习惯，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社会，并且被称作塔邦(Tabon)。他们逐渐抛弃了纯属巴西人的传统，而又保留了另外一些文化特征，例如每年举行长达两天的节日活动时，人群击鼓列队穿过阿克拉的古老街道。[25]当塔邦到这个国家定居时，他们必须与阿克拉的加族酋长签署一份臣属身份的合同。他们很早就放弃了葡萄牙语，但是在他们的歌词中还能找到加族语、英语和葡语的混合体。黄金海岸塔邦的迅速同化与那些变化较慢的非裔巴西人形成对照。那些变化较慢的人住在拉各斯、阿贝奥库塔、波多诺沃、维达以及一些更小的尼日利亚、达荷美和多哥沿海城镇。

在拉各斯和非裔巴西人社会并存的还有一个非裔古巴人社会，这个人数较少的集团由一些从古巴返回非洲的人构成。

美国黑人在非洲的传教活动

殖民时期，在很少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非洲人和美洲黑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手段之一，便是派黑人传教士去非洲传播基督福音，以“提高”非洲。基本上采取先用美国黑人传教士在白人居多数的人群主流中布道的办法。例如，早在1896年长老会在法属喀麦隆就首倡用黑人传教士布道。一位名叫威廉·H. 谢泼德的牧师是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学院的黑人大学生，他促使南方基督教长老会在19世纪90年代担负起到刚果从

⑲ J. M. 特纳 (Turner)，1975年，第V章。

⑳ 布歇 (Bouche) 致普兰奎 (Planque)，波多诺伏，1869年1月25日，非洲传道会档案，罗马，条目第21.150号，标题第12/80200号 (11/082)（布歇神父致其上级普兰奎神父的信）。

㉑ 《拉各斯旗帜报》，1896年1月8日和1900年5月2日。

㉒ M. C. 达·库尼亚 (da Cunha)，1976年，第33页。

㉓ J. A. 巴拉尔 (Ballard)，1965年，第16页。

㉔ C. 塔迪兹 (Tardits)，1958年，第39页。

㉕ J. M. 特纳，1975年，第23页。

事传教的任务，并由他本人代表教会。他很快就发现他的传教团吸引了“成百人”前来皈依，并扩展成为“基督教的最重要基地之一”。[26] 与此同时，进入 20 世纪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派遣三个黑人传教团到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巡回 5 年的结果，他们送了 3 名年轻的非洲信徒，包括丹尼尔·夏普·马莱基布，到美国的黑人学校去受教育。不仅是有些“白人教堂”有黑人福音传教士，而且还把一些白人传教士放在非裔美洲人的学校756 里为去非洲服务作准备。但是，有自己意志和自主权的黑人教会组织，很快被证明是在非洲最有成效的传教事业。

的确，非裔美洲人在 19 世纪所受的教导特别强调“拯救”非洲社会。例如特纳主教就勇敢地强调，“上帝把黑人带到美洲使其成为基督徒，这样黑人才能返回非洲去拯救那块土地”。[27] 而其他的人则暗示非洲未来的政治伟绩和神圣的传教活动是使得新大陆黑人行动起来的无法抗拒的理由。例如，1902 年的一篇演说词告诉黑人说，“如果美洲的黑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正视给他的机会，而以上帝的名义在非洲从事传播福音，那么尚未出生的数百万非洲儿女将来就会看到一个面目一新的大陆”。[28]

早在 1884 年，非洲人美以美会曾就“美洲有色人种去非洲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发起过专题讨论会。1893 年 8 月，非洲人和来自美国及欧洲的其他参加者出席了一个全美教会联合会召开的“世界非洲大会”，这是和同一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联合举行的。为期一周的大会，目的是为了激发非裔美国传教士在非洲工作的兴趣，同时也是为“在美国的非洲人”伸张正义。

在大会上，特纳主教重申他的黑人移民去利比里亚的倡议。确实，至少有一位利比里亚人（莫莫卢·马萨奎奥）出席并参加了会议的各项活动。后来，1895 年 12 月在亚特兰大的甘蒙神学院召开的“非洲与美国黑人”讨论会也至少有一位非洲代表（利比里亚的埃特纳·霍尔德内斯）参加。甘蒙会议再一次强调了帮助整个非洲的基督教化是非裔美洲人的义务：“必须要有，而且一定要有一支从事基督教工作的队伍连绵不断地伸向从好望角到埃及一线，……然后是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再进一步……到苏丹和刚果诸地”。[29]

美国黑人对这类号召作出不同方式的反应。例如 1930 年一位非洲人美以美会的主教一时感情冲动之下，在南非购置了一个有数千英亩土地的农场，企图将教会中的移民安置在那里，作为非洲人美以美会的一个殖民点。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各黑人教会对于 1926 年 1 月黑人报纸刊登的所有传教士均被利比里亚当局驱逐出境的播道则深为忧虑。

但是更为实在的是：非洲人美以美会和非洲人美以美会锡安山派以及全国浸礼联会在整个殖民时期都在向非洲派遣黑人传教士。全国浸礼联会早在 1883 年就在利比里亚建立了早期传教站，这是在洛特·凯里更早期的工作基础上建立的。非洲人美以美会锡安757 山派 1878 年就在利比里亚扎了根，1896 年又在黄金海岸扎了根。约翰·布赖恩·斯莫尔

[26] C. 克伦德宁（Clendenen）、R. 柯林斯（Collins）和P. 杜伊格南（Duignan），1966 年，第 63 页。
[27] M. M. 庞顿（Ponton），1917 年，第 77 页。
[28] I. G. 佩恩（Penn）和J. W. E. 鲍恩（Bowen）（合编），1902 年，第 310 页。
[29] J. W. E. 鲍恩（编），1896 年，第 205 页。

主教这位加勒比人后来在黄金海岸组织了两次非洲人美以美会锡安山派的年会，其结果是诱使J. E. K. 阿格雷和弗兰克·奥萨姆-皮南科加入非裔美洲人的教会，最后为非洲人美以美会锡安山派服务。1930年非洲人美以美会锡安山派的传教士应锡安山派下属的当地非洲教会的邀请到尼日利亚去工作。与此同时，非洲人美以美会也在非洲一些特定的地方设立了传教站，包括1886年在塞拉利昂（以丹尼尔·科克尔早年的传教工作为基础），19世纪90年代在利比里亚（通过亨利·特纳个人的访问）和1896年在南非。由于非洲人美以美会具有深远的资历，因此有必要更进一步阐述它在非洲传教工作的演变，尤其是对该教会影响最大的地区——南部非洲的有关情况作一番介绍。

许多美国黑人响应他们所在教会的号召于19世纪后期作为传教士前往南部非洲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分立的或独立的非洲人教会或“埃塞俄比亚”教会，于1896年完成了与非洲人美以美会之间真正的联合，从而开始了南非黑人和美国黑人历史上重要的10年。虽然非洲人美以美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之间的联合时间不长，但是非洲人美以美会凭借它早期在南非的渗透，在以后50年内一直保持强盛不衰。

埃塞俄比亚教会，或者叫黑人分立教会运动，是由卫斯理会中持异议者和其他“宗教不满分子”所组成。在它最初的年月里，为保持自身存在经过苦苦挣扎。只是由于一位在威尔伯福斯大学上学的非洲学生偶尔插入才得到挽救。1895年，在威尔伯福斯大学和林肯大学就读的南非学生中，有一名参加所谓“祖鲁人合唱队”的夏洛特·曼耶，用非洲人美以美会的信笺，给她在南非的姐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了埃塞俄比亚教会运动的领袖们的兴趣，他们希望得到更多关于非洲人美以美会的信息。他们提出要求，从而获得了非洲人美以美会的教规、赞美诗和礼拜仪式的有关印刷品。特别引起他们兴趣的是非洲人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这一系列偶然的事件导致在1896年派遣一个由詹姆斯·马塔·德万牧师率领的埃塞俄比亚教会代表团赴美，最终导致“埃塞俄比亚”教会为非洲人美以美会所正式接纳，而非洲人美以美会也由此正式进入了国外传教的领域。

德万特别敦促非裔美洲人到南非去，并推动非洲人美以美会的教育传教团这样做。他的理由是南非为“受过教育并被授予神职的美国黑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最广阔天地”。[30] 但是，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则是由美国教会协助非洲青年进入美国学校接受培训。特纳主教在《传教团之声》上发表文章，用神秘难懂的建议做了响应：“请注意，威尔伯福斯。南非正在走来！” 758

不过，德万和非洲的领导人仍认为，和非裔美洲人联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应该是在非洲当地发展像当时非洲人在美国上的那种学校。他相信，非洲大众所需要的大量教师和传教士应该来自这种学校，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解除在提供传教士和教师方面完全依赖海外学校的状况。与此同时，特纳还在1898年访问了南非，授予德万非洲人美以美会代理主教的职称，并宣布教会要建立一个非洲人美以美会学院的打算，他声称这个学院要超过任何“早先传教团对教育事业所作的努力”。于是，德万进一步呼吁要建立一

[30] J. M. 德万（Dwane），1897年。

个"昆斯顿特纳师范学校"或"黑大陆的威尔伯福斯学院"。

特纳用《传教团之声》1899年3月号整个一期来宣传南非建立学院的运动。有一篇文章把拯救非洲称作是"美国黑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该文描绘了对学院的具体设想:它将是一个为非洲人开设,由非洲人执教,并由非洲人美以美会的传教部门创建和资助的学校。创办时的教职员将从在下列学校学习过的非洲学生中聘请。这些学校是:威尔伯福斯大学、莫里斯·布朗学院、霍华德大学和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地方的中央州立学院医学系。

不过,教会运动不由非洲人指挥并占统治地位这一点,对德万来说,是无法忍受的。1899年,他脱离了非洲人美以美会-"埃塞俄比亚教会"联合会,这样,在南非黑人教会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宗派。1900年,非洲人美以美会在全体大会上,为了试图恢复该会在南非的传教据点而指定利瓦伊·科平为第一位驻当地的主教,而且由夏洛特·曼耶来帮助教会工作,此人是南非索托族学生,是她最初促成了非洲人美以美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联合。曼耶于1901年从她在美国留学的学校回来,并立即着手为实现南非学院的理想而奋斗——在开普省东部的佩迪人中创办了一所非洲人美以美会教会学校。到1908年,夏洛特·曼耶·马克斯凯和她的丈夫,已从传教部得到了足够的钱在德兰士瓦购置土地,修建了一座(以科平主教命名的)大厦,并将上述学校(已改名为威尔伯福斯学院)迁到了伊瓦顿的固定地点。

与此同时,在尼亚萨兰有位名叫约翰·奇伦布韦的尧族青年,他皈依了全国浸礼联会,1905年他不很肯定地写信给他的教会说,"传教的工作主要只能靠你们的帮助"。这恰好是在他领导的一次反对尼亚萨兰英国人的不成功起义前的10年,他带着失望的情绪,继续发泄他的感情:"在英属中部非洲不像在南非那样,人们能够自己为传播福音做些事情,……我毫无把握这项工作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31] 奇伦布韦1897年曾旅居美国,就学于只接受黑人的弗吉尼亚神学院,受了做牧师的训练,并于1900年前后在全国浸礼联会的赞助下回到尼亚萨兰。他着手建起一个传教站——对此他写出了上述的悲叹——根据他在各地美国黑人中观察的结果,办了"一个工业式的传教站,非洲人在其中受着工艺训练,同时学习传授基督教教义"。[32]

759

科平主教1916年在非洲人美以美会召开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对美国黑人教会在非洲所作的努力进行了评价。他说:

> 美国教会在非洲西部和南部已经建立并仍在帮助建立教堂和学校校舍。我们在美国国内训练了大量非洲学生,其费用大部或全部由教会负担。……(因为)我们对大洋彼岸的同胞要我们负起责任的召唤,从未采取过冷漠的态度;我们认识到对国外各地所欠的"债",尤其是对非洲……为了拯救仍有千百万人生活在黑暗之中的非洲,为了抓住埃塞俄比亚伸出来的手。[33]

---

[31] J. 奇伦布韦(Chilembwe),1905年。

[32] G. 谢泼森(Shepperson)和T. 普赖斯(Price),1958年,第113页。

[33] 摘自非洲人美以美会《主教手册》,1963年。

尽管遭到白人南非政治当局和教会当局的重重阻挠，非洲人美以美会建立的层层联系在保送非洲学生到美国上学方面获得了真正丰硕的成果。这种深厚的联系由特纳播种，由德万深犁，并由科平夫妇和马克斯凯夫妇使其具有牢固的组织基础。在英属中非和西非，非洲学生也同样受到美国黑人教会的鼓励并经常得到它的资助。后来学生的侨居使得殖民时期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进入了一种几乎全新的阶段，其影响之一就是对20世纪中叶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的确，这种由美国黑人教会领袖在其中起辅导教师作用、以传教为动力的接触阶段，已逐渐转化成为美国在黑非洲利益的深度、相互关系和性质要由非洲人的能动性来决定的时期。

巴西和非洲沿岸在宗教上的相互影响

关于宗教，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传播福音，我们无法把北美黑人的影响与非裔巴西人相提并论。因为，前者直接或间接参与传播福音的工作，后者却从来没有从事过改变信仰的工作。他们中有某些人抵达拉各斯后，继续奔向他们的祖居地。有些历史文件中记载着穆斯林非裔巴西人越过拉各斯投奔豪萨所属土地的资料。弗吉尔[34]所著书中谈及英国驻拉各斯领事本杰明·坎贝尔的活动，1858年他曾为希望到祖居地去旅行的非裔巴西 **760** 人颁发过护照。拉各斯市内巴西区的边上竖立着一座由巴西来的工匠建筑的中央清真寺（图片29.5）。

天主教徒[35]也于1879年开始在拉各斯建筑他们的第一座教堂——圣十字教堂，并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国和英国教会办的学校去读书，那里用英文和法文授课。

由于来自圣多美岛说葡语的教士们不断散布宗教影响，天主教社会在其初创阶段就得到著名的自由奴安东尼奥神父[36]的指导和帮助。那些在巴西区住的非裔巴西人的后代，从教会学校出来，就在这一地区担任教师和传教士，他们工作的学校和传教团都是非洲人传教团的教士所创办。除此之外，这些人也从事其他活动，如为殖民当局服务。[37]这些传教士为之工作的传教团都起源于欧洲，而不是根植于巴西、为了教育目的的传教事业，也不是拉各斯非裔巴西人社会倡议的结果。事实上教学用语是英文，间或也用法文。

就非裔巴西人来说，他们的天主教信仰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一种标志。由此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使他们成了拉各斯非洲资产阶级的最初核心。

返回非洲的大部分非裔巴西人，虽然公然声称是天主教徒，但他们从未放弃自己对传统非洲宗教的信仰。因此，当他们返回故国的时候，这种宗教行为便受到了激励，表现出多少有些混合的形式，它既带着巴西宗教生活所形成的天主教正规仪式，又崇拜约鲁巴的众神。就像是天主教圣徒与约鲁巴众神并肩坐在圣殿上一样。“天主教传教士踏上

[34] P. 弗吉尔，1968年，第617-618页。
[35] J. F. A. 阿贾伊（Ajayi），1965年，第199-200，202页。
[36] P. 弗吉尔，1968年，第618页。
[37] M. C. 达·库尼亚，1976年，第32页。

非洲大陆的海岸时，最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非裔巴西人对南美由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宗教所表示的敬意……"。拉菲特神父还补充说，"巴西人作为基督徒只是因为他们受了洗礼，但这并不阻止他们向黑人神灵祈求保佑……"。而非裔巴西人和其他皈依者，深信他们作为基督教徒的地位能带来社会利益，而并不是全心全意接受教堂宣讲的教义。[38]

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在那里改变信仰的程度要深得多，有几个北美的黑

761 人还成了基督教教义的传播者，而非裔巴西人却还坚持着他们的非洲传统宗教信仰。

因此，住在巴西区并形成一个中产阶级核心的非裔巴西人，成为一种持有内聚力和独特性的社会群体，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他们信仰天主教，崇拜家庭守护神，同时他们也向占卜者问卦。[39]更有甚者，非洲宗教甚至跨过大西洋向巴西施加影响。尼娜·罗德里古斯[40]指出，20世纪初从拉各斯驶出的船只，运载着约鲁巴和说英语的纳戈商人。他们带的是：柯拉果、玛瑙贝壳、约鲁巴"尤尤"崇拜用品、肥皂、"海岸沙笼"等等。1888年，在运往巴西价值8237英镑的货物中，棕榈油只占2600英镑；其余的货物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或是崇拜用的物品，特别是"海岸沙笼"竟占3367英镑，因为巴西对它有着大量的需求；两种柯拉果共占1525英镑，还有"海岸麦秆"、黑肥皂、玛瑙贝壳、"奥里斯（oris)"、葫芦和"玫瑰经念珠"。巴西从未停止进口过非裔巴西人在宗教典礼中所用的非洲崇拜物品，而且这些物品越来越变得非常难得。因而随着在非裔巴西人中实行混合宗教的人数的增加，价钱也因之而上涨了。

去美国接受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殖民时期住在美国的非洲学生，在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之间，以及在来自非洲大陆各个地区的非洲学生之间，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他们回国之后，又鼓励他们的同胞报名上美国学校留学，这一切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始终没有中断。非洲学生在美国的人数因而不断增加，非洲人作为一个群体与美国黑人交往的时间也随之延长。接受美国教育和培养的殖民地非洲学生人数众多，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许多人（如纳姆迪·阿齐克韦，克瓦米·恩克鲁玛，卡穆祖·班达）以及早期的民族主义领袖和社会知名人物，如A. B. 朱马，约翰·迪尤布，马歇尔和夏洛特·马克斯凯，J. E. K. 阿格雷，皮克斯利·卡·艾萨卡·塞姆，D. S. 马莱基布，弗兰克·奥萨姆-皮南科，彼得·科伊南吉，恩达班尼吉·西索尔，爱德华·蒙德拉纳和约翰·奇伦布韦。一时之间，非洲人去美国的渠道日益扩展，大大超过了对方流向非洲的黑人传教士的人数。换句话说，开始时作为拯救灵魂而去非洲的美国传教士的袭击，最后却帮助建立了一个教育、技术和政治革命的跳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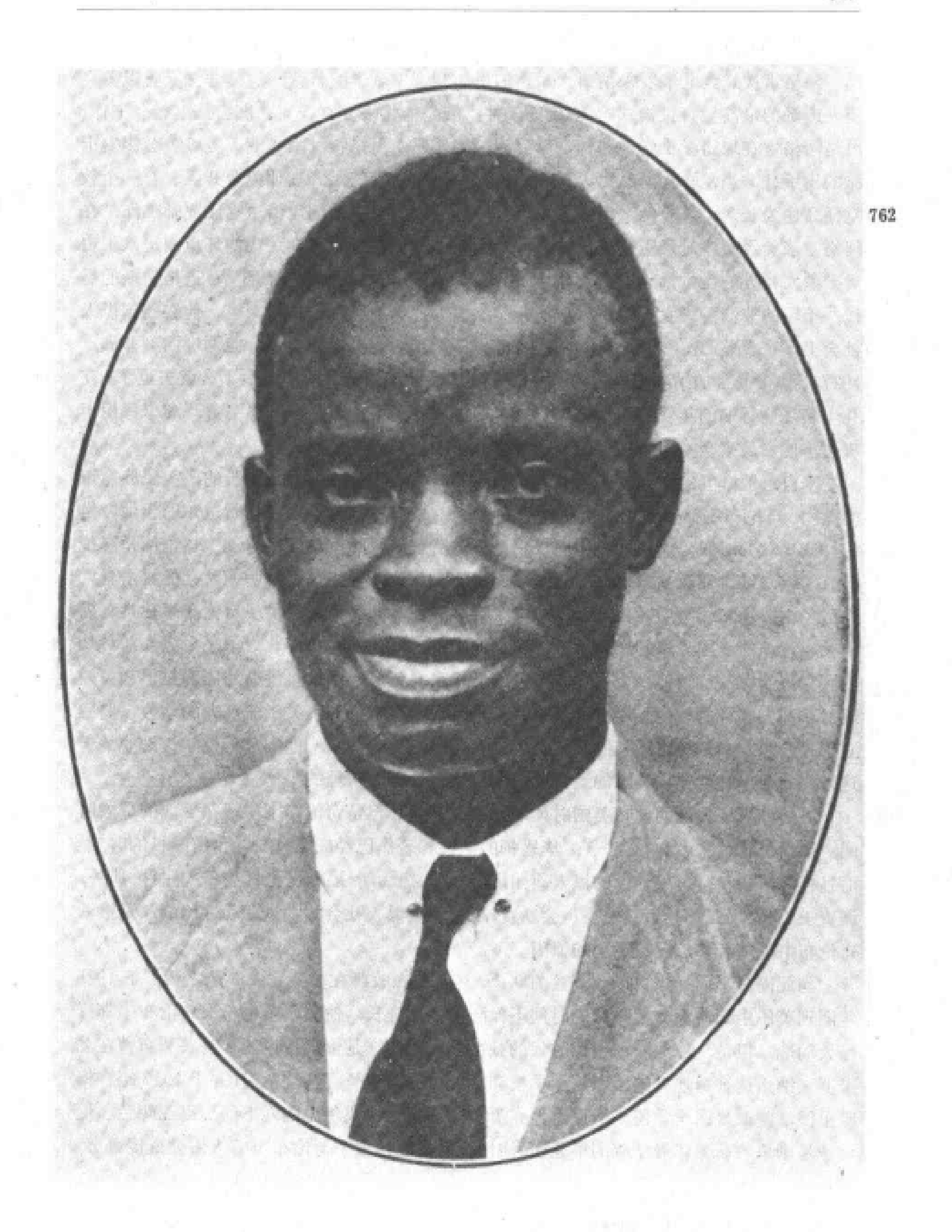
763 考察某些特定的非洲学生的简历，也许就能够看出美国教育对殖民地非洲人以及反殖民主义进程的影响。举例而言，J. E. K. 阿洛雷，在一位美国教育出来的非洲人美

[38] P. 弗吉尔，1968年，第601页。

[39] M. C. 达·库尼亚，1976年，第33页。

[40] N. 罗德里古斯（Rodrigues），1976年，第105页。

762



图片29.2 J. E. K. 阿格雷（1875-1921年），黄金海岸教育家

以美会锡安山派主教（此人来自巴巴多斯）的直接影响下，于1898年从黄金海岸来到美国。阿格雷被送到北卡罗来纳州索尔兹伯里的利文斯敦学院就读，这是非洲人美以美会锡安山派的最高教育机构，并有明确的条件：就是他将来要直接回非洲去从事教会工作。可是阿格雷在取得学士学位和神学学衔后，却任职于夏洛特一家非洲人美以美会锡安山派的出版社，当了一、两家黑人报纸的记者。他为附近的黑人教师免费开课。有一个教堂任命他为长老，并有两个黑人教堂推荐他当牧师。根据他的自传，这段牧师工作“在阿格雷旅美经历中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这使他走出了学院式的环境而进入了由美国黑人领导的尘世活动中去”。[41] 当1904年他与一位可能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后代、年轻的非裔美国女子结婚时，他和美国黑人社会的联系已经很深了。他在美国黑人社会工作了整整25年之后，作为费尔普斯-斯托克斯委员会的委员，他两度回到非洲。1927年他接受在加纳新创办的阿奇莫塔学院担任助理副校长的职务后不久就去世了。在几十名受他影响的年轻非洲人中，有纳姆迪·阿齐克韦、克瓦米·恩克鲁玛和卡穆祖·班达，他们后来全都上了美国的黑人学校。

来自尼亚萨兰的约翰·奇伦布韦在美国的时候，正好受到日益增长的黑人民族意识的薰陶。奇伦布韦在弗吉尼亚当学生的时候，正是1898年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地方发生种族暴动的时候，而且他还伴同查尔斯·S. 莫里斯牧师一起回到非洲。莫里斯是一位具有“埃塞俄比亚教会意识的”美国黑人浸礼会教徒，他也是威尔明顿动乱的目击者。乔治·谢泼森和托马斯·普赖斯在一篇令人尊敬的专题论文中评价了奇伦布韦在具有黑人民族意识的美国吸取的经验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提到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黑人对付歧视性立法的做法“给他一个战略和策略的榜样来对付家乡那种虽没有美国明显但却有效地对非洲人实行的歧视”。谢泼森和普赖斯没有去争辩奇伦布韦关于非洲人的学校“要独立于政府和欧洲传教团体”的思想是否来自美国黑人的体制，他们只是说“假设他关于这方面的观念是受他在美国的经验所影响也不会是不合情理的”。[42]

764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在美国时读的是哪类书籍，但是奇伦布韦生活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也正是特纳主教和布克·T. 华盛顿的演说和著作已经成为有新闻价值题目的时候，而且杜波依斯和富有战斗性的黑人新闻记者如T. 托马斯·福琼也正日益引人注目。此外，调查1915年尼亚萨兰起义的委员会断言，来自美国黑人社会的大量煽动性印刷品是推动奇伦布韦追随者参加反抗运动的原因。

与此同时，同样来自尼亚萨兰的D. S. 马莱基布牧师在美国完成学业之后，于1926年回到英属中部非洲。他离开的时间不像阿格雷那样长，他的归来也不像奇伦布韦那样惊天动地，但是，作为一个殖民时代的社会领袖他同样是值得重视的。马莱基布曾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地方的国家培训学校和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学习，并于1917年在梅哈里医学院取得医学学位。然后，他在妻子弗洛拉·埃塞尔温陪同下回到尼亚萨兰。他妻子是刚果的斯佩尔曼学院的毕业生。他回来后迅速恢复了奇伦布韦的天佑勤奋传道会。

[41] E. 史密斯（Smith），1929年，第85页。

[42] G. 谢泼森与T. 普赖斯，1958年，第97-98页。



765

图片29.3 纳姆迪·阿齐克韦（1904年生），尼日利亚记者、泛非主义者和政治家

该会在夭折了的1915年起义的余殃中已被尼亚萨兰保护地政府彻底镇压。马莱基布还进一步创建了奇拉祖鲁土著人协会，并得到任命，进入当地地区委员会。总之，他创建了一个教堂和一所医院，又重建了奇伦布韦的传教站，而且他那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工作引起了人们热情洋溢的报道。

纳姆迪·阿齐克韦和卡穆祖·班达一样，都是受无所不在的詹姆斯·阿格雷的鼓舞，以及在与马库斯·贾维相联系的美国当时气氛的刺激之下，毅然而去美国的。他于1925年首先进了西弗吉尼亚州的一所黑人预科学校，数年之后才进入霍华德大学。当时，他与下列一些黑人学者交往甚密：如拉尔夫·本奇，特别是阿兰·洛克和威廉·利奥·汉斯伯里，在"非裔美洲人"、"殖民主义入侵前的非洲历史"诸问题上共同研究、互相切磋。

洛克教授担任了阿齐克韦的个人导师，阿齐克韦又反过来当了洛克的私人秘书。1925年出版的洛克的《新黑人》肯定对好学的阿齐克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为这是一本对黑人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典范，它包括着那些令人神往的来稿，这是一批为使哈莱姆文化复兴的五花八门的作者和学者写的，他们是：让·图默，康梯·卡伦，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牙买加人克劳德·麦凯，兰斯顿·休斯，波多黎各黑人移民阿瑟·A.肖姆伯格，E.富兰克林·弗雷泽和W.E.B.杜波依斯。另外，和西印度群岛法律系学生乔治·帕德莫尔的接触，对作为霍华德大学学生的阿齐克韦也有明显的影响。在1928年的美国大选中，帕德莫尔向学生集会发表了关于政治选择的演说。帕德莫尔后来给阿齐克韦办的《非洲晨邮报》撰写政治性文章，该报在20世纪30年代发行于黄金海岸。

766 1954年，阿齐克韦在出任尼日利亚东部总理之前不久，向霍华德大学理事会发表的演说中，讲到了他在霍华德大学的学生时代："在这里的小山顶上，我学到了人文科学的基本原理，学到了社会科学的剖析和政治学入门"。[43] 1960年，当阿齐克韦被提升为尼日利亚总督时，汉斯伯里教授也在场，他当时称颂阿齐克韦是"我以前的学生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对非洲过去的伟大领悟得最清楚，他显示了现代非洲的伟大潜力"。[44] 汉斯伯格在对阿齐克韦的赞扬中肯定隐含着某种失望。因为他对非洲历史的作品不能为霍华德大学的学生和非裔美洲人教职员所接受，有时甚至还遭敌视。

1930年阿齐克韦转学到林肯大学以后，继续钻研他感兴趣的黑人历史和种族关系课题，并表现出要使全是白人的教职员队伍保证任命黑人的决心。他批评了"学生们的传统志向和学校明显的中产阶级宗旨……"。[45] 他认为，"这样一所为黑人办的学院，竟然在86年之后才有条件任命一个黑人当教职员，简直是罪大恶极"。[46] 学校当局越来越对阿齐克韦的抗议感到不愉快（这些抗议不仅在校园中张贴，而且发表在黑人的《费城论坛》和巴尔的摩的非裔美洲人报纸上）。最后，学校拒绝推荐阿齐克韦延长他的学生签证，实际上这种拒绝就是结束他在美国的居留。1934年阿齐克韦返回非洲。到1935年克瓦米·

---

[43] B.N.阿齐克韦（Azikiwe），1961年，第13页。
[44] K.A.B.琼斯-夸泰(Jones-Quartey)，1965年，第76页。
[45] 霍勒斯·曼·邦德（Bond）论文集，林肯大学（宾夕法尼亚州）。
[46] H.M.邦德，见J.A.戴维斯（Davis）（编），1958年，第257页。

恩克鲁玛在林肯大学上学时，正是本章所涉时期的最后一年，许多阿齐克韦所要求的改革已经在这里实行了。

阿格雷随费尔普斯-斯托克斯委员会来到西非和南部非洲，紧接着他又接受阿奇莫塔学院的任命在黄金海岸讲课，他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由此传到了非洲的许多角落，他仍然动员数十名非洲青年寻找机会去受美国教育，而不是英国教育。阿齐克韦、班达和恩克鲁玛成了阿格雷接触到的人们中最著名的三位。他们的经历也说明了在美国时期他们的泛非人或泛黑人的色彩。但是上述非洲人和散居在外的黑人的相互影响的诸方面还不能完全解释那些美国教育出来的非洲人返回非洲后的所有活动。当前可以看到的著作也未能把这种情况解释清楚。他们回去后所发生的情况，特别是在英属殖民地的非洲人中所发生的情况，是受过美国教育的非洲人与殖民地对他们的冷遇发生冲突的结果（这是受教育的经历完全脱离殖民轨道所造成的后果）。[47] 767

但是，美国的教育在非洲殖民地内并未普遍地或绝对地遭到反对或轻视，有迹象表明在实业训练或职业教育方面受到了殖民地企业家的欢迎。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得到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为他驾驶运货汽车、建筑房屋和经营他的机械厂或电力厂。政府官员和白人传教士们出自不同的原因也支持此类训练。官员们相信这样可以促进这一领地的商业和经济发展，教士们相信布克·T.华盛顿的“应用教育”观点可以锻炼性格，并能有助于提高非洲人生活中的一般道德标准。

至于那些留学美国的非洲人的经验中所包含的非裔美洲人成份对那些经验的独特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从下述二例中看出。约翰·迪尤布牧师后来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届总主席（1912-1917年），有时人们把他叫做“南非的布克·T.华盛顿”，他在纽约的一次谈话中直率地肯定了布克·T.华盛顿的塔斯基吉模式对他的价值。的确，迪尤布在祖鲁兰建立了一个“本地的塔斯基吉学院”，按照布克·T.华盛顿的方式来训练祖鲁青年的头脑、手和心。阻挠迪尤布这一尝试的障碍是巨大的，其中包括基金筹措方面的各种问题，因为南非当局对特纳、德万和科平主教“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活动所引起的“不安影响”深为疑虑。

在美国呆了9年之后，阿齐克韦于1934年到黄金海岸暂时定居，而没有回到他的故国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不让他担任职务(如担任拉各斯的金斯学院教员)，利比里亚也不让他担任外交职务。利比里亚总统巴克利拒绝了阿齐克韦的申请，他不客气地提醒阿齐克韦，他不是利比里亚人，因此缺乏处理问题时对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有关该国的知识。但是阿齐克韦以特有的热情着手使自己成为利比里亚的权威，甚至那些从美洲回来的利比里亚公民都会为此产生忌妒。1931年底他在这方面已积累了足够的知识，以致他在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宣读了关于利比里亚的论文。他在论文中为利比里亚进行了辩护，并谴责了西方对它的抨击。1934年发表了他写的《世界政治中的利比里亚》一书。

---

[47] 见R.D.罗尔斯顿（Ralston）即将出版的书中进一步阐明。

泛非主义：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

768 除了上述教育方面的交流，还有一系列的泛非主义组织和会议，以及商业的和文学或文化方面的活动，使非洲人与非裔美洲人保持接触，并有助于影响殖民地非洲事态的发展。有四个人的活动在殖民统治时期支配了泛非主义正式的有组织的发展。第一位是布克·T.华盛顿，他是塔斯基吉学院的创始人和校长，该学院是许多非洲和加勒比社会发展教育事业的典范。第二位是W.E.B.杜波依斯博士，他是《危机》杂志的主编，是泛非主义大会运动之“父”，也就是他，使非洲参加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活动。第三位是马库斯·贾维，他用他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不仅掀起了一场向非洲移民的运动，而且促进了非洲人后裔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团结。最后一位是艾梅·塞泽尔，他（与其他的加勒比黑人如卡宴的莱昂·达马，海地的琼·普赖斯-马尔斯博士和塞内加尔的诗人兼政治家利奥波德·桑戈尔合作）提出了泛非主义中一种黑人集团意识的文化变体，称作黑人精神运动，这种主张主要流行于说法语的黑人世界。

布克·T.华盛顿和塔斯基吉式的泛非主义对非洲以及对接纳和鼓励非洲学生方面的关心、参与和影响固然很大，但布克·T.华盛顿有关的作品却鲜为人知。塔斯基吉的名声和教学方法主要是由非洲和非裔美洲毕业生带到非洲来的，甚至往往是由一度去塔斯基吉参观过的人和未经录取而与布克·T.华盛顿保持通讯联系的人传播的。通过多次国际会议、邀请访问和技术派遣作为媒介，许多非洲人或是被“塔斯基吉精神”所感动，或是吸收了塔斯基吉和其他非裔美洲人的长处。

1912年春天于塔斯基吉召开的泛非主义者“黑人问题国际会议”，由布克·T.华盛顿确定基调。他特别强调非洲黑人和美洲黑人相互在技术和资源上进行交流的意义。他说，“在塔斯基吉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机会，研究那些曾用来帮助过美国黑人的方法，并且看看塔斯基吉和汉普顿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能适用于非洲”。[48] 1912年会议的参加者中有来自黄金海岸的代表J.E.凯瑟利·海福德，他是一年前发表的重要著作《不受束缚的埃塞俄比亚》一书的作者和保护土著人权利协会的代表。与会者还有来自英属东非、利比里亚（F.E.T.约翰逊）、尼日利亚、卢安达（现在的卢旺达）、葡属东非（现在的莫桑比克）和南非（昆斯顿“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以赛亚·西舒巴牧师）的代表。

虽然非洲人对塔斯基吉的热情是在1912年召开的会议上点燃的，但是有关非洲学生返回非洲和塔斯基吉以往业绩的信息却早已激发了很大的兴趣。例如，一个塔斯基吉代769 表团于1901年应德国殖民政府的邀请来到多哥兰（现在的多哥），计划改进种植棉花的方法。该团取得的成功导致了邀请更多的代表团到坦噶尼喀（现在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和苏丹，甚至布克·T.华盛顿本人也被邀请到南非去开设办事处。

和塔斯基吉与布克·T.华盛顿有关的泛非主义活动还应包括1908年召开的黑人商

---

[48] 《塔斯基吉学生》，1912年。

业联合会会议。布克·T.华盛顿在会上赞扬了促成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相互交流的泛非主义运动。当他介绍前来寻求美国财政援助的五位利比里亚使节时，他强调“他们是来美国进行公务访问，他们不仅仅是他们一国的使节，而且是整个黑种人代表……”。[49] 非洲人与非裔美洲人之间虽然没有达成多少真正的商业来往，但是非洲联合公司(由布克·T.华盛顿的助手埃米特·斯科特在1913年建立的航运公司）却计划在世界市场上促进非洲产品的贸易。很明显，开辟非洲航线的主意特别吸引了贾维向布克·T.华盛顿靠拢。

非洲黑人和美洲黑人在塔斯基吉举行会议以及塔斯基吉的业绩，使“塔斯基吉精神”的传播几乎以几何级数向外扩散。塔斯基吉一位费尔普斯霍尔圣经学院的毕业生在尼日利亚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小小的例子。他写信给系里报告说：“我已经向乡亲们提出了建立一个像塔斯基吉一样的学校的计划，他们愉快地同意了。其中有一人捐献了50英亩土地和1000美金以便立即着手开办起来”；他继续写道，“我正开始修建两、三间房屋，一旦完工，就立即宣传塔斯基吉精神。”[50]

约翰·迪尤布和D.D.T.贾巴武是塔斯基吉一长串杰出的非洲毕业生名单中的两位。当迪尤布在美国奥勃林和纽约上学的时期，他和亚特兰大的教育家约翰·霍普和塔斯基吉的布克·T.华盛顿都取得了联系。迪尤布于1899年回到南非，并开办了奥兰吉学院，公开以塔斯基吉为榜样。后来，贾巴武在伦敦大学上学时，也曾于1913年在塔斯基吉呆了六个星期左右，观察了那里的农业技术，途中他还在南方参观了其他黑人学校。

另外，塔斯基吉每年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总要组织一系列所谓的“非洲讲演会”，讨论非洲某些特定需要的解决办法，诸如筹集资金支援在利比里亚的一个塔斯基吉教堂之类。典礼的特色经常是该院的非洲学生和非裔美洲学生举办演讲和举行唱歌表演。在1916年的典礼上，演说的题目从“黄金海岸可可工业的发展”、A.B.朱马的“南非农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51]，直到“马达加斯加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各色俱有。

770

泛非主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同时成为殖民地非洲人和美洲黑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系渠道。1900年，特立尼达律师亨利·西尔维斯特·威廉斯在伦敦组织了一系列泛非会议的第一次大会，与会代表来自美国、加勒比地区、南美和非洲。而且，威廉斯取得了“开普殖民地最高法院律师”的资格，并于1903至1904年在南非开业期间，参加了各种非洲人的政治抗议活动。威廉斯还参加了利比里亚独立50周年大典，并在巴克利总统的指示下，于1907年担负起了新大陆向利比里亚移民的任务。

无疑，在威廉斯主办的大会之后，由W.E.B.杜波依斯在欧洲好几个首都召开的三次泛非主义者大会(1919年在巴黎；1921年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1923年在伦敦和里斯本)，支配着组织起来的泛非主义者运动。杜波依斯本人则是这三次大会的支配者。他先于1919年在巴黎召集了第一次大会。当时他正在法国为《危机》杂志采访巴黎和会的情况，并为准备写的《美国黑人在世界大战中的历史》一书收集资料，还为“生活在

---

[49] 《利比里亚公报》，1908年，第64-65页。

[50] 《南方的来信》，1917年。

[51] A.B.朱马（Xuma），是作者正准备写的传记题目。

美国以及遍布世界其他地方肤色较深的种族"[52]的政治权利进行游说。1919年巴黎泛非主义者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有一条就是号召非洲人争取自决。

1921年的第二次泛非主义者大会，与杜波依斯一起参加的有：沃尔特·怀特；非裔艺术家亨利·O. 坦纳；杰西·R. 福塞特，他是《危机》杂志的一位黑人社论撰写者，还是哈莱姆文化复兴小说家中最多产的作家；非裔歌唱家罗兰·海斯；以及来自塞内加尔的布莱塞·迪安格内。1923年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从美国、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吸引了不少参加者。除杜波依斯本人、雷福德·洛根和美国的非洲人美以美会主教弗农外，还有黄金海岸的酋长阿莫阿三世和葡属东非的坎巴·西曼戈参加了会议，并帮助起草了若干项实质性的决议，附带还有一项"为了造福于非洲人而发展非洲"的一般性号召。[53]大会还要求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应有"研究黑人问题的机构"的代表，要求在所有的黑人世界恢复和改善黑人的权利，要求将阿比西尼亚、海地和利比里亚从"世界金融巨头控制的经济垄断和高利贷手中"解放出来。[54]杜波依斯亲自带着上述决议到日内瓦，并把它们交给了国际联盟。

771 可能因为声明中涉及到了利比里亚，因此柯立芝总统请杜波依斯代表美国参加1923年利比里亚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是杜波依斯首次访问非洲，他也许说过不赞成贾维的移民泛非主义的话，因为过后不久，利比里亚人就反对全球黑人促进协会的计划了。

尽管贾维本人和全球黑人促进协会遭到具有派性色彩的批评，在1916年到本世纪30年代这段时间里，贾维仍然成为美国、加勒比地区、西非、东非、中部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多数泛非主义者注意的焦点。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贾维富有战斗性的报纸《黑人世界》（由一位住在纽约的加勒比人记者休伯特·哈里森担任编辑工作）曾扣动在纽约、整个北美和非洲的黑人群众的心弦。贾维告诉人们的信息是：组织起来，买黑人的东西，支持黑星轮船公司（它能把黑人移民送往非洲，并带回来原料），并支持把白人驱出非洲。他强调说：

> 我们是一个受苦受难民族的后代。我们又是一个决心不再受苦受难的民族的后代。……我们并不希望得到属于别人的东西，然而别人却经常在寻找机会来剥夺那些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现在该轮到（全世界）4亿黑人来宣称非洲是他们自己的了。[55]

杜波依斯在非洲以外的黑人知识分子中是一个较大的泛非力量；布克·T. 华盛顿则在农村的手艺人阶级中比较有名；而贾维对社会底层的所有阶层的黑人群众，不论在非洲或非洲以外，都有同样的影响。1912年，贾维还在英格兰的时候，他从埃及的知识分子杜斯·穆罕默德·阿里那里得到了很多他自己的泛非主义的灵感，他也从在伦敦读到的布克·T. 华盛顿的自传《从奴役中站起来》中吸取到灵感。

最初仅仅是围绕着在牙买加建立一所塔斯基吉式学校的想法而组织起来的贾维的全

---

[52] 《危机》，1921年，第119-120页。
[53] 同上，1924年，第120页。
[54] 同上，第121页。
[55] 转引自E. D. 克龙翁（Cronon），1962年，第65页。

球黑人促进协会，现在成了非洲以外广大非洲黑人和美洲黑人之间的组织纽带，并且通过《黑人世界》又在非洲内部产生了大量的泛非效应。从1920到1938年，总共举行了八次全球黑人促进协会大会，其中前五次在贾维主持下于1920到1924年每年8月在纽约市召开，后来的两次大会由于贾维被美国驱逐出境而于1929和1934年在牙买加召开，第八次大会，即最后一次1938年在加拿大召开。

第一次大会开幕时，贾维就鼓吹：为非洲黑人和美洲黑人创办专门学校进行技术教育；"在农业、工业和商业各方面开发经济机会"，以便促进黑人之间的贸易；开办黑星航运公司以促进这种贸易事业；还要办一份日报"使世界上几个大城市中人们的情绪向同情整个黑人种族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伦敦、巴黎、柏林、开普敦、纽约、华盛敦特区、黄金海岸以及加勒比地区。贾维认为上述方案一旦实施，即有可能把"遍布世界的每一个单位的黑人统一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56] 和贾维同时代的人认为他的信息简直是"从非洲内部发出的声音"，他已经"从哈莱姆有限地区的有利地位一跃而成了世界性的人物"。[57] 772

黄金海岸的知识分子J. E. 凯瑟利·海福德于1917年利用贾维主义的推动力量，建立了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并于1920年3月在阿克拉举行了成立大会。在别处，乔莫·肯雅塔还记得1921年时，"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不识字，他们围在一个朗读《黑人世界》的人周围，一篇文章听个两、三遍，……然后，……穿过森林奔向不同的道路，又把整篇内容小心翼翼地背诵给……渴望得到某种理论的非洲人，这种理论可以把他们从奴隶意识中解救出来。"[58] 贾维亲自为《黑人世界》撰写社论和大块文章，因此它所拥有的读者数目大大超过了它20万份左右的实际发行量。

在尼亚萨兰建立全球黑人促进协会分支机构一事，遭到殖民当局和某些非洲领导人的抵制，例如工业和商业职工联合会[59] 的创建人克莱门茨·卡达利就是反对者之一。尽管社会主义者卡达利对全球黑人促进协会所主张的"非洲人的非洲"明显表示反对，但贾维能直接与当时在美国上学的非洲学生接触，包括尼亚萨兰学生。于是，英国殖民部对尼亚萨兰学生进行了一次集中调查，例如调查D. S. 马莱基布医生本世纪20年代作为专收黑人的梅哈里医学院一名医科学生时的活动。马莱基布返回非洲的时候，最初没能进入尼亚萨兰，他只好去利比里亚暂住一段时间。部分是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害怕再出现约翰·奇伦布韦的革命幽灵，所以在30年代严词拒绝"贾维及其同伙提出到尼亚萨兰和东非其他地方旅行"的申请。由于贾维的影响可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诸如从南非回来的流动劳工[60] 和他那远近闻名的报纸广为传播，所以当局在1922年有效地查禁了《黑人世界》。当局之所以特别感到恼怒，是由于该报刊登的一些文章，例如后来一篇谈到卡穆祖·班达的文章，把这位当时刚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学生说成是"尼亚萨兰2.5万非洲土 773

[56] A. C. 希尔与M. 基尔森（合编），1971年，第241页。
[57] J. H. 克拉克（Clarke），1964年，第15页。
[58] C. L. R. 詹姆斯（James），1963年，第396页。
[59] S. W. 约翰斯(Johns)，见R. I. 罗特伯格(Rotberg)和A. A. 马兹鲁伊(Mazrui)(合编)，1970年。
[60] 关于全球黑人促进协会南非分支的情况，见《黑人世界》1927年。

著人的领袖身份的明显后继者”。[61]

贾维的遗孀艾米·雅克·贾维曾解释贾维的影响确实是以神秘的方式到处广泛传播。她说：“非洲其他地方（不包括利比里亚）的海员和学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接受了贾维思想的灌输回国之后，便悄悄地秘密散布关于团结和自由的福音；其中有些人成了领袖，其他人则用宣传和启示的办法建立了一支献身的追随者队伍”。[62] 贾维的影响在阿齐克韦所上的教会学校中十分明显。克瓦米·恩克鲁玛后来透露说，当他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任何著作都没有贾维的《哲学与主张》（1923 年）对他影响更大。

正当贾维和杜波依斯在本世纪头 30 年用政治来鼓动黑人世界的时候，一个影响十分广泛的非洲文化全盛时期开始了。重新肯定黑人文化的呼声在欧洲、加勒比地区和西非广为传播，领导者是巴黎讲法语的非洲留学生和加勒比地区留学生。这些人已被泛非主义运动、全球黑人促进协会的纲领和哈莱姆文化复兴的热潮所吸引。

总之，讲法语的加勒比黑人（如 1939 年发表的著名诗篇《回归纳塔尔记》作者、马提尼克的艾梅·塞泽尔）和西非的知识分子（如塞内加尔的诗人兼政治家利奥波德·桑戈尔）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黑人精神运动。主张黑人精神的作家由于相信所有非洲人及非洲裔人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因而致力于把黑人世界在各个领域里重新连接成一体。

黑人精神的概念受着黑人在海外的经历以及关于哈莱姆文化复兴的作品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强烈影响。反过来，正在兴起的非洲文化认同论又促进了哈莱姆文化复兴运动。康梯·卡份用诗的语言问道：“非洲对我意味着什么？”在他的诗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兰斯顿·休斯在他《黑人所说的河流》一诗中描述了他是如何在刚果河附近修筑他的茅舍，以及流水又如何给他催眠。[63] 以上两人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桑戈尔和黑人精神的作家们。

但是另一位牙买加人克劳德·麦凯的诗文却有助于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泛非主义统一起来，他以他的诗文作武器，表达了他所坚持的原则，即黑人应该承认并为共同的苦难而抗争，以维护自己的尊严。特别动人的是麦凯一首带挑战性的诗，叫做《如果我们必须牺牲》，这首诗后来被温斯顿·丘吉尔在不列颠战役中不指名地引用过。麦凯像贾维和成千上万的非洲留学生一样，由于对塔斯基吉感兴趣而侨居美国，但他很快就离开这个地方，加入了本世纪 20 年代流入纽约的数百万黑人的行列。

774

有时，殖民地非洲和美洲黑人的相互影响在大众文学和思想中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各式各样的非洲人社会不时地把自己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千年至福梦想寄托在美洲黑人大众身上。例如，围绕着 19 世纪中叶科萨人灾难性地用牲畜作祭品的千年至福阴影，非洲人普遍深信：传统的土地、财产和亲属们将会在大洋彼岸的黑人干预下归还他们。1910 年，正当南非联邦形成的时候，报纸的记载谈到一位名叫姆西昆亚的非洲人主教，他自称是来自美洲黑人社会的救世主。1921年这一主题再次在报纸上出现，当时有一位贾维主义者伊诺克·姆杰吉马，他是一个名叫“黑色上帝选民”的组织的首领，在

[61] 《黑人世界》，1932 年，第 8 页。

[62] A. J. 贾维，1963 年，第 258 页。

[63] 转引自C. H. 罗林斯（Rollins），1970 年，第 19 页。

布尔胡克起义中和在惠灵顿先知运动时（见本书第 27 章），他与非裔美洲人上帝会和基督圣徒教会建立了联系。姆杰吉马当时曾与贾维通信，希望能在南非建立一个全球黑人促进协会的分支机构。

20 世纪初叶出现了两本书，以小说形式和悲剧主题表达了非裔美洲人千年至福的梦想。其中之一名为《祭司王约翰》（1910 年问世），这本白人写的小说描写了一位在海外受过教育的非洲牧师领导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反抗白人的起义。这本书在南部非洲立即引起了轰动，某些人看来该书就是 5 年后奇伦布韦在尼亚萨兰叛乱中遵循的蓝图。第二本小说名为《巴叶特！》，1923 年问世，它利用南非白人对非裔美洲人影响的惧怕心理，把非裔美洲人在南部非洲影响的前景戏剧化了。

在两次先知运动（姆西昆亚和姆杰吉马／惠灵顿）和两本千年至福梦想的小说（《祭司王约翰》和《巴叶特！》）形成的恐惧气氛中，紧接着出现的是两件与非裔美洲人救世主主题明显有关的具体事件，其表现形式是贾维运动的兴起和詹姆斯·阿格雷作为费尔普斯-斯托克斯委员会委员对南部非洲的访问。虽然阿格雷是来自黄金海岸的芳蒂族人，但他却被普遍地理解为美洲黑人侵入的先驱，在非洲人、开普有色人和白人的口头传说中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一份当代的记载证实了大众当时的看法：

> 要了解在德兰士凯为阿格雷举行的热情洋溢的招待会和他的演说至少对许多人产生的效力就必需记注：在那里，和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一样，有很多居民对美洲寄以希望，盼望美洲黑人能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阿格雷被某些人视作这种黑人入侵部队的先驱——他们以为所有的美洲人都是黑人——这支队伍将把南非的白人赶到海里去。[64]

总之，阿格雷的出现以及贾维把成百万美洲黑人重新安置到非洲以便打败那里的殖民主义的宣传，恰好起了遥相呼应的作用，因此激起了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775

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巴西的少数黑人积极参加了解放奴隶的斗争（1888 年），[65]他们包括卢斯·达·伽马（1830-1885 年）、安德烈·雷博卡斯（1838-1898 年）和何塞·多·佩特罗西尼奥（1853-1905 年）。专题论述非洲人在巴西的贡献的著作中，应该特别提到曼纽尔·雷芒多·奎里诺（1851-1923 年）的作品，他住在巴伊亚州的圣萨尔瓦多，他的出版物很多，其中包括《作为移民开拓者的非洲人和非裔巴西人的习俗》；还有索拉诺·特立尼达德（1908-1973 年），[66]他把泛非主义概念和黑人精神带入巴西诗文。此外，还必须提到非裔巴西人报纸所起的作用，这些报纸是：1915 年在圣保罗创刊的《曼涅里克报》以及诸如坎皮纳斯的《热图利纳报》（1923-1926 年）、在圣保罗由何塞·科里亚·莱特和杰梅·德·阿吉阿尔创办的《晨光号角报》（1924-1932 年）和一个名为“黑人-巴西人阵线”的政治组织的机关报《种族之声》（1933-1937 年）。

---

[64] E. 史密斯，1929 年，第 181 页。

[65] D. B. 波特（Porter），1978 年；S. M. 库塞罗（Couceiro），1974 年；H. L. 阿尔维斯（Alves），1976 年。

[66] M. 安德雷德（Andrade），1959 年，第 97-99 页。

非洲文化的价值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持续和演变

有几个作者[67]把注意力转向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的非洲人，他们用百分比来估计各国人口总数中非洲人后裔所占的比例，以此为准则可以把情况主要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人口的大多数是黑人的国家，诸如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巴巴多斯就属这类。第二类所包括的国家，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非洲血统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这种情况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等等。第三类包括巴西和古巴，黑人在经济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68]在文化方面也施展着巨大的影响，那里的种族结构大部分是混血的结果。

最后还必须讲一讲另外两类国家。第一类包括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尼加拉瓜之类的国家，它们有着人数不多但联系紧密的非洲血统的人口集团。在第二类国家里，那些来自非洲的人群并没有经历过与新大陆一体化的过程，苏里南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776 人们还可以找到非洲的博尼人、德朱卡人、萨拉马卡人和阿夸人。在牙买加、圣多明各，甚至在海地和古巴，还存在逃亡黑奴的居住点。在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有些族群居住在大森林中，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他们原有的文化价值和某些社会组织。逃亡黑奴是逃出来的奴隶，他们在上述这些国家的大山中避难，组成自己的社会，从而完全切断了与殖民者的接触。至少相当一部分这一类的社会得以使自己孤立于他们从前的殖民者之外。后来在苏里南、法属圭亚那和一定程度上在牙买加，他们对被称为“总体社会”的人保持距离。

从人口统计的观点说，上述这些国家人口的组成应该仔细核对三个主要部分的材料：非洲血统的，欧洲血统的，以及当地血统——即“美洲印第安人”。这样核对后，人口剩余的部分就是几个不同族群间混血的结果，也许情况就是如此，这也应该考虑进去。

应该在受教育程度之类的标志之外，认真研究每个族群的社会区分。这样就可以为分析非洲血统人口的地位变化提供基础。奥克塔维奥·伊安尼和费尔南多·昂里克·卡多索[69]就是用这种观点研究过去的奴隶如何进入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而后来又如何被吸收入城市经济的。

这种类型的分析使得人们有可能估价非洲血统人口与拉丁美洲各种社会、经济体系一体化的程度。不过，这样做仍然没有把非洲文化的价值在新大陆继续保持声誉这一因素估算在内，当然人们也可以认为这是用种族标准才能衡量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不重要的因素。

---

[67] 举例而言，小L. B. 劳特（Rout），1976年。

[68] J. H. 罗德里古斯（Rodrigues），1964年，第I卷，第51页。

[69] O. 伊恩尼（Ianni），1962年；F. H. 卡多索（Cardoso），1962年。

对此，思想界有两个对立的学派。M. J. 赫斯科维茨主张[70]把非洲文化作为继续存在的文化因素“重新进行解释”。他的态度促使北美黑人社会学家E. 富兰克林·弗雷泽[71]把注意力集中于整个社会一体化这一核心问题上。按弗雷泽的看法，赫斯科维茨的理论可能导致一种结论，即非洲文化价值的持续存在可能成为支持黑人不可能被同化的种族主义论点。在美国，由于各种因素，包括各新教教会的工作在内，使得过去的奴隶失去了大部分传统的非洲文化价值而转化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世界的一部分。

在北美、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三者之间就非洲的存在，特别是非洲文化的价值这一角度来作对比，则尚无定论。因为从过去的奴隶在这些地区被“一体化”的方式来看，情况极不相同，甚至每个国家都有别于另外一个国家。 777

从文化的角度看，在美国，皈依新教、导致文化传统的遗弃和新的世界观的产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文化的价值则不同程度地得到保留、或者正经历一系列演变的过程。

从方法论讲，必须区别两种存在的形式：一种是非洲的文化存在，另一种是黑人在形体上的存在。可以找到其中之一或两者同时并存的证据，这要取决于殖民过程的条件与方式。

肤色区分的问题起因于不同的方面，因为按罗杰·巴斯泰得的说法，“有的地方肤色界限已经制度化，如美国，有的地方并没有，但结果却并无二致。黑人生活在——或趋向于生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他们感到自己与“其他人”不同，他们被迫或“宁愿”（原因远不如结果重要）“和自己人在一起”。[72]

从历史角度分析则揭示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宁愿强调“非洲文化”与“黑人文化”的一分为二。由于一连串社会变迁的结果，产生了随形势而来的不同程度的文化变异。例如，在海地黑人人口占大多数，一种具有非洲特色的宗教就受到海地社会这种结构现实的影响，加上混血儿的作用以及因适应新的形势需要面信奉“新上帝”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在邻近的岛屿上，由于新教传教工作的开展，“黑人文化”已经表现为多种形式的运动，如拉斯塔法里(Rastafarians)（是一种反对白人老爷的救世主运动的浪潮，其中非洲人的形象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海尔·塞拉西被尊奉为救世主的角色）。另一方面，在牙买加，起源于阿散蒂的萨萨邦桑（Sasabonsan）崇拜，作为在一个历史时期保持下来的“非洲文化”成分，后来又迅速让位于包含大量魔术的精灵崇拜。1894 年由贝德沃德建立的“牙买加自由浸礼教会”这个教派也是同样情况。

在美洲那些受到天主教教义薰陶的地方，产生了一种欧洲和非洲文化特征共存的诸说混合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天主教徒并不需要像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那样经历激烈的变化。

上述信仰混合的特点在庄祝天主教的节日和诸圣日时即可明显见到，人们在那种时

---

[70] M. J. 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41 年、1948 年、1966 a，1966 b，1966 c。
[71] E. F. 弗雷泽（Frazier），1949 年。
[72] R. 巴斯泰得（Bastide），1967 年，第 199 页。

778 候既用占卜又用黑人巫师，而庆祝的节日又正好和天主教的诸圣日的日期相一致。巴斯泰得断言说，信仰混合论无非是黑人的诸神带上了白人的面具而已。这两种宗教的价值在不同程度上互相进行渗透。例如，在巴西有一系列天主教的圣礼，诸如洗礼之类，一再被说成不仅是为了仪式的目的，而且也是为了给个人增加力量。这种从欧洲流入的价值观，甚至在形式上也最接近非洲人的价值观，如坎多姆布莱（candomblé）、麦坎巴（macumba）之类各种崇拜祭礼，其中有些是近乎、甚至具有魔术的特征。至于麦坎巴，则甚至还有美洲印第安人的价值观存在，在这里所融合的是三层变异体。

在西印度群岛可以看到含有印第安文化的信仰混合的实例。特别是在洪都拉斯，这里有一种混血种人，他们是印第安妇女和非洲人混血的结果，被称作黑色加勒比人。[73] 这些非洲人主要是伊格博人和埃菲克人的后裔，其次也可能是芳蒂人、阿散蒂人、丰人和刚果人的后裔。

“非洲人社会”逐渐变成了“黑人社会”，他们和非洲联系的强度各不相同，和整个社会一体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这是从能否全面取得公民身份的意义上说的。

从社会的角度看，与整个社会一体化的关键是下列几种可变因素：白人殖民者社会的类型；土地的开发方式；殖民者的宗教信仰——新教还是天主教；人口中印第安人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对殖民当局强加给当地的经济进程的参与程度。不论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南北美洲独立之后都是如此。

殖民统治时期已经存在一些反抗形式。18 世纪后期一小批逃亡奴隶，包括混血儿在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企图生活在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体系之外。这些群体保持着典型的非洲社会价值观。从总体社会这一术语的角度看，这些“逃亡者”在 19 世纪情况各不相同，或是与世隔绝，或是融合成一体，以有关国家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经济演变所处的阶段而异。当时的演变是从种植园、农场和糖厂为主体的农业价值观经济逐步转化为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那种类型更为相似的经济。

黑人与农业社会一体化的程度，视农业的条件、劳动力是缺少还是容易得到、以及来自欧洲移民人数的多寡而异。这里所谓的欧洲移民是指那些专门来这里寻找劳动力体制范畴内的工作的人，例如来巴西咖啡种植园中劳动的人。这种一体化的表现方式很多，

780 包括非洲人在古巴和巴西的宗教团体所唱的歌、被有效地吸收进音乐文化的非洲乐器节奏[74]、非洲的烹调艺术、对某种非洲技术的利用（如在海地使用的农业工具，其中使用的锄头即是一例）、还有宗教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的传播。尽管非洲文化由于强迫实行奴隶制而遭破坏，但它仍然存在了下来，而且更进一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

[73] R. 科埃略（Coelho），1964 年。

[74] F. 奥蒂茨（Ortiz），195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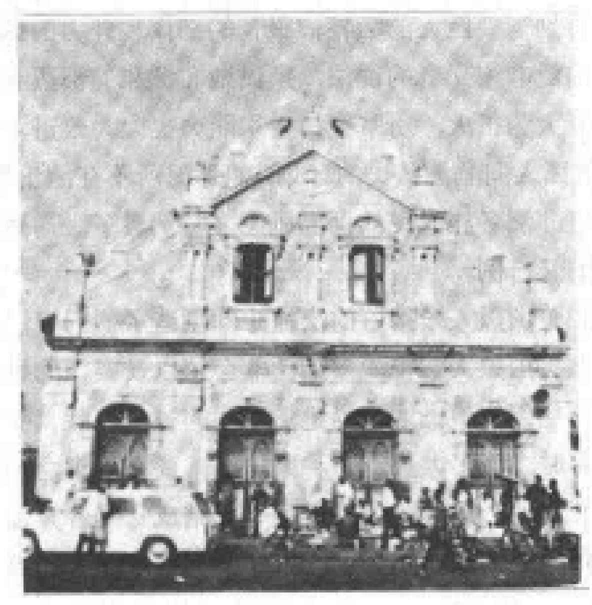
779

(a)

(c)

(d)

图片 29.4(a)-(d) 约鲁巴宗教对巴西巴伊亚州的非洲人后裔的影响示例



图片 29.5 拉各斯中央清真寺，在建筑方面深受巴西的影响

结　论

殖民地非洲人和美洲黑人的相互影响究竟产生了哪些后果？只有某些特定地区的非洲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和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黑人的交往。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之初就参与交往的那些地区，成了美洲黑人移民或传教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西非、南非和非洲之角。其他地区的人则是由于下列因素而卷进来的：——泛非主义者的各项活动，美洲黑人的各种著作、民间传说之类的东西渗入了他们的地区，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有数目不断增加的来自非洲大陆各个地方的学校毕业生去美国深造的主动精神。

毫无疑问，前途究竟如何发展，要由那些生活在特定黑人环境和有影响的集团之中的非洲人来直接左右。至于确切说出影响到底有多大则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殖民地非洲人与美洲黑人交往的后果，参照后来的社会和政治活动看，无论如何是独特和关键性的。就某些人看来，殖民统治时期涌现出来的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和战略中肯定存在着大量美洲黑人的成份，这一点十分明显而突出。但也有一些人，如一些非洲学生则认为，美洲黑人活动场所中的相互影响是令人失望和没有价值的。有一位这样的访问者用尖刻的评论阐述了后一种看法："当我呆在美洲的期间，我决定要探索的事情之一就是早先从非洲带到这里来的奴隶们的后裔处境究竟如何，……我觉得这样的结论不会错的，即就经济和物质的进步而论，美洲的黑人一般说来要比西非人领先，但是从品德和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说，美洲黑人又远远处在西非人之下。"[75]

另有一种看法是，许多非裔美洲人传教士把非洲人看作是"可怜的不信教的野蛮人"，从而使广大美洲黑人的脑子里非洲和非洲人的形象长期遭到歪曲和十分恶劣，对此这些传教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换句话说，教会为国外的传教团招收美洲黑人工作人员时进行百般游说，无疑地有时也会受诱惑的驱使，把非洲描述为一个奇异的、色情的和社会低下的地方，特别需要巨大的牺牲、艰苦的工作和外力的拯救。

781

但是，按照广义的泛非主义者的说法，殖民地非洲和美洲黑人的交往，使得非洲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视野大为扩大，所掌握的技术能力也大为改进，这些方面的证据是明显的。贾维大肆鼓吹的黑人向非洲移民的计划，他那无所不在的出版物深入非洲腹地，这仅仅是把美洲黑人带进非洲各族人民的世界概念之一例罢了。通过美洲黑人传教士拯救非洲人则是这一主题的又一例。

然而，非洲人在和美洲黑人紧接着的交往中却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方式，诸如上美国人的学校，更多地是上美国黑人学校，参加泛非会议以及类似的种种活动。其结果是许多非洲人得到了一种与他们的殖民地世界绝然不同的技术、教育和政治阅历。当他们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世界时，许多人都有一种紧迫感，要在新观念的指导下，去解决意识形态、文化定义、教育价值、政治权力以及泛非团结或觉醒各方面千头万绪的问题。

鉴于这种历史背景，无数的泛非会议、塔斯基吉式的教育和技术计划、黑人精神运

[75] A. E. 安尼-奥科康（Ani-Okokon），1927年，第10页。

动以及非洲人千年至福美梦中对美洲黑人的期待，这一切都说明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黑人中泛非的主题思想是始终一贯的，同时也表现出非洲人对新大陆倡议的反应经常变化，最终还是由非洲人自己把这些倡议变成适合非洲条件的形式。

总之，非洲人种散居世界各地以及第一、第二两个黑人世界的人们互相影响的特点包含着两个前景。其中一个前景是非洲黑人和美洲黑人两方面宗教力量的联合，或者由美洲黑人主动，大量引进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黑人的技术专业知识，以此重建非洲。另一个前景反映了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人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这后一种前景是通过非洲人的返回和开发非洲的资源而使非洲社会在精神上得救，非洲社会得到复兴和政治得到革新。由于上述前景，大量非洲人送到美洲的学校里受教育，或者被送去参加技术和商业活动，其他人则受到美洲黑人的著作或者散居世界各地的黑人组织的反殖事业的影响。后一种前景似乎并没有以简单地维护和重新修正非洲人的观点来更多地放弃隐含在早先的观点中的唯心主义的东西。

（屠尔康译）

30 殖民主义在非洲：影响和意义

A. 阿杜-博亨

根据本书前面各章所述，显然到1935年的时候殖民主义已经在非洲建起了钢铁般的782控制，并有永远存在下去的样子。但是，殖民主义也和其他靠武力建立并维持的体制一样，同样是短命的。从1935年起仅仅45年的时间，殖民主义制度已在非洲90%以上的土地上被推翻，只剩下林波波河以南的一块地方了。这就是说，殖民主义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的存在还不足10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就一个种族和整个大陆的历史而言，的确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推翻殖民主义这一不可思议的业绩是如何和因何得以完成的？或者用马杰里·佩勒姆的话说："1950年以来的解放进程因何如此惊人地迅速？"① 成为这段历史总结性一卷的两个主要课题。作为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准备集中于探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殖民主义给非洲留下了什么遗产？或者说它对非洲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二，鉴于此种影响，或从得失平衡的观点看，殖民主义对非洲又具有何种意义？它对这一大陆的历史是否构成某种革命性的或一个重要的插曲？这一大陆的历史究竟是已被它割断，还是这仅仅是过眼烟云而并不能割断这个大陆的历史？或者像L. H. 甘恩和彼得·杜伊格南所曾提出的"殖民统治时期在更广泛的非洲史范畴内的地位何在"？②

殖民统治的影响

很可能，任何主题都不会像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那样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某些非洲问题专家，诸如甘恩、杜伊格南、佩勒姆和P. C. 劳埃德认为，这种影响是得失相当的，对非洲来说，既可以算是幸事，也可以说至少是无害于非洲。

783 例如，劳埃德就曾毫不犹豫地谈到殖民统治影响的好处。"今天要吹毛求疵很容易"，他指出：

> 你可以说半个世纪殖民统治期间经济发展缓慢……但是把非洲在19世纪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状况相对比，差别是十分惊人的。殖民国家提供了"独立"后赖以取得进步的基础设施：一整套相当有效率的一直伸展到最边远地区、最基层一级的行政机构；公路和铁路网；保健与教育的基本设施等等。西非初级产品的出口

① M. 佩勒姆（Perham），1961年，第24页。

② L. H. 甘恩（Gann）和P. 杜伊格南（Duignan）合编书的"结束语"，1970年，第526页。

给当地人民带来大量财富③。

马杰里·佩勒姆1961年在里思讲课时也强调说："批评殖民主义的人，其主要兴趣着眼于现在和今后。但我们必须提醒他们，我们已经消失的帝国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传给后代的内容，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当然还有无足轻重的。这是无论他们或我们都无法随意抛弃的。"④有意思的是，人们注意到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D. K. 菲尔德豪斯在一本1981年才出版的书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看来，对于殖民主义不应像通常加于它身上的那样全面赞扬或全盘否定。如果说它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来克服殖民地的贫困状态，也不能说是它第一个使殖民地陷于贫困。殖民帝国产生了有深远意义的经济后果，有好的、也有坏的……"。⑤

最后，实际致力于为非洲的殖民主义进行辩护的L. H. 甘恩和P. 杜伊格南在1967年得出如下结论："帝国制度是非洲历史上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动力之一，算起帐来，它是功大于过。"⑥在他们两人共同主编的五卷本《殖民主义在非洲》第一卷的序言中，他们又一次总结道："我们并不同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假设——殖民主义与剥削应该划等号 784 ……因此我们把欧洲在非洲的帝国主义解释为文化变革与政治统治的一种动力。"⑦

另外一些人，主要是非洲人、黑人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特别是研究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理论家们则强调：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好处实际等于零。圭亚那黑人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采取了特别极端的主张。他坚决认为："有些人说：一方面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而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做了大最有利于非洲人的事，是他们开发了非洲。我们的论点是：这种说法完全是虚假的。殖民主义只有一面——它是一个吃角子老虎。"⑧

以上就是对在非洲的殖民主义的两种主要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但是从已有的证据看，需要作出一个更为均衡的评价，这就是本章的目的。正如我们在下文即将阐述的那样，殖民主义的影响确是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必须一开始就强调，绝大多数积极的后果并非有意识计划的结果。总的说来，正像M. H. Y. 卡尼基和A. E. 阿菲格博在第16章和第19章所指出的那样：不如说是为促进殖民者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与措施所偶然带来的副产品；或者说变革的结果是殖民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也可以用阿里·马兹鲁伊的说法，积极的影响"来自失误或来自推行铁的法则所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⑨关于消极的一面也应指出，为什么有些事情未能做到，也可能是确有原因，这些原因不管是好、是坏、还是无足轻重。例如，像D. K. 菲尔德豪斯想竭力表明的那样：为什么使用强迫劳动，为什么未能促进工业化，也未实现农业多样化，以及为什么医疗设施不足。⑩但从遭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总而言之都是消极面。那么，让我们先在政

③ P. C. 劳埃德（Lloyd），1972年，第80-81页。
④ M. 佩勒姆，1961年，第24页。
⑤ D. K. 菲尔德豪斯（Fieldhouse），1981年，第105页。
⑥ L. H. 甘恩与P. 杜伊格南合编，1967年，第382页。
⑦ L. H. 甘恩与P. 杜伊格南合编书"序言"，1969年，第22、23页。
⑧ D. W. 罗德尼（Rodney），1972年，第223页。
⑨ A. A. 马兹鲁伊（Mazrui），1980年，第41页。
⑩ D. K. 菲尔德豪斯，1981年，第67-68，71-74，88-92页。

治范畴来算这笔帐，先从积极的开始，然后再讲消极面。

政治范畴的影响

第一个政治方面的积极影响是殖民主义在非洲得到巩固之后，比以前更大程度地建立了持续的和平与稳定。如前所述，19世纪在非洲的中南部出现了“姆非卡尼”*以及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和尼扬韦齐商人的活动，诸如提普·提卜和姆西里等等。西苏丹有富拉尼人圣战者以及图库洛尔帝国与曼丁哥帝国的兴起，西非则有奥约帝国和阿散蒂帝国的瓦解。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和不安全。但是在同一阶段内，欧洲的情况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在欧洲，这时正值拿破仑战争、“知识”革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战争、波兰与匈牙利起义、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最后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应该承认，在非洲殖民统治时期的第一、二个或第三个10年里，即从1880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正如考德威尔所说的那样，不稳定、暴力和混乱甚至进一步加剧，造成大规模、不可原谅的破坏和人口损失。举例而言，在殖民统治的头40年里，比属刚果的人口减少了一半，赫雷罗人减少了五分之四，纳莫人减少了一半，利比亚人减少了75万。[①] 甚至是反殖民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也不否认下列事实：完成殖民占领并建立各种行政机构之后，这类侵略扩张战争和解放战争告一段落，非洲绝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享受了很大程度的持续和平与安全。这种状况是一种肯定的财富，因为它在所有各个殖民地都极有利于正常的经济活动和提高社会与物质的能动作用。这一切又通过新思想、新技术、新爱好和新风气的推广，大大地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个政治方面的积极影响，是形成现代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地理上的政治形状。正如A.E.阿菲格博在上文（第19章）所指出，殖民瓜分和征服势必造成非洲的政治局面产生革命性的改变。过去存在着成千上百个独立氏族、世系集团、城邦、王国和帝国。它们的边界从未明确划定过，代之而起的是新建立的50个新的国家。这些国家绝大多数的边界业已划定。有意义的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划定的边界线，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变化。

第三，殖民体系向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引进了两种新体制。新的司法制度与新的官僚政治或称文官制度。有意思的是这两者在独立后也被保留了下来。毫无疑问，除穆斯林国家外，实际上所有独立国家都保留了殖民统治者所引进的高级法院审判制度；在前英属殖民地不仅保留了其形式（甚至包括假发与长袍，尽管气候不相宜），也保留了其内容与气质。

为殖民地行政管理而引进的机制也势必导致文官队伍的出现，只是许多地区为时较晚。这支队伍的人数与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这一特定遗产的重要性因殖民体系之不同而各异。无疑，英国比法国为其殖民地提供了训练有素、人数更多也更有经验的官僚机构，而比利时和葡萄牙在这方面的记录则很糟。

---

① B.戴维森（Davidson），1964 b，第37页；1978 b，第150页。

* 见第9章注。

殖民主义的最后一个积极影响不仅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且产生了泛非主义。前者，正如我们已谈到的，在每一个新的国家或一群国家（如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各阶级或各部族群体之间培养起一种认同感与觉醒感；而后者，则出自一种认为全世界黑人都具有共同点的认同感。代表前者呼声的，如B. O. 奥洛隆提梅欣在前文，（第22章）所示，有各种运动、政党、青年团体与协会、宗教派别和报纸；代表后者呼声的有R. D. 罗尔斯顿在前文（第29章）所论述过的各种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一遗产尽管重要，但恰好是殖民存在不想有意识地创造它，而是意外地出现的副产品的一个典型事例。没有一个殖民统治者愿意创造并培养非洲民族主义。 786

如果说殖民主义有什么积极影响的话，那么消极面肯定更大。首先，民族主义的发展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是一种意外地出现的副产品，而且是因为它并非出自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责任和忠诚的一种积极认同感的结果，而是来自殖民统治者推行压迫、歧视、屈辱和剥削措施而造成的愤怒、挫折和耻辱感的一种消极产物。随着殖民主义被推翻，这种感情必然会失去势头，而且也确实失去了。今天，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用一种持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去取代这种消极的反应。

其次，当我们承认新的地理-政治布局时，虽然它是偶然造成的，但总算是一笔资产，不过它所产生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多。虽然A. E. 阿菲格博和G. N. 乌佐伊圭（在第2章和第19章中）业已阐明：新生国家的边界并非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是随心所欲地划定的，无疑许多国家的出现是人为的，而这种人为的做法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一大陆的未来发展势必受到这些问题的干扰。第一个后果是某些边界线穿过并割裂了早已存在的部族群体、国家和王国，从而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动乱和流离失所。例如，巴刚果人被边界线分割在安哥拉、比属刚果（今扎伊尔）、法属刚果（今刚果）以及加蓬四地。今天，埃维人一部分住在加纳、一部分住在多哥、一部分住在贝宁。索马里人被分割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和吉布提。在马里、科特迪瓦和上沃尔特都有塞努福人。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上述情况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出现了毒化某些非洲独立国家关系的边界争端这种痼疾。这种争端已在苏丹与乌干达、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与索马里、加纳与多哥、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之间发生。第二个后果是由于边界是人为划定的，各个非洲民族国家都由一些文化、传统和语言各不相同的人们混合组成。由于居民混杂而带来的国家建设中的问题迄今难以解决。

殖民过程中人为地、主观地划分边界所带来的另一后果是新兴国家的面积大小各不相同，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也不均等。有些国家经分割后成为巨人如苏丹、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有的则成侏儒如冈比亚、莱索托、多哥和布隆迪。苏丹与扎伊尔的面积分别为250万平方公里和240万平方公里；而冈比亚只有10,350平方公里，莱索托只有29,200平方公里，布隆迪为28,800平方公里。不幸的是小面积或中等面积的国家远比大面积的国家多。[12]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一些国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像马里、上沃尔特、尼日尔、乍得、赞比亚、乌干达、马拉维等却是内陆国家。再一个后果是有 787

[12] A. A. 马兹鲁伊，1980年，第90页。

些国家如加纳、赞比亚、扎伊尔、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另一些如乍得、尼日尔和上沃尔特就不那么幸运。最后，有些国家如冈比亚只与另外一个国家的交界需要防守，而另一些国家则与4个或更多的国家交界，扎伊尔的邻国竟达10个之多。这种情况给保证国家安全及制止走私带来严重问题。继承了上述种种不幸的遗产、那些自然资源贫乏或不足、沃土不足、缺少出海口的非洲独立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容易想象的。

殖民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消极影响是当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受到削弱。首先是像S.阿布巴卡尔最近所指出的，而且从以上许多章节中都可以清楚看到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经过征服与废黜、流放原有的统治者，才被人取得的，这“势必使整个酋长制威信扫地，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13] 正如我们在前文已谈到的，某些殖民国家如法国，把一些传统的君主政体与统治家族全盘废弃，指定一些原来无权担任此类职务的人作为酋长，并把他们都转化成为行政官员。英国和比利时则保留了传统的统治者及其体制机构，并且正如R.F.贝茨在第13章所说的那样，在不存在传统统治者的地方首次指定了一些酋长，试图通过他们进行统治。但是，派往当地的殖民官员，实际上成了真正的独裁者，而不是这些传统统治者的顾问，他们利用这些传统统治者来强制推行被其臣民所深恶痛绝的强迫劳动、直接税和为殖民军强制征兵之类措施。这样操纵酋长体制的结果，使传统统治者在自己臣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与尊严。最近对加纳两次大战之间时期农村政治的研究表明：这一阶段的殖民记录[14] 充满着年轻人反对他们酋长的动乱和起义，甚至是那些被废黜了的酋长。此外，殖民地司法体制允许臣民向殖民法庭上诉，这一事实不仅削弱了传统统治者的权威，也减少了他们的经济收入。[15] 更有甚者，基督教的传播削弱了国王们权威的精神基础。因此，殖民制度就这样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有时削弱或者甚至摧毁传统统治者；有时又与之联合并利用他们。但殖民制度的这两种做法最终都缩小了传统统治者的权威。

788

殖民统治在政治领域内的另一消极影响在于造成非洲人下述心理状态：政府以及所有公共财产不属于人民而属于白人统治者，因而可以也必须想方设法从中取利。加纳人的下列说法十分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心理状态：“如果白人的财产遭受破坏，扔到海里就算了”；“应该把政府拉到地上来，而不要把它捧上天”。这两种说法的含义就是用不着爱惜政府的财产。这种心理状态是殖民当局高高在上与深奥莫测的直接结果，因为非洲人的绝大多数，不管他们是否受过教育，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多数非洲人在独立数十年以后仍保留着这种心理状态。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因何在许多非洲独立国家中对待政府财产之所以如此漫不经心。

专职军队或常备军的建立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这一点经常为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但却具有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在R.E.贝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第13章）。已有充分材料说明：撒哈拉以南绝大多数非洲传统国家不设常备军。在整个西非只有

[13] S.阿布巴卡尔（Abubakar），见D.伊基默（Ikime）编，1980年，第451页。
[14] P.詹金斯（Jenkins）编，1975年。
[15] R.阿多-费宁（Addo-Fening），1980年，第509-515页。

达荷美有常备军，并有独特的娘子军，即著名的亚马孙部队。在多数情况下，平民与军人之间没有区别。所有成年男子，甚至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家庭成员，在战时是军人，在平时是老百姓。因而各殖民地的殖民统治者引进的最新颖设施莫过于专业军队。这些军队多数是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创建的，最初是为了征服并占领非洲，随后是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最后是为了推行全球战争、镇压非洲独立运动。在殖民统治者被推翻以后，这些军队没有解散而是被新的独立的非洲统治者所接管，从此他们成为殖民主义最成问题的产物。正如W. 格特里奇所承认的：军队的"活动从长远来讲不利于前殖民地的稳定"。[16] 确实，从本书中第八卷中我们将可以看到，由于他们经常不断地对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政治进行不必要、不合理的干预，这些军队已成为挂在非洲政府和人民脖子上的磨石。 789

殖民主义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消极影响就是非洲主权与独立的丧失，从而使非洲人丧失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以及与外部世界直接打交道的权利。早在16世纪与17世纪，贝宁与刚果等非洲国家都能派使节和使团去欧洲国家的朝廷。甚至迟至19世纪90年代，我们还能看到某些非洲国家能以平等地位与他们的欧洲同行打交道。阿散蒂赫内、马塔贝莱兰国王以及马达加斯加女王都曾在19世纪90年代向英国女王派出过外交使团。殖民主义使这种行动中止了，从而剥夺了非洲国家从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中获得经验的机会。

但是失去独立与主权对非洲人的损失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们丧失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丧失了计划自己发展、管理自己经济、确定自己的战略与重点以及从外部世界自由引进最新与最适用的技术的权利。剥夺了他们全面处理自己事务（也可能处理得不好），从成功中得到启示和满足，从失则中吸取教训与经验的权利。总之，殖民主义剥夺了非洲作为一个民族的最基本、最不可分割的权利——自由的权利。

更何况，像罗德尼所指出的那样，殖民主义在非洲的70年间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取得巨大的决定性发展与变革的时期。例如，在这一时期内欧洲进入了核时代，进入了飞机与机动车时代。如果非洲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应该从中得到好处，甚至成为这些惊人变革的一部分。但是殖民主义使她完全孤立、隔绝于这些变革之外，使她处于从属地位。显然，殖民主义强加于非洲的这种独立与主权的丧失、自由的基本权利的被剥夺与政治上的孤立是我们所看到的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又一个最致命的政治影响。

经济范畴的影响

总之，政治范畴的影响是重要的，虽然祸福参半。经济范畴的影响也同样是如此，甚至更加重要。正如前文许多章所指出，这方面第一个最明显、最深远的积极影响就是提供了公路、铁路、电讯、电话，有时甚至是机场等基础设施。这是殖民主义入侵前的 790

[16] W. 格特里奇（Gutteridge），1975年。

非洲所没有的。正如J. C. 考德威尔所说，在殖民时期以前"几乎所有陆上运输都是靠的人力"（见18章）。非洲的这些基础设施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可以说此后并未新添多少英里的铁路。这种特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它不仅促进了货物、新的经济作物和军队的运输，也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后一种因素有利于缩小地区狭隘性、地方主义与部族中心主义。

同样重要而有意义的是殖民主义在经济方面对初级产品的影响。前文所述清楚地表明：所有的力量都被用来开发或剥夺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正是在殖民统治期间人们全面了解了非洲的矿产潜力并使采矿业得以蓬勃兴起；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可可、咖啡、烟草、花生、西沙尔麻和橡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得以推广。肯定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加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法属西非195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来自农产品。必须强调，正如M.H.Y.卡尼基已指出的(第16章)，西非的经济作物是由非洲人自己生产的。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愿意并有能力适应这种外来的刺激，还作出了正确的反应。正如J.福布斯·芒罗所指出的那样，绝大部分经济上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1914年这20年间，"在这段时间里，各殖民地政府为绝大多数当代国家所必需的经济基础设施奠定了基础，而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商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7]

这一经济革命有着某种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土地的商品化，使之成为真正的财产。在殖民时代以前，非洲许多部分大面积的土地不仅人烟稀少，而且未被利用。经济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以及采矿业的发展，结束了这一状态。确实，在非洲许多地区原始森林利用速度之快，使殖民政府不得不建立森林保护区以防进一步砍伐。其次，经济改革提高了一些非洲人的购买力，从而提高了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第三，非洲人的经济作物的发展，使某些个人或社会阶层得到了财富，尤其在农村地区是如此。

在非洲许多地区，殖民主义另一个重大的革命性影响在于引进了货币经济。正如W. 罗德尼在前文（第14章）所指出的，到本世纪20年代，非洲社会的每一部分，包括以保守闻名的牧民，都已被纳入了货币经济。[18] 这一转变的影响也是极其重大的。首先是到本世纪30年代已经采用一种新的计算财富的标准。财富已不再以人们所拥有的羊、牛或薯芋的数目，而是以实有的现金来计算。其次，人们从事活动已不单纯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就像下文即将阐明的，又导致新的挣工资和薪金的阶层的出现。第三，货币经济的引进使非洲开始了银行的活动，这又成为独立非洲国家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791

货币的引进、随之而来的银行活动以及殖民地非洲与欧洲间贸易量的巨大增长，都像A.G.霍普金斯所描述的那样：通过"创造条件为欧洲人与非洲人双方进行合法贸易提供发展与多样化的途径与刺激"，从而完成了"把西非纳入工业化世界的过程"。[19] 非洲其他地区的状况也与此相同。到1935年非洲经济已与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殖民国家的

[17] J. F. 芒罗（Munro），1976年，第86页。

[18] 见本书第14章。

[19] A. G. 霍普金斯(Hopkins)，1973年，第235页。

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在1935年以后的年代里这种联系只有加深，甚至非洲的独立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关系。

那么在经济范畴内对非洲的殖民影响是否是令人称羡的呢？远非如此，今天非洲国家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多数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源。

首先是，如M. H. Y. 卡尼基在前文所指出的（第16章），殖民主义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既不充足也不实用。多数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不是为了开发所在国，而仅仅是为了把具有矿藏或具有发展经济作物潜力的地区与出海口联接起来而已。或者用菲尔德豪斯的话来说，就是"把内地生产地区与世界商品市场相联结"，⑳ 铁路和公路都很少有支线。人们也未打算发展非洲内地相互间的交通与运输。因此这种基础设施的提供是为了促进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并把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起来，而不是为了促进非洲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不是为了促进非洲内地相互间的接触。其次，殖民地的这种经济发展是以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这意味着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完全被忽视了。这就使同一殖民地 792 的经济出现了极其悬殊的发展。这些差别，反过来又加深并加剧了地区差别与地区情绪，成为非洲独立国家建成民族国家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正如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所指出："如果所有部族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部族分歧在现代世界中也许很容易消除。而在那些极不平等的地方，部族分歧往往被用来增强经济利益的保护主义。"㉑

第三，殖民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绝大多数殖民地内，完全地、有意识地忽视或不鼓励工业化以及对当地所产原料和农产品的加工工业。正如菲尔德豪斯所指出的："在1945年以前，可能没有一个殖民政府设立工业部的"。㉒ 即便是火柴、蜡烛、香烟、食油、甚至石灰和桔子汁之类在非洲很容易生产的一些简单的基本物品都靠进口。因此所有非洲国家，根据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做法，都成为宗主国工业制成品的消费市场和专供出口的原料生产者。正是殖民列强及其商业、矿业公司这种对工业化的全面忽视应该被归咎为是对殖民主义最不可原谅的一种控诉。它也为下列观点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论证：殖民时代是经济剥削的时代，而不是非洲发展的时代。忽视工业化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非洲人根本没有受到接替欧洲人的训练。这种后果的危害之深甚至超过政治领域。

第四，不仅工业化被忽视，而且在殖民主义入侵前非洲原已存在的一点工业与手工业也几乎被摧毁殆尽。应予强调的是，非洲殖民化之前的工业能够生产非洲人需要的所有东西，包括建筑材料、肥皂、串珠、铁制工具、陶器、尤其是布匹。如果这些制造业，能像印度在1920至1945年期间所做的那样，㉓ 通过生产技术的现代化来维持和振兴的话，非洲不仅能增加其产量，而且也能不断地改进其工艺。但是由于大规模制造的廉价商品成批涌入非洲的结果，这些手工业和工业实际上全都遭到扼杀。非洲的技术发展就此停顿，在获得独立前始终未能得到恢复。

⑳ D. K. 菲尔德豪斯，1981年，第67页。
㉑ W. A. 刘易斯（Lewis）1965年，第24-25页。
㉒ D. K. 菲尔德豪斯，1981年，第68页。
㉓ 同上，第92-95页。

第五，虽然农作物已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并未作出任何努力使殖民地农业经济多样化。相反地，正如前文某些章节所指出：到1935年，只生产一种，或者最多是两种经济作物已成为惯例。例如黄金海岸生产可可，塞内加尔与冈比亚生产花生，苏丹生产棉花，乌干达生产咖啡与棉花，坦噶尼喀生产咖啡与西沙尔麻等等。在79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里，这方面的情况也未见改善。因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发现自己已被固定在单一作物经济范围内，因而极易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贸易情况的影响。殖民主义确实完成了把非洲经济纳入国际经济秩序的轨道，但却使其处于极为不利的受剥削的地位。这一情况至今未有变化。

严重地依赖于经济作物的另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忽视了非洲国家的国内经济。正如M.H.Y.卡尼基所指出的（第16章），非洲经济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为维持生产者生存和国内市场而生产的国内部分，和为供应远距离商队贸易的出口部分。在殖民统治前，这两部分受到同样的重视，其结果是不需要为养活任何人而进口食品和鱼米。但是，到了殖民统治时期，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经济作物，其结果是国内部分实际上遭到严重忽视。非洲人事实上被迫不顾生产自己消费所需的粮食，而致力于生产出口所需的经济作物。甚至像菲尔德豪斯所指出的，即使是不上算，也还得这样做。[24] 因此非洲不得不进口粮食，老百姓也不得不经常以高价购买进口粮食来充饥。冈比亚的例子就很典型。冈比亚人被迫放弃水稻种殖而改种花生，因此不得不进口大米。[25] 在几内亚，富塔贾隆地区的非洲人因被迫种植橡胶而导致1911年的粮荒，因而不得不进口大米，用卖橡胶的钱来购买进口大米。几世纪来一直出口谷物和食品的埃及，从20世纪初由于过度集中于出口棉花的生产而被迫进口玉米和小麦。同样情况也发生在黄金海岸，在那里由于过分强调可可生产而不得不进口粮食。从一个名叫A. W. 卡迪纳尔的持同情态度的殖民官员在30年代的悲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这个国家可以生产（进口的）"鲜鱼、大米、玉米、其他谷物、豆类、腌肉和鲜肉、食油、香料和新鲜蔬菜的半数，或者，换句话说，可以省下20万英镑外汇。"[26]。正如C.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在前文（第15章）所指出，在非洲某些地区，特别是法属非洲，殖民初期由于忽视粮食生产再加上强迫劳动，出现了众多的营养不良、严重饥荒和传染病。因此，殖民体制下的非洲人在大多数情况是被794 迫生产他们所不消费的东西，而消费他们所不生产的东西。这就是殖民地经济不平衡与剥削实质的明证。

正如科林·利斯所指出的：在非洲也有一些禁止非洲人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方，如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他们从为新市场生产经济作物的独立农民被成功地转化为依赖工资为生的农业劳工"。[27]

第六，前文已提到过的土地商品化导致一些肆无忌惮的家族头人非法出售村社共有的土地，并使因土地而打官司的事件日益增多，这引起广泛的贫穷，特别是在占统治地

[24] D. K. 菲尔德豪斯，1981年，第88页。
[25] W. 罗德尼，1972年，第257-258页，
[26] 转引自M. 克劳德（Crowder），1968年，第348页。
[27] C. 利斯（Leys），1975年，第31页。

位的家族中 在非洲的东部、中部和南部正如前面许多章节中提到过的，土地还大规模地被欧洲人所侵占。在南非，89%的土地为只占人口21%的白人所保留，在南罗得西亚，37%的土地为只占总人口5.2%的白人所保留，在肯尼亚不到10%的白人占有7%的土地（译者按：原文如此），在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2.5%的白人占有3%的土地（译者按：原文如此），而他们所占有的都是这些国家最肥沃的土地。[28]这样的侵占只能引起更多的苦难、愤怒与失望，也是造成肯尼亚爆发茅茅运动那样严重爆炸性事件的根本原因。

殖民体制，也像前文早已指出过的那样，导致非洲出现了越来越多外国人兴办的银行、船运公司和贸易商行，从本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这些银行、商行和公司又合并调整成数目越来越少的垄断组织。这些公司既控制进口、也控制出口贸易，它们不仅决定着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决定着非洲人生产的出口产品的价格。这样，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得到的巨额利润滚滚而流入公司的腰包，而不属于非洲人。更有甚者，这里对利润几乎不征税，也没有规定必须把部分利润投资于当地或必须支付较高的特许费。因此无论是当地的殖民政府或者作为土地主人的非洲人都不能从这些公司的活动中直接得到好处。这种发展的另一个结果是非洲人自然而然地被完全排除在经济活动中最有利可图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之外。19世纪后半叶存在的非洲富商们事实上已经消失，他们的后代迫于生计只能成为外国商行与公司的雇员。在工业部门情况完全一样，这就阻碍了从非洲人中产生一个具有经营管理技能的阶级。

正如罗德尼所指出，殖民主义实际上抑止了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在殖民统治时期之前，非洲国家相互间进行着大量的贸易。远距离商队的贸易活动是非洲经济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但是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这种非洲大陆内部的短途或长途贸易如果不是 795 遭到禁止也至少可以说受到了严重阻碍。或者用罗德尼的话说“各殖民地人为划定的政治边界总的说来对经济活动是个阻碍”，[29]各殖民地的贸易流向也改变了方向，全都流向宗主国。长期形成的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与商业关系大部分被消灭的结果，使非洲人没法加强旧的联系，也难以发展新的有利于他们的关系。由于同一原因，非洲人也不能发展同世界其他地区诸如印度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

最后，不管殖民阶段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使非洲人付出了惊人的、不公正的代价。这就是：强迫劳动、流动劳工（按戴维森的说法，“这对殖民前文化和经济所起的摧毁作用可能超过了殖民统治其他形式的总和”）、[30]强迫种植某种作物、强占土地、打乱家庭生活的强迫迁移人口、通行证制度、矿山与种植园的高死亡率、以及由此引起的非洲人抵抗与抗议运动所遭受的残酷镇压等等。最重要的则是殖民国家在殖民地所推行的金融政策——把殖民地的货币与殖民国家的货币拴在一起，推行税则并把所有外汇收入存在宗主国首都。殖民国家在使本身的货币保持稳定并可自由兑换的同时，却把殖民地的资产冻结在宗主国首都，使之不能兑现，不能投资于殖民地。银行把非洲人的储蓄

---

[28] M. J. 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62年，第147-150页；A. 桑普森(Sampson)，1960年，第46-47页。

[29] 见本书第14章。

[30] B. 戴维森，1978 b，第113页。

与存款送回宗主国并在贷款方面对非洲人推行歧视政策，这种作法进一步阻碍了非洲的发展。

综上所述不妨作出如下结论：尽管甘恩与杜伊格南有不同看法，还是可以说殖民统治阶段对非洲是一个残忍的经济剥削阶段，而不是经济发展阶段。不难肯定，殖民主义在经济范畴对非洲的影响是最为暗淡的。

社会范畴的影响

最后，殖民主义在社会范畴内的记录又是怎样的呢？第一个重要的积极影响，正如J. C. 考德威尔（第18章）所指出，就是非洲的人口，除了在殖民统治开始的20或30年有所下降外，在整个殖民统治阶段增加了37.5%。按照考德威尔的说法，增长的原因是由于打下了经济基础、修筑了公路和铁路以保证食品能够迅速送到灾区。此外还有对嗜睡病、腺鼠疫和黄热病等传染病所进行的宣传和防治活动。

796

与此紧密相连的殖民主义第二方面的社会影响就是城市化。正如A. E. 阿菲格博（第19章）所强调的，在殖民统治前非洲当然并非没有城市化。非洲的王国和帝国有过像库姆比·沙勒、贝宁、伊莱-伊费、库马西、加奥、大津巴布韦等首都或政治中心；也有过卡诺、杰内、苏法拉与马林迪之类商业中心；还有廷巴克图、开罗与非斯之类的教育中心。但是无疑殖民统治的结果是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出现了像科特迪瓦的阿比让，黄金海岸的塔科拉迪，尼日利亚的哈科特港与埃努古，肯尼亚的内罗毕，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北罗得西亚的卢萨卡以及比属刚果（今扎伊尔）开赛省的路路阿堡这样全新的城市。

此外，正如考德威尔在前文（第18章）所述，早已存在的城市以及新兴城市的人口在殖民统治期间都飞速发展。1896年作为修建乌干达铁路的中转站而建立起来的内罗毕，其人口在1927年仅为微不足道的13,145人，而到了1940年却达到25万人。卡萨布兰卡的人口从1910年的2026人增加到1936年的25万人；黄金海岸的阿克拉从1901年的17,892人增加到1948年的135,926人；拉各斯从1914年的74,000人增加到1950年的23万人；达喀尔从1916年的19,800人增加到1936年的92,000人，到1945年更增至132,000人；最后是阿比让从1910年的800人增加到1914年的10,000人，到1955年增至127,000人。从上述数字中可以清楚看到：非洲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1919至1945年期间。这段时间一直被描绘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全盛时期。此外，这些城市在此期间之所以得以迅速发展是由于它们成为殖民政权的新的首府或行政中心，例如阿比让、尼亚美、内罗毕、索尔兹伯里和卢萨卡；或者是作为新的港口、铁路的终点或交叉口，如塔科拉迪、哈科特港、巴马科以及布拉瓦约；或者作为新兴的采矿业或商业中心，如奥布阿西、乔斯、路路阿堡、金伯利和约翰内斯堡。

人们的生活素质，特别是那些住在城市中心的人无疑是有所改善的。像考德威尔所说（第18章）的那样，这是由于提供了医院、药房、自来水、卫生设施、改善居住条件

以及殖民地统治者采取了废除奴隶制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措施的结果。

殖民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及西方教育的传播。这一切无疑是由于和平、秩序和保护，并与殖民主义在有的地区提供积极的鼓励有关，基督教与伊斯 797 兰教的传教士遂将他们的活动一步步向内地推进。正如K. 阿萨雷·奥波库（第20章）所指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殖民时代所占领的地盘大大超过了以前3或4个世纪的总和。正是在这段时期里基督教在东非和中部非洲站稳了脚跟，有时它随着欧洲列强的国旗与贸易向前推进，有时欧洲列强的国旗与贸易又随着它向前推进。伊斯兰教在西非和东非发展也很快。这既是由于殖民统治时期交通条件的总的改善，也是由于法、英统治者庇护的结果。正如奥波库所强调的，这两种宗教之所得并未以传统宗教的牺牲为代价。殖民主义所做的是加强了非洲宗教的双重性并使之永恒化，从而丰富了非洲的宗教生活。

与基督教的传播有密切关系的是西方的教育。正如前面许多章节中所阐述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主要责职也在于此。但是应该记住，这些传教士之所以能开展活动主要是由于殖民当局给以补贴的结果。确实，到了殖民统治末期，连个小学都没有的地方几乎没有了。西方教育的传播有着深远的社会效果。其中之一就是增加了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精英的人数。社会精英是当前组成非洲各国寡头统治集团以及文职人员的骨干。

殖民主义的另一重要影响是为每一个殖民地或一系列殖民地提供一种通用语，这一点在下文将表明是祸福参半的。在所有殖民地，宗主国家的本国语，或以其纯真的方式或以其混杂的方式成为官方或商业用语，并在许多场合成为一个殖民地众多语言集团的居民相互交往的主要手段。值得指出的是除北非、坦桑尼亚、肯尼亚与马达加斯加外，直到今天这些语言仍为官方用语。

最后一个有益的社会影响是殖民主义向非洲某些地区引进了，或在有些地方使之加速发展了新的社会结构。正如A.E.阿菲格博所指出（第19章），虽然传统的社会结构允许社会流动，但其阶级结构看来过于看重出身。而另一方面新的殖民秩序则强调个人本人的长处与成就而不是出身。这一变化再加上奴隶制的废除；西方教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引进；经济作物农业的推广在某些地区有助于积累财富；以及新的殖民秩序所推行的其他种种发迹的机会，迅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因而，到了本世纪30年代，殖民统治前按传统贵族统治者、普通人、家庭奴隶以及相对说来人数很少的受过教育的社 798 会精英来划分的社会阶级，被一个新出现的城市与乡村居民间的差别比以前更为尖锐的新的社会所取代。而城乡居民又分成不同的阶层。城市居民可分为三个主要集团：社会精英（或被称为行政管理-秘书公务-专业资产阶级）；非精英（或按劳埃德的意思把他们称作候补精英）；以及城市无产阶级。社会精英又可分为三类：由文官组成的官僚精英；由医生、律师、建筑师、勘测员、教授等组成的专业精英，以及由外国商行、公司的经理人员和私营商人、企业家组成的商业精英。候补精英包括经纪人、掮客、办事员、教师、护士、下级文职人员。城市无产阶级包括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店员、司机、技工、邮递员、裁缝和砌砖工等等。在农村地区，首次在非洲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这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前者还包括主要是在非洲东部和南部那些土地被欧洲人剥夺，又被禁止长期在城市及工业中心居住，而不得不在城市和农村间来回谋

生的流动劳工。农民则是被约翰·艾利夫描绘为"住在小的村社中，耕种自己所有或是归自己掌握的土地，主要依赖家庭成员劳动，生产自己赖以生存的产品，同时也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系，包括非农民，提供产品。"[31]后一阶级中的某些成员由于种植供出售的经济作物而变得相当富有，从而导致所谓的农村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艾利夫曾把这种"农民化"当作一种"其影响可以与工业化相比的一劳永逸的转变"。应该强调：既然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更大程度上可以根据个人的努力与成就而不是靠宿因来改变社会地位，这对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相当大的改进。

但是，如果说殖民主义确实具有某些积极的社会影响的话，它也确实有某些消极的影响，而且确实还是些严重的消极面。首先是创造并扩大了在殖民统治期间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心与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别。像我们在前文中已提到的城市中心人口的巨大增长，并不单纯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殖，而是主要由"推拉力"[32]所造成的。受教育和谋职业的需求不断把男女青年拉向城市，推出农村。正如C.科奎里-维德罗维奇在前文（第15章）所说，这是由于饥荒、传染病、贫困和捐税所造成的。更何况，由于欧洲人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中心，因而也只有在这些地区才会建立上面所列举的改善生活素质的设施。农村地区则实际遭到忽视。这也加剧了人口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流动。即使时至今日，非洲城乡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无疑，这种差别是由殖民体系所造成并加以扩大的。

799

但是迁移来的人很快就发现城市中心并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种既安全又富裕的避难所。没有任何城市以平等的态度来接纳非洲人，并和他们打成一片。何况，多数人并不能找到工作或者像样的住所。他们不得不挤在郊区或贫民窟中，在那里失业、少年犯罪、酗酒、卖淫、犯罪并堕落成了他们命中注定的人。殖民主义不仅使农村生活贫困化，而且也毒化了城市生活。因此难怪这一群体的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突击队员。

第二个严重的社会遗产就是欧洲人和亚洲人移民问题。虽然北非一些国家和南非在殖民时代以前就已有欧洲移民，但是无疑地，在殖民统治时期移民不仅在人数上大量增加了，而且欧洲和亚洲的移民还推进到了非洲的东部和中部，甚至西非的部分地区。正如M.H.Y.卡尼基在前文（第16章）所指出的，肯尼亚欧洲人的人数1903年为596人，1905年增加到954人，1914年增加到5438人，1929年增加到16,663人；南罗得西亚则从1901年的11,000人，1926年增加到35,000人以上；[33]而在阿尔及利亚从1876年的344,000人增加到1936年的946,000人。在东非、中非和北非的许多地方，移民的存在之所以使非洲人怀有敌意，是由于欧洲人占有了绝大部分肥田沃土，而亚洲人则垄断了零售业和批发业。西非的情况也是这样。亚洲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印度人）的人数从1897年的仅仅28人，到1900年增为276人，1909年为1910人，1929年为3000人，1935年达6000人，而且还排挤走了他们的非洲竞争者。到1935年，这一欧洲

---

[31] J. 艾利夫(Iliffe)，1979年，第273-274页。

[32] F. 威尔逊（Wilson），见M. 威尔逊和L. 汤普森（Thompson）所编书，1971年，第132页。

[33] 见本书第16章。

移民与亚洲移民问题对非洲来讲已达到严重的比例失调，至今这个问题仍未能完全解决。

更何况，虽然像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殖民主义确实引进了某些社会服务设施，但必须强调的是，不仅这些设施总的说来并不充足，在各个殖民地分布也不均衡，而且主要是为少数白人移民和政府官员服务的，因而集中在城市。罗德尼曾指出：本世纪30年代尼日利亚有12所医院为在该国的4000名欧洲人服务，而为4000万非洲人开设的只有52所。[34] 1920年在坦噶尼喀达累斯萨拉姆欧洲人医院的病床与居民人口间的比例约为1比10，而非洲人医院的比例则约为1比400-500。[35]

在教育方面，殖民主义时期所提供的设施总的说来是不完备的，分布不均衡而且方向不对头，因而非洲人从中不能得到预期的好处。在殖民统治时期建立了五种类型的教育设施：小学、中学、师范、技校与大学。但是，英属西非许多小学是在1860年建立的，却直到1876年才由卫斯理教会的传教士在黄金海岸及尼日利亚分别建立了当地最早的两所中学，姆范齐平中学与循道宗中学，而英国殖民当局则直到1927年才在黄金海岸建立了第一所中学（阿奇莫塔学院）。正如前文所指出：在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到1940年只为利比亚人办了3所中学。两所在的黎波里，一所在班加西。非洲大部分地区有技校和大专院校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有意思的是每个地方只办一所大学：黄金海岸在1947年，尼日利亚在1948年，乌干达在1950年，塞内加尔和马达加斯加在1950年，索尔兹伯里在1953年，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在1954年，伊利莎白维尔在1956年。换句话说，大学与技校教育是直到殖民统治临近结束时才引进到非洲的。 800

再则，无论在什么地方和对什么层次提供的设施都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也分布不均。甚至劳埃德也承认：直至本世纪30年代中期，“所有地方的政府的开支都是很低的。尼日利亚和法属领地只占总岁收的4%，加纳占7%”。[36] 在各殖民地，学校和教育机构分布也不合理。绝大多数高于小学的机构都设在主要城市中心，有些国家大多数中学集中在一个城市内。例如，在黄金海岸约有80%的中学设在海岸角。1920年乌干达有328所小学设在布干达，西部省、东部省分别为34所、24所，而北部省几乎等于零。[37] 教育设施之所以如此不足，又如此不均衡，原因在于殖民国家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教育事业而发展教育，也不是为非洲人而发展教育，用一位非洲学者的话说，只是“为了培养对殖民制度更有用的非洲人”。[38]

除了总数不足，分布不均外，所有这些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都是由殖民统治者决定的，即使不是照搬宗主国的经验，也至少是严密地以此为范本，因而对非洲大陆毫无用处。再也没有人比1919至1927年任黄金海岸总督的戈登·古吉斯伯格更为权威的了，他在1920年作证说：“过去教育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非洲人教育成了欧洲人，而不是让他们仍然成为非洲人。这是完全错误的，政府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将来我们教育的目的在 801

---

[34] W. 罗德尼，1972年，第223页。
[35] D. E. 弗格森（Ferguson），见M. H. Y. 卡尼基（Kaniki）所编书，1980年，第326页。
[36] P. C. 劳埃德，1972年，第79页。
[37] T. B. 卡布韦格耶雷（Kabwegyere），1974年，第179页。
[38] 同上，第110页。

于使非洲人仍然成为非洲人，并关心自己的国家。”[39]

但是，虽然古吉斯伯格办了阿奇莫塔学院来实现上述允诺，却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因为该国的教育仍然控制在基督教传教士的手中，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能阅读英文或本地语圣经以及能担任教师与牧师的人。

这种不充分、不均衡并有方向性错误的教育对非洲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几乎是永久性的。首先，它给非洲留下了巨大的文盲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其次，它所培养的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总的说来是一种疏远了非洲的人物。这类精英崇拜欧洲的文化与文明而看不起非洲文化。他们在食品、饮料、穿着、音乐、舞蹈甚至娱乐方面都有了新的鉴赏力。加纳激进的学者与民族主义者科比纳·塞基伊在他所著《糊涂人》一剧中曾对这类精英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因此，在这类精英与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另外一种至今未能消除的鸿沟。此外，虽然随着教育设施的增加与大学的兴办，这类精英的人数在本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之间有了增长，但是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他们人数仍然是极少的。然而，由于社会精英包括了最富有的人，而无论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还是以后的年代里，他们都占有最高的职务。他们掌握了与他们的人数极其不成比例的权力与影响。以他们为一方以及传统上层人士为另一方的在殖民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紧张关系，此后从未真正痊愈。

而且，用自然的、科学的术语来解释死亡、下雨与疾病等现象的结果，从根本上打击了非洲人的宗教信仰，约束力和禁忌，从而动摇了非洲社会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到处笼罩着前途未卜、希望落空和不安全感——这是奇努阿·阿契贝在他的小说《土崩瓦解》中卓越地把握住的一种气氛。这种不安全与希望落空的感觉，经常由于一连串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本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以及战后，尤其是在城市里，这种气氛又导致犯罪、离婚、少年犯罪与暴力的频繁发生。正如我们在前文已论及过的，千年至福论、埃塞俄比亚教会或者信仰诸说混合论教会所领导的宗教性起义，其部分起因也可以归之于这种气氛。

忽视技术性、工业性教育而强调文科教育和办事员的训练，以及随之而来的热衷于白领工作的结果，还在受教育的人们中间造成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对体力劳动与农业劳动的轻视。况且，教育设施分布不平均又使各殖民地内的现代化不能同步进行，这又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部族群体与地区间的差别与紧张关系。这种状况在许多地区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是有些非洲独立国家发生某些内战与敌对的根源。对高等教育以及技术训练的忽视，也促使一些有钱人把子女送到宗主国和美国去。正是这批人，部分是由于他们形形色色遭受种族歧视的经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对殖民制度的罪恶实质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他们回国后成为这一制度最尖刻的批评家，并成为反殖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将在本书下卷加以阐明。

尽管通过教育体系在促进通用语方面有所得益，但由此却阻碍了某些当地语言发展成国语或通用语的可能性，从而带来了令人遗憾的后果。特维语、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

[39] 转引自R.阿多-费宁，1980年。

完全有条件很容易地分别发展为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以及英属三个东非殖民地的国语。事实上，正如T.B.卡布韦格耶雷所指出的：英属东非的殖民官员们曾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试图把斯瓦希里语发展成通用语，但遭到英国殖民部的否决，反对的理由如下：

……发展通用语对于当前利益很少有什么关系。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树立持久的价值观念，从而实现一种渗透，这种渗透不管怎样迟缓但却牢固地与国家同样长远久存。从这一标准看，无论是斯瓦希里语、干达语或其他土语都是不可取的。[40]

这一建议进一步指出只应该承认英语"是未来不可避免的通用语。这一事实应该毫不迟疑地被纳入总的政策和教育政策"。其他殖民国家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用土语作通用语的可能性。在殖民国家离去以后，有谁还能被相信是客观实行语言政策的呢，又有谁能具有同样的权力来强制推行语言政策呢？而且从独立以来，由于许多非洲国家中部族群体间与地区间互相对立的情绪不幸地高涨与加剧，确定一种当地通用语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难怪迄今只有极少几个非洲国家政府能触及这一问题。

殖民主义另一个极其令人遗憾的社会影响是它造成非洲妇女地位的下降。这是一个新课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无疑地妇女被禁止参加殖民主义所引进或强化的大多数活动，诸如西方教育，非洲某些地区的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法律、医学、采矿等许多专业和就业机会等等。部分由于上述原因，她们在新的殖民地政治机构中没有任何地位。即使在母系社会中，部分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部分是由于强调个人成就的新概念，有些家庭开始向父系体制转化。[41] 正如艾利夫所指出的：殖民世界确实是男人的世界，它并不鼓励妇女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803

何况，由于殖民主义的结果，非洲人本身遭到公开的或隐蔽的轻视、屈辱与歧视。确实就像A. E. 阿菲格博所论证的（第19章）：殖民主义的社会影响之一"就是非洲人地位的普遍降低"。阿里·马兹鲁伊在他在里思的讲学中也强调了奴隶贸易、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这三重罪恶所强加于非洲人身上的这一屈辱的遗产。他说："非洲人不该是最受残酷虐待的人民，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近代史上最受屈辱的人"。[42] 因此，虽然像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羡慕欧洲文化，他们放弃自己的方式而与之同化，但他们永远不能被他们的欧洲同行平等相待。他们被排除在欧洲人社会之外，不让他们居住在城市中欧洲人居住的地区。这种地区在森班内·乌斯曼的小说《上帝的木块》中被称作"梵蒂冈"。[43]

随着殖民统治的发展，这种种族歧视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在当时流行的虚伪的种族理论与所谓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支持下变本加厉，以至在南非不人道的种族隔离的伪哲学之下发展到了顶峰。这一切引起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强烈不满与仇恨。因此，他们成为第一批对殖民制度的罪恶、剥削及歧视等本质产生了强烈的意识，并不断怀疑其继续存在的道义与合法基础的人是毫不足奇的。也正是这一个由殖民者与传教士一手培养出

---

[40] 转引自T. B. 卡布韦格耶雷，1974年，第218页。
[41] J. 艾利夫，1979年，第300页。
[42] A. A. 马兹鲁伊，1980年，第23-45页。
[43] S. 乌斯曼（Ousmane），1962年，第162页。

来的阶级，起而领导推翻殖民制度的运动。一些历史学家，如M. H. Y. 卡尼基，得出这样的结论："殖民主义……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而罗宾·莫姆则坚持："在大英帝国的墓碑上"（最公开实行种族歧视的地方）"可以写上'死于势利'四字"。[44] 两个结论都是无懈可击的。种族歧视又在某些非洲人身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阿非格博把这种自卑感相当简洁地概括为"一种对自己、对将来失去信心的倾向——简言之，思想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以致有时赞成不加批判地模仿欧洲列强（甚至可以说对之卑躬屈膝）。"（第19章）在独立20年后这种自卑感仍未全部消失。

殖民主义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更加糟糕。正如1959年3至4月在罗马召开的第二届黑人作家与艺术家代表大会所声称的："殖民主义罪恶中危害性最大的就是在西方被长期理所当然地接受的非洲人是没有文化的人这种概念。"[45] 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奇。正如P. 柯廷和其他一些人早已指出过的，"欧洲人进入非洲时，正是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本身种族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候"。[46]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1900至1945年进入非洲的欧洲人：传教士、商人、行政官员、移民、工程师和矿工之类，一般说来都受到这种潮流的感染，因此对非洲的一切，非洲音乐、艺术、舞蹈、名字、宗教、婚姻、继承制度等等都持谴责态度。一个非洲人如果被接纳入一个教会，他不仅要接受洗礼，而且要改变他的名字和放弃一切传统的习俗。在某些地区甚至禁止或至少不鼓励穿非洲式服装。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如果坚持穿非洲服装就会被指责为"变成土著"了。因此，在整个殖民统治阶段，非洲的艺术、音乐、舞蹈甚至历史不仅全部遭到忽视，甚至绝不鼓励或被否定。正是在这些日子里，A.P.牛顿教授能这样写："在欧洲人来到之前，非洲实际上没有历史……（因为）只有当人们能够书写时历史才能开始"，[47] 而雷金纳德·库普兰爵士在5年后还持这样的观点：直到19世纪，

> 非洲人的主体，即居住在撒哈拉与林波波河之间热带家园的尼格罗人……还没有历史。在无法统计的许多世纪里，他们一直处于野蛮状态，这几乎看来是天意……。因此，他们处于停滞状态，既未前进，也未后退。世界上除了南美某些瘴气弥漫的沼泽或太平洋中一些无主的岛屿外，没有任何地方人类生活像这里那样停滞不前的。非洲的心脏几乎很少跳动。[48]

这些观点并非天意，而是出自这些充满沙文主义思想的欧洲历史学家的丰富的想象力。非洲的心脏一直在跳动，只是欧洲人被本身的偏见、先入之见、傲慢和沙文主义所震聋听不见罢了。

从上述分析，也能清楚地看到，持下列观点的学者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即他们认为

[44] M. H. Y. 卡尼基，1980 a，见M. H. Y. 卡尼基所编书，1980年，等10页；R. F. R. 莫姆（Maugham），1961年，第84页。

[45] 阿农（Anon），1959年，第3页。

[46] P. 柯廷（Curtin），S. 菲尔曼（Feierman），L. 汤普森，J. 范西纳（Vansina），1978年，第484年。

[47] A. P. 牛顿（Newton），1923年，第267页。

[48] R. 库普兰（Coupland），1928年，第3页。

殖民主义对非洲纯粹是一场灾难，除了不发达与落后外，它们没有带来任何东西。而那些殖民主义的辩护者同样是言过其实。譬如甘恩、杜伊格南与劳埃德把殖民主义当作是对非洲的十足的祝福，或者像佩勒姆与菲尔德豪斯那样，把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看成是祸福相当。本章作者从更为确切的判断得出的意见是：殖民主义并非没有为非洲做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事，它确实做过。但是欧洲人通过采矿公司、贸易商行、银行、轮船公司、种植园和特许公司确实从非洲攫取了巨额利润。况且，政府把来自殖民地的大量外汇储备扣留在宗主国，这必然为宗主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当一笔资金。最后，宗主国的工业从来自殖民地的廉价原料中获得好处，也从向它们出口工业制成品中得到利润。把这一切与非洲的土地所有者、从事农业的农民以及矿工们之所得相对比，再考虑不管宗主国提供了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其费用仍然都由殖民地本身支付，人们不能不对殖民主义强加于非洲人的不公平交易表示惊讶。此外，不论殖民主义在非洲为非洲人干了些什么，如果考虑到当时它在非洲所获得的机会、资源、权力与影响，它能够而且应该干远比这些更多的事。甚至连劳埃德也承认：“如果工业国把落后地区的发展看作首要任务，可能它们所能做的会远不止于此”。[49] 正是由于殖民统治者不仅没有把非洲人的发展看作他们的首要任务，而且根本看不到这有什么优先之必要，因而他们才受到人们的谴责。正是由于上述这两个理由，殖民统治时期将作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阶段记载在历史之中，这是一个非洲的资源被无情掠夺的时代，是一个使非洲人民遭受贫困化与屈辱的时代。

殖民主义对非洲具有何种意义

由此可引伸出本章下笔伊始就提到过的第二个问题，即殖民主义对非洲具有何种真实意义。它是否割断了非洲的历史，或者仅仅是重要性有限、并不影响非洲发展进程的一个插曲？对于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答案。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殖民主义 806 尽管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但对非洲意义重大，给非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这种看法的学者人数相当多，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出于不同理由的发展论者及反发展论者。例如R.奥利弗和N.阿特莫尔就强调说：“用历史的时间观念来衡量，殖民统治时期仅仅是一个时间短暂的插曲，但是这个插曲急剧地改变了非洲历史的方向和势头”。[50] 甘恩和杜伊格南也把殖民时代当作是“对非洲的未来起最关键性作用的”时期。[51] 马克思主义者与不发达理论的学者所持答案在罗德尼题为《欧洲如何使非洲成为不发达的》一书中作了精辟的概括。另一方面，也有其他一些人把殖民主义的影响看作是肤浅的，认为殖民主义并没有使非洲的历史因此而被割断。J.F.A.阿贾伊在一系列作品中[52] 始终坚持：

---

[49] P.C.劳埃德，1972年，第80页。

[50] R.奥利弗（Oliver）和A.阿特莫尔（Atmore），1972年，第275页。

[51] L.H.甘恩和P.杜伊格南所编书“序言”，1969年，第23页。

[52] J.F.A.阿贾伊，见L.H.甘恩和P.杜伊格南所编书，1969年；M.克劳德和J.F.A.阿贾伊，见M.克劳德和J.F.A.阿贾伊所编书，1974年；J.F.A.阿贾伊，见T.O.兰杰（Ranger）所编书，1968c。

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被夸大了，殖民主义在漫长、多事的历史中"仅代表一个插曲"，并没有使非洲历史的延续性中断，非洲人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其程度可使非洲人继续保持能动精神，欧洲人要使非洲完全脱离自己历史轨道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霍普金斯也坚持："殖民时代已不再被认为是非洲历史上的唯一实体，有充分理由认为，殖民统治对经济的影响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引人注目，也没有那样普遍"。他坚持认为：殖民主义并"不是在突然打乱传统的低水平平衡状态基础上从落后中创造现代化的"而"新统治者的主要作用在于给业已进行着的经济发展进程以推进"。[53]

本章作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确实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因为殖民主义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问题上是不一样的。在经济方面殖民主义的影响总的说来无疑是决定性的和807 根本性的，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是这样。实际上在非洲所有地区到殖民阶段末期，货币经济已不再是偶然现象而已成为普遍规律。即使在农村，人们的地位不仅以出身、妻子和子女的多寡来衡量，而且也以现金和每季度出产的经济作物的数量来衡量。再则，随着经济作物的推广，土地获得了殖民统治前所未曾有过的价值。同时个人的努力与成就被看作远远超过传统秩序的村社制。非洲经济也前所未有地、日益紧密地与总的世界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其影响可能是永远无法消除的。不幸的是，这种结合是在对非洲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与被剥削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在独立 20 年后这一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就是现在被称为的新殖民主义。

即使承认上述这一切，难道佩勒姆认为殖民主义的主要影响是使非洲得以与 20 世纪的欧洲相抗衡的观点是正确的吗？[54] 或者我们应在这里赞成霍普金斯的观点？我们有一切理由反对佩勒姆的观点而赞成霍普金斯的观点。应该强调的是：除了殖民主义引进基础设施这方面所起的变化，如公路、铁路、电话和电报之外，所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变化如经济作物与货币经济的推广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村社制生活的瓦解，非洲经济被并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城市化等等在殖民时代以前都早已在进行。正如考德威尔和阿菲格博正确地加以强调的（第 18、19 两章），也正如霍普金斯所坚决主张的：殖民主义所做的只是大大加速这种变化的进程，因而并不是使非洲开始与欧洲相抗衡，而是加速了这种抗衡，使之更为尖锐而已。不过，殖民主义不仅是加速了变化的过程，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尽量不使与此密切相关的非洲人自己起到有意义的作用和从中得到好处。再则，变化是如此地迅速与深入，它不仅对非洲人的影响是真正有害的，而且其结果是把非洲经济纳入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被剥削的轨道，使它既不能够也迄今并未脱离这一轨道。这一点正是我与霍普金斯有分歧的地方。我认为，应该从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与 20 世纪欧洲相抗衡来观察殖民主义在经济领域内的全面影响。

殖民主义在政治领域内的影响是带根本性的，而且注定是持久的，也是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觉察到的。首先，正如前文所已阐述的，非洲各个独立国家的地理形状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根据非洲统一组织所通过的国家的边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种地

[53] A. G. 霍普金斯，1973 年，第 167、206、235 页。

[54] M. 佩勒姆，1961 年。

理形状看来不会改变。其次，非洲各国虽然重新获得独立，但政治权力与权威的来源无疑已发生了根本性和永久性的改变。在殖民统治以前，权力是由传统上层人士：国王，女王，家族、氏族与宗教的首领们行使的。但是当殖民统治者被迫把独立与主权归还非洲人时，像在下一卷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不是把它还给传统的上层人士，而是给予殖民体系一手培养出来的新的社会精英或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成员。这种状况永远不会逆 **808** 转。如果有可能变的话，非洲传统的王室体制，以几内亚为例，被完全废除的可能性比保留下来的可能性要大，更谈不到使他们复辟了。再次，是殖民主义促成了非洲的民族主义，它是对殖民体制感到愤怒、怨恨、痛苦、失望与疏远的产物。第四，军队是在殖民统治结束后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殖民遗产之一，这一建制看来不会被取消。而且我们在下一卷将会看到，它已经改变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历史进程，而且似乎它还没有完成它的政治使命。用芬纳的话说，[55]"骑在马匹上的人"将在很长时期内和我们共处，而且不断地唤起我们对殖民统治阶段的回忆，好像我们还需要有人提醒似的。最后，看来司法与政治机构也将继续保留，如法庭、议会、地区与行政区的专员等等，尽管已作了一些改进与修正，将来也还会继续这样做。很可能殖民主义在政治领域内的影响比在经济领域内确实更带有根本性，而且在许多方而已被证明后果更为深远。

另一方面，在文化与社会领域内，殖民主义的影响相对说来不那么深入，也不那么持久。即使是殖民主义全盛时期在文化方面所推行的变化、所实行的种族歧视或所宣传的对非洲文化的非难，都主要限于沿海地区和城市中心，从未渗入农村地区，那里的生活仍然与以前一样欢快。非洲舞蹈、艺术、音乐以及传统的宗教体系仍保留着自己的地位。即使非洲人对殖民主义文化有所借鉴和适应改造，它不仅是有选择的，而且用M. J. 赫斯科维茨的话说，是"添加剂"面不是必不可少的"代用品"。[56]因此，在农村地区，甚至城市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即在原有基础上加上了新的信仰、新的神灵、新的用品、新的工具与新的对象。在这些地区，许多基督徒确实仍旧保留了他们对传统神灵的信仰。确实，在宗教领域内，说起来不过是把欧洲宗教非洲化了，而不是反之。这从宗教仪式、赞美诗、音乐、甚至从信仰混合和千年至福教会的某些教旨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城市中心，文化方而已失去了的阵地实际已被收回。今天，非洲的艺术、音乐与舞蹈，不仅为各式各样的教育机构所讲授，而且在非洲还是一派兴旺景象，并得到了欧洲的承认。因而，就文化领域而论，殖民主义肯定仅仅是一个插曲，它的影响是肤浅的，是极其短暂的。

最后，在社会领域内，殖民主义所具有的意义是混杂的。一方面，外来的或者叫殖 **809** 民地的通用语，即使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也会继续使用很长一段时间。其次，殖民主义所促成的"不是按财产、威望等非洲标准，而是按教育与文明等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57]新阶级，注定要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正在日趋复杂化。独立以来已经增加了两个新的

[55] S. E. 芬纳（Finer），1962年。
[56] M. J. 赫斯科维茨，1962年，第379页。
[57] C. D. 穆尔（Moore）和A. 邓巴(Dunbar)，1969年，第125页。

阶层。第一个阶层是政治精英，是由在非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政党的领导人所组成。现在这些人已成为总理、总统、部长、大使等等。另一个是军事精英，由各独立国家军队的现役军官或以前的军官组成。这些精英阶层的成员，在服装、生活方式、爱好兴趣和地位上，与农村地区的人有着明显的区别。现在，如果这些精英阶层在非洲人口中已构成相当比例的话，人们会把他们的组成也当作是殖民主义所推行的另一种关键性的和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到殖民时代末期，城市居民或精英阶层在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最多大约20%。其余的人仍然住在农村，绝大多数是文盲，并且仍保持着传统的信仰、价值观与生活准则。确实，殖民主义所推行的文明化或社会化，基本上是一种城市现象，实际并没有影响农村人口。既然后者在每个非洲国家里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并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说：殖民主义在这方面的影响，尽管很有意思，但是极其有限。

总之，虽然殖民主义无疑在这个大陆漫长历史的无数章节中，仅仅只有一章；在非洲人民多种多样、丰富多采的经历中，仅仅是一个插曲和一个阶段；其存在时间在非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超过80年。但是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甚至社会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插曲。它是在非洲过去及今后的发展之间一座明显的分水岭。因而非洲的历史进程已经并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受殖民统治的影响，而且使它不得不改变如果没有殖民统治这段插曲而应该发展的方向。因此，非洲领导人今天在选择道路时最可靠的办法不是把殖民主义一笔勾销，而是了解其影响，设法补救其已经形成的缺陷，并解脱其失败所造成的后果。

（屠尔康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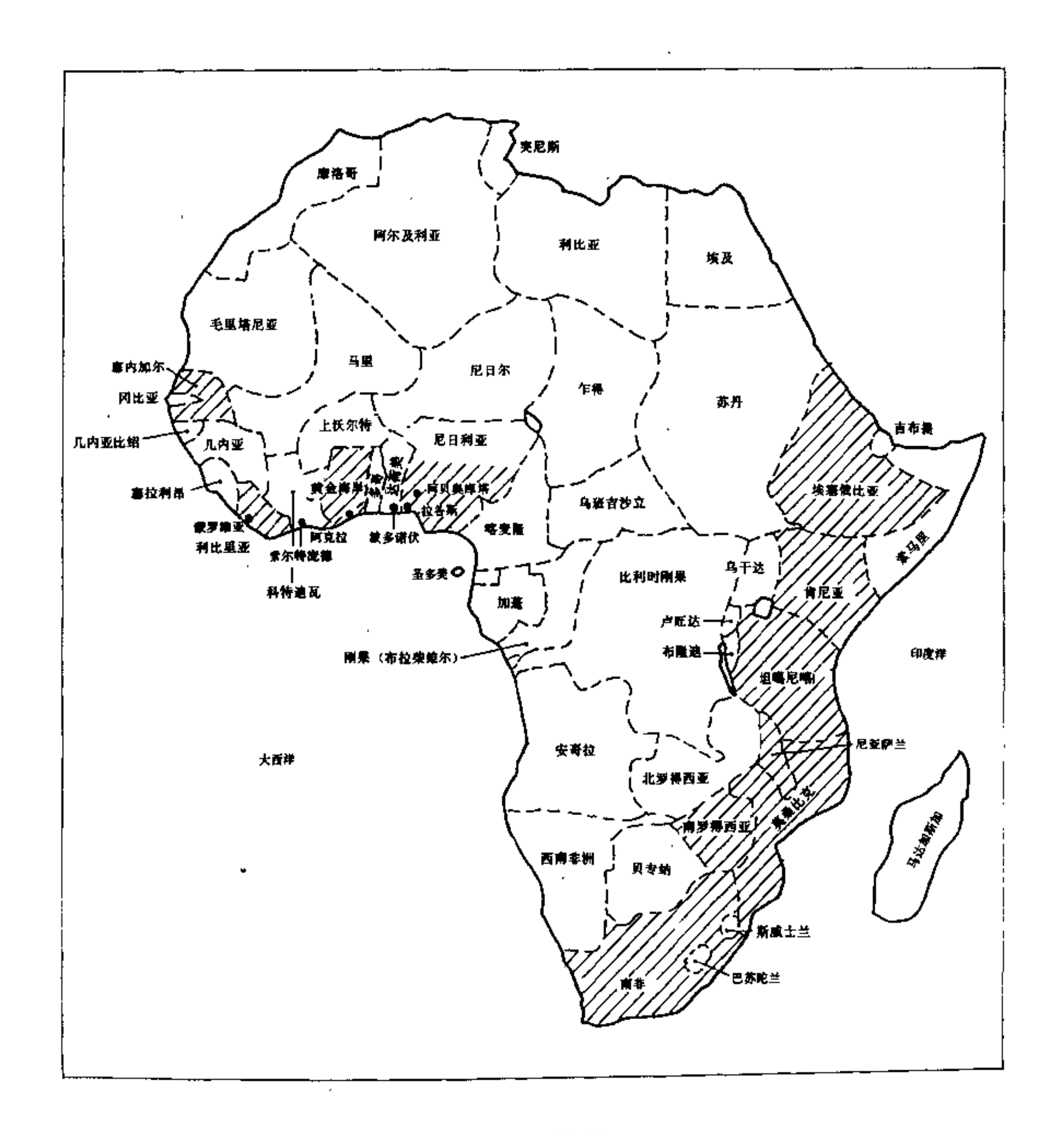

突尼斯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
埃及
毛里塔尼亚
马里
尼日尔
乍得
苏丹
塞内加尔
冈比亚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
上沃尔特
尼日利亚
吉布提
塞拉利昂
黄金海岸
阿贝奥库塔
埃塞俄比亚
蒙罗维亚
拉各斯
乌班吉沙立
利比里亚
阿克拉
波多诺伏
喀麦隆
索马里
索尔特庞德
科特迪瓦
圣多美
比利时刚果
乌干达
肯尼亚
加蓬
卢旺达
布隆迪
印度洋
刚果（布拉柴维尔）
坦噶尼喀
尼亚萨兰
大西洋
安哥拉
北罗得西亚
莫桑比克
南罗得西亚
马达加斯加
西南非洲
贝专纳
斯威士兰
巴苏陀兰
南非

插图 30.1 非洲概图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所述日期指的是参加该委员会的日期

J. F. A. 阿贾伊 (J. F. A. Ajayi) 教授
(尼日利亚)，自 1971 年起
第六卷编辑

F. A. 阿尔布凯克·莫朗 (F.A.Albuquerque Mourao) 先生
(巴西)，自 1975 年起

A. A. 博亨 (A. A. Boahen) 教授
(加纳)，自 1971 年起
第七卷编辑

布布.阿马 (Boubou Hama) 阁下
(尼日尔)，1971-1978 年 (已辞职)

M. 布尔 (M.Bull) 阁下
(赞比亚)，自 1971 年起

D. 查奈瓦 (D. Chanaiwa) 教授
(津巴布韦)，自 1975 年起

P. D. 柯廷 (P. D. Curtin) 教授
(美国)，自 1975 年起

J. 德维斯 (J. Devisse) 教授
(法国)，自 1971 年起

M. 迪富伊拉 (M. Difuila) 教授
(安哥拉)，自 1978 年起

H. 贾伊特 (H. Djait) 教授
(突尼斯)，自 1975 年起

谢赫·安塔·迪奥普 (Cheikh Anta Diop) 教授
(塞内加尔)，自 1971 年起

J. D. 费奇 (J. D. Fage) 教授
(联合王国)，1971-1981 年 (已辞职)

M. 法西 (M. El Fasi) 阁下
(摩洛哥)，自 1971 年起
第三卷编辑

J. L. 佛朗哥 (J. L. Franco) 教授
(古巴)，自 1971 年起

已故M. H. I. 加拉勒 (The late M. H. I. Galaal) 先生
(索马里)，1971-1981 年；1981 年逝世

V. L. 格罗塔内利 (V. L. Grottanelli) 博士，教授
(意大利)，自 1971 年起

E. 哈贝兰德（E. Haberland）教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 1971 年起

A. 哈普特（Aklilu Habte）博士
（埃塞俄比亚），自 1971 年起

阿马杜·哈姆帕特·巴（Amadou Hampate Ba）阁下
（马里），1971-1978 年（已辞职）

I. S. 哈雷尔（I. S. El-Hareir）博士
（利比亚），自 1978 年起

I. 赫尔贝克（I. Hrbek）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自 1971 年起
第三卷助理编辑

A. 琼斯（A.Jones）博士
（利比里亚），自 1971 年起

已故阿贝·亚历克西·卡加梅（The late Abbé Alexis Kagame）先生
（卢旺达），1971-1981 年；1981 年逝世

I. M. 基曼博（I. M. Kimambo）教授
（坦桑尼亚），自 1971 年起

J. 基-泽博（J. Ki-Zerbo）教授
（上沃尔特），自 1971 年起
第一卷编辑

M. D. 拉亚（M. D. Laya）先生
（尼日尔），自 1979 年起

A. 列特涅夫（A. Letnev）博士
（苏联），自 1971 年起

G. 莫赫塔尔（G. Mokhtar）博士
（埃及），自 1971 年起
第二卷编辑

P. 马蒂布瓦（P.Mutibwa）教授
（乌干达），自 1975 年起

D. T. 尼昂（D. T. Niane）教授
（塞内加尔），自 1971 年起
第四卷编辑

L. D. 恩康科（L. D. Ngcongco）教授
（博茨瓦纳），自 1971 年起

T. 奥邦加（T. Obenga）教授
（刚果人民共和国），自 1975 年起

B. A. 奥戈特（B. A. Ogot）教授
（肯尼亚），自 1971 年起
第五卷编辑

C. 拉沃雅纳哈里（C. Ravoajanahary）教授
（马达加斯加），自 1971 年起

已故W. 罗德尼（The late W.Rodney）教授
（圭亚那），1979-1980 年；1980 年逝世

已故M. 希贝卡（The late M. Shibeika）教授
（苏丹），1971-1980 年；1980 年逝世

Y. A. 塔利布（Y. A. Talib）教授
（新加坡），自 1975 年起

已故A. 特谢拉·达莫塔（The late A. Teixeira da Mota）教授
（葡萄牙），1978-1982 年；1982 年逝世

T. 齐邦古（T. Tshibangu）阁下
（扎伊尔），自1971年起

J. 范西纳（J. Vansina）教授
（比利时），自1971年起

已故E. 威廉斯（The late E.Williams）博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6-1978年；1978年辞职；1980年逝世

A. A. 马兹鲁伊（A. A. Mazrui）教授
（肯尼亚）
第八卷编辑，非委员会成员

C. 旺济（C. Wondji）教授
（科特迪瓦）
第八卷助理编辑，非委员会成员

国际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M. 格莱莱（M. Glélé）
教科文组织文化研究处，法国巴黎米奥利斯街（1，rue Miollis）75015



作 者 简 历

第 一 章 A. 阿杜·博亨（A. Adu Boahen，加纳）；西非殖民史专家；关于非洲历史的许多出版物和文章的作者；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教授。

第 二 章 G. N. 乌佐伊圭（G. N. Uzoigwe，尼日利亚）；东非史、尤其是乌干达前布尼奥罗王国史的专家；有关非洲史的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三 章 T. O. 兰杰（T. O. Ranger，英国）；非洲抵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专家；这一领域许多著作和文章的作者与主编；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前历史学教授；曼彻斯特大学近代史教授。

第 四 章 H. A. 易卜拉欣（H. A. Ibrahim，苏丹）；19和20世纪埃及与苏丹史专家；发表过若干研究报告；喀土穆大学历史学讲师。

阿拔斯·I. 阿里（Abbas I. Ali，苏丹）；19世纪苏丹与东非史专家；这一领域一些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喀土穆大学历史系前主任；已故。

第 五 章 A. 拉鲁伊（A. Laroui，摩洛哥）；马格里布史专家；19世纪北非史一些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摩洛哥，拉巴特大学近代和现代史教授。

第 六 章 姆巴耶·盖耶（M. Gueye，塞内加尔）；19和20世纪西非史专家；关于奴隶贸易和法国殖民活动若干著作的作者；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语文系历史学讲师。

A. 阿杜·博亨

第 七 章 H. A. 姆万齐（H. A. Mwanzi，肯尼亚）；东非史专家；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内容主要有关肯尼亚的基普西基人）；内罗毕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

第 八 章 A. 伊萨克曼（A. Isaacman，美国）；非洲史专家；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教授。

J. 范西纳（J. Vansina，比利时）；非洲史专家；有关非洲殖民化以前历史的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九 章 D. 查奈瓦（D. Chanaiwa，津巴布韦）；18和19世纪南部非洲史专家；有关南部非洲历史的许多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北里奇，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前历史学教授；哈拉雷，就业及就业开发部主任。

第 十 章 M.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M.Esoavelomandroso，马达加斯加）；18 和 19 世纪马达加斯加史专家；塔那那利佛大学语文系历史学教授。

第十一章 M. B. 艾克潘（M. B. Akpan，尼日利亚）；西非经济史专家；有关西非史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尼日利亚，卡拉巴尔大学高级讲师。

A. B. 琼斯（A. B. Jones，利比里亚）；19 世纪西非史学家及专家；前利比里亚驻联合国大使和常任代表。

R. 潘克赫斯特（R. Pankhurst，英国）；埃塞俄比亚史专家；许多有关埃塞俄比亚历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埃塞俄比亚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所前所长。

第十二章 M.克劳德（M.Crowder，英国）；西非史专家；许多有关西非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曾在好几个大学任教授；《今日历史》编辑；现任博茨瓦纳大学客座教授。

第十三章 R. F. 贝茨（R. F. Betts，美国）；19 和 20 世纪欧洲人对非洲推行殖民主义问题的专家；若干有关非洲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肯塔基大学历史学教授。

A. I. 阿西瓦朱（A. I. Asiwaju，尼日利亚）；西非史专家；有关该地区的各种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拉各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十四章 W. 罗德尼（W. Rodney，圭亚那）；西非经济史专家；有关西非奴隶贸易的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及西印度前历史学教授；已故。

第十五章 C.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C.Coquery-Vidrovitch，法国）；非洲社会经济史专家；发表过若干有关该问题的著作和文章；现任巴黎第七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十六章 M. H. Y. 卡尼基（M. H. Y. Kaniki，坦桑尼亚）；西非经济史专家；发表过若干关于该问题的著作和文章；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前历史学副教授；现任卢萨卡，赞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十七章 A. 卡萨卜（A.Kassab，突尼斯）；经济地理专家；发表过若干这一领域的研究报告；《突尼斯地理评论》主编。

A.A.阿卜杜萨拉姆（A.A.Abdussalam，利比亚）；利比亚经济史专家；有关这一问题若干著作的作者；利比亚，班加西，加里乌尼斯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F.S.阿布塞得拉（F.S.Abusedra，埃及）；经济史专家；利比亚，班加西，加里乌尼斯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第十八章 J. C. 考德威尔（J. C. Caldwell，澳大利亚）；人口学专家；有关赤道非洲人口问题若干著作的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人口学系人口学教授兼系主任。

第十九章　A. E. 阿非格博（A. E. Afigbo，尼日利亚）；西非史专家；有关尼日利亚历史的若干著作及科研文章的作者；尼日利亚大学（恩苏卡）非洲研究所前所长。

第二十章　K. 阿萨雷·奥博库（K. Asare Opoku，加纳）；非洲宗教问题专家；有关非洲宗教某些方面的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宗教及伦理学高级研究员。

第二十一章　W. 索因卡（W. Soyinka，尼日利亚）；非洲戏剧、文学和哲学专家；这些领域许多著作的作者；加纳利贡大学前教授，现任伊费大学戏剧学教授。

第二十二章　B. O. 奥洛隆提梅欣（B. O. Oloruntimehin，尼日利亚）；19世纪以来前法属西非问题专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该地区的著作和文章；伊费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二十三章　H. A. 易卜拉欣（H. A. Ibrahim）。

第二十四章　J. 伯奇（J.Berque，法国）；当代伊斯兰社会史专家；埃及与马格里布史若干著作的作者；前法兰西大学教授。

第二十五章　A. 阿杜. 博亨（A. Adu Boahen）

第二十六章　E. S. 阿蒂埃诺-奥迪安博（E. S. Atieno-Odhiambo，肯尼亚）；东非政治史专家；有关非洲东部及中部民族主义兴起的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

第二十七章　A. B. 戴维森（A. B. Davidson，苏联）；非洲史专家；发表过一系列有关非洲的著作；莫斯科，苏联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教授。

R. 佩利西埃（R.Pélissier，法国）；非洲历史上19和20世纪抵抗运动专家；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研究员。

A. 伊萨克曼（A.Issacman）。

第二十八章　M. B. 艾克潘（M. B. Akpan）、A. B. 琼斯（A. B. Jones）和R. 潘克赫斯特（R. Pankhurst）。

第二十九章　R. D. 罗尔斯顿（R.D.Ralston，美国）；19和20世纪非洲史专家；有关非洲与新大陆关系的若干文章的作者；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非裔美洲人研究部历史学助理教授。

F. A. 阿尔布凯克·莫朗（F. A. Alburquerque Mourão，巴西）；非洲史专家；有关非裔巴西人历史的若干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巴西，圣保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历史学教授及主任。

第三十章 A. 阿杜·博亨（A. Adu Boahen）。

助理编辑 Y. 夸尔滕（Y. Kwarteng，加纳）；新闻学与交流学专家，他的硕士论文题是：《1957年以来西非新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目录

本书出版者谨指出，尽管参考书目已力求准确无误，但由于本著作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错误在所难免。

Abbreviations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AA *African Affairs*, London, Royal African Society
AEH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Madison, Wisconsin
AESC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Paris
Africa *Africa*,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London
African Arts *African Ar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frican Studies Center
African Literature Today *African Literature Today*, London, Heinemann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M *Archives Marocaines*
Annuaire Médical et Pharmaceutique Colonial, Paris
AQ *African Quarterly*, New Delhi
BIFAN *Bulletin de l'Institut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Dakar
BSGL *Boletim da 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 Lisbon
BUP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BUPAH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in African History*,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ulletin des juridictions indigènes et du droit coutumier congolais
BWHO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CEA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Paris, Mouton
CHJ *Calabar Historical Journal*, University of Calabar
CJAS *Cann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Af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CSSH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ud History*, Cambridge, CUP
CU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ltura *Cultura*, Brasilia
EAJ *East Africa Journal*, 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 Cultural Affairs, Nairobi
EALB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Nairobi
EAPH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EDC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New York
EHA *Études d'Histoire Africaine*, Kinshasa
E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Encounter *Encounter*, London
EC *Études Congolaises*
EO *Ethiopia Observer*, Addis Ababa
ES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enève-Afrique, Geneva
GJ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GR *Geographical Review*,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HA *Horn of Africa*
Hadith *Hadith*, Nairobi
HJ *Historical Journal*, Cambridge, CUP
HMSO Her/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HU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AI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London
IFAN Institut Fondamental de l'Afrique Noire
IJA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IL *International Law*
IRCBM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Mémoires*, Brussels

IUP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JAH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CUP
JAS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frican Studies Center
JAf. S *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 (later *African Affairs*)
JCAHA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f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JD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JES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JHM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New York
JHSN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JMA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Cambridge, CUP
JNH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Washington DC
Journal Officiel de l'A.E.F., Brazzaville
JP *Journal of Politics*, Gainesville, Florida
JSAS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London, OUP
KHR *Kenya Historical Review*, Nairobi
Kongo-Oversee *Kongo-Oversee*
The Lancet *The Lancet*, London
Le Matériel Colonial, Paris
LSJ *Liberian Studies Journal*, Newark, Delawar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Marchés Coloniaux, Paris
MARSOM *Mémoires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Brussels
MBAB *Mitteilungen der Basler Afrika Bibliographien*, Basel
MMFQ *Mil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London
ML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UP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The Muslim World *The Muslim World*, Hartford, Connecticut
Nigeria Magazine *Nigeria Magazine*, Lagos
NJESS *Niger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ud Social Stndies*, Ibadan
NUP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du *Odu*, Ife, University of Ife Press
Omaly sy Anio *Omaly sy Anio*, Antananarivo
Optima *Optima*, Johannesburg
OU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 *Présence Africaine*, Paris
PAP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Practical Anthropology *Practical Anthropology*
PP *Past & Present*, Oxford
PS *Population Studies*, London
PUF 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çaises
PU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 *Revue Africaine, Journal des Travaux de la 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 Algiers
Research Review *Research Review*, 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RFHOM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aris
RIIA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RLJ *Rhodes-Livingstone Journal* (now *African Social Research*), Lusaka
RM *Revue Marocaine*,
R Med. *Revue de la Mediterranée*, Algiers
ROMM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editerranée*, Aix-en-Provence
RPC *Recherche Pedagogique et Culture*
RSEHA *Revue Sémitique d'Épigraphie et d'Histoire Ancienne*, Paris
RSSJ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London
SNR *Sudan Notes & Records*, Khartoum
SOA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SR *Sociological Review*, Manchester
SUP Staoford University Press
Tarikh *Tarikh*, Ibadan, Longman
THSG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 Legon
TJH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Nairobi
TRSTMH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tine and Hygiene*, London
Transition *Transition*, Kampala (later Accra)

Ufahamu *Ufahamu*, Journal of the African Activist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UJ *Uganda Journal*, Uganda Society, Kampala
UP University Press
West Africa *West Africa*, London
WUP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Yale Review *Yale Review*, New Haven
YUP Yale University Press

Bibliography

Abbâs, F. (1931) *Le jeune Algérien* (Paris: Éditions de la Jeune Parque).
Abbâs, F. (1962) *Le nuit coloniale* (Paris: Julliard).
'Abd al-Halim, M. O. (1975) 'Islam in Somalia, 1800–1920'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Abd al-Rahīm, M. (1969)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udan: a Study in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99–195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bdin, H. (1970)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in the Suda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bernethy, D. B. (1969) *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Popular Education: an African Case* (Stanford: SUP).
Abraham, W. E. (1964)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on Wilhelm Amo', *THSG*, VII, pp. 60–81.
Abubakar, S. (1980) 'The northern provinces under colonial rule' in O. Ikime (ed.) *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 pp. 447–81.
Abū Salīm, M. I. (1969) *Manshūrāt al-Mahdiyya* (Khartoum).
Abū Salīm, M. I. (1970) *Al-Haraka al-fikriyya fil Mahdiyya* (Khartoum).
Addo-Fening, R. (1975) 'The Asamankese dispute, 1919–1934', *MBAB*, XII, pp. 61–89.
Addo-Fening, R. (1980) 'Akyem Abuakwa, *c.* 1874–1943: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and colonial rule on a traditional stat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hana).
Adeleye, R. A. (1971) *Power and Diplomacy in Northern Nigeria, 1804–1906: the Sokoto Caliphate and its Enemies* (London: Longman).
Adewoye, O. (1977) *The Judicial System in Southern Nigeria, 1854–1954: Law and Justice in a Dependency* (London: Longman).
Adimola, A. B. (1954) 'The Lamogi rebellion 1911–12', *UJ*, XVIII, 2, pp. 166–77.
Afigbo, A. E. (1972) *The Warrant Chiefs: Indirect Rule in Southeastern Nigeria, 1891–1929* (London: Longman).
Afigbo, A. E. (1973) 'Patterns of Igbo resistance to British conquest', *Tàrikh*, IV, 3, pp. 14–23.
Afigbo, A. E. (1974)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onial rule, 1900–1918' in J. F.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pp. 424–83.
Ageron, C.-R. (1966) 'Enquête sur les origines de nationalisme algérien. L'Emir Khaled, petit-fils d'Abd El-Kader, fut-il le premier nationaliste algérien', *ROMM*, II, pp. 9–49.
Ageron, C.-R. (1978a) *France coloniale ou parti coloniale?* (Paris: PUF).
Ageron, C.-R. (1978b) *Politiques coloniales au Maghreb* (Paris: PUF).
Ageron, C.-R. (1979)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ne, 1830–1973* (Paris: PUF).
Ahmed, J. M. (1960)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Egyptian Nationalism* (London: OUP).
Ajayi, J. F. A. (n.d.) 'The impact of colonialism on Afro-Arab cultural relations in West Africa' (unpublished paper).
Ajayi J. F. A. (1965)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London: Longman).
Ajayi, J. F. A. (1968) 'The continuity of African institutions under colonialism' in T. O. Ranger (ed.) *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pp. 189–200.
Ajayi, J. F. A. (1969) 'Colonialism: an episode in African history'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Vol. I,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870–1914*, pp. 497–509.
Ajayi, J. F. A. and Crowder, M. (eds) (1974)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London: Longman).
Akpan, M. B. (1973a) 'Liberia and the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the background to the abortion of Garvey's scheme for African colonization', *JAH*, XIV, 1, pp. 105–27.
Akpan, M. B. (1973b) 'Black imperialism: Americo-Liberian rule over the African peoples of Liberia, 1841–1964', *CJAS*, VII, 2, pp. 217–36.
Akpan, M. B. (1975) 'The Liberi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overnment finances', *LSJ*, VI, 2, pp. 129–61.
Akpan, M. B. (1976) 'Liber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cramble for West Africa', *CHJ*, I, 2, pp. 61–75.

Akpan, M. B. (forthcoming) 'Native administration and Gola–Bandi resistance in north-western Liberia, 1905–19', *THSG*.
Al-Ashhāb, M. T. (1947) *Barqa al-'Arabiyya* (Cairo: Matba't al Hawwari).
Al-Barāwī, R. (1973) *Al-Sūmāl al-Jadīd* (Cairo).
Al-Ḥaddād, T. (1927) *Al-Ummal 'al Tunisiyin*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Al-Ḥaṣan, M. A. (1964) *Ta 'rikh Dārfūr al-Siyāsī* (Khartoum).
Al-Ḳaddāl, M. S. (1973) *Al-Mahdiyya wal Habasha* (Khartoum).
Al-Madanī, T. (1963) *Kitāb Al-Jazā'ir* (Blida).
Al-Masada, M. G. al-Dīn (1974) *Danshuwāi* (Cairo).
Al-Misurātī, A. (1964) *Sa'dūn al Batal* (Beirut).
Al-Murshidī, M. (1958) *Al-Thawra Al-'Urābiyya* (Cairo).
Al-Nāṣirī (1907) *Kitābal-Istiqqā* (tr. by E. Fumey in *AM*, X, p. 227).
Al-Rafī, A. (1966) *Al-Thawra al-'Urabiyya wal Iḥtilāl al-Ingilīzi* (Cairo).
Al-Rafī, A. (1969) *Fi Aqab Al-Thawra Al-Misriyya*, Vol. I (Cairo: 3rd edn).
Al-Sayyid, A. L. (1968) *Egypt and Cromer: a Study in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London: John Murray).
Al-Sūsī, M. (1961) *Al Ma'sul*, Vol. XX (Casablanca).
Al-Tillisi, K. (1973) *Mujam Ma'arik Al-j-Jihnd Filibiya* (Beirut: Dar al-Thaqafa, 2nd edn).
Al-Zawi, Al-T. A. (1973) *Jihad al-Abtal* (Beirut: Dar al-Fath, 3rd edn).
Albion, R. G. (1959) *Seaports South of the Sahara: the Achievement of an American Steamship Servic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Alegre, C. da C. (1916) *Versos Lisbon Livraria* (Ferin).
Allan, J. A., McLachland, K. S. and Penrose, E. T. (eds) (1973) *Libya,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Frank Casa).
Allan, W. (1965) *The African Husbaudman* (London: Oliver & Boyd).
Allan, W. N. and Smith, R. J. (1948) 'Irrigation in the Sudan' in J. D. Tothill (ed.) *Agriculture in the Sudan*, pp. 593–632.
Alldridge, T. J. (1910) *A Transformed Colony, Sierra Leone, as it was, and as it is, its Progress, Peoples, Native Customs and Undeveloped Wealth* (London: Seeley).
Aloisi, P. (1957) *Journal, 25 juillet 1932–14 juin 1936* (Paris: Plon).
Alves, H. L. (1976) *Bibliografia afro-brasileira; estudos sobre o negro* (São Paulo: Edições H).
Amin, S. (1970) *The Maghreb in the Modern World: Algeria, Tunisia, Morocco* (Harmondsworth: Penguin).
Amin, S. (1972)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e in Black Africa: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forms', *JMAS*, X, 4, pp. 503–24.
Amin, S.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nanaba, W. (1969)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n Nigeria* (London: C. Hurst).
Anderson, R. E. (1952) *Liberia: America's African Frien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Andrade, M. (1959) *Antologia da Poesia Negra de Expressão Portuguesa* (Paris: Pierre Jean Oswald).
Anene, J. C. (1970) *The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of Nigeria, 1885–1960: the Framework of an Emergent African Nation* (London: Longman).
Ani-Okokon, A. E. (1927) 'A West African in the US: some ref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Missionary Seer*, XXVIII, 6.
Anon. (1910a) 'Health and sanitation in Sierra Leone', *The Lancet*, 1 October 1910 (Vol. II), p. 1053.
Anon. (1910b) 'The Egyptian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The Lancet*, 29 October 1910 (Vol. II), p. 1298.
Anon. (1911) 'The Transvaal Mining Commission', *The Lancet*, 11 March 1911 (Vol. I), p. 688.
Anon. (1913) 'Notes from South Africa', *The Lancet*, 14 June 1913 (Vol. I), p. 1702.
Anon. (1959) 'The policy of our culture' [Editorial], *PA*, XXIV–XXV, pp. 3–5.
Anouma, R. P. (1973) 'L'impôt de capitation, le système des prestations et des corvées en Côte d'Ivoire de 1901–1930' (thèse de doctorat de 3e cycle: University of Aix-en-Provence).
Antonetti, G. G. (1926, 1927) articles in *Journal Officiel de l'A.E.F.*, I June 1926, 1 December 1927.
Anyane, S. L. (1963) *Ghana Agricultur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OUP).
Araedon, D. (1976) 'Architecture' in S. O. Biobaku (ed.) *The Living Culture of Nigeria*, pp. 38–44.
Arap Magut, P. K. (196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ndi Orkoiyot' in B. G. McIntosh (ed.) *Ngano: Studies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ast African History*, pp. 95–108.
Arap Ng'eny, S. K. (1970) 'Nandi resista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1893–1906', *Hadith*, II, pp. 104–26.

Armah, A. K. (1973) *Two Thousand Seasons* (Nairobi: EAPH; London: Heinemann 1979).
Arrighi, G. (196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hodesia* (The Hague: Mouton).
Arrighi, G. (1970) 'Labou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JDS*, VI, 3, pp. 197–234.
Asante, S. K. B. (1977) *Pan-African Protest: West Africa and the Italo-Ethiopian Crisis, 1939–1941* (London: Longman).
Ashe, R. P. (1894) *Chronicles of Ugand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Ashur, F.b. (1956) *Al-H'arakāt al-adabiya w'al-firkiya fī* (Tunis).
Asiwaju, A. I. (1976a) *Western Yorubaland under European Rule, 1889–194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alism* (London: Longman).
Asiwaju, A. I. (1976b) 'Migrations as revolt: the example of the Ivory Coast and the Upper Volta before 1945', *JAH*, XVII, 4, pp. 577–94.
Asiwaju, A. I. (1979) 'Control through coercion: a study of the indigénat regime in French West African administration, 1887–1946', *BIFAN*, (B) XLI, 1, pp. 35–71.
Assis, A. de, Jr (1917) *Relatório dos Acontecimentos da Dala Tando a Lucala* (Loanda).
Atanda, J. A. (1969) 'The Iseyin-Okeiho rising of 1916: an example of socio-political conflict in colonial Nigeria', *JHSN*, IV, 4, pp. 487–514.
Atieno-Odhiambo, E. S. (1973) 'Review of J. Iliffe (ed.) *Modern Tanzanians*', *TJH*, III, 1 & 2, pp. 153–4.
Atieno-Odhiambo, E. S. (1974) '"Seek ye first the economic kingdom":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Luo Thrift and Trading Corporation, LUTATCO, 1945–1956' in B. A. Ogot (ed.) *Hadith*, V,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ast Africa*, pp. 218–56.
Ayache, A. (1956) *Le Maroc: bilan d'une colonisation* (Paris: Éd. Sociales).
Ayache, S. and Richard, C. (1978) 'Une dissidence protestante malgache: l'église Tranozozoro', *Omaly sy Anio*, VI–VIII, pp. 133–82.
Ayandele, E. A. (1966)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 1842–1914: a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 (London: Longman).
Azikiwe, B. N. (1934) *Liberia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A. H. Stockwell).
Azikiwe, B. N. (1961) *Zik: a Selection from the Speeches of Nnamdi Azikiwe* (Cambridge: CUP).

Baden-Powell, R. S. S. (1897) *The Matabele Campaign, 1896: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uppressing the Native Rising in Mataheleland and Mashonaland* (London: Methuen).
Badoglio, P. (1937) *The War in Abyssinia* (London: Methuen).
Baer, G. (1962) *A History of Land Ownership in Modern Egypt, 1800–1950* (London: OUP).
Baer, G. W. (1967) *The Coming of the Italo-Ethiopian War* (Cambridge, Mass: HUP).
Baeta, C. G. (1962) *Prophetism in Ghana: a Study of Some 'Spiritual' Churches* (London: SCM Press).
Baeta, C. G. (ed.) (1968) *Christianity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UP).
Balandier, G. (1965) 'Messi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Black Africa' in P. Van den Berghe (ed.) *Africa: Social Problems of Change and Conflict*.
Balandier, G. and Dadie, B. (eds) (n.d.) *Le travail en Afrique noir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Balans, J. L., Coulon, C. and Ricard, A. (eds) (1972) *Problèmes et perspectives de l'éducation dans un état du tiers-monde: le cas du Sénégal* (Bordeaux: Centre d'Etude d'Afrique Noire).
Baldwin, R. E. (196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ort Growth: a Study of Northern Rhodesia, 192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lek, R. (1922) *La Tunisie après la Guerre (1919–21): problèmes politiques* (Paris: Comité de l'Afrique Française).
Ballard, J. A. (1965) 'The Porto Novo incidents of 1923: politics in the colonial era', *Odu*, II, 1, pp. 52–75.
Bandini, F. (1971) *Gli Italiani in Africa: Storia delle guerre coloniali, 1882–1943* (Milan: Longanesi).
Banks, A. (1975) *A Military Atla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Heinemann).
Bannermann, R. C. (1920) 'Report on Conditions in Liberia', 2 October 1920 (New York).
Banton, M. (1966)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social system of Temne immigrants in Freetown' in I. Wallerstein (ed.) *Social Change: The Colonial Situation*, pp. 402–19.
Barbar, A. M. (1980) 'The Tarābulus (Libyan) resistance to the Italian invasions, 1911–192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arbour, K. M. and Prothero, R. M. (eds) (1961) *Essays on African Popul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arbour, N. (ed.) (1959) *A Survey of North West Africa (The Maghreb)* (London: OUP).
Barclay, E. J. (1931) *Annual Message*, 22 December (Monrovia).
Barclay, E. J. (1932) *Annual Message*, 24 October (Monrovia).

Barclay, E. J. (1934)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Thirty-Seventh Legislature* (Monrovia).

Barclay, E. J. (1935a) *Special Message delivered before the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the Liberian Legislature*, 29 May (Monrovia).

Barclay, E. J. (1935b) *Annual Message*, 19 December (Monrovia).

Barclay, E. J. (1937) *Annual Message*, 29 October (Monrovia).

Barker, A. J. (1968) *The Civilization Mission: a History of the Italo-Ethiopian War of 1935–1936* (London: OUP).

Barrett, D. B. (ed.) (1971) *African Initiatives in Religion* (Nairobi: EAPH).

Bascom, W. (1959) 'Urbanism as a traditional African pattern', *SR*, VII, pp. 29–53.

Basso, L. (1972) 'An analysis of classical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N. Chomsky *et al.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pp. 111–44.

Bastide, R. (1967) *Les Ameriques noires: les civilisations africaines dans le Nouveau Monde* (Paris: Payot).

Bates, M. L. (1965) 'Tanganyika: changes in African life, 1918–1945' in V. Harlow and E. M. Chilver (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II, pp. 625–38.

Bates, R. H. (1971) *Unions,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Study of Mineworkers in Zambia* (New Haven: YUP).

Bauer, P. T. (1954) *West African Trade: a Study of Competition, Oligopoly aud Monopoly in a Changing Society* (Cambridge: CUP).

Bauer, R. A. and Bauer, A. H. (1942) 'Day to day resistance to slavery', *JNH*, XXVII, 4, pp. 388–419.

Baum, J. E. (1928) *Savage Abyssinia* (London: Cassell).

Beach, D. (1971)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Shona country' (London: SOAS unpublished seminar paper).

Beach, D. (1979) '"Chimurenga": the Shona rising of 1896–97', *JAH*, XX, 3, pp. 395–420.

Beer, G. L. (1923) *African Question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New York: Macmillan).

Beinart, W. and Bundy, C. (1980) 'State intervention and rural resistance: the Transkei, 1900–1965' in M. Klein (ed.) *Peasants in Africa*, pp. 271–315.

Bender, G. J. (1978) *Angola under the Portuguese: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London: Heinemann).

Benians, E. A., Butler, J. and Carrington, C. E. (eds) (195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II, *The Empire–Commonwealth 1870–1919* (Cambridge: CUP).

Bennett, G. (ed.) (1953) *The Concept of Empire: Burke to Attlee, 1774–1947*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Bennett, G. (1963) *Kenya, a Political History: the Colonial Period* (London: OUP).

Benson, M. (1966) *South Africa: the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nz, E. (ed.) (1965) *Messianische Kirchen, Sekten und Bewengungen im heutigen Afrika* (Leiden: Brill).

Berg, E. J. (1965) 'The development of a labour force in sub-Saharan Africa', *EDCC*, XIII, pp. 394–412.

Berkeley, G. F. (1902) *The Campaign of Adawa and the Rise of Menelik* (London: Constable).

Berliner, P. (1978) *The Soul of Mbi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nard, A. and Lacroix, L. N. E. (1921) *La pénétration saharienne, 1830–1906* (Algiers).

Berque, A. (1936) 'Un mystique moderniste: le Cheikh Benalioua', *RA*, LXXIX, pp. 691–776.

Berque, A. (1947) 'Les intellectuels algériens', *RA*, XCI, pp. 123–51, 261–76.

Berque, A. (1951), 'Les capteurs du divan: marabouts et ulemas', *R. Med.*, X, 43, pp. 286–302; XI, 44, pp. 417–29.

Berque, J. (1970) *Le Maghreb entre deux guerres* (Paris: Éd. du Seuil, 2nd edn).

Bervin, A. (1969) *Benito Sylvain, apôtre du relèvement social des noirs* (Port-au-Prince: La Phalange).

Beti, M. (1971) *The Poor Christ of Bomba* (London: Heinemann).

Betts, R. F. (ed.) (1972)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Causes and Dimensions of Empire* (London: D. C. Heath, 2nd edn).

Bidwell, R. (1973) *Morocco under Colonial Rule: French Administration of Tribal Areas, 1912–1956* (London: Frank Cass).

Biobaku, S. O. (ed.) (1976) *The Living Culture of Nigeria* (London: Thomas Nelson).

Birmingham, W., Neustadt, I. and Omaboe E. N. (eds) (1967)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Ghana*, Vol. II (London: Allen & Unwin).

Bittremieux, L. (1936) 'Brief van Musiri (Geschiedenis van een Negerkonig uit Katanga) door Zijn zoon en apvolger Mukanda-bantu (Met het relaas der groote daden van den Schrijver) Uit het Kisanga Vertaald', *Kongo-Oversee*, III, pp. 69–83, 252–91.

Blair, D. S. (1976) *African Literature in French* (Cambridge: CUP).

Blaug, M. (1961) 'Economic imperialism revisited', *Yale Review*, L, pp. 335–49.

Bley, H. (1968) *Kolonialherrschaft und Sozialstruktur in Deutsch-Südwestafrika 1894–1914* (Hamburg: Leibnez-Verlag).

Bley, H. (1971) *South West 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1914* (London: Heinemann).

Blyden, E. W. (1864) 'The call of Providence to the descendants of Africa', *The African Repository*, XL, p. 358.
Blyden, E. W. (1887) *Christianity, Islam and the Negro Race* (London: W. B. Whittingham).
Boahen, A. A. (1966) *Topic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 Longman).
Boahen, A. A. (1974) 'Politics in Ghana, 1800–1874'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pp. 167–261.
Boahen, A. A. (1977) 'Prempeh in Exile', *Research Review*, VIII, 3, pp. 3–20.
Boavida, A. A. (1967) *Angola: cinco séculos de exploracão portuguêsa* (Rio de Janeiro: Civilizacão Brasileira).
Bohannan, P. and Curtin, P. (1971) *Africa and Africans*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rev. edn).
Bohm, E. (1938) *La mise en valeur des colonies portugaises* (Paris).
Boilat, Abbé (1853) *Esquisses Sénégalaises* (Paris: P. Bertrand).
Boiteau, P. (1958)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nation malgache* (Paris: Éd. Sociales).
Bond, H. M. 'Forming African youth: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J. A. Davis (ed.) *Africa Seen by American Negroes*, pp. 247–61.
Bonner, P. L. (1978)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ICU: a case of self-destruction?' in E. Webster (ed.) *Essays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ur History*, pp. 114–20.
Bonner, P. L. (1979) 'The 1920 Black mineworkers' strike: a preliminary account' in B. Bozzoli (ed.) *Labour, Townships and Protest: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Witwatersrand*.
Bony, J. (1980) 'La Côte d'Ivoire sous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et le prélude à l'émancipation, 1920–47 – Genèse d'une na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I).
Booth, N. S. (1977) 'Islam in Africa', in N. S. Booth (ed.) *African Religions: a Symposium* (New York: Nok Publishers).
Booth, N. S. (ed.) (1977) *African Religions: a Symposium* (New York: Nok Publishers).
Boserup, E. (1965)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Chicago: Aldine).
Botelho, J. J. T. (1934) *História Militar e Política dos Portugueses em Moçambique*, 2 vols (Lisbon).
Bouis, L. (1946) 'Algérie et Sahara: le regime douanier' in *Encyclopédie de l'Empire Française* (Paris).
Boulegue, M. (1965) 'La presse au Sénégal avant 1939: bibliographie', *BIFAN* (B) XXVII, pp. 715–754.
Bourguiba, A. (1954) *La Tunisie et la France: vingt-cinq ans de lutte pour une coopération libre* (Paris: Julliard).
Bowen, J. W. E. (1896) *Africa and the American Negro: Addresse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gress on Africa* (Miami: Mnemosyne Publishers, 1969 edn).
Bower, P. (1948) 'The mining industry' in M. Perham (ed.) *Mining,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Nigeria*, pp. 1–42.
Boyes, J. (n.d.) *My Abyssinian Journey* (Nairobi: W. Boyd).
Bozzoli, B. (ed.) (1979) *Labour, Townships and Protest: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Brandel, R. (1961) *The Music of Central Afric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Branquinho, J. A. G. de M. (1966) *Prospeccão das Forças Tradicionas* (Nampula).
Brass, W. *et al.* (1968) *The Demography of Tropical Africa* (Princeton: PUP).
Brass, W. and Coale, A. J. (1968) 'Methods of analysis and estimation' in W. Brass *et al. The Demography of Tropical Africa*, pp. 88–139.
Brett, E. A. (1973) *Colon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 (New York: Nok Publishers).
Brotz, H. (1970) *The Black Jews of Harlem: Negro Nationalism and the Dilemmas of Negro Leadership* (New York: Schocken).
Brown, M. (1978) *Madagascar Rediscovered: a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Independence* (London: Damien Tunnacliffe).
Brunschwig, H. (1966) *French Colonialism, 1871–1914: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Praeger).
Brunschwig, H. (1974) 'De la résistance Africaine à l'impérialisme Européen', *JAH*, XV, 1, pp. 47–64.
Buell, R. L. (1928) *The Native Problem in Africa*,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Buell, R. L. (1947) *Liberia: a Century of Survival, 1847–194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undy, C. (197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uth African Peasan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ndon: Heinemann).
Burns, A. C. (1957) *In Defence of Colonies: British Colonial Territor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Allen & Unwin).
Bustin, E. (1975) *Lunda under Belgian Rule* (Cambridge Mass: HUP).

Cachia, A. J. (1975) *Libya under the Second Ottoman Occupation (1835–1911)* (Tripoli: Dar al Farjeni)
Caldwell, J. C. (1967) 'Population change' in W. Birmingham, I. Neustadt and E. N. Omaboe (eds)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Ghana*, Vol. II, pp. 78–110.

Caldwell, J. C. (ed.) (1975) *Population Growth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West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P).
Caldwell, J. C. (forthcoming) *The African Drought and its Demographic Implications.*
Caldwell, J. C. and Okonjo, J. (eds) (1968) *The Population of Tropical Africa* (London: Longman).
Cantrelle, P. 'Mortality; levels, patterns and trends' in J. C. Caldwell (ed.) (1975) *Population Growth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West Africa*, pp. 98–118.
Capela, J. (forthcoming) *O Movimento Operário em Lourenço Marques, 1910–1927.*
Cardoso, F. H. (1962) *Capitalismo e escravidád no Brasil meridional* (São Paulo: Difusão Europeia do Livro).
Cordozo, J. (1931) *Finances et crédit pan José Cardoso* ... (Lourenço Marques).
Carr-Saunders, A. M. (1936) *World Population: Past Growth and Present Tren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rtwright, F. and Biddiss, M. D. (1972) *Disease and History* (London: Rupert Hart-Davies).
Cosserley, G. (1923) *Algeria Today* (London: T. Werner Laurie).
Cecil, G. (1932)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Vol. IV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Centro de Estudos dos Africanos (1977) *The Mozambique Miners* (Maputo).
Chaine, M. (1913) 'Histoire du règne de Iohannes IV, roi d'Ethiopie (1868–1889)', *RSEHA*, XXI, pp. 178–91.
Chalmers, J. A. (1877) *Tiyo Soga: a Page of South African Mission Work*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Chalk, F. (1967) 'Du Bois and Garvey confront Liberia', *CJAS*, I, 2, pp. 135–42.
Chanaiwa, D. (1974) 'The Shona and the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0–1896', *AQ*, XIV, 3 & 4.
Chanaiwa, D. (1980) 'African humanism in South Africa' in A. Mugomba and M. Nyaggah (eds) *Independence Without Freed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onial Educ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pp. 9–39.
Chapus, G. S. (1961) *Manuel de l'histoire de Madagascar* (Paris: Larose).
Charle, E. G. (1964) 'An appraisal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he extrac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Nigeria', *NJESS*, VI, 1, pp. 37–42.
Chester, E. W. (1974) *Clash of Titans* (New York: Orbis).
Chevalier, L. (1947) *Le problème demographique nord-africaine* (Paris: PUF).
Chilcote, R. (ed.) (1972) *Protest and Resistance in Angola and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ilembwe, J. 'Letter', *Mission Herald*, IX, 9 April 1905.
Chinweizu (1975) *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Us: White Predators, Black Slavers and the African Eli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Chomsky, N. *et al.* (1972)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Nottingham: Spokesman Books).
Chrétien, J. P. (1970) 'Une revolte au Burundi en 1934', *AESC*, XV, 6, pp. 1678–1717.
Churchill, W. S. (1948) *The Gathering Storm* (London: Cassell).
Cimmaruta, R. (1936) *Ual Ual* (Milan: Mondadori).
Clapham, C. (1977) 'Ethiopia' in R. Lemarchand (ed.) *African Kingships in Perspective: Political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in Monarchical Settings*, pp. 35–63.
Clarence-Smith, W. G. (1979) *Slaves, Peasants and Capitalists in Southern Angola, 1840–1926* (Cambridge: CUP).
Clarence-Smith, W. G. and Moorsom, R. (1975) 'Underdevelopment and class formation in Ovamboland, 1845–1915', *JAH*, XVI, 3, pp. 365–81.
Clarke, J. H. (1964) *Harlem USA* (Berlin: Seven Seas Publishers).
Clendenen, C., Collins, R. and Duignan, P. (1966) *Americans in Africa, 1865–1900*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Clower, R. W., Dalton, G., Harwitz, M. and Walters, A. A. (1966)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An Economic Survey of Liberia* (Evanston: NUP).
Coale, A. J. and Demeny, P. (1966) *Regional Model Life Tables and Stable Populations* (Princeton: PUP).
Coale, A. J. and Demeny, P. (1967) *Population Studies* (New York: UN).
Coale, A. J. and Lorimer, F. (1968) 'Summary of estimates of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in W. Brass *et al. The Demography of Tropical Africa*, pp. 151–67.
Coale, A. J. and van de Walle, E. (1968) 'Appendix: notes on areas for which estimates were made but not subject to a detailed study' in W. Brass *et al. The Demography of Tropical Africa*, pp. 168–82.
Cobbing, J. (1974) 'Ndebele relig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published paper).

Cobbing, J. (1977) 'The absent priesthood: another look at the Rhodesian risings of 1896–1897', *JAH*, XVIII, 1, pp. 61–84.
Coelho, R. (1964) *Os Karibes Negros de Honduras* (São Paulo: Separata da Revista du Museu Paulista, n.s. 15).
Coelho, T. (ed.) (1898) *Dezoito annos em Africa* (Lisbon).
Cole, M. M. (1961) *South Africa* (London: Methuen).
Coleman, J. S. (1958) *Nigeria: Background to Na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eman, J. S. (1965) 'Nation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in P. J. M. McEwan and R. B. Sutcliffe (eds) *The Study of Africa*, pp. 156–83.
Coleman, J. S. and Belmont, B., Jr (1962)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J. J. Johnson (e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p. 359–405.
Coleman, J. S. and Rosberg, C. G. (eds) (1970)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lins, R. O. (1967) 'The Aliab Dinka uprising and its suppression', *SNR*, XLVIII, pp. 77–89.
Confer, C. V. (1966) *France and Algeria: the Problem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eform, 1870–1920* (New York: Syracuse UP).
Coon, C. (1936) *Measuring Ethiopia and Flight into Arabia* (London: Jonathan Cape).
Coquery-Vidrovitch, C. (1972) *Le Congo français au temps des grandes compagnies concessionnaires, 1898–1930* (Paris & The Hague: Mouton).
Coquery-Vidrovitch, C. (1975) 'L'impact des intérêts coloniaux: SCOA et CFAO dans l'ouest africain, 1910–1965', *JAH*, XVI, 4, pp. 595–621.
Coquery-Vidrovitch, C. (ed.) (1976) 'L'Afrique et la crise de 1930 (1924–1938)', *RFHOM* (special number), LXIII, 232–3, pp. 375–776.
Coquery-Vidrovitch, C. (1977) 'Mutations de l'impérialisme colonial français dans les années 30', *AEH*, IV, pp. 103–52.
Coquery-Vidrovitch, C. (forthcoming) 'French Black Africa' in A. D. Roberts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VII.
Coquery-Vidrovitch, C. and Moniot, H. (1974) *L'Afrique noire de 1800 à nos jours* (Paris: PUF).
Cornevin, R. (1962) *Histoire du Togo* (Paris: Berger-Levrault).
Coro, F. (1971) *Settantasei Anni di Dominazione Turca in Libia, 1835–1911* (Tripoli: Stabilimento Poligrafico Editorial, Plinio Maggi).
Cosnier, H. C. (1921) *L'ouest africain français, ses ressources agricoles, son organisation économique* (Paris: Larose).
Cosnier, H. C. (1922) *L'Afrique du nord: son avenir agricole et économique* (Paris: Larose).
Couceiro, S. M. (1974) *Bibliografi sobre o negro brasileiro* (São Paulo: Centro de Estudos Africano/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Coupland, R. (1928) *Kirk on the Zambez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utinho, J. A. (1904) *A Campanha do Barue em 1902* (Lisbon).
Cronon, E. D. (1962) *Black Moses: The Story of Marcus Garvey and the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rowder, M. (1962) *Senegal: a Study in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London: OUP).
Crowder, M. (1964) 'Indirect rule: French and British style', *Africa*, XXXIV, 3, pp. 197–205.
Crowder, M. (1968) *West Afric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Hutchinson).
Crowder, M. (ed.) (1971)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London: Hutchinson).
Crowder, M. (1973) *Revolt in Bussa: a Study of British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Nigerian Borgu: 1902–35* (London: Faber).
Crowder, M. (1974) 'The 1914–1918 European War and West Africa'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pp. 484–513.
Crowder, M. (1977a) *Colonial West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Crowder, M. (1977b) 'Introduction' [to 'Protest against colonial rule in West Africa'], *Tarikh*, V, 3, pp. 1–5.
Crowder, M. (1977c) 'The Borgu revolts of 1915–17', *Tarikh*, V, 3, pp. 18–30.
Crowder, M. (1977d) 'Blaise Diagne and the recruitment of African troops for the 1914–18 War' in M. Crowder, *Colonial West Africa*, pp. 104–21.
Crowder, M. and Ajayi, J. F. A. (1974) 'West Africa 1919–1939: the colonial situation'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pp. 514–41.
Crowder, M. and Ikime, O. (eds) (1970) *West African Chiefs: Their Changing Status under Colonial Rule and Independence*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rp.).
Crowe, S. E. (1942) *The Berlin West African Conference, 1884–1885* (London: Longmans Green)
Crummey, D. (1969) 'Tēwodros as reformer and modernizer', *JAH*, X, 3, pp. 457–69.

Cudsi, A. S. (1969) 'Sudanese resistance to British rule, 1900–1920'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Cunha, J. M. da Silva (1949) *O trabalho indigesa: estudo do directo colonial* (Lisbon).
Curtin, P. D. (1969)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urtin, P. D., Feierman, S., Thompson, L. and Vansina, J. (1978) *African History* (London: Longman).

da Cunha, M. C. (1976) 'Brasileiros Nagós em Lagos no século XIX', *Cultura*, October–December 1976 (Brasilia: Ministerio da Educacao e Cultura).
Dabbūr, M. A. (1971) *Nahd 'at al Jazā'ir al-Hadītha Fīthawratī-Hāx'l-Mubāraka* (Algiers).
Dachs, A. J. (1972)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imperialism in practice' in B. Pachai (ed.)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wi*, pp. 283–92.
Daly, M. D. (1977) 'The Governor-Generalship of Sir Lee Stack, 1917–24'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Darwin, C.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John Murray).
Davidson, A. B. (1968) 'African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T. O. Ranger (ed.) *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pp. 177–88.
Davidson, A. B. (1972) *South Africa, the Birth of a Protest* (Moscow: African Institute).
Davidson, B. (1964a) *The African Past* (London: Longman).
Davidson, B. (1964b) *Which Way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Davidson, B. (1978a) *Discovering Africa's Past* (London: Longman).
Davidson, B. (1978b) *Africa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Allen Lane).
Davies, I. (1966) *African Trade Unio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Davies, J. N. P. (1956) 'The history of syphilis in Buganda', *BWHO*, XV, pp. 1041–55.
Davis, J. A. (ed.) (1958) *Africa Seen by American Negroes* (cover title) [*Afric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merican Negro Scholars* – title page titl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Davis, L. (1974) 'Black images of Liberia, 1877–1914' (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ixth Annual Liberian Studies Conference, Madison, Wisconsin, 26–27 April 1974).
de Bono, E. (1937) *Anno XIII: The Conquest of an Empire* (London).
de Castro, L. (1915) *Nella terra dei Negus, pagine raccolte in Abissinia* (Milan: Fratelli Treves).
de Dekker, P. (1974) 'Mutations sociale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au Rwanda entre les deux guerres' (Master'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aris VII).
de Freitas, H. I. F. (1956–7) *Seitas Religiosas Genticicas*, 3 vols (Lourenço Marques).
de Graft, J. C. (1976) 'Roots in African drama and theatre', *African Literature Today*, VIII, pp. 1–25.
de Kiewiet, C. W. (1965) *The Imperial Factor in South Africa. A Study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Frank Cass).
de Montmorency, W. G. B. [Viscount Mountmorres] (1906)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a Report on a Voyage of Enquiry*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Debrunner, H. (1967)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Ghana* (Accra: Waterville Publishing).
Dejaco, A. (1972) *Di mal d'Africa si muore* (Rome).
del Boca, A. (1969) *The Ethiopian War, 1935–1941* (Chicago: Chicago UP).
de la Pradelle, A. (1936) *Le conflit Italo-Ethiopien* (Paris).
Delavignette, R. (1946) *Service Africaine* (Paris: Gallimard, 8th edn).
Denoon, D. (1972) *Southern Africa since 1800* (London: Longman).
Desanti, M. (1940) 'La propriété en Afrique noire' (paper presented to Conférences à l'Ecole Coloniale).
Deschamps, H. (1960) *Histoire de Madagascar* (Paris: Berger-Lavrault).
Deschamps, H. (1962) *Madagascar, Camores, Terres Australes* (Paris: Berger-Levrault).
Deschamps, H. (1963) 'Et maintenant, Lord Lugard?', *Africa*, XXXII, 4, pp. 293–306.
Despois, J. (1961) *La Tunisie* (Paris: A. Colin).
Deutschland, H. (1970) *Trailblazers, Struggles and Organizations of African Workers before 1945* (Berlin: Tribune).
Digernes, O. (1978) 'Appearance and reality in the Southern Sudan. A study in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the Nuer, 1900–193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ergen).
Dike, K. O. (1956)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wnes, W. D. (1919) *With the Nigerians in German East Africa* (London: Methuen).
Dresch, J. (1952) 'Les investissements en Afrique noire', *PA*, XIII, pp. 232–41.
Dreschler, H. (1966) *Südwestafrika unter deutscher Kolonialherrschaft* (Berlin).
Du Boie, W. E. B. (1968) *Dusk of Dawn. An Essay Towards an Autobiography of a Race Concep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Dublin, Louis I., Lotka, A. J. and Spiegelman, M. (1936) *Length of Life: a Study of the Life Table* (New York: Roland Press).
Duffy, J. (1959) *Portuguese Africa* (London: OUP).
Duffy, J. (1962) *Portugal in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Duffy, J. (1967) *A Question of Slave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uggan, A. J. (1962) 'A survey of sleeping sickness in Northern Niger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TRSTMH*, LVI, 1962, pp. 439–80.
Dumont, R. (1966) *False Start in Africa* (London: André Deutsch).
Dunbar, A. R. (1965) *A History of Bunyoro-Kitara* (London: OUP).
Duncan, W. G. (1973) *The Nature aud Content of Fertility Surveys Conduc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since 1960* (The Hague).
Duperray, A. (1978) 'Les Gourounsi de Haute-Volta: conquête et colonisation, 1896–1933' (Thèse de 3e cycle: University of Paris).
Durand, J. D. (1967) 'The modern expan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PAPS*, CXI, 3, pp. 136–59.
Dwane, J. M. (1897) Article in *Voice of Missions*, July 1897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Easton, S. C. (1964) *The Rise and Fall of Western Colonialism* (London: Pall Mall).
Echenberg, M. J. (1975) 'Paying the blood tax: military conscription in French West Africa, 1914–1929', *CJAS*, IX, 2, pp. 171–92.
Edgar, R. (forthcoming) 'Enoch Mgijima, the Israelites and the background to the Bulhoek massacre', *IJAHS*.
Edmund, W. D. (1951) 'The newspaper press in British West Africa, 1918–1939'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Bristol).
Eggeling, W. J. (1948) 'Another Photograph of Mumia', *UJ*, XII, 2, pp. 197–9.
Eggeling, W. J. (1950) 'Death of Mumia', *UJ*, XIV, 1, p. 105.
Ehrlich, C. (1957) 'Cotton and the Uganda economy, 1903–1909', *UJ*, XXI, 2, pp. 162–75.
Ehrlich, C. (1973) 'Building and caretaking: economic policy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1890–1960', *EHR*, XXIV, 4, pp. 649–67.
El-Alami, (1972) *Allal El Fasi, patriarche du nationalisme marocain* (Rabat).
El-Annabi, H. (1975) 'La crise de 1929 et ses conséquences en Tunisie' (Dissertation for Certificat d'Aptitude à la Recherche: Tunis).
El-Hareir, I. (1981) 'Mawaqif Khalida li umar al-Mukhtar' in *Umar Al-Mukhtar* (Tripoli: Libyan Study Centre).
El-Kammash, M. M. (1968) *Economic Development aud Planning in Egypt* (New York: Praeger).
Elgood, P. G. (1928) *The Transit of Egypt* (London: Arnold).
Elias, T. O. (1971) *Nigerian Land Law* (London: Sweet & Maxwell).
Eliot, C. (1905) *The East African Protectorate* (London: Arnold).
Ellis, S. (1980a) 'The political elite of Imerina and the revolt of the *Menalamba*. The creation of a colonial myth in Madagascar, 1895–1898', *JAH*, XXI, 2, pp. 219–34.
Ellis, S. (1980b) 'Resistance or collaboration: the Menalamba in the Kingdom of Imerina, 1895–1899'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Emmanuel, A.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Encyclopédie de l'empire française (1946) 2 vols (Paris).
Esoavelomandroso, F. (1977a) 'Politique des races et enseignement colonial jusqu'en 1940', *Omaly sy Anio*, V–VI, pp. 245–56.
Esoavelomandroso, F. (1977b) *L'attitude malgache face au traité de 1885 (d'après le Journal de Rainilaiarivony)* (Antananarivo: Collection Etudes Historiques).
Esoavelomandroso, F. (1979) 'Rainilairivony and the defense of Malagasy inilependence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R. K. Kent (ed.) *Madagascar in History, Essays from the 1970s*, pp. 228–51.
Esoavelomandroso, F. (1980) 'Une étude récente sur les Menalamba: compte rendu de la thèse de Stephen Ellis (Les Menalamba dans le royaume d'Imerina: résistance ou collaboration)', *Omaly sy Anio*, XI.
Esoavelomandroso, F. (1981) 'Differentes lectures de l'histoire.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VVS', *RPC*, L, pp. 100–111.
Esoavelomandroso, M. (1975) 'Le mythe d'Andriba', *Omaly sy Anio*, I–II, pp. 43–73.
Esoavelomandroso, M. (1979) *La province maritime orientale du Royaume de Madagascar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1882–1895)* (Antananarivo: F.T.).
Esoavelomandroso, M. (1981) 'L'opposition de l'Ambongo à la pénétration française en 1899', paper presented to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lgache at Majunga (13–18 April 1981).
Evans-Pritchard, E. E. (1949) *The Sanusi of Cyrena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adipe, M. A. (1970) *The Sociology of the Yoruba* (Ibadan: IUP).
Fage, J. D. (1967) 'British and German colonial rule: a synthesis and summary' in P. Gifford and W. R. Louis (eds)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 pp. 691–706.
Fage, J. D. (1978) *An Atlas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Arnold, 2nd edn).
Fanon, F. (1967)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Farago, L. (1935) *Abyssinia on the Eve* (London: Putnam).
Farrant, L. (1975) *Tippu Tip and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 (London: Hamilton).
Fashole-Luke, E., Gray, R., Hastings, A. and Tasie, G. (eds) (1978) *Christianity in Independent Africa* (London: Rex Collings).
Faulkingham, R. H., Balding, J. H., Faulkingham, L. J. and Thorbahn, P. F. (1974) 'The demographic effects of drought in the West African Sahel' (paper presented to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Faulkner, T. J. R. (1926) *Programme of the People's Party* (Monrovia).
Faulkner, T. J. R. (1927) *An Appeal to Reason: to the Public* (Monrovia).
Fendall, C. P. (1921) *The East African Force, 1915–1919* (London: H. F. Witherby).
Ferguson, D. E. (198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and medicine in colonial Tanganyika' in M. H. Y. Kaniki (ed.)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pp. 307–43.
Fernandes Júnior, J. (1955) 'Narração do Distrito de Tete' (Makanga: unpublished Ms).
Fetter, B. (1974) 'African associations in Elisabethville, 1910–1935: their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EHA*, VI, pp. 205–23.
Fetter, B. (1976) *The Creation of Elisabethville, 1910–1940*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Fidel, C. (1926) *Les colonies allemandes: études historiques et renseignements statistiques* (Tonnerre: C. Puyfagès).
Fieldhouse, D. K. (1961) 'Imperialism: an historical revision', *EHR*, XIV, 2, pp. 187–209.
Fieldhouse, D. K. (1981) *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Fika, A. M. (1978) *The Kano Civil War and British Over-rule, 1882–1940* (Ibadan: OUP).
Finer, S. F. (1962) *The Man on Horseback* (London: Pall Mall).
Finkle, J. L. and Gable, R. W. (eds) (1971)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John Wiley, 2nd edn).
First, R. (1963) *South West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scher, F. (1967)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Flament, F. *et al.* (1952) 'La force publique de sa naissance à 1914. Participation des militaires à l'histoir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Congo', *IRCBM*, XXVII, pp. 1–585.
Ford, J. (1971) *The Role of Trypanosomiases in African Ecology: 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olayan, K. (1973) 'The resistance movement in Libya', *Tarikh*, IV, 3, pp. 46–56.
Folayan, K. (1974) 'Italian colonial rule in Libya', *Tarikh*, IV, 4, pp. 1–10.
Frankel, S. H. (1938) *Capital Investment in Africa* (London: OUP).
Frazier, E. F. (1949) *The Negro in thr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Fremigacci, J. (1980) 'Madagascar de 1905 à 1940' (unpublished Ms).
Friedland, E. A. (1979) 'Mozambican nationalist resistance, 1920–1940' *TJH*, VIII, pp. 117–28.
Fugelstad, F. (1974) 'La grande famine de 1931 dsns l'ouest nigérien', *RFHOM*, LXI, 222, pp. 18–33.
Furnivall, J. S. (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UP).
Fynn, J. K. (1971) 'Ghana-Asante (Ashanti)' in M.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pp. 19–52.

Gabel, C. and Bennett, N. R. (eds) (1967) *Reconstructing African Culture History* (Boston: BUP).
Gaffarel, P. (1905) *Histoire de l'expansion coloni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870 jusqu'en 1905* (Marseilles: Balatier).
Gaitskell, A. (1959) *Gezira: a Story of Development in the Sudan* (Londen: Faber).
Galbraith, J. S. (1961) 'Myths of the "Little England" era', *AHR*, LXVII, 1, pp. 34–48.
Gallagher, J. and Robinson, R. (1953)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HR*, VI, 1, pp. 1–15.
Ganier, G. (1965) 'Lat Dyor et le chemin de fer de l'arachide, 1876–1886', *BIFAN* (B), XXVII, 1 & 2, pp. 223–81.
Gann, L. H. (1964) *A History of Northern Rhodesia: Early Days to 1953* (London: Chatto & Windus).
Gann, L. H. and Duignan, P. (1967) *Burden of Empire* (London: Pall Mall).
Gann, L. H. and Duignan, P. (eds) (1969)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870–1914* (Cambridge: CUP).
Gann, L. H. and Duignan, P. (eds) (1970)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I,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14–1960* (Cambridge: CUP).

Gardiner, A. L. (1933) 'The law of slavery in Abyssinia', *IL*, XV.
Garvey, A. J. (ed.) (1923–5) *Philosophy and Opinions of Marcus Garvey* (London: Frank Cass: 1967 edn).
Garvey, A. J. (1963) *Garvey and Garveyism* (Kingston: United Printers).
Gaudio, A. (1972) *Abd el-Fasi, or the History of the Istiqlal*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Gautier, E. F. (1910) *La conquête du Sahara* (Paris: A. Colin).
Geiss, I. (1974) *The Pan-African Movement* (London: Methuen).
Gerhart, G. M. (1978) *Black Power in South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bson, G. W. and Russell, A. F. (1883) *Memorandum and Prot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Liberia against the Action of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in the North Western Territories of the Republic* (Monrovia).
Gide, A. (1930) *Travels in the Congo* (New York and London: Knopf).
Gifford, P. and Louis, W. R. (eds) (1967)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 (New Haven & London: YUP).
Gifford, P. and Louis, W. R. (eds) (1971) *France and Britain in Africa* (New Haven & London: YUP).
Giglio, C. (1968) *L'articolo XVII de Trattato di Ucciali* (Como: Cairoli).
Gilkes, P. (1975) *The Dying Lion: Feudal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Ethiopia* (London: Julian Friedmann).
Gleichen, E. (1898) *With the Mission to Menelik, 1897* (London: Arnold).
Gluckman, M. (1963) *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Cohen & West).
Goodfellow, C. F. (1966) *Great Britain and South African Confederation, 1870–1881* (Cape Town: OUP).
Goody, J. (ed.) (1968)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CUP).
Grandidier, G. (1934) *Atlas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Paris: Soc. d'éditions gé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Gray, J. M. (1948) 'Early treaties in Uganda', *UJ*, XII, 1, pp. 25–42.
Graziani, R. (1938) *Il Fronte Sud* (Milan: Montadori).
Graziani, R. (1976) *Verso al-Fezzan* (Cairo: Maktabat Saigh).
Graziani, R. (1980) *Cyrenaica Pacificata* (Benghazi: al-Andalus).
Greenfield, R. (1965)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Groves, C. P. (1969) 'Missionary and humanitarian aspects of imperialism from 1870 to 1914'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 pp. 462–96.
Guillaume, A. (1946) *Les Berbères marocains et la pacification de l'Atlas central (1912–1933)* (Paris: Julliard).
Gusfield, J. R. (1971)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isplaced polar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J. L. Finkle and R. W. Gable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Gutteridge, W. (1975) *Military Regimes in Africa* (London: Methuen).
Gwassa, G. C. K. (1972) 'African methods of warfare during the Maji Maji war' in B. A. Ogot (ed.) *War and Society in Africa*, pp. 123–48.
Gwassa, G. C. K. (1972) 'Kinjitile and the ideology of Maji Maji' in T. O. Ranger and I. N. Kimambo (eds)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frican Religion*, pp. 202–17.
Gwassa, G. C. K. and Iliffe, J. (eds) (1968) *Records of the Maji Maji Rising* (Dar es Salaam: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Paper No. 4).

Hafkin, N. J. (1971) 'Sheikhs, slaves and sovereignty' (pe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the USA, November 1971).
Hafkin, N. J. (1973) 'Trad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orthern Mozambiqu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oston).
Hagan, K. O. (1968)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literacy and adult education and their influence in social change in Ghana, 1901–57' (B.Litt.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Haile Sellassie (1936) 'La vérité sur la guerre Italo-Ethiopienne', *Vu* (Paris), July 1936.
Hailey, Lord (1938 and rev. edn, 1957) *An African Survey* (London: OUP).
Hajivayanis, G. G., Mtowa, A. C. and Iliffe, J. (1973), 'The politicians: Ali Mponda and Hassan Suleiman' in J. Iliffe (ed.) *Modern Tanzanians*.
Haley, A. (1976) *Roots* (New York: Doubleday).
Haliburton, G. M. (1971) *The Prophet Harris* (London: Longman).
Hall, R. (1965) *Zambia* (London: Pall Mall Press).
Hallett, R. (1970) *Africa to 1875: a Modern History* (Ann Arbor: MUP).
Hamilton, A. (1911) *Somaliland* (Westport: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 1970 edn).
Hamilton, R. (1975) *Voices from an Empire: a History of Afro-Portuguese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mmond, R. J. (1969) 'Uneconomic imperialism: Portugal in Africa before 1910'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 pp. 352–82.
Hamza, M. M. (1972) *Ḥisār wa Soqut al Khrṭūm* (Khartoum).
Hancock, W. K. (1962) *Smuts: the Sanguine Years, 1870–1919* (Cambridge: CUP).
Hardie, F. (1974) *The Abyssinian Crisis* (London: Batsford).
Hardy, G. (1930) *Vue générale de l'histoire d'Afrique* (Paris: A. Colin, 2nd edn).
Hargreaves, J. D. (1963) *Prelude to the Partition of West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Hargreaves, J. D. (1969) 'West African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nquest'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 pp. 199–219.
Harlow, V. and Chilver, E. M. (1965)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rmand, J. (1910) *Domination et colonisation* (Paris: Flammarion).
Harms, R. (1975) 'The and of red rubber: a reassessment', *JAH*, XVI, 1, pp. 73–88.
Hatch, J. (1971) *Nigeria: a History* (London: Secker & Warburg).
Hatton, P. H. S. (1966) 'The Gambia, the Colonial Office, and the opening month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JAH*, VII, 1, pp. 123–31.
Hauser, P. M. (1957) 'World and Asian urbanization in rela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P. M. Hauser (ed.) *Urbanization in Asia and the Far East*, pp. 53–95.
Hauser, P. M. (ed.) (1957) *Urbanization in Asia and the Far East* (Calcutta: UNESCO).
Hayes, C. J. H. (1941)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1871–1900* (New York: Harper & Row).
Hayford, J. E. C. (1911) *Ethiopia Unbound: Studies in Race Emancipation* (London: C. E. M. Phillips).
Haykal, M. H. (n.d.) *Tarājim Misrtyya wa Gharbiyya* (Cairo).
Hayward, V. E. W. (ed.) (1963)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 Movements* (London: Edinburgh House Press).
Heald, S. (ed.) (1937)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5*, Vol. II (London: RIIA).
Heimer, F.-W. (ed.) (1973) *Social Change in Angola*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Henries, A. D. B. (1965) *Presidents of thr First African Republic* (London: Macmillan).
Hermasi, A. B. (1966) 'Mouvement ouvrier et société coloniale' (unpublished thesis).
Herskovits, M. (1941) *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 (New York: Harper).
Herskovits, M. J. (1948) *Man and His Works: the Scienc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Knopf).
Herskovits, M. J. (1962) *The Human Factor in Changing Africa* (New York: Knopf).
Herskovits, M. J. (1966a) *The New World Negro. Selected Papers in Afroamerican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Herskovits, M. J. (1966b) 'Problem, methed and theory in Afroamerican studies' in M. J. Herskovits, *The New World Negro*, pp. 43–61.
Herskovits, M. J. (1966c) 'Some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Afroamerican studiés' in M. J. Herskovits, *The New World Negro*, pp. 145–55.
Hertslet, E. (1896 and 1909) *The Map of Africa by Treaty*, 3 vols (London: HMSO 2nd and 3ed edns).
Heseltine, N. (1971) *Madagascar* (London: Pall Mall).
Hess, R. L. (1963) 'Italy and Africa: colonial ambi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JAH*, IV, 1, pp. 105–126.
Hess, R. L. (1966) *Italian Colonialism in Somalia* (Chicago: Chicago UP).
Hess, R. L. and Loewenberg, G. (1968) 'The Ethiopian no-party state' in P. J. M. McEwan (ed.)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 pp. 198–205.
Higginson, J. (forthcoming) 'Labourers into His harvest, lambs among wolves: African Watchtower and the spectre of colonial revolt in Katanga, 1923–1941'.
Hill, A. C. and Kilson, M. (eds) (1971) *Apropos of Africa: Sentiments of Negro American Leaders on Africa from thr 1800s to the 1950s* (New York: Anchor).
Hill, M. F. (1956) *Planters' Progress: the Story of Coffee in Kenya* (Nairobi: Coffee Board of Kenya).
Hill, P. (1963) *The Migrant Cocoa-Farmers of Southern Ghana* (Cambridge: CUP).
Himmelfarb, G. (1960) 'John Buchan: an untimely appreciation', *Encounter*, LXXXIV, pp. 46–53.
Hinsley, F. H. (1959a)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the colonial sphere, 1869–1885' in E. A. Benians, J. Butler and C. E. Carringto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II, pp. 95–126.
Hinsley, F. H. (1959b) 'International rivalry, 1885–1895' in E. A. Benians, J. Butler and C. E. Carringto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II, pp. 255–92.
Hinsley, F. H. (1962)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 *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98* (Cambridge: CUP).
Hobsbawm, E. J. (1964) *The Age of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bsbawm, E. J. (1969) *Bandit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Hobson, J. A. (1902) *Imperialism: a Study* (Ann Arber: MUP, 1965 edn).
Hodgkin, T. (1954) 'Background to AOF (3): African reactions to French rule', *West Africa*, No. 1925 (16 January 1954), pp. 31–2.

Hodgkin, T. (1956)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London: F. Muller).
Hoffherr, R. (1932) *L'économie marocaine* (Paris: Recueil Sirey).
Holt, P. M. (ed.) (1968)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Egypt* (London: OUP).
Holt, P. M. (1970) *The Mahdist State in the Sudan, 1881–18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nd edn).
Hopkins, A. G. (1966a) 'The Lagos strike of 1897', *PP*, XXXV, 1966, pp. 133–55.
Hopkins, A. G. (1966b) 'Economic aspect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in Nigeria and in the Gold Coast, 1918–1939', *JAH*, VII, 1, pp. 133–52.
Hopkins, A. G. (1968)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West Africa: Lagos 1880–1892', *EHR*, pp. 580–606.
Hopkins, A. G. (1973)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Hopkins, E. (1970) 'The Nyabingi cult of southwestern Uganda' in R. I. Rotberg and A. A. Mazrui (eds)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pp. 258–336.
Hordern, R. C. (1941)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ar. Military Operations: East Africa* (London: HMSO).
Houghton, D. H. (1971) 'Economic development, 1865–1965'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II, pp. 1–48.
Hourani, A. (1962)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89–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oward, D. E. [President of Liberia] (1916) *Annual Message, 19 September 1919* (Monrovia: Republic of Liberia).
Howitt, W. (1969) *Colon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
Huberich, C. H. (1947) *The Political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of Liberia*, 2 vols (New York: Central Book Co.).
Hull, R. W. (1980) *Modern Africa: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Huntingford, G. W. B. (1969) *The Galla of Ethiopia: the Kingdom of Kafa and Janhero* (London: IAI).
Huot, Marzin, Ricau, Grosfillez, David, Drs (1921) 'L'épidémie d'influenza de 1918–19 dans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Annuaire Médical et Pharmaceutique Colonial*, XIX.
Huxley, E. J. (1935) *White Man's Country: Lord Delamere and the Making of Kenya*,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Hyam, R. (1972) *The Failure of South African Expansion, 1908–1948* (London: Longman).
Hyden, G. (1969)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ral Tanzania* (Nairobi: EAPH).
Hymer, S. (197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old Coast and Ghana' in G. Ranis (ed.)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129–80.

Ianni, O. (1962) *As Metamorfoses do Escravo* (São Paulo: Difusão Européia de Livro).
Ibrahim, H. A. (1974) 'The policy of the Condominium government towards the Mahdist political prisoners, 1898–1932', *SNR*, LV, pp. 33–45.
Ibrahim, H. A. (1976) *The 1936 Anglo-Egyptian Treaty* (Khartoum: Khartoum UP).
Ibrahim, H. A. (1977)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neo-Mahdism', *SNR*, LVIII.
Ibrahim, H. A. (1979) 'Mahdist risings against the Condominium government in the Sudan 1900–1927', *IJAHS*, XII, 3, pp. 440–71.
Ibrahim, M. A. (1969) 'Hamlat al-Amir Mahmūd Wad Ahmad ila al-Shamāl 1315/1897–98'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Ikime, O. (1971) 'Nigeria-Ebrohimi' in M.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pp. 205–32.
Ikime, O. (1973) 'Colonial conquest and African resistance in the Niger delta states', *Tarikh* IV, 3, pp. 1–13.
Ikime, O. (ed.) (1980) *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 (Ibadan: Heinemann).
Iliffe, J. (1967)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ji Maji rebellion', *JAH*, VIII, 4, pp. 495–512.
Iliffe, J. (1968) 'The Herero and Nama risings' in G. Kibodya (ed.) *Aspects of South African History* (Dar es Salaam: EAPH).
Iliffe, J. (1969) *Tanganyika under German Rule, 1905–1912* (Cambridge: CUP).
Iliffe, J. (ed.) (1973) *Modern Tanzanians* (Nairobi: EAPH).
Iliffe, J. (1979) *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 (Cambridge: CUP).
Ingham, K. (1958) *The Making of Modern Uganda* (London: Allen & Unwin).
Irele, A. (1964) 'A defence of negritude. A propos of Black Orpheus by Jean-Paul Sartre', *Transition*, III, 13, pp. 9–11.
ʿIsa, G. O. (1965) *Taʾrikh al-Ṣumāl* (Cairo).
Isaacman, A. (1972) *Mozambique: the Africanization of a European Institution: the Zambesi Prazos, 1750–190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Isaacman, A. (1973) 'Madzi-Manga, Mhondoro and the use of oral traditions a chapter in Baru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history', *JAH*, XIV, 3, pp. 395–409.
Isaacman, A. (1976) *Anti-Colonial Activity in the Zambesi Valley, 1850–192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aacman, A. (1977) 'Social banditry in Zimbabwe (Rhodesia) and Mozambique, 1894–1907: an expression of early peasant protest', *JSAS*, IV, 1, pp. 1–30.
Isaacman, A. and Isaacman, B. (1976) *The Tradition of Resistance in Mozambique: the Zambesi Valley, 1850–1921* (London: Heinemann).
Isaacman, A. and Isaacman, B. (1977)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c. 1850–1920', *IJAHS*, X, 1, pp. 31–62.
Isaacman, A., Stephen, M., Adam, Y., Homen, M. J., Macamo, E. and Pililão, A. (1980) '"Cotton is the mother of poverty": peasant resistance to forced cotton production in Mozambique, 1938–1961', *IJAHS*, XIII, 4, pp. 581–615.
Isichei, E. (1977) *History of West Africa since 1800* (London: Macmillan).
Issawi, C. P. (1954) *Egypt at Mid-Century* (London: OUP.
Issawi, C. P. (1963) *Egypt in Revolu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OUP).

Jabavu, D. D. T. (1920) *The Black Problem* (Capo Town: Lovedale Press).
Jackson, G. S. (1970) *Music in Durban, 1860–1900* (Johannesburg: WUP).
Jackson, R. D. (1970) 'Resistance to the German invasion of the Tanganyikan coast, 1885–1891' in R. I. Rotberg and A. A. Mazrui (eds) *Protest aad Power in Black Africa*, pp. 37–79.
Jacob, G. (1966) 'Des "Temps Malgaches" à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1883–1896' (Draft Chapter XIX of *Histoire de Madagascar*: Tananarive).
Jacob, G. (1977) 'Influences occidentales en Imerina et déséquilibres économiques avant la conquête française', *Omaly sy Anio*, V–VI, pp. 223–31.
Jacob, G. (1979) 'Sur les origines de l'insurrection du sud-est de novembre–décembre 1904' (typescript ms., to be published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lgache).
James, C. L. R. (1963)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eissued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2).
Janmohamed, K. K. (1974) 'Review of J. Iliffe (ed.) *Modern Tanzanians*', *KHR*, II, 2, pp. 335–7.
Jardine, D. (1923) *The Mad Mullah of Somaliland* (London: H. Jenkins).
Jenkins, P. (ed.) (1975) *Akyem Abuakwa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in Ghana*, *MBAB*, XII.
Jewsiewicki, B. (1980) 'African peasants in the totalitarian system of the Belgian Congo' in M. Klein (ed.) *Peasants in Africa*, pp. 45–75.
Jewsiewicki, B. (forthcoming) 'Belgian Congo and Ruanda–Urundi, 1908–1940' in A. D. Roberts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VII.
Johns, S. W. (1970) 'Trade unionism, pulitical pressure group or mass movement?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of South Africa' in R. I. Rotberg and A. A. Mazrui (eds) *Protest aad Power in Black Africa*, pp. 695–754.
Johnson, G. W. (1966) 'The ascendancy of Blaise Diagne and the beginning of African politics in Senegal', *Africa*, XXXVI, 3, pp. 235–53.
Johnson, G. W. (1974) 'African political activity in French West Africa, 1900–194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pp. 542–67.
Johnson, J. J. (ed.) (1962)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PUP).
Johnston, B. F. (1958) *Staple Food Economies of Western Tropical Africa* (Stanford: SUP).
Johnston, H. H. (1899 and 1913) *A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 (Cambridge: CUP).
Jones, A. G. (n.d.) 'The Republic of Liberia, 1915-1935' (Ms prepared for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Jones, H. A. (1962)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unification in Liberia, 1847–1930' (PhD thes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Jones, W. O. (1959) *Manioc in Africa* (Stanford: SUP).
Jones-Quartey, K. A. B. (1965) *A Life of Azikiwe* (Harmondsworth: Penguin).
Julien, C. A. (1972) *L'Afrique du nord en marche* (Paris: Julliord, 3rd edn).
July, R. W. (1968) *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 (London: Faber).
Justinard, L. V. (1951) *Un grand chef berbère: le caid Goundaf* (Camblanca: Ed. Atlantides).

Kabwegyere, T. B. (1974)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Nairobi: EAPH).
Kadalie, C. (1970) *My Life and the IC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Black Trade Unionist in South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Kaddache, M. (1970) *La vie politique à Alger de 1919 à 1939* (Algiers: SNED).
Kane, C. H. (1972) *Ambiguous Adventure* (London: Heinemann).
Kaniki, M. H. Y. (1972)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1929–1939'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Kaniki, M. H. Y. (ed.) (1980)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Longman).
Kaniki, M. H. Y. (1980a) 'Introduction' in M. H. Y. Kaniki (ed.)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pp. 3–10.
Kanya-Forstner, A. S. (1971) 'Mali–Tukulor' in M.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pp. 53–79.
Karani, A. M. (1974) 'The history of Maseno School, 1906–1962, its alumni and the local society'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Nairobi).
Karefa-Smart, J. and Karefa-Smart, A. (1959) *The Halting Kingdom: Christianity and the Af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Karoui, J. (1973) 'La régence de Tunis à la veille du protectorat français: débats pour une nouvelle organisation, 1857–1877' (unpublished thesis).
Kassab, A. (1976) *Histoire de la Tunisie: l'époque contemporaine* (Tunis: STD).
Kassab, A. (1979) *L'evolution de la vie rurale dans les régions de la moyenne Medjerda et de Beja-Mateur* (Tunis: Pubn of the University of Tunis).
Kay, G. (1970) *Rhodesia: a Human Geography*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Kay, G. B. (ed.) (197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onialism in Ghana: Documents 1900–1960* (Cambridge: CUP).
Keddie, N. R. (1968) *An Islamic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Writings of Sayyid Jamāl od-Dīn 'Al-Afghan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dourie, E. (ed.) (1970) *Nation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Keltie, J. S. (1893)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London: E. Stanford).
Kent, R. K. (ed.) (1979) *Madagascar in History, Essays from the 1970s* (Berkeley: Foundation for Malagasy Studies).
Kerr, W. M. (1886) *The Far Interior*, 2 vols (London: Sampson Low).
Kessous, A. (1935) *La vérité sur le malaise algérien* (Bône).
Kesteloot, L. (1974) *Black Writers in French. A Literary History of Negritude* (Philadelphia: Temple UP).
Keyfitz, N. and Flieger, W. (1959) *World Population: an Analysis of Vital Data* (Chicago: Chicago UP).
Kibodya, G. (ed.) (1968) *Aspects of South African History* (Dar es Salaam: EAPH).
Killingray, D. (1978) 'Repercussions of World War I in the Gold Coast', *JAH*, XIX, 1, pp. 39–59.
Kilson, M. (1958)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in British West Africa', *JP*, XX, pp. 368–87.
Kilson, M. (1970) 'Emergent elites of Black Africa, 1900–1960'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I, pp. 351–98.
Kimambo, I. N. (1970)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Kamba', *Hadith*, II, pp. 79–103.
Kimambo, I. N. and Temu, A. J. (eds) (1969) *A History of Tanzania* (Nairobi: EAPH).
Kimba, I. (1979) 'Guerres et sociétés: les populations du Niger occidental au 19ème siècle et leurs réactions face à la colonisation, 1896–1906' (thèse de doctorat de 3e cycle; University of Paris).
Kimble, D. (1963)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The Rise of Gold Coast Nationalism 1850–192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ing, C. D. B. [President of Liberia] (1922) *Annual Message* (Monrovia: Government of Liberia).
King, C. D. B. (1923) *Annual Message* (Monrovia: Government of Liberia).
King, C. D. B. (1924) *Inaugural Address* (Monrovia: Government of Liberia).
King, C. D. B. (1927) *Annual Message* (Monrovia: Government of Liberia).
King, C. D. B. (1928) *Annual Message* (Monrovia: Government of Liberia).
King, K. J. (1971a) 'The Kenya Maasai and the protest phenomenon, 1900–1960', *JAH*, XII, 1, pp. 117–37.
King, K. J. (1971b) 'The nationalism of Harry Thuku', *TJH*, I, 1, pp. 39–59.
King, K. J. (1972) 'Some notes on Arnold J. Ford and New World Black attitudes to Ethiopia', *JES*, X, 1, pp. 81–7.
King, K. J. and Salim, A. (eds) (1971) *Kenya Historical Biographies* (Nairobi: EAPH).
Kingsley, M. H. (1897) *Travels in West Africa: Congo français, Corisco and Cameroons* (London: Macmillan).
Kipkorir, B. E. (1969) 'The Alliance High Schoo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enyan African elite, 1926–1962'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Kiser, C. V. (1944) 'The demographic position of Egypt', *MMFQ*, XXII, 4.
Klein, M. A. (ed.) (1968) *Islam and Imperialism in Senegal: Sine-Saloum, 1847–1914* (Stanford: SUP).
Klein, M. A. (ed.) (1980) *Peasants in Africa* (Beverly Hills: Sage).
Koerner, F. (1968) 'Les débuts du nationalism malgache 1913–40' (contribution to forthcoming *Manuel d'Histoire de Madagascar*).
Koffi, S. (1976) 'Les Agni-Diabé, histoire et société' (thèse de doctorat de 3e cycle: University of Paris I).

Kopytoff, J. H. (1965) *A Preface to Modern Nigeria: the 'Sierra-Leoneans' in Yoruba 1830–189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Krishnamurty, B. S. (1972) 'Economic policy: land and labour in Nyasaland, 1890–1914' in B. Pachai (ed.)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wi*, pp. 384–404.
Kuczynski, R. R. (1936) *Population Movem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uczynski, R. R. (1939) *The Cameroons and Togoland: a Demographic Study* (London: OUP).
Kuczynski, R. R. (1948–53) *Demographic Surve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Empire*, 3 vols (London: OUP).
Kudsi-Zadeh, A. A. (1980)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journalism in Egypt', *The Muslim World*, LXX, 1, pp. 47–55.
Kuper, H. (ed.) (1965)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uper, L. (1971) 'African nationalism in South Africa, 1910–1964'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II, pp. 424–76.
Kuran, E. (1970) *La politique ottomane face à l'occupation d'Alger par les Français* (Tunis).
Kyeyune, J. B. (1970) 'The Mubende Banyoro Committee and the struggle to reunite Bunyoro, 1916–1965' (BA diss. (History): Makerere University).

Lacheraf, M. (1965) *L'Algerie: nation et société* (Paris: Maspero).
Langer, W. L. (1935)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Vol. II (New York: Knopf).
Langley, J. A. (n.d.) 'The last stand in West Africa: resistance to British rule in West Africa, 1879–1939' (unpublished paper).
Langley, J. A. (1973) *Pan-Afric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West Africa 1900–1945. A Study in Ideology and Social Class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anternari, V. (1974) 'Nativistic and socio-religious movements: a reconsideration', *CSSH*, XVI, 4, pp. 483–503.
Last, M. (1967) *The Sokoto Caliphate* (London: Longman).
Last, M. (1974) 'Reform in West Africa: the jihād movement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II, pp. 1–29.
League of Nations (1930)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xistence of Slavery and Forced Labour in Liberia* (Monrovia).
Leith-Ross, S. (1939) *African Women: a study of the Ibo of Niger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ejeune-Choquet, A. (1906) *Histoire militaire du Congo* (Brussels: Castaigne).
Lemarchand, R. (ed.) (1977) *African Kingships in Perspective: Political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in Monarchical Settings* (London: Frank Cass).
Lemumo, A. (1971) *Fifty Fighting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 (London).
Lenin, V. I. (1916)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5 edn).
Leonard, H. (1934) *Le contrat de travail au Congo Belge et au Ruanda–Urundi (entre indigenes et maîtres civilisés)* (Brussels: Larcier).
Le Tourneau, R. (1962) *Evolution politique de l'Afrique du nord musulmane (1920–1961)* (Paris: A. Colin).
Leubuscher, C. (1963) *The West African Shipping Trade, 1909–1959* (Leyden: Sythoff).
Levine, D. N. (1974) *Greater Ethiopia: the Evolution of a Multi-ethnic Society* (Chicago: Chicago UP).
Lewis, I. M. (1961) *A Pastoral Democracy* (London: OUP).
Lewis, I. M. (1963) 'Pan-Africanism and pan-Somalism', *JMAS*, I, 2, pp. 147–61.
Lewis, I. M. (1965)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 from nation to state* (London: Longman).
Lewis, W. A. (1965) *Politics in West Africa* (London: Allen & Unwin).
Leys, C. (1975) *Underdevelopment in Keny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colonialism, 1964–1971* (London: Heinemann).
Liebenow, J. G. (1969) *Liberia: the Evolution of Privilege* (Ithaca: Cornell UP).
Lindberg, J. (1952) *A General Economic Appraisal of Libya* (New York: UN).
Linden, I. (1972) 'The Maseko Ngoni at Domwe, 1870–1900' in B. Pachai (ed.)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wi*, pp. 237–51.
Lindley, M. F. (1906) *The Acquisition and Government of Backwar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Longmans Green).
Ling, D. L. (1967) *Tunisia: from protectorate to republic* (Bloomington: Indiana UP).
Little, T. (1958) *Egypt* (London: Ernest Benn).
Lloyd, P. C. (ed.) (1966) *The New Elites of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UP).
Lloyd, P. C. (1972) *Africa in Social Chan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rev. edn).
Lochner, N. (1958) 'Anton Wilhelm Amo: a Ghana scholar in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 *THSG*, III, 3, pp. 169–79.

Lonsdale, J. M. (1968a) 'Som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in East Africa', *JAH*, IX, 1, pp. 119–46.
Lonsdale, J. M. (1968b) 'Emergence of African nations: a historiographical analysis', *AA*, LXVII, 226, pp. 11–28.
Lonsdale, J. M. (1977) 'The politics of conquest: the British in western Kenya, 1894–1908', *HJ*, XX, 4, pp. 841–70.
Louis, W. R. (1963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frican peace settlement of 1919: the pilgrimage of George Louis Beer', *JAH*, IV, 3, pp. 413–33.
Louis, W. R. (1963b) *Ruanda–Urundi, 1884–191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ouis, W. R. (ed.) (1976) *Imperialism: 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Low, D. A. (1965) 'Ugand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tectorate, 1894–1919' in V. Harlow and E. M. Chilver (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II, pp. 57–120.
Low, D. A. (1971) *The Mind of Buganda* (London: Heinemann).
Low, D. A. and Lonsdale, J. M. (1976) 'Introduction: towards the new order 1945–63' in D. A. Low and A. Smith (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III, pp. 1–63.
Low, D. A. and Smith, A. (eds) (1976)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uck, A. (1963) *African Saint: the Story of Apolo Kivebulaya* (London: SCM Press).
Luckhardt, K. and Wall, B. (1980) *Organise or Starve!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ugard, F. D. (1893) *The Rise of Our East African Empire* (London: Blackwood).
Lugard, F. D. (1919) *Politicol Memoranda* (London: Frank Cass, 1970 edn).
Lugard, F. D. (1929) *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1965 edn).
Lynch, H. R. (1967) *Edward Wilmot Blyden: Pan-Negro Patriot* (London: OUP).

Mabona, M. A. (1974)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ligions in the eastern Cape' (unpublished seminar paper: SOAS London).
Mabro, R. and Radwan, S. (1976)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gypt 1939–1973: Policy and Perform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cCall, D. F. (1964) *Africa in Time Perspective* (London: OUP).
McCracken, J. (1972)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northern Ngoniland, 1881–1904' in B. Pachai (ed.)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wi*, pp. 215–36.
McEwan, P. J. M. (ed.) (1968)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 (London: OUP).
McEwan, P. J. M. and Sutcliffe, R. B. (eds) (1965) *The Study of Africa* (London: Methuen).
McGregor, G. P. (1967) *King's College Budo: the First Sixty Years* (Nariobi: OUP).
McIntosh, B. G. (ed.) (1969) *Ngano: Studies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Mackenzie, J. (1887) *Austral Africa* (Lond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Macmillan, W. M. (1938) *Africa Emergent* (London: Faber).
Macmillan, W. M. (1963) *Bantu, Boer and Brit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cPhee, A. (1926)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in British West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1971 edn).
Mafeje, A. (1972) 'The fallacy of dual economies', *EAJ*, IX, 2.
Mair, L. (1971) 'New elites in East and West Africa' in V. Turner (ed.)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II, pp. 167–92.
Makonnen, R. (1973) *Pan-Africanism from Within* (Nairobi: OUP).
Malgeri, F. (1970) *La Guerra Libica* (Rome: Edizione de Storia e Litteratura).
Maltese, P. (1968) *La Terra Promessa* (Milan: Sugareditore).
Mamet, P. (1964) 'Les expériences syndicales en Tunisie, 1881–1956' (unpublished thesis).
Mangat, J. S. (1969) *History of the Asians in East Africa* (London: OUP).
Marais, J. S. (1957) *The Cape Coloured People, 1852–1932* (Johannesburg: WUP).
Marcum, J. (1969) *The Angol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Marcus, H. G. (1969) 'Imperialism and expansionism in Ethiopia from 1865 to 1900'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 pp. 420–61.
Marcus, H. G. (1975) *The Life and Times of Menelik II: Ethiopia 1844–191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garido, A. (1972) 'The Tokoist church and Portuguese colonialism in Angola', in R. Chilcote (ed.) *Protest and Resistance in Angola and Brazil*, pp. 29–52.
Marks, S. (1970) *Reluctant Rebellion: the 1906–1908 Disturbances in Nat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ks, S. (1972) 'Khoisan resistance to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JAH*, XIII, 1, pp. 55–80.
Marlowe, J. (1965)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London: Cresset Press, 2nd edn).
Marsot, A. L. A. (1977)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1922–193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tin, C. J. (1961) 'Population census estimates and methods in British East Africa' in K. M. Barbour and R. M. Prothero (eds) *Essays on African Population*, pp. 49–62.
Martin, R. E. R. (1897) *Report on the Nativ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South African Company* (London: HMSO).
Mashingaidze, E. (1974) 'Christianity and the Mhondero cul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astern African Religions, Limuru, June 1974).
Mason, P. (1958) *The Birth of a Dilemma* (London: OUP).
Matsebula, J. S. M. (1972) *A History of Swaziland* (Cape Town: Longman).
Matson, A. T. (1970) 'Nandi traditions on raiding', *Hadith* II, pp. 61–78.
Matt, J. R. (ed.) (1914) *Muslim World Today* (London).
Maugham, R. F. R. (1961) *The Slaves of Timbuctu* (London: Longman).
Maunier, R. (1949) *The Sociology of Colonies*,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wut, L. L. (1978) 'The Dinka resistance to Condominium rule, 1902–1932'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Mazrui, A. A. (1980) *The African Condition* (London: Heinemann).
Mbiti, J. S. (1969)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London: Heinemann).
Mead, D. C. (1967)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Egyptian Economy* (Homewood: Richard D. Irwin Inc.).
Meebelo, H. S. (1971) *Reaction to Colonialism: a Prelude to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in Northern Zambia, 1893–193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Meek, C. K. (1925) *The Northern Tribes of Nigeria*, 2 vols (London: OUP).
Meillassoux, C. (1972) 'From reproduction to produc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ES*, I, 1, pp. 93–105.
Menaut, J. (1935) 'Les raisons d'un décret', *Afrique Française*, August 1935.
Mérab, E. (1921–9) *Impressions d'Ethiopie, l'Abyssinie sous Ménélik II, par le docteur Mérab*, 3 vols (Paris: Libert & Leroux).
Merad, A. (1967) *Le reformisme musulman en Algérie de 1925 à 1940. Essai d'histoire religieuse et sociale* (Paris: Mouton).
Merlier, M. (1962) *Le Congo de la colonisation belge à l'indépendance* (Paris: Maspero).
Michel, M. (1982) 'L'Appel à l'Afrique–Contribution et réaction à l'effort de guerre en AOF, 1914–1919' (thèse de doct. d'état: University of Paris).
Middleton, L. (1936) *The Rape of Africa* (London: Robert Hale).
Milner, Lord (1921) *Report of the Special Mission to Egypt* (London: HMSO).
Minter, W. (1972) *Portuguese Africa and the We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Miracle, M. P. (1966) *Maize in Tropical Afric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iracle, M. P. (1967) 'Murdock's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food economies' in C. Gabel and N. R. Bennett (eds) *Reconstructing African Culture History*, pp. 201–25.
Mitchell, J. C. (1961) 'Wage labour and African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Central Africa' in K. M. Barbour and R. M. Prothero (eds) *Essays on African Population*, pp. 193–248.
Mitchell, P. (1954) *African Afterthought* (London: Hutchinson).
Moberly, F. J. (ed.) (1931)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Military operations: Togoland, Kamerun, 1914–1916* (London: HMSO).
Moeller, A. (1938) *Les finances publiques du Congo belge et du Ruanda–Urundi* (Brussels: Larcier).
Moffat, R. U. (1969) *John Moffat, C.M.G., Missionary*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
Molema, S. M. (1920) *The Bantu Past and Present* (Edinburgh: W. Green & Sons).
Molitor, G. (1937) 'L'introduc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ulture du caféier arabica chez les indigènes du Ruanda–Urundi', *Le Matériel Colonial*, March, pp. 156–75.
Mondlane, E. (1969) *The Struggle for Mozambique* (Harmondsworth: Penguin).
Moore, C. D. and Dunbar, A. (1969) *Africa Yesterday and Today* (New York: Praeger).
Moreira, E. (1936) *Portuguese East Africa: a Study of its Religious Needs* (London: World Dominion Press).
Morel, E. D. (1906) *Red Rubber* (London: T. Fisher Unwin).
Morel, E. D. (1920) *The Blackman's Burden* (Manchester: National Labour Press).
Moroney, S. (1978) 'Mine worker protest on the Witwatersrand, 1901–1912' in E. Webster (ed.) *Essays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ur History*, pp. 32–46.
Morrell, J. R. (1854) *Algeria: the Topography and History, Political, Social and Natural of French Africa* (London: Nathaniel Cook).
Mosley, L. (1963) *Duel for Kilimanjaro. An Account of the East African Campaign, 1914–1918*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osley, L. (1964) *Haile Selassie: the Conquering L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oulaert, G. (1945) *Souvenirs d'Afrique: 1902–1919* (Brussels: Dessart).
Mourão, F. A. A. (1977) *La présence de la culture Africaine et la dynamique du processus social brésilien* (Lagos: Collaquium).
Muffett, D. J. M. (1971) 'Nigeria – Sokoto Caliphate' in M.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pp. 269–99.
Mugomba, A. and Nyaggah, M. (eds) (1980) *Independence Without Freed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onial Educ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Santa Barbara & Oxford: ABC—Clio Press).
Mungeam, G. H. (1970) 'Masai and Kikuyu respons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JAH*, XI, 1, pp. 127–43.
Munongo, A. (1948) 'Lettere de Mwenda II Mukundabantu', *Bulletin des juridictions indigènes et du droit coutumier congolais*, XVI, pp. 199–229, 231–44.
Munro, J. F. (1975) *Colonial Rule and the Kamb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unro, J. F. (1976)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00–1960* (London: Dent).
Murdock, G. P. (1960) 'Staple subsistence crops of Africa', *GR*, I, 4, pp. 523–40.
Muriuki, G. (1972) 'Background to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in central Kenya' in B. A. Ogot (ed.)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Kenya*, pp. 1–17.
Muriuki, G. (1974) *A History of the Kikuyu, 1500–1900* (Nairobi: OUP).
Murtād, A. al-M. (1971) *Mahd'at al-adab al-'arabi al-mu'āsir fi'l-Jazā-ir*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Musham, H. V. (1951)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Beduin', *PS*, IV, 4, pp. 354–63.
Mutibwa, P. M. (1974) *The Malagasy and the Europeans: Madagascar's Foreign Relations 1861–1895* (London: Longman).
Mwanzi, H. A. (1977) *A History of the Kipsigis*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Myint, H. (1968) *The Economic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Hutchinson, 3rd edn).

Nevinson, H. W. (1906) *A Modern Slavery* (London & New York: Harper).
Newbury, C. W. (1961) *The Western Slave Coast and its Rulers. European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among the Yoruba and Adja-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western Nigeria, Southern Dahomey and Togo*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bury, C. W. and Kanya-Forstner, A. S. (1969) 'French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cramble for West Africa', *JAH*, X, 2, pp. 253–76.
Newitt, M. D. D. (1972a)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ultanate of Angoche', *JAH*, XIII, 3, pp. 397–406.
Newitt, M. D. D. (1972b) 'Angoche,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Portuguese, *c*. 1844–1910', *JAH*, XIII, 4, pp. 659–72.
Newitt, M. D. D. (1973) *Portuguese Settlement on the Zambezi* (London: Longman).
Newitt, M. D. D. (1981) *Portugal in Africa. The Last Hundred Years* (London: C. Hurst).
Newton, A. P. (1923) 'Africa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JAfS*, XXII, 88, pp. 266–77.
Niege, J. L. (1968) *L'imperialisme colonial italien de 1870 à nos jours* (Paris).
Nketia, J. H. K. (1975) *The Music of Africa* (London: Gollancz).
Nkrumah, K. (1957)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London: Nelson).
Nouschi, A. (1962) *La naissance du nationalisme algérien (1914–1954)* (Paris: Éd. de Minuit).
Nouschi, A. (1970) 'La crise de 1930 en Tunisie et les débuts du Néo-Destour', *ROMM*, VIII, pp. 113–23.
Nunes, J. (1928) 'Apontamentos para o estudo da Questão da Mao d'Obra no Districto de Inhambane', *BSGL*, XLVIII.
Nzula, A. T., Potekhin, I. I. and Zusmanovich, A. Z. (1979) *Forced Labour in Colonial Africa* (London: Zed Press).

Obichere, B. I. (1971) *West African States and European Expansion: the Dahomey-Niger Hinterland, 1885–1898* (New Haven: YUP).
Obichere, B. I. (1972) 'L'education coloniale au Sénégal: analyse structurale' in J. L. Balans, C. Coulon and A. Ricard (eds) *Problèmes et perspectives de l'education dans un état du tiers-monde: la cas du Sénégal*, pp. 7–18.
Obiechina, E. (1978) *Culture, Tradition and Society in the West African Novel* (Cambridge: CUP).
O'Brien, P. (1968) 'The long-term growt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Egypt: 1821–1962' in P. M Holt (e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Egypt*, pp. 162–95.
Ochieng, W. R. (1972) 'Colonial chiefs' in B. A. Ogot (ed.)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Kenya*, pp. 46–70.
Ochieng, W. R. (1977) *The Second Word: More Essays on Kenya History* (Nairobi: EALB).
Odinga, O. (1967) *Not Yet Uhuru* (Nairobi: Heinemann; London: Heinemann 1968).

Ogot, B. A. (1963)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the central Nyanza district of Kenya, 1900–1960', *JAH*, IV, 2, pp. 249–73.
Ogot, B. A. (1971) 'Reverend Alfayo Odongo Mango, 1870–1934' in K. J. King and A. Salim (eds) *Kenya Historical Biographies*, pp. 90–112.
Ogot, B. A. (1972a) (ed.) *War and Society in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Ogot, B. A. (1972b) (ed.)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Kenya* (Nairobi: EAPH).
Ogot, B. A. (1974a) 'A community of their ow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astern African Religions; Limuru, June 1974).
Ogot, B. A. (1974b) 'Kenya under the British, 1895 to 1963' in B. A. Ogot (ed.) (1974)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pp. 249–94.
Ogot, B. A. (ed.) (1974)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2nd edn).
Ogot, B. A. (ed.) (1975) *Hadith*, V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ast Africa*) (Nairobi: EALB).
Ogot, B. A. and Ochieng, W. R. (1972) 'Mumboism: an anti-colonial movement' in B. A. Ogot (ed.) *War and Society in Africa*, pp. 149–77.
Ogunba, O. and Irele, A. (eds) (1978) *Drama of Africa* (Ibadan: Ibadan UP).
Ohadike, P. O. (1968)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in fertility and family formation, a study of urban Africans in Lagos, Nigeria'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karo-Kojwang, M. (1969) 'Origin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Kavirondo Taxpayers' Welfare Association' in B. G. McIntosh (ed.) *Ngano: Studies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ast African History*, pp. 111–28.
Oliver, R. (1951) 'Some factors in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ast Africa, 1884–1894', *UJ*, XV, 1, pp. 49–64.
Oliver, R. (1965) *The Missionary Factor in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Oliver, R. and Atmore, A. (1972) *Africa since 1800* (Cambridge: CUP, 2nd edn).
Oliver, R. and Fage, J. D. (1962 and 1970)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st and 2nd edns).
Oliver, R. and Mathew, G. (eds) (1971) *History of East Africa: A Century of Change, 1870–1970*, Vol. I (London: Allen & Unwin).
Oloruntimehin, B. O. (1971)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independence in French West Africa, 1914–1960', *Tarikh*, III, 4.
Oloruntimehin, B. O. (1972a) *The Segu Tokolor Empire* (London: Longman).
Oloruntimehin, B. O. (1972b) 'Theories and realit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colonial French West Africa from 1890 to the First World War', *JHSN*, VI, 3, pp. 289–312.
Oloruntimehin, B. O. (1973a) 'French colonisation and African resistance in West Africa up to the First World War', *Genève-Afrique*, XII, 1, pp. 17ff.
Oloruntimehin, B. O. (1973b) 'French colonisation and African resistance in West Africa up to the First World War', *Tarikh*, IV, 3, pp. 24–34.
Oloruntimehin, B. O. (1974) 'The culture content of alien domin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ontemporary Francophone West Africa', *Symposium Leo Frobenius* (Final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rganized by German and Cameroon Commissions for UNESCO, 3–7 December 1973, Yaoundé) (Cologne: Deutsche – UNESCO – Kommission; Pullach/Munich: Verlag Dokumentation).
Olusanya, G. O. (1980)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s in Nigeria' in O. Ikime (ed.) *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 pp. 345–69.
Ominde, S. H. and Ejiogu, C. N. (eds) (1972)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Omu, F. I. A. (1968) 'The Nigerian press and the Great War', *Nigeria Magazine*, XCVI, pp. 44–9.
Omu, F. I. A. (1978) *Press and Politics in Nigeria, 1880–1957* (London: Longman).
Opoku, K. A. (1978) *West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 (Singapore: FEP).
Opoku, K. A. (1978) 'Changes within Christianity: the case of the Musama Disco Christo Church' in E. Fashole Luke, R. Gray, A. Hastings and G. Tasie (eds) *Christianity in Independent Africa*, pp. 111–21.
d'Orleans, H. P. M. (1898) *Une visite à l'empereur Ménélick: Notes et Impressions de Route* (Paris: Librairie Dentu).
Ortiz, F. (1950) *La Africanía de la Música Folklórica de Cuba* (Havana).
Orubuloye, I. O. (n.d.) 'Differentials in the provision of health services and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levels in western Nigeria: a study of Ido and Isinbode communities in Eati Division'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Ibadan).
Osuntokun, J. (1975) 'Nigeria's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Islamic insurgency in French West Africa, 1914–1918' *CEA*, XV, 1, pp. 85–93.
Osuntokun, J. (1977) 'West African armed revolt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arikh*, V, 3, pp. 6–17.
Osuntokun, J. (1978) *Nigeria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ongman).

Ousmane, S. (1970) *God's Bits of Wood* (London: Heinemann).
Ouzegane, A. (1962) *Le meilleur combat* (Paris: Julliard).
Owen, R. and Sutcliffe, B. (eds) (1972)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Longman).

Pachai, B. (ed.) (1972)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wi* (London: Longman).
Padmore, G. (1956) *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 (London: Dobson).
Page, H. J. (1975) 'Fertility patterns: levels and trends' in J. C. Caldwell (ed.) *Population Growth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West Africa*, pp. 29–57.
Page, H. J. and Coale, A. J. (1972) 'Fertility and child mortality south of the Sahara' in S. H. Ominde and C. N. Ejiogu (eds)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pp. 51–66.
Paish, G. (1909)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in other lands', *RSSJ*, LXXI, pp. 465–80.
Paish, G. (1910–11)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in individual colonial and foreign countries' *RSSJ*, LXXIV, pp. 167–87.
Palley, C. (1966)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Law of Southern Rhodesia, 1888–196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ankhurst, R. (1962a) 'The foundation and early growth of Addis Ababa to 1935', *EO*, VI, 1.
Pankhurst, R. (1962b)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printing, newspapers, book production, libraries and literacy in Ethiopia', *EO*, VI, 3, pp. 266–79.
Pankhurst, R. (1964) 'Italian settlement policy in Eritrea and its repercussions 1880–1896', *BUPAH*, I, pp. 119–56.
Pankhurst, R. (1966) 'The great Ethiopian famine of 1888–1892: a new assessment', *JHMAS*, XXI, 2, pp. 271–94.
Pankhurst, R. (1967) 'Emperor Theodore of Ethiopia: a nineteenth century visionary', *Tarikh*, I, 4, pp. 15–25.
Pankhurst, R. (1968)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1800–1935* (Addis Ababa: Haile Sellassie I UP).
Pankhurst, R. (1970) 'The Ethiopian patriots: the lone struggle', *EO*, XIII, 1, pp. 40–56.
Pankhurst, R. (1972) 'W. H. Ellis-Guillaume Enrique Ellesio: the first black American Ethiopicist?' *EO*, XV, 2, pp. 89–121.
Pankhurst, R. (1976) 'Ethiopia: 1914–35' (Ms. prepared for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Passelecq, F. (1932) *L'essor économique belge. Expansion coloniale, étude documentaire sur l'armature économique de la colonisation belge au Congo* (Brussels: Desmet-Verteneuil).
Patterson, S. (1957) *The Last Trek: a Study of the Boer People and Their Afrikaner 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earse, S. (1971) 'Metropolis and peasant: the expansion of the urban-industrial complex and the changing rural structure' in T. Shanin (ed.)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pp. 69–80.
Peel, J. D. Y. (1968) *Aladura: a Religious Movement Among the Yoruba* (London: OUP).
Peemans, J.-P. (1968) *Diffusion du progrès économique et convergence des prix* (Louvain: Éd. Nauwelaerts).
Pélissier, R. (1969) 'Campagnes militaires au sud-Angola, 1885–1915', *CEA*, IX, pp. 54–123.
Pélissier, R. (1977) *Les guerres grises: résistance et révoltes en Angola (1845–1941)* (Orgeval: Éd. Pélissier).
Pélissier, R. (1978) *La colonie du minotaure: nationalismes et révoltes en Angola (1926–1961)* (Orgeval: Éd. Pélissier).
Penn, I. G. and Bowen, J. W. E. (eds) (1902) *The United Negro: his Problems and his Progress* (Atlanta: D. F. Luther Publishing).
Penvenne, J. (n.d.) 'Preliminary chronology of labour resistance in Lourenço Marques' (unpublished paper).
Penvenne, J. (1978) 'The impact of forced labour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African working class: Lourenço Marques, 1870–190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envenne, J. (1979) 'Attitudes toward race and work in Mozambique: Lourenço Marques, 1900–1974'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 6).
Penvenne, J. (forthcoming) 'Labour struggles at the port of Lourenço Marques, Mozambique, 1900–1943'.
Perham, M. (1954) 'A restatement of indirect rule', *Africa*, VII, 3, pp. 321–34.
Perham, M. (ed.) (1948) *Mining,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Nigeria* (London: Faber).
Perham, M. (1960a) 'Psychology of African nationalism', *Optima*, X, 1, pp. 27–36.
Perham, M. (1960b) *Lugard: the Years of Authority, 1898–1945* (London: Collins).
Perham, M. (1961) *The Colonial Reckoning* (London: Collins).
Perham, M. and Bull, M. (eds) (1963) *The Diaries of Lord Lugard*, Vol. I (Evanston: NUP).

Perrings, C. (1977) 'Consciousness, conflict and proletarianization: an assessment of the 1935 mineworkers' strike on the Northern Rhodesian Copperbelt', *JSAS*, IV, 1, pp. 31–51.
Perrings, C. (1979) *Black Mineworkers in Central Africa. Industrial Strateg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African Proletariat in the Copperbelt, 1911–1941* (London: Heinemann).
Person, Y. (1960) 'Soixante ans d'évolution en pays Kissi', *CEA*, I, pp. 86–112.
Person, Y. (1968–75) *Samori: une révolution Dyula*, 3 vols (Paris: Mém. de l'IFAN).
Person, Y. (1969) 'Guinea-Samori' in M.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pp. 111–43.
Peters, C. [K.] (1902) *The Eldorado of the Ancients* (London: Arthur Pearson).
Petrides, S. P. (1964) *Le livre d'or de la dynastie salomonienne d'Ethiopie* (Paris: Plon).
Phillip, J. (1828)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London: Duncan).
Phillipson, D. W. (1977) *The Later Prehistor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himister, I. R. and van Onselen, C. (1978)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Mine Labour in Colonial Zimbabwe* (Gwelo: Mambo Press).
Plaatje, S. T. (1916) *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London: King and Sons, 2nd edn; reissued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1982).
Plancquaert, M. (1932) 'Les Jaga et les Bayaka du Kwango. Contribution historico-ethnique', *IRCBM*, III, 1, pp. 1–184.
Poncet, J. (1952) *La colonisation et l'agriculture européene en Tunisie depuis 1881* (Paris: Mouton).
Ponton, M. M. (1917)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M. Turner* (Atlanta: A. B. Caldwell).
Portal, G. L. (1892) *My Mission to Abyssinia* (London: Arnold).
Porter, D. B. (1978) *Afro-Braziliana* (Boston: G. K. Hell).
Potocki, J. (1900) *Sport in Somaliland: being an Account of a Hunting Trip in that Region* (London: R. Ward).
Price, R. S. (1973) *Maroon Societies: Rebel Slave Communities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Prothero, R. M. (1965) *Migrants and Malaria* (London: Longmans).
Prothero, R. M. (1968) 'Migr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in J. C. Caldwell and J. Okonjo (eds) *The Population of Tropical Africa*, pp. 250–73.

Rabearimanana, L. (1980) *La presse d'opinion à Madagascar de 1947 à 1956* (Antananarivo: Librairie Mixte).
Ralston, R. D. (forthcoming) *African Nationalism in Embryo: Influence of American Study Sojourns in Metamorphosis of African Colonial Leadership.*
Ramaḍān, A. M. (1968) *'Tatawura al-Ḥaraka al-Waṭaniyya fī Miṣr 1919–1936* (Cairo).
Ranger, T. O. (n.d.) *The African Churches of Tanzania* (Nairobi: EAPH).
Ranger, T. O. (1965) 'The "Ethiopia" episode in Barotseland, 1900–1905', *RLJ*, XXXVII, pp. 26–41.
Ranger, T. O. (1967)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6–1897* (London: Heinemann).
Ranger, T. O. (1968a) 'Connexions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JAH*, IX, 3, pp. 437–53; IX, 4, pp. 631–41.
Ranger, T. O. (ed.) (1968b) *Aspects of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London: Heinemann).
Ranger, T. O. (ed.) (1968c) *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Ranger, T. O. (1969) 'African reactions to the imposi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 pp. 293–324.
Ranger, T. O. (1970) *The African Voice in Southern Rhodesia* (London: Heinemann).
Ranger, T. O. (1971) 'Christian independency in Tanzania', in D. B. Barrett (ed.) *African Initiatives in Religion*, pp. 122–45.
Ranger, T. O. (1972) 'Missionary edaptation of African religious institutions: the Masasi case' in T. O. Ranger and I. N. Kimambo (eds),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frican Religion*, pp. 221–52.
Ranger, T. O. (1975) *Dance and Society in East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Ranger, T. O. and Kimambo, I. N. (eds) (1972) *The Historical Stndy of African Religion* (London: Heinemann).
Ranis, G. (ed.) (1971)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UP).
Rathbone, R. (1978) 'World War I and Africa: introduction', *JAH*, XIX, 1, pp. 1–9.
Raum, O. P. (1965) 'From tribal prophets to sect leaders' in E. Benz (ed) *Messianische Kirchen, Sekten und Bewegungen im huutigen Afrika.*
Ray, B. C. (1976) *African Religions: Symbol, Ritual and Continuit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Read, M. (1971) 'The Ngoni and Western education' in V. Turner (ed.)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II, pp. 346–92.
Republic of Liberia (1920)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October 1, 1919 to September 1920* (Monrovia: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Republic of Liberia (1930)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30 November 1930* (Monrovia: Department of State).

Republic of Liberia (1931a)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931* (Monrovia: Department of State).

Republic of Liberia (1931b)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Interior* (Monrovia: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Liberia (1934)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Thirty-seventh Legislature* (Monrovia: Department of State).

Republic of Liberia (1940) *Bureau of Statistics: Annual Report 1939* (Monrovia: Bureau of Statistics).

Republic of Liberia (1941) *Import, Export and Shipping Statistics, 1940* (Monrovia: Bureau of Revenues).

Rey, C. F. (1927) *In the Country of the Blue Nile* (London: Duckworth).

Rezette, R. (1955) *Les partis politiques marocains* (Paris: A. Colin).

Rhodie, S. (1968) 'The Gold Coast cocoa hold-up of 1930–31' *THSG*, IX, pp. 105–18.

Riccioli, B. (1661, 1672) *Geographiae et Hydrographiae Reformatae* (Bologna & Venice).

Rigby, P. (1974) 'Prophets, diviners and prophetism: the recent history of Kiganda relig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astern African Religions, Limuru, June 1974).

Roberts, A. D. (1974) *A History of the Bemba: political growth and change in north-eastern Zambia before 1900* (Madison: Wisconsin UP).

Roberts, A. D. (ed.) (forthcoming)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VII (Cambridge: CUP).

Roberts, G. W. (1954) 'Immigration of Africans into the British Caribbean', *PS*, VII, 3, pp. 235–62.

Roberts, S. H. (1929) *The History of French Colonial Policy, 1870–1925*, 2 vols (London: Frank Cass, 1963 edn).

Roberts, Z. B. H. (1934) 'Supplement' to the *Liberian Crisis*, July–August 1934 (Monrovia).

Robertson, E. M. (1977) *Mussolini as Empire-builder: Europe and Africa, 1932–6* (London: Macmillan).

Robinson, R. (1972) '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in R. Owen and B. Sutcliffe (ed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pp. 117–142.

Robinson, R. and Gallagher, J. (1961)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Robinson, R. E. and Gallagher, J. (1962)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in F. H. Hins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 pp. 593–640.

Rochet, G. (1971) *Militari e Politici nelle Preporazione delle Campagna d'Ethiopia* (Milan).

Rodd, J. R. (1923) *Diplomatic Memories: 1894–1901, Egypt and Abyssinia* (London: Arnold).

Rodney, W. (n.d.)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onial Tanzania, 1890–1934' (seminar pap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Rodney, W. (1971a) 'The year 1895 in southern Mozambique: African resistance to the imposition of European colonial rule', *JHSN*, V, 4, pp. 509–36.

Rodney, W. (1971b)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 in Ovimbundu/Portuguese relations' (seminar pap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Rodney, W. (1972)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Rodrigues, J. H. (1964) *Brasil e Africa outro Horizonte* (Rio de Janeiro: Civilizacão Brasileira).

Rodrigues, N. (1976) *Os Africanos no Brasil* (São Paulo: Ed. Nacional).

Rogers, S. G. (1972) 'A history of Chaga politics, 1916–1952'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Rogers, S. G. (1974) 'The Kilimanjaro Native Planters Association: administrative responses to Chagga initiatives in the 1920s', *TJH*, IV, 1 & 2, pp. 94–114.

Rollins, C. H. (1970) *Black Troubadour: Langston Hughes* (New York: Rand McNally).

Rosberg, C. G. and Nottingham, J. (1966) *The Myth of Mau Mau: Nationalism in Kenya* (Nairobi: EAPH).

Rose, J. H. (1905)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Nations, 1870–1900* (London: Constable).

Rosen, F. (1907) *Eine deutsche Gesandschaft in Abessinien* (Leipzig: Von Veit).

Ross, D. (1971) 'Dahomey' in M.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pp. 144–69.

Ross, D. H. (1974) 'Ghanaian forowa', *African Arts*, VIII, 1, 1974, pp. 40–49.

Ross, E. A. (1925) *Report on Employment of Native Labor in Portuguese Africa* (New York: Abbott Press).

Ross, R. (1972) 'Black Americans and Italo-Ethiopian Relief 1935–1936', *EO*, XV, 2, pp. 122–31.

Rossetti, C. (1910) *Storia Diplomatic dell'Ethiopia* (Turin).

Rossini, C. C. (1935) *Italia ed Ethiopia dal Tractato d'Uccialli allà Battaglia di Adua* (Rome).

Rotberg, R. I. (1965)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the Creation of Northern Rhodesia, 1880–1924* Princeton: PUP).

Rotberg, R. I. (1966)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Central Africa: the Making of Malawi and Zambia, 1873–1964* (Cambridge, Mass: HUP).

Rotberg, R. I. and Mazrui, A. A. (eds) (1970)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New York: OUP).

Rout, L. B. (197· *The African Experience in Spanish America, 1502 Present Day* (Cambridge: CUP).
Roux, E. (1944) *S. P. Bunti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Cape Town: privately published).
Roux, E. (1964) *Time Longer than Rope* (Madison: Wisconsin UP, 2nd edn).
Rubenson, S. (1964) *Wichale XVII: the Attempt to Establish a Protectorate over Ethiopia* (Addis Ababa: Haile Sellassie I University).
Rweyemanu, J. (1974) *Under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anzania: a Study in Perverse Capitalis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ondon & Nairobi: OUP).
Rydings, J. (1932) *Report of Mission to the Kru Coast* (Monrovia), April.

Sabrī, A. al-M. (1969) *Muḥammad Farīd* (Cairo).
Sa'dallah, A. K. (1969) *Al-H'araka At Wat'anīya Al-Jazāi'rīya 1900–1930* (Beirut).
Safran, N. (1961)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an Analysis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of Egypt, 1804–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Saint-Martin, Y. (1972) *L'empire toucouleur et la France, un demi-siècle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1846–1893)* (Dakar).
Salifou, A. (1973) *Kaoussan ou la révolte Sénoussiste* (Niamey: Centre Nigérien de Recherches en Sciences Humaines).
Samkange, S. (1967) *On Trial for My Country* (London: Heinemann).
Sampson, A. (1960) *Commonsense about Africa* (London: Gollancz).
Sanderson, G. N. (1980) 'Aspects of resistance to British rule in the Southern Sudan, 1900–1928' (unpublished ms).
Sandford, C. (1946) *Ethiopia under Haile Selassie* (London: Dent).
San Marco (1940) 'Le problème des cultures obligatoires dans la production des produits d'export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Conférences à l'Ecole Coloniale).
Sarraut, A. (1923) *La mise en valeur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Paris: Payot).
Sauer, C. O. (1952) *Agricultural Origins aud Dispersals*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Sautter, G. (1966) *De l'Atlantique au fleuve Congo, une géographie du souspeuplement: République Gabonaise, République du Congo*, 2 vols (Paris & The Hague: Mouton).
Sautter, G. (1967) 'Notes sur la construction du chemin de fer Congo–Océan (1921–1934)', *CEA*, VII, 26, pp. 219–99.
Schlemmer, B. (1980) 'Conquête et colonisation du Menabe: une analyse de la politique Galliéni' in *Changements sociaux dans l'ouest malgache* (Paris: Mém. de l'ORSTOM, no. 90), pp. 109–31.
Schnee, H. (1919) *Deutsch-Ostafrika in Weltkriege* (Leipzig: Quelle & Meyer).
Schnee, H. (1926) *German Colonization Past and Future* (London: Allen & Unwin).
Schoffeleers, M. (ed.) (forthcoming) *Guardians of the Laud.*
Schoffeleers, M. (forthcoming) 'An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the Mwari shrines' in M. Sehoffeleers (ed.) *Guardians of the Land.*
Schram, R. (1971) *A History of the Nigerian Health Service* (Ibadan: Ibadan UP).
Schumpeter, J. (1955)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Cleveland & New York: World Publishing).
Schwarz, F. A. O. (1965) *Nigeria: the Tribes, the Nation, or the Race,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cott, W. R. (1966) 'The American Negro and the Italo-Ethiopian crisis, 1934–1936' (MA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Scott, W. R. (1971) 'A study of Afro-American and Ethiopian relations, 1896–1941'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Scott, W. R. (1972) 'Malaku E. Bayen: Ethiopian emissary to Black America, 1936–1941', *EO*, XV, 2, pp. 132–8.
Segal, R. and First, R. (1967) *South West Africa: Travesty of Trust* (London: André Deutsch).
Sekyi, W. E. G. (1915) *The Blinkards* (London: Heinemann, 1974 edn).
Sellassie, G. (1930–32) *Chronique du règne de Ménélik II, roi des rois d'Ethiopie* (Paris: Maisonneuve).
Salous, F. C. (1896) *Sunshine and Storm in Rhodesia* (London: Rowland Ward).
Semi-Bi, Z. (1973) 'La politique coloniale des travaux publics en Côte d'Ivoire, 1900–1940' (thèse de doctorat de 3e cycle: University of Paris VII).
Shack, W. A. (1969) *The Gurage: a People of the Ensete Culture* (London: GUP).
Shanin, T. (ed.) (1971)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Sharevskaya, B. I. (1968) 'Natzionalno osvoboditelnoe dvizeheniye religia v tropitchescoi Afrik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and religion in tropical Africa], *Voprosi nauchnogo atiesmia*, No. 5 (Moscow).
Sharkasi, M. M. (1976) *Lamahaton Ani Al Awda'a Al Iqtisudia fi Libya Athna'a Al Ahd Al Italy* (Tunisia: Addar al Arabia Lil Kitab).

Sharpe, A. (1920) 'The hinterland of Liberia', *GJ*, LV, 4, pp. 289–304.
Sheikh-Abdi, A. (1978) 'Sayyid Mohamed Abdille Hassan and the current conflict in the Horn', *HA*, I, 2.
Shepperson, G. (1968) 'Ethiopianism: past and present' in C. G. Baeta (ed.) *Christianity in Tropical Africa*, pp. 249–68.
Shepperson, G. and Price, T. (1958) *Independent African: John Chilembwe and the Origins, Sett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yasaland Native Uprising of 1915* (Edinburgh: Edinburgh UP).
Sheriff, A. M. H. (1980) 'Tanzanian societies at the time of the partition' in M. H. Y. Kaniki (ed.) (1980)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pp. 11–50.
Sherrill, M. (1973) *Unilever et l'Afrique* (Brussels: Cahiers du CEDAF, no. 4).
Shibayka, M. (1965) *Ta'rīkh Shu'ūb Wādī Al-Nīl* (Beirut).
Shibayka, M. (1978) *Al-Sudān wal Thawra al-Mahdiyya*, Vol. I (Khartoum).
Shibeika, M. (1952) *British Policy in the Sudan, 1882–1902* (London: OUP).
Shouqair, N. (1967) *Gurafiat wa Ta'rīkh al-Sūdān* (Beirut).
Shufeldt, R. W. *World Cruise: Liberia and the Liberian Boundary Dispute* (Washington DC: Naval Historical Foundation Collection, Ms Division).
Sik, E. (1964) *The History of Black Africa*, Vol. I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Silberman, L. (n.d.) *The Mad Mullah: Hero of Somali Nationalism* (London).
Simensen, J. (1974) 'Rural mass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ti-colonial protest: the Asafo movement of Akim Abuakwa, Ghana', *CJAS*, VIII, 1, pp. 25–41.
Simensen, J. (1975a) 'Nationalism from below: the Akyem Abuakwa example', *MBAB*, XII, pp. 31–57.
Simensen, J. (1975b) 'The Asafo of Kwahu, Ghana: a mass movement for local saform under colonial rule', *IJAHS*, VIII, 3, pp. 383–406.
Simons, H. J. and Simons, R. E. (1969) *Class and Calour in South Africa, 185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Simpson, C. L. (1961) *The Memoirs of C. L. Simpson* (London: Diplomatic Press).
Singh, M. (1969) *History of Kenya's Trade Union Movement to 1952* (Nairobi: EAPH).
Skinner, E. P. (1964) *The Mossi of the Upper Volta.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a Sudanese People* (Stanford: SUP).
Skinner, E. P. (1965) 'Labour migration among the Mossi of the Upper Volta' in H. Kuper (ed.)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pp. 60–84.
Skinner, R. P. (1906) *Abyssinia of to-day;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Mission sent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the King of Kings (1903–4)* (London: Arnold).
Slade, R. (1962) *King Leopold's Congo.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 (London: OUP).
Smith, C. B. (1973) 'The Giriama rising, 1914; focus fo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Kenyan hinterland, 1850–1963'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mith, E. (1929) *Aggrey of Africa: a Study in Black and White* (London: SCM Press).
Smith, H. M. (1926) *Frank, Bishop of Zanzibar: Life of Frank Weston, D.D. 1871–1924* (London: SPCK).
Smiuk, R. (1971) 'Yorube–Ijebu' in M.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pp. 170–204.
Sorrenson, M. P. K. (1968)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Settlement in Kenya* (Nairobi: OUP).
Spacensky, A. (1970) *Madagascar, cinquante ans de vie politique: de Ralaimongo à Tsiranana*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Spencer, J. (1971) 'James Beauttah: Kenya patriot' (seminar pap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Nairobi).
Spillman, G. (1968) *Souvenirs d'un colonialiste* (Paris: Presse de la Cité).
Starr, F. (1925) 'Liberia after the World War', *JNH*, X, 2, pp. 113–30.
Staten, M. (1925) *Annual Report of the Liberian Frontier Force for Fiscal Year 1924–1925* (Monrovia: Republic of Liberia).
Steer, G. L. (1936) *Caesar in Abyssini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Steinhart, E. (n.d.)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and nationalism, the Nyangire rebellion' (unpublished paper).
Stengers, J. (1957) *Combien le Congo a-t-il coûté à la Belgique?* (Brussels: ARSC).
Stengers, J. (1962) 'L'imperialisme colonial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mythe ou réalite', *JAH*, III, 2, pp. 469–91.
Stengers, J. (1969) 'The Congo Free State and the Belgian Congo before 1914'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 pp. 261–92.
Stengers, J. (1974) 'La Belgique et le Congo, politique coloniale et decolonisation. *Histoire de la Belgique Contemporaine, 1914–1970* (Brussels).

Stevens, R. P. (1967) *Lesotho, Botswana, and Swaziland* (New York: Praeger).
Stokes, E. (1966a) 'Barotseland: the survival of an African state'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The Zambezian Past: Studies in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pp. 261–301.
Stokes, E. (1966b) 'Malawi: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olonial rule, 1891–1896'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The Zambezian Past: Studies in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pp. 352–75.
Stokes, E. and Brown, R. (eds) (1966) *The Zambezian Past: Studies in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Stone, R. L. (1975) 'Rural politics in Ghana in the inter-war period: some comparisons between Akyem-Abuakwa and the state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 *MBAB*, XII, pp. 117–41.
Storme, M. (1961) 'Het ontstaan van de Kasai missie', *MARSOM*, XXIV, 3.
Summers, A. and Johnson, R. W. (1978) 'World War I conscrip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Guinea', *JAH*, XIX, 1, pp. 25–38.
Sundkler, B. G. M. (1961) *Bantu Prophets in South Africa* (London: OUP, 2nd edn).
Suret-Canale, J. (1964) *L'Afrique noire, l'ère coloniale, 1900–1945* (Paris: Éd. Sociales).
Suret-Canale, J. (1971) *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 (London: C. Hurst).
Suret-Canale, J. (1977) 'Strike movements as part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in French West Africa', *Tarikh*, V, 3, pp. 44–61.
Sutcliffe, B. (1972) 'Imperialism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in R. Owen and B. Sutcliffe (ed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pp. 171–92.
Sutherland, E. (1970) *The Original Bob: the Story of Bob Johnson, Ghana's Ace Comedian* (Accra: Anowuo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Szereszewski, R. (1965)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Economy of Ghana, 1891–1911*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Tandia, A. K. (1973) 'Bakel et la pénétration française au Soudan' (DES thesis: Faculty of Letters, University of Dakar).
Tangri, R. (1967) 'Early Asian protest in East African Protectorate', *African Quarterly*, LXXII.
Tangri, R. (1968) 'African reaction and resistance to the early colonial situation in Malawi', *JCAHA*, XXV.
Tardits, C. (1958) *Porto-Novo* (Paris & The Hague: Mouton).
Temu, A. J. (1980) 'Tanzanian societies and colonial invasion, 1875–1907' in M. H. Y. Kaniki (ed.) (1980)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pp. 86–127.
Thomas, H. B. and Scott, R. (1935) *Uganda* (London: OUP).
Thomas, R. G. (1975) 'Military recruitment in the Gold Coast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CEA*, XI, 57, pp. 57–83.
Thompson, V. and Adloff, R. (1960) *The Emerging States of Equatorial Africa* (Stanford: SUP).
Thompson, V. and Adloff, R. (1968) *Djibouti and the Horn of Africa* (Stanford: SUP).
Thornton, J. (1973) 'The state i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a reassessment' *Ufahamu*, IV, 2, pp. 113–26.
Tignor, R. (1971) 'Colonial chiefs in chiefless societies', *JMAS*, IX, 3, 339–59.
Tosh, J. (1973) 'Colonial chiefs in a stateless society: a case-study from northern Uganda', *JAH*, XIV, 4, pp. 473–90.
Tosh, J. (1978) *Clan Leaders and Colonial Chiefs in Lang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n East African Stateless Society, c. 1800–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othill, J. D. (ed.) (1948) *Agriculture in the Sudan* (London: OUP).
Touval, S. (1963) *Somali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 HUP).
Touval, S. (1966) 'Treaties, borders and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JAH*, VII, 2, pp. 279–92.
Townsend, E. R. (ed.) (1959) *President Tubman of Liberia Speaks* (London: Consolidated Co. Ltd).
Traoré, B. (1972) *The Black African Theatre and its Social Functions* (Ibadan: UP).
Trentadue, M. (1976) 'La société guinéene dans la crise de 1930: fiscalité et pouvoir d'achat', *RFHOM*, LXIII, 232–3, pp. 628–39.
Trimingham, J. S. (1962)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OUP).
Tunley, H. A. (1948) 'Revenue from land and crops' in J. D. Tothill (ed.) *Agriculture in the Sudan*, pp. 198–209.
Tupinier, M. (1940) 'L'influence du commerce sur la mise en valeur de l'AOF' (paper presented to Conférences à L'École Coloniale).
Turner, H. W. (1965) 'Pagan features in West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Practical Anthropology*, July–August 1965, pp. 145–51.
Turner, H. W. (1967) *History of an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urner, J. M. (1975) 'Les Bresiliens'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Turner, L. D. (1942) 'Some contacts of Brazilian ex-slaves with Nigeria, West Africa', *JNH*, XXVII, 1, pp. 55–67.

Turner, V. (ed.) (1971)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II, *Profiles of Change: African Society and Colonial Rule* (Cambridge: CUP).
Turton, E. R. (1972) 'Somali resistance to colonial ru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mali political activity in Kenya, 1893–1960', *JAH*, XIII, 1, pp. 119–43.
Tweedy, O. (1931) *Cairo to Persia and Back* (London: Jarrolds).

Ullendorff, E. (1960) *The Ethiopians* (London: OUP).
Union of South Africa (1922) *Report on the Martial Law Enquiry* (Pretoria: Judicial Commission).
Union of South Africa (1924) *Union of South Africa and the Great War* (Pretori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1973) *The Determina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Trends: News Summary of Findings on Interaction of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New York).
Urvoy, M. (1940) 'Le rôle économique du Commandant de cercle' (paper presented to Conférences à l'École Coloniale) (reproduced copy).
Uzoigwe, G. N. (1973) 'The slave trade and African societies', *THSG*, XIV, 2, pp. 187–212.
Uzoigwe, G. N. (1974) *Britain and the Conquest of Africa: the Age of Salisbury* (Ann Arbor: MUP).
Uzoigwe, G. N. (1976a)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hinterland in the partition of Africa', *JAS*, III, 2, pp. 183–203.
Uzoigwe, G. N. (1976b) 'The Mombasa–Victoria railway, 1890–1902', *KHR*, IV, 1.
Uzoigwe, G. N. (1977) 'The Victorians and East Africa, 1882–1900', *TJH*, V, 2, pp. 32–65.

Vail, L. (1976) 'Mozambique's chartered companies: the rule of the feeble', *JAH*, XVII, 3, pp. 389–46.
Vail, L. and White, L. (1980)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Mozambique: a Study of Quelimane District* (London: Heinemann).
Valdant, P. (1946) Article in *Marchés Coloniaux*, 19, p. 269.
Van de Kaa, D. J. (1971) 'The demography of Papua and New Guinea's indigenous population'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Van de Walle, E. (1968) 'Fertility in Nigeria' in W. Brass *et al.*, *The Demography of Tropical Africa*, pp. 515–27.
Van den Berghe, P. (ed.) (1965) *Africa: Social Problems of Change and Conflict* (San Francisco: Chandler).
Van der Laan, H. L. (1965) *The Sierra Leone Diamonds, 1952–1961* (London: OUP).
Van Onselen, C. (1973) 'Worker consciousness in black miners: Southern Rhodesia, 1900–1920', *JAH*, XIV, 2, pp. 237–55.
Van Velsen, J. (1966) 'Some early pressure groups in Malawi'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The Zambezian Past: Studies in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pp. 376–412.
Van Vollenhoven, J. V. (1920) 'Circulaire au sujet des chefs indigènes' in *Une âme de chef* (Paris: Dieval).
Vansina, J. (1966)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ansina, J. (1969) 'Du royaume Kuba au territoire des Bakuba', *EC*, XII, 2, pp. 3–54.
Vatcher, W. H. (1965) *White Lager: the Rise of Afrikaner Nationalism* (London: Pall Mall).
Vatikiotis, P. J. (1969)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Verger, P. (1968) *Flux et reflux de la traite des nègres entre le Golfe du Bénin et Bahia de Todos os Santos du 17e au 19e siècle* (Paris: Mouton).
Vidal, H. (1970) *La séparation des eglises et de l'état à Madagascar (1861–1968)* (Paris: ICDJ).
Villari, L. (1943) *Storia diplomatica del conflitto Italo-ethiopico* (Bologna: Zanichelli).
Violette, M. (1931) *L'Algérie, vivra-t-elle?* (Paris).
Virgin, E. (1936) *The Abyssinia I Knew* (London: Macmillan).
Vivo, R. V. (1978) *Ethiopia: The Unknown Revolution* (Cuba: Social Science Publishers).
Von Lettow-Vorbeck, P. E. (n.d.) *My Reminiscences of East Africa* (London: Hurst & Blackett).

Wallerstein, I. (1970a)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J. S. Coleman and C. G. Rosberg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pp. 318–39.
Wallerstein, I. (1970b) 'The colonial era in Africa: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L. H. Gann and P. Duignan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II, pp. 399–421.
Warhurst, P. (1962) *Anglo-Portuguese Relations in South-Central Africa, 1890–1900* (London: Longman).
Warwick, P. (1978) 'Black industrial protest on the Witwatersrand, 1901–1902' in E. Webster (ed.) *Essays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ur History*, pp. 20–31.
Waugh, E. (1931) *Remote People* (London: Duckworth).
Webster, E. (ed.) (1978) *Essays in Southern African Labour History* (Johannesburg: Ravan Press).

Webster, J. B. (1964) *The African Churches among the Yoruba, 188–192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ebster, J. B. and Boahen, A. A. (1967)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West Africa since 1800* (London: Longman).
Weiskel, T. C. (1980) *French Colonial Rule and the Baule Peoples, 1889–191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eiss, H. (1967) *Political Protest in the Congo* (Princeton: PUP).
Welbourn, F. B. (1961) *East African Rebels* (London: SCM Press).
Welbourn, F. B. and Ogot, B. A. (1966) *A Place to Feel at Home: a Study of Two Independent Churches in Kenya* (London: OUP).
Welch, C. E. (1966) *Dream of Unity: Pan-Africanism and Political Unification in West Africa* (Ithaca: Cornell UP).
Welsh, D. (1971) 'The growth of towns'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II, pp. 172–243.
Wheeler, D. L. (1963) 'The Portuguese in Angola, 1863–1891'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Wheeler, D. L. (1968) 'Gungunyane the negotiator: a study in African diplomacy', *JAH*, IX, 4, pp. 585–602.
Wheeler, D. L. (1972) 'Origins of African nationalism in Angola: assimilado protest writings, 1859–1929' in R. Chilcote (ed.) *Protest and Resistance in Angola and Brazil*, pp. 67–87.
Wheeler, D. L. and Christensen, C. D. (1972) 'To rise with one mind: the Bailundu war of 1902' in F.-W. Heimer (ed.) *Social Change in Angola*, pp. 53–92.
Wheeler, D. L. and Pélissier, R. (1971) *Angola* (New York: Praeger).
Wiedner, D. L. (1964) *A History of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Wiese, C. (1891) 'A Labour Question em Nossa Casa', *BSGL*, X, p. 241.
Wilks, I. (1968) 'The transmission of Islamic learning in the Western Sudan' in J. Goody (ed.)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pp. 161–97.
Wilks, I. (1975)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UP).
Willcox, W. F. (1931)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of the earth and of the continents since 165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Vol. II,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ilson, C. M. (1971) *Liberia: Black Africa in Microcosm* (New York: Harper & Row).
Wilson, F. (1971) 'Farming, 1866–1966'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II, pp. 104–71.
Wilson, M. and Thompson, L. (eds) (1971)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ishlade, R. L. (1965) *Sectarianism in Southern Nyasaland* (London: OUP).
Wolff, R. D. (1974) *The Economics of Colonialism: Britain and Kenya, 1870–1930* (New Haven & London: YUP).
Work, E. (1936) *Ethiopia: a pawn in European diplomacy* (New York).
Wright, J. (1969) *Libya* (New York: 1969).
Wylde, A. B. (1901) *Modern Abyssinia* (London: Methuen).

Xavier, A. A. C. (1889) *Estudos Coloniales* (Nova Goa).

Yancy, E. J. (1934) *Historical Lights of Liberia's Yesterday and Toda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Yapé, G. (1977) 'Histoire du Bas-Sassendra de 1893–1920' (thèse de doctorat de 3e cycle: University of Paris).
Yesufu, T. M. (1962) *An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Nigeria* (Oxford: OUP).
Young, C. (1965) *Politics in the Congo: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Princeton: PUP).
Youssoufi, A. (n.d.) 'La résistance marocaine à la prévarication étrangère' (unpublished memoir).

Zayid, M. Y. (1965) *Egypt'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Beirut: Khayats).
Zayid, M. Y. (1968) 'The origins of the Liberia Constitutionalist Party in Egypt' in P. M. Holt (e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Egypt*, pp. 334–46.
Zervos, A. (1936) *L'empire d'Ethiopie* (Alexandria).
Ziadeh, N. A. (1962) *Origins of Nationalism in Tunisia*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Faculty of Arts Pubns, Oriental Ser.).
Zulfu, I. H. (1976) *Shikân Ta'rikh Askari Lihamlat Al-Ganarāl Hicks* (Abu Dhabi).
Zwemer, M. (1914) 'Present-day journalism in the world of Islam' in J. R. Matt (ed.) *Muslim World Today* (London).

索　引